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

欧洲史系列（套装5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
欧洲史系列（套装5册）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德国总参谋部
[英] 斯宾塞·威尔金森 著
鹿婷婷 译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上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下
中世纪欧洲
[英] 理查·威廉·丘奇 著
李艳 译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

总目录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中世纪欧洲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从格拉古兄弟党争、苏拉独裁到马略改革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德国总参谋部

查理曼大帝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兴衰、百年战争与文艺复兴

中世纪欧洲

中画史鉴 全景插图版 011

[英] 理查·威廉·丘奇 著
李艳 译



全景插图版

中世纪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兴衰、百年战争与文艺复兴

[英] 理查 · 威廉 · 丘奇　著　　李艳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欧洲 /（英）理查·威廉·丘奇著；李艳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146-1633-0

Ⅰ．①中…　Ⅱ．①理…②李…　Ⅲ．①欧洲 - 中世纪史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9943号

中世纪欧洲

［英］理查·威廉·丘奇　著　　李艳　译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李　媛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37.25

字　　数：434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5146-1633-0

目录

序言
第1章　伟大的罗马帝国
第2章　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3章　基督教的黎明
第4章　君士坦丁大帝
第5章　蛮族入侵
第6章　法兰克人崛起
第7章　查理曼大帝
第8章　诺曼人入侵
第9章　封建主义和修道主义
第10章　授职权问题
第11章　早期的十字军东征
第12章　腓力二世时代的法兰西王国
第13章　君权和教权
第14章　中世纪的文化和教会组织
第15章　中世纪的信仰
第16章　两位明君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
第17章　百年战争
第18章　中世纪的西班牙
第19章　中世纪后期的中欧和北欧
第20章　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
第21章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第22章　大航海时代
第23章　文艺复兴
专有名词中外对照
返回总目录

序言

中世纪欧洲史题材宏大，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必须进行大幅压缩或删减，但这种做法看似有些鲁莽。

在我之前，许多人做过类似的尝试，如J.H.罗宾逊所著《西欧史概述》，瑞文顿出版社面向学生推出的《欧洲史纪》，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欧洲史》等。

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参阅和借鉴了许多人的著作和观点。在此，我想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其中包括家庭大学丛书系列中H.W.D.戴维斯先生对中世纪历史所作的精彩综述。尽管众多权威涉足这一领域，但我认为这本书可以称为“删减”类历史书籍的开拓者，尽管“删减”的做法有些冒险，但我相信是合理的。

我创作的初衷不是要罗列大量历史事实，而是希望让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变得鲜活、生动，让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通过阅读此书，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生活、社会的阶级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不同思想和固有偏见。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由于篇幅有限，必须删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做的确有些遗憾。但遗憾的同时，我希望可以真实再现历史、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这本书能获得成功，我首先感谢亨利·奥斯本·泰勒先生，他的作品《中世纪思想（全二卷）》是我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其次，我感谢我书中提到的所有作者、著作和研究成果。没有他们，我的书难以完成，更不用说和读者见面了。

理查·威廉·丘奇

第1章

伟大的罗马帝国

“罗马万岁！”“罗马不朽！”他们高呼口号，佩戴双头鹰徽，从欧洲北海岸到达亚洲和非洲。这些口号不仅是爱国口号，更是一种信念的表达：人类必将灭亡，个人抱负渐将消失，而罗马帝国不可战胜，亘古长存，它的名字所孕育的内涵更会永垂不朽。

在现代社会，有时提醒人们国籍还是有必要的，而罗马人从不会忘记继承罗马国籍。圣保罗要遭鞭刑时，大声宣布道：“我是罗马公民。”卫队长因为刚花了一大笔钱而获得了罗马人身份，所以未经审判前，他不敢动囚犯一根手指。

无论贫穷，还是手无寸铁，罗马人都可恣意行走世界，因为任何身处险境的罗马人都可受到保护。无论是富有还是社会地位高的非罗马人，在罗马人眼中都是“蛮族”，品性低劣，声名狼藉。

伟大的拉丁诗人维吉尔[1]说：“哦，罗马人，用罗马帝国的规则统治所有国家吧！”罗马人确实感受到了他们种族的天命。

罗马帝国向西扩张至西班牙和高卢的大西洋——一片广阔的“黑暗海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地球到这里突然消失不见；向东扩张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波斯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古巴比伦、叙利亚、犹太人聚居的巴勒斯坦、埃及、罗马[2]、迦太基[3]都成为罗马帝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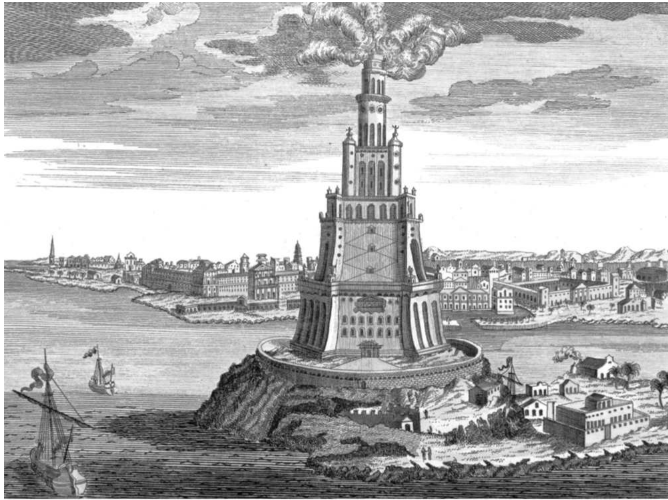
行省。这些地方曾经的光芒因罗马帝国的辉煌而显得黯淡。

第1节　古罗马的贸易线路

地中海曾经是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现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满载谷物的船只从西班牙抵达埃及，供应世界中心[4]的市场。罗马帝国正如今天的英国，国内谷物种植无法满足本国人口的需要。于是，满载生活必需品的舰队与满载东方奢侈品——丝绸、珠宝、香水的帆船，从锡兰、印度到达红海之滨，然后由骆驼商队运抵亚历山大港。

除地中海外，其他贸易线路像蜘蛛网一样相互交错，形成一张巨大的陆路网，使罗马帝国的每一部分，无论远近都紧密联系，息息相关。沿途每六英里设置一个驿站，提供四十多匹马。往返于首都、携带重要消息的信差，可在任一驿站更换马匹，从而一路风驰电掣，保证消息及时送达。

历经19个世纪车流的碾压，罗马的交通道路至今还保持完好，仍在使用，可以想象当时的道路修筑得多么坚固。道路夯实坚固的秘密正是罗马缔造者的伟大之处，他秉持一个理念：任何手工制品不应只存世几年或人的一生，而应该像罗马城一样，他相信是永恒。



亚历山大港位于埃及地中海岸，是欧洲与东方贸易的重要枢纽。绘者信息不详



罗马有著名的罗马竞技场，它目睹了无数角斗士的搏斗与死亡。让-里奥·杰罗姆绘于1872年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宣称他接收的罗马是一座砖城，但他留下的却是一座大理石城。后世之君就像奥古斯都一样热爱建筑。罗马帝国的遗迹至今依然随处可寻——大排水沟、广场、公共浴场、庄严的柱廊……罗马有著名的罗马竞技场，它目睹了无数角斗

士的搏斗与死亡；其他地方如法国南部城市尼姆的小型圆形竞技场；西班牙塞戈维亚的排水沟；英格兰的浴场，还有一个小镇以该浴场命名；罗马帝国边界矗立的高墙。这些建筑工程无一不是出自天才设计师——奥古斯都之手。奥古斯都大胆规划，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耗费巨资和人力。

参观过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的人都知道哈德良长城，它高二十英尺，宽七英尺。建造该长城的目的是抵御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入侵，保卫北方的领土。敌人一旦冲上城墙，就会发现面前还有布满尖矛的壕沟。驻守的士兵们以火光为信号，沿着绵延七十英里的长城，通过各个塔楼传递增援的消息。为了让这里固若金汤，罗马帝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

在中欧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罗马帝国修筑了同样的防御工事。这些河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既是罗马帝国第三条重要的贸易线路，也是连接中世纪与近代的桥梁。铁路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荒芜之地变成繁荣的工业中心：铁路环绕矿区、港口，穿越隧道，遍布欧洲。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世界没有铁路的样子。在罗马帝国时代，隔海的邻国之间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河运成为最早的交通方式。莱茵河向西北流，多瑙河向东南流；它们的流速不急不缓，适合航行，自然成为中欧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是罗马帝国和蛮族之间的天然屏障。

雄伟的边界墙把莱茵河和多瑙河的源头连接起来，并在每一个易攻之处建造坚固的要塞。英明的罗马皇帝希望以此守住罗马文明，防止蛮族染指。

奥古斯都警告他的继任者，要满足于现有疆域，开疆拓土会削弱帝国的实力。数个世纪之后的人们都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若罗马帝国不断扩张，会像橡皮筋一样突然断裂，戛然而止，而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通人相信罗马的版图可以无限扩大。

罗马的军队自豪地宣称“罗马的旗帜永不降落”。如果有蛮族渡过多瑙河，袭击要塞的前哨，罗马军队不仅要实施相应的报复，惩罚他们，而且要征服蛮族的领地，扩大罗马的疆域。如果征服的领地是沼泽和森林，罗马人就弃之不取；如果是牧场和良田，则必取之。很多罗马人离开喧嚣拥挤的意大利，涌向这些地方建立殖民地。商人也加快了步伐。因为没有河流、山川、大海等天然屏障保护征服的土地和移民，所以罗马政府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比如征服多瑙河北部富饶的达契亚，当时虽然显著增加了罗马的国土面积，却成为罗马未来灭亡的根源。

第2节　罗马帝国的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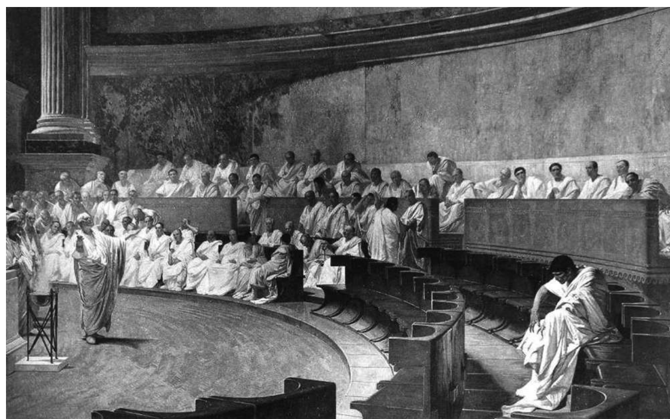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皇帝被称为“恺撒·奥古斯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军队统帅，也是正义的化身。他被奉为神明，人们必须在祭坛上屈膝下跪，为他焚香。

罗马帝国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实行共和制。它的元老院由各家族首脑组成，对人民负责。罗马帝国时代的史学家塔西佗回忆那个时代，叹息道：“那是一个愉快的时代，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用担心邻居告密，而现在家里、客栈里告密者无处不在。只要你稍不留心说错话或行为不谨慎，就会遭到揭发，被收监或判死刑。”随着罗马帝国四处征战、掠夺，独裁统治形成了。

治理一个小城市相对容易，欺骗、谋私很快就会曝光，但随着罗马帝国疆域不断扩大，政府雇用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寡廉鲜耻的政客出现了。在任期间他们大肆敛财。他们成为议员后，便不再代表人民的意愿，而是为少数富人谋利益。他们的家族成员起先在意大利任行省总督，但随着罗马帝国征战不断，其势力延伸至高卢、西班牙、埃及和小亚细亚，这些人就被派往这些地方任职。而议员和总督虽然名

义上是普通公民，但实际上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身边有成群的仆人侍奉。

令人奇怪的是，罗马人曾经如此崇尚自由，驱逐或流放压迫他们的君主，之后又遭到许多贵族的压榨和欺负，但事实上他们的变化比奴役他们的贵族阶级还大。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由各家族首脑组成，倡导言论自由。切萨雷马卡里绘于1889年

不断的征服和通婚使纯正的罗马人或拉丁人几乎绝迹。他们与健壮的日耳曼人、柔软灵活的东方人、强壮的埃及人之间的通婚日益频繁。在拥挤的罗马大街，几乎没几个人还能铭记、敬畏旧时的传统。现在，罗马代表的是武力、奢侈、文明和正义，而不再是自由和理想的化身。罗马富足强盛，欣欣向荣。人们安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根据议员的承诺和成绩，他们选出新官员。如果官员们作战失败，治下的土地歉收，没能履行承诺，充其量被免职，由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取而代之。

元老院的腐败很容易转变为独裁专制，“一人独裁好于多人独裁”，这是当时普通老百姓对屋大维独裁所持的态度。屋大维以奥古斯都的名义独揽政治和军事大权，成为第一任皇帝。如果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向“罗马七丘”[5]炫耀自己的胜利，也许他早已成为被暗杀的

对象，但他巧妙地隐藏了权力，假装自己只是国家的第一执政官。

屋大维改革了元老院，表面上提高了它的地位和尊严。奥古斯都可以不经元老院的同意发布法令或命令，但他通常以元老院的名义向公众发布法令，因为这样他不承担任何风险，而那些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高高在上的议员们事实上只是他的傀儡。

其他执政官也任由他摆布，因为他拥有绝对的军权，由此衍生出“最高统治者”“罗马皇帝”的头衔。起先他的任期是十年，届满时他向顺从的元老院请辞，但又在一片欢呼声中连任。奥古斯都的独裁统治是罗马人的幸事。

战争期间，各行省招募的军队不再宣誓效忠总督，而是效忠奥古斯都。为了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军团的入伍登记、发放军饷、解散都以至高无上的“恺撒”名义进行。军队听从奥古斯都的命令而不是上级长官的命令。

文职政府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各行省的总督曾经是小统治者，而现在只是罗马帝国的仆人。皇帝派人到各行省任职，亲自任命总督下面的官员，支付官员工资，官员们向皇帝述职。庞提乌斯·彼拉多说：“如果你放过这个人，你就不是恺撒的朋友。”并以此威胁提比略[6]时期的一位犹太行省总督，让他判一个无罪的人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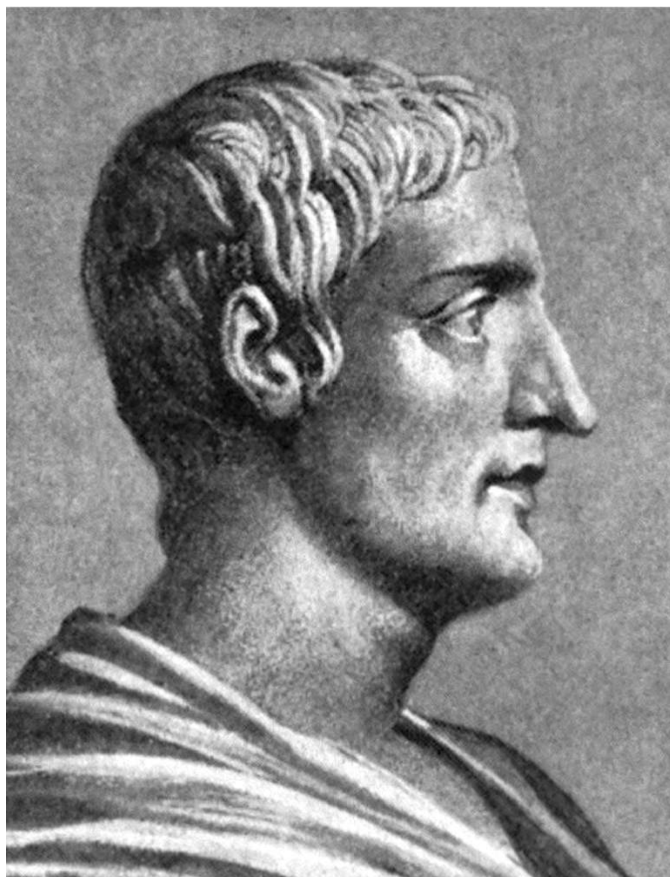
在遥远的行省，罗马皇帝的名字让人生畏，上述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总督、军事指挥官、大法官、税收官和众多在政府中任职的官员做出判决后，都会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皇帝影响这些官员的喜怒哀乐。

用现代理念衡量，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人很难催生出一个好政府，但在两千多年前，罗马人满足于皇帝的统治，只要他能保证国家的和平繁荣。至少罗马帝国早期的统治是稳固的。

除了海盗偶尔的袭扰，罗马的两支舰队在地中海巡航无须警戒。只有暴风雨才会干扰罗马的水域。驻守在叙利亚、埃及或者多瑙河、莱茵河沿岸的军队，一直防范蛮族入侵。罗马人不再热衷战争，几乎每个人都可能应征入伍的时代结束了。现在军人只是少数人的职业，更多的人满足于向国家缴税，过平民生活。



罗马帝国开国之君奥古斯都



罗马帝国皇帝提比略

一些人经营庄园，一些人当官，一些人成为律师或法官，其他人经营商店、客栈或成为雇佣劳动力，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市场出售的战俘和因欠债或犯罪被剥夺自由的平民则沦为奴隶。

罗马人口众多。大部分人住在公寓里。这种公寓很像现代城市中的贫民窟。他们中有的干点儿零活，有的无所事事。不过，在罗马空前繁荣的时期，政府通常向赤贫的饥饿人群发放粮食。皇帝经过大街时，人潮涌动。人们向他的马车抛撒鲜花，高声欢呼，好像他是上帝似的。作为回赠，皇帝会赏赐食物和娱乐节目。

建造竞技场是为了满足公众观看演出和比赛的需求。在罗马时代，人的生命廉价。皇帝吹嘘的罗马文明本质上是野蛮的。他把观看备受歧视的基督徒与狮子、角斗士的格斗作为消遣。“表演”前，满足皇帝这些嗜血欲望的受害者来到皇帝宝座前屈膝下跪，说：“我们要赴死了，向您致敬。”皇帝点头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杀人或者被杀。皇帝的权杖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却换来了国家空前的繁荣、公正和秩序。

---

[1]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欧洲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大家。他被公认为荷马之后最伟大的史诗诗人。他的代表作包括田园抒情诗《牧歌》十首，这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农事诗》四卷，发表于公元前29年；史诗《埃涅阿斯纪》十二卷，这是他晚年的重要作品。但丁、塔索、卡蒙斯、弥尔顿等诗人深受他的影响。——译者注

[2]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杀害自己的哥哥后建立的王国。——原注

[3]地中海沿岸的商业中心。——原注

[4]埃及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中心。——译者注

[5]“罗马七丘”指位于罗马台伯河东侧的七座山丘，分别是帕拉蒂诺、卡皮托利诺、埃斯奎利诺、维米纳莱、奎里那莱、凯里、阿文蒂诺。根据罗马神话，这七座山丘是罗马建城之初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译者注

[6]提比略（前42—37），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14—37年在位）。提比略早年担任过财务官、大法官和执政官，后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公元14年，奥古斯都驾崩后，经元老院一致同意，提比略登基。——译者注

第2章

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马帝国正处于黄金时代。然而，即使是在最繁荣时期，社会的种种弊端仍然露出了端倪，从而最终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独裁，即一人专制。如果独裁者不是人而是上帝，一种完美的政府组织形式就可能会出现，因为上帝可以集非凡的美德、高超的智慧和绝对的权力于一身。不幸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只是形形色色人类的代表：一些人，如奥古斯都，是伟大的统治者；另一些人，虽然是好人，但缺乏治国理政的才能；还有一些人过着罪恶的生活，把执政当作满足私欲的手段。例如罗马皇帝尼禄，他残暴、淫荡，杀害了同母异父的哥哥、母亲和妻子。他觊觎许多议员和平民的财产，就残忍地杀害他们，被杀者不计其数。在尼禄独裁统治期间，腐败横行，官员行贿受贿，肆意欺压百姓。最终，他在逃亡途中自杀，成为罗马帝国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他死后，“四帝之年”出现了。这种说法源于他死后先后有四人争夺帝位。

元老院名义上拥有立君的权力，但实际上四帝的最后获胜者维斯帕先既不是罗马人，也不是他地贵族，而是来自行省的一名战士，他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显赫的声名。他登上皇帝宝座不是由于元老院的支持，而是因为拥有拥护他的军队。现在，军队意识到其所拥有的能力。从此，手握利剑的军队才是拥立或罢黜皇帝的真正力量，尤其是罗马近卫军，其权力就是维持罗马的秩序。这

一点逐渐被认同，从而给罗马政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经常出现在某个战役中获胜的将军会想起维斯帕先的例子，并“痴迷”于这样的想法：我也许会成为下一个恺撒。随着个人野心的膨胀，将军们会向军队许诺，如果他们戴上罗马皇帝的皇冠，军队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已经成为一种交易。士兵们不再忠心耿耿，开始变得傲慢、贪婪，伴随而来的是士气低落。

元老院希望通过法律破解皇位继承的困境。法律规定皇帝要在有生之年指定继承人，继承人立刻被拥为恺撒，成为政府第二执政者，继承人的肖像被印在钱币上，被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所知晓。皇帝死后，继任者的帝位会立刻得到承认。罗马希望建立的制度，用今天英国人的话说就是——“国王永远不死”。



维持罗马秩序的近卫军

元老院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战，但是没能消除其他

阻碍政府繁荣发展的有害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皇室的花费。皇帝不仅要在财富上超越最富有的大臣，还要斥巨资建立忠诚的近卫军，此外还要让罗马居民享用免费的粮食和奢华的娱乐。

奢华的程度日益严重，罗马人不再崇尚先辈朴实的生活，朴实的生活只存在于书本中。他们反而以奴役东方人为时尚。皇帝与大臣们渐渐疏远。皇宫前厅挤满了行贿跑官的官员。在这种不健康的氛围中，猜忌和阴谋像野草一样疯长，钱就像筛子滤沙一样从皇帝的指尖滑下，一会儿跑到这个宠臣的口袋，一会儿跑到另一个宠臣的口袋。

只要二十四小时没有赐予侍臣贵重礼物，提图斯皇帝就会说“我失去了一天”。他的侍臣随时准备下跪，为他的慷慨而大声欢呼“人类的宠儿”。提图斯虽然在位仅两年，却耗尽了所有的财富，但贪婪之人对此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奢侈像瘟疫一样在罗马蔓延，贵族纷纷效仿皇室。皇帝被侍臣围绕，贵族也有门客，门客每日早晨谦恭地等候在门阶前，侍奉贵族去广场和公共浴场。门客可能是无所事事的绅士、没落的贵族子弟、专写奉承诗句的职业诗人以及知名角斗士。他们在罗马受欢迎的程度就像英国今天的网球和足球明星。门客们只有一个愿望：从怙主那里获得东西，可能是钱财，可能是垂涎的职位，最不济也是一张宴会的请柬。

第1节　罗马的庄园

随着帝国的日益强盛，贵族议员们的财富也不断增加。他们购置的大量地产，被称为“庄园”。庄园就是一个微型王国。在这片土地上，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事务一般交由管家处理。管家由受主人青睐、已获自由的奴隶担任，而小军官辅助管家。土地上的居民一般是小型农场主，他们要交纳租金或提供不同的服务以获得居住

权；最底层的是大量的奴隶，他们充当家仆、面包师、鞋匠和牧羊人。

罗马“庄园”最显著的特点是完全独立。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和衣服，都可自给自足。犯了罪的人由主人或管家来判决，如果是主人做出的判决，就很难有上诉的机会。如果小农场主苛刻、自私，那些活着的罪犯的境遇就会更悲惨。

公元4世纪，议员的平均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六万英镑，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奥里利乌斯·西玛克是那个时代年轻议员中的典型，他拥有十五座乡间庄园，遍布意大利各地，在罗马和郊区有三座连栋房。奥里利乌斯·西玛克的目标是成为罗马的执政官，这是城市的最高职位之一。为了赢得百姓的认可，他和他的父亲组织了多种公众游艺活动。他们耗资九万英镑，从非洲运来狮子和鳄鱼，购买苏格兰狗、西班牙的特种马，俘虏日耳曼战士，把他们训练成为角斗士，驱使他们在竞技场表演。

通过这位年轻议员的书信得知，他想成为执政官不是为了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而是完全出于私利，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这种现象在他那个阶层相当普遍。他们视野狭隘，缺乏公共精神，愚钝无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正在使罗马走向灭亡。

比贵族腐败更致命的是中产阶级的没落，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5世纪，马赛的一位公民说：“罗马公民的身份曾经让人如此珍视，甚至需要花大价钱才能得到，但现在人们不再趋之若鹜，甚至有些厌恶。”

第2节　罗马帝国的税收

圣保罗时期罗马帝国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奥里利乌斯·西玛克耗费巨

资，从非洲运来狮子和鳄鱼、从西班牙运来特种马的时期。罗马帝国的财富逐渐被耗尽，只有不断增加赋税才能填充国库。因此，税收规模大幅提高。

罗马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拥有大量地产的议员本应成为主要缴税者，但不幸的是，这个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市政厅和库里亚[1]完成。如果征收的赋税达不到国库的要求，库里亚有义务加入市政厅，弥补短缺的税收。

对中产阶级的库里亚而言，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库里亚的名分如泰山般压在他们头上，而且他们的儿子到十八岁时也必须接受这个荣誉，背上沉重的负担。确定地主贵族们的应缴税额是一回事，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是另一回事。当今英国，如果纳税者拒绝缴税会受到惩罚，而在罗马帝国，受到惩罚的是收税员。

议员因为拥有财富和权力，在与库里亚的较量中轻松胜出，获得免税资格或行贿中央政府派遣的检察官，赦免他们的逃税罪行。朝廷腐败横行，整个社会上行下效。

库里亚面临毁灭，他们试图寻找其他出路：最富有的人希望获得议员职衔；无法企及权力的人则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征收重税大肆聚财，所以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多少库里亚就有多少强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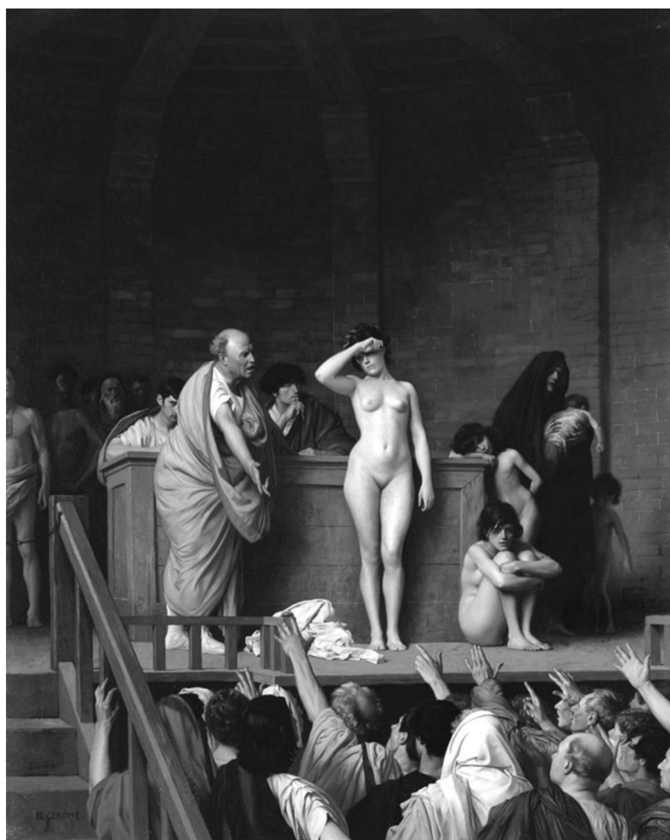
中产阶级中地位更低的一些人无力支付应缴税款，只能向他人强征，他们想尽办法剥离库里亚的身份，企图逃脱帝国政府编织的这张困住他们的大网。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近寻求地主的保护，成为“庄园”的食客，另外一些人则非法参军，还有一些人卖身为奴，因为至少主人会保证他们的衣食。

为了生存和复仇，更多的人出于无奈，铤而走险去抢劫。他们加入到犯罪团体或逃跑的奴隶当中，滋扰公路，伏击抢劫旅行者，把抢劫来的东西带到深山中或堡垒里分赃。通过欺骗和暴力，他们库里亚

的身份渐渐消失了，而其他库里亚的负担更重了。

奴隶制度的普及加剧了社会的罪恶，除了对奴隶主和奴隶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还带来了其他经济问题，比如强迫奴隶和自由劳动者共同劳动，奴隶很容易就把自由劳动者挤出市场，因为奴隶更廉价，奴隶主不需要支付奴隶薪水，可任意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自行决定奴隶的食宿条件。从这一点来说，雇用奴隶更方便，因为奴隶无论多么厌恶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条件，都无法逃离。富有的奴隶主操控着商业和贸易，他们贱卖掉自由劳动力，奴隶越来越多，自由劳力越来越少。

在罗马和其他大城市，自由劳动者也像贵族阶层一样腐败，追求奢华和享乐，他们无意于推动税收改革和废除奴隶制，只希望得到更多的免费粮食和更频繁的公共娱乐和表演。



罗马奴隶交易市场上，奴隶主竞相贱买中意的奴隶。让-里奥·杰罗姆绘于1884年

奢华的王室、腐败的政府、奴隶制度、阶级谋私，这些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但腐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酸腐蚀铁一样。尽管公众有所诟病，但不是所有的库里亚都是强盗，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不是所有的食客都怯懦可怜，很多奴隶主还会释放或帮助奴隶，奴隶也愿意为主人赴死。社会的弊害在于罗马公民对邪恶视而不见，只要没有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拒绝激进的社会改良。更可悲的是，大部分人认为罗马曾经的辉煌会庇佑现在的罗马，人们“对罗马的信任毁坏了广阔的未来”。

狭隘的视野摧毁了很多国家，罗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暴露在了被他们鄙视的“蛮族”面前，而蛮族已经开始叩击罗马帝国的

大门了。

我们知道“蛮族”仅仅是一个绰号，在罗马帝国早期是指没有得到公民身份的那些民族。

当时，最强大的“蛮族”是日耳曼人，他们定居在多瑙河北部、莱茵河西部广袤的森林和山地中，他们体型健硕高大，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凶暴的蓝眼睛，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打仗，闲暇时间打猎、赌博。

第3节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塔西佗是公元1世纪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是这样描述日耳曼人的：他们原始、愚昧、生活简单，鄙视罗马人的生活陋习。

塔西佗说，日耳曼人的部落不是集中在四周筑墙的城郭中，而是散布在广阔田野里。他们以放牧和耕种为生，牧场是公共资源。土地每年定额分配给居民。数个村庄形成一个州。数个州形成一个国家。国家的首领通常是国王，但有时只有重要的酋帅[2]才会得到最高尊重。

酋帅主持小型议会，处理国家不太重要的事，大事须交由更大的部落会议讨论，征求公众的意见。皎洁的月光下，年轻人围坐在篝火旁，倾听有经验人的意见。如果大家对他的观点很满意，就挥动武器表示同意。

议会选出地方法官，负责各州和村落的执法。与罗马复杂的法律条文相比，部落的法律很原始，无须专业律师解读。如果一个人背叛了村民，投降敌人，就会被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让所有人都知道叛逃

的后果；如果他因怯敌逃离战场，则用树枝编织成的囚笼将他套住，投入偏远的沼泽中淹死，让人们尽快忘掉耻辱；如果他出于愤怒误杀或误伤了邻居，则要交纳赔偿金，一半给受害者的家属，一半给国家，如果当事人对判决不满意，受伤者的家属可以实施同样的报复，但这样做肯定会遭到反对，因为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结下世仇，就像后来科西嘉人的仇杀，代代相传。

家族仇杀不会给日耳曼人带来荣誉。幼年时，日耳曼人就期盼获得同族亲戚赠予的盾与剑，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就长大成人了，承担起男人的责任和危险，和同伴们一起投奔部落伟大的首领，成为侍从，跟随酋帅愉快地出征打仗。

他们犹如古代的斯巴达人，出征前高呼："带着你的盾牌回来，不然就战死沙场！"

塔西佗说："在战场上，酋帅不如他人勇敢，是酋帅的耻辱；如果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了。"

这些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莽、散居的日耳曼人可以数次攻破纪律严明的罗马方阵。日耳曼妇女同男子一样刚毅，她们带来或接收的彩礼不是饰品或漂亮的衣物，而是战马、长矛或宝剑。

为了防止妇女在婚后放弃追求高贵生活的想法和逃避战争危险的心理，在成婚前夕，家人就谆谆教导她应与丈夫共劳苦、同患难，在太平时期与丈夫一同享福，遇到战争与他共渡危难。

"蛮族"妇女纯洁、勤劳、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和孩子。她们非常爱国，在战争中宁可男人牺牲也不愿他们后退。在塔西佗看来，与这些"蛮族"妇女相比，罗马帝国的妇女背信弃义、无所事事、寻欢作乐，应该受到谴责。日耳曼人可能粗野，军队纪律不甚严明，甚至贵族也缺乏教养，但他们勇敢、热情、忠诚，最重要的是他们明辨是非，不会漠视邪恶。

可能在塔西佗时代，罗马人对塔西佗的观点只是一笑了之，因为对他们而言，日耳曼人仅仅是骁勇善战而已。当日耳曼人战败，戴着沉重的枷锁走在获胜者的战车后面，日耳曼战俘高大的身躯更增添了获胜队伍的荣耀。然而，数个世纪过去了，彼此的交往改变了人们的态度，相互的鄙视和仇恨渐渐消失了。

幼时即被罗马人俘获的日耳曼人，一直生活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对奴隶主而言，这是一笔财富。他们在被囚禁的土地上长大，成为罗马公民。边界沿线的部落也逐渐开化，用原始产品和皮毛在就近的市场交换罗马人的奢侈品和享用品。日耳曼人对罗马的仇恨渐渐被羡慕所代替。罗马的伟大激发了“蛮族”的想象力，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政府的有序管理有可能带来和平稳定，部落效忠的政权不仅应该会打仗，更要懂得如何治理国家。



骁勇善战的日耳曼人





来自佛兰德斯的法兰克人

罗马皇帝愿意依据标准招募新力量，使之成为附属或联盟：来自佛兰德斯的法兰克人就遵照罗马帝国的命令，把“蛮族”同伴从莱茵河左岸驱逐回去；金发的阿勒曼尼人和撒克逊人归顺了恺撒，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干旱的非洲沙漠效力。从附属力量变成罗马正规军很容易，因为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日益拓展，罗马军团每年需要招募的人也越来越多。

之前谈到，罗马军团拥兵自重，掌握着皇帝的废立，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并不愿意当兵，因为普通士兵没有受贿和侵占财产的机会，而成为职业军人却有很多弊端。

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可以驻守南部大城市。罗马又有自己的近卫军，因此大多数军团在多瑙河和莱茵河边界驻防，更差的是在寒冷而多雾的伦敦驻防，士兵们把自己关在约克或切斯特的要塞里。今天的英国军人对在遥远的国度服役，如在埃及或印度，感到无所谓，有些人甚至很高兴，因为可以领略异域国家的风情。但罗马的士兵，正如他们说的那样，如果离开了意大利的家乡，他们的一生就算结束了，因为军队最短服役期是十六年，最长二十五年。当时，交通落后，如果想要离开军团，他们就得像奴隶逃离政府一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注定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要奉献给国家。

军人及其家属因为不断变换驻防据点，对家的记忆日渐模糊，只记得所攻占的地方。当他们老了，在战火中长大的儿子又会应召入伍，军人职业就像种姓制度一样，父传子承，代代相传。

因为缺乏共同利益，军人对普通市民没有多少好感，还鄙视他们不知如何使用武器；而普通市民认为军人粗鲁无知，他们忘记了没有军人的保护，所有的贸易和享乐都是空谈。然而，政府不去想方设法消除彼此的隔阂，相反，因为害怕失去纳税人，政府不允许库里亚入伍，于是这种隔阂加剧了。更多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哥特人被招募入伍，补充到罗马军团中，他们善战、勇敢、忠诚。

同样，如果意大利的土地无人耕种，皇帝会派“蛮族”定居，开垦土地，建设家园。起初，邻居们可能对他们充满猜疑，但后来彼此通婚，“蛮族”的孩子开始接受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后代还有可能进入市政委员会，有的甚至会成为执政官。

第4节　蛮族入侵

有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是蛮族的入侵——一群鄙视罗马的奢侈与腐败的原始部落在公元5世纪横扫阿尔卑斯山，把整个意大利

北部变成一片荒芜——这绝非事实。蛮族，无论是奴隶、商人、士兵或殖民者，对罗马的和平入侵，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罗马帝国初期。蛮族变得日益强大。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他们屡次进犯罗马边境。罗马帝国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公元5世纪，蛮族入侵达到高潮，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部分军队由半开化的蛮族士兵组成。与罗马帝国早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他们不太值得信任，因为他们的外族血统使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违背誓言，归依同族的队伍。

蛮族袭击罗马军团、进犯边境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垂涎罗马人的财富，而不是因为鄙视罗马人的奢侈生活。如果因为好战，阿勒曼尼人袭击他们的撒克逊邻居比攻打罗马军团更方便，但他们却不辞劳苦，侵犯西班牙、高卢南部、意大利平原，希望找到富裕的城市和成群的牛羊。“掠夺”是他们最早的战斗口号，但到了3世纪，迫于四周其他部落的压力，他们开始加强防范。



东部的匈奴人一路南下，追杀日耳曼人

蛮族的这次运动被称为“欧洲民族大迁徙”，这个过程就像从山洞流淌出的小溪一样，缓慢而坚定。北部的哥特人、东部的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数量巨大，一路南下到达日耳曼南部，把日耳曼人驱赶至边界。日耳曼人先到多瑙河，后到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

意大利和高卢不仅是掠夺者的天堂，更成为学习过部分罗马文化的蛮族的难民营。其他蛮族部落肆意蹂躏妇女和儿童，所到之处烧杀

抢掠，血流成河。正是他们的到来，光明的罗马进入到“黑暗时代”。

---

[1]库里亚起源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王政时代。每个库里亚包括十个氏族。当时，罗马共有三十个库里亚。库里亚大会是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之一。——译者注

[2]相当于公爵。——原注

第3章

基督教的黎明

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的皇帝时，耶稣还没诞生。除了犹太人信仰万能真神“耶和华”，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大部分民族信仰不同的神。据民间传说，这些神同在祭坛焚香的饮食男女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神是永生的，因为他们依循内心的热情和愿望去追求成功。

罗马的神“朱庇特”和希腊的神“宙斯”一样，经常被描述为“众神之主和人类之王”，但朱庇特并不是公正的裁决者和统治者，在涉及他的神话中，他都以残忍、不忠、报复心强的形象出现。“朱诺”，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天界的神后”，善妒、易怒。尤利西斯，一个坚毅勇敢的英雄，在从特洛伊返回故土的途中，遭到朱诺不断的恶意刁难。众神的信使墨丘利只是一个狡黠的小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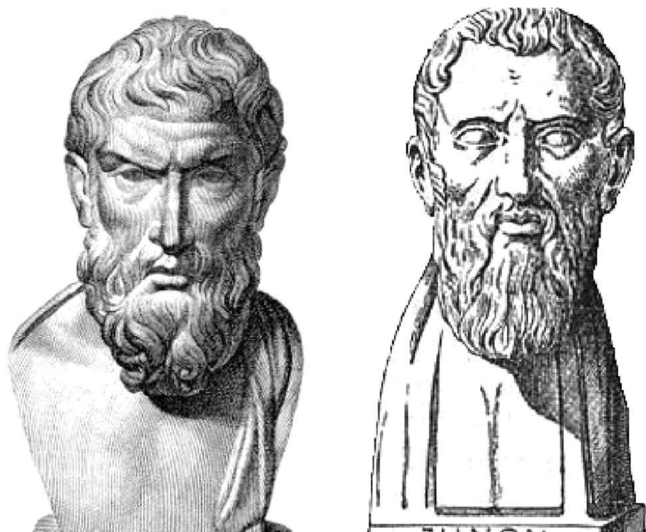
大部分有见识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知道，这些古老的神话只是原始祖先们编造的故事，用来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如火、雷电、地震。然而，这种形式的信仰在历史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所描述的爱国主义不应被彻底遗忘。因此，皇帝被上升到了众神的位置。罗马公民，无论内心信仰与否，都去祭坛焚香祭祀朱庇特、朱诺或奥古斯都，以表明对国家的忠诚。

人类发现，什么信仰都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在不停地寻找各种理论，用来解释高于他们的自然界，用来辨别是非。早在公元前

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哲学家就已经开始讨论人类灵魂问题，其中一些哲学家制定了美好生活的准则。

伊壁鸠鲁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必须以追求最多的快乐为人生目标。这个学说给很多只想为自己而活的人提供了机会，但伊壁鸠鲁本人过着简单、几近苦行僧的生活。他明确提出快乐是他的目标，但不能因为追求快乐而失去理智、高贵和正义。自我放纵的人往往因为损害了健康和性格，无法实现快乐的目标，最终以痛苦结束一生。

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芝诺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前教他的第一位弟子，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斯多葛派”。芝诺认为，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只有让自己变得冷酷麻木，直至漠视命运，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死亡、痛苦、失去朋友、不得志，这些所有的不幸，斯多葛派信徒必须平静面对，不要恐惧、痛苦或冲动。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主谋布鲁特斯就信奉斯多葛派。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得知深爱的妻子波西娅自杀时，布鲁特斯表现得很克制。



左：哲学家伊壁鸠鲁；右：哲学家芝诺

伊壁鸠鲁和芝诺的教义为罗马帝国的人们提出了奋斗的理想，却没有让人看到美好的、无尽的幸福希望。古老神话中的“地狱”，是冥河环绕的一片阴凉之地，阴森黑暗，门口守着一只三头怪兽——地狱看门狗，防止灵魂再次逃到明亮的阳光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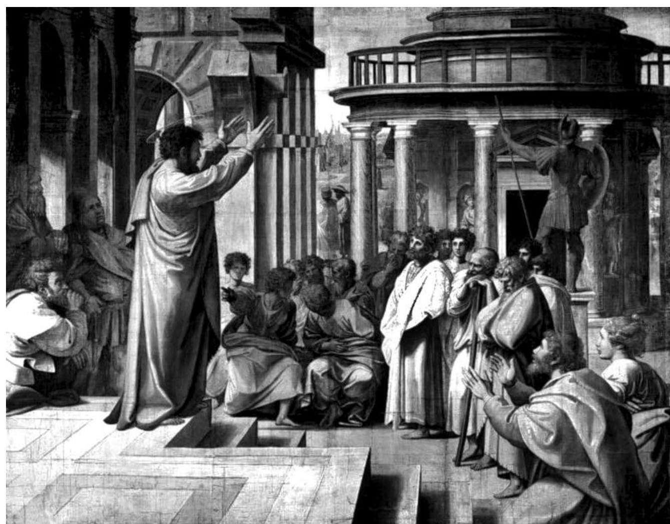
对所有思索未来的人来说，异教是悲哀的教派，这正是基督教受到热烈拥戴的原因之一。圣保罗来到雅典，发现祭坛上供奉着“无名之神”。这表明人们对旧时的信仰是不赞成的，正在为内心的疑虑和怀疑寻找答案。圣保罗试图告诉希腊人，他宣扬的基督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神，但人们觉得他的思想很荒谬，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辱而死的犹太农民竟然是神圣的。

第1节　早期的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信徒并非是像雅典人那样有教养的人，而是一些贫穷、无知的人。对他们而言，基督教义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不分阶级和国界的普世之爱。基督教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它许诺的永生和幸福，还在于它建立了衡量对错的确定的标准。犹太教制定了“十诫”作为生活准则，但犹太人从未试图劝服他人遵守这些准则，反倒小心提防非犹太教徒。而基督徒接受的教诲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即使是奴隶，在他确立了新的信仰后，就会讲给邻居听。当这些奇谈怪论传到男女主人耳朵里时，主人就会琢磨这个人虔诚信仰的东西也许是真的。



布鲁特斯的妻子波西娅自杀



圣保罗来到雅典传播基督教义

在野蛮时代，统治世界的基本是武力。基督教对妇女和痛恨暴力的高层次男人很有吸引力。敏锐之人会发现，基督教受青睐的原因之一是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温顺、平和、坚定不移。一方面基督徒遭受侮辱时懦弱容忍，另一方面他们耐心宽容，勇敢面对折磨和死亡而不放弃信仰。基督教的牺牲者告诉世界，他们的信仰里没有吝啬和沮丧。

令人奇怪的是，基督徒的行为平和、善意，却会遭到迫害。基督告诉他的信徒“恺撒的物当还给恺撒”，基督教的力量不在于反叛，而在于顺从平民政府，这是真的。然而，按时纳税、遵守本省法律的基督徒发现，很难与异教徒和平共处。像犹太人一样，基督徒们不能敬拜异教徒心中的神，不能去供奉朱庇特和奥古斯都的祭坛焚香，不能在异教徒的宴席上洒酒祭祀神明，不能在公共庆祝场合把月桂枝挂在门上表达对达芙妮女神的敬意。

因为忽视日常的风俗习惯，所以基督徒成为非基督徒邻居们猜疑和讨厌的对象。心怀恶意的人到处讹传，说基督徒的平和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其他人点头或耳语表示赞同。这种说法后来演变成谣

言，说“谋杀新生儿是基督教仪式的一部分”，并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如果基督徒很顺从，帝国政府也许会为他们正名，给他们提供保护，但基督徒们拒绝信仰其他神，所以帝国政府并不信任他们。皇帝们放松了管制，准备允许犹太和基督的神位列入他们的神明之中。罗马人无法理解基督徒排斥朱庇特和朱诺的观念，他们的信仰里没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样的戒律，所以犹太人和基督徒被指责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当政府触犯众怒时，犹太人和基督徒就成为替罪羊。



尼禄时期的罗马大火

在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发生了重大火灾，罗马城一半被烧为废墟。尼禄残忍、奢靡、不得人心，他害怕自己要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就宣布有证据表明，这场大火是基督徒策划的。于是，对基督徒的第一次严重迫害开始了。

第2节　对基督徒的迫害

我们在塔西佗的历史日志中找到了以下记述："尼禄把所有恶行都强加在基督徒身上，残酷地迫害他们。他们忍受侮辱和嘲笑，在痛苦折磨中死去。一些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些人被缝在野兽皮里，置于狂犬之前；还有一些人被涂抹上可燃材料，作为火把，照亮黑夜。尼禄的花园是这些惨景上演的固定场所，这里同时举行赛马，如果皇帝出席，将是莫大的荣耀。"

塔西佗本人是异教徒，对基督徒怀有敌意，但他承认，这种残忍激发了他的同情心。然而，在不同皇帝统治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一直存在，尽管有些皇帝是明君、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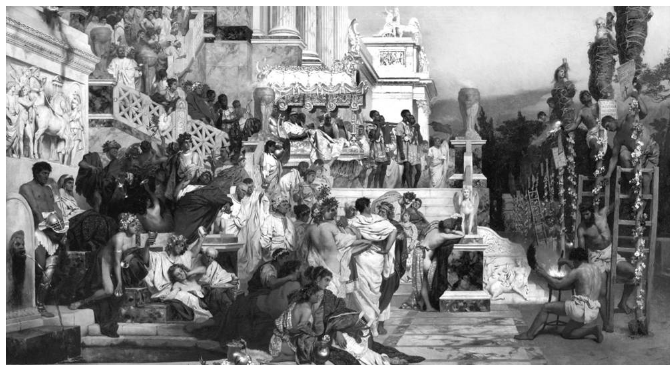
出身于西班牙行省的罗马皇帝图拉真写道："这些人[1]不应该被搜查，但如果被举报或定罪，则应该受到惩罚。"

马库斯·奥勒利乌斯宣称，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应该被活活打死。在他统治时期，在罗马帝国的每个地方，基督徒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惨遭折磨和杀害。地方法官对他们的考验几乎是相同的，被告必须在皇帝的塑像前面供奉酒和香，辱骂基督的名字。

这些末代皇帝们的动机和尼禄不一样，不是由于天性残忍，或要寻找替罪羊，而是真的害怕这个人数和财富都在稳步增长的教派，会对普通民众到神殿敬拜构成威胁，因为这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

在图拉真时代，比提尼亚总督写信给皇帝抱怨，随着基督教义的广泛传播，现在花在购买祭祀野兽上的钱很少。他还说："基督教不仅在城市渗透、蔓延，在乡村也一样。"

皇帝和地方法官一开始非常自信，他们相信如果实施严厉的惩罚，基督教就会崩溃瓦解，但事实正好相反，基督教征服了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了。



尼禄把所有恶行都强加在基督徒身上，残酷地迫害他们。他们忍受侮辱和嘲笑，在痛苦折磨中死去。一些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一些人被缝在野兽皮里，置于狂犬之前；还有一些人被涂抹上可燃材料，作为火把，照亮黑夜

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上，信徒们觉得有必要把政府的某些形式引入教会。后来，当基督教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该国各行省的基督徒们都会选出一位有影响力、有学识的人掌管这一地区的宗教事务，他们被称为“主教”，来源于希腊词语Episcopus，意思是“监督者”。传统观点认为，圣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主教。在尼禄统治时期，圣彼得因为忠于基督教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协助主教，基督教还任命了数量众多的“神父”，神父之下是“执事”，负责一些小事。雇用的第一批执事负责向穷人分发教会富有成员捐出的救济物，虽然早期收到的救济品数量有限，但处在各个阶层的不顾嘲笑和危险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人都会捐出一些物品。教会的收入开始增长，主教成为重要人物。

现在皇帝和地方法官认识到，他们的前任们对基督徒实施迫害会对政府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引发危险，因此，他们开始请教并尊敬这些市民们非常信任的人。最终，公元4世纪登上皇帝宝座的这位皇帝不再用仇恨和恐惧看待基督教，而把它当作有价值的盟友，投以友好的目光，这和他的异教徒父亲很不一样，他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1]指基督徒。——原注

第4章

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出生时，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统治着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306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在约克驾崩，他的大儿子君士坦丁继位。这位新皇帝年仅二十一岁，自幼在军中长大，他英俊、勇敢、有才华。他率领的军队纪律严明，他深受士兵爱戴。

在他统治的几年中，他与他的姐夫——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发生了争吵。君士坦丁决心越过阿尔卑斯山，把皇帝从宝座上赶下来。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罗马的军队既有精挑细选出的罗马近卫军，又有西西里人、摩尔人、迦太基人组成的军团，人数是他的军队的四倍。但君士坦丁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犹豫。他知道对手缺乏军事经验，而且罗马宫廷的腐败和奢靡也削弱了自身的精力和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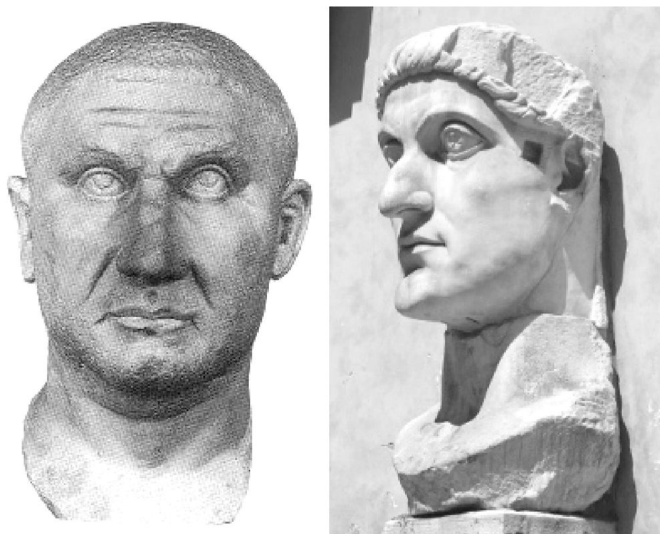
据说，君士坦丁相信上帝就在他身边，因为当他准备在意大利平原与强大的对手交战时，看见天空中闪耀的十字架，下面写着“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他马上下令命军队把十字架放在盾牌上，举着绣有同样标志的军旗进攻，结果大获全胜。罗马军队慌乱逃跑，马克森提乌斯被杀，君士坦丁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首都。罗马建造了一个刻有他名字的拱门来庆祝这个胜利。

现在君士坦丁成为整个西欧的主人。几年后，经过与东罗马皇帝

李锡尼乌斯的激战，君士坦丁成功统一罗马帝国各行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君主。

第1节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罗马帝国

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个欢乐的时刻，尽管君士坦丁直到临死前才受洗，但在他统治时期，他非常同情基督教，竭尽所能去帮助基督徒。君士坦丁大帝利用他的影响力阻止了角斗士表演，废除了十字架钉死的酷刑，改善了奴隶的境况。作为皇帝，尽管他保留了大祭司长的职位，但他尽量避免参加异教徒仪式或神殿敬拜活动。



左：东罗马皇帝李锡尼乌斯；右：君士坦丁大帝

他挚爱的母亲海伦娜王后是一位基督徒。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记述她去圣地朝拜，找到了耶稣受死的十字架，并带回来十字架上的一些木头。



海伦娜王后去圣地朝拜，找到了耶稣受死的十字架

第2节　基督教的壮大

在君士坦丁征服罗马后不久，他就发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宣布罗马帝国人人有信教自由，无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或其他异教徒。基督徒不再被当作罪犯，而是享有所有民权的合法公民，恢复基督徒被侵占的做礼拜和朝圣的地方。

后来，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他抛弃偏见，给予基督徒特别的恩惠。他不仅没收寺庙的部分财物送给教会，同时还从财

政收入中划拨出一部分钱给教会。他还试图免除牧师的税，允许主教干预民事法庭。

很多措施并不明智。当基督教受到打压或与其他宗教地位相等时，基督教吸引的是那些真正信仰基督教义的人。但当基督教占有物质优势时，那些野心勃勃的人马上看到其中的利益，信仰新的宗教是他们得到皇室恩惠、取得成功的捷径。因此，虚假的元素就会渗透进教会。

此外，很难保证教会人员甚至虔诚的基督徒不滥用特权。4世纪时，基督徒已经忘记宽容的含义，经常使用强制手段对付反对他们的人，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其他教派的教徒。在基督教早期历史中，教会饱受争议，因为大部分教义是通过“传统”或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所以对耶稣所说的话或隐晦的教义存在争议。最后，教会决定收集“天主教”的主要教义和“普世”信仰，形成人们可以学习和背诵的教义形式。“使徒信经”由此诞生了。

尽管如此，对教义解释的争论从未停止。4世纪初，三位一体教义中对圣父和圣子确切关系的描述引发了埃及教会长老阿里乌和亚历山大行省主教之间的争吵，后者宣布阿里乌否认基督的神性。虔诚的教徒各站一边，争吵愈演愈烈，最后上诉至皇帝，请他裁决。



教会收集“天主教”的主要教义和“普世”信仰，形成人们可以学习和背诵的教义形式。“使徒信经”由此诞生

君士坦丁大帝不愿干涉。他说：“他们要求我判决，但我希望基督来决断，多么无畏的疯狂！”然而，他发现，如果要维护教会的秩序，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因此，他决定召集帝国境内所有主教和牧师在尼西亚举行会议，共商大事。会期漫长，争吵激烈。有一个名叫亚大纳西的埃及执事能言善辩，判决反对阿里乌，但阿里乌拒绝承认会议做出的判决，称该判决为邪说、不合法。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主教

都属于东正教派，他们起草了新的教义表达他们的观点。教义以会议地点命名为“尼西亚信经”。它的修订版现在还在基督教世界的天主教堂广泛吟诵。

阿里乌尽管在会议上没有取得成功，但他的观点赢得了皇帝的青睐。皇帝试图说服教廷让阿里乌重回教会。皇帝本以为他有能力解决教会事务，但他的建议却遭到拒绝，皇帝震怒，动用武力让阿里乌在新建城市——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任职。东正教主教很快被关押、隔离，由此引发的骚乱一直到阿里乌死后才结束。



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帝国境内所有主教和牧师在尼西亚举行会议，共商大事

然而，教会的分裂一直在持续，彼此的怨恨对未来的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种族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现在却障碍重重。像东正教一样，阿里乌教派也具有传教士精神，半开化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部落从牧师那里学习了新的信仰。当哥特主教在尼西亚参加会议时，另一位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过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名叫乌尔斐拉斯的哥特人把大部分圣经翻译成他的母语。这是首部知名的教会圣经。它的原稿已经丢失。一个世纪后，它的抄写本收藏在乌普萨拉博物馆，用银色和金色哥特文书写在紫色羊皮纸上。

哥特人对他们的圣经怀有深深的敬畏，游牧时也放在身上，战前

会查阅圣经。汪达尔人也被阿里乌派教化，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但东正教不喜欢他们，斥之为异端，等同于异教徒。



富有传教士精神的阿里乌教派

第3节　早期的修道主义

君士坦丁大帝本人是个狂热主义者。成为阿里乌的拥护者后，君士坦丁大帝就开始迫害亚历山大行省的主教亚大纳西，把他流放到罗马。据说，一开始，罗马人都嘲笑亚大纳西，因为和他一起的还有两个戴着兜帽和斗篷的埃及修道士。当时，尽管东正教接受修道主义一段时间了，但西欧却对其知之甚少。

对抱有崇高理想的早期基督徒来说，周围的世界是邪恶的，所以无法过上基督式的生活。他们认为应该远离残酷、充满物质诱惑的环境，只有进行禁食祷告，才能亲近上帝，进入天堂。有时，一些人会去荒凉的地方，像隐士一样独居在山洞里，几个月甚至几年不与人交流。另外一些人则不必这么孤单，他们遵从特殊律条，与修道士共同生活，在早晚固定的时间吟诵礼拜圣歌，其余时间工作、祷告或学习《圣经》。

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很多苦修行为很荒谬，例如我们不会赞成坐柱者西蒙不管刮风下雨日晒，都蹲伏在高柱上，直到四肢麻木、萎缩，以此度过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修道士、隐士都是那个时代基督教的有力见证人，只是他们并未真正领会基督的教义。“愿意跟从我的人，背起他的十字架跟我走。”众多的无知信徒第一次明白了基督的牺牲精神。当看到一些熟识的人舍弃了世俗愿景和天伦之乐，过着永生不适的生活，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恩惠而非诅咒。早期教会的重要神职人员被称为“教父”，他们大多数是修道士。



坐柱者西蒙不管刮风下雨日晒，都蹲伏在高柱上，直到四肢麻木、萎缩，以此度

第4节　教父

圣格里高利和圣巴西尔就是其中两位。4世纪时，他们同在雅典大学学习。圣巴西尔在小亚细亚创建了隐修院。他的圣名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不靠花言巧语，也不许诺安逸舒适，因为修道士只被允许吃少量食物，且每日需做祷告和繁重的体力活。阿里乌教派憎恨圣巴西尔是东正教派，曾威胁说要没收他的财产，折磨他，处死他。这位隐士平静地回答道：“我唯一的财产就是一件破烂的斗篷和一些书籍，我在世间不过是朝圣，我的身体很虚弱，任何折磨都足以让我毙命，死是一种解脱。”他年仅五十岁就辞世了，但他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每日的苦修和贫困耗尽了他的生命。他留下了许多书信和神学著作，阐明了他那个时代的诸多宗教问题。

圣格里高利曾与圣巴西尔和其他修道士同住在小亚细亚，但他意志不够坚韧，无法遵守隐修院过于严苛的戒律，事实上，他说，如果不是圣巴西尔善良的母亲，他可能已经死于饥饿。后来，他返回家乡，被任命为牧师。他比圣巴西尔更温和，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和雄辩的传道士。

另一位天主教“教父”圣安布罗斯是米兰的主教，当地居民敬重他的坚强无畏，推选他为主教，尽管这并非他所愿。他曾毫不犹豫地用教会的财产，甚至熔化一些祭坛神器去救赎那些在“蛮族”入侵时被俘虏的基督徒，他说：“教会的金和银不是用来储藏的，是造福于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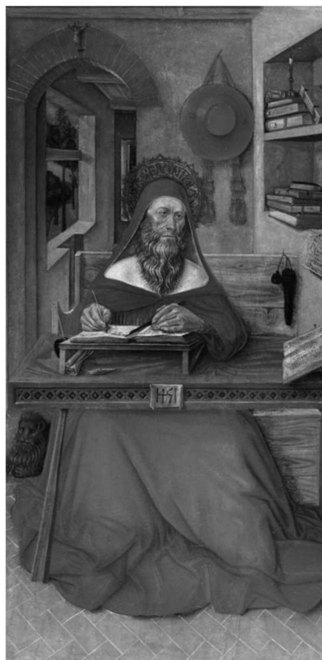
圣安布罗斯性情急躁，精力充沛，是一位天生的领袖，但他无法容忍那些持不同意见者。当时，米兰的基督徒焚烧了犹太教堂。狄奥多西皇帝命令基督徒帮助重建教堂。圣安布罗斯告诉基督徒不要理会

皇帝的命令，他说："我也会焚烧犹太教会堂，这样做只是对犹太教徒和异教徒对天主教的掠夺和破坏行为的小小报复。"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这是中世纪教会的精神。

另一位比圣安布罗斯影响力更大的教父是5世纪的修道士圣杰罗姆。他因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而被后人铭记，这本被称为"拉丁文圣经"的书是罗马天主教会至今仍承认的版本。

圣杰罗姆出生在意大利，但他非常严格地遵守着东方教会而非西方教会的苦行主义。青年时期，他过着放纵的生活，但后来突然悔悟，隐居于沙漠，用饥饿和苦行磨炼自己。他坚信这是通往天堂唯一的路。回到罗马后，他继续宣扬禁欲主义，力劝人们不要结婚，结婚是一种罪。他担心如果人们满足和享受家庭生活，就会忘记上帝。





左：圣安布罗斯；右：圣杰罗姆

许多地位显赫的家庭，尤其是妇女，都深受圣杰罗姆的影响，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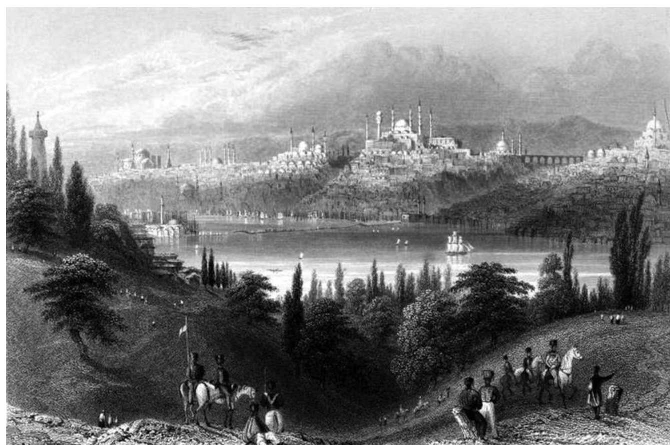
这么偏激的观点不会真正被人们接受。他期望被选为罗马主教，但树敌太多，被迫再次回到沙漠。他的虔诚不容怀疑，但他的人生观和现代诸多虔诚的基督徒一样扭曲。他相信人性的本质和尘世是邪恶的，只有压制享乐的欲望，灵魂才能得到救赎。

几个世纪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给他的追随者们讲授人性的美和价值。

第5节　君士坦丁堡的建设

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君士坦丁堡是希腊的一座移民城市，称拜占庭。这座城市建造在金角湾的岬角上，岬角被内海环绕，水深浪静，抵挡住了地中海的急流，形成一个绝好的天然港湾，整个城区宛如一座天造地设的要塞，固若金汤，扼守通往亚洲狭长的达达尼尔海峡，辖黑海入口，港口众多，成为当时以及现在俄国南部玉米和谷物的集散地。

君士坦丁大帝建都时就清楚拜占庭的地理优势。君士坦丁大帝出生在巴尔干半岛，大半生都在亚洲军中服役，后在不列颠称帝，统治他的第一个王国——高卢。意大利几乎没有在他复杂的传奇人生中留下痕迹，罗马的名字也不会让他热血沸腾。在他心中，罗马就是一座位于帝国边缘的腐朽城镇，既无港口，也无特殊的陆路军事价值，而且阿尔卑斯山还阻碍了往来信息的传递。拜占庭靠近多瑙河河口，易守难攻，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军事上监视北方边境、瞭望东方的中心。



金角湾的岬角被内海环绕，抵挡住了地中海的急流，形成一个绝好的天然港湾

拜占庭原有的城墙并不能满足君士坦丁大帝的野心。于是，他亲手设计城墙，圈定城市的标界。宫中的随从都唉声叹气道，“足够大了”“从未有哪座皇城这么大”。但君士坦丁大帝回答道：“我还会继续，直到这个看不见的守护神来到我面前才会停止。”

直至拜占庭城外的七座山被连接起来，完全裹住了新都，皇帝这才心满意足。之后，他开始在城内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伟大的建筑，如大理石广场和浴场、大理石皇宫和柱廊。一座新都——君士坦丁堡出现了。它规模宏大，豪华壮丽，在欧洲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旧城墙之外的新市场上矗立着一座“黄金城门”，它原是小修道院内的一根大理石柱，上刻有豪言：“世界的中心点”。里面屹立着君士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的雕像。此外，他还从罗马和希腊的一些城市掠夺了许多雕像装饰新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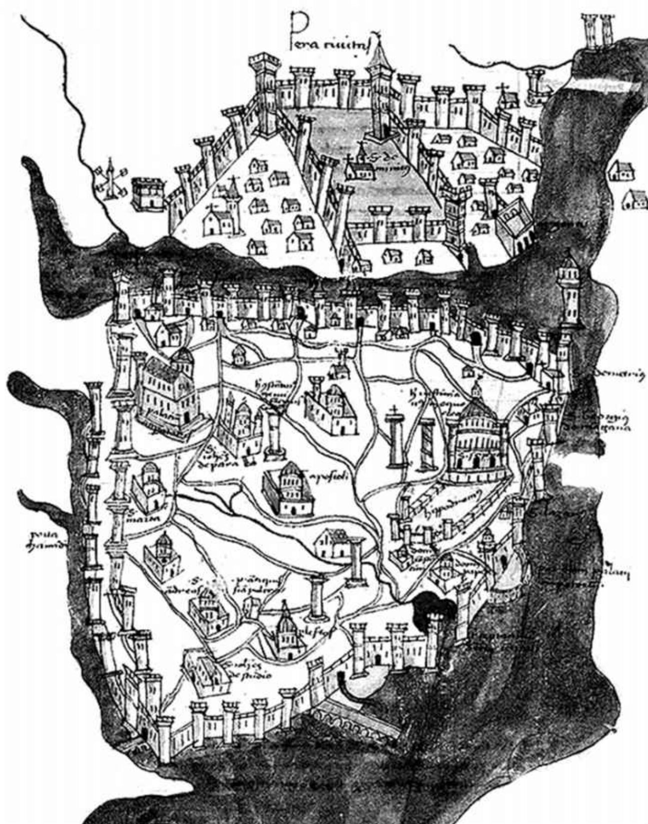
330年5月，君士坦丁堡举行庄严神圣的落成仪式。整个帝国都沉浸在节日气氛中，庆祝这一盛事，但狂欢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改变帝国的命运进程。新都城虽因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矗立一千多年，但它却以牺牲罗马为代价，彻底割裂了东西罗马帝国的利益。

尽管罗马人仰慕希腊的艺术和非凡的智慧，但从未信任过希腊

人。到4世纪，希腊夺走了本应属于征服者的荣耀，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罗马现在既无皇帝，也无高层官员。官员们在新都城忙着扩大胜利的战果。罗马只能树立新的偶像。军事辉煌的象征消失了，而基督教的信仰通过使徒和圣经的传播，为人们提供新的理想。

罗马主教宣称，献祭仪式上神赐予的礼物，经圣彼得和依次连续的按头礼传递给了他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些话表明基督似乎赋予使徒完全控制人类灵魂的权力。于是，罗马的基督徒就产生了疑问，圣彼得“捆绑或释放”的权力没有传承给他的继任者吗？如果有，他们的“神父”教皇毫无疑问就是基督教界的第一主教，因为没有其他使徒被基督赋予这样的权力。

这种推理是一闪而过的灵光，还是所有基督徒都愿意接受的理论，就不得而知了。从圣彼得开始的历任教皇都被认为只是罗马教会的主教、罗马帝国重要城市教会的“监督者”。他们受信徒的热爱和尊重，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神圣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不以个人或教派利益为重，一直秉持公正、宽容、四海一家的原则。



君士坦丁大帝亲手设计城墙，圈定城市的标界，建成新都君士坦丁堡

如果一个罗马人遭抢劫、瘟疫和饥荒，或者受到敌人的威胁，都可向罗马主教请求提供帮助和保护。当皇帝和议员都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能做到这些的力量自然就填补了皇帝的位置，教皇在罗马应运而生，正如我们在西欧看到的，上帝逐渐代表国王在人间行使权力。

希腊、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教会并不具有这样的光环。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是东方世界的轴心，拥有圣彼得赐予权力的罗马主教，既不权威，又缺乏吸引力。因此，东西方教会的裂痕继续加深，发展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337年，君士坦丁大帝驾崩，如果伟大可以用功绩来衡量，他名

副其实。天赋和创造力比他高的人都失败了，但他成功了。这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君主，臣民和敌人畏惧和敬仰的统治者，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摧毁所有威胁他实现雄心壮志的障碍，直到最终离开人世。

第5章

蛮族入侵

君士坦丁大帝没有尽力去维持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帝国一分为二，分别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外甥。在他执政末期，一系列谋杀和内战毁灭了他的家族。他的两个儿子瓦伦特和瓦伦斯出身低贱，但骁勇善战，被同时立为皇帝。瓦伦斯统治君士坦丁堡，他的哥哥瓦伦特统治米兰。正是在他们统治期间，帝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打击。

我们之前提到的哥特人是个半开化的蛮族部落，受罗马的影响，皈依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他们其中的一个部落西哥特人定居在多瑙河北部，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还算友好，但匈奴人打破了这种和平。匈奴人在亚洲平原上消失，突然横扫欧洲。一位哥特作家这样描述匈奴人，“他们的脸不能称为脸，没有脸的形状，肤色黝黑，充满褶皱，长着两个小点一样的眼睛。身材矮小但柔韧灵活，肩宽，善骑，可以隐藏在凶猛野兽的身躯之下。”

据说，这些“怪物”骑着长鬃小马，把妇女儿童踩在脚下，好食人肉。无论这些描述是否真实，他们的名字已经令文明世界胆战心惊。西哥特人与匈奴人交战几次后，被逼到了多瑙河边缘，只好恳请罗马皇帝允许他们躲避在罗马的要塞中。

瓦伦斯皇帝对这样的请求有些犹豫不决。他的领地突然涌来了整

个西哥特部落，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拒绝西哥特人的请求，逼急了他们，他们就会强行渡河进入罗马，这结果他能承受吗？

一位当代作家写道："众多的西哥特人逃离了凶残野蛮的匈奴人，二十多万名西哥特战士、妇女、儿童站在多瑙河河岸大声恸哭，伸出双手承诺，只要罗马帝国赐予他们福音，他们会成为帝国忠诚的盟友。"

瓦伦斯勉强答应了。很快，大量难民也涌入达契亚行省。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难民需要大量食物，而当地居民的食物也不充裕。别无他法，瓦伦斯只得下令进口玉米。负责执行命令的官员非常贪婪，囤积了大量粮食，以高价少量卖出，饿得半死的难民拿出仅有的微薄积蓄去购买粮食。难民愤怒、抱怨，不堪重负，最终揭竿而起。

西哥特人在达契亚行省的悲惨遭遇是罗马历史上最糟糕的一页，但罗马很快就受到了惩罚。怀疑和仇恨带来的痛苦像火苗一样迅速蔓延。罗马军团的蛮族逃兵联合蛮族力量和逃跑的奴隶，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瓦伦斯被迫采取措施保卫皇权，在阿德里安堡与西哥特人交战，罗马军队溃败，瓦伦斯皇帝战死。罗马军队损失约四万人。

第1节　狄奥多西皇帝

之前，帝国雄鹰从未败给蛮族人。西哥特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对所取得的成功保持着警觉。来到高大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前时，他们失去了进攻的勇气，北撤至色雷斯，想与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和解，要回多瑙河南部的那片土地，但狄奥多西不同意，他增派了最强大的兵力。

"爱好和平，与哥特人和平共处"，狄奥多西把这个品质传承给他

的子孙后代。在他统治时期，西哥特人和其他北方部落都受到他的恩惠。

哥特族人的一位老酋长阿森纳瑞克在君士坦丁堡拜访狄奥多西时，受到富丽堂皇的皇宫的震撼。他感叹道："现在我终于看到我经常听到，但不相信的场景。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就是世界的上帝。谁反抗他都是犯罪。"

通过与哥特人和希腊人结盟，狄奥多西暂时达到了目的。在新盟军的支持下，他打败了罗马的皇帝，征服意大利。临终之前，他把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封给大儿子阿卡迪乌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青年；把罗马城和西罗马封给年仅十一岁的小儿子霍诺里乌斯。狄奥多西相信蛮族的力量，他把外甥女嫁给汪达尔人的一位酋长斯提里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充当酋长的顾问，指挥酋长的军队。

在英明的摄政王的辅佐下，整个国家都在耐心等待年幼的君主长大，但不幸的是，霍诺里乌斯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显示出丝毫男子汉的气概，他不喜欢骑射，却对饲养公鸡、母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他每日的快乐之所在。他对罗马既无情感，也无敬畏，最后选择定居在亚得里亚海附近的拉文纳，那是王国最安全的要塞，他在那里签发命令，派兵保护边界，发布傲慢的对敌宣言。

只要斯提里科一直表现软弱，就没人会注意他。但汪达尔人高大健壮，精力充沛，胆量超群，斯提里科随时面临危险。

狄奥多西一直与西哥特人为友，但在他死之后，西哥特人开始违背联盟的誓言。阿卡迪乌斯和他的弟弟一样无能，"他很少说话，看起来无精打采，就像快睡着了似的。"蛮族不仇恨他，但也不喜欢、不惧怕他。西哥特人选出了自己的国王阿拉里克，他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将军。此时，他们开始思考新的征服和掠夺。



霍诺里乌斯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显示出丝毫男子汉的气概，他不喜欢骑射，却对饲养公鸡、母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第2节　西哥特人的入侵

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建议被搁置了，那些高耸的城墙在大海的映衬下显得坚不可摧。同时，西哥特人讨论，有没有其他很富有却不堪一击的城市？在喋喋不休的争吵声中，西哥特人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行军，目标是亚得里亚海东部沿海城市伊利里库姆，接下来是肥沃的意大利平原。

作为敌对双方的统帅，阿拉里克和斯提里科棋逢对手，不分高下。多年来历经数次艰苦的战斗和围攻，汪达尔人赶走了哥特人，然而死亡迫使斯提里科放弃挑战，罗马最终沦陷不是因为敌人手中的长剑，而是背叛的利器。

霍诺里乌斯缺乏很多优秀的品质，包括感恩，军队获胜他并不高兴。狡猾的朝臣想大发国难财，就对霍诺里乌斯说斯提里科一直觊觎他的皇位，时刻想谋害他。猜疑和恐惧使这位胆小的皇帝寝食难安，似乎如果不除掉这位英勇善战的军队统帅，他的内心将永远不会安宁，最后他下令处死斯提里科。于是，意大利落入阿拉里克的西哥特

人之手。

横扫阿尔卑斯山后，西哥特人最后在罗马的大门前停下了。

罗马使臣大胆向城外喊话道：“我们人数众多，准备应战。”

“密草比稀草更容易割。”阿拉里克回答道。

使臣改掉了傲慢的语气，询问求和的条件。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所有的金银财宝。”

使臣惊呼道：“那给我们留下什么？”

“你们的灵魂。”西哥特人嘲笑地反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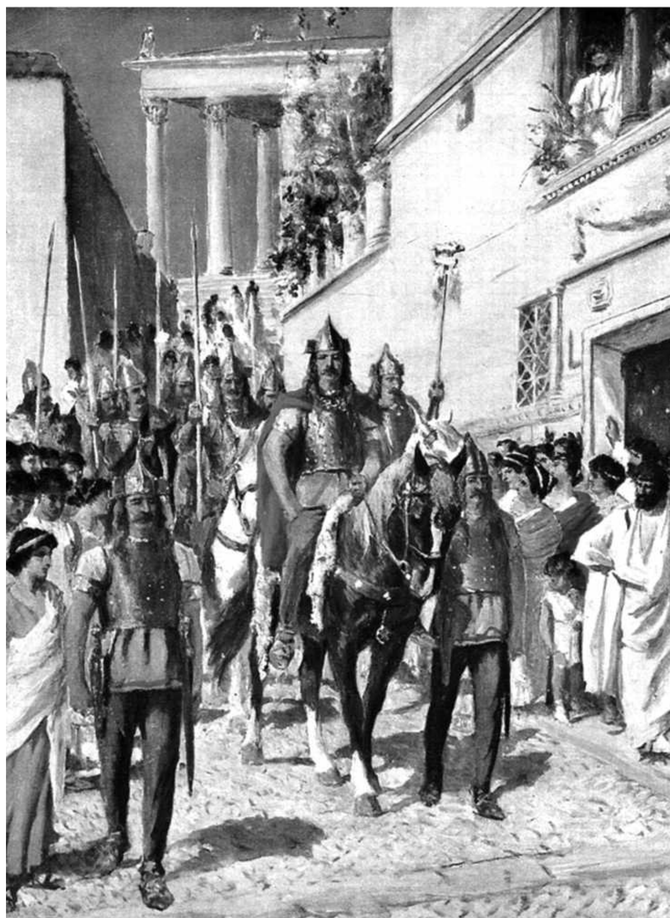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西哥特人得到想要的东西后同意北撤。但410年夏天，他们再次返回，罗马只微弱抵抗就打开了大门，敌人欢呼着拥入街道，但阿拉里克不是嗜杀成性的匈奴人。他命令军队尊重生命，不要抢夺教会和供奉在祭坛上的金银器皿。

阿拉里克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把城市洗劫一空，然后打算继续南进，侵略非洲。军队要开拔时，他病死了。他的驾崩是西哥特人的巨大损失。西哥特人放弃了继续打仗的想法。阿拉里克作为国民英雄被全民悼念。因为西哥特人无法忍受有一天敌人会亵渎阿拉里克的陵寝，所以他们在附近拦河筑坝，挖了很深的河床作陵基，接着建陵，然后把他的尸体放入，最后将河水引入旧河道中。于是，英雄被深埋水底，免遭敌人的侮辱。



西哥特人拦河筑坝，挖了很深的河床作陵基，接着建陵，然后把阿拉里克的尸体放入，最后将河水引入旧河道中。英雄得以深埋水底，免遭敌人的侮辱

对文明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罗马惨遭劫掠，年轻的皇帝霍诺里乌斯并不在意，他给自己最心爱的母鸡取名罗马。当憔悴的信使带着消息跪在他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陛下，罗马灭亡了！"霍诺里乌斯只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回答道："不可能，我今天早晨才喂过她。"



阿拉里克率西哥特人涌入罗马城的街道

圣杰罗姆在伯利恒的一所小屋隐居，听到“永恒之城”的命运也惊呆了，他说“世界灭亡了”，“没有不生锈的工艺品，没有不流逝的岁月，但罗马是永恒的！”谁能相信，她的辉煌有一天会陨落。

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罗马为什么会衰败？今天我们知道罗马的腐败已经持续几个世纪，只是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一些人开始低声抱怨，说奥林匹斯的上古之神愤怒了，因为他们的宗教被抛弃了。人们相信基督可以拯救世界，但基督拿什么去拯救罗马？

基督教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可以捍卫其事业的人——奥古斯丁，他是一位非洲的修道士，在中世纪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位异教徒，母亲是基督徒。奥古斯丁幼时狂野不羁，几年后在迦太基学习，但他生性懒散，无心学习，决定去罗马。经过米兰时，他因为好奇而聆听了圣杰罗姆的布道，并深受影响。奥古斯丁悄悄忏悔自己虚度的年华，欣然接受了神的指示，而之前母亲莫妮卡给他传福音时他却非常排斥。很快，奥古斯丁就皈依基督教并受洗。后来，他成为希波的主教。希波离迦太基不远。

很难用几句话形容奥古斯丁。同圣杰罗姆和其他早期的“教父”一样，奥古斯丁无法容忍异端邪说。邪说宣扬，凡人的爱和世间最简单的快乐就是粗心者落入魔鬼设置的陷阱，这是那个时期广为流传的观点。要反对这些邪说，就必须用火一样的热情信仰上帝，为基督教服务。

一位当代作家曾这样描述奥古斯丁：“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总结过去，提炼观点，融合自己的想法，提出新的统一形式和思想，使之持续焕发活力……最伟大的灵魂，最伟大的思想，思想跟随灵魂，灵魂指引思想——这就是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那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他全心全意热爱上帝，希望全世界和他一同信仰上帝，他布道、工作、写作都为了这个目的。他的著作《忏悔录》描述了他的青年时代和对过去的忏悔，但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全世界和他一同信仰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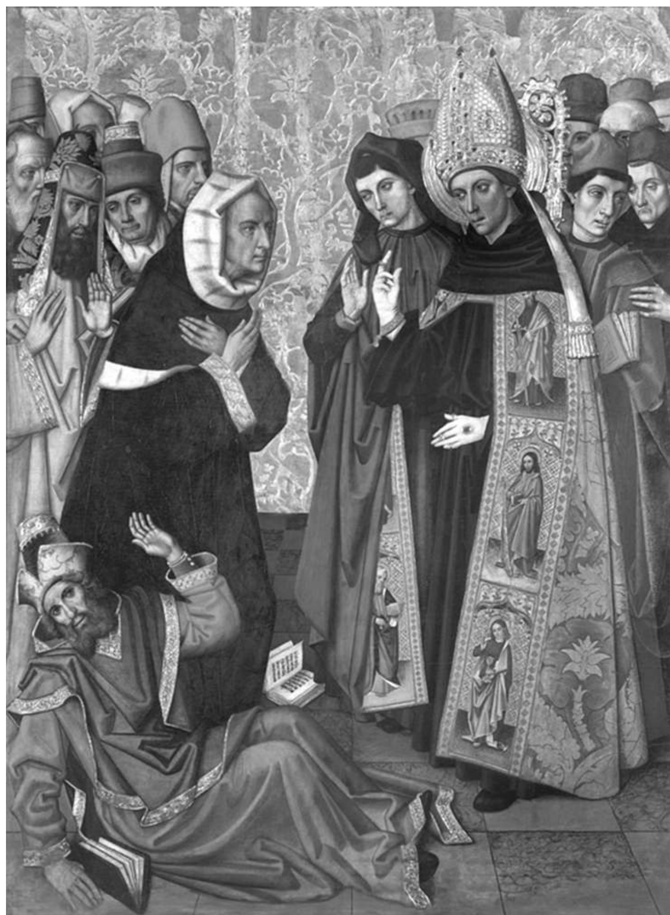
他驳斥了那些宣称罗马衰亡是因为忽视异教神灵的观点，罗马存在过，但从未也永远不会永恒，因为永恒的王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的统治下，人类从一开始就得到神的眷顾，相比上帝之城的辉煌，人类鼓吹的王国、文化、文明都必将消陨，只有上帝是永恒的。奥古斯丁用他的雄辩和推理能力从历史的角度证明神的旨意是重要的、可信的。

第3节　汪达尔人的入侵

《上帝之城》作者的信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在他去世之时，世界正面临荒芜和恐惧。人们看不到美好和希望。罗马任由蛮族践踏。非洲基督教发展受到束缚，并快速衰落。新的侵略者——汪达尔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斯提里科从莱茵河撤回军队去抵挡西哥特人进攻意大利时，汪达尔人乘机突破防守薄弱的边境进入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然后继续南进。

西班牙是罗马最富有的行省，除了矿藏丰富、粮食充裕，还盛产作家和诗人。在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西班牙和它的近邻一样，也滋生了腐败和厌战情绪。因此，汪达尔人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开始肆意抢劫和掠夺。汪达尔人没有就此止步、安定下来。继续掠夺的欲望和其他蛮族部落紧随其后的压力迫使他们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按既定路线沿非洲东海岸行进。他们在西班牙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西班牙最美丽的省的名字——安达卢西亚。

当时，汪达尔人的国王是金塞里克，他不仅征服了北非大部分滨海地区，还建立了一支舰队，横行地中海。和哥特人一样，汪达尔人也皈依了基督教，但他们信仰阿里乌派，排斥东正教。尽管他们不像对手那样血腥、残忍，但他们所经之处都被洗劫一空，留下一片荒芜，所以后人用“汪达尔人”来形容肆意破坏他人财物的行为。



奥古斯丁驳斥那些宣称罗马衰亡是因为忽视异教神灵的观点

“匈奴人”的名声更坏。5世纪上半叶，在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匈奴人成功横跨欧洲。阿提拉被称为“上帝之鞭”。他的铁骑所经之处，寸草不留。匈奴人矮胖丑陋，鼻子扁平，皮肤黝黑，双眼深陷。他们生气时会用力翻滚，令人生畏。他们的首领不仅喜欢恫吓敌人，而且喜欢恫吓下属的部落头领。阿提拉对同情、温柔、文明这样的词汇一无所知，甚至憎恶这些字眼。他的军队占领了城市，城里的老人、妇女、牧师和儿童都没有逃脱他的屠刀。

阿提拉的野心是使全世界的人听到“阿提拉”的名字都会战栗，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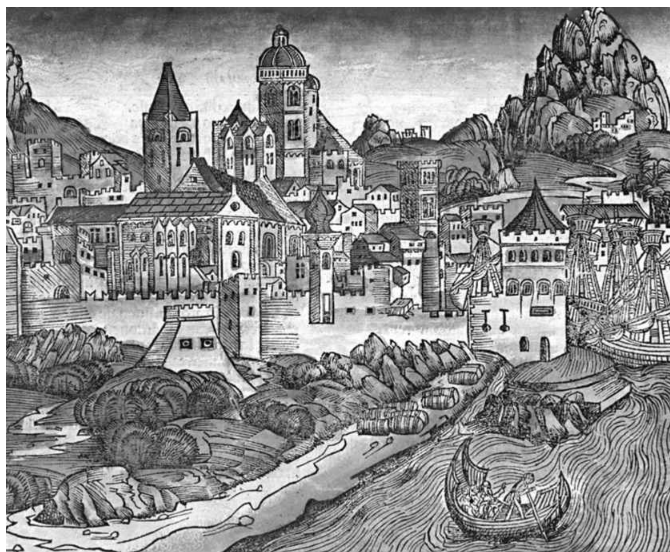
能多大程度地实现这个目标则是对他的军队的极大考验。当匈奴人到达高卢边界，阿提拉发现对手在恐惧之下集结了一支充满仇恨、人数众多、英勇无畏的军队，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里面不只有“外省人”——定居在高卢的罗马籍后裔，还有弗兰克斯人、勃艮第人和其他部落的人，如汪达尔人，他们在罗马卫戍部队削减和撤退时被迫跨过莱茵河，来到高卢。他们对匈奴人的怒火熊熊燃烧，经过沙隆之战，他们甚至把匈奴人全部赶出了西欧。



阿提拉率领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横扫亚得里亚海西北富饶的国家意大利

尽管失败动摇了阿提拉的决心，但他阴险狡诈，一心想报复，就把目光转向了意大利。他率领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到达亚得里亚海西北富饶的国家——意大利。意大利人只做微弱的抵抗就敞开了城门，城里所有的宫殿、沐浴场、露天剧场都被夷为平地，曾经富有的城市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阿提拉无意之中也做了一件好事。阿奎利亚人为了躲避凶残的敌人，逃到了亚得里亚海滨的一片充满沼泽的荒凉半岛。经过数百年的经营，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座新城——威尼斯，后来被称为“亚得里亚海女皇”。阿奎利亚曾经也是一座极富盛名的城市，但远不及威尼斯辉煌。威尼斯这座建于中世纪的城市四周层峦叠嶂、沼泽密布，非常安全，吸引了许多航海企业。



阿奎利亚曾经也是一座极富盛名的城市，但远不及威尼斯辉煌

阿提拉从亚得里亚行省到达罗马，但他并未掠劫罗马，据说是因为在沙隆战役中打败他的高卢军队还尾随其后，要切断他回撤阿尔卑斯山的路线，于是他同意按照教皇拟定的条款达成临时协议。据临时协议描述，匈奴人被穿着牧师长袍的利奥一世震慑，为利奥一世镇定自若的态度所折服，同意和解。心怀感激的人们用“伟大”形容利奥一世教皇，他实至名归。

阿提拉离开罗马后，向北行进，但很快就死于醉酒狂欢之中，这个恶名远扬、大肆掠夺的王国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匈奴人或者与其他部落的军队融合，或者各自为营，打一些零碎小仗。

第4节　汪达尔人洗劫罗马

罗马曾被西哥特人劫掠，在阿提拉手中逃过一劫，但对它的考验并未结束。汪达尔人国王金塞里克已在迦太基立足，只是等待劫掠罗马——这座举世闻名的财富宝库的机会。金塞里克的舰队彻底切断了

埃及到意大利的运粮路线，封锁了台伯河口。由于连年饥荒和战乱，罗马实力锐减，很快就求和。

教皇利奥一世再次作为调解人来到敌人军营，但信仰阿里乌教派的汪达尔人与异教徒匈奴人大不相同，非常顽固。他们说，可以放弃大屠杀，但其他条件免谈。汪达尔人对罗马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无情劫掠后，金塞里克乘船走了，除了带走数以千计的俘虏外，还将能搬走的财宝和艺术品一扫而空。400年前，提图斯皇帝抢劫耶路撒冷时，把黄金祭台、犹太人神殿的烛台带回罗马，现在，罗马之前抢劫的果实都化为乌有了。

西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没能挽救自己的都城，自然在军中威名扫地。据说，“罗慕路斯”创建了罗马帝国，但另一个英俊、年轻的“罗慕路斯”小皇帝终结了罗马帝国，这位皇帝被人们戏称为“无助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或“小奥古斯都”。

小皇帝被废黜的借口是他拒绝把意大利的土地赠予罗马雇佣军的重要成员——日耳曼军队。日耳曼军队的头领奥多亚赛逼皇帝退位。皇室在公众心目中尊严扫地。奥多亚赛没有索要梦寐以求的荣誉，而是把王冠和紫袍送给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写道：“我们不必也不愿再继承意大利皇位……一位君主就足以统治和保护东西罗马帝国。”

幸运的是，这位君主弱小，微不足道，没有人想要杀害他，他依靠国家财政在地中海的城堡中度过余生，而奥多亚赛以“总督”的头衔和政治家特有的智慧统治了意大利十四年。

第5节　东哥特人入侵

接下来两次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入侵彻底毁灭了罗马帝国恢复和统

一的希望。第一次是遭东哥特人入侵。东哥特人与西哥特人是同族，他们从亚洲返回时遇到匈奴人。当时正值阿提拉驾崩，于是东哥特人逃过一劫。在狄奥多里克的率领下，东哥特人建立了独立王国，并一直在与之结盟的东罗马边境滋事。

狄奥多里克曾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尽管他勇敢好战，但他的追随者并不热衷战争。因此，狄奥多里克认为，把东哥特人迁徙到新的广袤土地上，也许可以激发他们的猜忌和仇恨。于是，他向皇帝芝诺请求作为统帅前往意大利攻打奥多亚赛。他写道："请允许我率领士兵征服独裁者，如果我输了，你只是少了一个奢侈、爱惹麻烦的朋友，但如果托陛下的福，我赢了，我会以你的名义统治意大利，给你带来荣耀。"



匈奴人被穿着牧师长袍的利奥一世震慑，为利奥一世镇定自若的态度所折服，同意和解



汪达尔人对罗马进行了两个星期的无情劫掠，除了带走数以千计的俘虏外，还将能搬走的财宝和艺术品一扫而空

芝诺没有力量阻止奥多亚塞获得“总督”头衔，也不喜欢这位胆敢逼皇帝退位的“蛮族暴发户”，同时他也不希望不安分的东哥特人离君士坦丁堡太近，因此他非常支持狄奥多里克的建议，盼望东哥特人赶快离开。如果两个蛮族相互残杀，对帝国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在芝诺皇帝的支持下，狄奥多里克开始了他的伟大征程。

狄奥多里克带领着士兵、部落所有妇女儿童以及财产出发了。经过几次战斗后，他成功击败并杀掉对手。罗马视他为皇帝派来的代表，高兴地打开了大门，但狄奥多里克却更倾向定都拉文纳。于是，他住在拉文纳，亲自种植果园。

尽管狄奥多里克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国家，但他还是希望能赢得新臣民的信任和好感：他对外宣布效忠皇帝，给皇帝写信语气很谦恭；他发行的货币上刻有帝国邮票的票样；他经常听取罗马元老院的意见，虽然元老院早已没有实权，但在政府中毕竟还占有一席之地；打算把第三块意大利土地赠给东哥特人时，他允许罗马官员参与分配。

狄奥多里克还保留了意大利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并强迫东哥特人遵守，但国防由他的军队来负责。虽然他致力于民族团结，但两个民族始终难以融合，因为它们之间矗立着宗教信仰的障碍：东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教。尽管狄奥多里克对不同的信仰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天主教教徒总是怀疑他的意图。

一次，反犹太教的骚乱发生了，几座犹太教堂被焚毁。狄奥多里克命令肇事者东正教教徒捐钱重建教堂，但东正教教徒拒绝遵守命令。当抗命的元凶当街遭鞭刑时，公众对哥特国王的愤怒达到极点。随着狄奥多里克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沉默而残暴。在他统治后期，他处死了一名叫波依提乌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波依提乌曾是狄奥多里克最青睐的顾问，但作为议员，他竟敢公开为狄奥多里克已定罪的人辩护。

波依提乌不仅是一位无畏的斗士，还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充满黑暗和恐怖的侵略时期，他高举古典文化的火炬，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撰写了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方面的论文，痛击了阿里乌教派对《尼西亚信经》的攻击。他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最有名的一部著作《哲学的慰藉》，一千多年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欢。波依提乌写这本书时，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正悄悄逼近他，他的前额被绳索紧紧地束缚，然后行刑者用棍棒猛击他。命运之神对这位哲学家太残忍了，他死于酷刑之下。狄奥多里克比他多活了两年。临终前，狄奥多里克痛苦地忏悔，自责对波依提乌使用的酷刑太残忍了。

狄奥多里克统治末期，他被称为“暴君”名副其实，但我们也要记住他全盛时期的辉煌，“在西罗马帝国，没有人不尊敬他”。通过家族联姻，他与勃艮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结盟。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所有蛮族中最伟大的领袖。如果他的继任者有他一点点的政治家素养，就算东哥特人和意大利人宗教信仰不同，也许可以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但不幸的是，二十年后他建立的王国消失了。

狄奥多里克的王位由他的孙子继承，但他的孙子只活了几年就驾崩了，之后王位又传给了他的外甥。这个外甥既不高贵，又缺乏政治家的风度。与这个弱小的王朝统治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查士丁尼皇帝，他拥有那个时代所需的超强的能力和坚韧的毅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6节　查士丁尼皇帝

查士丁尼出生于农民家庭，但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仅对法律和金融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神学、音乐和建筑也很感兴趣。他对臣民的态度严肃而友好，但他没有同情心，不能赢得大众的好感。有些大臣赞叹他的勤勉，但另一些大臣认为他是不需要休息的恶魔，否则怎么可能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一位作家写道：“没人记得他年轻的模样。”但这位严肃的皇帝为了爱情与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狄奥多拉结婚，并不顾公众的反对，立她为后。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狄奥多拉：“她的美难以用语言描述，难以用艺术再现。但狄奥多拉不是一个玩偶，在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连鄙视她的人都倾倒于她的高贵。”

查士丁尼对建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斥巨资兴建桥梁、浴场、城堡和宫殿。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被称

为“神圣的智慧教堂”。后来，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

然而，查士丁尼被人们所铭记，不应该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他最大的功绩是主持编纂了《罗马民法大全》，让他的臣民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罗马法律。《罗马民法大全》包括三个部分：法典，汇集了各个时期皇帝颁布的律令；学说汇纂，知名律师做出的判决；新律，罗马法律的解释原则。一位现代作家写道：“历经十三个世纪，它仍然是一座无与伦比的法学知识宝藏。”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通过借鉴它得到灵感，譬如基于《罗马民法大全》，教会律师编纂了教会法，赋予教皇统治教会的权力。



狄奥多拉不是一个玩偶，在政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连鄙视她的人都倾倒于她的高贵



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后，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

查士丁尼在编纂《罗马民法大全》的同时，还致力于推动世界的进步。但为了实现他的军事抱负，成为像狄奥多西和君士坦丁一样的皇帝，统治整个欧洲，他耗尽国库，加重税收。此外，他连年讨伐波斯帝国，并派遣贝利萨留将军率陆军或指挥舰队征讨北非的汪达尔人。查士丁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帝国的疆域扩张到整个北非以及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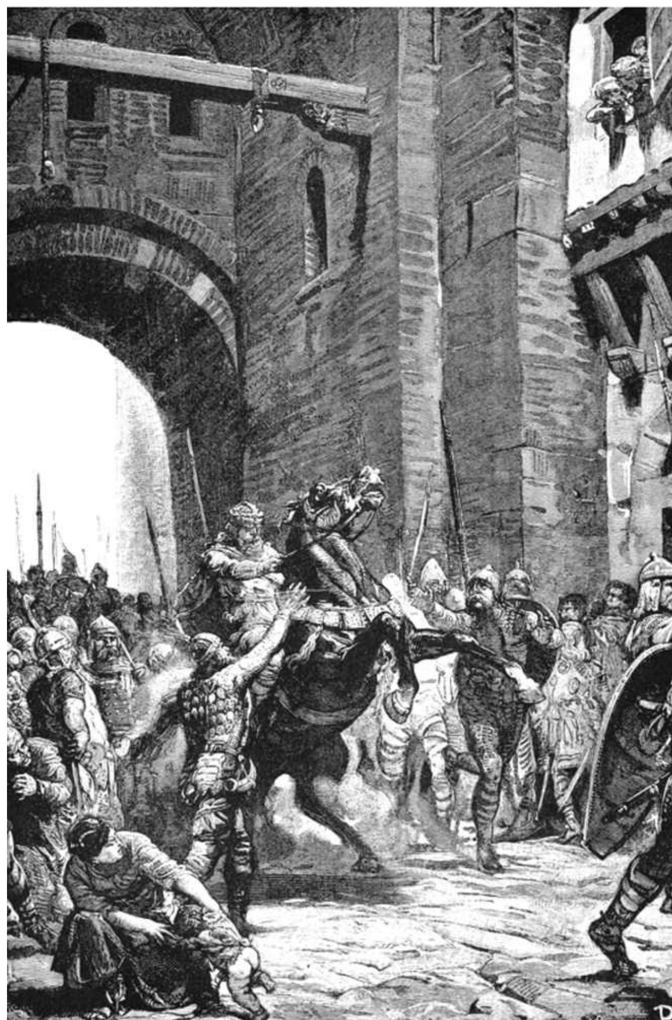
班牙南部，整个地中海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中。接着，他又决定推翻懦弱的狄奥多里克王朝的后裔，恢复对意大利的真正统治。

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我们知道意大利人不喜欢希腊人，哥特人为获得独立而英勇斗争，经过十九次战役，最终，555年，查士丁尼的一位亚美尼亚裔头领纳西斯成功击溃蛮族，在拉文纳建立政权，出任“总督”，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

第7节　伦巴底人的入侵

纳西斯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耳曼部落的一支——伦巴底人，他们的名称源于他们的居住地。伦巴底人也是罗马帝国的一分子，从易北河沿岸迁徙到多瑙河流域。在多瑙河流域，他们四处寻找战机，释放多余能量。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他们参与了包括入侵意大利的许多战役，希望能从中获利。

纳西斯取得胜利后，支付给伦巴底人大笔钱财，想让他们迅速离开，但伦巴底人喜欢上了意大利温暖宜人的气候和爬出墙外的葡萄藤蔓，开始嫌弃自己荒凉贫瘠的家园。因此，他们一直滞留在意大利，直到他们惧怕的纳西斯死去。之后，伦巴底人在国王阿尔博因的领导下，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占意大利北部。他们既没有遭到东哥特人的回击，也没有遇到罗马军队的抵抗，因为这两支军队正在僵持对峙。伦巴底人在伦巴底行省成功建立了政权，之后定都帕维亚，而罗马帝国仍然控制着海岸线两侧以及拉文纳、那不勒斯、罗马和其他一些城镇。



伦巴底人在国王阿尔博因的领导下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占意大利北部，定都帕维亚

伦巴底人入侵是蛮族最后一次入侵意大利，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他们统治意大利长达两百年，尽管他们是异教徒，而且经常严厉惩罚意大利人，但并没有阻止民族融合的进程。在更高的文明被征服时，日耳曼人学会信仰上帝，忘记了自己的语言，接纳了周围的风俗和习惯；而意大利人在与伦巴底人斗争的过程中，也变得善于打仗，勇于作战。到8世纪时，民族融合完成。

伦巴底人入侵的另一个有趣而重要的后果是，蛮族人与希腊人长期斗争阻碍了政府的正常发展。虽然伦巴底人在意大利的各个城镇和行省处于主导地位，但他们的政策和想法会遭到意大利人的反对。拉文纳的总督声称他以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名义在意大利半岛征收赋税，治理国家，但实际上，他只控制着城市周边地带，伦巴底人切断了他与希腊官员的联系。他本来可以与海上或沿海重要城市如那不勒斯，通过海路联系，但联系松散，这些地方已经渐渐脱离他的控制。而在罗马，不仅议员参与政府管理，而且教皇已经超越政府官员，成为基督教公民的保护者和施助者。

第8节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

我们知道，当匈奴人兵临罗马城下时，利奥一世劝服阿提拉撤兵。后来，利奥一世再次临危受命去说服汪达尔人金塞里克放弃对罗马的掠夺，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样的行为使教皇超越其他统治者，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590年，格里高利一世担任教皇。他超越前任所有教皇，奠定了教皇权威的基础。

在成为罗马教皇之前，格里高利是一位贫穷的中年隐修士，接济穷人，过着禁食和忏悔的苦修生活。现在英格兰人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对当时罗马奴隶市场中的金发盎格鲁人产生了兴趣，“他们有着‘天使般’的脸庞，他们应该是天使派来的使者”，在这番评论之后，他请求到这些奴隶的来源地北部岛屿去传教，却被派驻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几年里，他对英格兰一直念念不忘。成为教皇后，他派圣奥古斯丁赴英格兰传教，使异教徒肯特国王皈依基督教。

据说，“格里高利一世是一位传教教皇”。他热衷于传教，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关于神学的，并深受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的影响，展现了对信仰的澎湃热情和执着追求。格里高利一世除了帮助英格兰皈依基

督教，还成功说服伦巴底国王皈依基督教，并赢得了国王的友谊。在他任教皇期间，西班牙的阿里乌教派与天主教派关系缓和。

难怪罗马人在与入侵者的连年战争中，不仅把这些调节者当作精神领袖，也当作世俗领袖。当罗马人忍饥挨饿时，难道不是教会接济他们食物吗？当敌人兵临城下时，难道不是教会组织士兵进行抵抗，并派特使与敌人周旋，保卫城市吗？罗马人没有从拉文纳总督那里得到任何实质的帮助，拉文纳总督只会谈论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因此，罗马人认为，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很孱弱，根本靠不住。格里高利一世担任教皇期间，他摆脱拉文纳总督的控制，实现教会独立，他的继任者也一直遵循这一政策。

伦巴底王国分裂为数个公爵领地，每个领地都有各自的都城。因此，在中世纪早期，意大利成为一个“城市集群”国家。邻邦之间相互忌妒，为了利益钩心斗角，这种区域影响力至今还存在。譬如，一个英国人或法国人会先说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然后才会说是哪个地方的人，而意大利人则不同，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说“我是罗马人”“那不勒斯人”或“佛罗伦萨人”。只有记住这个不同，才能正确解读意大利的历史。



格里高利一世是一位传教教皇，他不仅执着追求自己的信仰，而且热衷于传教

第6章

法兰克人崛起

我们在前面引述了历史学家塔西佗对日耳曼部落的描述，他告诉高卢人，除非罗马帝国的军队能把日耳曼人挡在莱茵河外，否则日耳曼人就会用“荒凉偏僻的森林和沼泽来交换富饶肥沃的高卢”。他说：“对你们来说，罗马帝国的衰落是致命的，你们将会被掩埋在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中。”

这些预言性的警告后来都被验证了。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匈奴人、法兰克人强行跨过莱茵河，扫荡葡萄园和玉米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如果人们胆敢抵抗，他们就纵火焚烧城镇和要塞。汪达尔人继续远征西班牙和北非。对他们而言，高卢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匈奴人在沙隆之战中受到重挫，浑身带血去了意大利。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则于5到6世纪在高卢建立了强大王国。

西哥特人的伟大首领阿拉里克驾崩后，他的妹夫阿萨尔夫受到拥戴，成为国王。新国王没有继续进攻意大利南部，而是与霍诺里乌斯皇帝和解，娶了皇帝的妹妹。在罗马人眼中，阿萨尔夫成了半个皇族人。

阿萨尔夫坦言：“我曾经渴望消除罗马人的痕迹，在废墟上建立哥特人的统治，但我渐渐意识到要维护和治理好国家，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从那一刻起，我对辉煌和抱负有了不同的理解。我衷心希望

未来的人们能看到一个陌生人的优点，并心怀感激。这个陌生人没有用哥特人手中的剑去颠覆罗马帝国，而是用它恢复和维持罗马帝国的繁荣。”



阿萨尔夫渐渐意识到要维护和治理好国家，法律是必不可少的，从那时起，他对辉煌和抱负有了不同的理解

基于这样的情怀和祝福，阿萨尔夫愿意放弃意大利。经过短暂斗争后，他在高卢南部建立西哥特王国，疆域从地中海延伸到比斯开湾。后世之君继续扩张。最后，西哥特王国的领土囊括了整个阿基塔

尼亚行省和比利牛斯山南北坡，定都图卢兹。

日耳曼人的另一支——勃艮第人在罗纳河沿岸建立了一个中型国家。多年与罗马人的交往，令他们的举止和思想改变了。他们的统治没有遭到高卢人的强烈反抗，所以他们也尊重高卢的法律和风俗。然而，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都信仰阿里乌教派，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致命的宗教障碍决定了最终统治整个高卢地区不是这两个部落的任何一个，而是第三支日耳曼人萨利安-法兰克人，他们的好运得益于他们的宗教信仰。

第1节　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身材高大，金发，四肢柔软灵活，起源于日耳曼，后来定居于现在的比利时。他们继承祖先信奉的沃登神和日耳曼其他异教神。萨利安法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映出很多日耳曼的风俗习惯。塔西佗对此也有描述。

国王不由人民选举产生，墨洛温王朝实行世袭制，但妇女不可继承王位，即使是墨洛温家族成员也不例外；王子不可剪发，因为飘动的长发是王室成员的标志。尽管国王拥有新特权，但旧时的平等精神并未完全消失，每年举行一次的自由民集合已经演变为阅兵仪式，但征兵打仗需获得本人同意。当战争结束，取得胜利，大部分战利品不是进贡给国王，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分配给大家。

萨利安法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惩罚暴力行为：实施暴力者必须缴纳罚金。暴力行为包括：射毒箭，即使没有射中目标；伤害他人头部；削掉他人鼻子或大脚趾；最严重的是食指受伤，因为那样受害人就无法拉弓射箭了。

这个法律条款遵循的原则和罗马法律不同。罗马法律制定一套权

利标准，如果不遵守就会获罪。因此，一个罗马公民如果谋杀或伤害邻居就会受到法律惩罚，因为犯了国法；而法兰克人如果遇到同样的案子，部落法官会判处缴纳罚金，过错方给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因为犯罪者不需要平息国家的怒气，而是要消除受害方的怨恨。

因此，从王室贵族到最底层的自由民，依据等级和生命的价值不同，每个法兰克人都有对应的赎罪金。离开比利时继续前进、进攻、征服高卢北部时，法兰克人给罗马臣民也估算了赎罪金，但只有他们的一半，一个法兰克自由民的赎罪金是两百金币，而罗马人只要一百金币。

6世纪初，法兰克人在高卢建立了稳固的政权，部落重要事务已经全部交由国王身边的贵族进行管理，因此出现了“宫相”这样的头衔。起初，宫相只是管家，后来成为“无冕之王”；“总管”是王室管家；“司令”掌管马匹；“内侍”侍奉国王起居。

第2节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

墨洛温王朝最有名的国王是克洛维，他选巴黎作为法兰克王国的首都。他和他的子民虽然是异教徒，但同高卢北部的罗马居民，尤其是天主教牧师相处友好。劫掠苏瓦松镇时，克洛维竭力保护教堂里的金银器皿，尤其是兰斯主教圣雷米非常珍视的精美绝伦的花瓶。他对士兵们说：“把它放在我的战利品中。”他打算事后再把花瓶还给主教。但一个士兵很无礼地回答道：“只有抽签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属于你。”说完，士兵就用斧子把花瓶砸成了碎片。

克洛维当时按捺住愤怒，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件事。一年后检阅军队时，他看见了那个忤逆的士兵。他走向前，从士兵手中拿过武器，扔到地上说：“你不配佩戴武器。”士兵蹲下去捡武器，克洛维高举战

斧，砍向士兵的头，说：“这样做是为了苏瓦松的花瓶！”

克洛维迎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外甥女。她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公主，叫克洛蒂尔达。在妻子的要求下，他允许大儿子受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自己拒绝皈依基督教。在一次战斗中，他和军队被敌人紧紧压制。战士们见状要逃，他大喊一声“耶稣基督，克洛蒂尔达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我现在虔诚地请求你的帮助，我承诺如果你帮助我战胜敌人……我就皈依你，接受你的洗礼，因为我祈求了我们的神，但他们没有帮助我。”



克洛维迎娶了勃艮第国王的外甥女克洛蒂尔达

很快，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克洛维指挥法兰克联军大获全胜。克洛维没有忘记承诺。他与三千将士同往兰斯受洗。雷米主教对受洗的国王说：“低下你的头，从今以后，珍惜你已经焚毁的，焚毁你之前珍惜的。”

皈依基督教后，克洛维并没有意识到他改变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对他个人而言，他只不过是兑现了与上帝的交易，他个人没有任何改变，仍然通过武力和背叛一如既往地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执着使他成为法兰克人的最高统治者。对付法兰克人的另一支里普利安人时，他秘密唆使里普利安人首领之子夺权。年轻的王子克洛德里克果然杀死父亲，夺取了王权。



克洛维在兰斯受洗，皈依基督教

夺取王权后，克洛德里克昏了头，兴高采烈地给克洛维写信：“我的父亲死了，他的财产现在是我的了，派你的人到这里来，我将把你喜欢的财宝送给你。”

萨利安人的使臣如约而至，克洛德里克向他们秘密展示了自己的财富。他把手伸进金库去摸金子，使臣们请求他把胳膊再伸进去一些，以便让他们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巨大，他弯腰伸胳膊时，一个使臣从后面给克洛德里致命一击，然后使臣们就逃跑了。父子相继死于背叛，而克洛维却矢口否认此事与他有关，装作完全不知情。

“克洛德里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而他又不知被谁所杀，我完全不赞成家人之间相互残杀，因为这是违法的。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愿意接受你们为臣民，给予你们保护。”

里普利安人群龙无首，而他们又同其他蛮族一样崇尚胜利，相信克洛维会带领他们夺取胜利，因此他们举起盾牌，高呼万岁。

“每天上帝帮助克洛维挫败敌人，扩大领地，因为克洛维虔诚信奉上帝，做上帝喜欢的事情，”主教图尔的格里高利这样描述克洛维发动的战争。他对背叛和谋杀抛出这样的言论，着实令人惊奇，但他这样说绝不是谄媚王室，而是一个牧师的职责所在。他只坚持正确的事，后来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其他法兰克国王。但蛮族只会动粗，不理解这种职责。蛮族认为战胜邻居是智慧的表现，谋杀是很平常的事，既无须兴奋，也无须做出说明。如果犯罪事实清楚，支付偿命金就可以了。希望经过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明洗礼，凶残的蛮族能够接受基督教的真谛：追求真理、坚守正义、宽容仁慈。

高卢的罗马人已经别无所求，随时准备忍受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因此，只要统治者们能表现出一点点教养，罗马人都感到欢欣鼓舞，而在基督教历经多年迫害后，克洛维提出要对天主教教堂予以保护时，罗马人就对克洛维的缺点视而不见了。

在高卢北部立足后，克洛维决定攻打南部的西哥特人。“在高卢看到阿里乌教徒，我很不舒服，”他对随从说，“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征服这些异教徒，夺取他们的领土。”

克洛维可能真心讨厌异教，但出于政治考虑他却必须接纳它，因为无论他和他的战士走到哪里攻打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都需要寻求罗马东正教教徒的帮助。对东正教教徒而言，克洛维恢复了消失的罗马帝国的某些荣耀，让天主教继续生存，并获得新的胜利。

在普瓦捷附近经过激烈交战，克洛维击败西哥特人，把他们逐出

阿基坦。西哥特人的领土只剩下地中海沿岸狭长地带和比利牛斯山的一侧。克洛维还与勃艮第人交战，虽未能征服勃艮第王国，但使勃艮第称臣。四十五岁驾崩时，他已经征服高卢四分之三的土地，被征服的土地上永久刻上了征服者的名字。

克洛维的继任者继续他的侵略政策，到公元7世纪初达戈贝尔国王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达戈贝尔被称为“法兰克的所罗门王”，如犹太人的所罗门王一样，以智慧和财富闻名于世。达戈贝尔不满足统治莱茵河西岸的高卢地区，于是进入德意志，与撒克逊人和弗里斯兰人开战，最终迫使他们进贡。他的帝国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波西米亚山脉。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寻求与法兰克人联盟时，一直没有归顺法兰克王国的布瑞坦尼公爵前来宣誓效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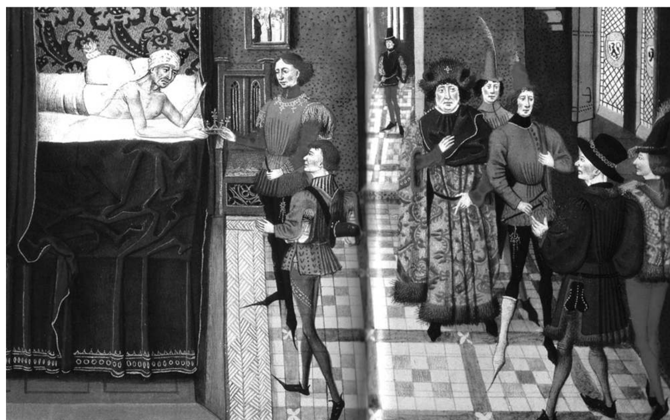
那个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达戈贝尔，“他憎恨背叛和叛乱，把王权紧紧握在手中，像只狮子，随时准备进攻煽动叛乱的人”。

另一段记录描述了他在私访时，如何秉承公正，完全不偏袒残暴的地主的事情，“他的裁决令主教和大人物恐惧，却令穷人开心”。

在战事纷乱的年代，社会因达戈贝尔的统治而呈现繁荣景象，但在他驾崩之前，繁荣已渐衰落。奢侈腐蚀了这位伟大君主的思想和身体。这位“法兰克的所罗门王”后半生生活放纵，意志懈怠。他的继任者再未达到他的高度。

墨洛温王朝的最后几位统治者都被称为“懒王”，他们既无天赋，也无雄才，大多数在未成年就夭折，面容苍老如年迈之人，国家实权落入宫相之手。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国王仍会乘坐粗糙的牛车前往集会地与臣民见面，但仪式一结束，就返回王室庄园，变成微不足道的人了。“除了具有长发和长胡须的王室成员标志外，国王有名无实。他们坐在宝座上假装处理朝政，实际上只是傀儡而已，掌握实权的是

宫相。”



奢侈腐蚀了达戈贝尔的思想和身体，致使他后半生生活放纵，意志懈怠

第3节　加洛林王朝

墨洛温王朝在法兰克只保留虚名的情形继续存在，最后终于被迅速崛起并篡权的加洛林王朝打破。默兹河和莱茵河下游之间的高卢地区被称为奥地利，加洛林家族的首领世代担任这里的“宫相”，负责管理王室领地，即监督法律的执行，管理土地耕种，替国王征收农业税。

这些工作听起来似乎不重要，实际并非如此，因为中世纪早期绝大多数人都住在乡下。罗马帝国进入衰落期后，忽视道路建设，而运粮船队又经常沉没在地中海。于是，欧洲各地之间粮食和货物的运输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工商业发展停滞不前，城市不再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只是人们遭到敌人攻击时的避难所。人们更愿意生活在乡村，种植玉米和大麦，饲养牛羊。如果庄稼歉收或牛羊病死，饥荒就来了。

宫相必须尽量确保王室领地不受恶劣天气、狼和不法之徒的侵害，因为法兰克国王与臣民们的生存都依靠庄稼和牲畜，而不是依靠

商业和制造业。到7世纪末，宫相们已经不满足通过管理当地事务获得利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整个法兰克。他们借国王之名行事。王位空缺两年后，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篡夺了王位，而且没有遭到法兰克人的反对，这是因为治理国家、征服外族还得依靠他们。

加洛林家族的“铁锤”查理·马特是一位英勇无比的战士，一位历史学家称他为“大力神”。“常胜将军……战胜了无数的公爵、国王、部落和野蛮国家。起来反抗他的斯拉夫人、弗里斯兰人、西班牙人、撒拉逊人都以失败告终。”

正是查理·马特才使法兰克免遭撒拉逊人的奴役。撒拉逊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从非洲跨过直布罗陀海峡，迅速征服了西班牙四分之三的领土。非洲总督给哈里发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战胜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所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哦，指挥官，这次征服不同以往，各国就像参加审判日的集会一样。”

胜利让撒拉逊人得意忘形，先知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撒拉逊人认为，他们一定会把基督徒组成的军队追得四处逃散；他们横扫比利牛斯山地区，接二连三攻下地中海沿岸的要塞。遭到入侵前，查理·马特与阿基坦公爵争吵不休，但之后他们很快成为朋友，并在普瓦捷联合作战，抵挡撒拉逊人的进攻。战斗非常惨烈，近三十万撒拉逊人倒在“如冰山般坚毅”的法兰克士兵的脚下。数字虽然有些夸大，但战争取得了胜利，迫使撒拉逊人的残余军队迅速向比利牛斯山撤退，使欧洲的基督教幸免于难。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摩尔人可能在未来数年耗费巨大精力保卫西班牙。当时，虽然撒拉逊人以凶猛残暴闻名于世，但他们进攻高卢的最初目的是抢劫，而非定居。



查理·马特与阿基坦公爵在普瓦捷联合作战，抵挡撒拉逊人的进攻

取得胜利的首要功臣“宫相”自然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英雄。教皇当时正在竭力抵御伦巴底人入侵罗马，派人向查理·马特求援，但查理·马特知道与撒拉逊人作战已经大伤元气，不敢应允参战。

第4节　法兰克国王丕平

几年之后，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继位。丕平如他的绰号一样，身材矮小。但他强健有力，一斧子下去能砍掉狮子的头。他精力充沛，聪明能干。他发现，帮助教皇抵抗伦巴底人有利可图，于是派使到罗马询问能否获得国王名下的一块土地。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只有虚名，而无实权，教皇急于取悦丕平，谨慎地回答道：“拥有权力的人理应拥有与之相符的头衔。”

这正是宫相期待和希望的，之后的故事在《旧法兰克编年史》751年中都有记载，“这年，罗马教皇为丕平举行了加冕仪式，在苏瓦松给他涂上了圣油膏……丕平按照法兰克习俗正式登基，成为法兰克

国王，而徒有虚名的国王希尔德里克被关进了修道院。”

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消失于修道院，加洛林王朝的丕平从此成为法兰克真正的统治者。在教皇的帮助下，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很快就得为偿还欠教皇的债付出代价。

在上一章，我们讲述了伦巴底人入侵意大利产生的影响。日耳曼人对意大利半岛的影响非常深入，只有希腊沿海地区被认为是东罗马帝国。虽然罗马理论上也属于这一地区，但实际上教皇对东罗马帝国干涉教会事务和对伦巴底人入侵一样憎恨，希望能摆脱东罗马帝国的束缚。

愿望得到满足后，丕平就把精力转向教皇的事务。伦巴底人窃任拉文纳总督后，丕平召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向伦巴底王国首都帕维亚进发。敌人闻风丧胆，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同意了丕平提出的条件。



法兰克国王丕平，他虽身材矮小，却强健有力、聪明能干

从法律上讲，丕平应该马上把总督之职还给东罗马帝国，但他认为没必要讨好君士坦丁堡。他更愿意取悦罗马，因此就要求伦巴底人把总督一职交给教皇斯蒂芬二世。伦巴底人答应了。但在他返回之际，伦巴底人又开始骚扰罗马周边地区，切断食物供应，抢劫教堂。

第5节　教皇的世俗权力

丕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他再次返回意大利。伦巴底人不得不信守承诺，使罗马教会获得了第一块领土，并通过正式的条约明确

了领土的确切范围和教皇的权利，这是中世纪历史上的大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从此以后，教皇不仅是基督教的精神领袖，更是拥有公认领土和收入的意大利政治领袖，管理俗世事务。教皇不信任意大利半岛上的任何一位统治者，担心他们强大后会夺取他的领土，但遇到困难时，他仍然需要利用精神力量去应对世俗事务。因此，在后面的欧洲历史中，教皇常常使用他的精神力量和世俗权力去解决问题。

丕平虽然精明，但并没有意识到捐赠土地会埋下隐患。有感于他的慷慨大方，教皇赐他“贵族”头衔。丕平和他的军队缴获许多战利品后，离开意大利，返回本国，很快参与到打击撒拉逊人和日耳曼叛乱部落的各种战役中，直到他768年离世。

第7章
查理曼大帝

“矮子”丕平驾崩之前，把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二，交给他的两个儿子——二十六岁的查理曼和他的弟弟卡洛曼统治，但他们关系不好，所以均分土地无助于改善关系。卡洛曼没有政治家的潜质，脾气暴躁，忌妒心强，很容易受周围人的蛊惑。他听信谗言说他哥哥一直觊觎他的财产，甚至有可能杀了他，但这些猜忌毫无根据。尽管这样，卡洛曼总是想方设法阻挠哥哥提出的计划。三年后，卡洛曼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也许上帝真的赐福给查理曼。这时，一位修道士写信给他，结尾直言不讳地说道：“第五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上帝已经将你的兄弟从尘世中带走。”

查理曼大帝是中世纪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身材高大魁梧，长着鹰钩鼻，生气时眼睛像狮子一样闪着怒光，无人敢直视。他力大无穷，精力充沛，武艺精湛。他能徒手把四个马掌锁在一起，能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提到他的肩膀上，能一拳将马和骑手打翻在地。

查理曼大帝非常愿意遵守古老的传统，经常穿着法兰克亚麻的束腰外衣，绑带交叉绑腿，身穿及脚长外套。“这些破布有什么用？”他指着短斗篷轻蔑地反问身边的大臣，“睡觉时，它能盖住我吗？骑马上路时，它能挡风遮雨吗？”

这种质问显示出查理曼大帝的个性。查理曼大帝制订出许多领土扩张和国家改革的方案。他改革的心情迫切。旧制度还没废除，新方案已经开始实施，但他绝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而是一位头脑冷静、讲求实际的实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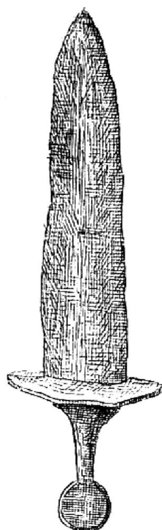


查理曼大帝。他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而是一位头脑冷静、讲求实际的实干家

第1节　罗兰之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令查理曼大帝闻名于世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史诗——《罗兰之歌》。《罗兰之歌》讲述

了查理曼大帝和圣骑士的故事，其流行程度和辉煌成就甚至超过了《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历史事实是这样的：一些心怀不满的埃米尔[1]秘密请求查理曼大帝远征西班牙，进攻哥多华的哈里发。查理曼大帝翻越比利牛斯山，攻陷几个城镇后被迫撤退。返回途中翻越大山时，负责殿后的军队被加斯科涅的山地人包围，尸横遍野，查理曼大帝和残部艰难逃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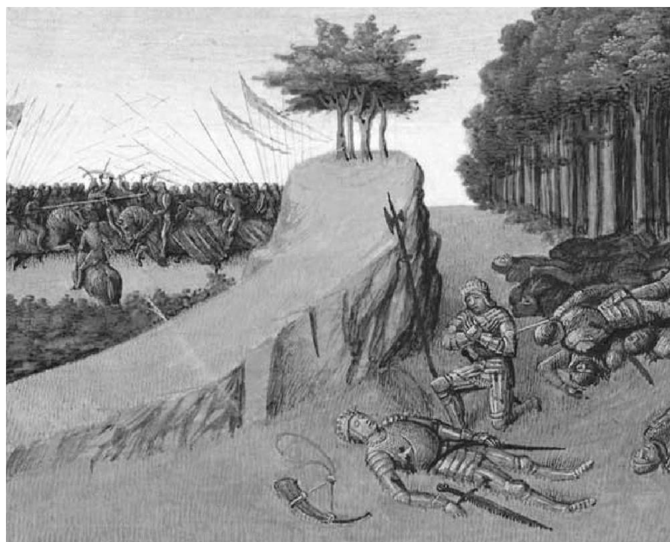


宝剑“杜朗达尔”

这首创作于11世纪的史诗具有很大的传说成分。查理曼大帝是史诗的主要人物，他有很多“圣骑士”，即著名的骑士，包括他形影不离的朋友奥利弗和罗兰。据说，在西班牙建立了无数功绩后，由于叛徒出卖，查理曼大帝被迫向法兰西山区撤退。主力翻越山顶时，负责殿后的罗兰发现隆塞斯瓦列斯山口有加斯科涅人重兵埋伏。虽然号角就挂在他身边，但他不屑吹号求援，而是拔出宝剑“杜朗达尔”勇敢地与敌人战斗。

法兰克人勇敢反击，加斯科涅人节节败退。就在这时，三万撒拉逊人来援，战局发生了大逆转，奥利弗战死，罗兰负伤倒地。罗兰把宝剑“杜朗达尔”折成两半，因为没人配用这把无与伦比的宝剑，之后

他把号角放在嘴边，用尽最后的力气吹响。查理曼大帝在八英里外的军营里听到号角声，不安地问“这是不是罗兰在吹号？”叛变的大臣没有如实回答。直到奄奄一息的斥候进来报告战事，查理曼大帝才匆忙赶往战场。他在敌军尸横遍野的战场找到了圣骑士罗兰。罗兰双臂摊开，躺在地上，旁边放着折断的宝剑。查理曼大帝看到罗兰，屈膝跪下，难过地哭了起来：“哦，我得力的助手，法兰克人的骄傲，正义之剑……我怎么会让你在这里死去？我怎能眼睁睁看你死去，却不与你一同赴死？”最后查理曼大帝抑制悲痛，重新积聚力量，带着复仇的烈火，猛攻在隆塞斯瓦列斯杀害基督徒的加斯科涅人和撒拉逊人。



罗兰负伤倒地，他身旁的“杜朗达尔”和号角清晰可见

《罗兰之歌》是法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虽然它不是历史著作，但记述了很多历史事实。生活在9世纪早期的查理曼大帝是诗人在两百多年之后描述的人物，查理曼大帝是基督教的核心人物，是基督教战胜穆斯林和异教徒公认的领袖。盎格鲁-撒克逊修道士、宫廷学者阿尔昆写道：“正是你取得的成功保护了基督教，捍卫了天主教的信仰，传播了正义的法则。”

第2节　伦巴底人的入侵

为了抵御伦巴底人的入侵，教皇们打算求援。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查理曼继位后，希望能与伦巴底国王迪迪尔友好相处，因为他娶了迪迪尔的女儿。但教皇诅咒这场联姻道：“你不知道伦巴底人的孩子都是麻风病人，他们是从民族之林中被赶走的吗？天堂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会与魔鬼接受‘永恒之火’的炙烤！”

查理曼大帝并未理会教皇的谴责，继续我行我素。但他很快就厌倦了这位相貌平平、身体虚弱的伦巴底妻子，和她离婚就可以娶到漂亮的德意志公主了。这当然是对迪迪尔国王的极大侮辱。后来，迪迪尔视法兰克国王为敌人，两国之间的嫌隙再也无法弥合了。

在教皇眼里，伦巴底人真的应该受到诅咒。在格里高利教皇时代，天主教进入鼎盛时期。天主教堂是意大利最漂亮的建筑，修道院以学识渊博而闻名，帕维亚成为学生和学者集聚的中心。伦巴底人的罪恶不在于他们的异端邪说，而在于他们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伦巴底王国不仅包括北部的伦巴底，还包括南部的斯波莱托公国。教皇的领地像一堵巨墙挡在了拉文纳和西地中海之间。伦巴底人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攻城掠地。教皇也紧紧地盯着他们，意欲赶走这些危险的邻居。但教皇心里很清楚，没有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帮助，这一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查理曼大帝在弟弟死后不久，被说服进攻意大利，帮助教皇实现夙愿。他在日内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梅菲尔德”大阅兵上，提出作战目标，士兵们高声欢呼，表示同意。

这是一支浩浩荡荡、气吞山河的军队。每个法兰克人都要求参加集会，为战争做准备。富人们骑战马，穿铠甲，戴头盔，佩戴宝剑和

匕首；穷人徒步前行，身背弓箭；其他人手拿长矛和盾牌；最低等的人只手持镰刀或木棒。王室领地的地主必须带上他们所有的自由民，如果想要获得参战豁免权，就必须支付罚金，但罚金数额惊人，几乎无人可以负担得起。

大军列队前行时，紧随其后的是无数的行李车和带皮质遮阳篷的马车，车上装载着足够三个月使用的粮草、额外的衣物和武器。大家都希望在回程的途中，马车会装满战利品。

伦巴底人已经融入奢靡舒适的城市生活，再也不是勇猛的战士了。因此，查理曼大帝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迪迪尔率军在阿尔卑斯山西口进行一番徒劳的抵抗之后，逃到帕维亚。接着，他增强帕维亚的兵力，加强防守，而把其余地方拱手相让。

后来，历史学家描绘了迪迪尔当时的情景，他蹲伏在城市的一座高塔上，浑身颤抖地等待“可怕的查理曼”到来，旁边站着奥特哥，他是法兰克公爵，卡洛曼曾经的追随者，一位同样憎恨查理曼大帝的人。“查理曼的大军来了吗？”迪迪尔不停地问。首先是长长的行李车在平原上蜿蜒而过，接着是平民的队伍，紧随其后的是主教、修道士和神职人员的队伍。每次奥特哥的回答都是：“不，还没有。”

迪迪尔开始讨厌日光。他哽咽着说：“我们下去，藏在地下，远离可怕的敌人。”奥特哥也很害怕，因为他知道可怕的查理曼发怒时的威力。奥特哥得意之时，经常出入宫廷。他说：“当你看到无数的长矛举起，无数的黑铁砸向城墙，你就知道查理曼来了。”就像乌云在西方升起，挡住了白昼的光芒，大地一片漆黑。查理曼大帝的大军终于来了，举起的长矛使受困的城市变得比黑夜还黑。钢铁巨人查理曼大帝现身了，他头戴铁头盔，身披铁铠甲，佩戴铁胸甲和肩甲，左手握铁匕首……连战马也是铁青色的。查理曼大帝的意志坚如磐石。他前后左右的骑士也是同样的装扮。于是，平原和空地到处都是铁，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这就是你想见到的人。”奥特哥对迪迪尔

说。然后，他像个死人般消失了。

尽管加洛林王朝军队的画面气势磅礴，但法兰克人还是花了六个月才攻陷帕维亚，迪迪尔最后投降，被关进了修道院。查理曼大帝宣布自己是新领地的国王。围城之时，查理曼大帝把破城的任务交给了几位勇将，自己前往罗马。在罗马，他受到盛情款待。市民们手拿橄榄枝涌向城门迎接他，高声欢呼“尊贵的客人”“教会的守护者”。他下马徒步穿过街道，来到罗马天主教堂。他和普通朝圣者一样，跪着爬上台阶，等台阶最上方的教皇扶他起身，和他拥抱。唱诗班响起了欢呼声，传来了“奉主之名而来，主将赐福于你”的喊声。

几天之后，查理曼大帝在丕平的教会捐赠书上盖上印章，文件被封存在教皇的档案室中，但此后不久，关于领土部分的文件却消失不见了。



包围帕维亚后，查理曼来到罗马觐见教皇

第3节　君士坦丁的捐赠

与此同时，教廷起草了另一份文件，即所谓的“君士坦丁的捐赠”。文件称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赐给了教皇。几个世纪后，人们才知道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信以为真。教皇的权力逐步扩大。在处理世俗事务上，我们不知道查理曼大帝赋予教皇多大的权力，但在他统治期间，他与教皇在处理意大利事务上的态度应该是主仆关系，而不是相反，只有在讨论精神层面的问题时，他才愿意顺从教皇的意志。



教皇利奥三世

攻克帕维亚后，查理曼大帝把伦巴底交给他的一个儿子统治，然后回国去了。但不久之后，新麻烦又出现了，他再次返回意大利，原因是教皇利奥三世很不受罗马和周边国家的欢迎，贵族们总是制造骚乱反抗教皇政府。一天，利奥三世在宗教游行队伍的最前头骑马穿过街道时，一群武装分子从街道边冲出来，把他拖出游行队伍，拉下马，暴打至半死，更有甚者，将他挖了双眼，割了舌头，但后来都奇迹般地恢复了。

利奥三世浑身颤抖着来到查理曼大帝的面前。查理曼大帝此行的目的就是恢复罗马的秩序。如果袭击教皇只是简单的报复行为，那么处理起来毫无困难，因为他身后有强大的法兰克军队。但利奥三世的

敌人马上进行了指控，宣称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此，查理曼大帝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会认真聆听双方的观点，另一方面，尽管他对教廷很尊重，但不可能无视身居高位的人的卑劣行径，尤其像利奥三世这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查理曼大帝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事情处理到底，但要依据什么法律，法兰克国王甚至是意大利国王才可以审讯和盘问教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审判教皇，就像古时候罗马帝国皇帝对圣保罗做出的最终裁决那样。但自从“矮子”丕平把拉文纳总督的职位给了教皇而不是拜占庭的皇帝后，法兰克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就变得日益紧张，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六世尚未成年，他的母亲伊琳娜太后篡了位。女皇把他扔进地牢，弄瞎了他的双眼。因此，西罗马不想接受这种女人的审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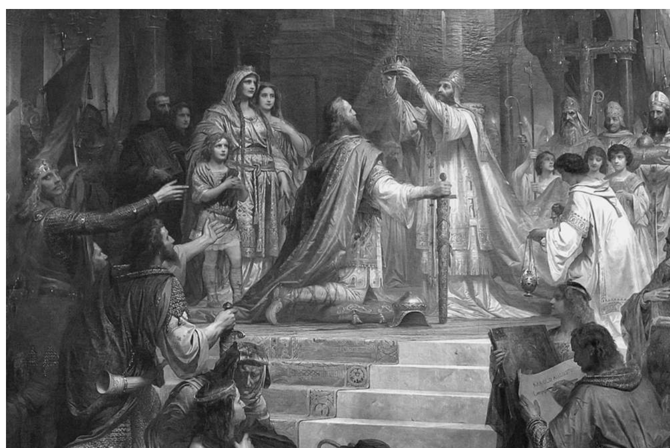
于是，查理曼大帝不得不承担起审判的责任。认真核实证据后，他宣布指控教皇的罪名不成立。教皇彻底赢得了胜利。但查理曼大帝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知道教皇的权力基础薄弱，教皇迫不得已向一位世俗君主请求伸张正义的举动，势必会降低教皇在世人眼中的权威。一旦法兰克人离开罗马，他不敢保证教皇不会再次受到攻击。教皇没有公认的权力基础执行自己的意愿，只能受政敌摆布。

800年圣诞日，圣彼得大教堂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利奥三世终于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利奥三世身着华丽的礼服站在高高的圣坛前。圣坛的拱形入口上悬挂着一千支蜡烛。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儿子们跪在光线昏暗的教堂中。祭祀仪式临近结束时，利奥三世手持金色王冠，走向他们，然后把王冠戴在了查理曼大帝的头上，教堂立刻响起欢呼声，就像从前罗马皇帝即位时的情景一样。利奥三世高声说道：“查理曼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皇帝，一位伟大而性情温和的君主，愿他永生，常胜不败！”法兰克史学家评论道：“从那时起，君士

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第4节　西罗马帝国的建立

利奥三世通过给查理曼大帝涂圣油、加冕的仪式，不仅强化了教皇的权力和尊严，还取悦了罗马民众。历经三个世纪后，罗马又重新有了皇帝。查理曼大帝对他的新身份有些迟疑，不愿接受，因为即使没有和君士坦丁堡起纷争，本国的麻烦也足以让他筋疲力尽。但事情出人意料，东罗马帝国由于忙于揭露和反对伊琳娜女皇，无暇顾及西罗马发生的变故。后来，伊琳娜女皇的继任者尼塞福鲁斯一世同意承认查理曼大帝的称帝，但需以割让他们垂涎已久的东亚德里亚海的部分土地作为交换条件。



利奥三世身着华丽的礼服站在高高的圣坛前，把金色王冠戴在了查理曼大帝的头上

其他国家也急着向新皇帝表示敬意，纷纷写信祝贺，其中包括来自巴格达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寻求结盟的信。哈伦·拉希德统治着强大帝国，疆域从波斯延伸至埃及，从埃及沿北非海岸线直达直布罗陀海峡。一次，他送给查理曼大帝一个精妙的水钟作为礼物，钟表敲响

12下，很多窗户就会打开，弹出全副武装的骑兵前后移动。更让西罗马人惊讶的是，圈养在亚琛王宫里郁郁寡欢的大象九年来一直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当人们正要带着它远征北方的日耳曼部落时，它却死了，这个故事被记载在国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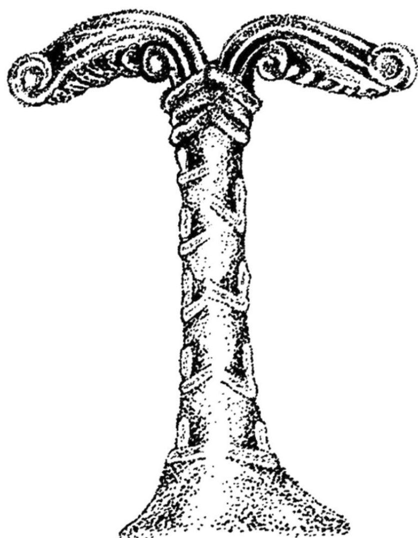
比哈伦·拉希德更不幸的是那些向查理曼大帝示好，想要寻求他的保护的统治者们。他们希望利用查理曼大帝的影响力，让遭到流放的韦塞克斯和诺森伯兰的国王们恢复权力。耶路撒冷主教写给查理曼大帝一封信，请求他从异教徒手中拯救这座基督教城市，随信还附上了一面旗帜和圣墓教堂[2]的钥匙。尽管查理曼大帝被这个请求打动，但他知道他无力打这场战争，只能将之搁置，因为如果帝国境内的异教徒没有被征服，凶悍的撒克逊人是否会挑衅法兰克的主权，嘲笑法兰克人的信仰？

撒克逊人生活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丘陵地带，8世纪末，其他日耳曼部落，如法兰克人和巴伐利亚人，都已经接受基督教文明的洗礼时，撒克逊人仍然坚守旧信仰，崇拜自然之神，向居住在树林和喷泉中的精灵献祭。他们崇拜的对象是掩藏在森林深处的一棵大树，祭司宣称整个天堂就依附在大树之上。这株圣树叫“伊尔明苏尔”（Irminsul），被称为“万物的支柱”，是团结撒克逊各部落的纽带。敌人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时，他们就会聚集在部落首领身旁，共同抗敌；和平时期，他们会纯粹因为好战而彼此争斗。

第5节　圣博尼费斯

罗马帝国分裂、实力下降时，一部分撒克逊人来到大不列颠岛并定居下来。这些移民的后裔中有一些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决定把福音带到日耳曼的异教徒部落，为仍生活在精神黑暗之中的部落带去光明。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是圣博尼费斯，拉丁语为圣温尼福瑞斯，

意思是“带来和平的人”。



圣树“伊尔明苏尔”



撒克逊人的后裔中有一些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决定把福音带到日耳曼的异教徒部落，为仍生活在精神黑暗之中的部落带去光明。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是圣博尼费斯

查理·马特还是法兰克公爵的时候，圣博尼费斯来到日耳曼，在各地游历，传播基督福音，说服皈依基督教的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他向罗马教廷陈述了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教皇任命他为主教，到巴伐利亚公国传教。后来，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他的身边聚集了大量信徒。他不仅在一些教区建造了教堂，还在美因茨建立了大主教辖区。因

此，早在德意志建国前，教会就拥有了政府组织形式，管辖各省的教会。

只有在德意志北部和东部偏远地区，异教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完成教皇的愿望，帮助法兰克实施教会改革后，圣博尼费斯决心最后一搏，完成去北方传教的心愿。当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但没有什么困难和危险能让他退缩。他和几个教徒启程前往弗里斯兰，准备向居住在那里的野蛮的异教部落传道。他还没有开始传道，就受到攻击。他没有自卫，结果不幸遇难。

“德意志的使徒”走了，随之而逝的是上帝带给德意志的福音。基督教要传播到北方部落，需要通过暴力和长剑，而不是温和的影响力。查理曼大帝笃信天主教，坚决捍卫他的信仰，他认为，愚蠢和固执使人们对基督教的真理视而不见。如果有必要，他决心用武力推进天主教的传播。

而撒克逊人如果在战斗中失利，会臣服一段时间，承诺给法兰克人进贡，建造教堂，但本质还是异教徒。机会终于来了。撒克逊人得知法兰克的大军都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边境，就越过边界，驱逐或杀死很多传教士。查理曼大帝知道，如果不征服撒克逊人，他的帝国就得不到安宁，但这个任务远比预料的艰巨，他花了整整三十八年才宣告征服成功。



圣博尼费斯和几个教徒启程前往费里斯兰，准备向居住在哪里的野蛮的异教部落传道。他还没有开始传道。就受到攻击。他没有自卫，结果不幸遇难

第7节　征服撒克逊人

艾因哈德是查理曼大帝时期的一位学者，写过查理曼大帝的传记，他说：“要不是撒克逊人背信弃义，他们早就被征服了，他们向国王投降，接受投降条件，然后再次叛乱。他们究竟失信多少次，已经数不清。”艾因哈德说，查理曼大帝的办法是，只要叛乱，就必须受到惩罚。于是，他马上率大军平叛。一次战役中，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抵达圣树伊尔明苏尔所在的森林，放火烧毁了圣树。撒克逊人非常沮丧，之后马上聚集在一位叫威肯特的酋长的麾下。我们对威肯特的了解不多，只知道他英勇无比，多年来一直没有向敌人投降，因此，他最后应该能够赢得胜利。

查理曼大帝被不断的反抗彻底激怒了。他采用一切手段推进目标。有时，他用贿赂的手段让部落首领们背叛，但更常采用的是残忍手段，以此震慑敌人。四千五百名曾经发动叛乱的撒克逊人被法兰克

人砍头或逮捕。被俘的撒克逊人哀求道，是已经逃到丹麦的威肯特唆使他们叛乱的。“威肯特不在这里，你们必须替他受罚。”查理曼大帝无情地回答。所有人被就地正法。

此外，查理曼大帝还把数百个撒克逊家庭迁到法兰克王国的中心地带，史学家们称之为“大聚居区”。他在这里建立了法兰克卫戍部队，派传教士到被征服地区建造教堂，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

异教徒撒克逊人经常躲藏在附近森林和沼泽里，突袭奉命去传教的主教和牧师。传教士们不得不赶紧逃跑。一些传教士缺乏圣博尼费斯的勇气，当危险降临时，就会犹豫要不要返回。其中，最胆小的一位传教士在查理曼大帝面前哭诉道：“我应该怎么办？”查理曼大帝严厉地回答道：“返回你的教区。”



一次战役中，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抵达圣树伊尔明苏尔所在的森林，放火烧毁了圣树

查理曼大帝期望教会的神职人员像部队的军官一样顺从、忠诚，他知道传教士的工作必须得到他的有力支持。

“任何一个没有受洗的撒克逊人藏起来，躲避受洗，让他去死。”

“如果有人因为蔑视基督教而轻视大斋节的斋戒，让他去死。”

“所有人，无论贵族、自由民，还是农奴，都要把他财产和劳力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和牧师。”

这些法律表明查理曼大帝本质上还是个半野蛮人，他用更残酷的野蛮手段来镇压异教徒的野蛮行为。威肯特虽然非常勇敢，但最终还是被迫投降，接受洗礼。法兰克逐步征服了撒克逊人。

巴伐利亚公国皈依基督教多年，所以没有顽强抵抗。巴伐利亚和撒克逊臣服法兰克后，查理曼大帝不仅是名义上的君主，实际上他统治的帝国包括了现在的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后来，他放弃了一些征服的地方，而遭受蹂躏最多的德意志成为他对外战争的最大功绩。



查理曼大帝用更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异教徒的野蛮行为。威肯特虽然非常勇敢，但最终还是被迫投降

他扫除了黑暗的阴霾，
让我们寻找到了光明。

这是9世纪一位撒克逊修道士写的诗，这表明撒克逊人的痛苦已经消失。一位现代作家写道：“显然，几代撒克逊人都忠诚于他们的

信仰。”

如果忽略了查理曼大帝对待撒克逊人的残酷行径，那么与查理曼大帝有关的故事就不真实；如果仅仅把他描述成一位战士，用野蛮的方式无情地消灭所有反对他的人，这也不公平。他不仅是一位征服者，还是帝国的缔造者。对法兰克人的祖先而言，战争并不是目的，而是保卫国家的方式。

查理曼大帝沿边境修筑的要塞，在敌人的领土上建造的教堂，这些都是他的威慑和恐吓政策的一部分。他在各地兴建的道路和桥梁，构筑起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成为文明传播的通道。这些道路不仅改善了交通环境，还促进了各地的贸易和交流。王宫成为周边各国的司法中心，修道院成为传播知识和宗教的中心。以上这些都是他的罗马帝国梦的一部分，他要重塑罗马帝国昔日的高贵和威严。

查理曼大帝计划建造一条连接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运河，从而贯通东西水路。在他那个时期，这个工程已经进入施工阶段，但直到现代才完成。查理曼大帝拥有完成宏伟工程的远见和进取心，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力，工程最终搁浅。查理曼大帝不像以前的罗马皇帝，他无处征税，只能依靠私有土地的税收，而这样的税收经常以“种类形式”缴纳，即不以货币的形式，而是依据承租人的意愿，缴纳一定数量的牛、牛奶、谷物或燕麦。他仔细记录了王室庄园里的母鸡数量和鸡蛋数量。然而，这些以“种类形式”缴纳的税费，只能满足王宫的日常开支。

法兰克人所欠的主要“债务”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军事上的。根据法律规定，每个自由民都有耕种的义务。但随着帝国领土的扩大，这一政策就变得不合时宜，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修改之后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拥有的土地少于一定数量，可与其他人合并，根据合并后土地的面积，出相应的人服兵役，剩下的人则继续在家耕作。

第8节　查理曼大帝的宫廷

查理曼大帝急切地希望从各区征得大量劳力实施他的工程计划，但该想法遭到强烈反对。地主认为，法律只规定他们修筑附近的道路和桥梁，如果陛下征用佃户，可能会把他们从阿奎尼派到巴伐利亚，或从奥地利派到伦巴底。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很多工程因为缺乏劳动力而不得不突然停工。然而，装饰着从拉文纳运来的圆柱和马赛克的王宫和教堂，最终在亚琛建成，这里成了查理曼大帝的主要居所。

这种被查理曼大帝称为“新罗马”的生活非常简朴。查理曼大帝是一位真正的法兰克人，讨厌一切不必要的炫耀和仪式。每年春秋两季集会上，重要贵族和官员讨论政务时，他会亲自接待他们，感谢他们赠送的礼物。他在人群中穿梭，与这个人开玩笑，问那个人问题。而在君士坦丁堡宫廷，这种做法是绝不能接受的。

君臣之间轻松交流的氛围充分展示了查理曼大帝的个人魅力。士兵、教会人员、官员和自由民一样，不再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难以接近的皇帝，而是和他们一样，也有普通人的优点和缺点。

有时，查理曼大帝会突然发脾气，但马上会搞个恶作剧让气氛重新变得轻松。据史学家记录，一次，查理曼大帝说服一位犹太人卖给一位爱慕虚荣的主教一个涂了色的老鼠，骗主教说老鼠是从朱迪亚带回来的。起先，主教想低于三块钱买下，但犹太人说钱太少了，就假装不愿意。最后，主教同意支付一蒲式耳银。查理曼大帝听说后，召所有的主教到宫廷，兴高采烈地喊道：“让我看看谁买了一只老鼠！”我们相信这个故事肯定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傲慢的教会也会遭到人们的耻笑。

查理曼大帝还喜欢向遇到的人提一些艰深的问题，包括教皇本人。他并不是心怀恶意，想让他们难堪，而是真心求教。他时刻保持

清醒的头脑，对所遇之事抱有浓厚的兴趣。他鄙视邋遢或知识贫乏的人，期望主教成为神学的权威，官员通晓政府管理，学者拥有良好的科学素养。

勤奋是赢得查理曼大帝赏识的最可靠的途径，他不允许自己和所有的官员偷懒。即使睡觉时他也会把书写材料放在枕头底下，以便醒来或思考时随时记录。一次，他参观他创办的宫廷学校，发现出身卑微的孩子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而贵族子弟鄙视书本知识，浪费了时间，荒废了学业。他赞扬了认真读书的人，然后呵斥其他人道："你们仗着自己的家世和财富，无视我的命令，不努力提高自身的修为，不潜心钻研学问，而是纵情享乐，无所事事……我不在意你们的出身……记住，除非你们能认真学习，弥补之前的疏忽，否则你们永远不可能从我的手中得到任何好处。"

第9节　查理曼大帝的政府

贵族和地主曾与查理曼大帝并肩参加过最艰苦的战争，他们现在大多身居要职，而且依据他们的爵位的高低[3]，统治着帝国内面积大小不同的省。

很多伯爵私自扣留本省三分之一的贡赋和租金，不上交国王。有些贵族更厚颜无耻，不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增加扣留的比例。贵族们掌管当地法庭，负责司法管理、征缴税款、建造道路和桥梁。实际上，他们就是土皇帝，欺压百姓，无视王室利益，满足私欲。

墨洛温王朝曾试图限制伯爵和其他省级官员的权力，偶尔派密使去调查这些省的情况，对发现滥用权力的情况进行整治。查理曼大帝把这种做法纳入常规监察体系。在年度集会上，他任命"钦差"到各地巡查，每年至少四次。"钦差"向他报告巡查的情况。"钦差"所到之处，伯爵和子爵都会暂时有所收敛。"钦差"可以坐在法庭上，倾听当

地百姓申诉冤屈。如果“钦差”坚持改革，伯爵们必须执行，还要为受指控的罪行赎罪。

这里有一段关于贵族暴行的记录：

> 伊斯特里亚是亚得里亚海东部的一个行省，当地一位男子长期遭受主人约翰尼斯的欺压，在“钦差”的过问下，事情最终水落石出：约翰尼斯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当作农奴卖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强迫佃农建造房屋，派遣他们到遥远的威尼斯和拉文纳干活；他把公共土地据为己有，并从边界带回斯拉夫人为其耕作；他还抢夺佃户的马匹和钱财，借口说皇帝征用，分文不给。当地人哭喊着说：“如果皇帝帮助我们，我们就得救了，如果不帮我们，我们生不如死。”

以上记录可以看出查理曼大帝已经成为百姓反抗贵族暴政的救世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政府可称为“大众政府”。从前，法兰克是在大众集会时制定法律，但现在只是召集贵族集会，审批通过法律条文。

国家的“法典”以查理曼大帝最信任的钦差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具体法令交由主要贵族讨论，然后在大会上宣读，进行集体表决，但这毫无意义，因为很少有人表示反对。

除了颁布诏书和制定法典外，查理曼大帝还命令收集所有旧部落的法令，如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文字传承的法典、口头传承的法典，然后修改和更新这些法律，这是一项实用而有意义的工作。但查理曼大帝还不能像查士丁尼一世一样被称为“伟大的立法者”，因为他急于维护法律的正义。法典的制定很仓促且不完善。他还没弄清楚罪恶的根源，就急于铲除它，因此通过了很多相关的法律，但只触及了罪恶的表象，造成多重指令、彼此矛盾的混乱状况。

有时，“钦差”也不可靠，在巡视期间收受地主的贿赂，因此，需要更多的机制和新的法律来监督他们。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如果制定出完善的法律很难，那么实施起来就更困难，因为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通常会抵触，或者阻碍法律的实施；而广大民众愚昧无知，无法承担实施法律的责任，只有少数在宫廷学校接受过教育的人成为可信赖的“伯爵”或王室管家。

然而，人们模糊地认为，现在的政府是维护国家繁荣最理想的形式。史学家们说：“无人在他面前哭诉，相信他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法兰克的每一个教堂里，那些没有奉召随查理曼大帝而战的人都会为他的安全祈祷，祈祷他的大军征服野蛮人。

与赢得战争胜利相比，查理曼大帝更在意的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上帝之城》。圣奥古斯丁在书中描述了完美君主的形象，他们手中拿着上帝赐予的权杖，征服敌人，引领被征服者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繁荣。

第10节　查理曼大帝和教会

查理曼大帝相信自己被赋予了监护天主教会的权力，不仅要阻止异教的渗入，还要防止教会内部传播错误教义，从而导致邪恶生活滋生。举行宗教仪式时，他在教皇面前放低身段，跪爬圣彼得台阶，但在其他场合，他用主人对仆人的语气对教皇说话，提出他的想法，并期望得到遵循，而作为回报，他也会以武力保护教会不受侵扰。

“愿教会领袖能得到国王的正确统治，愿国王得到万能的神的正确统治！”阿尔昆的这个祷告也许表达了皇帝的想法，而教皇利奥三世更愿意把罗马天主教会和皇帝的关系说成母亲和忠诚的儿子的关系，言外之意就是，皇帝作为儿子应该顺从母亲。但查理曼大帝并不认可该观点，从而导致后来君权和教权之间的冲突。

在自己的领土上，查理曼大帝和以前的法兰克国王一样，对教会拥有最高统治权。他任命主教，并经常令他们担任“钦差”，协助政府管理。然而，教会是一块“独立区域”，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是，其收入主要来源于主教辖区的教廷的支持和一般信徒捐赠的十一税。在神职人员参加年度集会时，皇帝有意安排他们与贵族和自由民分开。如果主教把异教徒或罪犯驱逐出教会，皇帝的法庭一定要执行这个判决，因此教会拥有许多权力，甚至是特权。查理曼大帝认为，享有特权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前，查理·马特和圣博尼费斯一直致力于提高法兰克教会的品质，查理曼大帝也继承了该使命，经常巡视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看他们是否在高墙内严格遵守教会的戒律。

普通教区的神职人员也受到严格的监督。依据罗马教会的法律，他们不可以结婚、参与任何世俗事务、进酒馆、携带武器、打猎，而是要自我约束，以身作则，为教区的居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工作出色比知识更重要，”查理曼大帝在写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信中建议道，“但没有知识，工作不可能出色。”依据这一思想，查理曼大帝要求每个教区都要建立学校，附近的男孩都有机会接受普通的基础教育。宫廷成为研究学问的中心。他本人对各科知识都很感兴趣，从圣经到数学，再到遥远国度的传说，他都做过深入研究。吃饭时，他喜欢让人读历史。《查理曼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告诉我们，查理曼大帝虽不会书写，但他精通拉丁语，粗通希腊语。

他非常渴望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那样的人。他身边聚集了欧洲最有学问的人。他还热切欢迎外国学者进入政府，为他所用。在帝国收留的人当中，有一个叫阿尔昆的诺森伯兰人，称自己是“地球上的流浪者”，因为当初是丹麦人的入侵迫使阿尔昆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阿尔昆住在法兰克宫廷，组建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宫廷学校，自己编写识字课本教学生。他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很快成为皇帝的重要智囊，激励皇帝施展他的宏图大志，而皇帝也热情地投入工作。

第11节　查理曼大帝的性格

正如火山般的能量，赋予了多面性格的查理曼大帝魅力。我们首先认为他是一名战士、传奇的主角、建造帝国的政治家；其次他是人民的监护人，维护公平正义的国王。但当我们回忆起涂色老鼠，他简单、孩子气的性格就展现出来了。“伟大的查理曼”不是圣人，是领导法兰克人战斗的粗野战士，既残酷又善良，脾气暴躁，热爱运动，危急时刻坚强如铁，对待女人柔情似水。他是一位纵容孩子的父亲，于是女儿的诡计成为宫廷的丑闻。与他的居家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还是一位学者、神学家、阿尔昆的朋友，认为“如果没有知识，工作就不可能出色”的人。

历史上，很多著名人物与查理曼大帝齐名或超越他，如一些政治家或立法者，学问更深的学者，举止更文雅的王宫贵族，但很少甚至没有人像他一样目标多样，单纯依靠人格力量就取得惊人的成就。画家和史学家都喜欢描绘他的雄才大略，但事实上，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他一直保持着年轻人的激情和活力。在亚琛的浴场中，他像孩子般纵情游泳，到山上狩猎野猪，拟定法典，向主教发号施令，处理任何事情都会竭尽全力，工作的强度远超常人。

幸运的是，查理曼大帝拥有法兰克人的健壮体魄。814年驾崩时他已是一位高龄老人，因此，人们认为他不是普通人。据说，两百年后他的陵寝被打开，人们发现他如活人般端坐在宝座上，雪白的头发上戴着王冠，手中紧握着宝剑。



查理曼大帝。他不是圣人，是领导法兰克人战斗的粗野战士，既残酷又善良，脾

气暴躁，热爱运动，危急时刻坚强如铁，对待女人柔情似水

“上帝把一切恩惠赐予查理曼大帝，他与世界共存。”几个世纪过去了，这种说法还在民间流传，时间会证明一切。

---

[1]埃米尔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尊称。——译者注

[2]耶稣奉安之地。——译者注

[3]依次为伯爵、子爵。——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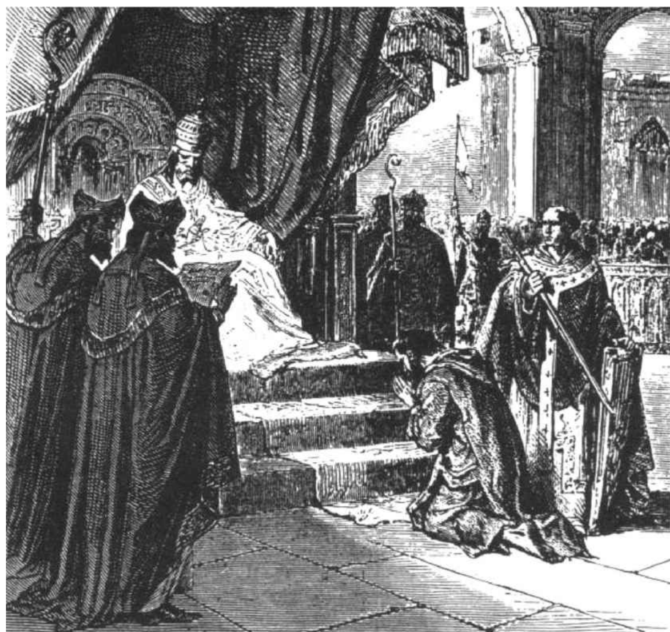
第8章

诺曼人入侵

查理曼大帝驾崩时，他建立的帝国幅员已经非常辽阔，从丹麦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和罗马南部的斯波莱托公国，西起大西洋，东至波罗的海、波西米亚和达尔马提亚海岸[1]。查理曼大帝试图实现古罗马的理想，把文明的欧洲置于一人统治之下。但他很清楚，他奠定的基础很薄弱，是他强悍的性格把欧洲各地凝聚在一起，如果他不在了，一切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他卓越超凡的才能和赫赫声名，帝国很有可能崩溃。因此，他不想留下一个统一的帝国，由一个儿子继承，而是打算把帝国分给三个儿子。但其中两个儿子都先他离世，于是他的想法彻底破灭了，唯一的幸存者，路易最终继承了整个帝国。

新皇帝路易的身材与父亲相似，但缺乏父亲的远见卓识。路易性情温和，但很残酷，好猜忌。例如，在对待他的侄子——意大利国王伯纳德的事情上，路易总认为伯纳德要密谋推翻他的统治。路易召这位年轻人到宫廷来，伯纳德有些犹豫，害怕有诈。路易让伯纳德信任的皇后传话，并保证他的安全。伯纳德不得已，最终同意前往。但伯纳德一到达就被逮捕，扔进了地牢，他的眼睛被残忍地挖掉，最终毙命。不久，皇后也死了，路易非常爱她，因此认为上帝因为他食言而惩罚他。为了忏悔，他在宗教仪式上表现得更加虔诚，他的臣民都叫他“虔诚者路易”。

路易和他的父亲一样，随时聆听被压迫者的心声，并通过法律改善他们的境遇。路易统治的前十六年中，加洛林王朝没有面临任何危险，似乎相当稳固，但繁荣与和平突然就在可怕的内战中灰飞烟灭了，犹如乌云遮住了太阳的光芒。



为了忏悔，路易在宗教仪式上表现得更加虔诚

虔诚者路易和第一任妻子育有三子。他效仿查理曼大帝的做法，指定长子洛塔尔为王位继承人，把国土分别给了三个儿子。但路易与第二个妻子结婚后，又生下一个小儿子查理，于是麻烦来了。第四个儿子是老皇帝的心肝宝贝，他很乐意赐给这个儿子更大的封地，这样就得牺牲其他儿子的利益，而其他儿子认为查理是闯入者，非常憎恨他，不想让他得到任何东西。

查理六岁的时候，虔诚者路易坚持把现在的瑞士和德国的一部分分给查理。查理的三个哥哥听说后，先是密谋反叛，最后公开叛乱。



虔诚者路易

接下来的十年是虔诚者路易最不光彩的十年。虔诚者路易和皇后两次被关进监狱，受尽凌辱。儿子们每次释放他后，软弱无能的他都会就地原谅他们，然后儿子们再次发动叛乱。

840年，虔诚者路易驾崩时，纷争的种子已经四处播撒。他的继承人公开表示，除了个人野心，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洛塔尔承袭帝号，获得的封地位于法兰克王国的中部，从莱茵河河口一直延伸到意大利，据有两个都城——亚琛和罗马；东部是现在的德国，由他的弟弟路易统治；西部是现在的法国，由“秃头查理”统治——这个最遭嫉恨的小儿子最终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虔诚者路易驾崩后，洛塔尔继位，承袭帝号



虔诚者路易驾崩后，“秃头查理”统治法兰克王国的西部，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第1节　斯特拉斯堡誓词

这种划分很有趣，因为它表明欧洲的两个民族从帝国时代就出现了融合。842年，路易与查理兄弟二人在斯特拉斯堡会晤，决定结盟，共同反对洛塔尔。路易和贵族们用德语宣誓，而查理和他的追随者则操着类似于现在法语的浪漫语言宣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双方的军队清楚君主的意图。斯特拉斯堡誓词是民族发展的见证，表明

不同的民族语言已完全不同。

很快，兄弟三人就签署了《凡尔登条约》，承认查理曼帝国划分为三部分，西部后来发展成法国，东部后来发展成德国，有争议的中部领土归洛塔林王朝。中世纪时，洛塔林王朝的领土面积不断缩小，最后相当于现在的洛林省，而洛林省成为引发战争和麻烦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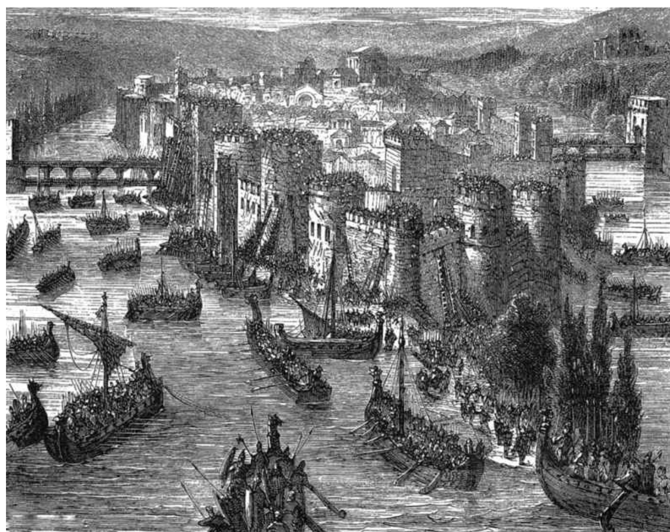
追溯《凡尔登条约》签署之后的历史细节有些令人乏味，一位历史学家把这段历史描述为“令人头晕目眩、难以理解、单调、混乱的现象出现了，背叛没有节制，贪婪没有底线。没有一个儿子顺从或忠于父亲，兄弟离间，叔叔不宽容侄子。命运不停地变化，各方关系不停地变化，彼此之间没有信任，互相撒谎，彼此伤害。”

881年，东法兰克王国的君主“胖子查理”[2]，在侄子和叔叔这些对手相继去世后，因斯特拉斯堡誓词而名声大噪，成功统一查理曼大帝时期的疆域。但几年之后，他身体变得虚弱，无力控制庞大帝国，不久就被废黜，死于康斯坦茨湖岛上的监狱，加洛林王朝最后闪耀世界的光芒也随之消逝了。“秃头查理”的后裔几代人居无定所，遭到贵族们的鄙视和威胁，如墨洛温王朝一样，他们完全无力抵抗诺曼人的入侵。从8世纪开始，到9世纪和10世纪之交，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破坏了欧洲的文明和贸易。

查理曼大帝时期，人们就能在法国海岸看到诺曼人的长船。据史学家的记录，睿智的国王查理曼大帝看到这些长船说：“这些船没有装载货物，他们是凶残的敌人。”接着，他痛苦地叹息道：“知道我为什么流泪？我不怕他们伤害我，我难过的是，在我有生之年，他们竟已如此靠近海岸。当我预想未来，我感到更加悲伤，因为他们将会给我的子孙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诺曼人，从他们的名字可以猜出，来自荒凉、积雪常年覆盖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丹麦海岸，弱者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很难生存。这

个族群的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耐寒，不喜欢坐在火边，而喜欢让清凉的海风吹拂脸庞。对他们而言，生存是永恒的斗争主题，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直至他们获得舒适安定的生活。



查理曼大帝时期，人们就能在法国海岸看到诺曼人的长船

诺曼人或称“维京人”，分为三个等级：奴隶、农民和贵族。

“奴隶皮肤黝黑，手上都是裂纹，指关节弯曲，手指粗壮，相貌丑陋，后背宽阔，脚跟很长；他们每日辛勤劳作，背着一捆柴疲惫地回家，孩子们帮忙架起篱笆，施肥，照看猪羊，挖泥煤。农民皮肤泛红，眼睛不停地转动，主要从事宰牛、打犁、建木头房子、造手推车。贵族长着黄头发，面色红润，目光锐利，他们的活动主要是造盾牌、拉弓、掷标枪、投长矛、骑马、掷骰子、击剑和游泳，他们的任务是发动战争，血染沙场，战胜对手。”

“挑起战争”是维京人的生存目标。他们的神“奥丁”和“托尔”都是战神。在闪电中，战神互相击杀，移动盾牌时，雷声隆隆。在维京人看来，活得舒服长久，最后死在床上，既不光荣也不快乐。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哈拉神殿没有穆斯林臆想的天堂，穆斯林的天堂里阳光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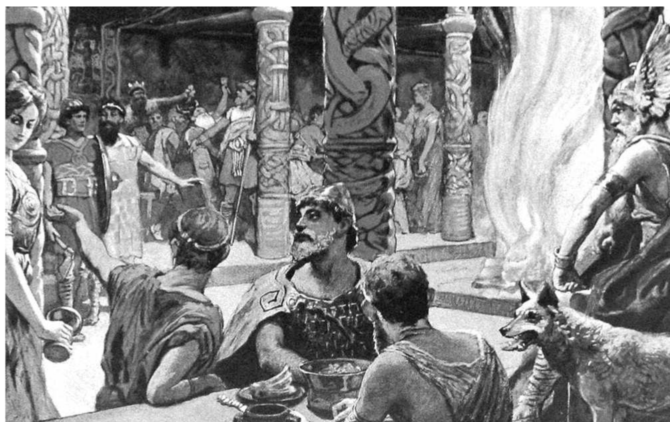
照花园，花园结满果实，鲜花盛开，人在劳顿后休息时，有天堂女神陪伴。维京人不需要休息，而是不断积蓄力量，勇猛杀敌。在维京人的天堂，白天进行永恒之战，夜晚坐享盛宴，勇士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夸耀他们的勇猛行为，第二天继续英勇战斗。

第2节　诺曼人的突袭

诺曼人的长船有着巨大的船首，船首往往塑着猛兽或恶魔的头，船上乘坐的是厌倦了掷骰子和标枪的维京“伯爵”，或因犯错被国王流放的伯爵。他们的舰队横扫北海。一些船开到冰岛或更遥远的格陵兰岛和北美去探险。一些船去烧毁爱尔兰沿岸的修道院。还有一些船袭击东法兰克王国北部、西法兰克王国和英格兰。他们最初的目标只是掠夺。与匈奴人不同的是，他们并不鄙视文明社会的奢华。只有接受文明，他们才会变“柔和”。后来，诺曼人发现进攻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开始在当地建造房屋，譬如，英格兰东部沿海地区就成为丹麦人聚集的殖民地。



对维京人而言，生存是永恒的斗争主题，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直至他们获得舒适安定的生活



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哈拉神殿是维京人的天堂，勇士们夜晚在那里坐享盛宴



“奥丁”（右）和“托尔”（左）都是维京人的战神

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学家说：“855年，异教徒第一次在谢佩岛过冬。”

第3节　阿尔弗雷德大帝

在之后的五十年里，侵略者似乎要像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消灭英格兰原住民和罗马征服者一样彻底清除盎格鲁-撒克逊人，但他们并未得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遇到了英格兰最著名的国王，韦塞克斯王国的王子，阿尔弗雷德大帝。韦塞克斯王国大部位于泰晤士河南岸。849年，阿尔弗雷德出生在伯克郡的旺塔奇镇。他自小就生长在战乱和危险的环境中。从幼年时起，在哥哥们的帮助下，他长期抗击丹麦人，但仍然无法阻止丹麦人入侵。阿尔弗雷德登上王位后，英格兰获得暂时的安宁。他开始组建舰队，改革军队，但几年后，敌人再次越过边境。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阿尔弗雷德率部去萨默赛特的沼泽地逃难。阿尔弗雷德在阿塞尔内修筑要塞，并招募了许多英格兰勇士，与敌人最后决一死战。丹麦军队溃败。他的敌人——古瑟罗姆国王求和，同意签署《韦德莫尔和约》，皈依基督教，并承认阿尔弗雷德是韦塞克斯国王，古瑟罗姆则继续据有泰晤士河以北的丹麦法区[3]。

这是新英格兰的雏形，因为从这时起，阿尔弗雷德和他的子孙们确保了韦塞克斯的安全，现在他们决心从丹麦人手中一点点收复失地。首先，在他的儿子长者爱德华的领导下，中部的麦西亚被光复了，丹麦法区的丹麦人承认韦塞克斯国王为他们的君主。后来，韦塞克斯国王攻占了诺森布里亚和苏格兰南部，到10世纪中期，可以说“英格兰从福斯河到英吉利海峡都在一人统治之下”。

收复丹麦法区意味着打败了丹麦人。阿尔弗雷德之所以得到“大帝”的尊号，是因为他勇敢地挥舞着长剑，带领大家共同战斗。阿尔弗雷德是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在野蛮战争的年代，他洞察到严格的纪律和军事训练的价值。为得到他需要的人才，他增加了大乡绅的人数，大乡绅的性质是充当国王骑士的贵族。同时，他重新组织了“民兵”，从此，无须每年秋天派遣大量民兵回家收割庄稼，而是保留大

量民兵，平时在田地里劳作，战时拿起武器。

除了改造军队外，阿尔弗雷德还在边界沿线建造要塞，组建舰队。他相信没有哪个伟大的国家是单纯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的，所以他制定法律，任命法官。法官如同查理曼大帝时期的钦差，监督法律的实施。他还创办学校，翻译书籍，邀请许多学者到宫中给他周围的人讲解和平的美好。他督促把格里高利主教所著的《牧民职务》和波依提乌在狱中完成的《哲学的慰藉》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

阿尔弗雷德大帝说他的理想是“我希望后人能记住我的著作”。今天的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人的后裔，骄傲而深情地怀念着这位“英明的国王”“真理的讲述者”“英格兰亲爱的”——当时的人对他的称呼。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爱国，追寻正义和知识。阿尔弗雷德大帝驾崩后的大半个世纪中，他的子孙继续发扬他的伟大精神。然而，978年，一个叫埃塞雷斯的十岁小男孩继位，他长大后被称为“不听忠告的人。”



阿尔弗雷德大帝是一位成功的军事领袖，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爱国，追寻正义和知识

谴责埃塞雷斯的行为之前，先看看他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这样才是公正的。重整旗鼓的丹麦人又开始进犯沿海。国内贵族纷争不断，伯爵或“郡守”纷纷占地为王，即使像阿尔弗雷德大帝一样的政治家也要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智慧，才能把这些势力强大的贵族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共同抵抗侵略者，而埃塞雷斯是一个软弱、缺乏领导才能的人，他被人们所记住的就是他推广的“丹麦金”的税收政策。“丹麦金”是为了向丹麦进贡，避免丹麦人入侵而征收的一种年度税，但聪明的人应该早就意识到，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丹麦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埃塞雷斯震怒之余，做了更短视的蠢事，下令屠杀境内所有的丹

麦人。



埃塞雷斯是一个软弱、缺乏领导才能的人

这一极端措施通常被称为“圣布里斯节大屠杀”。他的屠杀行为挑起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疯狂复仇情绪。一支装备精良的丹麦军队和另一支在沿海登陆的丹麦军队会师，然后一起进攻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埃塞雷斯只好跑到法兰西王国避难，不久之后就死了。丹麦人的领袖克努特篡夺英格兰王位。

克努特有可能摧毁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他的儿子们建立的基业，但幸运的是，克努特不像其他维京人那么鲁莽，为了战争而战争。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筹划的“北海大帝国”正是以英格兰为中心。他保留了一支称为“胡斯农奴”的丹麦护卫军，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执行他的命令。丹麦护卫军靠对新臣民征税维持运转。除此之外，克努特已经完全是英格兰人了。他还特意赠予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大量礼物，给英格兰贵族施以恩惠、赏赐土地，接受英格兰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克努特——丹麦的国王、英格兰和挪威的征服者，急于与欧洲大陆的国家结盟。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到罗马朝圣，博取教皇的同情。为了推动海外结盟，他真的是不辞劳苦。他迎娶了埃塞雷斯的遗孀——诺曼底公爵的姐姐艾玛，来取悦英格兰人，接近法兰西人。

一提到诺曼底，我们就想起北方人的第二次入侵，因为诺曼人和克努特一样具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本性。9世纪时，一些维京人航行到亨伯河和泰晤士河，伺机掠夺或定居；而另一些人像查理曼大帝一样更喜欢塞纳河、索姆河和卢瓦尔河的港口，他们和早期的英格兰侵略者一样粗鲁、大胆、野蛮。他们所经之处，城镇和教堂成为一片废墟。

“秃头查理”和他之后的加洛林王朝的继任者们无力对付维京人，只有巴黎公国的英雄厄德·卡佩率军英勇抗敌，拯救法兰西王国未来的首都。



克努特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保留了一支称为“胡斯农奴”的丹麦护卫军，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执行他的命令

“历史注定会重演。”加洛林王朝的“宫相”取代了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加洛林王朝注定经历同样的命运。

987年，“一无是处”的路易五世驾崩，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把他的王位留给了他的叔叔洛林公爵——查理。查理是一位软弱、挥霍无度的君主，统治时间很短。西法兰克王国北部的贵族不希望王室像英格兰的埃塞雷斯那样，为了和平而贿赂丹麦侵略者，于是，他们一致同意废黜查理，拥立厄德·卡佩的后代——巴黎公爵雨果·卡佩为王。兰斯大主教评价道：“我们的王冠不是继承来的，是靠智慧和贵族的鲜血换取的。”



巴黎公爵雨果·卡佩被拥立为王

第4节　卡佩王朝

不幸的洛林公爵被囚禁并死于狱中，加洛林王朝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卡佩家族登上了历史舞台[4]，其直系血统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4世纪。之后，卡佩家族的一个旁支瓦卢瓦家族取而代之，继续统治法兰西王国。

卡佩王朝时期的法国，不像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各个部落和种族凝聚在一起；也不像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是欧洲国家的一部分，而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是一个有着不同利益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融合的进程缓慢。雨果国王和他的继任者只是一片狭小领地的统治者，而不是整个法兰西的统治者。当他们率领庞大的

军队远征海外，并取得胜利时，边缘省马上承认他们是领主；但当他们转身返回法兰西时，他们发布的号令完全被忽视或蔑视。

最令巴黎统治者惶恐不安的邻居是诺曼底公爵，他是一位叫“步行者”罗洛的维京首领的后裔。罗洛之所以被谑称为“步行者”，是因为他的身型巨大，没有马可以承载他的重量，只好徒步行走。罗洛在鲁昂建立自己的政权。加洛林王朝末期的统治者“憨直者”查理无法打败罗洛，不得不封给他地，赐给他爵位，希望他能从偷猎人变成猎场看守，从制造事端的敌人变成贵族，而罗洛承诺皈依基督教，并承认“憨直者查理”是他的领主。史学家记载，当罗洛被要求亲吻“憨直者查理”的脚趾以示臣服时，一位维京人傲慢地回答道：“这样不行。”而另外一位维京人则在同伴的笑声中，把查理从宝座上粗鲁地拉了下来。

这可能只是个故事。事实上，罗洛娶了查理的女儿，住在鲁昂，成为这个半文明国家的模范统治者，支持教会，维护法律秩序。据说，他把一个硕大的手镯挂在树上，之后就忘记了，但这个手镯三年没人敢偷。

第5节　征服者威廉

诺曼底公国的统治者几乎个个头脑精明，体格强壮，野心勃勃，骁勇善战，但他们中最突出的当属威廉，他是“魔鬼”罗伯特公爵的私生子。威廉和他的斯堪的纳维亚祖先一样不安分守己。他觉得自己的公国太小了，无法施展他的宏图大志，而此时的英格兰统治者是“忏悔者”爱德华，他是埃塞雷斯的儿子。克努特的两个儿子死后，爱德华夺得了王位。他是个软弱无能的国王。因此，威廉确定英格兰就是他征服的方向。事情朝着有利于威廉的方向发展。“忏悔者”爱德华从小生活在诺曼底，继位后一直没有子嗣。因此，他非常愿意让威廉继

承他的王位。

“忏悔者”驾崩后，英格兰的英雄——撒克逊人哈罗德马上宣誓登基。哈罗德是显赫的戈德温家族成员。这个家族长期控制着英格兰南部的大片土地。

但不幸的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主要由莫克利家族和其朋友们控制。莫克利家族对危险的对手戈德温家族的憎恨超过了对诺曼人入侵的恐惧。因此，莫克利家族没有实质性抵抗诺曼人入侵。



哈罗德在约克郡的斯坦福德桥战役中成功击退丹麦人

哈罗德在国内遭各方嫉恨。此时，他听说诺曼底公爵威廉已经在南部沿海登陆。哈罗德刚在约克郡的斯坦福德桥战役中成功击退丹麦人。因此，他马上率军南下，但途中他的军队不断减员，有些人携带缴获的丹麦战利品偷偷地跑了，有些人跑回家收庄稼去了。

逃兵们可以宣称他们遵循了基督教父的建议，因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赠与威廉祝福的旗帜，而谴责哈罗德是伪君。

格里高利七世生气的原因是哈罗德未经他的同意，任命他人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且狡猾的威廉对格里高利七世说，哈罗德年轻时

曾在诺曼海岸战败，对着圣物发誓他永远不会夺取英格兰的王冠。哈罗德曾是威廉的囚徒，正是因为他的誓言，他才被释放，返回自己的祖国。

虽然年代太久远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追溯，但我们知道，哈罗德在怀疑的阴影下作战，他的勇敢以及兄弟朋友们的帮助都无法扭转他失败的命运。此时，他带领军队站在龙旗下，在森拉克旷野与纪律严明的诺曼军队相遇。英格兰军队的弓箭手和步兵沿着山坡组成人墙，岿然不动。威廉的军队无法克敌，就设置了陷阱，然后转身假装逃跑。最后，计谋果然得逞。撒克逊人欢呼着跑下山坡，追击诺曼军队。没想到的是，诺曼军队把英格兰军队团团包围。英格兰军队大乱，只有哈罗德和他的近卫军奋力杀敌。一支箭射中哈罗德的眼睛，他倒地身亡。战斗结束了，诺曼底公爵威廉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英格兰的统治者。

我们王国的龙旗在这里升起：



诺曼军队把英格兰军队团团包围



一支箭射中哈罗德的眼睛，他倒地身亡

受到诺曼人诽谤的国王在这里战斗、倒下。

哦，英格兰人的鲜血浇灌了花园。

哦，时间治愈了仇恨。

现在我们一起散步，

而八百年前我们怒目而视。

这是阿尔弗雷德·坦尼森[5]的诗《贝特修道院》中的名句，反映了

丹麦人和撒克逊人已经融合为一个民族，诺曼入侵者与他们的后裔不断融合，历经几代后，威廉和哈罗德竟同时成为民族英雄。

第6节　末日审判书

征服者威廉令被征服者胆战心惊。1069年，英格兰北部发生暴乱，他疯狂镇压，大肆屠杀，纵火焚烧，使亨伯河到蒂斯河的区域变得荒芜。诺曼的男爵和英格兰的伯爵因为挑战威廉的统治，通通被扔进地牢。在撒克逊人看来，比威廉的残忍更令人恐惧的是他的政策。威廉下令汇编国家所有资产，汇编而成的文件被称为《末日审判书》。它详细记录了教俗地产情况，每个村庄的地产面积，甚至每个庄园的牲畜数量，“调查内容非常细致，没有漏掉一块地、一头牛、一只羊和一头猪”。

可以看出，征服者威廉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做事都很细致，因此他赢得了新臣民的尊敬。克努特驾崩后，英格兰要么内战不断，要么统治者懦弱无能，百姓不断遭受贵族欺压，而诺曼征服后的结果是，英格兰现在只有一个独裁者，而不是许多施暴政者。百姓们欢迎这种变化，因此中下层阶级就会帮助这位外来君主共同对付躁动不安的贵族阶层。

以下是征服者的敌人——盎格鲁-撒克逊修道士记载的一段历史，内容与征服者威廉有关：

> 如果有人想知道威廉国王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把他描述成我们知道的样子……威廉国王……是一个睿智而伟大的人，比他所有的前任更强大、更令人尊敬。他对热爱上帝的人温文尔雅，但对违逆他意志的人残酷无比……他是一个严厉而易怒的人，所以无人敢忤逆他的意志；抗旨的贵族

一律被囚禁，主教被赶走……最终他的哥哥厄德也没能幸免。

威廉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可以携带金子到处旅行而不必有任何担心。无论彼此仇恨多大，也不会相互残杀。

这位史学家还说，征服者威廉时期的和平是他通过独裁统治换来的。

这一时期也有许多困苦和麻烦……他建造城堡，压迫穷人……他贪婪无比。他为养鹿圈占了大片森林，并制定相关法律。所有猎杀驯鹿的人都要被挖去眼睛……他喜欢站在高台上，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甚至对释放哪些野兔都要指手画脚。富人抱怨，穷人咕哝，但他很强势，根本不予理会；人们要想活，就得顺从他的意志……唉，无人像他这么自高自大，愿万能的上帝拯救他的灵魂！



征服者威廉。“他是一个睿智而伟大的人，比他所有的前任更强大、更令人尊敬。”

1087年9月，征服者威廉驾崩。修道士的这段话写于他驾崩之后。征服者威廉没有因战胜敌人而为维京人的祖先增光添彩，却因与他的子嗣进行夺权斗争增添了几分不光彩。他镇压了长子罗伯特在法兰西人支持下发动的叛乱。他的次子威廉·鲁弗斯继承了王位，进一步巩固了诺曼人在英格兰的统治。

诺曼人的冒险精神驱使他们从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来到英格兰和

法兰克的海岸，出于同样的原因，生活在法兰西的诺曼后裔跨过英吉利海峡进行新的征服。而在11世纪，其他诺曼人则选择南下而不是北上。他们名义上是去罗马或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朝圣，但他们发现美丽的西西里岛已经被穆斯林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四分五裂，纷争不断，无法形成统一联盟抗击敌人，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诺曼人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征服。

第7节　意大利的诺曼征服

意大利人这样描述诺曼人：“他们狡猾，报复心强，急切寻找财富和土地，鄙视自己拥有的，渴望得到没有的。”意大利人对诺曼人的了解是用痛苦的经历换来的。因为不了解诺曼人，所以意大利南部的东罗马帝国总督乔治·马尼科斯，请求诺曼人帮他从撒拉逊人手中夺回西西里。诺曼人同意参战，夺回了大片土地。但在分配战利品时，双方发生分歧。诺曼人盛怒之下入侵了阿普利亚省，并建立国家，建都梅尔菲。

新国家的君主叫欧特维尔的威廉，他和他的几位哥哥曾是意大利远征的首领。

“只要看到邻国的土地，欧特维尔家族的人就想据为己有”，他们家族的传记作者说。一旦树立目标，威廉和他无数的哥哥必会齐心协力完成。即使在中世纪，想要攫取他人的财产，也得经过斗争。幸运的是，欧特维尔家族具有最终赢得斗争、获得所觊觎财产的能力。

从查理曼大帝时代起，圣彼得教廷对拉文纳的管辖权就确认了。此时，教皇利奥四世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意大利的入侵者，他想与东罗马帝国结盟，消灭嚣张跋扈的篡权者。虽然结盟成功了，但在奇维塔特战役中，教皇的联军战败，教皇也差点儿被俘。

此时，诺曼人开始使用外交策略，所以意大利人说他们很“狡猾”。诺曼人马上宣布他们无意与教皇交战，祈求教皇的原谅。他们得到了教皇的宽恕。几年之后，经过罗马执事、后来的教皇圣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斡旋，诺曼人签署了条约，承认教皇尼古拉二世是他们的领主，而教皇承认诺曼人征服的领地。双方对此都很满意：教皇尽管对诺曼人没有约束力，却拥有了一个附庸国；而在欧洲人眼中，诺曼人的统治具有了合法性，但没人知道这为子孙后代留下了隐患。

欧特维尔家族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日益强盛。威廉死后，他的弟弟罗伯特继位，被称为“吉斯卡德”或“聪明人”。罗伯特强迫希腊总督和南意大利各独立国家的君主放弃他们的财产。他甚至准备发动战争，进攻东罗马帝国。幸亏他死了，这场战争才避免。

罗伯特建立了阿普利亚公国，他的侄子西西里伯爵罗杰二世继承了他的治国才能和强大兵力。罗杰二世诱使教皇同意将意大利大陆和岛屿统一起来，形成联合王国。此后，罗杰二世成为那不勒斯国王。“他坚持正义，犯罪必究，憎恨撒谎……从不凭空许诺，从不迫害私敌，发动战争尽量避免流血牺牲。国民普遍遵纪守法。”

罗杰二世显然比威廉一世更文明、更有教养。他们都表现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才能，这似乎与他们野蛮的祖先很不一样。他们头脑清楚，意志坚定，敢于冒险，善于经营，正是中世纪早期的诺曼人促使欧洲摆脱了“黑暗时代”的落后和压抑。

---

[1]今克罗地亚附近。——译者注

[2]路易驾崩后，传位于儿子“胖子查理”。——译者注

[3]9世纪，丹麦入侵英格兰东北部后，施行丹麦法的地区称为丹麦法区。——译者注

[4]史称卡佩王朝。——译者注

[5]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

第9章

封建主义和修道主义

第1节　封建主义

在历史进程中，人类总会逐渐发展出某种形式的联系以确保共同利益，这些形式可能是阿拉伯人的部落，部落为其成员的行为和过错承担责任；也可能是“村委会”，如沙俄的“米尔”，长者为年轻村民制定法律；也可能是如塔西佗所述的，一群日耳曼酋长乘着月色，围坐在篝火旁制定法律。

与原始的部落形式相比，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组建的政府管理形式更精密、更复杂：有专制的皇帝、无数的官员、富可敌国的议员、挣扎着的库里亚、奉命驻扎从英格兰到幼发拉底河广大疆域的军团。罗马帝国灭亡了，它的政府也如房屋倒塌般崩溃了。蛮族征服者以意大利和罗马各行省的法律为基础，加入自己的风俗习惯，合并演化出新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如果缺少相应的实施办法，就无法抵御侵略，也无法保护商人和农民的合法利益。

中世纪有时被称为封建时代，因为在这一时期，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封建主义的方法处理公共事务。关于封建主义，有两点要记住：第一点，封建主义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源于罗马人和蛮族的旧理念。第二点，封建主义与人们对土地的观念紧密相连。这是顺理

成章的，因为土地如同空气和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的耕种和食物的分配。



佃农为领主地播种、收割庄稼、喂养家畜

封建主义认为，归国家所有的土地首先属于国王。国王无法亲自管理和耕种土地，就以“采邑”的形式把土地分配给主要的王公贵族，并承诺保护他们。贵族们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古罗马时期的“庄园”就采用这一制度，奴隶主为佃户提供保护，使他们免遭抢劫和重税；雇用他们耕地播种、收割庄稼、建房搭桥。

中世纪的佃户还要服兵役。当国王需要时，佃户就和骑兵、弓箭手一样全副武装。因为要参军，他们的土地就分配给其他佃户；下次，同样的方法适用于其他佃户。这种制度被称为“领地分封”。因此，整个社会呈金字塔形，国王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国王之下是直属封臣，直属封臣之下是各级、各层佃户。

让我们看看金字塔最底端的人群，他们既无战马，也没武器，无法战斗。他们当然也没有士兵可借给领主。他们就得不到土地吗？

罗马“庄园”的最底层是奴隶，他们没有任何权利，甚至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封建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农奴”，他们本是自由民，居住的土地归他们所有，但在封建制度下，他们失去了自由，依附于土地。如果土地被转租或卖掉，土地上的农民连同土地上的树和草就一起被转交给新主人。农奴虽然不需要舞枪弄棒，参加战斗，但需要在土地上劳作，修建桥梁和城堡，平整道路，看家护院。

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制度”固化了不同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但这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佃农宣誓效忠土地时，他们“脱去帽子，解开腰带，放下佩剑”，把双手放在领主的两手之间发誓，和韦塞克斯王国的乡绅对国王起誓的方式一样，“爱他所爱的，躲避他所躲避的”，确立奴仆对主人的效忠关系。据塔西佗记载，日耳曼部落早已沿用这样的制度，酋帅的职责是率领和指引，随从必要时为主人赴死。



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制度”固化了不同的人的权利和义务。佃农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为领主收割庄稼

简而言之，封建主义就是基于土地占有的社会制度，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和社会职位主要由他所占有的土地状况决定。这种制度普遍存

在于社会各个阶层。

中世纪的主要封建势力之一是教会。虽然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不会亲自参战，但他们有人数众多的俗世佃农，战时要为国王或领主而战。一些佃农的土地是教会提供的，还有一些人拥有土地，但为了得到当地修道院或教会的保护，自愿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佃农。然而，教会持有的大部分土地不是通过军事或强行征用获得的，而是通过精神服务获得的，称为“免费捐赠”，也就是通过为捐赠者的灵魂祈祷获得土地。土地所有者希望以他的墓地作为虔诚的礼物奉送给上帝；犯了罪的人相信只要把财产交给教会，他的错误行为就会得到上帝的宽恕。总之，基于类似的原因，一些人的土地就转由教会持有。通过这种方式，教会积累了大量的庄园和捐赠金，摆脱了世俗的土地债务。在欧洲，许多个体甚至整个村庄和城镇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国王、大地主、修道院院长或主教的保护，而他们则需要支付租金、提供服务或缴纳货物过路费给保护者。

在军队和警察不存在的年代里，封建主义鼎盛时期的制度为弱者提供了保护。即使这种制度日渐衰落，日益腐朽，仍然成为超越日常生活的理想，得到忠诚拥护，并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教会的影响，从一颗信仰高贵的种子茁壮成长为骑士制度的鲜艳花朵。

我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发誓，

对国王忠贞不渝，

忠于他们的良心，

消灭异教徒，维护基督教。

骑马行走天下，矫正人类恶行，

不诽谤，不信谣，

视他的话为上帝神示，

在纯真中过着甜蜜的生活。



佃农们深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寒冬时节也要为领主劳作

这是乔治·坦尼森描述的亚瑟王的骑士所发的誓言，他们和查理曼大帝的圣骑士都是中世纪梦幻传奇的主人公。10世纪早期，统治东法兰克王国的“捕禽者亨利”国王[1]制定了骑士制度。当时的骑士队伍实际上是由“捕禽者亨利”的弟弟们和大贵族的儿子们组成的近卫军。得到佩剑、成为骑士之前，这些被授予骑士头衔的候选人都要发四个誓言：第一，说出真相；第二，忠实地服务于国王和教会；第三，决不伤害女人；第四，勇敢面对敌人。

骑士中很多半野蛮的年轻剑客或许随意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但

也有人把誓言铭记在心，忠实恪守，构成了理想的骑士精神。因此，那个野蛮而残酷的年代也会有些许温暖和怜悯。理想的骑士精神影响力不断扩大，影响着未来的人们，虽然有时会被那些所谓最明亮的镜子所歪曲，但欧洲从未丧失这种精神。于是，强国经常维护、保护弱国的利益，男人不惜付出生命保护受欺压的妇孺。

封建主义的邪恶大于美好。从军事方面讲，这个制度为国王提供了军队，但一旦一个直属封臣要造反，宣誓效忠领主、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就必定会忠于领主，而不是国王。因此，国王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是王室领地的封臣。

在封建社会，王室领地的法律和秩序由直属封臣维护，于是许多拥有绝对权力的小统治者诞生了。农民犯罪由领主的管家或代理人在领地法庭审判，按他们的意志，农民被处以死刑或缴纳罚金。只有查理曼大帝时代是例外，钦差被派往各领地巡视，纠正执法不当的地方。对佃户和农奴来说，只有领主的公正或不公正似乎才是真实存在的，而国王的法律则是一种模糊而遥远的东西。

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就曾和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的权力比肩。来到英格兰后，征服者威廉决心削弱封地伯爵的权力。1086年，他召集英格兰所有拥有土地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开会，在会上要求他们宣誓向他效忠。征服者威廉威严强势，所以伯爵们都能遵守誓言，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在征服者威廉的外孙史蒂芬[2]统治时期，史蒂芬因为英格兰王位而与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之子安茹伯爵亨利争吵不休。为了获取贵族的支持，史蒂芬赠送礼物，选择妥协。于是，封建主义的“恶习”四处蔓延。



骑士中很多半野蛮的年轻剑客或许随意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但也有人把誓言铭记在心，忠实恪守，构成了理想的骑士精神

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学家说：“他们虽然宣誓效忠国王，但并不遵守誓言……富人修筑城堡防止底层农奴造反。于是，土地上城堡林立……他们日夜抓捕藏匿私有财物的人，夺取他们的金银，把他们扔进监狱，用难以形容的痛苦折磨他们……我无法一一描述他们实施的残忍的酷刑，这种状况持续了十九年。史蒂芬成为国王后，情况恶化了。”

史蒂芬软弱无能，忙着应付内战，政府管理一塌糊涂。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13世纪的蒙圣迈克尔修道院，其领地上的农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封建金字塔底层的卑微的佃户们要缴纳许多钱物寻求领主的保护了。

> 6月，农民必须割草，堆垛，把干草扛到庄园……8月，他们必须收割庄稼，把修道院的粮食和自己的粮食放在风雨

中晾晒……在圣母圣诞节[3]，佃农上交定额猪肉，比例是八分之一……圣诞节上交定额优质禽肉……圣枝主日[4]上交定额羊肉……复活节必须犁地、播种、耙地。只要修道院建造房屋，佃农必须扛石头，服务庄园……给修道院拉木头一日只能赚两尼尔[5]。如果卖掉自己的土地，农民须交给领主土地交易金的是十三分之一。如果把女儿嫁到庄园以外，他要交纳罚金。他必须用庄园的石磨磨麦子，用庄园的烤炉烤面包，领主收取的费用很高。

当然，中世纪的农民几乎没有时间哀叹自己的不幸，他们唯一渴望的就是他们的家免遭火灾和抢劫，他们的家人免受饥饿的困扰。

战争就是封建世界的法则。在整个欧洲，涌现出许多护城河环绕的城堡，城墙环绕的城镇和村庄，这些都是中世纪社会动荡的见证。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暴力的氛围也很有吸引力。

大人！我渴望战争，

和平让我痛苦，

教义不再束缚我，

星期一，星期二——在您需要的任何时间，

一天、一星期、一月、一年，对我而言，都一样。

12世纪，普罗旺斯的伯爵们这样吟唱。我们在13世纪末期的西班牙也发现类似的倾诉，一位贵族面对胜利和战利品表现出快乐，同时叹息道：“如果卡斯提尔[6]有很多国王，我也应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6月，蒙圣迈克尔修道院领地上的农民割草，堆垛，把干草扛到庄园



正在用庄园的烤炉烤面包的农民

第2节　上帝休战期

教会竭力反对这种无政府状态，因此在不同场合宣传“上帝休战期”，类似于阿拉伯人的“圣月”，即规定在某些季节从周三到下周一，

如基督降临节[7]或大斋节，在教会的监督下完全停战，不得骚扰牧师、劳工、妇女或儿童。

这类改革的缺陷在于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封建制度继续蓬勃发展，甚至冒险到海外寻求利益，如十字军东征，它吸纳了许多支持者，想要建立以文明和人道为基础的新社会，这似乎表明政府必须在教训中成长，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很痛苦的经历。

第3节 修道主义

研究封建主义必须了解中世纪的物质生活，不理解修道主义就无法理解中世纪的精神生活。是什么诱惑世人——不仅是几个虔诚的灵魂，而是从贵族到农奴成千上万的人——为了修道院而舍弃世界，而且他们不后悔做出这样的牺牲，并虔诚地坚守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能理解中世纪的思想，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修道主义发展的早期，当神父们寻找适合隐居的密室时，我们发现，异教徒社会的野蛮和欲望正在逐渐消逝。人们坚信，接近上帝的方法就是将世界拒之门外，坐柱者西蒙希望无知的人看到他的自我忏悔，能够思索未来的天堂和地狱。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这种思想继续激励着狂热的基督徒。当欧洲表面上皈依天主教时，隐士们想要逃离的不是异教思想，而是所谓的基督徒们的嘲笑。腐朽的罗马帝国、伟大的君士坦丁或查理曼大帝、狡猾而残忍克洛维、冷酷自私的封建男爵和诺曼冒险家都以基督的名义发动战争，这些都违背了基督福音宣扬的守贫、温和、兄弟般情谊的精神。

就连一度被教会高高举起的理想之光，也开始变得暗淡无光，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容忍罪恶。在蛮族入侵中长大的牧师把粗俗和暴力看作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牧师的道德水准有时比教区居民稍高一点

儿，有时同他们一样，有时甚至在他们之下。

然而，就教会而言，它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所遇到的艰辛，而是繁荣。在中世纪，主教是教区纪律和福利的监督者。不过，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使他们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仆人而不是上帝的仆人。与普通大众相比，神职人员受教育程度高，自律性强，同时因为不允许结婚，也少了家庭的羁绊，所以他们经常被国王选中治国理政，从他们的行政能力和忠诚度来讲，国王的选择是明智的，但赋予教会政治权力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主教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使他们成为封建贵族，而主教也成为行政管理的职位之一。昏庸的国王可能将主教的职位赐予他最青睐的人，或把职位卖给品行不端但出价更高的人。因此，使徒们最初强烈谴责这种新罪行——“买卖圣职罪”或“圣物交易行为罪”。罪行背后隐藏的是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成为封建贵族的主教开始对牧师犯罪不闻不问，也不会花时间去提升神职人员的德行。

主教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世界感到恐惧，还遭到教会的谴责。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远。在修道主义发展的早期，每位隐士都遵循自己的祈祷和自律方式。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信徒，信徒有选择留下或另树一帜的自由。因为管理制度缺乏，所以极端的狂热主义或慵懒的无所作为经常出现。

第4节　圣本笃

6世纪，一位意大利的修道士努西亚的圣本笃为他的信徒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命名为“本笃会规”，成为所有西方基督教国家修道院生活的准则。圣本笃要求道修士们有十二个月的见习期，考验他们对不断自我牺牲的隐修生活的适应力；见习期满后，如果新人仍然意志坚定，不改初心，就同意接收他为修道院的一员，但他要发誓遵

守守贫、顺从和贞洁三条准则。这三条准则与中世纪盛行的贪婪、动荡和欲望刚好对立。这些誓言之外，还增加了体力劳动的义务——每日除了背诵祷文，还要劳动七小时。



圣本笃



圣本笃要求修士们遵守会规

虔诚的本笃会教徒至少从未被指责过懒惰。与修道院外的牧师相比，他们更严格地遵守着生活戒律，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文明。

有时，人们会轻蔑地指责中世纪的修道士们选择风景宜人的地点建立豪华住宅。因为水是生活必需品，修道士们当然一般选择在河湖周围建修道院。他们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现在成了世界建筑的奇迹，但其中不少最初只是建造在沼泽地上的小木屋。圣本笃的信徒们用石头取代了木头，把沼泽变成了花园和农田。

蛮族或封建的无政府主义者到处焚烧和破坏，中世纪的修道士则把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牧场或良田。正如除草、播种、耕种是修道士对上帝要尽的部分义务，帮助周围的穷人劳动，在修道院为无知的人传播知识和文化也是其应尽的义务。修道院是中世纪生活的中心，而死亡是城堡生活的中心。在安静的隐修室，修道士成为历史学家。抄写员小心翼翼地抄写着破损的手稿，书稿装裱者细心地描绘着那个时代的画卷。化学家调制出奇异的药水，让修道士的书稿重新焕发出神奇的色彩。

“对我们来说，生活在这里是一件好事。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更纯粹，很少退缩，直面困难，行走谨慎，休息安定，易于宽恕，回报丰厚。”这是修道院的改革者圣伯纳德所说的话，他的理想就是中世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修道院是信徒们可以虔诚祷告的家，是在动荡的世界中无法实现理想的学者和艺术家的避风港，是蔑视或恐惧战争的人们的避难所。封建伯爵会暂停争吵，虔诚地为修道院送上礼物，为他崇拜的信仰敬奉贡品。后来，伯爵也许会像土地上劳作的农奴一样进行忏悔，到修道院寻求灵魂的救赎。中世纪的一位德意志人说：“在修道院，你会看到伯爵在厨房做饭，总督出去喂猪。”

修道主义崇尚兄弟般的情谊，人不分阶级，都是平等的。但修道院也像教会一样，被大众的热情推入诱惑的深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对上帝的虔诚进入修道院。本笃会会规再严格，修道士犯了罪可能也不会被追究，因为此时的修道院院长已不再是圣人，而是像主教一样，成为拥有世俗利益的封建地主。这样一来，邪恶和懒惰就像田旋花[8]一样在修道院四处盛开。

在整个中世纪，修道院也出现过腐败和衰退，之后便是一波波的改革和尝试。最终，十字架再次作为祭祀的象征被高高举起，成为更多人的精神信仰。



田旋花图解

第5节　克吕尼奠定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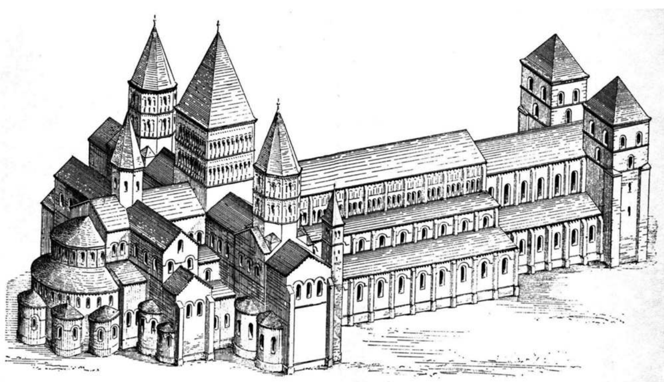
910年，克吕尼修道院在勃艮第建成，随后确立了改革后的本笃

会的规范。修道院不再由教皇直接控制下的地方主教管辖；修道院员长不仅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也是整个欧洲服从本笃会会规的各修道院的院长。

此后不久，其他道修会相继建立了，其中就有加尔都西会[9]和熙笃会[10]。

在对抗世俗欲望的过程中，早期的加尔都西会的修道士，譬如查尔特勒修道院的修道士，不断与俗世享乐做斗争，一年有八个月严格禁食；一日一餐，独自安静进食；终生严守静默，只在每周六聚谈一次。这就是他们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熙笃修道院位于今法国南部，以创建的地点而命名。熙笃会希望创建一种生活在俗世但脱离俗世的修行模式。身着白色长袍的“白衣修士”在不毛之地建造房屋。他们建造的教堂和修道院至今仍堪称建筑奇迹。他们因“惧怕”钱财，不肯佩戴金银十字架，也不穿刺绣服饰。熙笃会的任何一个修道士都不会为钱而背诵弥撒，也不会为钱而去治愈灵魂。他们的双手必须为微薄的食物而辛勤劳作，并要时刻铭记感谢上帝，为了修行而完全放弃自我。



910年，克吕尼修道院在勃艮第建成，不再由教皇直接控制



早期的加尔都西会的修道士终生严守静默，只在每周六聚谈一次



熙笃会希望创建一种生活在俗世但脱离俗世的修行模式，“白衣修士”的双手必须

第6节　圣伯纳德与克莱尔沃修道院

熙笃会最重要的圣人是伯纳德，他是一位勃艮第贵族。1115年，他在克莱尔沃建了新修道院，他成为中世纪思想的引领者。二十岁时，他带领着他的亲戚、朋友等一群人出现在熙笃会修道院门前，说服他们一同进入修道院。圣伯纳德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能影响他人，并敢于使用这种影响力。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善于和不同的人交谈，他和当地人交谈，人们误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和其他领域的人交谈，人们以为他是这一领域的从业者；他随时调整自己，只为让更多的人亲近上帝。”



圣伯纳德是熙笃会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后成为中世纪思想的引领者

这些话蕴藏着圣伯纳德的使命和成功的秘密。他雄辩，却从不为自己辩护，那些想要批评他的人也为他的真诚所折服。他严于律己，宽厚待人，愿意接受责备，随时承担最卑微的任务，但他对阻挠上帝旨意的人或事却异常凶狠，毫不宽容。

他给一位想要逃离克莱尔沃修道院严苛生活的年轻修道士写信说：“我为你叹息，我的孩子，杰弗里，你听从上帝的召唤，怎么能

转身跟随魔鬼？在深渊吞噬你之前，在你的手脚被束缚在外界的黑暗之前，回头吧……脱离死亡的黑暗。”

圣伯纳德给法兰西君主写了一封谴责信。信是这样结尾的：“哦，国王，生活在你的国家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的无畏吸引了欧洲许多重要的牧师和政治家到克莱尔沃修道院的密室修行，学习上帝的旨意。

在修道院，圣伯纳德宣扬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改革教会暴行，废黜一位伪教皇，谴责异教徒。他怀疑人类的理性，试图摆脱早期基督教思想的教条主张。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狭隘观点，但他热爱上帝。他宣扬的人道焕发出一种精神魅力，像一根金线穿越中世纪冷酷和背叛的思潮。

“不要哀叹，”他对一位新修道士的父母说，“他和上帝在一起，你们并没有失去他，而且通过他，你们会得到更多的儿子，因为所有克莱尔沃的修道士都会把他当作兄弟，把你们当作父母。”

对圣伯纳德而言，自我放弃意味着自我实现。放下世俗生活，寻找更纯洁更充实的生活，这就是修道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总是被意志不坚定的追随者误解和怀疑，但这种理想也成为圣人的荣耀。

---

[1]即亨利一世。——译者注

[2]史蒂芬1135年继位，统治英国十九年。——译者注

[3]圣母圣诞节是天主教、东正教节日，是纪念所传圣母马利亚的诞生日。教会规定于9月8日举行，但因历法不同，东正教的9月8日常相当于公历9月20日或21日。——译者注

[4]圣枝主日也称棕枝主日、基督苦难主日（因耶稣在本周被出卖、审判，最后被处十字架死刑），是圣周开始的标志。——译者注

[5]尼尔是法国旧银币。——译者注

[6]卡斯提尔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由西班牙西北部的老卡斯蒂利

亚和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组成。它逐渐与周边王国融合，形成了西班牙王国。——译者注

[7]降临节是基督教重要节日。教会规定耶稣复活节50天后的星期日为圣灵降临节，故又称“五旬节”。——译者注

[8]田旋花，一种草本植物，原产于欧洲南部。——译者注

[9]加尔都西会是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又称“苦修会”。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的山中而得名。——译者注

[10]熙笃会是罗马天主教修会，又译“西多会”。1098年，熙笃会在法国第戎附近的勃艮地的森林里建立。——译者注

第10章

授职权问题

在“斯特拉斯堡誓词”中，我们还有可能分清两个新建立的国家——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但与其邻国不同的是，东法兰克王国乃至后继的德意志王国在整个中世纪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利益的原因之一是，尽管查理曼大帝征服了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但没有将二者整合为一个民族。在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统治时期，不同民族的人仍旧各自认为自己是撒克逊人、法兰克尼亚人、巴伐利亚人，而不是德意志人。此外，波西米亚人重新成为异教徒，彻底回归野蛮。

封建制度加剧了这种分裂，因为直属封臣的叛乱都依靠本领地的支持，所以就不难理解，如果德意志王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发生统治者和封建贵族的斗争时获胜的为什么都是贵族了。

如果国王的实力非常强大，并给予重视，这个问题或许就解决了，比如征服者威廉就曾成为整个德意志王国的统治者。但不幸的是，德意志王国从未摆脱外来战争的困扰。诺曼人在法兰西海岸登陆时，德意志王国也受到丹麦人、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的威胁。这些野蛮人每年进犯边境，甚至向西深入莱茵河，大肆掠夺。

外来威胁不断降临，德意志王国的君主不得不依靠各诸侯国的军事力量防御边境，甚至被迫在北部和东部边界建立了名为“马克”的大庄园，作为防御性要塞。这些庄园的贵族统治者拥有很大的独立权。现在的普鲁士就曾是勃兰登堡的马克，用以抵御斯拉夫人的入侵；东部的奥地利马克抵挡巴伐利亚人和匈牙利人；石勒苏益格马克用来抵挡丹麦人。

造成割据的另一个原因是，10世纪早期，加洛林王朝结束了在德意志的统治，大家纷纷推举各诸侯和公爵为国王。如果选民能做出诚实的选择，这种做法完全可行，但选举却成了封建贵族的武器，拿来与未来的统治者讨价还价，所以贵族们往往推举一个软弱的统治者，以便随时能推翻他的统治。

第1节　亨利一世

德意志王国第一位当选的君主是法兰克尼亚人康拉德一世[1]。在他统治期间，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诸侯割据加剧了。康拉德一世临终时，考虑到国家的利益，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我知道没有人比我的敌人亨利更适合这个王位。我死后，把王冠、圣矛、金臂章、宝剑和国王的紫披风都给亨利。”大臣们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山上找到了正在猎鹰的新统治者——“捕禽者亨利”。亨利成为德意志王国的君主和民族英雄。

在与入侵者不懈的抗争中，亨利一世想起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弗雷德大帝。像阿尔弗雷德大帝一样，一开始敌人来了，亨利一世被迫逃跑，他向匈牙利人支付大量贡金换得九年的和平，这让公爵们非常厌恶。但当敌人撤退以后，亨利一世马上开始建造城堡或要塞，并在城堡内驻扎军队，由领主指挥。这些城堡都建造在边界附近。为了寻求安全住所，附近居民纷纷来到城堡周围定居。因此，城堡周围逐

渐出现了一些村庄和城镇。



“捕禽者亨利”



匈牙利人再次向亨利一世索取贡金

到第十年，匈牙利人又来索取贡金，但这次亨利一世命令把一只死狗扔到匈牙利人的脚下。

亨利一世喊道："这就是你们的主人能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如他所料，他的回答激怒了匈牙利人。匈牙利马上派兵进犯，但没能像以前一样肆意抢掠村庄，而是发现城堡、要塞防御坚固，供给充足。他们既无法攻克，也无法安全撤退。最终，匈牙利人与亨利一世相遇，大败而逃。匈牙利人宣称是先头部队的金色圣迈克尔旗被施了巫术，才导致战败。

除了击退侵略者，亨利一世还竭力控制反叛贵族。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亨利如何建立骑士制度，让不安分的年轻贵族子弟为他效命。亨利一世还鼓励建造有城墙的城镇来保护商人，以此强化中产阶级的力量，制衡贵族。亨利一世不像先君那样在森林举行会议，而是把会议地点放在城镇，目的是吸引更多人来城镇定居。基于亨利一世的边境防守政策，边界沿线建立了很多马克。在建立马克和征服匈牙利人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他的儿子奥托大帝。

第2节　奥托大帝

奥托大帝的统治可以称为一部战争史：首先对外作战，征服了丹麦，丹麦国王成为德意志的属臣；再次征服波西米亚，并改变了波西米亚人的宗教信仰；发动一系列征讨匈牙利人的战争，955年在奥格斯堡战役中赢得彻底胜利。此后，除了草寇，再也没有侵略者敢越过边境。



955年奥托大帝在奥格斯堡战役中赢得彻底胜利

除了对外战争，奥托大帝还在国内不断用兵，重申中央对洛萨林尼亚和巴伐利亚公国的控制权。一些不安分的公爵都被王室成员替换。奥托大帝还赠给主教们大片土地，希望他们能成为忠诚的直属封臣。但这样做收效甚微，因为奥托大帝发现封建主教是他最大的敌人，最后他转而求助于新型传教士——克吕尼改革运动后涌现出的一批人：博学多才的学者、恪守宗教戒律的修道士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奥托大帝希望他们成为统一德国、净化教会的有用之才。但准备改革和控制教会时，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他能多大程度控制神职人员？如果他对神职人员加强管控，神职人员能在多大程度上听从罗马教廷？

查理曼大帝轻易就破解了这些难题，因为教皇是他的联盟，甚至

可以说是他的属臣，所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然而，在奥托大帝之前的很长时间，德意志国王早已不是皇帝，皇帝的头衔从意大利一个王储转给另一个王储，在世人眼中早已失去光彩。现在为了控制圣彼得教廷，德意志国王要重新夺回皇帝的头衔，这样做值不值得？

历史系的学生可以通过最终结果检验中世纪的政策，看到德意志国王抵制了来自伦巴底和罗马的诱惑，他们的回答当然是“不”。但对奥托大帝而言，干涉意大利内政意义有所不同。他被皇帝的头衔搞得头晕目眩，忙着入侵意大利只是为了迫使教皇成为他的盟友。他现在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成为阿尔卑斯山北边国家的主人，要么眼巴巴看着他最强大的属臣——巴伐利亚公爵[2]做同样的事。

做出选择的时机出现了，普罗旺斯的洛泰尔伯爵被谋杀了。洛泰尔伯爵本是意大利王位的竞争者之一。他的遗孀、勃艮第公主阿德莱德[3]请求德意志王国为她报仇。德意志王国的几位公爵，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巴伐利亚公国的公爵们，既想行侠仗义，也因看到有利可图而都跃跃欲试。料到公爵们的企图后，951年，奥托大帝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凶手手中救出阿德莱德，与她成婚，并在帕维亚加冕为意大利国王。



阿德莱德

十年后，意大利再遭外族侵略，被迫向德意志王国求援。奥托大帝再次出现在意大利。962年2月，罗马教皇加冕他为皇帝。他的继任者去掉“德意志国王”的称号，改称“罗马国王”，教皇加冕后又改称“神圣罗马皇帝”，意思是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者，教皇是精神副主教。于是，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了。

尽管奥托大帝加冕在当时没有引起轰动，但这却是历史的转折点。对奥托大帝而言，他到达了事业的顶峰，无须再实施干涉德意志教会改革的计划。同时他颁布法令，承认教皇的世俗财产，但教皇必须宣誓，效忠皇帝高于一切。这样一来，教皇就只是皇帝领地上教会

的领袖。在奥托大帝的继任者统治期间，这一政策并未受到教皇们的质疑。教皇由神圣罗马帝国提名候选人，通过竞选赢得权杖。即便如此，罗马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暴政的恐惧也次于意大利贵族们对教廷的干涉。

斯波莱托的公爵们、托斯卡纳的伯爵们、罗马的坎波尼亚的男爵们毫不尊重基督教的领袖，只把他们当作政治运动的一枚棋子。罗马地区声名狼藉的克雷申蒂家族拥有贵族头衔，几名家族成员曾被东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为意大利总督。该家族的三位成员连续担任教皇一职，最后一位是本笃四世，参选时才十二岁。他恶贯满盈，残忍暴虐，整天在罗马大街上晃荡，被称为“小偷和强盗的首领”。在危急时刻，这位年轻的教皇竟把教皇职位卖给家族的其他人。因为本笃四世的过分行为，罗马掀起反教皇运动，他很快就退位了，但接下来发生了更不光彩的事，三位教皇相互指责，并带领随从在街上械斗混战。

第3节　苏特里宗教会议

亨利三世的干预受到各方欢迎。在苏特里宗教会议上，教皇候选人全部被废黜，亨利三世选中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名主教任教皇。

当代史学家认为，亨利三世是“继查理曼大帝之后欧洲最强大的国君”。他不但征服了桀骜不驯的波西米亚人和匈牙利人，而且在形式上统一了神圣罗马帝国。他掌控贵族，净化国家，甚至积极影响了意大利。但命运有时就爱开玩笑，他提名他的表弟布鲁诺为圣彼得教廷的教皇，称“利奥九世”，正是利奥九世奠定了教皇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的基础。



奥托大帝与教皇约翰十二世见面。这次见面促成了德意志教会改革计划的实施



亨利三世



利奥九世。他奠定了教皇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控制的基础

布鲁诺坚持认为，他应由神职人员和罗马人民依法选出，尽管他是皇室成员，却作为忏悔者赤足走进罗马。与傲慢的罗马贵族不同，他不认为教皇的职位是获得世俗荣誉和享乐的一种手段，因此他就任后，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一心致力于教会改革。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强烈谴责了买卖圣职的罪恶，认为独处是神职人员摆脱世俗纷扰的唯一途径。

为了把他的思想传播到意大利之外，利奥九世还长途穿越法兰西和德意志，沿途宣传克吕尼修道院提出的净化理想。但与此同时，他

和他的继任者们树立了一种他们努力实现的愿景，即教皇在意大利的世俗统治权力。

利奥九世担心定居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威胁罗马的安全，就组建联盟反抗入侵者，但并未成功，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们非常明智，认为谋求和平必须依赖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封建领主。想要控制半岛事务，教皇必须留守罗马。因此，后来的教皇都派遣“使节”到国外传达和解释他们的意愿和想法。1059年，为了寻求进一步的独立，教皇尼古拉二世彻底改变了教皇选举的方法。他颁布法令，罗马教皇不再由罗马人民和神职人员选出，而是由红衣主教，即主要城市的主教，在秘密会议上选举产生。红衣主教组成的机构被称为枢机主教团，枢机主教团想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

第4节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教皇尼古拉二世勇敢地推行这种独立政策时，他的身后站着一位那个时代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罗马的副主教希尔德布兰德[4]。

希尔德布兰德是一位木匠的儿子，身材矮小，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虽然其貌不扬，却天生拥有统治者精明务实的头脑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据说，在他少年时代，同伴就发现他与他父亲作坊的木屑和刨花说话，“我会统治五湖四海”。在苏特里会议上被废黜的教皇奥利五世是当时最好的教皇。为了接近利奥五世，希尔德布兰德愿意与利奥五世一同被流放。利奥五世听说了希尔德布兰德的才能，找到他，把他带回罗马，从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希尔德布兰德。其貌不扬，却天生拥有统治者精明务实的头脑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渐渐地，几任教皇连同整个城市都在依靠希尔德布兰德的力量。1073年，教皇的职位虚悬，民众们高声呼喊："希尔德布兰德是教皇，这是圣彼得的意愿！"

按希尔德布兰德自己的说法，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格里高利七世"的尊号，成为教皇。可能因为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以他对自己设定的任务有些踌躇，但一旦下定决心，就勇往直前。

格里高利七世耳边不断响起基督的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决心摆脱世俗统治者的控制。圣彼得和他的继任者们本身就被赋予了约束和释放[5]的权力。在对这一文本的解

释中，格里高利七世甚至不承认两个平等的权力主体[6]共治基督教。他宣称："人类的骄傲创造了君主的权力，上帝的仁慈创造了主教的权力……教皇是君主的主人，圣彼得以他的德行使教皇变得神圣。在《圣经》的指引下，罗马教廷从未犯错，永不犯错，抵制罗马教廷就是抵抗上帝。"

这样的观点放在现实社会，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此，当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要求征服者威廉宣誓效忠亚历山大二世以换取教皇对英格兰的祝福时，征服者威廉送来了丰厚的礼物以示对教皇支持的感谢，但随之传递的信息与教皇的理想一样毫不妥协。

"我没有宣誓，也不会宣誓效忠，我的前任从未这样做过。"随后，征服者威廉开始在新王国[7]罢免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甚至规定没有国王的许可，不得承认新教皇，没有国王的批准，不得发表教皇的公文和法令。

如果英格兰离意大利更近一些，或者征服者威廉只是滥用权力而不是改革英格兰教会，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也许会接受他的挑衅，但事实正好相反，他与征服者威廉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教权与君权斗争的序幕已经开启。

召集苏特里宗教会议的亨利三世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强大到可以与希尔德布兰德做出完满的妥协。尽管亨利三世在驾崩之前就把皇位传给了他年仅六岁的儿子亨利，却无法把政治家的能力和品格传给儿子。因此，1056年，亨利三世驾崩后，他的家族和帝国衰落了。

很难评估神圣罗马帝国这位新君的天赋，因为他的成长经历扭曲了他的观点和情感。在母亲艾格尼丝太后监护期间，十一岁的亨利四世被诱上了一艘船。它属于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安诺二世。沉浸在莱茵河两岸的优美风光时，亨利四世遇到了劫匪。为了躲避，他跳入河中，但被救了回来。之后的四年中，亨利四世先是作为学生跟随大

主教安诺二世学习。安诺二世对他严厉苛刻，他犯一点儿错都会受到惩罚。安诺二世禁止他和同龄人相处。不来梅大主教阿达尔贝特继安诺二世之后来到他的身边。阿达尔贝特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亨利三世在驾崩之前就把皇位传给了他年仅六岁的儿子亨利

十五岁时，亨利四世变得很英俊了。他疏远贵族，放荡不羁。亨利四世极不情愿地迎娶了一位相貌平平的伯爵的女儿，他虐待她、忽视她，以此来表达对她的不满和对她家族的愤恨。为了方便军队镇压乡村暴动，亨利四世在萨克森的某个山顶建造城堡，但他最大的罪过是对教会滥用权力。

当教皇谴责亨利四世买卖圣职时，一开始他写信表达歉意，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不久，罗马的指责和威胁激怒了他。最后，激烈的争论演变成“授职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11世纪影响教权和君权关系的问题，所以理解它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是很重要的。

授职权就是世俗统治者（如国王）在仪式上授予新当选的教会官员（如主教）土地和权力。国王交给主教戒指和权杖，主教把手放在国王两手之间像直属封臣那样起誓。

罗马教廷宣布，在祭坛为上帝服务的手放在沾满鲜血的世俗统治者的双手之间是不合适的。这其中隐藏的含义是，如果戒指和权杖作为土地和权力的象征交给主教，主教就会认为这些世俗之物是他生活的中心，对国王效忠的誓言就会高于为上帝服务的誓言。

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认为，如果教会人员不能摆脱世俗统治者的贿赂和恐吓，教会改革就无法进行。他说，有很多人像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一样，愿意“投资”教会，有无数的国王和公爵愿意支持教会，为教会提供武器和士兵。

世俗统治者反驳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观点，认为无论教皇怎么称呼主教，接受土地和职位的主教已经变成世俗佃户。如果国王失去了对主教的控制权，就失去了对富有的重要属臣的控制权，如果再失去授职权，就算主教辖区落入叛乱者或外国人之手，国王对此也会一无所知。

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双方都振振有词。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

德执行的是他早在1075年罗马举行的宗教会议上提议的著名法令，禁止世俗统治者授权；而亨利四世对此置若罔闻。同一年[8]，他完全没有征询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意见，就任命了米兰的新主教。他还任命了两个不知名的外国人到意大利主教辖区任职。亨利四世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抗议。他对抗议书非常恼火。第二年，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召开教会会议。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主教被迫宣布同意废黜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

亨利四世又给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亨利的王位不是篡夺来的，而是上帝的恩赐，希尔德布兰德从此不再是教皇，而是伪传教士……"作为回应，格里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

"彼得赐福……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在天堂和人间捆绑和释放的力量，为了教堂的荣誉和安全。我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宣布，亨利四世不再是皇帝，不再是亨利三世的儿子……不再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我解除所有基督徒对他效忠的誓言，我命令所有人不再服从他。"

亨利四世疏远的神圣罗马帝国贵族都聚集在教皇的旗帜下，两年前发生的撒克逊农民暴动卷土重来，甚至连主教们也为自己在废黜格里高利七世时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恐慌。因此，这位权倾天下的统治者发现自己竟然成了非法之徒，除了他虐待过的妻子，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别无他法，她最终只能屈服。1066年冬天，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亨利四世和妻子以及一名随从乘坐雪橇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建在亚平宁山顶的卡诺萨城堡里求见教皇。

格里高利七世拒绝了。亨利四世暗示他会忏悔。他过去也经常这么做，但总是言行不一。亨利四世脱下皇袍，换上忏悔服，像乞丐一样赤足在城堡里站立了三天。后来，在意大利朋友的恳求下，他承认了教皇的地位，并高声喊道"神父，宽恕我吧！"教皇把他扶起，正式

原谅了他。

卡诺萨城堡发生的一幕太富有戏剧性了，格里高利七世的胜利和亨利四世的耻辱成为世界永久的记忆，但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们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亨利四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重新获得支持后，他的世俗授职权也恢复了，但格里高利七世却不相信亨利四世的诚意，而是继续谴责他，并计划给他的对手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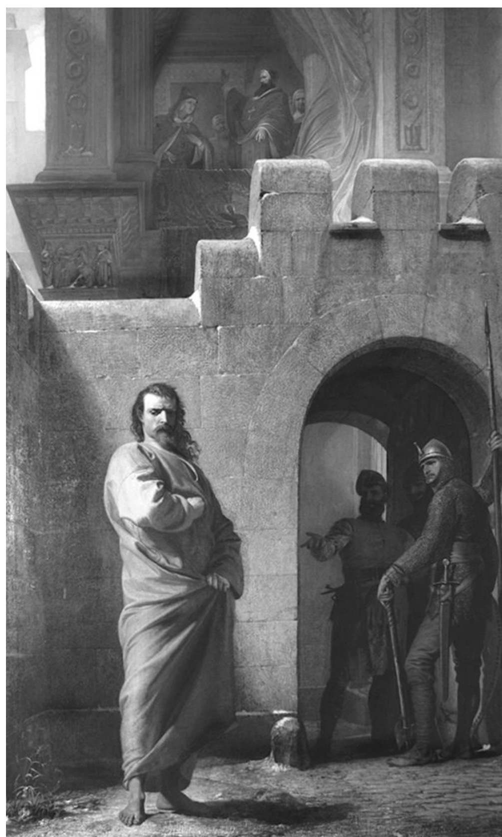
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说服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主教再次废黜了格里高利七世，还任命了伪教皇。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打着伪教皇的名义，劫掠伦巴底人，迫使他们南退，远离罗马，之后又在圣安吉洛要塞围困了格里高利七世。在这危急时刻，盘踞在意大利南部的罗伯特·吉斯卡德率诺曼军队救了格里高利七世。但残酷的诺曼人大肆屠杀，洗劫了这座圣城，返回时带走了格里高利七世。一半罗马城变成了废墟。

不久，无家可归、被废黜的格里高利七世去世了，但他坚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我崇尚公正，憎恶邪恶，故而死于流亡。"站在床边的主教回答道："基督的牧师和使徒，国家为你所有，世界也为你所有。"后来的历史证明，失败的格里高利七世的成就远高于获胜的对手。

亨利四世虽然比格里高利七世多活了二十一年，但以理想破灭而驾崩。一方面，亨利四世继续与宣扬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格里高利七世的追随者们斗争；另一方面，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发生了一次次叛乱。这时，亨利四世年事已高，身心俱疲，而担当军队统帅的儿子们对他充满敌意，即使他屈从于儿子们的要求，也无法得到安宁。后来，他被迫退位，遭到监禁，惨死于狱中。



亨利四世脱下皇袍，换上忏悔服，像乞丐一样赤足在城堡里站立了三天



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城堡忏悔

亨利五世统治期间，皇帝和罗马教廷就“授职权问题”达成了妥协，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签订了协议。首先，皇帝放弃授予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戒指和牧杖的权力，将该权力转交给教廷的代表；其次，举行授职权仪式时必须有皇帝或皇帝代表在场，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对皇帝宣誓效忠。

十五年前，安塞姆大主教反对坎特伯雷大主教向征服者威廉之子亨利一世宣誓效忠。于是，英格兰教会和英王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这样就避免了双方陷入痛苦和仇恨。一方面，曾饱受良心煎熬、内心忠于国王的大主教由此可以无忧无虑地成为虔诚的教职人员；而另一方面，国王尊重安塞姆大主教的人格，只要教会维护他的统治权就行了。

因此，妥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沃尔姆斯会议上就授职权做出的决定不再是关键问题了，其重要性只在于，这是教权与君权之间的一次战斗。虽然双方都做出了妥协，但最终教权胜出。在查理曼大帝或奥托大帝时代，欧洲人认为教皇依靠君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罗马教廷要摆脱世俗统治，获得自由。格里高利七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最终由他的继任者们完成。

---

[1]康拉德一世（Conrad I，约881—918），911年成为东法兰克国王。他在位期间，王权影响力微弱，甚至不如萨克森公爵、士瓦本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临终时，他劝说其弟埃贝哈德放弃继承王位，推举他的老对手萨克森公爵亨利（后来的亨利一世）为国王。此举大大推动了东法兰克王国向奥托王朝的德意志王国转变。该事件是划时代的，成为中世纪列国争雄的拐点。——译者注

[2]巴伐利亚公爵指阿努尔夫公爵之子埃贝哈德。——译者注

[3]阿德莱德是洛泰尔伯爵的遗孀。951年，她与奥托一世成婚，是奥托一世的第二任妻子。

[4]即下文的格里高利七世。他是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皇之一，他领导了

克吕尼运动，颁布了教皇选举法，宣扬教皇权力至高无上，反对世俗君主拥有教皇任免权，毕生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斗争。——译者注

[5]见第四章。即“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译者注

[6]分别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7]指英格兰。——译者注

[8]指1075年。——译者注

第11章

早期的十字军东征

君士坦丁堡帝国的标志是双头鹰，象征着君士坦丁对东西两个帝国[1]的统治，到11世纪末，这个标志已经成为皇帝对敌国的忧虑。穆罕默德王朝攻占了小亚细亚的尼西亚，离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只有一百英里。保加利亚人在亚得里亚堡大门徘徊。诺曼人和教皇在意大利共享着希腊遗产。阿莱克修斯·科穆宁[2]登基时，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败，领土只剩下希腊沿海地带。

尽管领土面积大大缩减，但君士坦丁堡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建筑恢宏，商业繁荣，满足了人们对城市的所有想象。

哥特国王阿塔纳里克说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一定是上帝。11世纪的欧洲人虽然视东罗马帝国皇帝为凡人，但对他仍充满敬畏。君士坦丁堡让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但他们的基督教不是西欧的天主教，而是希腊对基督信仰的解读，被信徒称为“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的金币是各国商人交易的主要货币。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宫殿、奢华和政府吸引了挪威和斯拉夫的冒险家们来充当雇佣兵。在这些负责皇帝人身安全的“瓦兰吉”近卫军中，有很多曾经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追随者，他们逃离被诺曼人征服的英格兰，愉快地服侍同样痛恨诺曼人的新主人。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的性格和他的帝国一样，已经雄风不再。他没

有君士坦丁大帝化弱为强的天赋，也不具备查理曼大帝的英勇气概，但他的女儿在记述他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把他美化为道德的典范。他的帝国同他一样已经分不清奢华和伟大、隆重和荣耀。东罗马帝国末期的统治者也兼具这种混合特征，自负而软弱，灵活而狡猾，敏感而不忠。因此，西欧各国虽然崇尚拜占庭，却用“拜占庭”来表达轻蔑和厌恶之意。

拜占庭皇帝也不喜欢他的西欧邻居。教皇剥夺了拉文纳总督的头衔，还在罗马建立了教会中心，对君士坦丁堡的主张置若罔闻。8世纪时，开创了伊苏里亚王朝[3]的利奥三世被称为“圣像破坏者”。他发起了圣像破坏运动，谴责供奉圣像是盲目崇拜。此举遭到西方基督教的强烈反对。

这是东西方教会之间真正分裂的开始，此后它们一直格格不入。到9世纪，双方裂痕进一步扩大，因为教皇尼古拉一世支持的东正教的主教被东罗马皇帝废黜，并将主教的对手和继任者也逐出教会。双方的争端愈演愈烈。11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关闭了教区的拉丁教堂和修道院，并公开宣布罗马天主教是异教。



利奥三世发起了圣像破坏运动，谴责供奉圣像是盲目崇拜



左：罗伯特·吉斯卡德；右：博希蒙德

除了教皇，东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还有其他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诺曼人。诺曼人不满足于只占领那不勒斯，罗伯特·吉斯卡德和他的儿子博希蒙德[4]率军又攻占了亚得里亚海的著名港口都拉佐，然后入侵马其顿，但被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利用他擅长的游击战击退。

第1节　威尼斯共和国

东罗马帝国更危险的敌人既不是教皇，也不是诺曼人，而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业竞争对手——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一直在密布的屏障之后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意大利北部威尼斯，而威尼斯不但成功地抵制了西方皇帝的封建统治，而且确保了自己的共和政府不受外部控制。年轻的威尼斯被其后代骄傲地称为“亚得里亚海女皇”，保持着独有的商业辉煌和骄傲，与垂死的君士坦丁堡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在与罗伯特·吉斯卡德的战斗中，两次被迫向威尼斯的海军求助，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授予威尼斯在东方海域的贸易特权。无论威尼斯商人在哪里登陆交易，不久就会建立

政治基础。来自亚洲的丝绸、染料、蔗糖和其他货物在亚得里亚海港口卸载，这里很快成为世界商贸中心。

1095年，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向威尼斯、教皇乌尔班二世[5]和西欧各公爵发出援救请求。

他写道：“从耶路撒冷到爱琴海，都被土耳其人控制了。他们的战舰横扫黑海和地中海，并威胁君士坦丁堡。即使君士坦丁堡沦陷，也不要落入异教徒之手。”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指的土耳其人是东罗马帝国的心腹之患。他们来自中亚。经过几个世纪的流徙，他们燃烧着好战和流血的火焰，带着对文明的蔑视，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对他们而言，充满东方艺术魅力、奢华和神秘主义的阿拉伯帝国除了可以掠夺外，再无其他意义。从前，希腊被征服后，接受了罗马文化，而哈伦·拉希德[6]留给征服者的遗产只有自己的战斗信条。

土耳其军队更危险，因为土耳其人更加狂热。他们横扫波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征服了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直逼博斯普鲁斯海峡。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被迫向欧洲求援，保护他摇摇欲坠的帝国。

他求援的基督徒愿意给他提供人力和资金的帮助。早期的基督教会保留这样一个传统：一些虔诚的教徒或罪犯因为急于弥补自己的过失，就派他们去参观耶路撒冷的圣地。基督曾在那里传教、祈祷、受刑。教徒们在那里赞美上帝，以获得他的宽恕。这种“朝圣之旅”既有同志的友爱，也充满了危险和艰辛，在当时广受欢迎，而阿拉伯的穆斯林对此也持包容的态度。当地还为疲惫或生病的旅行者建立了“医院”或避难所，付钱的朝圣者可以逗留一段时间。

然而，土耳其人来了，一切都改变了。人们很难再去参观圣地，基督徒被石击或暴打，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物被勒索敲诈。人们不是

死于饥饿，就是被扔进地牢，被迫交纳赎金。

第2节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据说，一位叫彼得的法兰西修道士在土耳其统治的最黑暗时期参观了耶路撒冷。夜晚他来到圣墓教堂祷告，为白天所看到的悲惨景象而哭泣，当他双手合十跪下时，仿佛看到基督就站在他面前，并叮嘱他“将虔诚的人唤醒，清洁圣墓教堂”。彼得谨记使命，立刻离开圣地，去找教皇乌尔班二世。已经接到求救信的乌尔班二世被这位修道士的热情所打动，答应帮助阿莱克修斯·科穆宁。

是不是彼得说服乌尔班二世的，已无从考证。总之，1095年，在乌尔班二世的召集下，克莱蒙特大会召开了。乌尔班二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呼吁欧洲的骑士把私人恩怨搁置一旁，要么恢复圣墓教堂，要么与基督为世界献出生命的圣城同归于尽。他的讲话可能有多种动机。他是格里高利七世理论的忠诚继承者。他看清了这次宗教战争的前景：欧洲的军队统一在罗马教廷的旗帜下，在教皇的领导下进行战斗，这有利于提高罗马教廷的地位。他是否希望通过与东罗马帝国结盟，使东正教归顺于罗马？他是否认为如果经常叛乱的封建贵族参加这次东征，他们或许就没有机会再回到欧洲惹是生非了？



1095年，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特大会上发表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呼吁欧洲的骑士把私人恩怨搁置一旁

这样的算计和乌尔班二世的雄心交织在一起。宗教的理想给了他力量和口才，完全淹没了他的算计。每次他向涌动的人潮讲话，都会高呼口号“以上帝的旨意”，后来这变成了东征者的战斗口号。

“全世界的人都想去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首先到达耶路撒冷的是穷人，接着是中产者，最后是国王、侯爵、伯爵和主教，甚至还有许多妇女，这是前所未有的。

演讲的效果神奇，这表明乌尔班二世和彼得修道士的呼吁触动了大众的心灵。人们不计后果，义无反顾地前往圣地。在克莱蒙特大会召开前夕，法兰西由于粮食歉收，粮价飞涨，一些投机商乘机囤积粮食准备高价卖出。但会议结束后，投机商却发现失算了，因为法兰西人都在卖粮食而不是买粮食。即使是灾荒之年，人们也要筹措资金完成自己的梦想，前往圣地，以求自己的罪行获得上帝的宽恕。

十字军东征的路线是经天主教国家匈牙利，过保加利亚，然后到达君士坦丁堡。各路武装朝圣者都在这里会合。进入保加利亚时，保加利亚国王信仰东正教，所以对朝圣者并不友好。于是，朝圣者的麻烦接踵而至。当地人不愿意给十字军提供水和食物，即使付钱都不行。因此，这支纪律涣散的十字军就通过焚烧和抢劫进行报复，继而引发了一场特殊的战争。很多拉丁朝圣者被山里的强盗杀害。此外，还有许多目的不纯的朝圣者也给同伴带来了恶名。他们贪婪而残暴，加入十字军是为了获得财富，进行冒险，而不是要得到上帝的宽恕。



纪律涣散的十字军通过焚烧和抢劫进行报复，继而引发了一场特殊的战争

事实上，十字军聚集了一批穷人、狂热分子、声名恶劣的人，没

有固定组织，缺乏有才能的军事领导，这些原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十字军最终惨遭失败。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需要的是一支劲旅，而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问题就出现了。他匆忙把第一批十字军运送到小亚细亚后就弃之不顾了。因此，十字军战士成了土耳其人的猎物。同时，十字军遭遇了瘟疫和短粮的困扰，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如果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悲剧开始，但随着第二批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第二批十字军东征最终以胜利宣告结束。第二批十字军是由欧洲主要军事领袖率领的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其中包括阿莱克修斯·科穆宁的宿敌、盘踞在西西里的罗伯特·吉斯卡德的儿子博希蒙德以及洛林公爵布维涅的戈弗雷[7]、征服者威廉的长子罗伯特·柯索斯[8]和巴约大主教厄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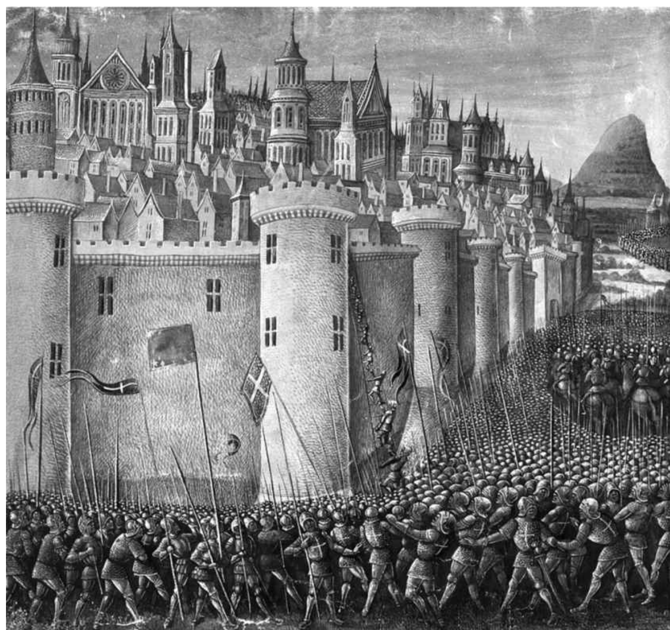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之女安娜·科穆宁娜[9]写道，十字军战士都是一些朴实的男女，一心要膜拜基督的圣墓教堂，但也有一些邪恶之人，比如狡猾的博希蒙德之类，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攻取圣城。



征服者威廉的长子罗伯特参加十字军东征

安娜·科穆宁娜的观点也许是有根据的，但对她而言，这样想也是自然而然的，因为阿莱克修斯·科穆宁不相信任何人。他不仅讨厌在宫廷招待这么多全副武装、傲慢无礼的陌生人，而且担心他们就此建立一个敌对王国。因此，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哄骗这些军事领袖承诺效忠后，才把他们及其军队送过达达尼尔海峡。

1097年十字军攻克尼西亚，取得十字军东征的首捷，然后在小亚细亚取得的胜利。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十字军先包围了安提阿，之后又被困在安提阿，受到饥饿、干渴和瘟疫的折磨。就在十字军丧失勇气、濒临绝望之际，一位牧师宣称他在悬挂十字架时，发现了刺穿基督的长矛。教皇使节拿着圣物来到军队鼓舞士气。受到激励的士兵们冲向安提阿城门。十字军锐气逼人，土耳其军队溃不成军，仓皇而逃。从此，安提阿变成了博希蒙德统治的基督教公国。十字军继续沿海岸线南进，直逼耶路撒冷。



十字军包围安提拉

1099年6月7日，十字军终于看到了心中的圣地耶路撒冷。教徒们卸下装备，像最虔诚的朝圣者，对着橄榄山赤足跪下，难掩内心的狂喜。祈祷很快转变成强烈的决心，洛林公爵布维涅的戈弗雷率部攻克城墙，拥入城内，在街道一路挥舞长剑和长矛，与另一侧进城的十字军会师。接下来的场景充满了中世纪的野蛮和暴力，成为基督教历史上的耻辱。城内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老人和妇女，儿童和婴儿，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被大肆屠杀，用来祭奠宣扬宽恕精神的基督。十字军战士骑马驰骋在血流成河的街道，目击者称“没有祈祷，也没有怜悯。这样的大肆屠杀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就连上帝也不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



1099年6月7日，十字军终于看到了心中的圣地耶路撒冷。教徒们卸下装备，像最虔诚的朝圣者，对着橄榄山赤足跪下，难掩内心的狂喜

任务完成后，大部分十字军战士都回家了，但在回家前，他们拥戴洛林公爵布维涅的戈弗雷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第一任统治者。耶路撒冷王国北部的安提阿和埃德萨成为独立公国。

布维涅的戈弗雷拒绝成为基督受难之地的君主，这表明他一方面谦卑、热爱上帝，另一方面骄傲而残忍。他以“圣墓教堂看护人”的尊号统治了耶路撒冷近一年的时间就薨了。他获得了勇敢和正义的名声，就像查理曼大帝一样。人们创作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和故事。



布维涅的戈弗雷以“圣墓教堂看护人”的尊号统治了耶路撒冷近一年的时间就薨了

第3节　骑士修道会

布维涅的戈弗雷的继任者是他的弟弟鲍尔温一世。鲍尔温一世统治时期，我们第一次听到在中世纪十字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骑士修道会”这个名称。骑士修道会包括“医院骑士团”。耶路撒冷曾经为朝圣者建立暂居的“医院”。医院骑士团就是旧“医院”财产和房屋的继承者。骑士修道会还包括“圣殿骑士团”，他们因居住地靠近所罗门神殿而得名。

这两支骑士团都受修道士誓言的约束，守贫、服从和贞洁。但他们的任务不是在田地劳作，而是参加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一位13世纪的作者写道：“被召集起来进行战斗时，圣殿骑士团不问敌人的数量，只问敌人的位置，在战场上像狮子，在家中像绵羊，对基督的敌人凶狠残暴，对基督徒温和仁慈。”

第三支骑士修道会是“条顿骑士团”，创立于12世纪，他们也来自医院，但这些医院由德意志商人为本族十字军战士而建。13世纪末，他们迁徙到波罗的海南部，在寒冷荒凉的海岸，发起了讨伐立陶宛异教徒的运动。现代历史系的学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16世纪时，条顿骑士团最后一任团长[10]皈依了路德教，转而镇压骑士团，将骑士团庄园变成世袭领地，称为“勃兰登堡”公国。他把“马克”[11]和勃兰登堡公国完全军事化，未来普鲁士王国的雏形显现了。

耶路撒冷王国存在了大半个世纪[12]。耶路撒冷王国能平稳建国，一方面是因为十字军战士英勇善战，另一方面是因为土耳其塞尔柱王朝爆发了内战。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远多于基督徒，如果巴格达和开罗的哈里发决出胜负，或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能统一全国，巴勒斯坦境内小小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此时，拉丁人仍维持着他们的统治，他们在新招募的欧洲士兵和热那亚、威尼斯水手的帮助下，攻取了沿海的城镇，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丢掉了陆地上的前哨站——埃德萨。

因为失去了埃德萨，所以欧洲发起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口才超凡的克莱尔沃修道院的圣伯纳德不仅说服了法王路易七世和他的妻子埃利诺王后，还说服了起先并不愿意参战的康拉德三世[13]，前去拯救基督教。十字军战士在胳膊上都绑上了十字架。“在圣战中杀死异教徒的基督徒会得到奖赏，为圣战而死的基督徒会得到更高的奖赏。”

这位著名的修道士所描绘的殉难和征服的荣耀是如此生动，人们群情激昂。一次，圣伯纳德被迫撕毁自己的长袍，为狂热的信徒提供更多的十字架，但他宣称的胜利最终却以许多的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丧生而告终。



口才超凡的克莱尔沃修道院的圣伯纳德说服法王路易七世和他的妻子埃利诺王后前去拯救基督教



路易七世出征图中访问安条克公国。他一事无成，在耻辱中踏上归途

路易七世和东罗马帝国皇帝都进入巴勒斯坦。路易七世甚至还访问耶路撒冷，但他却一事无成，在耻辱中踏上归途。埃德萨继续由穆罕默德统治。基督徒们本想以攻占大马士革作为战役胜利的前奏曲，但最终被迫放弃。更糟糕的是，路易七世和康拉德三世撤退时抛弃了军队，十字军战士成为土耳其人的刀下鬼。战场上白骨累累。这导致基督徒纷争、希腊背叛、粮食缺乏、瘟疫蔓延。

受益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东罗马帝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了小亚细亚的大片领土，但深恨违背誓言的拉丁统治者。因此，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希腊人充当了穆斯林军队的间谍和秘密盟友，甚至很多次公然与土耳其人并肩作战。但他们十分残忍，他们拒绝向拉丁军队的掉队者提供食物和水。

当统治者率领军队返回祖国时，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寡妇和孤儿认为圣伯纳德是伪先知。尽管圣伯纳德坚定地认为过错不在上帝，而是佩戴十字架的俗人，但他还是为希望破灭而悔恨不已。

圣伯纳德疲惫地写道：“上帝的子民们在旷野被击倒，被长剑屠杀，被饥馑毁灭。我们满怀希望，但希望破灭。上帝的决断是正义的，但这次我们如临深渊。我一定会让上帝赐福于大家。”

第4节　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很多年，西欧对来自巴勒斯坦的求助置若罔闻，耶路撒冷王国不断衰落，不但领土面积缩小，而且社会风气日渐萎靡。基督徒们忘记了自己的理想，沉迷于奢华享乐之中。东西方民族通婚兴盛。这些都削弱了十字军移民的活力和效率。在建立封建政府的过程中，耶路撒冷王国经常发生直属封臣和佃户间的冲突。“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为了利益也卷入这些纷争，彻底忘了曾经信守的誓言。

1183年，吕西尼昂的盖伊阴谋篡夺了耶路撒冷王位，但大部分拉丁贵族不愿支持他，正在他举步维艰之际，他发现更大的威胁正在逼近。开罗的哈里发萨拉丁[14]统一了埃及和叙利亚。他是一位才能卓越的军事领袖。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提比利亚湖附近的哈丁岩石交错，干涸无水。1187年夏，基督徒和穆斯林在此决一死战。基督徒大军虽人数占优，但被酷热和饥渴所困。尽管将士们在圣物“真十字架”的激励下拼死反击，但最终还是被彻底击败，溃不成军。国王吕西尼昂的盖伊也被迫缴械投降。

同年秋天，耶路撒冷在被包围一个月后向胜利者打开了大门，但与第一次十字军入城后的情形完全不同，萨拉丁没有大肆屠杀基督徒，而是让他们交纳赎金。作为“真主的施舍”，萨拉丁和他的兄弟还释放了许多交不起赎金的穷人。

第5节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听说圣墓教堂重新落入异教徒之手后，欧洲蒙羞了，愤怒了，于是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的队伍不再吸纳不守军纪的狂热分子。虽然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得到了教皇的应允，但像隐士彼得或圣伯纳德这样的教会领袖进行鼓动和宣传的情况没有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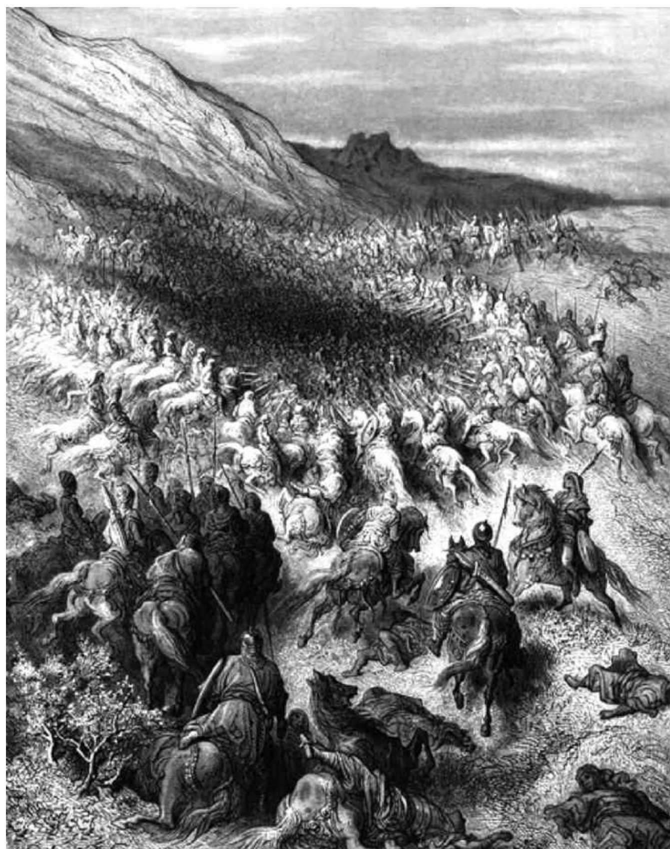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实际是三国的军事行动，统帅分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二世、英王“狮心王”理查一世，其他的王公贵族也一同航海随行。如果三人能齐心协力，萨拉丁也许会惧怕。但萨拉丁的敌人互相忌妒、不团结，加之萨拉丁政治和军事才能卓越，最终穆斯林再次赢得胜利。

就在英法两国的统治者还在为结盟的条件讨价还价时，最后一个拿起十字架的腓特烈一世出神圣罗马帝国，迅速越过匈牙利和保加利

亚，并通过威胁和展示军事实力震慑东罗马帝国皇帝，顺利攻下小亚细亚。但命运的天平倾向了穆斯林军队，腓特烈一世在西西里渡河时，不幸坠马跌入河中溺亡。“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死后，他一手组建的军队也散了，一些人返回家乡，另一些人沦为乌合之众，成为敌人的刀下鬼。



开罗的哈里发萨拉丁



1187年夏，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哈丁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英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的友谊也破裂了。他们向本国臣民征收十一税[15]用于军队支出，然后启程东征。两人年轻气盛，都想建立丰功伟绩，但法王筹划了密谋，等待他所期望的最终胜利，而理查一世则通过四处征战赢得胜利。

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对理查一世的充沛精力感到匪夷所思。理查一世胆识过人，敢于冒险，所以经常出奇制胜，扭转乾坤。

尽管命运经常随意发泄自己的怒气，但却不能吞噬他，

上帝赐予他慷慨的灵魂和美德，似乎他不属于这个时

代，他的事迹让作家写到手指发麻，让聆听者震撼不已。

对理查一世的赞美之词不胜其多，这只是沧海一粟。

理查一世是高超的战略家，天生的军事领袖，无所畏惧，精力充沛，即使生病仍带着垫子指挥战斗。但他不善外交，缺乏谋略，因此只具备伟大国王的一半品质。与其说他无知，不如说他无脑，他乐意做先祖们做的事情——征服，但他唯一的武器是他的双手，而不是他的大脑。

“英格兰国王在营帐外面竖起绞刑架，惩治小偷和强盗，不管罪犯是哪个国家的。他视每个人为臣民，罪犯必须得到严惩。”



腓特烈一世在西西里渡河时，不幸坠马跌入河中溺亡



理查一世是高超的战略家，天生的军事领袖，无所畏惧，精力充沛，但他不善外交，缺乏谋略

从理论上讲，这种高压政策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提高战斗力，但在实际中，他随意处决他国臣民的行为引起了该国君主的不满。

法王“对犯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交到了很多朋友，而理查一世却不断卷入各种纷争，并且毫不在意，丝毫不考虑个人和十字军的未来利益。

他们要离开法兰西时，腓力二世想把妹妹嫁给理查一世，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两人公开决裂。此时，理查一世想迎娶纳瓦拉国王桑乔一世[16]的女儿贝莲加。

在意大利南部，理查一世遇到了另外两个敌人。他们因为西西里的王位继承发生争吵和纠纷。启程前，理查一世在墨西拿狠狠地教训了其中的一个对手坦克雷德[17]。坦克雷德表面上归顺了理查一世。另外一个对手是腓特烈一世之子——后来的亨利六世。理查一世没能打败亨利。亨利对理查一世的怨恨加深了，等待报复的时机。

在塞浦路斯，理查一世驱逐了塞浦路斯的希腊统治者，囚禁英格兰的船员。于是，这个岛屿成了他的领土，东罗马帝国皇帝也成了他的敌人。1191年夏，理查一世到达巴勒斯坦，及时参加了腓力二世围攻阿克的战役。

“两个国王和两个民族联合不如他们单打独斗，因为他们相互轻视。”攻克阿克后，英法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此时，腓力二世正好患病。他生气地宣布他无法履行十字军的诺言，启程回国。之后不久，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也对理查一世心生怨恨，因为英格兰人将利奥波德的旗轻蔑地丢进了壕沟里，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狮心王”理查一世现在成了解放巴勒斯坦的主人、土耳其人的噩梦。土耳其人经常用他的名字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理查一世在巴勒斯坦驻扎了十四个月，但他的手下相互忌妒，尔虞我诈。他无人可信任，时间都浪费在挺进耶路撒冷的途中，既无法与萨拉丁交战，也没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

有消息传来说，腓力二世、亨利六世正在与理查一世之弟约翰接洽，密谋推翻理查一世。理查一世感到非常害怕。此时，他身患疾病，所以无心恋战，同意与萨拉丁签署三年零八个月的休战协议：基督徒据有雅法、提尔港和沿海城镇，可以自由出入圣地朝圣，而他自

己满含泪水，凝视着远方未能征服的城市，发誓一定再回来。1192年秋，他启程回国。随着理查一世的离开，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也结束了。

十字军东征继续进行了许多次，但没有一次像前三次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欧洲恢复圣墓教堂的渴望。国家之间的不信任破灭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胜利的希望。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欧洲的共同行动变得越发不可能了。

十字军东征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失去了对宗教的热情。人们相信他们胳膊上的十字架可以把罪人变成圣人，可以冲破城墙，消灭异教徒，就像奇迹会发生一样。但当发现在巴勒斯坦宗教热情四处蔓延，而救赎的道路依然充满艰辛，人们的幻想就破灭了，不再急切地要求去东方。虽然十字军东征没有戛然而止，但规模和影响力都降低了，一会儿这个国家资助，一会儿那个国家资助。参加十字军的人也不是去朝圣，而是去冒险、战斗或发大财。

有人说，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早期的十字军东征吸纳了大批爱滋事的贵族，使国家的商业和政治免遭侵害。虽然英格兰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付出了沉重的物质代价，但商人和各城镇所提供的资金用在了约束国王特权和制定宪章上，为市政自由打下良好的基础。



1191年夏，理查一世到达巴勒斯坦，及时参加了腓力二世围攻阿克的战役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法王腓力二世胜利围攻阿克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对当时法兰西王国的影响是毁灭性的。整个村庄空无一人，城市人数寥寥。据说，有些省的“男女比例达到1:7”。在售卖的“狂欢”中，准备参加十字军的人的土地和财产迅速易手，较小的封地往往被较大的封地收购，而其中许多变为王室领地，加之其他

原因，法王的财富和收入激增，从而在整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十字军东征对欧洲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对新事物的认识。如果人们的生活长期单调乏味，接触不到不同的思想，难免会产生偏见。对十字军而言，旅行并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风俗习惯是件好事，但在当时这可能会让他们恼火。十字军东征不仅刺激了地中海港口的贸易发展，还为世界的思想、文学和艺术发展提供了动力。运输大规模军队的需求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土耳其人的狡猾激发了基督士兵和工程师的聪明才智；拜占庭的建筑和马赛克深刻影响着威尼斯的建筑风格和色彩。

西欧继续憎恨东方，却不能没有东方的丝绸、香料和香水，同时无法抛弃对神秘中国的幻想。因此，十字军东征将其经历的失败与大发现时代的成功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通往东方的崭新道路。

---

[1]指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译者注

[2]阿莱克修斯·科穆宁（1056—1118），即阿历克塞一世，东罗马帝国科穆宁王朝的奠基人。他继位时，东罗马帝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他通过整顿改革、与威尼斯结盟等手段，延缓了帝国的衰落，开创了科穆宁复兴时代。——译者注

[3]伊苏里亚王朝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封建王朝（717—802）。因其建立者利奥三世来自小亚细亚南部的伊苏里亚而得名。——译者注

[4]博希蒙德（1050—1111），即博希蒙德一世，诺曼冒险家、十字军领袖。他的父亲是罗伯特·吉斯卡德，但他未能继承父业。1095年，他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克安条克，成为安条克公国的君主。——译者注

[5]乌尔班二世（1042—1099），罗马教皇。他继续推行前任格里高利七世“教权至上”的克吕尼改革。他赴西欧诸国游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重振了教皇的权威。——译者注

[6]哈伦·拉希德（约766—809），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第五任哈里发。他两次率军远征拜占庭帝国。第二次远征直抵博斯普鲁斯海峡，逼近君士坦丁堡。他统治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首都巴格达成为帝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译者注

[7]布维涅的戈弗雷（1060—1100），洛林公爵，第一次十字军的将领。1099年，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后，戈弗雷留守并统治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区。——译者注

[8]罗伯特·柯索斯（约1054—1134），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二世。1096年，他率军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来，与其弟亨利争夺王位的战争中被俘，在监禁中度过余生。——译者注

[9]安娜·科穆宁娜（1083—1153），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之女，历史学家。她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饱读诗书。她根据父亲阿历克塞一世生平研究，著有《阿历克塞传》，这本书成为研究东罗马帝国的重要史料。——译者注

[10]指阿尔布雷希特（1490—1568），第37任条顿骑士团大团长。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教，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联系，使条顿骑士团世俗化。于是，普鲁士公国登上了历史舞台。——译者注

[11]马克是建立在德意志王国边界的防御性的大庄园。——译者注

[12]指1099年到1291年。——译者注

[13]康拉德三世（1093—1152），亨利四世之孙，腓特烈一世之子，霍亨斯陶芬家族第一位国王，驾崩前未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14]萨拉丁（1137—1193），中世纪军事家、政治家，埃及阿尤布王朝首任苏丹。萨拉丁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促进了阿尤布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夺取了叙利亚等地，使埃及和西亚广大地区重回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他发动圣战抵抗十字军，因在抗击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卓越才能和骑士风度而闻名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译者注

[15]即每个臣民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原注

[16]桑乔一世（1045—1094），阿拉贡国王。在他执政的末期，阿拉贡王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地中海。——译者注

[17]坦克雷德（1138—1194），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君主。1190年，英理查一世率十字军东征途中，劫掠西西里王国。坦克雷德起兵反抗，惨遭失败。——译者注

第12章

腓力二世时代的法兰西王国

带着十字架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还有法王路易七世和他的妻子埃莉诺王后。他们并不般配，国王平庸、软弱、不好战、虔诚，而王后继承了阿基坦家族的性格——专横、意志坚定、敢爱敢恨。她不安分、好冒险的性格促使她加入了十字军。她在巴勒斯坦的很多行为引起了路易七世的不满，同时因为他们无子，于是回国后不久就离婚了。

从政治角度去研究12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地图就知道离婚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因为不要忘了，尽管国王是一国之君，但作为封建领主的路易七世只能依靠他自己的领地获得收入和力量，他的领地只有巴黎周围的小片土地，而巴黎北部、东部和南部主要省份的大片领地属于直属封臣们，他们的领地是卡佩王室领地的三倍到四倍。路易七世通过与普瓦图女伯爵、阿基坦女公爵[1]联姻，成了法兰西中部和西南部以及王室领地的直接统治者，但他现在与妻子离婚，这些财产也不归他所有了。

第1节　英王亨利二世

更糟糕的是，埃莉诺离婚后马上与安茹伯爵亨利结婚了。亨利比埃莉诺小十四岁，他是法王最重要的直属封臣，或许也是法王最危险的敌人。亨利不仅是安茹、曼恩和都兰的伯爵，还是诺曼底公爵、英格兰国王。他是亨利一世的外孙[2]，1154年从软弱的斯蒂芬手中继承了的英格兰王位。在第十五章，我们会略微讲述斯蒂芬混乱的统治。

讨论亨利二世与阿基坦女公爵埃莉诺的婚姻结果之前，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位英格兰国王的工作，这是他承担的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任务。亨利二世的性格与斯蒂芬完全相反。他意志坚定，一心要成为自己土地的主宰，他接连打击造反贵族，把他们用来折磨和进攻邻居的城堡夷为平地，收回了斯蒂芬为了收买人心和获得支持而出让的王室领地。当发现许多贵族篡夺了国家主要职位时，亨利二世迅速让职位卑微的人或自己选中的人取而代之。通过这种方式，他任命伦敦人托马斯·贝克特[3]为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来，这个冲动之举被证明是他所犯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

亨利二世非常自信，因此总是低估周围人的能力，并且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向他鞠躬。他从不停歇，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他精力充沛，总是有新的抱负要实现，他无法容忍把时间浪费在听取别人批评他已决定的事情方面。史学家记录了他如何焦躁不安，甚至在做弥撒时无聊地作画，称赞那些读得最快的牧师。有时，他会花点儿时间修补旧衣服，因为觉得没有更有趣的事可做。



亨利。他不仅是安茹、曼恩和都兰的伯爵，还是诺曼底公爵、英格兰国王

第2节　亨利二世时代的法兰西

亨利二世做事雷厉风行，但并不意味着他工作马虎。他有远见卓识，不满足于清除英格兰的不法之臣。他深知，如果想要巩固法兰西的领地，就必须获取英格兰人民的支持。尽管最后无果而终，但这是他最大的理想。亨利二世是英格兰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但他生长在法兰西，所以他骨子里更是一个法兰西人而不是英格兰人。

亨利二世没有把贵族逼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经常召集他们参加“大议会”[4]，听取他们的建议。当贵族们反对亨利二世的要求——

让他们和其追随者到法兰西服役时，亨利二世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妥协，建立了兵役免除税制度。贵族只要缴纳定额税，就可免除在海外服役的义务。通过兵役免除税募集的资金，亨利二世组建了雇佣军，同时剥夺了封建贵族们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

亨利二世时代的“大议会”后来发展成国民议会制度。除了建立“大议会”，他还强化了“君主法庭”，这是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为处理司法和金融问题而建立的制度。斯蒂芬时代的贵族们试图使他们的封建法庭完全独立于君主法庭，但亨利二世建立了中央法院，任何一个认为自己受冤的人都可以重新上诉，接受审判。此外，亨利二世还大力改进和推进巡回法官制度。巡回法官执行的正是亨利一世推崇的“王室诉讼条例”。

亨利二世发现这种干涉不仅被封建法庭所憎恨，还被县法院的行政长官所憎恨。县法院本来遵循的是诺曼人古老的“郡辩论会”形式。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这种形式非常流行，但后来随着县法院被大地主控制，逐渐衰落了。亨利二世要求重新恢复这种制度，罢黜了许多篡夺县法院职位的贵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地位较低的人，他们会向亨利二世求助或咨询建议。

欧洲其他主权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来提高王室权威，但英格兰很幸运拥有像“郡辩论会”或“百户邑会议”这样的有效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亨利二世可以了解当地的司法执行情况，而不是借派遣的王室官员之口了解。

亨利二世颁布了《克拉灵顿诏令》。诏令规定，发生刑事案件后，每百户选出十二名熟悉情况的陪审员或每镇选出四人向法庭提出控告并证明犯罪事实，然后由王室法官裁决。亨利二世在位期间，地方代表还协助法官评估税收，决定携带武器的数量和人员资格，以确保邻居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在民事案件中，如土地或个人财产的所有权纠纷，推选该地区的十二名陪审员，或在一些特殊案件中，推选该

郡的十二名骑士，协助县法官做出公正裁决，这个被称为“认可”的制度就是现代陪审团的雏形。

各百户邑和各镇的骑士和代表很可能会抱怨国王的立法制度烦琐，成本高昂，因为他们和亨利二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自治政府的开端，为真正的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几代之后，亨利二世懦弱的孙子亨利三世[5]用暴政统治英格兰时，各郡的骑士已经成为具有丰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的代表召集议会，商讨如何捍卫英格兰的自由。

虽然亨利二世利用各种机构和王室成员来打压造反的贵族，但在他统治期间，英格兰最主要的斗争是他与教会而不是与贵族的斗争。托马斯·贝克特曾是他打击封建特权的得力助手，但托马斯·贝克特警告亨利二世，作为宗教领袖他的爱可能会变成仇恨，从而去帮助国王的反对派。亨利二世不相信他的这番言论，硬是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但让亨利二世感到惊讶和愤怒的是，托马斯·贝克特活脱脱就是第二个格里高利七世，把教会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结果教权与王权经常起冲突。

第3节　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之争

托马斯·贝克特与亨利二世的主要争议之一就是教会要求保留所有涉案教会人员的司法权，不仅包括牧师，还包括受雇于教会的信徒和唱诗班歌手。亨利二世坚持认为，在教会法庭中被判有罪的教会人员应该被移交到王室法庭接受惩罚。原来，依据教会法，如果教会人员犯了谋杀罪，教会法庭不判他死刑，最多解除其教职、交纳罚款或被监禁，这就意味着即使教会人员两次犯谋杀罪，也会毫发无损，而俗世之人即使第一次杀人，也会被王室法官判处绞刑。

托马斯·贝克特坚持认为，无论教会人员是不是罪犯，只要王室官

员触碰牧师或教会人员，就是对他们的亵渎。当亨利二世建议在克拉灵顿宪法中体现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大主教公开拒绝签署协议。愤怒的大臣们不断威胁和侮辱托马斯·贝克特。

托马斯·贝克特的一个侍从惊恐地说：“噢，我的主人，这是可怕的一天！”

“审判的日子将会更加可怕。”托马斯·贝克特无所畏惧地回答道。在他的大无畏精神面前，没有人敢对他下手。

不久，托马斯·贝克特被流放到国外。他希望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但教皇呼吁他不要与英格兰国王发生争执，亨利二世利用他的影响力来修补这项模糊而没有约束力的协议。托马斯·贝克特返回坎特伯雷，但流放也未能改变他的观点。他还没上岸，就再次公开反对亨利二世的打算——亨利二世想要驱逐那些在托马斯·贝克特流放期间贸然行动的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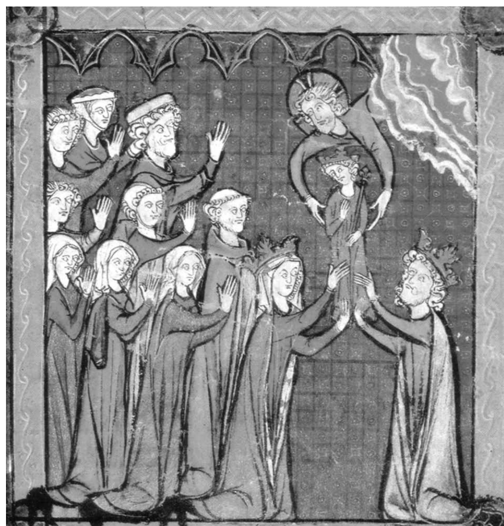
托马斯·贝克特

剩下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愤怒的亨利二世情绪失控了，粗鲁地高声喊道：“难道我的朝廷里都是傻瓜和混蛋，没有人能解决这个自命不凡的牧师，为我报仇吗？”后来，四个骑士在托马斯·贝克特跪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祭祀时杀了他，亨利二世非常后悔。

任何一个欧洲人甚至亨利二世的亲信们都感到无比愤怒和恐惧。亨利二世被迫在托马斯·贝克特的陵前脱光衣服接受鞭笞，公开忏悔，关于国王是否凌驾于教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争议暂时沉寂了。



托马斯·贝克特跪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祭祀时被骑士所杀



路易七世与王后为感染恶疾的儿子祈福

接下来几年，许多朝圣者参观了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托马斯·贝克特的圣祠，希望赐福出现奇迹，其中就有法王路易七世。路易七世渴望出现的奇迹就是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菲利普·奥古斯都能尽快摆脱恶疾，早日康复。自从埃莉诺再婚后，英法两国战争不断。这次老国王要越过海峡踏上亨利二世统治的土地，臣民们不免有些担心。但在强烈信念的驱使下进行的旅程得到了回报，亨利二世以一种忠心耿耿的附庸臣民的方式接待了路易七世，这让路易七世感到无比喜悦和荣耀。返回家中时，路易七世发现儿子也正在康复。

这段旅程的续集却是路易七世突然瘫痪，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法兰西人给年轻的王储举行了加冕礼，史称“腓力二世”。十四年前八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黎敲响了王储出生的快乐钟声，一个年轻的英格兰学生把头伸出窗外，询问详情。一个市民回答道：“今天晚上，上帝赐予我们的男孩将会是你们国王的克星，毫无疑问，你们国王的权力会削弱，领地会减少。”他的预言一半都实现了。

乍一看，英王亨利二世似乎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他的领主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统治的领土从他的附属国苏格兰延伸至比利牛斯山。常

年的征战和灵活的外交谋略不仅增加了他的领土和财富，还增长了他的政治智慧。他认为，一个在巴黎被一群狂暴的贵族包围的小毛孩，又能兴起什么风浪呢？

然而，法王手中已经握有必胜的利器，那就是他自己。据记载，阿基坦公爵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恶魔祖先的鲜血，赋予他们凶猛和虚伪的性格，这甚至令中世纪的人们都感到惊讶。埃莉诺和她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儿子们正应验了这一传说。亨利二世谴责他的一个儿子阴谋夺权，他的儿子竟回信道："你不知道，我们互不关爱，是我们的本性。兄弟阋墙，父子反目，难道不行吗？我认为你不应该剥夺我们的继承权，改变我们的本性。"

为了削弱亨利二世，路易七世积极鼓励这种背叛精神，甚至在托马斯·贝克特流放期间给他提供避难所。腓力二世也继承了该政策。如果亨利二世的儿子们惹怒了父亲而要逃跑或要策划新阴谋，腓力二世都会敞开怀抱，在巴黎接纳他们。

亨利二世如果能像控制英格兰一样牢牢控制他在法兰西的领地，就可能会在与两个儿子和法王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在普瓦图和阿基坦，人们认为亨利二世只是埃莉诺的配偶，他的继承者才是统治者，尤其是埃莉诺最喜欢的理查。但最后贵族们却受到鲁莽自私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暴虐的对待。

埃莉诺支持她的儿子们公然反抗父亲。后来，虽然亨利二世囚禁了埃莉诺，但理查得到腓力二世和法兰西南部力量的支持。于是，亨利二世不得不与他和解。尽管亨利二世只有五十六岁，但身体虚弱。听到他的领地曼恩省也落入儿子之手时，他彻底绝望了。他一边诅咒背叛他的儿子们，一边不情愿地重新向腓力二世宣誓效忠，并承诺答应理查财产和独立的要求。协议签署后，亨利二世发着高烧，骑马来到城堡。他已经濒临绝望，不久就陷入昏迷状态。有消息称，此时，亨利二世的幼子约翰——亨利二世为他在爱尔兰建立公国，但他一直

是反亨利二世联盟的秘密成员——跪在他的床前。他清醒了几分钟，问道：“是真的吗，约翰？”他从侍从脸上读到了答案。他转过身去，对着墙说：“由他们去吧，我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这个世界了。”说完，年迈的国王就驾崩了。

第4节　英王理查一世

1189年，理查继承了王位。他在巴勒斯坦的英勇使他赢得了“狮心王”理查的称呼。他怎样与腓力二世争吵，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讲到。阿克战役之后，腓力二世回了国。这时，他已经对理查一世傲慢的性格厌恶至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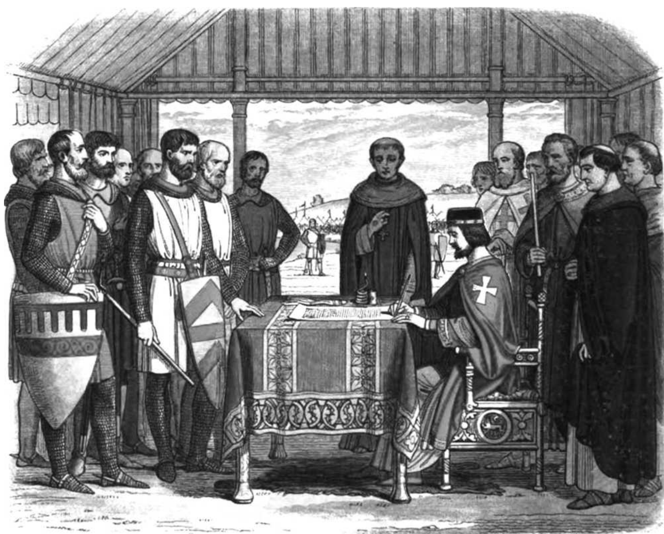
在战场上，腓力二世没有像他的对手——理查一世那样树立起英雄形象。事实上，在欧洲，没有人是这位“阿基坦恶魔”的对手。理查一世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的赫赫战功闪耀了七个世纪。但在治理国家上，腓力二世在那个时代是出类拔萃的。他随时准备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战斗，但更愿意以坚韧的治国之术为国家服务。理查一世在巴勒斯坦期间，腓力二世和约翰为了各自的利益串联在一起。他们的计划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但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了。因为曾经把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旗帜轻蔑地扔到水沟里，惹怒了利奥波德，所以在回国途中理查一世不得不进行伪装。但进入奥地利后，他被认出了，成了利奥波德的俘虏。

奥地利公国的领主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他对西西里王国的利益诉求经常受到理查一世的嘲笑。于是，理查一世又成为亨利六世的阶下囚。直到他承诺宣誓称臣，交纳巨额赎金后才被释放。腓力二世和约翰曾共同贿赂亨利六世，请求亨利六世永远囚禁理查一世，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腓力二世写信给约翰道：“小心，恶魔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年，法军在诺曼底与复仇的理查一世率领的英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无论是在法兰西北部还是东部，理查一世都是腓力二世可怕的对手。他们的对决一直持续到理查一世被一支毒剑射中身亡才结束。

从那时起，腓力二世开始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一开始尽管速度缓慢，但随着“最坏的英格兰国王”继位，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继承理查一世王位的约翰王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勇士，他只会无端发火，毫不在乎尊严和礼仪，徒增阿基坦家族残忍和背叛的恶名。他的臣民恐惧他、仇恨他、蔑视他。很快，臣民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约翰王践踏教会的特权，骚扰贵族的妻女，抢夺和没收贵族的土地，利用雇佣兵折磨和压迫人民。他就主教的人选问题与坎特伯雷教会争吵不休。他公然违抗教皇英诺森三世之命，被教会禁止做礼拜。他献出自己的财产向罗马教廷宣誓效忠，在兰米尼德签署《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上，这一切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欧洲历史上，约翰王是不受各阶级欢迎的国王，而在法兰西人的眼中，腓力二世是“上帝赐予的国王”，与约翰王形成鲜明对比。



约翰王在兰米尼德签署《大宪章》

第五节　腓力二世占领诺曼底

当约翰王在鲁昂享受盛宴时，信使带来消息说腓力二世正在进攻诺曼底。约翰王懒散地回答道：“随他去吧，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夺走的都夺回来。”然而，约翰王起兵时，为时已晚。英格兰贵族们可能会跟随“狮心王”理查一世去巴黎战斗，却不愿意为约翰王从剑鞘中拔出长剑。安茹人和诺曼人发现他们与法兰西征服者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非海峡对岸的英格兰国王。阿基坦公国充满敌意，监视着腓力二世的一举一动，倒不是因为它喜欢英格兰，而是担心腓力二世占领巴黎。多年以来，阿基坦公国一直奉行远交的政策，支持离它最远的君主，防止邻国干涉它的内政。

约翰王终于做出大胆的举动。他率军来到佛兰德斯，与腓力二世的直属封臣弗兰德伯爵费朗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6]结盟，一起进攻法兰西北部边境。英法两军在布维涅相遇。腓力二世率军迎战。

战斗打响了，腓力二世挥舞长剑，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夜幕降临时，战斗结束了。腓力二世赢得胜利，费朗德伯爵和英军主要指挥官都举手投降了。



英法两军在布维涅打响战斗，最终，腓力二世赢得胜利，费朗德伯爵和英军主要指挥官举手投降

腓力二世身后跟着戴着镣铐的费朗德伯爵，凯旋返回巴黎。沿途所有的教堂都敲响了钟声，人们高声欢呼着拥向腓力二世，吟唱《赞美颂》。

1914年之前，“布维涅战役可能是发生在法国最重要的战役了”。一位当地的历史学家写道。

路易七世时期，法王在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佛兰德斯伯爵和安茹伯爵面前都矮半截。现在，路易七世之子击败了一个皇帝，把一个反叛的直属封臣投入地牢，从约翰王手中抢走了他觊觎已久的卢瓦尔等北部诸省。曾经一贫如洗的国库现在充斥着从诺曼人手中没收的财产和英格兰贵族的庄园，而约翰王曾经禁止他的贵族们向法王效忠。

腓力二世成了“征服者”腓力，但他更伟大之处在于能破能立，就像英王亨利二世一样。腓力二世统治期间，旧封建贵族的威胁彻底被扫除，政府打上了效忠君主的永久烙印。

处理与教会的关系方面，腓力二世遵循矮子丕平和查理曼大帝的做法，赠予修道院很多礼物。他既是教会的自由资助人，也是坚定的主人。国王和教会的良好关系得益于腓力二世的政策：他让出身卑微、习惯服从的人出任原本只属于显赫家族的主教之职，而且如果教会的底层人员和上级发生争吵，他都会支持弱者，这不但削弱了教会领导的地位，也赢得了底层人员的爱戴。

第6节　英诺森三世和腓力二世

与约翰王一样，腓力二世总是违背教皇的意志，但只是在纯道德问题上。腓力二世拒绝和丹麦公主英格博特[7]住在一起。婚礼上他就表现出对她的厌恶。新娘是十八岁的少女，不会讲法语。腓力二世的主教尽管心存异议，也不敢支持英格博特。英格博特只得寻求教皇的帮助。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她终于赢得了胜利。

在其他章节，我们将会看到教皇英诺森三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和异教徒迫害者的一面。英诺森三世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描述一下他的性格和工作是有必要的。对英诺森三世而言，取悦腓力二世可以获取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需要腓力二世的帮助，从而严惩英格兰的约翰，支持十字军打击异端邪说在朗格多克的传播。此外，英诺森三世因为没有军队，无法迫使污蔑自己妻子懂巫术的腓力二世承认英格博特为法兰西王后。但英诺森三世相信腓力二世错了。当腓力二世说服主教允许他离婚，并很快再婚后，英诺森三世很快写信谴责离婚是闹剧，再婚不合法。



英诺森三世是欧洲的精神领袖

英诺森三世写道：“想想你的合法妻子，我们希望你能公正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无法做到，你在我们面前就丧失了权力。”随信附上的是革除教籍的威胁。被禁止做圣事几个月后，腓力二世不得不承诺妥协，重新考虑他的婚姻问题。尽管这个承诺是如此不情愿，但仍然是个承诺。直到1213年，在教皇的持续施压下，腓力二世才公开承认他讨厌的丹麦公主妻子和王后的身份。

我们已经看到腓力二世是如何与他的直属封臣打交道的，但征服诺曼底和安茹、取得布维涅战役大捷都是他数年外交的成果。他的王权就像乙醚一样渗透到英格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看到理查和他的兄弟们对父亲抱怨，腓力二世深表同情。在对待教会问题上，他也使用了不少妙招。

当代一位写腓力二世传记的作家写道："在没有结成联盟，确保每一步都获得支持前，他不会发动新的战争。"腓力二世笼络的对象通常是封建庄园的附庸佃户。在和平时期，他支持他们反对封建领主：有时他只是利用他的影响力扮演调停者的角色，有时他授予佃户们特权，有时通过王室法庭裁决他们的纠纷，但无论通过哪种方式，他会让弱势佃户感到他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当他出征时，佃户们急切地聚集在他的麾下，有时甚至不顾领主们的反对。

但王室的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封建贵族，而是普雷沃。普雷沃由国王任命，代替国王在各省行使税收、司法、审判的权力。如果君主软弱，这些普雷沃就会失去控制，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幸运的是，他们的独断专权遭到贵族和教会的抵制。因此，确立普雷沃从属地位的改革体系受到各方欢迎。

地方政府和国王议会之间的纽带逐渐建立起来。法兰西北部称这些官员为"市政官"，南部称"管家"，他们的职责是监督普雷沃，必要时废黜他们或向国王报告。普雷沃仍然为王室收税，市政官负责监督他们的工作，并把所得款项上交中央政府。此外，市政官还巡回判案，并定期返回巴黎报告地方上的状况和案件的处理情况。

这些改革如同英王亨利二世的改革，逐步改变了法兰西王国的面貌：首先它摧毁了无法满足新兴文明需要的封建体制；其次，任命在金融、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受过教育的官员替代原来的贵族官员，贵族不再是国家依靠的力量，国家治理实行君主制。

在中世纪早期，法国的主要贵族被称为"宫相""管家""内侍"等，被赋予世袭荣耀和政治权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头衔消失了，在腓力二世和他的孙子路易九世统治时期，这些头衔被授给了职位卑微的"新人"，他们只在任职时享有这些头衔，或者他们仍保留朝廷册封的尊号，但失去了政治权力。王室曾经"事事都操心，但事事都力不从心"，例如在查理曼大帝时代。现在，政府发展成两个独立的体

系，各有分工：大贵族围绕着君主，乐享尊贵的地位，而训练有素的官员们为国王出谋划策，执行国王的命令。

第7节　法兰西公社

腓力二世不鼓励自己的王室领地独立，但对其他大城镇就另当别论了。他对市民们为摆脱贵族、主教和修道院的束缚所做出的努力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许多城镇都成立了“公社”，公社有些像当代的商业联合会，尽管在法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此时还处于萌芽阶段。有些公社起源于反抗压迫的斗争，市民领袖通常以公会的形式组织盈利性的活动。此外，享有法律特权的商人组织形成了。市民和商人想要获得的特权是自行征税，在当地法庭解决纠纷，保护贸易免受欺诈、独裁和外部的竞争。这些现在听起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却激起12世纪的法兰西一位作家的强烈愤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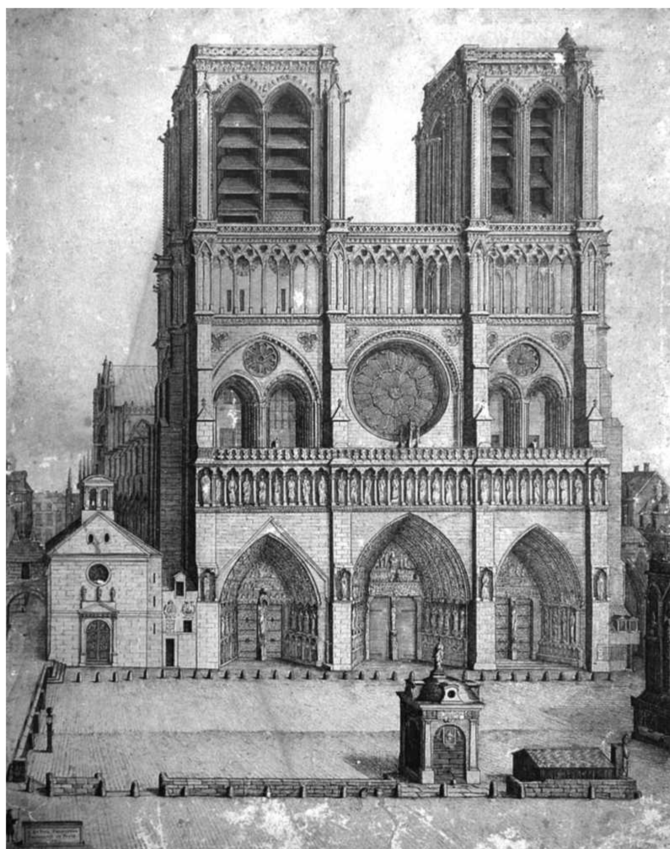
他说：“‘公社’这个词新颖但可憎，这就是它的含义。那些欠税的人只要支付本应属于领主的租金即可，而且一年仅一次；如果他们因反抗领主而犯罪，只要交纳补偿金就可豁免。”

除王室的领地外，腓力二世很乐意授予特许状，确认公社所期待的权力。腓力二世还建立了受王室保护的新城镇，逃跑的农奴只要缴纳必要的税款，接受特定的条件，就可在此避难。

第8节　腓力二世的成就

腓力二世统治的巴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它不是以有害的气味而闻名，而是为欧洲最奢华的城市奠定了基础。清扫、整修肮脏的街道，建防御工事、市场、教会，为庆祝布维涅大捷造了哥特式建筑的

标杆——巴黎圣母院。这些都是在他执政期间规划或完成的。腓力二世也向年轻的巴黎大学伸出了保护之手，保护学生不受镇上居民的敌视，因为受教育是牧师才能享有的特权。腓力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对受教育者施以的同情引导了公众舆论的发展，而这些知识分子也利用他们的舌头和笔来回报他们的守护神。



腓力二世为庆祝布维涅大捷造了哥特式建筑的标杆——巴黎圣母院

1223年7月，腓力二世驾崩。虽然他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法国历史学家没有清晰地描述他的性格。后人只称颂他的意志、远见和耐心，而不是他的性格，所以并不真正了解他。他只是被当作令人崇仰和敬畏的国王，无人敢违背他的意志，或激怒他。但他内敛矜

持，不喜宫廷享乐，厌恶亵渎神明的人，这些却无人知晓，人们对他为法兰西所做的贡献难以做出公正的评判。如果他像“狮心王”理查一世一样鲁莽，人们也许可以更好地了解他，现代传记作家也许对他的描述会更公正、清晰。

“他发现法兰西王国实力弱小，邻敌环伺。在他继位伊始，只有少量讲法语的人拥护他的统治。作为君王，他的权力受到轻视和嘲笑。即使作为领地领主，人们也公然反抗和藐视他，但当他驾崩时，整个法兰西王国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广阔领土的君主，内政外交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腓力二世不仅改变了法兰西王国，也影响了欧洲。他使法兰西王国摆脱了封建采邑制的束缚，奠定了法兰西向近代迈进的基础，并且成为那些落后邻国的引领者。

---

[1]普瓦图女伯爵、阿基坦女公爵指同一个人，即路易七世的第一任妻子埃莉诺王后。埃莉诺后改嫁英王亨利二世，阿基坦公国随即成为英格兰王室领地。——译者注

[2]亨利之母是英王亨利一世之女玛蒂尔达。——译者注

[3]托马斯·贝克特（约1118—1170），英王亨利二世时期重臣，任大法官和上议院议长，后被亨利二世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大主教后，他在很多教权问题上与亨利二世发生冲突。1170年，他被亨利二世的四名骑士杀害。——译者注

[4]“大议会”（Great Council）是指国王召集各郡代表及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集会，最后逐渐转变成了国家的立法机构，是英国现代议会的雏形。——译者注

[5]亨利三世之父是亨利二世之子约翰。——译者注

[6]奥托四世（1175—1218），德意志国王。1209年，他在罗马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他违背了对教皇的承诺，大肆入侵意大利南部，试图收复帝国在意大利的旧业，但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7]1193年，英格博特与腓力二世成婚，是腓力二世第二任妻子。——译

者注

第13章

君权和教权

亨利四世越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到卡诺萨向教皇认罪时，随行的有一个忠诚的骑士，他叫布伦·腓特烈。因为他忠心耿耿，所以亨利四世把女儿嫁给了他，并封他为施瓦本公爵。后来，布伦·腓特烈之子成为康拉德三世。康拉德三世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第一位君主。从此，君权和教权之间延续几代人的战争开始了。

“霍亨斯陶芬”本来是一座山，山上坐落着腓特烈最大的城堡。霍亨斯陶芬家族亦称“魏布林根家族”，魏布林根是霍亨斯陶芬家族治下的一座城镇。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主要对手是巴伐利亚家族，巴伐利亚家族亦称韦尔夫家族。两大家族的纷争不仅把神圣罗马帝国搅得不得安宁，而且“越过”阿尔卑斯山，对意大利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两大家族之争成为13、14世纪最主要的政治斗争。

第1节　意大利公社

上一章我们谈到了法兰西公社，它是在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北部公社的建立过程和法兰西公社相同，但意大利的国情和城市活力与法兰西不同。意大利公社建立的速度更快，取得的成就更大。

13世纪的意大利人惊讶地说：“在法兰西，只有普通人才住在城里，骑士和贵妇们都住在私有领地。”当然，这与伦巴底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意大利，邻邦之间相互猜忌、忌妒、竞争，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戒备森严的王国，或者坐落在山顶上，或者位于广阔的平原上。在城市狭窄的街道上，贵族、骑士、商人、学生、骗子和乞丐们混在一起，有限的空间决定了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必须共享，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瘟疫。如果街头混战猖獗，阶级凝聚力就增强，人们的智慧和刀剑也变得更锋利。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像温室里的花朵，比外面的世界更早结出文明的果实，无论是在商业、绘画还是政府自治方面。难怪来自阿尔卑斯山北边的游客会惊讶地看着意大利商人们居住的奢华宫殿。与这些宫殿相比，他们国家贵族们的城堡只是野蛮人的要塞罢了。

然而，这种欣欣向荣的独立局面是通过激烈的、不懈的斗争换来的，甚至最终危及意大利人原本要获取的政治自由。一开始，意大利人与入侵者斗争。后来，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结束了对意大利名义上的统治，当地的主教担任起培育这个城市国家新生活的责任，对国民进行了战争和治国方面的知识教育。

随着封建主义的兴盛，主教们逐渐变成了暴君。市政府开始选举议会和顾问委员会，领导人民反抗他们以前的恩人，建立独立于教会控制的自治政府。

意大利内部产生了一个危险：城市比国家更不稳定。伦巴底人的“公社”经常会变成私人派系或周边强大城市争相抢夺的猎物。在各派斗争中，不断出现联盟和反联盟，就像千变万化的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辩论和斗争始于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由格里高利七世的继承者们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接棒。站在“公社”的角度来看，这是意大利人获得独立的天赐良机，用10世纪一位

主教的话说：“意大利人一直希望有两位统治者。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操纵利用，实现制衡。”

支持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一派被称为“保皇党”，支持教皇的被称为“教皇党”。起初，在充斥着残酷和背叛的斗争中，人们不知如何选择。后来，腓特烈一世奉行强烈的君主主义，与教皇党开战，而教皇党展现出爱国的一面。

腓特烈一世是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巴巴罗萨”。他父亲来自霍亨斯陶芬家族，母亲来自韦尔夫家族。推选腓特烈一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希望“他能像块基石，把两个家族连接起来，愿上帝保佑，两个家族的争斗能就此结束”。一开始，这个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新皇帝与他的表弟——巴伐利亚兼萨克森公爵、韦尔夫家族的继承人“狮子”亨利感情甚笃。腓特烈一世还利用他的规则建立起史学家称为“不稳定的和平”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变了，世界不同了，连天堂都变得更温和了。

但不幸的是，被称为“君主主义版希尔德布兰德”的腓特烈一世只是把和平的神圣罗马帝国当作实现更大野心的跳板。他视在君士坦丁堡统治欧洲的查士丁尼一世为偶像。在来自博洛尼亚大学的律师的帮助下，腓特烈一世收回了旧帝国[1]曾经控制的但现在几乎被遗忘的意大利北部领土。这位律师也因此获得丰厚回报。“意大利公社”发现腓特烈一世正在践踏他们的祖先通过战斗和牺牲获得的权利。腓特烈一世给每个重要城市派遣一名执政官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强征重税。如果人们抱怨或反抗，就会受到折磨或被处死。

“为自由而死是仅次于为自由而生的最好选择。”克丽玛人大声疾呼。他们的疾呼最终演变为动乱。米兰三年紧闭城门，不让执政官入城。但腓特烈一世和他的军队没有放过意大利，放火焚烧了克丽玛。饥饿的人群四处流浪。辉煌的米兰沦为废弃的石场。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感到教权的独立受到皇权的威胁，就积极支持自由运动。最后，他

被赶出了罗马，只得前往法兰西寻求保护。保皇党无往而不胜。在意大利最黑暗的日子里，教皇党不再进行派系斗争，而成为爱国者。教皇站在世界的面前，为驱逐侵略者、拯救意大利而奔走。

在米兰的废墟中，伦巴底人联盟出现了。不堪神圣罗马帝国的压迫和傲慢的各个城市纷纷加入联盟，甚至因有天然屏障而只求自保的威尼斯也为联盟提供船只和资金。米兰重建了，这座新城因教皇而得名“亚历山德里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巴巴罗萨轻蔑地称为“亚历山德里亚救命稻草”，扬言要烧掉它，就像烧掉野草一样。但新城墙阻挡住了巴巴罗萨的进攻，瘟疫和潮湿的寒冬摧毁了驻扎在城市外围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

事实上，腓特烈一世已经失去他统治早期的政治远见。在腓特烈一世的母亲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因各种夺权斗争而陷入混乱。腓特烈一世有理由怀疑“狮子”亨利就是主要的幕后指使。“狮子”亨利大怒，拒绝参加对意大利的战争。更糟糕的是，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法王和英王结盟后，返回意大利，积极鼓动各方反对腓特烈一世的暴行，而腓特烈一世本人也早已被教皇革除教籍。

第2节　莱尼亚诺战役

1176年，在离米兰十五英里的莱尼亚诺，盟军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决一死战。面对武装简陋的普通市民，巴巴罗萨非常自信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一支由米兰骑士组成的“死亡联队”发扬克丽玛人的精神，誓与军旗、战车共存亡。他们的战车上竖立着基督的雕像。基督张开双手，站在祭坛上，一根高大的柱子上悬挂着米兰的守护神圣安布罗斯的旗帜。

战斗打响了，神圣罗马帝国骑兵猛烈进攻，率先攻破了米兰人的防线，但“死亡联队”抱着必死的决心，奋力厮杀，转守为攻。在随后

的战斗中，腓特烈一世下马作战。神圣罗马帝国军队里盛传腓特烈一世已经战死，因此士气低落。士兵们像潮水一样疯狂后退，将军们也加入撤退的洪流，无力挽回失败的战局。



神圣罗马帝国骑兵猛烈进攻，率先攻破了米兰人的防线

这就是莱尼亚诺战。人们不应只记住这是12世纪教皇党取得的一场胜利，更要明白这是一种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的胜利，是为了自由而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之后，在威尼斯，霍亨斯陶芬家族承认自己失败了，请求与罗马教廷和解。1183年，双方签署《康士坦茨永久和平条约》。条约授予意大利北部公社许多权利，而这些权利从前一直为霍亨斯陶芬家族所有。

造币权、募兵权、征税权以及行政官员和法官选举权都是自由、民主发展的支柱，但在中世纪，人们认为“自由”就是压迫他人的权利，就是保留君主制。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意大利又为异族所统治。公社滥用和践踏“死亡联队”誓死获得的权利。尽管如此，莱尼亚诺取得的胜利仍是欧洲的一笔宝贵财富。它向世人宣告，暴君可以被人民推翻，公民税收可以破坏封建军队的运行。

第3节　“狮子”亨利

巴巴罗萨回国后，向“狮子”亨利宣泄了他的怒气。他认为，“狮子”亨利没有随同前往意大利参战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巴巴罗萨现在已经与罗马教廷和解，成为罗马教廷坚定的支持者。他邀请“狮子”亨利出席帝国议会，让“狮子”亨利就没收教会土地和收入的指控做出回应。“狮子”亨利只回应了萨克森教会纵火案。在“狮子”亨利缺席的情况下，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狮子”亨利的非法禁令。于是，魏布林根家族和韦尔夫家族的宿怨又像大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了。虽然一开始只是小火苗，但他们的情谊已经荡然无存。“狮子”亨利是英王亨利二世的女婿，与法王腓力二世和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一世结盟。他拥有南部的巴伐利亚公国和北部的萨克森公国，这两个公国的面积相当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分之二。与斯拉夫人的军事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而腓特烈一世却丢失了伦巴底。因此，“狮子”亨利逐渐走上与腓特烈一世对立的道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即使在神圣罗马帝国，政治的时钟也在前进，封建主义正退出历史舞台。

在德意志人看来，巴巴罗萨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至尊贵族，是得到罗马教廷支持的皇帝，而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行动是造反。战争愈演愈烈。贵族们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殴打、流放，财产被掠夺，却不会挺身相助。

腓特烈一世只允许“狮子”亨利保留布伦瑞克的庄园。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强大对手，萨克森和巴伐利亚被分割成小封地。神圣罗马的君主不应该只是名义上的，更应该是实际上的。他和他的继任者要像腓力二世一样建立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从而能持久而稳定地统治意大利。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谈的是意大利北部，但1187年，腓特烈一世让儿子娶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诺曼人的王国的女王储康士坦茨，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南部就紧密联系起来了。腓特烈一世希望通过联姻与意大利南部建立永固的联盟，从而抗衡北部教皇和教皇党城市联盟。最后，腓特烈一世战胜了愤怒而无助的罗马教廷，接着效仿古代

加冕他的儿子亨利为“恺撒”。为了追求冒险和荣耀，腓特烈一世还骑马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溺亡的消息很快传到神圣罗马帝国。人们既悲痛又自豪。虽然腓特烈一世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残酷、强硬的传统，但在他统治时期，社会和平、繁荣。于是，他的缺点很快被遗忘了。关于他的传说各种各样。人们纷纷私传他并没有死，而是在沙石下睡着了，如果他的臣民遇到危险，他就会醒来领导他们，保护他们。

亨利六世继承了腓特烈一世的帝国，也继承了他的梦想和错误。亨利六世早期的斗争成果之一就是使西西里成功脱离坦克雷德的统治，但西西里人同时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中，因为亨利六世通过诱骗和贿赂的手段与教皇和意大利北部结盟，实施报复：坦克雷德失明又残疾的幼子和其母亲被送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监狱结束了一生，而在巴勒莫和阿普利亚的地牢里，坦克雷德的追随者们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和饥饿，生不如死。

康士坦茨皇后没有能力对抗丈夫亨利六世的暴行，继而憎恨和反对他。教皇也革除了亨利六世的教籍，但亨利六世只是轻蔑一笑。他有三重理想：首先，王位继承人不通过选举产生，而由霍亨斯陶芬家族世袭；其次，说服神圣罗马帝国贵族们接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合并成为帝国的一个省；最后，统治包括意大利南部所有的皇家领地，像奥托大帝时代一样，罗马的教皇是帝国的大主教。



1187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诺曼人的王国的女王储康士坦茨大婚

亨利六世意志坚定，坚韧不拔，足智多谋，富有远见，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一点儿，也许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但1197年他就驾崩了，年仅三十二岁，留下一个三岁的儿子继承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理想。一年后，康士坦茨皇后也薨了。在她短暂的孀居期间，她试图调整丈夫的德国政策，并把西西里小国王[2]托付给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教皇党领袖英诺森三世监护。

第4节　英诺森三世

在英诺森三世的加冕典礼上，主礼牧师说："请接受三重加冕，因为你是公爵和君主的父亲，是世界的统治者，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在人间的牧师。"对英诺森三世而言，这些话就是他所笃定的信仰，就像格里高利七世的信仰一样不可动摇，就像腓特烈一世和亨利六世的君主主义一样传播广泛。英诺森三世宣布"主耶稣基督只选择一人作为普世牧师统治万物。天堂、人间和地狱的万物都向基督跪拜。因此，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基督的牧师，哪怕是一群羊和它的牧羊

人。”他重申：“君主只在世间拥有权力，而牧师在天堂也拥有权力。”

在阐述这些观点时，英诺森三世把教皇比作太阳，把帝国比作光芒略暗的月亮。在客西马尼园[3]，基督赐予圣彼得两把剑。他解释说这两把剑代表世俗领域的权力和精神领域的权力，那些声称要行使前一种权力的皇帝必须要征得圣彼得继任者的同意，因为“上帝赋予彼得不止统治世间教会的权力，还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力。”

“卡诺萨的胜利”[4]让人们不禁思忖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理想能否实现，但格里高利七世被逐出罗马，四处寻找实现理想的证据，死于流亡途中，现在只能由英诺森三世来继承和实现他的理想。英诺森三世的性格不像克莱尔沃修道院的伯纳德那般圣洁崇高，但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实干政治家。他希望依照世间王国的模式建立一个上帝的王国。他虔诚地相信，带着上帝给人类的赐福，用好手中的所有武器，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有时，英诺森三世的雄心壮志也会破灭，如他极力鼓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远征由于威尼斯的因素而宣告失败。威尼斯承诺向十字军提供必要的船只。把十字军送到达尔玛西亚海岸后，威尼斯利用十字军占领了一个垂涎已久的重要港口。之后，在商业和掠夺的双重利益驱动下，威尼斯商队和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英诺森三世使节的规劝书根本无人理会。英诺森三世获悉大怒。他原本希望通过此次东征，东方基督教[5]能归顺西方天主教，同时铲除异教。他的计划失败了，因为十字军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的拉丁帝国太弱小，既无力长期统治敌对的希腊人，也不能成为阻挡土耳其人的有力屏障。然而，政治家的素养使英诺森三世只得接受眼前的既得利益。于是，让东方基督教归顺西方天主教就成了他欠罗马教廷的长期“债务”。



威尼斯商队和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尽管扩大了罗马教廷的影响，但仍然应该看作英诺森三世的一次失败。不过，在西方，英诺森三世的人格和政治才华为他赢得了声名。他的名字敌人听了恐惧，朋友听了雀跃。他是支持英格博特王后的道德力量，迫使腓力二世最终屈服。对信仰的坚定和执着、纯洁的个人生活和充满魅力的行为举止，使他赢得了罗马人的喜爱，尽管罗马人仍对牧师怀有敌意。

在中世纪，与阿尔卑斯山外的国家相比，意大利对教皇并不是特别尊重，尤其是罗马，因为教会的精神赠予都以物质回报为目的，教皇的行为往往与他们虔诚的职业龃龉。然而，在英诺森三世任职期间，我们在罗马找到了“完美”的代表，他手握授职权，市政长官向他宣誓效忠。通过这种双重影响，英诺森三世成为市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英诺森三世可以继续康士坦茨皇后的政策，驱逐叛乱的贵族，打击西西里境内的萨拉逊人，发展教会教育。他的教子、年轻的西西里国王，有一天会为他的理想而战斗。英诺森三世写信给腓特烈二世说：“上帝没有抛弃你，他带走了你的父亲、母亲，但他赐予你更可敬的父亲——牧师，和更好的母亲——教会。”

在伦巴底，教皇党自然认为英诺森三世是领袖。教皇的方式相对温和，而巴巴罗萨和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的残酷行径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和怀疑。因此，英诺森三世发现他比以前的任何教皇在意大利拥有的权力都大，对他的赞助和联盟以意大利为中心延伸开来，像一张网覆盖了整个欧洲。

法兰西的腓力二世试图忽视和反抗英诺森三世，但最终却不得不讨好他。英格兰的约翰王也由急躁、蔑视变为顺从、效忠；葡萄牙接受他为宗主；对手匈牙利国王寻求他的仲裁；甚至遥远的亚美尼亚也派遣大使寻求他的保护，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与欧洲各国的斗争中他保持不败。

我们知道，亨利六世曾经希望皇位世袭，但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不愿意接受他的孩子为继承人。因此，候选人只能在霍亨斯陶芬家族成员——亨利六世的弟弟施瓦本的菲利普和韦尔夫家族的成员——“狮子”亨利之子奥托中选出。最后，他们选票相当。每人都声称自己是合法选出的皇帝，一个称菲利普二世，另一个称奥托四世。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神圣罗马帝国因陷入内战而遭受重创。奥托四世是教皇党的代表，得到英诺森三世的支持，请求教皇进行仲裁，但菲利普二世拒绝接受有利于对手的判决。他相信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贵族和官僚都支持他。

教皇宣布“作为基督最亲爱的儿子，奥托勤勉、谨慎、细心、强壮、坚毅，献身教会。我们由圣彼得授权接受他为皇帝，并在适当的时候为他加冕。”

这是教皇的胜利！罗马不需要再接受保护，而成了保护者。奥托双膝跪下，充满感激地宣誓顺从和尊重罗马教廷赋予的特权，这就是教皇取得胜利的完整画面。然而，形式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也改变了人。施瓦本的菲利普死后，奥托四世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统

治者。原本属于教皇党的他发现自己从前的理想无法实现了。奥托四世现在成了“魏布林根”政策的延续者，宣布对伦巴底以及一些属于教皇管辖的城镇拥有统治权，同时宣布要把来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年轻国王赶出那不勒斯。

英诺森三世对奥托四世的转变怒不可遏。现在奥托不再是他“基督最亲爱的儿子”，而是一名伪誓者、分裂者。当务之急，罗马教廷要废黜奥托四世并革除他的教籍。然而，除非教皇能够为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找到有力的竞争对手，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名竞争对手必须能蛊惑人心，在教皇的支持下，赢得许多支持者。危机时刻，教皇发现了被奥托四世公开抨击的霍亨斯陶芬王子——腓特烈二世，一名自幼受天主教教义和理想熏陶的小伙子。

第5节　腓特烈二世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有趣地继承了两个家族的喜好和特点。他血管中流动的南方血液让他充满激情，酷爱奢侈品和艺术，歧视妇女，把她们当作闲暇时期的娱乐工具。从父亲的霍亨斯陶芬血统中，他遗传了力量、野心和残忍；从他母亲的诺曼血统中，他遗传了鲁莽、大胆和背叛。以他的日常贵族教育来看，腓特烈二世只可能成为一个能力非凡的勇士国王，但由于英诺森三世对他的谆谆教导，男孩天生的智慧和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了，远超同龄人。成年之后，腓特烈二世热爱读书和文化，对哲学和自然历史的兴趣浓厚。

腓特烈二世以宪章的形式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他表达他的想法道：“在这个王国，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食物。”他的巴勒莫宫廷充斥着放荡和奢侈，同时也是智者和学者聚集的中心。腓特烈二世喜欢在这里展示他的妙语和理论。

腓特烈二世到达罗马后，英诺森三世激励他拔出霍亨斯陶芬家族

的剑与奥托四世战斗。他的个性甚至自己都不了解。他像任何一个有抱负、爱冒险的十七岁青年一样冲动、急躁。他真诚地尊重他的监护人，因此没有多想就跪在教皇脚下，保证他的忠心和信念，然后骑马北行，去赢得一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人等着腓特烈二世。一些人因奥托四世的韦尔夫血统而终生反对他，一些人因奥托四世的粗暴无礼而憎恨他。腓特烈二世把从热那亚共和国借的钱都挥霍在这些贵族身上。他的慷慨大方与霍亨斯陶芬家族固有的力量和胆略让他声名远扬。

1212年12月，他在美因茨登基。接着，内战爆发。教皇和帝国联盟[6]都苦不堪言。在前面我们讲述过，1214年，奥托四世在与法王腓力二世的布维涅会战中大败。这把奥托四世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和最后的希望都冲走了。随着年轻的竞争对手进入莱茵兰，西西里王国和德意志王国不复存在，腓特烈二世在查理曼大帝的都城亚琛加冕称王。

英诺森三世现在的权力到达顶峰，因为他的学生和门徒登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同年，英诺森三世在拉特兰宫召集会议。这是第四次召开类似的会议了。会议召开的目的是商讨他内心最渴望实现的目标——“拯救圣地和改革教会。”然而，英诺森三世无法再次燃烧起人们东征的热情，但在13世纪，净化教会生活除英诺森三世外无人可为。他在欧洲的影响力巨大，第四次拉特兰宫会议与会者云集，其中包括来自各领地、各阶层的代表。于是，英诺森三世的教皇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腓特烈二世率军出征

1216年，史上最有权力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离世。他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的命运注定了他的辉煌。在他辉煌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个瑕疵，就是他的一个短视政策，把那不勒斯再次并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把教皇夹在伦巴底和南意大利两堵墙之间。英诺森三世当时因为急需找到一个与危及教皇地位的奥托四世抗衡的人，加之他相信年轻的腓特烈二世做出的永远忠于他的承诺。此外，英诺森三世还试图通过让腓特烈二世公开宣布将那不勒斯留给不争皇位的儿子，来保障教会的未来。英诺森三世当年的行为只是播种了一阵微风，而他的继任者收获的是一场旋风。

英诺森三世死时，新皇帝年仅二十岁。也许是为了取悦他的监护人，也许是出于热爱宗教的冲动，腓特烈二世一进入亚琛就拿起了十字军架做东征的准备。但几年过去了，他并没有急于兑现他的诺言。他大部分时光都在他热爱的南部王国度过，在那里他完成了英诺森三世的理想——使留在西西里的撒拉逊人归顺。英诺森三世对这些阿拉伯异教徒有着特殊的仇恨，但腓特烈二世发现这些人其实很软弱，迫切想依附他，于是就保护他们而不是迫害他们。腓特烈二世鼓励他们发展丝绸业，并为此在那不勒斯海岸建立了一个叫卢切拉的小镇。腓

特烈二世还招募大量阿拉伯战士入伍，以此加强他对封建贵族的统治。这些封建贵族都是11世纪诺曼入侵者的后裔。

腓特烈二世成功地利用一个族群对付另一个族群，镇压或帮助不同阶级，很快他就成为那不勒斯的独裁者。他摧毁许多贵族的军事堡垒，严厉禁止贵族间的私战，剥夺贵族法庭和封建主教的审判权，审判权移交皇室法庭。各城镇选举市政官的权力被剥夺，当地司法和税务由皇帝派遣的官员管理。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是有益的，因为在那不勒斯私人特权泛滥。腓特烈二世和腓力二世、亨利二世一样，有能力根除社会顽疾。他的高压政策激起了那不勒斯贵族和教会的愤怒。那不勒斯贵族和教会急忙向罗马教廷控诉，说他们的统治者更爱异教徒，并把巴勒莫宫建成接纳东方异教徒的后宫。

新教皇洪诺留三世听到这种报告和丑闻惊慌不已，注意到腓特烈二世只专注意大利，这引起他的不安。他只好不停地提醒腓特烈二世不要忘记东征的誓言，并耐心等待其兑现承诺。然而，腓特烈二世不仅迟迟未动，还彻底违背了当初对英诺森三世的承诺，加冕他的长子亨利为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国王，承认亨利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的继承人。洪诺留三世获悉后怒火中烧，要革除腓特烈二世的教籍，但因为腓特烈二世的长篇累牍的解释和教皇对友谊的慷慨大度，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洪诺留三世选择相信腓特烈二世，因为他不愿意冒险点燃一场“大火”。不久，耐心的洪诺留三世去世了。

新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是英诺森三世家族的成员。在教会拥有世间至高统治权的观点上，他与英诺森三世完全一致。格里高利九世是一个生活简朴、精力充沛的老人。他认为腓特烈二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怪物。他疯狂地努力削弱腓特烈二世的地位。在教皇不断的辱骂和威胁下，腓特烈二世在布林迪西开始为十字军远征做准备。当他最终要出发时，当地开始流行一种热病，他自己也被传染，只得退回港口。

格里高利九世不相信有瘟疫，认为腓特烈二世借口拖延。腓特烈二世痊愈后，马上起航。然而，格里高利九世又发布禁令，因为腓特烈二世还未得到他的宽恕，不能远征。格里高利九世对待皇帝就像对待温顺的儿子，要求皇帝言听计从。



洪诺留三世

一名地位尊贵的十字军战士因为没有履行誓言，接着又因为履行誓言被基督教的最高领袖革除教籍，这多么荒谬和羞辱。腓特烈二世现在对罗马充满敌意。他没有听从教皇的禁令，继续前进。他固执地认为，即使不是为了天主教信仰，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也应该进行东征。在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不支持他。留在阿克的基督徒因为受到牧师的警告，也不敢全力帮助他，甚至只是袖手旁观。然而，即使没有教皇的帮助，腓特烈二世取得的成就也比以往获得教皇祝福的十字军多。凭借武力和熟练的谈判技巧，腓特烈二世从苏丹手中夺得耶路撒冷，戴上了拉丁国王的王冠。

腓特烈二世履行了誓言，返回西西里。腓特烈二世远征期间，教皇的军队不停地骚扰西西里。现在，格里高利九世在圣热内罗与腓特烈二世签署了修好的和约。腓特烈二世虽然大声说“我已经忘记过去”，但内心的怒火却难以平息。格里高利九世说：“皇帝是热爱和忠于我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不再信任我，他的话言不由衷。”

伟大的霍亨斯陶芬国王凭一己之力夺取了耶路撒冷！腓特烈二世现在是那不勒斯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的至尊。他把帝国的权力延伸至伦巴底。格里高利九世认为，罗马的暂时独立决定了教廷的未来，但抱有这样的想法怎么能平静地睡在床上呢？

在这里，我们无法详述在《圣热内罗条约》撕毁后的细节。君主与教皇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双方的内心都很痛苦。腓特烈二世无法忘记是他的基督教父亲试图毁掉他的十字军。这种记忆根深蒂固，他至今怒气难消。因此，他对向教皇妥协的建议充耳不闻。然而，他还是很恐惧教皇的谴责。他很清楚教皇指责他的罪行与事实不符：他既不残忍，也不挥霍；他那样做不是对撒拉逊人包容，而是因为他是那不勒斯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对于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傲慢的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清除教皇指责他的罪行，那就是占领罗马。他像手指压海绵一样，把他的判断挤进他的幻想中。他写信给教皇说：“意大利是我的财产，世人皆知。”

腓特烈二世一心想要获得这份“财产”，就把政治家的风范彻底抛在了脑后。他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强大的君主政体。但在神圣罗马帝国，他破坏了巴巴罗萨和亨利六世奠定的皇家权威的基础。他宣称：“依照领地、豁免权、辖区、郡和百户邑所定惯例，让每位贵族都能和平拥有自己的领地和获赐的封地。”

为了从神圣罗马帝国攫取资金支付对意大利作战以及他的娱乐消遣的开支，腓特烈二世又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的

良好政治秩序，用现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他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来换取对敌作战的胜利”。

起初，腓特烈二世赢得了胜利，他的精力和策略获得了回报。他的宿敌“伦巴底联盟”与他的长子亨利私下勾结，但被他及时发现。于是，他废黜并囚禁了亨利。面对终生监禁的可能，绝望的亨利跳崖自尽。八岁的弟弟康拉德[7]取代了亨利，被加冕为王。

在意大利北部，腓特烈二世并没有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税款用来作战，而是用来扶持、资助魏布林根党[8]的意大利贵族。于是，贵族们为他而战，普通百姓对他闻风丧胆。这些贵族主要有易斯林·德·罗马诺和他的兄弟维罗纳与维琴察的领主阿尔贝里戈。他们的残暴和专制世间罕见。

当代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易斯林·德·罗马诺如何残酷屠杀了一万一千名囚犯，称“他是恶魔的仆人”。

“我相信从古至今没有比他更邪恶的人了。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止不住要颤栗。今天活着的人不确定明天是否还活着。父亲会杀害儿子，儿子会杀害父亲或亲属去取悦他。”

阿尔贝里戈“绞死了二十五个最了不起的特雷维索人，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冒犯或伤害他”。当囚犯们痛苦挣扎时，阿尔贝里戈把他们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们推倒在他们的脚下，然后把她们半裸着推入河中，任其漂流。

当这位“小撒旦”落入敌人之手，敌人会同样残忍地报复他。阿尔贝里戈和他的儿子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撕成碎片，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活活烧死，尽管她们高贵而美丽，并且完全无辜。

教皇党和保皇党不分青红皂白，惨烈厮杀，连小孩和妇女也不放过。残酷，这个最卑鄙和最具传染性的“罪恶”，笼罩着13世纪，亵渎

了这个拥有崇高理想和英雄辈出的时代。

令当代历史学家惊讶的是，腓特烈二世有时可以宽恕别人调侃他，但有时会因为一位公证人拼错他的名字而切断公证人的拇指。为了娱乐消遣，腓特烈二世命一位仆人不断跳入大海，潜水捞取一个金杯，直到他筋疲力尽，再也没出来。

“伦巴底联盟”在科特努奥瓦被腓特烈二世的军队彻底击败，米兰插旗的战车遭到焚烧。腓特烈二世激动地宣布，现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都效忠他了。他攻克罗马涅，包围教皇的一些城镇，作为他被革除教籍的回应。在敌人逼近罗马城门时格里高利九世因悲痛、愤怒而死去。在红衣主教加冕前，他的继任者由于恐惧和不安，追随他而去。

英诺森四世登上了教皇宝座，他向腓特烈二世抛出了橄榄枝，但腓特烈二世却说：“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因此没有教皇可以成为保皇党。”腓特烈二世谨记奥托四世的例子，皇帝不可能成为教皇党。

因此，腓特烈二世迎来了一位顽敌。他比格里高利九世更危险，因为他更谨慎、更懂政治。从里昂逃出来后，英诺森四世毫不退缩，维护了他在罗马的主张，宣布废黜皇帝，革除他的教籍。听到消息后，腓特烈二世一边嘲笑一边说：“教皇要废黜我？”“把我的王冠拿来，我要看看他怎么拿走。”

腓特烈二世的侍从给他拿来七顶王冠，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的、伦巴底的、耶路撒冷的、勃艮第的、撒丁尼亚的、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他一个接一个地戴在头上，然后说：“看，它们不还是我的吗？没有人可以轻松地拿走它们。”

于是，韦尔夫家族和魏布林根家族之间，教皇党和保皇党之间的可怕战争继续进行。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笼罩在刀光剑影与血雨腥风之中。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说：“在皇帝的禁令被宣布后，强盗们趁火打劫。普通人把犁头打成刀剑，长矛挂上钩子，不携带燧石和铁

之类可以点火的东西，没人敢出门。”

随着教皇城帕尔马成功地抵挡住帝国军队的进攻，腓特烈二世的命运也跌落谷底。要不是身体日渐衰弱，他也许可以再次赢得胜利。1250年，腓特烈二世驾崩，他至死也未获得教籍。他的敌人诅咒他下地狱，热爱他的人认为他还活着，因为他的个性超越人类的极限。

然而，无论好与坏，腓特烈二世都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消失了。教皇们还会被其他噩梦惊醒，但再也不会被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样的噩梦困扰了。腓特烈二世励精图治、呕心沥血建立的那不勒斯王国被他的继承人毁于一旦。最后，教皇把那不勒斯献给了法兰西的安茹家族。



康拉丁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

在与篡权者的斗争中，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皇帝——康拉德之子、年仅十五岁的康拉丁[9]像他的祖父一样英勇无畏，但在作战时被俘杀。

在神圣罗马帝国铲除异己后，腓特烈二世另寻他处建立的王国的根基并不稳固。他的征战和功绩都已成为记忆。了解他的人称他为“罗马的荣耀”。尽管他以失败告终，并且劣迹斑斑，但他仍是“世界的奇迹”。他鲜明的个性、超凡的勇气、无所畏惧的胆量、为实现目标百折不挠的精神，都超越了他的敌人和朋友。

---

[1]指从前的神圣罗马帝国。——译者注

[2]也就是亨利六世与康士坦茨皇后之子腓特烈二世。——译者注

[3]客西马尼园位于耶路撒冷，靠近橄榄山，是耶稣基督经常祷告与默想的地方。——译者注

[4]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在关于教皇的权力方面斗争不断。亨利四世被格里高利七世革除教籍。亨利四世迫于压力，不得不屈从教皇，在卡诺萨（Canossa）城堡里求见教皇，亨利四世在冰天雪地中站了三天，才得到教皇的原谅。史称“卡诺萨的胜利”。详细内容见本书第10章。——译者注

[5]即东正教。——译者注

[6]1212年，腓特烈二世正式加冕称德意志国王。在教皇支持下，他与法王腓力二世结盟，对抗英王支持的奥托四世。——译者注

[7]即康拉德四世（1228—125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子。康拉德四世与他父亲一样，也与教皇进行了无休止的争斗。1251年，康拉德四世入侵意大利，作为报复，教皇英诺森四世废黜了他的西西里王位。——译者注

[8]魏布林根家族的支持者。——译者注

[9]康拉丁（1252—1268），康拉德四世之子，霍亨斯陶芬王朝最后一位君主。1267年，康拉丁率军进攻意大利，兵败被杀。——译者注

第14章

中世纪的文化和教会组织

对现代人而言，“进步”这个词是指朝着完美的方向前进，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个词的含义会有所不同。在中世纪，进步意味着透过外族入侵的迷雾看到一个理想化的基督教罗马。灵感从前就存在。它不仅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观念中，还存在于思想和艺术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传统往往会扼杀灵感，束缚创新。

中世纪早期的绘画以拜占庭刻板而华丽的宗教画为主。教父们认为，在教会会议上通过的教义最能代表基督教绘画的主题。非主流但贴近生活的绘画作品有祈祷书和圣经的插图集，描绘了福音书教义和圣人的生活。其他绘画作品再现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从他的陋室窗户望出去，看到贵族骑着马，鹰或猎犬跟随左右；农民在播种或耕地；商人带着他的钱袋；时尚的人拖着长礼服。

此外，还有装饰画。装饰画以流畅的线条、精湛的色彩工艺、对细节近乎苛刻的追求，鲜活地再现了12世纪到14世纪欧洲的真实生活。然而，中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用刷子完成的，而是用建筑工人的工具和雕塑家的凿子完成的。

第1节　中世纪的建筑

继大规模建教堂和修道院之后，虽然市政厅和大学等其他建筑也纷纷拔地而起，但与绘画相同，建筑师创作的初衷也完全源于宗教。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生只是通往永恒的“上帝之城”的短暂旅程。受他观点的影响，中世纪的人们相信，朝圣的旅途中到处都是恶魔和圣人。人类为了灵魂不断战斗，只有通过信仰和圣徒的仁慈帮助，人类才能战胜恶狼般的地狱军团。此外，人类的祷告是通过圣墓教堂传递给上帝，所以在圣墓教堂祷告最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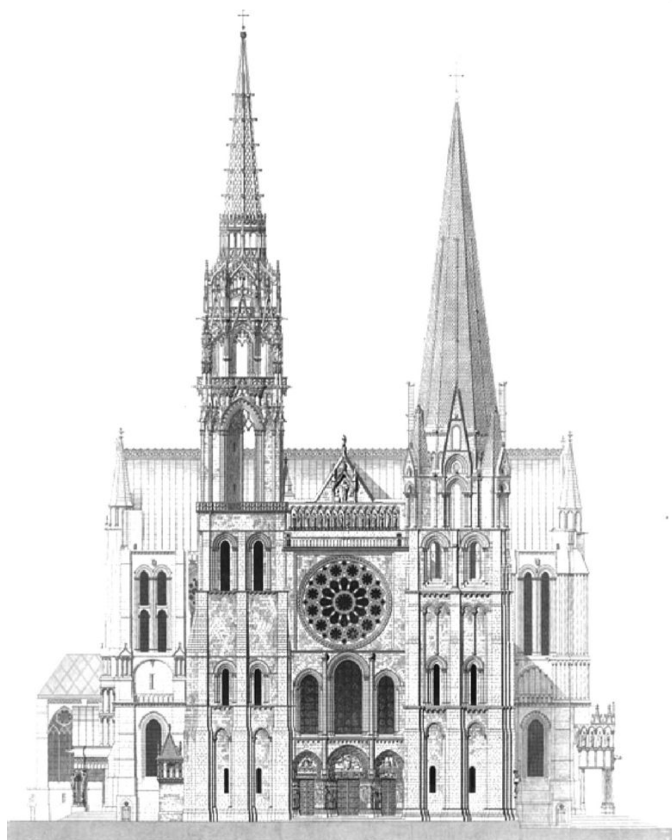
在现代，教堂和小礼拜堂属于公共财产，属于信仰者和思考者的共同财产。但当时由于资金和精神匮乏，或由于建筑工艺和建筑材料低劣，教堂的建造质量低下。在中世纪，教区的教堂与基督徒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受洗到生命旅程结束安息于地下，基督徒都离不开教堂。他们在教堂忏悔、发誓、祭祀和感恩，教堂是他们的避难所，可以躲避发生在街头、学校、粮仓和教区议会的暴力。

与中世纪的艺术家相比，中世纪的建筑师跟宗教的关系更密切。他们的灵魂与时代的希望和恐惧契合。建筑师们认识到建造和装饰寄托人们信仰的建筑，是展示他们天赋的最佳途径。“让我们为上帝的荣耀建造一座令所有人赞叹的教堂吧！”13世纪的锡耶纳人说。

因为黑死病在锡耶纳传播，夺去了很多设计者和建造者的生命，所以竣工后的大教堂，尺寸和宏伟程度只达到原设计的三分之一。然而，在现代人眼中它仍然雄伟壮丽，引人注目。设计者和建造者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热爱似乎都嵌入黑白大理石中。他们的工艺体现了中世纪的灵魂，城市因此带有浓郁的中世纪色彩。

腓力二世建造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这样，维克多·雨果说，巴黎圣母院的“每一面，每一块石头都是一页历史”。几乎所有中世纪的教堂都

经受住了战火的蹂躏，保存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如果说中世纪的艺术成就落后，那么至少有一门艺术成就非凡，那就是教堂建筑。



如果说中世纪的艺术成就落后，那么至少有一门艺术成就非凡，那就是教堂建筑

建筑师的工作完成后，雕塑家接着工作。起初他们的作品简单而庄重。后来，人们的想象力迸发，教堂采用拱形穹顶，柱头雕刻着天使、恶魔和各类怪物。飞拱[1]的发明使建造镶嵌大面积玻璃的高大天窗成为可能，也使玻璃绘画艺术达到顶峰。中世纪的艺术家们在坩埚[2]中混合颜料的工艺领先。人们被里昂、阿尔比和沙尔特教堂窗户的玻璃色彩所震撼。玻璃透明，色彩绚丽。彩绘玻璃的工艺秘密至今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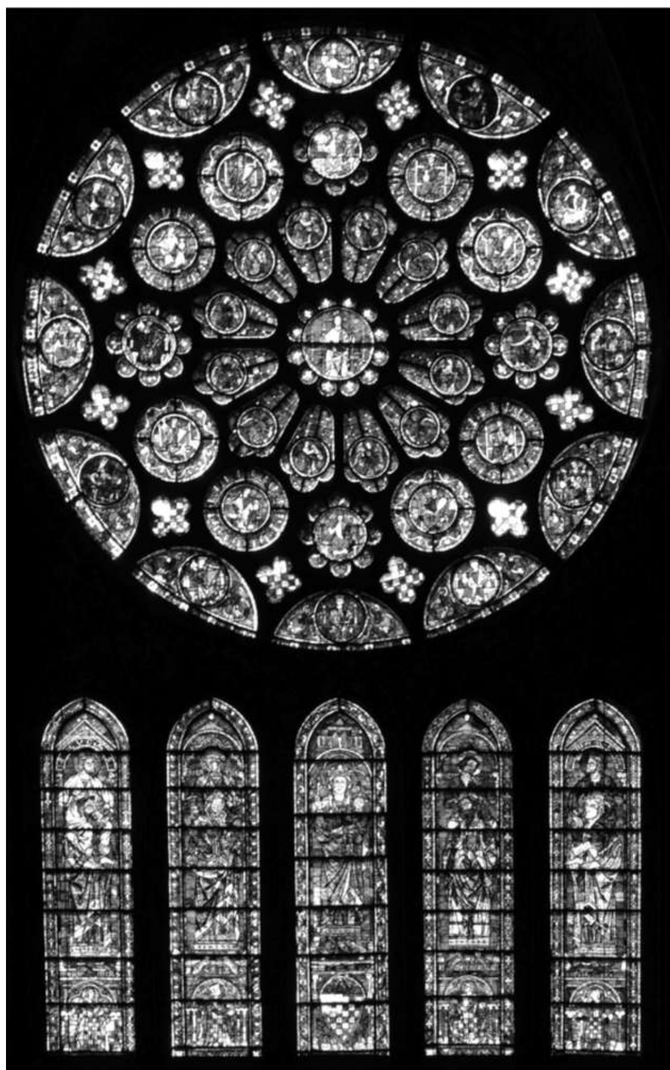
法破解。

第2节　文化知识和教会组织

中世纪在建筑、雕塑和彩绘玻璃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知识方面，欧洲难以摆脱罗马的巨大影响，即使在遭受入侵时，意大利还在悉心研究经典作家的作品和罗马的法律。拉丁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教堂诵经、布道、书信往来以及商业往来、教授们在大学授课都使用拉丁语。

语言统一的优势显而易见，教皇和国王与不同种族的主教、臣民可以轻松沟通，各国学生可以无障碍地阅读最好的书籍，因为几乎没有哪个中世纪的作家会屈尊俯就使用本国语言。更重要的是，大使、商人和朝圣者在环游欧洲时，可以用拉丁语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无须绞尽脑汁进行语言转换。

语言统一也有缺点。首先，普通人失去了获取知识的途径；其次，中世纪的很多作家可以用本族语言在羊皮纸上娴熟书写，但无法自如地使用拉丁语记载事件发生的经过，所以他们拙劣地模仿拉丁语风格撰写书籍。这些书读起来像目录一样索然无味。但中世纪文化犯的一个伟大“错误”就是《神曲》的问世。作者但丁因这部恢宏的拉丁语巨著而名垂青史。



沙尔特教堂的窗户玻璃透明，色彩绚丽，令人震撼

英法两国的人们掌握拉丁语很困难，而且拉丁语古板、累赘，不适合日常交流。在中世纪，从操拉丁语的罗马士兵到高卢的商人都会说法语。法语是文明社会的语言。它有两种变体，一种是“d'œil”法语，另一种是“d'oc”法语。它们获得这样的称谓是因为，法兰西北方人，包括诺曼人，把ouias读作œil，南方乡下人读作oc。



但丁因恢宏的拉丁语巨著《神曲》而名垂青史

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随着12、13世纪文学的发展，大量的d'œil法语进入英格兰，成为英格兰法庭的主要语言，而d'oc语言则主要在法国南部流传，是普罗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创作诗歌和书写传奇故事的主要语言。前者的后代是今天的法国人，后者是西班牙人。但在11世纪，他们都是图卢兹伯爵[3]的臣民，图卢兹统治的地区从罗纳河源头到地中海，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到埃布罗河。

第3节　中世纪的文化

图卢兹是一个半独立国家，孕育出一种新文化。新文化推崇用温和的形式享受生活，如爱情、艺术、音乐、科学，但这些形式会让人在享乐中堕落。图卢兹王宫对圣奥斯丁的“地狱说”毫不在意，尽管这

是欧洲思想的主流。图卢兹人认为，享受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纵情享乐的文化氛围中游吟诗人比赛诞生了。游吟诗人歌唱爱情，拨动了骑士和淑女的心弦。游吟诗人创作的旋律优美动听，时而哀怨，时而欢快，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观众如痴如醉。13世纪，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意大利，涌现出吟游诗人，如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北部和英格兰，但他们歌唱的主题通常是战争而不是爱情，观众在城堡里、篝火旁或倾听查理曼大帝与圣骑士、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传说，或聆听活泼的边塞曲《切维·切斯》。

第4节　中世纪的大学

在市场、营地和宽敞的大厅通常歌唱或吟诵虚构的历史故事。这些地方也是普通民众获取知识的“学校”。只有少数人可以通过大学接受全面的教育。当时，最著名的三所大学分别是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4]和牛津大学。

在中世纪，“大学”这个词的意思是“男性联合会”。鱼商和布商为了保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建立了“公会”，大学建立的初衷和“公会”相似。今天，城市因为有大学而自豪，并热烈欢迎新同学。但在中世纪早期，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男子拥入一个城市，其中许多人狂野不羁，不受约束。有些人很穷，必须依靠乞讨或行窃生活。所以，最初的大学并未得到人们的祝福。相互仇恨的不同族群之间，以及学生与当地市民之间的街头斗殴司空见惯，受伤、纵火、抢劫也是家常便饭，但大学经常会保护和控制它们的成员。因此，愤怒的商人想要铲除这些教育机构，因为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

市政当局也没有宽容地对待大学，因为大学就像城中城，威胁到城市管理权。直到几个世纪后，市政官员们才明白了“合作”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帮助而不是阻碍大学的工作。但也有像腓

力二世这样宽容的国王，让学生享有神职特权。随着大学的发展，学校开设了自己的课程。在13世纪，巴黎大学的老师们关闭了演讲厅，带领学生出走，抗议市政当局对暴乱处理不公。他们用离开告诉巴黎人，学生是城市的财富，而不是灾难。在教皇“诏书”的保护下，几个星期后，学生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拉丁区[5]。

建立可供学生居住的大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任何类似于现代大学的复杂机构都是逐步演化来的。学生住在学校，老师靠学生支付的学费生活。如果老师们的授课不受欢迎，听众减少，老师们就会挨饿。老师和学生的生活都是不稳定而危险的，因为经常有一些穷人或罪犯潜伏在街头，攻击过往行人，威胁师生安全。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不是“短暂的逗留”。在牛津大学或巴黎大学，学生学习期满五年才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再攻读三年才可获得硕士学位。如果要获得最高学位，比如神学博士，学生至少要经过八年艰辛的努力。因此，在大学读书可以说是一种职业。

在意大利最大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许多学生都对研究罗马法律的本源感兴趣，这并不代表学生对垂死帝国的法律多么感兴趣，而是他们想要掌握在被入侵后，对方借鉴和植入其国家法典的法律体系。《民法大全》在11世纪比在它的编纂者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更受尊重。我们看到，巴巴罗萨让博洛尼亚的律师们努力从旧法律文件中找到证据，证明他想要建立的伦巴底是合法的。当律师们帮助他实现愿望后，他给律师们丰厚的回报，赐予他们骑士头衔，显示对他们价值的认可。尽管巴巴罗萨的专政最终导致“伦巴底联盟”揭竿而起，反对他的主张，但这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中世纪的人们对早期法律和所有权契据的尊重。



在巴黎大学，学生学习期满五年才可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再攻读三年才可获得硕士学位。如果要获得最高学位，学生至少要经过八年艰辛的努力。因此，在大学读书可以说是一种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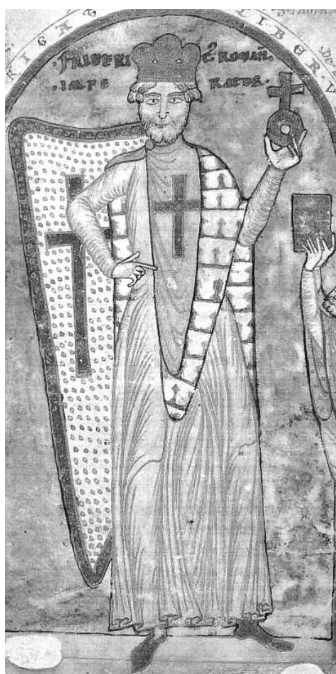
在博洛尼亚大学，许多学生都对研究罗马法律的本源感兴趣

第5节　中世纪的教皇政府

与欧洲的民法法典相比，直接建立在经典模式之上的教会法与旧罗马的法律文本的关系更紧密。随着格里高利七世的野心膨胀，教会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要求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律师来解释和使用它们。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在教会学习法律课程，可以获得一份回报丰厚的职业。这些未来的律师们学习的课本，是由格拉提安[6]编纂的一部详尽、权威的教会法著作。



壮年时的巴巴罗萨



晚年时的巴巴罗萨

执行教会法的教会法庭[7]曾处理过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的争

端。教会法建立的初衷是处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案件，同时竭尽所能吸引教会的保护对象。教会保护的对象有牧师和神职人员，后来涵盖了十字军将士、寡妇和孤儿。教会法庭的管辖范围不仅涉及诸如异教、亵渎神明和做伪证等道德问题，还涉及遗嘱、结婚和离婚，甚至是诽谤等非教会问题。

罗马成为教会律师的聚集地，教皇就像旧时的罗马皇帝，是最高法律的制定者，是全欧洲教会法庭最后的上诉法庭。教皇拥有绝对的权力，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如果教皇认为可行，他可以把教会法律搁置一边，实施他的“豁免权”。此外，无论底层教会法庭诉讼进行到什么阶段，教皇可以召集教廷或教皇法庭直接宣读他的审判结果。

教会也有阶层，与世俗社会的封建阶级相对应。教皇之下是大城市主教，大城市主教从教皇或教皇使节手中接过象征权威的羊毛披肩。大城市主教之下是教区主教及其属官。最底层是执事和农村教长，他们拥有法庭和审判权。

教皇的意愿以信件的形式传达到基督教界，被称为“诏书”，上面盖着重重的印章，如果有人违背或无视诏书的内容，违反者是个人的，会受到革除教籍的惩罚；违反者是国王或城市的，会面临更严厉的惩罚禁令。接到禁令的城市，被剥夺所有的精神慰藉：没有牧师给公众布道、给新生儿洗礼，没有牧师主持婚礼，没有牧师给予临终关怀，没有牧师参加葬礼，教堂的钟声不再敲响。

当圣人撤回遮挡的臂膀，恶魔们就会欢乐地聚在一起，重拾丢失的灵魂。正是在这种精神饥饿的压力下，英格兰的约翰王受到人民的诅咒，只能向罗马忏悔、屈服。然而，像大多数武器一样，熟悉会导致蔑视：频繁使用禁令和革除教籍就削弱了“武器”的效力，例如腓特烈二世，经常被革除教籍。即使在教皇的禁令下，他也能征服耶路撒冷并统治意大利。

教会想要统治全世界，并要求绝对服从，这显然超出了它的能力。同时，为了实现世俗的理想，教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的诱惑：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教会的金库，教会繁复、昂贵的行政管理就难以为继。律师、牧师、使节、红衣主教和教皇本人也要在世人眼中保持与职位相称的状态，因为13世纪跟12世纪一样，人们以貌取人，并予以相应的尊敬。

教皇法庭[8]是欧洲宗教和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除了日常开支，教皇与各国持续不断的战争也增加了教会的财政负担——先是与邻近的意大利各国君主的斗争，接着是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最后，教皇英诺森四世战胜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国王腓特烈二世。教皇更多的时候会把手伸向英格兰的钱袋子。在约翰王之子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英格兰被揶揄为“教皇的摇钱树”。

起初，教会法庭对罪犯的判决比国王或封建领主的暴政人性、全面。教会法的支持者被认为是大众英雄。然而，后来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随着国家民法法典的实施，人们的信念开始动摇了，教会法执行起来成本高昂且耗时，尤其是上诉案件，得从低级法院上诉至罗马教廷，而罗马教廷的判决经常被金钱和权力左右。

第6节　教皇的压榨

不止司法可以买卖。罗马教会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欧洲各国的圣奉和俸金。教皇通过各种方式敛财。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保皇党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教皇必须让教会的资金增长。因此，用在主教教区和教区精神需要的资金只能让位于军事需求。

有时，牧师候选人支付大量钱财并不是为了得到俸金，而是为了获得下一任职位的优先承诺。提名候选人时，牧师会承诺将自己的“第一个成果”，即第一年的俸金送给罗马教廷。愿意掏钱的一般都

是当地主教职位空缺的本国人。通常情况下，成功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不亲自去履职，而是派一个代理人去收取会费。会费的来源多种多样，但教士的俸金主要来自十一税，即为了维持教会生存所征收的税，每个公民要向教会缴纳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

不断横征暴敛常常会导致怨声载道，中世纪也不例外。以英格兰为例，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爆发战争时，英格兰并未卷入，但罗马教廷不断触碰英格兰的钱袋。英格兰非常不满，甚至对罗马教廷充满敌意。

巴黎的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9]写道："在这种时刻，信仰之火越来越弱，几乎熄灭，因为现在盛行不知廉耻地公开买卖圣职。每天，社会最底层的文盲身带教皇的诏书，征收和掠夺农民和他人赖以生存的财物。"

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教皇的使节被愤怒的学生赶出牛津小镇。"那个放高利贷、买卖圣职、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家伙哪里去了？"学生们大声喊道。在街上找到教皇的使节和他的随从时，学生们吼道："就是他蛊惑国王，颠覆国家，用我们的血汗钱资助外国。"

在林肯，主教格罗斯特拒绝帮助英诺森四世的侄子，一位年仅十二岁的少年，成为教堂的下一任受俸牧师。教皇的亲戚吞噬了欧洲大多数地方的俸金和主教职位。在英诺森四世时期，"裙带关系"公开化。也就是说，教皇利用教会的收入和职位为他的侄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谋利。

巴黎的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这样评价教皇英诺森四世："他把礼义廉耻放一旁，成为有史以来勒索钱财最多的教皇。"英诺森四世勒索的钱财能让罗马战胜敌人，但勒索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在中世纪早期，教皇被视为代表教会传达基督的声音。在教皇与君主发生纷争时，君主无法确定臣民是否忠心，不知他们是否会响应号召，拿起

武器反抗他们的“神圣父亲”。

随着各国国力的增强和罗马世俗权力的扩大，欧洲人民对教皇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更倾向于服从他们所熟知的统治者而不是陌生的、遥远的统治者。他们也不再愿意接受教皇的干涉，因此第一次开始区分教皇和教会两个概念了。



在信仰之火越来越弱的时候，不知廉耻地公开买卖圣职日渐盛行。每天，社会最底层的文盲身带教皇的诏书，征收和掠夺农民和他人赖以生存的财物

当英诺森四世废黜腓特烈二世，要把王冠加冕给挪威国王哈康·哈罗德森[10]时，哈康·哈罗德森拒绝了。他说：“我很乐意与教会的敌人作战，但我不愿意与教皇的敌人作战。”哈康·哈罗德森的话代表了一种新思想。持续两个世纪的教皇党与保皇党之争，为15世纪发起的由俗世议会监督教皇权力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而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教皇的权力遭到了更激烈的反对。

---

[1]飞拱，又称飞扶壁，哥特式建筑重要的标志性元素之一。——译者注

[2]坩埚是熔化和精炼金属液体以及固液加热、反应的容器。——译者注

[3]图卢兹伯爵是中世纪法兰西贵族爵位。墨洛温王朝时代，国王派官员治理图卢兹。到了加洛林王朝末期，该爵位开始世袭。图卢兹伯国大致包括现在的朗格多克-鲁西荣大区南部与比利牛斯大区的东半部。——译者注

[4]博洛尼亚大学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城，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创建之初以法律和医学两个专业著称，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大学之母”。——译者注

[5]拉丁区（Latin Quarter）位于巴黎塞纳河南岸，是巴黎著名的大学区，区域内学府林立，如著名的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等。拉丁区这个名字来源于中世纪，当时这里以拉丁语做教学语言。——译者注

[6]12世纪的一位修道士。——原注

[7]教会法庭是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司法机构，其中包括对教会的财产权及税收权加以保护、对各级教士履行圣职加以监督、对教士的各类过失加以审判等。——译者注

[8]教皇法庭是基督教会法院的最高法庭，产生于中世纪初期。由罗马教皇亲自主持，受理各级教会法院的上诉案件，包括刑事案件和一些特别案件。——译者注

[9]马修·帕里斯（1200—1259），本笃会修士，英格兰作家兼绘图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大部分为历史著作。——译者注

[10]史称“小哈康·哈罗德森”。他的父亲称“老哈康·哈罗德森”。——译者注

第15章

中世纪的信仰

一位即将进入大学学习的现代学生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他不可能像16世纪的哲学家一样“广泛涉猎”，而必须选择攻读的方向——法律、古典文学、科学、经济学、化学或医学等。中世纪的人们肯定会对种类繁多的学科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学科都是通往神学的主干道的边缘小径，比如科学。科学是基于事实而建立知识的过程，没有可靠的证据不能成为事实，而在13世纪，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罗杰·培根是第一个尝试科学实验的英格兰人。他的研究和他对当时观点的讽刺评论使他被视为魔鬼。他因为被怀疑是巫师而遭数年监禁。当时，即使教皇再开明，也无法把他从监狱中救出来。

人们不愿意改变从小就熟悉的观点，欣然接受早期基督教作家所讲的神话故事，例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鹈鹕杀死了刚出生的幼子，又在三天内复活了它们；麒麟破解了猎人的所有诡计，却被一个纯洁的少女轻易捕获。对中世纪的人而言，这些历史故事的魅力不在于它们的传奇性，而在于它们指向道德或装饰神学的教义。

就像罗马法律在博洛尼亚大学一统天下一样，神学是巴黎大学的主要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彻底掌握教父对圣经的阐述，了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和阿拉伯文译作。尽管亚里士多德是异教徒，

但他受到很多中世纪神学家——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的推崇，他们毕生的工作就是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天主教相异的观点。

第1节　经院哲学

来自这些权威的哲学被称为“经院哲学”。提出令人深思的观点，从而创建理论体系的人被称为“经院学者”。

巴黎大学第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是彼得·阿伯拉[1]，他是布列塔尼人。彼得·阿伯拉英俊、自信、头脑灵活、口齿伶俐。他对中世纪哲学体系建立的基础辩证法研究深入。他能围绕主题展开滔滔不绝的演讲。他的雄辩和独创性吸引了许多学生。学生们抛弃了原来的老师，纷纷投奔他的门下。

在巴黎大学，很多年轻人围挤在桌子旁聆听彼得·阿伯拉演讲，因此，彼得·阿伯拉有时也被称为大学的创建者。虽然这不是真的，但他受欢迎的程度决定了巴黎而不是其他地方成为法兰西的知识中心。人们孜孜不倦地倾听他的思想理论。他试图用人类的理性来证明教会的信仰，他的理论也是以保护教会为目的，但他还是很快陷入与教会的矛盾中。

彼得·阿伯拉的著作《是与非》，简要总结了早期基督教神父在各种神学问题上的观点。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很多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他成为教会，尤其是克莱沃尔修道院的圣伯纳德仇视的对象，因为圣伯纳德认为，人类的理性只是为了接受教会的教义，而不是对其提出质疑或批评。

圣伯纳德写信给教皇说：“彼得·阿伯拉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人类的理性完全理解上帝。他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价值。在他的眼中，人是伟大的。他是异教邪说的鼓吹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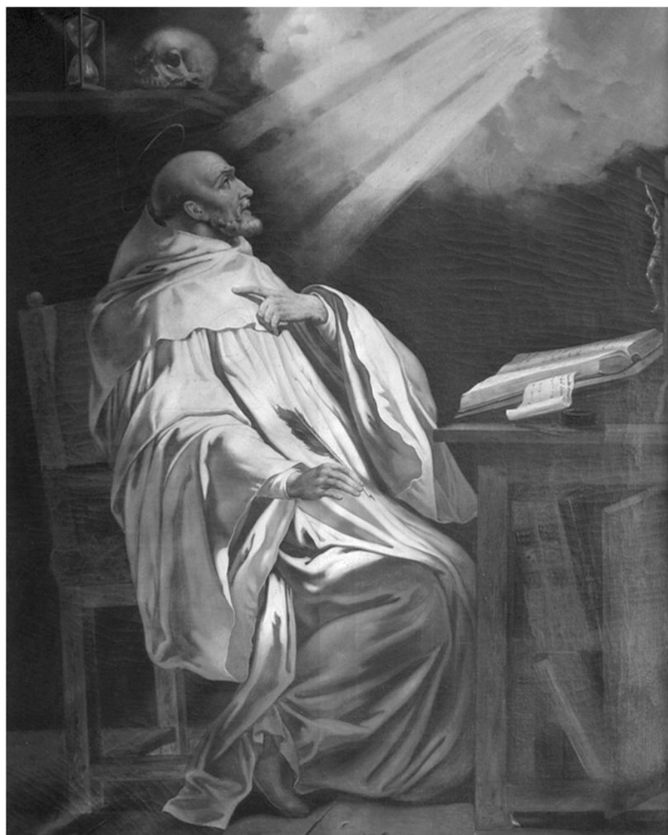
彼得·阿伯拉英俊、自信、头脑灵活、口齿伶俐，能围绕主题展开滔滔不绝的演讲

彼得·阿伯拉与圣伯纳德的思想完全相反。圣伯纳德尽管公开谴责教会的罪过，但从不挑战权威思想。他憎恨和惧怕人类以智慧为傲，认为这是所有罪恶中最致命的一种；而彼得·阿伯拉天生好奇多思，把灵巧的大脑看作外科医生的刀，能把疾病或坏死的组织等杂念清理掉，使思想更健康、更纯净。

尽管彼得·阿伯拉与圣伯纳德是对手，但并不匹敌，因为圣伯纳德是一个伟人，完全抛弃了世俗的虚荣，静心修身，具有中世纪还未被唤醒的探究精神。因此，彼得·阿伯拉被迫在修道院隐退，他的著作被公开焚毁。

彼得·阿伯拉的学生彼得·伦巴都[2]采用老师的方法，对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而且没有引起正统教派的不满。彼得·伦巴都的著作《语录》成为经院哲学最权威的教科书。在中世纪的思想丛林中，这部天才之作为创新者开辟了一条道路。到了12世纪后半期，随着亚里士多德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品被发现，很多经院学者的研究热情被激发了。这些学者中成就最突出的是托马斯·阿奎纳[3]，他被称为“天使博士”。

托马斯·阿奎纳出生于那不勒斯一个贵族家庭，幼年从家里逃出来，加入多明我会。多明我会是一个流浪牧师团体。后来，托马斯·阿奎纳被他的哥哥抓住带回家，但威胁和监禁都无法使这个年轻人放弃他选择的生活。一年后，他跳窗而逃，离开那不勒斯，前往科隆和巴黎研究神学，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神学讲师。在他最有名的著作《神学大全》中，他提出信仰上帝是人的最高境界。他以基督教父的注解评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素材，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理论。他和彼得·阿伯拉一样，相信理性，但去除了彼得·阿伯拉的探究怀疑主义。人类的理性是引领他穿越神学迷宫的向导。托马斯·阿奎纳的研究方法清晰、公正，他的著作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他成为与圣奥古斯丁齐名的神学权威。



圣伯纳德是一个伟人，完全抛弃了世俗的虚荣，静心修身，具有中世纪还未被唤醒的探究精神



托马斯·阿奎纳出生于那不勒斯一个贵族家庭，被称为“天使博士”

第2节　中世纪的信仰

人们对神学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正确信仰的重视是中世纪最显著的特征。今天，我们判断一个人是通过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信仰。我们会用慷慨、自私、善良、残忍、勇敢或懦弱等词汇总结一个人的性格，但在12世纪和13世纪，这些完全是错误的标准。在那个残酷而充满激情的年代，像圣伯纳德那样崇高的行为，除了圣徒，普通人根本

无法达到，而实现美好的生活似乎也就不可能了。人们普遍认为，除了苦修，世间的罪恶和失败要想得到赦免，罪人要忏悔、改正、坚守教会的教义之后，上帝就会通过圣徒予以怜悯、宽恕。教会的教义或“信仰”已经由基督传达给他的使徒，由教父编纂成书，由教堂议会规范为信经和圣礼，由牧师和神学家布道和宣讲，由教皇维护，只有它才能指引步履蹒跚之人前往上帝之城。

法兰西一位伯爵说：“依据基督教人类永生的教义，我能得到什么？在天堂能得到天使赠予的王冠，因为天使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在中世纪人眼中，接受异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道德的疾病比身体的疾病更严重，因为它影响的是灵魂，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异教徒必须被镇压，如果可能，使其皈依基督，如果不行，异教徒就像沾染疾病的破布被烧死和遗忘，以防他们错误的信仰传染他人，让他人永远失去灵魂。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是压制还是焚烧，都不能最终消灭思想的独立性和探究精神，因为思想独立和接受权威一样，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宽容多大程度上可以发展为行为和信仰，仍是世界研究的课题之一。看看首先开战的地方吧！那里的人们既不寻求也不提供妥协方案，因此播下了流血和硝烟的种子。

除了彼得·伦巴都，彼得·阿伯拉的另一位知名弟子是意大利人布雷西亚的阿诺德[4]。他在很多方面和老师很相像——专注、活跃、雄心勃勃。离开大学返回家乡后，他把布雷西亚搅得天翻地覆。他公开宣称教会应该回归“使徒般贫穷”的年代，鼓励人们摆脱主教的束缚。教皇和牧师被他的观点激怒，把他逐出意大利。他又回到巴黎大学教书，但法王也下令驱逐他，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教皇使节因为了解和仰慕他，因此提供保护，让他在神圣罗马帝国避难。但这个消息让圣伯纳德勃然大怒。

圣伯纳德写信给教皇使节说：“布雷西亚的阿诺德说话甘之如饴，但他宣扬的教义是毒药。他被罗马憎恶，被法兰西驱逐，被神圣

罗马帝国诅咒，意大利也拒绝接受他，但他却得到了你的支持。与他为友就是与教皇和上帝为敌。”

经过斡旋，教皇使节使阿诺德与教会暂时和解，但阿诺德天生就是个点火者。在罗马定居后，阿诺德很快成为“自由之城运动”[5]的领袖，只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他的努力下，教皇被流放。但罗马人害怕教皇发布禁令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朝圣之旅，最终抛弃了他，他被迫逃离。他在意大利的一座山上被抓获。被带回罗马后，他受了火刑。他的骨灰被扔进台伯河，以免被热爱他的人民奉为圣物。其实无须这么谨慎，因为在那个时代阿诺德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很难获得大众的认可。事实上，在其他地方，异端学说也偶尔出现，直到13世纪初才形成规模，成为教皇重视的问题。

异端学说比较盛行的地方是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文化繁荣，思想发展迅速。13世纪，图卢兹伯爵不再统治现代称为西班牙的地区，但统治着比利牛斯山北部最富饶的地区，是国王的直属封臣。

图卢兹是半独立国家。其君主雷蒙德六世的宫廷以奢华和享乐闻名。他轻视道德，排斥正统教派观点。当他的臣民嘲笑天主教时，罗马教廷谴责了他，而他就对天主教主教和牧师施刑。雷蒙德六世懒得假装悔过，因为他质疑的本性与异教合拍。他和贵族们完全赞同布雷西亚的阿诺德的观点，让教会回归使徒的贫穷状态，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侵占和挪用教会的土地和收入了。

第3节　朗格多克的异端学说

朗格多克的异端教派很多，最重要的有阿比尔教派和韦尔多教派，前者几乎完全否认基督教，认为善与恶是平等的，而基督的死对拯救人类毫无用处；韦尔多教派，或称“里昂的穷人”教派，起先试图

让教会接受其信仰。韦尔多教派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6]是里昂的一位富商。他把一些福音书由拉丁文翻译为俚语。他舍弃所有财富，挨家挨户布道，并和信徒们一起效仿使徒过简单贫穷的生活。

尽管韦尔多派的教义受到教皇的谴责，但韦尔多教派的人数在增加。韦尔多教派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独立任命牧师，否认基督教义书中很多关于救赎的文章。

中世纪的教会告诉人们，只有接受《信经》或《圣礼》中宣扬信仰的文章的教化，并由牧师指引，才有被拯救的希望。《圣礼》中有七篇关于弥撒奇迹的重要文章，也称“圣餐变体论”，它来源于“最后的晚餐”[7]。基督受刑前，给他的门徒面包和酒，说：“拿起来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来喝，这是我为你们流下的血。”中世纪的教会宣称，每次做弥撒时，祭司都要献上圣饼，因为基督为世界的罪过做出新的牺牲，而面包变成了组成他身体的物质。

韦尔多教派以及后来抛弃中世纪教会教义的许多教派都否认了这个奇迹，同时否认了祭司圣品的神圣性。根据教会的说法，牧师通过主教的双手得到了基督赐予圣彼德的神秘力量，赋予牧师权力，宽恕他们的罪行。无论牧师是懒惰还是邪恶，都可以通过神职保留他神圣的品格。

12世纪，圣伯纳德游历到朗格多克时，惊恐地发现“圣礼不再神圣，牧师无人尊重”。他提出抗议，迎接他的却是石块和威胁。而当圣公会成立宗教调查机构，试图消除这种敌意时，普罗旺斯人的痛苦增加了，他们不改变信仰的决心加强了。

人们用“我宁愿成为犹太人”来表达对犹太人的轻蔑态度，而在图卢兹，人们说：“我宁愿成为牧师。”到国外布道的牧师因害怕遭到攻击而被迫戴上头套，隐瞒自己的身份。

英诺森三世的第一个判断是，“只有坚定不移地宣传基督教，才

能消灭异端。通过宣扬真理，我们可以破坏错误的根基”。因此，他派了西多会的一些修道士去朗格多克完成使命。随修道士一同前往的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叫多米尼克·德·古斯曼[8]，他愿意为赢得信仰的灵魂而牺牲自我。西多会修道士骑马前行，后面跟着大批仆人和满载衣食的牛车。这引起阿比尔教派和韦尔多教派人士的嘲笑。他们说：“看到了吗？上帝富有的传教士载满了荣耀，但他们行为卑劣，令人鄙视。”

到处是这样的嘲笑和鄙视。举步维艰的时刻，西班牙人多米尼克·德·古斯曼站了出来。与生活在贫困中的异教牧师和生活在奢华、世俗中的当地基督教牧师说话时，他态度谦和诚恳，甚至在布道游行时也保持同样的态度。他长期严格自律，身着粗麻衬衫，经常禁食，远离享乐。他受到人们的尊敬。西多会修道士受到他的影响，赶走了马匹，弃了牛车，徒步前行，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赢得敏行。修道士们赤足跟随多米尼克·德·古斯曼前进，尽管前路坎坷，但他们为拥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欢欣鼓舞。

朗格多克人不再嘲笑教皇的使团，但对他们仍怀有敌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是神圣的，同时对罗马的偏见根深蒂固。因此，皈依基督的人仍然寥寥。在一次集会上，愤怒的人群把石头扔向陌生的传教士。于是，争执重新开始。传教士的使命越来越难完成了。

1208年，更激烈的冲突爆发了。教皇的使节因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挪用教会土地并且拒绝归还而革除了他的教籍。不久，教皇使节被杀。雷蒙德六世涉案。此案与当年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的案件如出一辙。英诺森三世马上宣布废黜雷蒙德六世，发动十字军讨伐他和他的异教臣民。

接下来便是二十年的血雨腥风。在西蒙·德·蒙福特[9]的率领下，法兰西北部正统教派联盟响应教皇的号召，前去剿灭在南部搞独立的异教徒。朗格多克的贵族和百姓团结起来，为宗教和政治自由而战，但

双方力量悬殊，朗格多克被迫投降。三万多朗格多克人死于战争，但他们创造的文明和文化使普罗旺斯在中世纪的欧洲闪耀着光芒。



多米尼克·德·古斯曼与人交谈态度谦和诚恳，长期严格自律，身着粗麻衬衫，经常禁食，远离享乐

第4节　阿比尔派十字军

多米尼克·德·古斯曼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血迹斑斑的阿比尔派十字军的名单上。他呼吁采用不同的方式扑灭异教。1216年，为了追寻理想，多米尼克·德·古斯曼得到教皇的允许，组建多明我会[10]。多明我

会基本遵照修行制度，但规定修道士不可一直留在修道院，而要游历各地，挨村布道，托钵行乞，过清贫生活。创建者希望这些严厉的规定能防止多明我会受到世俗的侵扰。

多米尼克·德·古斯曼热爱教会，信仰虔诚，很快被尊为“圣徒”，史称“圣多米尼克”。然而，他的精神境界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英诺森三世是13世纪早期的代表人物，所以圣多米尼克的信徒遵守英诺森三世制定的标准，而不是多明我会制定的标准。

英诺森三世提倡用正确的教义驱逐错误的教义，但他的方法失败了，这让他既恼又怒。他顽固地认为朗格多克的异端是道德和社会的毒瘤，需要无情地铲除。他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中。除西蒙·德·蒙福特将军的杀戮外，他还增加了可怕而有效的审判制度。到了格里高利九世时期，审判权由地方主教转交给罗马教廷。罗马教廷授权审判者寻找异端邪说，并用酷刑威胁、转变异教徒。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在神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信仰又非常虔诚，因此很多被选成审判者。

阿比尔派十字军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被法王腓力二世摘取。尽管腓力二世允许、鼓励贵族们拿起十字架参战，但他远离海外战争，袖手旁观。教皇的废黜令发布后，图卢兹雄风不再。图卢兹曾是法兰西南部的中心，曾经骄傲地宣布为独立地区。现在它不再是腓力二世的心腹之患；普瓦图和阿基坦的大部分土地也合并为皇室领地。

法王腓力二世之子路易八世继续执行父亲的政策。他亲自参加十字军，随军到达罗纳河谷，攻克阿维尼翁，几乎进入图卢兹。但他突然患病身亡，战争随即宣告结束。之后，路易九世继位，路易八世的遗孀卡斯提尔的布兰奇摄政。卡斯提尔的布兰奇与图卢兹新伯爵雷蒙德七世签署条约。从此，雷蒙德七世成为法王和教皇的双重附庸，并且被迫承认法王的弟弟是普罗旺斯的继承人。

第5节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从中世纪最黑暗的画面之一——阿尔比派十字军，转向中世纪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阿西西有个叫翁布里亚的小村庄。1182年，这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母亲给他取名约翰。他的父亲是富商，刚从法兰西旅行回来，所以给他取名“弗朗西斯”，即“法兰西人”的意思。圣多米尼克在一个严肃的宗教家庭中发展出对宗教炽热的信仰，而弗朗西斯则可以参与意大利小镇上轻松愉快的社交活动。少年时代的他慷慨、天真、快乐，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弗朗西斯成年以后，参加了攻打佩鲁贾的阿西西军队。他在战场上被俘，和战友们一起被投进地牢。在被囚禁的十二个月里，大多数狱友满腹牢骚，不停地抱怨，但弗朗西斯没有。在逆境中，他表现出幽默甚至快乐。大家都认为他疯了。

后来，弗朗西斯被释放回家。父亲希望他能名扬世界。这个年轻人梦想着闪亮的盔甲和辉煌的战功。因此，他的父亲准备了衣物和装备，送他和另一位贵族结伴去那不勒斯战斗。

旅途刚过半，弗朗西斯就返回了阿西西，虽然说不清楚为什么，但他相信是上帝让他这么做的。他试着回归以前无聊的生活，但同伴们的笑声现在听起来那么空洞，就好像他们在影子里找到了快乐，而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可以真正拥有快乐，如果他能找到，整个世界就会被照亮。

对他的召唤来了，但对阿西西那些过惯舒适生活的市民而言，这简直是疯狂的声音。他们谣传说看见弗朗西斯和麻风病人在一起，和乞丐一同进餐。弗朗西斯几乎放弃了所有财物，卖掉了马，在城外的一个山洞住下。人们为他的疯狂行为摇头叹息，为他父亲老贝尔纳有

这样的儿子表示同情。

事实上，贝尔纳对儿子的行为也感到无比愤怒，他恳求阿西西主教说服弗朗西斯放弃那种新生活方式，否则弗朗西斯就得交还最后的、所剩无几的财产。于是，弗朗西斯奉召前来。在主教面前，弗朗西斯把钱甚至衣服都还给了父亲。他身无分文，站在阿西西的大街上。从前，作为富商的继承人，他在这里骑马穿行，现在他穿着灰色乞袍，戴着白色十字架。他将之视为新职业的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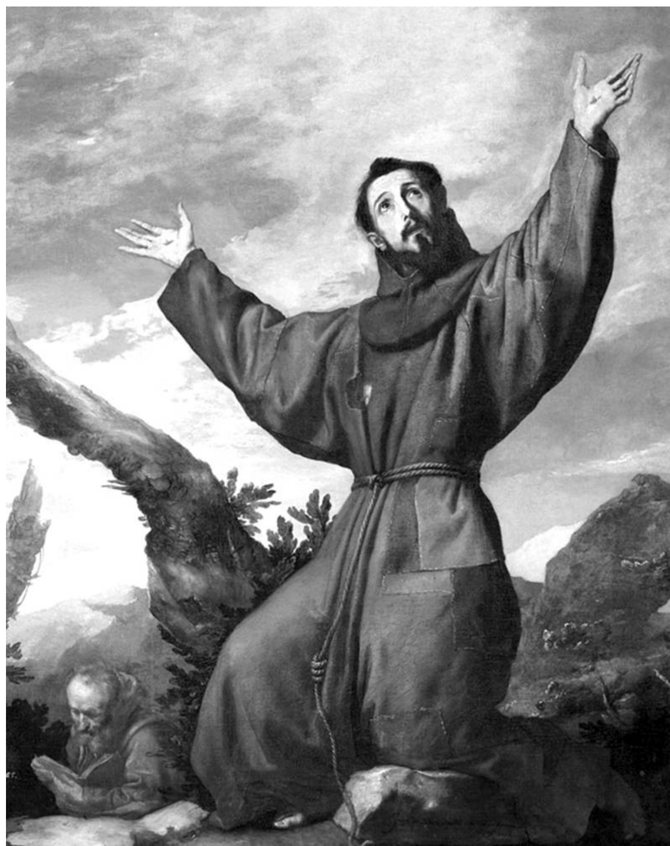
他舍弃一切的行为最后打动了周围的人。但一开始，有的轻蔑地怀疑他，有的赞赏他。人们可以理解圣徒捍卫信仰、反对异端邪说的决心和热情，谴责一切世俗的享乐，因为这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氛围。但弗朗西斯——这位阿西西的儿子在争议中没有扛起任何大旗，而是选择在山边的阳光下，在温暖的火焰中，在贫民窟肮脏的环境中，寻找快乐，这超越了人们所能理解的精神境界。



弗朗西斯几乎放弃了所有财物，卖掉了马，在城外的一个山洞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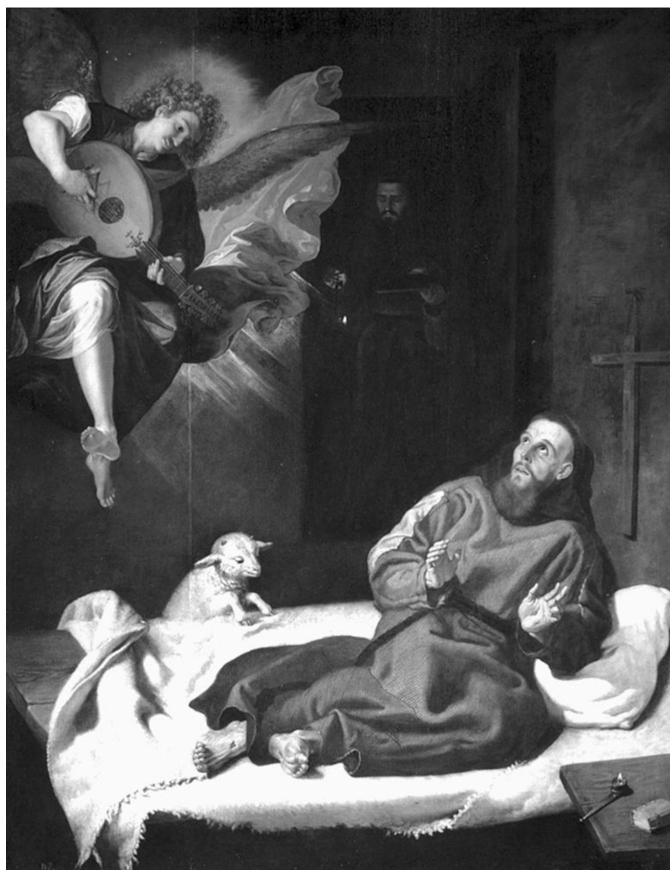


贝尔纳对儿子的行为也感到无比愤怒，他恳求阿西西主教说服弗朗西斯放弃那种新生活方式，否则弗朗西斯就得交还最后的、所剩无几的财产。于是，弗朗西斯奉召前来。在主教面前，弗朗西斯把钱甚至衣服都还给父亲



弗朗西斯在争议中没有打起任何大旗，而是选择在山边的阳光下寻找快乐，这超越了人们所能理解的精神境界

然而，弗朗西斯和圣多米尼克、圣伯纳德一样属于中世纪的世界。他的精神夹杂着里昂穷人的自我否定和普罗旺斯诗人吟唱的传奇。这些游吟诗人颂扬骑士。骑士的荣耀和辉煌使许多超凡脱俗的女子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弗朗西斯沉醉在歌剧《我贫穷的夫人》中。他的灵魂被骑士精神点燃了。传统诗歌被映衬得黯然失色。



弗朗西斯沉醉在歌剧《我贫穷的夫人》中

为了对《我贫穷的夫人》表达敬意，这位富商的儿子抛弃了他对父亲的感情、他的军事抱负以及舒适的家与华丽的衣服。由于他执着的奉献精神，他丝毫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有的是在肮脏、破烂不堪的环境中发现美的强烈喜悦。

第6节　方济各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弗朗西斯并未想过建立修道会，从而把那些被他的真诚和快乐所打动的人，想要成为他的追随者的人，愿意分担

他的工作的穷人和病人聚集在一起。当他们询问清修生活的戒律时，他带他们到最近的教堂。历史学家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 他们开始祈祷（因为他们都是简单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宣扬放弃世界的福音文本），虔诚地请求上帝。在他们第一次打开书时，上帝会屈尊显示自己的意志。
>
> 他们祷告的时候，弗朗西斯手里拿着福音书，跪在祭坛前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帝的训诫："如果你是完美的，把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卖给穷人，你就会在天堂拥有财富。"看到这句话，弗朗西斯无比兴奋，衷心感谢上帝。

因此，为了纪念《我贫穷的夫人》，他创建了小兄弟会，或称阿西西穷人会。英诺森三世允许修道会帮助麻风病人和无家可归的人。1223年，罗马教廷正式批准方济各会成立。

三年后，圣弗朗西斯去世了。与他一起生活的修道士们声称，他对基督教非常虔诚，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手和脚上留有耶稣受难的创伤。关于他谦逊和温和的故事广为流传，如在修道会成立初期，为了避免同伴受辱，他亲自去乞讨面包。在食不果腹的日子里，他把同伴抓来打算到市场上卖的鸽子放飞了，因为他在每个有生命的物种上，都读到了上帝的灵魂，他对鸟类也要传播福音。

对阿西西的修道士而言，兄弟不但意味着人类灵魂的统一，而且意味着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统一。弗朗西斯每日要感谢兄弟们的帮助，感谢太阳、火和风；感谢姐妹们的帮助；感谢月亮、水和地球母亲。他对自然的热爱，与13世纪的精神格格不入，却与当代精神非常契合。

据历史学家记载，"他告诉园丁修道士，花园不要只种植蔬菜，还应种植一些花草。他称这些应季绽放的'兄弟花'为田野里的花朵或

山谷里的百合”。他说，园丁应该在花园开辟出一块地方，用来种植各种各样香味扑鼻的药草。这些药草会结出美丽的花朵。在它们绽放的季节，人们会愉快地前往，欣赏它们，赞美上帝。因为每朵花都会大声呼喊：“哦，上帝，让我为你而绽放。”

一旦人们认识到圣弗朗西斯生命之花的美，信徒就迅速增加了。乞讨时，他们不再惧怕侮辱和伤害。实际上，人们聆听他们布道，献给他们供奉。方济各会的一些成员定居在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而另一些人则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前往英格兰，住在伦敦、牛津和诺里奇的贫民窟里，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最好地为穷人服务。

圣弗朗西斯从未想到自己如此受欢迎。去世前他对此一直很困惑，也很警觉。他忧心忡忡地承认，他的一些追随者们并不是真心想要过圣徒的生活，而是希望通过传播圣徒的思想，获得人们的赞美和荣誉。

他对未来的担忧是正确的。如果不能理解修道会规则的真正含义，并且切实去遵守，那么规则就是废纸。弗朗西斯的快乐、自我克制的秘密只能留给少数人。如果布道不是为了帮助人类、赞美上帝，而是为了获得财富和荣誉，弗朗西斯认为他们是伪修道士，这正是方济各会修道士面临的最大诱惑。广受追捧后的贪婪和自我满足，很快使方济各会与其他修道会、大学神学讲师和世俗教士陷入争吵。他们把这些托钵僧看作闯入者，想要攫取其他教派的信徒、会费和收入。

当代的一位本笃会信徒尖酸地说：“信徒们相信，只有在牧师或方济各会修道士的指引下，他们才可以被拯救。”方济各会的发展得到了大多数教皇的支持。他们像英诺森三世一样，认为方济各会是新的“挡箭牌”，可以保卫罗马免受世俗和腐败的指责。作为对教皇的回报，方济各修道士成为罗马最忠实的拥护者。他们现在修行的目的是捍卫一种制度而不是献身于一种理想，逐渐退化，接受了普通的宗教标准。

虽然改革的浪潮再次席卷中世纪的教会，但收效甚微，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努力是徒劳的。圣弗朗西斯无法阻止13世纪的腐败，但他的朴素和真诚却再次向人类揭示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真理：通向上帝之城的道路就是人类的爱。

“本笃会是遁世，方济各会是入世。”这句话表明，中世纪人的思想带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恐惧，正经历着转变。它已经显示出一种现代的精神，即上帝创造的万物都是神圣的。因此人类对万物的态度不应是不信任，而应是同情和感兴趣。

对圣奥古斯丁而言，通往上帝之城的道路是陡峭而狭窄的，在救赎的过程中，每个灵魂都被许多的邪恶所包围；对圣方济各而言，通往上帝之城的道路是一条小径，虽然陡峭而崎岖，却开满了鲜花，朝圣者沉浸于为他人服务的快乐中，没有意识到脚被石头磨破了，正在流血。

在佩鲁贾的地牢里，圣弗朗西斯的快乐被他的同伴们称为疯狂。对那些眼中只看到世间的邪恶，看不到世间光明的人而言，圣弗朗西斯传递的信息自然是疯狂的。然而，阿西西的圣人在他死后的各个时代都有追随者，他们不一定穿着灰色长袍，但都无声地帮助着他人，快乐地信仰着上帝和人类。

---

[1]彼得·阿伯拉（1079—1142），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生于贵族家庭。他的“三一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神学》被焚。1142年死于克鲁尼修道院。——译者注

[2]彼得·伦巴都（1100—1160），意大利北部人，曾任巴黎诺托达姆神学院教授，后升任巴黎教区主教。12世纪著名神学著作《四部语录》即出自他之手。——译者注

[3]托马斯·阿奎纳（约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南部一个贵族家庭。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学派的创立者。著有《神学大全》。——译者注

[4]布雷西亚的阿诺德（1100—1155），布雷西亚隐修院长，意大利激进的宗教改革家。他主张精神权利与物质财富分离，废除教皇世俗权力，被教皇谴责为教会分裂分子。后来，他在罗马被腓特烈一世所俘，处以绞刑。——译者注

[5]为了摆脱教廷控制，罗马市民驱逐了教皇和各枢机主教，恢复了古代的元老院，宣布罗马为共和国。阿诺德到达罗马后，立即和起事者联合攻击教皇和枢机主教，史称“自由之城运动”。——译者注

[6]彼得·韦尔多（1140—1205），中世纪韦尔多教派创始人。他本是里昂的商人，1173年，他将个人所有财产捐给穷人，从此过上使徒般的贫穷生活。韦尔多教派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会习俗，否认许多正统教义和教会礼仪。——译者注

[7]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坐在餐桌旁，共进晚餐。餐桌旁共十三人，这是他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在餐桌上，耶稣突然感到烦恼，他告诉他的门徒，他们中的一个将出卖他。史称“最后的晚餐”。——译者注

[8]多米尼克·德·古斯曼（1170—1221），西班牙人。他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圣职人员，创立多明我会。——译者注

[9]西蒙·德·蒙福特（1208—1265），法裔英格兰贵族。在第二次伯爵战争中，他率领贵族反抗亨利三世，俘获爱德华王子，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召开了一次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这在中世纪欧洲是第一次。——译者注

[10]多明我会也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该会的修道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被称为“黑衣修道士”。——译者注

第16章

两位明君统治下的法兰西王国

我们看到，腓力二世奠定了法兰西强大的君主制的基础，但他驾崩后，封建贵族又蠢蠢欲动，试图通过欺诈和暴动恢复他们曾经拥有的独立。

新君路易八世为了挫败封建贵族的阴谋，决定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儿子们，所有的次子向长子效忠，但各子直接治理自己的领地。当时，这也许是彰显王权最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迅速确立了对诺曼底、安茹、普瓦图和图卢兹的统治权。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短视政策，因为这些“封地”或“王室领地”是世袭的，而其统治者——王室贵族比旧封建贵族更傲慢、更有野心，因为他们都与卡佩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血亲关系。

第1节　路易九世

路易八世还未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就驾崩了，年仅十二岁的路易九世继承了王位。虽然路易九世接受了父亲遗嘱中给弟弟们分配土地

的决定，但他的母亲兼监护人布兰奇王后治国有方，而新国王也非常强硬，因此国王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一次，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伯爵囚禁了一位骑士，这位骑士不服从安茹伯爵的裁决，上诉至王室法庭。安茹伯爵获悉后勃然大怒。路易九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声说："法兰西只有一位国王。"他下令释放骑士，并要求伯爵的案子都应该在巴黎审理。

路易九世严惩私战，禁止贵族铸造货币。据说，当时除国王外，还有八十名贵族拥有自己的货币。路易九世知道封建货币可以自由贬值，所以禁止私人货币在其他省流通，而国王的货币价值高，可以在任何地方流通。在交换商品时，人们更喜欢使用价值高的货币。于是，那些容易贬值的货币就逐渐被淘汰了。

如果认为君主拥有绝对权力，路易九世肯定也认为国王负有同等的责任。他对儿子说："要让你的人民爱戴你，否则，我宁愿让其他治国有方的人继承王位，即使他们是苏格兰人。"

像铸造货币一样，王室司法必须高于其他司法。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路易九世选择那些忠诚睿智、行为端正、声誉良好、廉洁奉公的人出任"地方长官"和"总管"。路易九世知道，即使有良知的官员也有可能被名利腐化。他命令各级官员不得收受任何礼物；同时警告法官们，案件办理过程中，未查明真相前，要尽量向着穷人而不是富人。

腓力二世一直坚持正义，因为他相信正义是有回报的，而他的臣民也惧怕并尊重他；他的孙子也拥有强烈的荣誉感，坚持正义，受到人民的爱戴，人们热爱他就像热爱上帝和圣徒一样。

和所有法王一样，路易九世是罗马教廷虔诚的儿子。英诺森四世被腓特烈二世从罗马赶出来时，正是在路易九世的保护下，他才可以在里昂安然居住。尽管路易九世真诚地热爱自己的信仰，后来被封为圣徒，但他要统治一切（无论是俗世，还是教会）的决心和欲望，无

法阻挡。如果神职人员犯了俗人之罪，路易九世就坚决要求俗世法庭审判他们。与路易九世同时期的英王亨利三世是一个软弱的国王，经常被教皇牵着鼻子走。路易九世怒斥道：“这种教廷闻所未闻。征收临时商品税的应该是国王，而不应该是教会。必要时我要向教会征税。”



路易九世拥有强烈的荣誉感，坚持正义，受到人民的爱戴，人们热爱他就像热爱上帝和圣徒一样

在与神圣罗马帝国艰苦的斗争中，教皇得到法王的支持。因此，罗马教廷没有抗议路易九世的决定。路易九世这样做既维护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平息了人们对罗马教廷的不满。意大利一位修道士看到路易九世谦卑地接受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食物，就评价说他不像国王，更像修道士。路易九世的日常生活也完全符合这种评价：饮食简单，喜着素装；习惯半夜和清晨起床做弥撒；憎恨誓言、谎言和谣言；热衷慈善；在巴黎贫民窟，热心地帮助护理病人，给拥挤在门口肮脏的乞丐洗脚。这位意大利修道士这样描述他，“他很瘦弱，有着天使般的表情。灰色的眼睛充满了善意”。

如果命运没有让路易九世成为一位国王，他可能会成为一名修士。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时，他的妻子抱怨他穿着太朴素，他就调侃道，如果他穿上花哨的衣服取悦她，她也必须穿着朴素的衣服

来取悦他。

在战场上见过路易九世的臣民称他是“最好的骑士”。战士们描述道，国王的英勇无与伦比，他不计个人安危，亲自上阵杀敌。但路易九世也衷心热爱和平，希望同所有的基督教邻国成为朋友；他安于法兰西的领土现状，与英格兰达成协议，承认吉耶纳公国[1]属于英格兰；他不是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成功的调解人，但在双方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中立。在教皇废黜腓特烈二世时，路易九世拒绝教皇加冕，也没有在腓特烈二世驾崩后的无政府状态中窃取任何利益。



路易九世在战场上英勇无敌，不计个人安危

路易九世憎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因为内战使欧洲无法有效联合，共同对付土耳其人。和英诺森三世一样，他的身上也燃烧着古老的十字军精神的火焰。

13世纪初，一个叫斯蒂芬的法兰西农民曾鼓动发起新的十字军东

征。他说，上帝在幻境中告诉他，基督教的孩子们应继承先辈失败的事业，夺回圣地。结果成千上万的男孩和女孩聚集在马赛。他们大部分只有十二三岁，狂热地回应上帝传递的神谕，期待海中出现一条通往陆地的通道，就像摩西和他的信徒遇到的一样。孩子们等待的奇迹没有出现，却被伪善的商人欺骗了。这些商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但眼里只有金子。孩子们跟随商人登船。在船上，孩子们被解除武装，捆上手脚，戴上手铐，然后被贩卖到埃及和叙利亚为奴。

第一次听说孩子们组成十字军远征时，英诺森三世惊呼道：“此等行为让我们汗颜！”十字军精神的继承者圣路易[2]认为，如果他不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改变和推翻土耳其人，他的王权将会蒙羞。

第2节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法兰西的茹安维尔记录了路易九世远征埃及的过程。一支约一千八百艘大小船只组成的舰队，从十字军大本营塞浦路斯出发，航行到尼罗河口的达米耶塔。路易九世看到旗舰靠岸，忘形地跳到水里，手里拿着长矛，高喊战斗口号——蒙茹瓦，圣丹尼斯！

十字军很快攻克了一个城镇，但中世纪人对天气认识不足。不久，瘟疫席卷了尼罗河三角洲。高烧和痢疾大大削弱了十字军的战斗力，许多支劲旅在小规模战斗中覆没。既定的进攻变成了撤退，撤退变成了溃败。路易九世因为拒绝抛弃殿后的军队而被俘虏。

灾难终于结束了，路易九世答应放弃达米耶塔，并支付巨额赎金，他被释放了。但路易九世的耐心和骑士精神弥补了他失败的耻辱。他没有返回法兰西，而是前往圣地。尽管耶路撒冷在腓特烈二世短暂收复后重新落到土耳其人的手中，但基督徒仍控制着沿海的狭长地带，其中包括阿克。



一支约一千八百艘大小船只组成的舰队，从十字军大本营塞浦路斯出发，开始了远征埃及的路途

路易九世认为，只有他履行誓言，十字军将士们才不会丧失希望和勇气。尽管疾病缠身，他还是在巴勒斯坦待了三年。直到他的母亲摄政王太后布兰特薨逝，他才被迫返回巴黎。茹安维尔讲述了这次返航的过程，因为暴风雨很猛烈，水手们要把路易九世送上塞浦路斯海岸，但路易九世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引起军队的恐慌，他说：“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热爱自己的生命，但如果大家互相猜疑，就有可能永远回不到自己的国家。因此，我宁可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也不愿意伤害这里的每个人。”



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路易九世因拒绝抛弃殿后的军队而被俘虏

路易九世安全返回了法兰西，但他对十字军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因此，1270年，他不顾贵族们的反对，再次拿起十字架。他的目标是重新夺取突尼斯，解放北非部分地区。该使命让他重新燃起了宗教热情，但法兰西厌倦了十字军东征，许多在叙利亚和埃及心甘情愿随他战斗的人现在拒绝参战。最终，他的十字军主力是以赚钱为目的的雇佣军。

在迦太基附近登陆后，十字军很快就发现敌人的兵力强大，接着被包围在城镇的废墟中。瘟疫再次席卷了军营，第一个倒下的就是身体虚弱的路易九世。“主啊，求你怜悯我带领这里的百姓，将他们安

全地送回家，不要让他们落入敌人之手，不要让他们怀疑你的圣明。”路易九世的临终遗言表明他热爱自己的信仰和人民。他驾崩的消息传遍了军营，传遍了法兰西。人们哀悼这位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的国王。然而，他点燃的宗教烈火迅速熄灭了。他的儿子腓力三世与突尼斯苏丹达成停战协议，撤军回国。唯一对这个协议感到恼火的是英格兰王子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一世。路易九世驾崩时，爱德华一世正在作战。他渴望通过一场战役获得军事荣誉，但因为没有人支持，他只能放弃在非洲开战的想法，继续他的旅程，独自来到圣地。

法王腓力三世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他夹在两代雄主——他的父亲路易九世与他的儿子“美男子”腓力四世之间。腓力四世性格强硬、深沉，是法兰西历史上强大的君主。

腓力四世继承王位时只有十七岁。从他的绰号“美男子”可以得知他英俊潇洒，但茹安维尔并未留下关于他个人生活和性格的记录，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行为做出判断，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冷酷无情、有仇必报的人。

在与教皇的交往方面，先王们尊敬教皇，而腓力四世则不然，部分原因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的纷争结束后，罗马教廷对法兰西的态度与早期完全不同。

自格里高利七世以来，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们就像一团乌云堵在了教皇的地平线上。但随着康拉丁被处决，这团乌云终于被驱散了，而神圣罗马帝国却深陷内战之中，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十七年里，英格兰、西班牙和德意志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权纷争不断。尽管如此，胜负却一直未分出。最终，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伯爵[3]胜出。其间，鲁道夫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他想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稳固，最好把教皇当作朋友而不是敌人。鲁道夫早期的行动之一就是批准与罗马签订的一份协定，撤销腓特烈二世提出的针

对罗马教廷的领土主张，承认教皇为主要联盟者，承认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的查理伯爵是普罗旺斯伯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

从此，意大利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扰，但仍深陷于教皇党和保皇党的派系斗争之中，而且法兰西人的权力铁手像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专制权杖一样，力量强大，凌驾于意大利王国之上。西西里人非常不满法兰西人的高压统治，开始怀念腓特烈二世。无论腓特烈二世犯过什么错，他毕竟是在意大利南部出生和长大的，是西西里公主的儿子，而这些法兰西人则是残酷无情的陌生人，鄙视受到压迫的意大利人。

第3节　西西里晚祷

一名法兰西士兵当众凌辱一名巴勒莫女子，这彻底点燃了西西里人积压已久的怒火，从而引发了“西西里晚祷”事件。复活节那天是星期一，晚祷时分，西西里人屠杀了四千多名法籍居民，并把他们的尸体扔进一个露天大坑。面对法兰西所受的侮辱，安茹的查理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报仇。安茹的查理正准备行动时，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彼得三世[4]派一支庞大的舰队来救西西里人。接着，双方展开激战。尽管彼得三世战败，但由于法兰西不断受到教皇的威胁，再加上西西里人坚定地支持新盟友，阿拉贡最终获得了西西里的统治权，这标志着西西里终于从法兰西安茹家族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独立出来。

当时，罗马教皇马丁四世是安茹的查理的傀儡，抑郁而亡。他的继任者霍诺里厄斯四世思想独立，非常羡慕西西里人。他心里清楚，罗马刚挣脱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铁锁链，又套上了安茹家族的枷锁，这有什么用呢？他带着恐惧和猜疑凝视着那不勒斯国王，这位与法王有着血缘关系的国王[5]。



一名法兰西士兵当众凌辱一名巴勒莫女子，这彻底点燃了西西里人积压已久的怒火，从而引发了“西西里晚祷”事件

第四节　博尼费斯八世

教皇博尼费斯八世有时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教皇”，因为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统一世界的理想，随着博尼费斯八世的去世永远破灭了。1294年，教皇博尼费斯八世被推选为圣彼得教廷教主。1300年，他在罗马举行千禧庆典，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来自欧洲各国的朝圣者纷纷交纳供奉，观看这场绚丽的庆典仪式，但光彩夺目只是一种假象。

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对博尼费斯八世很冷漠。教皇颁布教谕《教士不纳俗税》，禁止神职人员向国王纳税后，爱德华一世立刻谴责英格兰教会此举非法。教会的土地和商品遭到大规模哄抢。英格兰主教不得不妥协，教谕也变成一张废纸。法王腓力四世的举动更粗暴。作为报复，他命令他的臣民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罗马进贡。

任何一个比博尼费斯八世聪明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他的失败表明

民族认同已经超越建立世界政府的理论，无论这个世界政府是什么形式的。但博尼费斯八世迂腐而固执地坚守着格里高利七世的理想。当他的使节与腓力四世发生争执时，他教唆使节公然反抗。腓力四世下令立即逮捕教皇使节，把大主教降级。博尼费斯八世严厉谴责，宣布要革除国王腓力四世的教籍，并废黜他，而腓力四世则以公开的暴力形式回应教皇的威胁。

腓力四世命一个叫诺加雷的人报复博尼费斯八世。诺加雷的祖父是一位阿比尔教教徒，被施以火刑烧死。诺加雷加入罗马坎帕尼亚地区仇视教皇的贵族群体。诺加雷和贵族们全副武装出现在博尼费斯八世居住的阿纳尼村，要求见博尼费斯八世。外面的武装人群高声喊道：“处死教皇！”

教皇在里面的接待室听到了外面的喊声，尽管他已经八十六岁，但毫无惧色。他身着教皇长袍，一只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手拿着圣彼得的钥匙，出来接见这些闯入者。诺加雷粗鲁地要求他退位，教皇回答道：“这是我的头，这是我的脖子。”“我像耶稣基督一样遭到了背叛，如果我必须像他一样死，我至少会以教皇的身份死。”此时，一个罗马贵族用铠甲手套打在教皇脸上，教皇应声倒地。要不是诺加雷阻拦，这位罗马贵族就要杀了教皇。诺加雷的任务是恐吓而不是谋杀教皇。接着，诺加雷与意大利人发生了争吵。愤怒的意大利人群一拥而上，诺加雷被迫逃走。

蒙受几个星期的屈辱后，这位骄傲的老人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本笃十一世宣布革除所有参与阿纳尼谋杀案人员的教籍后，也神秘离世。腓力四世虽没有直接嫌疑，但有谣言说教皇是被毒死的。为了找到新教皇，红衣主教们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最终，教皇在红衣主教中产生，他就是波尔多大主教，史称“克雷芒五世”。他在里昂加冕，后来再也没敢进入意大利，一直住在普罗旺斯的阿维尼翁。

接下来的七十年被称为“巴比伦之囚”。教皇们都受到法兰西的影

响，无力摆脱法王的束缚。



博尼费斯八世身着教皇长袍，一只手拿着十字架，另一只手拿着圣彼得的钥匙，出来接见这些闯入者



新任教皇在红衣主教中产生，他就是波尔多大主教，史称“克雷芒五世”

腓力四世立即利用这个法兰西籍的基督教领袖[6]来谴责圣殿骑士团，因为他一直憎恨和忌妒圣殿骑士团的强大组织和巨额收入。

十字军东征结束了，圣殿骑士团却活下来了，已经摒弃自我否定、与世隔绝的清修戒律，到处游荡，卷入世俗诱惑之中。因此，镇压圣殿骑士团是明智之举。但腓力四世不仅镇压他们，还残酷地对待他们。很多人被扔进地牢，被迫承认自己有罪。但仅承认错误还不够，很多主要首领在法兰西城镇的市场上被施以火刑烧死。教皇下令圣殿骑士团的收入由圣约翰骑士团接收，圣约翰骑士团现在仍然守护着基督教的前哨——罗德岛。但腓力四世把没收的大部分财产截流到自己的国库中。

腓力四世的确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因为王室领地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政府的开支，而且政府统治的领土不断增加。腓力四世曾尝试多种权宜之计弥补财政赤字，但收效甚微，比如不断贬值货币或征收加布尔，即商品销售税。该政策遭到臣民的痛恨，因为它非但没有鼓励商业发展，反倒造成了市场上商品价格上涨，阻碍了工业的发展。此外，征收作物税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交纳三倍的税款，首先是谷物税，其次是面粉税，最后是面包税。

比加布尔更糟糕的是腓力四世征收农业税的做法。他把收税的权力卖给一些投机者。这些投机者负责向政府交纳固定税额，然后不断压榨农民，获得高额回报。

第5节　腓力四世的统治

腓力四世的经济管理并不值得称颂。他不是一位有创新性的天才，但他的实干才能却使他完成了许多前任无法实现的计划。他和其他法王一样，憎恨而且不信任那些滋事的贵族。为了让贵族服从王权，他广开言路。腓力四世和路易九世曾引入少量律师进入王室法庭工作。



腓力四世不是一位有创新性的天才，但他的实干才能却使他完成了许多前任无法实现的计划

雇用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替代业余人员改善了政府管理。因此，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现代政府管理的雏形已经出现。政府进行部门划分，不同部门分管不同工作：御前议会的职责是给君主提供建议；纳金署负责处理经济问题；坐落在巴黎的最高法院每年至少巡回办案两次，每次两个月，负责审判和裁决。

巴黎议会听起来像英格兰议会，但后来除了获得记录王室法令的权利之外，它的工作完全是司法性质的，而不是立法性质的。法兰西

国民议会的职能与英格兰议会相似，由三级代表组成：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占法兰西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根本没有代表。

腓力四世几次召集国民议会，希望他的一些建议获得通过。但与英王爱德华一世时期的“模范议会”[7]不同，国民议会没有发展成立法议会，从而有效地监督法王的独裁统治。它的存在只是执行法王的法律，满足法王的财政要求，无论其要求是否合理。国民议会的缺点由两个原因造成：首先，议会只召开一天，所以没有空闲时间讨论具体的执行措施；其次，在投票通过税收法案时，阶级固有的自私性使三个阶级不可能联合起来支持改革。

一次，贵族和市民们联合起来拒绝交纳讨厌的加布尔，因为加布尔侵犯了这两个阶层的利益。腓力四世被迫屈服。但因为税收不充足，所以法军败于佛兰德斯。

佛兰德斯是法兰西的领地，佛兰德斯伯爵是法王的直属封臣。佛兰德斯伯爵造反，所以腓力四世将他关进监狱，然后废除他的封地。后来，腓力四世和王后骑马前往佛兰德斯。佛兰德斯现在直接效忠国王，因此，腓力四世认为他可以直接向当地居民下令。当地居民献上了精心准备的服饰和珠宝，惊艳了腓力四世和王后。

“我以为，法兰西只有一个王后，但在这儿，我至少看到六百个！”腓力四世的妻子不悦地说。但腓力四世具有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良机——他们不正是最适合征税的臣民吗？佛兰德斯人坚强、独立，经营内外贸易，获得财富。他们冒险反抗，不是因为关心伯爵的命运，而是因为不愿让法王像拔鹅毛一样压榨他们。



腓力四世的妻子

于是，库特赖战役爆发了。为了惩罚佛兰德斯人的傲慢，腓力四世亲自率军前往。但佛兰德斯人宣称，被征税的公民可以拿起武器反抗全副武装的封建军队，就像12世纪的米兰人一样。两年后，虽然挽回了败局，但腓力四世发现胜利的果实并不丰硕。接下来的几周，佛兰德斯人快抵挡不住军队进攻了。这时，一支平民军队集结起来袭击了王室营地。腓力四世仓促应战，最后被迫求和，结束了战争。

第6节　腓力四世驾崩

除了憎恨佛兰德斯人闹独立外，腓力四世对英格兰拥有吉耶纳公

国的统治权也非常不满，尽管这是他祖父路易九世心甘情愿承认的，但这让他感到不舒服，就像匕首插入他的心脏似的。他一直在等待收复吉耶纳公国的机会。英王爱德华一世卷入了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腓力四世趁机攻入吉耶纳公国，使用武力和计谋，控制了许多要塞。毫无疑问，如果他活着，他会收复南方所有省。他驾崩时年仅四十六岁。虽然他是对法兰西影响最深远的国王之一，却只有少数臣民悼念他。

---

[1]吉耶纳公国位于今法国西南部。1152年，阿基坦的埃利诺嫁给英王亨利二世后，吉耶纳公国就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1453年，法兰西王国占领吉耶纳公国。——译者注

[2]即法王路易九世。——译者注

[3]鲁道夫伯爵，即鲁道夫一世（1218—1291），哈布斯堡王朝的奠基人。大空位时期结束时，他当选为德意志国王。他多次征讨势力强大的波希米亚之主奥托卡二世，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4]彼得三世（1239—1285），阿拉贡国王（1276—1285）和西西里国王（1282—1285）。1282年西西里晚祷事件后，彼得三世接受西西里人的邀请，就任西西里国王。但法兰西籍教皇马丁四世却革除了他的教籍，废黜他的王位。——译者注

[5]也就是安茹的查理。——译者注

[6]指教皇克雷芒五世。——译者注

[7]英王爱德华一世以各种方法吸引骑士和市民代表进入议会，使议会的代表范围逐渐扩大。这时的议会已不再是类似于“贤人会议”之类的机构。1295年召开的由各郡、各自治城市和下层教士代表参加的议会，被称为“模范议会”。——译者注

第17章

百年战争

从1314年到1328年，腓力四世的三个儿子先后登基，统治法兰西，但随着最后一位君主查理五世驾崩，卡佩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查理五世的堂兄继位，史称“腓力六世”，瓦卢瓦王朝开始了。腓力六世宣称，古老的《萨利克继承法》规定，禁止女性继承土地所有权，因此他继位是合法的。腓力四世有一个女儿，叫伊莎贝拉，她嫁给了英王爱德华二世。他们的儿子爱德华三世抗议道，他比瓦卢瓦人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爱德华三世坚持认为，《萨利克继承法》可能禁止女人继承王位，但没有禁止她的遗产传给她的男性子嗣。

第1节　百年战争的起因

对《萨利克继承法》王位继承权的不同解释成为英法两国动武的直接原因。于是，两国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当然，百年战争爆发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约翰王当年被逐出诺曼底，后世之君从未忘记，也无法原谅，一直想雪耻。此外，腓力四世攻打吉耶纳公国，支持苏格兰人的独立斗争，也触碰了英格兰的底线。14世纪初以来，苏格兰人闹独立成为英格兰一切灾难的根源。

英格兰镇压苏格兰独立的战争失败了。之后，贵族叛乱，杀死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汲取了父亲的教训，迫切想与法兰西开战，不仅为了复仇和建功，还为了发泄满腔怒火以及在激烈的混战中杀死腓力六世。

爱德华三世骑上战马，奔向战场。他是宫廷的英雄，英格兰的骑士。正如他所想，中产阶级全力支持他的第一场战役。腓力六世禁止佛兰德斯人与英格兰人做生意，这激怒了他们。英格兰的羊是全欧洲最好的[1]。一旦失去英格兰的羊毛，佛兰德斯的纺织厂就会因缺乏原料而倒闭。在此之前，英王一直鼓励与佛兰德斯人进行贸易往来，甚至在某些城镇建立了市场，方便两国商人交易。现在，为了报复腓力六世，爱德华三世禁止出口羊毛，但与此同时，他向布鲁日和根特的商人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他们在诺福克郡定居，建立工厂。

佛兰德斯人当然无法接受目前的状况。大城市反对法王的声浪日益高涨。最后，一位极受欢迎的领导者——雅各布·范·阿特韦德，绰号“根特啤酒制造商”，站了出来。他通过发表煽动性的演讲蛊惑同胞。他说：“我们失去英格兰就无法生存。”他抛出很多商业观点来争取中间派，中间派正在为是否要违背效忠的誓言而摇摆不定。他还让人们相信，爱德华三世才是合法的法王。

叛乱迅速波及全国。1338年，爱德华三世实际发动战争时，背后支持他的不仅有英格兰经营羊毛的农民，还有佛兰德斯大部分商人和工匠。他们都相信，如果爱德华三世赢得胜利，佛兰德斯就可以开放市场，与海峡对岸的英格兰做生意了。

百年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三世发起的反对瓦卢瓦王朝的战争，该阶段一直持续到1375年；第二阶段，在理查二世统治时期，两国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到了1415年，英格兰的兰开斯特王朝再次挑起战争。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战争的进程都是迂回曲折的。英格兰每次都是高开低走，最终

获胜的是法兰西。

英格兰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海战，这是英格兰等待已久的复仇。法兰西人曾骚扰英格兰南部海岸，并深入到索伦特，甚至火烧南安普敦等大城市。1340年6月，在斯鲁伊斯港附近，大约有两百艘英格兰船靠近法兰西舰队。船用铁链连在一起，围成四边形，对斯鲁伊斯港形成包围夹击之势。一些船的甲板上堆满了石头，罗列着掷石器，数百名热那亚弓箭手待命。当时，英格兰弓箭手远距离投射的精准性和稳定性在欧洲无人可及。这时，箭矢的呼啸声很快就迫使法兰西人躲了起来。英格兰士兵毫不费力就登上了法舰。

法兰西人开始恐慌了，其中不少陷入包围，无法逃脱。最后，两万五千名将士与大量军用物资葬身海底。

现在英吉利海峡被英格兰人控制，爱德华三世可以把军队运到佛兰德斯，但英格兰再也没有取得像斯鲁伊斯海战那样的胜利，战争变成了无休止的围攻。佛兰德斯人最初的热情冷却了，开始不喜欢英格兰人了，并指责雅各布·范·阿特韦德向爱德华三世提供资金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雅各布·范·阿特韦德矢口否认。一天，当他听到有人在他家门外的街道上高喊他的名字时，他跑到阳台上想要逃走，但暴徒已经破门而入，不容分说，就把他杀了。对爱德华三世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尽管他对盟友的遭遇感到愤怒，但他既无人力也无财力实施报复，因此，他决定开辟新战场，他的军队不仅在佛兰德斯，还在诺曼底和吉耶纳对法作战。



爱德华三世。他发起的反对瓦卢瓦王朝的战争



1340年6月，在斯鲁伊斯港附近，大约有两百艘英格兰船靠近法兰西舰队。船用铁链连在一起，围成四边形，对斯鲁伊斯港形成包围夹击之势

第2节　克雷西会战

爱德华三世在诺曼底登陆，然后向加莱进发。途经索姆河北岸的克雷西[2]时，他被腓力六世率领的军纪涣散的庞大军队赶上。

研究百年战争的著名学者让·弗鲁瓦萨尔说：“你必须知道，法军行进时并没有特定的编队。法王看到英格兰人时，热血就开始沸腾，他向将军们喊道，‘命令热那亚人前进，以上帝和圣丹尼斯的名义开战！’”

热那亚人是弓箭手。经过长途跋涉，现在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极不情愿地向前挪动。暴风雨淋湿了他们的弓箭，弓箭变得松弛，失去了威力。这时，太阳刚好穿过云层，闪着耀眼的光芒，刺得他们睁不开眼睛。英格兰弓箭手静静地等待敌人靠近，然后放箭。接下来，万箭齐发，射向那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落箭就像下雪一样”。

热那亚人彻底绝望了，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法王愤怒地喊道："杀掉这群乌合之众，他们堵塞了进攻的道路。"但英格兰人的怒火并未熄灭。很快，法兰西骑士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接替了热那亚人的位置。虽然他们骑马前行，但英格兰弓箭手射中了他们厚重铠甲的缝隙，他们纷纷落马。

克雷西会战再次向欧洲人证明旧式战法已经毫无优势。胜利不再属于穿厚重铠甲、行进缓慢的像座炮塔的骑士，而属于目光敏锐、身穿皮衣的弓箭手，或使用刀或矛的快速步兵。法军在克雷西作战时很勇敢，腓力六世的勇猛也无人能及，他的马都被射死了，但勇气不能抵消战术低劣。最后，腓力六世不得不下令撤退，留下十一名王子和一千多名骑士继续战斗。

克雷西会战失败后，法兰西王国又寄希望于加莱战役[3]。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经历漫长的包围战，法兰西王国最终放弃加莱。加莱成为英格兰海战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让·弗鲁瓦萨尔写道："英格兰议员们热爱加莱胜过世界任何一座城市，因为他们说，只要他们控制着加莱，他们就把法兰西的钥匙绑在了腰带上。"

第3节　黑死病

克雷西会战中，中世纪各种新式武器悉数登场，夺去了英法许多骑士的生命。现在，另一种夺命方式无关乎种族和信仰，以可怕的流行方式蔓延欧洲各地，深入宫廷和城堡，像无情的"大镰刀"扫过贫民窟和茅舍。它被称为"黑死病"，发源于远东某些地方，向西蔓延。所经之处，村庄甚至城镇悉数覆灭。据说，中国超过一千三百万人死亡，印度的人口也锐减，到了1347年，黑死病又席卷欧洲。有些感染者几小时后就毙命，大多数患者五天以内死去。当代作家这样描述，一些满载船员的船离开东方港口，几周后漂到地中海，被发现时，人

都死光了。城里的尸体实在太多，根本无处掩埋，就被扔到乡下的路边。农民认为是动物的死尸，就未在意。



克雷西会战再次向欧洲人证明旧式战法已经毫无优势。胜利不再属于穿厚重铠甲、行进缓慢的像座炮塔的骑士，而属于目光敏锐、身穿皮衣的弓箭手，或使用刀或矛的快速步兵



克雷西会战失败后，法兰西王国又寄希望于加莱战役。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经历漫长的包围战，法兰西王国最终放弃加莱



黑死病以可怕的流行方式蔓延欧洲各地，深入宫廷和城堡，像无情的“大镰刀”扫过贫民窟和茅舍

意大利、法兰西和英格兰也有同样骇人听闻的记录。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他的著作《十日谈》中描述道，佛罗伦萨的富贵人家从瘟疫

肆虐的城镇逃到没有城墙保护的庄园，然后讲述彼此的故事度日。这些故事成就了薄伽丘，他成为欧洲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实际上，没有多少富人可以逃离疫区。薄伽丘说："首先放弃别人生命的人，自己也不会得到别人的怜悯。"

所有疾病的根源都一样，黑死病主要在人口密集和环境肮脏的区域传播。勇气、奉献精神与私心都无法对抗这种可怕的灾难。薄伽丘说："成千上万的人感染这种疾病，因为没人愿意照顾他们，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死了。"法兰西南部的一位医生说："死者多于幸存者。"曾经兴旺的马赛港，因为死亡人数多，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法兰西一位作家写道："男女死亡率都很高，死尸太多，无法掩埋。"英格兰一位作家这样描述自己国家的情形，"瘟疫消灭了一个城市、城镇乃至一所房子内全部或大部分人口。"

黑死病的直接结果就是暂时终止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军队大幅减员。两国君主忘记了"荣耀""征服"这些词语，陷入了惊恐的沉思中，因为在黑死病面前，任何武器都无能为力。

另一个更持久的影响也随处可见，即城镇和乡村的秩序陷入混乱：地方官员、市政官员、牧师和医生都已死亡，无人可以替代他们；罪犯到处抢劫无人居住的房屋；曾经守法的居民，因为失去了管理，放任自流，只想在寻欢作乐中忘记过去和未来；工作几乎停滞，织布机闲置，船上没有货物，田地没有收获，也不播种；当农民受到谴责时，他们说瘟疫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劳动就是浪费时间。"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家具、食品和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翻了一倍，仆人的薪资也高得离谱。"

在黑死病流行的几年时间里，欧洲的劳动阶级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们是中世纪生活的基础，是封建社会金字塔型阶级的基础。现在他们人口减少，贵族们争相寻求他们的服务，因此他们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但当时的政府是为贵族和中产阶

级服务的，禁止给劳动阶级涨工资，农奴们只好离开雇主的家，去寻找条件更优厚的地方。现在，被压迫阶级不满足现状，一半人已经觉醒，向往自由和革命。但在中世纪，很少有国王体察民情，比如，爱德华三世在这方面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1355年，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王国重新开战。他希望通过胜利获得法兰西王国的赎金和战利品，使自己的钱包鼓起来。同时，一场炫目的胜利还可以麻痹英格兰臣民躁动不安的情绪。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率军在波尔多登陆，向吉耶纳挺进。英军和法军一样，都由雇佣军组成。朋友和敌人都害怕他们，因为他们在所经之处，不分青红皂白，践踏谷物和葡萄园，掠夺城镇，烧毁农场和村庄。

第4节　普瓦捷战役

法王腓力六世驾崩，他的儿子“好人”约翰二世继位。约翰二世继承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大胆、鲁莽而奢侈。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他绝不是一个好的统治者。让·弗鲁瓦萨尔描述道：“两军在普瓦捷相遇，约翰国王证明了自己是位优秀的骑士。事实上，只要四分之一的法兰西士兵勇猛作战，胜利就会属于法兰西。”

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法军人数众多，但从战役伊始就处于劣势。黑太子爱德华天生具有指挥才能。他命英军隐蔽在一个长满茂密葡萄树的斜坡上，娴熟的弓箭手待命出击。为了给主力部队开辟道路，约翰二世的骑兵向唯一的缺口冲去。他们遭到埋伏在附近的炮火袭击。两军陷入混战，英格兰骑士击溃法军侧翼。法军步兵纷纷逃跑。经过激战，法军大败，约翰二世及众臣被俘。黑太子爱德华取得重大胜利。让·弗鲁瓦萨尔说：“法兰西俘虏表现得坚贞不渝，至今受到后人尊敬。”当天晚宴上，黑太子爱德华等着他的俘虏——约翰二世，因

为约翰二世的表现比所有人都勇猛，所以授予他荣誉和花环。

法兰西悲惨黑暗的日子随之而来。骑士们无力支付法王和贵族的巨额赎金。为了筹措这笔钱，商人们必须日夜操劳，慢慢积攒，农民们必须忍饥挨饿，辛苦劳作，而处于休战期的雇佣军，每天还要消耗大量的粮食。

雇佣军中许多军官都曾经是臭名昭著的强盗，他们抢农民的羊、粮食和葡萄。如果农民拒绝交出他们要求的物品，就会被扔到火堆里，然后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受到折磨或杀害。这些可怜的农民得不到政府和领主的任何保护。事实上，领主和强盗一样残忍，他们竭尽所能地剥削农民。在国家遭难时，他们甚至过着比从前更奢侈、更享乐的日子。

法兰西贵族嘲笑农民道："呆扎克[4]背很宽，只有抽打他们，他们才会快点儿从钱包往外掏钱。"然而，当无法忍受压迫时，用让·弗鲁瓦萨尔的话说，农民们就像"疯狗"一样掏出刀子，他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改革的愿望，只想复仇。在农民暴动"扎克雷"[5]中，他们以牙还牙，折磨贵族及其家人。贵族们无助地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贵族的城堡被烧毁，家具和珍宝被洗劫一空，主人被活活烧死，妻子和女儿被侵害，孩子被折磨和屠杀。



经过激战，法军大败，约翰二世及众臣被黑太子爱德华俘虏



当天晚宴上，黑太子爱德华授予他的俘虏约翰二世荣誉和花环

这是法兰西历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但更可怕的是，法兰西并未从中汲取任何教训。贵族们很快就战胜了这些无组织的野蛮农民，然后进行同样的疯狂报复，给农民套上更沉重的枷锁。他们认为这是对付“疯狗”的唯一办法。但农民和贵族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会愤怒。法兰西农民在数个世纪暴政统治下积蓄的愤怒终于在1789年的革命中爆发，革命力量非常强大，犹如洪流不可阻挡。



贵族镇压“扎雷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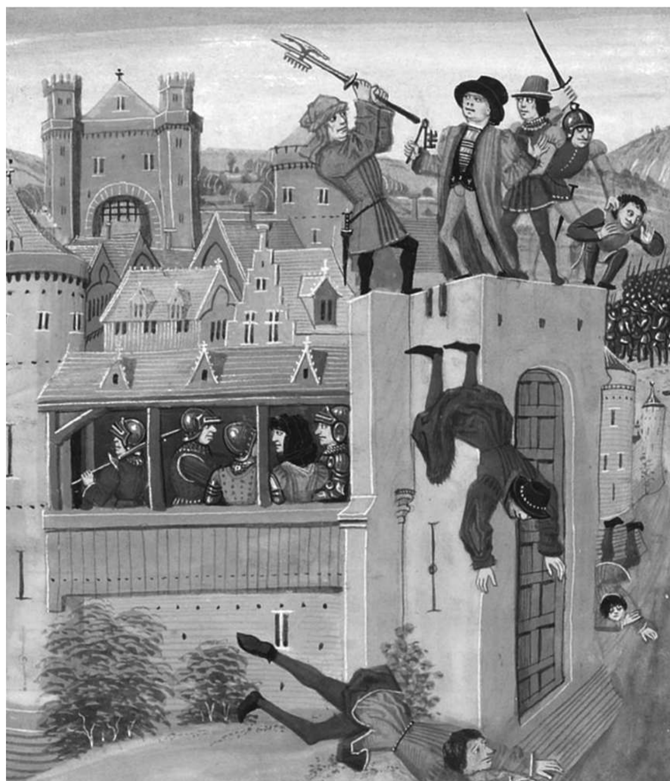
第5节　艾顿·马塞

不幸的是，农民付出的努力被巴黎中产阶级商人领袖艾顿·马塞领导的改革摧毁了。艾顿·马塞要求国民议会每年召开两次。这时，约翰二世已被英格兰囚禁，他的长子王太子查理摄政。艾顿·马塞请求王太子查理驱逐小人，罢黜佞臣，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提供建议供法王咨询。

王太子查理迫于公众的压力，佯装认可改革要求，但很快就露出真面目，重新任用他挑选的官员。艾顿·马塞非常愤怒，率市民冲进王宫，令武装人员抓住两名最可恨的大臣，然后拖到王太子查理面前。艾顿·马塞说：“杀了他们。”两名大臣蜷缩在王太子查理的脚下，紧紧地抓着他的长袍，但武装人员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们。

王太子查理对艾顿·马赛产生了持久的仇恨。也正是从这时起，艾顿·马赛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艾顿·马赛过度纵容农民造反。农民造反震惊了整个法兰西。为了与纳瓦拉国王“恶人”查理[6]结盟，共同对付王太子查理，艾顿·马赛承诺送给“恶人”查理巴黎城门的钥匙，从而换取他的支持。

艾顿·马赛的承诺是致命的，因为“恶人”查理完全不关心中产阶级的利益，只希望获得一些可以高价出售的机密。当王太子查理付给“恶人”查理足够的钱时，“恶人”查理立刻出卖了艾顿·马赛。他们设了一个陷阱。在为他的盟友打开巴黎城门时，艾顿·马赛被奸诈的盟友杀害了。随着艾顿·马赛的死亡，建立一个更自由、更负责任的政府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



为盟友打开巴黎城门时，艾顿·马赛被奸诈的盟友杀害了

事实上，整个法兰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消耗。两年后，法兰西与英格兰签署了《布勒塔尼和约》[7]，承认英格兰在吉耶纳公国、加莱及其西南部大片领土的统治权，并且取消过去一切引起争端的封建义务。作为回报，爱德华三世不再争夺法兰西王位。

第6节　《布勒塔尼和约》

法兰西似乎获得了永久和平。但实际上，只要英格兰想重开战端，所有和谈的成果就会化为乌有。王太子查理继承王位后，轻轻扇动着政治风向，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局面，他从一个胆小、易怒的年轻人，普瓦捷战场上的一个逃兵，成长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在他的努

力下，法兰西王国夺回了失去的领土。他因此被称为“智者”查理。

英王爱德华三世和他的儿子黑太子爱德华公然藐视新法王，因为他不善于打仗。王太子查理虽然身体虚弱，像个学生，但他知道如何挑选精兵强将在战场上为他效力。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军官叫贝特朗·杜·盖克兰。据说，贝特朗·杜·盖克兰是那个时代最丑陋的骑士，最优秀的战士。他成了法兰西战场上乃至之后西班牙战场上对英作战的英雄。

随着西班牙战争的爆发，英格兰对法兰西南部的统治第一次动摇，这是由于已经成为吉耶纳公爵的黑太子爱德华听信了流亡的卡斯蒂尔国王佩德罗一世[8]之言造成的。为了寻求黑太子爱德华的帮助，佩德罗一世来到波尔多。他希望黑太子爱德华帮他夺回失去的王位。篡位的是他的异母兄弟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9]。也许是因为黑太子爱德华的曾祖父爱德华一世娶了普罗旺斯的埃莉诺，英格兰和卡斯蒂尔从而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也许是因为佩德罗一世承诺如果夺回王位，将赠给黑太子爱德华巨额财物；更有可能是因为黑太子爱德华得知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曾经得到贝特朗·杜·盖克兰的援助才登上王位，所以他马上宣布帮佩德罗一世恢复合法国王身份。

第7节　纳瓦雷特之战

1367年，黑太子爱德华率军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达埃布罗河附近的纳瓦雷特[10]。英格兰弓箭手娴熟的射术和黑太子爱德华的指挥才能再次碾压敌人。尽管西班牙军队人数占优，但他们盲目进攻，很快就被英格兰军队击溃。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逃跑，贝特朗·杜·盖克兰成为阶下囚，佩德罗一世成功夺回王位。

佩德罗一世现在对与黑太子爱德华的结盟追悔莫及。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大批英军士兵生病，因病死而减员的数量甚至超过了阵

亡。佩德罗一世许诺的钱也落空了。实际上，狡猾的佩德罗一世残杀战俘后，就溜之大吉，当国王去了。黑太子爱德华只靠书信与他联系，几乎没有捞到好处。他郁郁寡欢，疲惫不堪，身体大不如前。他率领饥肠辘辘的军队返回波尔多，因为钱财耗尽，不得不解散军队，任由他们蹂躏法兰西南部，而他为了充盈国库，对吉耶纳横征暴敛。



在纳瓦雷特之战中，英格兰弓箭手娴熟的射术和黑太子爱德华的指挥才能再次碾压敌人

黑太子爱德华尽管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却不会治国理政。在百年战争早期，吉耶纳公国敌视巴黎，期望在远方的英王的庇护下确保自由。现在，吉耶纳公国饱受掠夺和横征暴敛之苦，很快就视英格兰统治者为外国暴君，因此就向“智者”查理求救。“智者”查理公开撕毁《布勒塔尼和约》，要求黑太子爱德华前往巴黎，解释其遭到指控的行为。黑太子爱德华回答道：“我很想按照你的意愿前去巴黎，但随我前去的还有六万大军。”

黑太子爱德华的话不过是一个垂死之人为挽回颜面所说的狂傲之

词罢了，他已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妄言。他的指挥权已被他的弟弟——毫无军事才能的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11]接管。1373年，冈特的约翰率军出加莱，沿途焚烧村庄，最后进抵法兰西王国的心脏地带。尽管一再深入，但英军没有遇到一个敌人，攻取城市时也没遭到抵抗。当法兰西王国愤怒的贵族请求作战时，“智者”查理回答道：“由他们去吧！焚烧得不到任何财富。尽管狂风暴雨在法兰西肆虐，但他们也消耗了自己。”

自《布勒塔尼和约》签订以来，“智者”查理一直谋划与他国君主结盟，孤立英格兰。同时他加强城市防御，为抵抗侵略做准备。冬天到了，冈特的约翰和他的军队既找不到食物，也得不到当地贵族的帮助，而且不断遭到流匪的伏击，死的死，伤的伤，最后一匹战马都没有了。冈特的约翰率残部艰难地撤退，终于回到波尔多。冈特的约翰输得很惨，葬送了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利益。

1375年，英法两国休战，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爱德华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法兰西只剩下加莱、瑟堡、布雷斯特、巴约纳和波尔多等沿海城镇。



“智者”查理

第8节　亨利五世

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正式宣布他为法兰西王国国王，但他拿不出任何合法的证据，只能用刀剑来争夺。于是，战端重启了。亨利五世是冈特的约翰之孙，篡位者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想通过一场战争提升兰开斯特家族的声望，盼着像大多数中世纪的君主一样为他的贵族们寻找用武之地。按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人类杀戮最好的借口就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尽管中世纪的人们对此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为了战争而战争”可能是中世纪英格兰的座右铭。英格兰发动战争的目的和借口放在现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中世纪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所以开战无所顾忌。在“智者”查理的统治下，法兰西王国

已经开始复苏，但进入他的儿子“疯子”查理六世时代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查理六世登基时只有十一岁，后来患上严重的精神病。宫里充斥着激烈的派系斗争，查理六世注定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他的威胁首先来自“百合花王子”[12]，其次来自为了各自利益而想控制宫廷和政府的贵族。不过，查理六世最可怕的对手是勃艮第家族和阿玛尼亚克家族。

阿玛尼亚克家族的核心人物是奥尔良公爵查理。他是查理五世的侄子，阿玛尼亚克伯爵的女婿。于是，他将自己的党派命名为“阿玛尼亚克派”。勃艮第家族的核心人物是查理五世的堂弟勃艮第公爵，被称为“无畏”的约翰，他继承了母亲在佛兰德斯的遗产，统治着英法两国之间的省份。“无畏”的约翰这一派被称为“勃艮第派”。

查理六世神志清醒时支持奥尔良公爵和阿玛尼亚克家族。当时，英王亨利五世在诺曼底登陆，围攻阿尔弗勒尔[13]。此时，控制巴黎的阿玛尼亚克家族派大军北进抵抗侵略。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只是袖手旁观，因为他一方面不愿帮助阿玛尼亚克家族，另一方面不想卷入与英格兰的战争，因为佛兰德斯非常依赖与英格兰的羊毛贸易。



“无畏”的约翰，勃艮第家族的核心人物

攻取阿尔弗勒尔后，亨利五世率军向加莱挺进，途经阿金库尔时遇到了法军[14]。法军在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接下来的战斗表明，在之前的战役中，法军没有汲取任何教训。法军的指挥官仍然是全副武装、骑在马背上、军纪涣散的贵族。10月的夜晚，法军在泥潭中无助地挣扎，既发动不了冲锋，也脱不了身，很快就沦为俘虏。这时，亨利五世收到虚假军情，说敌人的援军快要到了。因此，他下令杀死全部战俘。当他发现报告有误时，命令已经执行。这场大屠杀非常惨烈。

兵败阿金库尔与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憎恨阿玛尼亚克家族的群众怒气冲天，高喊着“勃艮第与和平”的口号，发动了叛乱。不过，叛乱很快被镇压了。1418年，“无畏”的约翰成功进驻巴黎。当时，亨利五世获胜后回到了英格兰，现在再次返回征服了诺曼底公

国。得知诺曼底公国的旧都鲁昂已向英军投降时，法兰西人愤怒至极。

一直不愿与英格兰交战的“无畏”的约翰也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英军进一步侵犯。英格兰人提出许多不合理的要求，导致“无畏”的约翰看好的和谈破裂。于是，“无畏”的约翰建议与阿玛尼亚克派结盟，这样一来，如果必须参战，至少可以表明法兰西王国众志成城。

这是法兰西王国复兴的时刻。这时，阿玛尼亚克派奉“疯子”查理六世之子查理为尊。王太子查理回应了“无畏”的约翰抛出的橄榄枝，同意在蒙特罗桥会面，修复两派裂痕。为了表示服从和善意，“无畏”的约翰跪下亲吻王子的手。就在这时，一名愤怒的阿玛尼亚克党人冲上前，用匕首刺死了勃艮第公爵。惊恐的勃艮第人抬走“无畏”的约翰的尸体，他们认为这次事件是有预谋的，因此发誓再也不效忠“伪太子”了。

第9节　《特鲁瓦条约》

1420年5月21日，英法签订了《特鲁瓦条约》。条约规定，亨利五世迎娶“疯子”查理之女瓦卢瓦的凯瑟琳[15]，法兰西王国王位的继承权归亨利五世。

两年后，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先后驾崩。法兰西王国分裂为两个阵营：其北部和东部承认亨利五世和瓦卢瓦的凯瑟琳之子——年幼的亨利六世为统治者；其南部和西南部则承认瓦卢瓦的查理七世。

《特鲁瓦条约》划分了百年战争第二阶段法兰西王国的权力归属。尽管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大获全胜，接着稳步向南推进至阿玛尼亚克，但英格兰的影响力渐渐减弱。阿玛尼亚克家族签订的《特鲁瓦

条约》使英格兰获得了法兰西王国王位的继承权，这被法兰西人视为奇耻大辱。法兰西人一方面仇恨阿玛尼亚克家族，另一方面不齿于效忠外国君主。



亨利五世因收到虚假军情下令杀死全部俘虏，酿成了惨烈的大屠杀



在蒙特罗桥与王太子查理会面时，“无畏”的约翰被一名阿玛尼亚克党人刺死

当王太子查理成为法王查理七世，他不再只是一个因谋杀了勃艮第公爵而名誉扫地的派系领袖，而是成为具有号召性的人物。因为他不敢去巴黎，一直待在法兰西中部的小镇布尔日，所以他的敌人轻蔑地称他为“布尔日国王”。尽管如此，他仍然是国王，是一个法兰西人。如果他勇敢、大公无私，愿意承担风险，发挥才能，而不是与自己的亲信混在一起消磨时光，他完全可以加速英格兰溃败的进程，但他荒废朝政，不关心公事，任用佞臣，而佞臣阻碍了他与勃艮第派的和解，从而推迟了拯救法兰西的进程。



王太子查理加冕成为法王查理七世，他从一个名誉扫地的派系领袖变成了具有号召性的人物

“无畏”的约翰之子“好人”腓力[16]憎恨杀死他父亲的凶手王太子查理，但也不喜欢他的英格兰盟友。通过联姻和外交，现在荷兰的大部分领土都进入他的彀中。“好人”腓力本以为自己能和英王平起平坐，但现在他沮丧地发现，英格兰可能会永久地控制海峡两岸。只要亨利五世之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17]在法兰西摄政，就还能维持表面上的友谊，但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很难与他那个在英格兰摄政、好争吵、无责任心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18]意见一致。这时，巴黎民怨沸腾。巴黎人因为长期战争而饱受饥饿之苦。他们认为，外国君主是引起所有问题的根源。

只有驻守法兰西北部的英军还在忠心耿耿地履行职务，当时的一

位历史学家说：“两百个英格兰人可以驱赶五百个法兰西人。”但拯救法兰西的力量已经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这位历史学家可以自豪地加一句：“现在两百个法兰西人可以追赶、暴打四百个英格兰人。”

第10节　圣女贞德

15世纪初，上默兹的多雷米村住着一个叫贞德的少女。根据一位村民的描述，她谦虚、简朴、虔诚，爱去教堂，平时播种、锄地、做家务。十三岁之前，贞德像其他女孩一样无忧无虑，但后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她似乎听到了召唤的声音，看到了教堂画像中灿烂的云彩之后圣凯瑟琳和圣迈克尔的真身。



简朴、虔诚的贞德看到圣凯瑟琳和圣迈克尔的真身

当被问及圣人的外貌时，贞德说：“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接着，她承认起初她很害怕，但后来他们安慰她，并带给她神谕。用贞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做惊天动地之事，因为天主选择她来帮助法王”。

贞德没有歇斯底里地幻想。她心里很清楚，她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女孩，被召唤去拯救法兰西的想法多么荒谬可笑。有一段时间，她试图忘记那些传递给她的神谕，但最终上帝赋予了她拯救法兰西的使命，而这次她很执着。即使是她愤怒的父亲和胆小的朋友也

无法阻挡她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11节　1429年的法兰西

十七岁时，历经艰难险阻的贞德终于和法王查理七世站在一起了，因为篇幅有限，就不在这里详述了。贞德坚持战斗的消息已经远播异域。查理七世在灯火辉煌的城堡大厅里召见了她。他衣着朴素，与穿长袍的大臣们站在一起。大家都认为这个农村女孩会手忙脚乱。然而，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这个一直住在安静小村庄，连国王画像都未见过的女孩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立刻认出了那个与她的使命息息相关的人，然后径直走过去说："我尊贵的主人，我奉上帝的旨意来帮助你和你的国家。"

贞德的简单、直率与朝廷腐败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动了查理七世。经过主教的询问和批准，贞德获准率法军去解救被英军围困的重镇——奥尔良。贞德全副武装，手握长剑和旗帜。与她同行的人都感到了她必胜的信心，受到了她的勇气和信念的感染。

我们常说骑士精神是中世纪的典范，国王、公爵、骑士是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展现出勇气、礼貌和教养。然而，在现代人眼中，这些品质似乎已经"褪色"，因为骑士英雄绝不会为自己的残酷、自私或势利而感到羞耻。法王约翰二世宁愿死在外国的监狱，也不愿意违誓逃脱，但他却会骑马轻蔑地踩踏那些因疲惫不堪而战败的弓箭手；黑太子爱德华会像仆人一样等待他的囚犯，但对待其他人却像佩德罗一世一样残暴。譬如，里摩日人反抗他，他就悉数屠杀了城中的老人和小孩。

然而，这个拯救法兰西王国的农村女孩身上没有骑士的恶劣品质。她的行为虽然像黄金一样珍贵，却不夹杂一点儿自命不凡。贞德和普通女孩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显得很可爱。受到欺骗时，她很容易

生气，也很容易被安抚。她对士兵和国王一样友好，但从未丧失尊严。在我们知道的所有中世纪骑士中，贞德是最勇敢的。她也知道什么是恐惧，经常祈祷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从不逃避战斗，面对危险镇定自若。她身材苗条，深色短发，目光炯炯有神。哪里战斗艰苦，她就去哪里。她总是很快乐，充满朝气，胜利时欢欣雀跃，对待敌人慷慨仁慈，对待伤者和战犯充满怜悯。



全副武装、手握长剑和旗帜的贞德

同胞们一看到她，就士气高昂。面对她的“超自然”能量，敌人恐慌不已，称她为“女巫”，发誓要烧死她。

一位当代作家描述了贞德的一次作战场面，“她突然转身。看到

前面的英格兰人后，她就带几个人迎上去。英格兰人仓皇逃进防御工事，法兰西人这才返回。”

解了奥尔良之围后，在贞德的鼓励下，查理七世既不太情愿又半信半疑地进攻兰斯，接着在那里加冕，让所有的法兰西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国王。贞德建议，加冕仪式结束后立即进攻巴黎，但查理七世的亲信惧怕她的影响力，不断向查理七世进谗言。查理七世开始迟疑和犹豫了。法军进至塞纳河时，发现所有的桥梁都已被毁，这不是撤退的英格兰人干的，而是背叛的法兰西人干的。

巴黎人已经做好准备。只等着贞德与英格兰驻军交战，就打开巴黎的城门。这时，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在北方镇压叛乱，但查理七世紧抓断桥的借口，向南撤退，解散了军队，把防御任务交给了贞德。

上帝的声音警告她，她会被俘，然后被处死，但她的使命是拯救法兰西。她听说勃艮第公爵计划进攻重镇贡比涅，就率领少量军队去防守。最后，在城墙下突围时，她被英军俘虏，但她拒绝投降。她说：“我已经起誓，并将信仰交给了上帝，我必须遵守自己的誓言。”接下来的几个月，她被关押在鲁昂的一个昏暗城堡里，受尽折磨和侮辱，但她保持忠贞，对敌军的首领说：“我的国王是最高贵的基督徒。”



在贞德的鼓励下，查理七世既不太情愿又半信半疑地进攻兰斯



在查理七世的加冕礼上，贞德精神奕奕、充满朝气，展现出勇敢无畏的勇士精神



贞德虽已被关押在昏暗的城堡里，但仍保持忠贞，向敌军首领表达自己对查理七世的忠心

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其中一些是主教、教士和巴黎大学的律师——经过滑稽的审判后，以异教徒的罪名将贞德在鲁昂市场烧死。她就义时就像之前一样勇敢，祈求圣徒宽恕她的敌人，原谅他们对她所做的恶事。当代一位作家说："她没有留给世界遗物。英格兰人把她的骨灰扔进了塞纳河。"

出卖了贞德的法兰西，不需要贞德留下任何遗物来缅怀她。现在人们称她为"圣女"，因为她的确带给法兰西王国一个奇迹，那就是法

兰西王国多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几乎丧失信仰，而她却让民族自豪感回归。她说：“如果要与英格兰人和平共处，唯一可做的就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在贞德死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兰西王国完成了她从多雷米带来的任务——除了加莱还被英格兰控制外，所有的失地都被收复了。

总结百年战争时我们发现，英格兰人从一开始就打了一场失败的战争。财富、兵器、勇气和意志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使英格兰的征服暂时得逞，但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是无法战胜的，因为它是一剂长生不老药。随着“圣女”贞德的到来，形势改变了，英格兰征服者的浪潮迅速退去了。

1435年，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去世。同年，查理七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在阿拉斯与“好人”腓力签订条约后，他进入巴黎。更幸运的是，查理七世的对手——年轻的英王亨利六世没有继承他父亲的勇气和才能，却像他的外祖父[19]一样，是个精神病患者。亨利六世第一次患上忧郁症之前就是个傀儡。为了各自利益、以他的名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派系先后丢掉了诺曼底和吉耶纳。最后，矛盾被带回了英格兰。就像因果报应一样，英格兰也因玫瑰战争而陷入混乱。



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经过滑稽的审判后，以异教徒的罪名将贞德在鲁昂市场烧死

在查理七世的统治下，法兰西王国逐步摆脱了英格兰的控制，从中世纪开始向现代迈进。查理七世晚年时期，起用才干卓越的贤臣替代那些无所作为的宠信，加强了王权，恢复了财政信用，解散了军纪涣散的雇佣军，建立了由国王招募和指挥的正规军。

这些举措也遭到过反对。布拉格叛乱几乎涉及法兰西王国所有重要贵族，包括王太子路易。王室对他们的控制不断增强，他们试图反击，但最终没有成功，因为整个国家都实行君主集权制，君主集权制

虽然不完美，但在当时是保证法兰西王国复兴的唯一手段。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路易十一继承了查理七世的王位，他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为了实现作为独裁者的统治理想，他抛弃了支持他的各阶级的利益。

---

[1]这种羊价值很高，因此被禁止出口，以免别的国家得到这个品种。——原注

[2]1346年8月26日，克雷西会战正式打响。——译者注

[3]史称“加莱之围”，始于1346年9月4日，终于1347年8月3日。——译者注

[4]呆扎克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译者注

[5]1358年9月初，不堪压迫的农民揭竿而起，史称“扎克雷”（Jacquerie）。——译者注

[6]恶人查理（1332—1387），纳瓦拉国王（1349—1387）和埃夫勒伯爵（1343—1378）。曾参加过镇压扎克雷起义的军事行动。百年战争中，与英格兰结盟反对法王查理五世。他被查理五世彻底击败，放弃在法兰西的全部利益。——译者注

[7]1360年10月24日，英王爱德华三世与法王约翰二世批准《布勒塔尼和约》。——译者注

[8]佩德罗一世（1334—1369），卡斯蒂尔国王和莱昂国王（1350—1369），伊瓦里亚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争夺王位的过程中，他被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所杀。——译者注

[9]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即亨利二世（1334—1379），特拉斯塔马尔王朝的开国之君。1369年，他打败了同父异母的兄弟佩德罗一世，成为卡斯蒂尔国王和莱昂国王（1369—1379）。后来，他参加费迪南战争和百年战争。——译者注

[10]1367年4月3日，纳瓦雷特战役打响。——译者注

[11]冈特（Gaunt）的约翰（1340—1399），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三子，黑太子爱德华之弟，理查二世之叔，封兰开斯特公爵。理查二世登基时年幼，冈特的约翰摄政。——译者注

[12]“百合花王子”，也称“戴百合花的王子”，是古希腊克里特岛著名的米诺斯壁画，壁画创作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550年。这里指查理六世的兄弟们。——译者注

[13]史称“阿尔弗勒尔之围”（Siege of Harfleur）。阿尔弗勒尔之围始于1415年8月18日，终于1418年9月22日。——译者注

[14]史称“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于1415年10月25日爆发。——译者注

[15]瓦卢瓦的凯瑟琳（1401—1437），法王查理六世和伊莎贝拉王后的长女，嫁给英王亨利五世，生亨利六世。——译者注

[16]“好人”腓力（1396—1467），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之子。“无畏”的约翰遇害后，他继承了勃艮第公国。他因政治改革而闻名。通过战争与结盟等手段，他巩固和扩大了勃艮第的势力。他也是杀害圣女贞德的罪魁祸首。——译者注

[17]贝德福德公爵约翰（1389—1435），英王亨利五世之弟，百年战争期间英军的主要将领，也是亨利六世登基后英格兰在法兰西的摄政。——译者注

[18]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爵汉弗莱（1390—1447），亨利四世最小的儿子，亨利五世之弟，亨利六世之叔，担任亨利六世在英格兰的摄政。——译者注

[19]指法王查理六世。——译者注

第18章

中世纪的西班牙

西班牙为地表起伏最剧烈的国家。西班牙山脉纵横，被切割成不同的区域，形成完全不同的气候状况和土壤条件。西班牙的河流也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河流很不相同。譬如，莱茵河和多瑙河是连接友谊和商业的通道，而西班牙大部分河道是无法航行的。河水在陡峭的山涧倾泻而下，阻碍了各地的交往。

因此，地理因素在中世纪西班牙历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罗马人、汪达尔人、西哥特人和摩尔人轮番征服欧洲，但他们的征服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西班牙大山中的避难所是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而这也造就了西班牙人的独立精神，就像意大利人一样，他们介绍自己时，首先不会说我是西班牙人，而会说我是布尔戈斯人、安达卢西亚人，或者巴塞罗那人。

在瓜达莱特，打败西哥特王国君主罗德里戈和他的基督徒军队[1]后，摩尔人发现征服西班牙南部和中部易如反掌。他们轻而易举就攻取了很多富裕城镇。西哥特贵族们本应该奋起抵抗，但内讧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纷纷逃向北方的利昂山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而留下来的底层人民很快就迎来了新主人。

摩尔人的政策规定，只要奴隶公开承认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先知，就可获得自由，而拒绝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只要缴纳人

头税也可以安定地生活，穆斯林则免税。

第1节　科尔多瓦哈里发国

摩尔人的王国的首都或者说哈里发国的首都科尔多瓦，在之前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攻克科尔多瓦的摩尔人认为他们感受到了真主的激励。在夜色的掩护下，摩尔军队潜到城墙附近。这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风雨声遮盖了逼近的马蹄声。一位摩尔军官从背叛的牧羊人口中获知防御工事的薄弱部分。他悄悄爬上一棵无花果树，放下他的长头巾，帮助其他同伴爬上来。他们一同制服了守门的将士，然后打开大门，让主力大军入城。

西班牙人几乎是在睡梦中被击败的，科尔多瓦沦陷了，摩尔人统治了西班牙，这让他们蒙羞了。然而，这些成就了巴格达神话的人，用他们的奢侈和华丽赢得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羡慕。当读到装饰着黄金和宝石的宫殿，种满石榴和杏的树林，美丽的花园和芳香的喷泉，没有围墙的驿舍，我们仿佛回到了爱恨交织的东方童话故事里。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无序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尔人统治的西班牙发展迅速，理学、植物学、代数和算术等学科的研究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被中世纪欧洲忽视的、几乎要成为沙漠的干旱土地，通过运河引水灌溉而成为肥沃的平原，种植着稻米、糖料作物、棉花和橙子。数学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海上指南针出现了。科学的头脑与灵巧的手艺造就了托莱多和塞维利亚的钢刀、格拉纳达的丝绸以及巴伦西亚的陶器和天鹅绒。

然而，尽管知识应服务于商业，但摩尔人发展科学并不完全以实用为目的，或者认为只有带来物质财富的知识才值得拥有，因此，哲学、文学同科学一样拥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图书馆填满了哈里发从希腊和东方搜罗来的手稿。12世纪时，科尔多瓦的教授世界闻名，许多

基督教学生慕名前来，拜在他们门下。阿拉伯教授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基督学生学习的权威版本。

为了利益而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摩尔人宽容地对待其他民族的智者。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只有钱袋子像海绵一样能挤出钱的富有的犹太人才能得到基督教统治者的保护，但只要十字军到达或瘟疫爆发，犹太人就会受到侮辱、折磨或死亡的威胁，他们的房屋会遭到焚烧或洗劫。

狂热的基督徒几乎切断了犹太人所有的生路，犹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放贷。因为教会法律禁止放高利贷，所以他们的竞争者并不多。但犹太人又被指责为“吸血鬼”。为了稳定自己的经济地位，经常收取高额利息，他们因此被鄙视和憎恨。种种迫害使普通犹太人滋生了一些恶习，即傲慢、排外、报复基督教邻居。

只有在摩尔人的城市，如科尔多瓦，犹太人才可能成为杰出的公众人物。他们在医学内科和外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许多在西班牙居住的以色列人成为医生，他们在知识和技能上明显超过普通医生，而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们面临健康危险时，也会对犹太医生的医术感激不尽。

乍一看，这个幸福的国度似乎文明、舒适、宽容，其文化的影响一定会远播欧洲。但此时的西班牙也有黑暗的一面。



12世纪时，科尔多瓦的教授世界闻名，许多基督教学生慕名前来，拜在他们门下

随着摩尔王室的内讧以及各省埃米尔的纷争，摩尔人在西班牙南部和中部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走向衰落。

在北方，西班牙民族的发源地——阿斯图里亚斯，每个农民都认为自己是绅士或贵族；在利昂和纳瓦拉王国的卡斯蒂尔和巴塞罗那，曾经衰败的哥特人的后代发展为战斗民族。

西班牙人尽管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认为获得的每次胜利都有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但在被称为第一次“重新征服”的时期，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摩尔人的极度厌恶。西班牙人早期的斗争不是因宗教而起，而是为了获得独立。通常西班牙公爵或伯爵会联合一些友好的埃米尔共同对付基督教的敌人。西班牙最伟大的英雄罗德里戈·迪亚兹曾说过，“只要付给我钱，所有的国王都一样”。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典型的心声。

第2节　熙德

基督徒称罗德里戈·迪亚兹为“坎培多尔”或“挑战者”，但更多人称呼他的阿拉伯语头衔——赛义德或熙德，意思是酋长。熙德勇敢、慷

慨、自负、叛逆，他是卡斯蒂尔人，效忠利昂国王，有时会因为钱而为国王打一些不道德的仗。但当他被流放时，他对自己效忠的人产生了怀疑。于是，他毫不掩饰地远离了国王，开始为摩尔苏丹——萨拉戈萨打仗。

古老的历史书籍以及民谣可以看出，熙德深受部下爱戴。他派人告诉他的亲戚和朋友他被利昂国王流放了，然后问谁愿意和他一同流放，他的侄子阿尔瓦·芬兹回答道："熙德，我们都愿意和你一同穿越人迹罕至的沙漠和熙熙攘攘的城镇，永不背叛你。我们的骡子和马、财产和衣物你随时可用，我们永远是你忠实的朋友和奴仆。"大军都附和阿尔瓦·芬兹。

中世纪的西班牙人都很倾慕勇士，这也正是熙德的魅力所在。毫无疑问，当熙德手持提泽纳剑[2]驰骋战场时，没人能抵挡住他的勇猛进攻，这更加深了熙德与底层人民的友谊。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的英雄可能杀过很多人，但与法兰西王国的贵族不同，他不会鄙视底层人民，因为他是纯正的西班牙人，热爱所有的西班牙人。

当熙德被流放后途经布尔戈斯时，他把阿尔瓦·芬兹叫到身边，说："侄子，穷人没有像国王一样残害我们，我们也不能沿途骚扰他们。"一位老妇人站在门口说："做你想做的，祝你走运。"

熙德的"幸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谨慎，帮助他赢得了很多战役。有时，他与基督教国王和解，为国王而战；有时，他抛下土地，与摩尔人结盟。最终，熙德到达他的人生顶峰，在摩尔人的巴伦西亚建立公国，成为统治者。他非但没有假装向谁称臣，反倒放出豪言——他这个"罗德里戈"要去解放另一个"罗德里戈"丢掉的阿斯图里亚斯。

熙德的雄心并未实现，因为英雄也会失败。后来，正值他生病之际，摩尔人大举入侵。不久，他病入膏肓，无力再战，很快就死去

了。不过，最终他还是取得了胜利。忠心耿耿的追随者把他的尸体做了防腐处理，放在战马上，然后把提泽纳剑绑在他的手上，带他出城迎敌。熙德的遗孀没有悲哀和哭泣。她命令敲响教堂的钟声，吹响战场的号角，迷惑敌人。不知熙德已死的摩尔人惊慌不已，仓皇逃走。

尽管熙德取得了胜利，但巴伦西亚还是落入了摩尔人的手里。不过，巴伦西亚并没有忘记熙德，至今他还被称为“巴伦西亚的熙德”。

西班牙“重新征服”的第二阶段是基督徒的征服。这段时期被称作“十字军时期”。它开始的日期并不确切，一直持续到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12世纪时，基督教国家逐渐意识到与摩尔人的战争不可避免，这远比它们内斗更重要。这种意识逐渐强化，成为信念。当时，摩尔王国腐朽不堪，四分五裂，数个诸侯国割据。到12世纪末，来自北非强悍的柏柏尔部落的首领穆瓦希德推翻了摩尔人的统治，并暂时统一了各诸侯国。



熙德，他是个勇敢却叛逆的卡斯蒂尔人



格拉纳达于1492年沦陷

和穆罕默德早期的追随者一样，穆瓦希德对基督徒和犹太人充满敌意，而且这种宗教仇恨与日俱增。战争初期，穆瓦希德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十字军出征获得普遍支持。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认为，拯救西班牙的责任和拯救圣地的责任一样重大。他向欧洲所有国家发出募兵的呼吁，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一些年轻勇士积极响应。西班牙也成立了七个军事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地亚哥修会，它以圣

詹姆斯[3]的名字命名。圣詹姆斯的陵寝位于北部的孔波斯特拉，是朝圣者最喜欢参观的地方。

第3节　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

基督教军队穿越崇山峻岭到达纳瓦斯德托洛萨平原，与敌人决一死战。基督教军队的统帅是卡斯蒂尔国王“好人”阿方索八世。他十五岁加冕，曾经与摩尔人交过手。与他同行的盟友是纳瓦拉国王桑乔七世[4]和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二世[5]，他们分别指挥军队的右翼和左翼。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尽管基督国王和骑士都很勇猛，但基督教军队还是受挫了。阿方索八世痛苦地说：“我们必须战死在这里。”他决心战死沙场，但托莱多的大主教罗德里戈·希梅内斯回答道：“不，这是我们要征服的地方。”大主教手持十字杖，号召痛击敌人。于是，基督徒团结一致，最终把敌人赶出了战场。基督教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阻止了穆瓦希德的前进步伐，基督教国家又成了半岛的主导力量。

起初，在基督教国家的争斗中，纳瓦拉王国在法兰西王国的帮助下占据了优势，但后来这个处在比利牛斯山鞍部的山地小国失去了往日的风光。西班牙的注意力从法兰西转移到从摩尔人手中收复的失地上。葡萄牙王国宣布独立；卡斯蒂尔王国摆脱了纳瓦拉的束缚，与利昂联合；阿拉贡王国吞并了加泰罗尼亚省和蓬勃发展的巴塞罗那港。

第4节　“征服者”詹姆斯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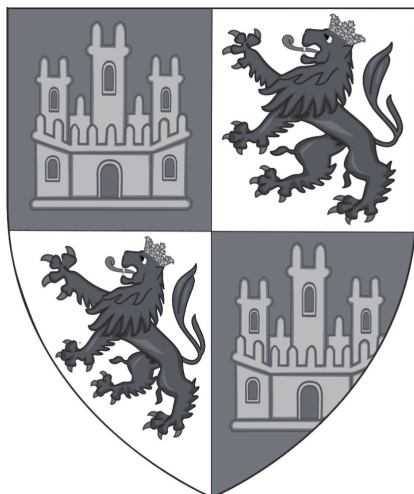
13世纪，阿拉贡王国最著名的英雄是“征服者”詹姆斯一世，他是佩德罗二世的儿子。在阿尔比派十字军战争中，为保护姐夫普罗旺斯

伯爵图卢兹，英勇抵抗西蒙·德·蒙福特的进攻，佩德罗二世不幸身亡。当时，詹姆斯只有六岁，被残忍的西蒙·德·蒙福特囚禁，但英诺森三世坚持让詹姆斯回国，并在圣殿骑士团接受教育。深受军事氛围熏陶的詹姆斯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战士，同时他是一位政治家，热爱文学。他用加泰罗尼亚语直白、有力地描述自己统治时期的历史。他鼓励他的臣民创作与普罗旺斯邻居共享的诗歌。

据描述，这位年轻的国王非常英俊，身高近七英尺，身材匀称。但不幸的是，他被彻底宠坏了。他生活放荡，脾气暴躁。尽管他平时慷慨仁慈，有时连死刑命令都不愿意签署，但一旦生气，情绪失控，甚至可能犯罪。史书曾记载，在一次战役中，詹姆斯一世发现一只燕子在帐篷的圆顶上筑巢，他说：“在燕子与它的孩子一起飞走前，士兵们不得骚扰燕子，让它信任我的保护。”



利昂国徽



卡斯蒂国徽



詹姆斯一世

詹姆斯一世集英俊的外貌、智慧和骑士精神于一身，激发了阿拉贡人无限的想象力，但他的战斗风格归根结底还是西班牙式的。他写道：“我的民族的命运不是在战斗中征服，就是在战斗中死亡。”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就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十字军战士。

多年后，詹姆斯一世长大成人可以独立治理国家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镇压那些有恃无恐的贵族。他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率军打败了摩尔人。随着他的征服，熙德控制的巴伦西亚最终回到基督徒的手中。

这时，摩尔人统治的王国只剩下南部的格拉纳达和穆西亚。虽然“智者”阿方索十世一直要求穆西亚的主权，但没有能力收复。

听到阿拉贡人在穆西亚取得胜利的消息后，“智者”阿方索十世问他的岳父詹姆斯一世能否帮他出兵攻打穆西亚。起初，阿拉贡人听了很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浴血奋战，而他人坐收渔利。

詹姆斯一世比他的臣民更有远见，他的看法有所不同：摩尔人的实力已经式微，但从前他们就与从北非涌入的大批新战士结盟，现在有可能再次结盟。詹姆斯一世敏锐地看到了事情的要害，说：“如果卡斯蒂尔国王失去土地，我们也不会安全。”1262年，他帮女婿出兵攻打穆西亚。

1262年，尽管阿拉贡没有获得新领土，但新纪元开始了。之前，詹姆斯一世和卡斯蒂尔人一样，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放西班牙上，但现在光复了穆西亚，他的周围都是基督教邻居，所以十字军需要解决的就只剩卡斯蒂尔了。此外，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早期，他也终结了阿拉贡的另一段历史：因为他父亲的败亡，他被迫将加泰罗尼亚主张的所有领土都割让给普罗旺斯。从此，祖先们梦寐以求的吞并法兰西的理想变得遥不可及。

那么接下来，阿拉贡胜利的武器应该对准哪里？詹姆斯一世，这位真正的阿拉贡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1229年，开始征服巴利阿里群岛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既不是北方，也不是南方，而是东方。当时，加泰罗尼亚的渔民和巴塞罗那的商人正在与马赛及意大利共和国争夺地中海的商业霸主的地位。阿拉贡国王很快就插手，用外交和武力支持商业发展。

第4节　阿拉贡的彼得三世

“征服者”詹姆斯一世并没有死于战场。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他身穿西多会修士长袍，在修道院隐居，为他年轻时的肆无忌惮、放浪形骸赎罪。他的儿子彼得三世遗传了父亲的军事才能。在彼得三世统治期间，阿拉贡王国开始征服意大利。

彼得三世终于找到了征服的借口，借口就是西西里王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合法君主康拉丁被弑。站在绞刑架下平静地等待死亡时，康拉丁将铁手套扔向臣民。这一举动意味着“报仇”。一位目睹了该场景的亲信迅速跪下，拿起铁手套，把它带到西班牙，交给彼得三世。彼得三世的妻子康士坦茨[6]，是腓特烈二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女儿，因此是西西里王国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后裔。



彼得三世，他继承了父亲“征服者”詹姆斯一世的军事才能

黜。



康士坦茨，彼得三世的妻子

彼得三世没有忘记铁手套及其传递的信息。当西西里人在复活节晚祷愤怒地杀了安茹暴君后，营救他们的正是彼得三世派来的船只，而彼得三世因公然反抗教皇马丁四世和法王腓力三世而被马丁四世废黜。

之后的几年，双方交手互有胜负。西西里和它毗邻的岛屿淹没在阿拉贡和安茹斗争的血雨腥风中，这是意大利的历史，而不是西班牙的历史，但这涉及卡斯蒂尔王国在意大利半岛的利益。

中世纪后期，卡斯蒂尔王国据有西班牙三分之二的领土，从北部的比斯开湾一直延伸到南部摩尔王国的格拉纳达。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卡斯蒂尔以城堡建国，但和英王斯蒂芬的城堡不同的是，不是为了盘踞乡下，而是为了抵御穆斯林的进攻。当然，那些住在前哨基地的人，夜晚随时会被唤醒，去突袭边境或者抵抗突袭，所以他们期望获得特殊酬劳。为了鼓励商人、骑士和贵族们在危险的南部边境上定居下来，国王以赠与豁免权和减免税收的形式提供了很多优惠，优惠的力度让欧洲许多君主望尘莫及。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十字军一到，前哨就不是前哨。当地居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过去拥有的特权和财富被剥夺了。来自摩尔人的危险逐渐减少，现在如果卡斯蒂尔人能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让政府意识到国家的需要和愿望，西班牙也许会成为欧洲的领袖。但不幸的是，普通的卡斯蒂尔人只想自私地享受自由带来的利益，而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承担更重的责任，因此，国家陷入了混乱。

对纯正的卡斯蒂尔人来说，战争的氛围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曾是十字军战士。在征服的土地上，卡斯蒂尔人无力与节俭的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农业和工业领域竞争。他们认为辛勤劳动是沦为奴隶的标志，这种谬论被广泛接受，成为西班牙最终灭亡的诱因。以辛勤劳动为耻，使西班牙背离了繁荣的道路，阻碍了贵族和市民的沟通。于是，贵族和市民无法在议会中达成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以辛勤劳动为耻的谬论更加深入人心了。随着基督徒失去了穆斯林这个敌人，贵族之间的战争就成了军事狂热分子的宣泄口。

战争期间，卡斯蒂尔国王很难发挥作用。尽管不像阿拉贡国王一样处处受法律的约束（在阿拉贡，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通过法律，大法官可以质疑国王的最高司法权），但卡斯蒂尔国王在实际中却受大臣们摆布。

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可以焚烧贵族的城堡，绞死城堡主人，从而为

王权至上铺平道路，但卡斯蒂尔的国王们几乎不可能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来对付那些通常比自己更富有的臣民。贵族的城堡是国家的要塞，贵族的仆人是基督教军队对抗摩尔人的主力。因此，卡斯蒂尔国王必须赋予贵族新的自由，并不断让他们得到回报，使他们发展成拥有土地和财富的诸侯。

第5节　《法典七章》

卡斯蒂尔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夸口道：“如果让我创造世界，我会把世界安排得更好。”然而，实际上，他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聪明。“智者”阿方索十世博览群书，钻研科学。他最杰出的贡献是他的巨著《法典七章》。这部书汇编了之前所有的西班牙法律条文，其中既有罗马人的，也有哥特人的，并用同一种文字起草。虽然在学术方面颇具天赋，但在生活中他是一个自负、优柔寡断、肤浅的人。例如，与妻子离婚后，他另娶挪威公主为妻。挪威公主到达西班牙港口时，他又决定把她送走，留下原来的妻子。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贯穿他之后所有的行动。

在“大空位时期”，“智者”阿方索十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竞争者之一，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气执行这项不明智的计划。于是，他增加了臣民的赋税。他还打算组建十字军，远征非洲，但又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对付难以驾驭的儿子们。除了学识渊博，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



“智者”阿方索十世，他博览群书，钻研科学

“智者”阿方索十世的统治成为卡斯蒂尔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内乱的序曲。其间，再没有国王可以被称作“学者”或“智者”。他们中有四个国王很不幸，幼年就继承了王位，因此贵族们乘虚而入，祸乱王室，从中获利。

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14世纪中期的一场斗争。西班牙的“尼禄”——暴君佩德罗，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的纷争。暴君佩德罗所犯的罪行数不胜数。譬如，他杀害亨利的母亲；平静地看着王室卫队追赶、砍杀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就是亨利的胞弟；命令他不喜欢的年轻新娘喝毒药。

黑太子爱德华很爽快地答应了来自比利牛斯山那边的暴君佩德罗的求助。暴君佩德罗会因为好杀而屠戮囚犯，会因为一位牧师预言他

的死亡而烧死牧师，会以极残忍的手段杀害大主教。他被描述为“疯子”。他的很多暴行没有什么意义，而他因为疏远忠臣，加速了他的倒台。当他的末日最终到来时，人们无比喜悦。据说，他被狡猾的贝特朗·杜·盖克兰所困，后被黑太子爱德华解救。

暴君佩德罗相信每个人都有价钱。他成为俘虏后，企图贿赂法军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贝特朗·杜·盖克兰佯装答应，将他引入军帐中。在那里，他见到了他憎恨的兄弟亨利和朝臣们。有人大声喊道：“看，你的敌人。”暴君佩德罗知道自己被陷害了，愤怒地喊道：“是我，是我！”然后，扑向亨利。他被亨利刺了一剑，接着滚在地上厮打成一团。后来，亨利摸到一支利器，接着重重一击。暴君佩德罗当场毙命。据古老的民谣记载，贝特朗·杜·盖克兰插话道：“我既不扶持国王，也不玷污国王，我只听命于我的主人。”他背对暴君佩德罗，让旁边的人把暴君佩德罗抬出去。如果故事可信，那么贝特朗·杜·盖克兰很忠诚，但他的游戏却不公平。国王没像骑士一样战死沙场，而是死于非命，所以人们没有表现出半点儿难过。



暴君佩德罗

取得胜利的亨利登上卡斯蒂尔国王的宝座，建立了特拉斯塔马尔王朝。几年后，阿拉贡王室的子嗣灭绝，王位传给了东部邻邦的斐迪南亲王。斐迪南亲王是一个具有成熟判断力的人，担任他的侄子——卡斯蒂尔王国的约翰二世的摄政时，就赢得了诚实、才干卓越的美名。



特拉斯塔马尔的亨利，他是特拉斯塔马尔王朝的建立者

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卡斯蒂尔王国，在半个世纪中深陷内战的深渊。约翰二世剥夺了他叔叔斐迪南亲王的监护权，整日沉迷于爱情歌曲的创作，对亲信阿尔瓦罗·德·卢纳[7]言听计从。据说，未经阿尔瓦罗·卢纳同意，约翰二世都不敢上床。这样的统治只会造成国内无休止的动荡。贵族们痛恨傲慢、权力无边的新贵，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控制王室，增加自己的收入。然而，约翰二世倒台和死亡后，竟没有一个好的政府来终结他的暴政。

第6节　卡斯蒂尔的亨利四世

在约翰二世之子亨利四世的统治下，卡斯蒂尔王国变得更糟。亨利四世不仅软弱而且邪恶，导致卡斯蒂尔王国丑闻迭出，陷入堕落的泥潭。卡斯蒂尔王国病入膏肓，回天无术。一位卡斯蒂尔人回忆起那时的“噩梦”说：“我们的宝剑不是用来保卫领土的，而是用来破坏国家的……国王崇尚暴力，公平和正义都被抛诸脑后。”

臣民们努力从这场灾难中拯救生命，挽回财富。城镇和乡村成立了兄弟联合会——逮捕和惩罚罪犯的武装群体。但兄弟联合会得不到国王的支持，所以没有能力对付罪大恶极的罪犯和有钱的贵族，因为这些人会用巨额贿赂和威胁等手段来掩盖他们的罪行。

第7节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

当卡斯蒂尔王国陷入无法自救的深渊时，亨利四世驾崩了，王位传给了他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个虽然上了年纪，但谨慎、有远见的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亨利四世一直给妹妹安排各种各样的婚姻，先后把她许配给法兰西的公爵、葡萄牙国王以及他的一位亲信，但伊莎贝拉都没答应。因此，亨利四世很不喜欢伊莎贝拉。事实上，伊莎贝拉早就秘密与她的堂弟——阿拉贡王储斐迪南结婚了。斐迪南是一位军事能力卓越和学识出众的年轻人。

于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成为卡斯蒂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联合统治者，很快就控制了西班牙，制服了势力最强大的反叛者，夺回了丢失的土地，组建了“神圣兄弟联盟”，并在以前的司法体系上成立最高法院来审理重要的抢劫和谋杀案件。西班牙人默许了这种威权，并且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厌倦了独立，独立滋生的是放纵而不是自由。

就这样，西班牙成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百年战争结束后法王路易十一建立的政体和玫瑰战争结束后英格兰的都铎王朝建立的政体，在西班牙也建立了。在专制统治下，西班牙失去了自由，但国内却实现了和平，而在国外获得的荣誉和功绩也高于预期。十字军与摩尔人无休止的战争一直牵动着欧洲人的心。现在，西班牙占领了格拉纳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个胜利让中世纪的人们喜出望外。



左：费迪南，他是一位军事能力卓越、学识出众的年轻人
右：伊莎贝拉，她是一个年纪虽大，却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一位热那亚冒险家传来消息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的西班牙王国非常富有，已经超越大西洋沿岸各国。这个奇迹令人难以置信。不久，斐迪南也实现了征服那不勒斯的愿望。

西班牙创造的辉煌属于近代史，不属于中世纪史的范畴，但就像幼年是成年的必经时期一样，西班牙成长为16世纪欧洲的第一强国，与其早期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料，西班牙成为了一个军事强国——傲慢、野心勃勃、虔诚地信奉基督教。西班牙致命的弱点是自负、狭隘，譬如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创建了残暴的宗教审判所，驱逐了成千上万节俭的犹太人和摩尔人。

西班牙是天生的征服者，但对所征服的国家，既没有给予同情，

也不懂治理，因此，通过勇气和蛮力建立的帝国注定不会持久。

---

[1]爆发于710年，史称“瓜达莱特战役”。——译者注

[2]根据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提泽纳剑是熙德所持的第一把宝剑。——译者注

[3]圣詹姆斯也称圣雅各（出生年月不详）。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军队占领西班牙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互争雄长。在基督教军队“重新征服”西班牙的运动中，圣詹姆斯成为代表性人物。他被西班牙人描述成是佩带利剑、身骑白马的勇士。——译者注

[4]桑乔七世（1154—1234），纳瓦拉国王（1194—1234）。1198年到1200年，他在非洲战场与穆斯林大军并肩作战，希望对抗卡斯蒂尔人。到了1212年，他又与基督教联军结盟，击败了穆斯林大军。——译者注

[5]佩德罗二世（1178—1213），阿拉贡国王（1196—1213）。他在位期间，赶走异教徒，扩张领土。1213年，他在米雷战役中阵亡。——译者注

[6]康士坦茨（1249—1302），也称西西里的康士坦茨，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的女儿，彼得三世之妻。——译者注

[7]阿尔瓦罗·德·卢纳（生卒年月不详），约翰二世的重臣，精政务，善征战。担任王室总管后，他使约翰二世免受叛乱贵族的威胁。1447年，约翰二世娶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为妻。伊莎贝拉与他的矛盾不可调和。1453年，卢纳被杀。——译者注

第19章 中世纪后期的中欧和北欧

第1节　鲁道夫一世

1273年，哈布斯堡公爵鲁道夫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这成为中世纪德意志历史的转折点。除了少数像腓特烈二世那样故意忽视德意志利益的皇帝，历代皇帝即使有心也无力终结德意志的混乱状态。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现在，这个魔咒终于被打破了。为了在阿尔卑斯山北部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位当选的皇帝愿意放弃统治罗马和伦巴底的荣耀。

鲁道夫一世当选本身就是奇迹，因为他的家族不太显赫和富有，只据有阿尔萨斯和瑞士山区的领土。而让现代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能影响选民选票，并建立伟大的哈布斯堡王朝的人却是霍亨伦索家族的成员。

鲁道夫一世参选时已到中年，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为人谦和，性格直率、果断。他因帮助属民对抗地方权贵不合理的要求而深受爱戴。当时，封建主教或贵族的城堡大多坐落于峭壁之间，他们经常派

遣武装家丁伏击过往的商人和旅行者。据记载，一次，鲁道夫一世率领一支看似人数不多的队伍进攻劫匪盘踞的要塞。鲁道夫一世挑衅劫匪。接近他时，劫匪惊恐地发现，每个骑在马上的人后面都藏着一名武装人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智谋上，劫匪都输了，有的被迫投降，有的仓皇逃跑。

鲁道夫一世当选皇帝后，非常有必要展示他的军事能力，因为当时中欧最强大的君主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2]拒绝承认他。奥托卡二世对自己没有当选，而来自瑞士山区名不见经传的伯爵[3]竟然成了自己的主人这一事实一直怀恨在心。事实上，奥托卡二世生性傲慢，脾气暴躁，所有选举人都惧怕他。后来，奥托卡二世在维也纳附近与鲁道夫一世交战时被杀。他年仅七岁的儿子瓦茨拉夫继承波西米亚王位。

这次战役的胜利只是哈布斯堡王朝好运的开始。此后，鲁道夫一世没收了对手的领地——奥地利的卡林西亚、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迅速扩张，成为最有势力的家族。不幸的是，随着成功的来临，鲁道夫一世变得无道。面对土地和财富，他欲壑难填。

为了阻止鲁道夫一世的侵夺，瑞士的封臣们不得不自卫，因为鲁道夫一世不再是他们的保护者。1291年，瑞士成立了一个叫“永久同盟”的自卫组织，几年后，同盟以简化形式起草的盟约，成为瑞士的神圣自由宪章，就像英格兰的大宪章一样。



奥托卡二世在维也纳附近与鲁道夫一世交战时被杀



瓦茨拉夫，奥托卡二世被杀后，他继承王位，被称为“瓦茨拉夫二世”



鲁道夫一世，他从一个为人谦和的伯爵变成一位欲壑难填的皇帝

盟约开头写道："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的全体人民看到现世的罪恶，庄严同意并宣誓，用我们的力量、生命和财富，在疆域内外相互帮助，相互守卫，只要敌人入侵，无论是谁，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抵抗。"

这是第一个"瑞士联邦"，由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三个省结成的联盟。同年，鲁道夫一世驾崩。所以，瑞士争取自由的斗争对准了鲁道夫一世之子——奥地利的阿尔伯特[4]。

鲁道夫一世尽管与教皇签订了协议，放弃对教皇领地的主张，但从未去意大利加冕，所以他死时的头衔仅是"罗马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选民以此为借口，没有让他的儿子阿尔伯特立即继位。

和奥托卡二世一样，阿尔伯特傲慢、专横、野心勃勃，父亲驾崩几年后，他攫取了整个家族的财产，没有留给已故的弟弟[5]的儿子约翰伯爵一点财产。阿尔伯特对自己想要做的事非常执着。第一次失败没能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他就积极交友结盟。他的策略非常有效。1298年，当皇位再次空缺时，他成功当选。

阿尔伯特的成功使他焕发了新的斗志。他现在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君主，但在瑞士山区自己的领地上，他的命令经常遭到市民和农民的抵制。瑞士人宣称，帝国已经允许瑞士独立。作为皇帝，阿尔伯特可以轻松撤回前任皇帝授给瑞士的特权，所以就派遣市政官去治理瑞士，使瑞士臣服于他的统治。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表现出了中世纪瑞士人的勇敢，揭开了瑞士为独立而斗争的序幕。

据说，在派遣的奥地利官员中，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是最受百姓痛恨的人。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心胸狭隘，憎恶农民建造石头房子，希望他们永远住在泥土房子中。他还利用一切机会羞辱和压榨农民。



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他心胸狭窄，深受百姓痛恨

第2节　威廉·泰尔的故事

一次，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在城镇集市的柱子上放了一顶帽子，让每个行人都向它敬礼。一个叫威廉·泰尔的人不知是故意还是没在意，并没有这样做。知道威廉·泰尔是弓箭手后，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命令他远距离射掉放在儿子头上的苹果作为惩罚。威廉·泰尔怎么哀求都没有用，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只是大笑。看到哀求没有用，威廉·泰尔抓起两支箭，一支直接射穿了苹果。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看到

威廉·泰尔成功了，恼羞成怒，疑惑地问，“第二支箭是用来做什么的？”威廉·泰尔犹豫要不要说。最后，他要求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保证不杀他才说。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同意了。威廉·泰尔坦率地回答道：“如果第一支箭射伤了我的孩子，第二支就会射穿你的心脏。”人群中响起了赞叹的声音。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非常生气，大声喊道：“没错，我是承诺不杀你，但我会把你关进地牢，那里暗无天日。”传说，尽管地牢守卫森严，但这位勇敢的弓箭手还是逃了出去，埋伏在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回城堡的必经之路的树丛后，射中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后马上逃走。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跌落马下，临死时说：“这是威廉·泰尔的箭。”威廉·泰尔因为勇敢反抗酷吏，成了瑞士的国民英雄。

对瑞士人来说，幸运的是，阿尔伯特因忙于国事而无暇讨伐反叛的诸侯。后来，阿尔伯特终于有时间回家乡了。到达哈布斯堡时，他被人暗杀了。暗杀他的人不是农民，而是他的侄子约翰伯爵，因为约翰伯爵认为阿尔伯特窃取了自己的遗产。



威廉·泰尔用箭直接射穿了他儿子头顶的苹果



威廉·泰尔因为触怒阿尔布雷希特·盖斯勒，被逮捕押入地牢



漫画：威廉·泰尔勇敢反抗酷吏。其中的魔兽喻指酷吏

制服瑞士的任务就落在了阿尔伯特的儿子利奥波德[6]公爵身上了。利奥波德公爵非常鄙视家乡的农民，他的军队在瑞士群山中漫不经心地游荡，毫无秩序，乱哄哄的就像热闹的狩猎宴会。士兵把俘虏的叛乱分子当作战利品捆绑在马鞍上。



利奥波德公爵，阿尔伯特的儿子

利奥波德公爵登上了莫加顿山冰雪覆盖的一侧。途中，他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高高的山脊间行进时，他发现自己进入了死亡陷阱，无数的石头和砖块从琉森山顶上像冰雹一样砸了下来。顿时，马儿惊慌失措，道路变得非常难走了。接着，手握长戟的农民从四面八方冲下来，在冰天雪地中消灭了利奥波德的主力。

利奥波德从战场上逃脱了，但他“神情恍惚，面如土色”。他的失败使瑞士独立前进了一大步。森林共和国[7]的核心地带很快就聚集了更多的人，他们众志成城，捍卫独立和自由。

第3节　“大胆”查理

为了争取彻底独立，瑞士继续战斗。其中，最重要的战役发生在

15世纪末。这次战役是为了反抗欧洲军事领袖勃艮第公爵查理。查理是百年战争后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好人”腓力的儿子。

“大胆”查理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战士。幼年时他就爱上了马上格斗。作为公爵继承人，他可以毫发无损地展示自己的骑士精神。即使在真正的比赛中，身披普通盔甲的查理也可以凭借力量和技巧夺冠。他身体健壮，性格勇敢而鲁莽。他非常好战，无惧危险，不怕艰辛。曾经为他效力的法兰西历史学家菲利普·德·科米纳写道：“我从未听他因劳累而抱怨，也从未见他流露出害怕的表情。”

“大胆”查理的致命缺点是脾气暴躁，缺乏耐心，总是低估对手的智慧。虽然他聪慧的头脑常常编织计划，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既没有谋略也没有政治远见，不能很好地把握时机。

像所有的中世纪勃艮第统治者一样，“大胆”查理面临的问题是，他的中部王国有着庞大的商业人口，既要考虑他们的贸易利益，又要实现自己的领土抱负。“大胆”查理统治着许多个省。对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言，他们可以挑拨查理的臣民造反，给他添乱，也可以与他联合镇压造反的臣民。

起初，“大胆”查理企图牺牲法王路易十一的利益，向西扩张领土。虽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胜利，但他逐渐发现，在外交上他不是那个精明的“蜘蛛国王”[8]的对手，于是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东部边境。

哈布斯堡家族的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9]卷入了与瑞士的冲突，最后被迫许诺给瑞士人一大笔无力支付的赔款。如果他愿意将阿尔萨斯和布列斯高抵押，“大胆”查理就借钱给他。西吉斯蒙德别无他法，只得勉强同意。偿还借款看似遥遥无期，“大胆”查理便开始统治阿尔萨斯和布列斯高了，就好像那是自己的领地似的。如果不是“蜘蛛国王”横插一脚，“大胆”查理很可能真的就吞并这片领土了。路易十一不

会原谅“大胆”查理抢走法兰西的领土，他现在要编一张网紧紧缠住“大胆”查理，直到最终消灭他。路易十一悄悄地告诉瑞士人，“大胆”查理这个邻居比“身无分文”的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更危险，然后建议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放弃哈布斯堡家族对瑞士领土的统治权，而瑞士人支付给西吉斯蒙德一笔钱。



“大胆”查理，他是个典型的中世纪战士，却也是一位缺乏政治谋略的统治者



法王路易十一，他因为诡诈、老练的外交手段，被称为“蜘蛛国王”



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曾是奥地利的统治者

最终，西吉斯蒙德和瑞士人达成了协议。“大胆”查理非常生气，要求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归还那片领土。“大胆”查理向法王路易十一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示好，取得了成功。因此，为了夺回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的领地而大举进攻时，瑞士人发现已经失去盟友的支持。

第3节　格朗松战役和莫拉托战役

一向高估自己能力的“大胆”查理相信现在他可以彻底摧毁这些自以为是的瑞士人。他率领一支约五万人装备精良的军队，携带可以把战场变成地狱的新型重型火炮，跨越汝拉山，向已经被瑞士人占领的格朗松[10]挺进。途中他停了下来，把所有的炮都悬挂在树上，没有上膛，好让叛乱分子明白他将怎么对付他们。听说八千瑞士军队已经在附近集结后，他又继续进军。

在种满葡萄的斜坡上，“大胆”查理可以看到瑞士人的先锋。他们张开双臂跪下，向上帝祈祷。“大胆”查理轻蔑地说：“这些胆小鬼我们包圆了。”然后下令立刻开炮。他原以为这些瑞士人会恳求他宽恕，但他们却跪下祈求上帝的帮助。瑞士人虽然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为了引诱他们离开阵地，“大胆”查理命令一部佯装溃退，但这引起了其他各部的误解。该部收到撤退命令时，听到瑞士军队吹响号角，就从所在的高地上快速冲下来。其他各部不知所措，很快“拔腿就跑，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旋风扫过地面一样”。



“大胆”查理在格朗松向瑞士人开炮，瑞士人虽伤亡惨重，但仍坚守阵地。最终，“大胆”查理因指挥失误，败给瑞士军队

瑞士人在格朗松战役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缴获了欧洲最富有、最奢侈的君主的丝质帐篷、行李车、地毯、佛兰德斯的蕾丝、精美的亚麻、珠宝、刺绣军旗和雕刻精美的武器。其中一些珍宝现藏于瑞士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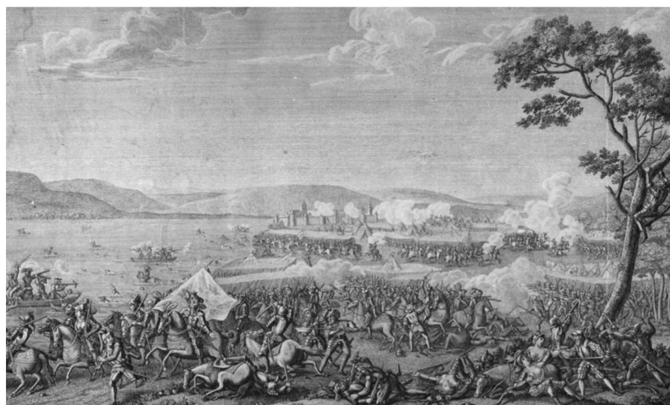
当时，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用骑士的语言评价道：“查理被一群乡巴佬打败了，颜面扫地。”这个耻辱坚定了勃艮第人继续战斗的决心，瑞士人也因格朗松大捷而信心倍增。



瑞士人在格朗松战役中取胜后，大肆掠夺勃艮第军营中的丝质帐篷、行李车、地毯和雕刻精美的武器等

在莫拉托战役[11]前夕，一位瑞士将军说："敌人的数量是格朗松战役的三倍，但大家不要灰心，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会消灭所有的敌人。"在莫拉托战役中，瑞士人徒手搏斗，给了勃艮第步兵致命打击。"大胆"查理和少数骑兵侥幸逃出战场。

第二次仍然战败，如果"大胆"查理是一位明智的君主，就应该考虑与对手和谈，而不是竭力证明自己比对手强，尽管对手是群乡巴佬。但"大胆"查理只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没有意识到他低劣的指挥才能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原因。他选择相信一个方便但勉强的借口——失败是因为运气差。他预言，只要坚持下去，运气就会改变。



在莫拉托战役中，瑞士人徒手搏斗，给了勃艮第步兵致命打击

佛兰德斯人开始怀疑他们君主的才能而不是他的运气，所以不愿意再投入新的战斗。于是，他们恳请“大胆”查理与对手和谈。一度被“大胆”查理的声名和财富迷惑的盟友也打算抛弃他，而“大胆”查理对各种暗示和传闻都置若罔闻。

在南锡[12]，“大胆”查理第三次遇到了瑞士人。乌里和下瓦尔登再次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勃艮第军队预感不妙，四处逃散。没人知道“大胆”查理怎么样了，直到有报告说，“大胆”查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力有不逮，最终被杀。后来，“大胆”查理的尸体被找到。他的盔甲已被卸走，半个身子嵌在冰冻的湖水里。

“大胆”查理死了，而他的敌人——瑞士人因此获得“勇士”的称号。在欧洲瑞士士兵至今仍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确保瑞士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了，欧洲各国不得不承认瑞士独立。其他地方的民主力量也公开活动了。我们前面提到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公社”都具有现代意识，这种意识是超前的。至少在意大利，公社已经结成强大的联盟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商业竞争和阶级斗争阻碍了这些联盟发展成联邦。

神圣罗马帝国南部也是如此，像奥格斯堡和纽伦堡这样的城镇，

已经成为连接东西欧的商业中心，也是威尼斯、热那亚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在经济利益上与地中海沿岸港口形成激烈竞争。在“大空位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无力维护这里的和平与秩序。于是，城镇的年轻人团结起来，与乡村的“害虫”——强盗作战，保护自己的财富。



在南锡战役中，“大胆”查理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力有不逮，最终被杀。找到他的尸体时，他的盔甲已被卸走，半个身子嵌在冰冻的湖水里

因此，一方面，以防卫为目的形成的联盟成为城镇早期打造的政治武器；另一方面，市民们渐渐意识到永久联盟还有其他优势，例如支持商业发展，维护政府稳定。这种观点虽然是有局限性的，却是中世纪的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些城镇为了从主教的束缚或贵族的高额赋税中解脱出来，不断抗争；一些城镇尽管拥有高度的商业自由，但不得不接受领主派来的行政官统治；另一些城镇拥有特权，完全自治，只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效忠。一个有头脑的皇帝也许会将这些利益相互冲突的城邦统一为联邦，从而有助于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但不幸的是，中世纪人们的思维陷入了谬论的泥潭，认为只有牺牲他人利益，才可确保自己的利益。

一个城镇憎恨和害怕另一个城镇繁荣，深信城墙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邻居，保护自己。比如，在对待沉船事件上，中世纪的人们的观

点与现代的互助观点完全背道而驰，他们会公开祈求上帝保护残骸，或者为了抢夺残骸，用石头袭击沉船上的水手和商人。这种野蛮行径在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城镇就时有发生，但这些城镇还掌握了一件“秘密武器”——合作，这恰恰是富裕的南方邻居缺失的。通过合作，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形成了闻名世界的政治力量。

第5节　汉萨同盟

一开始，汉萨商业同盟的成员涵盖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主要港口城市——吕贝克、但泽、不来梅和汉堡，后来，随着盟友相互支持、相互履行义务的价值被认可，成员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

中世纪的法律是个人化而非区域化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出国旅行，他不会受到目的地国家法律的审判或保护，而遵循的是本国法律，如果本国不存在相应的法律，例如在神圣罗马帝国“大空位时期”，在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们看来，德意志人的信誉尽失，于是，德意志商人几乎既无法自保，也无法保护自己的货物。

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诸侯们感到力有不逮时，汉萨同盟出现了。汉萨同盟成为各个城市[13]货物的海外集散地。同盟的永久成员可以代表曾经遭受过抢劫或暴力的商人向相关政府提出诉讼。



汉萨同盟贸易路线。汉萨同盟成为各个城市货物的海外集散地。这些城市主要包括伦敦、布鲁日、科隆、卑尔根、哥廷根、汉堡、吕贝克、法尔斯特布但泽、维斯比、诺夫哥罗德

早在10世纪，德意志商人就在英格兰市场获得特权，因为“无准备者”埃塞雷德二世[14]颁布的法典中有如下表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可以享受我国法律的保护。”

为了方便神圣罗马帝国的商人进行贸易，英格兰建立了类似佛兰德斯的货物集散地。汉萨同盟的商业活力使这些地方很快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这也许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但受到英王的重视。

汉萨同盟的商人在国外受到保护的机制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但享受特权的商人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货物运送到市场须经陆路和水路，但在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商人不仅害怕强盗，还害怕神圣罗马帝国的敌人。往东到俄国著名的尼杰诺-诺夫哥罗德市场洽谈毛皮油脂生意时，他们经常遭到斯拉夫部落的袭击，更危险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会穿过波罗的海或丹麦群岛击沉他们的货船。

汉萨同盟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捕鱼业。法律规定，每个基督徒必须在四十天的大斋期[15]禁食猪肉制品。因此，在每周五的斋戒

中，鱼肉就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对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最便宜的鱼是咸鲱鱼。鲱鱼迁徙时，给沿岸城市带来了财富。从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波罗的海成了北海鲸鱼的避难所，因而造就了吕贝克的繁荣，但当鲸鱼游往荷兰海岸时，吕贝克的繁荣也被带走了。



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波罗的海成了北海鲸鱼的避难所，因而造就了吕贝克的繁荣

每年有两个月，数以百万计的鲸鱼游过斯科纳海岸附近的狭窄海峡[16]。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渔民们会撒网捕鲸，这给汉萨同盟造成了麻烦。因为斯卡尼亚位于现在瑞典最南端，当时是丹麦的一个省，而丹麦人是战士不是商人，他们非常憎恨德意志人。

第6节　中世纪的北欧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北欧海盗的家园，诺曼人是世界征服者的始祖。当年，克努特[17]统治了英格兰、挪威和丹麦。诺曼人从未忘记自己的远大理想。在百年战争中，丹麦国王瓦尔德玛四世就打算通过远征英格兰来帮助他的盟国——法兰西王国，但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突发的政治事件缠住了他，所以远征计划最终搁浅。

瓦尔德玛四世继承了祖先挪威海盗的无耻、不安分，这使他的臣民疲惫不堪。这种品质有时会带给他胜利，但更多的时候是灾难。心怀不满的丹麦人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休息、睡觉。市政官必须时刻努力工作，否则就可能失去国王的宠信，甚至生命和财产。”因为瓦尔德玛四世固执，所以被戏称为“又一天”，因为他常说：“总会有时间完成任务的。”

瓦尔德玛四世最大的野心是使丹麦称霸北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寻求与挪威、瑞典结盟，避免卷入战争。瓦尔德玛四世憎恨、鄙视汉萨同盟。1361年，在敌意的驱使下，瓦尔德玛四世发动了战争。他向将士们保证，带他们去金银遍地的地方，那里的猪槽都是银制的。这个地方就是哥特兰岛[18]的首府——维斯比。在神圣罗马帝国北部商人的经营下，维斯比成为波罗的海繁荣的渔业中心。因为没有料到瓦尔德玛四世的进攻，所以维斯比的四十八座塔被焚烧和洗劫。

哥特兰岛属于瑞典，所以汉萨同盟无权报复。不过，汉萨同盟认为，瓦尔德玛四世的行动损害了它的商业利益。于是，汉萨同盟派舰队前去支持瑞典和挪威。这造成汉萨同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因为瑞典和挪威没有派兵接应，所以汉萨同盟的兵力处于劣势，舰队很快就被击败、摧毁。



1361年，在敌意的驱使下，瓦尔德玛四世对波罗的海繁荣的渔业中心——维斯比发动战争

瓦尔德玛四世因为胜利而喜出望外，决心彻底打败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德意志人，继续他的扩张政策。不过，他犯了一个政治错误。许多城镇，尤其是非波罗的海沿岸城镇起初对他的入侵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因为他们既不愿意为庆祝胜利而纳税，也不愿意为失败做经济补偿，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丹麦不断进攻已经威胁到汉萨同盟的生存，于是新的舆论出现了。1367年，反对瓦尔德玛国王的会议在科隆举行。会议要求每个城镇必须为反抗瓦尔德玛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宣布："任何拒绝向汉萨同盟提供帮助的城市，其市民和商人不得再与汉萨同盟的成员交往和贸易，同时无权进出任何港口或在港口装卸货物。"

会议制订的联盟政策获得巨大成功，瓦尔德玛四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瓦尔德玛四世凑足钱后到各国王室游说时，国内的老百姓遭受了不幸。因为在他离开时，哥本哈根被洗劫了，丹麦人被迫签订了《斯特拉松条约》。汉萨同盟因此控制斯卡尼亚沿岸各要塞长达十五年。

现在，汉萨同盟已经获得波罗的海霸主的地位，但海上守备和巡逻需要常备陆军和海军。因此，汉萨同盟北部诸城市没有像德意志南部、意大利、法兰西那样，一旦获得临时安全，就迅速消失。各城市在管理自己的事务时，保留了联邦议会，讨论共同税收或外交政策。那些拒绝遵守协议的汉萨同盟成员的特权会被剥夺。

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按照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经验，谴责汉萨同盟，讨厌汉萨同盟在德意志北部充当警察角色。查理四世访问吕贝克时，称当地主要官员为"我的主人"！吕贝克官员认为这种称呼言过其实。查理四世回答道："你们的确是主人，因为连最年老的登记员都知道，吕贝克是帝国议会授予公爵爵位的五个城镇之一。"因

此，吕贝克与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比萨齐名。

14世纪后半期，汉萨同盟的势力发展到巅峰。瓦尔德玛四世之女——玛格丽特一世极具政治天赋，成功地将丹麦、挪威和瑞典联合起来，组成卡尔玛联盟，逼迫汉萨同盟交出斯卡尼亚沿海各要塞。



作为瓦尔德玛四世的女儿，玛格丽特一世极具政治天赋

然而，即使是这个庞大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也无法撼动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后来，在玛格丽特一世的继任者埃里克七世统治时期，因为连年内战、民怨沸腾，卡尔玛联盟很快解体，最后成员只剩丹麦了。



埃里克七世是玛格丽特一世的继任者，他在卡尔玛联盟成员面前由玛格丽特一世加冕

到了15世纪，汉萨同盟虽然还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已走向衰落，跟不上商业发展的时代步伐了。一个原因可能是神圣罗马帝国经济乏力，无法刺激汉萨同盟的发展。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而本地利益成为人们争夺的焦点。

然而，对汉萨同盟形成真正打击的是，鲱鱼滩涂从波罗的海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海岸。汉萨同盟的商业利益一直集中在波罗的

海，但现在却发现已无力与荷兰和英格兰竞争，因为它们才是北海的主人。

更具有冒险精神的竞争对手在非洲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开辟了新贸易航线，而汉萨同盟仍然受着严格而狭隘的商业利益观念的束缚，就像保姆仍然牵着那些本来能自立的孩子的手不放一样。汉萨同盟曾经是商人的保护者，现在成了个体企业的监察者，中世纪已渐行渐远，它却仍抓着中世纪精神不放。

第7节　条顿骑士团

另一个注定要衰落并最终消失的中世纪机构是条顿骑士团，它是汉萨同盟的亲密盟友。小亚细亚半岛的拉丁帝国灭亡后，条顿骑士团迁移到波罗的海。他们多以查理曼大帝和法兰克人为榜样，与立陶宛和普鲁士的异教徒展开持久战，建立要塞和殖民地。

当时，教皇极力鼓励骑士消灭异教徒。于是，战场成了欧洲各个国家骑士最喜欢的“度假胜地”。骑士们与巴伦西亚、穆西亚和格拉纳达的异教派展开激烈的领土竞争。

条顿骑士团在家乡附近并不受欢迎。譬如，起初，波兰把条顿骑士团当作抵御北方蛮族的“堡垒”，但后来意识到，条顿骑士团虽然保住了利沃尼亚、柯兰和普鲁士，却切断了有利可图的海上贸易。

波兰是中世纪时期欧洲东部的一个国家，名义上效忠神圣罗马帝国。波兰人皈依了天主教，因此成为天主教的一分子。与波兰人不同，东斯拉夫人皈依了东正教。从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东斯拉夫人的王公都向来自西伯利亚的蒙古君主称臣。

波兰人勇敢，有着强烈的奉献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他们

很讨厌德意志骑士，因为德意志骑士的军事天赋和严格纪律常常使他们的野心受挫。虽然矛盾和战争不断，但对波兰形成致命伤害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姻。

1387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主路易一世[19]驾崩后，波兰人把王冠送给了立陶宛的雅盖洛大公，条件是雅盖洛大公迎娶路易一世的女儿[20]，并且成为基督徒。王冠的诱惑战胜了宗教的顾虑，雅盖洛公爵抛弃了原来的上帝，受洗后加冕为拉斯洛五世，成为雅盖洛王朝的缔造者。雅盖洛王朝对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持续了整个中世纪。

在雅盖洛大公的强迫下，无论立陶宛人以前的信仰是什么，现在全部改信基督教。这彻底摧毁了条顿骑士团的立足根基。周围全是基督徒了，他们无事可干了。骑士团团长再也得不到教皇的祝福，取而代之的是禁止欺压的警告。关于条顿骑士团道德败坏、贪得无厌的报告甚嚣尘上，不绝于耳。



路易一世，他曾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主



雅德维加，她是路易一世的小女儿，后嫁给雅盖洛大公，成为波兰王国的第一位女王



雅盖洛大公，他受洗后加冕为拉斯洛五世，成为雅盖洛王朝的缔造者

骑士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力也不断下降，因为骑士的誓言都和军事有关。一旦异教徒入侵的恐惧被消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者便开始讨厌他们。骑士团奉行禁欲主义，并且受当时波罗的海环境的影响，所以无法在当地培养接班人，但随着他们慢慢变老、死去，培养新人的任务迫在眉睫，于是不得不在离神圣罗马帝国很远的地方招募新人。新人来到神圣罗马帝国后，要学习当地的习俗和传统。

在新环境下，条顿骑士团拯救神圣罗马帝国北部的功绩被遗忘

了，势力持续下降，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波兰人发泄怨恨的对象。在坦宁堡战役[21]中，团长和许多重要骑士被杀，那些幸存下来的骑士也没享受到胜利的果实。通过1466年签订的《索恩条约》，波兰吞并了普鲁士西部，包括重镇但泽。于是，波兰获得了对维斯瓦河和波罗的海港口梦寐以求的控制权，并对普鲁士东部形成包围之势。

第8节　路易一世

波兰的南方邻居是匈牙利王国。路易一世统治匈牙利时期，两个国家合并。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路易一世取得胜利。为了感谢他，教皇推举他为教会领袖。打败土耳其人后，路易一世野心勃勃，意欲统治东欧。他不断进攻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似乎是他的主要对手。此外，为了争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控制权，他还与威尼斯人作战。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杀死他的弟弟——乔安娜一世[22]的丈夫安德鲁[23]，从而成为那不勒斯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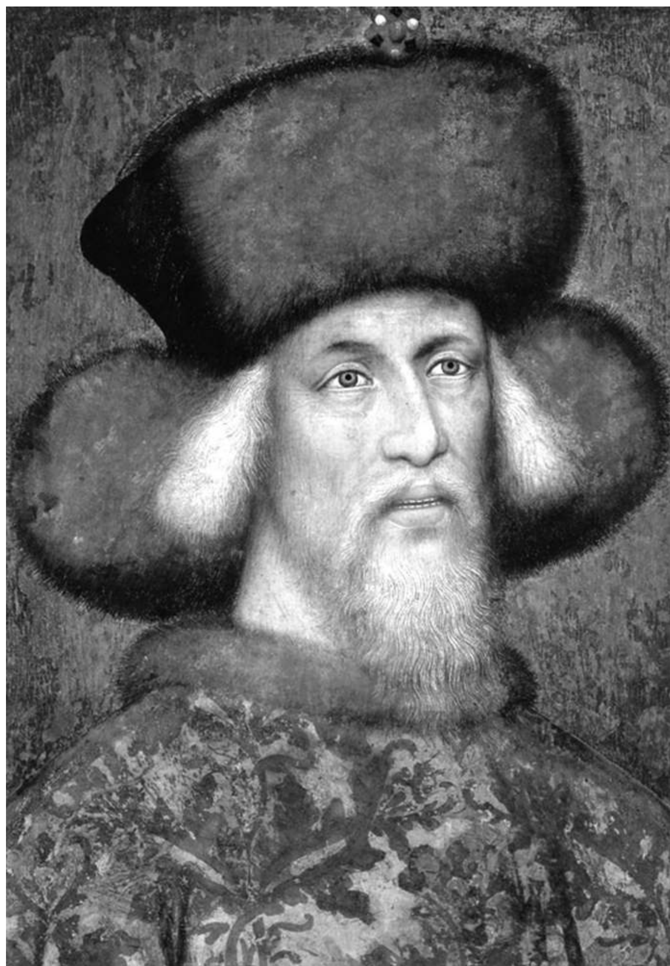


1466年，《索恩条约》签订

路易一世打败了威尼斯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不仅得到了达尔马提亚，还获得威尼斯人每年上缴巨额贡品的承诺。这些功绩让他在欧洲声名鹊起，因为威尼斯人一直以难以驯服而著称。此外，路易一世的英明统治也深得民心。他发现他的国家深受民族纷争之害，譬

如捷克人和玛格尔人的世仇。他建立了一套公平的法律体系，维护正义，不以牺牲一个民族的利益来维护另一个民族。他还把宫廷打造成文化和知识的中心。贵族们在宫廷里既可习文也可练武。

路易一世发展文化事业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的支持。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好几年。后来，一些王公贵族开始厌倦查理四世的统治，不断比较两位君主：一个懒懒散散，一个战功赫赫。于是，贵族们阴谋废黜查理四世，支持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路易一世愤怒地终结了这个阴谋，但查理四世没有那么宽容大度，不再信任路易一世。盛怒之下，他谩骂路易一世挚爱的母后伊丽莎白[24]，这导致两人开始相互攻击，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查理四世大败，请求和解。查理四世的儿子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娶了路易一世的女儿玛丽。于是，查理四世和路易一世表面上又恢复了友谊。



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他娶了路易一世的女儿玛丽



路易一世的女儿玛丽，她嫁给了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

路易一世驾崩后，一直不愿死心塌地接受路易一世统治的波兰把王冠送给了立陶宛的雅盖洛大公，而匈牙利在经历多年的混乱后，推选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为国王。

卢森堡家族在中世纪后期的主要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卢森堡家族出了好几位有趣的统治者，其中一位就是亨利七世[25]，是查理四世的祖父。亨利七世是一位勇敢、侠义的骑士。除了外交上稍显拙劣外，他算得上一位英明睿智的国王。

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就与亨利七世同时代。他视亨利七世为英雄，希望亨利七世拯救世界，革除时弊，改良教廷。亨利七世听信了但丁的言论，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最终走向毁灭。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去解决意大利的纷争，却再也没有回到神圣罗马帝国。亨利七世在罗马加冕不久后就病逝了。据说，他是在做弥撒时，喝了一位牧师献上的毒酒后死亡的。

神圣罗马帝国爆发了内乱。1348年，卢森堡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当选为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才恢复平静。他就是查理四世，一个和他祖父完全不同的人。对查理四世而言，意大利没有一点儿诱惑力。他之所以翻过阿尔卑斯山，只是因为被教皇加冕为皇帝可以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声望。虽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和尊重，但他毫不介意。加冕仪式一完，他就返回神圣罗马帝国。面对意大利人的抱怨和建议，他完全不理会。

对一位皇帝来说，这次匆忙之旅当然有失尊严。但查理四世这个从克雷西战场逃跑的年轻人，从来就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他从不考虑荣耀、责任等与自己懒散个性不相称的事。但在很多事情上，他还是很有见识的。不管怎样，鲁道夫一世的看法值得分享：

> 我相信，在他的心目中，帝国是第一位的，他比他的祖父更聪明。

第9节　《黄金诏书》

《黄金诏书》是查理四世颁布的法律，因诏书上盖有黄金印玺而得名。《黄金诏书》明确规定了选举皇帝的具体方法。迄今为止，选举中出现的争议大都是因缺乏正确的程序而产生的。因此，落选者常常很失望，认为很多程序不合法，于是不效忠当选者。《黄金诏书》

规定，选举人有七位——三位大主教和四位教会以外成员，选举仪式必须在法兰克福举行，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除了以上主要规则外，《黄金诏书》还赋予七位选举人极大的特权，提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们的地位甚至超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公，这些王公只是帝国议会的代表。事实上，七位选举人的影响力超过了皇帝本人。因此，查理四世经常被指责将帝国交给了封建寡头政治。

查理四世可能没有预见到《黄金诏书》的结果及其持久的影响。他只是下定决心，要出台可行方案，防止内乱出现。有种猜测认为，查理四世对波西米亚王国的王位更感兴趣。在他心中，波西米亚王国的王位比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重要，因为波西米亚王国是他的世袭领地。无论真正动机是什么，查理四世都意识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政府体制已如明日黄花。他试图建立一种更有效的政府体制。尽管缺少英王爱德华一世那样的天赋，不具备法王腓力四世那样的机会，但查理四世是中世纪后期欧洲统治者的代表。他们的统治已经开始远离中世纪的一些特征。查理四世比任何一位先王的在位时间都要长，并且没有经历严重的危机。这表明，即使查理四世不是一位天才政治家，也会跟随历史的步伐，进入崭新的时代。



查理四世，他是《黄金诏书》的颁布者

---

[1]1273年秋，鲁道夫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鲁道夫一世”。这标志着“大空位时期”结束。——译者注

[2]1278年，奥托卡二世被杀后，瓦茨拉夫继位，称“瓦茨拉夫二世”。——译者注

[3]即后来的鲁道夫一世。未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前，他被称为“鲁道夫伯爵”，是阿尔萨斯南部和瑞士北部的领主。——译者注

[4]奥地利的阿尔伯特，即阿尔伯特一世（1255—1308），鲁道夫一世的长子，奥地利和施蒂利亚公爵。鲁道夫一世驾崩后，他并未获得皇位继承

权。1298年在各城邦支持下，他击败候选同盟，成功当选德意志国王（1298—1308年）。——译者注

[5]指鲁道夫一世的次子哈特曼（1263—1283），溺亡于莱茵河中。——译者注

[6]即利奥波德一世（1290—1326），阿尔伯特一世第三子，奥地利和施蒂利亚公爵。1307年他的长兄鲁道夫三世驾崩。1308年，他的父亲阿尔伯特一世被暗杀后，他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核心人物。——译者注

[7]指独立后的瑞士。——译者注

[8]“蜘蛛国王”，法王路易十一以诡诈、机智、老练和出色的外交能力著称，在统一法兰西，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他喜欢玩弄阴谋手段胜过发动战争。因此，时人称他为“蜘蛛国王”。——译者注

[9]提洛尔的西吉斯蒙德（1427—1496），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奥地利公爵（1439—1490，1477年升为大公）。他从1446年到1490年统治奥地利和提洛尔。——译者注

[10]格朗松战役爆发于1476年3月2日。——译者注

[11]1476年6月22日，莫拉托战役爆发。——译者注

[12]1477年1月5日，南锡战役爆发。——译者注

[13]包括同盟成员。——原注

[14]埃塞雷德二世（968—1016），英格兰国王（978—1013，1014—1016），他的绰号并非源于现代英语，而是源于古代英语，意思是“邪恶顾问”。在位期间，他大肆屠杀丹麦移民，从而引发丹麦再度入侵英格兰。——译者注

[15]大斋期又称“预苦期”，因整个斋期需守斋戒四十天，故又称“四旬期”。在西方基督教国家，每年大斋期是基督徒献供与苦修的时期，也是洗涤罪恶、承蒙上帝启示的时期。大斋期一共有六个主日。——译者注

[16]即厄勒海峡。——译者注

[17]克努特（995—1035），中世纪英格兰、丹麦和挪威国王，1015年入侵英国，击败英王埃塞雷德二世，征服英格兰，自立为英王。——译者注

[18]哥特兰岛属瑞典，是波罗的海最大的岛屿。——译者注

[19]路易一世（1326—1382），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国王（1342—

1382）。他的舅舅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三世驾崩，没有子嗣，1370年他成为波兰国王（1370—1382）。他在位期间讨伐立陶宛，打败鞑靼军队，势力扩张至黑海。——译者注

[20]指雅德维加，她是路易一世的小女儿，也是波兰王国的第一位女王。——译者注

[21]1410年7月15日，坦宁堡战役爆发。——译者注

[22]乔安娜一世（1328—1382），那不勒斯女王（1343—1382），在她漫长的统治期间，卷入多场内政外交冲突。——译者注

[23]安德鲁（1327—1345），卡拉布里亚公爵，乔安娜一世的第一任丈夫，路易一世的弟弟，被谋杀。——译者注

[24]伊丽莎白（1305—1380），匈牙利国王查理一世的妻子，路易一世的母亲，1370年到1376年担任波兰摄政。——译者注

[25]亨利七世（约1275—1313），卢森堡家族的第一位德意志国王（1308—1313），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12年加冕）。他加冕后进攻佛罗伦萨，但没能取得重要战果，准备再次发动进攻时，突然驾崩。——译者注

第20章

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

在莱纳诺战场上击败了腓特烈一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后，伦巴底联军的“敢死队”不仅升起了欧洲民主大旗，还唤醒了民族意识。其他民族纷纷追随这面旗帜，前赴后继：瑞士人摆脱了哈布斯堡的束缚；佛兰德斯人反抗他们的伯爵和法兰西领主；汉萨形成政治和商业联盟[1]反对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西班牙摆脱内战，发展为具有民族意识的现代国家。



莱纳诺之战

国家和阶级的缓慢进化成为中世纪后期历史的主旋律，但意大利并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相反还倒退了，早期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努

力都付之东流了。

13世纪，腓特烈二世对伦巴底实施独裁专政，但霍亨斯陶芬家族消失后，韦尔夫家族和魏布林根家族的斗争也已沉淀为德意志人的回忆，而保皇党和教皇党的斗争仍像怪物一样徘徊在阿尔卑斯山南部城镇，在那里，独裁者们奴役公社，把国家变成战场。

最终，在失去希望、充满罪恶的边缘，意大利没有以国家的形式出现，而是出现了五个声名显赫的意大利城邦：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几个城邦彼此忌妒、憎恨超过对外国侵略者的忌妒和憎恨，因此经常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向法兰西、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或者东罗马帝国求援。结果，意大利成了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战场，陌生人相互斗争，攫取财富。造成意大利伤痛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政治远见。

米兰的历史首先是作为公社争取自己的自由、摧毁邻邦的自由，接着成为两大家族的决斗场，最后成为胜利者的奴隶。意大利北部很多城市的故事都与此类似，他们的统治者只关心地位和财富，根本不关心当地人民的利益。

第1节　威斯康提家族

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米兰的领主来自威斯康提家族，是意大利典型的暴君，随时挥舞着长剑，但更多的时候使用匕首和毒药；他们挥霍、奢侈，是文学和艺术资助人，是敌人更是损友；他们虚伪、残忍，“毒蛇”是对他们最好的形容。臣民对他们忠诚只是因为恐惧，他们故意残忍地加剧人们的恐惧，这成为他们统治的一种手段。

贝尔纳博·威斯康提[2]只允许他一人享受打猎的乐趣。他饲养了五千条凶残的猎犬，每日喂以大肉。如果农民故意杀死他的猎物或私藏

猎物，就会被扔进狗舍。

即使在教皇特使面前，贝尔纳博·威斯康提的恶搞也不会有所收敛。一次，教皇派信使送来令他不快的消息，他手指着桥下湍急的河水问他们要不要吃点或喝点。信使惶恐地看着他手指的方向，回答道："吃！"贝尔纳博·威斯康提严厉地说："那么就吃这个！"然后，他把写在厚厚的羊皮纸上、带有铅印的教皇的信递给他们，直到信使把信吃完，才允许他们离开。

贝尔纳博·威斯康提的哥哥加莱亚佐·威斯康提更残忍。那些被他判死刑的人死之前还要忍受长达四十一天的非人折磨，先是挖去一只眼睛，然后砍掉一只手或脚，接着被暴打，强迫他们吞下恶心的饮料，当痛苦无以复加时，才让他们死去。这些残酷的场景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好让米兰人知道惹怒他的后果很严重。

这个臭名昭著的家族最著名的人物是加莱亚佐·威斯康提的儿子吉安·加莱亚佐[3]，他是个非常胆小的年轻人。只要听到突然的关门声或者屋外街道上的喧闹声，他就会战栗。吉安·加莱亚佐的叔叔认为吉安·加莱亚佐的智商有问题，于是在吉安·加莱亚佐的父亲死后，愚蠢地接受邀请去看望吉安·加莱亚佐，并想替他处理善后事务，使他彻底屈从自己。然而，这个狡猾的老头失算了。吉安·加莱亚佐率兵到达约会的地点，逮捕了他的叔叔，把他监禁在一个城堡中，并喂以慢性毒药。最后，他的叔叔中毒而亡。



加莱亚佐·威斯康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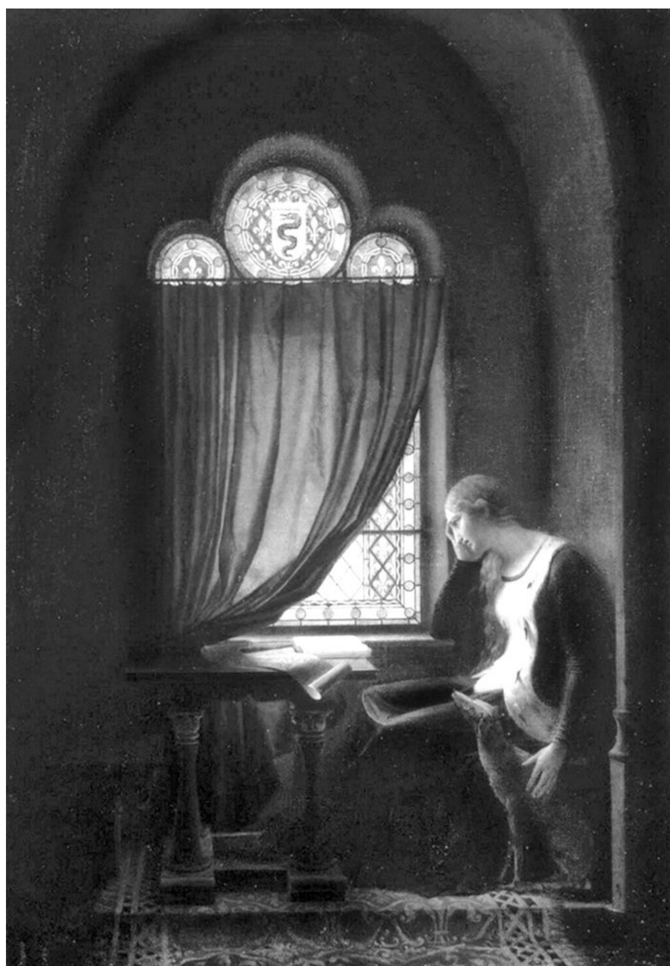
吉安·加莱亚佐

在吉安·加莱亚佐独自统治米兰后，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约束他的残酷和野心。他用阴谋创造政治机会，损害邻邦的利益。他的领地扩展至伦巴底平原及其以南的托斯卡纳山。在米兰境内，他用武力镇压反抗者；在米兰以外的地方，他用贿赂和欺骗的手段，让一些弱小的城市屈服、效忠，因为这些弱小的城市不惧怕遥远的米兰，更惧怕他们的近邻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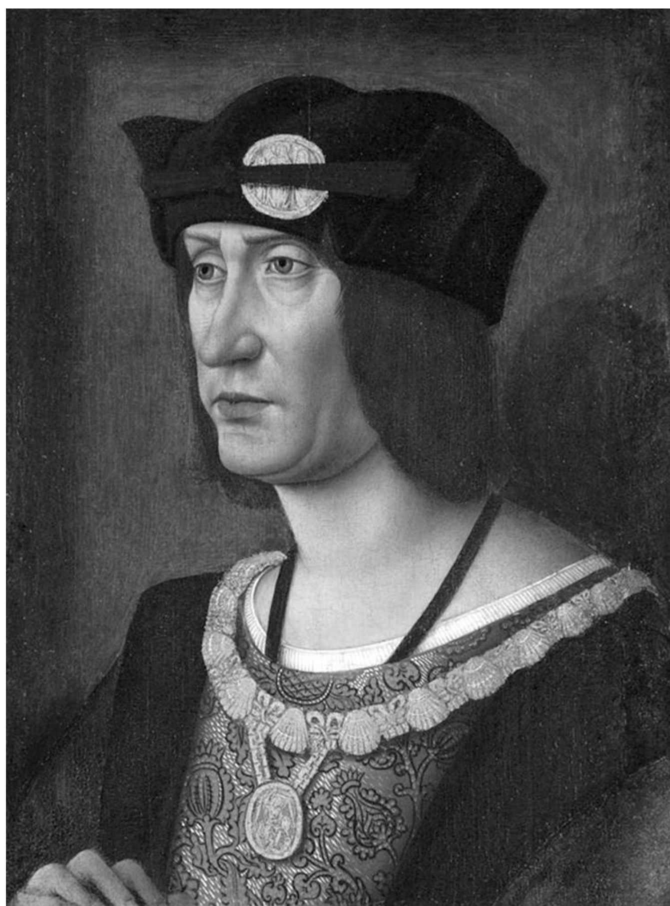
吉安·加莱亚佐的目标是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王国。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非常努力，他的领地一度延伸至维罗纳和维琴察，逼近

威尼斯的大门。在意大利南部，他吞并了佛罗伦萨的两个主要“敌人”——比萨和锡耶纳。这些领土是他通过战争、贿赂、谋杀或欺骗获得的。他说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承认他的公爵爵位，并与欧洲王室联姻。他的女儿瓦伦蒂娜·威斯康提与法王的弟弟——年轻、软弱的奥尔良公爵的婚姻绝称不上金玉良缘，但这对整个意大利都很重要，因为到了15世纪末，瓦伦蒂娜·威斯康提的孙子——奥尔良公爵路易继承了法兰西王位，称“路易十二”，因为路易十二是威斯康提家族的后人，所以对米兰公国也拥有统治权。

乍一看，像威斯康提这样残忍、暴力的家族怎么能持续统治崇尚独立的意大利北部居民这么长时间，这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当然，如果威斯康提家族只依赖征收赋税延续他们的统治，那么这种统治不会持久。但不幸的是，在战争年代只要钟声响起，每个米兰市民都会出来保卫自己城市的旧传统已经消失，职业军人承担了市民的这个职责，市民的心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只要他们能得到高工资和更多的战利品，就不再在乎主人是谁，也不在乎去做拿剑杀人或者吓唬人的龌龊工作。



瓦伦蒂娜·威斯康提。她与奥尔良公爵的婚姻绝称不上金玉良缘。她神情凄凉，心情痛苦



法王路易十二

意大利雇佣军制度形成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居民的惰性。城市居民不愿意为了操练和打仗而放弃生意，因此宁愿付钱让他人替自己服役。另一个原因是暴君不愿意武装和雇用自己的臣民，因为威斯康提家族认为没有爱国心理障碍的陌生人可以更好地执行大屠杀或其他残酷的命令。

大批流氓无赖式的雇佣军在意大利就可以招募到，因为很多曾经独立的小城邦现在被更大的城邦所吞并。被征服者受到肆意欺压，不允许在政府任职，也不允许为自己发声。无数经验表明，这种暴政只

会滋生仇恨和不忠，因此，中世纪的意大利一直饱受内战困扰的原因是未能认清这个政治真相。被征服地区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没有合法的发泄渠道，所以就会形成抢劫团伙或者为某个王公服务，从而用更体面的方式进行报复。

第2节　雇佣军制度

意大利的雇佣军吸纳了一些德意志士兵，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访问意大利时带来的，之后就留在了意大利。他们把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当作冒险和抢劫的乐园。雇佣军的另一个来源是法兰西海盗。在百年战争休战期间，他们四处游荡，很快就有人雇用他们掠夺财富。

14世纪，涌向意大利的人潮中有一位叫约翰·霍克伍德的英格兰军官，他是埃塞克斯一个裁缝的儿子。约翰·霍克伍德因在法兰西战场作战英勇，被爱德华三世赐予爵位。佛罗伦萨的一位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霍克伍德的：

> 他在军中服役六十年，无人能及。他深谙被战乱裹挟的意大利的生存之道……居民、公社和各个城市以和平求生存，但约翰·霍克伍德这种人以战争求发财，结果城市遭到破坏，他们也一无所获。他们既没有爱，也没有信仰。

有这样一个故事描述约翰·霍克伍德。一群佛罗伦萨人遇到了约翰·霍克伍德，他们按照习俗打招呼说："祝你平安！"令人吃惊的是，约翰·霍克伍德回答道："让上帝收回你的祝愿吧。"人们问他为何如此不领情。他说："你们希望上帝让我死于饥饿？你们不知道我靠战争生存，而和平会毁了我吗？因此我只能这样回应你们。"



约翰·霍克伍德

约翰·霍克伍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佛罗伦萨军中度过。无论多么残忍和贪婪，他至少不像同时代的军官那样虚伪。他死后，佛罗伦萨人把他葬在教堂里，感谢他为保卫这座城市所做的贡献。

再回到米兰和它的雇佣军历史。吉安·加莱亚佐虽然胆小怕事，但很精明。他的手下军官虽然惧怕敌人，但对他忠心耿耿。然而，1402年他死后，很多下级军官试图摆脱威斯康提家族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几年后，吉安·加莱亚佐的儿子菲力波·玛利亚[4]重新控制了局面，获得米兰的统治权。

菲力波·玛利亚比他的父亲更胆小，像法王路易十一一样不喜欢进入公众视线。让·德·西斯蒙第[5]把他描述为“一个奇怪、脏兮兮的人，眼球突出，目光鬼鬼祟祟”。菲力波·玛利亚讨厌听到“死亡”这个词，害怕被暗杀。他每晚都要更换睡觉的房间。只要听到战败的消息，他就颤抖不已，担心雇佣军会弃他而去。当信使带着捷报而来，他也不会喜形于色，因为他认为获胜的将军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对手。

这就是暴君为了获得财富和权力所付出的代价：担心最卑微的雇

佣军会被收买，投入敌人的怀抱；担心毒药藏在调味盘里或酒杯里；担心匕首会刺穿铁网。因此，菲力波·玛利亚时刻生活在恐惧中。他的雇佣军强迫热那亚承认他为宗主，使米兰陷入与阿迪杰河沿岸城市威尼斯的敌对状态中。



意大利雇佣军：步兵



意大利雇佣军：骑兵

第3节　威尼斯

威尼斯的历史与意大利其他城市都不相同。威尼斯建于群岛之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它海洋强国的地位。威尼斯从未进行过领土扩张，但为了利益，它不断进行商业扩张，这种方式很好地避免了封建地主的纷争，而教皇党和保皇党的党派之争却使它的邻居们沦为

奴隶制度的牺牲品。

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城市和国家的名字都与中世纪某个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那不勒斯，霍亨斯陶芬家族、安茹家族和阿拉贡家族之间的斗争；在罗马，坎帕尼亚家族、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之间的斗争；在米兰，威斯康提家族和后起的史佛拉家族之间的斗争；在佛罗伦萨，贵族集团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斗争；但在威尼斯，国家就是一切，它的子民不需要成为优秀的军人，只需要服从、谦卑和努力工作。

总督或者公爵是威尼斯的大执政官，相当于国王。事实上，总督酷似民选总统。为了防止拉帮结派，他受到一套复杂体系的制约。一旦当选，总督必须遵守一套规程，接受一百多条宪法条例的束缚：总督必须按照六名公爵议员的建议行动；总督的任何家庭成员不得担任公职；总督不得因工作繁重而中途辞职；就算从他的办公室到整个威尼斯，傲慢的贵族在他面前都心甘情愿地屈膝，总督仍要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对他的尊重不是由于他的个人魅力，而是他的职位。

很久以前，威尼斯所有重要的事务都由公民大会决定，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笨重的机构被由主要公民组成的大议会所取代。14世纪早期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大议会被取消。只有一些贵族才可以从政，特权贵族应运而生，大部分普通威尼斯人被排挤出政府，但由于政府不是为任何一个特定家族利益服务，而是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人们原谅了它的专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著名的“十人会”有权秘密调查公民，因它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总督的儿子、商人和乞丐一视同仁，备受威尼斯人的推崇。一位现代作家说：“威尼斯共和国是整个意大利北部稳定的因素，甚至现代人都对这种政治稳定的状态感到惊奇和赞赏。”

有时，现代人很难欣赏中世纪威尼斯的自私和直白的商业至上主义，它对意大利和基督教皆无忠爱之心，因此即使面对第四次十字军

东征，除了坚持保护它在东方贸易中的地位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它的外交政策。

威尼斯的确自私，但我们必须知道“爱国主义”这个词的范畴在现代比中世纪要大得多。威尼斯可能对“意大利”或“基督教”表现冷漠，但它所有的生活和理想都以“威尼斯”为中心。水手和商人是缔造威尼斯的坚实基础。虽然威尼斯没有雇佣军，但人民愿意为它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意大利所有国家中，只有威尼斯真正理解“爱国主义”的含义，因为它的臣民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生命、家庭理想和阶级利益。

威尼斯的国家利益与航运和世界贸易联系在一起。例如，羊毛加工是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的核心利益，它们非常依赖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把糖和香料从东方运往英格兰，然后在英格兰装载上羊毛运往佛兰德斯，之后在佛兰德斯装载大包布匹运往意大利市场销售。



中世纪的威尼斯全图（局部）

烈。



“十人会”。它有权秘密调查公民

除了贸易运输依赖邻邦的工业，威尼斯自己也生产丝绸和玻璃。但无论如何，威尼斯的水手和工人都明白控制亚得里亚海才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因为单靠国内生产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且藏匿在达尔马西亚沿岸的敌人和海盗时刻威胁着满载货物的商船的安全。因此，威尼斯很早就开始实施强硬的海上政策，这也使威尼斯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冲突不断，尤其与东部海域的竞争对手热那亚的冲突更激烈。

在第四次十字军战争结束时，威尼斯迫使君士坦丁堡接受拉丁帝国，从而保证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霸主地位；而热那亚则接收了希腊难民，并且帮助希腊将军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在1261年恢复东罗

马帝国。

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公开交战几乎没有间断：在君士坦丁堡和巴勒斯坦的海港进行陆战，在意大利和希腊海域进行海战。经过几番较量，谁都无法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却严重削弱了基督教对抗伊斯兰教的力量。

1380年，决战在威尼斯水城基奥加打响。热那亚舰队在外海取得胜利，决定实施封锁，迫使威尼斯投降。威尼斯将军高喊“让威尼斯每条船上的人都参战！”一位声望素著的领袖维托·皮萨尼之前因肇事入狱，此时也应公众所求获释出狱，成为军队统帅。市民们激动地高喊道：“皮萨尼万岁！”他们的领袖具有真正的威尼斯精神，回应道：“威尼斯人只高呼‘圣马克[6]万岁！’”

维托·皮萨尼麾下只有几艘船和少量人马。他明白，主动出击取得胜利几乎不可能，但他知道在东地中海有一支威尼斯舰队，如果这支舰队得知他的困境，肯定会掉头全力帮助他，因此，维托·皮萨尼决定被动等待，迷惑敌人。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技巧实施该计划，命令战士用石头击沉船只，堵住通往基奥加的航道，接着派舰队把守各主要入口，防止热那亚增兵。现在，封锁者被封锁了。漫长的冬季来临，热那亚人苦苦防御，疲惫不堪，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此刻，威尼斯人焦急地瞭望着地平线，终于人群中响起了一声呐喊，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船，威尼斯的旗帜骄傲地进入人们的视线。维托·皮萨尼和他的手下高声欢呼，因为威尼斯得救了。它不仅没有成为废墟，还成为“亚得里亚海女皇”，而热那亚被迫投降，承认威尼斯海上霸权的地位。

威尼斯的海上政策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但几个世纪后，威尼斯提出更具争议的陆地政策：中世纪一些威尼斯人认为既然陆地是政治问题的根源，威尼斯就应该加强对陆地的控制，以防遭受意外袭击；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观点很偏狭，只适用于弱小城邦割据伦巴

底的时代，而对付像意大利北部暴君威斯康提这样的人则毫无意义。除非威尼斯有能力保护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领土以及东伦巴底的广大地区，否则无法控制与德意志和奥地利进行贸易的山区通道。

威尼斯的陆地霸权政策得到了确认。14世纪初，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索的统治者玛斯缇诺·德拉斯卡拉警告要对通过其领土的威尼斯商品征税。威尼斯认为这是对它商业霸权地位的侮辱，于是立刻与米兰和佛罗伦萨结成联盟，反对玛斯缇诺·德拉斯卡拉。结果通过战争，威尼斯获得了特雷维索和其他一些城镇。



维托·皮萨尼之前因肇事入狱，此时应公众所求获释出狱。市民们激动地高喊道："皮萨尼万岁！"



威尼斯舰队与热那亚舰队激战

当然，这次战役只是威尼斯商业政策的外现，是防卫而不是侵略；但在1423年，佛罗伦萨人请求威尼斯参战，共同抵抗威斯康提家族，并声称他们不愿独自对抗暴君，如果威尼斯拒绝帮助他们，他们就拥立菲力波·玛利亚为意大利北部的国王。随后，战争的结果是签署了一项增强威尼斯陆上权力的条约。威尼斯在意大利建立陆地帝国迈出了关键一步。

16世纪，一个叫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系学生，写了一本为统治者提供建议的手册《君主论》，这同时是一本关于他的出生地佛罗伦萨历史的书籍。在书中，马基雅维里提到，雄心勃勃地推行陆地霸权政策并吸收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礼仪和习俗时，威尼斯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这可能是真的。不可否认的是，在威斯康提家族不断敲击威尼斯大门的情况下，威尼斯还能明哲保身吗？

第4节　佛罗伦萨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佛罗伦萨。15世纪，佛罗伦萨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托斯卡纳第一大城市。像米兰一样，佛罗伦萨成为保皇党和教皇党争夺的“猎物”，但这场争夺没有发展成统治者家族之间的斗争，而演变为激烈的阶级斗争。

腓特烈二世垮台后，代表富商阶级的教皇党将与之对立的大部分贵族阶级赶出了城，然后基于自己的利益修改了宪法。

佛罗伦萨尽归执政团。执政团由司法行政官、最高执政官、行会律师、医生和布商等组成。贵族必须是行会成员才有资格出任公职。为了防止贵族只在公会挂虚名，后来规定，各公职的候选人必须提供他确实在所属行会工作的证明。

之后，更严厉限制贵族的政策出台了：贵族如果伤害了地位较低

的公民，不管是故意还是意外，贵族的房子都要被夷为平地；过去祖先们用来向对手身上泼溅热油、扔石头的高塔，现在依据法律要降低高度；在暴乱中，无论贵族怀有什么意图，都不被允许走向街头；事实上，在政治和司法方面，贵族处于明显的劣势，这样一来，曾经野心勃勃的敌人变成了人畜无害的普通人。

13世纪，教皇党的全面胜利并未给佛罗伦萨带来和平，新的政党不断涌现。为了消除来自家庭和阶级的影响，政府实施了许多复杂的制度，这不仅伤害个人，也无法稳定国家。例如，执政团的成员任期只有两个月；顾问团的成员由十二人缩减到六人；为了实现“人尽其才”的目的，政府的做法是先列出所有适合担任公职的公民的名字，将之放在包里，然后在职位空缺时随意挑选。尽管这些措施防止了任人唯亲，但也影响了效率。紧急情况下召开的议会是非正式集会，广场的钟声响起，人们就在广场集会，决定是否赋予特别委员会修改现存宪法的权力。政客们认为，广场集会是反映民众诉求的最后手段，但广场入口都有武装人员把守，而胆小的民众都受幕后黑手的操控。

佛罗伦萨的权力都被掌握在富有的中产阶级和商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分裂为“白党”和“黑党”两派，被世家大族所利用。

第5节　但丁·阿利盖利

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属于“白党”。1302年，“黑党”获胜，但丁被流放出城。如果但丁肯缴纳一大笔钱就可赦免，虽然他对佛罗伦萨赤胆忠心，但他拒绝交钱，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有罪。但丁骄傲地写道：“如果能找到不玷污但丁名誉和声望的其他方法，我将毫不犹豫地接受……但以目前的方法，我绝不进入佛罗伦萨。”



在维罗纳的但丁

但丁思想中的偏见和仇恨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但他的思想更清晰、更高贵。作为一名狂热的保皇党员，但丁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首要职责是对意大利施威，但他的想法不像大部分意大利人那样狭隘。大部分意大利人希望通过报复，恢复自己的家园。然而，但丁认为，比个人抱负更重要的是将教廷和国家从腐败与暴政中拯救出来，而这只有赋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高权力才能实现。

1294年，教廷进行了一次改革尝试。红衣主教团憎恨教廷的腐败，推选一位以隐秘和神圣生活而闻名的隐士为教皇，这位教皇就是后来的圣雷定五世[7]。圣雷定五世身材矮小，面容苍白，头发蓬乱，穿着麻布衣服。当穿着华丽的红衣主教团来找他时，他惊恐地逃走了。他几乎是被逼着穿上教皇长袍，然后被红衣主教团带走的。渴望改革的人们急切地等待新教皇下诏，但人们的期望落空了。圣雷定五世没有能力推行改革。他被所处的环境吓坏了，成了那些肆无忌惮和野心勃勃的人的牺牲品。圣雷定五世因不敢拒绝大臣的要求而两次放弃圣俸，而且只要大臣提出更换红衣主教的要求，他就马上答应。最

后，他被允许退位，匆匆返回自己的修室。但圣雷定五世被继任者凶悍的博尼费斯八世[8]抓捕，关进城堡，最后死在那里。

但丁讨厌博尼费斯八世利用教会谋求私利的行为，也鄙视圣雷定五世。圣雷定五世被赋予改革基督教会的权力，最终却无所作为。佛罗伦萨人不指望罗马教廷进行改革，但当亨利七世翻越阿尔卑斯山，但丁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认为意大利的救世主终于出现了。诗人可能就是在那时写了他的政治谏言《论世界帝国》，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亨利七世不是第二个查理曼大帝或奥托大帝。随着亨利七世驾崩，但丁的希望落空了。

但丁最伟大的作品是长篇诗歌《神曲》，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神曲讲述了在一千三百年前耶稣受难日，诗人遇到了他的精神领袖维吉尔，维吉尔带他穿过接受永恒惩罚的地狱，随后另一位向导出现了，她就是但丁心中的恋人，女性理想的化身贝缇丽彩。贝缇丽彩领但丁穿越“九重天”来到上帝的宝座前。《神曲》既是对中世纪生命永恒论的总结，也是对14世纪政治的思考。《神曲》不但是一座历史宝库，而且是意大利文学的杰作，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人类灵魂的发展。但丁对氛围和细节拿捏得恰到好处，将想象和现实融为一体。《神曲》显然是但丁的真实表达——一个艰辛努力的灵魂生活在腐败、冷漠的环境中，试图寻找救赎的方法，最后到达“上帝之城”，朝圣之旅最终完成，而这段朝圣之旅展示的美丽和安宁已经超越圣奥古斯丁的预言。

现在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钟声

响彻天堂

随着这首歌

我的灵魂飞舞

压力消逝

我看到的是一片欢喜

世界向万物微笑

快乐欢喜难以表达

宁静和爱永恒

财富和幸福无尽。

但丁没能活着实现他的尘世梦想——再回到佛罗伦萨。1321年，但丁在拉文纳去世。他的墓碑上刻着拉丁铭文：“生于佛罗伦萨，但他的母亲并不爱他。”而他的肖像下刻着他引以为傲的座右铭“我不向厄运屈服。”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佛罗伦萨人对否定自己最伟大的儿子感到很羞愧。在但丁死后的几年中，政治偏见蒙蔽了佛罗伦萨人的眼睛。在被但丁称为“世界国王”“上帝仆人”的亨利七世的时代，佛罗伦萨视但丁为可恶的敌人，佛罗伦萨甚至愿意放弃自己吹嘘的民主，接受任何一位反对但丁的王子为主人。因此，佛罗伦萨把执政团的最高职位让给了14世纪早期意大利教皇党党首——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9]，他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五年。



贝缇丽彩。她是但丁心中的恋人



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

第6节　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是查理的孙子、圣路易的哥哥，承袭安茹伯爵爵位。他遵循家族传统，支持教皇，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的统治。从表面看，他是意大利最有权力的君主，但实际上，他的宝座坐得并不安稳，因为那不勒斯臣民并不爱戴法兰西统治者，即使在康拉丁死后，那不勒斯人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念念不忘，而且非常羡慕西西里岛勇于摆脱法兰西的枷锁，投入西班牙的怀抱。

安茹的罗伯特驾崩后的1343年到1435年，关于那不勒斯被阿拉贡王朝征服的历史记载很少。在近一个世纪中，相关的历史记录都是

和谋杀、诡计有关，而爱国主义和英雄人物鲜有出现。这段历史就像一场死亡之舞，虽然舞伴不断变化，但除了罪恶和暴乱，什么都没发生。

安茹的罗伯特的继承人是他的孙女——乔安娜一世。还在摇篮里时，乔安娜一世就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五岁时，她嫁给年长她两岁的表兄——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的弟弟安德鲁。我们无法确定这对热情、任性的年轻伴侣是否相处和谐，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腐败的朝廷里，没人给他们这个机会。一些阴谋家不断在乔安娜一世耳边挑拨道，作为一个女王，让丈夫干涉朝政是有失尊严的；而另一些阴谋家不断提醒年轻的安德鲁王子，他是安茹的罗伯特之弟查理·罗伯特[10]的后裔，有权像他的妻子一样继承王位。敌对双方经常激烈争吵，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1345年，十八岁的乔安娜一世和二十岁的安德鲁一起出发，踏上了一个看似美好的狩猎之旅。一天晚上，两人在一个修道院的客房里休息。安德鲁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叫他。他毫无戒备，起身去看是不是朋友在叫他，结果遭到一群武装分子的袭击。安德鲁转身想回卧室，但身后的门已经被锁。他无计可施，只得与歹徒英勇搏斗，但寡不敌众，两名刺客将绳子套到他的脖子上，将他勒死，并把尸体吊在阳台外面。



乔安娜一世与安德鲁

最后，侍从来了，强行打开门，告诉乔安娜一世发生了谋杀案，但乔安娜一世却说，她睡得非常沉，什么都没听到，但她最终却不能圆满地解释王子身后的卧室门为什么会被锁上。当然，大部分欧洲人都认为乔安娜一世是这起凶杀案的幕后主使。于是，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进军意大利，为他死去的弟弟报仇。路易一世把乔安娜一世赶出那不勒斯，并宣称他是王位继承人，但在那不勒斯他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而此时他的匈牙利王位也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只得匆匆赶回匈牙利，弟妹乔安娜一世的罪行只能交由教皇审判了。

当时，教皇把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统治者当作他的后盾，因此当即宣布乔安娜一世无罪。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又有三个王子成为乔安娜一世的丈夫，尽管乔安娜一世有四次婚姻，但她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夭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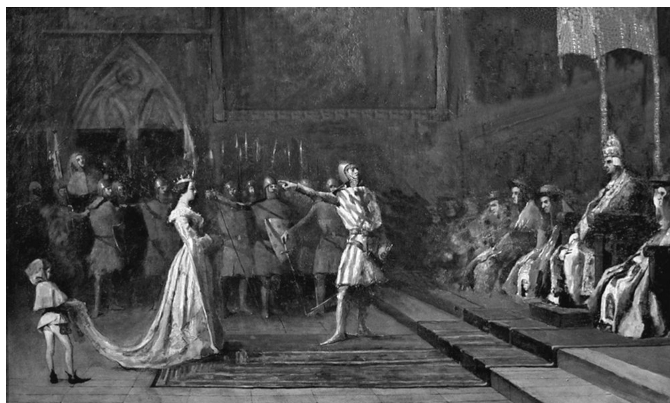
起初，乔安娜一世非常乐意接受她的外甥、与她侄女结婚的都拉佐的查理[11]为王位继承人。然而，两人很快就发生了激烈争吵。因此，乔安娜一世又把王位给了法兰西王室成员——安茹公爵路易。对

历史系的学生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令人困扰，因为第二个干涉意大利政治的安茹王朝亮相了。它与第一个安茹王朝的关系疏远。两个王朝都声称享有那不勒斯的统治权，并为此发动战争，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似的。

最终，乔安娜一世的反复无常受到了惩罚。在内战中，她落入都拉佐的查理之手，被关进城堡，并丧了命。有史料记载，她是被羽绒被捂住窒息而亡的；还有记载说，为了给安德鲁报仇，有人用丝绳勒死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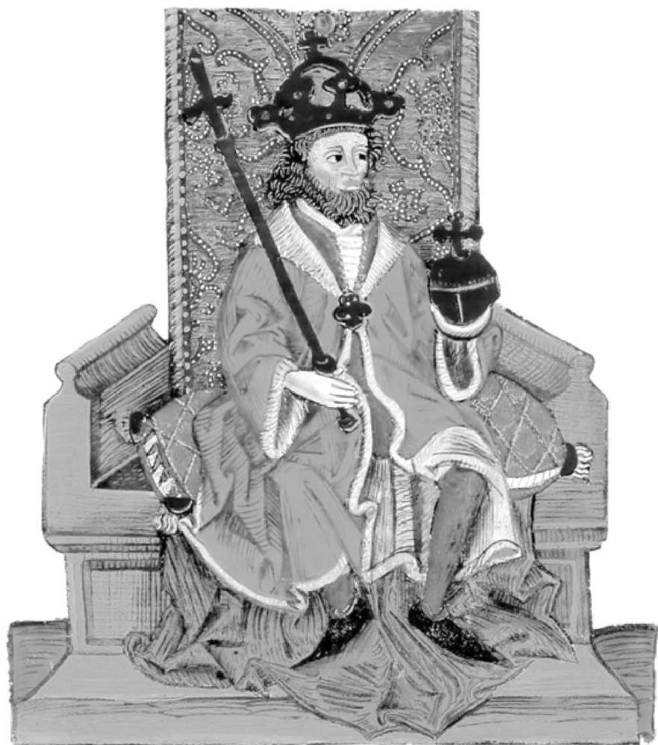


安德鲁被杀



教皇宣布乔安娜一世无罪

乔安娜一世死后，都拉佐的查理在那不勒斯的统治维持了四年，但不得不把普罗旺斯让给竞争对手。他不满足于对意大利的统治，一听到路易一世的死讯，便立刻前往匈牙利，希望能统治这片“勇士之土”。出乎意料的是，他在匈牙利被暗杀了，其王位由年仅十五岁的儿子拉迪斯拉斯[12]继承。



都拉佐的查理

拉迪斯拉斯是一位天生的战士，精力充沛，目标明确。他不仅制服了狂傲的贵族，还成为意大利南部的主人，占领了罗马，赶走了教皇。现在，统一意大利的最佳时机出现了。拉迪斯拉斯当然想抓住机会，但他只是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却是典型的暴君——残酷、无耻、追求享乐，与当年的威斯康提一模一样。1414年，他死时，几乎无人哀悼。

拉迪斯拉斯的妹妹继承了王位，称“乔安娜二世”[13]。乔安娜二世没有继承拉迪斯拉斯的一丝长处，却把他的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乔安娜二世和乔安娜一世一样虚伪善变，而且也没有直接继承人。因此，乔安娜二世驾崩后，安茹家族在那不勒斯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在乔安娜二世执政后期，关于继承人问题的讨论激烈地展开了。年迈的女王似乎愿意接受第二安茹王朝的代表人物路易三世为继承人，但由

于她的善变和愤怒，她又倾向统治阿拉贡和西西里的阿方索五世，不久指定阿方索五世为继承人，但之后又变卦了。阿方索五世佯装并不在意乔安娜二世的反复无常。但这位头脑冷静的西班牙人不会轻易咽下这口气，这不会阻碍他实现称霸地中海的雄心抱负。

乔安娜二世驾崩后，阿方索五世的舰队就出现在了那不勒斯海岸。在战斗中，阿方索五世尽管被俘，成为菲力波·玛利亚的囚犯，被押往米兰，但凭借高超的外交手段，他使这位暴君相信，西班牙人取代法兰西人统治那不勒斯会让米兰更有安全感。米兰和那不勒斯形成坚固联盟的序幕开启了。阿方索五世获释，在那不勒斯建立“王国”，另建新都。新都城成为与腓特烈二世时代媲美的意大利文化和学识中心。



乔安娜二世



阿拉贡和西西里的阿方索五世

我们探讨了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四个主要国家，而如果继续探讨罗马的情况，就必须重拾政治主线，回到1308年教皇法庭被移至阿维尼翁的时期。

从教皇的角度出发，教皇法庭中大部分都是法兰西人，这让教皇从中获益，他不再担心神圣罗马帝国为了实现统治意大利的理想而入侵意大利，也不再被罗马市民和坎帕尼亚贵族的叛乱所困扰。

阿维尼翁离法兰西非常近，教皇遇到麻烦可以随时申请法王保护，而阿维尼翁又在边界之外，不受法兰西法律的限制。阿维尼翁位于普罗旺斯县，属于那不勒斯安茹王朝。乔安娜一世流亡期间，由于身无分文，加之需要得到教皇的支持，不得不把阿维尼翁卖给教廷，因此，一直到18世纪，阿维尼翁都保持着独立教廷。

“巴比伦之囚”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劣势也不可低估：教皇在欧洲人心中的声望下降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罗马从前是公认的首都，教皇是全世界的教主，继承了圣彼德和恺撒的衣钵，但现在迁居到普罗旺斯，地位降低，就像一个小诸侯。

比如，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人就对阿维尼翁做出的裁决表示不满。大家普遍抱怨教皇法庭中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同情法兰西人及与法兰西政治立场相同的人，因此，一个英格兰人想要在教皇法庭诉讼成功，必须支付比其他国家的人多一倍的钱；更有甚者，英格兰人知道支付给教皇的所有资金，都用来提高他们最憎恨的敌人——法兰西人的战斗力。

早在英诺森四世时期，当教皇向英格兰人征税以便支持讨伐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的时候，英格兰人就开始讨厌教皇了。一个世纪后，英格兰怨声载道。英格兰人不仅不满教皇的统治，而且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教义产生怀疑。因此，英格兰第一位伟大的“异教徒”约翰·威克里夫在爱德华三世统治后期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约翰·威克里夫被认为是一位爱国者，他谴责天主教的教义在英格兰被广泛阅读和讨论。



约翰·威克里夫大力宣扬自己的观点

13世纪，朗格多克发生镇压异教徒的运动；但到了14世纪，没有出现像英诺森三世那样具有号召力的教皇可以说服人们为阿维尼翁而战，批评的声音和独立的思想此消彼长；进入15世纪，约翰·威克里夫的教义已经传遍欧洲，并在波西米亚建立总部。

第7节　罗马

我们以后再讨论异教派在波西米亚发展的历史，但异教派能蓬勃发展，一方面归因于教皇地位的改变，另一方面归因于“巴比伦之囚”对罗马灾难性的影响。

德国历史学家费迪南·格利高沃瑞斯说：“教皇不在，让罗马贵族更加无法无天。他们认为，教皇不在了，他们就是罗马的主人。他们的雇佣军在每条道路上安营扎寨，抢劫过往的行人和朝圣者。朝圣之地现在空无一人。城市环境恶化。王公贵族、外国使节的踪迹难觅。牧师充当枢机主教，梵蒂冈代表教皇，并由邻近的奈比、维泰博和奥

维多的主教行使教皇的权力。”

教皇法庭创造的财富和盛况原本是罗马财政收入的来源，现在也转移给了普罗旺斯。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两大家族在街头混战，也因教皇不在而无人制止。现在只有教皇的代表留在罗马，主要是为了征收租金和赋税。因此，就像君士坦丁把他的都城迁到博斯普鲁斯一样，罗马再次面临政治灾难的威胁。

第8节　黎恩济

罗马长达七十年的黑暗时期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一个叫黎恩济的罗马年轻人希望把罗马带回自由而伟大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他的故事被创作成歌剧，成为经典。据记载，黎恩济性格完美，外表俊朗，口才一流，很少有人不被他的言语打动。作为罗马特使，黎恩济获得教皇的许可重振罗马。许多罗马市民成为他的狂热追随者。无论黎恩济说什么都会赢得掌声，并且追随者愿意用手中的剑帮助黎恩济实现他的抱负。



科隆纳家族成员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只因一时之怒，就杀死了黎恩济的弟弟。黎

恩济抱着弟弟，向上帝求助

实现罗马复兴的第一步是要恢复街头秩序。因此，黎恩济决心打倒贵族。罗马贵族及其家臣经常闹事，尤其是骄傲的科隆纳家族。科隆纳家族成员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只因一时之怒，就杀死了黎恩济的弟弟。

1347年5月，革命爆发了。黎恩济身旁站着教皇的牧师，头上飘扬着代表自由、正义与和平的旗帜。黎恩济宣布编纂公民新宪法，并出任首席行政官。他也被称为“神圣罗马共和国保民官”。

一开始，罗马贵族听到黎恩济的宣言哄堂大笑。科隆纳家族首领史蒂芬·科隆纳说：“如果这个蠢货再激怒我，我就把他从这儿扔出去。”但当史蒂芬·科隆纳听说有一支市民组成的军队守卫着桥梁，把贵族们都软禁在家中时，他的嘲笑变成了沮丧。最后，他逃到了乡下的庄园，而家族中的年轻成员则与保民官和解，宣誓效忠新共和国。

黎恩济现在已经取得胜利。他写信给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宣布罗马已经恢复和平和秩序，同时激励意大利的其他城市摆脱暴君的桎梏，加入“全国兄弟会”。

黎恩济和他的人民似乎已经看到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愿景。但不幸的是，黎恩济缺乏实现该愿景的智慧和能力。保民官无疑是伟大的，但没有伟大到可以确保成功。黎恩济本是农民的儿子，却吹嘘说自己其实是亨利七世的儿子。他越来越沉迷于这种幻想，与他最初的使命已渐行渐远。黎恩济身穿镶金边的白色丝绸衣服，在一群装备精良的骑兵的簇拥下穿过街道。为了庆祝他掌权，黎恩济设立了专门节日。黎恩济在用传说治愈了君士坦丁麻风病的斑岩熔浆沐浴后，在奢华的拉特兰教堂，被授予金腰带和马刺，正式封爵。

当号角吹响时，人们开始热烈鼓掌欢呼，争相成为黎恩济的仆人。这时，大家已经忘记保民官承诺的公平，但不久就意识到这简直

就是愚蠢的铺张和炫耀，并且对黎恩济为维持政府运转而征收的赋税感到不满。

黎恩济的辉煌是由他的天赋成就的，他的失败是他的胆小怯懦和缺乏平衡能力造成的。一次，当黎恩济得知那些发誓维护新宪法的贵族们要密谋推翻他时，他邀请密谋者的领袖去参加宴会。在宴会上，黎恩济逮捕了他们，将他们关进监狱。次日早晨，监狱的钟声敲响了，贵族们被押了出来，显然是要被执行死刑，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但就在最后时刻，当所有罪犯都放弃希望时，黎恩济出现在刑台上，一番宽恕罪行的布道之后，命令释放所有的罪犯。



黎恩济

如果黎恩济希望通过这种仁慈赢得敌人的忠心，显然他误判了。贵族们从前不喜欢这个农民暴发户，现在就更憎恨他了，因为黎恩济让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贵族们并不认为释放他们是对他们的宽恕，而是因为黎恩济害怕他们身后强大的家族。从这一刻起，奥尔西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及其支持者唯一的目标就是将黎恩济从保民官的位子上拉下来。贵族们通过行贿和散布谣言等手段，破坏黎恩济的形象，到处宣扬黎恩济铺张、奢侈以及征收重税。最后，1354年，罗马城里爆发了骚乱，一群暴徒聚集在黎恩济居住的宫殿门前，大声喊道：“处死叛徒！”当这位保民官试图逃跑时，房子已经燃起大火，最后坍塌了。

第9节　凯瑟琳·贝宁卡萨

随着黎恩济的垮台，想借助神圣罗马共和国的名号改革意大利的想法也终结了，就像随着亨利七世的驾崩，但丁重建一个新罗马帝国的希望破灭一样。意大利就没有希望了吗？答案是有。意大利的希望来自锡耶纳，一个位于佛罗伦萨南部的山地小镇。主人公是一个叫凯瑟琳·贝宁卡萨[14]的农村女孩。她像贞德一样，看到乡村生活的悲苦，相信自己被上帝召唤，要告诉乡民救赎之路。

后来，凯瑟琳·贝宁卡萨被封为圣徒，称“圣凯瑟琳”。她是锡耶纳一个染匠的二十五个孩子之一。她的父亲起初对她拒绝结婚、加入多明我第三级修女会很生气。加入多明我第三级修女会的女子可以留在家中，宣誓遵守教会条例就可以了。



凯瑟琳·贝宁卡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只染匠本人，所有的锡耶纳人都意识到凯瑟琳·贝宁卡萨的思想和精神境界远超普通人，因为她在做最简单的家务活时，可以顿悟严肃的生命主题，为前来寻求帮助的人解读他们烦恼的根源，并指出重新获得勇气和希望的途径。

在锡耶纳瘟疫爆发时，凯瑟琳·贝宁卡萨不知疲倦、毫不沮丧地到处看望、守护病人和垂死之人，为疲倦的医生注入新的活力，为遭受病痛折磨而绝望的病人带来希望。

当一个年轻的贵族因批评政府而被严苛的法律判处死刑时，凯瑟琳·贝宁卡萨到狱中探望了他。这个年轻人像被困的野兽一样在牢房里狂跳，拒绝一切安慰，而她的出现和安慰让他安静了下来，甚至最后满怀感恩之情来到刑台上，欣然受死。此时，刑台被他称为“正义的圣地”。凯瑟琳·贝宁卡萨也没有被死亡的场景吓得退缩，而是等着这位年轻的囚犯受刑。当他的头被砍下时，凯瑟琳把它放在膝盖上。后来，她写道：“当他安息时，我的灵魂也安息了。”

当其他城市的使者甚至阿维尼翁的教皇使节前来询问凯瑟琳如何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时，她也毫不惊慌。她相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是“耶稣的仆人”。上帝希望复兴意大利的使命不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完成，而是由教皇本人完成，教皇不应该再住在阿维尼翁，而应该返回罗马，着手教会和国家都迫切需要的改革，然后向全世界宣布，由于他的公正和慷慨无私，他是当之无愧的基督教之父。全世界的人们也会欣然效忠。

凯瑟琳·贝宁卡萨崇高的理想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她写信给约翰·霍克伍德，请求他把对准意大利的长剑对准土耳其。据说，读完这封信后，约翰·霍克伍德伯爵发誓说，如果有其他军官参加十字军东征，他也会参加。

凯瑟琳·贝宁卡萨亲自去阿维尼翁拜访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15]。格里高利十一世是一个胆小怯懦的人，喜欢奢华和安宁，惧怕罗马的动荡。这时，坎帕尼亚的所有贵族和教皇领地的大部分城市都武装起来，然后发出警告，教皇如果不亲自安抚战斗人员，就会失去所有的世俗财产。当教皇向凯瑟琳·贝宁卡萨咨询此事时，她严肃地说，教皇一定要回到罗马，但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说：“睁开你智慧的双眼，认真地审视这件事，神圣的教父……你会发现，赢回你的灵魂比夺回你的世俗财产更迫切。”



在凯瑟琳·贝宁卡萨的劝说下，教皇回到罗马

1377年1月，凯瑟琳·贝宁卡萨获得了标志性的成功。在她的劝说下，教皇回到罗马，夺回自己的居所，从而结束了“巴比伦之囚”。不久，教皇就死了。罗马人对教皇返回感到非常高兴。现在他们担心教皇的继任者如果是法兰西人，又要返回阿维尼翁，因此，罗马人在教皇选举时，聚集在红衣主教团周围，高喊道：“给我们一个罗马人！”红衣主教团认为他们至少要推选一个意大利人，否则就会被撕成碎片。红衣主教团匆忙之中推选了那不勒斯的巴里大主教为教皇，称“乌尔班六世”[16]。

这是一次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乌尔班六世真诚地希望改革教会，但基督教会是慈善机构，如果不做善事，就会一无所有。乌尔班六世傲慢、狂热、易怒，做事不考虑策略，用威胁和侮辱的方式强迫红衣主教们放弃荣华富贵。红衣主教团中的一员听了教皇言辞激烈的谴责后，大声回应道：“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你的前任们从未像你今天这样不尊重红衣主教，如果你不尊重我们，我们也不会尊重你。”

罗马再次被阴谋包围。红衣主教团的成员煽动道，他们受到暴徒的恐吓才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对乌尔班六世的选举无效，应另选他

人。最后，在一次秘密会议中，红衣主教团推选出另一位教皇，称“克雷芒七世”[17]。短暂的内战结束后，克雷芒七世从意大利逃往阿维尼翁定居。

第10节　大分裂期

之后的时期被称为“大分裂期”，是教皇权力减弱最严重的时期。罗马和阿维尼翁各有一个教皇，有两套教皇法令。两个教皇都宣布自己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者，是神圣天主教的教父，昭告基督教世界遵从他们的裁决。



教皇乌尔班六世



教皇克雷芒七世

克雷芒七世站在法兰西及其盟国苏格兰、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一边；而乌尔班六世则支持神圣罗马帝国、英格兰和北欧大部分国家。当这两个教皇去世后，红衣主教团继续选出两个敌对的教皇，破坏团结，延续分裂。因此，在争取世俗权力的斗争中，教廷已经忘记改革，怀疑和猜忌的种子不断生长发芽。

凯瑟琳·贝宁卡萨实现了教皇返回罗马的夙愿，但她所祈祷和计划的目标却以失败而告终。14世纪的教皇只是普通人，不具备锡耶纳圣徒那样伟大的灵魂，没有能力完成凯瑟琳所期待的任务。凯瑟琳死后，她的理想也消逝了，而另一种思想逐渐在人们心中生根，即“从基督教牧师到基督本人都呼吁建立一个教会共同组织”。

在基督教早期的历史中，基督教曾经在尼西亚和其他地方开过神

父会议，确立天主教的教义和法律。现在有人建议，再次召开一个由天主教国家参加的大型世界会议，参会者由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会和骑士团的领袖，以及神学和法律博士组成，基督教世界赋予会议结束分裂、谴责异教、改革教会的权力。

这次会议的召集人是查理四世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18]，他也是波西米亚国王文策尔[19]的弟弟和王位继承人。1414年，他在康斯坦茨与参会者见面，西吉斯蒙德通过与路易一世的女儿联姻成为匈牙利国王，但他的臣民并不惧怕他，经常叛乱。在与土耳其人的决战中，尽管西吉斯蒙德因缺乏资金而惨败，但他壮心未已，渴望成为改革教会和国家、改变欧洲命运的主导者。



康斯坦茨会议

康斯坦茨会议给了西吉斯蒙德机会，这个会议开了四年，有时他亲自主持，有时他会访问教皇法庭，试图说服对立教皇辞职，如果教皇顽固不化，国家政权就拒绝庇护或保护他。为了不受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政治争端的影响，西吉斯蒙德甚至尝试充当百年战争调停者的角色，但以失败告终。

第11节　约翰·胡司

不幸的是，西吉斯蒙德参与了康斯坦茨会议的背叛事件。由于文策尔很无能，西吉斯蒙德作为波西米亚王位的继承人，经常参与波西米亚的内政事务，西吉斯蒙德觉得有义务在他未来的臣民中，尤其是在布拉格大学传播威克里夫的教义。在布拉格大学，一个叫约翰·胡司的牧师兼教师每天都在阐述异教派的观点。当时，大学信奉正统天主教的人主要是德意志人，他们深受普通的波西米亚人也就是斯拉夫人憎恨，因此，斯拉夫人都赞成约翰·胡司阐述的关于国家和宗教的观点。



西吉斯蒙德来参加康斯坦茨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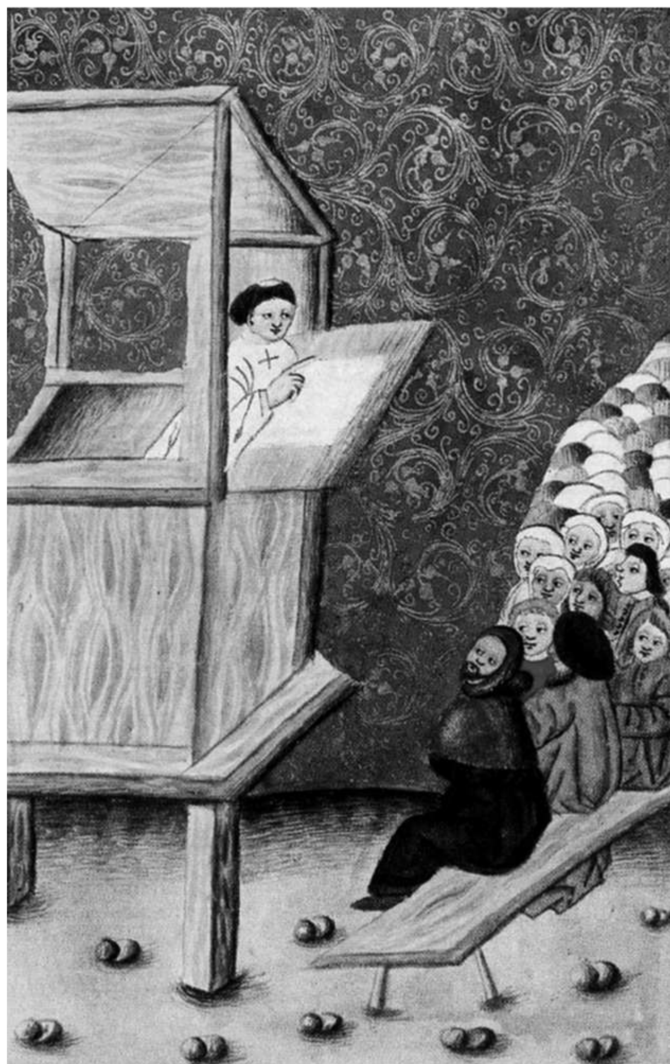
西吉斯蒙德同意约翰·胡司的观点，希望彻底改革教廷，并用适当的方法实现康斯坦茨会议上提出的目标。同时，他相信基督教代表能和约翰·胡司在宗教观点上达成妥协，并说服约翰·胡司放弃一些非常不正统的观点。基于这个目的，西吉斯蒙德发给约翰·胡司特别许可证，邀请他参加康斯坦茨会议。

当波西米亚的民族英雄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前进时，波西米亚人认为约翰·胡司背叛了波西米亚。其中一人说："愿上帝与你同在，我担心你再也不回来了。"这个预言果然成真了。到达康斯坦茨时，

约翰·胡司发现西吉斯蒙德不在。与会者对他所说的一切充满敌意。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审查，约翰·胡司被要求放弃他的学说。他拒绝屈服，被判为异教徒。约翰·胡司被判刑后不久，西吉斯蒙德返回康斯坦茨，与会者威胁西吉斯蒙德必须撤销胡司的特别通行权，否则就解散会议。

西吉斯蒙德被告知，希律王安提帕[20]立下恶誓同意满足希罗底之女的愿望，杀死了施洗约翰[21]。因此，同意异教徒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作为警告，异教徒应该被烧死。因此，为了教廷的利益，必须撤销特别通行权。尽管知道这样做有损名誉，西吉斯蒙德最终还是屈服，因为他更怕历经千辛万苦而召集的会议就此解散，导致任务无法完成，而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1415年7月，约翰·胡司被活活烧死。行刑时，他勇敢地喊道："瞧！我准备死在我所教和所写的福音真理中。"为了防止约翰·胡司被尊为英雄，胡司的骨灰被扔进河里，衣服被销毁。两个世纪前，当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向少数人布道时，教廷对付异教徒的措施是可行的，但当约翰·胡司为信仰而死时，教廷的做法就不可行。西吉斯蒙德没有让会议解散，但他为食言付出了代价。1419年，西吉斯蒙德登上王位，激怒了波西米亚人，战争持续了整整十七年。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胡司战争"。



约翰·胡司阐述异教派的观点



约翰胡司在康斯坦茨会议上辩论

康斯坦茨会议谴责异教派，成功废黜三名对立教皇，并通过联合选举推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结束了教廷长期分裂的局面。教廷改革是会议讨论问题的核心。由于争论不休，没有结论，只好推迟到五年后新教皇再次召集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教廷第一次真正尝试解决中世纪的问题，但教廷改革不是某个人可以决定的，不论是教皇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是由广大基督徒决定的。如果改革遇到的困难太多，失败就不可避免。

从某种意义上说，会议程序是很现代的，一项决议需要很多人表决，避免了独断。但会议的实际操作和运行还是很中世纪的，因为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让与会者带有偏见和误解。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波西米亚人、意大利人相互猜疑，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都不愿意牺牲个人和国家利益而屈服于传统权威。正如中世纪的政治家解读的那样，教廷制定世界规则的日子已经远去，康斯坦茨会议是最好的证据。

---

[1]即汉萨同盟。——译者注

[2]贝尔纳博·威斯康提（1323—1385），意大利政治家，米兰领主。他

野心勃勃，善用阴谋，在位期间与教皇乌尔班五世、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战争不断。——译者注

[3]吉安·加莱亚佐（1351—1402），米兰第一位公爵（1395—1402），中世纪末期米兰的统治者。他曾一度占领维罗纳和维琴察，控制整个波河流域，想要统一意大利北部，恢复伦巴底帝国，但最终未果。——译者注

[4]菲力波·玛利亚（1392—1447），米兰的统治者（1412—1447）。他残忍、偏执、极度敏感，但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时期，米兰雇佣军发展迅速，与以佛罗伦萨共和国为首的意大利联盟之间进行过多次战争。——译者注

[5]让·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著名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以其撰写的法国和意大利历史著作及提出的经济观点而闻名。——译者注

[6]圣马克（？——336），336年当选为罗马教皇，在位约一年，他曾授权奥斯蒂亚主教主持教皇登位仪式，支持建造圣马克教堂。——译者注

[7]圣雷定五世（1215—1296），十七岁加入本笃会，二十四岁在摩罗尼山上苦修，1294年当选为教皇，但不堪各种势力的肆意摆布，当了几个月的教皇后就主动请辞。——译者注

[8]博尼费斯八世（1235—1303），罗马教皇（1294—1303），主张教皇权力高于世俗君权，颁布“神圣一体敕谕”，宣称世俗王权必须服从教皇神权。他与法王腓力四世冲突不断，被腓力四世狠狠教训之后，蒙羞而死。——译者注

[9]安茹的罗伯特（1275—1343），那不勒斯国王（1309—1343），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和西西里国王。查理二世之子，被称为“聪明的罗伯特”。——译者注

[10]查理·罗伯特（1288—1342），匈牙利国王（1308—1342），匈牙利安茹王朝的创建者。他统治期间，镇压大封建主叛乱，推行改革措施，匈牙利国力迅速提升。——译者注

[11]都拉佐的查理（1345—1386），即查理三世，那不勒斯国王（1381—1386），匈牙利国王。乔安娜一世逃亡后，查理成为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他获得匈牙利路易一世的支持以及教皇乌尔班六世的首肯，进军那不勒斯，推翻并处死了乔安娜一世。——译者注

[12]拉迪斯拉斯（1377—1414），查理三世之子，那不勒斯国王（1386

—1414），1414年在匈牙利被暗杀。——译者注

[13]乔安娜二世（1373—1435），查理三世之女，那不勒斯女王（1414—1435），安茹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1420年，为了应对路易三世的攻势，她向阿拉贡和西西里国王阿方索五世求援，并选他为继承人，但不久就反悔，转立路易三世为继承人。——译者注

[14]凯瑟琳·贝宁卡萨（1347—1380），1461年被封为圣徒。——译者注

[15]格里高利十一世（1329—1378），最后一位法兰西籍教皇（1376—1378），也是在阿维尼翁执掌教权的最后一位教皇。1377年，在凯瑟琳·贝宁卡萨的劝说下，格里高利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译者注

[16]乌尔班六世（1318—1389），罗马教皇（1378—1389）。格里高利十一世去世后，乌尔班六世当选为教皇。他推行的一系列宗教改革引发不满，红衣主教枢机宣布他的选举无效，推出克雷芒七世为对立教皇，常驻阿维尼翁，从此开启了教廷六十年大分裂的局面。——译者注

[17]克雷芒七世，与乌尔班六世对立的教皇，两人相互开除教籍，两个教宗分别在阿维尼翁和罗马聚集了自己的势力，造成天主教分裂。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后世的确有一位罗马正统的教皇克雷芒七世。——译者注

[18]西吉斯蒙德（1368—1437），出自卢森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1414年至1418年，他组织召开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终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从而结束了教廷大分裂。——译者注

[19]文策尔（1361—1419），波希米亚国王（1378—1419），也称瓦茨拉夫四世，查理四世之子。瓦茨拉夫四世在位时，波希米亚的王权衰落，贵族叛乱，组成反瓦茨拉夫四世的贵族联盟，瓦茨拉夫的弟弟西吉斯蒙德也参加了这一联盟。——译者注

[20]希律王安提帕（公元前4—39），传说他杀死了施洗约翰。——译者注

[21]施洗约翰，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儿子，因他宣讲悔改的洗礼，而且在约旦河为众人施洗，也为耶稣施洗，故得此名。——译者注

第21章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为了使东欧免受异教的影响，基督教与异教进行了长期斗争。基督教的最后一次失败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时，威尼斯因为自私自利，赶走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然后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个帝国存在了五十七年，但它的根基脆弱，就像一栋地基薄弱的房子，只要遇上一次暴风雨就会坍塌。表面上看，新帝国似乎继承了旧帝国的所有领土，但新任命的封建领主对领地并没有真正的统治权。这些领地仍归希腊和保加利亚贵族所有。在小亚细亚流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尼西亚，一直在等待机会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光复故国。

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的机会来了，他是一位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被任命为年仅八岁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杜卡斯[1]的监护人。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利用这种身份打击异己，宣布他与儿皇帝约翰·杜卡斯为共主。这让事态变得更糟糕了。郁郁寡欢的儿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来又被监禁，于是，巴莱欧罗古斯家族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第1节　东罗马帝国

对基督教而言，这是一段罪恶的时期。许多贵族不满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篡位，纷纷起来反抗。尽管巴莱欧罗古斯镇压了所有反抗，并成功返回君士坦丁堡，但他和他的后代都不是能守住江山的人。巴莱欧罗古斯家族成员既软弱又虚伪。比如，迈克尔狡猾善变，连他的朋友都不信任他。迈克尔是以欺骗和杀戮的手段获得王位的，所以他像意大利暴君一样怀疑一切，唯恐哪位将军会背叛或超越他。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本应在小亚细亚的帝国边境派驻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非常害怕军队背叛，所以一进入君士坦丁堡，就解散了军队，流放了最优秀的军官。事实上，他处心积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或优势，并未考虑帝国未来的发展。因此，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驾崩后，东罗马帝国很容易就成为外敌的囊中之物。

第2节　中世纪时期的近东

除去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的错误统治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在破坏重建东罗马帝国的希望。在拉丁人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获得独立的希腊和保加利亚并不愿意重新效忠东罗马帝国。拉丁人建立的许多附庸国现在由希腊和保加利亚贵族统治。比如雅典公国，尽管法王是其宗主，但法兰西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都在威尼斯人的手中。威尼斯人知道东罗马帝国的舰队曾经在13世纪横扫地中海，所以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威胁其在希腊的商业和军事基地。同时，君士坦丁堡现在无法从中转贸易中获利，因为地中海沿岸城市更愿意与叙利亚和埃及商人直接交易，不愿意向中间市场付费。

综上所述，新的东罗马帝国比脆弱的、不稳定的旧帝国的情况更糟。正如法王腓力四世发现查理曼大帝的经济制度无法适用一样，当时巴莱欧罗古斯家族制定的一系列的法律和严苛的税收制度在外国入侵的压力下已经完全崩溃，同时没有能力提出任何可行的应对方案。

事实上，当时这些篡位的“暴发户”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像阿历克塞·科穆宁一样，向西方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都曾经是狂热的十字军战士，现在他们忙着争夺地中海霸权，因此不会在东部海域结盟。而教皇也因为拉丁帝国被推翻，东正教被恢复而大为恼火，教皇此时更希望诱使东罗马帝国重新皈依天主教。即使天主教国家同情东罗马帝国，但后者自身的政治麻烦太多，无法兑现对天主教国家的承诺。事实上，此时，天主教国家更关注内政，不会再去响应十字军的号召。它们狭隘的利己主义和对希腊人的偏见使自己无法意识到，君士坦丁堡一旦沦陷，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君士坦丁堡为屏障的西欧国家也会深陷危险之中。

第3节　土耳其入侵欧洲

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的儿子、王位合法继承人安德罗尼克斯二世[2]同样是一个残忍而虚伪的人，而且更胆小、懦弱。他看到了被入侵的危险，但既害怕土耳其人，又害怕本国臣民，因此雇用了一支曾经在“西西里晚祷”时期来到西西里，并帮助阿拉贡人战胜安茹家族的加泰罗尼亚雇佣军。雇佣军首领罗杰·弗洛尔曾是圣殿骑士团的战士，因为一些野蛮行径被逐出圣殿骑士团。他希望在新的战场上重建辉煌，掠夺更多的财富。因此，当收到财富和友谊的承诺后，罗杰·弗洛尔和他的军队愉快地起程，向东方进发了。

然而，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在君士坦丁堡胡作非为，有恃无恐，希腊人抱怨说他们太过邪恶。后来，罗杰·弗洛尔和安德罗尼克斯二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争吵过程中，一位西班牙雇佣军将军被杀。这一过激行为，再加上对安德罗尼克斯二世给予的薪酬不满，加泰罗尼亚雇佣军被彻底激怒了。他们从伪装的盟友变成了愤怒的敌人。加泰罗

尼亚雇佣军被赶出君士坦丁堡，一路烧杀抢劫，最后来到雅典。他们攻下雅典，杀死拉丁公爵，建立了独立共和国。



罗杰·弗洛尔和他的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

加泰罗尼亚人安定下来后也就不那么危险了，但他们野蛮的游荡还是给东罗马帝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安德罗尼克斯二世既无力阻挡加泰罗尼亚人，也无力抵抗土耳其人入侵小亚细亚，因为其东部边界的防守太薄弱了。土耳其人大兵压境。不久，东罗马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领土就只剩达尔丹莱斯以北的沿海地带，但最终还是被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人越过海峡，占领了加利波利。加利波利成为土耳其人未来在欧洲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

征服东罗马帝国的君主是奥尔汗[3]，他是奥斯曼[4]的儿子。奥尔汗和巴莱欧罗古斯一样残忍、无耻，但有政治家的胆识。他在征服希腊和其他埃米尔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公正、高效的政府巩固自己的统治，并逐步将各处领土统一了起来。

当安德罗尼克斯二世的孙子约翰五世[5]和其监护人兼联合统治者约翰·坎塔库真努斯[6]之间爆发内战后，约翰·坎塔库真努斯完全丧失了爱国精神，居然向奥尔汗求救，甚至提出把女儿嫁给他。奥尔汗热情地答应了约翰·坎塔库真努斯的要求，并派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带着奢侈

品到色雷斯，向未来的岳父示好。奥尔汗让送礼的军队留在当地。后来，基督徒们发现很难把这支誓死效忠奥尔汗的土耳其军队赶走。



奥斯曼





奥尔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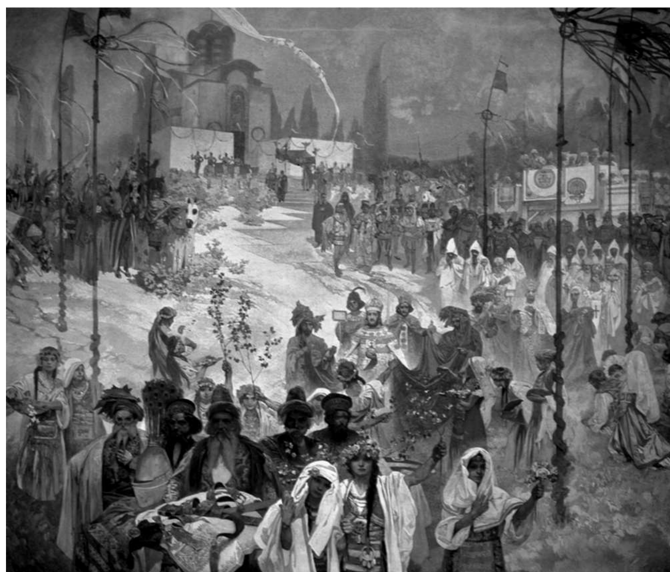
埃米尔的征服传统是不压迫被征服者，而是要求被征服者纳贡或送来小孩。在奥尔汗统治的每个村庄，士兵都要带走一定数量健康而又四肢健壮的男孩，这些男孩被安置在营房里，接受教育，忘记过去的生活，成为战士。他们学习射箭和搏斗，成为一群狂热、高度自律的战士，被灌输的唯一理想就是在战场上获胜。

这些男孩非常忠诚，埃米尔会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人担任维其尔[7]和其他重要官职，而大部分人则会进入禁卫军步兵团。维其尔勇猛善

战、耐力过人，防守水平卓越，威慑整个欧洲。用现代历史学家的话说，“土耳其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伊斯兰教战胜了基督教，被土耳其人驯化的基督教男孩摧毁了自己国家和教会的独立和权威。”

在奥尔汗驾崩几年之后，土耳其占领了阿德里安堡。除东罗马帝国外，土耳其人还与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其他基督教国家发生过冲突。

塞尔维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要斯拉夫民族。在伟大的君主史蒂芬·杜尚[8]的领导下，塞尔维亚成为东欧的主导力量。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的国王向塞尔维亚称臣。塞尔维亚人想同时征服阿尔巴尼亚和东罗马帝国，从而为进军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开辟道路。如果精力充沛的塞尔维亚人能够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征服弱小的希腊人，与强大的土耳其人交手，对基督教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但不幸的是，史蒂芬·杜尚在土耳其人入侵前就驾崩了，把王位传给了年少的儿子，历史学家把他描述成一位安静、和蔼、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



史蒂芬·杜尚登基大典

只有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坚强的意志才可以让塞尔维亚在艰难时期团结起来。塞尔维亚分裂为数个小公国，这给匈牙利路易一世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因为他实现宏图大志的障碍消除了。

在其他的章节中，我们讨论过路易一世的成就。他让威尼斯人低头；把乔安娜一世赶出那不勒斯；夺取了波兰王位；与土耳其人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作战。除建立文明的宫廷生活外，路易一世把精力都花在政治、军事上。因为他对东南欧造成巨大的破坏，所以东南欧最终彻底被土耳其人征服。如果路易一世没有实施入侵塞尔维亚的政策，允许塞尔维亚的各个公国建立联盟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入侵，或者路易一世的实力足够强大，能够建立一个囊括塞尔维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帝国，有力地抵抗土耳其人的入侵，那么中世纪的历史发展将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路易一世虽然因为战胜土耳其而享誉基督教世界，但同时削弱了本应是他盟友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因此对土耳其作战取得的胜利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第4节　哥数伏战役

塞尔维亚遭到匈牙利的入侵，丧失近一半的领土，实力大大削弱了。1389年，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在哥数伏遭遇，双方都记录了这场战役的激烈程度，土耳其人说：“天上的神仙被可怕的噪声惊扰，忘记吟唱赞美真主的圣诗。”塞尔维亚人写道：“战场到处都是裹着红色头巾的头颅，像郁金香花床，他们中没几个能回到自己的国家。”

夜幕降临，战斗结束，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和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一世双双阵亡。就真实战况而言，双方都没有取得胜利，但土耳其还有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的后备军可以补充，而塞尔维亚已经倾其所有，因此战斗的果实完全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



哥数伏战役

一位当地塞尔维亚人说："作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塞尔维亚人永远不会忘记与异教徒进行的最后一场殊死搏斗。哥数伏战役后，塞尔维亚举步维艰，失去了统治东南欧的时机。"

这里安息着塞尔维亚的骄傲[9]

啊！只要有一个婴儿出生，

一个灵魂在这片土地就得到安息。

只要有一片玉米叶，

也会被双手收割，

只要有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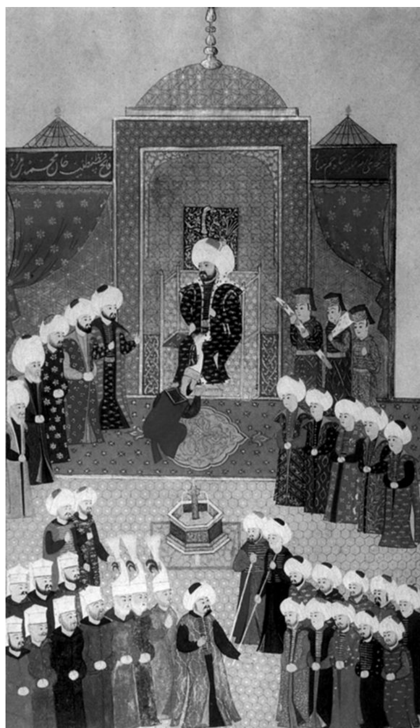
生长在哥数伏平原，

只要，只要……

战死的亡魂

就永垂不朽！

哥数伏战役结束之后，土耳其人对东南欧的征服已成定势，但由于一些苏丹缺乏野心，而且土耳其在小亚细亚又与鞑靼部落展开生死搏斗，所以最终征服东欧的时机一直拖延到15世纪中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决心要统治君士坦丁堡。



穆罕默德二世继苏丹位

在中世纪历史上，穆罕默德二世赫赫有名。他是一位塞尔维亚公主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长着圆润饱满的脸颊、鹰钩鼻、坚毅的嘴巴，更有奉承者说他的胡子像两片玫瑰花蕾下的叶子，每根胡须都是金黄色的。在性格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从一个任性不羁的男孩成长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坚定实现自己野心和欲望的人。他粗通阿拉伯语、希腊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历史学家说，因为穆罕默

德二世阅读了亚历山大和恺撒大帝的人物传记，所以生发了他成为一个伟大将军的想法。

穆罕默德二世的对手君士坦丁十一世是巴莱欧罗古斯家族最后一位成员，也是一位杰出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与土耳其人不同，与自己的祖先也不相同。他勇敢、简朴、慷慨，一心致力于复兴基督教，振兴东罗马帝国。当第一次识破穆罕默德二世的侵略意图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就试图通过释放土耳其战俘破解困境。他派人带话给穆罕默德二世说：“上帝会因你的心软而感到高兴，我也会很高兴，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誓死捍卫我的人民和宗教。”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话经受了考验。1452年秋，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

第5节　君士坦丁堡陷落

约翰五世对天主教国家的援助望眼欲穿。为了与西方交好，约翰五世多次出访罗马，并与教皇妥协，正式摒弃东正教与天主教所有不一致的观点。两派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天主教的弥撒圣餐使用未发酵面包；二是《尼西亚信经》称圣灵来自圣子和圣父。

在所有涉及信仰和教会审判的事务中，约翰五世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公开承认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们的服从没能在危急时刻换来天主教国家的帮助。事实上，约翰五世的做法非但没有获得天主教国家军事上的任何帮助，反倒引发国内强烈不满。很多希腊人认为向教皇妥协就是背叛国家。一些人公开宣称，伊斯兰教的胜利就是对皇帝的惩罚，皇帝背弃了父辈的信仰，因此，在圣索菲亚教堂看到异教徒的红头巾比看到红衣主教的红帽子要好得多。

穆罕默德二世下令用十四门大炮轰击曾经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城墙遭到严重破坏，攻克君士坦丁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据说，穆罕默德二世渴望迅速攻下城市，提出如果希腊人愿意投降，就

确保东罗马帝国皇帝和军队的自由。君士坦丁十一世回应道："我要么选择皇位，要么选择坟墓。"他非常清楚，这两者之一必是他的宿命。

除四千臣民外，君士坦丁十一世可指挥的就只有教皇派来的几百雇佣军、三百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少数西欧人。他率领这支薄弱的军队严防死守，修葺被重炮破坏的城墙。

双方实力悬殊，穆罕默德二世麾下有二十五万八千大军。1453年5月双方展开了最后决战。因为没有多余劳力修复城墙，所以一波波穆斯林战士高喊胜利的口号爬上城墙。在穆斯林战士连续攻击下，城墙很快失守。接着，两军进行巷战。最终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通过鞋上绣的金鹰标志，他的尸体被辨认出来。

因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向天主教屈服，所以很多希腊人在危机时刻不愿出手相助。土耳其人将在圣索菲亚教堂避难的希腊人拉出来，然后卖往塞尔维亚为奴。

第二个基督教城被攻陷，这标志着数个世纪以来恢复旧罗马帝国的中世纪美梦永远破灭了。

根据正义的规律，报应往往滞后，但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事件中，战争罪犯们的自私和冷漠马上就得到了惩罚。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不断膨胀，打算削弱基督教势力。因此，他宣布在圣彼得教堂的祭坛上饲养他的战马。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穿过塞尔维亚，包围了贝尔格莱德。但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基督教国王约翰·匈雅提的顽强抵抗。土耳其人称他为"邪恶的人"。约翰·匈雅提的抵抗换来"匈牙利和神圣罗马帝国东部八十年的和平"。

巴尔干半岛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它们彼此忌妒，不能团结抗敌，但仅靠一个国家又无法制敌，因此一个一个倒在入侵者的铁蹄之下。希腊被土耳其帝国统治了，因贸易利益而被威尼斯抛弃的爱琴海

岛屿也被土耳其帝国夺走了，威尼斯的商业面临着灭顶之灾。



穆罕默德二世准备用巨炮轰击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陷落，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入城



贝尔格莱德之围

[1]约翰·杜卡斯，即尼西亚皇帝约翰四世（1250—1305），杜卡斯王朝的后裔，登基时年仅八岁，后被摄政迈克尔·巴莱欧罗古斯废黜监禁。——译

者注

[2]安德罗尼克斯二世（1260—1332），东罗马帝国皇帝（1282—1328），迈克尔八世的幼子。他的孙子安德罗尼克斯（与其祖父同名，登基后称“安德洛尼克斯三世”）发动叛乱，企图篡位夺权，1328年，安德罗尼克斯二世被孙子击败并遭废黜。——译者注

[3]奥尔汗（1285—1359），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皇帝（1326—1359），帮助约翰六世推翻约翰五世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但在亚洲开疆拓土，而且开始进攻欧洲。——译者注

[4]奥斯曼（1258—1326），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1300—1326），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创立者。奥斯曼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开疆拓土，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他的名字成为帝国的国号。——译者注

[5]约翰五世（1332—1391），东罗马帝国皇帝。他继位时年仅九岁，由约翰·坎塔库真努斯摄政。1346年，他与约翰·坎塔库真努斯共治。1354年，成为唯一皇帝后，他请求欧洲各国援助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均遭拒绝，无果而终。——译者注

[6]约翰·坎塔库真努斯（1292—1383），即约翰六世，东罗马帝国皇帝。他是约翰五世的摄政。为了称帝，他与土耳其结盟，把女儿嫁给奥尔汗。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他与约翰五世共治，1354年被迫退位。——译者注

[7]维其尔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高级官员的称谓。——译者注

[8]史蒂芬·杜尚（1308—1355），塞尔维亚国王（1331—1355）。他在位期间开疆拓土，编纂《史蒂芬·杜尚法典》，巩固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使塞尔维亚成为东欧强国。——译者注

[9]一首古老的歌谣。——原注

第22章

大航海时代

第1节　马可·波罗

在整个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城市成为欧洲与东方交流以及了解东方奇迹的媒介，首先是阿玛尔菲和比萨，然后是马赛、巴塞罗那、热那亚和威尼斯。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叔来到中国，二十年后马可·波罗返回意大利，不仅带回来许多令人惊讶的元朝宫廷故事，还带回来各种红宝石、蓝宝石、钻石和翡翠，因为数量实在太多，所以朋友们都称他为“百万富翁马可”。

在马可·波罗受邀参加的宴会上，他向宾客们描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商人云集，堆金叠玉，富庶得难以想象；他们及其家眷们什么都不用做，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更让这些中世纪的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南方的天堂般的城市有许多公共澡堂，其中最大、最漂亮的澡堂可以容纳四千人。

大汗设的宴会胜过任何欧洲宴会。宴会的宾客成千上万。大汗坐在台上，重要贵族坐在台下。他们每人嘴上都缠着毛巾，以免口气污染皇室餐具。宾客送的礼物珍贵稀有，大汗收到披金戴银的五千头骆驼或五千头大象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大汗的行政系统是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欧洲难以想象的。例如元朝的邮政系统，徒步的信使和飞奔

的骏马把大都和数千里之外的地方连接在一起。收成欠佳时，为了表现皇恩浩荡，大汗不仅免税，还给受灾地区发放救济粮。

马可·波罗描述道，煤在中国免费使用。煤是从山中挖出的黑色石头，可以燃烧，比木头好用。整个中国都在使用这种燃料。

除了详细描述东方的繁荣和富足，马可·波罗还记述了日本、孟加拉、锡兰等地。他称锡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爪哇岛宽“超过三千英里”。

其他旅行者也证实了马可·波罗的许多说法，但无人能像马可·波罗那样简单、真实而生动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比如，14世纪英格兰的约翰·曼德维尔创作了大量小说，但他阐述的真相可能会让读者感到乏味。不管马可·波罗讲述的是事实还是故事，可以看出，中世纪的人们对“中国”或“日本”这样的名字非常感兴趣。西方人普遍相信东方的财富取之不竭，所以决心要分一杯羹。

塞尔柱王朝对基督教充满敌意，像一道屏障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因此，西方与阿拉伯和小亚细亚贸易的危险和成本都增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仍然为西方市场带回大量丝绸、香料和香水，但这些商品的价格却大幅飙升，因为货物在土耳其中转，需要付给土耳其苏丹和埃米尔相应的费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威尼斯与土耳其人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似乎保障了威尼斯人的贸易特权。然而，穆罕默德二世随时可以违背他的承诺，因为他在欧洲已经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穆罕默德二世征收的贸易费用越来越高，对基督徒商人在贸易上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结果威尼斯商人的货品价格上涨了两倍到三倍。



马可·波罗

有两种方法可以避开变本加厉的剥削政策：要么彻底打败土耳其人，迫使他们重新开放通往东方的古老商旅路线；要么发现新航线，不走土耳其的领土。但地中海沿岸城市愚昧、自私，尤其是威尼斯，帮助东罗马帝国战胜土耳其的大好时机已经永远消失，因此，第一种方法显然不可行，只能仰仗第二种方法。中世纪的探索之旅迫在眉睫。

第2节　“航海家”亨利

葡萄牙王子亨利生于14世纪末，是约翰一世[1]的第三子，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外孙。孩提时，亨利王子就因帮助攻克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对岸，北非沿海的摩尔小镇卡西塔而出名。这一胜利让普通的葡萄牙人对征服地中海南岸的城市充满信心，如果征服了黎凡特，就可以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竞争了。不过，亨利王子比普葡萄牙人看得更长远，他在思考谁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是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如果不经地中海，葡萄牙的船向南航行，那会怎样？被称为非洲的未知大陆会有多大？地理学家在非洲的地图上标记了各种标签来掩藏他们的无知，例如“这里存在有翅怪兽！那里有双头怪物！”有没有可能让船先向南航行，然后向东绕过非洲，到达声名远扬的中国，从而避免穿越叙利亚和高加索南侧的贸易航线？



约翰一世（居中而坐者）与冈特的约翰交谈



“航海家”亨利

幸运的是，亨利王子本身就是一位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回答亨利王子的疑问时，很多人告诉他非洲最南端是南角，离丹吉尔不远；

而另外一些人告诉他，如果白人敢于越过某个点航行，皮肤就会因太阳的照射变黑，而且风会吹起海平面的火焰，让海水沸腾。

亨利王子不相信这些传说。他不能亲自航行，因为他经常要在非洲与摩尔人作战。一年年过去了，最后亨利王子自己出资组建船队，挑选最勇敢的水手，并向他们承诺如果在未知的非洲海岸航行，就会获得爵位和财富。亨利王子还在葡萄牙的最南部萨格里什建立了海军军火库。他在空闲时，会来到萨格里什，研究天象，制作图表，并焦急地注视着大海，等待勇敢的冒险者们归来。

在亨利王子的一生中，他资助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发现了马德拉——因森林茂盛亦称“木岛”；还发现了卡纳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冈

比亚和塞拉利昂。很快，亨利王子就不需要再花重金雇用水手冒险了，因为首批探险的航海家带回来黑人和黄金，证明他们去过的地方不仅可以住人，还有无限的财富。因此，探险工作继续愉快地进行。

1471年，在亨利王子薨逝几年之后，葡萄牙的航海家穿过了赤道，迷信随之被打破了，因为航海家们既没被太阳晒黑，海水也没有燃起大火。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开辟去亚洲的新航线。巴塞洛缪·迪亚兹[2]向南航行，冒着暴风雪绕过好望角和桌山[3]，然后向东航行，在阿尔戈亚湾的圣克鲁兹登陆，并立了一个十字架。他本来想继续深入大陆探险，但卡菲尔人用巨石攻击他们，他们只得退回。

巴塞洛缪·迪亚兹打算继续远航，但随行船员厌倦了冒险。面对船员的威胁，巴塞洛缪·迪亚兹被迫屈服。他含着懊恼的泪水，掉头回家。他在里斯本描述航行旅程时，因在非洲最南端遭遇到危险，就把那里称为“风暴角”。但葡萄牙国王听说那里是大陆的末端，前面有可能就是亚洲，因此不同意取这样一个寓意不好的名字，改名为“好望角”，这个名字一直延用至今。

第3节　瓦斯科·达伽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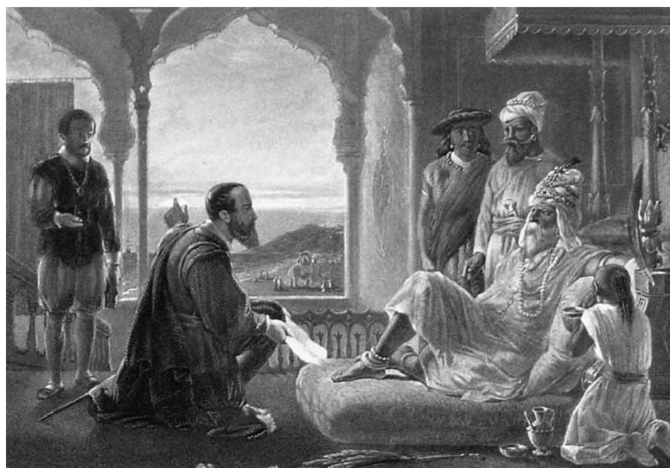
巴塞洛缪·迪亚兹未竟的探险事业在1498年由另一位著名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完成。葡萄牙获取财富的希望都寄托于达伽马的这次航海任务上。当他的船队起航时，很多人手拿蜡烛来到岸边，吟唱庄严的祷文为达伽马送行。很快，这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消失在地平线上。两年八个月过去了，当人们正沉浸在痛苦的绝望中时，英雄们回来了，带回了葡萄牙人难以想象的、更美好、更辉煌的消息。

由于篇幅有限，关于达伽马描述给国王和宫廷的冒险故事就不再赘述。达伽马和他的船员在无边的大海中，在广袤的天空下，航行了好几个星期。他们与霍屯督人发生过冲突，然后绕过好望角，遭遇暴

风雨，导致船体破裂渗水，此时，绝望和疾病击垮了所有的人。但达伽马即使是生病、沮丧到极点，也绝不改变自己的目标，继续向东、向北航行。但由于遭到其他船员的威胁和恳求，只得在圣诞节时在著名的纳塔尔港登陆。



瓦斯科·达伽马离开里斯本



瓦斯科·达伽马觐见卡利切特港的王公

因为在海上长期食用腌制的肉制品，所以船员们一直受坏血病的折磨。在纳塔尔港一上岸，他们就寻找新鲜的水和食物，但遭到了当地部落的攻击，幸好最后在一位阿拉伯领航员的指引下，达伽马一行到达印度的卡利切特港，那里的王公信仰基督教。于是，到亚洲的新航线被发现了。“一趟幸运的旅程，带回这么多翡翠。感谢上帝，让

你给国家带回这么多财富。”葡萄牙人为国家美好的愿景而大声欢呼起来。

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不关注瓦斯科·达伽马远航的影响。很快，威尼斯商人就悲哀地说：“在里斯本购买商品比在威尼斯便宜得多。”威尼斯繁荣的商业丧钟敲响了。

第4节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

与此同时，在达伽马航行获得巨大成功的几年前，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注定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格局。这个重大发现的主人公就是热那亚水手克里斯多弗·哥伦布。据说，他向北最远航行至冰岛，向南到达波尔图桑托岛。哥伦布在业余时间总是伏案研究地图、图表，用数学推断水手遇难的原因。之后，哥伦布向一些船员说了一个让他们无比震惊的航行计划，要找到中国，既不往南走，也不往东走，而是向西穿越大西洋。

下面是14世纪的人们对大西洋的描述，这个令人沮丧的描述在15世纪得到普遍认可：“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船不敢冒险远离陆地。即使水手们知道风向，也不知道风会把他们带往何方。前方没有人居住的国家。船在迷雾和水汽中冒着巨大的风险前行。西方的边界就是大西洋。”

许多人仍然相信世界是平的，而要穿越大西洋，就得冒着被风从地球边缘吹到太空的风险。因此，当哥伦布决定冒险时，遭到很多人的指责和嘲笑，但哥伦布对自己的认识深信不疑，而且由于遭到反对而变得更加坚定不移。

如果没有王室的赞助，哥伦布不可能远航。于是，哥伦布把计划摆在葡萄牙国王面前，希望他能赞助。但不幸的是，非洲海岸的发现

给葡萄牙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繁荣的贸易，葡萄牙的统治者不愿意再投资其他冒险行为，因为投入的资金不能保证有回报。

“后来我去葡萄牙避难，因为葡萄牙国王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王都懂得航海发现的意义，然而……在十四年里，我无法让他明白我所说的话。”在最后一次被葡萄牙国王拒绝后，哥伦布动身去了西班牙。他让弟弟巴塞洛缪带上一封信去向英王亨利七世解释他的计划。有趣的是，计划摆在聪明的亨利七世面前时，亨利七世说即刻研究计划，很快同意予以支持。但巴塞洛缪在返航途中遇险，延误了行程，而此时，哥伦布已经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赞助，在巴塞洛缪带回消息前已经启航出发。

西班牙国王阿拉贡的费迪南对哥伦布的计划犹豫不决，是他的妻子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女王不顾议员和主教的反对，力排众议，决定资助哥伦布。伊莎贝拉女王甚至认为必要时可以卖掉自己的珠宝首饰。这个计划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激发了伊莎贝拉女王的想象，因为她曾经在加利西亚的城门上被一望无垠的灰色海洋深深吸引。当然，比航海发现更有驱动力的是传播天主教的愿望。哥伦布一直被这个愿望所激励，他认为此次航海的本质是十字军东征，他认为自己被上帝召唤，要向居住在中国的数千万异教徒传播福音。



哥伦布觐见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

随哥伦布远航的船员都是“在押人员”。他们犯错惹怒了王室，所以要通过这种方式赎罪，但他们对船长的疯狂冒险旅程丝毫没有热情。从陆地消失在视野之时起，船员们就抱怨不断，甚至企图暴动。一次，罗盘发生异常，船员们惊恐万分，不断抱怨。还有一次，从西往东吹的风持续不停，船员们觉得风向不会改变，可以回家了，但最终却搁浅在马尾藻海。他们觉得，如果一直这样漂流，可能会死于饥渴。每次有人建议向东航行，哥伦布都充耳不闻。他人无数次威胁、劝诱、争辩，哥伦布都不为所动。无数次热切盼望能看到前方的地平线，但结果看到的只不过是低沉的云朵。

终于有消息传来说，在黑暗中看到移动的光芒，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像蜡烛一样上下闪烁。”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黎明的到来，这片被发现的土地后来被称为“巴哈马群岛”，当时被认为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哥伦布穿着盔甲，手持西班牙王室旗帜，这位伟大的发现者登陆上岸，然后谦恭地跪下，和船员们一起跪拜上帝，表达感激和喜悦之情。

哥伦布总共向西航行五次，后来几次航行都相对容易，他不再需

要强迫他人加入航海事业，相反还要防范不受欢迎的偷渡者溜进来。哥伦布带回棕色皮肤的印第安人、色彩绚丽的鹦鹉、闪闪发光的金块和奇异的植物，这标志着他首次航行的成功，足以点燃西班牙人追逐财富的热情。最后，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要求加入远航的队伍。

瓦斯科·达伽马因为航行成功到达印度而获得巨额养老金，并且获封赐尊号“多姆”[4]，最后颐养天年。据说，哥伦布第一次凯旋返航后，西班牙人非但没有将荣耀和赞美授予这位英雄，反倒指责和反对他，因为他带回的黄金不够多，而且他带回的新居民与当地人经常争吵，发生争执；还因为尽管哥伦布是一名伟大的航海家，却不善于与人交往，大家都忌妒他的天赋，决心打击他。

哥伦布第三次远航时，被他的敌人戴上铁链送回来了。他受到了侮辱。伊莎贝拉女王听说后，下令马上释放他，并试图平息他的怒气。过了不久，伊莎贝拉女王驾崩了，而阿拉贡的费迪南的野心在地中海，对他而言，征服那不勒斯比开辟到中国的航线更重要。因此，哥伦布的抱怨并未得到重视，他最终死于贫困，几乎被遗忘。“历经二十多年的艰辛和危险，在他结束最后一次航行登陆上岸后，他痛苦地喊道，我在西班牙连个屋顶都没有。”

哥伦布到达了新世界的入口，而另外一个叫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佛罗伦萨人，远涉重洋，穿过西印度群岛，到达新大陆。

哥伦布的发现对欧洲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西洋不再是欧洲人和未知世界的灰色阻隔，成为不是通往中国，而是通往更广阔西部的“高速路”，那里的财富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那里成为通过进取和勤奋就会有收获的乐土。

通往中世纪商业中心的“高速路”是地中海，而通往现代商业中心的“高速路”是大西洋。欧洲商业的未来不是南部的城市共和国，而是北部和西部的国家，包括葡萄牙和西班牙、佛兰德斯和英格兰，它们

位于旧世界的边缘，但处于新世界的中心。



哥伦布登陆，这标志着发现了新大陆



哥伦布航行归来，向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汇报



哥伦布死于贫困

---

[1]约翰一世（1357—1433），葡萄牙和阿尔维加国王（1385—1433），葡萄牙阿维什王朝的开创者。他在位期间，葡萄牙确立了海上扩张政策，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锋。葡萄牙由此跻身强国之列。——译者注

[2]巴塞洛缪·迪亚兹（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他的父亲、祖父追随亨利王子。1488年，他探险至非洲最南端好望角，为瓦斯科·达伽马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3]桌山位于南非开普敦。——译者注

[4]相当于总督。——译者注

第23章

文艺复兴

历史记录着社会的变化：要么是社会的进步，要么是社会的倒退。但这种变化是缓慢、循序渐进的，就像从黑夜到黎明，从中午到夜晚过渡一样，我们往往觉察不到变化开始或终止的点。只有变化足够明显我们才能注意到，这时才会回头梳理变化过程的种种线索，把它们串联起来，获悉变化的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在短期内看到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经过时间的“磨砺”就会显现出来，比如罗马帝国的解体，“黑暗时代”的文明融合。15世纪末到16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或称“新生”，因为从这时起，中世纪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熟悉、更易于理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世界应运而生。

文艺复兴时期最显著的变革，是以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名义统治世界的中世纪理想已经崩溃。神圣罗马帝国虽仍自命不凡，但其明智的统治者，如鲁道夫一世和查理四世已经意识到，成功要仰仗帝国的君权而非帝国的影响力。教皇已返回罗马，但议会拥有废黜教皇和改革教廷的权力，严重威胁着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梵蒂冈意识到无法阻挡社会变革的浪潮，因此，英诺森三世的理想只能屈从于意大利世俗统治者的意志。15世纪后期历史发展的趋势很显然是小国脱

离大国，纷纷独立。到15世纪末，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也响应这一感召，即使没有建立统一国家，也发展出拥有强烈民族感的省或城邦。

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是人类作为个体的观念发展。在整个中世纪，除了统治者，人只代表一个数字，而不被看作对周围环境系统产生影响的独立个体。在早期，部落要接受其成员的任何行为，无论好与坏，要么支持他，要么替他报仇，这是一种公共义务。这在家族事务中表现得更明显，如数不胜数的家族仇杀，像魏布林根和韦尔夫两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佛罗伦萨的“黑党”和“白党”的斗争。

从民族关系转向社会关系，我们发现中世纪的个人被各种关系束缚，自主选择和决策无法进行。个人行为由其依附的群体决定。在实际生活中，因为封建制度不完善，所以良好的制约体系并没有形成，但从理论上讲，从直属封臣到社会底层的地主，封建制度确定了每个阶层相应的生活准则，规定了领主和附庸封臣的责任和义务。更重要的是，这种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被中世纪的修道院所遵循，要求信徒毁灭自我，绝对服从。我们还记得，圣伯纳个性如此宽容，却无法容忍阿伯拉的观点，因为圣伯纳把自己的判断作为他人的生活准则。而阿伯拉就像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一样，播种了文艺复兴的独立的现代精神的种子，动摇了中世纪世界的基础。

除了修道主义，人还受其他社会关系的束缚——大学、阶级组织、商会（如德意志北部的汉萨同盟）、小规模的城市商会（如佛罗伦萨的“肥人”和“瘦人”商会）、律师行会、鱼商行会……这些机构最后都制定了统一标准，与现代工会酷似，不但规范了工作时间、工资、工作性质、能力业绩等，而且干涉每位成员的生活，规定公众场合应当如何着装，如何进行日常开支。这是一种仁慈的“奴役行为”，是个人因为无知或面对传统的重压，独立思想被无助感湮没而形成的。

传统的重压自然导致文艺复兴酝酿的第三个变革——黑暗思想的天幕被瓦解为团团云雾，虽然仍充满迷信，但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降低了它的浓度。中世纪的人们都期望回归到罗马帝国时期的辉煌，就像胆小的骑手，害怕骏马失去控制，把他们引入未知的歧途，因此不相信社会的进步。

中世纪最早的知识守护者是教会，教会按照自己对使命的理解，尽心尽力地向世界传播知识，教会的座右铭是“尊重过去”，但当教会在传统的祭坛前低头膜拜时，却忽略了另一个伟大的格言“相信未来”，这是现代社会的指路明星。教会对信仰的解读，对知识和艺术的限制，是中世纪早期学校的“必修课”。然而，由于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教化，人们的推理和理解能力不断增强。于是，学校的种种限制就变成了思想发展的牢笼。中世纪的教会曾经是思想的开拓者，但由于失去对现实世界的掌控，横流的物欲遮盖了基督教的精神内涵，削弱了信仰的基础。最后，教会对自己的教义是否为完全真理都产生了怀疑，就像一位商人拒绝睁开眼睛接受新观念，但内心却在偷偷担忧自己经商的方法已经过时。

当哥伦布在主教委员会和西班牙大学的主要成员面前陈述横渡大西洋的计划时，这些人引用《旧约》、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圣徒的主张嘲笑哥伦布的假设。他们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对跖点[1]，因为地球上只居住着挪亚[2]的后裔，而诺亚的后裔又怎能横渡大西洋呢？主教们提出很多类似的反对意见攻击哥伦布的计划，就像罗杰·培根在两百年前因为他从事的科学调查而被判为异教徒一样。罗杰·培根在监狱里耗尽最后的光阴，阿伯拉从演讲厅被赶到修道院，而哥伦布却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证实了自己的设想，从而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是一次重要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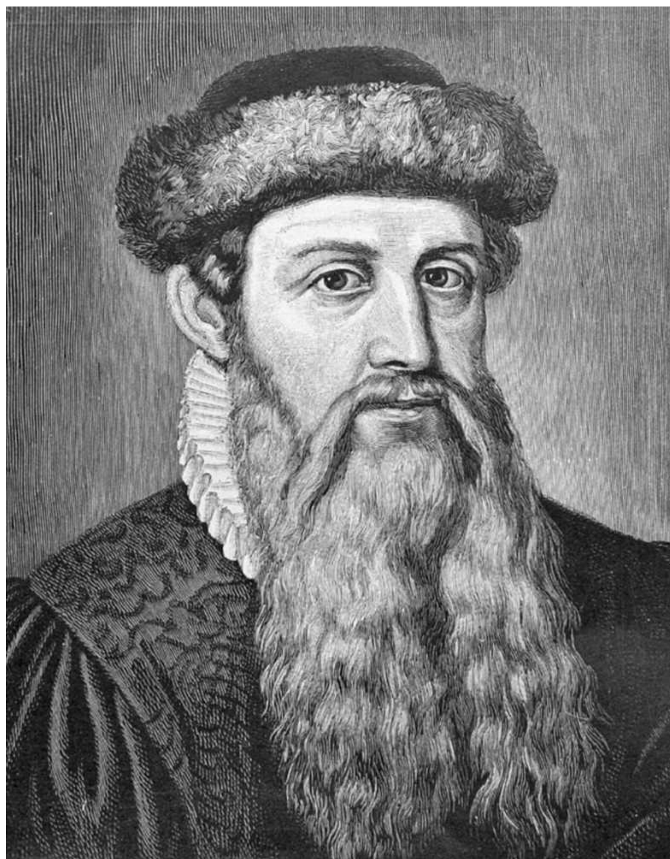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最大的秘密就是放飞人类不安于现状、探寻真理的灵魂。人类的思想就像一只鸟，冲破樊笼的大门，在空气和阳光中自由飞翔，虽然可能危险重重，但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有时，人们

的这种热情可能是愚蠢而多余的，因为他们太专注追求自由带来的乐趣和荣耀，所以义无反顾地要摆脱牢笼的束缚，尽管牢笼至少曾经是躲避现代世界暴风骤雨的避难所。

查理曼大帝认为，“没有知识，工作不可能出色”。文艺复兴早期的人们并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注重善行或救赎，但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没有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生活。

在知识的传播方面，如果文艺复兴还像中世纪那样限制重重，只是少数有学识的人的一场运动，而广大人民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很有可能变成膜拜，最终就会像一棵无根的植物很快凋亡。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伟大的思想从修道院的图书馆来到外面的世界。修道士们曾经只能辛苦地收集、手抄、整理知识，知识传播速度缓慢。后来，知识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辐射整个欧洲。人们的大脑和胃一样，对各种知识都充满渴望。

一个叫约翰·古登堡[3]的德意志人发明了西方活字印刷术，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实现自己的设计，只能向美因茨的一位富商约翰·福斯特借钱。约翰·福斯特并没有善待约翰·古登堡，一认清这项发明的价值，就要求约翰·古登堡马上还钱。约翰·古登堡没有能力还钱，只能把工厂抵押给他。然后，约翰·福斯特开始自己印刷。当美因茨的百姓看到约翰·福斯特印刷的《圣经》，发现每个字都是第一本的复制品时，无比惊讶，认为约翰·福斯特把自己卖给了魔鬼，正在练习魔法。据说，浮士德博士的传奇故事激发了很多诗人、音乐家和剧作家的创作灵感[4]。



约翰·古登堡

英格兰的第一位印刷商是肯特人威廉·卡克斯顿[5]。当时，英王爱德华四世和宫廷的人充满好奇、饶有兴趣地看他印刷，完全没有意识到小小的机器会带来怎样的精神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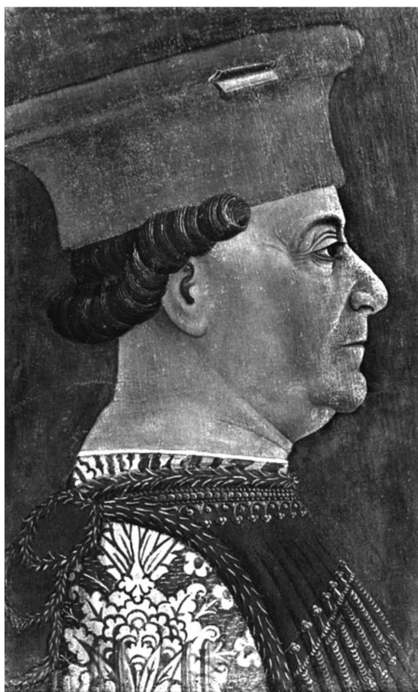


英王爱德华四世和宫廷的人充满好奇、饶有兴趣地看威廉·卡克斯顿印刷

意大利最伟大的印刷商是威尼斯人。威尼斯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书籍，至今仍备受赞赏，成为收藏家趋之若鹜的收藏珍品。在现代社会，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方式非常丰富，印刷术退化为一门产业。而在15、16世纪，印刷术被认为是一门艺术。罗马人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6]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可以模仿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笔迹。当时，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最聪明、最有进取心的人。他们辅佐、帮助他。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在威尼斯成立了阿尔丁出版社，希望出版当时希腊所有著名作家的作品。荷兰文艺复兴领袖的好几本著作也是阿尔丁出版社出版的。威尼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欧洲新思想的聚集地。

15世纪的意大利与14世纪的意大利完全不同：五强鼎立的局面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形成，其中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建立了联盟，以维持半岛的权力平衡，阻止威尼斯扩张的野心，但威尼斯的势力在大陆仍不断壮大。在那不勒斯，费兰特一世[7]，也就是阿方索五世的私生子，取代了暴君父亲的统治；在米兰，中世纪最著名的雇佣军领袖弗朗西斯科·斯弗扎[8]围攻他的雇主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提，最后两大家族合成一个新家族，1441年，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提被

迫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安卡嫁给斯弗扎，随后承认斯弗扎是王位继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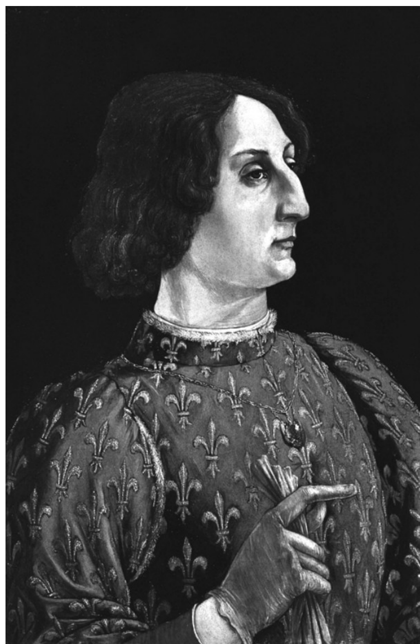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科·斯弗扎



安卡。她是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提的独女

第1节　莫罗

这个新家族继续传承威斯康提的恐怖传统。据说弗朗西斯科的儿子加莱亚佐·玛利亚·斯弗扎非常残忍，毒死自己的母亲，活埋他的臣民。加莱亚佐·玛利亚被暗杀后，他的弟弟卢多维科·斯弗扎[9]独揽大权。卢多维科·斯弗扎把侄子吉安·加莱亚佐·斯弗扎软禁在帕维亚，并对外宣称吉安身体欠佳，由他代表吉安行使权力。卢多维科·斯弗扎肤色黝黑，所以被称为“莫罗”或“摩尔人”。



加莱亚佐·玛利亚·斯弗扎



菲利普·德·科米纳这样描述卢多维科·斯弗扎："他很聪明，但很胆小，有些神经质。他没有什么信仰，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违背誓言。"表面上看，他极具文艺复兴时期王者的风范，举止和蔼可亲，以热情、智慧、有学识而闻名，吸引了许多画家、雕塑家、作家、学者、军事人才和时尚人士。

不难发现，意大利正在张开双臂，拥抱新的人文和艺术精神。在吸引和奖励人才方面，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米兰竞争激烈，甚至中世纪传统的守护者、抵制任何思想自由的罗马的教皇们，现在也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教皇尼古拉五世[10]建立了梵蒂冈图书馆。

最后，我们转向"鲜花之城"佛罗伦萨。之前，我们只注意到佛罗伦萨的"黑""白"党之争，以及与菲利普·玛利亚·威斯康提的战争，但在世纪之交，佛罗伦萨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旧理想，而愿意接受一个表面上伪装成自由选举的政府的家族统治。

美第奇家族没有王族血统，不像斯弗扎那样好炫耀，是一个银行家族，依靠辛勤劳动和智慧，在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欧洲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他们的贷款稳固了许多王室的统治，否则它们就有可能会因为资金缺乏而导致统治崩溃。因此，美第奇家族可以通过获得外部影响力来垄断政治大权。

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人是普通商人、谦逊的公民、易于接近的朋友。他们声誉日隆，逐渐成为一个高呼自由口号的集团。美第奇家族甚至愿意选举对手在政府中担任职务。

第2节　科西莫·德·美第奇

科西莫·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获得王权的奠基者，与许多在政

府中担任要职的贵族关系亲密，虽然赢得了贵族的支持，但还是保持低调，以免公众担心出现暴君统治。科西莫·德·美第奇经常不带随从，身着便装走在大街上，与遇到的商人友好交谈。商人兴趣相同，对放贷感兴趣。他还会像乡村绅士一样，与托斯卡纳的农民讨论农业问题，也会为劳动者提供资金帮助，还会向乞丐散发钱财。

科西莫·德·美第奇死后，伤心的国民在他的墓碑上刻着“国父”两个字。他们感受到了美第奇政府给予他们的好处，但没有意识到或不关心捆绑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科西莫·德·美第奇对待仇敌的手段高明，一方面彻底清除顽固不化的仇敌，另一方面用各种方法削减潜在仇敌的财富，为政府买单，之后他还因此获得赞誉。同时，他通过贿赂和威胁的手段拉拢仇敌的朋友和支持者。最后，他的仇敌们因为众叛亲离而被迫离开城市，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即使仇敌跑到国外避难，他也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到处追捕，直到仇敌灭亡。因此，任何一位对现状不满的公民，因为顾忌美第奇家族的势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反抗自由政府。

据说，税收是美第奇政府统治的一把利剑，所以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科西莫·德·美第奇曾说：“城市受到伤害比被毁灭要强得多。管理政府比坐着祷告付出得多。”

科西莫·德·美第奇和他的后代都不属于查理曼大帝或阿尔弗雷德大帝一类的伟大君主。他们的治国理想比较低级，只为满足自己的利益，但他们的真实想法被巧妙地隐藏了。一旦他们的想法暴露，不要忘了，他们没有威斯康提那样的雇佣军队。佛罗伦萨愿意被腐化，因为它没有得到向往的自由，因此心甘情愿地接受美第奇家族仁慈的专制统治，享受前所未有的物质上和政治上的繁荣。马基雅维里说：“如果不施恩惠，美第奇家族不会在佛罗伦萨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拥有赫赫权势。”



科西莫·德·美第奇

第3节　新学

正是在美第奇家族的“呵护”下，佛罗伦萨而不是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成为思想复兴的发源地。从这里，新学辐射到全欧洲。新学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它仍然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从过去寻找灵感，倡导古典复兴。在这个时期，希腊和拉丁作家的手稿，男神和女神的雕像，几乎和早期圣人的遗物一样受人尊敬。富人们为了从受宠若惊的希腊人手中购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文学作品而匆忙赶往东方；而在意大利的演讲大厅里，如饥似渴的学生们沐浴在古代哲学和历史

的新曙光中。大家学习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一位著名的学者在听说运送古典书籍的海船沉没后，难过得一夜白了头。

科西莫·德·美第奇是“饱学之士的朋友和资助人”。到他孙子“华丽者”洛伦佐·德·美第奇[11]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达到顶峰。洛伦佐·德·美第奇模仿古希腊的学术机构，建立了“柏拉图学院”，成为当时最睿智、最聪慧的智者的角斗场。这里有激烈的文字竞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点的捍卫者展开激烈的辩论。这里欢迎被迫逃亡的希腊饱学之士，只要他们愿意为他们民族的文学瑰宝做演讲，随时会被热情的听众围得水泄不通。这种热情让人回想起阿伯拉在巴黎阐述他的神学理论时的盛况。

这群学者中最有名的是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12]。邓斯·司各脱把逻辑推理的过程提升为一门艺术。有人说：“他的经院哲学到达人类的极限。”普通的神学家根本无法与邓斯·司各脱辩论，因为他们即使快速转动脑子，也跟不上邓斯·司各脱推理的节奏，最后只能打着响指，喊道：“哦！邓斯，邓斯。”因为邓斯·司各脱在知识悖论推理方面富有技巧，所以他和他的命题成为荒谬的代名词，后人常用“邓斯”来形容缺乏逻辑的愚蠢之人。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来说，中世纪演讲厅的辉煌既不震撼，也无魅力。亚里士多德仍备受推崇。人们努力使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柏拉图的观点与当前的宗教信仰相匹配，但这种尝试与中世纪思想努力的方向完全不同。

“救赎”“上帝之城”等词汇，是从圣奥古斯丁到圣多米尼克再到圣托马斯·阿奎纳时期的关键词汇，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只有一个主题词——“人文”。

这些苦苦追寻人文主义的古典哲学家，一千年后能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希望他们找到的答案与教会传播的信仰

一致，但即使不一致也无关紧要，不会因此被定为异端邪说。人们对生命的短暂和灵魂的不朽同样感兴趣，因为这就是今生的美丽和魅力所在，也是来世的荣耀。



洛伦佐·德·美第奇



邓斯·司各脱

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人们不再遵守严格的学院传统，而更注重文学灵感的迸发，受文艺复兴思想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渐渐地使用表达更自然的本族语言，而不是希腊语或拉丁语进行创作。

“新学”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再认为文学作品只能由希腊语或拉丁语书写。随着学术的发展，人们发现生动的民族语言才是表达国家理想和抱负的最好方式。使用民族语言的倡导者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出现了。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就是使用本民族的意大利语创作了

他的著作《神曲》，尽管作品立意只是模仿古典作品，并非独创。黎恩济的朋友——崇尚自由的诗人彼特拉克，对自己用意大利语创作的十四行诗感到羞愧，但他的意大利语诗仍然比他的拉丁语诗更有魅力，诙谐流畅，与薄伽丘的诗风格相似。

这些都是文学界不朽的名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进入“新学”时期，“柏拉图学院”成员发表的大部分作品已如一潭死水，就像经院哲学一样。如果我们现在翻开这些书籍，还是很难相信那些华丽的句子、冗长的论述曾让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获得新生、自由的文艺复兴，在文学方面的魅力不在于创造，而在于质疑和批评。文艺复兴的领袖们忙着清除旧传统，为新思想收集素材，建立文学的基础，拓宽新的视野。现代世界的文学“巨匠”得以在前辈困顿、停止或失败的基础上创作出传世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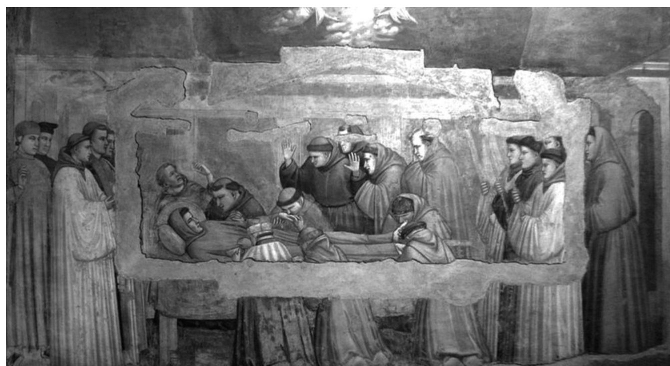
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创作的十四行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热爱自然和诗歌。但他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声名，不在于他的文学成就，而在于他对学者和艺术家慷慨的资助和欣赏。卓越的政治智慧使他成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

第4节　乔托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还带有实验性质，那么绘画已经大放异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与中世纪大不相同，贴近自然和人类生活，例如魔鬼设下陷阱，捕获来自天堂的灵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也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艺术家们用对过去的追寻和对未来的向往来指引他们的画笔。正是圣弗朗西斯的生活让新艺术的伟大先驱乔托找到了理想化的人文意识，激励他摆脱拜占庭的僵硬、粉饰和非人性的传统模式，再现他在田野、街道看到的普通生活。

著名的佛罗伦萨画家契马布埃[13]发现乔托时，乔托还是个牧羊

少年。他身旁放着许多用石头压着的羊图案剪纸图。契马布埃把乔托带走收作学徒。乔托很快就超过老师，脱颖而出，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都听说了乔托在色彩应用和设计上的才能。莱昂纳多·达·芬奇称“他以自然为向导”。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农民天才的故事。乔托身材矮小，面貌丑陋，而他所描绘的世界却充满欢乐和幽默。一次，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要求乔托为自己动荡不安的王国设计一个象征。于是，乔托画了一头佩戴马鞍的驴，嗅着放在地上的马鞍。乔托说：“这就是你的臣民，每天都在寻找新主人。”没有哪位政治家真正了解中世纪的那不勒斯。



让乔托声名鹊起的是他在阿西西教堂和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的墙壁上创作的反映圣弗朗西斯生活的壁画。此为其中一幅，表现了圣弗朗西斯去世时的情景

让乔托声名鹊起的是他在阿西西教堂和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的墙壁上创作的反映圣弗朗西斯生活的壁画，其中只有少量作品保存较好，可以看到画家清晰、细致的着色和大胆的轮廓，而大部分作品受时间和天气的影响，破坏严重，并且很难修复。对普通的观光者而言，这些只是一些传奇图画，设计多少有些粗糙，但当观众屏声息气欣赏画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最亲切的圣徒传说——他行走在翁布里亚群山之中，他的行为和思想比活生生的话语更生动。

要了解乔托的天赋对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乔托所处时代之前的绘画艺术是僵硬、不真实的，就如我们如果脱离哥伦

布所处的时代，以现代航海技术评价他发现美洲大陆的意义，我们就无从知晓哥伦布的伟大。乔托和哥伦布一样，有许多模仿者和追随者，其中一些也扬名立万，但人们仍然铭记乔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先驱，并遵照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命令，将拉丁文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上面写道："我就是让僵死的艺术复活的人……我使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

乔托和他的"流派"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描绘历史的画家，没有哪个时代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这么多的天才画家，所以用几个简短的段落不可能浓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历史，但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我们必须要讲述，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体现文艺复兴的精神，他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第5节　达·芬奇

达·芬奇出生于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一个叫芬奇的村庄。他喜欢称自己是佛罗伦萨人。他是一个私生子，显然不可能获得多少遗产。不过，他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

瓦萨里说："天堂最富有的礼物有时会赐予同一个人，让他同时获得漂亮、优雅和天赋，世间少有。因此，无论达·芬奇做什么，每个行为都那么神圣，把其他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段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如果我们了解达·芬奇，就知道他的确像瓦萨里描述的那样，无论在体格还是智慧方面都出类拔萃。达·芬奇体格强壮，可以徒手扳直马掌。他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和热情。他只要在场，就可以立刻驱散人们的悲伤。在大街上，达·芬奇可以驯服狂暴的烈马。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达·芬奇身上没有一点儿中世纪的痕迹。虽然生活充满苦难和艰辛，但他依然充满热情和力量。据说，达·芬奇和圣弗朗西斯

一样，看到大街上出售关在笼子里唱歌的小鸟，会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放飞。

达·芬奇的画本中净是马的图画。依据当时的观点和现存的设计草图判断，达·芬奇最伟大的作品应该是著名的雇佣军首领弗朗西斯科·斯弗扎之子卢多维科·斯弗扎骑在马背上的雕塑。不幸的是，几年后，法兰西士兵把卢多维科赶走，并毁了他的雕像。

达·芬奇被称为"意大利油画真正的奠基人"。他比较重要的油画作品是《最后的晚餐》。他首次使用油画颜料，在米兰附近修道院的墙上作画。因为气候潮湿，所以在他去世前，颜色就开始脱落了。经过反复修改，画面简洁，人物安排合理，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之作，足以证明达·芬奇的天赋。在达·芬奇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蒙娜丽莎》和《岩间圣母》。这两幅油画作品都收藏在卢浮宫。

达·芬奇在工程学、解剖学和物理学方面超前于他的时代。他擅长发明，猜想到蒸汽的力量，苦苦钻研飞机模型。时人认为他的想法不可理喻，一笑而过。多才多艺的达·芬奇能找到乐趣。他的艺术让他人羡慕不已，却使自己陷入忧郁。有人这样描述达·芬奇，"当他坐下开始作画时，充满恐惧"。他反复修改、破坏，画作难以达到他要的理想状态，但周围的人认为已经很完美。虽然这位不知疲倦的大师的画作成品并不多，但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却是无与伦比的。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杰出的代表——热切追求真理，渴望活力，热衷实验，最重要的是充满同情心。没有人比达·芬奇更能代表文艺复兴的精神，他完美地阐释了这句格言——"我是一个人，任何与人类无关的东西都不属于我的本质。"



《岩间圣母》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位“老师”在黑暗时期储存旧知识，却注定向全世界传播“新学”。“智者”洛伦佐和“华丽者”洛伦佐统治时期的佛罗伦萨阳光明媚，虽然当时五国鼎立，但由于洛伦佐杰出的政治才干，半岛力量均衡，局势稳定，意大利美好的未来似乎在预期之中。但到了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那一年，洛伦

佐去世了。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听到消息后，预言“意大利的和平也结束了”。事态的发展的确如此，洛伦佐·德·美第奇和他的家族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很快就受到了威胁。

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14]上台后，佛罗伦萨的政治智慧被统治错误所取代。皮耶罗·德·美第奇完全遗传了母亲家族的基因，和其他罗马贵族一样傲慢、倔强。他在货摊林立的大街上踢足球，傲慢无礼地对待商人，对谏言置若罔闻。他很快意识到美第奇家族的专制统治不是依靠军队的实力，而是依靠公众的善意，只要逆风刮来，国家就会灭亡。而这吹向意大利的旋风来自法兰西。但事实上，这是卢多维科·斯弗扎，而不是皮耶罗·德·美第奇播下的种子。

菲利普·德·科米纳曾经将卢多维科描述为一个“敏感而胆小的人”，卢多维科·斯弗扎对侄子吉安·加莱亚佐·斯弗扎的处置使自己处于猜忌和恐惧之中。吉安·加莱亚佐不学无术，身体羸弱，没有胆量反对他的叔叔，但他迎娶了那不勒斯的公主。她就是费兰特一世的孙女。当公主向她的家族不断抱怨时，她的家族强烈谴责卢多维科·斯弗扎，卢多维科·斯弗扎的麻烦就开始了。

卢多维科·斯弗扎本想与米兰最害怕的敌人威尼斯结盟，共同对付那不勒斯，或者与佛罗伦萨、罗马结盟，维护自己的政权。因此，卢多维科·斯弗扎必须放弃洛伦佐提倡的维护半岛势力平衡的政治观点，向阿尔卑斯山北侧寻求支持和帮助。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教皇和米兰的统治者都采取过这样不爱国的措施。现在米兰找到一个请求法兰西王国援助的借口，因为法兰西安茹第二王室的国王——费兰特一世的父亲阿方索五世被驱逐出那不勒斯。

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卢多维科·斯弗扎说服以重振安茹第二王室而闻名的法王查理八世[15]攻打那不勒斯。1494年，法兰西远征军吹响号角，声势浩大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卢多维科·斯弗扎吹嘘道：“我会帮助你成为比查理曼大帝更伟大的国王。”卢多维科·斯弗扎

把诱饵在查理八世眼前晃来晃去。但结果超出了卢多维科·斯弗扎的预期，给他带来新的恐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嘲讽道："法兰西人只用削尖的木棍和粉笔标记过夜的住所。"

第6节　法兰西入侵意大利

法兰西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胜利。法军从北向南穿越意大利，进入佛罗伦萨，流放了皮耶罗·德·美第奇和他的兄弟，迫使罗马臣服，横扫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那不勒斯的臣民兴高采烈地跑出来迎接新的征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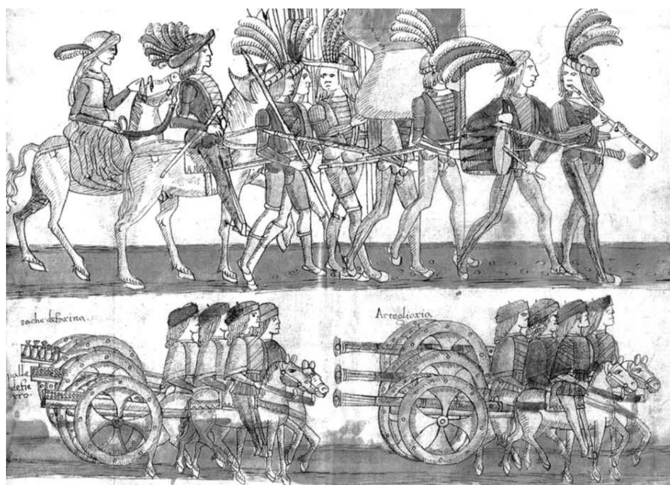
当然，年轻的法王查理八世不是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身体笨拙，脑袋很大，野心膨胀，头脑简单，行为放荡，声名狼藉。法兰西人科米纳深知自己的国王才疏学浅，认为远征军取得胜利一定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因为国王的智慧不值一提。但意大利历史学家认为意大利人受辱的原因是意大利的政治和军事衰落了。

14世纪的雇佣军在意大利处于被奴役的地位。雇佣军曾经是严肃的职业，随着时间的发展，后来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一颗棋子。15世纪的雇佣军和约翰·霍克伍德一样是战争狂徒，但现在受到文艺复兴的洗礼，已经失去中世纪的血腥味。他们一方面为了获得报酬，希望有战争发生，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经受战争的危险和艰辛。

以下是马基雅维里具有讽刺性的评论：

> 雇佣军首领不遗余力地减轻自己和士兵的疲劳与危险，不鼓励在战场厮杀，而是等着束手就擒，成为战俘……他们不会夜袭任何城镇，也不会主动攻击敌人。他们的营地没有堡垒和壕沟。他们冬季不打仗。

在法军入侵之前，雇佣军首领不通晓战略战术，只会速战速决，取得胜利。现在，意大利军队不是像被割草一样消灭，就是仓皇逃跑。因此，两军对阵的形势是一方是真实的，另一方完全是虚假的。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的1494年被视为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水岭，就像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在476年放弃王位，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开端一样。这种划分不是以特定的事件为依据，这些事件只不过是旧秩序终结、新秩序开始的标志。



法军远征那不勒斯

第7节　中世纪的终结

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约翰·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达伽马完成他的印度之旅，这些都见证了世界的“新生”，见证了现代世界的萌芽，但也见证了旧世界——中世纪的灭亡。

被法兰西征服者的压迫和傲慢刺痛后，意大利军队把他们暂时逐出了那不勒斯。但查理八世入侵造成的影响很难抹去。意大利在罗马

帝国时期是欧洲的中心，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散发着光芒，到中世纪时期，意大利仍抱有这样的幻想，但现在这个“骗局”暴露了。意大利至高无上的权威彻底崩溃。世界政治重心已经发生变化，于是，意大利的传统和理想也随之改变。

---

[1]对跖点是指地球同一直径上相对的两个地方。——译者注

[2]依据《创世纪》，上帝看到地球上充满各种邪恶，想要用洪水消灭恶人，但他发现地球上还有好人挪亚，于是指示挪亚建造一艘方舟，让挪亚与他的家人以及各种陆上生物躲避他制造的洪水灾难。——译者注

[3]约翰·古登堡（1400—1468），德意志发明家，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印刷了著名的《古登堡圣经》。他的发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先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译者注

[4]比如《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它是英格兰作家马洛创作于1588年的剧本。浮士德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对中世纪的学科深感厌恶，于是与魔鬼签订了协议，将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魔鬼则要在此后的二十四年中满足浮士德所有求知的愿望。这里指人们将约翰·福斯特比作浮士德，将灵魂卖给了魔鬼。——译者注

[5]威廉·卡克斯顿（1422—1491），英格兰首个印刷商，懂多种文字，出版了约一百本书，包括《坎特伯雷故事集》《亚瑟王之死》等。其中有二十四本是他自己的译作。——译者注

[6]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1450—1515），意大利出版家，创办了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出版了《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等。——译者注

[7]费兰特一世（1423—1494），那不勒斯国王（1458—1494）。他继位后，安茹公爵约翰为夺回那不勒斯发动了战争。1460年，费兰特一世击败安茹家族，巩固了王位，并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佛罗伦萨执政洛伦佐·美第奇结盟。——译者注

[8]即弗朗西斯科·斯弗扎一世（1401—1466），意大利雇佣军首领、米兰公爵，斯弗扎家族在米兰统治的开创者。——译者注

[9]卢多维科·斯弗扎（1452—1502），弗朗西斯科·斯弗扎的次子，绰号“摩尔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他开凿运河，修筑城防，庇护艺术家和科学家，使米兰宫廷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译者

注

[10]尼古拉五世（1397—1455），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教皇。他反对教皇独揽教廷大权，加强立法，禁止神职买卖。他重视学习古典文化、艺术，兴建了梵蒂冈图书馆，罗马教廷因此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中心。——译者注

[11]洛伦佐·德·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政治家、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他用收买、政治联姻、外交等手段，加强国内统治，维护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和平。他统治期间，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高潮，他被称为“伟大的洛伦佐”。——译者注

[12]邓斯·司各脱（1265—1308），文艺复兴早期英格兰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他沿袭方济各会传统，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观点，尊崇圣奥古斯丁，强调神的终极性体现在意志上。著有《巴黎论著》《牛津论著》《问题论丛》等。——译者注

[13]契马布埃（约1240—1302），意大利画家，乔托的老师。他的艺术承袭中世纪拜占庭风格而又有所创新。他是文艺复兴新艺术开始从中世纪旧艺术转化的先锋。现存主要作品是《圣特里尼塔的圣母像》。——译者注

[14]皮耶罗·德·美第奇（1472—1503），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492—1494），洛伦佐·德·美第奇的长子。1492年当选佛罗伦萨正义旗手。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迅速投降，之后被流放。1503年在加里亚诺河溺亡。——译者注

[15]查理八世（1470—1498），法兰西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1483—1498）。他野心勃勃，企图控制意大利。1495年加冕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法军战败，他被迫于1495年底退出意大利。——译者注

专有名词中外对照

St. Paul	圣保罗
Virgil	维吉尔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Romulus	罗慕路斯
Carthage	迦太基
Ceylon	锡兰
Alexandria	亚历山大港
Nîmes	尼姆
Picts	皮克特人
Border Country	哈德良长城
Rhine	莱茵河
Danube	多瑙河
Dacia	达契亚
Caesar Augustus	恺撒·奥古斯都
Tacitus	塔西佗
Gaul	高卢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Teuton	日耳曼人
Octavius	屋大维
Seven Hills	罗马七丘
Pontius Pilate	本丢·彼拉多
Tiberius	提比略

Nero	尼禄
House of Julius	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
Vespasian	维斯帕先
Germania	《日耳曼尼西亚日志》
Corsican	科西嘉人
Spartan	斯巴达人
Flanders	佛兰德斯
Franks	法兰克人
Alemanni	阿勒曼尼人
Saxons	撒克逊人
York	约克
Chester	切斯特
Goths	哥特人
Alps	阿尔卑斯山
Huns	匈奴人
Vandals	汪达尔人
Jehovah	耶和华
Juppiter	朱庇特
Zeus	宙斯
Juno	朱诺
Hera	赫拉
Ulysses	尤利西斯
Mercury	墨丘利
Epicurus	伊比鸠鲁
Zeno	芝诺
Stoics	斯多葛派
Brutus	布鲁特斯
Portia	波西娅
Daphne	达芙妮女神
Trajan	图拉真

Marcus Aurelius	马库斯·奥勒利乌斯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us Chlorus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
Maxentius	马克森提乌斯
Sicilians	西西里人
Moors	摩尔人
Pontifex Maximus	大祭司长
Helena	海伦娜
Edict of Milan	米兰敕令
Apostles' Creed	使徒信经
Arius	阿里乌
Nicea	尼西亚
Athanasius	亚大纳西
Arianism	阿里乌教派
Ulfilas	乌尔斐拉斯
Upsala	乌普萨拉
Simon Stylites	坐柱者西门
St. Gregory	圣格里高利
St. Basil	圣巴西尔
St.Ambrose	圣安布罗斯
Theodosius	狄奥多西
St. Jerome	圣杰罗姆
Assisi	阿西西
St. Francis	圣弗朗西斯
Byzantium	拜占庭
Golden Horn	金角湾
Hellespont	达达尼尔海峡
Black Sea	黑海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Valentian	瓦伦特

Valens	瓦伦斯
Visigoths	西哥特人
Tartar	鞑靼人
Dacia	达契亚
Thrace	色雷斯
Athanaric	阿森纳瑞克
Arcadius	阿卡迪乌斯
Honorius	霍诺留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Alaric	阿拉里克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
Bethlehem	伯利恒
Hippo	希波
Confessions	《忏悔录》
Civitas Dei	《上帝之城》
Titus	提图斯
Aurelius Symmachus	奥里利乌斯·西玛克
Marseilles	马赛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
Strait of Gibraltar	直布罗陀海峡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Genseric	金塞里克
Attila	阿提拉
Chalons	沙隆
Aquileia	阿奎利亚人
Venice	威尼斯
Leo I	利奥一世
Tiber	台伯河
Odoacer	奥多亚赛
Theodoric	狄奥多里克

Boethius	波依提乌
Nicene Creed	《尼西亚信经》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哲学的慰藉》
Justinian	查士丁尼
Saint Sophia	圣索菲亚大教堂
Corpus Juris Civilis	《罗马民法大全》
Canon law	教会法
Persia	波斯
Belisarius	贝利萨留
Narses	纳西斯
Lombards	伦巴底人
Elbe	易北河
Alboin	阿尔博因
Pavia	帕维亚
Athaulf	阿萨尔夫
Honorius	霍诺里乌斯
Bay of Biscay	比斯开湾
Aquitania	阿基塔尼亚
Toulouse	图卢兹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Rhone	罗纳河
Salian Franks	萨利安-法兰克人
Woden	沃登神
House of Meroveus	墨洛温王朝
Clovis	克洛维
Soissons	苏瓦松
Reims	兰斯
St. Remi	圣雷米
Clotilda	克洛蒂尔达
Ripuarians	里普利安人

Chloderic	克洛德里克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格里高利
Poitiers	普瓦捷
Aquitaine	阿基坦
Dagobert	达戈贝尔
Frisian	弗里斯兰人
Bohemia	波西米亚
Duke of Brittany	布瑞坦尼公爵
Carolingians	加洛林王朝
Meuse	默兹河
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
Slavs	斯拉夫人
Spaniards	西班牙人
Saracens	撒拉逊人
Caliph	哈里发
Rodrigo	罗德里戈
Moors	摩尔人
Pepin	丕平
Childeric	希尔德里克
Stephen II	斯蒂芬二世
Mecca	麦加
Ka'bah	卡巴神殿
Abu Talib	阿布·泰利布
Khadijah	赫蒂杰
Abu Bakr	阿布·伯克尔
Gabriel	加百利
Vienna	维也纳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国王
Yathrib	叶斯里卜
Medinah	麦地那

Badr	白德尔
Copts	科普特
Khosrau II	霍斯劳
Heraclius	赫拉克利乌斯
Nineveh	尼尼微
Syria	叙利亚
Yermuk	耶尔穆克河
Othman	奥斯曼
Bulgar	保加利亚人
Syracuse	锡拉库扎
Constantine Pogonatus	君士坦丁四世
Justinian II	查士丁尼二世
Crimea	克里米亚
Leo the Isaurian	利奥三世
Berbers	柏柏尔人
Julian	朱利安
Lex Visigothorum	西哥特罗马法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斯
Carloman	卡洛曼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Chanson de Roland	《罗兰之歌》
Emirs	埃米尔
Cordova	哥多华
Gascon	加斯科涅
Roncevaux Pass	隆塞斯瓦列斯山口
Durenda	杜朗达尔
Alcuin	阿尔昆
Didier	迪迪尔
Duchy of Spoletum	斯波莱托公国
Mayfield	梅菲尔德

Otger	奥特哥
Bagdad	巴格达
Haroun al-Raschid	哈伦·拉希德
Wessex	韦塞克斯
Northumberland	诺森伯兰
Irminsul	伊尔明苏尔
St.Winifrith	圣温尼福瑞斯
St.Boniface	圣博尼费斯
Duchy of Bavaria	巴伐利亚公国
Mainz	美因茨
Friesland	弗里斯兰
Eginhard	艾因哈德
Witikind	威肯特
Aquitaine	阿奎尼
Aachen	亚琛
Judea	朱迪亚
Istria	伊斯特里亚
Johannes	约翰尼斯
Dalmatian	达尔马提亚
Louis	路易
Bernard	伯纳德
Lothar	洛塔尔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Treaty of Verdun	《凡尔登条约》
Lotharingian	洛塔林王朝
Lorraine	洛林省
Lake Constance	康斯坦茨湖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Vikings	维京人
Odin	奥丁

Thor	托尔
Valhalla	瓦尔哈拉神殿
North Sea	北海
Iceland	冰岛
Greenland	格陵兰岛
Alfred the Great	阿尔弗雷德大帝
River Thames	泰晤士河
Berkshire	伯克郡
Commines	科米纳
Wantage	旺塔奇
Somerset	萨默赛特
Athelney	阿塞尔内
Guthrum	古瑟罗姆
Treaty of Wedmore	《韦德莫尔和约》
Danelaw	丹麦法区
Mercia	麦西亚
Northumbria	诺森布里亚
Forth	福斯河
Ethelred	埃塞雷斯
Massacre of St. Brice's Day	圣布里斯节大屠杀
Cnut	克努特
Humber	亨伯河
Somme	索姆河
Loire	卢瓦尔河
Charles ‘the Bald’	“秃头”查理
Odo Capet	厄德·卡佩
Hugh Capet	雨果·卡佩
Rollo ‘the Ganger’	“步行者”罗洛
Charles ‘the Simple’	“憨直者”查理
Robert	罗伯特

Edward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
Harold	哈罗德
Godwin	戈德温
Morkere	莫克利
Stamford Bridge	斯坦福德桥
Gregory VII	格里高利七世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主教
Tennyson	坦尼森
Tees	蒂斯河
Domesday Book	《末日审判书》
William Rufus	威廉·鲁弗斯
George Maniakes	乔治·马尼科斯
Apulia	阿普利亚省
Melfi	梅尔菲
William I of Hauteville	欧特维尔的威廉
Civitate	奇维塔特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兰德
Nicholas II	尼古拉二世
Naples	那不勒斯
Roger II	罗杰二世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Henry the Fowler	“捕禽者”亨利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
Matilda	玛蒂尔达
Mont St. Michael	蒙圣迈克尔修道院
Palm Sunday	圣枝主日
Provençe	普罗旺斯
Castile	卡斯提尔
Lent	基督降临节
Crusades	十字军东征

St. Benedict	圣本笃
Cluni	克吕尼
Carthusians	加尔都西会
Cistercians	熙笃会
Chartreux	查尔特勒
Clairvaux	克莱尔沃
St. Bernard	圣伯纳德
Franconians	法兰克尼亚人
Prussia	普鲁士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
Conrad I	康拉德一世
Otto I	奥托大帝
Augsburg	奥格斯堡
Lotharingia	洛萨林尼亚
Lothair	洛泰尔
Adelaide	阿德莱德
Tuscany	托斯卡纳
Campagna	坎波尼亚
Crescentii	克雷申蒂
Synod of Sutri	苏特里宗教会议
Henry III	亨利三世
Bruno	布鲁诺
Leo IX	利奥九世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College of Cardinals	枢机主教团
Agnes	艾格尼丝
Cologne	科隆
Anno	安诺
Bremen	不来梅

Adalbert	阿达尔贝特
Henry IV	亨利四世
Worms	沃尔姆斯
Canossa	卡诺萨城堡
St.Angelo	圣安吉洛要塞
Robert Guiscard	罗伯特·吉斯卡德
Anselm	安塞姆
Alexius Commenus	阿历克塞·科穆宁
Athanaric	阿塔纳里克
Leo III	利奥三世
Bohemund	博希蒙德
Durazzo	都拉佐
Macedonia	马其顿
Pisa	比萨
Genoa	热那亚
Urban II	乌尔班二世
Aegean	爱琴海
Haroun al-Raschid	哈伦·拉希德
Clermont	克莱蒙特
Godfrey of Bouillon	布林的戈弗雷
Anna Commena	安娜·科穆纳
Antioch	安提拉
Mount of Olives	橄榄山
Edessa	埃德萨
Hospitallers	医院骑士团
Templars	圣殿骑士团
Lithuanians	立陶宛
Luther	路德教
Seljuk	塞尔柱王朝
Louis VII	路易七世

Eleanor	埃利诺
Conrad III	康拉德三世
Damascus	大马士革
Guy of Lusignan	吕西尼昂的盖伊
Saladin	萨拉丁
Tiberias	提比利亚湖
Hattin	哈丁
Frederick Barbarossa	腓特烈一世
Philip II	腓力二世
Richard the ‘Lion-Heart’	“狮心王”理查一世
Tithe	十一税
Navarre	纳瓦拉
Sancho	桑乔
Berengaria	贝莲加
Tancred	坦克雷德
Acre	阿克
Leopold	利奥波德
Jaffa	雅法
Tyre	提尔港
Anjou	安茹
Maine	曼恩
Touraine	都兰
Thomas Becket	托马斯·贝克特
Scutage	兵役免除税制度
Itinerant Justices	巡回法官制度
Pleas of Crown	王室诉讼条例
Innocent III	英诺森三世
Runymede	兰米尼德
Magna Charta	《大宪章》
Ferrand	费朗德

Otto IV	奥托四世
Bouvines	布维涅
Charles VIII	查理八世
Te Deums	《赞美颂》
Loire	卢瓦尔
Ingeborg	英格博特
Languedoc	朗格多克
Suabia	施瓦本
Hohenstaufen	霍亨斯陶芬
Welf	韦尔夫家族
Waiblingen	魏布林根家族
Ghibelline	保皇党
Guelf	教皇党
Henry the Lion	“狮子”亨利
Bologna	博洛尼亚
Crema	克丽玛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Legnano	莱尼亚诺
Brunswick	布伦瑞克
Henry VI	亨利六世
Queen Constance	康士坦茨皇后
Dalmatian coast	达尔玛西亚海岸
Frederick II	腓烈特二世
Palermo	巴勒莫
Rhineland	莱茵兰
Lateran Palace	拉特兰宫
Lucera	卢切拉
Honorius III	洪诺留三世
Brindisi	布林迪西
Gregory IX	格里高利九世

San Germano	圣热内罗
Eccelin de Romano	易斯林·德·罗马诺
Verona	维罗纳
Vicenza	维琴察
Alberigo	阿尔贝里戈
Treviso	特雷维索人
Cortenuova	科特努奥瓦
Romagna	罗马涅
Lyons	里昂
Parma	帕尔马
Conradin	康拉丁
Siena	锡耶纳
Albi	阿尔比
Chartres	沙尔特
Victor Hugo	维克多·雨果
Divina Commediathan	《神曲》
Dante	但丁
Ebro	埃布罗河
Chevy Chase	《切维·切斯》
Latin Quarter	拉丁区
Lombard League	伦巴底联盟
Gratian	格拉提安
Matthew Paris	马修·帕里斯
Grosstete	格罗斯特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Peter Abelard	彼得·阿伯拉
Yes and No	《是与非》
Peter Lombard	彼得·伦巴都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纳
Dominicans	多明我会

Raymond	雷蒙德
Albigenses	阿比尔教派
Waldensians	韦尔多教派
Peter Waldo	彼得·韦尔多
Dominic de Guzman	多米尼克·德·古斯曼
Simon de Montfort	西蒙·德·蒙福特
Avignon	阿维尼翁
Blanche of Castile	卡斯提尔的布兰奇
St. Francis	圣方济各
Umbrian	翁布里亚
Bernadone	贝尔纳
Franciscan Order	方济各会
Norwich	诺里奇
Benedictine Order	本笃会
Piero di Lorenzo de Medici	皮耶罗·德·美第奇
Guienne	吉耶纳
Louis IX	路易九世
Philip IV ‘the Fair’	“美男子”腓力四世
Habsburg	哈布斯堡
Rudolf	鲁道夫
Sicilian Vespers	西西里晚祷
Aragon	阿拉贡
Peter III	佩德罗三世
Martin IV	马丁四世
Boniface VIII	博尼费斯八世
Clericis Laicos	《教士不纳俗税》
Nogaret	诺加雷
Anagni	阿纳尼
Benedict XI	本笃十一世
Clement V	克雷芒五世

Babylonish Captivity	巴比伦之囚
Model Parliament	模范议会
Battle of Golden Spurs	库特赖战役
Salic Law	《萨利克继承法》
Isabel	伊莎贝拉
Bruges	布鲁日
Ghent	根特
Solent	索伦特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
Sluys	斯鲁伊斯
Calais	加莱
Battle of Crécy	克雷西会战
Jean Froissart	让·弗鲁瓦萨尔
Black Death	黑死病
Boccaccio	薄伽丘
Decameron	《十日谈》
Étienne Marcel	艾顿·马塞
Treaty of Brétigny	《布勒塔尼和约》
Bertrand du Guesclin	贝特朗·杜·盖克兰
Pedro	佩德罗
Trastamara	特拉斯塔马尔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黑太子爱德华
Navarette	纳瓦雷特
Gaunt	冈特
Cherbourg	瑟堡
Brest	布雷斯特
Bayonne	巴约纳
Bordeaux	波尔多
Henry V	亨利五世
Armagnac	阿玛尼亚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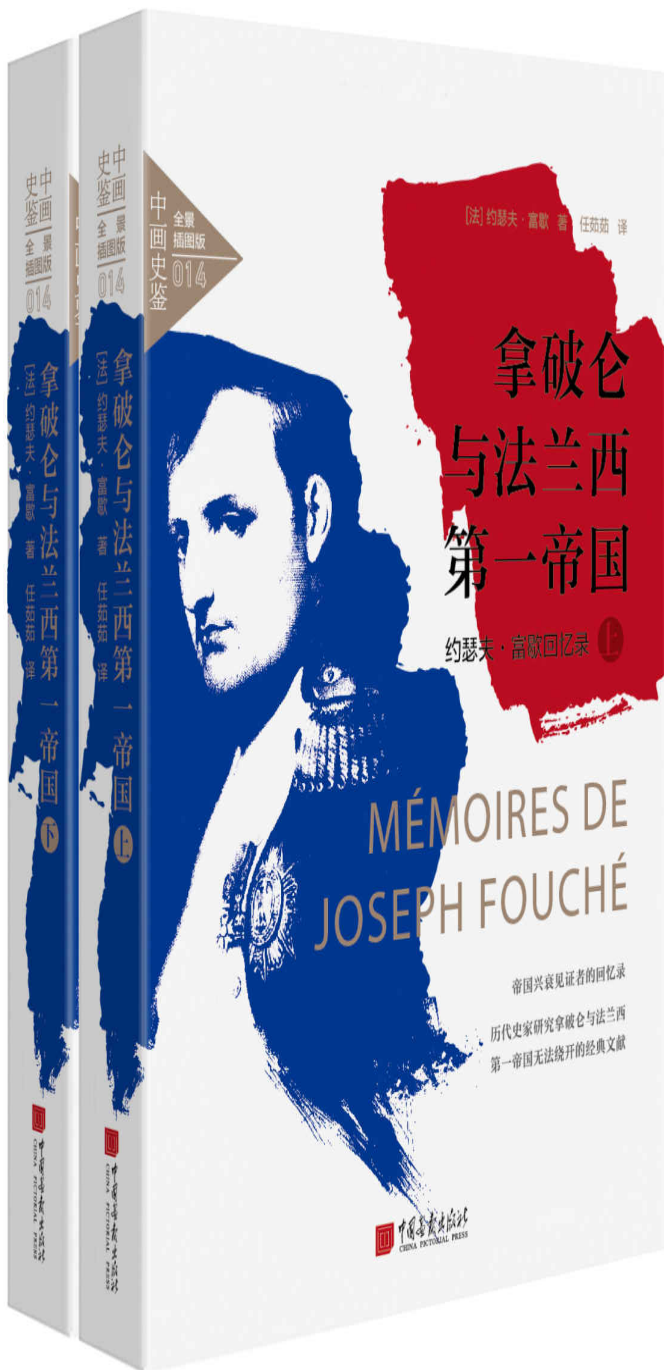
Harfleur	阿尔弗勒尔
Agincourt	阿金库尔
Charles ‘the Mad’	“疯子”查理
Montereau	蒙特罗桥
Traité de Troyes	《特鲁瓦条约》
Catherine of Valois	瓦卢瓦的凯瑟琳
Philip ‘the Good’	“好人”腓力
Bedford	贝德福德
Gloucester	格洛斯特
Humphrey	汉弗莱
Jeanne d'Arc	圣女贞德
Upper Meuse	上默兹
Domremy	多雷米
Orleans	奥尔良
Pedro the Crue l	暴君佩德罗一世
Limoges	里摩日人
Compiègne	贡比涅
Arras	阿拉斯
Guadalete	瓜达莱特
Asturias	阿斯图里亚斯山
Cordova	科尔多瓦
Toledo	托莱多
Seville	塞维利亚
Granada	格拉纳达
Valencia	巴伦西亚
Cid	熙德
Saragossa	萨拉戈萨
Alvar Fañez	阿尔瓦·芬兹
Tizona	提泽纳剑
Burgos	布尔戈斯

Almohades	穆瓦希德
Order of Santiago	圣地亚哥修会
Compostella	孔波斯特拉
Las Navas de Tolosa	纳瓦斯德托洛萨
Alfonso VIII	阿方索八世
Rodrigo Ximenez	罗德里戈·希梅内斯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James I	詹姆斯一世
Murcia	穆西亚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Alfonso X	阿方索十世
Siete Partidas	《法典七章》
Alvaro de Luna	阿尔瓦罗·德·卢纳
Alsace	阿尔萨斯
Ottokar II	奥托卡二世
Wenceslaus	瓦茨拉夫
Carinthia	卡林西亚
Styria	施蒂利亚
Carniola	卡尼奥拉
Uri	乌里
Schwyz	施维茨
Unter Walden	下瓦尔登
Albert	阿尔伯特
Gessler	盖斯勒
William Tell	威廉·泰尔
Morgarten	莫加顿山
Philip de Commines	菲利普·德·科米纳
Breisgau	布列斯高
Louis XI	路易十一
Granson	格朗松

Matthias I	马加什一世
Battle of Morat	莫拉托战役
Nanci	南锡
Lübeck	吕贝克
Danzig	但泽
Hansa	汉萨同盟
Nijni-Novgorod	尼杰诺-诺夫哥罗德
Skaania	斯卡尼亚
Valdemar III	瓦尔德玛三世
Gothland	哥特兰岛
Wisby	维斯比
Treaty of Stralsund	《斯特拉松条约》
Queen Margaret	玛格丽特一世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Livonia	利沃尼亚
Curland	柯兰
Louis 'the Great'	路易一世
Siberia	西伯利亚
Duke Jagello	雅盖洛大公
Ladislas V	拉斯洛五世
Battle of Tannenberg	坦宁堡战役
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
Treaty of Thorn	《索恩条约》
Vistula	维斯瓦河
Joanna I	乔安娜一世
Andrew	安德鲁
Magyars	玛格尔人
Elizabeth	伊丽莎白
Henry VII	亨利七世
Golden Bull	黄金诏书

Charles IV	查理四世
Legnano	莱纳诺
Bernabò Visconti	贝尔纳博·威斯康提
Galeazzo Visconti	加莱亚佐·威斯康提
Gian Galeazzo	吉安·加莱亚佐
Valentina Visconti	瓦伦蒂娜·威斯康提
John Hawkwood	约翰·霍克伍德
Essex	埃塞克斯
Herodias	希罗底
Filippo Maria	菲力波·玛利亚
Jean de Sismondi	让·德·西斯蒙第
Orsini	奥尔西尼
Colonna	科隆纳
Sforza	史佛拉
Council of Ten	十人会
Michael Paleologus	迈克·巴莱欧罗古斯
Chioggia	基奥加
Vettor Pisani	维托·皮萨尼
Mastino della Scala	玛斯缇诺·德拉斯卡拉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里
The Prince	《君主论》
Celestine V	圣雷定五世
Boniface VIII	博尼费斯八世
De Monarchia	《论世界帝国》
Ladislas	拉迪斯拉斯
Joanna II	乔安娜二世
Alfonso V	阿方索五世
Babylonish Captivity	巴比伦之囚
John Wycliffe	约翰·威克里夫
Nepi	奈比

Viterbo	维泰博
Orvieto	奥维多
Cola di Rienzi	黎恩济
Stephen Colonna	史蒂芬·科隆纳
Catherine Benincasa	凯瑟琳·贝宁卡萨
St. Catherine	圣凯瑟琳
Gregory XI	格里高利十一世
Urban VI	乌尔班六世
Clement VII	克雷芒七世
Great Schism	大分裂期
Wenzel	文策尔
John Huss	约翰·胡司
Herod	希律王


中画史鉴
全景插图版
014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上
MÉMOIRES DE JOSEPH FOUCHÉ
帝国兴衰见证者的回忆录
历代史家研究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无法绕开的经典文献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下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全2册

（法）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约瑟夫·富歇回忆录：全2册/（法）约瑟夫·富歇著；任茹茹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146-1658-3

Ⅰ．①拿…　Ⅱ．①约…②任…　Ⅲ．①富歇（Fouche，Joseph 1759-1820）－回忆录　Ⅳ．①K835.65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8460号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约瑟夫·富歇回忆录（全**2**册）

［法］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出　版　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李　媛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44.75

字　　数：654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ISBN 978-7-5146-1658-3

目录

上册

第1章　出版《回忆录》的初衷

第2章　恐怖时期与督政府的成立

第3章　出任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大使

第4章　督政府与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第5章　出任督政府公安部长

第6章　拿破仑·波拿巴凯旋

第7章　雾月政变

第8章　执政府的成立

第9章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第10章　拿破仑地位的稳固

第11章　法俄秘密联手

第12章　军政府的建立

第13章　离任公安部与出使瑞士

第14章　拿破仑·波拿巴称帝

第15章　第一帝国向英国宣战

第16章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

第17章　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与大陆封锁政策

第18章　拿破仑·波拿巴迎娶奥地利公主

下册

第19章　卸任公安部长

第20章　我失势的内幕

第21章　法英关系紧张

第22章　法俄关系紧张

第23章　出征俄国

第24章　马莱特事件

第25章　玛丽·路易皇后摄政
第26章　法奥同盟开始动摇
第27章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
第28章　意大利独立运动
第29章　我在意大利的使命
第30章　拿破仑被迫退位
第31章　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第32章　百日王朝
第33章　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第34章　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返回总目录

全景插图版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上）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第1章　出版《回忆录》的初衷

精彩看点

不惜代价说出真相——谁挑起了革命——革命从何而起——上层的堕落——共和的洪流——谁点燃了革命之火——由暴动到战争——击退第一次反法同盟——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保卫法国——为帝制铺平了道路——认识韦尼奥和罗伯斯庇尔——与罗伯斯庇尔越来越疏远——最严重的危机——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政治主张——雅各宾派教给我的道理——极端独裁的议会——政治的进步——不容置疑的事实——投票中的选择与牺牲——特派员的任务——我所应负的责任是很有限的——走出历史迷宫

在动荡的革命年代里，他从最初的众议员做起，凭借自己的谨慎和能力，官居大使、部长、参议员之位，还受封为公爵，取得了高位和大权，成为国家的实际掌权人之一。在荣耀之巅，他可以退居二线，被他人肆意抨击：这个人，他需要别的武器。没错，这个人就是我。我在大革命中成长起来，却跌倒在反革命中——一场我早有预感、防范的革命，然而，当危机降临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束手无策、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恶毒的喧闹和忘恩负义的凌辱之中。

过去，我曾长期掌握着神秘而强大的权力[1]。然而只有在需要平息民愤、分化党派和防范阴谋时，我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其他时候，我一直试图弱化权力，在不得已之时，也会尽可能人性化权力。同时，我也在努力地调和可能会分裂法国的各种对立因素，调和国内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你们如果能认真审视我在行政工作中做出的努力以及我曾经发表过的见解，毫无疑问就会发现，这是我一贯的行动准则，没有人能够否定它。

现在，在这片流放之地[2]，我该用什么来对抗那些狂热的对手——那些曾经在我面前摇尾乞怜、如今却肆无忌惮地攻击我的乌合之众呢？用冰冷的谴责吗？用学究气的文字吗？

不，当然不，我想以部长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清晰地表达出我的思想，真实地陈述出当时混乱的局势下，我亲身参与过的历史事件——在一些事件中，我甚至是掌舵之人。我要让他们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哑口无言、局促不安，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我知道，真相并不会保全我。甚至我说出真相的时刻，恐怕也就是“有心人”制造“真相”的时刻。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说出真相，就算那时我的残骸已然入土，面对历史，在死神面前，我也会拿着这些文字，与他们对质。

首先，没有人可以让我一个人担负革命和专政中的错误。在法国

和欧洲最初的动荡中，我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小卒。

事实上，1789年以前，关于封建王朝会崩塌的预言一直困扰着君主政体。时势摧枯拉朽，波旁王朝覆灭的命运亦不可避免。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时限，经过几个世纪的历史洗涤，它总会到期。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封建君主制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已经维持了一千多年的君主制大限将至。

如果君主制能够起死回生，用武力把欧洲置于其桎梏和恐惧之中，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抑或君主制虽然大难不死，但大势已去的它只能苟延残喘。当然了，现在的我们不必再细想它在变革中的其他归宿了。

地理位置已经注定了法国在未来几个世纪中的命运，被“世界之主”征服的高卢人不过臣服了区区三百年[(3)]，现在，其他侵略者已经在北方磨刀霍霍[(4)]了。



约瑟夫·富歇

那么，革命又是什么呢？革命筑起了抵抗侵略者的长城。人们一点点毁了这长城，又一点点筑起这长城。时间是强大的，它锤炼了人民，也锤炼了政党和政府在革命的奇观前大发雷霆的你们，在革命面前不敢抬头的你们，只能承受革命，将来也将继续承受革命。

那么是谁挑起了革命？是议会和王室的人，是年轻的殖民者们，是宫廷里的王妃们，是拿着王室俸禄的文人们。就是这些人挑起了革命，挑起了这场连公爵夫人们都响应的革命。

革命又是从何而起的呢？它是从大人物们的沙龙里，是从部长们的办公室里而起的。见识了国家上层的堕落、教士的放荡、部长们的荒唐后，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与此同时，我想起了新巴比伦王国在动荡中灭亡[(5)]的画面。此前的四十年里，正是这些人们眼中的法国精英们树立起了人们对伏尔泰、卢梭的崇拜，也是他们推崇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主张在法国建立自由和民主的政府。当人们向往共和时，君主制已经腐朽不堪。这时，再坚实的君主制也难以阻挡共和的洪流。

在上层阶级解体的过程中，国家慢慢成长、成熟起来。人们反复地说要解放国家，最后，它真的迎来了解放。

历史证明，面对暗潮汹涌的巨变，国家毫无准备。本来人们可以让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解放，这也是国王和智者们的希望。然而，政治的腐败、王公贵族们的贪婪、法庭上的不公、宫廷中的失误、部长们的差错，共同把这种希望推向了深渊。对当权者们来说，把一个躁动的国家置于一触即发的革命危险之中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那么，是谁点燃了革命之火呢？是来自第三等级[(6)]的桑斯大主教[(7)]吗？是日内瓦的内克尔[(8)]、米拉波[(9)]、拉斐特侯爵[(10)]、新奥尔良公爵[(11)]、阿德里恩·达波特[(12)]、肖代洛·德拉克洛[(13)]吗？是斯塔尔家族[(14)]、拉罗科什富家族[(15)]、博沃家族[(16)]、蒙莫朗西家族[(17)]、诺瓦耶家族[(18)]、拉姆斯家族[(19)]、拉图迪潘家族[(20)]、勒弗朗家族[(21)]吗？还是1789年挑战王权的其他人呢？



图中手握权杖者为桑斯大主教



米拉波



拉斐特侯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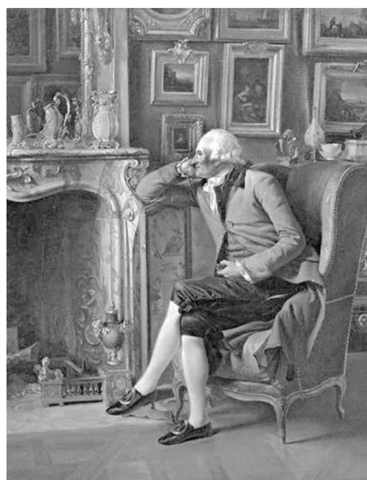
新奥尔良公爵

如果没有王宫和红山区的秘密会谈，布雷顿俱乐部[22]必会被解散。倘若7月12日路易十六的将士能够恪守职责，7月14日的大革命也将不复存在。

贝森瓦尔[23]是王后的宠儿，但在关键时刻，他却罔顾国王的命令，在叛乱者面前撤退了。而就在当天，布朗威尔元帅[24]也被他的

幕僚团架空了。谁都无法驳斥这些事实。

我们知道人民为何会起义。军队和宫廷在叛变，人民也希望声张自己的权益。因此，叛乱者和肇事者赢得革命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更何况他们还有周密的部署和狂热的想法。



王后的宠儿贝森瓦尔



布朗威尔

路易王子[25]让一切雪上加霜。本可以通过王位交替掌控局势的他，因年幼无所作为而导致没有任何目标的革命四处“流窜”。在这场暴风雨中，那些信念崇高、理想炽热、能力强大的人深信历史的变革即将到来，他们恪守着誓言，坚定地抗议着，为新世界的到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这些卑微的、来自第三等级的外省人，我们这些被自由的梦想所引导、被醉人的国家复兴神话所吸引的人做起了公共物品[26]的狂热幻梦。那时的我们，没有丝毫野心，没有任何个人的盘算或是龌龊的想法。

很快，反抗王权的行为使人们变得狂热起来，而党派精神也带来了无情的仇恨，一切都被推向了极端。所有人开口必谈为了人民。面对权力，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国家”，而人民则说“人民即主权，民族

即国家”，就这样，国家独自前行。

在这里，请注意这么一个事件，这件近乎奇迹的事情成了后续事件的关键。由于缺乏进行内战的必要资源，在国内孤立无援的保皇派和反革命者转身向流亡国外的贵族求助、向国外求助。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其他国家会冻结流亡贵族的财产，以防止这些人集结起来武装反抗。然而，在君主制政体下，如何介入财产权才能不损害君主制的根基呢？从最初的查封到后来的掠夺，这意味着一切秩序的崩塌，因为财产的转移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颠覆。“要变动财产！”这句话不是我说的。然而，这句话比格拉古兄弟[(27)]说过的任何话都更加尖锐，而当时的法国却没有西庇阿·纳西卡[(28)]。自此之后，革命就不再只是一场暴动了，因为暴动远没有战争那么残酷。为了镇压革命，欧洲各国都打开了雅努斯神殿[(29)]。战争一开始，面对体制老朽的欧洲各国、分歧不断的各国同盟军，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革命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需要注意的还有另一件事，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军蒙羞败退了。倘若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同盟军征服了法国爱国同盟；倘若普鲁士军队没有在香槟地区遭到沉重打击，而是一直打到巴黎；倘若法国革命军组织涣散，倘若历史真如这般，毫无疑问，法国的命运会与波兰一般无二[(30)]——国家的力量、君主的权威全线崩塌。

瓜分法国是欧洲大国共同的政治、外交主张，当时，启蒙思想还没有使欧洲各国诞生团结的理念，欧洲人也没有想到可以用赔款来代替军事占领。1792年，爱国者们浴血奋战，抵御外辱，或许不是有意为之，但无疑为将来的帝制奠定了基石。虽然有人对这场鲜血淋漓的革命唏嘘不已，但在外敌入侵、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法国如何能平静以对？很多人都错了，这里没有刽子手。

现在，我们已经不必再纠结8月10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出兵的原

因。无论如何，两国出兵的时间都太晚了。而且如果我继续探讨下去的话，恐怕我们就得探讨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了。

是的，革命是暴力的，是残忍的。大家对此都很清楚，我也不会再对此赘述，况且这也不是我写回忆录的目的所在。在这本回忆录中，我想谈的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作为部长时所亲历的事情。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交代清楚时代背景。

我知道，你们很难想象我会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公民去生活，但我的仕途在刚开始的阶段确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些琐碎小事可能会引起无聊的当代传记作者或者街头无所事事之人的注意，但毋庸置疑那只是一些无足挂齿的小事。

我的父亲是一名船商，我们家在当地很受人尊敬，所以我的家人自然希望我能子承父业，在航海方面有所建树。我从小在奥拉托利耶稣会[(31)]长大，并且是它的会员。后来，我决定从事教育工作。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已经是南特教会中学的学监了。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自己既谈不上无知，也谈不上堕落。只是想告诉大家，所谓我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教会工作或者管理工作的事情，都是毫无根据的造谣和中伤——当然了，在离开奥拉托利会之前，我的确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我说这些，更是想让大家清楚，如果条件允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精神强大的哲人。

在南特成婚后，我准备在权威的法律约束下从事律师工作。和那些盲从或者一时兴起的人不同，我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了这个选择。当时，我认为，律师这个工作既符合我的个人志向，也有利于社会。因此，可以说，我很幸运地契合了时代的精神。这样看来，我能够有幸成为国民公会[(32)]中的人民代表，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此后我就开始了风云变幻的一生。

我可以公正且毫不夸张地说，人们给我“穿戴”上了各种历史责

任，他们把我在法庭上说过的话当成了我做过的事，把我被迫发表的演说当成了我的个人意愿。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时间、地点和当时的社会情况，也根本没有考虑当时整个社会对于共和的狂热——这种狂热是两千万法国人有目共睹的。

我最初供职的地方是公共制度委员会(33)，在那里，我认识了孔多塞侯爵(34)，后来，我又通过他认识了韦尼奥(35)。机缘巧合，在阿拉斯(36)教授哲学时，我认识了罗伯斯庇尔(37)。后来，当他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要去巴黎履职时，我还借了一些钱给他。

当我和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中重逢时，以及我们重逢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往来还是很频繁的。不过后来，因为我们的政见不同，或者更明确地说，因为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我一生遭遇过很多危机，在这里，我想讲述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一天晚饭过后，在我的家里，罗伯斯庇尔公开、粗暴地宣布反对吉伦特派(38)，并严厉斥责在场的韦尼奥。我很欣赏韦尼奥这个长于辩论又朴实无华的人，于是，我走到韦尼奥的身边，对罗伯斯庇尔说道：“用这样暴力的方式，您赢得了亢奋的民意，但您却得不到尊敬和信任。”这句话伤害到了罗伯斯庇尔，他往后退了一步。不过很快，你们就会知道，这个易怒的人把他对我的仇恨推向了何处。



孔多塞



韦尼奥



我帮韦尼奥说了话，但我坚决反对韦尼奥领导的吉伦特派的政治主张。在我看来，这种政治主张会把法国分裂成许多地区和省份，并威胁到巴黎。国家最好的“救赎”在于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政治一体性，否则便会留下无穷后患。尽管我非常痛恨雅各宾派[39]的过度暴力，但这个道理正是雅各宾派教会我的。从道德和法律的层面来看，雅各宾派确实是恐怖至极，但我们航行着的大海正是一片惊涛骇浪。

革命进入了白炽化：君主没有了，政府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极端独裁的议会控制着局势。这个议会颠覆了从前的秩序，于是，在法国，雅典式的无政府模式[40]和奥斯曼式的专政模式[41]交替“上演”。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革命和反革命中，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政治取得了一次纯粹的进步。虽然国民公会中有很多倾轧，虽然国民公会出台了很多疯狂的法令，然而，正是这些法令确保了法国的统一，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绝不会否认我参与了国民公会的工作，更不会否认自己对它的支持。要用判例法[42]来审判革命吗？如果站在历史的审判台前，那么，所有雅各宾派的成员都可以像西庇阿这样的伟人一样说道：“我拯救了共和国，以神的名义，让我们去国会大厦吧！”

对于那次投票，我依旧无法做出辩解。但我可以既不软弱也不羞愧地承认，我对此追悔莫及。上帝，请您证实我说的都是实情吧：我那张票，与其说是为了对抗路易十六国王这位公正而善良的人，不如说是为了对抗与新制度不相容的王冠。我还想说的是，我的想法与当时很多人一样，我们都认为，只有采用极端的方式，摆脱所有的限制，与所有革命精英站在一起，我们才能从人民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渡过难关。

这也是我们当时必须承受这样巨大牺牲的原因。政治上，这样的牺牲有时候在所难免。如今，已经没有人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了：如果自由之树长得足够高大，它的根扎得足够深，甚至连当初亲手种树之人的斧头都无法修剪它时，谁应该为此负责，这又是谁的错？我想，在用自己儿子的鲜血浇筑自由事业之时，布鲁图斯[43]应该更幸福吧。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对他来说，把君主制交到现存的贵族手里更容易；但对1793年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来说，除了牺牲王室代表之外，他们真的没有别的方式重建国家了。在我们的国家，平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那时，我们已经到了只能把权力让渡给民主制度的地步，尽管此时的民主制度极其不稳定，简直如同“流沙”一般。

在人们眼中，现在的我已然是雅各宾派的法官和同谋，但我仍想谈一谈我在职期间的几件小事——几个可以减轻我罪行的情节。

在我被派往外省执行任务时，我不得不迎合那个时代的语言，审时度势，对一些人执行死刑。大批的教士和贵族被依法处以监禁。以下是我于1793年8月25日对此事发表的声明。

> 法律禁止反革命党人参与社会贸易，但判决的依据却是你们无耻的揭发。公正的法律在上，我不能接受这种无耻的揭发行为——因为造谣的“剑锋”不能随意指向他人。法律会严厉惩罚反革命党人，维护国家的利益，但绝不会违背道德、野蛮地侵犯人权。
>
> 当时有几个勇敢的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这些政令进行了弹性执行。其实，我并不想以特派员的身份执行任务，因为某些事情并不完全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请你们查证，在我所执行的任务中，可以谴责的大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言辞，而不是我的行为。即使是在如今的和平年代，这些言辞依然会激起恐慌，因此，请不要以我当时所处的位置来说事。作为疯狂议会的一个代表，我愿意坦言我曾经执行过残忍的法律。然而，对于别的控告——比如说我只是机械地

执行了特派员任期内的任务，我想说的是：我从来都不是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在那个恐怖时期[44]，我也从来没有真正掌握权力。相反，你们很快就能看到，那个恐怖时期同样给我留下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些事情明确表明，对当时发生的那一切，我所应负的责任很有限。

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来理顺这些事情，借助它们，让我们走出历史的迷宫，这正是我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所在。

---

(1)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1793年，因血腥镇压里昂起义而升任督政府公安部长，此后分别在督政府、执政府以及拿破仑帝国中出任公安部长或公安大臣。——译者注。（本书注释大部分为译者注，以下只对原注加标明）

(2) 特里雅斯特位于意大利东北部，靠近斯洛文尼亚。1816年1月12日，约瑟夫·富歇因弑君罪被流放至此。

(3) 现代法国人的祖先是高卢凯尔特人。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征服了高卢。此后三个世纪里，罗马确保了整个帝国的平稳，高卢人变成了高卢罗马人。随后，边境被蛮族围攻，高卢罗马文明逐渐消失，基督教文明逐渐兴起。公元48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在苏瓦松击败了罗马在高卢的末代统治者，由此结束了罗马帝国在高卢长达五百多年的统治。文中使用“臣服”三百年这种表达方式，意指罗马对高卢的实际控制时间为三百年

(4) 这里指位于法国北部的大英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联邦、沙皇俄国等。

(5) 新巴比伦王国也就是迦勒底王国。王国末期，政局恶化，社会动荡，王国很快灭亡。这里暗指法国封建社会的解体。

(6) 第三等级也称市民等级，区别于以贵族为代表的第一等级以及以教会僧侣为代表的第二等级。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平民和资产者，占法国人口的95%以上，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赋税。第三等级中，大商人和大作坊主构成此等级的上层，其中有些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成为新的权贵人物。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议员也加入了第三等级。

(7) 埃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安（1727—1794），1787年出任路易十六政府财政大臣，1788年任桑斯大主教及枢机主教。在任财政大臣时因无力对付日益恶化的财政危机，他辞职，让位于雅克·内克尔。

(8) 雅克·内克尔（1732—1804），日内瓦银行家，政治人物，曾担任路易十六政府财政大臣。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他推动了法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9) 奥诺雷·加比耶·瑞克缇·米拉波（1749—1791），被誉为“人民的演说家”“普罗旺斯的火炬”，三级议会中代表第三等级的杰出议员。

(10) 拉斐特侯爵（1757—1834），即吉尔贝尔·杜·莫提耶，法国将军、政治人物。

(11) 新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1747—1793），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之庶系分支奥尔良家族成员。他因热心支持法国大革命而被称为“平等的菲利普”，但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被送上断头台。他的长子路易·菲利普在1830年7月革命后成为法国国王。

(12) 阿德里恩·达波特（1759—1798），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社会活动家、议员。1789年5月，阿德里恩·达波特当选为贵族等级议员代表，但拒绝接受6月17日贵族等级针对第三等级所作出的宣言，并于6月25日加入第三等级，成为最初加入第三等级的四十七位贵族之一。

(13) 肖代洛·德拉克洛（1741—1803），法国大革命期间，他被拿破仑任命为陆军准将。他也是一位小说家，其代表作品为《危险关系》。

(14) 斯塔尔家族源自德意志的贵族世家。这里指其在法国的代表人物、路易十六财政大臣尼克尔之女——斯塔尔夫人。

(15) 拉罗什富科家族是法国的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期间，拉罗什富科家族的很多成员大力支持革命。

(16) 博沃家族是源自安茹的古老骑士家族。法国大革命期间，博沃家族很多成员积极投身革命。

(17) 马修·蒙莫朗西公爵曾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作为部长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马修·蒙莫朗西公爵因为坦诚以及自己无私的行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

(18) 诺瓦耶家族是法国古老而杰出的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期间，接受新观念的路易·马利·诺瓦耶致力于废除贵族特权，曾担任立宪议会议员。

(19) 法国大革命期间，拉姆斯家族成员出了许多军事、政治人才。奥古斯丁·拉姆斯、查理·拉姆斯、亚历山大·拉姆斯均曾被封为将军。

(20) 拉图迪潘家族是源自多菲内的贵族世家。法国大革命期间，拉图迪潘家族成员让·拉图迪潘曾在三级议会中担任贵族等级议员，也是路易十六的大臣。

(21) 在这里特指积极投身法国大革命的让·雅克·勒弗朗。在政治上，让·雅克·勒弗朗属于雅各宾派，曾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担任要职。

(22) 布雷顿俱乐部是指三级议会和制宪议会中来自布列塔尼地区的议员团体。这些议员们习惯在凡尔赛的圣克劳德大街或是卡诺大街聚会，商讨政治问题。布雷顿俱乐部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规模，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前身。

(23) 贝森瓦尔（1721—1794），瑞士人，作家、军人，被称为“王后集团的宠臣”和“末代王朝的见证者。”

(24) 布朗威尔（1718—1804），法国贵族、禁卫军统帅。他追随孔代亲王，率部参加反革命运动。

(25) 即路易·约瑟夫·泽维尔·弗朗索瓦（1781—1789），他是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个孩子。作为法王的长子和继承人，他被称为“法国王太子”。筹备三级议会期间，七岁的他因患肺结核不幸薨逝，他四岁的弟弟路易·夏尔接替他成为新的法国王太子。

(26) 公共物品是经济学中商品的一种分类，从需求方面的观点上，具有“非竞争性”；从供给方面的观点上，具有“非排他性”。

(27) 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他们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人物，平民派领袖。

(28) 西庇阿家族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家族，属于科尔内利乌斯氏族的一个分支，大西庇阿、小西庇阿皆出自此家族。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西庇阿家族产生了三十位执政官。这里指公元前138年的执政官，杀害格拉古兄弟的西庇阿·纳西卡。

(29) 雅努斯神殿是古罗马时期位于古罗马广场的神殿之一。神殿两侧刻有门神雅努斯。神殿在平时关闭，只有在战争爆发时才会打开。历史上有诸多罗马皇帝，例如奥古斯都都曾亲自关上雅努斯神殿的大门。

(30) 13世纪波兰形成统一的国家，到16世纪时已经成为东欧的一个大国。18世纪末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而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才重新获得独立。

(31) 奥拉托利耶稣会，也被称作法国奥拉托利会，以塑造符合罗马教皇教规的生活方式为宗旨。它是圣·菲利普·内瑞奥拉托利会的分支。

(32) 国民公会存在于1792年至1795年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单一国会。国民公会由七百四十九名议员组成，其中吉伦特派为右翼，约一百六十人，山岳派为左翼，约一百四十人，而人数最多的为中间派，也称平原派或沼泽派。

(33) 法国大革命初期，公共制度委员会是国民立法议会的组成部分。

(34) 即马利·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1743—1794），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杰出的代表之一，也是数学家和哲学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起草了吉伦特派宪法。

(35) 即皮埃尔·韦鸠尼昂·韦尼奥（1753—1793），法国律师和政治人物、国民立法议会波尔多代表。他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也是吉伦特派的支持者。

(36) 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加来海峡省的市镇，加来海峡省的省会，阿图瓦地区的中心。

(37) 即马克西米连·弗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人物，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38) 吉伦特派或吉伦特党人是指在法国大革命中从1791年到1795年期间，源自吉伦特省的一个政治派别。吉伦特派由国民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议员组成，代表当时信奉自由主义的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

(39) 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维护人民主权以及法兰西共和国统一的政治主张。法国大革命期间，其成员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集聚，被称作“雅各宾派”。

(40) 在古希腊哲学体系内，芝诺无政府自由社群的主张与政府论相对，后者的代表性表述是柏拉图共和政体和乌托邦。芝诺提出人有自卫本能，这让人变得利己，自然赋予了人类另一本能——社会性。

(41) 奥斯曼式的专政模式指以军事扩张为途径的专政模式。

(42) 判例法是以个案判例的形式表现出的法律规范，以遵循先例的法律原则作为其建立的基础。简而言之，作为判例的先例对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成为日后法官审判类似案件的基本准则。

(43) 即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罗马共和国的建立者，传统上被认为是第一执政官。在布鲁图斯成为执政官之前，当时的贵族子弟参与推翻罗马王政时代第七任君主——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统治的政变，其中包括布鲁图斯的两个儿子。当时布鲁图斯亲自宣读了对谋反者的宣判，并参与了死刑的执行。

(44) 雅各宾专政，即恐怖统治（1793—1794），是法国大革命一段充满暴力的时期，是对立的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爆发冲突后形成的。当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取得政权统治法国时，内战及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入侵压力，迫使罗伯斯庇尔以革命手段大规模处决“革命的敌人”，以救亡图存。

第2章　恐怖时期与督政府的成立

精彩看点

白热化的革命和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死亡名单”——我的反击准备——我的勇气——反对罗伯斯庇尔的力量——罗伯斯庇尔的应对——我的行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蒲月政变——波拿巴——我的决定——督政府成立——平衡与偏离——我被打入冷宫——我和巴拉斯私下会面——巴拉斯的要求——我的陈情书——为了革命一无所有——做生意——督政府的内部危机——共和精神的丧失——三头同盟——军队的躁动——果月政变

革命和恐怖统治已经白热化，国民公会只能依靠铡刀来维持国家秩序了，怀疑和猜忌吞噬着人心，恐惧盘旋在人们的头顶，那些手中握着恐怖武器的人也变得岌岌可危。在国民公会中，似乎只有一个人广受欢迎，那就是诡计多端且自负的罗伯斯庇尔。他非常善妒，也非常记仇，几乎是睚眦必报，只有同僚的鲜血才能满足他的欲望。不过，凭借着超群的能力、连贯的想法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紧急情况下，这个人总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后来，利用公共安全委员会[1]赋予的特权，他公开宣称要抛弃罗马式十人执政制度[2]，采用马略[3]和苏拉[4]的独裁制度。

野心勃勃、胆识过人的他任性地主宰着革命，差点儿成为革命的独裁者。没错，如果再有三十颗人头——国民公会里的三十颗人头，他就能成为独裁者了。

我知道他的企图，也知道我就在他的“死亡名单”上。后来，当我正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控告我迫害爱国者、与贵族图谋不轨，回到巴黎之后，我便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之后，在法庭上，我要求他解释他对我的控告，而他，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的最高领袖，则下令追捕我。对我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剥夺公权的监禁[5]。

我既不想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也不想与那些同样受到威胁的同僚们在秘密会议上密谋什么。分别联系了勒让德[6]、达连[7]、杜波瓦[8]、达努[9]、舍尼埃[10]后，我对他们说：“我确定名单上有你，你和我一样都在名单上！”得知此事后，达连、布东[11]和杜波瓦很愤怒，而且达连还决定为布东和杜波瓦而战。对他而言，相比于自己的性命，布东和杜波瓦更重要。因此，他决定给这个未来的独裁者一拳。但这谈何容易呢，一旦有人告密，我们就是罗伯斯庇尔坟前的殉葬品。

在推翻罗伯斯庇尔、夺取他权力的事情上，我并没有和达连同

行。不过，我知道他需要更多的帮助，因此，我直接找到了几个虽然在恐怖政府中供职，却忌妒、害怕罗伯斯庇尔的人。我告诉高罗[12]、卡诺[13]和瓦雷纳[14]，如果罗伯斯庇尔当政，那么未来的法国只能是现代版的阿皮乌斯。在和他们几人单独交谈时，我详细地分析了他们正面临的危险，也巧妙地激起了他们反抗的勇气，号召他们反抗暴君罗伯斯庇尔，反对他残杀国民公会的同僚。我对他们说："数一数你们手中的选票吧，如果你们团结一致，那么支持罗伯斯庇尔的就只剩下库东[15]和贾斯丁等少数人了。因此，不要支持他，用你们的选票孤立他吧。"


杜波瓦与妻子


青年时期的舍尼埃

要想不激怒雅各宾派以及罗伯斯庇尔狂热的追随者们，需要特别细致的谋划，所以前方的道路势必曲折！一切安排妥当后，在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我终于有勇气对抗罗伯斯庇尔了。那天，在杜伊勒里宫前，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称自己是最高主宰、最高裁判和调停人。当他走向神台，向上帝表态时，我大声地对他喊道（当时有二十位同事听到了这句话）："你的末日近在眼前！"

五天后，他决定对我和我的八个朋友动手，并计划接下来至少处

决二十个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发现公共安全委员会内部也有一股反对他血腥计划的力量，这时，他该是多么震惊和愤怒！这股力量警告他，民意已经被过分破坏，是时候停止杀戮了。发现自己失去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后，罗伯斯庇尔愤怒地离开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离开前，他还发誓说：如果委员会一直不明白我的意思，那我便不再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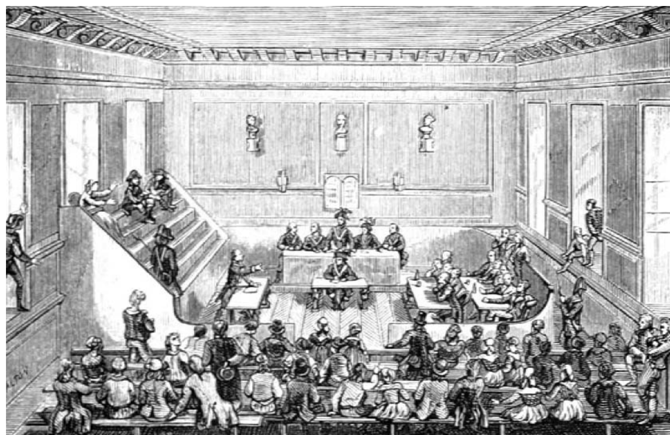
一场对罗伯斯庇尔不利的会议

离开公共安全委员会后，罗伯斯庇尔迅速召来了正在军队里的贾斯丁，又重新集结了库东麾下的铁血大军并控制了革命法庭[16]，随后，他又整顿了国民公会。做完这一切后，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已经控制了雅各宾派和巴黎所有的革命团体，以及国民自卫军[17]的长官昂里奥。他坚信，在如此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他一定能取得胜利。当时，他一定希望自己远离权力的旋涡，坐山观虎斗，静静地看着对手自相残杀，最后再把他们交给亟待复仇的人民吧。然而，软弱多疑的他并没有立刻行动，因此，他的对手获得了整整五个星期的时间来密谋接下来的行动。

我一直不停地观察着罗伯斯庇尔，随着他的势力渐渐衰落，我又秘密游说了他在公共安全委员会里的其他对手，让他们远离了忠于罗

伯斯庇尔的巴黎火枪手，并且撤掉了昂里奥的职务。在卡诺的坚持下，我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加强了军队里的炮兵建设。

撤掉昂里奥的职务似乎太过激进了，因此在军队里，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落实：昂里奥依然留在国民自卫军。另外我得承认，热月9日（7月27日），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我们才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这个昔日沉醉又愚蠢的奴才，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雕版画：革命法庭开庭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罗伯斯庇尔遇刺了。有的作家把他比作格拉古兄弟，但我觉得与他们相比，罗伯斯庇尔既没有演讲才能，也没有贵族教养。

我承认，沉浸在胜利中的我曾对当时支持罗伯斯庇尔的人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你们给了他如此大的荣耀，但他是个既没有计划又没有远见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无法自制的本能和冲动，像他这样的人又如何能掌控未来呢？"

当时的我也是当局者迷了。让整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可怕政体终于崩塌了，这是时代的伟大进步。然而，如果我们不妥善经营的话，生活是不会变好的。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呢？这个让人难以忘却的倒台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在罗伯斯庇尔死后，那些在十人专政时期备受凌辱的人们，开始用最残暴的话语来发泄他们的仇恨。



罗伯斯庇尔遇刺，他躺在担架上

不久之后，我们便看到，这场危机没有造福人民，却成了那些阻碍革命之人复仇的借口。国家从恐怖统治转入无政府状态，又从无政府状态陷入仇恨和报复的狂乱之中。

革命在革命的原则中被消耗着，折损着。革命者打着太阳和耶稣的名义组织雇用刺客，暗杀长期活动在外的革命者。虽然我逃过了罗伯斯庇尔的惩处，但我却没能躲过这些复仇的人。他们一直追到国民公会，用一些虚假的控告和罪名将我极不公正地驱逐。那之后，将近一年里，我在各种各样的凌辱和迫害中苟延残喘。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开始思考人性以及乱党的特点。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推向了极端，所以我需要等待，需要等待这些愤怒的人把革命、把国民公会推向绝路。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国民公会才会看到自己脚下的深渊。

这场危机的后果非常严重，整个国家都命悬一线。国民公会终于行动了，对爱国者的迫害到头了！蒲月13日，大炮响了整整一天，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既没有领袖、也没有行动中心就草率起义的反革命者们被镇压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蒲月的炮响给我带来了自由和荣誉。领导这次革命的年轻将领是波拿巴[18]，这一次，他为法国开辟了崭新的道路，所以，他必将青史留名。我承认从那个时候起，就很关注这位年轻将领的命运。

蒲月的炮响之后，我也准备重新与命运搏斗，是的，当时我觉得，我还有未来，我不该这么早就妥协。

这场暴动之后，督政府[19]成立了，说到底，督政府还是一种复合政府的尝试，它被四千万人称作民主共和国的协调者。

当然了，不得不说，在虎视眈眈的敌对武装面前，这个新生的督政府是一个伟大而勇敢的尝试。战争带给我们力量，这没有错，然而，战争也夹杂着罪恶。当时，我们根本无法分清到底哪一种政体——新的还是旧的——会最终取胜。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是我们天然的屏障。

人们都在等待，太多的罪恶浮现出来——控制我们的内心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为了在两种势力间寻求平衡，督政府费尽了心力。它的一边是只想替换临时政府当权派的政客们，另一边则是无力反抗督政府而退居南部和西部省份、勾结国外势力、策划内战的保皇派。

然而，正如所有的新政府那样，充满活力的督政府重组了军队，并且遏制了内战。不过，它可能过于担心那些政客们的举动了。然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督政府的统治下，这些身在巴黎的政客们集结了所有不满的革命者。在这双重暗礁里航行时，督政府慢慢偏离了航道——它在疏远革命者的同时（它自己就源于革命者），重用了那些人品欠佳、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在这些投机者中，有那么五个人，虽然他们曾在国民公会中叱咤风云，但如今，他们却开始迫害起自己曾经的同事，安抚起保皇派，采取了和自身状况完全相反的制度。



拿破仑·波拿巴

所以，虽然我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之一，但我却遭到了冷遇——在共和国，虽然我的情况算不上被流放，但那也绝对称得上是被打入冷宫了。那时，我没有任何公职，没有任何地位，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和我之前的许多同事一样，我空有一身爱国之情，却遭受着不公平的冷遇。

最终我能脱身而出，完全归功于偶然和制度的变化，在这里，我想说这么几个细节。

在那些供职于督政府的人中，巴拉斯[20]是唯一一个还和以前的同事来往的人。他像南方人一样坦率、忠诚和乐于助人，虽然他在政治上并不强势，但他老成持重，有着坚定的决心。不过，在生活中，他就太随意，甚至是放纵了，在道德原则上，他又太宽容了，所以，他的周围挤满了忘恩负义的吸血鬼。是的，他摆出一副共和国王子的姿态，而他身边那些溜须拍马之人和他的情妇则簇拥着他。

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卡诺，而他身边的人是怎么支持他的呢，嗬，他们对他的支持仅限于派他冲往前线，让他像蒲月13日那样骑着战马冲锋陷阵。

在罗伯斯庇尔危机之前，我就见过这个人，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我又见到了他。我清楚自己的见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私底下，我通过他的心腹隆巴德[21]和他碰了面。



巴拉斯

当时，政府和巴贝夫派[22]针锋相对。在这次会面中，他请我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于是我写了一份陈情书给他，指出了督政府所处的政治环境，并细数了它面临的危险。接着，我又详细分析了巴贝夫派，我指出，这一派人一方面希望颁布新的土地政策，另一方面则在觊觎着督政府的权力，暗地里想着伺机推翻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国家便会重新回到流血和恐怖之中。

我的陈情书对他触动很深，于是，为绝后患，巴拉斯派人去斩草除根了。此事过后，巴拉斯给了我一个闲职。不过我并不想通过这种

方式来获得差事，所以我拒绝了他。他对我说：“关于破格提升你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但现在，我在督政府的地位还不足以说服我的同僚们。”随着天气渐渐变冷，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被延后了。

在这期间，我有幸实现了财务自由。为了革命，我已经牺牲了一切，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最后却遭遇了最不公正的控告。对我来说，升迁已是无望，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们极力劝说我去效仿之前的同事们。哦，在督政府官员的庇护下，这些和我处于同样境况的人从家具行业里赚了一些钱。于是，我加入了一家公司，并在巴拉斯的担保下得到了一部分货物[23]。像伏尔泰那样，我开始赚钱，并把赚到的部分钱分给合伙人。凭借严格履行合同条款的能力，我的合伙人们在与共和国做生意上脱颖而出。当然我也参与了这些事情。在这个新的领域，也许我可以为那些遭受冷落的爱国者们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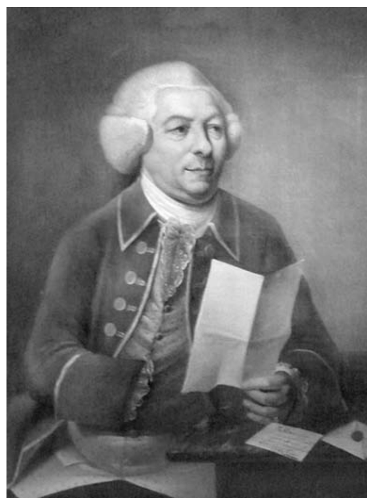
然而，督政府内部的危机却越来越严重，大量的革命党人被当成别有用心的政客和无政府主义者，不过，除非民众同意打压这些人，否则政府是不会轻易下手的。民意已经滑入了误区，共和党人虽然掌握着国家的缰绳，但整个国家却处于轻率的冲动之中，到处都是狂热地追求自由之人。在这些极端诉求的牵引之下，督政府在原本的康庄大道上惴惴不安。

流亡国外的贵族开始利用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公开宣扬新政府将命不久矣，显然，这些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共和党人和国家领导人。然而，这个时候，督政府内部正为了各派别的利益争斗得你死我活，于是，他们一点点地丧失了掌控国家的主动权。

最后会发生什么呢？当共和国和革命的军队战无不胜，一路高歌猛进，不断向意大利推进时，共和精神却在内部一点点死亡。选举成了保皇派和反革命分子的阵地，当上下两院[24]高票反对督政府时，一场分裂已经无可避免了。

危机之下，督政府成立了三头同盟[25]，巴拉斯、雷维耶[26]和韦伯[27]获得了远高于他们职务的权力。共治委员会成立后，三人意识到，他们所能依靠的似乎只有大炮和刺刀了。而且为了避免将领夺权，他们还需要调用军队。不过，与当下棘手的难关相比，后者的风险似乎暂时还没有那么严重。


雷维耶


韦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波拿巴相继征服了意大利伦巴第区[28]和奥地利，并在军队里的每个分队中设立了俱乐部。可就在这时，士兵们被告知督政府是革命的叛徒，他们正把法国卖给敌人。于是，士兵们在祭台前宣了誓，宣称以消灭叛徒为己任，之后，他们还把法外之徒的地址信息散布到了包括巴黎在内的所有省份。

北方的军队做的更多，作为桑布尔和默兹地区[29]将军的罗石[30]，带上补给，率领着军队向巴黎进军，并且在巴黎的周围城市安插了部队。不过，到了最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项行动突然停止了。也许是因为军队内部还没有就袭击两院一事达成一致，但我更愿意相信大家希望把荣耀留给那位意大利的征服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三头同盟中，巴拉斯代表着波拿巴的利益；被征服的意大利成了督政府的新财源；女人们也参与其中，筹划着各种阴谋。

果月18日（9月4日），在拿破仑的授意下，皮埃尔·奥热罗[31]带领军队控制了巴黎。在武器面前，法官低下了头颅，最后，在未经任何法律审判的情况下，两名官员、五十三名议员、众多相关报刊的作者和印刷商被流放，四十九省的投票被宣布无效，行政机关暂停工作、等候重组。

就这样，在军队面前，保皇派仓皇逃窜了，人民的力量得以重组，和平再次降临。与此同时，对共和党人的迫害也结束了，共和党或者革命党这些头衔不再是人们向上攀爬的资本。



罗石将军



指挥军队的皮埃尔·奥热罗

在督政府中，默林·德·杜埃[32]和弗朗索瓦·纳弗莎特[33]取代了卡诺和巴泰勒米[34]。经过这次调整，督政府似乎恢复了一些元气，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无法抵挡即将到来的风暴。最终，暴力之下，邪恶退去。然而，实际上，因为牵扯着未来，这样的举动非常危险。

在决定革命命运的那天，也就是果月18日暴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闲着。我向巴拉斯反复建言，那些有预见性的谈话也是有一些效果的，至少它们让三头同盟警醒了。革命的成果应归于那些用智慧和力量支持革命的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革命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35)？爱国者越过荆棘一路走来，现在不正是他们摘取自由果实的时刻吗？是时候奖励那些有能力的人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战胜了反法同盟的军队，克服了内战的危机，平定了内部投机倒把分子的谋乱。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了各级权力——这都是我们凭借能力取得的。当权力在手的时候，保持这个体制的稳定就是当务之急，其他革命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虚伪。虽然有些人口头上不承认这条定律，但它却是每个人心中的信念。我，一个有能力的人，说出了这些被认为是国家机密的平凡真理(36)。虽然他们能理解我的想法，但执行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

很快，就像天赐食物一般，我之前的同事们突然成了秘书长、公务人员、警察、公使、大使、秘密机构的工作人员、地区总领，经受如此长时间冷落的他们突然成为民选政府或军队中的一员。

我是第一批可以上任的革命党人之一，他们知道我的价值所在。然而，我多次拒绝了那些副职，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只接受那些可以让我直接参与大事件的职务，因此，我很耐心地等待着。

---

(1) 1793年4月，国民公会创建公共安全委员会。在法国大革命发展阶段，公共安全委员会是恐怖统治期间政府实际的执行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继承先前1793年1月成立的一般防卫委员会，并承担保护新成立的共和国抵抗外国入侵和镇压内乱的使命。作为战时措施，公共安全委员会由起初的九个成员扩增到十二个，并被广泛赋予军事、司法和立法工作的监管权力。

(2) 公元前452年，罗马的平民与贵族同意组成一个十人委员会进行立

法，定义罗马政府的执政原则；在十人委员会任职期间，其他长官的职务会被暂时停止，而前者的决定不必进行民意公决。

(3) 即盖乌斯·马略（公元前157——公元前86），罗马共和国军事家、政治家。

(4) 即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138——公元前78），罗马共和国政治人物、军事家、独裁官。

(5) 丹敦死后，在公安委员会的命令下，卡米尔·德斯莫林斯等议员在家中被逮捕。这些被迫出席革命法庭的议员完全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害怕受到同样迫害的丹敦的朋友勒让德、达连、库尔图瓦和其他议员再也不敢在家里睡觉，每天晚上都在各处流浪。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对待政敌的恐怖政策之一。

(6) 勒让德（1766—182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

(7) 达连（1767—1820），革命者、记者。

(8) 即亚历山大·杜波瓦（1747—1814），政治人物、将军。

(9) 达努（1761—1840），政治人物、历史学家，法兰西文学院常任秘书。

(10) 安德烈·舍尼埃（1762—1794），法国诗人。由于主张君主立宪制，在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恐怖”下，7月25日，他被送上断头台。

(11) 布东（1758—179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

(12) 高罗（1749—1796），政治人物，曾在国民公会中担任山岳派议员。

(13) 即拉扎尔·尼古拉·卡诺（1753—1823），法国数学家。他在法国大革命中获得伟大称号——“组织胜利的人”，是极其优秀且成功的军备与后勤天才。在法国历史上，路易十四的军备天才卢福瓦侯爵与他齐名。

(14) 即比洛·瓦雷纳（1756—1819），曾在国民公会中担任山岳派议员，并供职于公共安全委员会。

(15) 即乔治·奥古斯特·库东（1755—1794），政治人物和律师。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立法议会的代表而闻名。1793年5月30日，库东当选为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与他的朋友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恐怖统治时期紧密结合共事，直到罗伯斯庇尔被处决。库东在牧月22日法令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个法令使被指控为反革命而遭处决的人数急剧上升。

(16) 革命法庭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公会为了审判政治犯而在巴黎成立的法庭，是实行恐怖统治的强力机构。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检察长和两个副检察长组成，均由国民公会任命，其判决定案后，不得再上诉。

(17) 国民自卫军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各城市效仿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组建的民兵组织。这是一支区别于正规军的独立军事力量，最初由拉斐特侯爵指挥，然后短暂地归曼达特侯爵指挥。直到1792年夏，它还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并积极支持君主立宪制。国民自卫军对革命有一定影响，但后来被拿破仑解除武装，仅在1809年和1814年被召回用以保卫法国。在拿破仑被流放后，国民自卫军重建并在19世纪的每次革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8) 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军事家、政治家与法学家，在法国大革命末期达到权力巅峰，后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19) 督政府是法国大革命中于1795年11月2日至1799年10月25日期间掌握法国最高政权的政府，前承国民公会，后启执政府。

(20) 即保罗·弗朗索瓦·让·尼古拉·巴拉斯（1755—1829），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子爵，俗称“保罗·巴拉斯”，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及1795年至1799年督政府的主要领导者。

(21) 隆巴德（1750—182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人物。

(22) 格拉克斯·贝巴夫（1760—179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和记者。巴贝夫深受卢梭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财货共有。激进的平等思想使他被法国当局多次逮捕，最终遭到处决。1796年，追随巴贝夫的平等主义运动者曾策划推翻当时的督政府。

(23) 约瑟夫·富歇依然不乏对自己行为的粉饰，尽管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尽可能地陈述事实。在这部回忆录中，他已经供述自己的财富积累并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之后，我们还会知道他是如何一步获得巨额财富的。

(24) 1795年8月，热月党控制的国民公会颁布了新的共和三年宪法，规定新立法机构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参议院，由两百五十人组成，下院称五百人院，由五百人组成。宪法规定，现政府代表必须在新立法机构中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参议院选举出五名督政官组成督政府，每年改选其中一人。督政府成员以三个月为期，每人轮流担任主席。

(25) 三头同盟指三个有权力的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

(26) 雷维耶（1753—1824），法国大革命期间督政府的五位首脑之一。

(27) 韦伯（1747—1807），法国政治人物、外交家、共和党人。

(28) 伦巴第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和波河的一个意大利北部大区。意大利六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伦巴第大区，首府为意大利北部的最大城市米兰。

(29) 桑布尔和默兹地区位于默兹河畔、布鲁塞尔东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在17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里爆发过多次激战。

(30) 罗石（1768—1797），法国大革命期间著名将军。

(31) 即卡斯蒂廖内公爵夏尔·皮埃尔·弗朗索瓦·奥热罗（1757—1816），法国元帅，被誉为“法兰西第一击剑能手”和“最善战将军”。曾指挥莱比锡战役。

(32) 即安托万·默林·德·杜埃（1754—183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律师。

(33) 弗朗索瓦（1750—1828），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政治家、农学家。面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他写道：“宁愿忍受痛苦也不去施加迫害。”

(34) 巴泰勒米·纳弗莎特（1747—1830），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领导者之一。

(35) 一条珍贵的陈述，讲出了所有革命——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的动机。

(36) 根据史料，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敢这样说。在这里的陈述中，约瑟夫·富歇显得非常幼稚。

第3章　出任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大使

精彩看点

大使之职——《坎波福尔米奥条约》——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疆域——外交政策——督政府内部的派系——督政府做的事情——相互猜忌的双方——欧坦主教——远征埃及——巴黎的震动——战火再起——前往米兰赴任——人事调整——米兰政变——向人民主权致敬——联盟条款——我的行为——改革失败——督政府的阻挠——我的强烈抗议——督政府的瞎指挥——我的信——特使里沃——儒贝尔其人——军事政变——我开始逃亡——特使里沃的荒诞宣言——我回到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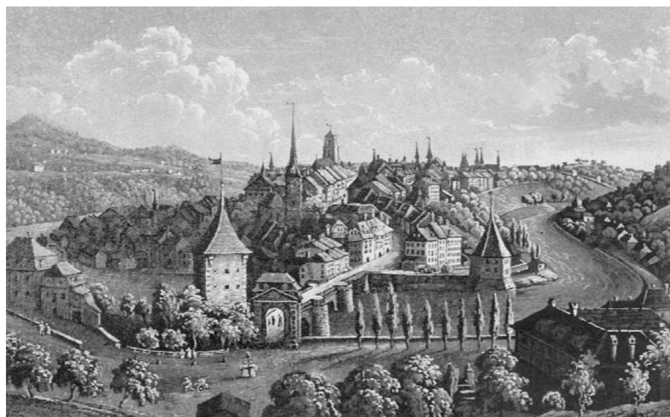
虽然我为此等了很久，但我的等待是值得的，这一次，巴拉斯终于说服了他的同事，任命我为法兰西共和国驻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大使。为此，他们开了多次会议商讨此事。终于，在走完正规的流程之后，1789年9月，我以大使的身份来到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众所周知，对于胜利之师和友好的新政府，我们是心怀感恩之情的。为了答谢这份恩情，我们愿意在奥地利给它修建一座金桥，愿意把威尼斯送给它。

根据《坎波福尔米奥条约》[(2)]，奥地利把荷兰割让给了法国，把米兰、曼托瓦[(3)]、摩德纳[(4)]割让给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因此，除了伊奥尼亚群岛[(5)]归法国以外，奥地利依然占有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剩下的土地不过是一块待接的石头，而且人们已经在谈论着要把革命进行到整个意大利去了。

在这段时间内，《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可以用来巩固新的共和国政权。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疆域非常辽阔，包括了奥地利的伦巴第、莫德内塞、马萨、卡拉拉、博洛尼亚、费拉拉、罗马涅、贝尔格玛、不勒森、克瑞马斯克和威尼斯的一些乡镇。

重组后的新政府也在谋求改变：它希望能得到法国——这个强大国家的庇护，而不是在督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苟延残喘。而且比起奴隶，法国更需要强大的同盟。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巴拉斯和布律纳[(6)]将军的意见——此前，这位将军的总部在伯尔尼[(7)]，不久之前，他刚把自己部队的总部移到米兰。然而督政府的另一位领导——来自科尔马的韦伯，一个强势却无能的人——却坚持强硬的政治外交政策，他宣称，不论是对朋友还是对敌人，我们都要用武力来征服——他似乎从这种方式里看到了尊严。



19世纪初期的伯尔尼



布律纳将军

默林·德·杜埃是一个优秀的法学家，同时是一个懦弱的政治家。在大事面前，韦伯更愿意和默林·德·杜埃探讨应对的方法。也就是说，督政府的实际掌权人是韦伯和默林·德·杜埃，特里尔[8]和雷维耶·勒博不过是他们的追随者。有时，巴拉斯也会自成一派，凭借着独特的想法和技巧在政府中占上风。况且人们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人，危难时总会对别人伸出援手。

然而我们已经不能再沉迷于过去的胜利之中了。我的想法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们最好明确一些重要的事情，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好准备。

《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后，在这不到一年的和平时间里，新政府已经过度耗损了自己的信用，统治的根基被逐渐蚕食。然而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停下：在海尔维[9]、罗马和意大利中部，到处是被滥用的武力；在国家没有国王之时，政府贸然和瑞士开战；而出征埃及[10]更是让一切雪上加霜。

对于出征埃及这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值得注意。波拿巴既害怕联合政府，又轻视被他称为五个末代国王的督政府。从意大利凯旋之后，法国人的热情让他昏了头，于是他计划着夺取最高权力。不过因为自身的经历，在政府里没有足够的威望，用他自己的话说——“果实还没有成熟”。

督政府也在担心这位即将出征英国的大将会对巴黎造成不好的影响，毕竟这位大将并不害怕牺牲阿尔比恩。说实话，对于这么一个希望加强自己力量的失势政府，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我们寻找应对之策时，前任欧坦主教[11]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之中。通过内克尔[12]诡计多端的女儿，这个投机分子参与到了外交事务中。他觉得他可以借助出征埃及之事把波拿巴排挤出局，因此，他首先说服了韦伯和默林·德·杜埃，接着，他又去游说了巴拉斯。虽然他计划的核心不过是那些老掉牙的明争暗斗，但最终却成为一个国家级事件。

对督政府来说，把这位粗犷勇敢的将军放逐到吉凶难料之地的计策看起来非常不错。而波拿巴，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征服遥远土地的同时，又可以获得更高的威望。然而很快他的热情就冷却了：或许是觊觎着最高权力，

又或许是纠结着是否要离开一支可以征服东方的军队。总之，他并没有急着离开巴黎，并开始暗自接触军队里的精英。

最初，这场远征一切顺利，我方很快就攻下了马耳他。然而，紧接着到来的却是极大的灾难，在尼罗河，我们的一个中队被全歼了。局势瞬间大变，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英国联合了俄国和两西西里王国(13)，开始挑唆新的战争。



内克尔诡计多端的女儿斯塔尔夫人



拿破仑指挥军队与埃及人作战，远处为雄伟的金字塔



拿破仑与狮身人面像

在巴黎，接连不断的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似乎又要变天了，所有人都开始备战，所有的一切都带着敌意和晦暗的色调。政府已经强制向富人借贷八千万法郎，而且据说征收标准还在提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儒尔当[14]向两院[15]提出的仿效奥地利的募兵计划得以推行和完善：意大利和德意志至少征召了二十万士兵，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各地几乎同时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斯海尔德河流域[16]、德塞夫勒[17]、梅赫伦[18]和布鲁塞尔暴动频发；沃盖合和曼图

亚周围骚乱不断；皮埃蒙特[19]大区的政权在一夜之间被颠覆；受我们革命的影响，热那亚和米兰的党派内部也是纷争不断。

在这种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我前往米兰赴任了。到达米兰的时候，布律纳将军正打算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推行人事调整，而我则是这次调整中的关键。人事调整的目的在于把权力下放到更有能力、更果敢的人手中，此次人事调整完成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将获得新生，并给整个意大利的发展注入活力[20]。

我们希望此举能够得到督政府中大多数人的支持。我和布律纳商量着推进此事，于是，我负责动员那些最热情的伦巴第人。我们一致认为，这次调整要平稳有序地进行，不允许有暴力或者随意剥夺公权的事情发生。

10月20日早上，米兰发生了一起军事政变，米兰城的城门被封锁——当时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和议员都在工作岗位上。在法国武力的威胁和督军布律纳的暗示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五十二名代表主动辞职，新的代表立刻走马上任；同时，由前大使杜威选定并向督政府备案过的三名领导阿德莱修、罗斯和索普内斯也被暗示辞职，并被布鲁内提、萨巴提和希纳斯尼代替。

这场类似果月18日的人事调整推进得很平稳，取得了成功，并且获得了初级议会的承认。以人民主权来惩戒侵犯它的人，是我们向人民主权的致敬。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前领导人索普内斯带领着二十二名议员向我提交了异议书，而我则劝他们不要固执己见。不过很明显，我的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强行用武力让索普内斯离开他所在的督政府府邸，并且重新提交一份文书，说明他曾向督军布律纳否认窃取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领导权力。

悄无声息中我们渡过了所有的难关，躲过了各种分裂，但我们也

知道，失势的人们已经把不满传到了巴黎的督政府。

在我看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0月20日的人事调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一是因为它有之前果月18日政变的榜样，二是因为它的主事人督军布律纳深思熟虑，三是因为最近督政府为了清除一些焦虑和危险的议员而临时颁布了废除各省选举结果的议案。

我甚至还有更多的打算，当然考虑最多的还是法国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所签订的联盟条款。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军队

这项于1796年3月7日得到参议院支持的条款规定：法国明确承认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承认其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作为条件，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需要参与法国所有的对外战争；在督政府征召时，它要无条件服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负责两万五千将士的日常所需，每年预留一千万法郎作为此项支出；最后，军队要受法国的绝对控制。

为了确保该条约能够被严格执行，督政府和议会要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安排一些可靠的人，一些能够放心把权力转交过去的人。现在我为政府和议会做了这件事。并且我还指示新政府循序渐进地革除政府中的各项弊端，推行精兵减政之事，尽量不要让改革成为民众的负担。

这段时间里，米兰的两院已经允许督政府出售三千万国有领地——很多神职人员的领地也包括在内。所以说，这次人事调整也有保护巨额国有资产的考虑，督军布律纳的急件可以说与我不谋而合。

然而我们的指示几乎没有效力。自傲、自大、最阴险的盘算以及外国的觊觎纷至沓来。是时候启用战时紧急措施：推翻已经腐朽不堪的旧政府，关系到我们沿用还是放弃意大利联邦共和国制度[21]。

然而，这项坚决的改革还是失败了。阴险的内务部长用尽手段阻挠改革，而最后，他也的确做到了[22]。狂妄的韦伯和默林·德·杜埃决定反对米兰的改革，唯一投赞成票的是巴拉斯。但不久之后，他的赞成票就被宣布无效。

10月25日，督政府一怒之下推行的法令正式否决了布律纳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也收到督政府的来信，在信中，他们对我的改革表达了不满，并且暗示我让被驱逐出议会和督政府的人官复原职。

本来，我是可以很轻松地和这件事撇清关系的，因为在这起事件中，我没有直接参与任何行动。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刚赴任的大

使，根本不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目的。如果我是一个为了保全自己的大使公职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和荣誉的人，那么我的确会这样做。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因此，我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我还强烈地抗议了督政府的来信，告诉他们倒行逆施的危险。人民在初级议会抗议示威，指责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政府行为轻率、言行不一，简直如同傀儡，政府的人已经不知该如何行事才能免于这种指责。我还向督政府指出，让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爱国者们失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失误！我警告督政府说反对派已经开始在那不勒斯蠢蠢欲动，三万奥地利人正在向阿迪杰河集结。

然而，对我的警告，督政府置若罔闻。就在我接到督政府正式法令的同时，布律纳将军也接到调令督命他前往荷兰，取代他的是儒贝尔(23)。不过，果敢、谦逊而又忠诚的儒贝尔将军迅速平定了这一切，这真是共和国之万幸！

11月7日，我接到了督政府的命令：如果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政府不能恢复到10月20日之前的状态，那么法国将会断绝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一切关系。此后，米兰两大派系杀气腾腾地较着劲，一方渴望恢复旧秩序，另一方则决定反击。此外，督政府还命令我组建新的初级议会。

对这种违背共和精神的出尔反尔，我非常愤怒。法国的制度就是建立在共和精神之上的，但现在，他们却要用这种奴役别人的制度来治理一个共和国盟国，对我来说，这简直荒谬至极。督政府想把意大利半岛变成一个只服务于自己的机器，这完全违背了盟军条约。

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两国的高层进行了报复性反抗。以下内容节选自我写给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政府的信：

> 各位领导，身为公民的你们，不要妄图去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了。你们的合法性只是暂时的，因为，我国督政府

不同意且严厉指责这项政令（这里，我的语气应当稍微缓和些）。在你们的初级议会中，你们的同胞们已经对这个合法性提出异议，你们应当考虑并对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人民的抗议负责！

骄傲地承认它的独立和你们的独立，坚定地守住它交给你们的管理权，而不是去拥抱那些背信弃义的建议；用一致和公正的政策来捍卫你们的权威；抵制那些邪恶的冲动，用坚定和公正来征服你们的敌人。

我们一直希望给这片土地以和平，但如果对鲜血的饥渴和狂妄让你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些叛徒，抱歉了！自由的人们会从你们的身上绝尘而去！

各位领导们，身为公民的你们，提高你们的觉悟吧！如果你们想控制局势，那么你们就必须拥有比局势更宽广的胸怀！不必担心未来，共和才是正道，胜利和自由必将嘉奖这片土地。

解决眼前棘手的运动后，你们的同胞会感谢你们的付出……你们要让他们知道，力量不是狂热，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独立。

然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高层远远没有这样的高度。我四处寻找坚定忠贞的心，幻想着哪怕有一颗也好，但四处只充斥着懦弱、犹豫的灵魂。

我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公众面前的言论引起了临时政府——驻扎在卢森堡公园的督政府的不满。他们立刻命里沃以特使的身份来米兰接替我的职位。这位特使里沃[24]肩负着命我离开意大利的使命来到了米兰，但，我没有离开，督政府没有权力驱逐一个自由人。

在这件事情上，刚接手布律纳之职的儒贝尔与我不谋而合，因此，我决定留在意大利静候事态的变化。儒贝尔是波拿巴将军手下最勇敢、最机智、最令人尊敬的中尉，《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之

后，他一直支持荷兰的人民运动。来到米兰后，他不顾督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坚决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支持民众希望获得自由的想法。我尽力劝说他不要被牵扯到我的事情里，最好避开我行事。

在此期间，特使里沃根本不敢做任何事情，他只是知会了他在卢森堡公园的代理人，向他们禀报了自己的境况。卢森堡公园立刻发出急件，要求里沃采取军事行动。12月7日晚到12月8日，法国军队接管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政府和两院的保卫工作，国民议会、政府以及两院的入口被封锁，宪法委员会的门上贴满了封条。12月8日晚上，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政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后，新的政府官员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旧的政府官员。同时，里沃发布了数条逮捕令。若不是得到儒贝尔及时通知的话，恐怕我就要被捕并押回巴黎了吧。

得到儒贝尔的及时通知后，我逃到了蒙扎[25]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与此同时，我收到了特使里沃对内高卢人民的宣言。在这份荒诞的政治文书中，里沃谴责11月20日的军事行动过于暴力。让人愤怒的是，在当时行动时，军队保护的正是他们这些人。可笑的指正，它批判果月18日的政变，和最近在米兰上演的这一幕，一幕巴黎在米兰上演的闹剧。

这位特使鹦鹉学舌般地指责了我和布律纳，斥责我们是没有人格和没有使命的改革者，最后强调指出，我们过分的爱国精神让人民的政府蒙羞。这些毫无道理的指责让人不齿！

获知我藏在米兰后，督政府又派了一名特使，负责把我逐出意大利。接到任命后，那位特使立刻给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政府写信："若您知道富歇在哪里的话，请您通知我。"他对我的怀疑和两国政府对我的恐惧让我觉得可笑。离开蒙扎后，我翻过阿尔卑斯山，于1799年1月初回到了巴黎。这时，韦伯和默林·德·杜埃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因为上下两院的压力，他们不得不低调行事。因此，他们没有追

究我的责任，只是以官方名义宣布我结束了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工作，回到了巴黎。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力量去质问他们对我采取的野蛮行径，并要求他们补偿我长途跋涉的损失，但当时，我并不想与他们争辩什么。

从高位跌落的每一个细节，这个时期的精神状态，以及我拥有的平台让我懂得了很多。在去马伦哥[26]前，受波拿巴之邀，我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历史。现在，重读它们的时候，我还能够从其中发现很多让我津津乐道的地方。

---

(1)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又译“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是意大利统一前位于其中北部的政权，统治着伦巴第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以及维内托和托斯卡纳部分地区。1797年6月29日建国。这个所谓的“姊妹共和国”（这是那些仿照革命法国建立的国家的称谓）第一次更名为“意大利共和国”（1802—1805），此后又变为“意大利王国”（1805—1814），首都为米兰。

(2) 或称《坎波福尔米奥和约》，是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和约。条约于1797年10月17日签订，由法国代表拿破仑·波拿巴与奥地利代表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伯爵签订。条约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崩溃、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的最终胜利。条约规定，奥地利向法国割让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威尼斯（连同威尼西亚）、伊斯特拉半岛和达尔马提亚归奥地利，法国则获得地中海数个岛屿，包括科孚岛及威尼斯共和国在亚得里亚海的其他岛屿，此外，奥地利承认利古里亚共和国及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独立。

(3) 曼托瓦是意大利伦巴第大区曼托瓦省会。

(4) 摩德纳是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摩德纳省会。

(5) 伊奥尼亚群岛是希拉欧瑞部伊奥尼亚海的群岛，面积2307平方千米，多火山、地震，地中海气候。

(6) 即纪尧姆·马里·安内·布律纳（1763—1815），法国军人、政治人物。布律纳是一位律师之子，生于法国科雷兹省布里夫拉盖亚尔德，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在巴黎学习法律，后成为一名政治记者。1793年在北方军团服役期间升为准将，负责镇压反革命。1796年，他被派往意大利军团，晋升为少将。

1798年进军瑞士，将日内瓦并入法国，1802年到1804年任驻土耳其大使，受封为法国元帅。1815年，拿破仑一世退位。赴巴黎途中，他在阿维尼翁被群众杀害，其遗体被抛入莱茵河。

(7) 伯尔尼位于瑞士西半部领土中央偏北之处，是仅次于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的瑞士第四大城市，是伯尔尼州首府，亦是瑞士实际上的首都。

(8) 特里尔（1742—1810），法国政治人物、法学家。曾担任制宪议会主席、国民公会主席和五百人院主席。

(9) 海尔维是1789年在瑞士成立的三个假想共和国之一。

(10) 埃及——叙利亚战役是指1798年至1801年期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远征奥斯曼帝国辖下的埃及的军事行动，后来战火烧至叙利亚。法国东方远征军由拿破仑率领，攻打当时属于奥斯曼帝国辖下的半独立政权埃及。法军占领埃及后，受到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联合进攻，最终不得不放弃埃及。

(11) 这里是指法国著名政治人物、外交家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曾于1788年到1790年担任欧坦主教。由于腿部残疾，他不能如家族期望的那样从军，转而学习神学。1780年，他成为一般代理神职人员并成为法国王室的教会代表。他曾在数届法国政府担任高等职务，通常是外交大臣或其他外交要职。他的职业生涯跨越路易十六、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时期。塔列朗的上级通常都不信任他，但拿破仑本人认为他是个十分能干的外交官。“塔列朗式”已经成为一种玩世不恭、狡猾的外交态度的代名词。

(12) 即雅克·内克尔（1732—1804），法国路易十六的财务大臣、银行家。他的女儿是作家、社会活动家斯塔尔夫人。

(13) 在拿破仑时期法国入侵前，波旁王朝统治两地，但它们形式上被分为“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统称为“两西西里王国”，在更改王国名称之后，费迪南多成为国王费迪南多一世。

(14) 即让-巴普蒂斯·儒尔当伯爵（1762—1833），法军指挥官，拿破仑帝国的元帅之一。他曾做过路易十六的士兵，在西印度群岛服役。

(15) 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解散，其立法权力由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参议院和五百人院继承，被称为两院。

(16) 斯海尔德河，也称埃斯科河，发源于法国埃纳省，流经比利时，最终在荷兰注入北海，全长三百五十千米。

(17)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期间，德塞夫勒是法国行省。

(18) 梅赫伦是比利时弗拉芒区安特卫普省的一座城市。

(19) 皮埃蒙特是意大利西北的一个大区，首府是都灵。

(20) 关于这项改革，约瑟夫·富歇并没有交代特别清楚。这项计划遭到督政府中大多数人反对，它的推行直接导致奥热罗将军失势。作为三军统帅，奥热罗将军在即将进攻施瓦本前被紧急召回。有人插手《坎波福尔米奥条约》刚刚确立的政治格局，引起拿破仑·波拿巴十分不满。需要承认的是，这项推行了一半的、大胆的全面改革方案为1799年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21) 历史将会为约瑟夫·富歇的1789年的改革方案正名。毫无疑问，之后他会提供新的证据。改革方案“随着形势发展做过调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22) 这种个人情绪的宣泄是毫无用处的。对不了解实情的读者来说，只需要去翻翻当时的年鉴即可。

(23) 即巴泰勒米·卡特林·儒贝尔（1769—1799），法国将军。1784年，他加入法国皇家军队，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战功卓著，拿破仑·波拿巴认可他的才能，非常信任他。1799年在诺维战役中阵亡。

(24) 即让·里沃（1755—180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

(25) 蒙扎是意大利伦巴第政区中的一个城市，从11世纪开始，成为米兰的卫星城市。13世纪成了自由市，14世纪由米兰维斯孔蒂家族管辖，后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1859年，蒙扎属撒丁王国，1861年归意大利王国。

(26) 马伦哥是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的一个小镇。这里爆发了著名的马伦哥战役（1800年6月14日）。法军由拿破仑率领，凯旋而归。

第4章　督政府与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

精彩看点

暗流——五个末代国王——俄国宣战——将军们——战事不利——战败的后果——战略调整——拿破仑的弟弟——韦伯出局——西哀士——选举——两个立法联盟——危机——不满——导火索——解除言论管制——西哀士的胜利——议会的胜利——荷兰大使——与西哀士道别——我的建议——西哀士的想法与私心

督政府的权威摇摇欲坠。除了公开的反对外，更多的是各派系对督政府统治的不满。人们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但毋庸置疑，这些人已经在暗处酝酿着阴谋，准备着发起攻击。

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厌烦了那五个末代国王[1]，厌倦了不断地神话他们这种幼稚的事情，更让人愤怒的是，在他们的统治下，人们只看到了掠夺、不公和荒诞。因此，那些派系的人决定唤醒昏昏欲睡的人民，率领他们反抗督政府的暴政。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做过几次交流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将有大事发生了。

俄国人正在不断地推进，督政府指示奥地利做出应对，试图阻止俄国人的扩张。2月底，俄国突然宣战。督政府与奥地利结为同盟。然而，最优秀的将军们却还困在别的战场上：拿破仑正在非洲沙漠上奋战，从爱尔兰远征军中逃走的罗石被人毒杀，皮什格鲁[2]被放逐到了锡纳马里[3]，莫罗[4]也受到了排挤，尚皮奥内[5]更是被革职查办。据说，为了遏止督政府中那些代理人的巧取豪夺，贝尔纳多特先是辞去了维也纳使馆的职务，接着又辞掉了观察军总指挥一职。最后，儒贝尔，那个勇敢善良的儒贝尔，那个想要在意大利建立自由政权来巩固两国关系的儒贝尔，也被免去了职务。



尚皮奥内

瑞士、意大利和埃及的战争不过是第二次大陆战争的一个序幕，3月1日，战争正式拉开帷幕，3月21日，在施托卡[(6)]，儒贝尔战败，不得不率部迅速转战莱茵河。不久之后，两院与拉施塔特断绝关系。在德意志地区，我方居于劣势，意大利地区的战事也是如此，在阿迪杰河，韦伯的爱将舍雷尔屡战屡败，连输了三场战争，输掉了我们用三场恶战才赢得的土地。

如果说之前我们是捷报连连，那么现在，我方就是节节败退。督政府也预料到了这些消息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如果战时的政府只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却无法击败敌人的话，那么它必将丧失权力。我方战败的消息传来后，野心家们开始蠢蠢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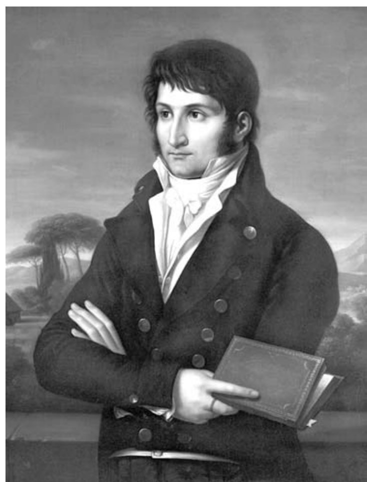
那段时间，我参加了很多议员和将军们的秘密集会。我发现不满督政府的党派们没有共同的目标，这些人聚在一起不过是为了推翻督政府，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政府。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说服

巴拉斯调整战略，想尽一切办法把韦伯赶出高层，与特里尔、梅兰·德·杜埃和雷维耶·勒博做一个了断。尤其是默林·德·杜埃和雷维耶·勒博，为了孤立两院中最热情的共和党人，这两个人曾支持分党派选举。

我也知道，在拿破仑被战略流放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两个兄弟约瑟夫[(7)]和吕西安[(8)]负责保障他在巴黎的利益。有极端爱国情绪的吕西安是一个反对党的头目；约瑟夫则斥巨资维持着一个“大家族”，那里聚集着议会里最有影响力的议员们、职位最高的政府官员们、战功最显赫的将军们以及那些最有心计的女人们。



施托卡之战，儒贝尔将军战败





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　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

韦伯出局了。对于自己出局，韦伯困惑不解，他将之归于天意。这时只要能获得元老议员的退休资格，他就很满足了。当然，默林·德·杜埃也不过是一只即将被牺牲的替罪羔羊。那么，在督政府中，谁来代替韦伯呢？默林·德·杜埃和他的追随者们，以及那些大腹便便的议员们，最终决定把来自滨海塞纳河省的杜瓦尔[9]推上之前韦伯所在的位置。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杜瓦尔，虽然为人正直，但能力平平，目光短浅，看不清局势。

我们没有插手督政府换人之事。当时的我们正全力以赴扶植驻柏林大使西哀士[10]——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个人有神秘能力。我知道，对于革命，西哀士有一些积极的、强烈的想法，然而我也知道，这个人多疑且虚伪，他的一些私心和我们自由的原则格格不入。虽然我并不愿意支持西哀士，但在这突然间形成的阵营里，我选择站在了他这一边。也许我们的联盟需要一个领导人，一个有能力平息普鲁士人的领导人。然而，当他向联盟发出警告之时，我们便已经确信他的政治生涯即将结束。

接着便是选举。即使到了现在，每次想起选举结束时默林·德·杜

埃脸上的失望神情，我都哑然失笑。选举结束后，默林·德·杜埃这个善良的人命人从公安部发电报，向两院宣布自己当选为督政府委员，结果却得知一部分人已经叛变。默林·德·杜埃和杜瓦尔都无法想象这样一桩胜券在握的事情居然会一败涂地。但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当晚的战术研讨会上，人们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颇有些幸灾乐祸。

梅兰·德·杜埃把西哀士看作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一直以来横眉冷对。至于好人杜瓦尔，不久后被一个勃艮第人所代替，从此郁郁寡欢。不得不说，梅兰·德·杜埃和杜瓦尔，这两个资质平平的人都不是能掌控政治的合适人选[11]。

好戏才刚刚开始，两个立法联盟出现了：一边是布雷·莫尔特、舍尼埃、弗朗索瓦·德·南特、夏米尔[12]、塔克西埃·奥利维尔[13]、伯捷、巴丁[14]、卡巴尼斯、雷尼尔和波拿巴兄弟，一边是贝尔特朗·杜·卡尔瓦多斯、普兰达、德斯[15]、贾洛[16]、阿瑞纳[17]、萨利斯提[18]和其他“得力干将”。为了给巴拉斯物色可为我们所用的人，我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这两派的人员。后来，巴拉斯也有效控制了我帮他物色到的人。最开始，我们只能秘密行事，毕竟摊牌的时机未到。

法国面临的危机似乎无意中帮助了我们。二十多场败仗下来，十七万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士兵和那些一直受冷落的将军们，如何才能挡住十万意气风发、士气高昂的敌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支持下，敌军正杀气腾腾地逼近法国边境。

很快，人们对督政府的不满便彻底爆发：“一直以来，督政府都在掠夺我们，行不义之事。果月18日以来，政府一直在滥用职权，独裁专政。而且自执政以来，督政府已经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严重威胁到了共和国的安危。”

只有在议会里，督政府还有一些蹩脚的支持者。当巴约勒[19]在宣传册里写下“比起边境上的俄国人，我更担心的是两院中的俄国

人”时，民众的愤怒终于一发不可收拾。

这段文字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当时，刚刚上任的新领导西哀士正向督政府询问共和国当前的内政外交情况。牧月28日（6月18日），在不清楚卢森堡宫事态进展的情况下，国务委员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了反击，督政府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然而这时的督政府已经无力应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首先，督政府被迫解除了言论管制，人民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国内再也不是法学家的一言堂。同时，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特里尔离开了督政府。

默林·德·杜埃和雷维耶·勒博依然认为自己在督政府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然而，莫尔特·布雷以及他阵营的议员们已经前往卢森堡公园，公然要求督政府将他们二人革职查办。与此同时，贝尔特朗·杜·卡尔瓦多斯也以十一人委员会（吕西安也是其成员之一）的名义，站在审判台上，向政府领导人宣读罪状书：

> 哈比内、里沃、杜威、法比乌[20]之流，不断激怒我们的盟军，侵犯人民的权益，迫害共和党人，任用叛徒！……

对于这样的控诉，我一点儿也不陌生，我自己的遭遇不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吗？

最终，牧月30日（6月20日），在确认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后，梅兰·德·杜埃和雷维耶·勒博引咎辞职。西哀士是这场战役的幕后推手，所有的革命力量都围绕在西哀士和巴拉斯周围。

和议会中的闹事者们取得一致意见后，西哀士等人立刻向督政府施压，迫使他们起用了皮埃尔·罗歇·迪科[21]、穆棱[22]和高杰来填补督政府中空缺的位置。这些被选中的人要么能力不足、要么性格软弱，完全不会给西哀士等人带来任何困扰。不仅如此，因为皮埃尔·罗

歇·迪科和西哀士进行了利益捆绑，所以新上任的这些人还可以帮助西哀士等人成为幕后真正的领导人。



穆棱

重组的议会马上通过了对儒贝尔的任命。巴拉斯从西哀士手中接过任命书，任命儒贝尔为巴黎总指挥。这项任命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为了补偿我，几天后，我也接到了法国驻荷兰大使的任命书。

向西哀士道别时，他对我说：“在此之前，我们的管理都没有章法，可以说只是见机行事，将来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同时，对于自己这种想法，他也表现出了焦虑，说：

“我们永远也掌控不了局势。”

“没有目标、没有规矩的民主做派应该让位于共和精英管理体制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政权。”我对他说。

“的确，如果能这样，那就真是再好不过了，然而，目标依然遥远，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道别时，我还向西哀士提及了儒贝尔。在意大利时，我有幸见识过这位将军的英勇和无私。我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地重用这位将军，给他权力和影响力。儒贝尔将军是一个永远不会背叛国家的人，我们无须提防他，可以放心地把兵权交给他。"

西哀士很认真地把我要说的话听完，但他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不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模棱两可，我无法知晓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猜忌西哀士或是挑战西哀士的信任，我并不感到快乐。在这之后，我得知他曾和某个人——刚上任的参议员塔列朗的一个朋友——进行过一次卓有成效的谈话。他向这个人坦言："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革命一直游走在一个怪圈里，只有仿效1688年英国革命[23]，依托于一种社会组织，我们才能走出这个怪圈。"此外，他还说道："过去的一百年已经证明，在英国社会中，自由和王权可以相安无事。"

那人反驳道："但世界上已经没有第二个纪尧姆了！"

他回应道："是的没错，但德意志北部还有一些开明的王公贵族、将士和哲学家，他们依然如同利奥波德管理托斯卡纳[24]那样管理着自己的领地。"

听到西哀士在暗指德·布伦瑞克公爵[25]后，那人便用1792年宣言[26]反击他。可这一次，西哀士却情绪激动地说："这该死的宣言又不是他写的，再说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使法国免去战火之灾。至于剩下的，就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了。况且现在，德·布伦瑞克公爵已经和那些觊觎王位的人达成了和解，那些人也不再敢轻举妄动。另外，在我们现有的将军里，我不知道有谁能掌控这些精明强干的人，让我们渡过眼下的难关。不必遮掩了，所谓的权力和宪法正在走向毁灭。"

西哀士的用意显而易见，这些话等于向人们昭告他那不可告人的私心。此外，我又得知，西哀士也对巴拉斯说过同样的话。

毫无疑问，在社会契约方面，西哀士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大的主教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唯一的立法者。离开巴黎的时候，我已经确定，西哀士已经和几个有影响力的人交流过他的想法，比如达努、舍尼埃、卡巴尼斯和嘉禾[27]。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革命会再一次爆发的原因。然而，如果不是再一次经受了革命的洗礼，法国可能就会在无政府状态下继续疯狂，也可能会在反法同盟的炮火下苟延残喘。



德·布伦瑞克公爵



西哀士



匿名讽刺漫画：讽刺布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宣言跟擦屁股纸一样

(1) 这里指督政府的五位督政官。

(2) 即让·夏尔·皮什格鲁（1761—1804），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位有争议性的将领。他曾率法军占领比利时与荷兰。后来，皮什格鲁成为保王党重要领袖之一，当选为议员。1797年，奥热罗发动果月18日政变，皮什格鲁与巴泰勒米等人被捕，同十四名同党一起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卡宴。后来他与其他七人逃亡到帕拉马里博，从那里乘船逃往美国。随后前往英国，成为亚历山大·高沙可夫的幕僚，积极参与组织第二次反法同盟。

(3) 锡纳马里是今法属圭亚那的一个小镇。

(4) 莫罗（1755—1828），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帝国的著名将领，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5) 即让·艾蒂安·瓦谢尔，又称尚皮奥内（1762—1800），法国将军，曾参加直布罗陀包围战。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参加革命运动。

(6) 施托卡是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城市。法军与奥军曾于1799年及1800年在这里交战。

(7) 约瑟夫·波拿巴，那不勒斯国王，西班牙国王（1768—1844），拿破仑的哥哥。他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流亡美国，后在佛罗伦斯辞世。

(8) 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的弟弟，法国政治人物、科学家。

(9) 杜瓦尔（1750—1829），法国政治人物。曾担任制宪议会、国民公会和下议院议员。拿破仑帝国时期，供职于公安部。

(10) 艾玛纽尔·埃贝·西哀士（1748—1836），法兰西天主教会神父。1799年，他煽动雾月政变，协助拿破仑·波拿巴夺取政权。

(11) 约瑟夫·富歇是个自大的人，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主宰公安部，才能灵活运用那些阴谋诡计，才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

(12) 夏米尔（1756—1829），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前期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后期坚决反对拿破仑独裁。

(13) 塔克西埃·奥利维尔（1764—1849），政治人物。他曾任下议院议员与上维埃纳省省长。

(14) 巴丁（1748—1799），法国政治人物，革命家。

(15) 德斯（1754—1804），法国政治人物，革命家。

(16) 贾洛（1762—1829），法国议员，政治人物，革命家。

(17) 阿瑞纳（1753—1832），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政治人物，因策划过暗杀拿破仑的事件而声名大噪。

(18) 萨利斯提（1757—1809），政治人物。

(19) 巴约勒（1762—1843），律师，政治人物，作家。

(20) 法比乌（1752—1817），政治人物。

(21) 皮埃尔·罗歇·迪科（1747—1816），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是国民公会以及督政府的高官。1799年11月9日，迪科参与了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政变，成为三执政之一（其余两位是拿破仑和西哀士）。随着稳定的宪法的出现，迪科成为议院副议长。在拿破仑帝国时期，他多次被授勋。但到了1814年他抛弃了拿破仑，并投票将其废黜。

(22) 穆棱（1752—1810），法国大革命时期将军。

(23) 光荣革命是一场政变，源自英王与国会权力之争以及基督教新旧教（国教会与天主教会）之争，发生于1688年到1689年。辉格党、托利党联合发动，将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赶走，改由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与夫婿威廉共治。

(24) 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一个大区，其首府为佛罗伦萨。

(25) 德·布伦瑞克公爵（1735—1806），普鲁士陆军元帅。

(26) 这里指《布伦瑞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在1792年7月25日致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该公告威胁如果法国王室的成员受到任何伤害，法国平民将因此受到严厉的报复。这项公告本来是为了恐吓巴黎，却反倒加剧了人民的革命热情。

(27) 嘉禾（1749—1833），律师、记者、哲学家、政治人物。1803年曾入选法兰西学院，《法兰西信使》编辑。

第5章　出任督政府公安部长

精彩看点

巴黎的情况——西哀士的做法——公安部长——新的一页——公安部的职责——我的思考与做法——对法令制度的初步判断——督政府开始走向分裂——保皇派——《人质法》——国家的伤疤——西部省份的情况——我的安排——内部的问题——前方战事失利——儒贝尔牺牲——一团糟的督政府——巴拉斯和西哀士的决定——我孤注一掷——向议会发通告——拉拢莫罗——形势危急——近乎于挑战书的党内紧急通报——我们当前的形势——说服贝尔纳多特——担心政变——撤掉贝尔纳多特的决定——吕西安的观点——巴黎恢复宁静——权宜之计——贝尔纳多特离职事件

虽然我的前任隆巴德·德·朗格勒[1]行事有些矫揉造作，但他本质上是一个不错的人。一到海牙，我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统治阶层也有鹰派和鸽派之分，有贵族和平民政客之分。

我坚信只要法国军队能够护卫荷兰，那么爱尔兰和英国将无法对这个国家施加任何影响。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布律纳将军。现在的他是军队的统帅。这个人治军甚严，但在一桩非法生意上，他却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件事情上，我也随他去了，毕竟我们无法靠一片残骸过活。对于旧政府垮台这件事，我们两人都非常高兴：那些无所作为的统治者总算下台了，也算是对我们这么久以来流离失所的补偿。

然而，巴黎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静。一切都在变化。我们也开始担心赢得执政权的议会是否会激怒政府，进而导致政府的再次重组。尤其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会不会打着革命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试图推翻一切，以夺取权力？这些人先是把贝尔纳多特推到战事部长之位，企图通过他与西哀士以及西哀士的党派抗衡。

庆幸的是，以拿破仑两位兄弟为统帅，以布雷·莫尔特、罗德若和雷尼尔为参谋、代表拿破仑利益的这一派认为他们有必要阻止立法运动的扩大化。吕西安起草了演讲稿，在表达了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后，他成功地笼络了一些人。

危险迫在眉睫。人民党要求政府交出前任领导人的罪状书，这也意味着所有的贪腐行为都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在议会中，那些曾经支持推翻督政府的人也反对这种做法，毕竟他们希望的仅仅是改变制度，然后自己上台。这些人甚至援引了一些有助于被告的言论：他们可能只是在政治上犯了些错误，采用了错误的制度，过度放手手中的权力。与其说他们是有罪的，倒不如说他们是不幸的。这些人还特别提到了当初的承诺：如果政府官员主动辞职，便不再追究他

们之前的行为。而且他们还不止一次地提醒议会注意，当初是议会通过了出征埃及、向瑞士宣战的提案。这个诉讼牵扯了太多巴拉斯想要回避的内幕，所以西哀士认为，在政治上，过多纠缠此事是不明智的。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后，公众的注意力被慢慢地转移了，然而，其他事件却在酝酿中[2]。

我们该如何控制那些日渐堕落的报刊和越来越多的无良公民呢？西哀士和他身后四十多位只知道放鱼饵的哲学家、玄学家和议员们能摆平现在的无政府局面，重建社会秩序吗？事实上，西哀士和巴拉斯的联盟很脆弱。在督政府里，西哀士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皮埃尔·罗歇·迪科，至于穆棱和高杰[3]，他只能指望这两个人有异常坚定的政治信仰。在危机爆发时，这些没用的人很可能转眼之间为他人所用，而那些围在西哀士身边的人，随时都会因为猜忌一哄而散。



高杰

后来，当西哀士发现巴黎统帅儒贝尔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时，他立刻决定让儒贝尔成为改革联盟的核心人物：儒贝尔接过了意大利军队的首席指挥官之职，也肩负起了为政府赢得胜利的使命。

得到儒贝尔的支持后，西哀士认为他还需要一种坚定而老练的管理模式。当然，这种管理模式肯定会偏向人民党，必然要在政府中安排一些人民党的领袖巨擘。

善良的布吉尼翁[4]把自己的升迁归功于高杰，大家都能感觉得

到，布吉尼翁的能力不足以肩负部长一职所带来的重重困难。甚至我为巴拉斯撰写国内情况报告，谈到整体管理方式时，巴拉斯还和西哀士商量着，要不要把布吉尼翁换下来。接着，巴拉斯又找高杰和穆棱商议，最终否绝了西哀士提出的备选人阿尔杰[(5)]，转而任命我为部长。

我即将赴任的地方动荡不安，但我依然乐意以大使一职来换公安部部长一职。安排妥当相关事宜后，我很快来到了新岗位上。8月1日，新的一页翻开了。

任何政府都需要敏锐的警力为它保驾护航，懈怠的警力是1789年王冠落地的主要原因：那些负责保卫王室安危的人没有识破当时的阴谋。公安部的责任是巨大的：要么服从一个更加精英、更加集中、更加专制的政府，要么就是在党派错综复杂的政府里，为某些需要军备的叛乱党提供合理的武力帮助。公安部面临的局势非常复杂，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暗流涌动：想要了解内情，我们必须打入他们的内部。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到并解散反对党，除掉保皇派和国外流亡贵族的代理人。不过这里的危险并不是最紧要的。

我用两个小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从细则层面思考了自己作为公安部长的职责。此外，我还考虑到了其他一些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首先要抓的是巴黎的警务工作。在这件事情上我需要倾注全部精力，其他事情需要放手给各级警局来具体负责。我开始研究如何牢牢掌控公安部的各项工作。

首先，我要求直接管理中央办公室，也就是后来的巴黎公安局。出人意料的是，接手巴黎公安局后，我发现它是一个烂摊子，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甚至没有警力。好在经过我的努力，不久之后，巴黎公安局的财政问题首先得以解决。

接着，我需要遏制政府内对我不服从的情绪。整个改革的过程

中，我慎之又慎，杜绝一切操之过急之事。在一位亲信的协助下，我初步掌控了巴黎公安局的局势。此时，我认为已经有能力处理国内政治事件。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代理人不过是些靠不住的工具。

总而言之，我认为警务的工作重点不在文书报告。作为部长，我亲力亲为，拜访了各派别有影响力的人。在法国这种方法很有效。比起从我眼前闪过的文件，那些隐秘的谈话、私下的交流更有助于我了解神秘的法国。而且通过这样的做法，我可以清楚地掌握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蛛丝马迹。大家马上就能明白我说这些话的原因了。

对国内政治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对一些法令制度，我有了自己的初步判断：凝聚人心的共和三年宪法[(6)]已经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这部宪法根本不具有可行性，果月18日和牧月30日的政变已经严重损害了它的权威。当我们从完全的宪政体制[(7)]过渡到后来的五人专政时，宪法却没有与时俱进。现在，政府的力量被削弱了，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五人专政恐怕就会演变成人民风暴。

另外，我还知道，从一开始，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西哀士就瞧不上这样的政府，甚至一度拒绝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因为认为自己可以尝试着改变一下现行政府，他才勉为其难地就任，毕竟想要攻破政府的防御堡垒，最好的办法就是坐上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我曾和巴拉斯说过这些想法，和我一样，巴拉斯也怀疑西哀士。不过，考虑到自己对西哀士的承诺，巴拉斯决定暂时不插手此事。当然，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畏惧人民党的过激行为。事实上，人民党对他并无恶意，而且当西哀士的真面目渐渐显露时，他们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巴拉斯对抗西哀士的有力助手。

然而，因为巴拉斯的“袖手旁观”，人们对他的印象也变了，此前，在人们的眼中，巴拉斯是一个热情的共和党人，但现在，人们却

认为他变成了一个无用的统治者，他们根本不可能靠他来保全共和。

与此同时，巴拉斯自己也被两面夹击：一方面，在木马集团中，雅各宾派的作风抬头，其成员公然向窃国者宣战；另一方面，西哀士似乎也对他有所隐瞒。

人们都相信，西哀士的心里已经有了新宪法的腹稿，这个希望加强自己手中权力的人无非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时机一到，他就会把新宪法公之于众。他的阵营牢不可破，在军事上，他还得到了儒贝尔的全力支持。

我从一位将军那里得知，西哀士非常想与保皇派和解。据说，西哀士曾说过这样的话："仅仅依靠草图和空谈是没有办法建设国家的，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头脑和武器。"我希望他想依靠的武器，不是指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力。

其实西哀士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一方面，他对巴拉斯有所隐瞒；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依靠掌权的穆棱和高杰。

好在他还可以依靠上下两院的同事，抵制立法掠夺，反抗无政府主义者的僭越。在参议院那里，西哀士有着不错的基础，如果能得到"五百人院"中大多数的支持，那他就如虎添翼了。要知道，"五百人院"中大都是激进的年轻人。在政府和政策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人也屈服了。在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后，督政府决定诉诸武力。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公安部长的我必须机警灵活地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首先，我必须阻止所有反对西哀士的联盟：取缔反动报刊，阻止死灰复燃的政治团体的各种阴谋。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的第一项建议。这些措施来自一份政府报告。巴拉斯很关注这份报告，还专门和西哀士讨论了此事。得到了领导人的首肯后，我决定从俱乐部入手。

我先是发了一份通告，告诉人们我刚刚接手公安部门的工作，本着对所有人负责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尽力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这个承诺令一些之前对我有好感的政客大为不满。热月18日（8月5日），即我上任后的第五天，督政府把我的政策分析报告移交到了参议院，接着，它又被移交到五百人院。于是，如何在议会面前阐述报告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不过分刺激共和党敏感的神经，我首先讲了保护俱乐部内部讨论的必要性，然后，我才说一些俱乐部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因此，我们应当把俱乐部的行为置于宪法的管理之下。

我的话音未落，现场便变得嘈杂起来。我记得，戴尔布莱尔[8]和克莱蒙梭这两位议员认为参议院准备以这种方式破坏宪法，议员格朗姆则认为我的报告并不属实，还说它是一种反对共和的新形式。

接下来，就是否印刷这份报告，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布瑞尔[9]和贾洛甚至提出了召回报告的建议。最后，议会决定暂时搁置此事。也就是说，在这次的争论中，虽然双方都不是胜利者，但我的劣势已经显露无疑。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我，这让我明白，这些参与革命的人是多么地狭隘，他们关心的全是自己的蝇头小利，他们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此事过后，这些人也许会找理由解释他们沉默的原因，但事实却是，他们并不愿意承担责任。

就在同一天，木马集团对我进行了更加暴力的攻击。

开局不太顺利。但我既不惊慌，也不害怕。只要我能够保持本心，不迷失，我就不会输。我决定小心翼翼地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寻找出路。

察觉到政府中有人含糊其辞、阳奉阴违，巴拉斯也不积极配合自己的指示后，西哀士命驻扎在杜伊勒里宫[10]的侦查委员会关闭了木马集团的会议室。此举再次引发骚动。

我想，那时的西哀士应该是特别自信吧，在8月10日的纪念会上，他以政府领导人的身份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雅各宾派的所作所为。他说：“督政府非常清楚一些人妄图对共和国不利的阴谋，我一定会坚决粉碎这一切阴谋，同时，我绝不会利用任何一派去制衡其他党派。”

然而，他这霹雳般的话音还未落下，他和巴拉斯的耳边便突然飞过两三颗子弹，同时，他似乎也听到了人群中的辱骂声。



杜伊勒里宫



塞纳河畔的杜伊勒里宫

我立刻护卫着这两人回到督政府，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这两人

的暴怒失态。回到督政府后，我提议说："就算确有阴谋，我们暂时也只能处置那些刚刚挑事的人。"同时，因为担心多疑的西哀士怀疑我，我写了一条纸条，暗示他提防巴黎统帅马尔博将军[11]。一直以来，马尔博将军都是激进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且一直抵触西哀士的各项政策。当晚，在战争统帅贝尔纳多特不知情的情况下，马尔博将军接到了调令，受命前往前线。另一位优秀且甘愿为督政府效命的士官勒费弗尔将军[12]接替了他的职务。

五百人院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西哀士在战神广场[13]上攻击雅各宾派的行为属于反革命行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看法，因此，督政府开始走向分裂。

那时，巴拉斯不知道他是否应该主动接近穆棱（和高杰，毕竟这两人之前一直不满西哀士）。看出了他的犹豫后，我很坦率地告诉他说现在还不是和西哀士分道扬镳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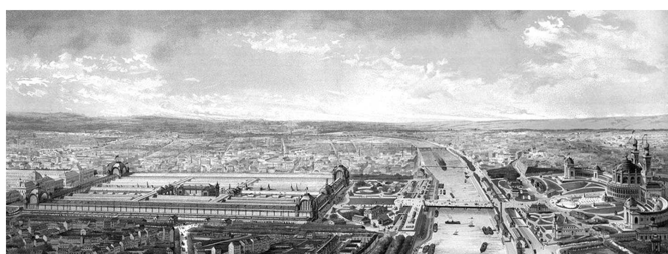
西哀士事件后的第三天，我下令查封了雅各宾派在巴克街[14]的会议室。那时，我有我的考虑。不久之后，督政府亦公开宣布他们从事危及宪法的活动。这个大胆的举动之后，议会和政府中的激进党派受到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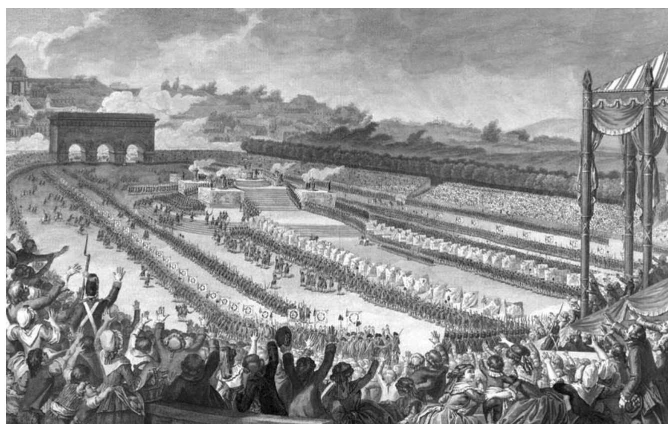
马尔博将军



勒费弗尔将军



战神广场的远景图



正在进行阅兵式的战神广场

不过，我们还需要让人们知道，我们也有能力对抗在西部蠢蠢欲动的保皇派——这些人已经在上加龙地区架起大炮。在我的建议下，为了揪出各路流亡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杀人凶手和土匪们[(15)]，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督政府派人挨家挨户地搜查。军事手段就足以解决上加龙地区的草莽之士，然而，因为活跃于布列塔尼地区[(16)]和旺代地区[(17)]的朱安党人[(18)]周密的部署，我们很难清除这个根深蒂固的顽疾。

《人质法》详细规定了对流亡贵族亲属的处理方式，但它不仅没有让保皇派的人有所收敛，反而激怒了他们。这项法案让我想起了恐怖统治时期那些令人作呕的法律，它们只会让我们四处树敌，对于时局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只要督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明确反对，我就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缓和执行这项法案。

我很清楚，这些问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伤疤，一个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伤疤。要知道，英国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激化这个矛盾。不久之后，我安排在西部省份的密探便向我报告了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很多保皇派落入我们地方政府手中之后，要么被处以死刑、流放或者终身监禁，要么终日惶惶不安。我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愿意为新政府服务的。我愿意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而这些人做得也确实非常不错，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他们，或者说他们提供的信息，我才能顺利结束国内战争。

最严重的还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很多人都忙着争权夺利，计较着身份地位，后来，这一部分人更是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苛刻，甚至开始不满督政府的统治。取缔了报刊后，我们还能自称民主管理和改革吗？《自由人日报》曾刊发评论说："督政府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不相上下，在10月8日的演讲中，督政府的首脑不仅公开戕害共和党人，更是下达了关闭俱乐部的命令。"

当我来到卢森堡公园时，西哀士及其同僚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报刊的言论。我随即向议会提议，查禁自由派报刊，管制反革命言论。然而，这项命令还没来得及发出，前方战事失利的消息便传来了——诺维失守了，更糟糕的是，儒贝尔将军牺牲了。

噩耗传来，督政府上下乱作一团。虽然噩耗惊人，儒贝尔将军的牺牲更是让人悲痛莫名，但我认为督政府不应该因此而懈怠，然而，得知这些消息后，督政府的所有人都无心工作。

对我们而言，战场失利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儒贝尔将军的牺牲更是令此事雪上加霜。儒贝尔将军是带着出征俄国的命令出发的，然而，为了和牧顿小姐的婚事，他耽搁了一个月。因为这宝贵的一个月，敌人得到了喘息之机。

据说，一个火枪手击中了儒贝尔将军，中弹后，将军倒地身亡。然而，目击者复述此事时却支支吾吾的，根本没有解释清楚其中缘由。后来，我又问了别的目击者，据他们说，当时那颗子弹是从一个小屋子里射出来的，敌人应该是提前埋伏在那里的。

儒贝尔将军，一个每次都会前往前线激励士兵的将军，怎么会给敌人安插卧底的机会？我们只能说，那颗子弹是我们自己阵营里的一个科西嘉人不小心射出来的。不过读者们，请你们不要试图从这里窥探那些隐秘的、不可告人的心思。出征埃及前，拿破仑曾经说过：“你留在这里，儒贝尔。”就这样，儒贝尔这样一个淳朴、公正、果断、理智、热情的人，被那些阴谋夺去了生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而他的祖国，还在等着他去拯救！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督政府内一团糟，督政府的工作几乎难以为继。但就这样一蹶不振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我去拜访了巴拉斯，劝他振作起来，采取行动。当然，那个时候，西哀士也正在策划政变——他想发动一场稳赢不输的政变。让我振奋的是，在皮埃尔·罗歇·迪科那里碰面后，巴拉斯和西哀士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开始自己

的计划。

这时，我也只能孤注一掷了。首先，我要彻底解决报刊言论的问题，因此，一夜之间，我直接取缔了十一种报刊——这些报刊都是为雅各宾派和保皇派服务的。接着，因为很多作者散布谣言、激化矛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因此，我又下令逮捕了一批作者。

取缔报刊、查封报社、逮捕作者之后[19]，督政府才向议会发出通告，通告说准备在法庭上传讯一些记者。当我汇报完此事后，议会内立刻变得嘈杂起来，议员布瑞尔首先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然后，他又要求议会解除我公安部长之职。不过第二天，在《编者》和《管理者》杂志上，督政府刊发文章，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表扬性报道。

为了继续推进我们的计划，我们开始拉拢莫罗。我们可以确定，莫罗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并且他厌恶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在政治上的表现过于软弱，因为，他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放心。不过，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鼓励他、支持他，那么这样一个软弱胆小、毫无野心的人还是可堪一用的。况且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在所有的将军里，我们只能依靠他。



诺维之战，在此战中儒贝尔将军牺牲

政局越来越动荡。意大利失守后，荷兰和比利时也面领着失守的

危险：8月27日，英俄联军在荷兰北部登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更加活跃，秘密会议召开的次数越来越多。在五百人院中，儒尔当和皮埃尔·奥热罗开始自称领袖；在参议院中，贝尔纳多特掌握着战事的发言权。

两百名议员加入了人民党。两百人，虽然算不得议会的大多数，但这已经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了，况且督政府中的穆棱和高杰还是他们的幕后支持者。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平衡政府中的党派，巴拉斯提拔了穆棱和高杰。如果巴拉斯没有和西哀士翻脸，那么他只需要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夺权。但现在巴拉斯的处境更加严峻。为了共和国，我必须保全巴拉斯。结果，到了最后，我们失去了人民党的支持。

儒尔当向激进党（人民党）发出了党内紧急通报，宣布人民党处于危险之中。对我们而言，儒尔当的这份党内紧急通报近乎于挑战书。

前一天晚上，督政府在弗雷热维尔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时，我便就此事提出过预警。紧急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大都马上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党指出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形势：“意大利被困，荷兰被入侵，英俄联军已经守在法国的北大门，瑞士的政局动荡，保皇派猖獗，共和党人却被当成恐怖分子和雅各宾派被追捕。”“在边境上，保皇派虎视眈眈，就像当年7月14日为自由而战的共和党人一样！……”

儒尔当向两院提议说督政府应该远离那些对革命不够热情的人。随后，他正式宣布人民党进入紧急状态。如果督政府接受了他的提议，那么国内的暴力活动将会愈演愈烈。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努力控制暴力运动，尽量避免暴力运动的扩大化。

儒尔当的这项提议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同时，人民党也提出了进入紧急状态的方案。不过，或许是良心不安，又或许是软弱，儒尔当

决定第二天再做决定。这给了我们缓冲的时间。

我从其他人那里得知，在一些激进党（人民党）的怂恿下，贝尔纳多特将会骑上战马，以保卫革命的名义发动叛乱。尽管公安部全力封锁消息，但新旧雅各宾派的人还是纷纷响应号召。此时，我和巴拉斯必须说服贝尔纳多特。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贝尔纳多特都不是一个狠厉决绝的人，因此，毫无疑问，这一次，他想为理想、为自由而奋斗。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想法。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知道如何说服他了。

首先，贝尔纳多特不敢违背儒尔当制订的方案，第二，他同样不敢忤逆莫罗，不敢反对莫罗提出的改变政府性质的方案。

于是，我们便告诉他说："儒尔当和莫罗的方案都是不可靠的，当危机来临时，根据这些挑事者提出的方案成立的政府只会不堪一击。"此外，我们还向他承诺道："只要我们的对手不推翻宪法，我们就会一直遵守宪法。"

巴拉斯还说："贝尔纳多特，与其成为反对政府党羽的牺牲品，不如保住自己的战事统帅之职。"当然，这只是巴拉斯的旁敲侧击，说完这句话后，我们便起身离开了，巴拉斯没有再做任何解释。

西哀士和皮埃尔·罗歇·迪科一直担心政变。当确认两院周围集结了大批人马，人民党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三位将军的支持，准备推翻现任政府后，西哀士和迪科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西哀士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召见了贝尔纳多特，假意表扬了他作为战事统帅的功绩，并提出，为了表彰他为共和国做出的贡献，已决定提拔他为部长。有了这个铺垫后，西哀士认为我们可以立即行动了。

勒费弗尔将军接到了与我配合行动的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我

们可以动用武力解散聚集的团伙。勒费弗尔将军有着大兵的耿直，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这时，在皮埃尔·罗歇·迪科家中，西哀士和巴拉斯终于做出了撤掉贝尔纳多特职务的决定，而对于此事，穆棱和高杰则完全不知情。为了平息穆棱和高杰的怒火，西哀士和巴拉斯保证，在新部长的任命上，他们二人可以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于是，在巴拉斯的支持下，高杰向督政府举荐了杜波瓦。

关于儒尔当的提议，各方都显得咄咄逼人。一部分人希望督政府能够保持原来的部长制度，另一部分人则希望政府采取公众议事制度，然而，这两种主要观点的背后藏着不同党派的各自盘算。

舍尼埃、吕西安和布雷·莫尔特先后否决了儒尔当的提议，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认为，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行政执法权威。但另一方面，吕西安本人也反对独裁，他说："难道我们之中就没有人可以像布鲁图斯那样站出来，勇敢地惩罚祖国的敌人和懦夫们吗？"雾月18日这天，吕西安为他们两个月后的胜利铺平了路。

人们都明白，那时的吕西安宁愿接受内部矛盾重重的督政府，也不愿意接受独裁政府，他的哥哥拿破仑不是为了独裁政府而在埃及浴血奋战。对吕西安来说，自由非常重要，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他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和退缩。仅凭这一点，吕西安就比那些畏首畏尾的将军们强了几百倍。那些懦弱的将军们既害怕承担责任，又没有勇气真正地推进改革。

贝尔纳多特被调离战事部长的消息传出后，五百人院沸腾了。从这件事中，儒尔当看到了政变的迹象，于是，他要求议会全天值班。然而在议会里，他的提议被全部否决（245:171），一百零二名最激进的议员对结果提出异议。

围在议会门前的人们越来越激动，辱骂声不绝于耳，巴黎民众也

变得惊恐不安。但幸运的是，在持续抵制后，人民党有所懈怠，再加上我行之有效的军事措施，最终，所有的动乱都被平息，巴黎又恢复了宁静。



贝尔纳多特（右二）与家人

在议会中，我们也大获全胜，参议院否决了剥夺政府在宪法许可范围内调用军队的权力。

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我们的祖国确实面临着危险，各派别之间依然存在着明争暗斗。

虽然我们宣布说贝尔纳多特的离职是他本人的意愿，但贝尔纳多特离职事件依然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督政府的影响。在一封面向公众的陈情书中，贝尔纳多特这样解释："与大家想的不同，我并不是被革职查办的，我希望，历史能够告诉大家真相。"同时，宣布从此退休的他也恳请督政府考虑他的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也算是对我二十年来不间断为政府服务的奖赏吧。"

议会和督政府再次陷入沸沸扬扬的争吵中，人们再一次迷失。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只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航人才能让国

家这艘船靠岸[20]”。

---

(1) 隆巴德·德·朗格勒（1765—1830），法官、社论家、编辑、剧作家、哲学家、诗人。曾担任法国驻荷兰大使。

(2) 这一切都非常清楚，是对当时的权谋最好的记载。

(3) 高杰（1746—1830），议员、督政府督领、雾月政变的主要领导人。

(4) 布吉尼翁（1760——？），法学家。督政府期间，他被高杰提拔为公安部长。

(5) 即夏尔·让·阿尔杰（1752—1826），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律师、法官、政治人物、外交家。

(6) 共和三年宪法是法国国民公会在共和三年果月5日（1795年8月22日）通过，并于同年9月6日经过公投通过的宪法，该法创立了督政府。宪法的序言是1795年的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宣言。该宪法直到1799年的雾月政变前还依然有效。它比已经失败的法国1793年宪法更加温和。共和三年宪法建立了一个选举权建立在缴税数额之上的温和共和国，这点与法国1791年宪法相似。宪法规定设立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参议院和五百人院）来延缓立法的进程，同时组建五人督政府。为了缓和民众运动，宪法恢复了两级选举制。中央政府拥有巨大权力，包括紧急禁止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力。开篇的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宣言包括了对奴隶制的明确禁止。这部宪法最终被共和八年宪法取代，后者建立了执政府。

(7) 这里指存在于1792年9月20日至1795年10月26日的国民公会。

(8) 戴尔布莱尔（1764—1846），五百人院议员，曾经反对雾月政变。

(9) 皮埃尔·布瑞尔（1771—1827），法国大革命期间重要政治人物，贝桑松共济会成员之一，意大利重要的烧炭党人。

(10) 杜伊勒里宫曾是法国的王宫，1799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一世宣布杜伊勒里宫为第一执政的官邸。

(11) 马尔博（1754—1800），将军、政治人物，出自昆西家族。

(12) 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费弗尔（1755—1820），第一代但泽公爵，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法军指挥官，拿破仑的十八个元帅之一。

(13) 这个广场的名称来自罗马的战神广场，法文中的“Mars”正是罗马神学中所谓的战神。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这是一块被遗弃的空地，直到军事学校在1765年建立，它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当时主要是用来作为军事训练的场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1年7月17日，此处曾发生屠杀流血事件。当时民众群聚此地呈上请愿书，期望可以废除路易十六的王位，建立共和体制的法国，巴黎市长却在此时颁布军事法令，此法允许军队使用武器驱逐民众，造成五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场屠杀，恶化了温和派与激进改革派之间的关系，而革命主义者、君主、贵族之间的纠纷因此扩大。

(14) 巴克街得名于1550年设立的一个摆渡点，位置在今伏尔泰滨河路，用来运输兴建杜伊勒里宫的石块。它跨越塞纳河的地点，1632年由金融家巴比埃兴建红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改建成今天的皇家桥。

(15) 这时，约瑟夫·富歇已经不是革命新贵。他是制宪议会中的富歇：他领导下的公安部就像雅努斯一样有两张脸。

(16) 布列塔尼地区是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半岛、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一个大区，首府是雷恩。

(17) 旺代位于法国西部沿海，卢瓦尔河以南。旺代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保王党反革命叛乱，也称“旺代叛乱”。1793年3月，反对三十万人征兵令的农民蜂起，以法国西部旺代为中心逐渐扩大。但却被巴黎的共和国政府视为反革命和保王党起事，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苦战的国民公会陷入危机。如同朱安党人一般，由自封的天主教和皇家军队领导，起事于卢瓦尔河北方。

(18) 朱安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动叛乱的保皇派。

(19) 这是约瑟夫·富歇治理国家的套路——排除异己。在拿破仑·波拿巴政权下，他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

(20) 这句话是富歇为了巧妙引入雾月18日政变。

第6章　拿破仑·波拿巴凯旋

精彩看点

转机——拿破仑回巴黎之前——约瑟夫和吕西安的真实想法——我的建议和决定——身无分文的约瑟芬——我确定拿破仑即将归来——出人意料的拿破仑——归来前夕——拿破仑归来——拿破仑的誓言——国内的政治形势——拿破仑取得所有人的支持——私人委员会——塔列朗——神秘人物——西哀士身边的人——塔列朗的保证——吕西安反对拿破仑

两件事为我们带来了转机，也拯救了我们的国家。第一，9月25日，在苏黎世战场，我方大捷，马塞纳将军[1]率部击退了俄国人，守住了我们的边境。因为此次大捷，巴黎转危为安。第二，10月9日，拿破仑凯旋，在弗雷瑞斯[2]登陆。随后，他不顾卫生隔离保护法的限制，于10月16日回到了巴黎。

在这里，我想先停顿一下，插叙一些内容。人类的所有活动大都是由各种动机下的冲动促成的。也就是说，人类很难把握事情的结果。在平常人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线索，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经常是致命一击。大人物们总能在有意无意间察觉到这些致命的细节。我现在要插叙的事情发生在拿破仑回巴黎之前，在拿破仑回到巴黎的五六个星期之前，曾有人向我汇报说，在讨论国家事务时，在我办公室供职的两个人提到了拿破仑，说他很快就要回来了。我命人去查证这个流言起于何处，而且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类预言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个想法让我异常震惊。

不久之后，我就从约瑟夫和吕西安周围的人那里获知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两人深信，一旦收到他们的信件和包裹，即便是面临着英国战舰的威胁，拿破仑也会不顾一切地回到巴黎。不过，因为此事实在渺茫，所以他们不敢和任何人说起这些。事实上，拿破仑的一位密使向我坦白了更多内幕。

我立刻找到了巴拉斯，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情况。但在这件事情上，他似乎无计可施。于是，我提议说：“要么从拿破仑的两个兄弟那里下手，要么从约瑟芬[3]那里下手。”最后，我决定从更容易接近的约瑟芬那里了解情况。

真不知道她这个人是怎么挥霍自己的钱财的，当我找到约瑟芬的时候，她竟然身无分文。要知道，在出征埃及前，拿破仑曾给她提供过一笔四万法郎的巨款，而且在此后的一年之内，远在埃及的拿破仑

还给她汇过两次款，每次的汇款数目都是四万法郎。

后来，我才得知，这个女人沉迷于赌博。鉴于约瑟芬一贫如洗，所以我亲手交给了她一千金路易[(4)]，对我后来的事业来说，这次的无心之举影响深远。

通过她，我得知了很多事情，因为她看到的是整个巴黎，而巴拉斯只能看到巴黎的一部分。



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

这个女人和时任督政府领导人的高杰往来频繁，也经常在自己的

家里接待高杰的夫人，她还常常向高杰的夫人抱怨拿破仑的两个兄弟——很明显，她与那两人的相处不是很愉快。通过汇总各方消息，我终于确定，拿破仑的确就要回到巴黎了。所以，当其他人还处于震惊状态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应对此事的准备。

在夺取政权这件事上，拿破仑算不得什么伟人。能者居之，权力本就该掌握在最有胆识的人手中，因此，只需要展示出自己非凡的勇气和能力，拿破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摘取胜利的果实。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拿破仑居然真的离开了高歌猛进的军队，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并在合适的时机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控制了所有党派，平衡了各派利益，顺利掌控全局。而且他只用了二十五天便完成了这一切，真是一个老道、坚韧、果敢的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写一本巨著，一本讲述他从现身巴黎开始，到最终掌控全局的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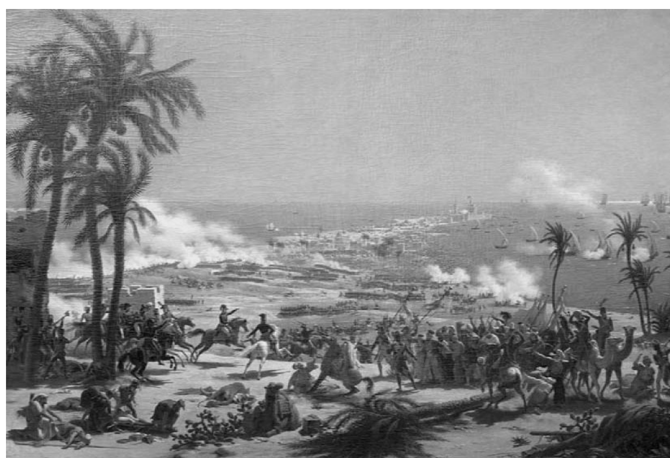
抵达巴黎前，拿破仑在阿布基尔[5]获胜的消息就传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当然，我也注意到，某些党派非常卖力地宣传此事，甚至不惜神话阿布基尔大捷。

从埃及传来的密件显示，约瑟芬和拿破仑两个兄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而且气氛越来越欢快。约瑟芬对我说：“他能回来该有多好！如果他知道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那么他一定会回来拯救我们，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

十五天后，拿破仑突然回到了法国。在艾克斯、阿维尼翁、瓦伦西亚、维也纳，尤其是在里昂，拿破仑走到哪里，哪里就挤满了热情迎接他的人。人们渴望拥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而拿破仑正是这位带来希望和好运的领袖。



阿布基尔之战。拿破仑的军队与埃及人交战



阿布基尔之战，法军与敌军在沙滩上交战

拿破仑凯旋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市民们的心中也开始升腾起一种希望和欢欣。虽然这种盛况之下肯定有人为的因素，甚至是隐秘的操作，然而不可否认，得知拿破仑即将归来后，全巴黎都沸腾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拿破仑开始以法国的救星自居。

虽然共和党人本能地警惕拿破仑的行为，虽然督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不满——毕竟拿破仑是擅自离开军队的，毕竟他违反了健康保障法，但他们又能如何呢？如果政府的威信足够高，如果政府足够强势，那么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当时的情况

是，得到了全国人民拥戴的拿破仑根本不惧督政府。

然而，督政府内部——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内部——的情况异常复杂，拿破仑又该如何平衡其中的利害关系，让各派达成共识呢？

回到巴黎后的第二天，拿破仑便前往卢森堡公园，向督政府汇报自己已经离开埃及、回到巴黎的事情。在卢森堡公园，拿破仑把手按在剑柄上，发誓说自己回到巴黎是为了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他只会为共和与政府而战。督政府似乎相信了他的宣誓，而这也是他滥用这信任的开始。得到督政府领导的信任后，拿破仑坚信，只要方法得当，他必将取而代之。

首先，他分析了国内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儒尔丹为首的人民党（又被称为木马集团或激进党）正陷入一场无休止的纷争之中；以巴拉斯为首的党派中净是革命投机分子，拿破仑将之称作“坏掉的党派”；西哀士麾下的管理者们和法官们大多是一些温和派别的人，他们一心想着巩固革命的果实。

此前，拿破仑得到了雅各宾派的全力支持，可以说他就是在雅各宾派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现在，他要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吗？然而，只有离开了雅各宾派，他才能得到其他党派的信任。

比如说，他拿什么取得巴拉斯——这个他口中坏掉的党派的头目——的谅解呢？再比如说，以西哀士为首的这一派人只想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效劳。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党派愿意帮助拿破仑，愿意帮他达成篡位的愿望。然而，到了最后，他还是成功说服了所有人，说服了督政府中的巴拉斯，说服了西哀士，尤其是说服了具有坚定信念的穆棱和高杰，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支持。

然后，拿破仑成立了一种类似私人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成员包括他的两个兄弟、贝尔西耶[(6)]、雷诺[(7)]、罗德尔[(8)]、瑞尔[(9)]、布瑞克斯[(10)]以及塔列朗。虽然塔列朗被木马集团排挤出局，被迫辞

掉部长之职，但凭借着随机应变的本事，他很快就在拿破仑的私人委员会中崭露头角。最开始的时候，塔列朗心中还有一些担忧和疑虑，他担心拿破仑集团不欢迎他，毕竟当初是他向督政府提议远征埃及的。

加入拿破仑的私人委员会后，塔列朗凭借着敏锐的嗅觉，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神秘人物。此人对时局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塔列朗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好处。这个人向塔列朗指出了政府的伤口所在，并且为他分析了各党派的动向，此外，塔列朗还从他那里获悉了西哀士的情况。

在皮埃尔·罗歇·迪科家聚会之后，筹备发动政变就成为西哀士工作的重中之重。西哀士身边的人可以简单地分为两派：一派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一派是他的拥趸。那些激进的共和党人非常后悔当初投票支持他，因此，这些人已经站在了西哀士的对立面；而他的拥趸则盘踞在参议院中。在督政府的所有领导人中，西哀士给出的承诺是最多的，在这一方面，巴拉斯也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雷诺


布瑞克斯


塔列朗

这个神秘的人还向塔列朗透漏道："巴拉斯摇摆不定，不知道是该选择西哀士，还是该选择穆棱和高杰；穆棱和高杰这两人则被时局牵引着，是激进党（人民党）或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五百人院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支持他们两人，参议院中的一部

分人也会选择支持他们。”

从其他幕僚那里，塔列朗也证实了那个神秘人透漏的消息。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的真实意图。表面上看来，此人不相信巴拉斯，与西哀士的关系也比较疏远，与穆棱和高杰的关系还算亲密。

据说，这个神秘人曾建议穆棱和高杰取代西哀士。不过一方面，对督政府的领导人都有年龄限制；另一方面，穆棱和高杰也有些怀疑这个神秘人的动机，因此，他们以年龄为借口，否决了他的建议。此后，这个神秘人开始找人接近西哀士。

在这个过程中，塔列朗找到了舍尼埃，舍尼埃又找到了达努。在塔列朗、舍尼埃、达努和西哀士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中，塔列朗向其他三人保证道：“只要我能继续做第一执政官，我就不会过问政府的方向。”

这次秘密会议后，秘密议员会议就接二连三地召开。有时候，开会的地点是在勒玛[11]的家中，有些时候，开会地点则是在弗雷热维尔的家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开始反对拿破仑的竟然是他的弟弟吕西安。吕西安对那些支持拿破仑的人说：“你们都不了解他，一旦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他绝对会把政府当作战场，那时，他会控制一切，命令一切！”

但八天之后，吕西安却积极地配合了拿破仑的行动。就像很多共和党人一样，在荣誉和财富的诱惑下，人们对拿破仑的怀疑逐渐消散。

有人说，在这次行动中，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顺便摘取了胜利的果实。事实上，拿破仑能够成功夺权，我功不可没。但在当时的情

况下，我的大功不适合公之于世。

如果没有我的支持，圣克劳德革命[12]就不会成功。那个时候，我大可以掩护西哀士，给巴拉斯通风报信，提醒穆棱和高杰。或者说，只要我稍微帮衬一下杜波瓦，那么，拿破仑的一切革命计划都将失败。然而，对我来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去支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呢？当时，我认为拿破仑是唯一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因此，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的确，精明的拿破仑不会告诉我他的全部行动方案，他绝不会只受制于一个人。但为了取得我的信任，他还是和我谈起了自己的行动方案，我也通过此次谈话确定了法国的未来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

在瑞尔家召开的两场会议中，我直接指出了他现在面临的困境：他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共和党人过度的革命热情。

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拿破仑比不上克伦威尔。但从另一方面，在拉斐特侯爵、迪穆里埃[13]和拿破仑这三位将军中，拿破仑的优势又是那么明显！

现在，各党派都在等着拿破仑行动。从战场凯旋而归的他有众多的追随者，非常受民众爱戴，然而，他也让督政府的领导人们隐隐不安。穆棱和高杰成为督政府的希望，但这两人却竭尽所能地向拿破仑示好、表忠心，想以此取得他的信任。他们两人提议升拿破仑为意大利军队的统帅，西哀士则明确反对此事，巴拉斯也说拿破仑在意大利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因此，他不需要再回战场了。然而，当督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高杰表露出想擢升拿破仑的想法时，拿破仑冷冷地拒绝了他。我看得出来，当时的拿破仑还在犹豫，在这场革命中，他在西哀士和巴拉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选谁作为自己的盟友。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建议拿破仑速战速决，并建议他接近巴拉斯，远离西哀士。我多么希望这也是他的想法。我对他说：“保住巴

拉斯，厚待军队党派，拖住西哀士，同时削弱贝纳多特、儒尔当和奥热罗的权力。”我觉得我的话以及瑞尔的暗示似乎起到了那么一点儿作用，拿破仑向我们承诺说他会接纳巴拉斯。

接到我们的消息后，巴拉斯向拿破仑发出邀请，邀请他第二天——也就是雾月8日——共进晚餐。当晚，我和瑞尔来到拿破仑的家中等待消息，在那里，我们还遇到了塔列朗和罗德若。不一会儿，院子里便响起了马车声，拿破仑回来了。

见到我们后，拿破仑说道：“嗯，好吧！你们知道你们的巴拉斯想要什么吗？他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控制现在的局势，因此他想为共和国找一位当家人，但他想找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嗬，这样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同意，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无能为力，但我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想让巴拉斯认清自己的处境，想告诉他，只有和拿破仑站在一起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因此，我向拿破仑承诺说：“我会和瑞尔一起批评这个人的，他居然这么不信任我们！我们必须向他说明（让他明白），对他而言，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位伟人绑在一起之外，他已经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也不是靠计谋就可以取胜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人拉到我们的阵营之中。”

拿破仑说道：“那就去做吧！”

于是我和瑞尔一路小跑，赶到巴拉斯家中。到达那里后，巴拉斯先开口了，他告诉我们说拿破仑一直不想正面回应他提出的条件。我们和他分析了他现在所处的境地，告诉他督政府的人心在拿破仑那一边。最后，巴拉斯终于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向我们承诺说他明天就去告诉拿破仑自己的想法——他愿意随时听候拿破仑的派遣。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巴拉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然而，拿破仑也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和西哀士站在一起，而且他们已经签订了盟约。团结了共和国上下这么多人后，拿破仑当然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政策。一方面，拿破仑误导着穆棱和高杰，让他们摸不清他的动向；另一方面，他又对巴拉斯、西哀士和罗杰·杜克玩起了“拖”字诀；甚至我也只能通过瑞尔了解他的动向。

从雾月9日起，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各方都在招兵买马。塔列朗把西蒙维尔[14]以及另外两位优秀的将领伯农维尔[15]和麦克唐纳[16]拉入了我们的阵营。在银行家里面，我们拉拢到了高罗——他为我们提供了两百万的贷款。

同时，我们也开始暗中加强巴黎的警卫，起用了之前在拿破仑手下征战意大利的两个骑兵团，让·拉纳[17]、缪拉[18]和勒克莱克[19]则

受命去拉拢主要军官。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将领以及贝尔西耶和马尔蒙[20]之外，索绪尔[21]和勒费弗尔将军也加入了我们，接着是莫罗和蒙塞。后来，莫罗曾后悔地坦承，拿破仑才是国家改革所需要的人。

在最具有煽情能力的吕西安、布雷和雷尼尔的运作下，拿破仑获得了西哀士拥趸们的支持，这些人分别是沙扎尔[22]、弗雷热维尔、达努、勒玛、卡巴尼斯[23]、勒布伦[24]、库尔图瓦[25]、高尔奈[26]、法尔格、巴拉庸[27]、韦乐鞑、古皮尔[28]、威玛[29]、布特维尔、尼岱[30]、爱尔威[31]、德克鲁、卢梭和雅里[32]。



指挥骑兵作战的缪拉将军





马尔蒙将军　　手握战刀的让·拉纳将军

议会上下都在暗地里盘算着最佳的时机和方案。就在此时，杜波瓦冲到了督政府，向穆棱和高杰揭发了拿破仑，并要求他们立刻逮捕此人，还主动请缨，准备亲自抓捕拿破仑。然而，穆棱和高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们两人非常信任拿破仑。当杜波瓦开始揭发拿破仑时，穆棱和高杰既没有立即找巴拉斯商议此事，也没有立刻采取任何措施，反而要求杜波瓦提供证据。

他们居然要证据，但密谋造反的人怎么会轻易让他人拿到证据呢？那些人，他们在西哀士家、在拿破仑家、在贝尔西耶家、在让·拉纳和缪拉家，那些人，在老人议会高级议员的沙龙里，在秘密委员会的会议室里。情急之下，杜波瓦紧急从卢森堡公园调回了一位警察，命其向穆棱和高杰说明一切。为了详细询问事情的真相，这两位领导人把这个警察单独关了起来。然而，在恐惧和迷茫之下，此人跳窗户逃走了。那个警察的逃跑，以及我的一些手段，使这两位领导人顾不上考虑杜波瓦这样做的用意。此后，我迅速将此事告知拿破仑。

拿破仑这边立刻开始行动，吕西安召来了沙扎尔、卡巴尼斯、埃

米尔[33]，并给他们分配好各自的任务。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在雷加米埃夫人[34]的家里，吕西安开始为军事暴动寻找法律依据。五百人院是吕西安的老本营，到时候，它也是拿破仑这一派有力的法律杠杆。

在吕西安的心中，爱情和事业就像两把熊熊燃烧的大火，一直以来，吕西安都为雷加米埃夫人所倾倒，醉心于她的温柔和妩媚，因此，在雷加米埃夫人的陪伴下，吕西安的斗志更加昂扬。



少女时期的雷加米埃夫人



成年后的雷加米埃夫人

为了掩饰即将发动的政变，督政府用为拿破仑庆功的名义举办了一次宴会，并邀请了各界精英。虽然宴会非常隆重，但宴会的气氛却分外冷清，各方都在默默地观察着其他人。因为身份尴尬，拿破仑早早离席了，此后，宴会上的众人也不知该如何自处。

和吕西安达成一致后，雾月15日，拿破仑和西哀士进行了会晤，商议18日的具体布置。政变的核心是推翻现在的督政府和立法委员

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能动用武力，而要走和平的法律程序——当然，这其中免不了欺骗和胆量。

---

(1) 即安德烈·马塞纳（1758—1817），封里沃利公爵、埃斯林亲王，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重要的法军指挥官，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首批获授帝国元帅的十八名法军将领之一，被昵称为“胜利的儿子”。众多军事史学者都认为，除了拿破仑外，当时没有一位指挥官比他更杰出。拿破仑的将军多数都接受过法国或欧洲军事教育，但马塞纳没有。拿破仑称赞他是帝国中最优秀的人。不少法国元帅都曾经在马塞纳指挥下作战，这在欧洲历史上非常罕见。

(2) 弗雷瑞斯是位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瓦尔省的一个镇。城市的东西都是山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湿润。弗雷瑞斯的意思是恺撒的市场。弗雷瑞斯也是座海滨度假都市。

(3) 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63—1814），原名玛丽·罗丝·约瑟芙·塔契·德·拉·帕热利，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后。约瑟芬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在巴黎附近的马尔梅松城堡去世。

(4) 波旁王朝货币单位。164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以自己的名义铸造了新的货币。印有路易十三头像的该货币于1792年停发。

(5) 阿布基尔是地中海沿岸埃及的一个村落，1799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东方军团在阿布基尔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赢得了阿布基尔战役的胜利。

(6) 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西耶（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参谋长。

(7) 雷诺（1760—1819），法国政治人物、律师、记者、三级议会议员，第一帝国时期参议员。曾获得帝国伯爵勋章，法兰西学院成员。

(8) 罗德尔（1754—1835），雾月政变前，他是拿破仑和西哀士之间的联络员。

(9) 瑞尔（1770—1841），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一帝国将领。

(10) 布瑞克斯（1759—1805），海军将领，政治人物，曾担任海事部长。

(11) 路易·尼古拉·勒玛（1755—1849），法国政治人物，三级议会议

员，参议院议员，在执政府期间担任参议院主席。

(12) 这里指雾月政变。雾月18日晨，吕西安·波拿巴用巴黎发生了雅各宾派政变的谎言欺骗了委员会，并以安全为由说服他们前往位于巴黎郊区的圣克劳德宫。而负责五百人院出行的安全并被授予当地全部兵权的正是拿破仑本人。雾月政变是西哀士连同拿破仑、富歇和塔列朗谋划的夺权计划。西哀士与拿破仑结盟，共同策划政变，并在共和八年11月18日至11月19日（1799年11月9日至11月10日）发动政变，迫使督政辞职，驱散立法议会成员，组成执政府。政变后由西哀士、拿破仑、罗歇·迪科任临时执政。西哀士起草新的宪法，但被拿破仑破坏。拿破仑此后控制了法国。

(13) 即查理-弗朗索瓦·迪穆里埃（1739—1823），法国大革命期间名将。

(14) 夏尔·路易·于盖（1759—1839），即西蒙维尔侯爵。

(15) 皮埃尔·里埃尔（1752—1821），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法国将领，封伯农维尔侯爵，被授予法国元帅。

(16) 麦克唐纳（1777—1837），那不勒斯王国国防大臣。

(17) 让·拉纳（1769—1809），封芒泰贝洛公爵。

(18) 若阿尚·缪拉（1767—1815），法兰西第一帝国军事家、元帅。

(19) 勒克莱克（1741—1800），法国大革命期间将领，曾参加埃及战争。

(20) 奥古斯特·德·马尔蒙（1774—1852），法国将军和贵族，封拉古萨公爵。

(21) 索绪尔（1774—1841），法国大革命期间将领。

(22) 沙扎尔（1766—1840），法国政治家。曾担任国民公会议员。

(23) 卡巴尼斯（1757—1808），医生、哲学家、议员、雅各宾俱乐部成员。

(24) 查理·弗朗索瓦·勒布伦（1739—1824），雾月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曾担任执政府第三执政官。死后葬于拉雪兹公墓。

(25) 库尔图瓦（1754—1816），议员、雾月政变的主要参与者。曾经向拿破仑揭发阿瑞纳谋反事件。

(26) 高尔奈（1750—1832），法国政治家、雾月政变的支持者。

(27) 巴拉庸（1743—1816），法国政治家、雾月政变的支持者。

(28) 古皮乐（1727—1801），法国政治家、雾月政变支持者。审判路易十六时，他选择支持国王，支持天主教，但主张废除封建头衔。

(29) 威玛（1744—1829），雾月政变的支持者、议员、贵族院成员。

(30) 尼岱（1755—1834），法官、雾月政变支持者。

(31) 爱尔威（1753—1824），农学家、政治家、雾月政变支持者。

(32) 雅里（1739—1805），政治家、雾月政变支持者。

(33) 埃米尔（1768—1822），卢瓦尔地区议员，督政府时期五百人院议员，雾月政变支持者。执政府时期供职于法案评议委员会。

(34) 雷加米埃夫人，即珍妮·弗朗索瓦丝·朱莉·阿德莱德·雷加米埃（1777—1849），是继乔芙兰夫人之后又一位法国著名沙龙主办人，托克维尔就曾是她沙龙里的座上宾。她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目睹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兴起和覆灭，又亲历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和七月王朝的建立，最后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的第二年死去。

第7章　雾月政变

精彩看点

移交立法权——拿破仑·波拿巴夺权——巴拉斯的妥协——高杰和穆棱的抵抗——特殊监察会议——确立“三人”临时执政——拿破仑私人委员会成立——在参议院初战告捷——“五百人院”的乱局——拿破仑被推下主席台——吕西安·波拿巴的决定——拿破仑发兵解散议会——缪拉与穆棱开战——雾月政变——“雾月19日”法令——新政府迁回卢森堡公园

这时，参议院颁布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立法委员会把权力移交地点定在圣克劳德。选择圣克劳德是为了避免牵扯到群众运动，而且如果政变中真的涉及武力行为，那么远离巴黎的圣克劳德也可以更加方便稳定地调动军队。鉴于拿破仑和西哀士已经控制了议会的一部分人，所以政变的主要发起人在布里德耶酒店[(1)]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于雾月16日向参议院主席勒玛发出最后的指示——这所谓的最后指示其实就是雾月18日10时杜伊勒里宫参议院中将要发表的演讲。负责参议院特殊监察会的高尔奈是负责发出信号的人。

宪法第三条规定，参议院有权把五百人院迁出巴黎。在拿破仑回到巴黎之前，时任特殊监察会主席的巴丁[(2)]就提醒过西哀士，这意味着参议院可以推翻政府。1795年的时候，巴丁参加了宪法的制定工作，并且负责撰写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得知拿破仑凯旋登陆法国后，巴丁因为兴奋过度而辞世。那时，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上帝终于派人来拯救法国了——拿破仑就是他本人和他所在的党派苦苦等待的人。高尔奈接手特殊监察会后，那里成了政变的一个重要窝点。除了革命热情外，在能力和影响力方面，高尔奈这位新任主席都无法与巴丁相提并论。

最重要的是架空当时督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高杰。为了更好地迷惑他，拿破仑向高杰发出了邀请，邀请他于18日当天来自己的家中赴宴，与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兄弟共进晚餐。另外，在同一天早上8点，拿破仑还邀请了他们这一派所有的将军共进午餐。接着，拿破仑又宣布他开始接受巴黎卫戍士兵和国家警卫士官们的拜见。要知道，自从拿破仑回到巴黎后，这些人就一直期待着见到他。

现在唯一的困难便是高杰。如果他突然警觉，他便可以召集激进党（人民党）和所有反对政变的将军们阻止政变。我非常清楚这一切。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控制住高杰。

午夜，拿破仑夫人通过自己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3]向高杰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夫妇二人早上8点来家中做客。在给儿子的信中，拿破仑夫人写道："我要和他们夫妇讲一些重要的事情。"然而，早上8点这个时间点引起了高杰的怀疑，因此，他决定让他的妻子单独赴约。

早上5点的时候，参议院的主持人高尔奈突然召集参与政变的人，命他们着手准备即将发表的演讲。参议院和五百人院都彻夜未眠。参议院开会的时间是在早上10点，五百人院的召开时间则是中午。对五百人院来说，它的职责仅在于听取早上参议院关于移交权力的法令，然后闭会。这项在参议院里得到足够多选票的法令已经具有了合法性（法律效力）。

在立法委员会中，在督政府中，在拿破仑身边，我都安排了密探，命他们随时向我报告发生的一切。早上8点，密探汇报说参议院的主席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发表完了浮夸的演讲，代表共和国把立法机关转移到了圣克劳德，并且任命拿破仑为所有军队的统帅。密探还汇报说接下来便是投票阶段了。于是，我马上上车，立刻赶往杜伊勒里宫。在杜伊勒里宫，我得知任命的法令已经被通过。将近9点的时候，拿破仑的住所已经出现了军队。将士们站满了大街小巷，院子里挤满了拿破仑的追随者和朋友，巴黎护卫团以及各省兵团都派来了协助的代表。



欧仁·德·博阿尔内（左一）与家人

当我走进拿破仑的鹅卵形办公室时，他正和贝尔西耶、勒费弗尔将军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参议院的结果。我告诉他议会已经决定任命他为军队的统帅，任命书应该马上就传过来了。同时，我向他反复表达我对革命的热情和忠心，并且告诉他说我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的邮政局，控制了所有的信使。就在这时，有几位将军走了进来。

拿破仑说：“没用的，人们都看到了，这是人心所向，人们都知道我是为了国家才这样做的，而我也会遵守议会的法令，保证公众的安宁。”

话音刚落，约瑟芬突然冲了进来，她面色难看地告诉我们：“高杰没有赴约，他只派来了他的妻子。”

拿破仑随即大喊道：“派人写信叫他来，快！”

几分钟后，高尔奈来了，他带来了议会的正式任命书，拿破仑从他手里接过了共和国的未来。于是，拿破仑立刻走出房间，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自己已经被任命为军队的总指挥。接着，拿破仑带领着所有的将军、高级士官，以及缪拉刚刚从巴黎护卫队带过来的一千五

百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向香榭丽舍大街走去。

与此同时，拿破仑建议我去督政府那里探听一下政府对立法机关转移的看法。于是，我首先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地点，在那里签署了革命声明，并命人迅速将之传达下去。接着，我便向卢森堡公园走去。

大约9点的时候，我找到了巴拉斯、穆棱和高杰。那时，他们三人居然不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当达连夫人强行闯入巴拉斯家中，冲到浴室，把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消息告知正在沐浴的巴拉斯时，巴拉斯大怒道：“这个好吃懒做的无耻之徒竟然把我们都卖了！”



身着法兰西传统服饰的达连夫人

虽然如此，但巴拉斯还是怀着协商的希望，派亲信波多[4]求见拿破仑，询问拿破仑希望督政府如何配合。当波多前去询问拿破仑的态度时，拿破仑正走在香榭丽舍大街队伍的最前面，他冷冷地回答道："去告诉巴拉斯，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进入卢森堡公园后，我把议会通过的决议——议会迁往圣克劳德——告诉了高杰。高杰没好气地说："真是难以置信，共和国的部长竟然成了传信员。"

我回应他说："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您，议会刚刚通过了这样一条重要决议。而且我觉得来督政府听命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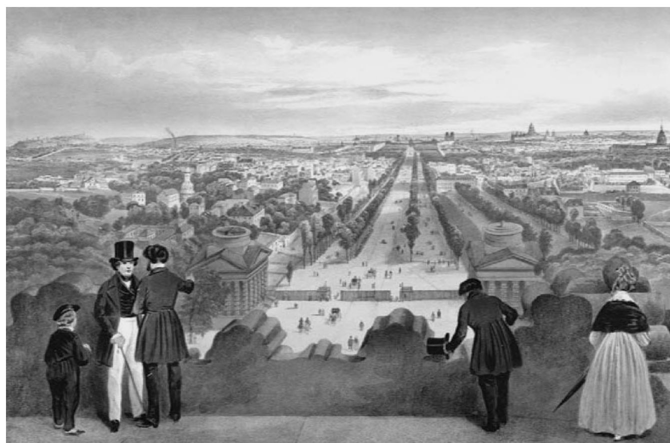
高杰激动地说："当然，提醒我们注意议会通过了这样一项政变的法令是您的义务，不过，此前的那些密谋聚会、人员往来呢？身为公安部长的你难道没有义务侦查并及时通报这些吗？"

我回答道："政府难道没有收到报告吗？为了搜集情报，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政府什么时候相信过警报？况且政府内部的人不也参与了政变吗？在参议院那里，西哀士和罗杰·杜克早就倒戈了。"

高杰坚定地说："大部分人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即使政府要下达命令，也会找信得过的人去传达。"

就这样，我离开了卢森堡公园，罗杰·杜克马上召集穆棱和巴拉斯前来商谈。刚刚上车，我就看到参议院的信使走了进去。高杰立刻赶到巴拉斯家中，要求他们马上加入讨论会。然而，优柔寡断的巴拉斯不能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

事实上，当巴拉斯看到拿破仑的两位信使塔列朗和布瑞克斯前来和他商讨他全身而退的事宜时，他便恨不得马上忘掉他之前对高杰的承诺。



19世纪的香榭丽舍大街

一开始，塔列朗和布瑞克斯便明确表示，如果巴拉斯选择负隅顽抗的话，那么拿破仑一定会调动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付他。恐吓完之后，这两位经验丰富的使者又蛊惑他说，如果巴拉斯能够主动辞职，那么拿破仑一定会保证他后半生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而且他再也不用操心政府的麻烦事了。

塔列朗手中拿着一张需要巴拉斯签字的保证书，最后，在恐惧和希望中挣扎的巴拉斯签下了那份保证书，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决心。于是，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巴拉斯离开了卢森堡公园，前往自己的领地格罗斯布瓦[(5)]。

也就是说，早上9点的时候，督政府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支持。督政府的坚定支持者杜波瓦再次找到高杰和穆棱，请他们下令逮捕拿破仑、塔列朗、巴拉斯和谋反的其他主谋，并自请担任战事部长，拦截赶往圣克劳德的拿破仑和缪拉。

当时，如果高杰和穆棱同意了杜波瓦的建议，如果被控制的督政府总秘书长拉加德[(6)]拒绝在没有得到议会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通过法令，那么一切都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然而，对于杜波瓦的建议，高杰冷漠地回应道：“我以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和印玺做担保，圣克劳德通过的决议怎么可能算数？”

穆棱也附和道：“今晚拿破仑和高杰会来我家中赴宴，到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人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了。”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些人根本不适合治理国家，他们的盲目、自大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想说，他们其实是被自己出卖的。

事态继续发展，骑着战马的拿破仑带领着追随他的将士们到达了香榭丽舍大街。在那里，他遇到了正在交火的士兵。当他拿出议会的任命书时，交战的双方放下了武器，追随他来到了杜伊勒里宫。香榭丽舍大街、码头、卢森堡公园等地都是一片欢腾，几乎是在一瞬间，激烈的战斗便变成了热烈的欢迎，杜伊勒里宫成了拿破仑接受他的子民、士兵朝拜的乐土。路过参议院门前时，身着军装的他刻意回避，没有对宪法宣誓。接着，他走出城堡，向所有的士兵致意。这时候，他得知，政府已经解散，西哀士和罗杰·杜克已经向特殊监察会递上辞呈，巴拉斯也在审时度势之后签署了隐退的保证书。路过特殊监察会时，拿破仑发现了挤在人群中的西哀士、罗杰·杜克和他们党派的其他几位议员。

那时，只有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高杰和他的同僚穆棱拒绝臣服拿破仑。高杰需要拿破仑给出一个解释，于是，拿破仑说道：“这绝对不是针对您本人，共和国正处于危机之中……需要有人来拯救它……我愿意拯救它！”

就在这时，穆棱的一个亲信前来禀报说桑德尔[7]在圣安东尼[8]发生暴动。拿破仑立刻转向信使询问情况，问清楚情况后，他下令道：“如果他敢轻举妄动，派一个骑兵团绞杀他。”穆棱赶紧说：“桑德尔能用的人不超过四个，不用担心。”这时候的穆棱也已经不是1792年人民起义[9]时的那个穆棱了。

我负责保卫巴黎的安全。所以我接过话头，汇报说巴黎没有任何人民暴动的影子。明白大势已去后，高杰和穆棱回到了卢森堡宫。然而，这个时候，他们两人已经被军队软禁起来。在拿破仑的授意下，莫罗率领一支特遣队控制了卢森堡公园，让·拉纳护卫着立法机构转移，缪拉火速占领了圣克劳德，而索绪尔则在布湾[10]待命。所有的一切都畅通无阻，至少巴黎没有发生任何暴动，全国也没有任何暴动的迹象。

为了厘清这一日发生的事情，也为了明确第二天将要在圣克劳德处理的事情，当天晚上，拿破仑一派的人在特殊监察会召开会议，我也列席其中。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原来针锋相对的两派人也能和睦相处、共商大计，军队党派的异军突起已经让这两派的人感到惊慌。不过，讨论了半天后，我们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拿破仑提出的所有方案，或者说拿破仑兄弟提出的所有方案，都不过是军队专政。立法委员会的人遭到了排挤。之后，立法委员会的人找到我，询问我的意见。我说："这已经是事实，拿破仑将军手握兵权，而这兵权正是你们赋予他的。现在除了依靠他的专政，你们无路可走。"

不久之后，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想反悔，然而现在已是穷途末路。最后，人们推选出了拿破仑、西哀士和罗杰·杜克三名临时执政。接着，西哀士提出逮捕四十多名反对党人或看起来支持反对党的人。我通过瑞尔向拿破仑建议道："千万不要同意西哀士的提议。在政府的工作刚刚起步时，切莫成为愤怒和仇恨的靶心。"拿破仑似乎理解了我的想法，回应西哀士时，他说道："时机还不成熟，况且全国上下没有任何抵抗，因此，国内根本不存在反对党。"

西哀士对他说："明天在圣克劳德，有您头疼的时候。"



讽刺漫画：展现了拿破仑的强硬和政敌的软弱

我承认，我也不能确定第二天可能发生什么。我所掌握的情报显示，对于废除宪法、建立军事独裁一事，参议院和五百人院都非常震惊，甚至之前支持专政的一部分人也反水了。不过，拿破仑早已经声名远扬，对这些摇摆不定的人来说，这是一剂强心药。无论是在凡尔赛，还是在巴黎，无论是在圣克劳德，还是在圣日耳曼，拿破仑这个名字都已经成为将士们的护身符。

拿破仑的私人委员会成立了，参议院中的雷尼尔、勒玛、法尔格、尼岱担任主要负责人，五百人院中，吕西安、布雷、沙扎尔、卡巴尼斯、埃米尔担任顾问。

当然，以木马集团为核心的反对党也在通宵研究应对方案。

第二天一大早，从巴黎到圣克劳德的路上就挤满了或步行或骑着战马的士兵，好奇的民众，搭乘马车的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此前不久，两个议会的大厅才匆匆忙忙地布置妥当。不久之后，在参议院和五百人院中，支持军队党派的议员只剩下一小部分，最激进的那一部分人。

我和我的人马留在了巴黎，在我的办公室中，我一直留心着发生的一切，比对着各种报告消息。为了了解圣克劳德那里的情况，我派出了一小队机警的人，命他们前往圣克劳德，与我安排在那边的密探取得联系，并每隔半小时向我汇报一次那边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知晓任何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微小事件。当然，我坚信，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军方。

吕西安控制的五百人院先开始了。埃米尔以一篇思虑周全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负责报告共和国现在所处的境况。埃米尔还提议说，在听完报告前，任何人都不要做任何决定。布雷已经准备好了这篇报告。

埃米尔的话音未落，大厅里就响起了如暴风雨般的呐喊声：

“宪法万岁！”

“废除专制！”

“打倒专政！”

在戴尔布莱尔的动议下，经克莱蒙梭加以发展后，议会中传出了“共和万岁”的呐喊声，并要求所有人对宪法效忠。这个时候，那些此前想要支持专政的议员也纷纷向宪法效忠。

参议院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在西哀士和拿破仑控制下的党派正想着迅速建立临时政府，因此，这些人拿着督政府总秘书长拉加德一份没有效力的文书（因为它没有得到议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宣称督政府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辞职。这时，反对党马上要求他们提供领导人辞职的正式文书。

得知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后，拿破仑认为该自己出面了。他穿过战神大厅[11]，走进参议院的大厅。做了一次冗长的、不时被打断的演讲后，他宣布督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宪法已经不能够挽救共和。一方面，他恳求议会迅速通过建立新秩序的法案；另一方面，他又宣称，为了支持议会的决定，他自己只想成为维持新秩序的左膀右臂。以上便是这次冗长演讲的大致内容。

拿破仑演讲的整个过程混乱不堪，我们的将军大人不得不一会儿对着议员们讲话，一会儿对着门口的将士们讲话，最后，人群中传来了“拿破仑万岁”的呐喊声。得到了参议院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后，拿破仑走出参议院的大厅，怀着胜利的希望走向另一个议会的大厅。

他清楚地知道此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什么，他甚至知道人们对着宪法宣誓的所有细节，所以他的内心非常忐忑。从参议院那里，五百人院得知巴拉斯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此事。愤怒

的五百人院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阴谋，他们要求参议院交代把议会转移到圣克劳德的动机。与此同时，督政府也向参议院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拿破仑演讲现场混乱不堪，他被五百人院的人团团围住

就在人们激烈地讨论巴拉斯的辞职是否合乎规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时，在一支精卫部队的护卫下，拿破仑走了进来。四位护卫陪同他走进了大厅，其余的人则守在大厅门口。

或许是因为刚才在参议院的成功给了他激励，拿破仑觉得自己一定能够顺利平息五百人院的怒火。然而，他一走进议会大厅，那里便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骚乱。人们认为这位将军是凭借着武力进入立法委员会的，因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朝他怒吼道：“你这是在

侮辱神圣的立法委员会，请出去！”

毕高内[12]冲他吼道：“你做了什么，鲁莽之士？”

德斯姆质问道：“您是为了权力才征战的吗？”

虽然站在台前的拿破仑试图开口说几句话，然而四面八方都是“宪法万岁”“共和万岁”的呼喊声，一些愤怒的议员更是高呼着“打倒专政！”“打倒克伦威尔！”“打倒暴君！”此外，甚至有一些人拥向前去，试图把拿破仑推下主席台。

阿瑞纳向他伸出了拳头：“你这是在向国家宣战！”

看到他们的将军脸色惨白，在主席台上摇摇欲坠后，守在门口的士兵们立刻穿过大厅，前来支援——他们在拿破仑和议会成员之间筑起了一道人墙。

在士兵的护卫下，拿破仑逃出了议会大厅。之后，他低着头骑上马，飞也似的冲下了圣克劳德大桥[13]，冲着等候在那里的士兵们大喊道：“他们想杀了我，他们想把我赶出议会！他们竟然不知道我是无坚不摧的，他们居然不知道我是闪电之王！”

在圣克劳德大桥等待的缪拉应声道：“像您这样战无不胜的人怎么会害怕那些饶舌之人呢！”

于是，拿破仑掉转马头，重新对着士兵们高呼，希望再次激发他们的斗志。然而，让·拉纳、索绪尔甚至是缪拉本人都还没准备好把刺刀对准议会。

最糟糕的事情是，议会这边已经完全乱作一团，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吕西安根本无法维持秩序，只能不停地向他的同事们确认拿破仑肯定会回来。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无法无天！”“立法处理拿破仑！”这样的嘶吼，人们甚至要求他主持立法投票驱逐拿破仑。愤怒的吕西安离

开了主席位置，摘下了徽章，不再主持会议。就在他准备离开主席台时，警卫部队冲了进来，把他带到了会议室外面。被限制权利的吕西安得知，他的哥哥拿破仑准备武力攻下议会，因此，他的哥哥需要他的帮助。



忠于拿破仑的士兵

这就是西哀士的主意，这个得到六匹马座驾的前共和国领导人，正在圣克劳德等待着事情的结果。已经不能再犹豫了。那个时候，拿破仑的拥趸面色惨白、不知该如何是好，而那些胆小的人已经完全反水了。儒尔当和奥热罗蓄势待发，正准备瞅准时机把警卫军拉到人民党这边。然而，西哀士、拿破仑、塔列朗、罗德若等人和我的观点一致，人民党既没有头脑，也没有左膀右臂。得知拿破仑的想法后，吕西安重新上马，以主席的身份要求拿破仑发兵解散议会。于是，缪拉率领一支警卫部队冲进了议会大厅，和陆军上校穆棱扭打在一起。整个大厅乱作一团，鼓声、嘶吼声交杂在一起，议员们慌忙跳窗逃离，大厅中到处都是被丢弃的长袍……

这就是雾月19日（11月10日）圣克劳德政变的最终结果。吕西安是拿破仑能够成功的关键人物，当然，缪拉的决定也功不可没，甚至那些懦弱的不敢直面拿破仑的反对派将军们也间接地帮助了他。

然而，我们又该如何把这反人民的一天昭告天下呢？军队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乘乱夺权。我们该如何为这一天正名呢？在历史上，它被称作军事夺权胜利的一天。

西哀士、塔列朗、拿破仑、罗德若、吕西安和布雷这些政变的核心人物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流落各地、支持他们事业的议员们，建立新的议会。布雷和吕西安找回了二十五或三十个人，这些人组成了小众议会。之后，这个小众议会即刻出台了紧急条例，宣布拿破仑以及支持拿破仑的将士们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然而，第二天的报纸却大幅报道了几位议员意图刺杀拿破仑、现在的议会正被一小群杀人凶手控制的事情。于是，主事人当即宣布停发所有报刊。

随后，新议会又颁布了雾月19日法令[(14)]，当然，这也是主事人为了使新革命合法化而颁发的法律条款。雾月19日法令宣布：废除督政府，建立一个由西哀士、罗杰·杜克和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15)]；推迟召开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时间，开除包括儒尔当在内的六十二位人民党（激进党）议员；集合两会的五十名议员成立新的立法委员会，着手制定国家的新宪法。

这份文书由小众议会草拟，提交到参议院后，仅仅得到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大部分人都没有表态。于是，得到六十余人支持的法令得以通过，这也意味着新政府正式合法化。随后，这六十余人宣布他们可以在新政府中胜任部长、大使或者执政府的代表等职务。

雾月20日（11月11日）早上5点，拿破仑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在参议院宣誓，把圣克劳德的新政府迁回了卢森堡公园。

---

(1) 布里德耶酒店位于今巴黎十六区，靠近戴高乐广场。

(2) 巴丁（1748—1799），法国革命家、政治家，反对处死路易十六。

(3) 欧仁·德·博阿尔内（1781—1824），法国军事家。欧仁出生在巴黎，

其父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被控叛国罪，送上断头台。后来，其母约瑟芬嫁给了拿破仑·波拿巴，欧仁被拿破仑收为继子。欧仁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波拿巴皇室中最有才能的人物之一。

(4) 波多（1759—1822），法国大革命时期将军，曾供职于法国宪兵队。

(5) 格罗斯布瓦是法国杜省的一个市镇，属于贝桑松区博姆勒达梅县。

(6) 拉加德（1763—1815），法国政治家。大革命爆发时，他离开法国，效力于英国海军。督政府时期返回法国，为雾月政变提供过便利。

(7) 桑德尔（1752—1809），法国大革命时期将军。1792年，桑德尔自封国民自卫军总指挥，带领民众洗劫杜伊勒里宫，向路易十六施压。晚景凄惨。

(8) 圣安东尼位于巴黎市郊。

(9) 1792年8月10日暴动是法国大革命历史的里程碑事件之一。8月10日，暴动的巴黎公社及来自马赛和布列塔尼的国民警卫联盟组成国民自卫军，攻入杜伊勒里宫，导致了法国君主制的崩溃。

(10) 布湾是巴黎的入口之一，位于今巴黎第十六区。

(11) 战神大厅是凡尔赛宫内的一个大厅。它是国王寝宫的一部分，室内的装饰以罗马神话中的战神为主题。

(12) 毕高内（1755—1832），政治家、作家。他反对雾月政变，与第一帝国保持距离。1819年出版了《雾月政变纪实》。

(13) 圣克劳德大桥连接塞纳省大区布洛涅-比扬古和圣克劳德。

(14) 参议院通过了将五百人院休会3个月的法令，任命拿破仑、西哀士和杜克为临时执政，命名立法院。五百人院中一些温顺的议员准备巩固五百人院的权力，但旋即被捕。五百人院从此沦亡。

(15) 执政府始于1799年雾月政变，止于1804年拿破仑称帝。

第8章　执政府的成立

精彩看点

执政府第一次会议——确立“三人执政”——执政府第二次会议——执政府人事调整——出任公安部长——流放反对党——宽大执行流放政策——废除人质法和强行贷款法——开展警务工作——结束临时政府状态——拿破仑的“秘密议会”——第一次立法会议——西哀士的提议——抵制“大选民”提议——西哀士出任参议院主席——执政府的成立

我预感到，在这个三人共治的执政府中，最后掌权的一定是军方。在执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时，罗杰·杜克和西哀士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拿破仑毫无争议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并且罗杰·杜克当即表态，拿破仑是唯一可以拯救共和的人，因此，从今以后，他将听其调遣。西哀士则咬紧嘴唇，什么也没有说。拿破仑知道这个贪婪的人在想什么，因此，他向西哀士承诺任其处理督政府的私有财产——约合八十万法郎。拿到这笔巨款后，西哀士仅给罗杰·杜克分了十万法郎。这个小甜头稍微平息了西哀士的野心，他觉得，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将会由拿破仑负责，而内政将会由自己来负责。但人们都清楚地看到，自第一次会议以来，拿破仑便亲自管理起了财政、政务、法律、军队、政策、人事任命等事务。

当晚回到家中后，当着塔列朗、布雷、卡巴尼斯、罗德若和沙扎尔的面，拿破仑说道："先生们，你们有主人了！"

西哀士这个多疑、贪婪的主教已经无法与拿破仑这位年轻有为且声名显赫的实际统治者抗衡了。况且在法兰西这样一个骄傲而好战的国家面前，西哀士完全没有能力施加任何影响。他那唯一主教的名号，也只能让他远离军队，权谋再也无法撼动武力。后来，西哀士试图拉拢我，取得我的支持，但我拒绝了他。

执政府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人们开始讨论部长的安排问题。首先，我们需要选出执政府的国务秘书长，最后，马赫[(1)]获得了该职位；拿破仑永远都无法原谅杜波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贝尔西耶取代杜波瓦成为新的战事部长；拿破仑最初的拥趸埃米尔获得了罗波尔[(2)]的财政部长之职；原海军部长布东卸任，弗尔菲[(3)]成为新一任海军部长；拉普拉斯[(4)]取代吉奈特[(5)]成为新的内务部长；外交部长一职暂时由瑞阿尔德[(6)]担任，但其实真正的外交部长是塔列朗，只不过这个任命没有公开。

讨论到公安部长的安排时，西哀士建议撤掉我的部长之职，任命阿尔杰为新一任公安部长。在推荐阿尔杰时，西哀士说："这是我的人。"不过，拿破仑认为我在雾月18日表现良好，所以他拒绝了西哀士的提议。事实上，我不仅为雾月18日的政变提供了军事上的便利，而且在危急时刻，我还阻止了几位议员和将军的危险行动。得到拿破仑认可的当天晚上，我便在整个巴黎张贴告示，表示自己服从拯救共和的行动。因此，尽管西哀士从中作梗，我还是留在了公安部长这个最重要的职位上。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局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前还有很多困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仅要会征服，还要懂得驯化。他知道，用一位能干的部长来震慑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好的安排。他更知道，现在的他需要这么一个人，这个人能够帮他和突然成为同事的战友们保持一定距离。在拿破仑入主卢森堡公园的当晚，我便向他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对他来说，我这位公安部长的观点的确很中肯。


瑞阿尔德


拉普拉斯


罗波尔

然而西哀士却一直想处罚那些他所谓的反对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他对拿破仑说："民众已经被雅各宾派的思想所毒害，因此，我们需要严肃处罚这些人。人们都认为圣克劳德政变之后的当权者不过是些巧取豪夺、谎话连篇的人，他们还认为三人执政的执政府不过是可怕的军事独裁，而且现在它正在腐化。雾月19日法令又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些抛开昔日同事的议会叛徒，在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

情况下强行通过的法令！这是阴谋篡权！他们需要给您、给我有一个解释，我们不能继续陷在泥潭之中了，这样下去，我们也会遭遇失败的。在圣日耳曼镇，人们说现在的情况不过是军队从学究派手中夺取了权力，另一些人还认为拿破仑将军会成为下一个蒙克[7]。一些人认为我们是波旁王朝的人，另外一些人觉得我们是罗伯斯庇尔的拥趸。现在，我们必须整肃人心，不能被保王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利用。对政府来说，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危险的人，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他们。尤其是现在，新政府要借此树立权威。”

说完这番话，西哀士又居心叵测地提出，公安部长应该采取对公众安全负责的措施——他把拿破仑拉到了自己那一边。雾月19日的时候，我接到的是“没有任何反对党，不会拘禁任何人”的命令。但雾月26日，他们居然又要我拿出拘禁名单。当天，执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在没有确切原因的情况下，五十九名主要的反对党人将被流放：三十七人将被流放至吉亚纳，二十二人将被流放至奥雷龙岛[8]。这份名单上既有可恶之人的名字，也有可敬之人的名字。我之前预测的情况发生了：民众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时候，在政治上，拘禁行为毫无用处。

最后，政府不得不向民意妥协，对一些人首先法外开恩。我恳求政府释放几位在名单上的议员。儒尔当此人廉洁奉公，在夫勒吕斯战役[9]中更是战功赫赫，如果仅仅因为政见不同，他便遭遇流放之刑，那么对于国家和军队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损失！看到拿破仑本人也犹豫不决时，西哀士便不再继续坚持流放之策，就这样，这件事暂且搁置了下来，名单上的人交由最高公安看管。

执政府的三位领导人意识到，对他们而言，公众意见非常重要，因此，他们需要颁布几项能够赢得民心的法令，所以，首先，他们废除了人质法和强行贷款法。

雾月政变已成既定事实，毫无疑问，新政府已经得到国家的认

同。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新政府将是联合共治的政府，还是一人独裁的政府。

在一片欢呼声中，只有那些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的支持者们依然对拿破仑政府存有异议。他们列举了独裁之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做出最坏的预测。他们说的非常正确，以后我们便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我反对流放政策，也反对所有一概而论的政策。我与执政府的三位领导坦诚相待。在政府稳定下来之后，我决定从此以公正、尊严和温和的方式开展警务工作。在督政府统治期间，妓女被训练为国家的间谍，我反对这种可耻的行为。我认为，警务工作不在于告密，而在于引领正确的方向。

同时，我也采取了宽松的方法处理了那些在北方被俘虏的流亡贵族：除了在全国上下推行以人为本的治理方针之外，我还向执政府建议释放所有在战争中失去自由的海外流亡贵族。这些温厚的措施让我赢得了保皇派的信任，也为他们日后臣服于政府奠定了基础。



夫勒吕斯战役，法军打败反法同盟军

当时，我关于主教等人的措施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我看来，

本着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正是本届政府所应持的态度。然而，在当时，这两项法令被恶意解读。有人认为这些法令是在动摇新政府的人心，也有人认为这些法令是在召回宗教对国家的统治。那些持后一种观点的人竟然不去思考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虽然如此，但我依然决定推行这两项法令。法令印刷完毕之后，我命人读给我听，我知道，我还必须做一些其他努力，只有这样，我才能让民众接受其中的思想和理念。

更加开明的政策和更加明确的和平，这便是新政府向法国民众提交的第一份答卷。人们都在称赞这位突然出现的杰出领导人，谨慎而不失活力是人们对他的共同评价。加上政客们的宣传，各派人马都认为新政府于自己有利。在保皇派们的眼中，拿破仑就是他们的蒙克，对于我们年轻的将军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大好事。长时间的战争让革命党人期望变得更加温和，他们公开表示他们愿意调整共和政体，成立新的混合管理体制。不过，现在，把民主政体变为共和帝国的时机还未到。人们希望建立一个融合各利益派别的政体，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办法实现。新的政务组织似乎在推行一种反革命的理念，他们认为革命的法律过于苛刻，保皇理念开始悄然盛行。比如说记录波旁家族悲剧命运的作品《伊尔玛》[10]成为巴黎大街小巷的热议焦点，人们都在议论着皇后的悲惨命运。

公安部也曾查获过类似的出版物，然而这种捍卫国家权益的方式必将牺牲民意，另外，对于新政府来说，稳住保皇派也是它的利益所在。不过，我依然认为我有责任让这些保皇派降低期待，同时，我也有义务唤起共和党人的士气。我向执政府指出，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我们依然需要处处留心、小心提防。革命的胜利是我们与真诚的共和党人、自由的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脱离自己的党派和军队，政府将处于危险的境地，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结束临时政府状态。

当时，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立法会议上。五百人院由

吕西安、布雷、雅克米诺和达努控制着，参议院则在勒玛、什涅[11]和勒布伦的掌握之下。当然，最有权威的议员还是勒布伦，就连拿破仑也要郑重对待他的意见。立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西哀士提出的新宪法，我们准备用它来代替第一共和国宪法。拿破仑很清楚西哀士的真实想法，他根本就是在故弄玄虚。西哀士对外宣称尚未做好准备，还需要整理草稿，像极了时尚圈矫揉造作的人们。然而实际上，他公布自己作品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了。为了调查他的真实意图——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请瑞尔——这个看似呆板的老实人——设了一个酒局，准备从西哀士的亲信什涅入手，通过什涅来调查西哀士的真实想法。

通过调查，拿破仑成立了一个秘密议会，我也是这个议会的成员之一。当天出席会议的有拿破仑、勒布伦、冈巴塞雷斯[12]、吕西安、约瑟夫、贝尔西耶、罗德尔、瑞尔和雷诺。我们主要讨论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拿破仑应该如何对付西哀士。

终于，在12月中旬，执政府的三位领导和两会的议员齐聚拿破仑家中，共商国是。晚上9点，会议开始，接近午夜时，会议结束，达努负责做会议记录。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西哀士没有发表任何观点，后来，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他才东拼西凑地在草稿纸上写一些他的理论。他以一种权威的语气，慢慢地抛出了他关于新宪法的设想。



拿破仑与同僚，从左到右分别是：冈巴塞雷斯、拿破仑、勒布伦



冈巴塞雷斯

在他的提议中，将来，国家会成立一个由一百人组成的主席团来负责讨论、制定法律；同时，国家还会再成立规模更大的立法委员会来审议主席团的议案；最后，国家还要成立参议院，参议院的议员是终身制的，他们负责监督国家的大政方针。拿破仑基本同意了他提出的这些方案，于是，它们顺利通过了议会和政府的认可。接着，西哀士就政府的日常管理发表意见，他提议建立内阁来负责制定公共管理方面的各项法规。

西哀士政府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的政府将是一种以共和为基础的君主政体。人们都焦急而又好奇地等待着西哀士接下来的提议。那么西哀士又提出了什么呢？一位终身制的大选民，这位由参议院推选出的大选民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平时，这位大选民住在凡尔赛宫，每年可获得六百万法郎的收入，并拥有三千名护卫。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任命两位执政官——和平执政官和战争执政官，这两个人的工

作相互独立。如果这位大选民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参议院有权在不交代原因的情况下召回大选民和他任命的两位执行官。被召回的大选民将会成为参议员，但不能再过问政府的行为。

就在这时，拿破仑听不下去了。他大笑着站了起来，从西哀士手里拿过草稿，用羽毛笔指着一行字，笑着说这纯属无稽之谈。

通常情况下，西哀士只会赌气，不发表意见，但这一次，他站了出来，开始为自己的“大选民”辩护：“说到底，国王不是别人。”拿破仑激烈地反对此事，他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对于别的质疑，西哀士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越来越烦躁的拿破仑质问西哀士道：“您觉得一位有地位、有才能的人会像一头猪一样，待在一座几百万的城堡里安心养膘吗？”

大家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西哀士也不得不中止了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西哀士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出这个可笑方案的，如果这个方案被接受，那么他将成为大选民——参议院将会装模作样地推选他为大选民。到时候，他可以任命拿破仑为战争执政官，当然，这是在他没有被召回的情况下。这样一来，他又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中，到时候，他可以任命心腹为政府首脑，再通过一些手腕，把执行权变为王室继承权，那时，他就可以成为新王朝的开创者。

不过，他的提议遭到了执政府的强力抵制，一段时间后，他的提议被彻底推翻。当然，这个人也很善于保存实力，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人如何在大笔财富中安度晚年。

抵制西哀士的法案，单靠共和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执政将军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当务之急是通过一项可以确保他们地位的法案。然而，尽管西哀士自愿隐退，但他所代表的共和党人依然希望组建纯粹的共和政府。于是，有人提议建立类似美国那样的政体[(13)]，

各部长和议会以及政府各部门联合选举一位总统，总统任期十年。虽然另外一些人在表面上附和着这个提案，但实际上，他们依然坚持三人执政的体制，并提议说弱化其中两位执政官的职能。

正当人们决定通过这种三人联合执政，其中一人拥有最高执政权的决议时，反对的声音出现了。沙扎尔、达努、库尔图瓦、舍尼埃以及其他一些议员以宪法为依据提出质问：如果没有经过选举就推选拿破仑将军为第一执政，那么我们如何证明雾月18日的事件不是一次篡位的政变呢？接着，他们提议说我们可以任命拿破仑为战时大统帅，全权决定是否与其他国家开战。

这时，拿破仑坚定地说："我希望留在巴黎，因为现在的我是执政官。"

打破了沉默的什涅继续谈论着自由、共和以及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他非常坚定地要求国家赋予议会召回执政人的权力。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拿破仑生气地直跺脚："不行！看来是要流血了……"

这些话让协商的气氛突变，没有人再说话，最后人们终于通过了三人联合执政的提议。在这个政体中，第一执政具有最高执政权，任期十年，可以连任，具有最高任免权、颁布法律权、宣战权。与此同时，人们也通过了选举拿破仑为第一执政的决议。事实上，拿破仑不仅绕过了参议院的立法程序，而且在第一执政的选举中，他还避开了参议院。

不知是因为蔑视，还是因为骄傲，总之，西哀士拒绝出任执政官，毕竟剩下的两个席位无非是有名无实的虚职而已。其实拿破仑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选，这二人分别是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这两人，一个是曾经支持过死刑的冷血又自私的革命党人，一个是从不相信理论、唯权力是瞻的行动派；一个是无力维护革命理念和利益、地

位、荣誉信徒的革命党人，一个则是相对廉洁奉公、恪守着信仰和公共习俗规范的人。虽然这两人比较贪婪，但他们都是正直明理之士。

西哀士被任命为参议院主席，他需要协助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一同组建参议院。鉴于他自愿把权力让给了拿破仑，所以，这个人得到了克罗纳[14]的庄园、一百万法郎奖金的补偿，此外，作为参议院主席，他每年可得两万五千斤[15]地租，同时，他还得到了六十万法郎，这是他作为督政府让位的酬金。从此以后，这个人慢慢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



1799年11月20日，参议院出台法令，规定从前两会的权力逐步恢复，到1820年2月完全恢复。为了避免这项法令影响到三人执政体制的运行，政府需要尽快向法国人民公布新的宪法。这一次，法国人民不需要通过议会来代表自己的权益了，他们将直接前往各地立法机关，亲自投票。支持新宪法的票数多达三百万或者更多，在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情况下，雾月政变得到法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七年来，政府换了九次，国家在政权的更迭中一次次触礁。这一次，她终于迎来了一位坚定而能干的领袖，而他治理下的法国也正向平静的海岸靠近。

---

(1) 马赫（1763—1839），外交官、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人文学院院士。

(2) 罗波尔（1746—1825），法国大革命期间政治人物、律师。1799年，罗波尔曾短暂出任财政部长，后被埃米尔取代。

(3) 弗尔菲（1752—1807），水文工程师、政治家。

(4)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侯爵（1749—1827），法国著名政治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的工作对天体力学和统计学的发展举足轻重。拉普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行星的轨道的周期性变化，这就是著名的“拉普拉斯定理”。

(5) 吉奈特（1762—1821），山岳党人，督政府时期曾出任内务部长。

(6) 瑞阿尔德（1761—1837），德籍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他和西哀士、杜克关系密切，出任督政府外交部长一职。

(7) 蒙克（1608—1670），英国海军司令，被认为是奥利弗·克伦威尔麾下的强硬派，曾经镇压过苏格兰起义，帮助查理二世振兴天主教，肃清军队中的清教徒。

(8) 奥雷龙岛，也译作“欧雷翁岛”或“奥莱隆岛”，位于法国西南部滨海夏朗德省、比斯开湾北部，为法国第二大岛（不包括海外领地）。

(9) 夫勒吕斯战役中，法国大败反法同盟。

(10) 伊尔玛的故事发生在亚洲。以寓言的形式影射波旁王朝，读者很容易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对号入座。对于这种诋毁革命的书籍，第一执政官表现得相当宽容。但当波拿巴政权稳固之后，执政官的宽容便不复存在。这些书籍包括《侯爵夫人回忆录》《贝特朗》《兰巴勒公主》《法兰西回忆录》《伊丽莎白历史》《玛德琳公墓》。

(11) 什涅（1736—1814），法国政治家，雾月政变的主要支持者，封玛莎公爵。

(12) 即让-雅克·雷吉斯·德·冈巴塞雷斯（1753—1824），第一代帕尔马公爵，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政治家和律师，也是著名的《拿破仑法典》的编纂者，这一法典至今仍是法国和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基础。

(13) 这里指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立的联邦制政府。该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的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由各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同时也有联邦政府来为联邦的运作服务。从此，联邦体制取代了基于邦联条例而存在的松散的邦联体制。

(14) 克罗纳位于今巴黎市埃夫里区。

(15) 斤是法国古代度量单位。在巴黎，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九十克。在其他各省，一斤相当于三百八十克到五百五十克。

第9章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

精彩看点

拿破仑取得执政府大权——拿破仑和约瑟芬告别过去的生活——商业的复苏——政治宽恕政策——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组——经济制裁政策——远征意大利的决定——伯爵夫人吉什造访——马伦哥之战——拿破仑进攻亚历山大港受挫——共和党人蠢蠢欲动——收买杜洛克——拿破仑凯旋——卡诺辞职——分散公安部职能

自命为第一执政以来，拿破仑便认为自己统治的时代到来了。在政府管理工作中，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在他的独裁管理下，共和逐渐消失，国家渐渐走向集权。第一执政向我们保证，而且我们也相信，集权不会损害共和大业。事实上，在马伦哥战役之前，共和的形式依然存在，至少在话语上，人们还是不敢违背共和精神的，作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也还仅仅是人民的执政官和将士们的领袖。

12月25日，拿破仑取得政府管理权，从此以后，所有公共法令上都签署着他的名字——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之前，国家领导人还住在卢森堡宫，没有人敢闯入王宫驻地，但胆识过人的拿破仑却率领军队占领了杜伊勒里宫，从此以后，那里便成为他的寝宫。参议院被安排在卢森堡公园，众议院则被安排在王宫。

此举得到了国家的肯定，毕竟国家的门面要撑得起国家的形象。辉煌和仪式悄然苏醒，社团活动欣欣向荣，人们也开始欢庆重大节日。考虑到公共形象和习俗礼节，拿破仑与约瑟芬和以前混乱的私生活做了了断[(1)]，把那些曾经显耀一时，但为世俗所不齿的女人们赶出了卢森堡宫。

新政府上台，商业似乎一定是最繁荣的。执政府也是如此。在通过了一系列具有人文关怀、公正且适度的法案之后，商业一片繁荣。在政治上，宽恕受雾月19日法令制裁议员的法案得到了一致好评，制宪议会中的一批杰出议员再次出现在了政府之中。那份流放名单的撤销令我非常高兴，再次看到很多人重新为政府效力后，我更是兴奋莫名。著名的恺撒勒斯[(2)]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同事玛鲁埃[(3)]，一个集正直和才能于一身的人也在其中。恺撒勒斯这位前制宪议会的议员曾经在奥拉托利会布道，因为这个原因，此后我给予了他特殊的关照。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心怀感恩的人也回报了我。

立法和行政机构的重组是新政府愉快开端的标志，但这祥和的景

象并没有持续多久。某天晚上，拿破仑对我说："现在，我还不能安心做我的第一执政，因为西部还处于动荡之中，我收到的报告显示那里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可怕的觉醒。

年轻的杜桑、福若特伯爵[(4)]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同僚被相继处决，一部分报刊被迫停刊，还有一些带有威胁性质的声明……因为这些，温和治理国家的希望再次落空。我向第一执政指出，我们必须消除这些阴霾，可他还是不紧不慢地继续施行怀柔政策，用施加恩惠、赐予职务的方式拉拢流亡贵族，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时，他还开始参拜天主教堂。不过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迫害共和党人，只是选择性地忽视了他们。

共和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在混乱中，金钱或被挥霍，或被消耗。为了应对战争和各部门的开销，执政府向巴黎商界贷款一千二百万法郎，又通过出售土地获得了八千万法郎，最后……通过这些措施，第一执政意识到，想要恢复摇摇欲坠的共和国经济特别困难。在收到这样一封公文后，愤怒的他决定对银行家和供应商下手。随后，我也收到了这份公文的复印件：



恺撒勒斯



玛鲁埃



福若特伯爵

"这里所提到的个体被认为是公共财产的实际控制者。这些人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动力，并且每个人都拥有一亿法郎的固定资产，以及八千万法郎的信用额度。这些人是阿尔芒[(5)]、范登堡、高罗、安格

鲁、乌瓦尔[6]、米歇尔兄弟、巴斯提尔德[7]、马里昂和雷加米埃[8]。”来自瑞士的哈勒[9]及其追随者们取得了胜利，正如他们所预言的那样，经济开始滑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没有采用他们提出的经济法案。

拿破仑没有办法忍受这些人一夜暴富，占有巨额财富。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掠夺公共资产之流。高罗为雾月政变提供了经济支持，因为这件事，拿破仑一直觉得很羞愧。约瑟夫也是拿着高罗借给他的两百万法郎才攻克了莫尔丰坦[10]。他曾对自己的弟弟拿破仑说：“您拿着别人的钱当上了官，但高利贷的压力却压在了我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决定对银行家和供应商采取严苛的政策。为了制止他这种冲动，我和勒布伦费尽全力。拿破仑对国债知之甚少，但据说他有意在法国推行埃及、土耳其等东方国家那样的财政方针。不过这也需要范登堡这样的人才能展开工作。

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和谋职者们的小报告像雪片似的涌向第一执政，而我则成了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他鉴别这些言论的人——我每天都要面对成千上万的公安报告。针对那些棘手的言论，我会专门写一份报告以供执政官们商讨之用。为了能够为第一执政提供最全面的信息，这些特殊的报告非常频繁地进入他的视野。我坦诚地向第一执政汇报着所有的事实，因为我在这位将军身上看到了独一无二的执行力，只有他才能让各党派停止攻伐，只有他才能结束法国混乱的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将军身上有一股暴动的热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强大的控制欲。不过，我可以自豪地说，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经常可以用理智和谨慎来说服他。

那时，虽然西部莫尔比昂省[11]残留的保皇派还时不时地发起暴动，但国内已经没有可以公然与拿破仑抗衡的党派。在欧洲，拿破仑还算不得非常响亮的名字。我们的第一执政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用新的胜利，他才能奠定自己的地位，他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

法国才刚刚走出危机，国内一片萧条。虽然拿破仑的上台冲垮了无政府主义者，但其对保皇派的作用微乎其微，更何况，自从拿破仑上台以来，共和党也日渐衰落。在军事上，虽然法国刚刚在荷兰和瑞士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些胜利依然不能让我们重新恢复攻势。我们已经完全丢掉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地区[12]甚至已经开始释放奥地利战俘。

拿破仑并没有闲着。在外交部长的建议下，他巧妙地利用保罗一世的激情破坏了英俄联盟；接着，他又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披着和平外衣、实则十足挑衅的信。这样一来，一方面，我们的第一执政表达了他希望和平的诚意，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国王拒绝了这份诚意，那么他就有充足的理由向英国宣战，夺回和平以及法国需要的金钱、武器和军队。



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右四）与家人



乔治三世

某天，秘密议会会议结束后，拿破仑激动地对我说他准备在三个月后重新出征意大利。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夸大其词，但不久我就被说服了。和我一样，刚刚被任命为战事部长的卡诺也发现，在军事领域，拿破仑拥有最高发言权。后来，他对我说：“一听到我即将出征的消息后，西部省份的保皇派立刻就偃旗息鼓了。”那时，我确定，眼前的这个人不仅是战场上的天才，更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

治家。能辅佐这样一个人，我深感荣幸。

为了征服保皇派，我们决定引蛇出洞。于是，借助贝尼埃主教[(13)]和两位子爵夫人之口，我们宣布拿破仑正在努力地复辟波旁王朝，希望帮助波旁家族重登王位。这个消息传到身在米塔[(14)]的国王[(15)]那里后，他以为恢复王位的最佳时机到了，因此，他特意命他的密使孟德斯鸠主教[(16)]给勒布伦带去了一封信，并希望勒布伦能够将其转交给拿破仑。在这封信中，他用最优雅的语言表达了如下意思：对我来说，能够重新获得祖先的王冠是巨大的荣耀。这位亲王说："缺少了您的帮助，我在法国将无能为力；而离开了我，您也无法给法国带来幸福。所以，请您做决定吧……"

同时，身在伦敦的亚多亚伯爵派吉什夫人[(17)]前往巴黎，希望她能联系到约瑟芬，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通过自己的夫人与拿破仑谈判了。伯爵夫人吉什是一个集优雅与智慧于一身的贵族，约瑟芬则是保皇派的救星。她们开始会面后，我和约瑟芬约定，我将以每天一千法郎的报酬换取城堡里的消息。

虽然我并不清楚拿破仑本人的想法，但此事干系重大。坐不住的我开始想尽一切方法、动用一切手段来了解事态的进展。最后，我得知孟德斯鸠主教正在通过勒布伦采取行动。在报告中，我向第一执政汇报了此事。首先，我说了伯爵夫人吉什此行的目的，接着，我又明确地表明我对此事的态度。如果政府纵容这样的协商行为，那么人们可能会觉得第一执政想从中渔利。况且拿破仑这样一位仁厚的长官又怎么会看得上这么无聊的算计呢，除非是踩过他拿破仑的尸体，否则波旁王朝根本不可能复辟成功。

我之所以用心拟定这份报告，就是想通过它告诉拿破仑，一切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份报告给拿破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伯爵夫人吉什被勒令立刻返回伦敦，勒布伦也因为参与此事而受到责罚；从此以后，我在执政府的

地位变得稳固起来。

另一场战争悄然打响，这是一场铺满了鲜血的战争。4月25日，莫罗率部跨过莱茵河，到5月10日前，他三战三捷，三次挫败了奥地利人。5月16日到20日，在一次称得上汉尼拔[(18)]的行动中，拿破仑率领后备军穿过了大圣伯纳德山口[(19)]。当敌军得意扬扬地准备从瓦河和热那亚省攻入法国时，拿破仑率军穿过了奥斯特峡谷，攻入了米兰，占领了由梅拉斯[(20)]控制的奥军通信台。在大炮的掩护下，惊慌失措的奥军向塔纳罗河[(21)]和博尔米达[(22)]撤退。不过，虽然奥地利人屡战屡败，但他们依然英勇地向第一执政部所在的方向冲去，可我们的第一执政正率部从他们的后方赶来。

在决定生死的一战中，所有的人都焦躁不安。巴黎开始流言四起，保皇派和人民党更是蠢蠢欲动，就连温和的共和党人也坐不住了：在他们的眼中，冲锋陷阵的将军似乎并不适合带领国家走向自由和正义。这些心有积怨的人甚至希望这位将军就像当年的克伦威尔一样半路夭折，希望成长于战争的他也倒在战争中。

6月20日晚上，两个商人透露："6月14日，拿破仑部在亚历山大港受挫，不过战争仍在继续。"一瞬间，这则消息便传遍了朝野。得知这个消息后，突然之间，人们的内心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在什涅家、在库尔图瓦家、在斯塔尔家、在西哀士家，奔走着、聚会着、商议着。每个人都觉得，是时候另选一位开明的第一执政了，是时候挽救共和于危难之中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战事部长卡诺的身上。

得知战况不妙的同时，我也得知了朝堂上的暗流涌动，于是，我马上找到了另外两位执政官。见到这两位有些颓唐的执政官时，我尽力去鼓舞他们的士气。然而，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承认，我的大脑确实需要新的能量。我家里挤满了人，但那时的我只想见最亲近的人。筋疲力尽的我对他们说："这个消息有夸大的成分，因此，它很

有可能是一次投机。在战场上，拿破仑是战无不胜的，所以，请大家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不要轻信谣言。”

第二天，第一执政的信使带着胜利的消息抵达了巴黎，虽然某些人大失所望，但这一小部分人的失望被掩盖在了大多数人的狂喜之下。正如亚克兴战役一样，马伦哥之战巩固了执政府的权威。但如果说此前的拿破仑还是自由民族的第一执政的话，那么凯旋的他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甚至有人说，与其说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不如说他征服了法国。也正是从这时起，拿破仑开始了他持续十五年的辉煌独裁。在朝臣们的一片溢美之词中，我们看到，一位名叫罗德若的国务委员正在到处神话他的新主。在一张报纸上，他借用了维吉尔(23)的一句话：“上天所赐。”

虽然我提醒人们，对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过度的赞美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但那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根本无人思考我说的话。

7月2日晚上，胜利者凯旋了。

但一见到他，我就有了一种乌云密布的感觉。当晚，在他的办公室中，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大声说道：“好！有人认为我会失败，竟然谋划着组建新政府！……我都知道了……这些人的命都是我给的，是我救了这些人！他们觉得我是下一个路易十六吗？既然他们敢这样做，那我就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不会再糊涂了。败了一场，对于我来说就是胜了一场……什么也不怕的我会让这些没有良心的人、这些叛徒归于尘土的……我很清楚，即使没了这些人，我也知道该怎么拯救法国……”



马伦哥之战，拿破仑大获全胜



马伦哥之战中的拿破仑



马伦哥之战中的随军学者

我对他说：“当时，一些受了蛊惑的共和党人一时冲动，制造了一些谣言，但我马上便平息了这些流言。”说话的同时，我把当时提交给两位执政的报告复印件递给了他。那个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接受如此欢腾景象中的一点小小瑕疵。但他的回应却是：“您没有向我坦白一切。不是有人想要立卡诺为王吗？呵，这个家伙呀，果月18日之后，他只能维持两个月不到的局势，就差把这个人发配到锡纳马里了！……”

不过，我坚持认为，在这件事中，卡诺是无辜的，他完全不知道

那些别有用心的阴谋。然后，拿破仑便沉默了。但这件事并没有这么过去，拿破仑根本没有原谅卡诺，不久之后，他便迫使卡诺递交了辞呈，交出了战事部长一职。如果不是有勒布伦和冈巴塞雷斯这两位执政的证词，我恐怕也要离开公安部了。

局势越来越紧张，拿破仑的执政方式也越来越独断，同时，他也越来越怀疑那些他口中的顽固派。其实拿破仑口中的顽固派要么是坚定的人民党人，要么是为垂死的自由呼喊的共和党人。为了软化这些所谓的顽固派，我建议政府厚待这些人，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年金和重要的职务。

在金钱分配方面，我可能还能够插得上话，但在职位的分配上，我根本无能为力。我非常清楚，我们的第一执政并不想把重要的职位给共和党人，他所希望的是维持现在军方——或者是说支持绝对权力的人——在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我只有任命六七个行政长官的权力。

我们都清楚，拿破仑最担心的是那些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激进党人。在拿破仑看来，这些愤怒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政变。另外，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支持独裁的人——还时不时地添油加醋、火上浇油。我们这位第一执政越来越多疑。

在这里，我简单提一下这些支持独裁的人。他们是波尔达耶[24]、勒布伦、冈巴塞雷斯、克拉克、帕尼[25]、菲尔、杜塞[26]、乔莉佛[27]、比内[28]、艾美瑞、罗德若、克戴尔[29]、雷尼尔、夏波多[30]和杜弗兰[31]。

同时，第一执政还派人秘密监督舆论动向，我和我领导的公安部也未能幸免。当时，同样掌管着警力的内务部长吕西安对我有些不满，因为他的某些汇报政府中密谋活动的报告都被拿破仑驳回了，而他认为这是我从中作梗。

当时，我负责监控政府的所有动向，包括贵妇沙龙中的闲言碎语。而吕西安却以权谋私，和有夫之妇乱搞，贩卖种子出口许可……作为公安部长，我怎么可能不向第一执政忠实完整地汇报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呢？

在这样的政局前，大家可以猜想到我的艰难处境了吧。不过幸运的是，我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说约瑟芬，比如说拿破仑的一个私人秘书——他在秘密支持我，比如说杜洛克[32]——他没有反对我。拿破仑的那个私人秘书机智灵活且充满才干，熟悉拿破仑的所有文件。但因为贪财的毛病，不久之后，拿破仑便冷落了他。后来，这个秘书发现，我每个月都会花费十万法郎来刺探第一执政的一举一动，于是，他也想和我做同样的交换。找到我后，他提出，我每个月给他提供两万五千法郎，而他则向我提供拿破仑的所有信息。他还说，如果我能够一次性付清全年费用的话，他可以只收九万法郎。


波尔达耶


帕尼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掌握拿破仑的动向至关重要，因此，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并且按月向其支付两万五千法郎。从这个

人的口中，我获得了有关拿破仑的准确消息，而他也获得了我的庇护。

虽然这样一来，为了拿破仑的动向，我每个月都要花去我所有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但这个时候，我不仅可以从约瑟芬那里探听到拿破仑的消息，还可以通过这个人的消息来佐证我的判断。所以，虽然花费不菲，但我也因此而获得了最强大的情报支持。

当时针对我的是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有人指控我保护共和党人和政客，甚至有人说我派和我私教甚好的巴林将军去游说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并用金钱来收买这些人。但事实上，我只是在努力地打破这些阴谋，平息他们的怨恨，消除他们对第一执政的不满情绪。收到我的警告后，有些人甚至向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只是在用我的方法尽自己的责任，我认为，预防要比惩罚更有效。

但三人成虎，拿破仑还是开始怀疑我。不久之后，为了稀释我手中的权力，第一执政专门任命了一个人来监视“顽固派”。此人是路易·尼古拉·杜波瓦[(33)]，一个既贪婪又崇拜权力的人。在革命之前，他是一名法官，革命之后，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混进了中央机关。雾月18日之后，路易·尼古拉·杜波瓦被任命为警察长。

为了单独成立一个部门，他盯上了我的私人资金，后来更是以公安需要钱为借口，要求我分很大一部分给他。不过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以国家所不齿的方式来为自己牟利。

但不久之后，拿破仑分而治之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公安部被分成了四个职责明确的事务署：宪兵监察事务署、由杜洛克控制的城堡事务署、由路易·尼古拉·杜波瓦控制的行政事务署和由我控制的警务署。此后不久，我撤掉了内务公安。这样一来，我们的第一执政每天都可以收到四份公安报告，此外，他的密使还会提交私人报告：

这就是他口中所称的为共和国号脉。

虽然我为共和国所做的全部贡献都变成了别人攻击我的武器，但我们的第一执政拿破仑并没有听信这些人的言论。他说：“富歇做的这些事情是我对抗反革命分子的一道屏障，此外，在对付英国和朱安党人方面，没有人能比富歇做得更好了。”

此前，我似乎仅仅是拿破仑用来制衡他人的工具，但现在，我觉得我的作用不只这些，然而，公共事件和政治事件还是会影响到拿破仑对我的态度。

---

(1) 拿破仑与约瑟芬结婚不久，被派往意大利作战。约瑟芬与年轻英俊的骑兵中尉伊波利特·夏尔成为情人，拿破仑知道后对约瑟芬的感情逐渐变得冷淡。

(2) 恺撒勒斯（1758—1805），法国政治家，三级议会中贵族等级议员代表，被认为是国民制宪议会中口才最好的议员。在恐怖时期和督政府统治时期，恺撒勒斯离开法国。之后成为活跃的秘密间谍，路易十八最得力的参谋。

(3) 玛鲁埃（1740—1814），制宪议会议员，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

(4) 福若特伯爵（1766—1800），朱安党领袖。

(5) 阿尔芒（1767—1835），化学家、医生、商人、银行家。

(6) 乌瓦尔（1770—1846），法国金融家、拿破仑政府财团成员之一。在督政府时期，乌瓦尔在军火买卖中大发横财。史学家认为，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乌瓦尔向军队提供了假的皮质军鞋，成为拿破仑失败的原因之一。

(7) 巴斯提尔德（1768—1821），银行家，拿破仑政府财团之一。曾控制法国银行，1806年，巴斯提尔德银行宣布成为同雷加米埃银行一样重要的银行。后来，巴斯提尔德经营不善，晚景凄凉。

(8) 雷加米埃（1751—1830），银行家。

(9) 哈勒（1758—1823），瑞士伯尔尼人。

(10) 莫尔丰坦是法国默尔特-摩泽尔省的一个市镇，属于布里埃区维勒吕

普县。

(11) 莫尔比昂省是法国布列塔尼的一个省。这个省和阿摩尔滨海省、非尼斯泰尔省、伊勒-维莱纳省、大西洋卢瓦尔省四个省接壤。莫尔比昂省的布列塔尼语方言比较特殊，不能和其他地区的布列塔尼语通话。

(12) 亚平宁山脉，位于亚平宁半岛东侧，是亚平宁半岛的主干山脉，北起阿尔卑斯山南麓，南至亚平宁半岛南端，全长超过1000千米。全境属意大利管辖。

(13) 贝尼埃主教（1762—1806），奥尔良主教，西部保王党领袖。

(14) 米塔又叫叶尔加瓦，今拉脱维亚的一座城市。

(15) 这里指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795年，路易十七死于狱中，路易十八被奉为继承人。但1795年至1824年在位期间，他有一大段时间并未居住在法国国内，实际在位约十年，当中约三个月短暂流亡。

(16) 孟德斯鸠主教（1756—1832），1792年10月起义后，孟德斯鸠主教流亡至英国。热月9日返回巴黎后，加入保王党集团。

(17) 吉什夫人（1768—1803），路易十六王后的好友勃利夫人的长女。

(18) 汉尼拔·巴卡（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出生在巴卡家族。其生长的时代适逢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年少时随父哈米尔卡进军西班牙，并向父亲立下要终身与罗马为敌的誓言。他自小接受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现今仍为许多军事学家研究的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前216年，汉尼拔运筹帷幄，成功地以少胜多，击溃了由罗马执政官保卢斯统领的大军，此战成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史称“坎尼会战”。

(19) 大圣伯纳德山口是迄今跨越西阿尔卑斯山最古老的山口，那里目前仍然能够看到上溯至青铜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罗马时代的羊肠小道和拿破仑军队1800年进入意大利时使用的道路。

(20) 米歇尔·冯·梅拉斯（1729—1806），神圣罗马帝国将军。在马伦哥会战中，曾指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

(21) 塔纳罗河位于意大利西北部，发源于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最终在巴西尼亚纳注入波河，全长276千米。

(22) 博尔米达是意大利萨沃纳省的一个市镇。

(23) 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前70——前19），也就是维吉尔，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其作品有《牧歌集》《农事诗》《埃涅阿斯纪》三部杰作。《维吉尔附录》可能也是他的作品。因在《牧歌集》中预言耶稣诞生被基督教奉为圣人。《埃涅阿斯纪》影响了包括贺拉斯、但丁和莎士比亚等许多诗人与作家。《埃涅阿斯纪》在中世纪被当作占卜的圣书，由此衍生出“维吉尔卦”。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尔也曾作为但丁的保护者和老师出现。

(24) 波尔达耶（1778—1858），19世纪法国外交官、政治家、法官。

(25) 帕尼（1756—1834），军人、政治家。曾担任拿破仑帝国大臣。

(26) 杜塞（1751—1844），政治家，七月王朝统治时被封为法国贵族。

(27) 乔莉佛（1753—1818），政治家。

(28) 比内（1749—1802），政治家。雾月政变后，向拿破仑集团靠拢，曾负责杜伊勒里宫的安保工作。

(29) 克戴尔（1747—1809），曾担任拿破仑内务大臣。担任内务大臣期间，主持了巴黎的改建工作。

(30) 夏波多（1756—1832），化学家、医生、政治家。改良了盐酸的生产流程。曾担任拿破仑内务大臣。

(31) 杜弗兰（1736—1801），雾月政变后，担任国库总负责人。

(32) 杜洛克（1772—1813），拿破仑贴身大元帅，在包岑会战中立下大功。他被称为“拿破仑的影子”。

(33) 路易·尼古拉·杜波瓦（1758—1847），法官，第一任巴黎警察局长。

第10章　拿破仑地位的稳固

精彩看点

军政府地位的加强——共和党人的不满——马尔梅松城堡暗杀——阿海尔的供认——吕西安提议建立君主立宪制——拿破仑和吕西安的争执——吕西安出任西班牙大使——保皇党的阴谋——设局尼凯斯街——流放“雅各宾党人”——保皇党和雅各宾派的合作——莫罗在意大利战场大获全胜——粉碎第二次反法同盟——第一执政官的地位稳固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和平即将到来。马伦哥之战后，执政府开始真正掌握大权，在征服了皮埃蒙特、热那亚和伦巴第之后，执政府又立刻颁布了军事宪法。后来，当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各项职能都恢复后，拿破仑便离开了米兰。攻克慕尼黑之后，莫罗率部向维也纳挺进。迫于形势，奥地利人求和了，他们希望法国不要向德意志扩军。莫罗同意了该请求，7月15日，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和约。

虽然捷报频传，但在巴黎，共和党人的不满情绪却越来越严重，拿破仑专制的作风让他到处树敌。在军队内部，共和思想也开始抬头，反对派都开始秘密互动，一些士官和上校也加入了密谋。这些人吹嘘说贝纳多特、儒尔当、奥热罗、布律纳将军等人都加入了他们，甚至莫罗也后悔他之前支持拿破仑上台的行为。实际上，虽然没有任何看得见的迹象表明有人在密谋造反，但在那些蛛丝马迹前，我们的第一执政坐不住了。

巴黎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反对派的行动也更加明显。最后，第一执政把那些最激进的人调离了重要岗位，并且派人暗中监视他们。其实，自从三人执政的执政府成立以来，那些秘密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而我的工作重心就在于阻止这些人的活动，当然，客观上我的行为也让执政府放慢了对他们采取激进措施的进程。后来，我们的第一执政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共和思想，比如说，在7月14日的国庆招待会上，第一执政向前来赴宴的人举杯，并献上了这样一句祝酒词：“主权在民，为了伟大的法国人民干杯！”

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内线我得知，在拿破仑前往意大利之前，激进派确实计划在巴黎附近暗杀他。当他凯旋后，这些计划便落空了。在那些秘密会议中，也有人提议在法兰西喜剧院[1]暗杀拿破仑。不过幸运的是，在我和让·拉纳的努力下，这些阴谋都没有得逞。然而，即便我们挫败了一个暗杀计划，那些人也会密谋另外的暗杀计划。这些人的生活很不如意，难以驯服，想长期控制他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不久之后，我得知，昂里奥的前助理儒尔诺与二十多个激进分子合谋，计划在马尔梅松[2]刺杀拿破仑。虽然我们认为菲雍、杜福尔和罗希诺是主谋，塔罗[3]和莱涅罗是他们幕后的指使人，而在塔罗和莱涅罗身后更是存在着一个坚定、活跃但从未现身过的笔杆子梅特格，但当时的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9月中旬，我们得到内线举报，得知有人密谋在大剧院暗杀第一执政。于是，我下令逮捕了罗希诺等嫌疑人，但因为没有审讯出任何结果，所以我接到了释放他们的命令。不过，那个命令同时命我派人暗中监视他们，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

十五天后，我们再次阻止了一起暗杀活动。阿海尔是这次暗杀行动[4]的同伙，此人以为举报可以得到很大的奖赏，所以他向第一执政的秘书布里安[5]告密了。受到传讯的阿海尔立刻供出了自己所有的同伙，据他的交代，参与此次暗杀活动的人有罗马难民赛哈市和笛安纳，公开反对第一执政的科西嘉议员的兄弟阿瑞纳，狂热的爱国者画家多笔诺，与巴亥关系亲密的德梅尔。



宏伟的法兰西喜剧院



法兰西喜剧院的内景

这件事给我招致了无数的指责和非难。面对这样的言论，我对第一执政说道："执政官将军，如果您不相信这个人的供认的话，您可以传讯公安部的任何人前来对质。毫无疑问，确实有人在密谋暗杀您，得知此事后，我也调查了这些人的动机。现在，我可以请您传讯向我报告消息的人，我们当堂对质。"

听完我的话后，拿破仑用友好的语气回应道："好，那就叫他来吧，你和让·拉纳将军一起商议此事吧。"

为了引出真正的反对分子，第一执政决定将计就计，由阿海尔设局，主动发起一个以暗杀自己为目的的行动，并且假装自己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把该行动的时间定在10月4日晚上，那时，拿破仑会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奥拉斯[(6)]的演出。阿海尔承诺说到时候会有四人落网。

在一次秘密议会中，拿破仑谈到了隐藏在自己周围的危险，无政府主义者和居心叵测的政客们的阴谋，还有那些宣扬共和精神的愤怒的共和党人的密谋。接着，他又说到了卡诺，开始指责卡诺和革命党人的关系，并且说卡诺的性格太狂野。吕西安·波拿巴也持同样的观

点，不过在表达同样的观点时，这个人的措辞更加狡诈。

他提到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曾以当前的局势为理由，建议他撤掉卡诺的战事部长。而所谓当前的局势，是卡诺曾经为共和党人出头，指责第一执政过于宽容保皇派，指责第一执政在执政府中大讲排场，并且约瑟芬的作风也大有王后的派头。第二天，在我的建议下，卡诺递交了辞呈。

10月4日，在法兰西喜剧院，提前设计好的谋杀“大戏”开始了。真正的反对分子出手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警察立刻冲了出来，抓获了赛哈市、笛安纳以及他们的同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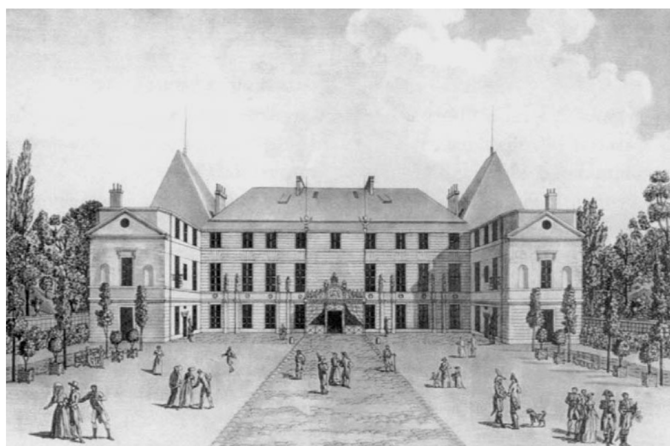
这件事反响很大，而这也正是拿破仑的用意。得知此事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立刻找到拿破仑，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躲过这次灾难。在主席台上，拿破仑说自己并没什么事，当时正好有一组随行的贴身侍卫跟着他……

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该怎么面对他的目光呢！

我马上提议加强防范措施，尤其要严格检查从巴黎到马尔梅松这一段路，为了排除所有隐患，我们需要彻底地搜查路上那些零星的房屋。这些指示相当于双倍加强了警力，负责城堡的警卫力量也得到了加强，靠近国家领导人不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

一般来说，所有的新政府都会利用一些自编自导的暗杀事件来加强自己的管理，而我们的第一执政也本能地采用了这种管理方式。当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的兄弟吕西安·波拿巴功不可没。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吕西安·波拿巴这个人有着和拿破仑一样的野心。他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在有意无意地挑战拿破仑的权威，但他还是经常提及自己雾月18日中的功劳，后来更是想在政府中掌握更大的权力。本来，他是希望拿破仑成立一种二人专政政府的，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和拿破仑一起主政了，更确切地说，是他负责国内事务。然而，专断的第

一执政是不会同意任何权力分享的行为的。更加微妙的是，在多次争取利益未果后，吕西安·波拿巴发现自己在执政府的地位开始慢慢下降，所以，他正在寻找一切途径来恢复自己在执政府中的影响力。于是，这次暗杀行动结束后，吕西安开始向他的兄弟拿破仑夸张地描述共和党人的威胁，所以就提议拿破仑建立君主立宪制并由他来担任首相。我明确反对这种不可行的方案，而且我也知道，即使第一执政非常迫切地想要确认自己的地位，他也不会同意这样的方案。



19世纪初的马尔梅松城堡

但吕西安·波拿巴却认为自己的兄弟拿破仑默认了自己的提议。于是，他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并且让人秘密地撰写了一份宣扬君主制原因和原则的文件——克伦威尔、蒙克和拿破仑之路。在执政府中，这份宣传册流传广泛；吕西安·波拿巴的办公室中同样储备了大量的宣传册，其数目应该和分发给各层级政府官员的数目一样多。

通过邮政局，这些宣传册发送到了各个地区的政府工作人员手中，虽然它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指示，但派送的地址、部长的信件以及别的标志都表明了这样的宣传大有深意。

在吕西安·波拿巴不知情的情况下，当天，我也拿到了这份文件。我马上赶到马尔梅松，找到拿破仑给他看了那份宣传册。接着，我明

确指出了这种行为的不妥之处和它背后的用意。我对拿破仑说：“跟随您征战多年的将士们大多认为是革命造就了自己，并且他们的心中还一直怀着共和的理想，因此，他们对您的依附感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强烈。如果我们就这样向这些人宣布我们即将建立君主制国家，那么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次革命不过是又一次的篡权。”最后，我再次重申了扩散这份文书的危险性，要求马上停止这种行为。

取得拿破仑的同意后，我立刻下令停止扩散该文件，并且为了更有效地消除它对政府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的部长信件里，我把它定义为一件可耻而有罪的事情。暴怒的吕西安·波拿巴认为我没有权利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用这样的词语诋毁他，因此，他也来到了马尔梅松。虽然他来此是为了告状，但正是从那时起，他们两兄弟间的争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终于有一天，在一次激烈的争论后，吕西安·波拿巴赌气地向他的兄弟拿破仑递交了辞呈，他说相比于和这样专制的人共事，他宁愿辞去所有公共职务。而被激怒的拿破仑也命人把“这个公民”请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无论是从理智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团结的角度来考虑，这两兄弟都不适合继续共事了。最后，我和塔列朗总算妥当地分开了两人。不久之后，肩负着让西班牙国王对葡萄牙宣战使命的吕西安·波拿巴出任了马德里大使，而对于这个依附于英国的小国，拿破仑早就嗤之以鼻了。

吕西安·波拿巴即将离开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各种私人场合和沙龙里，好事者嘀咕着，说此事与我有关。还有人说，这样一来，在政府中以约瑟芬为首的一派将更占上风，将压过以拿破仑兄弟为首的一派。

我当然希望国家权力能够更加集中，以结束法国长久以来的混乱局势，那么，比起专断的、想和自己兄弟分而治之的吕西安·波拿巴，我则更倾向于约瑟芬这种温和派。

在巴黎，当圣于连伯爵以奥地利国王的名义与法国签署和平条约时，这位“国王”也刚刚和英国签订了津贴条款，在和平与金钱之间，维也纳政府再次勇敢地抛掷命运的骰子——撕毁和平条约。圣于连伯爵以僭越国王权力的罪名锒铛入狱，停战协定也就此告吹，但考虑到需要一段时间来重整士气，停战协定一直延续到了12月。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需要同时面对与葡萄牙以及奥地利的战争，驻奥地利大使以及奥地利政府都渴望和平，而和平只能指望莫罗在此战中的表现了。

从战略上来看，在军功方面，莫罗是唯一一个能和拿破仑相抗衡的人。因此，拿破仑早就对立下赫赫战功的莫罗心怀芥蒂，所以，对拿破仑来说，莫罗的胜利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但目前，国内出现了令拿破仑更头疼的情况：各种政党——包括保皇派的人——都把拿破仑当作他们共同的敌人。这段时间里，拿破仑要面对来自激进分子的威胁，两股势力同时谋划着暗杀他。10月底，这些死灰复燃的人又开始策划新的暗杀计划。我发现，这一次，他们灵活地避开了公安部门所有的监测，因此，我简短地向第一执政汇报了这场完全处于暗中筹划的危险活动。有时，他们会在信奉基督教的酒水老板家密谋活动安排，有时，他们会把密谋地点安排在凡尔赛宫，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出没于旱金莲公园。这些人甚至还成立了临时政府！

戒备森严的警力没能遏制这些人的叛乱，反而刺激了他们狂热冲动的神经，那些想要快速了结拿破仑性命的人决定铤而走险。[(7)]被称作“骑士”的人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此人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在默东[(8)]的一家火药作坊里，他研究出了一种威力巨大的火药。之后，他计划把这些火药放进某个容器里，再将其埋在拿破仑的必经之路上。在他同谋的鼓励下，或者说在自己信仰的鼓舞下，这个人和一个被称作瓦尔塞的人一起研制了一种里面注有火药、外面围有铁片和钉子的

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上还牢牢地绑着一块改良后的电池，这样一来，只要溅上火星，这个秘密武器就会爆炸。

行动秘密地推进着，所有密谋者都迫不及待地想用这个“地狱武器”炸死那个“小伍长”（他们给拿破仑起的外号）。这一伙以“骑士”为首的亡命之徒甚至决定，在暗杀拿破仑之前，他们进行一次排练。10月17日晚上，这场暗杀的主谋们躲在硝石矿后面默默观察着预演。他们认为，有硝石矿作为掩护，他们都是安全的。果然不出所料，秘密武器的威力非常惊人。不过这次预演之后，暗杀者的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认为这种威力无穷的秘密武器绝对能让他们的计划大获成功；但另一派人则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杀掉拿破仑，而这样杀伤力巨大的秘密武器势必会伤及无辜。经过一番思考与争论后，持后一种观点的“骑士”决定放弃把炸弹安装在第一执政观看演出的车上的想法，转而着手改良这种秘密武器。

不过，那晚的爆炸已然引起了我的注意，越来越多的秘密文件提到，有些人准备用一种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来暗杀“小伍长”。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我认为“骑士”就是制造这个杀人武器的主谋。11月8日，在布朗克大街，他和他的同伙瓦尔塞被抓获，同时，政府也逮捕了与此事相关的所有嫌疑人。警察查获了他们使用的火药、子弹、第一台秘密武器的残骸和改进版本的草图。总而言之，我们查获了他们所有的作案工具。然而，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供认他们的犯罪意图。

抓获这些人后，威胁拿破仑生命安全的危险终于去除了，然而，另一派的反对党却希望从这些人手里拿到这种致命的秘密武器，继续他们的行动。虽然这种想法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刚开始的时候，乔治[9]这个布列塔尼地区最顽固的反对派领袖之一，这个握有布列塔尼地区所有军备力量的人从伦敦出发，登陆莫尔比昂，准备在那里发动一场新的军事行动。他把这次行动的权力暂时

下放给了几个主要的中尉，即麦卡锡·旺代[10]、巴赫、格瑞索和吉约姆[11]。因为这次行动还牵扯到其他各省，所以他们需要依靠信件和内线来协调活动。因为这个原因，我掌握了整个计划的行动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些蛛丝马迹。于是，我采取了紧急措施，立刻派人去西部，同时还派人监视并逮捕了像危险的郊区队长这种具有重大嫌疑的头目。不过，公安部的行动或多或少会都受到外交部的制约。在给身在米兰的第一执政写信时，我并没有提及这次危机的具体细节，但我告诉他，一旦取得胜利，我希望他能立刻返回巴黎，处理现在政府中的危机。

正如我们所见，马伦哥之战不仅没有给拿破仑带来任何伤害，反而给他带来了无上荣耀。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打乱了英国的所有计划，也扑灭了乔治的所有幻想，但“不屈不挠”的乔治并没有因此而罢休。凭借着莫尔比昂还未被摧毁的王室势力，他继续待在“自己的”地盘里，并通过内线得知了巴黎人民党正在不停地谋划着新的暗杀行动。于是，10月底的时候，他派自己的亲信里姆罗、圣瑞昂、华西和希拉里前往巴黎，这个人似乎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从雅各宾派的人手里拿到这种秘密武器，以推行新的暗杀计划。即使这个暗杀计划失败了，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也会认为这场保皇派策划的暗杀行动是雅各宾派的行为；如果这个暗杀计划成功了，那么保皇派的人便会上前摘取胜利果实。这个看起来万无一失的计划就是雪月4日（12月24日）暗杀案的起源！最开始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怀疑保皇派，所有的人都在怀疑无政府主义者。

12月24日终于来临了，巴黎上下都知道第一执政和政府高官一定会列席喜剧院，观看剧目《创世纪》。乔治的代理人决定在拿破仑前往剧院的路上安放“地狱武器”，送他和他的精英们上天。我们得到消息称，圣瑞让会把这个秘密武器安放在拿破仑必经的尼凯斯大街上，并且在预计的时间点火。在这里引发如此恐怖的事件，这真是难以置信！他们还按照第一执政的日常速度，精确地计算好了爆炸的波及范

围、火芯的燃烧速度、火药的威力。



乔治



吉约姆

在案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各警察局都收到了第二天将会有暗杀行动的消息，但这些消息非常空洞，况且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警报。不过，在每日公安报告中，敏锐的第一执政同样看到了这一条消息。刚开始的时候，他很犹豫，但在收到城堡护卫队的安全确认后，他决定第二天带着自己的贴身护卫前往喜剧院，这基本可以认为是带着盔甲出行的恺撒。我们知道，只要雅各宾派的暗杀有一丝差池，行动就将落空。而这一天，在前往剧院的路上，微醺的车夫比平常的速度快了两秒，而正是这两秒救了拿破仑的命，且再次巩固了他的地位。在恐怖的爆炸声中，对这次暗杀行动早有准备的拿破仑大喊："这就是那个地狱武器！"

虽然遭到埋伏的拿破仑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剧院，不过可想而知，他的脸色有多难看，那多疑的脑袋里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拿破仑遇刺的消息迅速传开了：所有与他有紧密利益相关的人——部长们、拍马屁的人们、执政官的亲信们——立刻来到了他的身边，蜂拥

而上地声讨肇事者。在演出结束，回杜伊勒里宫的路上，这些人浩浩荡荡地紧紧跟随着拿破仑的马车。当我满头大汗地赶到那里时，我只感到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敌意，对此已有心理准备的我不能被这群人吓倒。

拿破仑怒气冲冲地走向我：“好！这一次，您还是要说这是保皇派所为吗？”

我冷静地回应道：“很有可能，他们的嫌疑最大，稍后我会提供证据的。”

我的回答让人们震惊，但第一执政官用更加尖锐的语气质疑我，在他看来，这次行动绝对是公安部门没有及时镇压雅各宾派导致的。

我大声回应道：“不，这绝对是保皇派和朱安党人所为，给我一周的时间，我会拿出证据的！”

在得到一些肯定后，为了澄清我的立场，我继续向拿破仑汇报公安部门近期的工作和各个分局的职责。我提到，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雅各宾派的这种趋势应该得到遏制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已经散掉的雅各宾派人身上是多么错误的行为，而那些蠢蠢欲动的英国代理人、海外流亡贵族和朱安党人正在巴黎伺机而动。我坚信，不出一个星期，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

幸运的是，我用两千金路易便换来了乔治代理人的所有秘密！沿着他们提供的线索，我发现，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和第二天，有八十多位身负任务的朱安党人领袖从各地偷偷赶来巴黎，但不是所有人都知晓将有爆炸事件。几天之内，越来越多的线索让我迅速查清了事情的主谋，那些恶意的揣测不得不闭上了嘴。

我很快就发现，这次刺杀激化了拿破仑独裁的想法，而他的亲信们也在为此积极地活动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流放首都最激进的政客

和无政府人士，确定名单的事情又一次落在了我的肩上。在民意的压力下，参议会尽全力为这些人提供庇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划掉了在名单上的四十个名字——不然的话，这些人将被流放到非洲。接着，我又控制了这次流放的范围，将其改为在巴黎外的监视流放。

最开始的时候，这次残忍的流放行动是针对查理[12]、菲利斯[13]、舒得勒[14]、塔罗、德斯这些让拿破仑深感头疼的人的，后来，它扩大到了所有雅各宾派中的激进党人。

在批准流放法令的过程中，第一执政认为宪法委员会的程序复杂、效率低下，因此，他要求组建更高效的立法机关。于是，在内阁中，有人建议成立一种类似特别法的法律保障组织——它是不需要传讯，不需要陪审团，也不需要斟酌修订的特殊机构。但我认为，我们至少需要明确这次流放的范围，并且确保被流放者在流放途中的人身安全。

很快，在1月7日，第一执政下令，停止当天所有的邮递服务。当天晚上，拿破仑派一支仅有六人的押送队押送这批人前往非洲，然而，在途中，押送队遭到了朱安党人游击队的袭击。

在同一时期，恶名远扬的“老司机”团伙也在各地肆虐。因此，政府认为自己处在危机重重的环境下，他们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惩罚谋反者。

“骑士”和瓦尔塞因发明了“地狱武器”而被判处死刑，梅特格、航博和希贝尔也被判处死刑，他们的罪名是试图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在刑事法庭，阿瑞纳、赛哈市、多笔诺和德梅尔接受法律的审问，虽然那里的陪审团机制为他们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因为当时极端的政治环境，他们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这次爆炸事件之前，任何一个法庭都不能够仅仅依靠阿海尔德的口供就判处他们死刑。

之后，法庭开始处理与雪月3日爆炸事件相关的诉讼。卡邦和圣瑞昂也被判处死刑：卡邦负责购买放置“地狱武器”的车马，并同圣瑞昂一起把车马交给了护卫队，他们还一起准备了弹药；圣瑞昂负责点火，在点火的时候，他还被炸伤。

这些暗杀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同派别的作案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的仇恨让这几派人联合起来去攻克同一个难题，而雅各宾派想要杀掉拿破仑的动机恰巧成为保皇派可以利用的地方。

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鲜血浇灭了敌人谋逆的激情，拿破仑的权威也渐渐得到了巩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战场上，莫罗率军攻向德意志，在霍亨灵顿[(15)]大获全胜。当时，他对着将士们喊道：“朋友们，我们赢得了和平！”

不到二十天的时间，莫罗就攻克了八十里[(16)]具有争议的土地，闯过了因河[(17)]防线、萨拉防线、特劳恩[(18)]防线、昂镇防线，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距维也纳二十里的地方，并且击溃了唯一一支有能力抵抗的奥地利军队。在施泰尔，我方和奥地利重新签订了休战协定。迫于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同意奥地利退出联盟条约，与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意味着，英国人认为拿破仑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而莫罗则是为了和平而战。从此，竞争像一颗定时炸弹深埋在了两位大将的心中，事实上，两人迥异的性格，以及他们对共和精神的不同理解，迟早都会让他们分道扬镳。



莫罗将军大获全胜

在巴黎，关于修订法律，即建立一个半司法半军方的机构以适应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五百人院沸腾了，对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这项法案是对自由的极大侵犯。伊斯纳尔[19]、本杰明[20]、达努、舍尼埃、吉克内[21]和巴约勒被认为是共和国最后的斗士，他们与政府的这项提案做着最后的抗争。

政府发言人回应称，当前的社会秩序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越过法律控制范围的犯罪组织正在侵蚀我们国家的根基，因此，现行法律已经不能够适应严峻的现实形势。围绕这个法案，政府上下一共展开了七场激烈的讨论。在政府的威权下，议会通过了仅以微弱优势领先的法案，它使政府能够调离所有疑似威胁到政府存在的人，这也意味着警察专政的开始。有人猜测我将成为尼禄手下的塞昂努斯[22]，承担第一执政的所有任务。

现在，第一执政拥有了合法的独裁权，可以任意流放或者处死政敌，这样的执政方式无疑是宣告，执政府将依靠纯粹的武力来治理国家，但它可以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这么多年的征战之后，法国总算暂时迎来了和平！

(1) 法兰西喜剧院是法国的一个国立剧团，建于1680年。

(2) 马尔梅松是位于法国吕埃马尔梅松的一座城堡。曾是拿破仑妻子约瑟芬居住的地方。1800年至1802年，马尔梅松城堡和杜伊勒里宫都是法国政府所在地。现在这座城堡是一座博物馆。

(3) 塔罗（1755—1828），法国著名军事、政治家。因反对雾月政变、抵抗执政府而被列入追捕名单。

(4) 这里指剧院阴谋。1800年10月10日，一起针对拿破仑的暗杀活动。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约瑟夫·富歇及时阻止了这场阴谋。暗杀行动成员之一阿海尔向警方供出了自己的同谋，然后与警方一道破坏了这起暗杀行动。阿海尔向警方交代其同伙有公开反对第一执政的科西嘉议员的兄弟阿瑞纳等。

(5) 布里安（1769—1834），外交官、政治家。1785年，布里安和拿破仑一起进入香槟军事学校学习，成为私交好友。1801年，在拿破仑远征意大利之时，布里安受到重用，成为国务委员。同年，由于参与走私而被革职。

(6) 蒂托·李维（前64或前59—17），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过多部哲学和诗歌著作，著有《罗马史》。根据他的叙述，罗马和阿尔巴朗格大战期间，三个奥拉斯人和三个古瑞阿斯人决战。后来，这个典故成为众多文学创作的来源。

(7) 尼凯斯街暗杀又称“地狱武器暗杀”。1800年12月24日，保王党人针对拿破仑发起的暗杀发动。

(8) 默东是法国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的一个市镇，属于布洛涅-比扬古县。

(9) 乔治·卡杜达尔（1771—1804），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是朱安党人的重要领袖。拿破仑·波拿巴钦佩他的才能与充沛的精力，希望以丰厚的待遇拉拢他，但被他拒绝了。1800年以后，拿破仑的政权已经稳固，卡杜达尔认为已不再适合发动战争，于是将主要精力转到策划阴谋之上。他间接参与了暗杀拿破仑的尼凯斯街爆炸案，失败后逃往英国避难。

(10) 麦卡锡·旺代（1774—1801），法国大革命期间朱安党人的领袖。

(11) 吉约姆（1759—1805），法国大革命期间朱安党人的领袖。

(12) 查理（1752—1821），来自亨斯家族的将领。

(13) 菲利斯（1767—1837），革命者、雅各宾派有影响力的成员。

(14) 舒得勒（1761—1838），政治家、制宪议会成员。尼凯斯街暗杀行动之后，被执政府列入流放名单。

(15) 1800年12月3日，由莫罗率领的法国军队在霍亨灵顿大败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奥地利被迫向法国求和，这标志着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崩溃。

(16) 这里是法国里。一法国里约等于四千米

(17) 因河是多瑙河的支流，流经瑞士、奥地利和德国。

(18) 特劳恩是位于今奥地利北部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城市。

(19) 伊斯纳尔（1758—1825），吉伦特派政治家。

(20) 本杰明·康斯坦（1767—1830），出生于瑞士洛桑的法国小说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心理主义小说（Adolphe）闻名。发表政治评论、宗教评论等，从事政治活动，为拿破仑一世起草了帝国宪法附加法。

(21) 吉内克（1748—1816），作家、诗人、政治家。曾是立法评议委员会成员。

(22) 塞昂努斯（前20—31），尼禄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官员之一。曾先后担任近卫军司令及执政官等职位。后因为被人告发夺权篡位，被尼禄处死。

第11章　法俄秘密联手

精彩看点

签订《吕内维尔条约》——G夫人与拿破仑——G夫人出逃俄国——保罗一世遇刺——召回贝纳多特——拿破仑与贝纳多特和解——英国与法国为敌的立场动摇——西班牙军队攻克阿连特茹——法军进入葡萄牙——吕西安在葡萄牙受贿——《亚眠和约》——英法和解——埃及战场败退——法俄秘密联手——秘密联手事件暴露

意大利还有一些遗留事务，马塞纳以共和党嫌疑人的罪名被召回，8月份，布律纳接替了他的职务。然而，在第戎时，布律纳也同样被怀疑了。为了能够让布律纳官复原职，我尽力减轻了一些对他的控告。无论如何，布律纳都攻克了托斯卡纳，并且收缴了里窝那[(1)]和所有英国人的财产。

在保罗一世的恳求下，拿破仑考虑让缪拉停止向那不勒斯进军，集中精力征服两西西里王国。根据我方和那不勒斯签订的条约，在大布列塔尼和奥斯曼帝国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前，法国可派四千驻军驻扎在阿布鲁佐[(2)]的北部，奥特朗托[(3)]半岛方圆十二里之内。在秘密议会中，我是第一个就此秘密条约发表看法的人：在阿布鲁佐驻军意味着，只要时机合适，法国便可以出兵埃及、达尔马提亚和希腊。

1801年，经过四天的谈判，在吕内维尔[(4)]，法国和奥地利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条约规定：奥地利需要履行早前《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之决定；奥地利须放弃德意志的一些占领地，放弃从赫尔维蒂到巴达维亚所有土地的主权；法国的势力范围延伸至莱茵河左岸，以阿迪杰河为界；奥地利和意大利共享威尼斯大区。这样一来，赫尔维蒂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以及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地位都得到了保证。但《吕内维尔和约》[(5)]大获全胜之际，第一执政没有发来任何回应。

欧洲终于迎来了和平！《吕内维尔条约》规定了奥地利和日耳曼帝国[(6)]的领土界限，经过双方议会的讨论后，该条约正式施行。整个事件中，外交部长灵活的外交手段确实为第一执政增色不少，但平心而论，拿破仑也有些不悦，因为英国某些报纸宣扬他是在塔列朗的主张下行事的。

我不断地提醒他，如果政府的工作有失公允，那么这样的政府是没法长久的。对于拿破仑来说，他需要消解长期征战带给他的多疑和

坚硬的性格，只有用宽容的、受人欢迎的策略去治理国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但想要让一位历经革命洗礼、身居高位的独裁者变成一位强大又宽容的领袖又谈何容易呢？

拿破仑的内心充满了警觉、仇恨和报复，他越来越倾向于在国内建立残酷专政，而这正是我竭力抵制的事情。从私人感情上讲，我无比敬重这个人，只有他具有如此坚定和不屈不饶的性格，只有他能够排除不同党派间的异见，在军队和国内事务中带领法国走出泥潭。我甚至可以自信地说，在一些过分暴力的事件上，我都尽力劝他采用了更温和的处理方式。



为纪念《吕内维尔条约》而铸造的带有拿破仑头像的纪念币

还有一些人想通过女人来俘获这颗坚硬的心，因为拿破仑根本无法抵挡充满魅力的女性。当然这些人绝对不能做出有损法国利益的事。但此事的发展出乎意料。

在最后一次经过米兰时，拿破仑曾被女歌手G夫人的美貌，或者说她动人的声音所打动，因此，他便派贝尔西耶前往劝说G夫人，希望她能前往巴黎。为了打动她的心，拿破仑为她准备了丰厚的礼物。最后，G夫人坐着贝尔西耶的专车来到了巴黎。在每月一万五千法郎的丰厚酬金下，这位夫人美妙的歌声回荡在杜伊勒里宫的各场演出上。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拿破仑不想让醋意大发的约瑟芬起疑心。因

此，他只能偶尔拜访G夫人。但这种没有关爱和激情的爱根本满足不了这位充满青春活力、渴望疯狂爱情的G夫人。于是，她转而投向了当时有名的小提琴家皮尔·罗德[(7)]的怀抱。沉浸在爱情里的罗德也失去了分寸，开始挑战贝尔西耶的监控。有一天，拿破仑对我说，机警的我竟然还忽视了一些事情。

我回答道："对，我是忽视了一些事情，但现在我知道了。比如，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经常在晚上，带着一个贴身侍卫，从杜伊勒里宫的偏门出去，坐上一辆密闭的马车前往G夫人家……而这个人就是您。不过这位G夫人现在和小提琴手罗德有染。"

听到这些话，第一执政转过身去，沉默了一会儿，我则静静退了出去。

一位副官被派去给这位不贞的G夫人当监护人，感觉受到侮辱的G夫人坚决不服从这种后宫制度。那些人原本以为，失去了所有宠爱的G夫人会屈从，但同样沉溺于爱情的她不为所动，根本不理会贝尔西耶提出的优越条件，最后，她被赶出了巴黎。一开始，她和自己的爱人躲在周围的村子里，后来，两人一起逃到了俄国。



皮尔·罗德

有人说，对第一执政来讲，战争就是全部。但我把这个人推向了世界，让他懂得需要用冷静、和平与艺术来治理整个帝国，但他不仅想给欧洲大陆带来和平，还想让英国俯首称臣。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英国这个一直以来的对手便倾尽全力围剿法国。综观欧洲全局，这两个财富和实力相当的大国的确水火不容。

第一执政和他的私人内阁首先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先在国内建立起和平，再向英国发起挑战；还是先让英国俯首称臣，再在国内建立和平？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国内

的安宁最多算是一种暂时的休战。

《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基本处于防守劣势。我们的精锐部队就驻守在英国的对岸，法国和西班牙的军舰聚集在布雷斯特港口[8]，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海军跃跃欲试，准备以布伦港口为主要进攻口。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全力备战，他们封锁了所有的港口，密切注意着我们的任何风吹草动。

保罗一世率领的北方舰队也对英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威胁。他曾经旗帜鲜明地说过，他的目标就是要解除英国这个海上霸主的各种条款。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次对英国的战争中，第一执政多么想和保罗一世保持一致的步调，加入到他率领的海上舰队中。所以，那时，政府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赢得保罗一世的关注，以动员俄国人加入战争，同时也尽力拉拢丹麦和瑞典出兵。

普鲁士关闭了易北河[9]、威悉河[10]和埃姆斯河[11]的口岸，占领了汉诺威，英国人知道除了开战之外，他们已别无他计。海军上将海德帕克[12]和尼尔森[13]率领一支精锐部队奇袭了波罗的海，因防守不力，丹麦和瑞典失去了桑德海湾[14]，转而防守哥本哈根。4月2日，英国海军更是在哥本哈根战役中大获全胜。

而十一天前，就在3月22日，在圣彼斯堡的皇宫里，骄纵的保罗一世被刺身亡。这件事情改变了整个局势！我从一位外国银行家那里得知了这个噩耗，当我来到杜伊勒里宫时，刚刚接到消息的第一执政手里紧紧捏着急件："什么？这么多护卫都保证不了一个皇帝的安全！"

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冈巴塞雷斯以及其他几位要员赶紧劝说他，这种事情也只可能发生在俄国，欧洲中部地区从来不会发生这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但我们的劝说根本无法让他信服，尤其是经历过12月份的事件后，对于自己的处境，他更是感到不安。他大叫着，甚至

捶胸顿足，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失态的第一执政！如果说哥本哈根的战事不利让他觉得心烦意乱的话，那么这位盟友、这位朋友的离世则让他有种物伤其类的悲愤。而从战略上来看，法国也因此失去了有力的支持。

保罗一世的死让拿破仑变得更加敏感多疑，他觉得军队中有人在密谋反叛，于是，他下令撤职查办了几位将军，其中便包括我尽力保全的亨伯特。接着，有告密者说，贝纳多特将军心存不轨，贝纳多特周围的人在宣扬共和言论。去年一年里，这位驻守西部的大将军一直恪守本分，在马伦哥之战中，他更是击退了妄图从基贝龙(15)登陆的保皇派，使西部很多省份臣服于他。



被英军炮火轰炸的哥本哈根和惊慌失措的市民



哥本哈根战役中，英国军舰炮轰哥本哈根



被炮火毁坏的哥本哈根

接到告密的第一执政立刻召回了贝纳多特。关于此次事件，人们只能从拿破仑的办公室里打探情况，因为举报人是直接到办公室举报贝纳多特将军的。据说，有人不小心泄漏了一份军事叛变计划，根据这份计划，军队将直接冲向巴黎，推翻第一执政。但有人认为这个可笑的计划未必是空穴来风，他推测这是共和党人的叛变，而在军队

中，有深厚根基的贝纳多特将军首当其冲地成为这次叛变的主谋。

拿破仑命我秘密拘禁了贝纳多特将军身边的高级将领，解散了他们的活动，他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声张："不要让欧洲人觉得有人在法国密谋造反。"

我尽量低调地处理了此事，但这次反叛的性质不同于以往的民事反叛，而是一次带有军事政变色彩的叛乱。我告诉贝纳多特将军，我必须服从命令。不久之后，贝纳多特的连襟约瑟夫亲自向第一执政寻求和解（这是雾月18日以来的第二次），在我的建议之下，拿破仑同意以更加优厚的待遇与这位杰出的将军达成和解。

突变的欧洲局势推动了此次战争的和平解决，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采用了新的执政方式，他决定先释放英国海军俘虏。在圣彼得堡，俄国部长们和凯伦斯签署了新的协定，此事对局势产生了新的影响。同时，这位新沙皇派马可夫公爵[(16)]全权代表俄国，与第一执政以及盟国协商和平事宜。据此看来，俄国新政府很希望达成和平的局势。而在1800年末和1801年初的时候，除了要独自对抗法国外，英国还要处理与其他国家在领海问题上的新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似乎是要放弃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围剿法国的主张。在彼得退位和他的内阁下台之后，这种政治倾向更明显。于是，杜伊勒里宫和詹姆斯内阁似乎有很大的和解可能。当人们看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竞争的后果后，这种和平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亚历山大一世

西班牙军队攻克阿连特茹[17]的同时，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克[18]立刻命令一支法国军队从萨拉曼卡[19]进入了葡萄牙。腹背受敌的葡萄牙希望用重金安抚侵略者。6月6日，在巴达霍斯[20]，吕西安·波拿巴收受了葡萄牙政府提供的三千万法郎酬金，之后他和葡萄牙政府签署了和平条款。

见钱眼开的吕西安·波拿巴并不明白他出任西班牙大使的政治使命。果然，得知此事后，拿破仑勃然大怒。第一执政要的是通过西班牙对葡萄牙的宣战大大削弱英国的力量——英国把葡萄牙看作自己的

殖民地。从3月20日开始，在亚历山大保卫战中，莫奴将军[21]一直处于劣势，开罗和埃及其他主要城市相继落入了英国人和土耳其人手中。

就在这节骨眼上，吕西安·波拿巴辜负了法国的使命。本来决议要占领里斯本的拿破仑咬牙切齿地扬言要召回吕西安·波拿巴，并拒绝承认这项协议。但我和塔列朗则认为，这样的处理办法有很多不妥之处。因为，在法英两国疯狂无休止的埃及争夺中，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棘手。塔列朗提出，我们不妨在保护法西盟国的基础上修订条约，作为和英国争取和平的第一步。毕竟，被迫撤离的英国人迫不及待地重新回到了葡萄牙的港口。最后，巴西公主献出了自己的钻石珠宝，外加给拿破仑私人一千万法郎的酬金作为和解条件。最终，双方在马德里签署了和平条约。



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克

不幸的是，我们的预感是对的。8月7日，莫奴被迫放弃亚历山大，这意味着执政府在埃及建立法国殖民地的计划落空了，或者说拿破仑希望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东方帝国的计划破灭了。最终，在埃及势力相当的法英决定和解。10月1日，在伦敦，奥托和霍克斯[22]签订了和平条约。两国上下甚是欣喜，他们共同享受着这条约释放的和平气息。

接着，这和平气息更浓了。英法和解条约签订后，俄国的全权代表马可夫公爵立刻以沙皇的名义和执政府签订了最终的和平条约，而且承诺还会签订新的商贸条约。从保罗一世遇刺以来，法国和俄国就出现了诸多不睦。但第一执政还是一直把保罗一世的儿子和他的继承者放在心上，现在一切都变好了。

对于第一执政来说，这些和平条约的签订是新的台阶，他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拿破仑自以为他可以肆意地对内对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和俄国签订和平条约时，这种忘乎所以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内的一些不满情绪。该条约中的“庶民”一词与法国的国民精神不符。在收到这份条约后，共和党人密集的众议院把它转移给了专门负责审查条约的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在专门会议上继续讨论“庶民”这个词。需要注意的是，专门议会只是觉得这个词用词不当，并没有觉得和平条约本身有什么问题。

拿破仑加入了当晚的专门议会，他对议会这种咬文嚼字的做法非常气愤。在他看来，这迂腐的做法是在拖延条约的签订，这有损他的权威。于是，我郑重地向他汇报了巴黎的民意动向，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当前仅存的共和精神。最后，我说服了他。

在拿破仑私人议会的授意下，内阁委员菲尔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条约的说明。这份说明指出法国早已摒弃向他国强加任何条款的行为。俄国也解释了这份条约里使用“庶民”这个词的原因：俄国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共同面对国内外问题，它承诺俄国绝对不会为对方的敌国提供任何帮助。由此，议会的风波得以解决。

然而，在这份和平条约中，还有一条秘密协定：条约双方应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问题上保持一致态度。

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对英国来说，这个秘密条款是多么危险的事情。这意味着，在英国不知情的情况下，欧洲两大帝国强强联手了。

英国政府决定以六万英镑的重金酬谢提供秘密协定的人。很快，此事便传到了第一执政的耳中，他迅速传召我来到杜伊勒里宫，强烈指责了警务和外交工作的不周：公安没能及时发现和阻止出卖国家情报的事情，而塔列朗则被认为是出卖国家情报的人。

我这样为自己辩解道："层出不穷的阴谋根本防不胜防，任何公安力量都无法保证万无一失。"当我发觉第一执政把矛头指向塔列朗时，我立刻直言道："我可以确定，这次国家机密的泄漏和塔列朗的亲信R先生有关。得知秘密条约之后，这个人可能直接向英国人出卖了情报，也可能是通过路易十八的代理人奥托戈公爵[23]转达给了《讨论日报》[24]合伙人之一的B先生。"我向拿破仑报告："我有确切的情报表明这个人是外国人的间谍，但一直以来，仅凭公安部的力量，我很难拿到确切的证据，而公安部能做的只是提出案件侦查的方向。"

第一执政立刻命令军事法庭传唤了这两个人。塔列朗无力地反驳："马可夫公爵的秘书也有同样的嫌疑，或者也有可能是俄国大使团的人走漏了风声。"不过，考虑到条约签署到走漏风声的间隔过于短暂，情报从圣彼得堡流向英国的可能性真的很小。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R先生都被军事法庭流放到了汉堡，而M先生则被流放到了易北河。虽然被层层押送至易北河的M先生看起来遭受了更残酷的刑罚，但事实上，他过得更加安宁。

在整个事件中，我不断地向第一执政提及，在欧洲，最高机密的保密期不会超过四十天。正是因为这件事情的教训，拿破仑才决定组建自己的外交团队。

在此期间，按照之前的约定，康沃利斯侯爵[25]来到了法国的亚眠，参与了和约会议。协商的过程之长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但这并没有影响第一执政对这两个重要事件的同等关注：一个关于意大利，另一个关于圣多明戈[26]。我认为意大利的问题更紧迫，但拿破仑一

心想重新征服被黑人军队控制的圣多明戈，所以他认为圣多明戈的议案更紧迫。

在这一点上，我既不同意私人议会的决断，也不同意内阁的意见，我同意的是我之前的同事玛鲁埃的观点。在他看来，进军圣多明戈是对黑人自由的破坏。在这一点上，从在圣多明戈颇有影响力的桑德若的回忆录中，我找到了支持这个观点的有力证据。可惜的是，拿破仑不喜欢这位曾供职于内阁并受人尊敬的年轻人，甚至还曾下令将其逐出巴黎——因此，他的意见根本没有办法传达给第一执政。

最后，菲尔等殖民派占了上风。这些人决定，在占领圣多明戈后，继续在圣多明戈执行1789年之前的奴隶制度，并且按照之前的法律恢复黑人贸易。

出兵圣多明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法军的实力和声誉受到了双重损耗。那么第一执政坚持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呢？在这一点上，贝尔西耶和杜洛克要比我这个公安部长清楚得多：第一执政不会放过这个疏远莫罗党羽的机会。当然，那些心底里支持共和、不满拿破仑的人也都清楚这一点。这一次，那些本来就对拿破仑颇有微词的人更是肆无忌惮地通过各种刊物批评圣多明戈行动。于是，公安报告中出现了各种不好的舆论。

有一天，拿破仑盯着我说："好吧，你们雅各宾派说我是故意派莫罗的人去圣多明戈前线的。这些人真是丧心病狂，让他们嚼断舌根吧。但新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绝不能因为这些闲碎的诋毁就停止正常工作。不过，您最好能让民众更好地了解这件事情。"

我保证道："您根本不用担心这些，您会看到民意的改变的。"

终于，万事俱备。两万两千名出征殖民地的士兵搭乘着二十三艘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布雷斯特。鉴于出征圣多明戈时，我们还没有和英国签订正式的和平协议，于是，这次出征前，我们还特意去争取了

英国的支持。

在正式的和平协议签署前，拿破仑也打听到了自己关心的第二个重要事件——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1802年1月，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驻里昂的一名议员被召回国内，并且被选为意大利总统，而不是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总统，这是值得注意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希望寻求独立。事实上，自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军队就一直驻守在那里，与其说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如说它是法国的分支，或者说是处于拿破仑的势力范围。



法军在圣多明戈与黑人奴隶交战



法军在圣多明戈与黑人奴隶短兵相接

拿破仑自然不把意大利的选举放在眼里，他马上命令我们停止和意大利的所有谈判。在这件事情上，拿破仑信心十足：依仗着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英国断然不会干涉他的任何举动。所有人都坚信英国渴望和平。毕竟，3月25日在亚眠签订的英法停战协定[27]是最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了。

当时所有的领导人都明白，和平协议中有一个雷区——马耳他。在内阁会议中，我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但沉浸在和平协议喜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理会这个问题，他们甚至觉得我在危言耸听。但在英国议会中，我发现一位当时实力派议员提出了和我一样的观点。平心而论，前届部长和他们的朋友所形成的新的反对派会把这次的和平看作一次短暂的休战。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法国维持了自己所有的领土，而英国却只守住了特里尼达和锡兰。

那么，对法国来说，这和平真的是一件幸事吗？我看得很清楚，在战争中，拿破仑扩大自己的权力，同样地，他也会利用这和平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于英国的开明阶级、法国的自由斗士以及我来说，我们都能明白，这意味着法国军方势力得到了永久的保证。

(1) 里窝那是第勒尼安海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今意大利托斯卡纳西部，是里窝那省的首府。

(2) 阿布鲁佐位于意大利中部，北靠马尔凯，西南接拉齐，东临亚得里亚海。

(3) 奥特朗托是今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莱切省的一个城市。奥特朗托海峡以该市命名。隔海与阿尔巴尼亚相望。

(4) 吕内维尔是法国东部默尔特-摩泽尔省的一个镇。

(5) 《吕内维尔和约》是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后，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签订的停战条约。条约于1801年2月9日签订，法国由约瑟夫·波拿巴为代表，神圣罗马帝国由奥地利外相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为代表。奥军于1800年6月14日的马伦哥之役、12月3日的霍亨灵顿战役战败给拿破仑一世及莫罗后，奥地利被迫对法国求和，奥法之间遂签订一系列和约。《吕内维尔和约》标志着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崩溃。继此条约后，英国亦单独与法国签订了《亚眠和约》。

(6) 神圣罗马帝国亦被称为德意志第一帝国，1512年以后的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962年至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一个封建君主制帝国。帝国的版图以德意志地区为核心，包括一些周边地区，在巅峰时期包括了意大利王国和勃艮第王国。

(7) 皮尔·罗德（1774—1830），与贝多芬等著名音乐家有密切的合作。

(8) 布雷斯特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端，是布列塔尼大区菲尼斯泰尔省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港口和海军基地。

(9) 易北河发源于捷克和波兰交接的苏台德山脉，向南进入捷克，再流成一个弧形转向西北流入德国，经汉堡流入北海，是中欧地区的主要航运河道。

(10) 威悉河是德国境内的一条较大的河流，由威拉河与富尔达河在汉恩明登附近汇流而成，自南向北流经北威、下萨克森和不来梅，在不来梅注入北海的黑尔戈兰湾。

(11) 埃姆斯河发源于德国北部，流经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与下萨克森。

(12) 海德帕克（1739—1807），英国著名的海军将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曾效力于英国皇家海军。

(13) 海军上将第一代纳尔逊子爵霍雷肖·尼尔森（1758—1805），英国

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率领皇家海军取得大捷，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战役中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后中弹阵亡。

(14) 桑德海湾是波罗的海的交通要道。

(15) 基贝龙是法国莫尔比昂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大陆最南端，属于洛里昂区。

(16) 马可夫公爵（1747—1827），俄国外交家。

(17) 阿连特茹位于葡萄牙中南部，是葡萄牙七个大区之一。

(18) 查理·维克多·伊曼纽·勒克莱克（1772—1802），法国将领，拿破仑·波拿巴之妹保罗琳·波拿巴的丈夫。1791年开始军事生涯，在土伦之战表现出色，得到肯定。1797年与保罗琳·波拿巴结婚。

(19) 萨拉曼卡地处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的最西南端。

(20) 巴达霍斯是西班牙的城市，巴达霍斯省的省会，属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摩尔人曾在此建立过要塞。

(21) 莫奴将军（1750—1810），法国大革命时期将领。

(22) 霍克斯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市镇，著名的法语区。

(23) 奥托戈（1753—1812），外交官，私人代理人。

(24) 《讨论日报》最开始记录国民公会的日常讨论情况，后来成为法国重要日报。

(25) 第一代康沃利斯侯爵查理·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军人、殖民地官员及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于1778年至1781年出任北美英军副总司令，任内于1781年10月约克镇围城战役大败后率军投降。战后他于1786年至1793年出任印度总督，1798年至1801年任爱尔兰总督，1805年再任印度总督，但同年因病客死当地。卸任爱尔兰总督后，康沃利斯在1802年代表英国与法国的拿破仑签订《亚眠和约》。

(26) 法属圣多明戈是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即现在的海地。该地原属西班牙，是西属西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697年根据《里斯维克条约》该地被割让给法国，之后便称为法属圣多明戈。1790年，法属圣多明戈爆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黑奴起义，并坚持斗争直到1803年11月驱逐全部的法军。1804年1月，法属圣多明戈宣布独立建国。

(27) 这里指《亚眠和约》，于拿破仑战争发生期间的1802年3月，由当

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及英国的康沃利斯侯爵代表法英双方所缔结的休战条约。1801年，支持对法国强硬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由于国内的宗教问题而退政，并由支持对法融和的亨利·阿丁顿组成新内阁。当时，在法国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拿破仑不断透过对外战争来维持国内安定。由于双方都希望暂时休战，以应付国内的种种问题，双方决定于1802年3月25日在法国北部的亚眠缔结休战条约。条约规定，英国会从马耳他、直布罗陀、埃及等占领地撤军，把管治权交回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直布罗陀殖民地的荷兰（当时是巴达维亚共和国）。与此同时，法国会从拿波里王国、罗马教宗领地等地撤军。然而，《亚眠和约》在订立以后，并未得到双方全面的遵守。1803年5月，英国与荷兰捕获法国船舶的事件，成为条约双方关系恶化的导火线。1804年拿破仑称帝，翌年英国等国再次组成反法联盟，是为第三次反法同盟，把新成立的法兰西帝国推入战火内。

第12章　军政府的建立

精彩看点

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报告——重构宗教蓝图——红衣主教贡萨尔维斯造访巴黎——宽大处理流亡贵族——法国大赦——天主教回归——再次赋予拿破仑十年的执政权力——军政府建立——共和党人不满——福尔涅上校酒后失言——拿破仑获得终身执政权——共和国第五宪法——拿破仑出任参议院主席——拿破仑获得赦免权

无论如何，和平协议的签订是拿破仑的胜利，更是法国大革命理念的胜利，新的纪元开始了。由此，拿破仑要求我筹划一份关于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翔实报告。我分析了各个派别间观点的异同，以及近期叛乱党派的反动纲领。在这篇报告中，我指出，在第一执政的领导下，法国人民必将成为遵纪守法、有理有节的好公民。在未来几年之内，在军事上，法国将成为欧洲的霸主，不仅如此，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法国都将成为欧洲国家的楷模。宗教、艺术、科学和习俗礼仪都将以法国为中心，在欧洲全面复苏。而我们的第一执政，将不只是三千万法国人民的领袖，他将成为恩泽整个欧洲的慈父。在对外关系上，法国将成为继查理曼大帝以来最强大的法国；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建立起持久的秩序；到时候，法国将占有西班牙；而土耳其人，也会发现自己有着法国人的特质，倾向于成为法国的一部分；至于那些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小国家，他们将会迫不及待地请求第一执政协助推行国内改革。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将臣服于法国。

我知道这份报告触动了他心底隐秘的地方。一年多以来，在勒布伦、冈巴塞雷斯以及国务委员波尔达耶[1]的建议下，第一执政正兴致勃勃地重构宗教的蓝图，并且希望那些流亡海外的贵族回到法国的怀抱。内阁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计划书。在这两项重要的决定中，我赞成借助宗教推进国家管理，并且由第一执政推进的宗教改革，必然会更好地为第一执政的管理服务。但对于和罗马教廷签订臣服条约，我觉得非常不妥。在一个确立了大革命法则的国家，强行引入影响国家安定的外国势力是非常不合理的。即使罗马教皇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微乎其微，但一些偶尔的争论也无法避免。况且把这样一种天意宿命、不为人控制的东西引入国家的治理，本身就是很荒唐的想法。国家需要的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对各种宗教从业人员发放固定工资。

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计划仅仅是另一项更重要计划的铺垫。通过自己的情人——第一执政的妹妹爱丽莎[2]，翁达斯[3]向第一执政提交了一份周密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建议拿破仑仿效查理曼大帝，

借助罗马教皇的力量，完成帝国大业。

我也有考虑过恢复查理曼帝国的想法，不过和翁达斯不同的是，我希望这宏伟大业可以融合革命的原则，希望革命党人能够在这份大业里面占有绝大部分的席位。不，我不是想要在政治环境中排斥保皇派，我只是希望，在政府中，这些人是政府的少数派。况且在我看来，这份甚合第一执政心意的计划书，其他方面还非常不成熟。于是，尽管第一执政一再催促我加紧筹备，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拖延。

然而，急躁的第一执政根本无法容忍我这种谨慎的工作方式。从去年6月开始，在拿破仑的邀请下，罗马教廷庇护七世秘书——红衣主教贡萨尔维斯[(4)]——前来巴黎与拿破仑进行了会谈，并提出了相应的合作基础。随后，10月10日，拿破仑向内阁告知了这些合作基础。



爱丽莎与女儿

红衣主教的来访引起了明理派的不满。他们觉得我应该代表他们向政府建言，尽管第一执政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在对天主教的崇拜上，他还是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在国内，除了要考虑注重哲学思辨的大臣的反对外，拿破仑还需要顾及军队内部对宗教方案某些敏感部分的感受。为了保住民意，和内阁商量之后，第一执政决定借宣传英法和约之机，慢慢推进宗教改革。

而对英法和约的宣传，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宽恕海外流亡贵族。在这件事情上，作为公安部长的我有着重要的作用。九大簿名单记录了

大概十五万海外流亡贵族：名单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陆续回国，或者已经离世，但名单中的有效人数依然有八万左右。十年来，这八万人一直处于最高公安的监控之下，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自己的领地。

如果法国大赦，除了效忠法国王子的那一千人，其他人都可以得到赦免。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没能得到赦免的贵族的财产呢？那四百阿庞[5]森林更是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第一执政的意见是，这部分土地可以作为吸引流亡贵族的礼物。

大家决定：在正式签订和平协议前，我们应该避免过度宣传法国大赦。这样一来，大赦法案正式颁布时就会更显庄重。另外，从1802年4月6日起，拿破仑和红衣主教于1801年7月15日商议出的那些协定陆续通过了大众议会的审批程序。从马德里归来的吕西安·波拿巴重新进入了五百人院，他发表了一篇由诗人翁达斯润色的文章——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新的权力即将上台。

颁布《政教协定》[6]的日子定在了复活节，第一执政在杜伊勒里宫宣布该消息后，十二位巴黎市长纷纷向巴黎市民传达了这个决定。为了庆祝亚眠和平协议和政教协定的签订，在巴黎圣母院，政府安排了隆重的祭天仪式。我提醒执政官们，追随他们前往祭天的可能只有个别将军和公务人员，因为很多高级将领决定不参加这种盛大的仪式。为了避免冷场，政府马上想出了对应之策。于是，战事部长贝尔西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军事午宴，邀请了所有的高级将领参加。午宴过后，他提议他们去杜伊勒里宫向第一执政致谢。等他们到达杜伊勒里宫时，身着华服的拿破仑郑重地邀请他们随他前去巴黎圣母院。没有人敢当场拒绝这个邀请，最后，在一片喝彩和欢呼声中，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巴黎圣母院走去。



19世纪的巴黎圣母院

在关注着天主教回归的同时，参议院也一直关注着大赦条款的制定。后者势必会牵扯出财产的分配纠纷，而我负责的公安部则必须全面警惕，极力应付各种不测。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得到了内务部、财政部和内阁同事的大力帮助。而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内阁也偏袒了偏向革命者的惯例。

事已至此，大家都知道，自己依靠的是一个不能给革命党人保障的共和国。第一执政所有的计划都是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君主制国家。昔日表彰革命象征自由的荣誉勋章却成了损害平等的废铜烂铁，大家变得既敏感又矛盾。我们不敢怠慢的民意，第一执政和他的兄弟吕西

安·波拿巴却能视之如刍狗，罗德若甚至把这样的准则添附到共和国法律当中。在众议院中，这项立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人们认为它损害了人民自由的根基。但对于权势熏天的政府而言，任何的反对派都是无效的少数派。

反对派的意见越是微不足道，他们的愤恨也就越深。城堡护卫队觉醒了：那些被称作“坏头脑”的人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监禁。在将士们中间，不满快速地演变成怒气，这些被共同感受浸染过的人们都知道：拿破仑对共和制度的践踏无非是想为自己铺平专制的道路！

拿破仑和自己的亲信正在研究如何以合法的形式获得终身的权力。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事情。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我常常在议会上奔走呼喊：现在还不是恢复帝制的时候，人民还不能理智地认识帝制所带来的稳定；恢复帝制会激起军队精英和人民的反抗，会让我们失去人民的支持。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后来，我更是发现，他人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有所保留。除了私人议会外，人们还会在冈巴塞雷斯家里举行秘密会议。

为了第一执政和国家的利益，在了解到他们的秘密之后，我决定采取行动。我联系了五百人院中的几位好友，希望能够把这些计划——这些我觉得会给国家带来危险的计划——扼杀于萌芽之中。

当天，我的朋友们就去游说众议院中最有影响力的议员们。他们大力赞扬了拿破仑为顺利结束国内党派纷争和争取国家和平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特意提到了第一执政正牢固掌握着国家政府权力，并且在他领导下的，政府没有任何污点。最后，他们说他们希望参议员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在原定十年的执政基础上，再赋予拿破仑十年的执政权力。他们还提到，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稳定，也可以加强五百人院的权威。我的朋友们假装表现出这也是第一执政的意思，因此，这次游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月8日，参议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向第一执政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且在1799年12月13日宪法34条[7]的基础上，再次赋予了拿破仑十年的执政权力。不久之后，这个决议便传到了第一执政、五百人院和立法机构那里。

对此，第一执政和他的亲信们并不买账。对于这个决议，他们的回应相当模糊：他们说参议院的手伸得过长了，参议院怎么能够代表法国人民呢？他们又说，这个决议有些不符合实情，比如说："虽然幸运垂怜共和国，但这幸运却不是稳定的幸运；受到命运垂怜的人有多少能久存于世呢！……"

奥古斯都对此的回应也是一样的……参议院多赋予的十年权力期并不能满足第一执政，他从这十年中看到的是迫切想要到达权力巅峰的自己。拿破仑决定把确立君主制当作唯一的战役。两天以后，5月10日，他迫使另外两位执政同意：宪法没有规定不能向法国人民提出"拿破仑可以终生执政吗？"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当我赶到私人议会的时候，有人正在宣读第一执政写给参议院的信。我承认，在聆听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但我还是希望，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件事能够缓一缓、缓一缓、再缓一缓……

这不是推卸责任，我们的确要铭记，在这件事情上，参议院的坚守还是很多的，最开始的时候，这条法令并没有得到强烈的支持。然而很快，参议院、立法集团和众议院纷纷被收买了。所谓的征求法国人民的意见，不过是第一执政在众议院向法国人民的主权和革命的原则表达了口头的敬意而已。而所谓的全民公决则只向各新政府机构的秘书们、各个法院的记录员们和各位公职人员开放。拿破仑的亲信们提出的终身执政官制已经被大部分人所接受。遇到还在执拗的人，那些人就敷衍地说："等着吧，这件事得由国家来决定。"

尽管政府已经尽其所能地防范各种意外，但一件严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一次聚餐中——参与者为二十多位心怀怨气的将军，有人当场把第一执政的执政书扔在地上。喝醉之后，他们群情激愤，以精准射击而著称的第十二轻骑兵上校福尔涅(8)甚至扬言，五十步之内，他定能攻克拿破仑……不料，某个在场的人立刻向莫奴将军告发了此人，这个告密者希望现在恩宠正盛的莫奴将军能够把这件事告知拿破仑，而莫奴则直接带着这位告密者赶往杜伊勒里宫。当时，拿破仑正准备前往喜剧院，接到消息后，他立刻命令自己的护卫队赶往喜剧院自己的包厢。到达喜剧院之后，福尔涅也在该处，于是，助理警长朱诺(9)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罪将其当场逮捕。



福尔涅上校

我讯问了这位上校。随后，我更是得知了他们在聚餐活动中的那些醉酒狂言。指责他的同时，我又告诉他，这件事最终的处理还要看他们有没有切实的行刺计划。这位上校很后悔自己的酒后之言，他说自己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实际的准备。当时，我想尽办法劝说拿破仑低调处理此事。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让这件事变得更棘手。在公安局待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警察便随着这位上校去他的住所取证。虽然他们没有在那里搜查到任何实质性的刺杀计划，但他们却找到了很

多反对拿破仑的打油诗。接着，福尔涅上校做了一件令人咂舌的蠢事——他把护卫关在了自己的房间，然后逃跑了。听闻此事后，第一执政相当震怒，不过他的愤怒首先指向的是公安部。在他看来，比起这位上校、比起这次共和党人的聚餐，更让他愤怒的是公安部的迟钝——公安部居然对此一无所知。我告诉拿破仑说："那天晚上，公安部接到了关于这次聚餐的消息，但经过严密的调查后，我可以确定这只是一起聚餐失言事故。"接着，我又向他说明道："在这个全民公决的时刻，如果我们按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处理这件事的话，那么您的声誉将会受到影响。"思索了一阵之后，拿破仑终于点头同意了我的建议。当时名气很盛的中队长多纳德也因为此事受到牵连，和福尔涅一起被判处监禁。在我的斡旋之下，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也算过得去，无非是降职、流放和失宠。

此事让第一执政更加迫切地追求自己地位的终身制。整整六周，政府上下都在为全民公决的事情忙到难以喘息。大选结果出来了：3568185票赞同，9074票反对。8月2日，参议院宣布拿破仑获得终身执政权。总体来说，绝大多数外围的人都认为，授予拿破仑终身执政权可以给法国带来稳定和安宁。参议院也认为，或者说假装认为，拿破仑会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况且拿破仑本人也信誓旦旦地说："法国的自由、平等和繁荣即将实现。"得其所需后，他还慷慨激昂地补充道："我的内心涌动着使命，我要给这片土地带来秩序和正义。"

这些话值得我们用心体会——越是说向着人民，他就越会向着自己。这个人定会爬向权力的巅峰。只要时机成熟，他就会摘取那至高神圣的权力之果，他要比恺撒、亚历山大更幸福。

越是这样渴望得到的，就越会害怕失去。拿破仑深信，只要他还没有掌握全部的权力，他的权威就还没有确立。他害怕法国人民是一时脑热才选择他为终身执政官，因此，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他们有时间冷静下来。紧接着，8月6日，一份以政府名义发出的共和国新宪法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新宪法也叫作第五宪法[10]，该宪法规定拿

破仑为参议院主席。参议院的决策权转移到了拿破仑的手中，这意味着他有了可以决定国家体制政策的权力！

另外，宪法还承认了内阁相应的权威地位，并赋予了拿破仑最大的特权——赦免权。第五宪法还大量减少了众议院的议员名额，使其形同虚设，同时，它还剥夺了立法集团的条约审批权。这完全补足了终身执政事件的纰漏，政府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拿破仑手中。而为了奖励另外两位执政官——他的同伙的合作和配合，拿破仑宣布这两人在各自负责的事务上也享有终身权力。

这就是新宪法的全部要义：轻率、背离自由、毫无社会公平公正。毫无疑问，距离帝制只有一步之遥了。对，还剩最后一步，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吗？

---

(1) 波尔达耶（1746—1807），法学家、哲学家，《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

(2) 玛丽亚·安娜·爱丽莎·波拿巴·巴西奥克希（1777—1820），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大妹，封托斯卡尼女大公。1797年5月与科西嘉贵族巴西奥克希结婚。1805年3月19日，拿破仑授予她卢卡和皮翁比诺公主称号。

(3) 翁达斯（1757—1821），法国政治作家。他继承了拉辛与芬乃伦的文学创作手法。在政治上，他推崇亨利四世以及华盛顿的治国理念。

(4) 贡萨尔维斯（1757—1824），罗马教廷庇护七世秘书。

(5) 阿庞是旧时土地面积计量单位，1阿庞约等于20亩到50亩。

(6) 《政教协定》的签订者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此协定恢复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教廷地位。

(7) 这里指共和八年宪法，法国共和历八年颁布的一部宪法。依据宪法，法国政府为执政府。此前的雾月政变已经有效地将权力移交给拿破仑·波拿巴，并且在一些人的眼里，政变已经结束法国大革命。

(8) 福尔涅（1773—1827），法兰西第一帝国将领。

(9) 即让·安多许·朱诺（1771—1813），第一代阿布兰特什公爵。他是活跃于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国将领。1800年，他与拿破仑的多年好友劳拉·马丁·德·皮尔蒙德结婚。在意大利战争和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朱诺战功卓著。

(10) 这里指共和十二年宪法。共和十二年宪法是法国在共和历十二年（1804年）颁布的一部宪法。该宪法修正了先前的共和八年宪法和共和十年宪法，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并由此前的终身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担任皇帝，史称“拿破仑一世”。宪法规定波拿巴家族为法国皇室，皇位须由波拿巴家族成员继承。共和十二年宪法最后经过了帝国宪法附加法的全面修改，并在1815年波旁王室复辟后被废除。

第13章　离任公安部与出使瑞士

精彩看点

拿破仑的生日——人民的沉默——与拿破仑的争执——第一次离职——离职听证会——恬淡的离职生活——出任瑞士问题协商委员会成员——瑞士团结党和联邦党的纷争——瑞士将采用一种全新的联邦制度——圆满完成瑞士使命——《吕内维尔条约》后的德意志——雷根斯堡特约委员会的成立——对德意志的掠夺——小团体破坏特约委员会的工作

我认为这部宪法非常危险，因此，我毫不隐讳地向第一执政指出，支撑他这个终身执政权的只有他手中的长剑和战功。

8月15日是拿破仑的生日，在这一天，法国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感谢上帝赐予法国一位愿意终身执政的伟人。

在8月6日的参议院决议中，拿破仑还获得了主持参议院工作的权力。为了尽快行使这项权力并且增加民意支持率，8月21日，在两位同事以及部长、国务委员的陪同下，拿破仑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驻卢森堡宫。身着华服的军队从杜伊勒里宫一直排到卢森堡宫，拿破仑入住并接受众参议员的朝拜效忠。接着，塔列朗宣读了参议院对德意志各王公贵族的处理方案，其中就包括流放厄尔巴岛[(1)]的惩罚。此后，厄尔巴岛成了著名的流放之地，但多年之后，它竟然迎来了这位天命之子，多么大的讽刺！

一路上，呼应第一执政频频点头致意的只有他的两位兄弟——他们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这种沉默，这种来自人民的沉默深深伤害了第一执政。那时，他或许想起了这句名言：“人民的沉默是给国王的一课！”当晚，这句谚语就被张贴在杜伊勒里宫，第二天，它又出现在一些十字路口。

拿破仑把这次冷场归咎于公安部的失职。我提醒他，这一切不过都是在遵循他的意思，因为他命我们不得提前安排任何欢迎仪式。我还说：“即使我们这个民族是法兰克人和高卢人的融合体，但我们的身体里依然流淌着那股既不接受放任自由、也不忍受强权压迫的血液！……”

他激烈地反驳道：“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巴黎人民认为新宪法意味着对自由的剥夺和明显的集权趋势。”

“如果只有虚名，而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主人，在没有民意的支持下，我最多只能坚持六个月。”

“只要您能够一如既往地宽厚、公正、强大，那么您很快就会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

“民意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我能扭转它！”说完，拿破仑便转过身去。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会被疏远。这次谈话之后，我更加确信，这种疏远已经离我不远。我的对手们已经开始行动，除了吕西安·波拿巴和约瑟夫·波拿巴之外，他们的妹妹爱丽莎也反对我，这是个孤傲、神经质、充满激情、深陷爱情和欲望中的女人。之前我们便看到，她为自己的情人翁达斯大开便利恩宠之门。翁达斯是一个在政治上胆怯却又贪婪的人，他只敢在一些带有宗教或帝王色彩的传媒界活跃，这些人把基督教当作诗作，把我们的话语说成是黑话。这个人倚仗着恩宠和成功，带领一众文坛新手向拿破仑献上谄媚的诗歌。和翁达斯一样，这些诗人觉得自己将是重建帝制的栋梁。

这种“优雅”文学还不敢直接针对我，但在交给第一执政的秘密记录中，他们注明了各种党派、各种自由派组织，并且罗列了威胁集权的自由派革命人士。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拿破仑推向查理曼大帝，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里，革命只会平息、迷失。然而这正是第一执政，或者是他的亲信们的愿望。于是那些觊觎着权位、财富、恩宠的人争相提交着自己的方案，各种文章相继出现……



一次会议上的拿破仑

在我收到的几封匿名信中，有人告知我说吕西安·波拿巴在伦敦的代理人正借助拉维特的权势直接和第一执政通信。在洞悉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后，他大谈特谈查理曼大帝、路易十四、社会秩序、重建集权、帝制等和共和国完全不搭边的事情。这个人还到处捕风捉影，伪造了针对我和公安部的千百种故事。

终于，在巧妙地试探过杜洛克和萨瓦里之后，这些人认为时机成熟了。某次，在约瑟夫·波拿巴家里召集聚会时，有人宣布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将会参加下一次的会议，并且到时候要求大家一起阅读一篇报告。虽然这篇报告没有直接攻击我，但它还是表达了对我领导下的公安部的不满。他们说，自从拿破仑获得终身执政权之后，公安部就

成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机构。

无用指的是它对保皇派的无用，这些人早已缴械投降，如今，他们一心想和政府和解；危险指的是公安部已经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避风港，这些危险的革命者甚至可以从公安部领到工资。最后，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把如此之大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意味着把整个政府都交给了他，在政治上，这是不正确的。接着，他们便公布了由约瑟夫·波拿巴的亲信罗德若拟写的方案，即把公安部的权力转移到雷尼尔大法官控制下的司法部下。

在各位执政签署法令前，我已经得知了这个消息。几乎无法自制的我对朋友们说道："什么，一个大傻瓜替代了我！"从此，人们只称呼臃肿的雷尼尔为"大法官"。

因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我没有做任何抵抗。我的镇静甚至震惊了第一执政，在最后一次工作交接的时候，他对我说："富歇先生，您为政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政府要报答您，从今以后，您就正式成为国家最高行政体系中的一员了。说实话，和您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人分离，我内心很不好受，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向欧洲人民证明，我正在努力推进和平进程，并且我深受法国人民爱戴。在我刚刚下达的命令里，公安部不再是一个单独的机构，因此，您可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来向我汇报工作了，但请您相信，我绝不会不理会您的建议或者服务的。这绝不是排挤您，也请您不要听信圣日尔曼镇上那些沙龙里的闲言碎语……"

我向他表达了感谢，感谢他认可我的工作，同时，我也很坦诚地告诉他，其实，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

他大声说道："什么？您一直对此都有所怀疑？"

我回应道："我只是根据一些传到我耳边的流言做出了初步判断而已。"

我恳求他相信我丝毫不怨他，我只是担心政府以及他本人的安危，尤其是我离开后。怀着这样的情感，我希望他能收下我对当前局势的一份分析。

他对我说："把您想和我说的话都告诉我吧，我会用心地去处理来自于您的全部消息。"

我要求并执意坚持第二天举行一个听证会，到时候我会向他报告公安部秘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我开始拟定我的离职报告，短短的一篇报告却挑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首先，我向第一执政指出，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国内外的和平，因此，我必须先指出法国可能需要面临的战争隐患。如果国家陷入战争之中，那么民意是不会支持集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生的政权，撤掉一个警觉的部门是很不利的。政府突然决定设立一名终身执政官，那么，我们一定要用心安抚民意，切不可大意。我还希望表明的是，尽管我对于参议院最近做出的决定有很多保留意见，但这全都是以第一执政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所有最亲密的人都是一样的。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们的观点和方式不同，但所有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指出，政府需要警惕，千万不能因为不谨慎而把国家交给保皇派或者国外敌对势力。在国内事务方面，政府需要寻求新的支撑来统一协调各种利益；在国外事务方面，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要想统领欧洲，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有一天，如果法国重回欧洲战场，那么我们一定要先安抚好国内各党派间的纷争，我指的不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或是那些反革命者，我指的是那些正直的、有能力的人。在1789年的革命中，这些人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明智的朋友反对过度革命，希望建立一个强大而温和的政府。如果政府能够妥善安抚他们，那么有朝一日，当法国和欧洲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政府也将受益无穷。最后，我陈述了我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见解。虽然现在各党派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但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这些人都可能再次浮出水面。

第二天，我把这份报告——我的政治遗言——呈递给了第一执政。他从我手中接过这份报告时，我能感受到他的不舍。

在我交出秘密资金的财务报告时，他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有二百四十万法郎的结余，他对我说：“元老先生，我愿意给您比西哀士和罗杰更多的酬金。请您拿走这其中的一半，要知道，这都不足以表达我个人对您工作的满意程度。至于另一半，我将交给我的私人公安管理。对于您提出的加强警务工作的建议，我也会命他们加紧筹备，在这方面，我希望能及时得到您的建议。”

说实话，拿破仑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他以国家最高标准来答谢了我的工作（除了酬金外，我想还有参议院的年俸），而我也向他表达了我将永远忠于他的决心。

直至今日，我依然深信，对拿破仑而言，撤掉公安部意味着可以摆脱一种制度。在他获得终身执政权后，这种制度不仅没有什么用处，反而会威胁他的统治。让他害怕的，并不是某一个掌握公安力量的个体，而是整个公安制度。而这种恐惧，让他陷入了我的对手们的圈套。一言以蔽之，当时的拿破仑深信，国内已经没有作乱的保皇派，只有居心叵测的革命党。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在他耳边不停地说，有一个部长，一个从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部长，是这些人的靠山。

离职后，我回归到了一种幸福的私人生活中。在这种恬淡的生活中，我可以惬意地看待那些重大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非但没有被打压，反而意外获得了更好的待遇和生活。这让我的对手分外为难。据说，在议会中，有一些共和的趋势，但我告诉自己，我决不插手任何事件，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双恶意的眼睛。在我自己的四方之地上，我快乐度日。1802年秋，我接到了拿破仑的一封公开任命书，他任命我为协商委员会成员，与瑞士各州代表

磋商防御事宜。我们必须保证这个紧挨着法国的国家不会介入任何危害法国利益的活动。瑞士似乎是一条通往法国的坦途，在这里，除了峡谷外没有任何屏障，除了牧羊人外没有任何哨兵。因此，对第一执政来说，瑞士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这也是《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之后，他建议执政府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攻克瑞士的原因。但这一次，他意识到，除了武力，我们还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刚刚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承认瑞士具有独立主权，可以自主选择适合瑞士国情的政治体制。这个国家把自己的独立归功于第一执政，但第一执政已经料到有人会利用这次独立。事实上，这个国家内部分为矛盾尖锐的两派：一派是主张团结和共和的团结党，另一派是主张用旧的贵族体系建制的联邦党。如果说团结党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那么很明显，另一派则是旧体制下负隅顽抗的贵族，一些和奥地利藕断丝连的贵族。

在这两派之间，还有一派中立党。1802年一整年中，在团结党和联邦党的纷争中，瑞士不得安宁，内战频发。事实上，这种纷争背后有法国的支持。在杜伊勒里宫的授意下，我们的部长维尔尼轮流支持这两派人，以图渔翁得利。最后的结果是联邦党占据了上风，挫败的团结党投入了法国的怀抱。而这正中了第一执政的下怀，他马上命令战务助理哈勃带着国书出使瑞士。这份国书与其说是一份调停书，不如说是一份命令书。在这份国书中，拿破仑命令各党派放下武器，同时命纳伊[2]大将军率领一众人军事占领瑞士。如果说瑞士在军事进攻下做了让步的话，那么他们丝毫不愿意在权力上有任何妥协。

最后，为了得到法国协调者的庇护，这两派人派代表在巴黎会面。团结党的三十六位代表迅速到位，而联邦党的议员则吞吞吐吐的。在这些人看来，这将是一次带有羞辱性质的谈判，最终，联邦党共列席十五位代表。12月，这两派人齐聚巴黎。于是，第一执政任命使节团全权负责起草调停书，终结这两派之间的纷争。委员会主席是参议院议员巴泰勒米，我和另外两位国务委员罗德若和德穆尼尔[3]是

委员会成员。然而，这些淳朴的瑞士人认为协调委员会是现代版的亚略巴古[4]，于是，他们开始积极地游说团长和所有团员们。虽然我一再强调我们仅仅是工作人员，所有的决定都只是第一执政的意思，然而这些人依然固执地相信我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的办公室和沙龙里总是挤满了人。



纳伊将军

12月10日，协调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委员会主席向各位代表传达了第一执政的意思，并把经过第一执政授意的信件发给每个人。他说："瑞士天然便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想要和自然对抗的人是不明智的。"

对于团结党来说，这句话不啻于晴天霹雳，而联邦党则已经开始幻想所有旧制度的复辟。然而，第一执政又在信件里补充道：“但所有贵族放弃其特权是联邦制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说，旧的贵族制度将不复存在。

信件的最后，第一执政明确表示，法国和意大利决不允许在瑞士建立任何侵犯法国和意大利权利的政府。

我马上建议协调委员会成立五人共治委员会，以配合第一执政和协调委员会接下来的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也就是12月12日，拿破仑组织召开了协调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他在瑞士事件上的立场——在团结党和联邦党之外，他将支持成立第三方政党。

不同利益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803年1月24日。在这一天，在瑞士议会中，第一执政任命了几位调解员，并把协调草案交给了这些人，希望这些人能够在协商的基础上把最终的方案交给他。于是，经过八个小时的协调会议后，瑞士方面终于拿出了一个他们相对满意的方案。2月19日，第一执政正式公布最终协调方案。根据该方案，瑞士将采用一种全新的联邦制度，并且每一个州都将有自己独立的宪法。第二天，完成了使命的协调委员会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对瑞士内政的干涉也到此结束。在瑞士，我认为设想这样一个更符合其人民需要的过渡政府是困难的。另外，在对瑞士的内政上，拿破仑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威。可以说，在第一执政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所有法国的邻国中，瑞士是拿破仑最关照的一个国家。

当然，我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份富有协商和调解精神的方案中，我的同事巴泰勒米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对我来说，我也竭尽所能，最大限度地支持了巴泰勒米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我曾多次和第一执政单独汇报过我的想法。

然而在对待其他邻国时，第一执政的政策一点都不像对待邻国瑞士那样宽容！

拆散德意志联盟的行动已经在暗中进行，经过多次妥协，尤其是《吕内维尔条约》之后，德意志已经四分五裂。法国曾派特约大使团出使德意志，向其成员国发放补偿金。在俄法两国的斡旋之下，1801年夏天，特约委员会在雷根斯堡(5)成立，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德意志联盟隐秘掠夺的合法化。因为有众多政府高官的参与，所以舆论显得比较宽容。况且人们似乎更容易容忍对外国人的掠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俄国。然而，在瑞士风波结束的1803年2月23日，经过四十六次会议之后，特约委员会依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大家不免猜测，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一封封举报信纷至沓来，内幕慢慢揭开：某些小团体正在以补偿金作为交易条件，扰乱甚至破坏特约委员会的工作。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公安部长，但人们还是愿意向我告知情况，大家似乎依然执拗地相信，我的话依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第一执政。



19世纪的雷根斯堡

(1) 厄尔巴岛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海岸线外，第勒尼安海和利古里亚海之间，是托斯卡纳群岛的主岛，也是仅次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意大利第三大岛。根据1814年的《枫丹白露条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流放至此，当时此岛为法国领地。

(2) 米歇尔·纳伊（1769—1815），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的军事指挥官，拿破仑一世的十八位元帅之一。1802年9月，他任驻瑞士军队总司令兼大使，1804年5月19日获法国元帅权杖。

(3) 德穆尼尔（1751—1814），散文家，法案评议委员会成员。

(4) 亚略巴古是“阿瑞斯的岩石”，又称“战神山议事会”。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典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亚略巴古”一词也可以指现代希腊的最高上诉法院。

(5) 雷根斯堡是今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上普法尔茨行政区和雷根斯堡县的首府，天主教雷根斯堡教区主教的驻地。

第14章　拿破仑·波拿巴称帝

精彩看点

《亚眠和约》后的英法关系——英国报纸的挑衅——对英国的不满——与英国媒体直接对抗——逮捕所有在法经商和旅游的英国人——与普罗旺斯公爵谈判——乔治利用莫罗将军对抗拿破仑——英法两军对峙——昂吉安王子被捕——昂吉安王子之死——重返公安部——拿破仑称帝——拿破仑的家庭情况——奥坦丝与路易·波拿巴的婚事

然而，第一执政不仅需要面对纷乱的德意志，还要面对加莱海峡[(1)]对面蠢蠢欲动的英国。不出所料，《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是短暂的，因为怀疑第一执政的诚意，所以英国内阁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愿交出好望角、马耳他和亚历山大城。然而，拿破仑根本不想理智地处理英国报纸的恶意言词，因为他认为那些措辞是在挑衅自己的权威。而法国的公安竟然毫无尊严地与英国媒体直接对抗，这真是十分荒唐的做法。英国政府总是以舆论自由为借口来直接搪塞法国公安的每一条控诉，并表示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依靠法律办事。因为此事，第一执政大怒，又因为听信了一些不恰当的建议，所以拿破仑惩罚了贝尔蒂埃[(2)]。在英国，拿破仑的行为掀起了签名热潮，众多英国精英联名向他发起论战。

拿破仑对英国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他说："那边吹来的每一阵风都带着英国人对我的敌意。"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撕毁和约。对他而言，和平是他进行对外扩张的绊脚石，而且它也间接地损害了他在国内的威望。另外，和英国记者的论战也唤醒了国内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于是，第一执政决定封锁法国同这个自由民族的所有联系。同时，法国媒体开始猛烈地抨击英国政府及其制度。而失去公安支撑的第一执政，只能依靠外交部来误导法国民众的想法。和平的天空乌云密布，但内心惶恐的拿破仑似乎已经停不下来。

然而，指责拿破仑的声音不仅仅来自于充满敌意的英吉利海峡。人们指责他吞并了皮埃蒙特大区和厄尔巴岛，控制了托斯卡纳和帕尔马[(3)]，在利古里亚共和国[(4)]和赫尔维蒂共和国[(5)]强行制定并推行法律，把荷兰当作法国的行省，以进攻圣多明戈为由在布列塔尼布置大军，大规模派兵进驻河口，吞并路易安那[(6)]……最致命的是，还有人披露了法国炮兵伪装成商人以贸易的名义侦察英国港口的行为，他们说法国人正秘密谋划偷袭英国。

指责英国拒绝归还马耳他成了第一执政的唯一武器，但英国方面说《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政治局势突变，所以他们认为协议需要经过微调之后才能生效。

很明显，在面对英国的政治行动时，我们缺乏谨慎的筹划。如果拿破仑想要跟英国保持和平的话，他就应该更加宽容地对待印度问题，对塞巴斯提亚尼[7]出使叙利亚和土耳其的成果保持低调，从而避免让英国这个强国心生疑虑。拿破仑同惠特维尔公爵的会面加剧了英法两国关系的恶化，而这次会面也成为拿破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我看来，正是从那时起，拿破仑的执政方式开始变得异常乖张和激进。



《亚眠和约》的签订现场



讽刺《亚眠和约》的漫画：军官代表法国，贵妇代表英国，他们身边都放着武器，看起来友好，实际上各怀鬼胎。军官亲吻贵妇，对她说："夫人，我非常尊敬您，被您的美貌深深吸引。"贵妇说："您真是一位有修养的绅士，您的吻让我脸红，但我不能拒绝您，虽然我知道您在欺骗我。"



讽刺漫画：展现了拿破仑对法国和英国关系的愤怒

1803年5月22日，法国出台法令，逮捕了所有在法经商和旅游的英国人。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敢如此公然地侵犯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幸的是，外交部长塔列朗则成为这项法令的最大牺牲者。他曾经向生活在法国的英国人承诺，英国大使馆的撤离绝不会影响他们在法国居留期间的任何权益。试想一下，倘若当时的塔列朗勇敢地辞掉了外交部长一职，那么拿破仑该如何应对风云变幻的欧洲政局呢？而面对随之而来的疯狂的反法行动，法国又该如何自处呢？虽然我的确很庆幸我可以置身事外，但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在强权面前，我会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苟且偷生呢？我想我还是会表明我的不满吧。

没过多久，拿破仑便控制了布伦瑞克-吕纳堡选侯国，封锁了易北河和威悉河，那时的他一心想向对岸发起进攻。法国军队驻扎在奥斯坦德[8]、敦刻尔克[9]以及布洛涅[10]的绝壁上，土伦、罗什福尔[11]和布雷斯特军营的将士们则整装待发，船坞上的各类战舰森罗密布。英国方面也采取了严密的防御措施，全民皆兵，不仅出动了四百六十九艘军舰和八百艘巨轮来守卫海岸线，还在多佛尔、塞萨克斯郡、肯特郡布置重兵，严防死守。就这样，英法两军隔着英吉利海峡对峙着，

敌方战舰时不时地向我军发起挑衅。

两军对峙拉开了新一轮海战的帷幕，也意味着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而英国的另一个政治目的则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很久之前，伦敦政府就已经得知，拿破仑在默默地筹备称帝，准备继续查理曼大帝[(12)]未竟的事业。自从我离开政府后，他们便更加确信，共和已经形同虚设，没有人能阻挡拿破仑称帝的雄心。所有来自巴黎的消息都证实了这一点——不久之后，拿破仑将会加冕称帝。然而，不敢贸然称帝的他，希望普鲁士内阁，这个完全听任他指挥的政府能与保王党斡旋。当时，担任部长的霍格沃茨[(13)]派华沙政府的摄政王梅耶与普罗旺斯公爵进行谈判，向其承诺了丰厚的补偿金以及优渥的社会地位。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著名的回应：

> 我不知道上帝为我和我的家族安排了什么样的未来，但我知道，他带我来到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作为基督徒，我会用尽所有的力气来履行我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作为路易九世[(14)]的后裔，我会以他为榜样，即使身处牢笼也决不投降；作为弗朗索瓦一世[(15)]的后人，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像他一样说：虽然我失败了，但我们仍觉光荣。

此后，法国所有的王公贵族都进行了宣誓。

我之所以能够了解此事，是因为这与乔治和莫罗的谋逆以及昂吉安公爵之死[(16)]息息相关。因为策反王室的计划失败了，所以拿破仑不得不暂时搁置了自己的计划——在1803年的下半年里，他的计划基本上毫无任何新的进展。

政府似乎在全力迎战。然而在伦敦，另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乔治准备利用莫罗对拿破仑的不满情绪来联合保皇派和独立爱国者共

同反抗拿破仑，然而，很明显他们没有能力秘密行事，当一个分支暴露之后，这些人的谋反活动就迅速失败了。接到戈海勒的告密之后，瑞尔立刻向第一执政禀报了此事。

因为此事太过骇人听闻，所以，难以置信的拿破仑便来询问我的看法。虽然我认为此事大有蹊跷，但在没有任何明确线索的情况下，即使我马上官复原职彻查此事，我也很难取得明显成果。至于那位大法官，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事件。于是，我向第一执政推荐了第一秘密分队的领袖德马雷和国务委员瑞尔，并且建议以瑞尔为两人小分队的负责人。毕竟瑞尔是第一个接到告密的人，因此，他应该更加乐意完成此事。况且在缪拉被任命为巴黎市长后，作为其亲信的瑞尔也可以更方便地获得军方的支持。

经过层层追查之后，让-夏尔·皮什格鲁、莫罗和乔治浮出了水面。如此一来，这次针对拿破仑的谋反活动便成了他铲除莫罗的好机会。在拿破仑看来，他们足以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来除掉莫罗。然而，暗杀昂吉安王子的行动险些让这个想法成为泡沫。



少年时期的昂吉安公爵

我早就听说了科兰古[17]和澳德内尔[18]在莱茵河边的行动，然而，当我得知昂吉安王子被捕，并且将由斯特拉斯堡转押到巴黎时，我才知道这个贵族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于是，风月19日（1804年3月20日）早上九点，我立即赶到马尔梅松，找到了第一执政——那个时候，第一执政正一个人在公园里走来走去。发现他后，我立刻走了过去，向他请示我是否可以和他谈一谈这件刚刚发生的大事。

他说："我知道您来这里的目的，虽然我今天的动作很大，但这是必须的。"

我告诉拿破仑，我们不能贸然处决昂吉安公爵，尤其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在埃滕海姆有反叛行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贸然

处决了他，那么此举必然会搅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

他大喊道：“需要什么证据？不就是一个最危险的波旁家族的人吗？”

我据理力争，希望能用国家关系等理由来平息他的冲动，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不仅如此，我的行为还招来了他的怨气：“你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会成为法国的蒙克，最后会复辟波旁王朝吗？这次，你们就好好看看吧，绝对不会有任何倒退。拿一个国王的鲜血祭奠革命不是最让你们放心的事情吗？而且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我的周围充满了阴谋诡计，这一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说完这些话后，他便进了城堡。随后，我看见塔列朗赶了过来，接着，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也跟了过来。最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坐上了车，回到了家。



科兰古

第二天我才得知，在我走后，拿破仑便召开了内部会议，并且当晚便命萨瓦里[19]处决了那位不幸的王子。据说，如果不是因为昂吉安王子一事，那天里，萨瓦里就可以顺藤摸瓜地解决乔治谋反一事，逮捕贝里公爵和阿图瓦伯爵。

瑞尔告诉我说："第二天早上，我去文森堡[20]找王子，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被处决了。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拿破仑居然会这么快便处决他，我原本以为他会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呢。"

但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他要用一种强硬的方式让欧洲知道，所有对他心怀不轨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虽然这件事的后果比我预料的还要严重，但我并不敢妄加评论这种侵害国家甚至人类权益的行为。那时，我只是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这不是罪过，这是个错误。”后来，这句话被人们不断地引用和传颂。

虽然莫罗事件暂时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它也带来了真正的危险。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莫罗只不过是拿破仑忌妒心的牺牲品，因此，处决莫罗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军队的动乱。大部分将军都表示他们不满此决断，勒古波[(21)]、迪索尔、麦克唐纳以及马塞纳等人更是宣布自己要效忠莫罗，而蒙西则直接表明宪兵队不会配合拿破仑的行动。

在这危急关头，拿破仑却躲在圣克劳德的城堡里闭门不出。我向拿破仑写信陈述了情况，两天后，依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的我决定前往拿破仑的住所，告诉他再往前一步便是深渊。但他的回应中有着一种不安的坚定。



萨瓦里





处决昂吉安公爵的地点——文森堡

我对他说："我不同意牺牲掉莫罗，并且我也反对一切极端的措施。现在，您需要做的是缓和矛盾，因为暴力代表着软弱；现在，您的慈悲将远胜断头台的力量。"

认真听完我的陈述，尤其是听完我对他的处境分析后，拿破仑决定宽大为怀，免除莫罗的死刑，改判为流放。他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吗？

我听说有人夸大了责罚，怂恿莫罗逃避法律的责罚，让他铤而走险，召集士兵造反。然而在更真诚的建议之下，莫罗还是选择了服从法律的判决，因此，到最后，所有想要致莫罗于死地的尝试都失败了。之后，拿破仑召我前去圣克劳德，派我去了解这件微妙的事情。接到命令后，我先去拜访了莫罗的妻子，并尽力安抚了她内心的不平。然后，我见到了莫罗本人，向他指出，如果他继续留在巴黎的话，他便不得不接受两年的监禁——这等于把自己置于敌人之手，因此，他最好接受流放。事实上，对于莫罗来说，这两条路同样凶险，因为在流放途中，他也可能遭到暗杀。最后，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从加德斯[22]逃往了美国。

第二天，我在圣克劳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从人们的溢美之词中，我知道，隆恩又一次降临了。

我建议拿破仑称帝，建立自己的王朝，以此来打消人们的疑虑。可是，革命党人，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现实，何苦还要拼命保卫共和原则呢？况且所有人都清楚，只有拿破仑才能保全我们的财富和尊严。在莫罗事件结束前，拿破仑动用所有的资源，促使法案评议委员会出台了法案，指定自己为国王，并且使自己获得了王位世袭的权利。同时，为了适应君主制政体，拿破仑还在尊重人民权利、遵守自由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政府进行了相应整改。

在塔列朗的带领下，立法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五百人院的宣誓。5月16日，三位国务委员向参议院提交了计划书——当天，这个计划书便通过了特殊委员会的审核。按照计划书，首先，拿破仑将向参议院申请获得国王的头衔；紧接着，包括我在内的参议院全体成员一到达圣克劳德，拿破仑就立刻宣布他将接管参议院；然后，拿破仑将在帝国的各位部长和其他重要人士面前宣誓。

拿破仑的誓言包括：在即将到来的两年任期内，我将会恪守平等自由的原则，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失，并且依据法律的规定，不增收任何税费。

从一开始，拿破仑帝国就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可这又是谁的责任？现在，我不是在反对当时的参议院，而是当时，我确实没有发现参议院出台任何预防性条款。参议院只是列了下面这一项条款：

“拿破仑家族享有王位代际传承的权利，代际传承遵循长子继承制。不过，在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拿破仑可以选择其兄弟的子嗣为王位继承人，而被选中之人则成为拿破仑的直系亲属。”

所有了解拿破仑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该条款的用意所在。也许只

有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23]才能写清楚拿破仑特殊的家庭环境。在这里，我只能试着指出一些关乎历史真相的要点。

拿破仑心里很清楚，第一，约瑟芬不能生育，第二，自己迟早会步入暮年。约瑟芬也不得不面对两个棘手的问题——失贞和离婚。可以说，自从拿破仑当选为第一执政以来，约瑟芬就知道，总有一天，这个人会登上王位。而正因如此，她的忧虑才与日俱增。约瑟芬这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女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女儿奥坦丝[24]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奥坦丝就不喜欢母亲的丈夫拿破仑，虽然她厌恶这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岁的增长，拿破仑身上的光环效应让这个女孩对他的感情慢慢发生了变化。奥坦丝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栽培，虽然她算不得国色天香，但也是一个聪慧、优雅、德才兼备的人，再加上母亲约瑟芬的关系，她在宫廷的生活更是如鱼得水。就这样，母女两人征服了拿破仑那颗高傲的心。



奥坦丝

当她的母亲约瑟芬提议把她许给路易·波拿巴时，所有人都知道此举的用意所在。殊不知，当时的拿破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因为想要确保王室的正统血脉，所以他也肯定了这桩婚姻。此后，奥坦丝和拿破仑的兄弟路易结成联盟。

在这桩婚姻中，除了这位新驸马外，所有人的心愿都得到了满足。奥坦丝给自己的一个儿子起名为拿破仑，而拿破仑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在拿破仑登上帝位之时，这个孩子已经成长为一个让他另眼相看的翩翩少年，当时所有人都相信，拿破仑希望过继这个孩子的心愿非常强烈。

(1) 加莱海峡，也就是多佛尔海峡，是英吉利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晴朗的天气下可以用肉眼观望到对岸海岸线及沿岸建筑物。

(2) 著有《朦胧》以及一系列批评波拿巴和波拿巴家族的书籍。

(3) 帕尔马是今意大利帕尔马省首府。中世纪时，帕尔马成为贯通罗马与欧洲北部的要塞。文艺复兴后，该地成立了帕尔马公国。

(4) 利古里亚现为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邻海大区。

(5) 赫尔维蒂共和国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在瑞士邦联的领土上建立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798年4月12日，赫尔维蒂共和国成立，1803年3月10日解散。在瑞士历史上，这段时间的瑞士被称为赫尔维蒂。这个名称来源于欧洲古代的赫尔维蒂人。

(6) 路易安那州是美国的一个州，位于墨西哥湾沿岸。1682年，法国人热内-罗贝·卡瓦利尔宣布“路易安那”是法国属地。1762年，西班牙从法国手中得到“路易安那”殖民地。该地已有大量的法国移民居住，因此该州至今都是美国主要的法语地区之一。

(7) 即巴斯蒂安·塞巴斯蒂亚尼·德·拉波塔（1771—1851），法国军人、外交官和政治家。年轻时加入法国革命军队，成为拿破仑·波拿巴的支持者。

(8) 奥斯坦德是位于今比利时佛兰德省的一座城市。

(9)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诺尔省的临海市镇，不远处便是法国与比利时边境。

(10) 布洛涅是法国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

(11) 罗什福尔是法国的一座城市，始建于17世纪。这里曾是法国和英国的天然界线，被法王腓力四世购入。后又转让给英王爱德华三世。法王查理五世后来又夺回。法国海军创建后，罗什福尔被选为海军的基地。

(12) 查理曼大帝（742—814），欧洲中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国王。自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查理曼首度统一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为后世的法国、德国以及低地诸国成为民族国家打下了基石。

(13) 霍格沃茨（1752—1832），普鲁士政治家、外交家。自1792年起，霍格沃茨担任普鲁士外交大臣。

(14) 路易九世（1214—1270），绰号“贤人”，在位超过四十三年。1297年，罗马教廷封他为“圣人”。路易九世是一名大刀阔斧的改革者，试图在法兰西王国内实现公平。当今人们认为他促进了法国经济、知识和艺术复

苏。

(15)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即位前通常称“昂古莱姆的弗朗索瓦”。他被视为开明的君主、多情的男子和文艺的庇护者，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在他统治时期，法国繁荣的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潮。

(16) 昂吉安公爵（1772—1804），法国孔代家族的第十位继承人。其教父为路易十六，教母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1804年，昂吉安公爵被怀疑参与了保王党人的阴谋，伙同查理-弗朗索瓦·杜·佩里埃·吕穆策划阴谋叛变，被拿破仑处死。

(17) 科兰古（1773—1827），军事家、外交家。1804年，科兰古奉命前往斯特拉斯堡，铲除昂吉安公爵。

(18) 澳德内尔（1755—1811），法国大革命时期将领。

(19) 萨瓦里（1774—1833），拿破仑的亲信，曾担任第一帝国公安部长。

(20) 文森堡曾是法国非常重要的皇家军事要塞，建于1337年至1373年。它是法国现存的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要塞。

(21) 勒古波（1759—1815），法国大革命时期将领。因为支持乔治·卡杜达尔而遭到贬黜，路易十八时期恢复名声。

(22) 加德斯是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座滨海城市，加德斯省的省会。

(23) 苏埃托尼乌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属于骑士阶层。他最重要的现存作品是从恺撒到图密善的十二位皇帝的传记，即《罗马十二帝王传》。

(24) 奥坦丝·德·博阿尔内（1783—1837），荷兰王后，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和博阿尔内子爵的女儿，拿破仑一世的继女，拿破仑一世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拿破仑三世之母。

第15章　第一帝国向英国宣战

精彩看点

分封帝国元帅——重组朝堂——出任公安部长——全力指导最高警局的工作——构建警务网络——在亚琛接见各国使节——逮捕英国大臣安伯特——邀请教皇为拿破仑加冕——破坏英俄联盟——修复法俄关系——巴黎加冕仪式——拿破仑在米兰加冕——拿破仑向英国宣战——法国海军出师不利

然而，人们却不怎么关心拿破仑准备加冕这件事，各地的欢庆活动都十分冷清——这件事遭到了冷遇。

拿破仑没有料到法国人民的反应居然如此冷淡。不过，这也难怪，毕竟他似乎只想着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他经常封赏自己的大将，授予他们元帅军衔，当然，这些人大多是他最忠心的手下，以及他无法排挤的对手。

这些人包括贝尔西耶、让·拉纳、缪拉、勒费弗尔、贝希埃尔[(1)]、达沃斯特[(2)]、苏尔特[(3)]以及具有一定共和精神的马塞纳、儒尔当、贝纳

多特、纳伊、布律纳和奥热罗等元帅，佩里尼翁[(4)]、索绪尔、凯勒曼[(5)]和莫何耶[(6)]也是元帅军衔，当然，他们几人基本可以认为是用来凑数的。就这样，帝国的十八位元帅[(7)]诞生了。

众所周知，重建朝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那些被革命摧毁了的皇家仪式——如早朝、晚朝、觐见等——又悄悄地走进了革命党人的生活之中，虽然人们唾弃它们，但他们却又快速地适应了这些滑稽的模仿。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说到底，这本就是改朝换代的必然结果。

虽然拿破仑很擅长管理军队，但他似乎并不擅长治理国家。首先，虽然他擢升冈巴塞雷斯和勒布伦为法务大臣和财务大臣，但此举并没有使内阁的构成更加平衡。同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内阁根本不像一个议事机构，反倒更像是一个集权机构。所有的新任大臣中，只有塔列朗具有一定的个人影响力，但可惜的是，这种影响力也仅仅局限在国外。在国内，负责保卫帝国安全的公安部长之职空缺，很明显，拿破仑也没发现合适人选，因此，在7月10日颁发的皇帝诏令中，我被任命为公安部长，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比之前更大的权力。

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有必要加快我的叙述速度了，毕竟，我还要讲述接下来六年的故事。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不会遗漏任何重要的历史细节。


佩里尼翁


凯勒曼


莫何耶

接到皇帝诏令的两天前，我曾奉拿破仑的旨意来到圣克劳德，参加了一次特殊会议。在那里，我向拿破仑汇报了我关于组建新公安部的意见和建议。

瑞尔其实也很想担任公安部长一职，这个在乔治谋反案上兢兢业业的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侦探和分局领导，但很明显，他没有能力来控制公安部如此庞大的机器。不过，如果他放弃公安部长之职的话，他就可以很轻松地获得一笔丰厚的酬金，并且出任国务委员，成为四名公安政务委员之一来协助我的工作。另外三名公安政务委员分别是冈巴塞雷斯的心腹佩雷[(8)]、约瑟夫·波拿巴的心腹弥永[(9)]和巴黎公安局局长杜波瓦。

四位公安政务委员每周都要来我办公室一次，向我汇报各自分管范围内的情况。针对他们的汇报，我会做出相应的决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脱身，集中精力去处理最高警局的工作，尤其是监视德马雷负责的秘密警署[(10)]的活动。虽然德马雷头脑灵活，但他目光短浅。

毫无疑问，在不同层级的各个部门间，我都安排了眼线，雇用男

女特务深入了解情况。依照工作任务的性质和重要性，这些人每月都可以领到一千到两千法郎的报酬。和这些人签订合同之后，我可以直接收到他们的书面报告。为了确保这些人各司其职，并且获得相应的经济或地位补偿，每过三个月，我都会向拿破仑做一次汇报。

警惕友国的动向，瓦解敌国的阴谋，是公安部在国外的主要工作。为此，警署在各层级各重大城市都安排了特务人员。这些肩负特殊任务的人，或是通过外交部被派往国外，或是接到拿破仑的直接指令，被安插在这些人中间。为了掌握国外的重要情报线索，和政府领导人一起管理或者平衡外交部的相关工作，我也会在国外安排自己的眼线。同时，我还会派人搜集一些小道消息，并命专人分析整理这些消息。

但我的工作却不仅仅局限于间谍工作，比如说，我还掌管着包括宪兵营房在内的所有国家监狱，此外，我还负责签发一切护照和签证，监管所有的外国人、大赦后的人和海外流亡贵族的活动。为了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在全国主要城市和边疆地带，我都设立了相应的警务工作部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波旁王朝的三位王子[(11)]都已经为我所用——他们每天都要向我汇报他们的观察结果。

当然，我也承认，这样的警务网络需要耗费巨额资金，为了解决这几百万的财政压力，政府会对赌博、卖淫和护照进行征税。虽然所有人都应该反对赌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政府财政如此拮据的形势面前，利用丑恶也纯属无奈之举。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国民政府。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在现在的复辟政府中，博彩业依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赌博属于无可避免的罪恶，我们能做的是去规范它，让它能够有序地进行下去。

不过，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不只有警务网络，比如说，为了装点门面，新帝国需要修整三十多处宫殿，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将近四亿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更大范围地支持博彩业。于是，为

了管理博彩业，保证其有序进行，我任命沛函为博彩业的总负责人。在拿破仑加冕之前，沛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赌场，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得到任命后，他开始大力推广博彩业，将其推向了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于是，每天政府都可以入账一千四百万法郎。作为公安部长，我每天可以拿到三千法郎，但剩下的钱并不完全掌握在我手上，当然，这些钱也不会凭空从我的办公室消失。

精心布置的、周密的警署情报网络使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所有的重要信息，可以向拿破仑及时指出民意的走向。我并不想隐瞒那些不断针对拿破仑集权的疑虑甚至恐怖行动，当然，我也可以直接采取行动。作为公共安全的保卫者，为了法国的利益，我可以抗议和监管所有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办法如自己所愿，把警署的工作限定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上，那么至少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做的好事是多于坏事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避免了很多因为拿破仑的冲动决断而造成的恶性事件。

这是我第二次出任公安部长之职，与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相比，其实我更希望民众能够心怀敬畏、主动接受管理。于是，我便重新采用了之前的工作方式：只要有三人在一起私下讨论公共事件，那么第二天，他们的谈话就一定会传到公安部长那里。当然，我也会有足够的能力让人们相信，在任意地点的四个人当中必定会有我的眼线。毫无疑问，这种管理方式会造成普遍的腐败，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眼泪和悔恨！

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庞大而恐怖的国家公安机器，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我需要负责的事务有多么的繁杂和庞大。

第一帝国是在一片不祥之光中匆忙诞生的。对于这样的帝国，民众充满了敌意。针对拿破仑本人、拿破仑的家庭以及朝堂的嘲笑甚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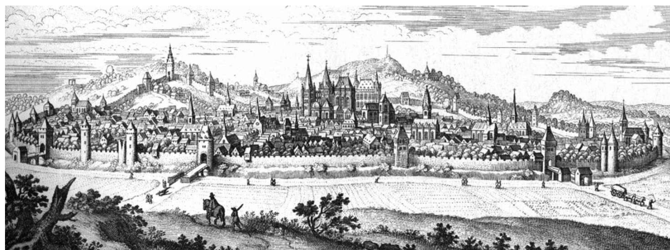
攻击更是层出不穷。为了分散巴黎人民的注意力，我建议拿破仑暂时离开巴黎，做一次短途巡游。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且选定了布伦作为这次巡游的第一站。在布伦，拿破仑受到了当地驻军的热烈欢迎。离开布伦后，拿破仑又前往亚琛[12]，在那里接见了各个重要国家的使节，并获得了除英国、俄国、瑞典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认可，可谓是收获颇丰。接着，他又去了附近的几个省份，在美因茨[13]，他接待了诸多德意志的王公贵族。当年秋末，拿破仑重新回到了圣克劳德。

在处理欧洲的政治问题时，直来直往的方式往往行不通，对于领导人而言，不断地周旋或许可以达到更好的平衡。但某一次，拿破仑的冲动行为险些让法国付出惨重代价。在汉堡，他命一小队士兵带走了英国大臣安伯特，同时，他还拿走了部长的文件，并把它带回了巴黎。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震惊了整个欧洲，塔列朗和我都担心昂吉安王子的悲剧再次重演，于是，我们尽自己所能减轻安伯特的罪行，使其免受重罪法庭的责罚。拿到这位部长的文件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掩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所以，当普鲁士介入的时候，我和塔列朗暗中庆幸，于是，我们顺水推舟地释放了安伯特。不过，作为附属条件，安伯特将永远不能再出现在汉堡以及法国边境方圆五十里内的地方。

对于拿破仑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我无力反抗，也无处躲避。皇帝可以无视任何法律形式，甚至直接命巴黎公安局执行命令，对此，我又能如何呢？更不用说，我还需要应对巴黎公安局局长杜波瓦或多或少的敌意。在马莱特将军[14]事发时，杜波瓦就直接向拿破仑告发，说我暗中保护了马莱特将军，并且提前把政府准备调查他的事情通知了马塞纳，此举使马塞纳成功地隐藏了重要文件。但事实上，这起事件是军队以及秘密警署内部的阴谋，我向拿破仑说明道：“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马塞纳免受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攻击。”



19世纪的美因茨



雕版画：亚琛城全貌



马莱特将军

那时，英俄两国已经有了合作的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第三次反法同盟将会出现。于是，我们在圣克劳德召开了几次重要的秘密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邀请教皇来为拿破仑加冕，破坏俄国和英国的联盟。然而，这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顺利。一开始，教皇的态度便让我们碰了钉子。教皇宣称除非出于宗教的需要或是查理曼大帝时代真的已经来临，否则不会为拿破仑加冕。

与此同时，破坏英俄联盟的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昂吉安王子被处决后，瑞典国王便亲自前往德意志，准备挑拨法德关系。为了阻止他的行动，我们在路上设下了重重阻碍，甚至在慕尼黑，我们差一点就除掉这个人了。

对我来说，修复法俄关系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俄国曾试图调停

法英矛盾，在维持两国和平未果后，英法两国仍处于僵持阶段。在僵持期间，昂吉安王子事件又激怒了欧洲政坛。5月7日，在雷根斯堡的议会上，俄国部长请第一帝国就侵犯俄国领土一事做出相应补偿。此前不久，圣彼得堡的内阁曾表示，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言辞——同意法国在德意志逮捕暴动人士，存在着很大虚伪的成分。

对于这一说法，沙皇心里并不是很痛快，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战争，而这很有可能会推翻拿破仑经营的反英阵营。于是，有人建议我们用美人计来拉拢俄国。我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荒谬至极，在内阁中我说道：“这种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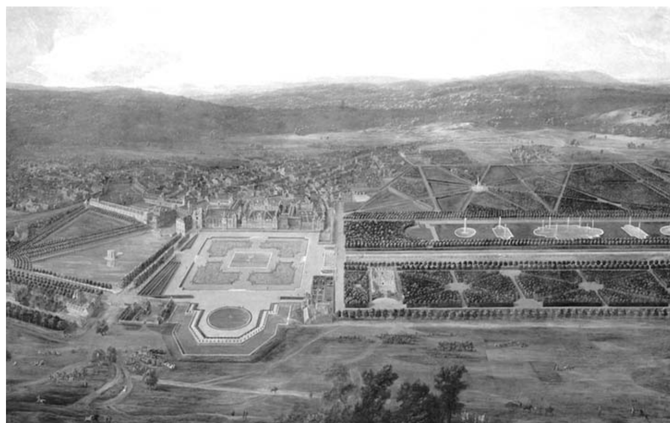
拿破仑对我说：“什么？先生！您这样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竟然也会如此的畏首畏尾！这十五年来，您见过多少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了呢！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路易十六在断头台前低下了头，奥地利公主、法国王后在断头台前脱下了裤袜和鞋子。而您，作为帝国的部长，您的字典里怎么能有‘不可能’这几个字呢？”

我当然知道，拿破仑这番言论是故意针对我的，因为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他耳边吹风，说我在插手昂吉安王子事件。面对这样的言辞，我很镇静地回应道：“没错，我应该记住陛下您曾教导我们的话，法国的字典里不存在‘不可能’这三个字。”

是的，在法国字典里，“不可能”这三个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拿破仑曾以让人瞠目结舌的方式证明了此事。就在11月25日，教皇庇护七世被迫离开了罗马，抵达枫丹白露。八天之后，也就是加冕的前一天，参议院向拿破仑提交了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三百五十万法国人支持帝国。而在参议院当天召开的会议上，参议院副主席弗朗索瓦还在讲着共和精神。现在想来，这真是滑稽。

大臣们以及政府官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加冕仪式，在仪式上，拿破

仑夺过了王冠，为自己加冕。最开始的时候，下面只有零星的欢呼，接着，一阵又一阵机械的掌声出现了。然而，回到宫殿后，拿破仑却又不得不面对那种似曾相识的冷清。从我所掌握的情报看来，他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渡过难关。



枫丹白露宫

不久之后，我们便察觉到，拿破仑正在酝酿着另一件大事。在内阁，他向人们宣布他将要成为意大利国王，我们劝阻他说他这样做是在挑起战争。

他反驳道：“现在，我需要战争带给我胜利。”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对英国的战事准备也没有受到影响。有一天，我明确表示我反对他两线作战。

他回应道：“我的理想是征服海洋，而不仅仅是这几寸土地。在反法同盟出现之前，我必须攻下英国。我根本就不害怕那些老欧洲。面对我的攻击，英国人一定会措手不及。而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不过是些没什么性格的无能之辈罢了。”

在米兰的加冕和在法国的加冕如出一辙。加冕结束后，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了巡游。看到风光旖旎的热那亚时，拿破仑大声呼喊

道："这场战争，值了！"紧接着，他又四处巡游了一段时间，壮美的皮埃蒙特大区更是令他流连忘返。

回到布伦后，他便加紧军队建设，准备跨越英吉利海峡。然而，如此庞大的计划真的能够成功吗？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的。因为任何一点意外都有可能改变整场战争的结局。毕竟，法国的海军非常弱小，根本不能和法国的陆军相提并论。

征服开始了，来自布雷斯特、罗什福尔、洛里昂[15]、土伦[16]和加德斯的五十艘战舰齐聚马提尼克[17]海域，然后驶向布伦，它们将掩护十四万将士和十万匹马登陆英国。



拿破仑的加冕礼


教皇庇护七世（坐者）


加冕后的拿破仑

在拿破仑看来，只要部队能够成功登陆英国，那么攻克伦敦便指日可待。拿破仑坚信，在他的大军面前，英军将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到时候，他会在英国建立新的人民党重组政府。我们拿到的所有情报都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但不幸的是，法国海军出师不利，登陆英国的行动并没有如拿破仑所设想的那般顺利。一方面，拿破仑不能像调动陆军那样精准地调动海军，另一方面，拿破仑深知他信任的海军部长德凯斯(18)无法应对变幻莫测的海上作战环境。德凯斯深信他的朋友海军司令维尔纳夫(19)一定能妥善应对接下来的一切，但他的盲目信任使法国海军遭到重创。

---

(1) 即让-巴普蒂斯·贝西埃尔（1768—1813），法国军人、拿破仑麾下的元帅、帝国近卫军司令，获封伊斯特利亚公爵。1798年4月升任上校，参加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在阿克雷包围战和阿布基尔战役作战十分英勇，赢得荣誉。和拿破仑回到欧洲，作为近卫团骑兵第二指挥官参加了马伦哥之战。1802年9月升少将。1804年受封法国元帅，担任最有名的帝国骑兵卫队上将。1805年，他率卫队九千骑兵在奥斯特利茨与俄国近卫骑兵展开白刃战，

获大鹰荣誉勋位。

(2) 即路易·尼古拉·达沃斯特（1770—1823），法国军人和政治人物，第一帝国元帅。先后受封奥尔施泰特公爵及埃克米尔亲王。他富有韬略，对军纪素来严苛。他对拿破仑一世忠心耿耿。波旁王朝复辟后，他要求联军不追究皇帝以及追随他的将领们，但路易十八并未遵守诺言，达沃斯特被剥夺贵族称号，流放至卢维耶。1819年3月，由于乌迪诺元帅求情，他被恢复贵族称号。

(3) 即尼古拉·让·德迪乌·苏尔特（1769—1851），法军将领和政治人物，绰号“铁手”，以作战英勇和政治投机而闻名，受封达尔马提亚公爵。

(4) 即凯瑟林-多米尼克·德·佩里尼翁，（1754—1818），第一代格勒纳德侯爵，荣誉法国元帅。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复辟时，他宣布效忠路易十八。拿破仑百日王朝期间，他被剔除出元帅名单。

(5) 即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凯勒曼（1735—1820），第一代瓦勒米公爵，法国军事指挥官，陆军上将，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元帅。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担任不同角色，经历了两个划时代的所有冲突。

(6) 即爱德华·阿道夫·卡西米尔·约瑟夫·莫何耶（1768—1835），封特雷维索公爵，拿破仑的元帅之一。1803年，英国对法宣战，他领兵占领汉诺威。1804年晋升为中将，5月被授予元帅称号。

(7) 包括拿破仑。

(8) 佩雷（1759—1842），吉伦特派著名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曾在公安部工作，但并不喜欢约瑟夫·富歇。

(9) 弥永曾担任那不勒斯王国大臣。

(10) 秘密警署存在于1810年至1885年，用来监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11) L王子，C王子，M王子。——原注

(12) 亚琛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是今德国最西部的城市。

(13) 美茵茨是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首府，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茵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美茵茨是政教古都。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美茵茨大主教身兼帝国七大选帝侯之一，驻跸于此，政治与宗教势力权倾一时。

(14) 马莱特（1754—1812），1812年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15) 洛里昂是今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莫尔比昂省的一个市镇，下辖洛里昂区。

(16) 土伦是法国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一个良好的海军基地。

(17) 马提尼克是今法国的一个海外大区。

(18) 德凯斯（1761—1820），法国海军将领，执政府及第一帝国的政治人物。

(19) 即皮埃尔-夏尔-让-巴普蒂斯-西尔维斯特·德·维尔纳夫（1763—1806），法兰西第一帝国海军将领。

第16章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

精彩看点

乌尔姆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建立文字监管制度——平定西部各省——转变公安职能——翁达斯的得宠——确立当代文学基调——约瑟夫·波拿巴出任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拿破仑家族受封——建立新的贵族体系

维尔纳夫计划汇合费罗尔[(1)]和维戈[(2)]的战舰，以及自己麾下的二十艘战舰去增援甘斯特[(3)]的二十一艘战舰。这样一来，在布伦，共计六十三艘的法国战舰和西班牙战舰就会形成一个掩护陆军登陆的人为屏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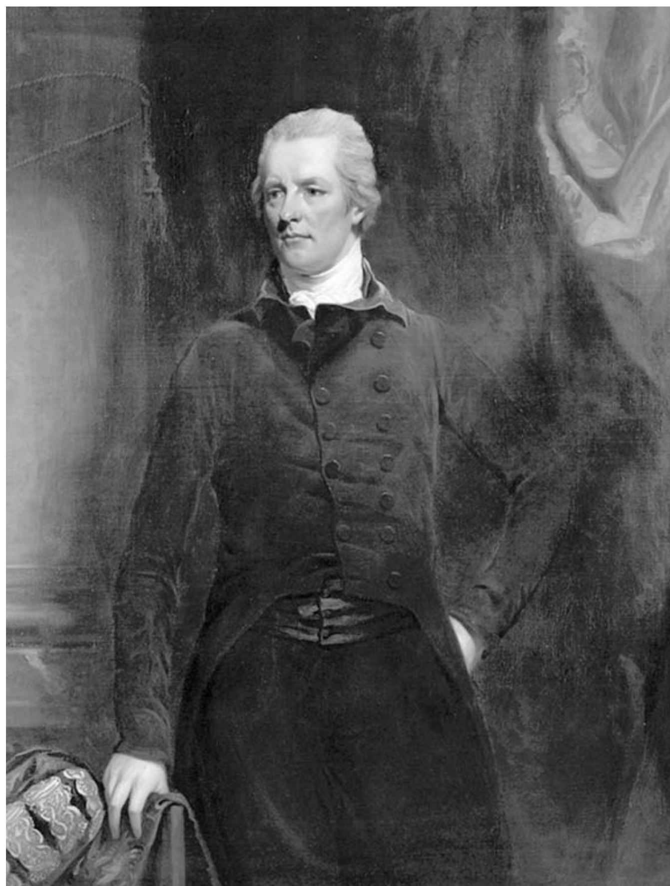
然而，当得知这位总司令没有坐镇前线、指挥作战，而是返回加德斯时，拿破仑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的他命令海军部长对维尔纳夫展开调查，并任命罗西[(4)]为新的总司令。接着，他又希望到时陆军也能登上海军战舰。布鲁斯将军[(5)]强烈反对此事，拿破仑却步步紧逼，两人险些拔刀相向。这件事不仅让布鲁斯失宠，也使一切再无任何转机。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拿破仑未能在英国的事情上如愿以偿，但他却打开了欧洲大陆的荣耀之门——欧洲的战乱岁月因此拉开帷幕。

任何人（包括外交部和我在海外的情报）都不能改变拿破仑对英国的敌对立场，但他也清楚，1804年1月的时候，奥地利部长斯达雄伯爵曾向英国内阁递交了一份希望能够联合英国组建反法同盟的陈情书，他更知道，皮特[(6)]即刻命在俄国的英国使节试探圣彼得堡的意向。毕竟德意志世俗化[(7)]之后，法俄两国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昂吉安王子事件又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收留了悲痛的昂吉安的父亲，俄国驻法大使吴布瑞尔受到了拿破仑的责难。因为此事，俄国提出了让法国撤出那不勒斯王国和德意志北部，并给予撒丁王国[(8)]一定补偿的要求。当时，刚接任公安部长（大臣）的我对拿破仑如是说：“这种要求无异于挑起战争。”

他回答道：“不至于！他们还没有这个打算。现在，只有瑞典的那位疯国王在和英国合计着算计我。不过，没有奥地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您也知道，我在维也纳的根基要比英国人强得多。”

我对他说："您就不担心那些人离您而去吗？"



皮特



讽刺皮特和拿破仑的漫画：皮特和拿破仑分享食物，而这食物正是世界，可见皮特和拿破仑对世界都有强烈的野心

他接着说："上帝的庇佑和我的军队给了我勇气，让我无惧任何人！"后来，拿破仑的这句话也出现在了《箴言报》[9]上面。

或许是政府内部暗箱操作，又或许是拿破仑对自己的部长们有意隐瞒，直到7月份，我们才得知，早在4月11日，在圣彼得堡，法国便同俄国签订了协同作战协定。当时，奥地利也开始有所行动，查理大公[10]也离开了维也纳政府。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法国和奥地利的友好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了拿破仑在意大利加冕的事情后，奥地利的科本茨尔伯爵[11]开始担心起来，他担心拿破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奥地利。虽然塔列朗尽力打消着科本茨尔伯爵在这方面的顾虑，然而奥地利依然主动提出了调节法俄关系的请求，不过，他们却遭到了拿破仑的拒绝。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知道了奥地利正在积极备战的事情。8月15日那天，拿破仑公开宣布，因为奥地利内部出现了一支拥护英国的党派，所以他对英国的作战计划暂时推后。接着，拿破仑傲慢地命令奥

地利撤回军队，维持和平状态。纸是包不住火的，8月18日，奥地利发布了让其军队积极迎战的命令，9月13日，奥地利发布了一系列谴责，谴责法国破坏协定条款，谴责意大利、瑞士和巴达维亚的独立，反对以拿破仑为首的法意联盟。不过，所有的这一切都还只是停留在外交层面，民众还在一心一意地准备着对英国的海战。然而，9月21日，奥地利却毫无征兆地入侵了巴伐利亚(12)。

对于第一帝国的皇帝来说，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样一来，拿破仑就能够以正当理由撤出布伦，集中兵力对付奥地利。于是，大军迅速撤离布伦港，昂首挺胸地向莱茵河挺进。这次撤兵不仅保全了法国海军的尊严，也让新生的帝国免于灭顶之灾。

反法同盟计划集结至少四十万大军，其中，奥地利出兵二十五万，俄国出兵十五万，英国出兵三万五千。依靠着这些集结起来的兵力，反法同盟扬言要让法国撤出汉诺威、德意志北部和意大利，要帮助荷兰和瑞士赢得独立，要帮助撒丁王朝复辟。说到底，反法同盟就是希望摧毁第一帝国，把还未强大起来的第一帝国扼杀在摇篮中。

我们必须承认，拿破仑并不认为仅凭军队便能获得胜利，他常常想起马基雅维利(13)的话：一个老道的国王必须既是狮子又是狐狸。

首次在德意志战场作战的时候，拿破仑便深入研究了作战场地，之后，他对我们说："你们会看到，莫罗的作战策略根本无法和我的作战策略相媲美。"事实上，他非常巧妙地收买了马克(14)，使我军顺利进入乌尔姆(15)。收买盟军的间谍比我们想象得要轻松很多，在这些人的助攻下，我军顺利取得了阿尔维战役和乌木兹战役的胜利。接着，我们便瞄准了意大利的高级将领，在正式开战前，这些人基本已全部倒戈。之后，我把自己手上所有的秘密情报都交给了情报总指挥萨瓦里。拿到这些情报后，在舒尔迈斯特(16)的强大助攻下，萨瓦里对盟军进行了更加猛烈的腐蚀。就这样，盟军被我们撕开了一个口子。普鲁士大帝亚历山大拒绝了盟军邀请出兵的请求：如果是十五天

之前，普鲁士士兵一定义不容辞。就这样，拿破仑破坏了这次反法同盟，但这种战术也有其两面性。

接着，我想说的是特拉法尔加战役[17]中的惨败。这场战争的失败直接摧毁了法国海军，确保了英国的海上安全。攻克乌尔姆之后不久，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拿破仑得知了特拉法尔加传来的消息。贝尔西耶对我说："当我看到这封急报时，我根本不敢报告给就坐在我旁边的拿破仑。当时我双肘压着急件，不知如何是好。"

果不其然，得知此事的拿破仑勃然大怒："我又没有分身术！……"贝尔西耶根本无法让震怒的拿破仑平静下来，于是，在奥斯特里茨的战场上，拿破仑避开了俄国和普鲁士，对英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拿破仑整日整夜地待在军队里，为攻破反法同盟而殚精竭虑，因此，他根本无暇顾及第一帝国日常的行政事务。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内阁全权负责国内事务。由于特殊的职位要求，我基本在监管所有事务，所以我尽量让拿破仑相信，即使他身在战场，所有的事情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巴黎的邮政人员兢兢业业地为他汇报着警署报告中的所有信息。对于拿破仑而言，他希望大家可以相信现在的政府是温和的，并且它会尽可能地赋予大家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当我拒绝批准出版剧作家科林[18]的一部作品时，他假装不满意。在《箴言报》中，他这样说："如果法国人没有出版自由，那么法国算什么法国！"我心里清楚，拿破仑其实是在督促我尽快建立文字监管制度。



拿破仑率军向乌尔姆挺进



拿破仑向受伤的奥地利士兵致敬



马克将军带领奥地利士兵在乌尔姆向拿破仑投降



偷袭特拉法尔加的英国舰队



特拉法尔加海战，英国军舰与法国军舰交战



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被击中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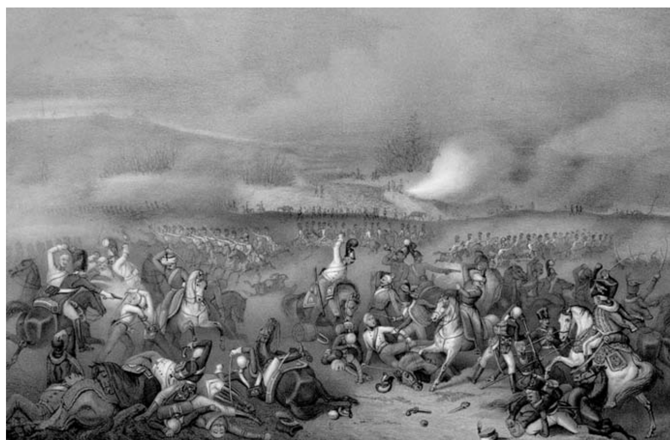
《普雷斯堡和约》[19]确立了拿破仑在德意志、意大利和那不勒斯王国的领主地位。和约签订之后，1月26日，拿破仑返回了巴黎。一回到杜伊勒里宫，拿破仑便因为银行催款的事情向几位政府官员发了脾气，德高望重的老臣巴比[20]更是首当其冲。银行催款的事情源于拿破仑，为了收买反法同盟，他曾向银行预支了五千万法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些钱根本少不了。

和罗马教廷产生分歧之后，拿破仑开始折磨不久前为他加冕的罗马教皇。这次巨大的胜利还带来了其他重要的改变：巴伐利亚和符腾堡[21]建立了选举制度，巴伐利亚公主和拿破仑的养子欧仁联姻——这也意味着拿破仑开始用联姻的方式扩大自己在“老欧洲”的势力范围。

在国内，奥斯特里茨[22]的胜利以及和约的签署使拿破仑的人气大涨：胜利的光环使人们眩晕了。向他汇报民意可喜的变化时，我说道：“陛下，奥斯特里茨的胜利动摇了腐朽的贵族制度，圣日尔曼镇再也无法和您抗衡了。”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法国胸甲骑兵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法军骑兵与俄军骑兵交战



奥斯特里茨战役，俄国骑兵夺下法军的鹰团旗

这番话让他很受用，他向我坦白道：“在战场上，即使是在战事最吃紧的时候，甚至是在沙漠中行军的时候，我都一直关注着巴黎的民意，尤其是圣日尔曼镇那边的消息——就像当年的亚历山大大帝心系雅典一般。”

于是，为了在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很多贵族纷纷涌向杜伊勒里宫和我负责的沙龙。虽然老共和党人因此责备我偏袒贵族，但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毕竟我的目标是融合各党派，让他们各司其职地为政府效力。

软硬兼施之下，拿破仑终于平定了长期被内战撕裂的西部各省份，自此，法国再也没有朱安党、旺代地区、可怕的阴谋以及危险的组织了。虽说还有一小部分贵族在英国负隅顽抗，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已经真心臣服于第一帝国。聚集在波尔多的、最顽固的保皇派社团已经解体，在国内，波旁王朝的眼线纷纷暴露：海德·德·诺维尔[23]到切尔瓦里·德·科尼尼，再到塔隆[24]和罗耶·科拉尔[25]。一些被认为从事危害帝国安全活动的叛徒也受到了严惩，拉洛施男爵被判处终身监禁。

有人举报了塔隆，因此，萨瓦里便派人逮捕了这位年老的贵族，并动用了酷刑。我如实地向拿破仑禀报了此事，之后，萨瓦里受到了拿破仑的批评。与此同时，塔隆的女儿四处为父亲说情，她的行为打动了所有人，所以，她的父亲受到轻判。

我密切关注着政府对这些贵族的量刑，也时刻留心着共和党人的看法，毕竟那时的我也需要获得一定的支持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开始考虑转型公安职能，从之前的严厉调查转向更宽容的工作方式。但新的问题出现了，除了要面对由于忌妒、艳羡而对我不怀好意的同僚外，我更需要应付疑心很重的拿破仑。

这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党人一方面利用宗教排挤革命党人，一方面又用花言巧语哄骗拿破仑。为此，这些人买通了一些报刊来控制民意。表面上，这些人似乎是想保卫经典文学，维护文学品位，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故意丑化革命。在报纸杂志上，这些人鼓吹辉煌的君主制时代，大肆宣扬至高无上的权力。拿破仑则认为《箴言报》已经有足够的影响力震慑国内外。同时，在看到很多地方都在模仿他的治国方式后，他更是充满了信心。

我被认为是民意和报刊的管控者，有人甚至认为我设置了专门负责监管报刊民意的机构。于是，有些人开始嚼舌根，认为我的权力过大，之后，《论战日报》[26]诞生了。这本杂志在我的监管范围之外，其负责人是我的一个私敌。作为对我的补偿，这些人让我负责《文雅信使》[27]，这是为反革命呐喊的杂志。然而，拿破仑还是回应了那些针对我的声音，很快，我所监管的杂志就只剩下《宣传员》和《哲学十年》了。

自从进入立法集团后，翁达斯便广交好友、左右逢源、声名鹊起。莫雷这个正好和议会同姓[28]的人是翁达斯的忠实信徒，他发表了为摩洛哥专制辩护的文章《论道德与政治》。在《论战》上，翁达斯大力赞美了这篇文章。我向拿破仑表达了我的不满，之后，拿破仑

公开批评了翁达斯，但他用了这样一句托词：为了鼓励一个有这样的姓名的天才。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对他说：“我的上帝！翁达斯先生，请至少把文字的共和国留给我们。”但这不过是做样子而已，不久之后，这位御用的年轻散文家便被任命为内阁助理办案员，接着又被擢升为秘密部长。不得不承认，相比于直来直去的阿谀奉承，拿破仑更喜欢翁达斯这种优雅贵族式的恭维。

于是，当保皇派的故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人们认为是确立当代文学基调的时候了。在这个故事里，保皇派的人被描述成伟大的英雄，而革命党人则是一些土匪。这还没完，经过再三修改之后，这个故事引起了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受到侮辱的革命党人的不满。他们居然以侮辱竞争对手的方式来烘托自身的伟大，我觉得我必须纠正这股不正之风。

事实上，《普雷斯堡和约》为法国带来的政治好处远不止这些，继《箴言报》宣布解散两西西里王国朝廷后，拿破仑又下了一道谕旨，他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成了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差不多同时，拿破仑的另一个兄弟路易也成为万众瞩目的荷兰国王。缪拉成为大公国伯爵，卢卡[29]和瓜斯塔拉[30]的领地被作为礼物分给爱丽莎和宝莉娜[31]，勒布伦受封为普莱斯公爵，冈巴塞雷斯受封为帕尔马公爵，贝尔西耶则获得了纳沙泰尔公国的全部领地。

在一次私人会议上，拿破仑宣布，他将把战利品分封给各位功臣，他将在欧洲建立新的贵族体系。在后来一场较大规模的内阁会议上，他询问建立贵族体系是否和大家推崇的平等原则相冲突，我们的回答是不会。事实上，所谓第一帝国的君主制是一种新型的君主制，对我们来说，确立新的军官、政要，建立新的贵族体系是必要的。况且这也意味着消除旧法国的封建残余，达成新旧法国间的和解。



拿破仑最喜爱的妹妹宝莉娜



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波拿巴

---

(1) 费罗尔是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拉科鲁尼亚省的一座城市，位于大西洋畔。费罗尔自波旁王朝以来一直是西班牙海军北方分部的总部，也是重要的造船中心。

(2) 维戈是西班牙西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加利西亚自治区第一大城。

(3) 甘斯特（1755—1818），法国海军将领。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第一帝国时期战争。

(4) 罗西（1748—1832），法国著名海军将领。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第一帝国时期战争。

(5) 布鲁斯（1759—1805），曾担任法国海事大臣一职。

(6) 小威廉·皮特（1759—1806），活跃在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的英国政治家。因领导英国对抗法国而声名大噪。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效率极高，推行改革，培养出一代优秀的政治家。

(7) 1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教会世俗化运动是将教会的财产转移给君主的过程，改变了教会一直以来在经济上富裕的状态，带来各种正面及负面的影响。1792年到1797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第一次结盟，共同抵抗法国，但很不幸无法战胜拿破仑。这次战争的经费主要由神圣罗马帝国教会承担，而这种

赔偿方式是规定于1795年法国和普鲁士在巴塞尔签订的灾难性和约，规定要用教产来赔偿。在1799—1802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中，奥地利的皇帝又被打败，所以被迫在1801年的《吕内维尔和约》中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将莱茵河以西的全部地区都让给法国。《吕内维尔和约》第七条规定，那些在莱茵河以西地区有财产的德意志世袭君主们必须在莱茵河以东地区获得赔偿。于是，一个由八位德意志君主组成的委员会——“帝国委员会”去落实这个规定。德意志的君主们在巴黎与第一执政拿破仑和他的首相塔列朗进行过很多特殊的谈判，通过贿赂和乞求确保自己尽量获得最多教产。最后，1803年2月25日，在雷根斯堡签订的“帝国委员会规章”结束了这些问题，但这些“规章”远远超过《吕内维尔和约》的范围，导致神圣罗马帝国教会的财产几乎被全部剥夺，也就是一个普遍的“世俗化”，即教会的财产被没收。

(8) 撒丁王国是意大利过去的一个王国。后来，意大利在撒丁王国的基础上统一。

(9) 《箴言报》是法国官方日报，创立于1789年。

(10) 查理大公（1771—1847），奥地利元帅，奥地利军队的改革者。他是利奥波德二世和皇后玛丽亚·卢多维卡公主之子，弗朗茨二世之弟。

(11) 即约翰·路德维希·约瑟夫·格拉夫·冯·科本茨尔（1753—1809），奥地利外交家、政治家。

(12) 巴伐利亚是今德国东南部的一个州。

(13) 即尼科洛·迪贝尔纳多·代·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官。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是政治哲学大师。他所著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政治无道德”的权术思想，被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14) 即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男爵（1752—1828），奥地利军人，巴伐利亚军队的实际司令官。

(15) 乌尔姆是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座城市，位于多瑙河畔。

(16) 舒尔迈斯特（1770—1853），历史上因为曾被拿破仑重金收买而闻名。

(17) 1803年，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与以英国为首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再次爆发战争。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为牵制住强大的英国海军，拿破仑派海军中将维尔纳夫率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与英国海军周旋。1805年10月21

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面相遇，决战不可避免，战斗持续五小时，由于英军指挥、战术及训练皆胜一筹，法西联合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主帅维尔纳夫以及二十一艘战舰被俘。英军主帅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也在战斗中阵亡。在随后到来的风暴中，许多被拖回的被俘法西军舰相继沉没，而英国军舰却无一损失。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丧，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到巩固。

(18) 科林（1755—1806），法国戏剧家。

(19) 《普雷斯堡和约》是弗朗茨一世的奥地利帝国与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帝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达成的和议。它结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拿破仑称帝一年后于1805年12月2日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击败了俄国、英国和奥地利的联军。俄国无法从它的内地及时调遣增援军，因此退出战场，但没有和法国签署和约。彻底战垮的奥地利同年12月26日在普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与法国签署和约。奥地利方面签署和约的是列支敦士登大公约翰·约瑟夫一世和伊格纳兹·吉尤莱伯爵，法国方面签署和约的是外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次日拿破仑在美泉宫批准了该和约。

(20) 巴比（1745—1837），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第一帝国大臣以及第一任审计法院主席。

(21) 符腾堡是一个历史地名，位于今德国西南部的施瓦本。

(22) 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拿破仑军旅生涯中的一场著名战役。七万五千法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在波西米亚的奥斯特里茨取得了对八万七千俄国-奥地利联军的决定性胜利。第三次反法同盟随之瓦解，并直接导致奥皇弗朗茨二世于次年取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尊号。这场战役因欧洲三个大国的皇帝奥皇弗朗茨二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全部亲临战场，又称“三皇会战”。

(23) 海德·德·诺维尔（1776—1857），保王党人，法国政治家。

(24) 塔隆（1760—1811），保王党人，路易十六的支持者。

(25) 罗耶·科拉尔（1763—1865），哲学教授。曾参与普罗旺斯公爵（后来的路易十八）的秘密议会。

(26) 《论战日报》是法国官方报纸，成立于1789年，1944年停刊。

(27) 《文雅信使》创刊于里昂。创刊之初，它是具有乡土气息、风格多样、内容较杂的报纸，刊载新闻、文学记事、演剧附刊、诗歌、大学招待

会、高级官吏的任免、婚丧事、趣闻、猜谜等内容，后来很快变成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实际上成为给社交场合交谈提供材料的杂志。它的内容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在欧洲也不乏模仿者。1724年更名为《法兰西信使》，由外交部赞助，成为巴黎最权威的文学刊物。

(28) 莫雷的全名是莫雷·帕尔曼（Parlement），而帕尔曼（Parlement）在法语中是“议会”之意。

(29) 卢卡位于今意大利中北部利古里亚海附近，是卢卡省的首府。

(30) 瓜斯塔拉是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省的一个市镇。

(31) 宝莉娜（1780—1825），拿破仑最喜爱的妹妹。

第17章　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与大陆封锁政策

精彩看点

分封公爵——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普鲁士战争——大陆封锁政策——柏林法令一埃劳战役一达凯伯爵的来信——《提尔西特条约》——第一帝国人事调整——塔列朗从外交部离任——帕尼公爵出任外交大臣——英军袭击哥本哈根——枫丹白露秘密条约一远征西班牙——拿破仑与教皇的冲突

3月30日，拿破仑诏谕参议院分封公爵领地，达尔马提亚[(1)]、伊斯特尔[(2)]、弗留利[(3)]、卡多雷[(4)]、贝鲁诺[(5)]、科尼利亚诺[(6)]、特雷维索[(7)]、费尔特雷[(8)]、巴萨诺[(9)]、维琴察[(10)]、帕多瓦[(11)]和罗维戈[(12)]等地获此殊荣，但他并没有表态这些新的爵位能否世袭。与此同时，塔列朗获得了封地贝内文托[(13)]，而我则受封成为奥特朗特公爵。人民支持为革命党人加官晋爵的决定，新的爵位以及国民贵族的出现也使上层社会移风易俗。

7月，德意志各联邦国通过了《莱茵联邦条约》[(14)]，十四个德意志联邦的省份宣布退出神圣罗马帝国，请求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庇护。这条精心设计的新法令直接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其目的在于孤立普鲁士，给德意志各联邦国施加压力。而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小摩擦也使俄国的外交立场开始变得模棱两可。俄国以其使者被隔离调查为由，拒绝批准新签订的协定，而这只是俄国的缓兵之计。自威廉姆斯·皮特逝世以来，英国的事务便由查理·福克斯[(15)]来主持，人们希望这位新上任的英国大臣不会继续支持反法联盟的行动。

在此期间，长达三个月的普鲁士战争爆发了。从奥斯特里茨战役以来，一些普鲁士人便开始秘密策划内战。我读过几篇反政府者写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主笔是蒙加亚尔。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宣称政府不过是纸老虎。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起内战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闹剧，所有的细节都是苦心经营好的。依我所见，普鲁士国王真是悲哀，因为他居然拥有这样一个混乱的内阁。历史终会告诉人们这场战争真正的起因。本该是普鲁士人民救世主的君主制普鲁士政府，却成为阴谋家手中的玩偶！普鲁士内战所取得的胜利让法国对这个地方刮目相看。

拿破仑自诩为上帝之子，以摧毁欧洲旧的统治秩序为己任。查理·福克斯的去世，劳德代尔堡伯爵[(16)]的离去，意味着法国和英国的和平谈判再次失败，换言之，英法两国之间将再也没有和平与休战。为

了摧毁英国这个唯一阻碍他称霸欧洲的国家，拿破仑建立了大陆封锁体系，对英国进行封锁，并在德意志颁布了该体系的第一条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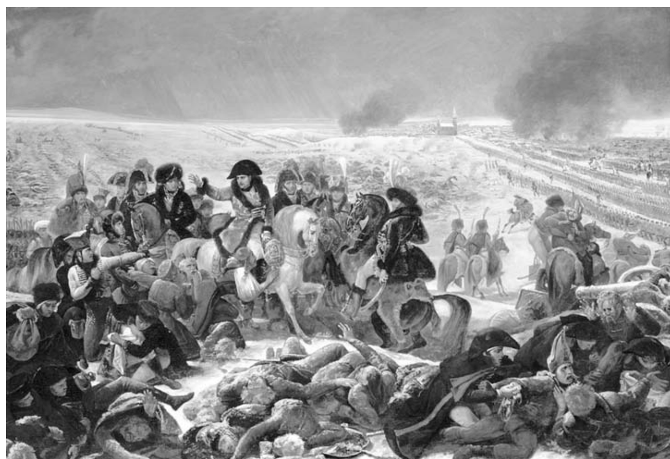
查理·福克斯

我预感到，大陆封锁政策[17]将会使英国大受打击，因此，英国人会马上出台应对政策，而法俄两国也到了一决雌雄的时候。当我获悉埃劳战役[18]的那些细节时，我整个人都胆颤心惊！这次战争不异于一场重新洗牌，而且战事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乌尔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及耶拿战役[19]：在距莱茵河两百里的地方，法俄两军进行了肉搏战。在写给拿破仑的信中，我用了类似马伦哥战役之前的笔调，考虑到这次的情况更复杂，我的言辞也更加激烈。我告诉他：

我们有十足的把握保证巴黎和法国不会生出事端，再加上奥地利也不敢轻举妄动，英国刚刚换了内阁，还在犹豫是否和俄国结盟，对法国来说，这一切都是有益的。然而，维斯瓦河[20]和尼曼河[21]一旦爆发战争，一切就有可能被摧毁！《柏林法令》[22]让太多人的利益受损，如果我们想再发动针对国王的战争，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度波及平民，否则一旦激怒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在信的末尾，我用最急切的语气恳请他动用自己所有的力量，迅速在欧洲建立和平。他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但他还是想再赢最后一场。



埃劳战役，俄国骑兵团发起冲锋



埃劳战役前线的拿破仑



埃劳战场上气势恢宏的骑兵部队

埃劳战役之后，我们需要慎之又慎地对待所有的战事，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过拿破仑锐利的眼睛——他注视着一切。从伦敦来的间谍尝试刺探巴黎的情况，刺探我的行踪，欧洲大陆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针对拿破仑的阴谋诡计，但它们都没有得逞。

在德雷克和斯宾塞·史密斯事件之后，英国内阁还在不断地刺探着公安部的工作；英国大臣霍威克子爵[23]派密使携信件来与我商谈，这份信件是用一根芦苇封存的。应这位部长的要求，我为两位肩负洽谈任务的密使准备了两本通行证。然而，首先，部长的秘使很不慎重

地同警署的佩莱[24]取得了联系！接着，此行的秘密被揭发，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已是在劫难逃。

这件事不可能不在拿破仑的心中留下阴影，他猜测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国外的阴谋家们正在从我这里下手策划新的诡计，而懂得审时度势的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人。然而，这并不是英国内阁对我的最后一次试探，意图破坏法国大革命成果的詹姆斯内阁认为我很有可能会背叛拿破仑，为波旁家族服务。英国内阁的这种判断仅仅是基于我的态度——我对保皇派所持的并不是赶尽杀绝的态度，因为我从不拒绝向我告发检举的人。

维特尔死后不久，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带有印章的信件，这封信上写着“富歇亲启”。打开之后，我发现里面的语气非常急迫，于是我马上召开原定于明天举行的听证会。这封信的主人用了一个假名，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海外贵族的名字，而且我也确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那个想要联系我的人。然而，当这样一个措辞锋利、条理清晰、有理有节的人，当着我的面承认了自己是波旁家族和英国内阁的代理间谍时，我依然非常惊讶！见到我之后，他迅速向我列举了拿破仑帝国的脆弱之处，还预言了拿破仑将兵败如山倒。最后，他劝我以法国利益和世界和平为重，和他们一起推翻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政权……他列出了所有我能想象到的优厚待遇。那么这个人是谁？我想应该是波旁王朝的海军总指挥达凯伯爵。

我对他说：“很不幸！您是带着阴谋来找我的。”

他大声说：“是，我的性命在您手上。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为过往做出牺牲！”

我说：“不，您错了。您现在在我家中，我是不会在家里对不幸的客人动手的。因为作为个人而不是公安部长的我，可以原谅您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我将给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离开巴黎。但我要告诉您

的是，二十四小时后，我就会下令，命巴黎戒严，全城搜捕您。我知道您从哪里来，也知道您的通信渠道。所以请您记住，您只有二十四小时。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您被别人发现的话，我也救不了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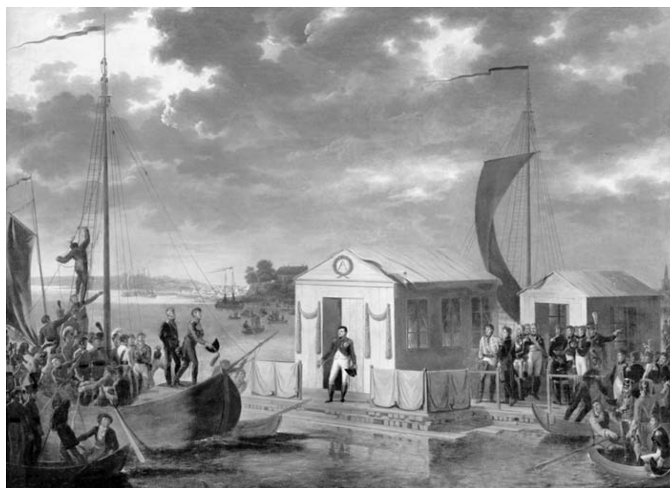
他向我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晓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任何地方，那些在海岸关口接待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碰巧去巴黎。

如果我不向拿破仑汇报刚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工作的失职。在向拿破仑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我只隐瞒了一件事，那就是达凯伯爵是从我这里拿到入境通行证的。这个隐瞒是必须的，因为我知道拿破仑一定会责备我在此事上的大度，并且怀疑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得知此事后，除了公安部的通缉令之外，拿破仑又直接下令展开搜查。于是，为了通缉达凯伯爵，我们几乎出动了所有的警力。最后，在即将登船的时候，达凯伯爵被一个女人出卖，惨烈地死去了。

这个时期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也需要评价一下拿破仑在这段时期的政治生活。圣日尔曼镇上的人们问道，推翻古老的贵族制度有什么不妥吗？

“亚历山大[(25)]会向拿破仑靠近，从此没有战争，千千万万的人民将得到安宁。”

人们这样希望着，然而他们却看到，《提尔西特条约》[(26)]不过是两大帝国的君主在确认欧洲的领地，一旦双方相互靠近，新的事端必然会出现。



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尼门河中央的竹筏会面



《提尔西特条约》签订后拿破仑送亚历山大一世离开

在《提尔西特条约》之外还有一个秘密条约，它规定，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平分欧洲大陆，欧洲南部归拿破仑。此时的拿破仑已经是意大利的主人，德意志的法官，北部的势力范围也已经达到维斯瓦河。

7月27日，拿破仑从圣克劳德返回巴黎。这一次，所有重要的官员都迫不及待地为他献上最令人心醉的赞美词，而这个革命者也慢慢

地被腐蚀了，越来越疏远他手下的大臣们。八天后，他对各部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升任克拉克为战事大将军；任命贝尔西耶为副陆军统帅；但最让人震惊的是，拿破仑把之前由塔列朗负责的对外关系部门移交给了帕尼公爵。很明显，从塔列朗手中拿掉这个部门意味着拿破仑在疏远他，而为了掩饰这种疏远，随后，拿破仑赐予了塔列朗很多名义上的奖励，升任他为副大选举官——但这也只是名义上的。塔列朗之所以受冷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拿破仑的分歧——他们两人在对西班牙的事情上意见不一致，但这件事情只有拿破仑和塔列朗本人知情。当时，内阁内部还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我在场的情况下是这样，但我还是提前知道了将在10月底签署的《枫丹白露密约》[27]。和《普雷斯堡和约》一样，《提尔西特条约》之后，热罗姆[28]成为德意志内部一个小国的国王，而这个新国王不过是他在巴黎的兄弟的傀儡。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得知，英国成功袭击了哥本哈根，最让人震惊的是，英国政府的行动居然如此准确。根据《提尔西特条约》，丹麦的海军已经归法国管理，因此，英国的这种举动就是在破坏条约。从保罗一世遇难以来，我还没有见拿破仑如此生气过，他怀疑政府内出现了新的叛徒。他命令我彻查此事，调查是否和最近的人事调动有关系。我再次向他表明，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只凭直觉来行事是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的。我对他说："除非叛徒自己露出马脚，否则仅凭凑巧，公安部门很难从他们嘴里得到有效的信息。"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一位身经百战的重要人士有过会谈，鉴于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我还不方便向大家透露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以及这位重要人士。

1808年是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拿破仑的神话黯淡下来。有一天，他推心置腹地向我坦白了签订枫丹白露秘密条约以及远征葡萄牙的动机，他告诉我说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以及布拉甘萨政权[29]即将倒塌。

我对他说："放弃葡萄牙吧，您知道，实际上，葡萄牙是英国的殖民地。至于西班牙，您更没必要去担心了，那里的波旁家族随时都愿意为您效力，只要您愿意，他们随时都会向您俯首称臣。您是不是误解了半岛的情况？没错，您在那里有很多的支持者，但那是因为半岛的人把您当成了一个强大的庇护者，把您看作一个盟友、一个朋友。如果您这样毫无根据地向现行政府发动战争，的确，您可能会从西班牙政府内部的争斗中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样一来，您所面对的敌人就是全部西班牙人民。而且您不能忽视这么一点，西班牙不像德意志，那里的人民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管理方式，所以西班牙人和别的国家那些毫无爱国气节的人不同。我还得再申明一次我的话，您要小心，千万不要把一个稳定的君主制国家变成另一个旺代地区！"

拿破仑说："您想说什么？西班牙所有头脑清楚的人都已经不再信任王室，现在王室的实际掌权人——所谓的和平王子，对西班牙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到时候，这个无赖会打开西班牙的大门，欢迎我的到来。至于您刚刚说的那些小民，目前他们还生活在教皇主宰的中世纪，我一棍子就能把这些人全部打散。而且您也看到了，在我的军队面前，所谓的普鲁士大军——这些弗雷德里克(30)的后人就像鸟兽一样一哄而散。现在，您不用怀疑，到时候，您也不用喝彩，您会看到我是如何一举攻克西班牙的。在那里，我有无数的支持者，就像当年的路易十四(31)一样，我会把西班牙纳入法国的版图，让西班牙摆脱英国的控制。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我一定不会放过。查理五世(32)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我将成为两个世界的主宰！"

出兵西班牙的事情已成定局，内阁中的人都没有站出来反对此事，我也只有顺其自然了。然而，我觉得我依然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尊敬的陛下，他将要做的这件事情绝非儿戏，如果俄国人在他身后出兵，大举进攻南部，或在这个时候和英国联合，到时候，恐怕第一帝国就要腹背受敌。

拿破仑冲我大喊道："您果然是一位公安部长！您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真善美！我敢肯定，亚历山大是靠得住的人，我对这个人很有好感。当然，我也确定，这种好感不是来自他身边的人对我的赞扬！"

在我看来，拿破仑对我说的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对沙皇和他的朝廷突然心生爱慕？这实在匪夷所思。想必拿破仑觉得自己当年对沙皇的二子君士坦丁大公的一番赞美已经俘获了这个人的心："您是欧洲最具有风度的王子，您有着世界上最健美的大腿。"

不过，对我来说，他的这番坦白并非毫无用处，看到拿破仑正在兴头上，我就又和他聊了聊几位我很感兴趣并且处于重要位置的人。听完我对圣日尔曼工作的计划之后，他更加满意，并且应允了我对旧贵族的宽大处理。在我看来，波尔多的两大家族非常顽固、非常危险，可拿破仑却特意交代，让我不用太过操心他们，只需默默监视他们的动向即可。他接着说："您和我说过，您希望像我一样，成为新旧秩序的调停者。对，这是您的任务，因为事实上，这同样是我的内政政策。但对于外交事务，您不需要费心，把它交给我来做吧，尤其是别想着为教皇辩护。不过对您来说，这实在太荒谬了，让塔列朗给他找个漂亮的女人，强制他还俗吧。"

我为之大笑，当我拿起文件出门时，海军部长迎面而来。

拿破仑刚刚那番关于教皇的言论意指他和罗马教廷的分歧，这种与日俱增的分歧产生于1805年。那时，拿破仑一面向半岛进军，一面又命令部队进驻罗马。庇护七世[(33)]紧张地扬言要动用精神力量和拿破仑对抗。毫无疑问，精神对抗不过是一击即破的泡沫。但庇护七世的话的的确确影响了很多人的心绪，它不仅改变了一些意大利人的想法，还使那些一直困扰我们的小教堂势力得到了壮大。在政治上，拿破仑驻军罗马的做法毫无益处，不仅如此，那些小教堂势力还和教皇站在了一起，并肩对抗政府。

重建欧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责无旁贷。但拿破仑却心急火燎地想征服罗马，重建欧洲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教皇的冲突不可避免，对于他这种舍本求末的帝国计划，我深感遗憾。他不懂得如何离间教皇和民众的关系，他似乎忘记了当初人民因何为他而战，动员民众参加一场对自己毫无益处的战争是荒谬的！如果他想让自己的帝国成为欧洲最长久、最伟大的帝国，那么他就应该遵循政治家赖以生存的原则：团结自己的人民，离间他人的人民。

可惜的是，因为当时的马德里和巴诺娜事件，拿破仑几乎完全忽视了罗马事件。西班牙已经失守，法国军队以友谊的名义占领了西班牙北部所有重要关卡。4月15日，拿破仑率领朝堂来到马德里，这个智囊团包括了罗维戈公爵萨瓦里公爵、马林大主教阿布·德普拉特[34]、皮内特里大公以及一些或多或少精于外交欺诈的人。当然，前外交部长这条智囊病虫也在其中。五六个野心家拜见了拿破仑，之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了占领新世界的神奇方案。从马拉克堡[35]到马德里、里斯本，加德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所有的发条都已经拧紧。对于西班牙，拿破仑志在必得。

但随着战事的扩大，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拿破仑再一次背离了罗马事件时的原则。5月2日，马德里发生了大屠杀，整个西班牙王室都落在了巴约纳分队手里。西班牙群情激怒，势比燎原。这个堪称噩耗的消息也传到了巴黎。两度担任部长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民众如此激烈地反对拿破仑野性地扩张。现在，所有的警务人员和政府人员还在极力地封锁消息，这只会产生更大的危机——该事件将会被夸大。在危机面前，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事情的真相。

拿破仑给我从巴约纳寄来两封信。除了告知巴约纳人民的愤怒情绪外，这两封信似乎都在指责我，认为我对此事负有责任。我回信说，自从他离开巴黎后，民意已经一落千丈。巴黎公安局已经出动了所有警力，但我们仍然无法控制那些沙龙里的闲言碎语。

《拜伦和约》[36]签订后的7月底，在绍塞-昂坦[37]的沙龙中，拿破仑大发雷霆，他决定立刻撤离巴约纳。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情报刺激了他，他的私人信使竟然说有人在巴黎策划造反。不不不，我承认，公安部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事态的恶化，但绝对没有人造反。拿破仑紧张地穿过旺代地区，不安地经由卢瓦尔河[38]，直直地回到了圣克劳德。我知道，迎接我的一定是粗鲁的责骂，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一见到我，他就说："您怎么能允许巴黎城内出现如此多妄自议政的沙龙派对呢？奥特朗特公爵，您真是太宽容了！"

我说："陛下，法不责众，如果所有人都这样讲，公安部将无法制止这种行为。况且警察是没有权力私闯民宅的，我们捉不到他们。"



西班牙战争中的法国士兵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士兵



马德里大屠杀



法军屠杀反抗的马德里市民



法军屠杀手无寸铁的马德里市民

他接着说：“那么，有国外势力混在其中吗？”

我回答道：“没有，陛下，都是巴黎人民。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怀旧，尤其是现在不如从前，旧的感情苏醒了，自然会排斥新的感情。只要这种旧情一直存在，我们就无法动摇他们的传统信仰。压制旧的感情只能适得其反，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获益。它会和别的事件一样慢慢平息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以及欧洲大陆之后所采取的态度。”

拿破仑陷入了思考，我补充道：“陛下，现在有些人向您夸大了巴黎的情况，而您曾经击败过比这困难千百倍的危机。”

听到这些话，拿破仑终于放下心来，之后，他开始和我讲述西班牙发生的事情，我也为自己的精心准备舒了一口气。他在办公室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告诉我他如何说服缪拉、莫西及杜邦——尤其是杜邦——坚持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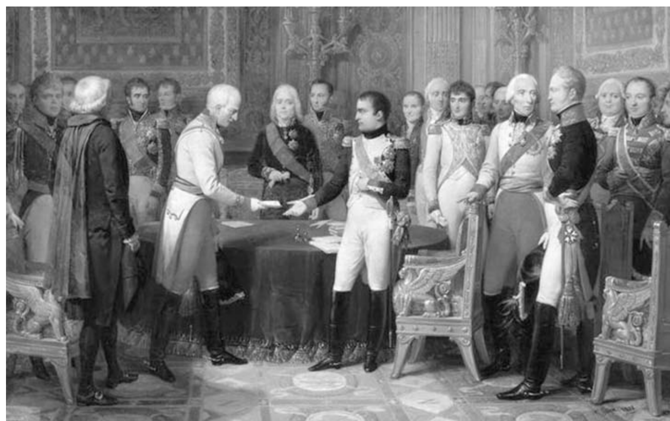
接着，他又说道：“和这些乡下人、僧人打仗，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我希望这次能震慑住英国人，确保之前的条约生效，当然，也是为了避免欧洲再生动荡。接下来我还需要去和亚历山大会谈，如果

英国人胆敢干涉此事的话，那么三个月之后，我就会让约瑟夫·波拿巴重回马德里，四个月之后，我便会亲自率兵进入里斯本。到时候，我一定要严惩这帮人，并且把英国人赶出葡萄牙。”

此后，所有人都在为促成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会面努力着，密使和信使已经出发前往圣彼得堡。不久之后，我们就收到了同意的回复。当年9月，在埃尔福特[39]，前来会晤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两个欧洲大陆的霸主在一起共度了十八天的欢乐时光，这次会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欣局面。10月26日，从埃尔福特归来的拿破仑召开立法集团会议，通过了和沙皇共进退的条约。之后，他欢快地说道：“不久之后，里斯本上空就可以看到我的雄鹰们了。”



19世纪的埃尔福特



拿破仑在埃尔福特

从一方面讲，这种欢乐祥和的景象是我们有意做出来的，为的是向英国施加压力，让英国也加入这次和平联盟，但另一方面，它也让聪明的人发现了拿破仑在国民战争中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如果没有获得欧洲另一大强国的支持，他将没有能力继续征战，以前一马当先、力压群雄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我还有另一个担忧。拿破仑出征西班牙之时，我就有很多不祥的感觉。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稍不留意，我们的君主拿破仑就会离我们而去。这个第一帝国的创始人，这个宣称向上帝借二十年完成大业的人无嗣。如果上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提前从我们身边带走了他，那么就像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一样，我们的帝国也没有确定的未来。拿破仑身后没有一个可以继承自己权力和荣誉的人，我们也无法保证我们的地位。我曾看到过一家西班人愿意向英国提供土地，给敌人创造有利条件来侵害我们的利益。为了这样一次冒失的出征，我们失去了太多的支持，甚至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之前征战四方的动机。一旦没有了拿破仑，帝国就会瞬间崩塌。而失去了他的支持，我们这些曾经扶他上马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奥坦丝的儿子是拿破仑寄予厚望的养子，但这个他精心呵护的孩子，这个维系他和约瑟芬与奥坦丝三人关系的孩子又令他痛心入骨，

因为这个孩子夭折了。他曾经说过："这个孩子真像我！"我知道，他是真的想把这个孩子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圣克劳德的阳台上，他曾多次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太阳下的孩子；他曾经多次推开政务，只是为了陪这个孩子玩耍！只要这个孩子对鼓声或兵器、或排兵布阵感兴趣，只要这个孩子表现出一星半点的坚韧品质，他就会激动地朝四方大喊："这个孩子绝对是个合格的继承人，而且他一定会超越我！"

就在他为这个孩子谋划着未来的时候，白喉带走了这个孩子，这个硬朗的男人想要依靠的唯一一根芦苇就这样折断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痛欲绝的拿破仑，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撕心裂肺的约瑟芬和奥坦丝。对于这两个女人而言，似乎所有的幸福之门就这样悄然关闭了。所有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我也看到，这延续帝国希望、连接帝国未来的链条断了。

我知道我不能向拿破仑隐瞒我的想法，但我需要等他的伤口愈合之后再和他提这件事。对他来说，个人的伤痛总是要让位于帝国利益，让位于政治和战争。他的悲痛需要得到排遣，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排遣。于是，在他的心腹杜洛克的策划下，拿破仑迅速投入到了女人的怀抱。这不是为了爱情，只是为了占有这些美丽的身体。宫廷里的人们经常会说起他的两个宠妃，但不久之后，人们口中就变成另一个妩媚多姿的意大利女人，一个生于布兰德的夏洛特。

拿破仑和约瑟芬分居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年，因为妒忌，约瑟芬对拿破仑大发脾气。盛怒的拿破仑决定分居。对约瑟芬来说，情感上的折磨还远比不上对现实处境的担忧，自从奥坦丝痛失爱子一蹶不振后，她就更加担心自己的地位。虽然她已经预感到不祥将至，她却只能因自己无法生育而黯然神伤。

为了这个伟大的帝国，为了我们所守护的新未来，出于这样的政治管理和对拿破仑家庭伦理的双重考量，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在递交给

拿破仑的私人报告中写上我的建议。我提到了解除其婚姻的必要性，并且我建议他马上和更合适的女人组建新的家庭，给帝国的未来留下一个继承人，这是我综合考虑了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后得出的结论。

对于我这样的重要提议，拿破仑没有任何表态，但我也猜测到，为了顾全政治大局，拿破仑心中已经有了定论，我从他那晦涩的三言两语中猜出了他的意思。但一方面，他还没有遇到想要迎娶的人，另一方面，他还是习惯了约瑟芬在他身边的日子。而且对他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签下离婚协议。于是，为了帝国的稳固和拿破仑的幸福，我决定从约瑟芬这里寻找突破口。

打开这样一个口子需要一些准备，我等待着行动的时机。终于，在枫丹白露的一个周日，我遇到了刚做完礼拜的约瑟芬。我上前扶着她来到一扇窗户前，然后，我开始用最小心翼翼的话语试探她是否愿意接受离婚这件事。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嘴唇也开始颤抖，似乎整个人都要倒向我，但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细声惶恐地问我是不是奉命这么问的。我对她说我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担忧帝国的未来。为了尽快结束这样一场痛苦的对话，我对她说我同事还在等我开会。第二天，我得知宫廷内部发生了痛苦的撕裂。拿破仑激动地向约瑟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对我进行了指责。只因为我站在法国利益的一边，约瑟芬这个惯常做作的女人就坚决地恳求拿破仑免除我的职务。拿破仑一面指责我，批评我没有得到他的指示就乱说话，一面安慰着约瑟芬，向她表明其中的政治原因，解释说他只能拒绝免除我职务的请求。

但于我而言，拿破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如果他真的没有想过离婚的话，他完全可以牺牲我，而不是简单地指责我几句。但约瑟芬却似乎依然被蒙在鼓里，她完全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根本没有办法看清事情的严重性。难以置信的是她居然向拿破仑谎称自己怀孕了，这让我们这位第一帝国的君主成为整个欧洲的笑柄。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11月4日，从德意志招募了八万老兵之后，拿破仑亲自发动了第二次半岛战争。这是一场针对起义的普通民众的战争，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场战争只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猜疑和担忧，以至于后来，他竟觉得我和塔列朗支持了巴黎的谋反运动。

得知西班牙立法集团有一百二十五人，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反对党人时，12月4日，拿破仑决定在巴利亚多利德[(40)]向他们强调君主制国家的意志。他拍板怒喝道："今天开会的目的是让你们这些不幸的人弄清楚一件事情，你们的想法是有罪的！立法集团想代替君主来代表国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立法集团应该被叫做立法建议委员会。立法？它毫无权力，也毫无依据。宪法已有规定：法律产生于君主及其部长所在机构，他们做出的决定才能代表国家。"

这些极权言论自然激起了西班牙立法成员的不满，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因为拿破仑长剑在手，践踏生命是他的胜利之路。只要动用战争，历史将再次重演，到那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会自行消失。

得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地驻进了马德里，并且决定突袭英国军队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会御驾亲征。但突然之间，他却丢下英国人，把这场战事交给了他的部下，然后悄悄地回到了我们中间。这也许就像是他周围的人向我解释的那样吧，他提前得知一伙西班牙人正在策划暗杀他（我相信这个说法，而且我本人也觉得确有此事），也或许是他觉得巴黎正有人策划挑战他的权威。我猜这两个原因都有，但在后来的公开通报中，他却是这样解释这件事情的：奥地利还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做好战争准备。拿破仑和我心里都清楚，奥地利的推托表明他们还在犹豫。



拿破仑接受马德里投降

回到巴黎后，拿破仑召见了我，他想知道我对西班牙立法集团的看法，要我评价一下这件事。我肯定了他的做法，我说道：“君主就应该这样管理国家。如果一个集团随随便便地自称代表国家，那么君主就应该解散它。如果当初的路易十六也这样做的话，那么现在的他依然会是戴着王冠的国王。”

拿破仑直直地看着我，嘴巴微张，似乎在回忆什么。一阵短暂的沉默后，他开口说：“什么！奥特朗特公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是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其中一个吧？”

我自豪地回答道：“是的，那是我为陛下做的第一件事。”

---

(1) 达尔马提亚位于今克罗地亚南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地区。

(2) 伊斯特尔位于法国南部，距马赛六十千米。

(3) 弗留利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

(4) 卡多雷是意大利贝卢诺省下的一个市镇。

(5) 贝鲁诺是今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的一个省。

(6) 科尼利亚诺是今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特雷维索省的一个市镇。

(7) 特雷维索位于意大利北部，今特雷维索省的首府。

(8) 费尔特雷是今意大利威尼托大区贝卢诺省的一个市镇。

(9) 巴萨诺是今意大利布雷西亚省的一个市镇。

(10) 维琴察是意大利维琴察省的一座城市，也是维琴察省的首府。

(11) 帕多瓦位于意大利北部，是今帕多瓦省的首府。

(12) 罗维戈是意大利威尼托大区罗维戈省首府。

(13) 贝内文托位于意大利南部，今贝内文托省的省府所在地。贝内文托市内有图拉真拱门、雷托里城堡、古罗马剧场等众多名胜古迹。

(14) 1806年7月12日，通过签署《莱茵邦联条约》，在法国保护下，包括列支敦士登、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莱茵河两岸的德意志南部、中西部十六个邦国，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联合体莱茵邦联。邦联在法兰克福设两院制议会，推选拿破仑为保护人，并由拿破仑支配邦联的外交和军事；协议同时规定，在发生战争时，邦联有义务向其保护人拿破仑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8月6日，已自称奥地利皇帝的弗朗茨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的弗朗茨二世）被迫宣布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在接下来数年，有二十三个邦国加入；弗朗茨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只能够统治帝国剩下的领土奥地利。德意志地区内只有奥地利、普鲁士、丹麦控制的荷尔斯泰因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未加入邦联，而且不计算并入法国的莱茵河西岸和艾尔福特。

(15) 查理·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资深政治家，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任下议院议员长达三十八年，是小威廉·皮特担任首相期间的主要对手。

(16) 劳德代尔堡伯爵（1759—1839），英国议员、掌玺大臣。1806年，英国政府派劳德代尔堡伯爵前往巴黎商谈和平事宜。

(17) 大陆封锁政策是拿破仑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启动的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该政策于1814年结束。一方面，拿破仑意图使用经济战的手段使英国屈服；另一方面，该政策也可以起到保护法国经济的作用。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法国无力再发动海战，拿破仑只能将争霸重心放回欧洲大陆。因此，他不得不利用经济手段。为了彻底切断英国在欧洲的贸易，他下令禁止交战国商船驶往英伦三岛。在法国统治的地区，英国的货物被没收，英国商人受到追查。到了1807年年底，政策的对象扩展至中立国的船运。1810年8

月5日的法令要求所有进口货物关税提高50%。

(18) 1806年10月，拿破仑率法军在耶拿战役中击溃普鲁士王国军队主力，在占领柏林后继续向东推进，与援助普鲁士的俄国军队相遇。1807年1月，贝尼格森率领的约七万俄军和八千普鲁士军队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出发，进攻米歇尔·纳伊和贝纳多特率领的法军，而拿破仑也调集约七万军队希望抄袭俄军后路。贝尼格森得知法军动向后决定在普鲁士-埃劳迎战法军。2月7日，彼得·伊万诺维奇·巴格拉季昂率领的俄军后卫部队同法军相遇，成功阻击了法军的进攻，使俄军主力得以占领普鲁士-埃劳北高地，从容设立坚固阵地。次日，两军决战。战斗打响后，奥热罗部受到俄军密集炮火攻击，损失惨重。拿破仑投入缪拉骑兵部队加以支援，这才使奥热罗挽回败局。达沃斯特在战斗初期取得一定进展，但俄军右翼及时支援了左翼，击退了法军进攻。当晚战斗结束，双方伤亡惨重，但均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

(19) 耶拿战役是指发生于1806年10月14日，在今德国萨勒河以西的高原，拿破仑一世率领的法军和腓特烈·威廉三世率领的普军之间的战斗。法军六天之内便击垮普鲁士主要作战力量，而普军的惨败令普鲁士不久就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直至1813年才重新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法军彻底改变了当时非常流行的线式作战，改写了欧洲陆战的战术原则。

(20) 维斯瓦河发源于今波兰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注入波罗的海格但斯克湾。

(21) 尼曼河发源于白俄罗斯的山区（在明斯克的西南部），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最后于克莱佩达注入波罗的海。

(22) 《柏林法令》是指1806年在柏林启动的针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以下是《柏林法令》的具体条款：①禁止所有同英国的贸易；②没收所有欧洲大陆上存在的英国商品；③禁止所有同英国的信件往来，以及所有为了英国利益而产生的信件往来；④所有在法国或者第一帝国的英国人都将以战争犯人的名义被逮捕；⑤禁止在英国海域停靠任何船只。

(23) 即查理·格雷（1764—1845），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他于1806年至1807年称“霍威克子爵”。

(24) 佩莱（1759—1828），著名记者。

(25) 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罗曼诺夫王朝第十四任沙皇，保罗一世之子。由于亚历山大一世击败拿破仑一世，复兴欧洲各国王室，因此被欧洲各国和俄国人民尊为“欧洲的救世主”。

(26) 《提尔西特条约》是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击败俄普联军后于提尔西特签署的两个条约。7月7日，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在尼门河中央的竹筏会面后，签订了第一个条约。7月9日，拿破仑与腓特烈三世签订第二个条约。该条约结束了法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两国结成同盟，同时开始执行几乎无效的大陆封锁。法国承诺帮助俄国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俄国则同意加入大陆封锁以对抗英国。更具体地讲，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从俄土战争期间占领的瓦拉几亚和摩达维亚撤军。原先被俄军将领乌沙科夫及森亚文占领的爱奥尼亚群岛和卡塔罗也将移交法国。

(27) 1806年，放弃远征英国的拿破仑启动了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英国的友邦葡萄牙拒绝加入大陆体系。因此，拿破仑决定进攻葡萄牙。1807年10月，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内政大臣同拿破仑签订了《枫丹白露密约》，允许法国军队通过西班牙领海，攻打葡萄牙。

(28) 热罗姆·波拿巴（1784—1860），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幼弟，法国元帅，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

(29) 布拉甘萨王朝是1640年葡萄牙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后，第八代布拉甘萨公爵约翰四世即葡萄牙王位而建立的王朝，该王朝一直统治葡萄牙至1910年，是统治葡萄牙王国的最后的王朝。

(30) 这里指腓特烈二世（1712—1786），史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军事家、政治家、作家及作曲家。在他统治普鲁士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获得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使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取得大国地位，并在德意志内部取得霸权，向以普鲁士为中心武力统一德意志的道路迈出第一步。腓特烈二世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也是欧洲“开明专制”君主的代表人物，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他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31) 路易十四（1638—1715），自号“太阳王”，1680年接受巴黎市政会献上的“大帝”尊号。他是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和纳瓦拉国王，在位长达72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也是有确切记录的在世界历史中在位最久的君主。

(32) 查理五世即位前通称“奥地利的查理”（1500—1558），在欧洲人心目中，他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开启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33) 发生在庇护七世（1742—1823）身上最著名的事件是被迫为法兰西

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加冕，但登基大典时皇冠被拿破仑夺走，拿破仑自行为自己及皇后加冕，庇护七世视之为奇耻大辱。1809年拿破仑进攻维也纳，吞并教皇国属下各邦。庇护七世大发雷霆，宣布将拿破仑逐出教门。1809年7月6日，拿破仑逮捕了梵蒂冈中的庇护七世并将其押解回萨沃纳囚禁。庇护七世在拿破仑1814年退位后才被释放。当时的法国宗教已经乱成一片，长期处于无秩序状态。1814年，庇护七世恢复了1773年被教宗克雷芒十四世解散的耶稣会。

(34) 阿布·德普拉特（1759—1837），外交官、历史学家。1805年任普瓦捷主教，1809年任马林大主教，是拿破仑的亲信。

(35) 马拉克堡位于今法国新阿基坦大区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阿杜尔河与尼夫河交汇处的巴约纳。18世纪初，西班牙王后在此修建了马拉克堡。1808年，拿破仑从马拉克堡的继承人手中购得。后来，西班牙的波旁王室在这里签署了退位宣言，支持拿破仑的长兄约瑟夫·拿破仑成为西班牙国王。

(36) 拜伦战役代表了安德鲁西亚人民起义的高峰。拿破仑的对外扩张在这里遭到了安德鲁西亚人民的强烈抵制。战败的拿破仑军队签订了《拜伦和约》。

(37) 19世纪以来，绍塞-昂坦街成为贵族、教士以及大资本家的聚集地，同时也是他们评论时政的地方。

(38) 卢瓦尔河是法国最长的河流，发源于塞文山脉，注入比斯开湾，两岸有闻名世界的卢瓦尔河谷城堡群。

(39) 埃尔福特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40) 巴利亚多利德位于西班牙中部，从11世纪开始逐渐成为西班牙的重要城市。1469年，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在这里举行婚礼，他们是日后统一西班牙并开创帝国数百年辉煌大业的奠基者。1527年，腓力二世在巴利亚多利德出生，二十九年后又在这里加冕登基，当时西班牙正处在鼎盛时期，而巴利亚多利德正是这个世界大帝国的都邑。

第18章　拿破仑·波拿巴迎娶奥地利公主

精彩看点

普鲁士起义——艾斯林战役——瓦格拉姆战役——罗马教皇事件掌控所有内政事务——贝纳多特失势——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向俄国女大公提亲——纳博出使奥地利——迎娶奥地利公主——舞会失火——拿破仑的怀疑——卸任公安部长

为了应对奥地利的进犯，拿破仑使出了浑身解数，几乎把自己的军事才能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我们的力量已大不如前，所以他决定速战速决。如果奥地利的军队大规模集结，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被逼至黑山[(1)]，进而转入防御状态。幸运的是，泰恩、阿本贝格、埃克米勒和拉蒂斯邦率领我们的军队迅速取胜，为这场战争开了个好头。但我们犯了兵家大忌，同时卷入了两场战争。

在席尔将军[(2)]的率领下，普鲁士人开始反抗拿破仑。这次的普鲁士起义是由具有启蒙思想的几位将军——如施耐德、斯坦因——发起的，它是普鲁士民族觉醒的一次小小尝试——当时，北德意志人民并不像半岛人民那样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这场战争中，拿破仑腹背受敌，艰难维持了四个年头。这引发了我的思考，除了穷兵黩武，我们的帝国还剩下什么。

最后，虽然我们占领了维也纳，但席尔依然控制着奥地利的萨克森[(3)]。维也纳的人民非常敌视拿破仑，维也纳更是发生了多场暴动。

艾斯林战场[(4)]传来的消息更加深了我们的担忧，在那里，我军阵亡八千人，有一万八千人受伤，这其中包括三位将军和五百名军官，让·拉纳——这个唯一敢对拿破仑说真话的人——也光荣牺牲了。

对于这样的惨胜，战场总指挥马塞纳应负主要责任。巴黎城内闲言四起，人们议论纷纷，而我们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掩饰这样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灾难呢！

一方面，拿破仑对外宣称说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一方面，他又把出现问题的责任推到了奥地利最优秀的军官多瑙河大将军身上。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我军遭受如此重创，只能退居罗博岛[(5)]的情况下，这位将军为何依然按兵不动？所以，尽管我们不断地宣传我们已经获胜，但议论依然不绝于耳，甚至愈演愈烈。

在法国，共和党和保皇派内反对拿破仑的人纷纷觉醒，圣日尔曼镇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旺代地区甚至还发生了几起暴动。有人已经在高调宣称，艾斯林之战是对拿破仑的致命一击。

当我们注意到罗马事件的时候，人们还在想方设法地应付多瑙河事件。这么说吧，虽然我们生于启蒙时代，即使我们可以算作排斥宗教的哲学家，然而，看到圣皮埃尔的遗产被僭越，看到宗教领袖被迫害后，我们的内心依然会感到悲痛。5月底，拿破仑颁布政令，吞并了教皇的所有属国。已经被剥夺至手无寸铁的大祭司，这位平日里受人尊敬的大祭司依然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他口中念叨着旁人听不懂的圣言，用精神力量对抗着拿破仑和他的党羽。



拿破仑看望在艾斯林战场上受伤的将士



艾斯林战场上的奥地利军队



拿破仑看望弥留之际的让·拉纳将军

如果人民已经无动于衷，如果大众的不满没有唤醒他们心中那几近熄灭的信仰，那么庇护七世所做的一切就只能用“可笑”两个字来形容了。也就是在那时，庇护七世被强制带走，押解至萨沃纳[6]囚禁。拿破仑知道我非常反感这样的暴力，因此，他避开了我，直接命那不勒斯警方负责此事，执行此事的主要负责人有缪拉、萨利斯提[7]、米

奥利斯[8]和夏代[9]。

尽管政府在监禁教皇一事上沉默不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同情教皇的遭遇。对于欧洲来说，教皇不过是拿破仑扩张野心的牺牲品。拿破仑剥夺了庇护七世的所有荣誉，并禁止他与其他主教通信，也不允许他以任何方式发布教皇谕旨、召开主教会议。

拿破仑的政策为当时的教会和个别祭祀提供了一个多么好的暴动借口。我预感到，虽然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散了秘密集会，但现在，那些人又要开始蠢蠢欲动了。事实上，曾经的拿破仑非常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在，他却亲手推开了人民，并且只要形势紧迫，他甚至还会和自己的敌人联手。但这位伟人依旧勇武，超强的军事才能又一次掩盖了他的错误。

每天，我的信使都会向身在维也纳的拿破仑禀报国内的情况以及每况愈下的民意。他写信告诉我："放心吧，一个月之后大家就不会这么想了。"说到国内事务时，他又一次说道："我这里很好，您那里也是。"

我肩上担负着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责任，我手里同时掌握着帝国的公安工作和几乎所有的内政事务。但我的内心依然坚定，因为拿破仑从未给予过我如此大的信任和鼓励。已经达到职业生涯巅峰的我深知，登高必跌重。

突然之间，形势急转，艾斯林之战后的第四十五天，瓦格拉姆战场[10]传来了好消息，我军大获全胜。六天后，《日纳姆停战协定》[11]的签订以及席尔大将军的去世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然而，在这期间，一支装备精良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了艾斯考河[12]，他们很有可能和奥地利联合起来，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助攻。

我认为此事非常危险，因此，在其他两位部长的协助下，我向议

会发出通告：如果情况紧急，我将会采取强硬措施。

增援比利时刻不容缓，我们现有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保护帝国这一块重要的土地。因此，在没有请示拿破仑的情况下，我命令巴黎以及北部各省立即开始征兵。在征兵的同时，我给巴黎各区区长写了动员信，在信中，我曾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向欧洲证明，即使没有拿破仑，我们也一样能击退敌人！”但谁能想到，这句话令拿破仑十分不悦。在给冈巴塞雷斯的信中，他命令我们立刻停止在巴黎的征兵活动。然而此时，巴黎的征兵活动已经进入到点将的阶段。

一开始，我并不清楚我们为何要停止巴黎的征兵活动，因为此时其他省份的征兵工作十分顺利，并且已经招募到了四万将士，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遇到任何抵制。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小心谨慎。在法国，这样的爱国热情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在去水疗的旅程中，拿破仑的母亲也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对此，她赞不绝口，还特地表扬了我。



拿破仑由罗博岛登桥过河，奔赴瓦格拉姆战场



瓦格拉姆战场的奥地利士兵



拿破仑观察瓦格拉姆战场上的形势



瓦格拉姆战场，法军骑兵与奥地利骑兵交战

当时，我们还需要为这支聚集在安特卫普[13]城墙下的军队选一位统帅。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贝纳多特刚好从瓦格拉姆战场回到了巴黎。得知他回来后，当天，我就找到了他，向其表达了我想请他出任战事部长的想法。

然而，到了第二天，贝纳多特私下对我说：“在瓦格拉姆战场上，我指挥的左翼部队中有一支萨克森人，但这支队伍却吃了败仗。之后，拿破仑便以此为借口撤了我总指挥的职务，令我返回巴黎。”虽然他指挥的部队表现良好，但还是有人向地区总指挥打了小

报告，说当天的他在向士兵训话时沾沾自喜。他对我说道：“一定有不怀好意的人在拿破仑面前说了我的坏话，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萨瓦里。”此前，让·拉纳还在的时候，萨瓦里就曾和这个最勇敢的人发生过非常严重的冲突，现在，因为让·拉纳的牺牲，在军队里萨瓦里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了。为了排除异己，这个人竟然给一些将军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们和兄弟帮[14]有联系，并意图谋反。

基于以上情况，贝纳多特并不愿意前往安特卫普担任帝国征兵的总指挥。但我对他说：“现在正是您重新向拿破仑证明自己的好机会，为了消解你们两人的误会，我已多次向拿破仑说起过您。况且以您现在的地位，如果您拒绝担任作战部长，别人可能会嘲笑您，说您在赌气，不愿意为祖国做事。再者说，即便是不情愿，我们也需要为拿破仑尽忠，为国家尽责。”他表示理解，然后，经过一番长谈，他终于同意走马上任。

贝纳多特果然不辱使命。见到北部省份蓄势待发后，英国人对大陆望而却步了。这样一个可喜的结果，以及贝纳多特明智的指挥，使拿破仑不得不把他对贝纳多特的怀疑和不满藏在心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根本没有原谅我和贝纳多特。面对如此的战功，以及我和贝纳多特的关系，他反而更加怀疑我们。

从军队中，我得知了一些关于兄弟帮的事情，这些消息和贝纳多特所说的完全吻合。兄弟帮并不掩饰自己的存在，他们的目的就是还法国人民以自由——被拿破仑恢复的贵族制度和政教协定所破坏的自由。虽然他们怀念当初那个作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但他们已经无法忍受现在这个独裁专制的皇帝拿破仑。兄弟帮的存在已使马莱特、吉达尔[15]、冉德、哥海尔以及拉欧瑞[16]遭到拘禁。

最近发生的另一件事更是引起了军队内部的恐慌，有人揭发说第九军陆军军团上校伍德[17]是兄弟帮主席团的成员。这个罪名是如此之大，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位可怜军官的命运了吧。就在瓦格拉姆战役

的前一天晚上，在距离瓦格拉姆几千米的地方，刚被任命为大队长的伍德落入了一伙人的陷阱之中。后来，有人怀疑这伙人是宪兵。第二天，人们发现伍德和他身边的二十二名军官已死。这件事情在美泉宫[18]以及整个维也纳和军队的高层将领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没有人知道当晚到底发生了何等恐怖的事情。两军休战之后，这件事才逐渐平息。

虽然我们与奥地利的和约迟迟没有消息，但所有的信件都宣称和平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当我们还在焦急地等待和约的签订时，我得知，在申布伦，拿破仑险些被人暗杀。在杀手就要得手的那一刻，贝尔西耶挡在了拿破仑前面。杀手是一个十七岁的埃尔福特年轻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卫兵从他身上搜到了一把锋利的长刀。认罪后，他被军法处决。

此后不久，法国和奥地利签署了《维也纳条约》[19]（10月14日）。条约刚刚签署，这位征服者以及和平的缔造者便马上回到了巴黎。也正是从他的口中，我们才得知这次战役打得如何艰辛，奥地利人是如何的顽强。

在拿破仑回到巴黎之前，我们曾在枫丹白露见过几次。我发现，他对圣日尔曼镇近来咄咄逼人的气势非常敏感。我不得不告诉拿破仑："艾斯林之战和巴约纳战役之后，这些人丧心病狂地编造谣言。"

受到冲撞的拿破仑命令我严惩这些阳奉阴违的家伙，但我劝阻了他。我对他说道："这是一个传统，只要塞纳河依然流淌，这个镇上的人就会不断地造谣生事。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作用，恺撒大帝受到的污蔑不比任何人少。陛下，这群人中既没有盖乌斯[20]，也没有布鲁图斯。至于那些最可怕的中伤，难道不是从您的内阁中传出来的吗？那些传播谣言的人不正是为您效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吗？在惩罚这些人之前，您需要先成立一个十人委员会，派这些人去挨家挨户地询问情况。伟人不会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因为伟人的光辉会让这些流言蜚语

无地自容。”最终，他采纳了我的建议。



位于维也纳郊外的申布伦宫，《维也纳条约》在此签署

我知道，瓦格拉姆战役之后，在是否解散奥地利君主制的问题上，拿破仑有些犹豫。虽然他预备了数个方案以应对这个问题，甚至他曾考虑过封几个他认为抑郁不得志的大公为王，然而，此举会引起俄国的怀疑，也会激怒奥地利人民，毕竟弗朗茨二世[21]深得民心。在权衡各种可能的方案时，拿破仑还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占领整个德意志并不意味着半岛战争的结束。

我觉得是时候告诉拿破仑事实的真相了，在一封私密的报告里，我向拿破仑阐述了我们的处境，并告诉他现在必须马上停止对外扩张的政策。首先，我建议他表露和平的诚意，或者直接询问英国的意见，或者向英国提出我们的想法，并且告诉英国，我们诚心诚意地聆听他们的意见，支持欧洲三足鼎立之势。其次，我们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面对葡萄牙，并且愿意撤出普鲁士，但我们必须守住意大利、马德里、威斯特伐利亚[22]和荷兰。也就是说，为了帝国持久的荣耀，我们需要给自己的野心设限——况且复兴查理曼大帝的事业已然是不朽的杰作。正因为如此，和平迫在眉睫。

一方面，缔结新的婚约可以为帝国延续血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和欧洲北部的大国——比如俄国、奥地利——联姻，那么法国现在

的处境必将改善。退一步来说，即使在法国国内另寻一位可以为帝国延续子嗣的女子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没有真正的和平，这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帝国长治久安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所以，我请求他告诉我他在此事上的真实想法，并且慎重考虑我提出的两个方案。



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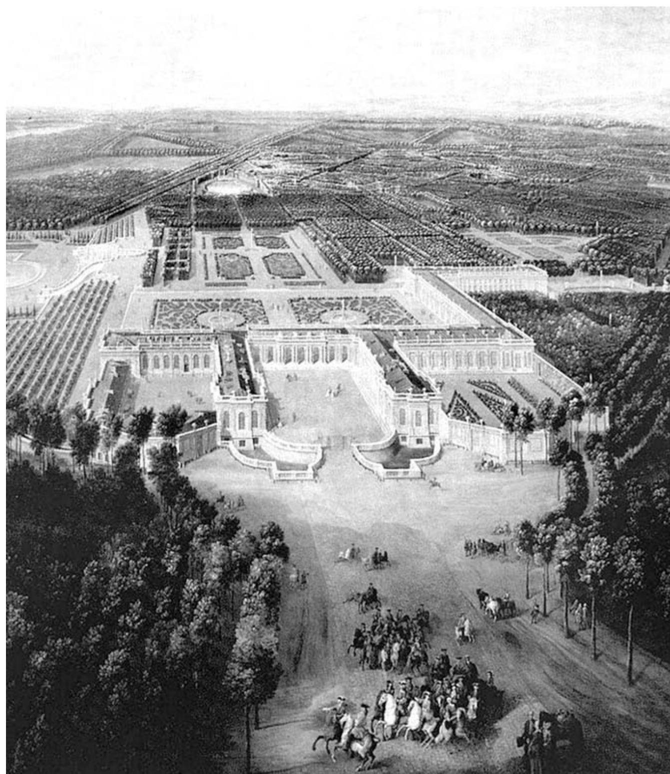
我的请求得到了默许，冈巴塞雷斯奉命告诉我说："拿破仑马上便会和约瑟芬解除婚姻关系。"之后不久，各种闲言碎语开始出现了，在巴黎的沙龙里，人们悄悄地议论着约瑟芬，但约瑟芬却被蒙在

鼓里，根本不知道此事。

与此同时，或许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或许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拿破仑决定和欧洲最古老的王朝联姻。当然，拿破仑想和约瑟芬解除婚约、向这些大国抛出橄榄枝，也是为了借此试探这些大国的心思。

帝国的日常也还需要精心的维护，12月3日，拿破仑请他任命的所有国王齐聚巴黎，为他的胜利和加冕纪念日唱赞歌。从巴黎圣母院出来之后，他马上召集立法集团开会。在那里，他发表了一番隆重的讲话。他说："当我重新出现在比利牛斯山外时，猎豹也自惭形秽，落荒而逃。"他想通过这样宏大的叙述来掩饰自己在西班牙战争中遇到的困难，或者说，他这么说也是为了麻醉自己。事实上，他自己也说不清这场战争的目的。

第三天，他和约瑟芬面对面地共进早餐，那时，他把自己的决定和盘托出。之后，约瑟芬昏厥了过去。最后，在冈巴塞雷斯和约瑟芬的儿子欧仁的不断劝说下，她终于妥协了。12月15日，两人举行了盛大的离婚仪式。一切都按规定行事，约瑟芬被一位宪兵护送着前往马尔梅松，而拿破仑则前往大特里亚农宫[(23)]休养。



位于凡尔赛宫西北部的大特里亚农宫

因为我们最先考虑的是俄国女大公[24]，沙皇的妹妹，所以我们首先试探的是俄国的意向。虽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支持此事，但据说，俄国皇室内部依然存在争议。不过，外交部是派人同时前往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向维也纳的提亲基本上也是在同时进行的。在奥地利，我们希望迎娶的是弗朗索瓦的大公主玛丽·路易[25]。在这里，我想说几点我知道的事情。

纳博应该算是路易十六朝堂上最风流的男子了，此人酷似路易十五，而且从出生起，他便带着一种神秘的特质。在后天的成长中，他平易近人的性格也使他深受大家的喜爱。他与本世纪最杰出的女性——斯塔尔夫人的私交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最受人关注的一点是，作为路易十六的战事部长，他却主张君主立宪，进而促成（导

致）了君主专制的没落。之后，在极端保皇派和共和党的双重排挤下，他被迫流亡海外。

因为怜悯这个想要调和皇室和民权的爱国者，所以，在他回到法国后，我接见了他。这个人的非凡气度、睿智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每天工作之余，我都会抽出时间与他聊一会儿天。同时，我也应允了他向我提出的关照他朋友的请求。

我也向拿破仑提起过他，最开始的时候，考虑到纳博和斯塔尔夫人（拿破仑的死敌）的关系，拿破仑非常排斥他。但在我的坚持之下，拿破仑还是同意接见了他。后来，拿破仑也对他青睐有加，甚至任命他为军队长官。在对奥地利的一系列战役中，纳博将军一直追随着拿破仑。此后，肩负特殊政治使命（我也知道此事）的他又被任命为特里雅斯特首长。

当纳博从奥地利归来时，拿破仑正在筹划新婚，因此，我便请他前往奥地利，征求奥地利的意见。然而，在没有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回复之前，派人贸然前往奥地利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因此，纳博伯爵只能以私人名义出访奥地利。1810年1月，纳博抵达维也纳，不过表面上看来，他只是计划经过德意志返回法国，正好途经奥地利。然后，一到维也纳，他便首先拜访了梅特涅[26]，之后，他又获得了奥皇弗朗索瓦二世的接见。

在当时，拿破仑再婚的事情是整个欧洲热议的话题，所以，这自然也是他们绕不开的话题。纳博告诉奥皇弗朗索瓦二世，欧洲很多大国都向法国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和法国联姻。奥皇弗朗索瓦二世则非常惊讶地说：“法国竟然没有考虑奥地利皇室！”随后，他又表达了奥地利皇室的诚意，并希望纳博代为转达。

当天，纳博便给我写信，告诉我说奥地利有联姻的意向，并且皇室正在考虑把大公主许给拿破仑。接到纳博的信后，我立刻把这个消

息告诉了拿破仑。我从来没有见过拿破仑如此高兴。得知此事后，拿破仑命人去咨询奥地利驻法国大使施瓦岑贝格大公[27]的意见。虽然施瓦岑贝格大公并未直接参与此事，但获知这个消息后，他认为此事干系重大，必须谨慎处理：首先，我们不能让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觉得我们是在同时谈判；第二，我们也不能让欧洲其他国家觉得拿破仑是在奥地利大公主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之间做选择。

2月1日，在杜伊勒里宫，拿破仑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私人会议，政府的主要工作人员、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各位大臣、参议院主席、立法集团主席、内阁主席等二十五人列席。首先，帕尼公爵宣读了驻俄国大使科兰古的急件，在这份急件中，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意把妹妹嫁给拿破仑，但他的条件是拿破仑必须以东正教[28]的传统迎娶公主，并且为公主修建希腊式的礼拜堂。接着，帕尼又传达了维也纳方面的意思。

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两难的选择，朝堂上出现了激烈的讨论。因为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直到讨论结束，我都没有表态。这次私人会议结束后，拿破仑派欧仁王子前去同施瓦岑贝格大公协商。接到拿破仑的指示后，施瓦岑贝格大公立刻表示同意。就这样，一日之间，拿破仑同玛丽·路易的婚事便定了下来。

第二天，参议院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29]告诉我说拿破仑已经决定迎娶奥地利大公主。听到这句话后，我故作惊讶，同时对没有和俄国联姻表示遗憾。我说：“这样的话，以后应该就没我什么事情了吧。”我说这些话其实是想告诉我的朋友，我离失宠不远了。



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安娜·帕夫洛芙娜公主



玛丽·路易

我似乎天生具备一种叫作第六感的东西，不知为何，我预感到我将无法应对拿破仑迎娶奥地利大公主之后的局面。和洛林世家结盟后，拿破仑便消除了奥地利的隐患，这也意味着整个欧洲已经臣服于他。也就是说，拿破仑将不再需要一个辅佐他的公安部长，其实，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拿破仑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件事了。更何况，我确定，拿破仑依然记着我私自募兵的事情。我也清楚，从那时起，我和贝纳多特的关系也遭到了怀疑。更严重的是，他颁布的政策对我越来越不利。

当我向他建议说在他和奥地利大公主大婚之际大赦天下时，一切都清楚了。拿破仑并没有直接首肯我的提议，而是假惺惺地对这些人表达了同情，说自己早就考虑过要结束这种严酷的警察制度。两天之后，他给我寄了一份计划书。这份以我的名义起草的皇家御令计划书撤销了对六人的国刑[30]，并规定，如没有私人议会的首肯，任何人不得随意拘禁他人。

这其实是一种策略，因为私人议会不过是拿破仑的一言堂。一切已成定局，然而，我还需要向内阁提交这份计划书，大家还需要装模作样地讨论一番，以便该文件能于3月3号正式生效。这就是拿破仑洗白自己、给公安部泼脏水的计划。随后，他要求我向他提交一份被监视人员的名单。

在我看来，监视是一种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刑罚。于是，为了逃避牢狱之灾，很多政治犯都希望能够用被监视代替监禁，而这也为我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但监视这种古老神秘的刑罚和我们这位世界上疑心最重的人建立的体系是不相容的，这也是国家之殇。

曾经有那么一刻，我幻想着拿破仑总有一天会平静下来，那时候，他将会采用一种更权威、更符合我们国情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对即将到来的婚礼，我依然心存幻想。因为我觉得，对拿破仑来说，他需要的是彻底的和平，而我，难道不能一如既往地为这份和平继续贡献我的力量吗？和约瑟芬解除婚姻，并和奥地利联姻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如果我可以做到的话，那么，看在我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的分上，拿破仑一定会重新信任我的。

对我来说，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探英国的立场。随着英国内阁的突变，我觉得时机越来越成熟了。最近，英国政府的糟糕表现引起了英国上下的不满，几位部长也起了争端。其中两位部长卡苏里子爵和坎宁先生竟然动了手（公开扭打在一起）。内阁匆匆忙忙地召回了驻西班牙大使威尔斯利侯爵，命其代替坎宁担任外交部长，利物

浦伯爵则代替霍克斯出任战争事务部秘书。我知道，威尔斯利侯爵和利物浦伯爵都是目光远大且随和的人。

法国已经取得了奥卡尼亚的胜利，占领了安达鲁西亚，因此，西班牙民族独立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我想，我可以借此和威尔斯利侯爵进行谈判，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可能。但在此之前，我还需要先了解清楚英国的情况，而向国外派遣代理人员正是我最熟悉的工作。

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我选定的人是乌瓦尔先生：首先，因为我的目的是政治和谈，所以，我根本无法用贸易行为来做掩护；其次，这项任务比较敏感，一个浸染商场的人恐怕会弄巧成拙。

鉴于奥维尔先生可以直接和威尔斯利侯爵取得联系，所以，我只需要找人把他引荐给英国内阁即可，而爱尔兰军官法根先生正是合适的人选。我计划在拿破仑大婚之后便请奥维尔先生出发。

4月1日，年轻的奥地利大公主抵达巴黎。这是多么欢庆的一天！为了见证这一对佳人的结合，宫廷里的所有人都去了圣克劳德。这一天，两人在世俗意义上结为夫妻。第二天，在卢浮宫的一个大厅里，在珠光宝气的贵族妇女的祝福下，拿破仑和玛丽·路易接受了红衣主教费持的洗礼。

这真是让人眩晕的盛大婚礼，然而，施瓦岑贝格大公以奥地利名义献上的礼物却寓意不祥。为了庆祝妹妹大婚，施瓦岑贝格大公举办了盛大的舞会，然而，舞会不幸失火，很多人都葬身大火，施瓦岑贝格的弟媳，施瓦岑贝格伯爵夫人便是其中之一。

于是，造谣者马上把这次庆祝两国联姻的失火和路易十六大婚时的另一场惨剧联系起来，他们预言说帝国将命不久矣。听到这样的谣言后，拿破仑非常震惊。鉴于我已经向公安部做过指示，并且管控社会舆论也是公安部的职责所在，所以怒不可遏的拿破仑认为失职之人是杜波瓦，因此，他撤掉了杜波瓦的职务。然而，要想肃清公安部内

部的不正风气，我们还需要经历一场更大的舆论灾难。

对于俘获了拿破仑的玛丽皇后，宫廷以及巴黎上下都唯命是从。社会上流传着一些革命时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很有可能会让玛丽皇后受惊，于是有人找准时机，诬陷公安部在这方面有所失职。虽然我命公安部查封了这些书籍，但巴黎公安局内部已经严重腐化，那些受命查封的人竟然开始私下贩卖起这些读物。

4月底，拿破仑携新皇后前去参观米德尔堡和弗利幸恩，途中经过了布雷达。这次旅行给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因为震惊于我之前关于和平的论述，所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破仑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一家贸易机构，然后派人同英国大臣展开了秘密谈判。也就是说，我们有两拨人同时在和英国进行谈判，这引起了威尔斯利侯爵的怀疑。最后，我们两拨人都被回绝了。

面对这样的结果，拿破仑非常惊讶，因此，他便命其私人警署和国际密探调查此事。刚开始的时候，他只得到了一些模糊的消息，慢慢地，他发觉可能有人在幕后干预谈判。最开始的时候，他怀疑的是塔列朗，后来，因为我和奥维尔先生的关系，所以他又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我。6月2日，在圣克劳德例会上，拿破仑公开向我问责，要我解释奥维尔在英国做了什么。



玛丽·路易来到卢浮宫



拿破仑与玛丽·路易的婚礼

我对他说：“据我所知，他做的事情与陛下大婚前我向您禀报的和平事宜有关。”

拿破仑说：“也就是说，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您准备私自决定是战是和吗？”

说完这话，他就走了出去，并且命令萨瓦里拘捕奥维尔。同时，

我也收到了禁止同犯人做任何沟通的禁令。第二天，萨瓦里出任公安部长。这次，我真正的失势了。

我想到了一位先哲的话：“四十天后，尼尼微将被毁灭。”而我想说的是，用不了四年，拿破仑帝国必将烟消云散。

---

(1) 这里指位于法国布列塔尼的一系列山脉。

(2) 席尔（1776—1809），1809年曾经率领普鲁士人抵抗拿破仑入侵。

(3) 萨克森位于今德国东部。

(4) 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中，拿破仑一世试图凭借武力在维也纳附近横渡多瑙河。但查理大公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在前者渡河时，发动进攻，接着爆发了激战，拿破仑被迫撤退。在拿破仑数十年军旅生涯中，这是他亲自率领的军队第一次遭到失败。战役的结果是，法军损失大约两万四千名士兵，包括八千名战死，一万八千名重伤，其中就有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一位阵亡的元帅让·拉纳。

(5) 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岛，这里是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及华格姆战役的主战场。

(6) 萨沃纳位于今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热那亚湾畔，是萨沃纳省的首府。

(7) 萨利斯提（1757—1809），法国政治家。

(8) 米奥利斯（1759—1828），法国大革命以及第一帝国时期将领。

(9) 夏代（1762—1825），法国大革命以及第一帝国时期将领。

(10) 瓦格拉姆战役发生于1809年7月5日到7月6日。拿破仑在这场战役中展现过人的毅力和临危不乱的指挥能力，突破敌军包围，用密集炮火击败奥地利军队，再次迫使弗朗茨二世求和。

(11) 《日纳姆停战协定》标志着1809年战争结束，但第五次反法联盟没有因此而破裂。1809年10月14日，《维也纳条约》签订，这意味着第五次反法联盟的彻底破裂。

(12) 艾斯考河发源于法国埃纳省，流经比利时，最终在荷兰注入北海。

(13)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港口城市和法兰德斯的首

府。

(14) 兄弟帮是拿破仑时代一个秘密的民主社团，在瑞士和意大利有广泛的影响。

(15) 吉达尔（1764—1812），法国将领，曾参与1812年马莱特政变，被枪击。

(16) 拉欧瑞（1766—1812），法国将领，曾被牵扯进马莱特政变中。

(17) 伍德（1773—1809），法国将领，在瓦格拉姆战役中身亡。

(18) 美泉宫是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巴洛克艺术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宫，如今是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美泉宫的名字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蒂亚斯，传说1612年他狩猎至凯特堡，饮用此处泉水，清爽甘洌，遂命名此泉为“美泉”。此后“美泉”成为这一地区的名称。1743年，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莎下令在此营建气势磅礴的美泉宫和巴洛克式花园，总面积2.6万平方米，仅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

(19) 《维也纳条约》是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停战条约。条约在1809年10月14日于维也纳的申布伦宫签订。条约终结了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奥地利为战败一方，不得不接受法国苛刻的和平条款。虽然奥地利退出战争，但英国仍然继续与法国维持战争状态。条约规定，奥地利将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割让给巴伐利亚王国，将西加里西亚割让给华沙大公国，将捷尔诺波尔地区割让给俄国，将第里雅斯特与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此地后来成为伊利里亚大区）割让给法国。奥地利亦承认拿破仑一世对以往征服地区的拥有权，同时承认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奥地利需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奥地利军队需缩减至十五万人，但此条款并未履行。

(20)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前85——前42），罗马元老院议员，谋杀恺撒的主谋，也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妻舅。

(21) 弗朗茨二世（1768—1835），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奥地利帝国第一位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皇后西班牙的玛利亚·路易之子。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是弗郎茨二世的姑姑。

(22) 威斯特伐利亚是以今德国多特蒙德、明斯特、奥斯纳布鲁克等都市为中心的地域。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萨克森，地处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原本是萨克森公国的一部分。1807年到1813年，成为从属于拿破仑的威

斯特伐利亚王国；1815年，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威斯特伐利亚省。

(23) 大特里亚农宫位于凡尔赛宫的西北部，是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蒙特斯庞侯爵夫人的住所，以及国王邀请宾客进便餐的地点。

(24) 安娜·帕夫洛芙娜女大公（1795—1865），沙皇帕维尔·彼得洛维奇与妻子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所生的女儿。1810年，拿破仑本来打算与安娜·帕芙洛娜公主结婚，不过被她的长兄亚历山大一世拒绝。1816年，安娜嫁给了荷兰国王威廉二世，两人育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25) 奥地利的玛丽·路易（1791—1847），原为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婚后成为法国皇后玛丽·路易。1817年，受封为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女公爵。她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第二位妻子，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之侄的孙女、拿破仑二世之母。

(26) 即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1773—1859），出生于德意志的奥地利政治家。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从1809年开始任奥地利外交大臣，直至1848年革命爆发，被迫下野为止。他任内首要工作之一是缓和奥地利与法国的关系。他也促成了奥地利公主——女大公玛丽·路易与拿破仑的婚姻。而在这不久之后，他作为外交大臣又推动了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代表奥地利签署了《枫丹白露条约》，流放了拿破仑。他是后拿破仑时代由欧洲列强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的主席。为表彰他为奥地利做出的贡献，奥地利在1813年10月授予他公爵的头衔。在他的影响之下，“梅特涅体系”维续着奥地利与俄国、普鲁士的联盟十多年。这是梅特涅在奥地利外交上的最高峰，此后他逐渐被国际外交边缘化。

(27) 即卡尔·菲利普（1771—1820），奥地利陆军元帅和外交家。卡尔·菲利普生于维也纳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世家，父亲是约翰·内波穆克·安东·施瓦岑贝格，母亲是厄廷根-瓦勒施泰因的玛丽·埃莱奥诺蕾女伯爵。1810年出任驻法大使。1812年拿破仑一世入侵俄国，奥地利加入侵俄战争，施瓦岑贝格被任命为奥地利后援军团司令，他观望避战，保存实力。181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同年奥地利倒向英、俄，他被推举为反法联军总司令，组织了莱比锡会战，次年率联军攻入巴黎。

(28) 东正教与天主教及新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信徒总人数少于天主教，但比新教最大的普世圣公宗要多出两倍，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东欧和西亚。

(29) 富歇没有指出这个人的名字，根据情况推断，此人可能是塞门维尔先生。

(30) 文森特、萨缪尔、翰姆、兰克、皮埃尔和菲内斯。

全景插图版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约瑟夫·富歇回忆录 下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任茹茹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 北京

第19章　卸任公安部长

精彩看点

被任命为罗马总督——萨瓦里接任公安部长——与萨瓦里的磨合——费里耶尔城堡的搜查——又见拿破仑·波拿巴——旧部相助——抵达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庇护——出逃北美——海上逃生——折返托斯卡纳——长公主爱丽莎的斡旋——和拿破仑和解——和家人在艾克斯团聚

我自愿接受公开调查。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是一种责任。我希望借此打消人们的偏见和仇恨，但我并不奢望我能够因此而在两国争霸的政治喧闹中听到理性的声音。当然，我所说的是当时那个比较平静的年代，而不是当今社会。

然而这就是我的命运啊！上帝啊，这是什么命运呢？我手握重权，但我仅有的一次僭越权力，也是为了避免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我所拥有的，都是我所不屑的，是我为他人所积累的。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对财富无欲无求，期望自己能在盛世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现在我却不得不在宦海沉浮中谋求权力。我憎恨迫害，什么样的差事没做过，什么样的苦水没有咽下过？我曾经不计前嫌地接纳你们，而如今，你们却矢口否认我的功绩。一直以来庇护你们、让你们免受拿破仑暴躁之苦的人不正是我吗？我承认自己掌管下的公安部警戒森严。可你们也不能否认，那时的你们受到了最多的保护，受到了最少的暴力攻击，不是吗？

当时的你们难道没有说奥特朗特公爵是拿破仑时代最机警、最能让人接受的部长吗？可是如今你们却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我知道你们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时代变了。你们用现在来度量过去，但我却不会这样做。我承认我犯过错误，但我同样坚定地认为：我所做出的成绩，完全可以将功抵过。

在混乱的局势中，我揭穿了各种阴谋，平息了各方怒火，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退居二线后，我有时甚至会感到轻松愉悦。在最近的这次失势、大滑坡期间，我时常想到我守护着的这个帝国：没有了我的支持，它会不会轰然崩塌呢？我甚至会想：是不是我搞错了，我会不会重新得到权势，眼前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现在，在人们的眼中，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人，一个“身经百战”，善于把握时机成功上位的人。

现在我已经看开了。经历了种种苦难后，我看透了那虚幻的荣光。现在我再也不会试图为我自己的政治观点正名了。我觉得为世俗之事而争吵不休是如此地空洞，我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无形中支配着这一切的力量。



卸任公安部长的富歇

我坚信一个永恒的真理：野心的伤口是永远无法愈合的。尽管我尽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但我的心还是会不受控制地追逐权力和虚荣，就像在车轮上的伊克西翁[(1)]一样停不下来。我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这种痛苦的折磨。

有人说，我不会完全坦承地向公众剖析我自己，更不会暴露我所有的软弱、错误和悔恨！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以一颗赤诚之心写下了这些文字。于我的政治生涯来说，回忆录的第二部分非常重要，而这也将促使我严格还原当时的情况，揭开所有的谜团，为此我将尽我

最大也是最后的努力。我在讲述时使用了第一人称，这样便可以在回忆的朦胧美中汲取一些温和的力量。

在准备回忆录的过程中，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对自己说：或许我不会完全跌入谷底。然而事实上，流放之门已然为我打开。如果在精神上我还可以故作坚强的话，我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命运不允许我有任何拖延。在命运女神的催促下，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努力把1810年到1815年这段历史交代清楚：卸任公安部长到跌落谷底。这段时期是我的政治忏悔中最棘手的一段时期。你们无法想象一个即将覆灭的政权中存在着多少巧合、欺诈，涉及了多少利益团体——世间百态！不过，无论是我的朋友们还是敌人们，请你们放心：揭开真相的不是警署，而是历史。

我可以忽视那些浅薄的计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宽容那些挖苦、诽谤、隐瞒和谎言。对于值得尊敬的人和事，我定会报以尊敬，但对于那些应被痛斥的人和事，我也绝不会笔下留情。

写在回忆录之前的这些话是为了唤醒我自己的回忆，同时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我将开始讲述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希望我讲述的东西能成为大家口中历史的画卷，或者是用来再创作的材料。

在回忆录上卷结束的时候，我讲到了我的失势，之后萨瓦里接任了公安部长一职。大家一定不会忘记，当时的第一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正在肆无忌惮地扩张。当时的拿破仑是德意志联邦的占有者、意大利的主人、法国的绝对统治者，而法国也还是俄国和奥地利的盟友。所有人都眩晕在拿破仑的光环下，根本没人理会不远处的西班牙硝烟弥漫，战争正在啃噬着第一帝国的根基。

拿破仑想做的只有占有。当时政府中已经没有可以和他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围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对他低眉顺目，雇员、政府人员、

大臣无一不极尽阿谀谄媚之力。而在那不久前，他已经把唯一一个敢于劝他节制扩张的人、唯一一个不遗余力向他积极劝谏的人——我，赶出了朝堂。

不久之后我接到了被任命为罗马总督的诏谕。但我内心绝不相信拿破仑会把如此重任交给我。果不其然，所谓的罗马总督无非是拿破仑的障眼法，他准备以此来向公众掩饰我的失势。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绝对不会弄错这件事，接替我的人选已然说明了一切。从此，巴黎的千家万户只能在惊恐中接受公安部已经成为拿破仑的警务军部这个事实，而新上任的公安部长则是一位积极执行其主人拿破仑一切命令的傀儡。也许我的措辞有点夸张，但单单是这个人的名字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惊愕和猜疑了。

那之后，我只能小心谨慎地从我的密友以及特派员那里打听政府的动向。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夫人沙龙里的访客们向来络绎不绝，但事发几天后，门庭便开始稀稀落落冷清起来。我也听到了来自一大批政府高层遗憾的声音。他们向我坦言，我的离职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损失："我们觉得您离开后，圣日尔曼镇上的那些人和我们这些革命者一样感到遗憾。"对于一个落魄的部长来说，这样的评价难能可贵。



接任公安部长的萨瓦里



身着军装的拿破仑，绘于19世纪初

无论是出于立场还是迫于惯例，我都不得不为刚刚接任公安部长之职的萨瓦里充任导师。正如大家所猜测的那样，我只负责把这个人领进高级公安工作的大门，而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一直避谈高级公安工作的精髓。此外我也没有过多向他谈及如何协调公安部密保和公报的艺术。我知道萨瓦里那点少得可怜的能耐。我可以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秘密公安部的所有资料。虽然这听起来很让人不齿，不过说实话，我很不耐烦他这种自大和无知，很多时候我只是在跟他讲一些无聊的话题。

同时我会煞有其事地告诉他公安部的规矩和惯例，还向他重点推荐了公安部的三位国务委员，并告诉他说这三人将协助他一起管理公安部的具体事务。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头昏目眩。我真心诚意地把之前在我手下工作的人介绍给了萨瓦里，但他只留下了一个胖出纳和一个矮小的审问官德马雷。德马雷此人是个天生的向日葵，哪里有太阳，他的腰就会弯向哪里，因此他自然成了萨瓦里的得力干将。我觉得这个大兵部长召开会议是最可笑的事情：他眼睛瞟着德马雷准备好的稿子，嘴里拼着上访者的名字，并且时不时地责骂这些人。当然我没有忘记告诉他，我是因为工作做得太好才惹怒了拿破仑，所以我劝他提防着时日不多但性格执拗的拿破仑。

从一开始这个极端自大的人就在刻意模仿自己的主人，故意使用一些不连贯的句子，以至于自己的话频频出错。在整个公安部的工作中，他只对秘报、间谍活动和钱感兴趣。当我向他指出秘密金库中最近流失的钱款时，这个人似乎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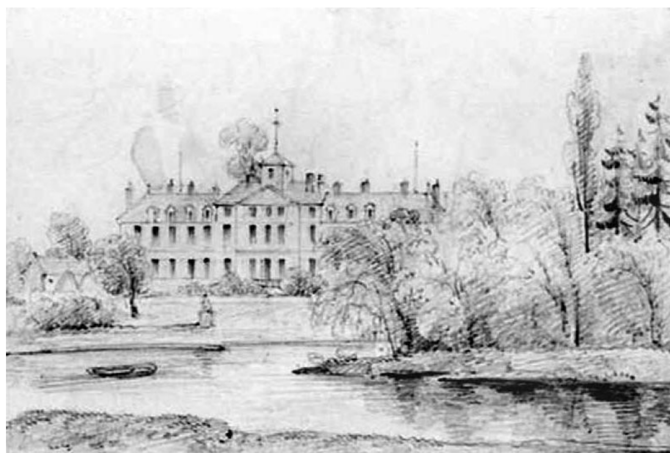
我迫切希望能够早日摆脱这份差事。但另一方面，我也在努力寻找着能让我在巴黎多留几日的理由。在别人看来我正在积极准备前往罗马赴职，好像已经决定要在罗马安家落户似的。因为我家里的所有人都在筹备这次远行，甚至随行的车马上面都有“罗马总督”这几个大字。我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因此我格外留心所有微小的细节。

万事俱备。但我却还没有得到任何正式通知。于是我让贝尔西耶代我向拿破仑询问具体的告别事宜。可是，我得到的回复却是，考虑到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拿破仑尚未确定我前往履职的具体日期，因此他让我先去自己的领地等候通知。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领地费里耶尔城堡[(2)]，当然这期间我也用了一些手段：在当天巴黎的报纸上，我让人报道了我前往罗马履职的事情。

见过贝尔西耶后，我基本猜到了拿破仑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我

能想象到当拿破仑看到民意向我一边倒时，他会有多么地沮丧。对于人们来说，新的公安部似乎只有警察和司法官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相信，我会艰难地渡过这次难关的。

在我回到费里耶尔城堡午夜时分，我夫人那边的一个亲戚急匆匆地赶来我家，告诉我说第二天会有人来我家搜查，并计划当场拘捕我。尽管这条消息有些夸张，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对我还是有好处的。首先我得知了负责搜捕工作的人隶属拿破仑。很早以前这个人就已经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二，得到消息后我可以马上开始行动，把重要的文件全都藏起来。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静静地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19世纪的费里耶尔城堡

第二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的信使J快马加鞭地带来了一张V太太的便条。在这张换了笔迹的便条上，V太太告诉我：萨瓦里上报拿破仑，说我把公安部重要的信件和密令带到了费里耶尔城堡。我知道自己马上安全不保。就在这时，我的人前来发出警报：一众人等骑着马匹冲进了我的城堡。为了保持最后的风度，拿破仑没有让我和他的整个警署有过多接触，因此，我只看到了贝尔西耶带着另外两个公安部的国务委员瑞尔和杜波瓦走了进来。

看到他们的窘态后，我意识到在他们面前，我威信犹存，他们这样做只是迫于形势。事实果然如我所料，贝尔西耶尴尬地开了口，说他们是受拿破仑之命前来向我索回公安部的文件。他接着说他们必须拿回这份文件，否则作为巴黎公安局局长的杜波瓦只能当场拘捕我，并查封我所有的文件。瑞尔则像老朋友那般，用更为热情的语气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他们也只是奉旨行事。我毫无畏惧地说道："你们都在想些什么？一直以来，我都在兢兢业业地为陛下尽职，我怎么可能会违背他的旨意呢？我没想到我会被他的猜忌所伤，但没关系，来吧，进来吧，先生们，你们随意检查，我这就把我家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你们，我也会把我所有的文件都拿给你们看。对我来说有幸受到陛下的突然关照真是一份荣耀，而我也相信我可以安全通过考验。我想这次严格检查之后，陛下应该会明白他对我的猜忌是多么的不公，同时他也会看到我的敌人们的用心是多么险恶。"



杜波瓦

镇静地说完这段简短的话之后，我接着说道："因为我当值期间我和陛下之间往来的秘密文件太过重要，同时也为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调查，所以在我离职时，我已经把它们全部销毁了。先生们，这里可能还剩下一些陛下想要的文件，我觉得它们应该就在这两个贴了标签的盒子里。你们应该很好分辨哪些是你们想要的文件吧。这里还有一些我私人的文件，我也一并奉上接受检查。我再说一次，我什么都不怕，更不会害怕这种检查。"

听完这些，这几个人忙不迭地向我道歉。接着，他们开始检查文件，更确切地说是我把文件拿到了肩负着搜查使命的杜波瓦面前。虽说杜波瓦和我有过节，素来不和，但这一次，他却表现得毕恭毕敬。也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失势在即[(3)]，又或许他觉得应该谨慎对待我这样一个人，一个曾经两次跌倒，却又重新站起来的部长。

可能是被我的真诚和坦率[(4)]所打动，拿破仑的检查团一行仅仅对我提供的文件进行了例行公事的检查。一番寒暄后，贝尔西耶、瑞尔和杜波瓦三人乘车返回了巴黎。

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从家里花园的小门出来，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坐着我的双人马车偷偷往首都方向赶去，并匿名住在了巴克街[(5)]上的一家旅店里。我所有的内线都处于紧张状态。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得知了这件事：拿破仑听说了费里耶尔城堡所发生的事情后，大怒不已，说了一些威胁我的话，并大喊我愚弄了他的特派员。之后他又责骂这些人全部是傻子，贝尔西耶更是首当其冲，拿破仑骂他是政务上的娘们儿，被帝国最狡猾的人欺骗了。

经过再三考虑，第二天上午九点我去了圣克劳德。在那里，我对驻殿大元帅杜洛克[(6)]说："我来这里有要事，希望能马上见到陛下。我要向他证明他根本不需要这般质疑我。请您告诉他，我会一直在您的办公室里等他，哪怕他只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杜洛克对我说："我现在就去，如果您能降低要求的话，我就更好办了。"

这是他的原话，而这句话也意味着他理解了我的行动。回来后杜洛克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拿破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我和拿破仑两个人。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便开始猜测他的想法。然而他并没有给我说话的时间，一见面，他便开始安慰我、恭维我，甚至对自己的某些做法表现出了悔意。紧接着他又加重了语气表示希望与我和解，并且为了补偿我的损失，他会给我一个保证。最后他向我提出索要秘密文件。



驻殿大元帅杜洛克

我坚定地告诉他："陛下，我已经把它销毁了。"

拿破仑的回应里夹杂着沮丧和愤怒："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需要它。"

"可是它已经变成灰了。"

他把头一扭，恶狠狠地看着我，嘴里吐出了一句话："出去！"

"可是，陛下……"

拿破仑大声对我吼起来："我说过了！出去！"

此时我手里还拿着一篇简短但内容丰富的汇报。出门的时候，我毕恭毕敬地把汇报留在了桌子上，可拿破仑却怒不可遏地拿起来撕碎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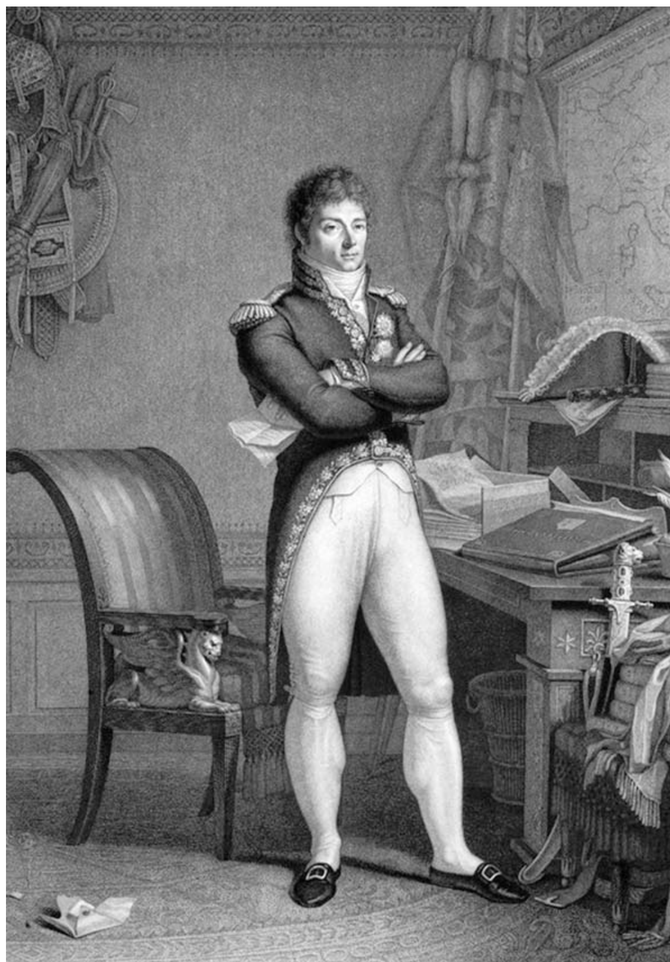
再次见到杜洛克时，他并没有察觉到我有任何情绪的波动。他因此以为我获得了特赦。他对我说："您又躲过了一劫。前天我就劝过陛下，劝他不要拘捕您。您这是帮他躲过一次疯狂的灾难，他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让那些为帝国鞠躬尽瘁的人心寒。"

从杜洛克的神情中，我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他内心的想法。于是我握起他的手，对他说："请不要灰心，陛下需要您这样贤明的人为他提出建议。"

从圣克劳德出来之后，我开始对这位我之前一点都瞧不上的大元帅另眼相看。虽然我认为我可能赢得了杜洛克的一丝信任，但我依然心事重重。回到旅店后，我赶紧处理完几件紧急的事情，准备重回菲利埃，纳夏泰尔亲王贝尔西耶[(7)]来了。他对我说："陛下非常生气，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生气过，他给我们复述了一遍您对他说的话。没想到您为了不用交还秘密文件，竟敢当着他的面说把它销毁了。他说如果您拒不交还文件的话，那么您就是在触犯刑法。"



纳夏泰尔亲王贝尔西耶



青年时期的纳夏泰尔亲王贝尔西耶

我对贝尔西耶说："这种质疑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就算这份文件真在我手上，我也决不会把它交出来的，因为这份文件是我唯一的依靠。"

贝尔西耶还想劝我妥协，但我拒不回应。于是他用拿破仑来威胁我。我对他说："去吧！去向他禀报，这二十五年来，我随时都在准备着上断头台。我知道他的厉害，但我一点都不害怕。请告诉他，如果他想让我成为第二个斯特拉福德[8]的话，那么就请他动手吧。"

离开巴黎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我必须好好保管这些证据。在我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在处理一些事件时，我所采取的所有暴力和极端不公的方式都是出自拿破仑的授意，这些文件上都有拿破仑的签名。

我所担心的并不是再一次跌倒，而是黑暗中伸向我的荆棘。在朋友的敦促下，我决定带着我的长子[9]和他的监护人立刻出发前往里昂[10]。我的前任秘书马洛是里昂公安局局长。为了报答我的知遇之恩，马洛向我提供了所有需要的文件，让我能够快速通过法国的大部分地区。离开法国后，我迅速转移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11]。经过这样一场仓促的长途颠簸后，我觉得我必须稍加休整才能继续我的计划。

我选择来到佛罗伦萨避难并非随意之举。现在我告诉你们这样做的原因。

托斯卡纳[12]这片古老而又美丽的土地自古以来就受到上天的垂怜。它就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从美第奇家族[13]到奥地利家族，他们更像父亲守卫着儿子那样保护着托斯卡纳。后来托斯卡纳卷入了法兰西帝国的旋涡：拿破仑任命帕尔马大公[14]为伊特鲁里亚[15]国王，命其接管这片土地，此后托斯卡纳又经历了多次动荡。

自1807年以来，拿破仑的大妹爱丽莎便以长公主的身份监领着这片土地。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当时是在我的争取下，她才获得了这片土地。爱丽莎是翁达斯和莫莱伯爵[16]的靠山，也是造成了我第一次失势的罪魁祸首，不过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个女人的优点。

写作的时候，我总是习惯于回忆一些往事，不过现在我要说的是，我的这些回忆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因为在他的眼中，过去的就只能成为历史，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帕尔马大公冈巴塞雷斯



拿破仑的大妹爱丽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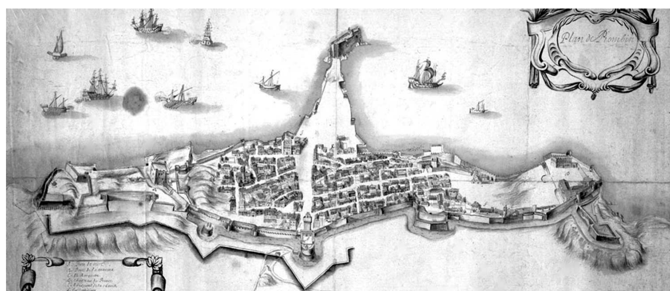


莫莱伯爵

如果把爱丽莎放在帝国大业的背景下，那么她的所作所为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当年回到公安部后，我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它可以使我与爱丽莎和解：两个对她非常重要的人先后闯了祸。他们一个惹怒了拿破仑，成了拿破仑缉拿的对象；另一个则深陷一场棘手的案件。我平息了这两件事，暗中保护了他们，为此也费了不少力气。

除此之外，在1805年，我还向拿破仑建议说把卢卡[17]和皮翁比诺[18]交给爱丽莎管理。我基本可以确定，此事之后，我基本得到了

长公主的认可。



19世纪的皮翁比诺

和拿破仑的最后一次会面后，我确信这一次失势已经无可挽回，因此我去拜访了正在为筹备婚礼而忙碌的长公主爱丽莎。我并没有告诉她我的困境，只是说我将要去罗马履职，恳请她能写一封推荐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还特地在信的开头，称我为“朋友”。而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了托斯卡纳的原因：我不仅有可以依赖的朋友，还可以得到长公主的庇护。我相信这些人的人品，我觉得我可以向他们托付实情。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收到巴黎和家里的消息：我在艾克斯的家人已被政府拘捕；同时我也得知在萨瓦里的怂恿下，拿破仑觉得我的抗旨是一种不谨慎且疯狂的行为。当时没有人敢想象会有人敢于违抗这样一位霸主，甚至于都有人在信中问我：“您是想要比陛下还强大吗？”这一次，我开始感到害怕了。失眠和梦魇折磨着我，恍惚间我好像被警察包围了，又好像但丁的地狱之门已经在我的面前打开。

混乱中，我感觉帝国的恐怖专制已经超越了罗伯斯庇尔——那个曾经想要把我推上断头台的人。唉，虽然我心里非常清楚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但我的头脑越来越不清楚了，最终我决定用最绝望的方式面对这一切：逃亡美国。为了报答我的知遇之恩，托斯卡纳大区公安局局长杜波瓦[19]给我提供了畅通护照，我迅速赶到里窝那。抵达里窝那之后，我和那里的人说我想坐船去看看那不勒斯，再从那里转

道罗马。事实上我是想穿过英吉利海峡远走大西洋。

但我万万没想到，我的身体竟然无力抵抗大海带来的眩晕！在海上漂泊的我胸闷气短，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旋转。身体的折磨使我意识到我这样不辞而别会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恶果，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不愿意妥协，每次想到要向拿破仑低头，我都会浑身颤抖。

正当我在海上痛不欲生的时候，一位英国舰队的船长提出带我上岸休息数日，并答应照顾我，给我拿晕船药。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当时的我不能接受他这份好意，因为以我当时的身份和处境，我不想让自己卷入更复杂的事件中。

不过也正是这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看待事物有了新角度。慢慢地我觉得我仍然可以和拿破仑这个暴怒的皇帝做个交易。我又犹豫了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的方案。当一切都处理妥当后，我又回到了佛罗伦萨。在这里，我给爱丽莎——这个仍乐意为我效劳的人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她可以帮我带一封信给拿破仑。这封信里没有奉承，没有卑微，我向拿破仑表示，我很后悔惹怒他，但考虑到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落入政敌之手任人宰割，因此我觉得我有理由拒绝交出这唯一能保护我的东西，即使这种理由可能是错的。同时我请求道：我可以在大公主的庇护下交出他想要的文件，但作为交换条件，他需要赦免在我两届任职期间被他授意所采取的所有行动牵连到的人员。除此之外，我希望陛下能够念在我多年为政府效劳的分上，允许我归隐艾克斯和我的家人团聚。递出这封信后，我想即便这封信再一次惹怒拿破仑，他也会顾及他和大公主的血缘亲情，给大公主一个面子。

我让信使把这封信带给了大公主，果真如我所料，在爱丽莎公主的鼎力相助下，我收到拿破仑的答复，讷沙泰勒公爵奉陛下旨意，同意了我的请求，并愿意以此作为交换秘密文件的条件。

在大公主的斡旋之下，我和拿破仑之间达成了这场三周前我认为绝不可能的交易。但这场交易并不出于我心悦臣服的顺从，而是因为我的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来自大海的折磨。



大公主爱丽莎

和家人在艾克斯团聚之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安宁。而我感觉到我的内心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愈挫愈勇。向这样一位暴君低头时，我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过。对于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希望生活在理性政府下的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都是付出了很大牺牲的。而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决定背后还有更苦涩的想法：第一帝国命数将尽。

(1) 伊克西翁是古希腊神话人物，特萨利君主。曾求聘于君主狄奥尼斯，却未支付彩礼并将之杀死。一度为宙斯所宽恕，后又由于追求朱诺而被逐并施以火轮之刑。

(2) 1855年至1859年，由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重建费里耶尔城堡，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长子继承制规则通过父系继承。它被认为是法国最大、最豪华的19世纪城堡，位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费里耶尔布里，在巴黎以东26千米处。

(3) 1810年10月14日，帕斯基耶尔接替杜波瓦伯爵出任巴黎公安局局长一职。富歇在回忆录上卷中有过交代。——原注

(4) 富歇的原稿中，“坦率”这个词被用作斜体。——原注

(5) 巴克街得名于1550年设立的一个摆渡，位置在今伏尔泰滨河路，用来运输兴建杜伊勒里宫的石块。它跨越塞纳河的地点，在1632年由金融家巴比埃兴建红桥，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改建成今天的皇家桥。

(6) 杜洛克，拿破仑贴身大元帅，被誉为拿破仑的影子。包岑会战中立有大功。

(7) 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西耶，纳夏泰尔亲王（1753—1815），出生在凡尔赛，法国元帅，1808年任法兰西陆军副统帅，拿破仑手下的参谋长。

(8) 这里指托马斯·温特沃斯（1593—1641），封斯特拉福德伯爵，英格兰政治家，英格兰内战前的一个主要政治人物。他曾在议会任职，并且是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者。从1632年至1640年，他担任爱尔兰总督。在那里他建立了强大的专制统治。回到英格兰后，他成为国王的首席顾问，试图加强对议会的控制。当议会判处温特沃斯死刑时，查理一世不情愿地签署了死刑令。

(9) 约瑟夫-莱伯特·富歇（1796—1862），第二代奥特朗特公爵，妻子为第一帝国财政大臣苏西伯爵的女儿伊丽莎白。

(10) 里昂，法国第三大城市，法国东南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罗讷省的首府，位于罗讷河和索恩河交汇处。里昂是著名的国际都市，历史悠久，部分历史和建筑地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11)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和佛罗伦萨省的首府。佛罗伦萨曾经长期处于美第奇家族控制之下，是欧洲中世纪重要的文化、商业和金融中心，并曾一度是意大利统一后的首都。

(12) 托斯卡纳，意大利一个大区，拉齐奥位于其南，翁布里亚位于其东，艾米利亚-罗马涅和利古里亚在其北，西濒第勒尼安海。它经常被评价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其首府为佛罗伦萨。

(13)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15世纪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势力和影响源于经商、从事羊毛加工和在毛纺同业公会中的活动。然而真正使美第奇发达起来的是金融业务。美第奇银行是欧洲最兴旺和最受尊敬的银行之一。美第奇家族以此为基础，开始是银行家，进而跻身于政治家、教士、贵族，逐步走上了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上流社会的巅峰。在这名门中曾产生了四位教宗（其中庇护四世来自米兰的美第奇家族，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远亲）、多名佛罗伦萨统治者及托斯卡纳大公，两位法兰西王后，和其他一些欧洲王室成员。

(14) 即让-雅克·雷吉斯·德·冈巴塞雷斯（1753—1824）。

(15) 伊特鲁里亚，处于现代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伊特鲁里亚的位置包括了现今托斯卡纳、拉齐奥、翁布里亚的区域。伊特鲁里亚被认为是伊特拉斯坎人的国家，后来被罗马人吞并了。古罗马的伊特鲁里亚时期是其鼎盛时期。

(16) 莫莱伯爵，路易·马修（1781—1855），法国保皇党政治家，曾在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和路易-腓力治下任职。

(17) 卢卡位于意大利中北部利古里亚海附近，卢卡省的首府。

(18) 皮翁比诺，是意大利利佛诺省的一个市镇。从古代起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附近有艾特鲁利亚人的港口波普洛尼亚。中世纪为比萨共和国的重要港口。

(19) 这个杜波瓦并不是巴黎警察局长杜波瓦。事实上，托斯卡纳公安局局长和里昂公安局局长因为为富歇提供便利而受到罗维戈的严厉批评，里昂公安局局长甚至被免职。——原注

第20章　我失势的内幕

精彩看点

秘密搜集情报——宝莉娜·波拿巴的失势——宝莉娜与皇后争宠——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退位——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退位的真相——威尔斯利侯爵与拿破仑的谈判——谈判失败——贬黜的真相——焚毁政策——大陆封锁政策受到阻碍——拿破仑敛财

在这样一场看似温柔却遥遥无期的流放中，我本应看开一切，变得与世无争；可是我却做不到这样，因为关注国际风云、审时度势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能觉察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那些散布在《箴言报》中的谎言——它们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一眼便能看穿新闻中所提及之事的原委，而新闻中避而不谈的才是事情的真相。在我眼里，报纸上那一套一套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野心的快乐折磨着的拿破仑。我甚至能透过报纸看到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动向和那些近臣密使们的言谈举止。

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是我看不到的。我离事件的发生地太远了：远在艾克斯的我怎么能猜得到巴黎平淡日子里的突发状况呢？巴黎的宫廷随时都可能上演各种震荡和风暴，而很多情况下，吹到外省时，这些风雨已经变成另一番模样。

可是我已经习惯把控全局。这样温柔的流放让我的生活变得空虚而无聊。在几个靠得住的朋友和三位信使的帮助下，我开始亲自拟写秘密报告。密报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内容相互佐证又相互牵制。这算是我自娱自乐的解闷法，但也可以说我在艾克斯成立了自己的秘密警署。最开始的时候，我每个月只写一份秘密报告，到后来甚至变成了一周写好几份。

我不在巴黎，所以获得消息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但是来自巴黎的信息却更容易激发出我的政治灵感，这也正是退居二线的迷人之处。啊，勇敢、智慧且坚韧不拔的V夫人！您掌握着所有事件的线索和真相，您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却能够在危机面前对我不离不弃。在这里我向您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还要说的是，在这场我们精心准备的爱国行动里，其他人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我们亲爱的D夫人和优雅动人的R夫人也一直在支持您的工作；在您美德的感召下，一支不为人知的骑兵队也投靠在您的麾下，任您指挥。在这里，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不论是在恐怖时

期，还是在专制的政府和帝国时期，有谁能像您这样一直对国家心怀赤忱呢？我被你们这群安静而又谦卑的女人所感动，你们的勇敢让很多男人都自惭形秽。

好吧！经过如此多的曲折和磨难之后，那可怕的一天终于要来了：在这一天里，一切——包括我们的财富、幸福和安宁——都将会被重新洗牌。是的，我们因为那个伟大的人才拥有了这一切，但这个伟大的人不顾历史血的教训，一意孤行，妄图建立一个没有反对党的朝堂。这个被控制欲和征服欲吞噬的人啊，他曾经一路走到了人类权力的巅峰，但现在他必须要停下自己的脚步。

我通过密报和其他各种信息密切关注着这个人的所有动向。我知道对于法国来说，他就是帝国。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成败和所有人的福祉全系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是个可怕的联系。他的身上承载着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成百上千个不同的国家。

然而，达到权力顶峰的拿破仑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在我离开巴黎两年之后，他的衰落开始慢慢显露出来。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要在这里举几个例子。也正因为这些事件，我才得以重出江湖[(2)]。

1810年发生了数件大事：首先是拿破仑和玛丽·路易的大婚，紧接着是我的失势，随后是拿破仑的妹妹——宝莉娜·波拿巴的失势，接下来是拿破仑的兄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3)]退位。大家可以和我一起从这其中的两件事里一窥未来。

拿破仑有三个姐妹，她们分别是爱丽莎、卡罗琳娜·波拿巴[(4)]和宝莉娜·波拿巴，其中宝莉娜·波拿巴以她独特的魅力深得拿破仑的宠爱。虽然她娇弱、古怪、放荡、空洞，但却不失几分风趣。她喜欢奢华、挥霍和各种赞美，而在这个世界上，她最憎恨的男人是她的第二任丈夫卡米耶公爵[(5)]，其次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勒克莱克。她的第一次

婚姻就是所谓的驻军婚礼，当时，因为身体欠佳，所以她拒绝随军前往圣多明戈。但最后，在拿破仑的命令下，她不得不登上军舰。

由于远征遭到挫折，她被迫来到龟岛[6]。在热带燥热的气候和狂热民风中，宝莉娜·波拿巴深陷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与阿尔特米希亚[7]和塔尼库斯的未婚妻[8]截然相反，勒克莱克死后，宝莉娜迫不及待地登上回巴黎的船，自由而又骄傲地扎进了纸醉金迷的新生活。回到巴黎后，因为纵欲过度，宝莉娜·波拿巴不得不开始长时间的休养，在试过阿斯克勒庇俄斯[9]所有的灵丹妙药后，宝莉娜·波拿巴终于康复了。大病初愈的她就像是喷过神奇药水的花朵一般，变得愈加美丽动人、娇艳欲滴。



拿破仑的大妹爱丽莎



拿破仑的二妹卡罗琳娜·波拿巴



拿破仑的三妹宝莉娜·波拿巴



宝莉娜·波拿巴的第二任丈夫卡米耶公爵



恢复健康的宝莉娜·波拿巴

然而这个放荡的女人并不想就此收敛自己的行为，却又惧怕拿破仑的暴怒。于是她联合另一个女人，试图以美色来征服自己的兄弟。拿破仑根本无法抵挡这样的娇柔和妩媚，他不止一次地对人们宣称自己的妹妹是最漂亮的女人，是当代维纳斯[10]。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漂亮不过是一种放肆。

拿破仑对妹妹的喜爱持续了一年多。然而这种喜爱却没达到迷恋的程度。这个高傲而好战的灵魂迷恋的只有控制和征战。赢得瓦格拉姆战役、签订维也纳和约后，有关拿破仑将和约瑟芬离婚的流言在宫廷中传得沸沸扬扬。回到巴黎的当日，拿破仑就去找了自己的妹妹宝莉娜·波拿巴。而这个一直期盼哥哥凯旋的妹妹，也向她的哥哥表达了从未有过的爱恋之情。我甚至听说，当天她对拿破仑说了这样的话：“为什么你不能像埃及的托勒密二世[11]迎娶自己的姐姐？我可以离婚然后嫁给你呀。”

我想她可能不知道，太阳底下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我认为她的这些话简直愚蠢至极。要知道当初把她许配给卡米耶公爵的正是

拿破仑。我不知道听到这番话的拿破仑心里又该作何感想。

因此当玛丽·路易坐上皇后的宝座时，我们可以想象宝莉娜·波拿巴的内心是多么的苦涩和煎熬！玛丽·路易皇后严格地调整了宫廷上下的礼仪习俗。对于宫廷而言，这可以说是一次大换血。而作为丈夫的拿破仑则全力支持皇后的改革，并身体力行。此后宝莉娜·波拿巴的宫里日渐冷清。于是这个善妒的女人便把玛丽·路易皇后当作自己的假想敌，身体也因此而日渐消瘦。在医生的建议下，百无聊赖的她前往亚琛[(12)]接受温泉治疗。途中，宝莉娜在布鲁塞尔恰好遇到了正准备前往荷兰的拿破仑夫妇。不得不在玛丽·路易皇后前露脸的她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嘲弄皇后一番。于是在参加皇后宫殿举办的沙龙时，她冷笑着把两个指头交叉着向皇后示威。这种手势在民间代表着夫妇一方的背叛。拿破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玛丽·路易皇后也从镜子里觉察到了这一切。拿破仑十分生气，他命令宝莉娜当天就离开皇后的宫殿。宝莉娜拒绝服从哥哥的命令，并就此离开巴黎。直到1814年拿破仑被迫退位[(13)]后，她才重新回到拿破仑的身边。

与宝莉娜·波拿巴的失势相比，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退位则显得崇高一些。

之前拿破仑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只针对民族国家。他曾经轻描淡写地说过希望自己建立的帝国能成为欧洲最长久的帝国。他的行为也因此而越来越失控，以至于到后来居然想要废掉自己亲人的王位。人们不禁猜测当年册封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王之时，他或许已经考虑到有一天要将路易·波拿巴降为省长。随着大陆封锁政策的推行，整个荷兰的工业和国际商贸都遭到了重创。荷兰经济每况愈下，性情温和、为人耿直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不得不无视拿破仑的威胁，默默支持海外贸易。而在大怒之中，意图出兵荷兰的拿破仑显然已经忘记当年逼迫弟弟离开巴黎时的那一番话：

> 宁可做死去的国王，也不要当苟活的王子。

因为无力阻挡拿破仑的入侵，所以路易·波拿巴只能自动退位，并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在退位的当天，他向荷兰立法集团说了这样一番话：

> 尽管我的哥哥对我非常残酷，但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孩子的，他一定不会剥夺这个孩子的继承权，因为他找不到任何理由抱怨、不满这样一个没有行为自主能力的孩子。而之后摄政的皇后也会尽力讨好当今圣上，也就是我的哥哥。或许此事发生后，她应该感到开心吧，谁又知道呢……也许只有我才是横亘在法国和荷兰之间的唯一障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愿远离这些我深爱的人，用余生去远方受难、流浪。

这样的退位并不是毫无尊严。说完这些话后，路易·波拿巴立刻离开了荷兰。从此他拿着一笔微薄的抚恤金，归隐在奥地利联邦格拉茨，他的妻子奥坦丝，这个贪婪的女人则独吞了拿破仑为自己弟弟预留的两百万法郎。

这件事使我震惊。震惊之余，它也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的是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因此而重获新生，因为总有一天，这个把所有人带向火坑的人也会被逼退位。不久之后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想法是如何在别人那里开花结果、成为事实的。

我们相信在路易·波拿巴退位这件事情上，拿破仑也会感到难过。但同时他身边并不缺少溜须拍马、粉饰太平的人。大家想听听当时的外交大臣帕尼公爵对此事的态度吗？当年塔列朗就说过这个人可以胜任任何职位。在报告里这个节节高升的帕尼公爵写道：在没有拿破仑许可的情况下，荷兰国王擅自让位的行动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份报告恰恰也从侧面说明，他们认为荷兰理所应当地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



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





玛丽·路易皇后



路易·波拿巴的妻子奥坦丝



路易·波拿巴的儿子

拿破仑则把路易·波拿巴尚且年幼的孩子叫到身边，册封他为贝尔格大公爵[(14)]。之后拿破仑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 过来吧，我的孩子。你父亲的行为让我伤心，但那也都是因为他的病情所致。[(15)]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了，你什么也不会少，但有一点你要记住，不管我的政策将你置于什么样的情况，你都要首先向我汇报，只有得到我的允许之后，你才能再进行下一步……

拿破仑的野心昭然若揭，他的地位高于所有国王，高于所有的民族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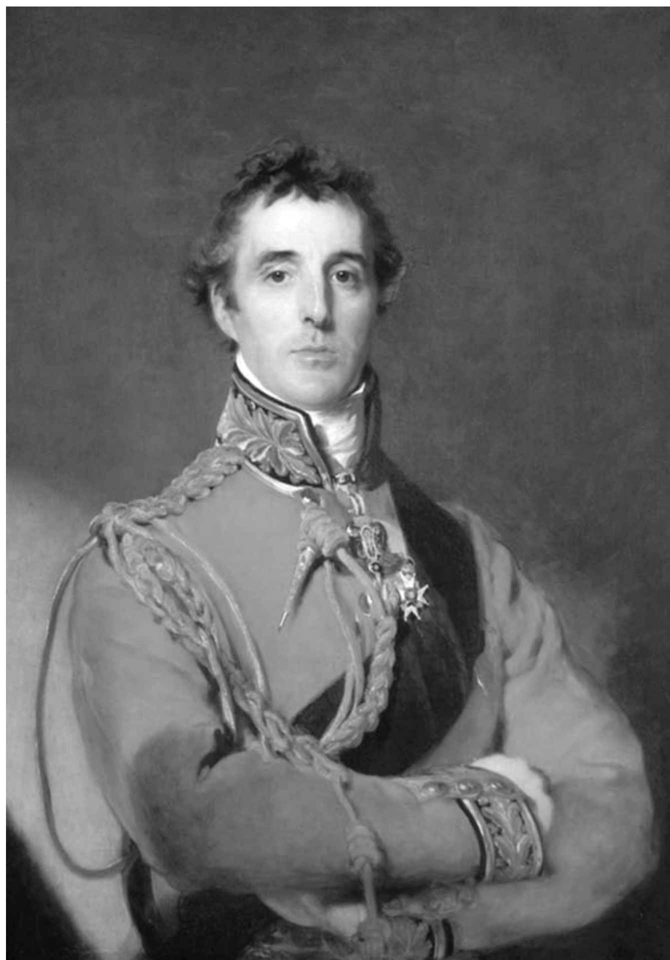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路易·波拿巴退位的真正原因吧。不得不说的是，这件事和我的失势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和奥地利公主完婚之后，拿破仑对我之前提出的全面和平建议做过指示。我从自己在英国那里的密使得知，有两件事是英国内阁的底线：荷兰和半岛的独立。荷兰有路易·波拿巴在，我们自然可以放心；但对于半岛的独立，拿破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是让出葡萄牙。在他眼中，只有在攻占葡萄牙时他才受到了挫折。虽然法国军队在西班牙战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基本不相信拿破仑会放弃西班牙。于是在拿破仑的授意下，我和当时（1810年）尚在巴黎的路易·波拿巴一起，与英国签下了一个秘密协定。

路易·波拿巴之后写信给荷兰外交部长，告诉他说："荷兰和英国的私下贸易令拿破仑非常愤怒。在大陆封锁政策上面，如果英国国会不做出调整，或者海上和平协议没有达成的话，那么荷兰和法国的联合便不可避免。"当时远在巴黎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授意他的外交大臣和其他同事就此事达成一个共识，并且派出一位密使出使英国，以他个人的名义和英国进行协商。这位特派员只需要告诉詹姆斯内阁，一旦荷兰和法国联手，那么英国和荷兰之间将不再存在任何贸易的可能，这对于英国的商业和未来的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威胁。经过协商，诸部长决定派遣阿姆斯特丹银行家拉布歇尔前往英国，请他和威尔斯利侯爵展开秘密协商。这也就意味着，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修改1807年11月英国国会通过的议案。然而威尔斯利侯爵拒绝了这次谈判。在他看来，荷兰只是想要取悦拿破仑，所以根本就不具备独立谈判的能力。

为了了解拿破仑的真实想法，威尔斯利侯爵在同一时间[16]派出了英国特使麦肯锡前往莫尔莱[17]，命其同法国特使[18]协商关于交换俘虏的事宜，意图打开海上和平的谈判。在谈判中，英国特使麦肯锡

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以敌对的态度维持各自领地；第二，维持现状；第三，互相妥协并补偿。但拿破仑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地，因此，他否决了这三种方案，但也没有提出自己认可的解决方案。

此后威尔斯利侯爵不再愿意同拉布歇尔先生和法根先生进行任何谈判。同时英国政府也认为1807年11月国会通过的议案运行良好，无须做任何调整。至此所有的谈判都戛然而止。拿破仑认为英国忤逆了自己的意愿，在报复心的驱使下他出兵荷兰。他以为如此就可以永远切断荷英两国之间的贸易了。



威尔斯利侯爵



19世纪的莫尔莱

拿破仑的另外一个心病是：一直以来，公安部长都在力图规正他的管理方式，试图把他的管理纳入理性的轨道。所以在他看来，排挤公安部长一事也已经刻不容缓。他的密使向他提到我的时候，不停地在他耳边进谗言：

> 您在公安部长的作品前颤抖，却因此而更没有勇气推翻他。

几个月以来，拿破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大家都已经看到了[(19)]，他特别担心我和贝纳多特的联合。而此时正是贬谪我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对外宣称，在荷兰的问题上，我假借协商之名设计了阴谋并进行了投机之事——他希望能够借此把谈判失败的事情嫁祸于我。事实上，他的强势和缺乏诚意才是导致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入侵荷兰以及我遭到贬谪的真相。

之后，拿破仑下令[(20)]在帝国控制以及被帝国征服的地区内，所有的英国货物都必须当众销毁。这条法令是对柏林条令和米兰条令[(21)]的补充，也就是说，接下来，拿破仑将在阿姆斯特丹[(22)]和里窝那[(23)]推行曾在柏林、法兰克福[(24)]、美因茨以及巴黎实施过的焚毁政策。既然我们可以说“焚烧不是回应”，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焚烧

不是管治”？



19世纪的阿姆斯特丹

这就是大陆封锁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拿破仑听信了谗言，让英国置身事外，使帝国与全世界为敌。从督政府时期开始，法国的一些社团活动家就鼓吹摧毁英国的唯一方式就是封锁全部的通商口岸。令人没想到的是，这种引火烧身的愚蠢想法竟然一直延续至今。

对于拿破仑而言，他要征服欧洲大陆：法兰西帝国的控制范围不过是整个大陆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仍在黑暗中苟延残喘，那里的人民还活在王室以及王室同盟的统治下。外交大臣帕尼接二连三地要求这些国家关闭对英贸易。他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欧洲不能再有中立国存在，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根据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协商进行相关的贸易。”

这就是著名的大陆封锁政策，其目的是消除一切对外贸易。正因为如此它无以为继。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修改大陆封锁政策，要么采用英国的许可证制度。所以我们看到从1810年末开始，拿破仑主动放松了大陆封锁政策，允许以再生产为目的向法国引入一定数目的殖民地产品。

那么谁是这前所未有的垄断措施的受益者呢？很明显不会是那些投机者，更不会是那些征税官。我们看到的是拿破仑在马尔桑[25]的仓库一天天充实起来。看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财富，拿破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大陆封锁政策的影响下，法国的收入达到了二十亿铸币，而拿破仑分得了五亿现金[26]。如果复仇女神涅墨西斯[27]能够就此放过这位伟人的话，也许有一天，他心中对财富的渴望会打败他征战四方的野心。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些年来这个人积攒的财富总量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加上存放在杜伊勒里宫地窖里的、价值四百万法郎的动产，供皇室使用的、价值四五百万法郎的金质餐具，五百五十万法郎军队年俸（鉴于拿破仑拥有宣战和停战权、签订和平协定权，有时候这笔年俸会高达七百万法郎）。除此之外，所有收缴自归属不明确领地的财物也全部归入了拿破仑名下。把整个法国归入自己的纳税范围是最得拿破仑欢心的政策之一。

这样一个靠武力肆意掠夺财富、无休止肆意挥霍的政权会把我们带往何处呢？我们付出的鲜血就是为了向他奉上全世界。但是，要填饱这样一个征服者的胃口似乎遥遥无期、毫无希望。

我这样的计算也许会让一些读者发笑。他们会说：“什么？这个部长之所以如此伤感，是因为他遭到了贬黜，他现在叫嚷着别人横征暴敛，难道他自己就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吗？他自己不也曾富可敌国、权倾一时吗？”

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虽然我曾经在这样一个危险、没有节制、让人难以忍受的政权下获得过一些好处，但我会因此而隐藏事情的真相吗？答案是否定的，沉默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时候揭开帝国轰塌的真相了！

接下来大家将会看到，拿破仑帝国何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失控并

走向败亡。

---

(1) 富歇在接下来的回忆中，会向读者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2) 重出江湖这个词并不是法语单词，而是一个英语借用词。——原注

(3) 路易·波拿巴（1778—1846），荷兰国王称路德维克一世，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妻子是拿破仑的继女，约瑟芬和前夫博阿尔内所生的女儿奥坦丝。两人共有三个儿子，其中幼子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路易早年参军，并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年仅25岁就担任将军。拿破仑征服荷兰后，于1806年封路易为荷兰国王。不过路易反对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并拒绝派兵支援拿破仑入侵俄国。1810年，拿破仑逼迫路易退位，荷兰并入法国。路易退位后仍留在荷兰三年。

(4) 卡罗琳娜·波拿巴（1782—1839），拿破仑最小的妹妹，那不勒斯国王若阿尚·缪拉的妻子。

(5) 卡米耶公爵（1775—1832），法兰西第一帝国将军，宝莉娜·波拿巴的丈夫，拿破仑一世的妹夫。

(6) 托尔蒂岛，龟岛，是加勒比海中的一座岛屿，位于海地北部海岸，面积180平方千米，1493年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

(7) 阿尔特米希亚为古希腊时期安那托利亚地区卡里亚王国的女王，在她丈夫死后她继承王位成为女王。丈夫死后，阿尔特米希亚抱着丈夫的骨灰盒痛不欲生。

(8) 塔尼库斯是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克劳狄一世的儿子。克劳狄一世再婚后，收养了皇后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尼禄。克劳狄一世去世后，尼禄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五任皇帝。尼禄因为喜欢塔尼库斯的未婚妻朱尼而谋杀了塔尼库斯。丈夫死后，朱尼悲痛欲绝。

(9)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在古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埃斯库拉庇乌斯，他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形象为手持蛇杖。他的女儿许癸厄亚、伊阿索、阿刻索、阿格莱亚、帕那刻亚则是主管清洁、医疗和医药的女神。相传古希腊医师、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之后裔。据说冥王黑帝斯以天雷杀死阿斯克勒庇俄斯后，宙斯将其灵魂升上天空，化身成蛇夫座。

(10) 维纳斯是罗马神话里的爱神、美神，同时又是执掌生育与航海的女神，相对应于希腊神话的阿芙萝黛蒂。

(11) 托勒密二世（前308——前246）原来的妻子是色雷斯公主阿西诺亚一世。但是，在阿西诺亚二世（她是阿西诺亚一世的后母）从色雷斯返回之后，也许是为了迎合埃及人的想法，托勒密二世抛弃了原配的王后并以企图谋杀丈夫的罪名将其流放。随后他与姐姐结婚并使她成为自己的共治者。

(12) 亚琛是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一个城市，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是德国最西部的城市。

(13) 1813年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双方在现今德国境内多次激战。虽然法军取得多次胜利，但是针对拿破仑的压力却是越来越大，直到10月的莱比锡战役法军被击溃，各附庸国也纷纷脱离法国独立，同盟军开始向巴黎挺进。1814年4月13日，拿破仑在巴黎枫丹白露宫签署退位诏书。

(14) 根据1805年《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重组，若阿尚·缪拉成为贝尔格大公爵。1809年，缪拉的儿子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成为贝尔格大公爵。

(15) 拿破仑的这种影射非常无理。路易体弱，但是他的精神和判断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原注

(16) 1810年4月。——原注

(17) 莫尔莱是法国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市镇和副省会，位于该省东北部。

(18) 穆歇侯爵，曾任查理十世驻瑞士大使。

(19) 《回忆录上》交代过原因。——原注

(20) 1810年10月19日。——原注

(21) 1807年12月17日米兰条令规定，查封所有在英国着陆的船只并充公。

(22)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及最大城市，位于该国西部省份北荷兰省。12世纪晚期一个小渔村建于此，而后由于贸易的迅猛发展，阿姆斯特丹在荷兰黄金时代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在那个时代，该城是金融和钻石的中心。19世纪和20世纪，该城扩展，许多新的街坊与近郊住宅区形成。

(23) 里窝那是第勒尼安海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西部，

是里窝那省的首府。里窝那在1577年由建筑师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建立，18世纪末由利奥波德二世扩建。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理想的城镇”，当时的建筑至今仍存在于社区之中。

(24) 法兰克福，正式全名为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是德国中西部黑森州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德国第五大城。自中世纪起，法兰克福即为德国的中心城市。公元794年时，法兰克福被授予帝国自由城市的地位。1815年，法兰克福自由市成为德意志州联的政治中心。在1848年革命时期，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圣保罗教堂召开。在普奥战争中，与奥地利结盟的法兰克福被普鲁士王国所吞并后，在1866年正式失去城邦的主权。

(25) 马尔桑是瑞士的城镇，位于该国西部，由弗里堡州负责管辖。

(26) 圣海伦的战俘确认了这条指控。但据他们的供词，当时只有4亿现金。——原注

(27) 涅墨西斯是希腊神话中被人格化的冷酷无情的复仇女神，亦称为拉姆诺斯的女神，其神殿位于马拉松以北的拉姆诺斯。神话中的涅墨西斯会对在神祇座前妄自尊大的人施以天谴。她又名阿德剌斯忒亚，意为“无法逃避的人”。涅墨西斯虽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神，但她也曾给诸如厄科和那耳喀索斯这样的凡人带去很多伤痛。那耳喀索斯生于希腊的Thespiae城与维奥蒂亚州，是一位自恋的美少年，对所有前来求爱的女人都无动于衷。一次那耳喀索斯打猎归来，被涅墨西斯引至一处水池。在池水中他看见了自己俊美的脸，于是爱上了自己的倒影，无法从池塘边离开，终于憔悴而死。涅墨西斯认为不应有人占有过多的好运而高傲自大，因此她常去诅咒那些有福的人。

第21章　法英关系紧张

精彩看点

法俄同盟动摇——罗马王降生——法国爆发饥荒——萨瓦里主政下的公安部——诗人艾斯门纳德——科里男爵事件——玛丽亚王后事件——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分歧——塔列朗失势——挑唆英国工人运动——交换俘虏——责令瑞典切断同英国的贸易

荷兰国王退位后，拿破仑致信参议院[1]，宣布当前最迫切的事情便是控制埃斯科河、默兹河、埃姆斯河、威悉河以及易北河的河口，并沿波罗的海[2]建成内部海上航道。一位参议院议员[3]提出，荷兰、德意志北部的大部、汉堡、不来梅[4]和吕贝克[5]等自由城市都应当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接着他还建议法国增设十个行省。也就是说，拿破仑在还没有巩固已有的战利品时，就已经在谋划着继续征战远方。



19世纪的吕贝克

在没有同任何机构协商的情况下，这条提议便假借同英国作战之名得到了落实。从此拿破仑取消了自己曾经建立的王国，莱茵联邦和威斯特伐利亚王国都不复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土地都成为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接着拿破仑又划定了一条新的疆界，切断了德意志中部和南部省份同北海的联系。此举大有联合帝国和普鲁士疆界的趋势，但在之前的协定中，这一点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出，拿破仑此举对邻国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行为。仅仅因为一个参议院议员的提议，仅仅通过了一个简单的法令，他就试图在莱茵河建立一个新的法国统治区。我察觉到划分欧洲

两大帝国势力范围的《提尔西特条约》正在遭到破坏，法国和俄国的破裂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我从在巴黎的信使那里获悉汉萨同盟[(6)]下自由城市的联合给俄国、普鲁士甚至奥地利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扰。这更坚定了我之前的想法：法俄大战不可避免，法国内部也会因为拿破仑的独裁而引发新的动乱，那些被革命摧毁的势力又将卷土重来。

啊！一个危机里裹挟着另一个危机：如何保障革命以及革命者的利益？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面前，我还能继续置身事外、熟视无睹吗？

奥尔登堡王朝[(7)]的奥尔登堡公爵[(8)]是最近被废黜的王公贵族之一。这位公爵和俄国沙皇有血缘关系，他被废黜意味着拿破仑侵犯了一位所有人都希望他能手下留情的公爵的利益。针对这件事，圣彼得堡和杜伊勒里宫之间开展了一次协商。作为补偿，拿破仑把埃尔福特市及其附属地交由奥尔登堡公爵管理。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已经高调拒绝了这份好意，并提出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同时他还命令自己的部长走访欧洲各宫廷，递上抗议书。我知道做事一向沉稳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绝不会贸然行动，法俄大战一触即发。

1811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虚假的太平盛世。从巴黎传来的一封封密电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暴风雨即将来临。现在我需要重新梳理一些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9)]的降生。拿破仑的儿子一出世就只能是国王。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帝国的这个新变化却是不祥之兆：罗马王这个名字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饱受折磨的罗马教皇了，巴黎上下都流传着关于这个新生儿的可笑言论。各个阶层都这样肆无忌惮地谈论着罗马王，恐怕不只是敌对势力操作。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有一位不能怀孕的公主假装有了身孕；接着，就有人传出了另一个

故事，这其中人们很容易便认出了罗马王的影子，这个拿破仑和玛丽·路易皇后的新生儿……



奥尔登堡公爵



亚历山大一世



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

有一些小报记者说罗马王是被偷换的孩子，拿破仑真正的孩子已经死去；还有一些小报记者说，玛丽·路易皇后生下的其实是一个女婴。国务大臣冈巴塞雷斯根本不愿理睬这些传闻，但造谣者却越来越疯狂。当然玛丽·路易皇后的生产过程确实非常艰难，所以有的人认为孩子已经死了，接生的人也因此丢了性命。最后当孩子在一百零一声的礼炮声中降落人间时，拿破仑的狂喜也是人之常情。于是一些人马上开始奉承比恺撒还高兴的拿破仑，说他以后再也不用当心坏日子了（古罗马历中3、5、7、10月的第15日，其他月份的第13日被认为是不吉利的），3月20日是拿破仑以及帝国的吉日。拿破仑相信了这些占卜和预兆。然而他并没有预料到的是1814年和1815年的3月，对他来说，将是多么可怕的日子。

拿破仑与玛丽·路易皇后从兰布莱[10]出发，五月底到达了瑟堡。再次回到圣克劳德[11]时，他们为小罗马王举行了天主教洗礼仪式。在所有人面前，拿破仑亲手举着这个新生儿接受洗礼。摆在这个孩子面前的似乎是一片灿烂的前程，然而三年后他父亲的伟业便被推翻了。当时列席的人，各位大臣、部长甚至帝国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同时在一些人的心里，一些莫名的担忧却在沉默

中暗暗滋长。



19世纪的瑟堡



拿破仑和玛丽·路易皇后抵达瑟堡

很快[12]拿破仑就召开立法集团会议，告知人们罗马王的诞生满足了他的心愿和法国人民的期待。此外他还谈到要控制斯海尔德河、默兹河、莱茵河、埃姆斯河、维斯河和易北河的河口，并沿波罗的海建成内部海上航道。最后他说，“希望大陆从此安宁”。法国人听懂了他的最后一句话，开始备战。

这时有人告诉我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已经下了敕令，要把俄国从尴尬的大陆封锁体系中解脱出来。海上贸易方面，俄国已经无法继续坚持对英国的经济封锁。另外我还听说，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朝堂上，一批老俄国人开始占上风。沙皇敕令减少了几个通商口岸，仅有的几个开放口岸中也已经完全看不到法国产品的踪迹。俄国在反击。

可以说我们的商业越来越局限在法国内部，海外贸易已经基本消失。我们的支柱产业是蔗糖制造业，但一些大胆的冒险家，却利用政府的奖金、土地政策大发横财。据我在巴黎的密探汇报，拿破仑在圣克劳德拥有一块自留蔗糖地，那里生产出的蔗糖可以媲美美洲殖民地奥尔良加工厂生产出的最精美的蔗糖。他的内务部长更是直接建议把这种蔗糖放进博物馆以供参观。于是拿破仑把这些蔗糖送给了莱茵河联邦的各位大公以及各邦的小首领，请他们品尝。普通民众根本无力承担这种蔗糖的价格，所以葡萄汁和本土的菊苣咖啡[13]成为了人们的宠儿。可以说蔗糖工业从侧面拉动了国内新的消费需求，但其他工业可谓是一片萧条。

由于年成不好，农作物的收成大幅下降。更糟糕的是，为了更多的利益，政府曾两次大规模地出口粮食，加重了国内的饥荒。事实上为了安抚民心，各地都开始建立赈灾仓库，为灾民提供最基本的食物和清粥。我们的人民执拗地向拿破仑发出控诉，指责拿破仑出口粮食。不得不承认的是，拿破仑推行的粮食垄断方针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灾荒。人们也开始在国内的沙龙里窃窃私语。民意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大陆封锁体系下的走私活动



法国士兵在街头查验违禁品

这也是萨瓦里就任公安部长以来的民意走向。这个被荣耀和特权眩晕了头脑的人觉得，只要朝堂上有寄生虫、有唯命是从的文人，那么他就成功了；他幻想着只要讨好了圣日尔曼镇上的那些人，他便可以高枕无忧。简而言之，他认为管理民意大概和德莱斯女士[14]重塑朝堂礼仪相差不远。于是公安部每周都会在餐厅举办盛大的午宴，在萨瓦里的主持下，御用的文人骚客们齐聚一堂，按照指示发表对帝国一周新闻的看法。

诗人艾斯门纳德[15]负责的是公安部的道德教化工作。作为诗人的艾斯门纳德可谓是颇有才华，但重用这样一个人的前提是一定要能驾驭他。不久之后新部长便被艾斯门纳德的赞美俘获了“芳心”。在我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知识分子和文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我的继任

者，一个自诩文艺保护者的人，却行轻视文人之事：在法兰西学术院[16]人员的任免问题上，他粗暴地安插自己的候选人。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报社的财产受到保护。我的继任者萨瓦里却肆无忌惮地侵吞报社财产，并将其分给自己的亲信和走狗。报社的衰败意味着萨瓦里失去了一个主导民意的重要杠杆。和拿破仑一样，萨瓦里将斯塔尔夫人视为死敌，他伙同艾斯门纳德，对斯塔尔夫人进行政治迫害，指控斯塔尔夫人进行反王权的秘密集会。

公安部的上层也在用同样暴力的方式推进工作。在这里我们看看主政的“小部长”德马雷那些拙劣管理的方法、那些让人指指点点的行为和混乱不堪的治理模式。请大家听一听这两个故事。

科里男爵受英国政府的委托，前往巴黎援助费尔南多七世[17]。1810年费尔南多七世从基贝龙湾登陆巴黎。我在巴黎抓捕了他，之后把他发送到了文森堡[18]。我的继任者又做了什么呢？他凭空想象这位拿着文件的人是一个假的科里男爵，真正的费尔南多七世其实已经谨慎地选择了回避。

伊特鲁里亚解体后，玛丽亚王后[19]被迫流亡至尼斯。然而在一些人的穷追不舍、步步紧逼下，绝望的王后不得已投向英国人的怀抱。不幸的是，在去往英国的途中她被中途拦下，随身的两个护卫被当场击毙，她自己也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制裁。



斯塔尔夫人



费尔南多七世

在没有阴谋的地方，这些人想象着阴谋、激化制造着阴谋。那些住在土伦的阴谋家们不得不迁往更晦暗的城市，继续密谋着反抗帝国的暴力统治。

没有人为此而站出来讲话，没有任何沟通，也没有任何信任。只有在家人和亲密的朋友间，人们才敢捂着嘴倾吐心中的伤痛。在“民意”一片太平的情况下，拿破仑思谋着沙龙里的声音。于是公安部重金部署了探寻者三百名，令这些人走访巴黎的各个沙龙。可笑的是，五六位警官在出访前还进行了所谓的“数据指导”，其中最没有意义的

指导就来自于他们的首领拉瓦莱特[20]。

拿破仑还是将军的时候，他就深知拉瓦莱特最擅长的是什么。因此很快我们的陛下就厌烦了这些空洞的信息，也渐渐意识到在我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如实汇报民意的真实走向了。他责令公安部向他禀报实情，然而即使公安部按要求行事，这些所谓的实情却也都自相矛盾、异常枯燥，令人不忍卒读。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离开公安部后，有人曾经给我看过那些初学者的警务报告。出乎我意料的是，萨瓦里竟然直接誊写了一份之前的侦查报告，似乎这样做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

自我离开公安部后，公安部的核心职能日渐衰落，与此同时，帝国另一秘密部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塔列朗下台后，外交部上下都充斥着征战的野心、没有限制的暴力和压迫。毋庸置疑，前外交大臣塔列朗是一个敏锐、杰出、老道的外交家，同时也是拿破仑的谋士，为保证拿破仑的个人安危而出谋划策。但拿破仑的做法却让人非常心寒（稍后，我会讲到具体情况）。拿破仑没有办法原谅塔列朗，只因为这个人坚定地反对西班牙战争。

很快巴黎的沙龙里便上演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以拿破仑为首的主战派和围绕在塔列朗身边的主和派用诗词做武器，明争暗斗着。随着与西班牙战争的激化，巴黎这场无声的战争也愈演愈烈。出于报复，拿破仑把西班牙王室的几位大公囚禁在了瓦朗塞城堡[21]，塔列朗夫妇对此事非常关注。有一天，拿破仑看见周围全是自己心腹，觉得自己在气场上压过了塔列朗，因此便想当众羞辱塔列朗。当时曾有传闻说瓦朗塞城堡里发生过一些风流韵事，于是拿破仑故意向塔列朗提及此事。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塔列朗却有理有节地答复道：



塔列朗

为了陛下的荣誉，同时也是为了我的荣誉，瓦朗塞城堡里的大公们最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对于这样一种得体的回复，拿破仑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而这一切也都预示着塔列朗的失势：他的住所、朋友、心腹都在萨瓦里明目张胆的紧密监视之下。萨瓦里甚至还向自己周围的人吹嘘：塔列朗和富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在民众的眼里，内心晦暗的拿破仑失去了自己内政外交上的左膀右臂，从此在国内外事务上，他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所谓公安部已经变成了一个令人气愤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审问机构；所有与国外签订的条款都不过是为了准备新的战争；政府越来越不忌惮自己的言行，作为塔列朗的继任者，主持过流放教皇和入侵西班牙王室的帕尼公爵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任何原则。”

这位远离外交圈，或者说是远离拿破仑淫威的前大臣，却成为了

法国人心目中最温和、最稳妥的一个人。似乎除了逢迎这位权倾一世的征战者外，政府已经别无他法。政客们开始献言进策，筹备着攻占英国和报复俄国的计划。事实上，在德马雷和萨瓦里的管理下，公安部的职能已经被篡改和消解，所以那时拿破仑听到的全是激化矛盾的报告和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

这也就意味着，帝国将同时对英国和俄国两大强国宣战。在我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我曾努力尝试让拿破仑和英国达成和解，然而收效甚微。事实上拿破仑很敬重英国人，对英国也没有特别的敌意，他担心的只是英国政府的寡头执政理念。在他眼中，英国人绝不会给大陆真正的和平，他们所谓的和平不过是三四年的短暂休战。在这方面我从来没有说服过拿破仑，而现在拿破仑身边的一些人又在不断地强化这种想法。最终，他们把法国拖入了一场新的大战，一场拿破仑期待已久的大战，一场可以摧毁英国新闻自由和议会自由的大战。



讽刺塔列朗对英政策的漫画：拿破仑坐在塔列朗肩膀上望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而法国舰队正在被英国舰队攻击



19世纪的瓦朗塞城堡

为了在岛国内部掀起同样的政治革命，拿破仑向英国派出了一些密使。我曾无数次和他说过，英国的制度和她的海军一样强大，然而这个人更愿意相信密使们带来的虚假消息。1811年一整年，他都在忙着推行大陆封锁体系，企图从外部瓦解英国经济；他的密使也在积极地向英国的制造商施加压力。于是乎，短短一年间，英国工厂纷纷倒闭。这极大地打击了英国的信用。密使们向拿破仑报告，英国内部正在遭遇严重的危机，一旦开战，英国肯定承受不起五千多万英镑的经

济损失。

英国诺丁汉确实爆发了失业工人运动，暴动的工人们联合起来，摧毁了新的机器。在一个假想队长卢德长官的带领下，他们自诩为卢德主义者。对拿破仑来说，这只是伤口溃烂的开始。紧接着，爱尔兰、德比、莱斯特相继爆发了工人暴动。可以确定的是，拿破仑政府中的许多人对这些暴动并不陌生，有些人甚至还是这些暴动的挑唆者。(22)

据统计，加上和伦敦暴动里应外合的在法国的各国俘虏，参与暴动的人数达到了五万。这也是拿破仑不愿意交换俘虏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法国只有两千英国俘虏，但我们却控制着五万三千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俘虏。所以拿破仑佯装交换俘虏的条件是：一名英国战俘加上四名西班牙或葡萄牙战俘，换回五名法国或意大利战俘。他确信英国不会同意这样的交换条件，事实上，仅仅这种交换比率就惹怒了英国内阁。



漫画：卢德主义者煽动失业工人进行暴动

此时英国国内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拿破仑对英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也越来越严苛。他责令瑞典切断同英国的贸易，意图让瑞典在英国和法国间做出选择。对一个中立国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源于拿破仑对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23)的继承人贝纳多特(24)的不满。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对这个昔日与我一道护卫安特卫普城的将领耿耿于怀。他认为当年我和贝纳多特一定有过密谋，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德意志受挫，我们两个将联手关上他回法国的大门，并保举贝纳多特为第一执政。所以当贝纳多特前往北方的时候，拿破仑心里非常高兴，

正如萨瓦里等人和他说的那样，这样一来他就少了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

拿破仑觉得，前往瑞典的贝纳多特一定会贯彻自己的指示，于是他一封接一封地致电查理十三世政府，命其切断同英国的对外贸易。瑞典政府没有立刻执行他的指示。拿破仑因此颇为恼怒，命令海盗船抢夺运载着英国殖民地物资的船只，并占领了波美拉尼亚[25]。就这样双方间的不满悄然滋长，同时拿破仑又担心这个即将由贝纳多特主政的瑞典政府。就这样，在两国的互相怄气与争辩中，1811年过去了。

以我对贝纳多特的了解，我相信这个人最后一定会加入到英国和俄国的阵营。他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要捍卫瑞典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也要保住自己的王冠。

我和这位瑞典王子的旧交情，成了萨瓦里等人手中的把柄。这位公安部长认为，是我在幕后指使贝纳多特强硬抵制圣克劳德的指示。很快，我便得知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我的信件都受到了监视。对此我不禁想问，和我玩这种小把戏意义何在？我并没有因此和斯德哥尔摩[26]以及整个北欧失去联系，贝纳多特身边的陆军上校维赛随时向我汇报着那里的情况。



瑞典国王查理十三世



查理十三世的继承人贝纳多特

1811年的政治纷争使我们卷入了一场致命的远征——出兵俄国。而此时西班牙的抵抗运动已经发展成一种国民运动。出兵俄国，正是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发起的针对英国的战争。

---

(1) 1810年12月10日。——原注

(2) 波罗的海是中欧和北欧之间的陆间海，海域横贯北纬53度至北纬66度，东经10度至东经30度，介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部分、欧洲大陆和

芬兰诸岛之间。波罗的海由厄勒海峡、大贝尔特海峡和小贝尔特海峡注入卡特加特海峡，而后者则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注入北海，最后进入大西洋；此外它还通过白海运河同白海相连，通过基尔运河同北海相连。波罗的海在北端与波的尼亚湾相邻，在东北端与芬兰湾相邻，在东端与里加湾相邻。这些海湾同样可以被看作波罗的海的一部分。

(3) 1810年12月13日。——原注

(4) 不来梅是德国不来梅州的州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

(5) 吕贝克位于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第二大城市。历史上曾是汉萨同盟城市之一，也是同盟的“首都”。1987年，“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欧洲北部第一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吕贝克坐落于特拉维河沿岸，是德国在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旧城部分是被特拉维河和易北河-吕贝克运河围绕起来的一个岛屿。

(6) 汉萨同盟是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汉萨”一词，德文意为“公所”或者“会馆”，最早是指从须德海到芬兰、瑞典到挪威的一群商人与一群贸易船只。汉萨同盟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早期达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367年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战胜丹麦，订立《施特拉尔松德条约》。同盟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雄厚。

(7) 奥尔登堡是德国北部的一个贵族家族，它起源于奥斯纳布吕克北部的地区，1100年在文献上首次提到埃基尔玛一世，他是第一名已知的该家族的人物，一般被看作该家族的创始人。

(8) 彼得·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1784—1812），出生于奥尔登堡。奥尔登堡公爵是奥尔登堡公爵彼得一世与妻子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欧根的次女弗里德里克·伊丽莎白·阿玛丽埃的次子。

(9) 拿破仑二世（1811—1832），即弗朗索瓦·约瑟夫·夏尔·波拿巴，拿破仑与皇后玛丽·路易之子，生于杜伊勒里宫。他出世后即被封作“罗马王”，为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皇位的继承人。1813年拿破仑一世在莱比锡战役中战败，次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法国参议院随即废除了拿破仑一世的帝位。拿破仑一世在枫丹白露宫宣布退位，在退位诏书中他希望由“罗马王”即

位、路易皇后摄政。但是在保王的塔列朗游说下，反法同盟最终使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一世失败后，弗朗索瓦被母亲带到她位于帕尔马的领地，后来又被送到维也纳他的外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那里，他的封号也先后被改为帕尔马亲王和莱希斯塔德公爵。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继位，“波拿巴党”——拿破仑的支持者依然称弗朗索瓦为“拿破仑二世”或是“罗马王”。由于身患肺结核，弗朗索瓦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最终在1832年于维也纳去世。

(10) 兰布莱，又译“朗布叶”，位于法国中北部。兰布莱地处巴黎西南郊，距巴黎市中心有44.3千米。城市附近是森林。兰布莱的城堡也是法国总统的别邸。

(11) 1811年6月4日。

(12) 1811年6月16日。

(13) 菊苣的根部或其谷物经烘焙及磨碎后也可以作咖啡代用品。

(14) 德莱斯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沙龙主人。拿破仑时期著名的三位女沙龙主人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斯塔尔夫人、安托奈特夫人。

(15) 艾斯门纳德（1769—1811），法国诗人、戏剧家。代表作《图拉真的胜利》充满了对拿破仑一世的追捧。

(16) 法兰西学术院是法国的一所学术机构，是法兰西学会下属的五个学术院之一，是五个学术院中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的学术权威机构，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是极高的荣誉。法兰西学术院由宰相、枢机主教黎塞留成立，最初成立的目的为规范法语。学术院的条例法规由他签署，于1635年1月29日由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签署君主制诰予以批准，并于1637年7月在巴黎议会注册备案。

(17) 费尔南多七世（1784—1833），西班牙国王，曾两次在位，分别是1808年3月至1808年5月、1813年至1833年。1808年，西班牙发生起义，卡洛斯四世被迫于当年3月19日宣布让位于其子费尔南多七世。不久，拿破仑另立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1813年，拿破仑同意费尔南多七世担任西班牙国王，再次即位。不久，拿破仑帝国垮台，费尔南多七世恢复权力。从1823年到1833年，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对革命者进行了严厉镇压，成为西班牙历史上“黑暗的十年”。

(18) 文森堡曾是法国非常重要的皇家军事堡垒，后被用作监狱。

(19) 伊特鲁里亚王国是1807年在现意大利共和国托斯卡纳大区大部分地

区建立的一个王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军于1796年攻入帕尔马公国。1799年，拿破仑以归还被法军攻占的北部土地为条件，要求西班牙废除由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托斯卡纳大公国，让帕尔马公国并入法国，并且要求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君主保证在将来对欧洲的战争中作为他的同盟。根据《阿兰胡埃斯条约》，费尔南多三世放弃了统治托斯卡纳大公国而转任萨尔茨堡选帝侯。而在其原有的土地上，建立伊特鲁里亚王国，同时为了补偿帕尔马公爵费迪南多一世让出帕尔马公国，指定由费迪南多一世之子，即来自波旁家族分支的路德维科一世出任新立的伊特鲁里亚王国的统治者。伊特鲁里亚王国的第一任国王路德维科一世于1803年英年早逝，其未成年的儿子继承王位，称卡洛二世，卡洛二世的母亲玛丽亚·路易同时为摄政女王，即伊特鲁里亚王后。至1807年末，西班牙爆发内部动乱，拿破仑乘机入侵西班牙。翌年（1808年）拿破仑攻占西班牙之后，宣布将伊特鲁里亚王国拆分，并入法国，成为其三个省：阿诺省、地中海省、翁布罗内省。而原国王及其母亲被许诺可以继承位处今葡萄牙北部大区的北卢西塔尼亚王国之王位，但该许诺却因1808年拿破仑与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决裂而未曾兑现，最终不了了之。

(20) 拉瓦莱特（1769—1830），军官、高级公务员。通过其妻子的关系，拉瓦莱特获得了很多秘密信息。

(21) 瓦朗塞城堡位于法国卢瓦尔河流域。法国小说家乔治·桑称瓦朗塞城堡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

(22) 卢德主义者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在该运动中，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这是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许多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作卢德主义者。

(23) 查理十三世（1748—1818），1809—1818年任瑞典国王，1814—1818年任挪威国王。他是瑞典国王阿道夫·腓特烈的次子，瑞典-挪威联合王国的首任君主。

(24) 1810年8月21日，经过瑞典各联邦一致通过，推选贝纳多特为继承人。

(25) 波美拉尼亚是中欧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现在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处于波罗的海南岸，主要河流包括维斯瓦河、奥得河和雷克尼茨河。

(26) 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和斯德哥尔摩省首府，也是瑞典第一大城市。瑞典王国政府、国会以及瑞典王室的官方宫殿都设在斯德哥尔摩。它位于瑞典的东海岸，濒波罗的海，梅拉伦湖入海处，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旅游

胜地。市区分布在14座岛屿和一个半岛上，70余座桥梁将这些岛屿联为一体，因此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斯德哥尔摩市区为大斯德哥尔摩的一部分。

第22章　法俄关系紧张

精彩看点

任命约瑟夫为西班牙军事总指挥——马塞纳将军受挫——半岛战争结束——约瑟夫提交辞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觉醒——拿破仑重启对俄计划——马赫出任外交大臣——拿破仑对欧洲重要人物的看法发生改变——斯成诺夫伯爵前往巴黎——12月31日俄国的决定——重回费里耶尔城堡——玛鲁埃的相助——拿破仑巡游荷兰——对俄宣战的利害

从1810年初开始，西班牙战场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争功，各个将军之间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前来参加拿破仑的婚礼时，西班牙国王约瑟夫明确提出，要么法国撤走所有军队，要么所有的法国军队都必须听命于军事总指挥。提及撤军，拿破仑非常谨慎，因此他同意了约瑟夫的请求，任命约瑟夫为军事总指挥。离开巴黎时，约瑟夫带走了儒尔当元帅，任命他为战事大将军。

西班牙战场上的所有将军都必须听命于约瑟夫，并且需要同时向约瑟夫和拿破仑负责。但这些举措收效甚微，战场上依然会同时出现几支军队。需要同时向两边负责的将军们不得不私下协调出兵方案。对这些将军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保住他们从敌人那里攻占的土地。

在英国势力稳固的葡萄牙，我军曾两次被驱赶出境。这些事实似乎都向拿破仑证明，如果我们真的想征服半岛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拿下里斯本，迫使英国人离岸。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拿破仑是在与整个欧洲为敌，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他自己又怎么会没有意识到，如果半岛战争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敌方势必会涌现出一批能人志士，这样一来，西班牙战争的局势以及他的利益势必受到影响。老欧洲并不缺少士兵，他们缺少的是能统率士兵的将领，缺少的是可以率领士兵抵抗法国侵略的将领。然而拿破仑却忽视了这一点。

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拿破仑没有亲自出兵葡萄牙，逼退威灵顿，而是派出了马塞纳将军。在所有的将领中，马塞纳最灵活、最勇敢、最执着，然而私下里，这位勇猛的“猎人”却对拿破仑怀恨在心。他也希望像苏尔特元帅(1)(2)一样，用剑戟打出一片江山。对他们来说，拿破仑、缪拉以及贝纳多特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榜样啊！马塞纳的内心也有着同样的渴望。于是，怀揣着梦想的马塞纳率领着六万大军前往葡萄牙。但当马塞纳在战场上刚刚受挫时，他便接到确切的消息称拿破仑已准备和英国人和谈，如果英国愿意放弃西班牙的话，

那么他将放弃葡萄牙。听闻此事后，马塞纳大为沮丧。可怕的是，同征战热情一同消失的还有他的军事才华。在这种危难关头，没有人可以取代拿破仑，但拿破仑一个人却可以决定三四万人的未来。可惜的是拿破仑没有看到这场战争对他和整个欧洲的重要性，这是他缺乏军事洞察力的表现。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法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威灵顿将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经过一个月的恳求后，战败的马塞纳才得到了一次向拿破仑解释的机会。虽然帝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半岛战争，但它却给整个战争局势带来了不安的因素。

单打独斗的苏切特元帅[3]在东部省份赢得了赫赫战功。出征巴伦西亚王国[4]时，他个人的力量已经绰绰有余。当他抵达巴伦西亚时，没能自立为王的苏尔特结束了自己在安达卢西亚[5]的霸权。与此同时，马尔蒙组织起了残余的葡萄牙军队，开始在杜罗河[6]和托尔梅斯河[7]单独行动。



马塞纳将军



苏切特元帅



威灵顿将军

总而言之，拿破仑的将领们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着政府工作。约瑟夫不过是一个傀儡国王。如果没有军队护卫，约瑟夫甚至没有办法离开马德里。有那么几次，他都险些被游击队俘虏。虽然约瑟夫是名义上的西班牙国王，但这个王国根本不属于他。被法国军队占领的省份，要么是被我们自己的军队摧残得面目全非，要么就是被西班牙游击队破坏得支离破碎。在我看来，这都和1810年那场草率结束的战争有关。

1811年末的时候，约瑟夫派阿尔梅纳拉出使法国，向拿破仑提交

了正式的辞呈。但当时的拿破仑一心想着出兵俄国，并没有及时做出回应。

实际上拿破仑远征俄国是一场纯粹的政治战争。在普通人眼里，这场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资源，恐怕也只有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和政府领袖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委吧。

《提尔西特条约》的签订已经埋下了法俄战争的种子。条约规定威斯特伐利亚王国[8]为拿破仑帝国的附属国，德意志北部的大部分邦国都加入莱茵联盟。新建立的华沙公国不过是帝国手中的一把蒲扇——它随时都可以对俄国或者奥地利翻脸，丹麦共和国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却永久隶属于拿破仑，成为拿破仑进攻波罗的海时的实际口岸和补给站。最后，法国军队享有横穿普鲁士的专门通道，而这通道一直延伸到了俄国边境。

当时迫于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俄国不得不接受《提尔西特条约》中的条款[9]。可是对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而言，签订的这样的条款，与其说是在承认和拿破仑势均力敌平分欧洲大陆，不如说是承认拿破仑是一位胜利的征服者，一位迟早会利用这些优势挑衅俄国的征服者。

不过拿破仑贪婪的目光最先望向的是欧洲南部，是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而对俄国来说，这正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可是对拿破仑来说，一边安抚着俄国，一边计划着攻下俄国并非难事。当时我很清楚他对于俄国的看法，我也必须承认，当时的自己也被拿破仑宏伟的计划所吸引。那个时候我希望能建立自由的波兰，拿破仑也故意诱导着柯斯丘什科[10]的想法。我理解他这样做的目的，他希望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但西班牙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却让我不得不对这种行为提高警惕。



柯斯丘什科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想要维持和平，因此他不得不尽力取悦拿破仑，尽力取悦拿破仑的内阁、部长、大使，并且时刻维护拿破仑的权威，服从他的意志。

对拿破仑来说，出征西班牙是他建立全面独裁的最后一步。奥地利战败后，拿破仑便迎娶了奥地利公主，之后法国又在北方有了新的动作。这些事情过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开始怀疑法兰西帝国是否会信守承诺，拿破仑是否会与他相安无事地平分欧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认为大陆和平终将被打破，大陆体系下的各个国家都不得不面

对日渐衰退的贸易、沉重的赋税、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及无力保护自己子民的大公。

《提尔西特条约》签订三年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认清了所谓的法俄联盟。他觉得是时候团结其下的各个联邦来捍卫自身的独立主权。得知反法派——或者说老俄国人已经在圣彼得堡内阁中占据上风后，拿破仑决定重新启动他在1805年到1806年制订的针对俄国的计划。

这个计划指的是分裂，进一步消灭俄国或者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接受侮辱性的和平条款，也就是说，在重建波兰和解体新月帝国的前提下，法国、俄国和奥地利三国之间达成和平。如此一来，整个欧洲大陆将被纳入大陆体系，而拿破仑将成为整个欧洲的主宰。

所以拿破仑首先需要恫吓俄国，或者与俄国决一死战，让它脱离欧洲、回归亚洲。于是法国把手伸向了波兰，与波兰暗中协商独立事宜。

理顺北方各种复杂的关系后，拿破仑换下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尼公爵。

在拿破仑看来，能担此重任的只有他的秘书马赫[11]，这也意味着从此之后，所有的对外事务都将服从他的意志。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马赫确实是拿破仑的不二人选。马赫这个人并不坏，并且他真心实意地崇拜自己的主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秘密和意向。他甚至还是拿破仑信任的作家，可以很好地把拿破仑各种不成文的指令写成语意通顺的政令。这个人还负责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整理归纳拿破仑对欧洲重要人物的看法、评价——他们享有的年金俸禄也都记录在册。与此同时，这个人还主持着特使的派遣工作。对于拿破仑所有的骄纵和粗鲁，马赫总是沉稳地妥协。在他看来，忠于拿破仑便是忠于自己的职责，忠于帝国的安危。他从来没有想过反抗拿破

仑，这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原因。

1811年，拿破仑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突然变了，这也意味着新的行动在秘密筹划中。对此有所警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认为他必须深入了解拿破仑的计划，同时他也希望能在拿破仑的政府中拥有更多的内线。当时的俄国大使库卡因[12]已经沉醉在圣克劳德的温柔陷阱中，成为大陆体系的热情拥护者。于是从1月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便派斯成诺夫伯爵前往巴黎。这位年轻的贵族是俄国皇家护卫队的上校。来到巴黎后，风度翩翩的他马上就成为宫廷的宠儿，深得帝国夫人们、小姐们的喜爱。不久之后，他便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所有的太太、小姐们都希望得到这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特使的垂爱。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特使还在犹豫不决。最后，当女大公R向他示好的时候，他接受了。公安部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到如此明目张胆的阴谋！



马赫

最开始的时候，拿破仑觉得此事有些蹊跷。他怀疑这个外表和善的人可能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月后当这个人再一次出现在巴黎时，拿破仑对他的怀疑便愈加强烈。一方面，萨瓦里对自己主人的怀疑困惑不解；另一方面，为了讨好主人，他还是派艾斯门纳德前往调查。斯成诺夫伯爵回到巴黎的当晚[13]，这位半正式的作家便在《帝国日报》中插入了这样一个故事：

> 一位名叫保尔的特使，受俄国王子波将金的委托，奉命前往巴黎为俄国效劳。到达巴黎后，保尔一会儿找舞伴，一会儿找阿尔巴尼亚[14]的特产，一会儿找阿斯特拉罕[15]的瓜果，一会儿又找克里米亚[16]的葡萄。



俄国大使库卡因

斯成诺夫伯爵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于是他和俄国大使一道提出坚决的抗议。那时拿破仑并不想贸然和俄国起冲突，因此对于这种暗讽，拿破仑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决定暂时流放艾斯门纳德。可是流放至那不勒斯的艾斯门纳德却受到了帝国的各种封赏。不幸的是两个月后[17]，这位骑着骏马恣意人生的作家头撞岩石，气绝身亡。

与此同时，拿破仑及法国各位部长都在喋喋不休地抱怨12月31日俄国的决定（俄国决定减少通商口岸），指责俄国在为英国提供便利。巴黎的各大日报频繁报道英国的货船被允许经停俄国口岸的事件。从这时起有远见的人都知道，法俄关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心里清楚这样的争执背后是两大帝国之间的政治较量。1811年秋天，旁观这场争辩的英国内阁有了足够的理由相信，拿破仑的确不会像他的兄弟约瑟夫说的那样增兵西班牙。

也是在那段时间，拿破仑一统欧洲大业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在将近七八个月的时间里，各个阶层都因这宏图大业而焦虑不已，我自然也不能幸免。初夏时，我觉得我必须重回巴黎。我希望一切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向陛下建言献策，改变或者调整他的宏图计划。我的内心隐隐地告诉我，这一次他可能会落败。

然而这谈何容易呢。首先，在拿破仑的眼中，我已经是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我知道，拿破仑已经多次下令密切监视我的行踪，但鉴于我已经远离朝堂，所以事实上他对我的监视并没有什么作用。一句话，我巧妙地躲过了所有的监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通过杜洛克向拿破仑提出我的请求。

我说自己非常不适应南部的气候，并且医生建议我离开南方；而且为了家人，我也希望可以在我的领地方桥暂住一段时间。同时我也表达我对于远离朝堂生活的喜爱。拿破仑马上通过了我的请求。但与此同时，杜洛克建议我回到费里耶尔城堡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给

针对我的公安部留下任何把柄。我于是默默地离开了南部。到达费里耶尔城堡后，我过起了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拒绝接待任何人。从表面上来看，除了每天疗养之外，我便是忙着教育子女，耕种自己的花园。在这里接见从巴黎来的信使，我必须高度警惕。每一次信使都是在夜深人静、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从一个小门（只有我有这个小门的钥匙）进来同我会面。我会在城堡中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角落里接待他，并确保没有任何人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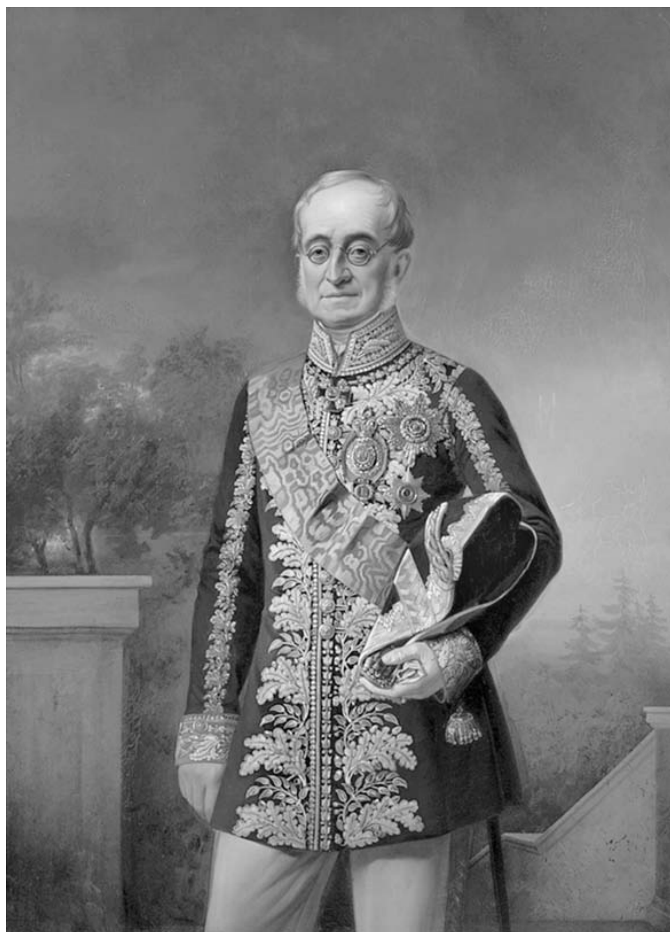
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所有官员里，只有玛鲁埃一人有勇气光明正大地来看望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个人身上的珍贵品质。只有他敢于挑战权威，向我这个旧时同窗、少年时代的朋友[18]伸出援手。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然而在政治上，我们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又是如此的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保皇派，而我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唉！

……回到法国后，玛鲁埃曾经对我做过一些非常中肯的评价。他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我，我的经历和思考让我知道，最重要的是化解仇恨和治愈革命的伤口。他同意我的观点，而我将永远铭记这份诚挚的友情。

互诉衷肠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啊！尽管我们的观点有些不同，但很快我们就站在了同一阵营里。因为我们都相信，欧洲将要面临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拿破仑出征俄国的野心已经势不可当，而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从玛鲁埃这里，我听说拿破仑建议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库卡因全权代表俄国和法国进行谈判。谈判主要围绕三个有分歧的方面进行：第一，从法国方面来看，沙皇12月31日的法令侵犯了《提尔西特条约》的相关规定；第二，法国认为，在处置奥登堡公爵时，俄国没有合法的立场去维护莱茵联盟中大公们的利益；第三，沙皇向摩尔多瓦[19]军队下达命令，逼近华沙公国的国界。觉醒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和拿破仑结盟的后果。于是他避开了这些提议，另派一名特使内斯尔罗德伯爵[20]代替罗门佐夫

伯爵进行谈判。

所谓的争端，不过是为了掩饰真正的矛盾：靠得太近的两大帝国，恐怕不得不一决高下了。玛鲁埃知道，我写给拿破仑的、关于这场战争危害的报告不会有任何作用，然而他并没有阻止我这样做。他对我说："这是您对国家的责任，也是您对自己的交代，更是您对之前所做工作的交代，所以您应当这样做。"但他也告诉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您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法俄关系还没有全面破裂，或者说没有任何正式、明显的迹象表明两国关系已经破灭，如果您贸然提交报告的话，那么您便会给别人落下口舌，使他们有理由指责您窥探国家机密。虽然此事已经火烧眉毛，但这个时机还需要您自己来把握。"玛鲁埃走后，我开始准备行动。



内斯尔罗德伯爵

为了巩固在荷兰的地位，9月初，拿破仑沿着荷兰的海岸线进行了一次巡游。回到巴黎后，他开始着手准备对俄战争。表面上他举行了几场私人听证会，但参会的人都是皇权下的顺民。这一次拿破仑的独裁达到了巅峰，他通过参议院代表控制了参议院，又通过参议院避开了立法集团，并且牢牢控制了各位部长大臣和内阁。他完全不理会大臣们的提议。比起这些人的建议，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密探或是自己的热情。朝堂之上一片谄媚，而从这时起，仰慕也变成了一种耻辱。

出征俄国的传言愈演愈烈，成为所有人私下讨论的话题。终于政府有了公开的动向。12月20日，参议院一位议员提议在1812年启用十二万招募军队计划。为了不泄漏更多的消息，该议员的演讲稿以及参议院的报告书没有向公众披露。

此前，我已经系统地整理了我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我认为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并列举了我们可能遇到的所有危险。我知道，是时候把这份报告交出去了。

这份报告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论证了现在不是出兵俄国的合适时机——西班牙战场的战火越燃越烈。如果我们贸然对俄国开战，那么法国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在第二部分中，我指出了这场战争的艰难之处，我们要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以及刚烈的民族性格，并且我们也琢磨不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性格；最后在第三部分，我分别论证了战胜和战败这两种情况下战争的后果，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俄国将重新回归亚洲，那么，我们所谓的建立全面君主制也不过是一个幻想，好战的莫斯科人肯定会不屈不挠地向君士坦丁堡(21)发起进攻，从君士坦丁堡打到恒河——在这一点上，前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后有恺撒大帝。

人们都认为我这样的陈述应该能够触动拿破仑。

我向拿破仑禀明：“陛下，您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君主制，难道您希望没有止境地去征战吗？历史已经证明，建立全面的君主制是不可能的。您要当心，千万不要被您的军事才华冲昏了头脑，违背了先人的教训，贸然挑战大自然的极限。是时候停下来了，陛下，您现在所拥有的东西要比您想要拥有的东西珍贵千百倍。现在对您，对不堪负重的法国来说，您所进行的每一次扩张都是切切实实的危险。您的领土每多一分，它的稳固性就减少一分。停下来吧，现在是时候停下来了。请您享受这份安宁，这份当今时代下最卓越的文明。

“您想要的帝国什么样的呢？俄国是一个远在北方，长年累月被冰雪覆盖的国家啊。在这个国家里，一年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可以用来行军作战，并且它严酷的自然环境，贫瘠的土地只能给我们带来痛苦。俄罗斯就像古代寓言中的安泰俄斯[22]，现在人们常用安泰俄斯的故事来比喻精神力量不能脱离物质基础，或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祖国和人民。想要征服他，只能让自己在他的手臂中窒息而亡。上帝啊！陛下，在没有考虑俄国严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以及那里广袤的森林和湖泊的情况下，您怎么能贸然出兵当代斯基提亚[23]呢？您的军队真的能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吗？没有人可以阻止您跨过尼曼河[24]冲进沙漠和立陶宛的森林，但您会发现，您前进的路上有比尼曼河更险恶的杜维纳河，而圣彼得堡还在一百里之外。到时候，您将不得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间做出选择。上帝啊，到时候您该怎么选！

“不管您是如何赢得了胜利，俄国人一定会步步紧逼，逼您交出占领的土地。到时候，您会发现，军队将得不到任何补给；到时候，您将不得不后撤两百里。当您准备好重新作战时，您会发现，您不得不将一半的兵力用在脆弱不堪的信息沟通和确认上。难道您不担心，您的盖世才华终究抵不过困乏不堪的将士吗？难道您不担心，到时候您不得不退回易北河和莱茵河吗？陛下，我以法国的名义，以您的安危、您的荣耀请求您，放下屠刀吧！请您想想卡尔十二世[25]，诚然，这个国王没有您的实力，不像您坐拥三分之二个欧洲大陆，当时的他只有六十万大军，但当时的彼得一世[26]却只有四十万军队和五万哥萨克人[27]。您说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温和的人，但请您不要大意，在如此重大的利益面前，他骨子里的坚韧，这股与生俱来的，这自然赠予的坚韧一定会显露出来的。况且，现在反对您的是他的整个国家，是他朝中的众多大臣，是他激愤的人民，是他顽强的将士。还有英国内阁也一直对您虎视眈眈，在英国的金钱攻势下，瑞典已经抛弃了您。难道您不担心这个小岛会动摇您的盟国，釜底抽薪吗？难道您不担心您的子民会对您这样的冲动心生怨恨吗？您的实力和荣耀让那些敌对的势力低下了头，但是一次不经意的失败很有可能

毁掉帝国的基业。”



战斗中的卡尔十二世



彼得一世



---

(1)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1769—1852），英国军事家、政治家，19世纪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在半岛战争中，威灵顿获晋升为将军。1814年，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后，威灵顿出任驻法大使，获册封为公爵。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他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从政后，他加入托利党，曾两次出任首相，成为托利党时代最后一位首相。纵使他阻止不了1832年改革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在他退出政坛前，他在皮尔内阁中任职，而他仍是上议院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终生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2) 尼古拉·让·德迪乌·苏尔特（1769—1851），封达尔马提亚公爵，法国军事首领和政治人物，绰号“铁手”，以作战英勇和政治投机而闻名。在法国历史上他是第一帝国18位元帅和6位大元帅之一。他还担任过三任法国首相。

(3) 路易·加布里埃尔·苏切特，第一代阿尔布费拉公爵（1770—1826），法国元帅，拿破仑皇帝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之一。

(4) 巴伦西亚王国是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东海岸的一个王国，也是阿拉贡联合王国之一。巴伦西亚王国成立时曾是伊斯兰教的泰法，但在1237年被基督教的阿拉贡联合王国占领。西班牙王国成立之后，巴伦西亚王国成为西班牙王国的一部分，曾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但在18世纪，由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失败，巴伦西亚王国的自治权被剥夺。现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自治区基本和巴伦西亚王国的范围重叠。

(5) 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南方，北有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卡斯蒂利亚-拉曼查，东有穆尔西亚，南有地中海、直布罗陀，西有葡萄牙。

(6) 杜罗河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条主要河流。发源于西班牙索里亚省，自东向西，最终在葡萄牙波尔图南约3千米处注入大西洋。

(7) 托尔梅斯河是西班牙的河流，流经阿维拉省和萨拉曼卡省，发源自格雷多山脉，最终注入斗罗河。

(8) 虽然官方上威斯特伐利亚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实际上是法国的附庸国，由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统治。虽然王国有“威斯特伐利亚”一名，但王国只拥有这地区的一小部分。

(9) 许多普鲁士和俄国的观察家都认为，该条约不但不平等，同时也是污辱。俄军拒绝遵从拿破仑的指令，尤其是在里斯本事件中，他们更向全欧洲

表达此意见。俄国皇室阻挡了拿破仑欲与沙皇的姊妹结婚的计划。由于沙皇开始允许中立国在俄国港口停靠，两国的合作在1810年急转直下。1812年，拿破仑横越尼门河，开启俄法战争，终结了同盟的最后希望。

(10) 安德热·塔德乌什·博纳文图拉·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军队领导人，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的民族英雄，担任国家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领导了反抗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柯斯丘什科起义。

(11) 马赫（1763—1839），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心腹，曾担任拿破仑·波拿巴的国务秘书。

(12) 库卡因（1752—1818），俄国政治家、参议员、俄国驻法国大使。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库卡基尼的原型。

(13) 1811年4月11日。——原注

(14) 阿尔巴尼亚西隔亚得里亚海和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南面则与希腊接壤，东临马其顿，东北是科索沃，北接黑山。

(15) 阿斯特拉罕位于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汇入里海处。这里曾是可萨汗国的首都，名阿提尔，和金帐汗国首都萨莱很接近。这里也曾是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首都。许多来自中亚的商人在此交易，甚至置馆居住，其中有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

(16) 克里米亚半岛，简称克里米亚，是黑海北岸的一个几乎完全被海包围的半岛。东部为刻赤半岛，与大陆隔刻赤海峡相望。

(17) 1811年6月25日。——原注

(18) 富歇和玛鲁埃曾经在圣托奥理会一起学习过。——原注

(19) 摩尔多瓦是一个东欧的内陆国家，首都是基希讷乌。摩尔多瓦西邻罗马尼亚，北面、东面、南面毗邻乌克兰。

(20) 卡尔·内斯尔罗德（1780—1862）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裔俄罗斯帝国外交官。内斯尔罗德于1816年至1856年40年间担任俄国外交大臣，主导了俄国外交，在神圣同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1) 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旧名，现在则指伊斯坦布尔金角湾与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地区。它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22) 安泰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在柏柏尔人的神话中有一个相似的形象，两者有可能是同源的。根据神话，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

塞冬的儿子，居住于利比亚。他的妻子叫廷吉斯。安泰俄斯力大无穷，而且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他强迫所有经过他的土地的人与他摔跤，并把他们杀死；这么做的目的是收集死者的头骨好为他的父亲波塞冬建立一座神庙。大力神赫剌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与安泰俄斯战斗。安泰俄斯每次被击倒后只要接触到大地——他的母亲，他的伤口就立刻愈合，力量也会恢复，起来重新战斗。赫剌克勒斯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把他扼死了。

(23) 斯基提亚是古希腊人对其北方草原游牧地带的称呼。这个区域为欧洲东北部至黑海北岸，经中亚草原一直延伸到他们不知道的领土之外，这整块区域都被古希腊人称呼为斯基提亚，包括了东欧大草原、中亚与东欧等地。

(24) 尼曼河发源于白俄罗斯的山区（在明斯克的西南部），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河长937千米，最后于克莱佩达注入波罗的海。在俄语中，“德国人”，即“尼曼河人”，因为在中世纪，德国人曾经占领过这个地区。

(25) 卡尔十二世（1682—1718）是瑞典在大北方战争时期的国王，终身未婚。他在位期间，因为过度从事军事远征，导致先胜后败，输给俄国的彼得大帝，瑞典由北欧霸主衰退为二流国家。有的学者称其为“18世纪初的小拿破仑”，表示他和拿破仑高度相似，都具有军事天才的能力与征俄失败的命运。

(26) 彼得一世（1672—1725）为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及俄国皇帝。在位期间力行改革，使俄国现代化，定都圣彼得堡，人称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发动北方战争，战胜瑞典，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

(27) 哥萨克人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游牧民系，在历史上以骁勇善战和精湛的骑术著称，为支撑俄罗斯帝国于17世纪往东扩张的主要力量。

第23章　出征俄国

精彩看点

面见拿破仑——B贵族事件——法国备战——征兵令——法国同英国的谈判——斯成诺夫伯爵出逃——法俄关系紧张——库卡因出访法国——拿破仑出征俄国——拿破仑军队势如破竹——拿破仑军队跨过斯摩棱斯克大道——火烧莫斯科——拿破仑撤军

写好这篇报告之后，我让人向拿破仑转达了我希望面见他的请求。最后他同意在杜伊勒里宫接见我。见到我后，拿破仑很随意地说道：“您来啦，公爵大人！我知道您为什么来这里。”

“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知道您要向我提交一份报告。”

“这不可能。”

“不管怎么说，我确实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给我吧，我会看的。但我知道，出征俄国和出征西班牙一样，它们都不是您乐意看见的事情。”

“陛下，我觉得我们无法同时应对比利牛斯山外和尼曼河外的风险。我希望看到您的江山永固，这也是我为什么有勇气来面见您，当面告诉您出征俄国的巨大风险。”

“没有风险，这只是一场政治战争。您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或是整个欧洲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件事情。从我大婚以来，有些人便以为我睡着了，这次他们会看到我是不是睡着了。只要圣彼得堡里没有了亲英势力，那么西班牙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需要八万将士，现在我已经有这么多人马了。整个欧洲将会和我站在一起。现在的欧洲已经是一片腐朽的土地，我和我的八万将士将会把这片土地改造成令我满意的欧洲。您以前不是说过，我教会了您无所不能吗？没错，六到八个月之后，您就会看到这支威武之师的厉害。我的决定是军队和人民的决定，而不是您的决定。我知道您担心我们会失败。不用担心，出征俄国的是正义之师，远征俄国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这样做是为了所有人的太平。况且就算是我拥有了全世界，我又能做出什么事情呢？您以及其他指责我的人，不是想让我做一个宽厚的国王吗？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想要完成我未竟的事业。欧洲需要有统一的法

律、统一的朝纲、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单位，我需要把欧洲各族人民融为一体，我要让巴黎成为世界之都。对，公爵先生，这就是我的宿命。如今您已经帮不上我了，因为在您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可行性；一年前，在马朗格之战和奥斯特利茨之战的时候，您还和我有着一样的热情。我告诉您，您会看到比这些战役更好的结果。再见了，公爵先生，不要失去风度，不要抱怨，请多给我一些信任。”

我深深地向拿破仑鞠了一躬，目瞪口呆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我在想拿破仑是如何知道我此行的意图的。毫无头绪的我赶到了玛鲁埃的家里，猜想着是不是他无意中走漏了风声。但听完这个人，这个世界上最正直的人的保证后，我觉得此事越发蹊跷。陛下是如何知道我要呈递一份报告的呢？难道我的身边有内奸？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

我想起，有一天，在侍卫还没来得及通报的情况下，有一个人突然冲进我家，说有事要面见我。把所有的线索连在一起后，我才醒悟到这个人是个间谍。展开调查后，我得知这个叫B的人是一个归国的海外流亡贵族。现在他是一个镇长。这个人在我的城堡附近买了一块地，但还没来得及付款。我找人拿到了他的笔迹，原来这个人是我之前安插在伦敦的一个间谍，那时，他负责秘密监视波旁家族的动向，我还有他的联系代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这是一个忘恩负义且狡诈的人。这个可笑的人啊。我之前的一个雇员查明了此事，以下便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拿破仑曾指示萨瓦里：“密切监视前公安部长富歇的动向，并随时向我汇报。”



1812年的拿破仑

于是萨瓦里对拿破仑说："我正在找一个灵活的代理来协助我完成此事，您也知道，想要调查富歇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前公安部长从来不会接待陌生人，包括当地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城堡。"

经过一番调查，萨瓦里把目光锁定在了B先生身上……他召见了这个身材魁梧，举止优雅，善于辞令，性格细腻、灵活、迂回的人。

他对B先生说："先生，您是你们镇的镇长。您知道奥特朗特公爵

吧，或者说至少在此之前，您和他有过联系吧。所以您一定大致了解这个人的品性。我现在需要知道他在费里耶尔城堡的动向，我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

B先生说：“阁下大人，您给我的任务实在难以完成。您了解这个人，他生性多疑，几乎不相信任何人。况且我根本没有办法接近他，我拿什么理由接近他呢？说实话，我真的做不到。”

萨瓦里说：“无论如何，您都必须做到这件事。陛下非常重视此事，您需要通过这件事来向陛下表达您的忠心。我等您的消息，去吧，不许空手而归，我给您十五天的时间。”

B先生陷入了困境。他只得走来走去，四处打听消息。终于，他间接打听到，我家的一位佃农正在被催租。于是他前去看望了这位佃农，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并从佃农手里拿到了当时的租约。拿到这些文件后，他搭乘一辆两轮轻便马车来到了我的城堡前，告诉门卫说他是隔壁镇的镇长。他希望替一位受到不公待遇的佃农主持公道，所以特来拜访。在被门卫拦下之后，他好言说服了门卫让他在台阶下等候。然而我的贴身侍卫并不允许他靠近我的房间。这个人再三请求，希望我的侍卫能向我通报一声他的到来。当我的侍卫推开我房门的那一瞬间，这个人也跟了进来。当时，我正在书房，手里拿着笔。

这样一个陌生人的造访让我非常吃惊。我问道：“您希望我为您做些什么呢？”

B先生说：“阁下大人，我希望您能为一个可怜的父亲主持公道。如果没有您，这个可怜的人将会家破人亡。“

为了讨好自己的雇主，这个人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经过一丝犹豫之后，我起身去一个纸箱里找我和这位佃农的契约。然而当我转身在箱子里寻找契约的空档，这个人看

似依然在不停地和我聊天，但实际上，他的目光却在窥探我桌上的草稿。从“V.M.I.R”这些大写字母里，他猜测我正在写一篇准备呈给陛下的报告。两三分钟后，我回到了书房，而这个巧言令色的人也功德圆满，可以回去交差了。

谢过他的好意后，我送走了他。从我家出来后，B先生赶紧向萨瓦里报告了他在我家看到的一切。我承认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后，我非常生气。我无法原谅自己居然被这样一个小丑玩弄于掌心。此前，这个小丑每年都会从我手里接过两万法郎，向我通报伦敦的情况。以后[1]你们会看到，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小人的。

这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耻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让我赢得了拿破仑的一些信任，确保了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继续暗中工作。很明显这次面见拿破仑后，他不再那么怀疑我，这也就意味着，在他远征俄国期间，我不会受到任何莫名其妙的审问或盘查。

我知道现在的内阁中，只有唯命是从的贝尔西耶、冈巴塞雷斯和杜洛克还有些分量。人们不禁怀疑，拿破仑排挤塔列朗和我，到底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全他自己的利益。不过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他们都认为现在发动政变是一件不明智且没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在政治上，发动政变会使民心过度动荡，也会牵扯到很多领导人的地位问题；再者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力量动摇拿破仑的统治。现在政府上下都在为出征俄国做准备。对于政府来说，最切实的危机就是粮食的匮乏。法国的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一些地方甚至因此发生了动乱。可是政府竟然动用武力，强行镇压了这些绝望而不幸的人。当得知一位在卡昂遇害的妇女的悲惨遭遇后，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害怕。

德意志北部已经成为备战的前线。为了向陛下提交两项重要报告，参议院召开了特别会议。这两项报告分别来自外交部和战事部。外交部和战事部之所以双管齐下，是因为拿破仑想进一步征兵，号召没有入伍的男性公民加入公民护卫队。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整个法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战场，我们的军队将从这个战场扑向欧洲的各个角落。为了美化这条征兵令——这条剥夺原本自由男性的自由的征兵令，政府需要一些新的借口。马赫向参议院提出，应当迫使英国承认荷兰《乌得勒支和约》[2]中关于法国海上权益的规定（法国曾在《亚眠和约》中主动放弃过这些权益）。

与此同时，我们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从此出征俄国没有了任何悬念。除了自己的军队外，拿破仑还集结了整个德意志的兵力，以及一些不得不依附于他的小国的兵力。

对俄战争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这时拿破仑派自己的一位亲信大臣前往英国，开展了一次迟到并且蹩脚的谈判。法国内阁中的知情人士，以及俄国政府中的法派官员，都以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定会惧怕法国和英国的联盟，再一次向拿破仑屈服，回归大陆体系。然而我的情报人员告诉我，当晚这些俄国人就被赶出了圣彼得堡内阁。



卡昂位于法国中北部，图为19世纪的卡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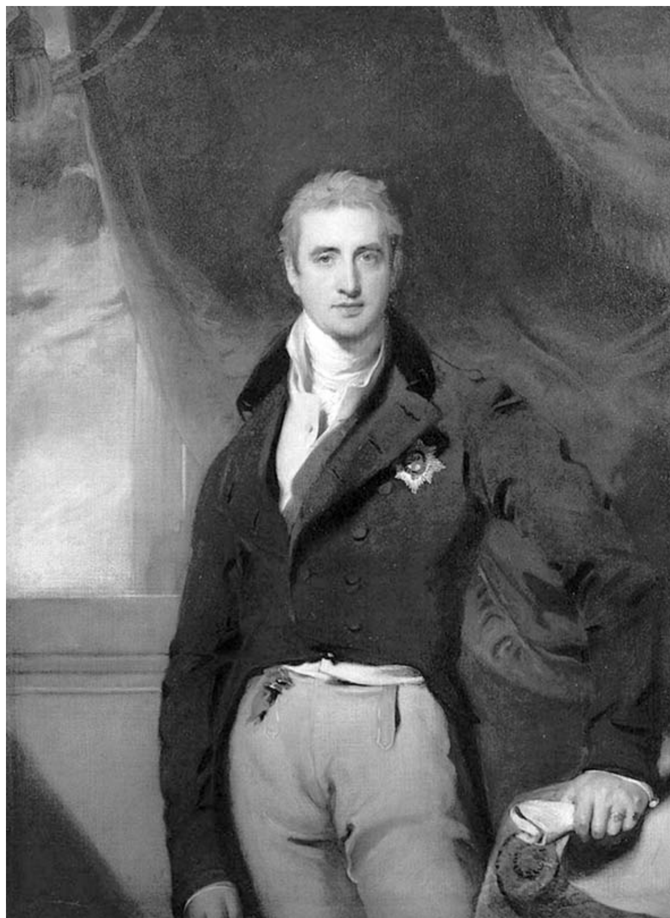
马赫致信卡斯尔雷子爵[3]，向他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放弃所有比利牛斯山边缘的城市；承认现在西班牙政府的独立性，并且维护该政府的权威；确保布拉甘萨家族的独立性和葡萄牙的主权完整，同时要保护缪拉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统治以及费尔南多四世[4]在西西里王国

的统治。至于剩下的争端，法国内阁的原则是，战后战胜方将享有土地的占领权。在对西班牙的问题上，卡斯尔雷子爵给予了肯定答复，但在费尔南多四世的问题上，他表示自己无能为力。鉴于已经接到了公开命令，他无法在费尔南多四世的问题上做任何妥协。这时我们的内阁才意识到，把俄国逼向这样一种境地，无疑是给我们的外交政策刻上了背信弃义的印章。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政府高层间的来往。虽然法国和俄国都在加紧备战，但表面上，两国在民间还保持着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大使还留在法国，拿破仑的大使也还在圣彼得堡。不过除了大使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向巴黎增派了另一位亲信外交官斯成诺夫伯爵。

这个讨人喜欢的俄国人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秘密使命。在蹩脚爱情的掩护下，借着女人们的帮助，他渐渐地摸清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真正计划。对此虽然最高警署已经有所警觉，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最后萨瓦里派人秘密接近斯成诺夫伯爵，向他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然而在女人们的帮助下，斯成诺夫得到了及时的提醒。躲过陷阱后，他向马赫抱怨，抱怨有人对他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

在得知斯成诺夫伯爵的真正目的后，拿破仑决定对他提出控诉。然而斯成诺夫伯爵明确地澄清了自己所有行为的动机，又一次成功通过了考验。之后公安部接到正式命令，取消了对斯成诺夫伯爵的监视。得到自由之后，这个人便可以更加无所畏惧地推进自己的工作。



卡斯尔雷子爵



费尔南多四世（左三）与家人

他对法国军队的动向非常感兴趣。于是他有意识地接近军队的行动负责人米歇尔。在一次工作失误中，米歇尔无意间泄漏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此事引起了最高警署的注意。因此他们决定逮捕斯成诺夫伯爵。得到紧急通知后，斯成诺夫伯爵立刻带着这些机密信息紧急逃离了巴黎。当拿破仑下达抓捕斯成诺夫伯爵的命令时，他已经离开巴黎六个小时了；当抓捕他的电报到达斯特拉斯堡[5]时，这个人已经跨过了凯尔[6]，离开了莱茵河地区。

百密终有一疏。因为离开得太过匆忙，斯成诺夫伯爵没来得及销毁他藏在卧室地毯下的秘密信件。于是，这些信件成为解密斯成诺夫伯爵动向的重要线索。人们最先发现了这位外交官和拿破仑宫廷里几位太太亲密关系的证据，其中便有女公爵R。但女公爵成功为自己开脱了，她说自己是在和丈夫联手调查斯成诺夫伯爵的阴谋。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一封米歇尔写给斯成诺夫伯爵的信件，最终米歇尔因此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次搜查翻出了一个奇怪的事件。早在埃尔福特会见[7]之时，俄国政府便已经预料到他们会和法国产生嫌隙，而那个时候在谈及拿破仑的时候，罗门佐夫伯爵用了这样一句话：“要用尽他。”



19世纪的斯特拉斯堡

斯成诺夫伯爵的逃亡成为沙龙间的热议话题，而这也加快了法俄关系的破裂。拿破仑心意已决，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去巴黎四处巡游，检查基础工程。实际上，他是在和巴黎市长、巴黎公安局局长帕斯基耶尔一起作秀。他也经常去郊外狩猎，给人一种正在忙于游乐的形象。在圣克劳德的朝堂上，我见过他一次（请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想要单独会见拿破仑的意思）。那时朝堂上下弥漫着阴郁的气息，忧心忡忡的大臣们和信心满满的国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采奕奕的拿破仑，他是如此的精神饱满，如此的斗志昂扬。然而像是已经知道了可怕的结果似的，我却不自觉的悲从中来。(8)

另一方面，或许是真的希望尽一切可能促进双方的和解，或许只是想打听清楚拿破仑真正的政治意图，圣彼得堡内阁命令库卡因带着沙皇的指示前来巴黎谈判。俄国的底线是，法国要放弃普鲁士，减少在格但斯克(9)的驻军，并且从瑞士的波美拉尼亚地区撤军。只要同意这些条件，沙皇将继续坚持对英国货物征收重税、实行贸易封锁的政策，并同法国在俄国协商新的大陆体系。

库卡因的提议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十五天后，也就是5月9日，在

拿破仑动身前往德国的当天，马赫问库卡因：“您是否有决定权？库卡因回答说：“作为大使，我拥有所有的决定权。”面对如此迟缓的回应，库卡因要求法国归还自己的通行证。然而他的要求被政府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直到6月20日，库卡因才拿回自己的通行证。事实上这不过是拿破仑的缓兵之计，他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在俄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先发制人。在这段时间里，拿破仑已经率领大军穿过了尼曼河，这一次，他想要给他的对手来个出其不意。

战争一触即发。六十万精锐部队已经穿过了尼曼河。现在，就是拿破仑，这个杰出的疯子奔向失败的时候了。

当他穿过德国，停在德累斯顿[10]的时候，二十个国家向他投以担忧的目光。首先是沙龙里政要们的想法。这里的人和巴黎的人一样，对这种因为快乐而征战的想法，很多人都暗中希望拿破仑败走远方。中间阶层和普通老百姓的心里也有诸多不满，不过这种不满绝对不是敌意。

有些人想过如果元帅和士兵联合起来抵制出兵俄国，最后不过也是落得在拿破仑面前表忠心。我可以确定当时所有不满的将军都没有想过战争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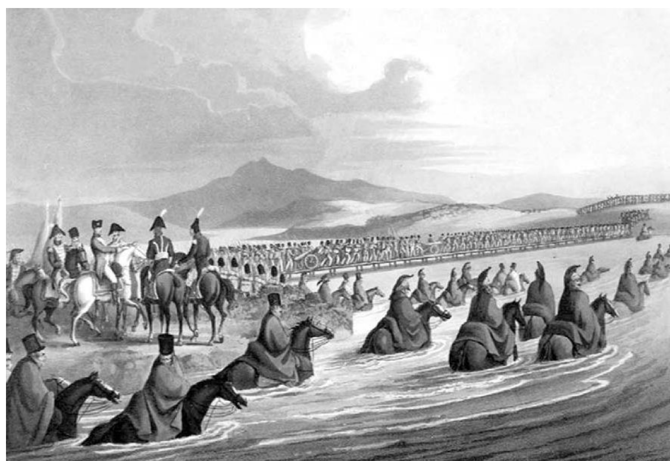
不过在这所有的不满想法中，有一种情感是共通的：对这个举世瞩目的人热烈的期待和担忧的好奇——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一如既往地披荆斩棘、战无不胜。

政客们看到了波兰的毁灭、革命的硝烟，以及被两面夹击的德意志——法国和俄国分别从西方和东方对德意志形成包抄。这个谁也无法阻挡的人想要把俄国挤出欧洲，这个人将率领欧洲一半的兵力冲向广袤的俄国大地，这个人将在十九个纬度和三十个经度间游戏自己和整个法国的命运。

拿破仑穿过了尼曼河，挑起了对俄战争。他大喊道：“这是俄国

人的命运，这是命运到来的时刻！”

与拿破仑相比，他的对手显得更加沉稳。虽然俄国军队不敢在维尔纽斯[11]正面迎战，但他们告诉他们的人民，这是在为祖国和自由而战。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拿破仑率领法国大军渡过尼曼河





19世纪的德累斯顿（上、下）

战争一开始，俄军的被迫撤退和成片的溃败实际上是战场上常用的诱敌深入策略。拿破仑就这样一马平川地打入了俄国的腹地。

一场激战过后，拿破仑不顾大多数元帅的反对，不顾当时在巴黎同内阁签署的协议，执意要跨过波兰边境唯一一条俄国大道——斯摩棱斯克大道。人们开始恐慌了，这个人完全没有考虑将要面对的意外，没有考虑敌军将士的性格，也没有考虑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更没有考虑时机以及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严寒气候。他就这样率军冲向了莫斯科。[12]

在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为了满足拿破仑的个人野心，十万大军牺牲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血战中[13]。拿破仑根本不顾长期露营下疲惫不堪的将士们的心情，他认为摧毁俄国就像他当初摧毁热那亚、威尼斯和卢卡共和国一样容易，因此执意要求推进自己的进攻计划。

撤退的俄军士兵拿起火炬，烧毁了斯摩棱斯克，烧毁了多瑞格尼，烧毁了维亚济马[14]、杰哈、莫扎伊斯克[15]。出乎拿破仑意料的是，他们甚至烧毁了莫斯科。这座美丽首都上空的熊熊烈火，照亮了

法国的恐怖前程。唉！我看着自己的预感就这样成为现实，也看到了这样的结局：胜者失去了权柄，败者却拿到了和平谈判的资本。



出征俄国的法军



拿破仑来到焚毁的斯摩棱斯克



抵抗拿破仑入侵的俄国士兵



拿破仑兵临莫斯科城下

在这样的民族牺牲面前，拿破仑又做了什么？在废墟上，他用了整整四十天来凝望自己的战利品。根本没有考虑过就此和俄国讲和，也没有怀疑过就在他身后一百里的地方，鲍里索夫正率领着两支俄国军队整装待发：一支驻扎在利沃尼亚[16]，一支驻扎在摩尔多瓦。他甚至不知道，在开战前没有任何盟军的俄国，已经和瑞典、英国、加的斯[17]政府签下了三方协议。

在此期间，在卡思卡特伯爵[18]出席的情况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图尔库[19]接见了贝纳多特。会晤之后，他们认为可以号召莫罗出手反击这个欧洲暴君。当人们把莫斯科的尸体带到莫罗的面前时，莫罗还没有反应过来该如何应对这样一场战争。他希望俄国政府能够给他一个恳切的说明，为此他等了二十二天。这时的拿破仑就这样固守着莫斯科，完全不知道西班牙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10月23日，当致命的冲锋号响起时，拿破仑撤军了。

---

(1) 1815年。

(2) 《乌得勒支和约》是1713年欧洲多国在荷兰乌得勒支签署的和约，旨在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根据和约规定，各国承认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条件是法国王位与西班牙王位永远不能由同一个人继承。在北美，根据第10到13款，法国放弃对英国哈得孙湾公司在鲁珀特、纽芬兰和阿卡迪亚地区领地的要求。

(3) 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1769—1822），英国爱尔兰政治家，通称卡斯尔雷子爵，曾任外务大臣，于1814年至1815年代表英方出席维也纳会议，后因工作过劳而精神失控，自杀身亡。

(4) 费尔南多四世，全名费尔南多·安东尼奥·帕斯夸莱·乔瓦尼·奈坡姆切诺·塞拉菲诺·真纳罗·本内迪托·迪·波旁，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1816年起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5) 斯特拉斯堡是下莱茵省的首府，位于法国国土的东端，与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隔莱茵河相望。斯特拉斯堡属于法国，但是在历史上，此地的主权曾多次由德国和法国交替拥有，因而在语言和文化上兼有法国和德国的特点，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地。

(6) 凯尔，全名为莱茵河畔的凯尔，是德国西南的一个小镇，位于巴登-符腾堡的奥特瑙县，和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隔莱茵河相望。

(7) 《提尔西特条约》签订后，拿破仑·波拿巴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10月14日在埃尔福特会见。该会见旨在加强法俄联盟。在塔列朗的协助下，亚历山大大帝没有对法国的要求做出任何妥协。对于拿破仑而言，这次会见可以看作一次失败。

(8) 帕斯基耶尔伯爵（1767—1862），第一帝国时期曾担任巴黎警察局局长、司法部部长、外交部部长。

(9) 格但斯克是波兰波美拉尼亚省的省会，也是该国北部沿海地区的最大城市和最重要的海港。

(10) 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自由州的首府，德国东部重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它位于德国的东南方，易北河谷地。

(11) 维尔纽斯位于立陶宛的东南部，距离白俄罗斯边界仅有40千米。维尔纽斯位于立陶宛的一角，造成这种情况应归因于几个世纪以来立陶宛这个国家边界形状的改变；过去，维尔纽斯曾经处于立陶宛大公国的地理中心。维尔纽斯位于维尔尼亚河和内里斯河的汇合处。

(12) 斯摩棱斯克位于俄罗斯西部第聂伯河畔，距离莫斯科360千米，是

斯摩棱斯克州的首府。

(13) 莫斯科或博罗季诺战役开始于9月7日，两军在距离莫斯科25千米的郊外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原注

(14) 维亚济马是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东部的一个城市。1239年首见于文献。1494年被纳入莫斯科大公国。拿破仑和希特勒侵俄时期这里都爆发过激战。有铁路联系莫斯科、圣彼得堡、卡卢加和布良斯克。

(15) 莫扎伊斯克是俄罗斯莫斯科州的一个城镇，位于莫斯科以西约110千米处。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莫扎伊斯克是守卫莫斯科的重地。著名的博罗季诺战役就发生在距该城12千米处。

(16) 利沃尼亚是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历史上曾先后由圣剑骑士团（通称利沃尼亚骑士团）、丹麦、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联邦、瑞典、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统治。

(17) 今属西班牙。

(18) 卡思卡特伯爵（1755—1843），第一任卡斯卡特伯爵。英国军官，外交家。

(19) 图尔库位于芬兰西南部，是该国第六大城市，也是最古老的城市（在1154年已有记载）。图尔库是芬兰第一个首都（1812年以前），也是第一个教区（成立于1300年，后来成为大主教区）。

第24章　马莱特事件

精彩看点

马莱特事件——马莱特其人——马莱特政变的过程——马莱特政变的失败——马莱特政变背后的人——马莱特政变的目的——马莱特政变的结果——拿破仑迅速撤离俄国——拿破仑回到巴黎——表忠心的行动

就在同一天，巴黎爆发了马莱特[(1)]事件，让拿破仑以及公安部蒙羞的马莱特事件险些葬送了整个帝国。

然而马莱特谋逆事件并非偶然，马莱特此人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大胆的人。

1802年，马莱特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那时他已经参与了所谓的参议院谋反事件。在这次谋反事件中，贝纳多特是事件的灵魂人物，斯塔尔夫人的家是活动的据点，而马莱特则是主要活动人员。后来警察局粉碎了这起阴谋，甚至我自己都因警署局长杜波瓦指认而受到牵连。在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罪责都被推到了马莱特身上。马莱特因此被送进了大牢。后来法国大赦，出狱后的马莱特于1805年加入了意大利军队。这一次，他又开始策划新的针对拿破仑的阴谋。这个人一会儿想要拖布鲁诺下水，一会儿又想要拖马塞纳下水，最后他被关进了文森堡。

也就是在这座大牢里，他开始策划一起双重阴谋：他将联合政府中所有反对拿破仑的势力。不过这起阴谋的策划者并非马莱特一人[(2)]，保皇派是这次阴谋的策划主体，共和党人则是执行主体。事实上这起阴谋要想获得成功，水火不容的两派人必须达成一致。而对于拿破仑压迫的共同仇恨则有可能让他们握手言和。等到万事俱备，所有的努力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开始四下张望：这个人必须是个可靠的、坚决的、勇敢的人，至于剩下的一切就只能看天意了。

他们首先想的是拿破仑不在朝堂时几个大权在握的人。第一个人便是国务大臣冈巴塞雷斯，然而这个人是个十足的懦夫，真正的告密者。在部长大臣中间，公安部长是唯一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但这个人不过是一介武夫，对政治和国家事务一窍不通。退而求其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巴黎公安局局长帕斯基耶尔，这个人长于市政管理，把市场治理得井井有条，在他的管理下，博彩业、红灯区也有条不紊地

发展起来，然而这个人却满口空话，在调查方面没有任何天赋。

这便是政务这边的情况，再看看军队这边。现在大权在握的是巴黎总指挥郝林。这个人是个皮实的大兵，虽然看起来麻木不仁，但在政治上却有些共和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政府中，还是在军队里，服从上级已然成为一种不需要思考的习惯，只要摆平了上级官员，那么剩下的人便只会机械地服从。再加上当时玛丽·路易皇后住在圣克劳德，巴黎的驻军已经被换成新招募的国民护卫队，因此巴黎城内已经没有一支拿破仑的铁杆军队。更重要的是在政府上层，已经有人对远征莫斯科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

皇帝远在千里之外。时断时续的通信让一些人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蓄意等待着皇帝驾崩的时刻。到那时参议院便可以发出政令，解散现在的皇权政府，组建临时政府。这就是马莱特想要推动的参议院谋反事件。同时他也伪造了参议院代表的发言，宣布解散现有的政府。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参议院政令，也没有所谓的临时政府。皇帝龙体安康，所有的谋逆都不过是一场幻觉。那么马莱特是如何以巴黎主人的身份推动了整场政变呢？



马莱特

确实参议院没有下达过任何政令，然而谁又能保证，参议院里一定没有一个看形势行事的反对集团呢？在我看来，在参议院的一百三十位议员中，有将近六十位[(3)]议员是在塔列朗、西蒙维耶[(4)]或是我的指示下行事的。我相信只要革命的目的是好的、有意义并且可行的，这些人肯定会联合起来支持革命。

这使得临时政府成为一种可能性。这个政府由马修·蒙莫朗西公爵[(5)]、亚历克西斯[(6)]、莫罗将军、塞纳省省长弗罗绍[(7)]以及一名待定人员构成。好吧，第五位人选其实是塔列朗。而我则是莫罗将军的候

补。整起事件的核心人物马莱特，他暗中把巴黎总指挥的差事交给了当时备受冷落的马塞纳。

你们肯定会质疑这件事情——因为拿破仑并没有死。但是你们一定还记得当年尼禄政权是如何被推翻的吧？虽然我并不想把这两人放在一起做比较。参议院在流言蜚语中失去控制，而皇权就此崩塌。

当马莱特准备发动政变的时候，拿破仑又在哪里呢？他正在撤离莫斯科。是的，他刚刚开始这次毁灭性的撤离。不好的预感已经笼罩了整个军队，而一旦这种预感被做实，那么帝国军队的溃败就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国安全的名义，替换十五到二十位的政府高层，那么政变会不会成功呢？在当时通信往来已经被阻断的情况下，第二十六封和第二十七封信上的日期是10月23日，信中报告法国军队开始撤离莫斯科，而第二十八封信上的日期已经是11月11日，这期间相隔了十五天！想要发动一场不为人知的政变，十五天的时间绰绰有余。整整一个月，我们得到的都是战场上溃败的消息，仅此一点，法国就可以永远地向拿破仑关上大门了。如果一开始政变的理由是拿破仑已死，那么现在他们便可以以战败的理由废黜复活的拿破仑。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时更适合推翻拿破仑的军事暴政，而对于法国来说，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比当时更适合成立一个各方利益都得到保证的政府。



马修·蒙莫朗西公爵

现在我们来理一理马莱特没有成功的原因吧。我会告诉你们什么呢？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执行者顾虑太多，或者说执行者过于心慈手软。身为共和党人的马莱特，以及他的两位同谋吉达尔和拉欧瑞都是兄弟帮的成员。受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非常担心法国会因此而再次陷入暗无天日的血光之灾。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萨瓦里没有就地处死郝林和他的两个助手杜塞和拉铂赫。马莱特认为，他们最好避免流血事件。因此他们选择暂时先拘禁这些人。一开始在公安部内部，这种温和的措施取得了成功：萨瓦里和帕斯基耶尔被拿下后，公安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但当郝林的反抗让马莱特不得不开枪时，他犹豫了，他没有办法同时向郝林和拉铂赫开枪。而这也给了拉铂赫时

间，这个人迅速集结起几个人扑向马莱特，解除了马莱特的武装。就这样，马莱特带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的秘密，平静地死去了。

夺权这件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似乎暗示了些什么。市政府已经做好了筹备临时政府的准备。一直到早上十点钟，脸色惨白的国务大臣冈巴塞雷斯都觉得随时会有人来取走他的性命，或者很快他就可以在监狱中见到萨瓦里。

在民众这边，马莱特什么都没有做。确实想要成就这样一件秘密的事业，最开始的时候最好不要惊动民众，当然民众自然会在无形中推动邪恶政府的没落。这起政变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打击了拿破仑帝国的核心，并且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一旦拿破仑倒下，他的帝国也会随之坍塌。

11月14日到16日之间，在斯摩棱斯克，正在为大撤退而焦躁不安的拿破仑第一次接到了有关政变的消息，以及对谋逆者的惩处结果。他大惊："在法国，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萨瓦里和冈巴塞雷斯请求拿破仑注意军队中是否也有人意图谋反。于是军队上下马上采取了严密的防御措施，形成了以埃曼努尔·格鲁希侯爵[(8)]为队长，以拿破仑死党为核心的护卫队。然而不久之后，这支精英队伍就被全面解散。这个时候，比起如何收拾战场上的残局，拿破仑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巴黎的皇帝宝座，因此拿破仑决定快速撤出俄国。最开始的时候，拿破仑躲过了库屠苏的追捕，到达别列津纳河[(9)]后，他又成功地骗过了摩尔多瓦的军队，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抵达了对岸。然而环顾四周，他的身边只剩下一些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幸存将士。面对这一惨状，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拿破仑把军队托付给科兰古之后，独自急匆匆地赶回了巴黎。



19世纪初的斯摩棱斯克

到达华沙后，他向自己的大使吐露了自己的情况，并留下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显贵到滑稽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在出发之时，拿破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顺利返回巴黎。不过，他依然希望能够快速穿过德意志，迅速逃回巴黎。在西里西亚，有人看到他被普鲁士人拘禁；在德累斯顿，他差点儿死于阴谋（在维也纳的沃波尔阁下不敢下达命令）。(10)

一路奔逃的拿破仑似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爱，12月18日，拿破仑回到了杜伊勒里宫。就在前一天，他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十九封国书，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的哀痛之情。然而这不过是他给宽容而又幼稚的法国人民布下的又一个陷阱。沉浸在悲痛中的人民相信，他们的领袖已经做好了准备，马上便能转败为胜，为法国带来永久的和平。就这样，法国又一次准备好为这个野心勃勃的人做出牺牲。他率领士兵夺下了一片废墟，可是他却把十五万盟军葬送在了俄国广袤的土地上。当初跨过尼曼河的四十五万大军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再也没能看见克里姆林宫。

然而这时拿破仑的心却不在损失惨重的军队上，他更关心的是这

起政变，或者说这个政变背后的真相——帝国的脆弱。他被“拿破仑战死”这样的预言折磨着，终日眉头紧锁。他和冈巴塞雷斯进行过长时间的对谈。那个时候，他不断地试探着这位国务大臣。同时他也不停地指责萨瓦里。对于他来说，政变似乎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而他的各位大臣则每天都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



陷入俄国漫天风雪中的法军



在俄国寒冷的天气里艰难跋涉的法军



抵抗俄军追击的法军后卫部队



拿破仑渡过别列津纳河

对这起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安部则把所有的过错全部推到马莱特身上。当然这也是国务大臣、战事大臣以及内阁中拿破仑亲信们的意见。这更加强了拿破仑脑海中一直以来的执念：共和党人是他最危险的敌人。在得知了塞纳省省长——米拉波分子——曾经纵容过谋逆分子时，拿破仑对着胆小的行政官员大发脾气：“这些人摧毁了法律和皇权，我们的父辈曾经大喊国王万岁，这几个字便说明了君主专制的优势。”

政府上下立刻发起了表忠心的行动，参议院发言人拉塞佩德伯爵(11)迅速声明参议院誓死效忠拿破仑，并且马上加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在国王同意的前提下，参议院的决定才具有权威性。"

在内阁中，拿破仑不惜一切代价镇压自由思想和哲学精神。他没有明白的是，没有了革命精神，他自己便失去了支撑；而他大肆宣扬君主制，也为后来波旁王朝卷土重来奠定了基础。然而在重大的事件面前，拿破仑依然对波旁王朝心怀芥蒂。在和我讲起大撤退的情景时，纳伊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时我以为他疯了。在大溃败面前，在离开我们之前，他就像一个没有了任何依靠的人，那时他说'波旁王朝可以趁虚而入了'。"

所以对拿破仑而言，只有自己的帝国能够超越波旁王朝，他才能渡过危机。于是所有人都在根据拿破仑的只言片语揣测着他的心意。有一天，拿破仑说："我要好好思考我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

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思考确保继承权的方式。各路演说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有人都只谈继承权，而继承权也成了所有演讲的主题。有人说应当尊重参议院的意见，对罗马王进行加冕，以便让帝国可以早日团结在未来继承人的宝座下。

这就是这位从革命中成长起来之人的真正目的，虽然他从革命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如今他却与革命精神背道而驰。

---

(1) 马莱特（1754—1812），1812年政变的策划者。

(2) 这里值得注意。——原注

(3) 18个月后，即1814年2月，也是这些人宣布废除拿破仑大帝。——原注

(4) 西蒙维耶（1759—1839），法国政治家、外交官。

(5) 1789年，马修·蒙莫朗西公爵（1766—1826）在三级议会中出任议

员，法国大革命后移民至瑞士。

(6) 亚历克西斯（1783—1835），法国政治家。

(7) 弗洛绍（1761—1828），曾担任塞纳省省长、巴黎市市长。

(8) 埃曼努尔·格鲁希侯爵（1766—1847），法国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军人和世袭侯爵，法国元帅。

(9) 别列津纳河位于白俄罗斯境内，是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

(10) 西里西亚是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

(11) 拉塞佩德伯爵（1756—1825），动物学家，政治家。

第25章　玛丽·路易皇后摄政

精彩看点

玛鲁埃失势——拿破仑组建新理事会——法奥同盟动摇——招募新兵——普鲁士叛变——逃兵事件——拉布歇尔同英国的谈判——塔列朗复出——致信拿破仑——纳博出使奥地利——玛丽·路易皇后摄政——包岑会战——乌尔城会战——茨威格休战协定

在打击革命精神和革命人士时，拿破仑想到了我。况且，他又怎么能原谅我对于出征俄国所做出的正确预言呢？有人警告过我，拿破仑曾经派人暗中调查过马莱特事件。只可惜，关于我不在场的所有报告都完全一致。

因为没有办法惩罚我，拿破仑便把怒气撒到了我的朋友玛鲁埃身上。他不能原谅玛鲁埃，因为他在我失势期间公然探望过我，而且他更害怕有着保皇思想的玛鲁埃和身为共和党人的前公安部长联合。而玛鲁埃也不满拿破仑在政府中的离谱政策，这更让拿破仑怒不可遏。最终玛鲁埃被迫离开了内阁，被流放至图尔。虽然那里的生活很安静，虽然远离了严酷的政治环境，但玛鲁埃却不得不心痛地看着法国日渐衰败。玛鲁埃的失势，不过是深陷泥潭的政府又一个猖狂的印记。

拿破仑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对很多老练的人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然而在其顾问大臣们的协助下，拿破仑尽一切手段来粉饰太平，掩盖惨败的真相。他向周围人灌输这样的思想，战争的失败只是因为俄国极端的自然条件，而这些谄媚的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宣传工具。这些人附和着他，回应着他，他们相信，只要国家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并且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和荣光，即便做出新的牺牲也无须大惊小怪。接着，拿破仑的喉舌开始游说各护卫队队长，随即这些人表示愿意离开法国、奔赴战场。与此同时，为了笼络人心、组建新的军队，保证其他国家能够继续坚守同盟，拿破仑私下里慷慨解囊。我们也可以说，拿破仑用自己的钱买来了一支后备军。

在此期间，拿破仑组建了新的理事会。理事会成员有冈巴塞雷斯、勒布伦、塔列朗、帕尼、马赫和科兰古。刚从柏林回来的马赫确定地说，普鲁士的各位部长以及普鲁士国王将会坚定地站在法国这边，继续坚守同盟条约。他还说，北方局势稳定，对拿破仑来说一片

利好。马赫说的或许是实情，不过他这么说也有可能是在有预谋地鼓舞内阁的士气。

拿破仑则表现出了更大的信心，他说自己可以信任奥地利，并且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也可以信任普鲁士。另外他现在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的兄弟约瑟夫控制着西班牙，英国人已经被他逼退至葡萄牙。更何况，现在他还有一百支护卫队预备军和1813年即将入伍的新军。所以他决定继续出兵西班牙和俄国。

然而，奥托[(1)]在信件中开始披露新的真相：为了拆散法国和奥地利的同盟，沃波尔阁下向奥地利开出了非常诱人的条件，德意志很快会暴动；不久之后，法国国内也会发生革命。奥托强调说，对奥地利的叛变，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然而在得知法国国内一切平稳，拿破仑重新掌权并且已经发起征兵的时候，奥地利内阁马上派布博纳伯爵[(2)]前往巴黎。而奥托也马上改了口风，表示同意奥地利的立场，以盟军的身份参与和平的构建。

信心满满的拿破仑在《箴言报》上公开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分开法国和奥地利，并且，四千万法国人也无所畏惧……如果有人想要问我和平的条件是什么，那么我会请他们去阅读对俄战争之前巴萨诺公爵写给卡斯尔雷子爵的信。"在拿破仑的这番话中，人们根本找不到莫斯科溃败的痕迹，他们只是确认了布拉甘萨家族在葡萄牙的统治和费迪南德四世在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而法国则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3)]

不久之后，普鲁士政府叛变的消息传来了，拿破仑大怒道："今非昔比！"

人们马上明白了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按照惯例，马赫拟写了一篇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并建议招募十五万新兵。雷诺则以拿破仑的名义急忙前往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同意把一百支国民护卫队交由政

府使用。然而当年政府曾对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做出过承诺，他们只负责法国境内的备战工作。一位参议院议员却同意了雷诺的要求。接着，拿破仑要求立法集团通过征税的立法。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拿破仑说：“世界需要和平，然而我绝不接受配不上帝国荣耀的和平。”

从当时内务部部长蒙塔里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各行各业，人口、农业、制造业甚至海上贸易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接着国务委员莫莱伯爵做了帝国财务报告。在帝国的繁盛面前，这位翁达斯的得意门生眼花缭乱，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报告：“在一个人的努力下，经过十二年的征战，法国便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于是，拿破仑就这样拿到了十一亿五千万法郎的国库预算。

拿破仑还需要处理另一件事。从六月起，教皇已经被移送至枫丹白露，于是，凭着去狩猎的借口，拿破仑匆忙和教皇签订了和平协议。可惜的是不久之后，教皇就废弃了这份合约，而天主教对拿破仑的敌意也越来越浓。

普鲁士公开叛变意味着欧洲正在形成新的反法同盟。突然之间，腓特烈·威廉三世[(4)]离开了柏林，在我国大使圣马尔桑，或者说奥热罗将军的保护下逃往布莱斯劳。自从莫斯科溃败以来，我们的大将和大使变得越来越慈悲。得知普鲁士国王出逃的消息后，拿破仑非常后悔，后悔他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对待腓特烈·威廉三世，把他像教皇或者费尔南多七世一样软禁起来。他说：“这不是第一次了，在政治上宽容绝对是一个不称职的顾问。”宽容？他竟然用宽容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与此同时，从莫斯科的废墟中撤离出来的军队，正在快速向奥得河和易北河转移。欧仁·德·博阿尔内率领的几千人马已经相继撤到了瓦尔达河、奥得河、斯派里河、易北河和萨勒河。德意志的一些秘密组织掀起了暴动，并有燎原之势，反对拿破仑的势力与日俱增。我们的盟军真的靠得住吗？普鲁士的叛变就像是一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

手。为以防万一，拿破仑已经在考虑1814年的征兵计划。也就是说，他正在挥霍帝国的人口资源。他还在和自己的亲信们幻想着组建一支由一千个营队构成的大军，幻想着他们能够调动八万步兵、四百个骑兵团以及一万匹战马。

另一方面，为了躲避征战，被征召来的十六万士兵中出现了逃兵，很多人都躲了起来。拿破仑非常害怕军队中的这种沉默反抗。长此以往，等到开战的时候，恐怕军队中就只剩下一些全副武装的将军了。为了阻止这种现象，他做了什么呢？他从法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里挑选了一万名年轻人，组成了荣耀护卫队，这些年轻人也成了拿破仑绑架他们父母的人质。

奥地利的调停没有丝毫的进展。于是拿破仑决定派银行家拉布歇尔同英国进行直接谈判。然而与当年我请拉布歇尔前往英国的谈判相比，这一次的谈判结果更加糟糕。刚和俄国结盟的普鲁士提出了停战的协议，他们希望拿破仑能退回到易北河以南，让出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从我们内阁的意见来看，很多人依然认为和平是有可能的。塔列朗认为我们依然有决定停战的主动权，勒布伦和科兰古也认为我们应当以普鲁士提出的条件为契机进行协商。



腓特烈·威廉三世与妻子路易



19世纪的布莱斯劳

然而拿破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他说："这些人以为我会退缩，但我什么也不会给他们。"他还对自己的报纸说："西班牙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不能破坏这件事。"3月11日，得知俄国人已经开始向易北河挺进时，拿破仑依然对这些报纸说："法国绝对不会让出一寸土地。"但当时，拿破仑却接到了来自各方希望和平的建议。

看到塔列朗重新被委以重任，而我还依然待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时，我承认我很气愤。不过我也知道其中的原委，在拿破仑的眼里，马莱特政变是一起共和党人的叛乱，而我则难逃干系。再加上我曾经劝他不要贸然发动对俄战争，他一定对此怀恨在心。但我相信我的建议迟早会派上用场，于是我希望我能够快速回到政府，为祖国分忧。

2月1日在哈特韦尔，路易十八发表了一篇面向全体法国人民的宣言。在这篇秘密流传的宣言中，路易十八希望参议院能够做一件惠及千秋万代的好事。我知道，对于此事，拿破仑一定有所耳闻，只是在英国，这篇宣言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所以他暂时还不能确定它的真实性。我把我得到的复印件递给了拿破仑，让他自己来进行比对。

在写给他的信中，我告诉拿破仑这样一个事实：他的战功让圣日尔曼镇上的人暂时闭上了眼睛，但他在战场上的失败却唤醒了这些人。现在这些人正在改变着整个欧洲的民意，而法国的民意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趁着帝国皇帝的权威正在下降的时候，波旁家族的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秘密聚集起来。针对社会上普遍的厌战情绪，我们需要让人民树立起国家荣誉感，让他们知道，新的战争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和平。并且我们要让人民知道，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和平谈判。一旦开战，我们便不能过高期待奥地利的表现，过分依赖奥地利会让法国陷入被动的局面。在和奥地利的谈判中，我们要马上答应奥地利向我们提出的条件，保证奥地利和法国的同盟关系。最后我向拿破仑推荐了纳博，希望由他代替奥托来推进这次法奥谈判。在我看来在梅特涅身边的奥托难以胜任如此复杂的政治谈判，而唯有纳博才能真正探听清楚奥地利的真实立场。

大约二十天之后，拿破仑派纳博出使奥地利，这也算是他对我的无声回复吧。我完全没有期待比这更好的结果。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我相信纳博一定可以出色地完成他的使命。



纳博

在欧洲，如果普鲁士遭到身后北德意志联盟人民的反对而出兵德意志的话，那么拿破仑便可以以民族战争的名义进行正当防守。他清楚只要得到民意的支持，只要我们做出一点让步，那么整个防守便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对拿破仑来说，这比牺牲他的生命还要让他为难，因为这样伤害了他的自尊，也制约了他的权力。于是我确定他最多只能同意把奥得河和维斯瓦河让给普鲁士，把蒂罗尔和伊利亚里亚让给奥地利。拿破仑认为，依仗着三十万新军，他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与此同时为以防万一——他深陷不测——拿破仑决定赋予玛丽·路易皇后摄政权，允许皇后参与各种国务会议。

拿破仑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奥地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预防政变阴谋。不过拥有摄政权的皇后并不能颁布法律，也不能随意召见参议院议员，在内阁中并没有实际权力。并且她的摄政行为都在冈巴塞雷斯的监视之下，而冈巴塞雷斯又在萨瓦里的监视

之下。在摄政期间，作为摄政秘书的前部长帕尼负责撰写所谓的国书，其实也就是不在朝中的拿破仑的决定。

经过几场战役之后，盟军已经做好了跨过易北河的准备。这时候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后，拿破仑于4月15日离开巴黎、前往前线。

在欧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德意志突然冒出二十万大军，拿破仑可以重新发起反攻。很快，他接连赢得了两场战役的胜利：一场胜仗发生在萨克森的包岑，另一场则发生在斯派里外的乌尔城。这两场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军心，并且带来了一个直接的效果：垂头丧气的萨克森国王重新成为我们的盟友。

被拿破仑击败的普俄联军继续向奥得河撤退，而拿破仑则亲率大军紧追不舍。然而拿破仑的军队越是深入对方的腹地，对方也就越有机会反击。

就在这时巴黎突然传来消息，拿破仑同意签订休战协定。此时的拿破仑一方面需要招募新兵，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扮演调停角色的奥地利的真实立场。



包岑之战



盟军在包岑之战后休整

我们来看看休战协定的内容吧。汉堡和布莱斯劳是双方激烈争夺的两个城市。为了保住西里西亚，普鲁士军队一直在顽强抵抗。拿破仑担心，敌方并没有真正休战的意愿，而休战协定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在周围人都仅仅想暂时放下武器的时候，拿破仑选择了放弃奥得河，率军撤至力格尼茨。6月4日，双方在布莱茨威格签署了休战协定：在德累斯顿，拿破仑重新做回了地区将军。

这就是在最开始的两个月内，这场决定欧洲命运的战争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莱茵河南北，所有人都屏息关注着这场大战。

普遍来说，人们的内心都渴望着和平。而对于拿破仑而言，这么多年的征战不也是为了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吗？然而在观察者们的眼中，时代已经不同了！可是当时，因为缺乏足够的有效信息，我们并不清楚很多事情的真正缘由。

---

(1) 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原注

(2) 布博纳伯爵（1768—1825），奥地利将军。

(3) 这里指第一帝国国务秘书，外交部长马赫（1763—1839）。

(4) 腓特烈·威廉三世（1770—1840），或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国王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

第26章　法奥同盟开始动摇

精彩看点

缪拉离开巴黎——贝尔西耶致信缪拉——我写给缪拉的信——德雷斯堡防御工事——维多利亚大溃败——苏尔特元帅出战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谈判——同梅特涅伯爵的谈判——拒绝奥地利提出的条件

当国务大臣邀请我与他一起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时，我还在等地区将军的消息。他对我说，受陛下的指示，他要和我商议这么一件事。当时拿破仑正要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希望他能够加入自己在德累斯顿的阵营。所以拿破仑希望，在此之前我可以和我这位私交甚好的朋友沟通一下，让他不要拒绝拿破仑的提议。国务大臣向我宣读了拿破仑的来信，并且不停地和我说，陛下之前没有启用我，是因为之前的小事还不需要我亲自出马。于是我答应为拿破仑效劳，动笔给那不勒斯国王写了一封信。

虽然之前的预兆已经告诉我，不久之后我便能够重回朝堂。但我自己也并不清楚这一刻会在何时降临。不管怎么说，我给同样处于棘手位置上的缪拉写了一封信。

缪拉是一位坦率并且正直的将军。但是作为国王，他却缺少一份坚定和果敢。他建立的那不勒斯军政府受到了人民一定程度的欢迎，所以这位国王便觉得自己可以撼动拿破仑的统治了。可是在拿破仑眼中，那不勒斯王国只是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附庸。经过深思熟虑后，缪拉决定率领一万两千名那不勒斯士兵和自己的一部分私人军队加入出征俄国的队伍。当年拿破仑落荒而逃的时候，也是缪拉临危受命，在一片狼藉中带着剩下的军队突围。这时缪拉预感到，欧洲政局将发生变动，因此他决定马上回国，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在波兹南[1]，他离开了部队，十天之后[2]，《箴言报》登出了这样的消息：

> 由于身体原因，那不勒斯国王不得不离开军队，国王助理将代替国王出任军队总指挥一职。在行政工作上，国王助理有更丰富的经验，并且他绝对忠于拿破仑大帝。

这些话深深地伤害了缪拉。尤其是联想到前两年，拿破仑一直明确地暗示他，那不勒斯王国不过是帝国的一个附庸。如果拿破仑重新掌权，奥地利必将重新成为帝国的同盟，而皇后的弟弟路易的命运将

危在旦夕。最开始路易通过奥地利的一位部长——米尔伯爵和奥地利宫廷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在西西里岛，他还和英国军队的指挥本廷克勋爵[3]有过几次会谈。在波森岛，缪拉甚至秘密会见过这位本廷克勋爵。只可惜这一切都在拿破仑的秘密监视之下。

当人们得知拿破仑已经攻克了包岑和吕城，并且在萨克森集结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时，皇后凯瑞琳娜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让他尽快断绝和奥地利以及英国的一切联系，全力支持那不勒斯国王的行动。

一开始，缪拉拒绝了拿破仑让他前往萨克森的要求，于是贝尔西耶以拿破仑的名义，给缪拉写了一封深情款款的信。在信中，贝尔西耶劝缪拉前往萨克森，并向他保证双方很有可能休战。而对缪拉来说，参加和平协商有很大的好处。在我写给那不勒斯国王的信中，我所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称赞他，告诉他前方便是荣耀之地。缪拉因此不再犹豫。



那不勒斯国王缪拉



本廷克勋爵

还没收到我的信时，缪拉便收到了来自德雷斯特的急件。急件说拿破仑召我前往萨克森。原来在拿破仑眼里，身在巴黎的我对他的威胁不亚于那不勒斯的缪拉，而他召我们前往萨克森，其实是在变相地控制我们。不久之后我便做好了准备，准备从美因茨前往萨克森。

美因茨是我们在莱茵河的重要关塞，奥热罗负责保卫它。同时在美因河，他集结了一批观察员，秘密监视着周围的动态。

在对俄战争中，美因茨受到了重创。而他的守卫者奥热罗将军自

然对此耿耿于怀。我们刚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我很难相信这位心怀不满的将军有和平的诚意。路过美因茨的时候，我让人向他转达了这些话：

> 我们的好日子过去了！此前战场上的那点成绩已经完全比不上当年，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几场战役下来，吕城城中心已经失守，而我们在两翼的援军也难以发力。如果不是这十六支分队和八十架火炮，吕城恐怕早已失守。坦白地说吧，现在我们能依靠的只有火炮军。攻下包岑后，军队紧急渡过了易北河，打开了北方的大门，但我们不得不停在斯派里外的乌尔城。在那里只有用血肉之躯，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位置。这次血战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突破，没有俘获一个敌人，也没有缴获一支火炮，而我们的对手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赖兴巴赫，我们也遭到了重创，杜洛克被炮弹打倒在地。杜洛克，您的朋友啊！同一天，布吕伊埃雷也被流弹击中。您自己也说过，多么可怕的战争啊！现在，在德累斯顿，您想要做什么呢？您不想要和平吗？您比我更了解拿破仑，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会遭到五十万大军的围攻。相信我，奥地利对拿破仑的忠诚不会超过普鲁士。



奥热罗将军



19世纪的美因茨

从那时起我便深信，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和平，希望能够早日回到巴黎。

在我看来，德累斯顿不仅仅是一个被城墙包裹着的战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然而，德累斯顿周边的森林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来到德累斯顿后，我看到到处都是乱砍乱伐、正忙着修建站渠和栅栏的士兵。拿破仑整天都巡游在外，检查各种战事准备工作。在贝尔西耶、苏尔特和地质工程师巴克雷的陪同下，拿破仑整日奔波着检查河堤、马路、棱堡[(4)]、防御工事等各种战事工程。

德累斯顿所有的防御工事都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易北河两岸的备战工作可以说接近完美，萨克森周围的农民都被叫来参与防御工事的修筑。

在德累斯顿市中心的断墙处，拿破仑命人修建了沟渠和栅栏。城市周围全都修建了先进的棱堡，火光照亮了周围的村庄。

防御工事的修筑并没有局限在德累斯顿周边，整个易北河，一直到汉堡附近，都有骑兵驻扎。科恩斯坦、德累斯顿、托格、维藤伯格和玛德伯格是易北河沿岸重要的据点，在这些重要的据点中，拿破仑

都周密部署了相关防御工事。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把兵力主要集中在了德累斯顿周围，并希望以此为据点，进可攻退可守。



巴克雷

布置好这一切后，拿破仑便开始投入到各种协商会谈之中。大部分将军认为，德累斯顿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攻守据点，以此为中心，他们可以实现拿破仑所有的军事安排。但也有一些人向我坦诚，一旦奥地利宣布退出帝国联盟，那么法国就会面临来自易北河和莱茵河的双面夹击。

敌方的兵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瑞典王子贝纳多特的兵力部署

在北方通往柏林的路上；布吕歇尔的兵力部署在东方通往西里西亚的路上；在波西米亚山后，施瓦岑贝格的兵力正在静待事态的发展。

得知拿破仑已经回到弗雷德里克顿的马克里尼宫[(5)]后，我赶紧前去觐见。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看到了一筹莫展的拿破仑。

他对我说：“您来晚了。公爵先生。”

“陛下，我已经尽力在为您效劳了。”

“和梅特涅谈判时，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陛下，这不是我的错。”

“这些人，不用拔剑，就想让我按他们的意志行事。您知道现在最让我困扰的人是谁吗？是您的两位朋友贝纳多特和梅特涅。这两个人，一个公开向我宣战，另一个在谈判桌上和我暗中周旋。”

“但是，陛下！……”

“去找贝尔西耶吧，他会告诉您所有的情况。之后您再来找我，告诉我您对此次同奥地利谈判的意见。在此事上，我们需要您灵巧应变的能力，需要您来促成这次谈判。但是这次谈判绝对不能有损我们的实力和荣耀！这些人是如此狡猾，他们想不战而胜，就这样拿走我们的钱，拿走我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纳博已经前往奥地利开启谈判了，您可以去问问他的看法。还有，尽快和贝尔西耶取得联系，好好想想对策，两天之内来见我。”



施瓦岑贝格将军



然而当天，贝尔西耶根本没有和我说话的时间。自从杜洛克牺牲之后，贝尔西耶整天都和拿破仑待在一起，两人甚至每天都在一起用餐。他让我第二天再去找他。在这期间，政府的一个办事人员和我说了两件不容乐观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梅特涅伯爵和拿破仑的政治争端（随后我会具体说明）以及我们西班牙的军队刚到维多利亚便遭遇了大溃败，留下威灵顿执掌半岛。这件事已经传遍了布拉格上下，对谈判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得知此事后，拿破仑怒斥约瑟夫和儒尔当无能，立刻另找了一位大将弥补此事。拿破仑看中了护卫队里的苏尔特元帅，命其前去增援西班牙军队，守住比利牛斯山。苏尔特没有犹豫，然而不久前刚来到前线的苏尔特的妻子却非常不满，拒绝前往西班牙。在她看来去了西班牙只有死路一条。妻子的话让苏尔特倍感为难，于是他向拿破仑求助。因此，拿破仑召来了公爵夫人，希望能够说服她。公爵夫人坚定地说，自己的丈夫不会回到西班牙战场的，这些年来，他为帝国东征西讨，现在是他休息的时候了。

拿破仑生气地说：“夫人，我召您来不是为了听您的抱怨。我不是您的丈夫，如果我是您的丈夫的话，那么您不敢这样做。要知道，女人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去找您的丈夫吧，不要再折磨他了。”

公爵夫人让步了，他们卖掉了当地的马匹和装备，向着西比利牛斯山进发。

在布吕尔宫[(6)]，我终于见到了贝尔西耶。在此，我闲言少叙，只向大家交代清楚其中重要的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对奥地利的谈判问题。四月底，我们接到了纳博的来信。据纳博从梅特涅得到的消息来看，奥地利已经完全靠不住。1812年3月14日和奥地利签订的联盟条约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的时局。纳博还特地强调，我们必须重视奥地利的诉求和军事动向。也就是从那时起，拿破仑开始考虑启动两项谈

判来中立奥地利的立场。他希望通过公开和秘密的谈判，减轻北方联盟对自己岳父和梅特涅的影响。



苏尔特元帅

当年，作为部长的纳博负责出使奥地利并签下了《维也纳和约》。拿破仑对这位住在巴黎的大使有一些误解。毫无疑问，在欧洲所有的部长中，纳博是最了解拿破仑的朝廷和政府的人。通过高层关系，通过向奥坦丝、宝莉娜·波拿巴，甚至是缪拉的妻子献媚，这个人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不知道的是，这个外表风流倜傥、好寻欢作乐的外交官，其实有着一颗德意志民族共有的强大的心，一种欧洲精神和君主思想。而拿破仑更没有想清楚的是，在战场上失利

的自己，仅通过一些计谋是根本无法动摇国家层面的考量的。而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源。

在他看来，吕城和乌尔城的刀剑已经斩断了欧洲的各种政治联盟，并且这样的胜利已经足够震慑奥地利，让其重新回到自己的阵营。奥地利派出了使者布博纳伯爵求见他。虽然这位使者在拿破仑面前说尽好话，但他却毫不掩饰地要求拿破仑归还奥地利在伊利里亚的一些省份，增加在巴伐利亚和波兰一边的边界，解散莱茵联盟。在拿破仑看来，以这样的牺牲来换取奥地利的中立非常不值。于是他这样回复自己的岳父：我宁愿在战场上倒下，也不愿这样任人宰割。

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奥联盟愈加脆弱。德布姆纳频繁来往于维也纳、德累斯顿和布拉格。最后他宣布俄国和普鲁士将介入协调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从那时起，布拉格将会召开重要会议的消息便广泛传播出去。纳博一直紧盯着奥地利朝廷的动向，当他抵达德累斯顿附近时，他接到了拿破仑的新指示。拿破仑问他："吕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这位舌灿莲花的人回应道："啊！陛下，虽然有的人说您是天使，有的人说您是魔鬼，但所有人都说您非比寻常。"

所谓的秘密谈判有两个条件：法国归还奥地利在伊利里亚的一些省份。为了补偿依然坚持法奥同盟的奥地利（英国内阁出资一千万英镑收买奥地利，并且已经分两次支付了这笔巨款），法国需要向其支付一千五百万英镑的补偿金。

接见过纳博之后，拿破仑决定直接和梅特涅进行谈判，而这个重任则落在了我这个长期关注国际政治的人身上。

当我接到拿破仑的任命书时，梅特涅已经带着奥地利内阁的意见来到了德累斯顿。奥地利内阁认为，此次出访的首要任务是解散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奥联盟。这位奥地利的部长也毫不掩饰奥地利的倾

向，他明确指出各大国之间的争端只能通过维也纳大使馆来斡旋。那么这里便出现了第一个难题，拿破仑根本不愿意接受这种罕见的谈判方式。

拿破仑秘密召见了梅特涅伯爵。而梅特涅伯爵也把奥地利国王的信件亲手交给了拿破仑。最开始的时候，拿破仑向梅特涅抱怨法国已经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奥地利所谓的调停却带着对法国的敌意。在谈到停战协定和斡旋的时候，拿破仑说奥地利这次来德累斯顿完全是为了阻碍法国前进的步伐。他对梅特涅说："您口口声声说着和平，说着结盟，但这都是幌子，英国人的金钱已经让你们低头。现在你们想用两万人马来让我屈服。您想利用我现在的困顿来收复之前的失地，并且借机勒索法国。好吧！我同意，但我希望把这件事说明白，您想要什么？"

梅特涅回应道："奥地利只想要欧洲各大国能够达到一种平衡，并且能够保障各个国家的独立。"

拿破仑说："请您说清楚点，我同意归还伊利里亚，也同意给出补偿金来换得奥地利的中立，并且我的兵力已经足够让俄国和普鲁士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了。"

于是梅特涅坦诚地说，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奥地利无法保持中立的地步，奥地利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要么反对法国，要么支持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没有任何搪塞，他拿起了一张欧洲地图，强迫梅特涅说清楚。奥地利想要的，根本不是伊利里亚，它想要的是意大利一半的领土，是教皇重回罗马，是重建普鲁士，是让法国放弃华沙、放弃西班牙、放弃荷兰、放弃莱茵联盟。



梅特涅

拿破仑大喊道：“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原来是为了平分欧洲！你们想要的是让帝国解体！你们想要轻轻一笔就推翻欧洲的城墙，推翻我浴血奋战才建起来的城墙！奥地利竟然觉得我会随随便便就答应这种条件！我的岳父竟然会同意这样的要求！一个弱小的帝国如何保护他的女儿和外孙！啊，梅特涅，您到底收了英国多少钱，您居然会如此针对我？……”

听了这些话，梅特涅只能报以骄傲的沉默。困惑不解的拿破仑用相对平静的口气说：“对于和平，我还没有绝望，因此，我希望调停会议能够正常召开。”送梅特涅离开的时候，他又补充道：“我还没有完全考虑好归还伊利里亚之事。”

这位奥地利的部长并没有马上离开德累斯顿(7)，而是尽力向拿破

仑政府争取到了奥地利的调停权，并且把休战协定延长至8月10日。

当人们问起拿破仑是否愿意支付最后五百万英镑的补偿金时，拿破仑一口回绝了：“不行，如果我真的给了他们这笔钱，之后，这些人便会狮子大开口，妄图吞下我们整个法国。”

---

(1) 波兹南位于波兰中西部，瓦尔塔河沿岸，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该国重要的历史中心。

(2) 1813年1月27日。——原注

(3) 威廉·亨利·卡文迪许·本廷克勋爵（1774—1839），简称威廉·本廷克勋爵，英国驻马德拉斯（实际上即印度）总督、英国枢密院顾问、陆军中将军衔。

(4) 棱堡是由帷幕墙向外凸出一块具有角形结构体的火炮防御阵地。完整的棱堡除了两个前端凸出面外，尚有两个侧面，用以保护帷幕墙，并连接棱堡本体。它常作为堡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盛行于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

(5) 1719年，波兰奥古斯特二世为情妇卡特琳娜建造了这座城堡。如今，马克里尼宫为德累斯顿市政府的一部分。

(6) 我们认为布吕尔宫就是马克里尼宫。这座拿破仑的行宫之前属于奥古斯都三世——马克里尼公爵。——原注

(7) 6月30日。——原注

第27章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

精彩看点

同贝尔西耶的谈话——同拿破仑的谈话——出使布拉格——和平大会的召开——奥地利的立场——北部联盟正式向莱茵联盟宣战——秘密会谈——赴任伊利里亚——和平谈判破裂——奥地利背弃法奥同盟——法国在克罗地亚战场上一败涂地——德意志战场获胜——士气低迷的意大利战场——莱比锡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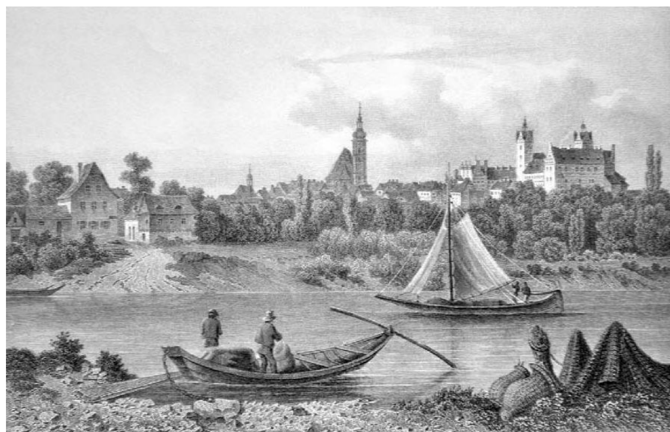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到达德累斯顿时的情况。我没有向贝尔西耶掩饰我的想法，我告诉他说：“如果拿破仑不放弃德意志和伊利里亚的话，那么奥地利肯定会加入反法同盟。如果奥地利加入反法同盟的话，那么法国将面临大革命以来最强大的王公贵族的围攻。”

虽然贝尔西耶也同意我的看法，但他还是对我说：“可是您不知道，和陛下相处时，我们需要多么的谨慎！如果我直言相劝，他势必会震怒，所以我只能迂回地表达我的意见。就拿奥地利这件事来说吧，自从他们提出和平条件以来，我们就经常讨论，法奥联盟破裂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我的出发点。唉！您能想象得到吗？我根本不敢向他建议放弃易北河，先保证莱茵河的安全。我手中有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将军[(1)]拟定的作战计划，这位将军希望我们召集所有易北河外的兵力以及所有零散的兵力，撤退至萨勒河，再从那里撤往莱茵河。很多人都支持这个方案。假如奥地利起兵的话，他们肯定会向反法同盟打开波西米亚的大门，让我们和法国失去联系。但拿破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他当时大喊：‘即使我吃了十场败仗，我也至多退回到你们刚刚为我规划的那个地方。你们觉得我现在根本拿不下德意志，是吗？当年在马朗格、在奥斯特利茨、在瓦格拉姆，难道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吗？现在我占据着易北河和埃尔福特的所有要塞，可你们却觉得我根本拿不下德意志？德累斯顿已经固若金汤，凭着德累斯顿，我可以应付所有的攻击。从柏林到布拉格，虽然敌人的势力在发展，可是我却占据着主动地位。你们以为这么多国家能够长时间地在这样一场战争里保持一致的态度吗？你们等着看吧，迟早我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萨克森平原将决定德意志的命运。我再重复一遍，以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算敌人赢我十场，也只能把我逼回到莱茵河，但是，只要我动用了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的驻军，一天之内，我就能攻入敌人的首都。到时候，我就可以逼迫盟军签下无损我荣耀的条约。我已经算好了一切，剩下的就只能等命运的安排了。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所说的倒退防守这个建议的，因此，你们也不必费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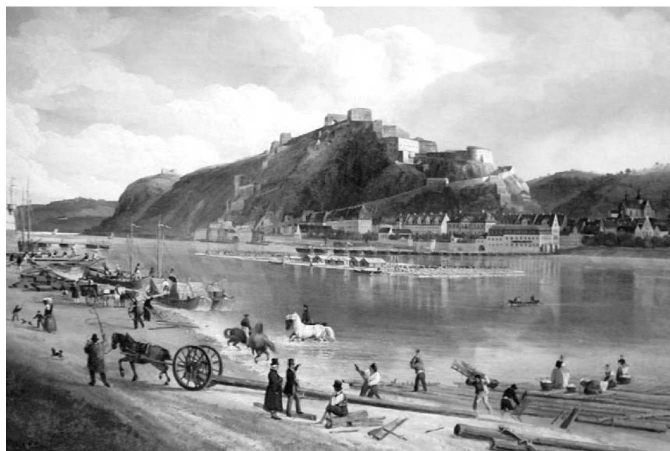
了，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执行我给你们的命令。’”

我对贝尔西耶说：“可是，如果所有的将军、所有的军队首领都和您想的一样的话——而且我相信他们的内心的确是这种想法，那么您觉得拿破仑会屈服于这种群体压力吗？”

贝尔西耶回应道：“别做梦了，拿破仑的想法非常坚定。我们赢了太久了，所以他觉得我们还会一直赢下去，因此，他根本看不到局势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再看看他周围的人吧：马赫已经完全听命于他了；科兰古算是他身边唯一敢讲实话的人吧，不过这个人也不过是个卑躬屈膝之辈；而对于缪拉和纳伊这两位正直的大将来说，拿破仑只会听取他们在战场上的意见。拿破仑周围的人都鼓动他参战，当然，纳博、富拉奥、杜罗若、杜若斯和贝尔纳上校的意见相对中肯，也更有参考价值。至于他身边的其他人——尤其是巴克雷这个每天拿着地图跟在拿破仑后面的人，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期待着敌人能落入他们的陷阱，被他们一举全歼。他们这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反法同盟的存在，根本不愿意正视法国在出征俄国之后所面临的困局，甚至不愿意承认我们已经教会了这些人如何应对我们，如何对我们进行反击，如何和我们的炮兵作战，况且在数量上，敌人占据人数优势，远远大于我们的人数优势。”



19世纪的易北河风光



19世纪的莱茵河及在莱茵河岸边劳作的人们

我补充道："还有现在的民间组织，这些人也正在觉醒，他们也在起身对抗帝国。"

贝尔西耶继续说："对，而且我们还缺少间谍和骑兵。"

临走的时候，我对贝尔西耶说："这下我就清楚了，我会把我们的意见写好的，明天，我就带着这些东西去见拿破仑。就像之前那样，我会告诉他实情的。"

我并不想参与任何军事策略类的会谈，也不想过度介入政治类的谈判。况且我知道，拿破仑也不会给我足够的时间和他详谈，我随时都有可能被命令闭嘴。第一次和他会面后，我便清楚，最让他烦恼的是贝纳多特和梅特涅这两个人。我知道自己可以在这件事上做什么，虽然说服贝纳多特要更困难，但这也是我必须攻克的难关。有人告诉我，在图尔库会谈时，沙皇曾经和贝纳多特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拿破仑没能拿下俄国，如果他失败了，那么法国的王位必将空缺，而在我看来，只有您才有能力登此大位。"

这些话解释了贝纳多特的行为。对于贝纳多特来说，这些话难道不是一种信任和鼓舞吗？在当时的法国政府中，还没有任何人有过这

样的想法，实现这样的承诺，基本全无胜算。然而莫斯科大战之后，欧洲内阁基本达成一致，他们认为在欧洲，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代替拿破仑。于是他们想到了波旁王朝，而继贝纳多特回到欧洲大陆后，莫罗的回归也让这一切更加明朗。

在签订停战协定前，贝纳多特抵达施特拉尔松德[(2)]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从我们手里夺走了波美拉尼亚。而他这样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听人们说，他身边一直围着英国的斯图尔特将军、奥地利的文森特将军、俄国的波佐二博尔戈将军和普鲁士的克斯马克将军。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来意，所有人都在他身上寄托着将信将疑的希望。

不久之前拿破仑得知，在停战期间，查理曾经拜访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总将赖兴巴赫，并且向这些人坚定地提出，只要莱茵河外还有一个法国士兵，那么拿破仑就绝对不会同意签订和平条约。大家可以想象我面临的处境了吧。调整好思路后，我前往马克里尼宫面见拿破仑。拿破仑马上接见了我，看到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拿破仑立刻从一片地图和作战计划书中站了起来，对我说道：“好吧，公爵先生，您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了吧？”

“是的，陛下。”

“我们会不会腹背受敌，一面是您的朋友贝纳多特，另一面是我的朋友施瓦岑贝格？”

“依我看来，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您尽可能地满足了奥地利的要求。”

“绝对不可能。他们休想不动刀兵就让我屈服。我知道，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人正看着我，比如您的朋友贝纳多特，他把我们的战术全部告诉了敌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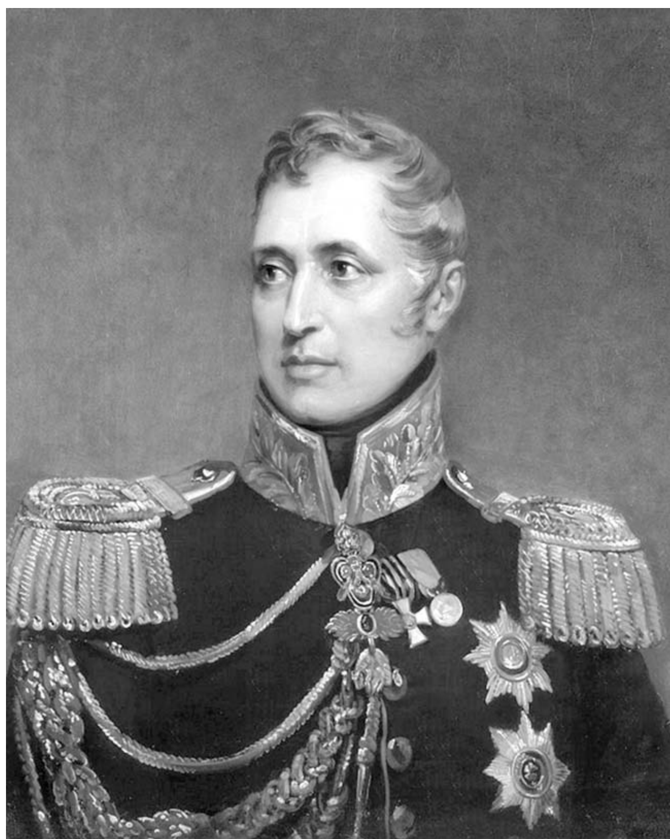
“可是，陛下，您难道就没有想过尝试着改变一下他对您的敌意

吗？”

“怎么尝试？他已经被英国人收买了。不过我让人给他写过信，而且我在他身边有个可靠的人，但这个人依然执迷不悟。”

“陛下，如果事态已经如此严重的话，那么我现在就给他写信。虽然这个人打算去德意志军演，但他绝对不能对法国开战啊！”

“嗯，法国！法国！法国就是我。”



波佐二博尔戈将军

“请陛下允许我在信中这样和他说，我会告诉贝纳多特，他这样做就成了俄国和英国人的工具，就成了推翻您、复辟波旁王朝的元

凶。”

拿破仑接过了信，仔细地读着。

“可以，但您准备怎么把这封信交给他？”

“我觉得陛下可以让纳伊元帅出面，一直以来，纳伊元帅和贝纳多特都是亲密的战友，而且纳伊可以让T上校出面……”

“不行，这个人之前是雅各宾派的人。”

“陛下，您也可以选择L中尉，您也了解这个人，他对您忠心不二。”

“好，我这就和他说我的想法，并且即日把他派给纳伊。”

沉默了两分钟之后，拿破仑接着说：“您有没有思考过与奥地利私下谈判的事情？”

“有过，陛下。”

“那么您有没有准备过一些相关的计划书呢？”

“有的，陛下，您看看这份计划。”

拿破仑读过计划书之后说：

“什么？您觉得一切都没用吗？您觉得我现在做的都只是些权宜之计吗？您也同意那些人的意见，觉得我好好做个村长就行了吗？公爵先生，请相信我吧，没有比我更可靠的国王了。”

“陛下，正因为我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我才不想看到您的王冠在枪林弹雨中飘零。但我也不敢向您隐瞒，此前，虽然欧洲在您的赫赫战功下屈服，但如今，如果您想让其继续臣服的话，您就必须有更辉

煌的胜利，但这胜利的取得会更加艰难。此前，那些欧洲部长们在您的威严下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但现在，他们都站在各自的朝堂上，叫唤着要您给欧洲一个交代。”

“好吧，我就是给欧洲的交代啊。当然，我不会再做让他们不满意的事情了。”



讽刺拿破仑狂妄自大的漫画：拿破仑正在把欧洲的大小君主铲进焚烧炉

“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对策。如果奥地利不能保持中立，或者不能站在您这边的话，那么这次您的敌人将是整个欧洲。现在，最好的情况就是和平能够达成，而只要放弃德意志、保住意大利，或者放弃意大利、保住德意志，这个和平便可以达成。陛下，以上帝的名义，我求您不要贸然和奥地利决裂，不要毁掉我们一起打下的江山。试想，如果战场上有任何闪失，那么局势将会大变，那时，您的同盟国会以保卫国家的名义退出联盟，到时候，您的敌人一定会对您群起而攻之的，那些沉睡的阴谋必将苏醒。散布在波尔多、旺代、诺曼、莫尔比昂的英国间谍一定会四处活动，随时准备着复辟波旁王朝。陛下，请您慎重考虑您的安危和荣耀，不要拿王冠和权力开玩笑。一旦战场失利，五十万大军，还有他们身后千百万的人民，一定会马上逼您撤出德意志，到时候，他们根本不会给您任何协商的余地。”

听完这些话，拿破仑抬起了头，挑衅地说道：“我还能和他们打十次，而且只要打赢一次，这些所谓的反法同盟便会马上分崩离析。公爵先生，真是让人难以接受，像您这样优秀的人都泄气了。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让出某个省份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法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有强大的民意支持，这就是我的神话。不要打破这个神话。为什么有这么多警示？顺其自然吧。至于奥地利，你们不要上了它的当，它不过就是乘人之危，想从我这里获利。从心底讲，我已经决定了。但我不明白，它竟然要加入俄国人的阵营和我开战。这就是我的意思，我希望您能给我提供您的方法。我现在任命您为伊利里亚总督，并派您做个样子，把这片土地交给奥地利。现在，您就动身吧，到布拉格的时候，您的儿子会和您一起去奥地利，去进行秘密谈判。到布拉格后，请您往格拉茨的方向走，在莱巴克观察事态的发展吧。您快点去吧，因为现在那边的朱诺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伊利里亚需要您这样一位坚定而明理的人。”

“陛下，我绝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确认一下，您的意思是，在交出伊利里亚省份的同时要确保您的统治地位吗？”

“没错，是的！告诉我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我将全力支持您。”

假如我们和奥地利的破裂在所难免，那么现在我能做的便是尽力为祖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况且，在拿破仑没有做任何让步的前提下，所谓的秘密谈判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拿破仑让我出使布拉格、推进秘密和谈，一方面是为了给奥地利一丝虚假的希望，另一方面不过是为了提防我：一旦爆发危机，远离事件中心的我无法对拿破仑造成什么威胁。当然拿破仑此举还有两个目的：首先，他要尽可能地拖住奥地利，同时他也想在奥地利政府里培植一支自己的亲信，这样一来，一旦我们和奥地利的关系破裂，他也可以通过别的手段破坏北方联盟；第二，他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重新回到朝堂，因为他相信，在处理

奥地利的事情时，我绝对不会一无所获。

贝尔西耶向我坦白表示，拿破仑确有此意，他甚至希望我能在布拉格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和纳博一道探查一下奥地利今后的意向。并且任命我为伊利里亚总督的同时，拿破仑也把所有的民事和军事权力一并交给了我，可以说，我拥有了伊利里亚省的至高权力。然而我知道，等待我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迎战，要么让出伊利里亚。至于我在布拉格的停留和查探，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绝不能不合时宜地长居布拉格或者做过多的打探。

我想的是先谨慎行事。因为我知道，盲目行事是最可怕的事情。在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前提下，我先做了几种假设。如果拿破仑在战场上失利，不得不同反法同盟签下退兵协定，那么他的荣耀将不复存在。出于自保，政府中难免会有人盲从局势。如果事态一旦恶化，拿破仑的统治将岌岌可危。到时候，反法同盟的核心——英国——一定会力保波旁王朝。我知道，我的经历不能让我往这个方向去想，我不能去想象帝国的覆亡。人们会和我说，在1813年过去的六个月里，在帝国政府的重要岗位上，波旁家族基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可是事实上，拿破仑的政府已经和拿破仑离心离德，而保皇派则通过各种途径混入帝国政府，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些人完全有能力撬动帝国基业。

当然，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逆转的可能。如果奥地利能够以大公主为核心在法国成立摄政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去支持一个“有节制”的法国——一个安守在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法国，而这也肯定会动摇其朝堂上的亲俄派。基于这个想法，我草拟了一封建议书，建议拿破仑授予皇后更多的摄政权。在我的计划书中，我建议成立包括所有利益方的摄政政府。而在摄政政府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塔列朗、纳博、麦克唐纳、蒙莫朗西，以及另外两位我现在不方便指出姓名的人。各位元帅的想法也会得到考虑，他们也将加入新的摄政政府，而这个以军政政府形式出现的新摄政政府也必将加强各位

元帅在国家的影响力。总而言之，我希望我们能够成立一个满足所有人利益的新的摄政政府。这样一来，我们的政府将成为一个温和的、糅合贵族气质和民主气息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将会从一个压迫者重新变回国家的保护者。这个计划可以让法国免除解体和被侵略的危险，因此，那个时候，它无疑是最稳妥的方式。

我非常确信，这个提议会受到深谋远虑的奥地利政府高官梅特涅的欢迎。梅特涅对我的好感要从1809年向奥地利宣战的事情说起。当时拿破仑不顾所有的外交礼节，命我派一队人马押送梅特涅至法奥边境，并强调一定要让这个人吃尽苦头。震惊之余，我私下缓和了拿破仑的命令。我亲自前往大使官邸，向梅特涅解释了我来访的目的，并且表达了我的歉意。经过一席对谈之后，我们达成了谅解。我请莫西元帅派一位温和的护卫队长陪同大使前往奥地利，最后，我还给了他尽可能多的宽裕时间，以便于其进行准备。当我们告别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我居然还会去给他送行。



讽刺拿破仑和路易的漫画：暗讽拿破仑迎娶路易只是为了要一个男性继承人

以上就是我的计划。在拿破仑和贝尔西耶的催促下，我和军队后勤助理沙桑翁一道踏上了前往布拉格的道路。在离开萨克森前，我向萨克森人民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为了法国的事业，他们做出了巨大的

牺牲。我能看得出来，在看到自己的国王又一次卷入了拿破仑的事业后，萨克森人民非常痛苦，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损失。

和平大会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我抵达了布拉格。对于此次大会，我不抱任何希望。在我看来，这次会议中所谓的外交措施，无非是为了证明开战的合理性。梅特涅、俄国政府全权代表、普鲁士政府全权代表，以及奥地利外交部的所有人都到场了。虽然法国也有两位全权大使，但我只看到了纳博。那个时候，他在等他的同事科兰古，并且此前，他也接到了这么一个命令：在没有科兰古的情况下，他不得私自做任何决定。

和平大会开幕前，一些困难已经出现了。首先，拿破仑反对俄国政府任命昂森特为全权代表。在《箴言报》中，拿破仑指出，这个出生于阿尔萨斯的法国人是一个活跃的好战分子。除了这些争辩之外，我们还希望对于和平大会的构成的争论能够拖住事情的进展。拿破仑对纳博的指示和对我的指示是一样的，他说："我不想要的和平就是我的敌人强加给我的和平。相信我，那个一直操控着和平的人绝不会就这样轻易接受和平。如果我放弃了德意志，那么奥地利一定会激烈地反扑，直到它拿下意大利。如果我放弃了意大利，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奥地利一定会逼迫我离开德意志。"

纳博接到的唯一正面指示便是尽量不要把奥地利推向敌人的阵营，我向他谈及了秘密谈判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非常赞同我的想法。

于我而言，布拉格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路过这个地方而已。想要接近奥地利大使团，我需要非常周密的部署，尤其是在所有人都不信任拿破仑的情况下。比如有人肯定地对我说："从12月起[(3)]，拿破仑就向奥地利承诺让出意大利、伊利里亚以及德意志，以此来恢复维也纳朝廷的荣耀。但是不久之后，这个人便

准备重新开战，而且只想让出一小部分利益，而在欧洲，这点小恩小惠根本不足以恢复维也纳的辉煌。”



莫西元帅



19世纪的布拉格

很明显，维也纳政府想利用我们现在的劣势来收复自己在《普雷斯堡和约》和《维也纳和约》中失去的土地。他们完全不在乎我们是否让出伊利里亚。在他们看来，只要出动炮兵，这块土地必将回到奥地利的怀抱。

在布拉格期间，我还得知在和平大会开幕期间，北部联盟正式向莱茵联盟宣战。从3月25日开始，在卡利施，库图索夫正式宣布莱茵联盟已经解体，还说这是他对那些为我们所用的德意志军队的提前惩罚。我还得知，在日米格鲁德[(4)]召开的赖兴巴赫会谈中，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瑞典王子、奥地利的斯塔迪翁、英国的阿伯丁以及联军将领等都参与其中。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商量各方的兵力投入比例——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各方各自应该投入多少兵力；在那里，那些人还磋商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进攻和防守的方式；最后，他们确定了他们这一阵营——我们的敌方阵营——的三大主力部队。在这样的会谈中，不可避免地，各方也谈及了相关的利益分配问题。

然而为了约束拿破仑的势力范围，他们依然决定召开和平大会。最后，他们心照不宣地聚集在英国的麾下，由英国出面和我们进行谈判。

于是奥地利就这样加入了北方联盟，并且向前线增派了二十万人。虽然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地试图挽回奥地利。然而奥地利的答复却是：拿破仑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便是不再扩大侵略，然而他的行动却无法证明他的诚意。



亚历山大一世、弗朗西斯二世、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日米格鲁德会师

我尽力去推进秘密会谈，然而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至于我想要成立摄政政府的私人想法，虽然奥地利似乎同意成立一个为奥地利利益服务的新政府，然而，只有在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情况下，奥地利才愿意做出相关的让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对奥地利做出任何承诺，但我得到了奥地利对我们的承诺，即他们绝不会从内部破坏拿破仑的统治。在这次同奥地利的交涉中，从奥地利大使团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拿破仑的抱怨，尤其是在其《箴言报》中的一些报道。

离开布拉格的时候，我心中确实有了更多的希望，但对于未来，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保证。相反，我知道，为了欧洲的未来，一百万士兵将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并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帮助我联合各方利益、组建新的摄政政府的契机还没有出现。

在去往伊利里亚的路上，望着眼前流转着的奥地利君主国的风

景，我的内心思绪万千。首先，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国，管理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完善。另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非常忠于自己的国家，并且坚韧不拔。与此同时，这个古老国家的政策也带有一种张力，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会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这种处事方式会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在平衡欧洲各国关系时，奥地利的作用非常明显。

在前往格拉茨的路上，我路过了卡尔尼奥拉公爵的领地莱巴克，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下的城市便是伊利里亚的首府了。7月末，我抵达了莱巴克，并且迅速走马上任。《维也纳和约》规定：伊利里亚地区包括奥地利的弗留利、特里雅斯特港口、富含伊利里亚矿产资源的卡尔尼奥拉港口、维拉赫周边、克罗地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萨瓦河右岸的整个区域，从卡尔尼奥拉港口算起，一直到波斯尼亚边境的地区都属于伊利里亚。众所周知，波斯尼亚包括克罗地亚省、六个克罗地亚军事管制区、里耶卡河和匈牙利海岸线、伊斯特拉半岛以及萨瓦河右岸的所有区域，而其中的塔尔韦格更是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边境城市。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伊利里亚地区的这些城市基本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但因为达尔马提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特殊位置，再加上它们长期隶属于法国，所以这个地区的重要性便日渐凸显。

我的到来引起了一片轰动：首先，因为我前公安部长的身份，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比较熟悉我；其次，我的前任，同时供职于政府和军队的阿布兰特什公爵、拿破仑的亲信朱诺最近发疯而亡。这个可怜的人啊，当年，他曾在葡萄牙战场上受伤，紧接着，在旧伤未愈的情况下，他又去了俄国战场，再加上思乡的情绪，以及因为没有得到帝国元帅勋章而产生的不满，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渐渐影响了他的健康。六周前，他突然得了疯癫病。那天，他手拿马鞭，亲自驾驭着敞篷四轮马车，从格拉茨的这一边奔驰到了另一边，完全不顾周围民众惊骇的目光。第二天，他用非常荒谬的语言下达了这样一道命

令："总指挥先生，我请求圣保罗，让您成为他的护卫。"

发生了这么一连串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后，可怜的朱诺被送回了法国。十五天后，他的疯癫之症再次发作，这一次，他一股脑地冲向了他父亲城堡的窗户，坠地身亡。这就是我的前任，一个和帝国形象极不相称的人。

上任之后，我首先任命弗雷西亚男爵为军事总指挥，让其协助我的工作。弗雷西亚是个机警并且相当有能力的人，是法国军队里杰出的皮埃蒙特人。当年，拿破仑派他前往伊利里亚时，他还是德雷斯特骑兵队的分队长。

我们所在的伊利里亚地区气候温暖宜人，自然景观多样，即使是原始的风貌也不失壮丽，这里的民众身上也处处透露着远古文明的痕迹。



雕版画：19世纪的格拉茨



阿布兰特什公爵朱诺

离开德累斯顿之前，我去和拿破仑道别，他对我说：“伊利里亚是奥地利的前卫，乃兵家必争之地。”可是，他从未想过留住这片土地。最开始的时候，他希望用这块土地交换加利西亚[(5)]，现在，他又想用伊利里亚来换取他岳父的同盟承诺。我很清楚，对于伊利里亚，拿破仑还有很多别的想法。他还和我说：“如果奥地利真的向我们宣战，那么我便会派欧仁·德·博阿尔内前往意大利前线，向这些松散的联邦发起进攻。同时，我已经吩咐过了，一旦开战，巴伐利亚的军

队、奥热罗元帅所部、米约将军所部将会全力协助欧仁·德·博阿尔内，一举拿下维也纳。”也就是说，对于拿破仑来说，首要任务并不是安抚奥地利，而是继续他的宏图大业。

事实上，一来到伊利里亚，我便觉得那些鲁莽的想法已经过时。虽然奥地利联邦很松散，但我们贸然发起进攻也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首先，我们在伊利里亚的军事力量并不强，而且自从莫斯科溃败以来，意大利的兵力也几乎耗尽。自1812年以来，三次连续性的侦查已然耗尽了法国和意大利所有的干部力量，因此，我们所谓的军队不过是一支空有名号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欧仁·德·博阿尔内却奉命征兵，组建一支新的军队。于是，有人建议他向靠近意大利的省份征集干部。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很快各级干部就到位了。可是这支号称五万人的部队却没有相应的物资补给。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了纳博的信，和平谈判破裂了。8月7日，奥地利宣布：帝国必须解散华沙公爵领地，将其交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三国接管；帝国将重建北方独立国家，以易北河为边境重建普鲁士；包括特里雅斯特在内的伊利里亚地区必须全部交由奥地利政府。此外，和平谈判还提到了荷兰和西班牙的独立。

8月9日，经过深思熟虑后，拿破仑决定先给出一个初步的答复，他同意了其中的一些要求。8月11日，所有人静候回音。但很快他得到消息说和平大会结束了。同一天，奥地利背弃了法奥同盟，加入了反法同盟的阵营，而波西米亚地区也出现了大批俄国军队。8月12日，当拿破仑愿意接受梅特涅提出的全部要求时，一切都太晚了。奥地利对法国宣战了，并且对于重新开启和平谈判的事情，奥地利方面没有给出任何准确消息。接到这封信后，我立刻便明白了，伊利里亚将成为两国的前沿交战地。

在路过这些松散的联邦时，我不是没有注意到奥地利军队已经在蠢蠢欲动。我得知陆军元帅海勒正在萨拉格布待命，并且弗雷蒙、枋

内、莫沙几位大将已经候命多时。这位元帅手握四万人马，奥属克罗地亚的军队也已经整装待发。

和欧仁·德·博阿尔内会合之后，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据我从法属克罗地亚得到的消息来看，奥地利的密使们正在这些联邦间流窜，进行着暗箱操作。为了给将来的侵略打开缺口，这些从萨瓦河另一头来的“来访者们”正在鼓动着民间暴动。

事实上，8月17日，也就是德意志停战协定到期的第二天，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两位奥地利上校便跨过了萨瓦河，挺进到了西塞克和萨拉格布，往卡尔斯塔特和里耶卡方向移动。卡尔斯塔特是法属克罗地亚的首府，虽然驻守在那里的将军震宁进行了抵抗，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却四处逃散，再加上当地人民的起义，他不得不独自逃往里耶卡。而克罗地亚总督宫塔德便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逃亡途中，他被人抓住，险些送了性命。后来，虽然他从愤怒的克罗地亚人中死里逃生，但不久之后，他就被纽金特将军俘虏。纽金特将军说：“在没有得到维也纳朝廷的命令之前，我不能给您自由。”

虽然我方在克罗地亚战场上一败涂地，但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这里的人民对奥地利的感情，而伊利里亚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尽管法国派出了老将华西、蒙特查尔和高谢尔等大将，但他们也无力扭转意大利兵力薄弱的情况，萨拉、罗格和卡塔托也相继失守。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建议我们重点防守莱巴克和特里雅斯特。当我得知奥地利总元帅海勒在克拉根福部署重兵，即将向维拉赫和塔尔维斯发起进攻，并且计划从德拉瓦河进入蒂罗尔时，我马上把这些情报告诉了欧仁·德·博阿尔内。虽然欧仁·德·博阿尔内手下的军队已经向伊利里亚进发了，但皮诺将军还是带着一队人马紧急增援莱巴克，这时，我心里终于有了一点底气。

但我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海勒麾下有四万人，并且他还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而欧仁·德·博阿尔内麾下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麾下的士兵全是没有经验的新兵。为了赢得时间，他决定不再试图夺回萨瓦河，而是以防守为主。然而，奥地利的主要兵力全都在向克拉根福方向集结，维拉赫和塔尔维斯的情况非常危急。一旦这两个城市失守，奥地利人便可以通过德拉瓦河进入蒂罗尔。欧仁·德·博阿尔内决定以阿德尔贝格为据点。在这里，向左他可以增援萨瓦河源头；向右他可以向特里雅斯特派兵。在最左边的位置，他还派驻了一组游击队，命其在蒂罗尔的入口驻防。

敌军一直在猛攻。敌军虽然轻松地攻下了里耶卡和特里雅斯特，可是皮诺将军也轻而易举地夺回了这两座城市。维拉赫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双方轮流做东。最激烈的对峙应该是和中尉阁海涅争夺菲尔尼茨的战争了。

整个9月的情况大致如此。正如拿破仑所言，德意志战场的胜负将决定奥地利的命运。



欧仁·德·博阿尔内



19世纪中期的里耶卡

在德累斯顿，和平谈判破裂带来了更大的军事震动。一直以来，德累斯顿都被拿破仑的支持者们看作坚不可摧的堡垒，然而接二连三的噩耗却让他们陷入了困顿和担忧之中。卡兹巴赫、毕戎和海乌诺姆战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巴黎和米兰的不安。通过密探，我了解到，巴黎已经有十八天没有得到前线的消息了，巴黎城内流言四起，人民渐渐开始对拿破仑失去信心，而在旺代和波尔多的保皇派也开始蠢蠢欲动，巴黎的沙龙里，人们到处嘀咕着、窃窃私语着：这是一切结束的开始。

还是回到意大利战场上吧，德意志战场上的捷报大大鼓舞了奥地利人在意大利战场上的士气，而我们阵营中意大利人的斗志却大不如之前。此前为伊利里亚尽心尽力的皮诺将军突然了离开军队，前往米兰等待战场上的消息。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欧仁·德·博阿尔内，忧心忡忡的王子表示他依然忠于拿破仑。得知和平谈判破裂后，他也很痛苦，而对于拿破仑，他也没有了之前的那份崇拜。他对我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他能连输两场就好了，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及时止损，撤回莱茵河。"

我毫不掩饰地对王子坦诚言道："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我确实这样建议过，但他根本听不进去。最恼人的是，在第一场战役中，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如此一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欧洲便联手重新规划欧洲政治格局。"

听完我的话，欧仁·德·博阿尔内非常震惊，同时，他也开始思考帝国脆弱的命运，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开始思考此事。考虑到他周围肯定有密探，所以我没有继续说下去。

终于，当巴伐利亚脱离我们的时候，欧仁·德·博阿尔内向我坦承

道："我认为您的预感是正确的。"面对入侵的奥地利军队，守在边境的巴伐利亚军队没有任何行动，因此，奥地利军队就这样缓缓地通过了德拉瓦河，抵达了蒂罗尔，无法自保的德属意大利撤退到索查河。



卡兹巴赫之战



毕戎之战

我对欧仁·德·博阿尔内说："一旦坚持不下去的话，请您一定要尽力在皮雅芙和阿迪耶这里拖延时间，再等待局势的发展。冬天快到了，毕竟您身后还有米兰、曼图亚和维罗纳。"

欧仁·德·博阿尔内立刻着手准备撤离事宜，我在城堡里留下了一些没有战斗力的人假装卫兵，并任命雷热为他们的首领。等一切都布置妥当之后，我跟着军队离开了莱巴克，抵达了索查河前线。同一天，奥地利军队抵达特里雅斯特，此时，弗雷西亚已经遵照我的指示撤离了城堡中的所有力量，只留下了哈比率领的一支很小的护卫队和敌人周旋。

通过身在格拉迪斯卡的将军，我向拿破仑呈递了我的报告。我向他禀报说："为了谨慎起见，欧仁·德·博阿尔内已经下令撤退至索查河，而这也意味着，伊利里亚就此失守。但意大利这边还会尽力抵抗，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支撑一段日子。"在报告的最后，我向拿破仑汇报说我已经结束了自己在伊利里亚的使命，因此，我希望拿破仑再派我去其他地方。

就这样，我一边等待着局势的发展，一边等待着拿破仑的回复。在这期间，我不禁又看了一眼这片美丽的土地，美丽的伦巴第啊，她是我事业起步的地方，而如今，她却在皇权专制下呻吟着，她的命运也和拿破仑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我们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工业、艺术和奢华。米兰可谓是法国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作为首都，她承载了所有的光辉，朝廷、内阁、参议院、外交团体、各部委、各民政单位、各军事单位、法院都在这里。在此期间，米兰的人口也增加了十万多人次，变得越发光彩照人。然而历朝历代以来，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总想着以此征服全世界，因此他们总是很快就会耗尽米兰的人力物力。不久之后，在伦巴第人的眼中，欧仁·德·博阿尔内便成了任意妄为的人。

莫斯科溃败之后，和法国一样，意大利政府的威信大减。拿破仑的神话似乎同他的军事天才一起跌下了神台。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欧仁·德·博阿尔内希望自己能身体力行，恢复拿破仑的威望。然而这

位正直的勇士、忠心耿耿的臣子却有些草率，过于顺从迎合他的人，过于亲信一些自大的法国人。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他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迟钝。最近，由于征兵和收税的事情，他激起了米兰人民的不满，而他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意大利独立力量和旧社会的力量向他发起了挑战。和自己的继父一样，欧仁·德·博阿尔内只能在战争中找到依靠，于是他立即开始组建军队。



19世纪的米兰



莱比锡之战

意大利的情况还不明朗，人们都知道，意大利的周围有三支在德意志的大军。这么说吧，以德累斯顿为据点的拿破仑计划，一旦战事

对法国有利，那么这三支军队将聚集在易北河和萨勒之间的德累斯顿防线。人们还知道，在反法同盟的二十万大军里，有十一支步兵、四支骑兵，还有一部分数量可观的后备军。并且，不久前人们刚刚得知，为了免于被敌军包围，拿破仑已经决定放弃德累斯顿的据点，准备前往萨勒和马格德堡。

10月底的时候，我接到欧仁·德·博阿尔内麾下大将的来信，上面写着："现在这个不想妥协的人已是一败涂地。"

第二天，关于莱比锡之战[6]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拿破仑被全欧洲的军队逼到了莱茵河，我所有的预感都变成了现实。我们该何去何从，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又该何去何从？不难猜想，战败后，拿破仑手中的巨大权力一定会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而另一方面，我很清楚，帝国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已经在蓄势待发，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也在摩拳擦掌。虽然我很欣赏这些人的能力，但我也清楚他们的能耐。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有胆识的人，然而这些跃跃欲试的人都不过是些懦夫。有一个才华横溢且天性灵敏的人本可以力挽狂澜，然而这个人最担心的还是脖子上的脑袋。至于我，虽然我不乏决心，但我却远在他乡，更何况，早就有人防范着我的行动。

辖。



莱比锡之战中发起冲锋的波兰骑兵

---

(1) 我们认为这里指的是罗涅将军。——原注

(2) 施特拉尔松德是汉萨同盟城，位于德国北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靠近波罗的海海峡，其位置像是吕根岛的门户。

(3) 1812年。——原注

(4) 日米格鲁德是波兰的城镇，位于该国西南部，由下西里西亚省负责管辖。

(5) 加利西亚是中欧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原来被称为加利西亚的地区现在分别属于乌克兰和波兰。

(6) 莱比锡战役，1813年10月发生于德国莱比锡附近。因参战国家和民

族众多，所以莱比锡战役亦被称为“民族会战”。拿破仑以十八万人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及其他各国三十万联军苦战，最后败阵。拿破仑败返莱茵河西岸，后返回巴黎。

第28章　意大利独立运动

精彩看点

被派往罗马——意大利战场突变——游说缪拉——缪拉决定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那不勒斯的朝堂——返回罗马——拿破仑拒绝了和平的提议

我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到巴黎，为了帝国的未来，我迫切地希望从这些阴谋中理出一些头绪。就在我上路的时候，我接到了拿破仑从美因茨发来的信件，或者说这是他对我之前请求辞去伊利里亚总督之职的回信。

信中，拿破仑命我前往罗马，担任罗马总督。我知道这次任命的原因，但我也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这个毁掉帝国的人啊，他仍然觉得自己可以在残兵败将中高枕无忧。于是，我放慢了前行的脚步。一方面，我希望进一步了解战场上的情况；另一方面，我还在等待莱比锡大溃败之后巴黎的消息。然而，我的猜测又是多么的准确啊！参议院里的元老们还深信帝国已经脱离了危险，因为拿破仑还活着！没有一个政府要员相信反法同盟能够跨过莱茵河！面对这样的失败，虽然各个阶层都瞠目结舌，然而他们依然盲目地相信着帝国的权威。当然，有一个人是例外，这是我安排的人，他正静静地等待着这个气数将尽的帝国走完他的最后一段路程。

然而，意大利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动，欧仁·德·博阿尔内接连放弃了索查河、塔利亚门托、皮雅芙和布伦塔，刚刚穿过阿迪耶，并把据点移到了维罗纳。奥地利军队一路向前，分别在维琴察、巴萨诺和蒙特贝罗设点驻军，并且在威尼斯、帕尔马诺瓦和奥索波建立了封锁线。我主持的秘密谈判里，放弃威尼斯和阿迪耶已成为与奥地利和解的基本条件之一，然而现在，帝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满足奥地利这个大国了。意大利南部已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在布伦塔和阿迪耶对峙的两军相互观望着，等待着政治协商的结果，筹划着可能的军事行动。在缪拉看来，莱比锡之战后，拿破仑的失败已成定局，因此，他决定赶回那不勒斯，重新规划之后的战事。可以这么说，10月23日，在图林根和米尔伯爵的会晤中，他已经计划着和奥地利结盟。当时，虽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指明缪拉即将叛变，但我的心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听说，当他从莱比锡和米兰回来之后，在洛迪换马时，几个意大利人曾经围着他的车，问他是否会增援欧仁·德·博阿尔内。

他这样回应：“当然，不到一个月，我肯定会前去增援你们，带着五万精锐……”



19世纪的维罗纳

话音未落，他就像闪电一般骑着马离开了。我推测他说的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当缪拉开始考虑和奥地利结盟的时候，他已经在思考着支持意大利独立运动的事宜了。我还得知，在经过上意大利地区时，他甚至接待了几位意大利的爱国将领，并且承诺支持他们的事业，向波河提供援军。

到达罗马后，我发现驻地将军米奥利斯、行政长官珍妮特对缪拉充满了怀疑，他们对我说，缪拉公开接近反法同盟，并且正在招兵买马。他这支新军融合了那不勒斯军队、叛变的意大利人、科西嘉人和法国人。所有来自那不勒斯的消息都显示，不久之后，缪拉就会抛弃大陆政策，允许各国船只靠岸。还有人确定，在和奥地利谈判的同时，缪拉还和本廷克勋爵进行私下的来往，意图单独和英国签订和解条约。欧仁·德·博阿尔内也同意罗马方面的担忧，因此，他便派他的副将吉夫伦加前往那不勒斯跟进缪拉的动向。虽然这位年轻的副官并不清楚那不勒斯朝堂的情况，但他还是怀着和平与友谊之心出发了。

缪拉发现，在这些罗马联邦里，在这些烧炭党人中间，有一批卓越的法学家和主教，因此，他决定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在维泰博[(1)]周围，教士巴塔利亚挑唆人们站起来反抗当地的法国政府，同时，在这些罗马教皇统治下的国家当中，流传着一些煽动性的文书。米奥利斯[(2)]不得不出动兵力镇压暴动的人群，解散了这些帮派。巴塔利亚被押送回罗马，从他的供认里，人们得知，他是那不勒斯领事朱卡里的代理人，他奉命前来煽动人民起义，反抗法国统治。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谨慎处理来自那不勒斯的反叛行动，不能操之过急。

然而，缪拉已经派兵前往上意大利地区。从12月初开始，在卡拉斯科萨的率领下，一支那不勒斯步兵分队和一支骑兵分队扛着十六架炮口进入了罗马。尽管拿破仑已经下令我方以盟军的态度对待来自那不勒斯的军队，但米奥利斯将军依然怀疑这些人，并且部署重点防守奇维塔韦基亚和圣昂热城堡。三四支那不勒斯军队相继从布鲁塞尔、安科恩和罗马向托斯卡纳移动，或者向佩萨罗、里米尼和博洛尼亚移动。不久前，缪拉派皮尼亚泰利公爵前往博洛尼亚，坐镇波河，他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对奥地利的承诺，不如说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完成独立大业。

在此期间，我收到了拿破仑的来信，他命我出使那不勒斯，并尽量说服缪拉不要反叛。依照拿破仑的指示，除了要尽力安抚缪拉之外，帝国还向他做出了出让费尔莫和安科恩的承诺。长久以来，缪拉一直希望得到这两个城市，为此，拿破仑三次致信缪拉，并且在第三封信中，他提到了我将前往那不勒斯一事。

12月中旬的时候，我来到了那不勒斯。

那不勒斯的朝堂，或者说缪拉的朝堂非常奇特，处处透露着一种维苏威火山[(3)]般的皇家气息。缪拉是一个勇敢但毫无想法的人，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隆重却又可笑的朝堂，而他本人也被将士们称作弗兰克尼国王。然而在拿破仑看来，他的妹夫缪拉并不是一

个好大喜功之人，他把那不勒斯朝堂上的怪象归罪于自己的妹妹卡罗琳娜·波拿巴，而且，他也认为，在缪拉身后捣鬼的正是这个高傲且野心勃勃的女人。如果不是她，缪拉根本不会想着成为国王。但自从成为那不勒斯的国王以来，缪拉一直不甘心成为帝国的附庸，另外，他想要推行的政策一直和他妻子的想法有冲突。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周围的谋士都建议他反叛，并且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策略。



绘于19世纪的罗马城



19世纪的圣昂热城堡

对内，这个朝廷阴谋重重、骄奢无度；对外，这个朝廷风华靡丽、礼仪繁多。恍惚间，我甚至有一种柏拉图来到大狄奥尼西奥斯[(4)]朝堂的错觉。两个国家的密使都戴着真诚的面具，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在这当中，我认出了来自巴黎的密使。当然，这其中也不乏那不勒斯国王的密使，比如一位让我尤为警惕的G侯爵。在两次会面中，这个人的名字都只是用拉丁文做了标注，这个人要么是一副戒备森严的态度，要么丝毫没有坦诚之心。在我和缪拉的第一次会面中，我基本没有表露任何私人意见，装作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的样子，只是请那不勒斯国王向我解释一下当前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他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他的臣民强烈希望断绝和法国的关系；另一方面，拿破仑又没有给他具体的指示，一直以来也从没有正视过那不勒斯，况且现在，欧洲盟军在不停地催促他迅速加入其同盟。而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他更愿意去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不过，不管是为了服从拿破仑的意志，还是为了自己的考量，欧仁·德·博阿尔内都不会同意这个举措。最后，那不勒斯国王说道：“我还在和本廷克勋爵做斗争，在西西里岛，这个人正准备煽动卡拉布莱斯人造反，并且在整个那不勒斯协助烧炭党人的活动。”

我对那不勒斯国王说：“我没有权力替您做任何决定，我只能建议您，一旦拿定主意，就全力以赴。”

这次会面之后，那不勒斯国王告诉我，一个月前他曾经给拿破仑写过信。在信中，他向拿破仑表达了自己对奥地利出兵波河的担忧，并且提议借此机会，帝国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控制，这样一来，他们也算是间接支持了意大利的独立运动。

我对那不勒斯国王说，让拿破仑做出这样的牺牲实在是太难了。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那个程度，我也会为法国的利益考虑。然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多次恳求拿破仑不要扩大战争范围，只是所有的请求都无疾而终。

剩下的会谈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式了，而此刻的缪拉也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每天，他的内阁都催促他尽快加入欧洲联盟，而他希望意大利独立的想法却和整个政治背景不相容。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于是，在一次秘密会谈中，我建议他增加军备力量、加强训练，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他的事业。此前，因为他对烧炭党人的做法不合时宜，所以我建议他在之后的时间里更加谨慎行事。最后，我告诉他说：“不要过度轻信那不勒斯大公们的嘈杂声音，您应该试图去相信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在那不勒斯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是全无乐趣。在一个富丽堂皇的朝廷中，我呼吸着欧洲冬日明媚的空气，然而我的心却时时刻刻牵挂着法国。外侵迫在眉睫，拿破仑将如何应对这些守在国门前的敌人呢？他该如何自保呢，他能否全身而退呢？我知道，这个人根本没有同自己国家一样广阔的胸襟，对于孤立无援的他来说，失败在所难免。然而，对于他的祖国而言，这样一个巨星的陨落将是一道需要很久才能愈合的伤疤。

在这段日子里，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巴黎的信件，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巴黎方面的明确消息。于是，我决定赶回罗马，和我的信使会合。况且，有消息称奥地利全权代表涅普森伯爵[5]将要抵达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敲定最后的加盟条约。那么我的存在将会使那不勒斯国王非常为难。回到罗马这个基督教的王国时，我马上拆开了所有来自巴黎的信件：军心不稳、哀鸿遍野。盟国肆意侵犯瑞士的中立权利，从东部边境攻入了法国。在一个月内，当拿破仑刚刚集结起六万人，准备反扑时，军队内部却突然爆发了疫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不顾塔列朗强烈要求和平的意见，依然拒绝签署盟国从法兰克福寄来的和平条款。国家已经没有任何精力承受如此大的损耗了，拿破仑这么做只能是自绝后路。



涅普森伯爵

---

(1) 维泰博位于意大利中部，是维泰博省的首府所在地。

(2) 米奥利斯（1759—1828），法国大革命以及第一帝国将领。

(3) 维苏威火山是欧洲的一座活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湾东海岸，同那不勒斯相距不过20千米。

(4) 大狄奥尼西奥斯，或称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前432——前367）。古希拉欧瑞西里岛叙拉古的僭主（公元前405年至公元前367年在位），曾占领西西里岛和南部意大利地区，成为古希拉欧瑞部最强大的城邦。

(5) 涅普森公爵（1775—1829），奥地利将军、外交官、国家领导人。

第29章　我在意大利的使命

精彩看点

致信拿破仑——罗马民族运动——会见爱丽莎——缪拉抵达罗马——缪拉反叛——托斯卡纳溃败——与缪拉的谈判——军队撤出罗马和托斯卡纳——与缪拉的密谈——下达撤军的命令

拿破仑到底在想什么呢，对这样明智的建议，他居然置若罔闻？政变，他要自立为独裁者。从革命的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的拿破仑深信言语的力量，清楚这几个字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便把参议院的钥匙握在手中，从此之后，参议院也被他秘密监视起来了。

这便是我从巴黎得到的消息，平复了心情之后，我提笔向拿破仑写了这样一封信：

> 我已经离开了那不勒斯。对于那不勒斯大公的行为，我不能向您隐瞒其中任何一条原因。
>
> 第一，在意大利战场上，您没有给予这位大公足够的信任。在最近的两场战役中，那不勒斯国王已经尽力向您展示了他的忠诚和军事能力，他希望得到您的信任。但是您的怀疑、不器重让他觉得他受尽了侮辱。
>
> 第二，那不勒斯内阁不停地在国王耳边煽风："如果您想要帮助拿破仑陛下保住意大利，那么您必将抽走国内的兵力，那时，英国很有可能会乘虚而入、登陆那不勒斯，并且掀动内乱，到时候，因为国内没有军队，也因为人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因为敌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所以，国内势必陷入混乱之中。而那个时候，拿破仑陛下可能还在忙着应对德国、瑞士和西班牙，忙着解决同他们的边境问题。到那时，您该怎么办呢？想想您自己吧，现在，拿破仑陛下甚至都无暇顾及法国的问题了，那么，他又怎么能顾得上那不勒斯呢？如果拿破仑陛下挺过了这一关，但他要求那不勒斯并入法国，到时候，您又该怎么办呢？"
>
> 第三，另一方面，陛下，您的敌人向那不勒斯国王提出了优厚的条件：这位大公将保有他的王位，并且可以扩大他的领土。退一步讲，他完全可以选择成为意大利独立运动的功臣，而不是为您的荣耀去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他选择继续

支持您，那么他面临的将是军备空虚和人民暴动；如果他决定背弃法国，那么他将得到整个意大利的支持。这就是那不勒斯国王每天听到的建议，也许他就是这样动摇了。所有人都希望和平，而在这些人的眼中，敦促那不勒斯国王支持意大利独立运动，是让您放手意大利最有力的保障。

18日，我抵达罗马。罗马的情况和意大利一样，独立已经是大势所趋。的确，在这面大旗下的人各怀心思，但所有人都希望成立一个地方政府，毕竟对于所有人来说，为了很小的事情而不得不前往巴黎是一件烦琐的事情。对于这些远离首都巴黎的人来说，法国的统治只是加重了他们的各项负担。征兵、税务、掠夺甚至是牺牲，这便是罗马人口中的法国统治。再加上我们根本不允许有任何贸易行为，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我们自己的产品没有销路，而稀少的外来产品也全都是天价。

陛下，如果您现在处于鼎盛时期，那么我一定会告诉您这些事情。今天，在您处于危难的时刻，我也不敢对您有丝毫的隐瞒。如果您在立法集团面前明确说明了您希望和平，并且您会尊重欧洲各国的君主制，那么所有人都会向您臣服。只要您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那么各国就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您会踏平各国，而法国也会因此而一直生活在警惕当中。

我以为，如果您能够把自己的欲望放在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莱茵河之间的话，如果您能够坦率地向各国表明您绝不会越界的话，那么您一定会得到所有国家的拥戴和支持。当然，这样一个法国也绝对是配得上您的荣耀的法国。我很确定，想要获得真正的和平，您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可是，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敢和您这样说的人了。您轻信了那些人，而现在您应该懂了。就是那些人让您出兵西班牙、出兵波兰、出兵俄国的，就是那些人让您远离了您真正的朋友——远离了对您忠心耿耿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些人

> 让您在德累斯顿签下了和平条约。现在，您依然可以重回法国，并且创造一个安宁繁荣的法国，然而除此之外，您已经没有别的可能了，整个欧洲都看着您。
>
> 我恳求您听一听我的建议，这些建议全都来自一颗对您忠心耿耿的心。我并不想说自己的建议一定比别人高明，但我恳请您原谅我的坦诚。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在《提尔西特条约》签订时，在《维也纳和约》签订时，在您出征俄国前，还是现在，在德累斯顿和平条约签订时，这颗心一直都对您忠心不二。
>
> 陛下，我的内心非常悲痛，因为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敢对您说真话的人。如果您将来再遭遇任何不测，我也可以对得起自己的心。我以上帝的名义请求您停战吧，还生灵涂炭的欧洲一个安宁吧！

刚刚把信寄出，拿破仑政变的消息便传来了，他宣布解散了立法集团。刹那间，承载着庄严愿景的杜伊勒里宫成了愤怒和丑闻的角斗场，在慌乱中，立法机构里的法官们、公务员们四下逃窜。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拿破仑抛弃了这些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人，帝国的未来又在何处呢？五国联军兵临城下，帝国还能撑得过这一年吗？

在这场决定性战役开始的时候，拿破仑认为奥地利一定会退出反法同盟。为了向奥地利施加压力，拿破仑决定在朝内继续维持以玛丽·路易皇后为核心的摄政府，并在军营保有自己的政府。然而很快，或者说在授权玛丽·路易皇后的同时，拿破仑又封自己的兄弟约瑟夫为帝国的副摄政王。很明显，这种荒谬的举动无异于又一次往政府扔了一颗分裂的炸弹。

我不禁想问，在这种情况下，谁才是拿破仑意志的真正代表者？约瑟夫的出现是为了制衡内务大臣冈巴塞雷斯，而玛丽·路易皇后不过是徒有其名。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冈巴塞雷斯是巴黎摄政府的实际掌权人，虽然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公安部长萨瓦里的监控之下。公安部

的权力源于民意，而正因为如此，公安部手握维持国家稳定的重要权柄。然而自从萨瓦里就任公安部长以来，公安部便完全丧失了这项神圣的职能。

通过以上这一切，我们便可看出，政府的行事风格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的谨慎。但有一点不容忽视：所有的政要都认为拿破仑不能继续执掌大权了。可惜的是，在这些老练的政要中，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出这些想法，他们都任由摇摇欲坠的法国在外国的阴谋中飘零。

有人或许会说："啊，在如此的危难前，您在哪里？您现在的忏悔难道不是对自己懦弱的悔恨吗？"当时，我确实不在场，确切地说，我确实应该在场。而且我也预感到，如果我在场的话，革命党人的利益一定会得到保证。

对局势越来越惶恐的我提笔给拿破仑写信，我告诉他说："现在，如果我继续以罗马总督的身份待在罗马的话，那么这就是对您尊严的最大挑战。现在，那不勒斯人已经用大炮打开了罗马的大门，再加上他们的国王也将投靠反法同盟，因此，我们肯定保不住罗马，保不住托斯卡纳，也保不住那些热内亚邦国。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当和那不勒斯国王和解，主动放弃那些我们已经保不住的城池，这样一来，那不勒斯国王也间接地加入了法国的事业。鉴于我现在的处境，我只能离开罗马，前往佛罗伦萨待命。



玛丽·路易皇后与罗马王



约瑟夫·波拿巴

和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一样，佛罗伦萨也处于焦躁、迷茫之中，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希望追随缪拉在上意大利地区的事业。拿破仑的追随者们依然坚定地认为，那不勒斯人还坚守着拿破仑的事业，整个部队还在波河等着援助我们，反叛的只是缪拉一个人。然而支持意大利独立的人们则确定，那不勒斯的所谓援军一定会和他们一道对抗法国，挣脱法国的统治。剩下的人则对上意大利地区充满了担忧。在他们看来，这支临时强征的队伍不过是一支弱不禁风的稻秆，一个流浪者和盗匪的集中营。看看这支队伍里都有些什么人吧，卡拉斯科萨，

一个夸夸其谈却没有实际能耐的总将；麦克唐纳，一个娶了内阿尔卑斯山老将杜威期妻子的人，因为自己长期以来的不得志，在缪拉的队伍里，他到处胡言乱语；勒奇，一个在西班牙战场上以残忍和横行霸道而出名的人，他曾经被迫前往法国接受军事法庭的宣判。也许人们会提及年轻的拉沃，这个最新得到缪拉青睐的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811年，时任轻步兵首领的拉沃获得了皇后的青睐，而这也招致了人们妒忌的流言蜚语，因此，当年，他便失势了。总而言之，虽然这支由四十支步兵队、二十支骑兵队、两万士兵和五十架火炮拼凑而成的军队身着华服，但他们却毫无纪律性可言。

12月10日，托斯卡纳政府对于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自从英国人登陆瑞吉欧，出现在里窝那以来，大家的担忧更是与日俱增。令人意外的是，英国似乎在向法国主动示好——在驻地法军的长期坚持下，英国人最终撤离了瑞吉欧。



麦克唐纳

在这种情况下，我来到了长公主爱丽莎的朝堂，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爱丽莎了。爱丽莎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子，虽然她已经不再年轻貌美，但她却依然善良、睿智，这一点从未改变。然而，爱丽莎缺乏判断力，她经常沉迷于奢靡之事，这是她的一个致命缺点。爱丽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她的兄长拿破仑：骄纵，喜欢排场，军事治国，无视文学、艺术这些和平的治国方式。在托斯卡纳这片以农业和商业著称的土地上，爱丽莎却想着建立一个气势恢宏的王国，因此，她只关注征兵事宜，并且不停地调兵遣将。在爱丽莎这种方式的治理下，除了她所钟爱的小丑表演和鲁特琴演奏活动外，比萨和佛罗伦萨的学术和文艺因得不到重视而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总而言之，那里的人们只是畏惧爱丽莎，但不爱戴她。

不过，在我看来，爱丽莎是一个热情、慈爱、不畏艰难、不屈不挠的人，因此，我愿意追随她，并愿意为她出谋划策，所以，我决定协助她处理托斯卡纳的政策制定工作。爱丽莎向我吐露了自己对于拿破仑那种蛮干行为的不满——拿破仑不仅输掉了帝国，还连累了整个家族。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也知道她心里有多么害怕失去托斯卡纳。

我对她说："当年，我曾经在德累斯顿竭力劝阻拿破仑放弃战争，让他不要拿自己的王冠与整个欧洲为敌，并劝他退回莱茵河以内，从而号召整个国家一起抵御外敌。然而，他还是醒悟得太晚了，他并没有听从我的劝阻。"

不久之后，缪拉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月23日浩浩荡荡地抵达罗马，并受到了独立派的热烈欢迎。当缪拉的队伍抵达目的地——罗马时，手中只有一千八百士兵的米奥利斯封锁了城堡。虽然缪拉的副将拉沃只有五千人马，但他却突然自封为罗马联邦的总指挥，要求和米奥利斯进行和平谈判。但米奥利斯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缪拉建议米奥利斯将军和守卫奇维塔韦基亚的拉斯卡尔将军带着他们手下的将士撤回法国，然而，那两位将军并没有听从缪拉的建议。遭到两位将军的拒绝之后，缪拉留下了一支军队，封锁了这两个城市，同时，他还派人前往巴尔布将军控制的昂孔城堡。缪拉虽然没有公开向法国宣战，但他已经率领九千步兵、四千马匹进入了博洛尼亚，并占领了莫得勒、菲若莱和斯托。

缪拉的这些举动，再加上他向帕尔马和托斯卡纳方向行进的那不勒斯军队，都预示着他已经变节。2月1日，缪拉进入了博洛尼亚，任命勒奇为托斯卡纳总督，并让他率领八百人马攻下托斯卡纳。得知此事后，长公主的朝堂乱作一团，但长公主却只能在悲愤中眼睁睁地看着妹夫缪拉夺下托斯卡纳，看着他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长公主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前往里窝那或者卢卡

避难。长公主听从了我的建议，她准备带着她的丈夫菲利克斯一起撤离托斯卡纳。

对于即将在巴黎上演的大溃败而言，托斯卡纳的溃败不过是一次小型预演。因为托斯卡纳的战场上没有流血，而佛罗伦萨人也只是在口头上嘲笑了一番当局者。比如，在新政府当值的巴乔基认为他自己应当改一改自己的姓，于是他就把巴斯卡尔改成菲利克斯（高兴的意思）。由于在意大利语中，巴斯卡尔这个姓就像笨侬在法国那样滑稽，于是，佛罗伦萨人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当您是菲利克斯的时候，我们是巴斯卡尔；当您是巴斯卡尔的时候，我们将会是菲利克斯。

佛罗伦萨人对当局者的嘲讽是不受地域、职务等限制的，就连佛罗伦萨的省长也不能幸免。这位省长是我的一个密友，在征兵工作中，他要求得非常严格，只要有人需要接受再教育，他就会当场打发这些人离开，并且每次都会加上这样一句话：你只适合走路。于是，当法国政府撤离托斯卡纳时，有人在他的门前写下这几个大字：你只适合走路。



长公主爱丽莎





爱丽莎的丈夫菲利克斯

当我和长公主撤退到卢卡的时候，巴乔基依然守卫着佛罗伦萨和沃尔泰拉的城堡。至于我，我每天都期待自己能够被委以重任，参与到佛罗伦萨和罗马联邦国的撤退行动中。长公主也希望能够以此来和缪拉进行谈判。但是，她非常不放心小拉加德，因为他是拿破仑派来的警察局长（小拉加德当年的发迹也有我的一份功劳），长公主甚至怀疑他私自向拿破仑汇报我们的行踪。有一天，长公主很坦率地跟我说："我希望我们能尽快拿到这个公安局长的公文包，看看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由于小拉加德的秘密文件对我具有更大的诱

惑，因此，我并不反对长公主想让小拉加德前往巴黎，并暗中派人在路上劫持这位公安局长的想法。此外，我也想看看这个自称坦率和善良的人，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当小拉加德返回比萨的时候，他被一群蒙面人拦下了，并被迫下车。其中两人挟持他，剩下的人则拿走了他车上的所有东西——珠宝首饰、金银财宝，当然最重要的是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当“劫匪们“返回卢卡，向我们汇报这位公安局长的悲惨遭遇时，我们都禁不住大笑起来。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需要马上冷静地应对此事。然而，我们所有人都被骗了，因为所谓的文件不过是几期《箴言报》，而真正的文件已经被小拉加德藏在马车的底部。所以，除了丢了些珠宝首饰和虚惊一场外，这位小拉加德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与此同时，缪拉已经准备拿下整个意大利。他不停地给我写信，向我解释说：“只有加入反法同盟，我才能保住王位，同时，我也希望你能致信拿破仑，向他汇报一下意大利的情况。”我回复他说：“在这一点上你大可以放心，即使你不劝我，我也会向陛下说明实情的，因为在我看来，掩饰就是背叛。至于当下，你一定要抓紧军备建设，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为你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既然你心意已决，我衷心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从现在起，任何犹豫都是致命的，因为任何犹豫都会引来猜忌。但是，现在你可以用自己国家的力量来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运动。不过，由于意大利的乡村还没有起义的动向，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煽动人民起义，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我也希望你能注意一下。对于起草关于自由宪法的邀请，我建议你不要操之过急，毕竟那不勒斯民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观点。此外，我担心‘立宪’二字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把‘立宪’当成他们不服从命令的借口。”

到达波河南岸后，缪拉的军队便迅速占领了罗马和托斯卡纳，缪拉还正式宣布支持奥地利，并决定与拿破仑为敌。然而奥地利却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因为在1月11日，缪拉和内伯格伯爵签下的条约还没

有得到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有必要亲自和缪拉谈一谈，于是我们决定在摩德纳[(1)]会面。我想借双方会面的机会让缪拉明白，既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么他就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只要他的性格能够像他的内心一样坚定，有敢闯敢冲的勇气，那么他在意大利的力量就一定会强于盟国。看他还在犹豫，我就告诉他我从巴黎获得的最新消息。听完我说的消息后，他向我透露了宣战书的内容，并且在我的建议下进行了修改。这份在博洛尼亚[(2)]拟定的宣战书是这样写的：

> 一直以来，我之所以和拿破仑并肩作战，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拿破仑大帝是为了法国的和平和幸福而战。但今天他打破了我对他的所有幻想，因为拿破仑想要的只是战争。现在，如果我依然和他站在一起，放弃加入能给你们带来独立的盟国，那么这将背叛我的祖国，也将背叛你们的祖国。
>
> 我知道，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不停地散布着虚假的爱国情绪。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只有臣服于拿破仑疯狂的野心，才算得上崇高和骄傲。战士们！现在的欧洲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条路是信仰、道德、公正、节制、法律、和平和幸福；另一条路则是迫害、暴力、独裁、战争和千家万户的葬礼。你们选择吧。

我和缪拉还一起处理了一件与我相关的事情。作为罗马总督和伊利里亚总督，我向缪拉提出补偿法国十七万法郎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入侵罗马联邦时，缪拉抢走了各联邦国的财政税收，所以现在他应向法国赔偿这笔钱。缪拉同意了这个要求，并马上下达了相关命令。虽然偿还款没有立即到位，但是，当我离开意大利的时候，我可以说，在这场战役中，我没有赔钱。

当我回到卢卡的时候，长公主还在焦急地等待着事情进展的情况。我把缪拉最后的决定告诉了她，同时也表达了我对缪拉实战能力

的怀疑——以他的能力，他是否能吸引联军的注意呢，此事真的有待观望。此外，奥地利和英国一直在指责他过于偏袒“法国”，尤其是过于考虑拿破仑的感受。再加上佛罗伦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缪拉是法国的卧底，最后，他一定会背叛意大利。有人还在责怪那不勒斯军队的不作为，认为他们并没有像奥地利所希望的那样出兵对抗欧仁·德·博阿尔内。我告诉长公主：“在我离开摩德纳的时候，缪拉非常难过，他知道自己当下的棘手处境。然而此后，我和缪拉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困难。”

没过几天，我便接到了战事部长的急件，急件里面包含了拿破仑关于军队撤出罗马和托斯卡纳的指示。而这些指示里还附着拿破仑写给那不勒斯国王缪拉的一封信，并且他命我负责把这封信转交给缪拉。与此同时，我打算和缪拉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向他传递一些秘密信息（根据实际情况，我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内容）。因此，我马上动身前往缪拉所在的博洛尼亚。从卢卡到佛罗伦萨的路上，我基本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是，当我到达佛罗伦萨后，新政府就向我指出，我既不能继续前进，也不能在佛罗伦萨逗留，还要求我前往普拉托等待国王缪拉的回复。由于当时的普拉托已经爆发了人民起义，所以，一回到卢卡，我就决定派出使者和缪拉进行联络。很快，我便收到了缪拉的回复，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吩咐手下的将士协助我们的撤退。

现在，拿破仑赋予我的权力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法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里窝那，而留在比萨的部分军队还在顽强抵抗。那不勒斯大将明铎所部则驻扎在佛罗伦萨和里窝那之间，因为法国军队和那不勒斯大将明铎所部摩擦不断，所以双方的敌意变得越来越重。得知此事之后，我立刻前往比萨前线，和驻守的哨兵说明了情况，并命令比萨所有的法军放弃已经占领的城池，撤回法国。同时，我也下令让里窝那和佛罗伦萨的护卫队撤回热那亚。

几天之后，我和那不勒斯驻托斯卡纳总督勒奇一起商讨关于撤出

罗马联邦的具体事宜——法国让出圣天使城堡(3)和奇维塔韦基亚(4)，并乘坐轮船撤回马赛，而那不勒斯则需要承担相关的交通费用。

---

(1) 摩德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

(2) 博洛尼亚是一座意大利城市，位于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也是艾米利亚-罗马涅的首府。博洛尼亚也是意大利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3) 圣天使城堡是意大利罗马的一座城堡，该建筑位于台伯河畔，邻近梵蒂冈教廷。圣天使城堡首先作为阻止西哥德人和东哥德人入侵的要塞，然后被当作监狱使用，最后改建成一座华丽的罗马教皇宫殿。公元6世纪，教宗格列哥里一世巡游经过此地，见到天使长弥额尔显像，城堡因而得名。现在圣天使城堡已成为一座博物馆，也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之一。

(4) 奇维塔韦基亚是意大利罗马省的一个海港镇，位于第勒尼安海沿岸。

第30章　拿破仑被迫退位

精彩看点

和欧仁·德·博阿尔内的密谈——离开意大利——抵达里昂——里昂政府的例会——抵达巴黎——拿破仑已被迫下台——临时政府——波旁王朝复辟

就这样，我在意大利的使命结束了。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回到让我牵肠挂肚的祖国了。我非常担心我的祖国，因为反法联盟已经攻入了我那让人心疼的祖国，并且在慢慢地逼近首都巴黎。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在罗日耳大败拿破仑之后，联军没有直逼首都巴黎？我觉得，如果联军立即决定拿下巴黎的话，那么流血牺牲的人数便可以减少很多。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联军还没有掌握巴黎的情况，而原本反对摄政府的内阁正在四处周旋，同时，内阁也希望能联合其他力量达成其他结果。至于夏第戎大会，我推测，它最后的结果应该会和布拉格大会相差无几。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场悲剧即将落幕。(1)

启程前，我专门拜访了欧仁·德·博阿尔内的总将沃尔特。当时，他正在准备向明乔撤离。得知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向法国宣战的消息时，他曾派兵向奥地利发起进攻。我和欧仁·德·博阿尔内有过两次私下会面。在这两次会面中，我对欧仁·德·博阿尔内说："在这里继续发动战争已经没有必要了，巴黎才是最终的战场。依现在的情形，遵照拿破仑的指示，把军队迁至孚日山脉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必要了。一方面，现在已经为时已晚，另一方面，一旦翻过阿尔卑斯山，你就会永远地失去伦巴第大区。"



第六次反法同盟中的阿诺之战



第六次反法同盟中巴伐利亚步兵

欧仁·德·博阿尔内告诉我说：“缪拉曾经私下建议我和他的队伍会合，等法国军队撤离后，一同瓜分意大利，不过我没有同意这个提议。因为缪拉的反叛让我的处境非常尴尬，并且如果缪拉开始积极地为奥地利效力的话，我怕我也坚持不了多久。”

我宽慰欧仁·德·博阿尔内说：“以我对缪拉的了解，此人优柔寡断、游移不定，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况且他支持意大利独立的想法也已经引起了盟军的不满。”

我和欧仁·德·博阿尔内秘密商谈期间，拿破仑的特使、此前和欧仁·德·博阿尔内交情不错的菲普勒抵达了他的驻地。这次，菲普勒是带着拿破仑最新的战报来的——此前不久，在布里[2]和蒙特罗[3]，拿破仑刚刚取得了两场胜利。菲普勒夸张地宣扬了这两场胜利，希望以此来激起欧仁·德·博阿尔内的斗志，并且尽量拖住缪拉替盟军作战的步伐。与此同时，欧仁·德·博阿尔内的副将塔什公爵也前来报信，并转述了拿破仑的原话：

“你快回到欧仁·德·博阿尔内的身边，告诉他我是怎么收拾这些人的——我就是用鞭子抽打这群‘野鸭子’的。”

得知这样的消息，所有人都非常振奋。我把欧仁·德·博阿尔内拉到一边，对他说：“这种言词只能鼓动那些容易冲动的人，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能看出，拿破仑的帝位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目前法国缺的不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臂膀，而是能够让这些臂膀挥舞起来的情感。拿破仑已经和国家渐行渐远，他的独裁和专制已经扼杀了帝国的共和精神。”向欧仁·德·博阿尔内表达了我的观点和一些建议之后，我就动身前往里昂，离开了被四国（法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和英国）军队占领的意大利。因为这一次，本廷克勋爵真的在里窝那登陆了，这也意味着本廷克勋爵既否定了拿破仑在托斯卡纳的地位，也不承认爱丽莎在这个地方的统治。一登陆意大利，英国人就马上和驻扎在博洛尼亚、摩德纳和雷焦的那不勒斯军队会合。

在我离开之后，意大利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因为阿尔卑斯山以外基本没有任何法国统治机构。我还很担心欧仁·德·博阿尔内和缪拉，虽然他们两人勇气可嘉，但他们都缺乏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意大利人眼中，这两人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再加上如今他们两人已经分道扬镳，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更好地领导留在意大利的法国力量。

除此以外，我还放心不下法国本土的情况。说到底，意大利的命运还是取决于拿破仑和欧洲各君主国之间的激烈较量。而盟军正在竭尽全力地把拿破仑困在塞纳河和马恩省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于三月初抵达了里昂。里昂的人非常担心这场战争的结果，里昂市市长、警察局局长以及几位副将认为保卫里昂便是在保卫巴黎，于是他们决定保卫里昂。很快，他们便沿着里昂筑起了一道城墙，并竭尽全力地想激起市民的爱国热情——比如说里昂市市长邦迪便在民众间四处游说已经被战争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里昂人，以便能把人数多达四万五千的德意志军队阻挡在帝国第二大城市之外。巴黎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到达里昂的当晚，我便被允许参加里昂政府的例会。每天晚上，

里昂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员都会聚集在奥热罗将军家里开会。一走进奥热罗将军的家，我便发现这里根本容不下任何消极的抗战情绪。除了市长、阿拉贡麾下的几位将军以及公安局总负责人索勒涅以外，剩下的人都决定坚定地为拿破仑效忠。我直言不讳地向大家说明了那不勒斯国王缪拉的决定，以及一百万大军正涌向巴黎的现状。同时，我还指出，按照当前的形势来看，除了动用政治求和手段外，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由于我带来的消息和我的观点完全违背了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的想法，所以他们毫不含糊地谴责我，并且让我立刻离开里昂。那个时候，奥热罗将军下令让我即刻离开里昂，这个坚定的革命者啊，他根本没有听进我所说的保全革命成果的话。尽管我的内心非常痛苦和遗憾，我还是决定离开里昂，离开多芬，前往瓦朗斯，回到我心心念念的巴黎去。



19世纪的里昂

在瓦朗斯，当我得知阿图瓦伯爵刚刚抵达沃苏勒的时候，香槟地区特鲁瓦的保皇派也开始蠢蠢欲动。没过几天，我又陆续得到了昂古莱姆公爵抵达威灵顿勋爵辖区的消息，紧接着便是法国连连溃败的消息——苏尔特在奥塔斯战场上失利，拿破仑在拉昂战场上失利，昂古莱姆公爵已经进入波尔多。而尚距巴黎一百里之外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即将爆发的政变！很快，奥地利人占领了里昂，奥热罗将军只

好带着麾下的将士退到瓦朗斯。而我，则退到了阿维翁，但我时刻牵挂着巴黎，因此，我一直等待着时机。然而，时断时续的信件以及难以为继的沟通和猜测，让我不得不犹豫。如果我当时知道盟军还没有攻破巴黎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尽全力回到那里的！

在阿维翁，我没有任何政治身份，只能暂时居住在一间公寓里。一年后，布鲁诺将军也是在同一间公寓被暗杀的。在这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而我则尽己所能地向我所遇到的各团体和各立宪机构说明现在的情况——意大利的缪拉正在着手推翻帝制。不像在里昂或者在瓦朗斯，阿维翁的人民都希望拿破仑下台。最终，3月31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我这里。由于不得不绕道图卢兹和利摩日，因此直到4月初，我才抵达巴黎，而这已经太晚了。我不在的时候，拿破仑已被迫下台，临时政府也已经宣告成立。紧接着，波旁王朝复辟，他们当着我曾经冒犯过的大公的面，废除了我之前关于摄政府的所有规划。虽然我知道这些大公肯定会以仁厚之心来面对我曾经的冒犯，但这些人坚守的原则与法理是完全不相容的。



拉昂战场上失利的拿破仑

此后，我听到朝中有人议论：如果3月31日政变时，奥德朗特公爵在场的话，他会不会成为临时政府中的一员呢？如果他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那么3月31日革命的结果又会如何？

(1) 莱比锡之战后，反法联盟针对如何处置战败国法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夏第戎，英国、俄国和奥地利达成协议，三方不得私下和法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时，反法联盟建立一支十五万人组成的联军，并由英国提供每年一亿两千万法郎的军队补给经费。

(2) 布里是法国皮卡第大区埃纳省的一个市镇，属于拉昂区拉费尔县。

(3) 蒙特罗是法国卢瓦雷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东部，属于蒙塔基区。

第31章　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

精彩看点

关于1809年安特卫普事件——写给拿破仑的信——写给阿图瓦伯爵的信——给革命党人的建议——写给路易十八的信——新政府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修改宪章

下面，我要向你们坦承一些秘密。我自认为我不能把这些秘密割裂开来，所以我决定在这里跟你们把这些事情讲明白。首先，我要向大家承认一件事，1809年的奥地利战争以及英国在安特卫普的突袭，不过是为了以法国拯救法国，逼退拿破仑而设计的一些最初方案。第二，我还需要坦承的是，我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因为当时只有我有能力让法国和欧洲和解，也只有我才能把大家带向一个理性的政府。第三，这次行动还得到了两位政要的协助，这两位政要分别是领导着维也纳内阁的梅特涅公爵和主宰着詹姆斯内阁的威尔斯利侯爵。我曾经派爱尔兰军官法根先生专门拜访了威尔斯利侯爵，因为我认为当时只有这个灵活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第四，在推进这项行动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和国内另一位公爵里应外合，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塔列朗公爵。在苏瑞尼的沃代蒙公主的家中，我们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我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一致，并且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也不谋而合。然而讽刺的是，我还是没有逃过这位贵族的毒舌。当他的亲信询问他对于我的看法时，我的这位新盟友塔列朗公爵如是说：“是的，是的，我知道富歇，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此后，不断有人向我提起这句话。但我并不觉得这句话冒犯了我，因为在我心中，政治的考量远远超过我的自尊心。

另外，我认为我还需要和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元老S先生建立联系。通过自己的旧时好友马赫，S先生和当时的国务秘书走得很近。自从布里安[1]垮台以来，我在内阁的眼线就只剩下一些下属人物，这样一来，我就很容易遗漏掉重要的情报。那么，我该如何才能在内阁中安插我的眼线，并且保证他们能长期为我所用呢？当我发现参议院有一个空缺名额时，我知道机会来了。在我的操作下，S先生获得了该职务。从此以后，在参议院，我多了一位朋友，同时，在拿破仑的内阁中，我也多了一双眼睛。

行动还缺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护卫队统领M元帅。要知道，一直以来，M元帅和我的立场都是相左的。虽然时任加泰罗尼亚部队总指

挥的M元帅身居高位，但他却没有足够的财力应付军备开支。知道他的困境之后，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我征得了拿破仑的同意，把自己可支配的8万法郎全部寄给了他。

这样一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所有之前与我为敌的人都成为了我的朋友。目前，我手里有两位大臣——内务大臣和公安部长，有供我差遣的护卫队，还有一批安插在重要岗位上的眼线。在民意方面，我还获得了老共和党人以及一批坚韧的保皇派的支持。在保皇派看来，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这就是当拿破仑深陷西班牙和奥地利两大战场无法自拔的时候，我手中所拥有的权力。或许是拿破仑多疑的性格猜到了什么，又或许是有人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总之，我瞬间便垮台了。而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因为有这样的内幕护身，所以我获得了民意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府成员的相助，所以我敢说，如果3月31日我在巴黎的话，我的影响力以及我对这些人底细的了解，会让这场政变的结局呈现另一番模样。

比起迟疑并且神秘的塔列朗，果敢的我才是当时政府需要的人才。而塔列朗这个当时身居要职的人恐怕必须和我搭乘同一辆马车，而我也会告诉他我的政治想法和计划。我会对塔列朗说："即使有萨瓦里经营的公安部，即使有冈巴塞雷斯管理的政府，即使有约瑟夫掌握的军队，即使有懦弱的参议院，只要我们两人联手，就一定可以救活帝国这具已经奄奄一息的革命之身。而那些被贬黜的贵族也只会想着明哲保身。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像我之前一直谋划的那样，在外国势力介入前建立摄政府。也只有这样，革命的成果才能得以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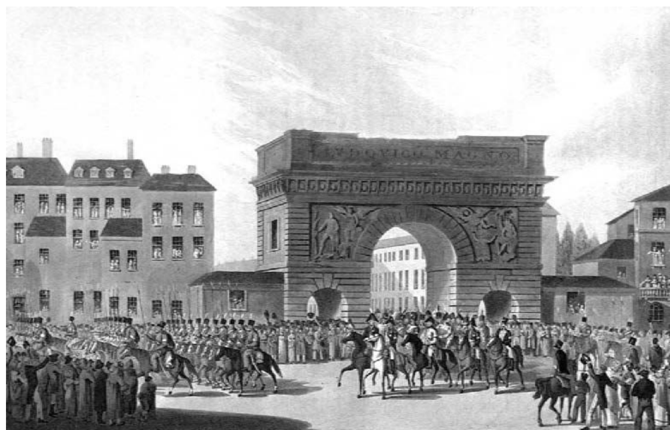
然而，命运却安排了另一场结局[(2)]。当时的拿破仑，就连身在巴黎的妻儿也要算计，又怎么会让我回到巴黎呢！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冈巴塞雷斯接到了拿破仑这样的命令——一旦盟军出现在巴黎，他要立马护送皇后和罗马王前往布卢瓦。他这样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摄政府政变。然而，等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攻进帝国首都时，

他却还想着摄政府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以塔列朗为核心的政客们已经把持了朝堂，临时政府已经宣告成立，而我也已经回到了巴黎。

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上帝啊，我该如何自处？他们为何要处心积虑地让我远离朝堂？我怨恨着、自责着。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法国王子回国了，人们夹道欢迎，巴黎各处都飘扬着象征王权的旗帜。我承认，面对这种景象，我的内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我没有掩饰自己的自责和悔恨，就连在参议院，我也没有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还敦促参议院向S.A.R.先生派出一支代表团。我知道自己已经无颜成为代表团的一员，我能做的只是尽我所能地说服那些想要束缚、捆绑波旁王朝的同事们。



巴黎城里的法国守军



反法同盟军进入巴黎

这一个月来，我的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拿破仑还盘踞在易北河厄尔巴岛[3]，而这股力量很有可能会威胁法国的未来。于是，我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我想让历史来评判它。

> 陛下，当法国和欧洲的大部分为您所有时，我不断鼓起勇气想告诉您实情，可如今，我更担心我的坦诚会不会伤害到您。但是，我必须要告诉您实情，因为只有实情才是对您有用的。
>
> 您已经答应从此隐退厄尔巴岛，我一直都在注意观察人们对于此事的看法。我认为我有义务告诉您，在欧洲，这样一个岛和您的身份不相配，这几亩地也满足不了一个曾经拥有庞大帝国的您。
>
> 因此，我希望您能考虑这两个建议，并且能考量一下它们的可实施性。
>
> 厄尔巴岛紧挨着非洲、希腊和西班牙，离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岸线也很近。风一刮，您就可以搭条小船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然而，现在的欧洲还没有彻底和平。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下，一旦出现像您这样的天才，那么欧洲各强国必定会恐

慌。即使您没有做任何事情，人们也会强加给您各种罪名，他们还会认为您什么都做错了。因为对各国政府来说，引起恐慌就是您最大的过错。

现在的国王希望建立以法度为基础的政府，但您也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些围在皇帝宝座周围的人会给真相多少空间。

现在，您虽然已经坐拥厄尔巴岛，但您的内心不会时时刻刻想着夺回您丢掉的大片山河吗？这样的景象，也许只能给您带来无尽的悔恨。但我想说的是，现在的您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有人说您甘于退居厄尔巴岛，是因为您想借此东山再起。还有人说，厄尔巴岛的礁石就是您撼动欧洲的杠杆。

我请求您允许我说出我的想法：现在，您最大的安慰和荣耀便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下去。对您这样的一位伟人来说，北美各国是最好的庇护所，那里刚刚建国，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而且那里的人们只会敬仰您，而不会惧怕您这样的天才。因为北美那边也有很多像您这样的天才，例如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杰斐逊[(4)]。这些人，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新的王国。在那里，您会得到公正无私的法律的保护；在那里，您可以像他们一样思考，像他们一样投票参政，像他们一样为自由而努力。

给拿破仑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也给阿图瓦伯爵写了一封信。而到时候，阿图瓦伯爵会把我写给拿破仑的这封信转交给他。下面是我写给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您好！我希望我们可以为拿破仑大帝做最后一件事。作为他的部长，我和他一起工作了十年。我刚刚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认为您应当知晓。我完全不必费心他的利益问题，因

为现在的欧洲各国已经对他心怀怜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征战和动荡，对于法国和欧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能够得到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想要让人民真正得到和平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我们有再强大的根基，只要拿破仑大帝还留在厄尔巴岛，人们的内心就无法得到彻底的安宁。对于意大利、法国和整个欧洲来说，留在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就像是在那不勒斯旁边守候着的维苏威火山一样。然而，我认为，到了北美新世界后，他就不会再掀起什么风云了。

我想，收到这封信后，只要细心想一想，阿图瓦伯爵便不会把我划入拿破仑的追随者们当中了。

对于希望听到我意见的各位部长们，我一直对他们重复着这样的话：

请你们对所有的错误保持沉默，把这二十五年间发生的所有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抛开之前政府做的不正确的事情，用你们的品德、智慧和能量去克服困难吧。在政府中，如果新国王没有任何依靠的话，他也就失去了权威，而人们对他的敬仰也会慢慢减弱，直到消失。请谨慎对待党派之争，避免参与其中。这看起来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实际上它关系重大，因为它关系着新的国家的施政纲领，而旗帜的颜色将决定执政的方向。



签署退位诏书的拿破仑



签署退位诏书后颓丧的拿破仑



拿破仑与皇室卫队

在我给出的建议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这场革命的领袖、国王。因为对于复辟的王朝来说，这些人的支持几乎和宪章同等重要。我也知道，我在保皇派和革命党人中有很多的支持者，而反对我的人则是拿破仑主义者以及萨瓦里的残余势力。我没能实现我一直以来的夙愿，没能参与推翻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因为这种遗憾，在面对我曾经忤逆过的庄严皇族时，我的内心颇不平静。我希望自己能尽我所能为新的王朝效力。在我的支持者看来，只有我才能抚平、联合各种政治派别，确保波旁家族的安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日尔曼镇上的大多数人都持有这个想法。

我开始和朝堂上的几位重要人士取得联系，其中一位便是我的朋友玛鲁埃。他刚刚接到国王的命令，从图尔赶回巴黎，出任海军部长。他把我给他写过的信件都摆在了国王的面前，就像我给那些王权支持者们建议的那样，我建议他不要将新旧势力对立起来，不要将国家和海外贵族对立起来。当然，我的这些建议可能并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只会随波逐流。

(1) 布里安（1769—1834），外交官、政治家。1785年，布里安和拿破仑一起进入香槟军事学校学习，成为私人好友。1801年，在拿破仑远征意大利之时，布里安受到重用，成为国务委员。同年，由于参与走私而被革职。

(2) 经过阴谋、战争、欧洲皇室的绞杀，也许天意最终还是垂青了法国的王公贵族们。现在，在查理十世和路易十八的治理下，这一切终于慢慢愈合。——原注

(3) 厄尔巴岛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海岸线外，第勒尼安海和利古里亚海之间，是托斯卡纳群岛的主岛，也是仅次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意大利第三大岛。根据1814年签订的《枫丹白露条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流放至此，当时此岛为法国领地。

(4) 此三人几乎与拿破仑同时，并称为美利坚“开国三杰”，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的领导人。华盛顿（1732—1799）领导了独立战争，战后为美国首任总统，杰斐逊（1743—1826）为第三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1706—1790）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与约翰·亚当斯、杰斐逊等人一起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此外，富兰克林还曾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任大使期间，他成功取得了法国的支持，为美国最终赢得独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原注

第32章　百日王朝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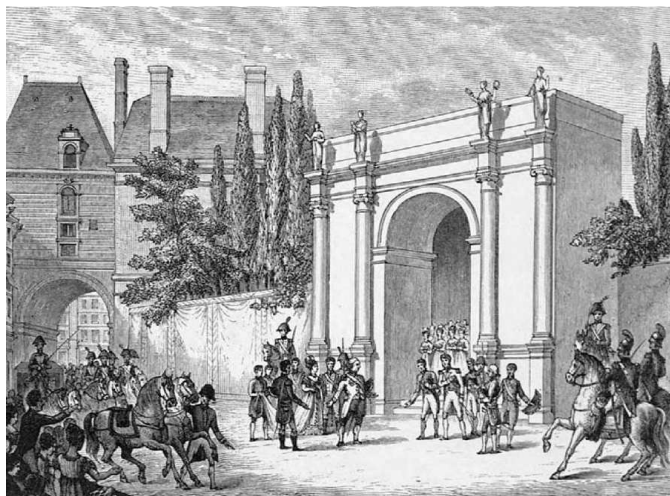
厄尔巴岛积极备战——缪拉在意大利称王——缪拉起兵呼应拿破仑——拿破仑的回归——会见艾斯卡尔伯爵——拿破仑重新回到杜伊勒里宫——再次出任公安部长——废除新闻审查制度——恢复拿破仑帝国——昂古莱姆公爵事件

6月底的时候，路易十八命布拉卡斯前来和我会谈。对这个人的到来，我的心中没有任何波澜，甚至有些许抗拒。我知道这位部长周围都是一些极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是与我为敌的人，比如萨瓦里、布里安，还有之前巴黎公安局局长杜波瓦，又比如一些好卖弄是非的女人——如P夫人之类。这些人的某些言论一定会影响布拉卡斯的判断。再加上这位新人没有经验，处事生涩，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发困难。

我很清楚，不久之后，路易十八便会知道我对他的新部长有所不满和保留，于是我决定提笔给布拉卡斯写信。我告诉他，在现在的法国，人们根本就是一盘散沙，比如人民担心重回封建制度，而旧时的封建主们则担心他们的领地，对于那些政治立场鲜明的人来说——如波拿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他们又担心自己的安危。在军队里，人们难过的是希望、荣耀的破灭，而在立宪党人那里，他们惊讶的却是国王希望他的王位能够世袭。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军队的不满了，我可以向您解释其中的缘由。将士们，尤其是通过征兵入伍的将士们，心里想着的必定是他们曾经所效劳的国家和政府，他们会因为这个政府的强大而高兴，也会因为它的落寞而悲伤。而我更想说的是，在这种不满情绪中，还有他们对拿破仑军事天才的仰望和崇拜。



路易十八



雕版画：路易十八返回巴黎

在信中，我是这样写的：“二十五年来，这个国家已经强大到足以去撼动整个世界了。所以，我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让这样一个国家回归到平淡温和的岁月。不要试图去阻止这种情绪，同时我们还要给这种情绪提供别的出口。现在，我们的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各种产业、发展贸易、破除所有的经济壁垒，还要发展文艺事业、科学事业和一切可以增强人民智力和能力的事业。十九世纪的帷幕才刚刚拉开，这个世纪，应当是路易十八的世纪，正如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一般。”

在信中，我还提到了许多关于促进新闻自由、个体自由的事业。在信的最后，我写道：“有很多法国人为波旁家族的事业做出了牺牲，现在，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这些人也回来了。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领地，看起来，激烈的冲突似乎在所难免，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战争。好在，有一位足够明智的部长向两院提出，以经济形式弥补这部分人的损失。我希望两院能够通过他这个提议。”

但是，如果提出这些想法的人并没有实权，那么这些建议也只能是形同虚设。我承认，在保皇派中，我有很多的支持者，而如今这些

人也已经成为供职于各个部门的政府人员；我也承认，曾经有人给我机会，让我出任部长、掌握局势，然而，因为布拉卡斯的原因，或者说因为萨瓦里的原因，我和这个机会失之交臂。拿破仑的忠实信徒萨瓦里对我的复出充满了恐惧，而关于我的恶言恶语，朝中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看到这样的情形后，我决定先带着我的家人回到我的领地菲利埃，在那里等待时机。

我已经提前看清了一点，现在，政府的操控权落在了一些软弱无能的人手里，而这些人将会沿用那些错误的政治理念，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走上错误的道路。

关于新政府模糊不清的定位，我做了一些严肃的思考。作为政治家，我清楚地知道波旁家族希望和平复辟，因为政府运作机制并没有改变。如果非要说有，那大概就是权力变得更加个人化了。另一方面，在这十二年里，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昔日的教士、贵族、地主都没有逃过社会的巨变。如果说波旁家族复辟是人心所向的话，那么他要权衡的利益却和以前大不相同，而这便是波旁家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现在的法国，支持和反对复辟的力量可谓是势均力敌。路易十八要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现在，在革命中做出过贡献的人希望和贵族共治天下。这段时间以来，这些人一直都在寻求这样的保障，而他们也确实以为他们从路易十八进城前的宣言中找到了这种保障。

然而，拿破仑的垮台来得太突然了，以致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都没能来得及转移他们的财产。掌权后，路易十八马上就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政府高官那里，这样的举措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当然，新政府将要面临的最大危机依然在军队中。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没有立刻解散当时的军队，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些老兵、这些在法国的战俘依然效忠他们之前的君主，也就是拿破仑。

新的政府还修改了宪章。这种行为更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因为自从革命以来，宪章精神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拿破仑的回归还只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想象的话，那么现在，它已经可以称为军队中的主流思想了。于是，各种秘密便悄悄地侵入了军队。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曾经担任过要职、如今依然有众多眼线的人来说，想要弄清楚这些阴谋并非难事。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一位曾经颇具影响力，如今却也日渐没落的政治家。他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加入一个政治团体。我直接在邀请函上写下了我对他的答复——“我不会在温室里工作，对于所有不在阳光下的事物，我都无能为力。”对这句话，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然而，这个秘密团体还是组建成功了。在那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定下了盟约。我非常清楚，国家即将面临一次新的危机，而拿破仑的追随者们就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参与，这些行动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但鉴于我对这个新政府长久以来的种种不满，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想为这个政府做任何事情。于是，带着不同方案的说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的方案无非就是废除现在的国王，由一位大公或一位贵族来执掌政权，或者成立临时共和国。有一位军方代表向我提议说让欧仁·德·博阿尔内担任新政府总统。于是，我写信给欧仁·德·博阿尔内，询问他的意见，然而我得到的却只有一个含糊的回应。在这期间，所有的革命党人都聚集在了我和卡诺身边。艾克斯事件也表明，在巴黎，有一批数目可观的人正在策划着拿破仑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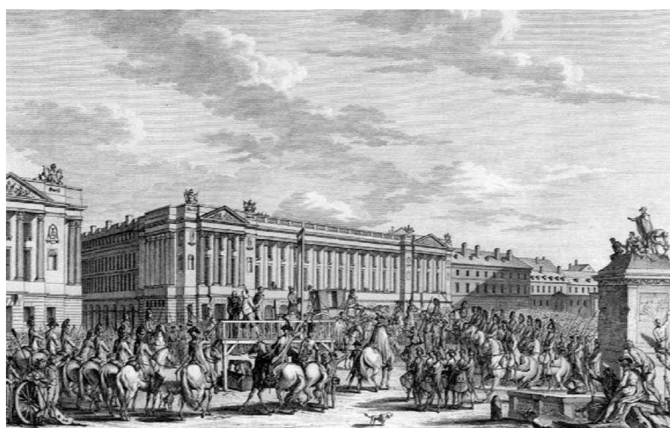
冬天快到的时候，我回到了首都巴黎。那时，新政府中还有两股势力在坚决反对宪政。这一次，英明的国王派勒阿弗尔公爵前来与我沟通。这位崇高而又坦诚的公爵马上赢得了我的信任，我向他完全吐

露内心，倾诉了我隐藏已久的心里话。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从来都没有如此畅快地卸下过心里的包袱。我向这位公爵讲述了那天投票的真实情况，向他讲述了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事情。我说，我真的非常后悔此事。当时，听到我这番话后，公爵的眼睛里也噙着泪花。有人为我们的政治会谈做了笔录，并将其当作报告呈给国王。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医治国家创伤的良药，危机在所难免了。

当时的我夹在两派人中间，一边是不会给我任何权力和荣耀，对我将信将疑的波旁家族，投靠这一派人的话，我就背叛了我自己的政治立场。另一边是革命党人，因为这些人，我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和荣誉。虽然当时的我还在犹豫，希望可以远离党争，但我却不由自主地投入革命党人的阵营。从内心来讲，我并不是很想对波旁家族宣战，我反对的仅仅是他们对宪章的践踏。然而，在革命党中，有一部分拿破仑的追随者又让我很不舒服，他们控制着军队，也间接控制了所有人。



卡诺



雕版画：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我之前的一位同事蒂博[1]告诉我说厄尔巴岛正在积极备战，而他也参与了这项行动。我知道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因此，我同意了蒂博的建议，开始联络拿破仑的追随者们，并让他参与了由雷诺、冈巴塞雷斯和达沃斯特组成的秘密会议。但我也提出了我的条件，新的政府必须废弃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政府。我们也同意了，政变之后，所有人将平分权力。

和蒂博拟好行动方案之后，我马上派出了使者，催促缪拉在意大利称王。与此同时，秘密会议决定派R博士前往厄尔巴岛。里昂和格勒诺布成为南方的两大据点，在北方，尔隆和勒菲弗将率领军队和波旁家族一决胜负。大功告成之后，我们将成立由我、卡诺、科兰古、拉斐特和N组成的临时政府。[2]

我们此次联盟的目的是在混乱中重新掌权。然而，缪拉却率先起兵了，当时，为了保住他在意大利的地位，他居然罔顾他和奥地利的协定。很明显，缪拉是冲着国王路易十八来的，不久之后，在路易十八的朝堂上，此事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缪拉的三万大军便向阿尔卑斯山和格勒诺布挺进，这可以说是为拿破仑的回归打了头阵。与此同时，拿破仑已经在戛纳[3]登陆了。推翻波旁王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然而，路易十八的朝堂却依然在掩耳盗铃，不愿意承认这一切。

3月20日，拿破仑回到了巴黎。在此之前，我还要记录这么几件事。



第六次反法同盟胜利后为庆祝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而创作的漫画，其中不乏讽刺意味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



拿破仑乘坐的“无常”号双桅横帆船

说实话，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无意造反。我只是希望杜伊勒里宫能够主政新政府，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人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能够担此重任的人。不管是在路易十八的朝堂，还是在巴黎或者外省，所有人都支持我成为这个人。当然，我也有一些竞争对手，但我从没有放弃过，直到最后一刻，我依然试图在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法，一个可以避免拿破仑回归的方法。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只做了最小范围内的妥协。得知拿破仑在戛纳登陆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这个联盟里也有拿破仑。也就是那时，我才清楚我们联盟的三个目的：迎接拿破仑回朝、赶走国王、营救在维也纳的玛丽·路易皇后和罗马王。考虑到军队已经完全反叛，那么迎接拿破仑回朝便成了最容易实现的目标。营救玛丽·路易皇后和罗马王的难度应该也不算太大，然而赶走国王和波旁家族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毕竟，皇室的兵力也不可小觑，而勒菲弗将军能否打赢这场战争还是一个悬念。

得知拿破仑即将抵达里昂时，我觉得我有必要和国王路易十八亲自谈一谈。毕竟自从波旁王朝复辟以来，这个家族一直都很尊重我。然而我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允许，不过国王路易十八还是派来了两位绅

士和我沟通。我告诉他们，路易十八的王位岌岌可危，如果朝廷可以答应我的条件的话，那么我马上就可以阻止厄尔巴岛上的行动。我的提议和当时其他派别的想法不谋而合。和我一样反对拿破仑专制的爱国者也已经开始行动。这些人以德布罗意、拉斐特、阿让森、弗拉格和本杰明为首，他们向国王提出了以下条件：重新选举部长，在两院各增加四十位革命党人的席位，并任命拉斐特为国民战事总指挥。另外，他们建议国王派遣爱国者到外省的军队中去鼓舞士气。对这些计划的内容，我并不陌生，我也知道，事成之后，我会升任部长。但我也清楚，只有联合所有的革命力量，只有唤醒所有人心中对自由的渴望，我们才能够抵挡军政府的回归。当国王的部长向我询问如何抵挡拿破仑时，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这些话，我只向国王本人说。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的方法是可行的。作为交换条件，我提出任命路易十八的长子为国家护卫队首领以及恢复我对国家事务的权力。然而我的请求被拒绝了，我也被迫不得不支持我本来想抗拒的那一派。

拿破仑的军队步步紧逼，杜伊勒里宫告急，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我。几位保皇派请求我至少见一见国王的兄弟艾斯卡尔伯爵。我答应了，并提出在晚上偷偷前往，毕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在另一派中的声誉。艾斯卡尔伯爵恳切的话语、殷勤的接待、崇高的情感都让我感到非常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早些拜访他。我不得不告诉这位坦率而忠诚的亲王，现在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无法再为国王效力了。和亲王告别的时候，我大声说道：“请您一定保护好国王，我会保住君主制的。”

但谁又能想到，这次会面之后，立刻就有人下令逮捕我。更奇怪的是，对于此事，国王却毫不知情。布里安的人率领几位巴黎公安局的干事来到了我的住所。因为我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所以当时我正准备逃走。可是就在这时，这些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们互相看着，这些人是我以前的部下，因此他们并不敢贸然对我下手。我接过他们的逮捕令，一边假装看着逮捕令上的内容，一边坚定地对他们

说："我可以证明这份逮捕令有问题。"之后，我站在我的秘书前面，拿起笔假装要写字。最后，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我迅速从花园的后门逃走了。

这件事情算是帮我澄清了另一件事，这一下子，那些之前怀疑我是波旁家族支持者的人总算可以放心了。

然而，我知道这件事情和政治考量毫无关系，S.A.R先生甚至对下议院的人说，他根本不同意逮捕我，并且他还要保证我的安全。

这件事不过是萨瓦里、布里安和B先生搞的鬼。不管3月20日事件的最后结果如何，这三个人都希望我能够彻底离开他们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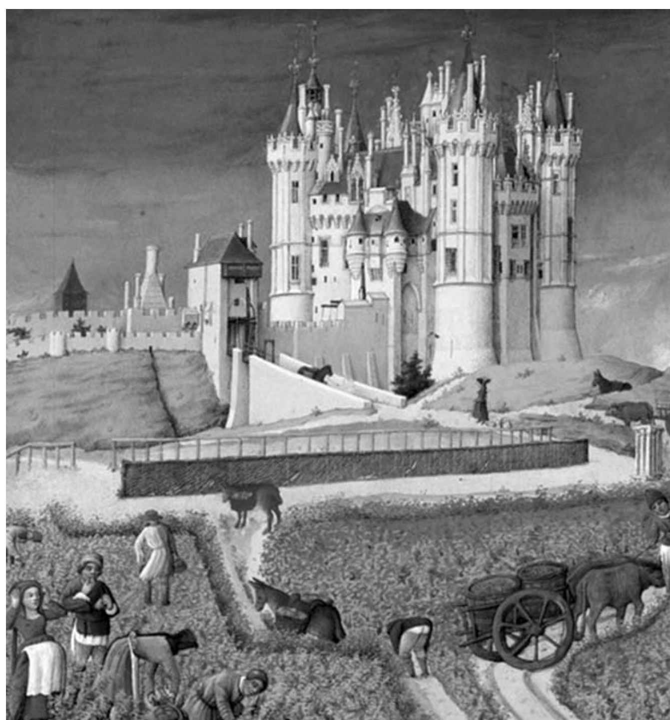


拿破仑再次掌握军队

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会怎么对我呢？他们说他们会把我送到里尔。不，那根本就不是里尔，而是索米尔城堡(4)。一旦去了那里，等待我的又将会是什么呢？根据我后来掌握的情报，我确定，这些人是想假借保皇派之手除掉我。

这便是我的处境，所以我只能离开路易十八，只能接受拿破仑的回归，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自由。关于国王撤离杜伊勒里宫这件事，我是最早的知情人之一。与此同时，我也得知，拉瓦莱特已经

派人去通知刚刚回到巴黎的拿破仑，告诉他国王路易十八已经离开的消息。对于拉瓦莱特抢先一步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翰姆夫人也急忙派人去通知拿破仑。



索米尔城堡，绘于16世纪

于是，在将士和民众的欢呼声中，拿破仑重新回到了杜伊勒里宫。当时，皇宫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然而，我并没有像其他大臣一样出现在杜伊勒里宫。询问了一番国家的情况后，拿破仑派人把我请到了杜伊勒里宫。他对我说：“听说有人想要劫持您，阻止您为祖国效力？噢，感谢上帝，您现在还完好地站在这里。您也知道，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相信，您和我的勇气一定可以让我们战胜这些困难。现在，我需要您为祖国做一些事情，请您务必再次接受公安部长一职。”

我向拿破仑表明，现在我最希望在外交事务方面为国家效劳，并

且请他相信我，这才是我最能为国家效力的地方。

可是拿破仑接着说：“不，您还是继续担任公安部长一职吧，因为只有您才能引导、疏通民意，只有您才能掌控突发状况。您了解其中的所有事情，公安部长一职简直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

我没有了任何推卸的理由，但同时，我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似乎是为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为政府服务，拿破仑告诉我，为了制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地利和英国方面已经私下里允许了他这次政变。虽然我接过了公安部长一职，但我并没有想要全心全意地为拿破仑服务。

第二天，我从我的心腹雷诺那里得知，拿破仑对我的疑虑根本就没有消除，他根本不愿意看见我出现在政府中。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对巴萨诺、科兰古、雷诺以及他身边的人的一种妥协。这些人拿出了和我签订的盟约，并且向拿破仑指出，当下，对政府来说，我的支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冈巴塞雷斯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不祥的未来，犹豫了很久之后，他还是接过了司法部长一职；拿破仑的心腹达沃斯特接过了战事大臣一职；因为已经确定现在无法和任何大国建交，所以科兰古拒绝了外交大臣一职。接着，拿破仑又询问了莫莱伯爵的意见，莫莱伯爵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最后，不忍心看到拿破仑为难的科兰古还是接过了外交大臣一职。卡诺担任内务部长，德凯斯担任海军部长，巴萨诺担任国务秘书。因为风评不好，萨瓦里离开了公安部，但莫西却拒绝了护卫队首领一职。在复辟王朝担任要职的帕尼和蒙塔里维自动辞职，此后效力于土木建设工作。伯特兰代替杜洛克成为驻殿大元帅。接着，拿破仑亲自出面请回了所有的殿前工作人员和司仪，很明显，拿破仑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对于帝王生活的向往。

然而，那些曾经帮助他跨过地中海的人却坚持认为，拿破仑并不

排斥建立共和国。但我知道，想要建立共和国，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努力，需要所有共和党人的坚持。在里昂的时候，虽然拿破仑曾说过会在法国颁布宪法，但这份宣言并非出于自愿。他是样说的：“我回来，是为了保护我们革命的成果。我会给你们一部不容侵犯的宪法，一部有着你们和我共同作品的宪法。”

在里昂的时候，拿破仑迅速下令，宣布废除两院和封建贵族制度。也是在里昂，为了避免引起欧洲各国的恐慌，他派身在瑞士的约瑟夫去和瑞士联邦的部长取得联系，并请这位部长放心，他这次回来只是为了重建法国，绝不会扰乱欧洲秩序。

然而，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拿破仑并没有放弃征服欧洲的想法，在他回到杜伊勒里宫的当晚，他就计划着入侵比利时。不过，幸运的是，在周围人的坚持下，他放弃了这个计划。那时，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他仍旧会依照形势做一些妥协。毕竟，自从里昂政令颁布之后，拿破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拿破仑了。



拿破仑的心腹达沃斯特



德凯斯

3月24日，政令宣布废除新闻审查制度，恢复新闻自由。当然，该政令也提到了恢复拿破仑帝国。法国人民终于重获了“新闻自由”这位自由之母！可以这样说，我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在拿破仑看来，波旁家族、雅各宾派完全有可能利用新闻自由替自己辩护。我对他说：“陛下，法国人需要这样的胜利，或者说需要一些自由的养料。”

对于曾经帮助自己重回杜伊勒里宫的爱国者们，拿破仑始终心怀芥蒂。有一天，他苦涩地对我说：“有些人，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偏偏要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些人以为是他们为我铺平了回来的路，但我清楚，我真正的恩人是人民，是将士们。”

我知道这番话对我和我所代表的党派意味着什么。所以，拿破仑自然需要一套和我有着不同主张的政治理念。他用重金收买了刚刚成立巴黎警署的瑞尔，并给他许下了美好的未来。他这么做是为了让瑞尔能和萨瓦里联手干涉我的政策。但我早有准备。

在这期间，拿破仑得知，路易十八决定暂时留在比利时观察情况。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令他头疼的事情，纳伊、勒古波等一些大将希望拿破仑能承认他们一直以来的付出，因此，他们向他提出了经济补偿。幸运的是，和王室的一次小交火稍稍缓解了拿破仑的燃眉之急。昂古莱姆公爵和公主的气节出乎拿破仑的意料，尤其是这位公主，她在大溃败面前展现出的勇气更是令拿破仑刮目相看。

在这里，我希望替马赫讲几句公道话。当时，拿破仑已经在巴罗德签署了投降书，但和平协议还没有传到前线。格鲁西却擅自做决定逮捕了昂古莱姆公爵。得知此事后，为了向保皇派封锁消息，一直等到晚上，在没有任何电报信号的时候，马赫才向拿破仑报告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人们就昂古莱姆的事情进行了协商。最后，人们提议用价值四百万的珠宝来交换这位公爵，而我则向拿破仑建议，不妨让维特罗尔斯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赎回昂古莱姆公爵。不过当时，拿破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他说：“不行，这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还是塔列朗的人。当初，就是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出卖了我们，也是这个人给反法同盟打开了大门。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用机枪处死这个一直和我作对的人。”

但我向拿破仑指出，一旦动用军事处罚，法国立刻就会血流成河，况且，对我们来说，这个波旁家族的代理人还有别的用处。最终拿破仑同意了我的建议。

---

(1) 蒂博（1765—1854），法国政治家，曾担任五百人院主席，第一帝国罗讷河口省省长。

(2) 格勒诺布尔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伊泽尔省省会，多菲内以前的首府，也是法国阿尔卑斯地区的首府。

(3) 当年拿破仑即是从此处登陆，复辟成功，开始了他的百日王朝。——原注

(4) 索米尔城堡是位于法国索米尔的一座中世纪时期的法式城堡。城堡最早修建于10世纪。

第33章　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精彩看点

盟国反对拿破仑重新掌权——维也纳会议——驱逐保皇派和旺代党人——财产清算令——英国和奥地利孤立拿破仑——针对我的审查——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颁布宪法修订案——向英国出卖作战计划——拿破仑战败——拿破仑二次退位

同时，还有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不久前，在杜萨夫人[(1)]家里，科兰古和奥地利部长文森特男爵进行了会面。这位部长毫不掩饰地告诉杜萨夫人，各联盟国非常反对拿破仑重新掌权。但同时，他也透露出了自己的儿子并不同意欧洲的做法。而我也知道，我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我的计划。

通过奥坦丝，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接着，他又通过自己的妹妹——也就是那不勒斯王国的王后——致信梅特涅，希望以此缓和两大强国的进攻。他派出了欧仁·德·博阿尔内和斯丹芙尼公主[(2)]，命他们尽可能地拆散反法同盟。同时，他也向英国内阁派出了使节。最后，为了获得议会和英国的支持，他宣布废除黑人买卖制度。

然而，那时，各国政府已经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外部通信，杜伊勒里宫的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维也纳会议的结果。终于，3月13日，我们获知了维也纳会议的最终决定——各国均不承认拿破仑政府。从那时起，法国便又一次笼罩在了战争的阴影之下。



斯丹芙尼公主



参加维也纳大会的各国代表



为纪念维也纳大会胜利召开铸造的纪念币，正面为各国君主的头像，背面为与会代表的名字

然而，故作威严的拿破仑却当着议会所有人的面说了这番话：“这一次，如果他们赢了，那么欧洲一定会血流成河；如果胜利垂青了我，那么他们就一定会看到一个最可怕的我。我，就是比利时，就是莱茵河以外的所有省份。一旦宣战，三色旗一旦飘起，不出二十四小时，我就能把这些人全部拿下。”

对于这样的大话，我根本就无动于衷。得知维也纳会议的最终决定后，我便毫不犹豫地派人和国王路易十八取得了联系，表达了我希望能尽我所能为他服务的意思，而我提出的唯一条件便是事成之后我能告老还乡，回到我的领地蓬卡尔安度晚年。

抵达根特后，刚刚参加完维也纳会议的威灵顿得知了我的请求，最终，他也同意了此事。这也意味着，我、梅特涅、塔列朗以及盟军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契约。

我和威灵顿以及威尔斯利家族的友谊由来已久，当年在我第二次出任部长时，我就曾经帮助这个家族的某位成员逃离过拿破仑的严酷制裁。

3月25日，各大国订立盟约，在条约中，他们一致认为，只要拿

破仑在位一天，他们就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与此同时，法国和各大国间的私下谈判也全都以失败告终。

亚历山大一世是这样答复奥坦丝的：“只要这个人还在，和平就绝对不会存在，休战也是不可能的。”

而派去维也纳的福来奥甚至根本没有办法跨过斯达格，塔列朗也拒绝和拿破仑进行任何谈判。尽管谈判受挫，但拿破仑还是再次向奥地利发起了新一轮的谈判。在派出斯塔萨尔男爵的同时，拿破仑还派出S.L和蒙特罗前往游说塔列朗。这两位使节和塔列朗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蒙特罗更是这位前外交官的挚友。可是大局已定，纵然有了第二轮谈判，我们也无法改变整个事件的进程。与此同时，拿破仑对我的怨念也越来越深，尤其是我处处针对他提出的专制政策。在他的心腹面前，拿破仑更是不愿提及我的名字，只会说手套部长。

3月20日，在一次冲突中，匆忙之中，布拉卡斯把非常重要的文件留在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些文件涉及很多重要任务中的重要信息。得知此事后，3月21日，我马上派公证人赖内前往布拉卡斯的办公室，整理并销毁相关文件。萨瓦里和瑞尔追踪了我的行动，当拿破仑要我交出文件的时候，我把剩下的未销毁文件拿了出来。最后，拿破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信息，但我知道他对我的怀疑越来越深了。

3月25日，他下令驱逐保皇派和旺代党人，让这些人远离巴黎三十里。得知这种大规模的驱逐命令后，我把这些人召集到了我家，向他们表明了我的立场，并且建议他们暂时不要离开巴黎。

我的行为进一步激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于是，他便颁布了接下来著名的财产清算令。这条政令主要针对塔列朗、拉古萨、阿尔贝格、雅阁、孟德斯鸠主教、伯农维尔、维特罗尔斯以及布瑞安等人。不过，令人吃惊的是，奥热罗将军的名字也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上，幸运的是，由于他妻子的求情，奥热罗将军的名字被划掉了。在内阁，我

曾公开反对这项政令，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专制政权的报复行为，是对里昂宣言肆无忌惮的破坏。

那时，英国和奥地利已经相继宣布孤立拿破仑的政策。英国内阁4月25日的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条信息：“英国既没有参与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复辟行动，也没有帮助路易十八重登王位，英国完全没有意向以战争的形式强迫法国接受任何制度的政府。”紧接着，5月9日，奥地利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

在此期间，我险些被牵扯进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中。当时，拿破仑抓获了一位和我联系的奥地利密使。在威逼利诱之下，这个人向拿破仑供认，他是我和沃纳之间的信使。于是，拿破仑立刻决定以讨论国事的名义宣我觐见。他首先想到的是从我手中拿到有用的文件，但是随后，他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他心里，我是一个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人。而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此人就是梅特涅使者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的样子。在没有得到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拿破仑召集所有近臣，告诉这些人我是叛徒，并且决定枪毙我。



拉古萨公爵，奥古斯特·德·马尔蒙



孟德斯鸠主教



伯农维尔

然而，他的周围全部都是反对的声音。卡诺是这样说的：“是的，您现在是主人，您可以枪决富歇，但明天在同一时间，您就会失去您所拥有的一切权力。”

拿破仑大叫道：“什么？”

卡诺继续说：“是的，现在不是我们与富歇决裂的时候。革命党人之所以服从您的条件，是因为您能够尊重他们的自由。但是现在，如果您枪决了富歇——他们心中最强大的靠山——的话，那么明天，民意绝对会一边倒的。如果富歇真的有罪，那么您需要做的就是找到明确的证据来指证他，然后交由法庭作出判决。”

人们都赞同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找出我的罪证，拿破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弗勒里。接到任务后，弗勒里马上出发前往巴塞尔，并且以我的名义迅速和沃纳取得了联系。

弗勒里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询问盟国将如何对付拿破仑。沃纳回答说："我现在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不过，不到最后一刻，盟国是不会轻易动用武力的。他们希望的是能以不流血的方式让拿破仑下台。"

弗勒里继续追问道："所以，现在只有两种方法了，一种是逼拿破仑退位，另一种是刺杀拿破仑。"

沃纳惊呼道："刺杀！梅特涅和盟国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弗勒里仍旧没能从沃纳那里得到任何针对我的证据。或许梅特涅早已有所准备，毕竟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没有向梅特涅有过任何隐瞒。早在1814年在巴黎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明确地指责他没有把拿破仑囚禁起来，并且告诉他说拿破仑一定会从厄尔巴岛回来的。辞别了沃纳之后，弗勒里回了巴黎，沃纳则去了维也纳，不过，他们相互承诺说八天之内会再次在巴塞尔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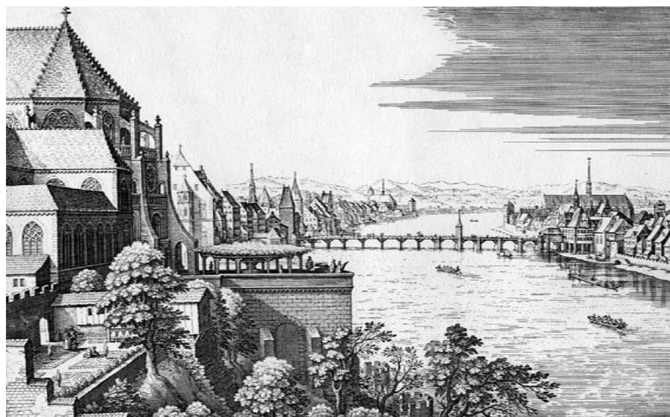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弗勒里刚刚踏上去巴塞尔的路时，另一位密使马上和我取得了联系，并且启发了我该如何揭开这件事的真面目。因此，我把梅特涅的信放进公文包，之后出发去面见拿破仑。例行的公事完成之后，我假装突然想起某件事似的说道："啊，陛下，我最近真是忙晕了，我这儿还有一封梅特涅几天前写给您的一封信。这件事需要您来拿主意。我到底该不该按他的要求派出使节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盟国肯定不愿意落上一个挑起战争的罪名，这样的话，他们一定希望您能把皇位让给您的儿子。而且，我认为这也是梅特涅的想法。或者我斗胆向您说一句，这也是我的想法。我不想向您隐瞒任何事情，我现在依然觉得您不是整个欧洲的对手。"

之后，我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释然和放松，毕竟我这番话能够让他解除他之前对我的怀疑。

弗勒里回来后，拿破仑命令弗勒里前来审问我，并且希望我能够向他坦白一切。这个干劲十足的年轻人费尽心机地想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信息，然而并没有任何效果。当他第二次回巴塞尔的时候，我也跟着他去了。

同时，从维也纳归来的蒙特罗和布列松给我带来了来自塔列朗和梅特涅方面的重要消息。毋庸置疑，这一举动又一次唤醒了拿破仑对我的疑虑。他分别提审了这两个人，不过直到最后，他仍旧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是，当得知布列松奉达沃斯特之命偷偷从英国购买了一千把火枪时，拿破仑非常的不满。他觉得我和达沃斯特正在密谋暴动，而布列松不过是我们的工具。

我必须牢牢把握住民意支持率，同时，我也要在首都巴黎建立起效忠于我的警力。然而，旺代地区的暴动却打破了我的所有计划。对我来说，保皇派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我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进入我们的规划中。在这一点上，我和拿破仑的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主动请缨，向拿破仑承诺说我会尽快平息这场暴动。拿破仑同意了，他让我带一万两千人前往前线处理暴动。我当然不会让这些人为波旁家族白白送死，因为我还有别的用途。很快，我便说服了朝中的保皇派，我告诉他们说：“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和拿破仑宣战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它只会造成恐慌，并引起革命党的反抗。现在，我们必须让国王下令停止这场暴动。”同时，我也派出了马拉迪克、菲维涅和拉布罗杰三位使者去说服军队，让他们暂且不要轻举妄动。于是，在几次小型冲突之后，旺代党人便偃旗息鼓了。



雕版画：18世纪的巴塞尔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在意大利起兵后，现在，缪拉已是骑虎难下，拿破仑和我都爱莫能助。因此，我再三写信给他以及他的王后，希望他赶紧停下来。当我得知他的部队已经并入奥地利的军队时，我知道，他失败了，他败在了自己挑起的暴动中。五月底，缪拉逃往地中海朱安海峡。

因为拿破仑手里掌握着军队，所以他决意用武力对抗盟军。这一次，法国将成为战场。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拿破仑允许成立人民俱乐部以及人民会议，这一切都散发着无政府主义的气息，像极了他当年推翻的雅各宾派。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拿破仑便决定颁布宪法修订案。在他看来，颁布新宪法意味着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但这次修订并不像他所承诺的那样——他并没有对宪法进行整体修订，而只是修订了其中关于参议院的相关法律。另外，他还决定推行财产清算制度。拿破仑关于宪法的种种行为都不过是在进一步加强集权。尽管所有的国务委员都反对此事，但他依然一意孤行。因此，在萨瓦里和瑞尔组织的民调中，拿破仑的支持率一路下滑。最后，这个人竟然鼓动社会最底层的人来杜伊勒里宫前大喊：“拿破仑万岁！”同时，他还宣布，如果欧洲敢发兵法国，他便会亲自带兵前往边境。

这种为人所不齿的行为让我无法平静，因为我知道，如此一来，欧洲各国一定会一致对抗法国，或者说一致对抗拿破仑。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前往杜伊勒里宫，再次向他重申，现在的法国根本无力对抗整个欧洲，因此，我们最好尽快与各国讲和，以保住仅有的江山。如果再这样下去，不管是为了祖国还是他自己，他都必须离开法国、前往美国。

拿破仑的回答依旧吞吞吐吐，而且在这吞吞吐吐中，他还高谈阔论着他的各种作战计划。自此，我便知道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非常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在国务会议上，达沃斯特再三强调，拿破仑应当快速前往前线坐镇指挥。然而，直到最后一刻，放不下巴黎的拿破仑才下定决心出征比利时。他走了，留下瑞尔处理国家事务，还高价雇人在大街上高喊："要么死，要么拿破仑！"除此之外，拿破仑还给达沃斯特留了一份高度机密的防守作战计划。

我的立场非常艰难：一方面，我极度排斥拿破仑，排斥他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我又与路易十八有约在先，承诺帮助他复国。况且，梅特涅和威灵顿将军已经向我提出了相当诱人的条件，他们希望我能够交出拿破仑的防守计划。

可是，一想到"叛徒"这两个字，我的心就猛的一揪，奥特朗特公爵前面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形容词。然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又该如何自处呢？一个政治家，又怎么能孤立无援呢？我知道拿破仑将在16日、18日或者稍晚发起突击，并且，他还计划在17日，趁着英军和普鲁士军队分开之际突袭英军。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威灵顿收到了错误的情报，他认为，在7月1日前，拿破仑不会有任何动作。也就是说，拿破仑的制胜点在于出其不意。于是，我决定用数字写下拿破仑的作战计划，在拿破仑动身前往比利时的当天，我派D夫人带着这份作战计划去找威灵顿。同时，我又在边境设下严密的关卡，拖延D夫人的行动。这样一来，在突袭结束后，威灵顿才会收到

拿破仑的作战计划。



拿破仑检阅军队

为了胜利，拿破仑已经全力以赴。如果他战败，并认为是我导致了他战败的话，那么我必定会背上叛徒的罪名，他就可以借此开脱。如果有人问我心里的想法，我一定会像老贺拉斯一样大喊，让他去死吧！

除非拿破仑能在这场战争中胜出，否则的话，革命党人是不会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的。但是，拿破仑连夜逃回了爱丽舍宫[3]，与此同时，马赫在拉昂[4]公开征求意见，然后离开军队、回到了巴黎。当天白天，吕西安支持拿破仑用军事手段解散议会。



19世纪初的爱丽舍宫

就这样，溃败后的拿破仑出现在了巴黎，这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怒。我知道，是时候逼他退位了，因此，我决定动用我所有的资源、权力和经验。于是，我立刻向我的朋友们、支持者们发起了动员令。在内阁所有人的面前，我也公开表达了我的想法。

我对议会中那些犹豫不决的人说道：“不要说空话了，是时候行动了！拿起武器。这一次，他气势汹汹地回来就是为了解散议会，专制政府又要回来了。”

我对拿破仑的追随者们说道：“难道你们不知道大部分议员已经非常不满拿破仑，所以要求他退位吗？如果你们坚持要救他，那么，你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告诉这些人，拿破仑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并且要他做出承诺，绝对不会解散议会。”

我又对我身边的革命者们说：“你们看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都无能为力了。几个小时之后，议会将不复存在，危险迫在眉睫，以

后，你们恐怕要后悔你们现在的不作为。”

随后，拿破仑召开国务会议，马赫宣读了滑铁卢之战[(5)]的战况。最后，他告诉我们：“为了挽救法国，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临时专制政府；当然，我们可以强行推行这个政策，但我们还是希望议会能够赋予我们这项权力。”



滑铁卢之战中的各国联军



滑铁卢之战：法军与各国联军交战

我知道，议会的同事们一定会极力反对此事，并且和马赫对抗到底。

得知议会发生的事情后，拉斐特提出了永久保持议会的动议。虽

然这个动议惹怒了军方，但它却团结了所有的爱国者。

受到议会攻击后，拿破仑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他命令达沃斯特武力解散议会，但他遭到了达沃斯特的拒绝。

第二天，逼退拿破仑激起了所有人的讨论。议会里人来人往，争执声、驳斥声、反对声不绝于耳。人们得出了各种结论，又推翻了各种结论，再继续商量着结论。激烈的争执持续了一天，之后，拿破仑出现了。他宣布："再多的抵抗也无济于事了！"接着，他把头转向我，挖苦地笑着说："让这些先生们休息一下吧。他们会满意的。"

吕西安拿起了笔，按照拿破仑说的，一字一句地写下了退位宣言。

---

(1) 杜萨夫人（1761—1836），法国作家、沙龙主人。

(2) 斯丹芙尼公主（1789—1860），拿破仑·波拿巴的养女，第一帝国的公主。

(3) 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室所在地，位于巴黎八区圣奥诺雷市郊路55号，邻近香榭丽舍大街。其名称"Élysée"来自希腊神话中的至福乐土。爱丽舍宫原为艾威尔伯爵于1718年兴建、1722年竣工的宫殿，拿破仑一世的皇后约瑟芬亦曾在此宫殿居住，1873年起至今作为法国总统官邸，并供接待重要外宾。

(4) 拉昂，法国北部城市，上法兰西大区埃纳省的省会。

(5) 滑铁卢战役是1815年6月18日大英帝国、荷兰联合普鲁士王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在布鲁塞尔南部的滑铁卢进行的一次战役。这是拿破仑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也是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在这场战役中，大英帝国的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的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鲁歇尔指挥的英普联军击败了拿破仑指挥的法军，这场战役的胜负决定了拿破仑所领导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覆灭。后世也经常将重大的失败代称为"滑铁卢"。

第34章　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精彩看点

组建摄政府——协商和平事宜——集体听证会——拿破仑二世的位置不保——盟军兵临城下——拿破仑离开巴黎——放弃防守巴黎——巴黎撤军协议——路易十八执政——写给国王的信——我的醒悟

至此，一切都变了，拿破仑失去了手中的权力。那么谁将接过这权力呢？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在吕西安的带领下，拿破仑在内阁中的支持者们正筹划着立拿破仑二世为王，组建摄政府。虽然这是我一直以来筹划的摄政府，但这一次，这个摄政府不会和我有任何关系。因此，我只能求助于别的力量，即支持波旁家族摄政。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按我的指示组建新的临时政府，因此，在议会上，我不惜牺牲革命原则力挺波旁家族。

在没有援引任何相关条款的情况下，议会接受了拿破仑的退位声明。吕西安焦急地等待着议会立拿破仑二世为王。吕西安那边有拿破仑的支持者们、军官们、下层民众，还有上下两院中的众多议员。而我这边则有两院的一部分议员、国民护卫队、大部分的将军，还有视情况而定的保皇派。

在爱丽舍宫，吕西安让瑞尔以拿破仑的旗帜召集其追随者；而我们则费了很大的努力才得以觐见拿破仑。我们告诉他说我们希望他的退位是纯粹和简单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他的安全撤离和他财产的转移。另外，如果拿破仑二世即位，那么奥地利很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法国的让步。随后，瑞尔带着拿破仑在巴黎的所有追随者闯进了爱丽舍宫。吕西安则马上跑到上下两院大声呼喊：“皇帝万岁！拿破仑二世万岁！”

最后，至少在表面上，议会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在上下两院取得初步的胜利后，吕西安马上回到了爱丽舍宫，命令跟随瑞尔而来的人前往上下两院，为拿破仑二世助威。而他则带着自己的哥哥出现在了议会上。这时的拿破仑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神采，如今，曾经敏锐的眼神也黯然失色，面对那些在自己面前大喊“皇帝万岁、王子万岁”的人，他也只是象征性地挥了挥手。

我并不在乎这种所谓的效忠仪式，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

中。在这些人演这出戏的时候，两会确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而我则是这个临时委员会的幕后控制人。

此时，瑞尔命令这些人前往立法集团游行示威，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当这些人浩浩荡荡地出发时，刚刚确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立法者们已经闻讯而迅速离开了立法集团。随着夜幕的降临，这些人也渐渐散去了，可怕的呐喊声充斥着巴黎的大街小巷，那些不愿意承认拿破仑二世的人听着胆战心惊。

最后，晚上的各种密谋结束了白天的躁动。第二天一早，我和我的同事们科兰古、卡诺、吉奈特以及阁海涅掌权了。正当我们如愿以偿地开始组建新政府的时候，议员贝朗热却要求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对刚发生的一切负责。为了更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这些人是不可侵犯的，那么一旦他们叛变，你们便没有任何能力抵抗他们。"

我完全不害怕这样隐晦的攻击。

莫尔特·布雷（拿破仑的心腹）对我们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拿破仑的支持者和保皇派，在争夺权力的战场上，新的第三方党派出现了。

对我来说，第三党比专制政府和反革命政府更加符合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立场和原则。预感到拿破仑二世很难保住王位后，我决定支持这支新出现的第三党。布雷抨击临时执行委员会的首要目的是要议会尽快立拿破仑二世为王。不过我这方早就有了对策，可是，为了避免受到反击，我们还需要一些技巧来推进这件事。曼努埃尔担负起了这个敏感的使命，在议会上，他的演说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而很明显，演说的内容有我参与的痕迹。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表明了他反对波拿巴家族的任何人参与摄政府组建的态度。议会的默许成为我们有力的保障，就此，在这关键的一刻，我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高峰。



拿破仑二世（罗马王）

6月23日，摄政府成立，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向各国宣战，并派出五位大使[1]全权协商和平事宜。我们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重组，但我们无法接受波旁王朝的复辟。同时，这些人也接到了秘密指示——力挺在议员和将军中更受欢迎的萨克森国王或者奥尔良公爵。我承认，在这次谈判中，我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但我们能否达成目的呢，我也没有信心。而且，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似乎觉得波旁家族的事业还没有就此结束。事实上，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密

报，路易十八已经抵达康布雷[2]，并且给我带来了皇家宣言。

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拿破仑的党羽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伺机行动。可以这么说，这些人已经在巴黎城下组织起了一支两万人的大军。同时，盟军正大步向巴黎进军，一路上可谓是所向披靡。一方面，我要满足爱国者们的各种要求，并且保证各位将军可以各就其位，同时迅速灭掉拿破仑的各种企图，另一方面，我还需要抑制守在首都门口、迫不及待想要进来的保皇派。

在此期间，大家可以想象究竟发生了多少阴谋、争斗和权力的变动吧！拿破仑退位之前，我需要战胜的是那些时而支持我、时而反对我的拿破仑的追随者，比如马赫、布雷；现在，我还要面对第三党，甚至我还不得不和我的一些同事反目成仇，比如卡诺这位从共和党人成为拿破仑忠实支持者的同事。为了保住拿破仑的帝位，他曾经在我的面前流下热泪。



盟军与法军交战



盟军中的普鲁士军队与法军交战

我知道，只有保证了这些高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才能堵上他们的嘴。

首先，由于我并不清楚盟军的倾向，因此我派出了一位朋友（正直的G先生）去见威灵顿，并让他分别给国王路易十八和奥尔良公爵带去了密信。我的使者很快就见到了威灵顿，后来，当他表达了他希望威灵顿能引荐他去见奥尔良公爵时，威灵顿对他说："奥尔良公爵根本不在这里，但您可以去见您的国王。"

于是，G先生便出发前往康布雷面见国王路易十八。不过，因为没有等到G先生的消息，所以我又派出了T将军。在他临走之前，我要这位忠心耿耿并且足智多谋的将军问清楚威灵顿的意向，并且让他告诉威灵顿我现在的艰难处境。如果他们执意要把路易十八推向王位的话，我一定会动用所有力量，即便巴黎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这一次，我得到了盟军的否定回答，他们说："确保波旁王朝复辟，答应路易十八重回朝堂掌政才是谈判的基础。"至于奥尔良公爵，根据威灵顿的说法，他不过是一个篡位者。我小心翼翼地向我的同事们隐瞒了这个答复，而这让我的处境更加艰难。

7月1日，我们派出的使者抵达了阿格诺[3]。欧洲各国认为单独召

见使者有所不妥，于是他们决定举行集体听证会。在会上，他们向使者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就想过的问题："国家有什么权力驱赶自己的国王而另寻他主呢？"我们的使者援引了英国历史上的例子。

不过这个问题也让使者们明白，拿破仑二世的位置保不住了。于是，他们给出了立奥尔良公爵或萨克森国王为法国国王的提议。经过几番没有意义的争论之后，盟国辞退了这些人，并提出了流放拿破仑的提议——鉴于三月份发生的事情，这一次，盟军将负责看管拿破仑。这样一来，拿破仑二世以及奥尔良公爵都很难登上王位。还没等五位使者返回法国，我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从这时开始，我能做的只有顺势而为了，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全我的祖国和我自己。盟国的军队正涌向巴黎，于是，我们派出使者[4]，请求盟国停战。仔细研究过我们的提案之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反对立拿破仑二世为王，强调路易十八才是王位的唯一人选，同时，他们还反对拿破仑继续留在巴黎。从爱丽舍宫搬到马尔梅松宫后，对于重归帝位，拿破仑已经不寄希望，但他还想着能够以将军的身份留在巴黎。在一些狂热的支持者的鼓动之下，他向临时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正式要求。这个时候，我公开写下了这句话："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他想让我们跟他一起毁灭吗？"

可以肯定地说，和我一样，卡诺也投了反对票。那时，拿破仑已经被我们严密地看管了起来，达沃斯特也阻断了他和军队的所有联系。然而，我们的敌对方驻扎在马尔梅松宫附近，准备伺机带走拿破仑。所以，当时，我们需要认真讨论关于拿破仑的流放事宜，并派出一位将军来主持此事。剩下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我这个简短的解释应该可以澄清那些对我的恶意猜测和中伤，让他们闭上嘴巴。

拿破仑离开之后，我们希望盟国可以与法国停战。这时候，我给每一位驻守将军写了那两封众所周知的信。由于形势所迫，同时也为了让各方放松警惕，在这两封信中，我力挺拿破仑二世。事实上，我

希望通过帮助路易十八复辟来让这位新国王对法国做出新的妥协。如果在路易十八这里得不到承诺，我会转而依靠新的力量。

这段时期，在夜间，我和维特罗尔斯以及几位重要的保皇派碰过几次面。同时，我也向国王路易十八、威灵顿以及塔列朗派出了密使。我知道，离开维也纳后，塔列朗辗转去了法兰克福和维斯拜得，其目的就是参与在根特或者巴黎召开的协商。回到巴黎后，这个激烈反对拿破仑的人想要跟我和解，并且保证我在波旁家族复辟后的利益。滑铁卢之战后，波旁王朝的复辟已是大势所趋。我想，他当时应该是和国王路易十八待在一起的，而且一定正在极力争取整件事的主导权。按照他的要求，我流放了布拉卡斯，但我的举动怎么可能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而且我也时不时地受到革命党人和波拿巴分子的公开挤兑。我冷静地处理着这一切，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必须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然后去和各方协商、妥协，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我知道，我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各方的怀疑甚至是血淋淋的仇恨，然而最可怕的便是揭开所有阴谋的那一天。

对我来说，议会对我的指控、人民和军队的狂怒才是最危险的。我写信给威灵顿，对他说：“现在，你必须要停下来，否则的话，我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然而威灵顿根本无法说服他的同事布吕歇尔，这个粗鲁而狂热的普鲁士人一心想着光复波旁王朝，扬言要一路打进巴黎，在巴黎的城墙下签订休战协定。他的回信让我们非常气愤，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们要么迎战，要么投降。拿破仑退位之后，军队的态度一直是犹豫不决，将士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战事部长达沃斯特写信告诉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路易十八，承认波旁王朝。在临时执行委员会面前，我回复了这封信。但临时委员会认为我过于偏向路易十八，给了达沃斯特过多的自主权。事实上，达沃斯特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为了进一步稳住达沃斯特，通过维特罗尔斯，我在国王路易十八面前为他争取到了免责通行证。



拿破仑离开法国，望着渐行渐远的法国海岸线陷入沉思。他的眼神是灰暗的，完全一副英雄末路的神态



拿破仑流放途中经过英国港口普利茅斯

形势越发紧张，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征求了作战经验丰富之人的意见——所有的大将都出席了两院的咨询会。卡诺本人作了关于巴黎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塞纳河左岸的空地可以作为主战场，也可以作为联军的驻守地。我承认，我并不希望巴黎保卫战持续下去，现在巴黎国库空虚，政局混乱，就像是一座一触即发的活火山，在这样的情况下，胜利是毫无希望的。一旦战败，我们将没有任何协商的可能。抵抗的结果只能是重演莱比锡之战和滑铁卢之战的悲剧，而所有的革命成果都将付之东流。然而，这恰恰是一些疯狂者的提议。

面对这样的危机，难道承认路易十八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吗？终于，我说服了之前那些不可动摇的人们。

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由达沃斯特主持讨论是否防守巴黎。如果投降，虽然我们保住了巴黎，但革命毁灭了；如若开战，一旦战败，巴黎将血流成河。

讨论非常激烈，最后，人们一致决定放弃防守巴黎，向盟军投降。然而布吕歇尔要求我们解散军队，这个过分的要求是要把巴黎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啊。在没有通知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情况下，我马上派人致信托梅岭和马西罗[5]这两位敌人的将军，在信中，我说道："军队非常不满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们善待这些人，那么他们会听命于你们。议会也是一样，他们会为你们服务的。善待所有人，人们也会将心比心，向着你们。我们会让军队撤出巴黎，议会也会在宪章中加入针对国王的特殊条款。请不要在三天之内打进巴黎来，这样所有人都会满意——议会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我们也会得到议会的支持。对议会，使用武力是没有用的，要用道理说服它。"

布吕歇尔同意了我的意见，7月3日，我们在圣克劳德签订了巴黎撤军协议。我拒绝用"投降"这两个字来定义这个协定，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更容易接受的协定而已。

因为还有一些陷入绝望的团体在挣扎，所以暴动和纷乱四起。人们马上把出卖巴黎的罪名盖在了将军们和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头上。为了澄清政府的行为，我向法国人发表了公开演说，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结束所有人的痛苦。



布吕歇尔

和各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之后，我们还需要和军队签订休战协议。正昂首冲向卢瓦尔河的各国联军要求我们赔偿巨额军饷，银行家拉菲特向我们预支了几百万法郎，最终我们和军队达成了和解。与此同时，我和各位特使——包括维特罗尔斯在内的国王的使者以及达沃斯特召开了秘密会议，确保了国王路易十八重新执政的前提是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情。当我试图用这份保证去说服别人时，议会发布了来自康布雷的国王诏谕，这份诏谕再一次把我逼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很

快，我们得知，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已经公开宣布，议会的存在不合法，要求议会所有议员辞职并宣布路易十八复位。

在卡诺的提议下，临时执行委员会计划集结卢瓦尔河的军队和议会共同抵抗。我强烈反对这项提议，因为这无疑是在挑起新的欧洲大战。我认为这种方式只会给法国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且我也相信，大部分将军也不会同意这项提议。最后，在我的理智分析和劝说下，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留在巴黎观察后续事件。

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威灵顿希望就协定的执行情况听取我的意见。幸运的是，临时执行委员会没有反对我们的会晤，因此，我们顺利见面了。在纳伊城堡，我重申了路易十八复辟的前提是不再追究过去发生的事情。此外，我还谈及了现在巴黎动荡的局势，并且毫不避讳地揭示了保皇派在政治格局中的劣势地位。我要求英国和奥地利答应，他们将不会以战争的形式强迫法国承认路易十八或者任何其他政府。盟军驳斥了我的这一要求，他们坚持认为巴黎协定签订的目的在于防止战争，而拿破仑则是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威灵顿直截了当地指出，盟军支持路易十八复辟，并且他将于7月8日正式入主巴黎。波佐二博尔戈以沙皇的名义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向我转交了梅特涅和内索罗伯爵的来信，信中，他们也表明了绝对支持路易十八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同意接受路易十八执政，但我依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保障我的荣誉和权利。盟军答应疏远布拉卡斯，成立以我和塔列朗为核心的内阁，并任命我为公安部长。但他们的条件是他们接管拿破仑，军队归国王掌管，同时，他们还要处罚几位将军。尽管我反对此事，但我所有的反对都被驳回了。我知道我已经无能为力。公爵向我宣布，他决定第二天向我引见S.M先生，或者至少会带我去阿尔维尔城堡[6]。我对他说，我的本意是希望把这封信带给国王的。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内容。

> 陛下，您的归来只能给政府带来更大的撕裂，我想告诉您法国人民的真实情感和想法。

人们害怕的不是您本人，相反，所有人都知道您是一位明智并且阅历深厚的国王，十一个月来，您的温和和公正带给了法国人民新的信心。您了解法国，了解这个时代，了解民意的力量。但是，您可能过于偏向那些在苦难中支持过您的声音了。

从那时起，法国就出现了两种人。对您来说，不断地撤回决议想必是非常痛苦的，您一定不止一次地怨恨国家的法律。

如果您继续推行之前的体系，只承认世袭的财富和荣誉，那么法国必将再次陷入迷茫的纷乱中。法国人民会在对祖国的爱和对您的爱之间犹豫不决，会在理智和情感之间摇摆。人民对您的服从只能建立在他们对您本人的信任之上，只要您能够赋予人民这份信心，那么一切危险都将迎刃而解。



路易十八再次复辟

陛下，您知道，一旦权力越界，那么它便失去了被支持的根基。人民获得的权利越少，为了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他们的反抗就会越激烈，那时，他们对您的爱戴也就会越来越少，最后，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

陛下，这一次，我们请求您不要只顾及您自己的公正和想法，被自由洗礼过的法国人民认为自由和生命同等重要。如果皇权和人民之间没有法律的保障，那么人民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自由。

陛下，如果等到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您这样明智的人才做出让步，那么您的利益必将受到损害。如今，您的让步可以团结人心，为王权正名，之后，您的退让只会被看作软弱。

第二天，这封信交到了国王路易十八的手中。回到巴黎后，我向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布，波旁王朝的复辟已成定局，路易十八将于后天回到巴黎。在很多人的眼中，我出任公安部长不是为了保护革命党人，他们认为那是我背弃国家拿到的酬劳，人们对我的辱骂和诅咒声不绝于耳。

接着，我前往阿尔维尔城堡，和国王路易十八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靠着内阁总理的关系，我被引进了国王内阁。我请求国王保证所有人的安全，这位国王也能够理解，对于现在的法国来说，对和平和安宁、团结和安定是多么迫切。

我并没有向国王掩饰巴黎混乱的局势，如果巴黎人民看到国王带着白色国徽出现在巴黎的话，那么，届时，国王的安全将很难保证。所以我建议国王保留议会，解散军队。一句话，如我一直以来所希望的那样：国王能成为革命的护卫者。

在国务会议上，针对这些问题，人们进行了讨论。我的提议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军队得以保留，议会将会解散。第二天，他们便会武力驱逐所有议会成员。

7月7日晚上，保皇派武力打开了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占领了议会。我的同事卡诺——这个对我敌意最重的人——给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叛徒，你现在想让我去哪里？”

我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了他：“蠢货，去你想去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八点，议员们如往常一样来到了杜伊勒里宫门前准备

议事。然而，这时的杜伊勒里宫已经成了重兵把守之地。与此同时，在保皇派的热烈欢迎下，路易十八回到了巴黎。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了欺骗，我所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全部得到落实。自此，百日王朝[7]结束，波旁王朝再次掌权。然而，摆在这个新的政权面前的又是什么呢？是愤怒、纷乱、仇恨！我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丢下我的祖国！

拿破仑的追随者们开始放下武器，国王开始接管一座又一座城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与安宁开始垂怜法国。

和对拿破仑一样，我向路易十八建议：只有“宽大”才能医治这个国家的创伤，只有“宽大”才能避免引发新的革命。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人们纷纷叫嚷着要树立典型，要赏罚分明。自7月24日以来，这十五天在路易十八的政府中有五十七位高官受到了处罚。有人问我，我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同志——那些和自己一道走来的人下手，我怎么会在判决书上签字呢？但你们可曾知道，从7月8日到现在，从圣日尔曼镇上的沙龙到杜伊勒里宫，各个阶层的保皇派都在清算这些年来的恩怨，他们已经向公安部递交了一份几千人的名单。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成为复仇者的同谋或者辞去部长之职。然而，我既不能向前者低头，也不敢贸然离开现在的位置。我想到了第三种可能：尽量减少名单上的受害者，仅留下那些在最近事件中活跃的人的名字。同时，我希望我尽可能地为那些留在名单上的人争取最温和的处罚方式。

然而愤怒的潮水还是冲破了我的防线，我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国王与爱国者之间的调停者，然而很快，我便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无节制的王权政府不能给革命者提供任何保证。当国王连续诏谕选举委员会成员，并让选举委员会组建1815年议会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预感没有错。

我清醒过来了，但在这个时候，我写给路易十八的那封信，以及

我和盟国之间的通信被披露出来了。虽然很多明理之人理解我的苦衷，但在极端保皇派(8)的眼中，这些文件却成了我准备削弱王室威严的证据，甚至国王本人也对此颇有微词。那时，我不仅被维特罗尔斯欺骗了，也开始遭到内阁的排挤，除非我能实现我对于议会和国家的规划，实现我自己心中的理想，否则的话，我的没落不可避免。

我保证，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写下的一切文件都是为了团结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各党派，尤其是想提醒欧洲政府，人民的暴动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欧洲政府能够对此心存忌惮，能够赋予人民自由——我一直以来所呼吁的自由。历史会证明一切，我这一生是为了革命而奔走的一生，而最终，革命也住进了我的心里。

---

(1) 这些全权代表是拉斐特先生、拉佛雷先生、蓬特古拉、德昂格森和塞巴斯蒂尼。本杰明·康特恩先生陪同。——原注

(2) 康布雷位于法国斯海尔德河畔，是北部-加来海峡大区北部省的一个城镇。

(3) 阿格诺是法国下莱茵省的一个市镇，位于该省北部，是该省的一个副省会，下辖阿格诺-威森堡区。

(4) 安特华西、波瓦西、弗拉格、瓦朗西和拉贝斯。——原注

(5) 马西罗（1788—1846），缪拉的最后一任副将。1817年，马西罗踏上南美大陆，参与了解放西班牙殖民地的战斗。

(6) 阿尔维尔城堡位于法兰西岛大区。1815年，路易十八曾在这里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

(7) 百日王朝是指拿破仑一世在被流放后重返法国，试图重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一连串事件。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到法国，集结军队，把刚复辟的波旁王朝推翻，再度称帝；6月28日，因为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拿破仑再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再度复辟。拿破仑战争至此结束。拿破仑重返帝位总共101日，因此史称“百日王朝”。事件也被称为第七次反法联盟之战。联盟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奥地利与数个德意志邦国。它们都宣称拿破仑是罪犯，而不是法国皇帝。

(8) “极端保皇党”这个词是富歇的首创。之后，我们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原注

专有名词对照

Archevêque de Sens	桑斯大主教
Necke	内克尔
Mirabeau	米拉波
Le duc d’Orléans	新奥尔良公爵
Adrien Duport	阿德里恩·达波特
Chauderlos-Laclos	肖代洛·德拉克洛
les Staël	斯达尔家族
les Larochefoucauld	拉罗什富科家族
les Beauveau	博沃家族
les Montmorency	蒙莫朗西家族
les Noailles	诺瓦耶家族
les Lameth	拉姆斯家族
les La Tour-du-Pin	拉图迪潘家族
Lefranc de Pompignan	勒弗朗家族
Mont-Rouge	红山区
Le club breton	布雷顿俱乐部
Besenval	贝森瓦尔
Broglie	布朗威尔
Gracques	格拉古兄弟
Scipion Nasica	西庇阿·纳西卡
le temple de Janus	雅努斯神庙
Condorcet	孔多塞
Vergniaud	韦尼奥
Arras	阿拉斯
Maximilien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Girondins	吉伦特派
Brutus	布鲁图斯

Marius	马略
Sylla	苏拉
Legendre	勒让德
Tallien	达连
Dubois de Crancé	杜波瓦
Daunou	达努
Chénier	舍尼埃
Bourdon de l'Oise	布东
Collot-d'Herbois	高罗
Carnot	卡诺
Billaud de Varennes	瓦雷纳
Appius	阿皮乌斯
Couthon	库东
St.-Just	贾斯丁
Henriot	昂里奥
Barras	巴拉斯
Lombard-Taradeau	隆巴德
La faction Baboeuf	巴贝夫派
Rewbel	韦伯
Sambre-et-Meuse	桑布尔和默兹地区
Hoche	罗石
Augereau	皮埃尔·奥热罗
Merlin de Douai	默林·德·杜埃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	弗朗索瓦·纳弗莎特
Barthélémy	巴泰勒米
Cisalpine	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
Campo-Formio	《坎波福尔米奥条约》
Lombardie autrichienne	奥地利的伦巴第
Modenois	莫德内塞
Massa	马萨

Carrara	卡拉拉
Bolonais	博洛尼亚
Ferrarais	费拉拉
Romagne	罗马涅
Bergamasque	贝尔格玛
Bressan	不勒森
Cremasque	克瑞马斯克
Brune	布律纳
Treilhard	特里尔
Albion	阿尔比恩
évêque d'Autun	欧坦主教
l'Escaut	斯海尔德
Deux-Nèthes	德塞夫勒
Malines	梅赫伦
Bruxelles	布鲁塞尔
Mantouan	曼图亚
Voghère	沃盖合
Piémont	皮埃蒙特
Gènes	热那亚
Milan	米兰
Adelasio	阿德莱修
Luosi	罗斯
Soprensi	索普内斯
Brunetti	布鲁内提
Sabatti	萨巴提
Sinancini	希纳斯尼
Naples	那不勒斯
Adige	阿迪杰河
Joubert	儒贝尔
Rivaud	里沃

Monza	蒙扎
La bataille de Marengo	马伦哥战役
Pichegru	皮什格鲁
Sinnamary	锡纳马里
Moreau	莫罗
Bernadotte	贝纳多特
Championnet	尚皮奥内
Stockach	施托卡
Rastadt	拉施塔特
Schoerer	舍雷尔
Joseph Bonaparte	约瑟夫·波拿巴
Lucien Bonaparte	吕西安·波拿巴
Boulay de Meurthe	布雷·莫尔特
Duval	杜瓦尔
Sieyes	西哀士
François de Nantes	弗朗索瓦·德·南特
Chalmel	夏米尔
Texier-Oliviere	塔克西埃·奥利维尔
Beriler	伯捷
Baudin des Ardennes	巴丁
Cabanis	卡巴尼斯
Régier	雷尼尔
Bertrand du Calvados	贝尔特朗·杜·卡尔瓦多斯
Poulain-Grand-pré	普兰达
Destrem	德斯
Garrau	贾洛
Arena	阿瑞纳
Salicetti	萨利斯提
Bailleul	巴约勒
Bertrand du Calvados	伯特兰

Rapinat	哈比内
Faipoult	法比乌
Roger-Ducos	罗杰·杜克
Moulins	穆棱
Gohier	高杰
Guillaume	纪尧姆
Léopold	利奥波德
Toscane	托斯卡纳
duc de Brunswick	德·布伦瑞克
Cabanis	卡巴尼斯
Garat	嘉禾
Lombard de Langres	隆巴德·德·朗格勒
Roederer	罗德若
Bourguignon	布吉尼翁
Alquier	阿尔杰
le pacte social de l'an III	第一共和国宪法
la société du Manége	木马集团
Delbrel	戴尔布莱尔
Clemanceau	克莱蒙梭
Grandmaison	格朗姆
Briot	布瑞尔
Marbot	马尔博
La rue du Bac	巴克街
Haute-Garonne	上加龙地区
Novi	诺维
Jourdain	儒尔当
Fréjeville	弗雷热维尔
Masséna	马塞纳
Joséphine	约瑟芬
Aboukir	阿布吉尔

Aix	艾克斯
Avignon	阿维尼翁
Valence	瓦伦西亚
Vienna	维也纳
Berthier	贝尔西耶
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ely	雷诺
Roederer	罗德尔
Réal	瑞尔
Bruix	布瑞克斯
Talleyrand	塔列朗
Lemercier	勒玛
Saint Cloud	圣克劳德
Dumouriez	迪穆里埃
Sémonville	西蒙维尔
Beurnonville	伯农维尔
Lannes	让·拉纳
Murat	缪拉
Marmont	马尔蒙
Serrurier	索绪尔
Moncey	莫塞
Chazal	沙扎尔
Lebrun	勒布伦
Courtois	库尔图瓦
Cornet	高尔奈
Fargues	法尔格
Baraillon	巴拉庸
Villetard	韦乐鞑
Goupil-Préfeln	古皮尔
Vimar	威玛
Bouteville	布特维尔

Cornudet	尼岱
Herwyn	爱尔威
Delcloy	德克鲁
Rousseau	卢梭
Jarry	雅里
Émile Gaudin	埃米尔
Récamier	雷加米埃
Mme Tallien	达连夫人
Gros-bois	格罗斯布瓦
Lagarde	拉加德
Santerrre	桑德尔
Saint-Antoine	圣安东尼
Point du jour	布湾
Bigonnet	毕高内
Destrem	德斯姆
Robert Lindet	罗波尔
Forfait	弗尔菲
Quinette	吉奈特
Laplace	拉普拉斯
Reinhard	瑞阿尔德
Monck	蒙克
la bataille de Fleurus	夫勒吕斯战役
Irma	《伊尔玛》
Jaqueminot	雅克米诺
Cambacérès	冈巴塞雷斯
Toustain	杜桑
Comte de Frotté	福若特伯爵
Armand Séguin	阿尔芒
Vanderberg	范登堡
Hinguerlot	安格鲁

Ouvrard	乌瓦尔
les frères Michel	米歇尔兄弟
Bastide	巴斯提尔德
Marion	马里昂
Haller	哈勒
Morfontaine	莫尔丰坦
Le curé Bernier	贝尼埃主教
Mittau	米塔
Montesquiou	孟德斯鸠主教
Guiche	吉什
Annibal	汉尼拔
Saint-Bernard	大圣伯纳德
Melas	梅拉斯
Virgile	维吉尔
Portalis	波尔达耶
Clarke	克拉克
Champagny	帕尼
Fleurieu	菲尔
Duchâtel	杜塞
Jollivet	乔莉佛
Benezech	比内
Emmery	艾美瑞
Cretet	克戴尔
Chaptal	夏波多
Dufresne	杜弗兰
Duroc	杜洛克
Parrain	巴林
Lombardie	伦巴第
Juvenot	儒尔诺
Malmaison	马尔梅松

Fion	菲雍
Dufour	杜福尔
Rossignol	罗希诺
Talot	塔罗
Laignelot	莱涅罗
Metge	梅特格
Harel	阿海尔
Bourienne	布里安
Cerrachi	赛哈市
Diana	笛安纳
Topino-Lebrun	多笔诺
Barrère	巴亥
Demerville	德梅尔
Horaces	奥拉斯
Saint-Julien	圣于连
Vercy	瓦尔塞
Blanc-Manteaux	布朗克大街
château d'Arnouville	阿尔维尔城堡
Morbihan	莫尔比昂
Mercier la Vendée	麦卡锡·旺代
Bar	巴赫
de Sol de Grisolles	格瑞索
Guillemot	吉约姆
Limolau	里姆罗
Saint-Régent	圣瑞昂
Joyaux	华西
la Haie-Saint-Hilaire	希拉里
Saint-Nicaise	圣尼凯斯
Humbert	航博
Chapelle	希贝尔

Hohenlinde	霍亨灵顿
les lignes de l'Inn	因河防线
les lignes de Salsa	萨拉防线
les lignes de Traun	特劳恩防线
les lignes de l’Ens	昂镇防线
Steyer	施泰尔
Isnard	伊斯纳尔
Benjamin Constant	本杰明
Ginguené	吉克内
Lunéville	吕内维尔
Helvétique	赫尔维蒂
Batave	巴达维亚
Livourne	里窝那
Abruzze	阿布鲁佐
Otrante	奥特朗托
Rode	罗德
Boulogne	布洛涅
Elbe	易北河
Weser	威悉河
Ems	埃姆斯河
hanovrien	汉诺威
Hyde-Parker	海德帕克
Nelson	尼尔森
Humbert	亨伯特
Quiberon	基贝龙
Saint-Helens	凯伦斯
Brest	布雷斯特
le duc de Marckof	马可夫公爵
Alentejo	阿连特茹
Salamanque	萨拉曼卡

Badajoz	巴达霍斯
Menou	莫奴
Otto	奥托
Hawkesbury	霍克斯
le comte d’Antraigues	奥托戈公爵
Journal des débats	《讨论日报》
Hambourg	汉堡
le marquis de Cornwallis	康沃利斯侯爵
Saint-Domingue	圣多明戈
Malouet	玛鲁埃
Santhonax	桑德若
Trinité	特里尼达
Ceylan	锡兰
Élisa	爱丽莎·波拿巴
Gonsalvi	贡萨尔维斯
Auguste	奥古斯都
Fournier Sarlovèse	福尔涅
Donnadieu	多纳德
la constitution de l'an XIII	共和十三年宪法
Elbe	厄尔巴岛
Savary	萨瓦里
Verninac	维尔尼
Rapp	哈勃
Ney	纳伊
Demeunier	德穆尼尔
Ratisbonne	雷根斯堡
Pas-de-Calais	加来海峡
Peltier	贝尔蒂埃
Parme	帕尔马
Ligure	利古里亚共和国

Louisiane	路易安那
Sébastiani	塞巴斯提亚尼
Ostende	奥斯坦德
Rochefort	罗什福尔
Douvres	多佛尔
Sussex	塞萨克斯郡
Kent	肯特郡
Haugwitz	霍格沃茨
Meyer	梅耶
Georges Cadoudal	乔治·卡杜达尔
Querelle	戈海勒
Desmarets	德马雷
Enghien	昂吉安公爵
Caulaincourt	科兰古
Ordener	澳德内尔
le duc de Berri	贝里公爵
le comte d'Artois	阿图瓦伯爵
le château de Vincennes	文森堡
Dessoles	迪索尔
Cadix	加德斯
Suétone	苏埃托尼乌斯
Hortense	奥坦丝
Bessières	贝希埃尔
Davoust	达沃斯特
Soult	苏尔特
Pérignon	佩里尼翁
Kellermann	凯勒曼
Mortier	莫何耶
Pelet de la Lozère	佩雷
Miot	弥永

Perrein l’aîné	沛函
Mayence	美因茨
Georges Rumboldt	安伯特
Mallet	马莱特
Lorient	洛里昂
Toulon	土伦
Decrès	德凯斯
Villeneuve	维尔纳夫
Gantheaume	甘斯特
Rosily	罗西
Bruix	布鲁斯
le comte de Stadion	斯达雄伯爵
Oubril	吴布瑞尔
Sardaigne	撒丁岛
Moniteur	《箴言报》
le comte de Cobenzel	科本茨尔伯爵
Bavière	巴伐利亚
Sardaigne	萨丁王朝
Machiavel	马基雅维利
Mack	马克
Ulm	乌尔姆
la bataille d’Alvenzi	阿尔维战役
la bataille de Wurmser	乌木兹战役
Schulmeister	舒尔迈斯特
Alexandre	亚历山大
Trafaldar	特拉法尔加战役
Collin-d'Harleville	科林
Barbé-Marbois	巴比
Wurtemberg	符腾堡
Austerlitz	奥斯特利茨

M. Hyde de Neuville	海德·德·诺维尔
Chevalier de Coigny	切尔瓦里·德·科尼尼
Talon	塔隆
M. Royer-Colard	罗耶·科拉尔
Larochefoucauld	拉洛施男爵
Débat	《论战日报》
Mercure	《文雅信使》
Publiciste de Suard	《宣传员》
Décade philosophique de Ginguené	《哲学十年》
Presbourg	普雷斯堡
Lucques	卢卡
Guastalla	瓜斯塔拉
Plaisance	普莱斯公爵
Neuchâtel	纳沙泰尔公国
la Dalmatie	达尔马提亚
l'Istrie	伊斯特尔
le Frioul	弗留利
Cadore	卡多雷
Bellune	贝鲁诺
Conegliano	科尼利亚诺
Trévise	特雷维索
Feltre	费尔特
Fleury	弗勒里
Bâle	巴塞尔
Malartic	马拉迪克
Favigny	菲维涅
Laberaudière	拉布罗杰
Juan	朱安海峡
Manuel	曼努埃尔

Hauguenau	阿格诺
Wisbad	维斯拜得
Vitrolles	维特罗尔斯
Tromeling	托梅岭
Macirone	马西罗
Lafayette	拉斐特
Reveillère-Lepaux	雷维耶·勒博
Leclerc	勒克莱克
Eugène Beauharnais	欧仁·德·博阿尔内
Bassano	巴萨诺
Vicence	维琴察
Padoue	帕多瓦
Rovigo	罗维戈
Bénévent	贝内文托
Williams Pitt	小威廉·皮特
Charles Fox	查里·福克斯
Montgaillard	蒙加亚尔
Eylau	埃劳战役
Dracke	德雷克
Spencer-Smith	斯宾塞·史密斯
Howick	霍威克子爵
Perlet	佩莱
Vitel	维特尔
le traité de Tilsitt	《提尔西特条约》
Bragance	布拉甘萨
Frédéric	弗雷德里克
Charles-Quint	查理五世
le grand-duc Constantin	君士坦丁大公
Baïonne	巴约纳
du château de Marrac	马拉克堡

Pradt	阿布·德普拉特
Pignatelli	皮内特里
Erfurt	埃尔福特
Brind	布兰德
Charlotte	夏洛特
Anvers	安特卫普
Valladolid	巴利亚拉多利德
Montagnes Noires	黑山
Tann	泰恩
Abensberg	阿本贝格
Eckmülh	埃克米勒
Ratisbonne	拉蒂斯邦
Schill	席尔
Saxe	萨克森
Essling	艾斯林战役
Danube	多瑙河
Laubo	罗博岛
Saint-Pierre	圣皮埃尔
Savone	萨沃纳
Miollis	米奥利斯
Radet	夏代
la bataille de Wagram	瓦格拉姆战役
Escaut	艾斯考河
Philadelphes	兄弟帮
Guidal	吉达尔
Gindre	冉德
Picquerel	哥海尔
Oudet	伍德
Schoenbrunn	舒特布伦
Cassius	盖乌斯

Louis de Narbonne	纳博
M.de Metternich	梅特涅
le comte de Schwartzemberg	施瓦岑贝格大公
Mme de Staël	斯塔尔夫人
lord Castlereagh	卡苏里子爵
M.Caning	坎宁先生
le marquis de Wellesley	威尔斯利侯爵
le comte de Liverpool	利物浦伯爵
Hawkesbury	霍克斯
Ocana	奥卡尼亚
Andalousie	安达鲁西亚
Ouvrard	奥维尔
Fagan	法根
Fesch	费持
Middlebourg	米德尔堡
Flessingues	弗利幸恩
Breda	布雷达
Ninive	尼尼微
Desmarets	德马雷
Ferrières	费里耶尔城堡
Straford	斯特拉福
Maillocheau	马洛
Étrurie	伊特鲁里亚
le comte de Molé	莫莱伯爵
Piombino	皮翁比诺
Lahorie	拉欧瑞
Marie-Louise	玛丽·路易
Cambray	康布雷
Surêne	苏瑞尼
Caroline	卡罗琳娜·波拿巴

Camille Borghèse	卡米耶公爵
L’île de la Tortue	龟岛
Artémise	阿尔特米希亚
Britannicus	塔尼库斯
Esculape	埃斯科拉庇俄斯
Ptolémées	托勒密
Gratz	格拉茨
grand duc de Berg	贝尔格大公爵
M. Labouchère	拉布歇尔
Mackensie	麦肯锡
Morlaix	莫尔莱
Marsan	马尔桑
Némésis	复仇女神涅墨西斯
Brème	不来梅
Lubeck	吕贝克
Holstein-Gottorp	奥尔登堡王朝
Duen of Oldenbourg	奥登堡公爵
Rambouillet	兰布莱
Cherbourg	瑟堡
Esmenard	艾斯门纳德
Kolly	科里
Ferdinand VII	费尔南多七世
Lavalette	拉瓦莱特
Valançay	瓦朗塞
Ludd	卢德
Derby	德比
Leicester	莱斯特
Flaugergues	弗拉格
Poméranie	波美拉尼亚
Wellington	威灵顿

Suchet	苏切特
Duero	杜罗河
Tormès	托尔梅斯河
Almenara	阿尔梅纳拉
Westphalie	威斯特伐利亚
Maret	马赫
Kourakin	库卡因
Lecourbe	勒古波
Macdonald	麦克唐纳
le comte de Czernitscheff	斯成诺夫伯爵
Bower	保尔
Potemkin	波将金
Pont-Carré	方桥
Moldavie	摩尔多瓦
le comte de Nesselrode	内斯尔罗德伯爵
le comte de Romanzoff	罗门佐夫伯爵
Antée	安泰俄斯
Scythie	斯基提亚
Dwina	杜维纳河
Caen	卡昂
le traité d'Utrecht	乌得勒支和约
Castlereagh	卡斯尔雷
Ferdinand IV	费尔南多四世
Michel	米歇尔
Kehl	凯尔
Pasquier	帕斯基耶尔
Dantzick	格但斯克
Dresde	德累斯顿
Wilna	维尔纽斯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Dorigobni	多瑞格尼
Viazma	维亚济马
Ghiat	杰哈
Mojaisk	莫扎伊斯克
Borisow	鲍里索夫
Livonie	利沃尼亚
le comte de Cathcart	卡思卡特伯爵
Hullin	郝林
Semonville	西蒙维耶
Mathieu de Montmorency	马修·蒙莫朗西公爵
Alexis de Noailles	亚历克西斯
Frochot	弗罗绍
Néron	尼禄
Doucet	杜塞
Laborde	拉铂赫
Grouchy	格鲁西
Kutusow	库屠苏
Bérézina	别列津纳河
Walpore	沃波尔
le duc de Lacépède	拉塞佩德伯爵
Bubna	布博纳
Frédéric-Guillaume	腓特烈·威廉三世
Saint-Marsan	圣·马尔桑
Breslaw	布莱斯劳
Oder	奥得河
Wartha	瓦尔达
Sprée	斯派里
Saale	萨勒河
Vistule	维斯瓦河
Hartwell	哈特韦尔

Bautzen	包岑
Wurtchen	乌尔城
Leignitz	力格尼茨
Plessevig	布莱茨威格
Posen	波兹南
Miër	米尔伯爵
lord Bentinck	本廷克勋爵
Lutzen	吕城
Mein	美因河
Reichembach	赖兴巴赫
Bacler d'Albe	巴克雷
Koenigstein	科恩斯坦
Torgau	托格
Wittemberg	维藤伯格
Magdeburg	玛德伯格
Friederichstadt	弗雷德里克顿
Marcolini	马克里尼宫
M. de Bubna	德布姆纳
Stralsund	施特拉尔松德
Stewart	斯图尔特
Pozzo-di-Borgo	波佐二博尔戈
Krusemarck	克斯马克
Laybach	莱巴克
Junot	朱诺
Chassenon	沙桑翁
Anstett	昂森特
Kutusoff	库图索夫
Kalisch	卡利施
Trachenberg	日米格鲁德
Stadion	斯塔迪翁

Aberdeen	阿伯丁
Carniole	卡尔尼奥拉
Trieste	特里雅斯特
Idria	伊德里亚
Willach	维拉赫
Save	萨瓦河
Bosnie	波斯尼亚
Fiume	里耶卡
Istrie	伊斯特拉半岛
Thalweg	塔尔韦格
le duc d’Abrantès	阿布兰特什公爵
Gallicie	加利西亚
Milhaud	米约
Hiller	海勒
Agram	萨拉格布
Frimont	弗雷蒙
Fenner	枋内
Morshal	莫沙
Sissek	西塞克
Carlstadt	卡尔斯塔特
Jeanin	震宁
Contades	宫塔德
Nugent	纽金特
Zara	萨拉
Raguse	罗格
Cattaro	卡塔托
Willach	维拉赫
Travis	塔尔维斯
Tyrol	蒂罗尔
Montalivet	蒙塔里维

Palud	巴罗德
Mme de Souza	杜萨夫人
Stéphanie de Bade	斯丹芙尼
Gant	根特
Flahaut	福来奥
Stuttgard	斯达格
Monteron	蒙特罗
Lainé	赖内
Saumur	索米尔城堡
Pino	皮诺
Clagenfurt	克拉根福
Drave	德拉瓦河
Adelberg	阿德尔贝格
Grenier	阁海涅
Felnitz	菲尔尼茨
Katsbach	卡兹巴赫
Gross-Beeren	毕戎
Culm	海乌诺姆
Isonzo	索查河
Fresia	弗雷西亚
Rabié	哈比
Gradisca	格拉迪斯卡
Leipsick	莱比锡
Tagliamento	塔利亚门托
Brenta	布伦塔
Bassano	巴萨诺
Montebello	蒙特贝罗
Palma-Nova	帕尔马诺瓦
Osopo	奥索波
Thuringe	图林根

Lodi	洛迪
Janet	珍妮特
Giffenga	吉夫伦加
Carbonari	烧炭党人
Viterbe	维泰博
Battaglia	巴塔利亚
Zuccari	朱卡里
Carascosa	卡拉斯科萨
Civita-Vecchia	奇维塔韦基亚
Saint-Ange	圣昂热城堡
Abruzzes	阿布鲁塞尔
Ancône	安科恩
Pesaro	佩萨罗
Rimini	里米尼
Pignatelli Strongoli	皮尼亚泰利公爵
Fermo	费尔莫
Ancône	安科恩
Vésuve	维苏威
Calabres	卡拉布莱斯人
Neipperg	涅普森
Trivulzi	杜威期
Lecchi	勒奇
Lavauguyon	拉沃
Via-Reggio	瑞吉欧
Lasal	拉斯卡尔
Barbou	巴尔布将军
Ancône	昂孔城堡
Modène	莫得勒
Ferrare	菲若莱
Félix Baciocchi	菲利克斯

Baciocchi	巴乔基
Volterra	沃尔泰拉
Lagarde	小拉加德
Modène	摩德纳
Prato	普拉托
Minutolo	明铎
Château Saint-Ange	圣天使城堡
congrès de Châtillon	夏第戎大会
Volta	沃尔特
Mincio	明乔
Vosges	孚日山脉
Faypoult	菲普勒
Brie	布里
Montereau	蒙特罗
Tacher	塔什公爵
Reggio	雷焦
Bondy	邦迪
Aragon	阿拉贡
Saulnier	索勒涅
Valence	瓦朗斯
Dauphiné	多芬
Vesoul	沃苏勒
Troyes	特鲁瓦
Angoulême	昂古莱姆公爵
Vaudémont	沃代蒙公主
Tullerie	杜伊勒里宫
Fontanes	翁达斯
Beurnonville	伯农维尔
Werner	沃纳
Blois	布卢瓦

M. de Blacas	布拉卡斯
L'affaire d'Excelmans	艾克斯事件
Thibaudeau	蒂博
Erlon	尔隆
Lefèvre-Desnouettes	勒菲弗
Broglie	德布罗意
Argenson	阿让森

Napoleon III

[法] 皮埃尔·德·拉诺 著　张宝元 译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

& Second Empire: Rising and Falling

中画史鉴
全景插图版
013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全景插图版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 皮埃尔·德·拉诺 著　张宝元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法）皮埃尔·德·拉诺著；张宝元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146-1657-6

Ⅰ．①拿…　Ⅱ．①皮…②张…　Ⅲ．①波拿巴（Bonaparte，Louis 1808-1873）－生平事迹②法国－近代史－1852-1870　Ⅳ．①K835.657＝41②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8461号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皮埃尔·德·拉诺　著　张宝元　译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李　媛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行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24.25

字　　数：312千字

版　　次：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ISBN 978-7-5146-1657-6

目录

序言

第1章　欧仁妮皇后

第2章　远征墨西哥、与教廷的斗争以及创造贵族的提议

第3章　拿破仑·热罗姆与欧仁妮皇后的政治斗争

第4章　夏洛特皇后求援及萨多瓦战役

第5章　保皇派、奥尔良派与第二帝国的政治乱象

第6章　权臣欧仁·鲁埃的恶政与误国

第7章　埃米勒·奥利维耶与自由主义在第二帝国的泛滥

第8章　1867年大阅兵与第二帝国全盛时期

第9章　戏剧化的自由主义改革

第10章　1870年战争爆发：导火索与罪魁祸首

第11章　色当会战与拿破仑三世投降

第12章　欧仁妮皇后逃亡、普法和谈与一代王朝的终结

专有名词对照

返回总目录

序言

值此《法兰西第二帝国史》第三卷《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1]问世之际，我谨以这篇序言献给我亲爱的读者们。

自撰写《法兰西第二帝国史》这套书以来，我时常被一些不同的声音困扰。因此，我有必要借这篇序言略作说明。

就第一卷《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一书某些章节中阐述的观点，我已明确答复持反对立场的朋友们。在此，我不想做任何补充说明。我也不想继续无谓的争论，因为一旦拉开争论的架势，双方谁也不想败下阵来，这难免会影响大家的情绪，难免会口出狂言，以同样激烈的言辞“回敬”对方，就像一场板羽球比赛，如果你不接招，那你就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作为一名文人，我犯不着如此小气。我宁愿静心撰写我的著作。风再大，只要储藏麦子的谷仓牢不可破，屋顶偶尔摇几下又有何妨？话虽如此，写一篇别具一格的序言还是有必要的，或许有助于读者朋友们对我的观点多一份理解。读者朋友们大可见仁见智。我仅以寥寥数语作为《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开场白。为了直接阐明写此书的目的，如实还原一段令人神往、陶醉而又惊心动魄的浪漫佳话，无关内容一概不提。

皮埃尔•德•拉诺

1893年2月于巴黎

---

[1]第一卷是《拿破仑三世的宫廷》，第二卷是《欧仁妮皇后》。——译

者注（本书中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说明）

第1章

欧仁妮皇后

之前，在写有关第二帝国的著作时，本着查缺补漏、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目的，书中的观点略带晦涩，且素材多以趣闻、逸事为主。因此，与闲情逸致的田园诗、充满血腥的叙事诗相比，我极少动容，几乎没有体验到感官上的震撼和情绪上的波动。

然而，讲述第二帝国后期故事的几个章节中，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因为更懂拿破仑三世了，所以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传奇人物的浪漫气息与戏剧化人生。在这些章节面前，后世任何一部描述浪漫、戏剧化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都黯然失色。此刻，独辟段落讲述拿破仑三世的故事，我激情澎湃。从前，这种情感没有这么明显。无论我的读者属于哪种党派，都应理解我的立场。不得不承认，拿破仑三世的性格比其他任何人的性格——不管是何种性格——都更值得研究、分析、解读。他就像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性格憨厚而又虚伪，天真而又愚蠢，虔诚而又多疑。

我把现代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英雄人物形象与拿破仑三世放在一起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不错，拿破仑三世是一位充满浪漫气息的英雄人物，不做作，有血有肉。他无法逾越尘世的各种利益纠结、世事的瞬息万变以及正常人的逻辑思维。

拿破仑三世的人生态度、不合常理的统治理念，不应使我们震

惊。尽管他没有意识到，但一生中他一直被动地扮演着不幸的“主角”；抛开他的冷漠、谨慎、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使命使他迈步向前，直面人生中的世事变迁和起起落落，就像连载故事中的主角一般。无论他神秘莫测还是激情四射，都注定要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认清拿破仑三世的人生态度及其独特的统治手段，你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奇怪了。难道他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出现不是始料未及，而是命中注定吗？难道路易•拿破仑亲王不是传奇与现实的结合吗？难道他不是被不可抗拒的使命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的吗？维克多•雨果写诗歌赞美他。阿道夫·梯也尔[1]著书讴歌他叔父[2]的辉煌。人们至今仍情不自禁地反复哼唱皮埃尔-让·德·贝朗热颂扬拿破仑一世的歌谣，以此来怀念随着拿破仑一世被流放圣赫勒拿岛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的美好过去。如今，人们的希望再次被点燃，拿破仑一世的精神在巴黎荣军院回荡。路易•拿破仑亲王受到一股非他所愿的力量驱使，在历史使命的感召下，想象着那个亦真亦幻的宝座，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真正的皇帝，而这段传奇中的主人公，亦神亦人，冥冥中注定他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注定延续叔父的荣耀”，再续阿道夫·梯也尔的历史著作以及皮埃尔-让·德·贝朗热的歌谣中被颂扬的拿破仑精神。命运注定如此，他是宿命的产物，只能听从命运的召唤，别无选择。

作为一名海员的儿子，路易•拿破仑亲王成年之际被带到波涛滚滚的海上。耳边萦绕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痛苦的呻吟，这种呻吟就像回声一般，久久不能散去。拿破仑家族神话般的影响力与耀眼的光环使他思绪万千，但他表面上却镇定自若。他谋划着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再次到来，希望他是拿破仑一世的化身。这是他的理想之一，但他既没有亲历奥斯特里茨战役[3]、滑铁卢战役，也没有亲历圣赫勒拿岛。命运却注定他与奇斯尔赫斯特[4]有“不解之缘”。奇斯尔赫斯特可能使人暴尸于荒凉的岩石上，但也有可能是最好的逃离之所或再次踏上光荣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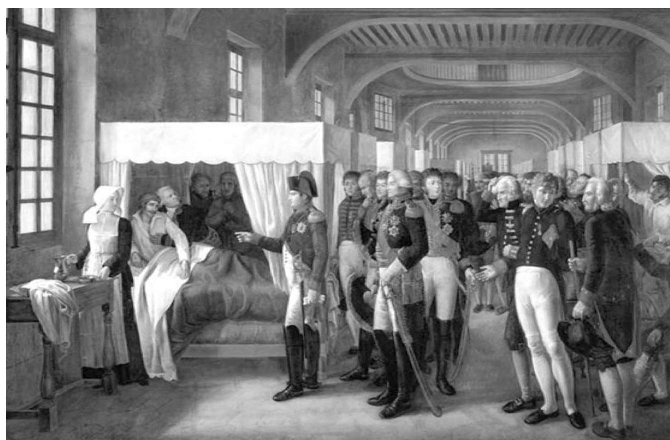
程的新起点。在法兰西新旧王朝更迭之际，命运使他选择了奇斯尔赫斯特，但他却没有再次踏上新征程。



路易•拿破仑亲王



拿破仑一世被流放圣赫勒拿岛



拿破仑一世在巴黎荣军院看望受伤的士兵

拿破仑三世的真实写照才刚刚开始，以上只是速写。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他一样做到完美的表里如一，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一样将自己的一言一行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与抱负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撇开世俗的说辞——诸如他没有智慧或愚蠢的谎言，以及由此而招致的不得不遭受的屈辱，一个真实的拿破仑三世顿时跃然纸上。在是否离开奇斯尔赫斯特、重回法国光复波拿巴王朝一事上，

他曾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似乎是他生不逢时、颠沛流离的童年时期的麻木不仁所造就的。当时，拿破仑三世龙体欠佳，给人以惰政的错觉。夜以继日的操劳似乎使他心力交瘁，尽管他强打精神，但于事无补，身体仍然每况愈下。在公众场合及官方活动中，他竭力掩盖这种状况，但每每事与愿违。作为帝王尊严的捍卫者，面对朝臣和谋官求职者的忠诚与敬意，他庄严、冷漠。然而，尽管深知如何扮演帝王这一“角色”，他却难免疲于应对各种情形。他本应拥有属于自己的时光去遐想——回忆他的过去，展望一无所知的未来。只有在远离尘世的是是非非时，他才欣喜万分。此时，他俨然一位贤者。摆脱精神与身体上的“枷锁”后，他是一位十足的贵族。

然而，深居皇宫的人却鲜知拿破仑三世真实的一面！尽管通过世人皆知的片段去了解他显得有趣，但不全面。我们不妨透过他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从他神秘的私生活中真正了解他。随着欧仁妮皇后政治野心的膨胀与虚情假意的递增，拿破仑三世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行为也越来越冷漠。政见不合的大臣们让他忧心忡忡，但把政事上的烦恼抛诸脑后时，他总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渴望别人快乐，给他们带来好运，就像一位家长，总是孜孜不倦地为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着想。他喜欢在杜伊勒里宫溜达。所见之人他都要致以亲切的问候。他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检查他收藏的每件艺术品——它们是懂艺术的人为他精挑细选的——就像参观博物馆时一样。他常常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嘴里叼着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皇后的寝室里。皇后和宫女们围成一团，闲聊散闷。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接着她们的话茬儿闲聊几句，有时会被她们逗得哈哈大笑。然后，他又悄无声息地迈着习惯性的、规则的、左摇右晃的步伐离开了，正如进来时一样。有时，他只带一名朋友或一名副官，亲自驾驶一辆四轮敞篷马车，在仅有一名随从陪同的情况下微服出宫。然而，他更喜欢徒步穿越杜伊勒里宫的排房，信步塞纳河岸。在密友的陪同下，通常是勒皮克将军或弗勒里将军，他会徒步走几个小时的路，途中一言不发，时而凝视着河岸，时而注视着公园中欢快而又无忧无虑嬉戏的孩子们。其实，他的身边

也有这样一个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因为他的娱乐受到官方礼仪的严格限制。这个孩子就是皇帝的儿子。皇帝深深地爱着他，就像深深地爱着上帝一样。为了爱子，在帝国倒塌之际皇帝选择了继续活下去；为了挽救爱子的性命，他曾两度差点儿了却此生。对强加在儿子身上的枷锁，拿破仑三世甚是烦恼。他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享受童年的乐趣呢！他多么希望儿子能和他们一样天真快乐、无拘无束，但宫廷礼仪却不容许，只能与宫廷里和他一样可怜的孩子经历那里特有的“童年”。



奥斯特里茨战役



滑铁卢战役

然而，一天下午，拿破仑三世梦想成真！他牵着儿子的手，把儿子带到杜伊勒里宫旁边的公园里嬉闹的孩子中间，这些孩子的父母亲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面，看他们玩耍。当有人认出皇太子时，周围的

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闹哄哄地朝他们围过来，想一看究竟。镇定自若的皇帝对他们付诸一笑，向人群欠了欠身，然后把儿子推向嬉闹的孩子们。“去吧，”他说，“去和他们一块儿玩。”害羞的小太子先是犹豫了一下，突如其来的自由使他有点儿纠结——这可是第一次与“人”接触啊！“去吧，路路，”皇帝不断地鼓励道，“去和他们玩吧。很快，你就会发现他们多么友好。他们会慢慢接受你的。”那天，皇太子的确与平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了，而他的父亲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玩，内心充满喜悦，让人备感亲切。

回到杜伊勒里宫时，拿破仑三世释然开怀，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只有在有心人的脸上才能流露出来。用晚膳时，他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了这段小插曲。然而，没等他讲完，皇后脸色大变，粗鲁地打断了他的故事。

“简直荒唐至极！”皇后愤怒地说道，“您为什么要让路易与那些他永远不该认识的、没教养的孩子一起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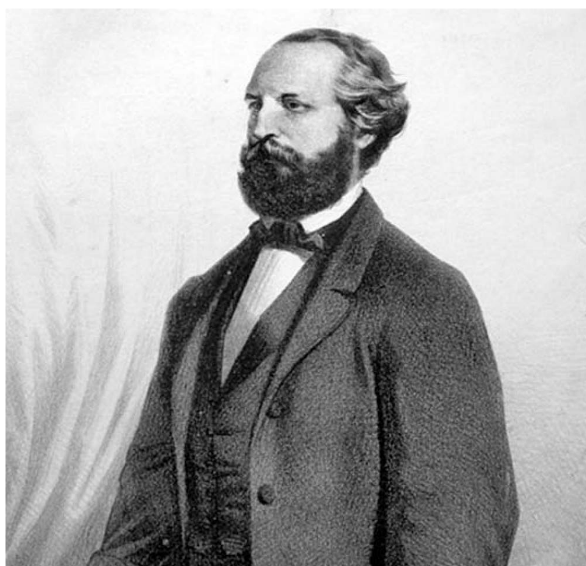
看着其他正在用膳的人，拿破仑三世表情痛苦。“不是所有的孩子，”他竭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反驳道，“不是所有在公园中玩耍的孩子都没教养。”

他欲言又止，先前洋溢在脸上的喜悦顿时凝固了。在这样的场合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场合，年轻气盛的皇后总是出言不逊，咄咄逼人，浑然不知丈夫内心真实的想法，冷不丁便让丈夫颜面扫地。

我想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到过皇后对皇太子冷淡无情的事。在皇太子成长的过程中，这位母后总是严厉地、几近苛刻地要求他的一言一行。从她身上他一点儿也体会不到一个孩子本应得到的来自母亲的、神圣的爱。然而，相比皇后，皇帝只能把对儿子的爱埋在心底。因此，一味地强调皇帝对儿子的挚爱之情或以此来衬托皇后对儿子的冷漠无情，是没多大意义的。简而言之，这会使进一步了解拿破仑三世

性格中与生俱来的仁慈变得无据可考。或许他对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不仅对孩子和蔼可亲，而且对其他人，甚至是敌人，同样和蔼可亲。对此，我只举一例，足以说明他这种鲜明的性格。

当是否该免除菲利斯•奥尔西尼[5]死刑的诉求被呈给拿破仑三世时，大臣们一致认为这种大事应由内阁商议后定夺。于是，内阁随即召开会议。在会上，拿破仑三世据理力争，主张行使他的赦免权，而议员们坚决维持原判。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就此爆发。会议持续了整整一晚上，但争论仍未平息，陷入了僵局。意识到僵化的局势即将带来一场政治危机时，他极不情愿而又悲伤地选择了妥协。



菲利斯•奥尔西尼

该事件只是拿破仑三世不为人知一面的一个真实写照，权且不论他是否是一位政治家。这种基调或许有失公允，但在我讲述与他有关的任何事件时，我没法做到回避他的真性情。

与欧仁妮皇后流露出的苍白无力的情感相比，拿破仑三世赤诚待人，十分珍视友谊。欧仁妮皇后也曾想让自己变得随和、平易近人，

但这种尝试不久便失败了。拿破仑三世的性格与欧仁妮皇后恰好相反，他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一旦动起情来，便坚定不移，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勾心斗角、相互算计充斥着宫廷。在这个精英云集的地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跻身宫廷便意味着飞黄腾达，将会得到无限荣耀。然而，精英之间难免意见相左，也不排除只为寻欢作乐而持悲观立场的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团体里，算计、竞争甚至敌对再正常不过了，同时也不可避免。因此，相互算计倒也显得公平。人们都对前途置若罔闻，于是不正之风兴起。人人利欲熏心，整天沉浸在寻欢作乐中。

面对宫廷中泛滥的不正之风，拿破仑三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暗地里时刻关注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谁是谁非他心知肚明。因此，当有人厚着脸皮向他要这要那时，他总是显得很不耐烦。尽管他的朋友难免有时也卷入是非的旋涡，但他对朋友的信任却丝毫未减。事后，他和朋友谈及此事时，他们总是一笑了之。

“不要自我辩护，”一天，他对一位因对手的忌妒而遭到诽谤的朋友说，“尽管有人对你风言风语，但我对你的信任一如既往。”

正因为他说的那些暖心的话，他赢得了臣民们的爱戴。说句公道话，即便在帝国崩溃之后，这些人仍对他不离不弃，誓死效忠。然而，有些权臣不堪忍受一再的攻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出国民议会，离开杜伊勒里宫。



欧仁妮皇后



拿破仑三世

然而，权贵之间的相互算计并未因此而停止。久居宫廷的大臣、贵族以及其他精英仍然见风使舵，竭尽所能地排挤、算计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这些受到欧仁妮皇后支持、保护的贵族和佞臣目中无人、薄情寡义。因政见不合，他们费尽心思挖苦、辱骂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精英，如作家、科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拿破仑三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臣们视杜伊勒里宫为某种形式的战利品，堂而皇之地搜刮、抢劫。任何一位新跻身于此的人都被视为眼中钉，禁止越雷池一步，除非他能出其右，或深得皇帝宠幸。

说到“抢劫”，这个词分量有点儿重。拿破仑三世的私人房间被分为几个等大的区域，部分是用于会客的，部分是家臣的。拿破仑三世视金钱如粪土是众所周知的，与大臣们对金钱的贪恋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要想从欧仁妮皇后那里“抢劫”任何战利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欧仁妮皇后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佩帕[6]详细地记录了后宫的每笔花销。因此，没人能从欧仁妮皇后的开销中捞到一点儿好处，除非欧仁妮皇后恩赐。既然抢劫欧仁妮皇后无门，他们便把目光投向皇帝，对皇帝的东西几乎是想拿就拿。皇帝对这些抢劫行为熟视无睹。他惧怕无休止的争论，也疲于施以无尽的慈悲。他不是唯一一位意识到这种情况存在的人，勒皮克将军是为数不多敢于面谏皇帝此等丑闻的人之一。

“陛下，您被抢劫了，”一天，勒皮克将军说，“如果您不下令终止这种挥霍之风，杜伊勒里宫不久将不属于您了。”

皇帝很伤心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彻查此事或许有点儿困难，”勒皮克将军接着说，“您身边最忠诚、正直的三个人将受到牵连。”

考虑到将军这句话的严重性，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事实上，他身边最亲近的人，那些宣誓永远效忠他、随时准备好为他献出生命的人也在公然抢劫他。他们似乎没觉得这是对皇恩的亵渎，竟然把对皇恩的亵渎与对皇帝真正的爱混为一谈！这确实自相矛盾，是在拿感情做赌注。然而，我坚信，即便这些人从皇帝身上捞不到一点儿好处，他们对皇帝的忠诚还是毋庸置疑的。皇宫本就是这样，或许在杜伊勒里宫这个特定的圈子里，是与非的评判标准与外部世界是有差别的。

杜伊勒里宫不仅有一套独立的道德标准，也有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欧仁妮皇后的西班牙情结很重。即使在看别人玩哑剧字谜游戏时，她也忘不了低声祈祷。她成功地把具有西班牙风格的礼拜仪式带

到了后宫。宫中的男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虔诚的信徒，一类是趁做弥撒的机会偷偷溜进情人闺房的花花公子。看到心仪的梦中情人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女子顷刻之间变得轻佻无度，公然与情人在忏悔室里玩起了亵渎神灵的勾当。

接下来，我要讲个关于杜伊勒里宫中的宗教仪式的故事，仅供读者参考。

欧仁妮皇后的母亲蒙蒂若夫人[7]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每次见到女儿时，总忘不了问问皇帝灵魂净化的事情。

“他对慈悲的上帝态度如何？”她经常会这样问，“他心中有圣母吗？他对上帝和圣母的态度如何？他做功课时认真吗？”

欧仁妮皇后总是这样回答：“皇帝与善良的上帝、圣母相处融洽。他例行弥撒、忏悔，对教堂总是很慷慨。”

的确是这样。拿破仑三世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对宗教信仰的狂热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然而，只有当宗教教义与国家利益一致时，他才表现得很虔诚；他的这种宗教倾向俨然影响了整个国家对教堂的态度。为此，他竭力避免与皇后争执，更不愿看见岳母因宗教仪式问题对他唏嘘不已。他并非真正的虔诚，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这样，在妻子的调解下，他开始拥护罗马教皇。他开始关注主教，并逐渐赢得了主教助理的好感。谈到这种拿腔作势的虔诚时——事实上，不得不这样做——拿破仑三世曾给几位挚友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御书房里只有他们几个人。御书房是皇帝唯一一个私人场所。只有在那里，他才可以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皇帝。



杜伊勒里宫

故事是这样的。在皇帝与皇后参加一次乡间宗教庆典时，皇后要求皇帝向上帝真诚地忏悔，认为此举可以拉近他与神职人员之间的距离。带头悔过，皇帝责无旁贷，但不巧的是，主教与神父——通常情况下负责听取忏悔——都不在场。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主教助理忏悔。拿破仑三世顽皮的秉性在他故作无辜的脸上一览无余。他幽默而又不失睿智地开始忏悔，但始终无法严肃起来。为使主教助理赦免自己的罪过，拿破仑三世竭力克制自己，不使场面失去控制。可怜的主教助理因领受的这个异常任务开始变得坐立不安。在忏悔室坐下时，他心里忐忑不安。当拿破仑三世开始忏悔时，你能想象到当时主教助理的表情吗？拿破仑三世已经想好该怎么做了。他打算给自己胡乱编造些罪名，以此来搪塞主教助理。每当拿破仑三世开始忏悔时，主教助理就急匆匆地连续咳嗽几声，示意他不要继续下去了。因为主教助理惧怕拿破仑三世坦白他的深重罪孽。拿破仑三世已注意到主教助理的滑稽伎俩。随着越来越紧促的咳嗽声，拿破仑三世停下了。

“我仁慈的主教助理，你感冒很严重，”他说，“在你咳嗽未减缓之前，我将暂停忏悔。我罪孽深重，想让你继续听我忏悔。”

咳嗽声戛然而止，但主教助理显得更加迷惑不解。

“陛下，”他说，“如果您愿意，我立即为您赦免。您的忏悔深深地打动了我。”

拿破仑三世坚持要彻底忏悔，而对面的主教助理则认为皇帝可以得到赦免了。

“贵为皇帝，”他机智地说道，“在我看来，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与您相提并论。因此，我恳请您，陛下，请允许我给您开个小灶。”

被主教助理的机智弄得半惊半喜的拿破仑三世没继续纠缠下去。离开忏悔室时，他给主教助理留下了一笔不菲的资助费。

蒙蒂若夫人喜欢在宗教事务上指手画脚，经常自哀自叹。拿破仑三世对此诚惶诚恐。他不是因为这种哀叹而怕岳母。当初，要说有谁能够在拿破仑三世与他中意的未来妻子的婚姻问题上横插一杠的话，这个人非蒙蒂若夫人莫属。他了解皇后的过去，知道她的为人，也清楚她有时不分善恶，并刻意美化自己。他真心不希望年轻的妻子与她的母亲太过亲密。蒙蒂若夫人在巴黎时，每天都要去见女儿。回到西班牙后，她动不动就给女儿写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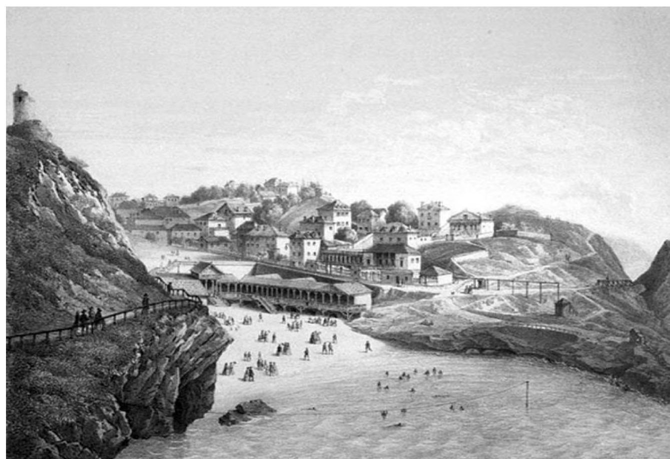
迎娶欧仁妮时，拿破仑三世已心无旁骛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宝座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他曾怀疑过自己的决定，尽管该念头不久便被这个年轻姑娘的威严打消了，但还是给他留下了疑问，就像所有的男人对自己的未婚妻都持有疑问一样。将怀疑埋在心底或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欧仁妮向拿破仑三世坦白她曾爱过其他人，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她曾随母亲去过许多时尚的温泉疗养地，在巴黎、马德里以外国人为主的奢靡交际圈里生活过。在这些地方，欧仁妮与那些爱慕她美貌的男士频繁幽会。因母亲的纵容与怂恿，她曾撕毁了几份婚约。拿破仑三世对她的感情史耿耿于怀。可见蒙蒂若夫人在触及道德底线时几乎是毫不犹豫的。

毫无疑问，蒙蒂若夫人的性格有点儿古怪，但她一直这样。她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带着一点儿现代都市女人的俗气，以女儿的姿色为荣，到处物色中意的女婿。这种类型的女人如今在地中海的沙滩上处处可见。当时，法属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因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兴起而被视为不二的度假胜地，那里也成了蒙蒂若夫人的首选地。

坐拥十万法郎年金的她每年夏天都会去海滨度假，通常是比亚里茨，秋季、冬季则选择在巴黎度过。由于几位权贵朋友，如曾任驻普鲁士公使的罗什朗贝尔侯爵，为她敞开了大门，她领着女儿，经常出没于各种“沙龙”。她是法兰西喜剧院、巴黎歌剧院的常客。在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公馆内，她经常接见名流。云集“沙龙”的政客们无一例外地垂涎那位年轻姑娘的姿色，而年轻的姑娘以她惯用的伎俩使每位政客都徘徊在希望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蒙蒂若夫人倒也坦率、真诚。只要能给女儿物色到一个合适的郎君，流言蜚语甚至诽谤对她来说在所不惜。虽然女儿的婚事该有个“了断”了，但现在看来却遥遥无期。年轻的姑娘假装单纯，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然而，当被锁定的目标离开自己的视野时，她就会原形毕露，像珠宝商掂量手中的黄金有多重一样，反复衡量目标的价值，如目标分量不够，没有万贯家产，不能为自己的雄心壮志增砖添瓦，不合母亲的心意的话，她就会毫不客气地信手一扬，将他晾在一边。这位母亲对女儿可真是慈爱有加。尽管她以特有的方式疼着爱女，我们仍不禁感到震惊，因为这有违法国人的传统。有违常理的疼爱方式要么说明她真的很疼爱女儿，要么另有所图，而我们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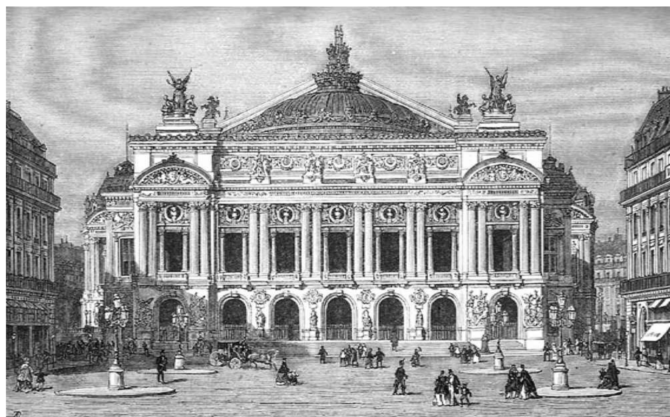
如果这段可能的婚姻无利可图，即便对方身份显赫，亲王也好，大臣也罢，蒙蒂若夫人绝不心慈手软。在这场婚姻追逐赛中，她只以女儿的切身利益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她的道德情操与人们嗤之以鼻的某些卖笑者的母亲如出一辙，只不过她既不贪婪，也不自私。



风景优美的亚里茨



法兰西喜剧院



巴黎歌剧院

读者们或许还记得蒙蒂若夫人写给朋友罗什朗贝尔侯爵的那封信吧。信是在欧仁妮小姐与拿破仑三世的婚事定下来之后写的。这是一封谈心信，信中言辞切切，饱含真情。被这突如其来的喜事冲昏头脑的蒙蒂若夫人当时只有一个念想：她会从女儿的这段美好姻缘中得到什么，却没料到过度的喜悦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当女儿成为皇后后，蒙蒂若夫人的地位随即发生了变化。然而，她却不得不遵守严格的宫廷礼仪。在内心深处，她或许渴望昔日的无拘无束。从此，她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四处窥探，盘根问底，满腹牢骚，给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为得到自己喜欢的奇珍异宝，她挥金如土。她的每笔花销在杜伊勒里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她给女儿写的一封封恳求信也传遍了杜伊勒里宫。如果她的行为不受约束的话，她将会拖垮杜伊勒里宫，但拿破仑三世却说她的行为并没什么异常。简而言之，蒙蒂若夫人绝非善类，但也不是罪不可恕。拿破仑三世受过她的影响，但绝不是事事言听计从。命运愚弄了她，而她却浑然不知。在皇帝的家庭生活中，她只不过是一位拥有漂亮千金的平民母亲，仅此而已。一位贵族某一天看上了她女儿，并与她女儿结为伉俪，但他却不漏声色地把岳母藏了起来。这只是上流社会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普通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拿破仑三世。

在从前的著作中，我讲过很多趣闻逸事，并如实地叙述了拿破仑三世真实的家庭生活。以一个外人的眼光看待皇帝的家庭生活时，它和谐而又令人满意。然而，从皇帝与皇后名噪一时的分居期间相互来往的充满感情纠葛的信件中一探究竟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结合其实是不幸福的。一方面，他们如火如荼地爱着彼此，而另一方面，赤裸裸的利益冲突使他们争论不休、相互算计，但他们谁也不愿离开对方，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仓促成婚的。这种结合注定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狂欢之后的冷静思考使他顿生厌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一切恰似幻觉。他能感受到的只是在他做出多次牺牲甚至蠢事后得到的物质上的短暂快乐，而这种快乐是最肤浅、最稍纵即逝的。他深感妻子与他分属两个精神世界。她对他的所爱所感要么一无所知，要么置若罔闻。他心中充满了辛酸。面对丈夫刻意的冷落，这位妻子尽管没真心爱过他，却毫不介意丈夫的款款深情、软磨硬泡与阿谀奉承。为了抚平受伤的虚荣心，她变得桀骜不驯，喜怒无常，惶恐不安，进而疑神疑鬼。这就是拿破仑三世传奇式的爱情，这也是欧仁妮皇后传奇式的爱情。

然而，他们也有过三年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要从他们的结婚之日，即1853年1月30日算起，直到1856年3月16日皇太子出生。自此之后，两人之间的亲密荡然无存。拿破仑三世抛弃了妻子，寄情于投怀送抱者。

当时，这位年轻的妻子或许还是有可能重新赢得丈夫的宠幸的。她在恋爱期间留给皇帝的好感，从那些由普罗斯佩•梅里美[8]口述，以她的名义写给皇帝的，使皇帝陶醉的情书中可见一斑。尽管当时她已权倾朝野，但对如何经营婚后生活却一无所知。因生性冷漠、薄情，她能展现给别人的只有虚情假意。就这样，她无力左右丈夫对她的爱，而她的丈夫在经历了当初的激情与盲目的奢望后，猛然发现自己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他对此确信无疑。妻子不再令他满足，他无情地离开了她，就像情夫抛弃一位不再受宠的情妇一样，留下形单影只

的她独自面对残酷的单相思。

如果皇后能对婚姻的认识再深一点点，他们的家庭生活指定会少许多孤寂。她或许有办法让心地单纯的丈夫回心转意，即便不能回到当初，但无疑会缓解两人之间持续发酵的冷战。然而，她有头无脑。在不断膨胀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她喋喋不休地埋怨，甚至数落皇帝。皇帝为此烦恼不已。慢慢地，他离家越来越远。他们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生性温和的拿破仑三世竭力避免与妻子正面交锋。每当看到怒火中烧、不依不饶的她时，他总是借机溜掉。无休无止的争吵使他不安，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家。然而，只要他在皇宫里，皇后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找到他，然后继续缠着他。即便是在御书房——唯一可以让他缓一口气的地方，他也不是绝对安全。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他正埋头研习或会客时，书房的门会被悄悄推开。透过门缝，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后的面容，她板着脸，神情焦虑，好像在探寻着什么。如果来客碰巧是一位女士，等会客结束后，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责骂之灾在所难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要看皇后的脸色。



欧仁妮皇后与皇太子

拿破仑三世生性好色，并深得女人欢心。然而，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要是拿破仑三世能在自己的家中得到他想要的爱情与温存，他就不会到处猎艳了。分居或离婚也许就能一了百了，但这些途径——我已在其他地方做过说明——是不适合拿破仑三世的。他重获自由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内心浮躁，既无法重拾幸福，也无法静心履行帝王的职责。

欧仁妮皇后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决策及私生活影响甚大。我们甚至觉得皇后在家中给拿破仑三世情绪上造成的不安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决策，削弱了他的意志。皇后倒显得无所不能。这种影响为帝国之后制定的让人嗤之以鼻的内外政策埋下了伏笔，进一步凸显了作为权力核心的拿破仑三世的软弱无能。结果，政客们渐行渐远，百姓离心离德。事实上，这种影响间接导致了1870年的战争[9]。这无疑是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心理”解读——“心理”并不总是个浪漫的词。

为避免招致不必要的批评，同时为澄清我写这部著作的初衷，我已明确示意，我无心撰写第二帝国“史”——如果仅从“历史”一词所赋予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通过描述特定的人、事以及相互交织的关系，我想给大家再现那个活生生的时代。有人执意曲解我的观点，但也有人赞同我。我不急于强调目的，也不急于表明立场，只希望能避免无谓的争论与批评。

我讲述拿破仑三世私生活的基调一直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

人们熟知拿破仑三世在杜伊勒里宫的私生活并不怎么称心如意，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开怀大笑；人们也知道拿破仑三世皇帝身边有几位睿智而又贴心的朋友，这些人千方百计地为皇帝排忧解难。

当时，宫廷盛行玩哑谜猜字游戏，看“活报剧”。臣民们获悉后感到十分惊诧，严厉批评这种不正之风。杜伊勒里宫的“常客们”顿时警觉起来。接着，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应运而生，那就是所有发行的报纸都应尽量不刊载与皇帝、皇后有关的任何私事，甚至规定任何刊载有关皇室生活的外国报纸在流入本国之前应被没收。读者朋友们或许不会忘记这样一件事：皇后和大臣们当时都怒不可遏。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大谈特谈枫丹白露宫流行的一种哑剧字谜游戏，以此来发泄愤懑之情。

这里有一份颇有意思的私人笔录。笔录的内容既反映了宫廷对舆

论的普遍恐惧，也不失偏颇地反映了宫廷对臣民的态度，并尽可能详实地再现了权贵们高高在上但事无巨细的精神世界。该笔录的作者说：

> 为保全皇后陛下的面子，所有在圣克卢宫以外地方发行刊载猎奇新闻的报纸都应受到禁止。这些报纸也会详尽报道贡比涅即将发生的每件大事。《蜡笔头报》在召开编辑事务会议后决定宫廷秘事不应公诸于世。理由如下：要是能读到拿破仑一世时期的《箴言报》，你最多能看到如“皇帝猎艳了”的简单报道。这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
> 这为愤愤不平的敌对分子继续他们的卑劣勾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善于抓住可利用的一切机会破坏、瓦解、颠覆甚至毁灭帝国。法兰西人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好色的君主不会是出色的统治者。农夫们挤在谷仓内，对宫廷的“奇闻趣事”——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评头论足，以此来打发漫长的冬夜。拿破仑一世对此心知肚明——《箴言报》言简意赅地报道“皇帝猎艳了”不过是说实话罢了。很多时候，即便是这样的报道也不会见诸报端。忧心忡忡的臣民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进而加重他们的负担。
>
> 我们认为，任何有关皇后日常梳妆打扮之类的报道都有失妥当。不需我们添油加醋、推波助澜，她已然“中枪”。
>
> 然而，这并非全部。法兰西人天生热爱猎奇，一旦有目标，无论是否亲眼目睹，猎奇心油然而生。尽管这有点儿奇怪，但却是事实。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旦百姓知道皇帝和皇后不顾他们的死活，恶意使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蒙受灾难等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包括我们在内的三千六百万法兰西人

中传开，结果将会是什么样子——只能滋生更多的嫉妒，进而为接踵而至的诽谤提供线索。

《蜡笔头报》不得不承认，报道是被一些鲁莽的傻瓜有意提供给那些四处探寻、伺机报“一箭之仇”的狡猾狐狸的。事实上，宫墙之内也暗藏着许多敌人。

《蜡笔头报》恳请禁止记者进入贡比涅，并认为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从此，世人将无从得知宫廷的任何“奇闻趣事”了。

这些用铅笔写的文字出自一名匿名作者，像是普罗斯佩•梅里美的笔迹，极有可能是他写给欧仁妮的忠告——提醒她在将来的婚姻生活中这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不能无谓地夸大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对那些像我一样试图从心理层面剖析法兰西第二帝国特征的人来说，它们无疑是有用的。至于后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我无从得知。我希望，在从那些曾使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纷繁杂芜的史料甚至意外事件中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段奇特的历史时，后人比我少一份困惑、多一份理解。



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在枫丹白露宫接见外使

在杜伊勒里宫，在皇帝和皇后[10]的周围，还有什么事不使人困惑，还有什么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呢？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已经看到杜伊勒里宫对任何一件有可能使其暴露于公众视野中的事情是多么惊恐万状，那些独揽大权、掌握国家命运的权贵对任何一件有可能削弱他们权力、有损他们声望的事情多么心惊胆战！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君臣们一方面因他们的日常娱乐与生活细节见诸报端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却自觉不自觉、反复无常地继续充当着当时最时尚的轻歌剧中的角色。“撒旦”雅克•奥芬巴赫[11]创作的轻歌剧不仅深受大众喜爱——演员们在舞台上怪诞的表演使他们大受鼓舞，备感自豪——也深受帝王将相、王公大臣、达官显贵以及军界要人的青睐。他们的双眼被愚蠢的虚荣心蒙蔽，对民众的嘲笑声置若罔闻，全然不知他们就是布姆将军和大公夫人取笑的对象，因为他们就是现实版的布姆将军和大公夫人。法兰西第二帝国带来的表面上的辉煌使他们不可一世，无心正视潜在的对手，而这些对手要么深藏不露，要么阳奉阴违。但百姓们却不买这个账，他们对剧中的角色指名道姓。为更透彻地了解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我给大家提一条微妙的建议，请往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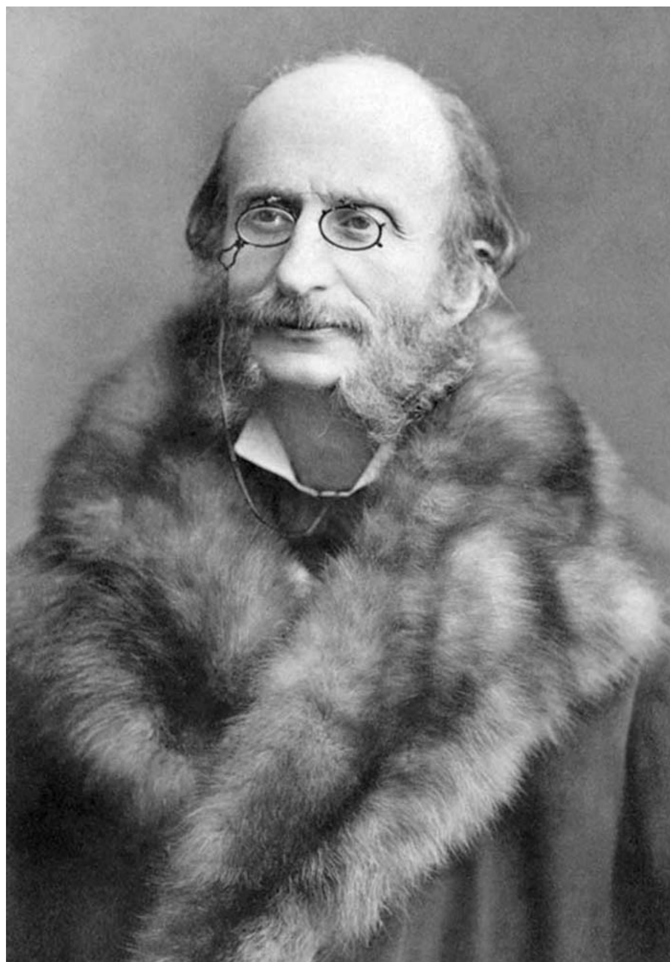
我突然饶有兴趣地想起了雅克•奥芬巴赫。像一位老练的放映机操作手一样，他把一束强光投向人们的心里，激发了人们心中的光。光带着强烈的仇恨，无情地蔑视一切甜美的幻想。“拙劣”的作品使他如日中天。他那长长的、恶魔般的身影在已分崩离析的人群中来回游荡，卷起一阵阵令人躁动不安的旋风。他就像一位巫师，一边主持着神秘的纵欲仪式，一边担任充斥着嘲笑、荒唐、奢靡以及轻浮、赤裸情色交易的管弦乐队的指挥，演奏的序曲仿佛通往地狱之门的召唤，高潮部分是嘈杂的喧嚣，最后在一片寂静与空旷中结束。

我清晰地记得他去世不久后的某一年我站在他灵柩旁时的情景。“那具尸体，”我身边的一位男士说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具社会主义者的尸体。没错，是他把帝国带向了坟墓——法兰西第二帝国本应千秋万代。”

他说的没错。雅克•奥芬巴赫的贡献在于，他本人就是那张落入法

兰西第二帝国死敌之手的王牌。因为他的存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威望一落千丈。在佯装给布姆将军和狂躁不安的阿基里斯的袖口系上镀金饰带，将上尉军帽上的羽饰取下来插到下士弗里茨帽子上的过程中，雅克•奥芬巴赫悄然公演了一幕革命剧。在振聋发聩的喧嚣中，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步步走向瓦解，而摆放在剧院舞台上的脚灯在罗什福尔《灯笼》强烈的火焰中闪闪发光。他时而仰天大笑，就像那些被他的诙谐、风趣的言行逗得捧腹大笑的人一样；时而愕然失色，就像全身心投入到四对舞[12]或波莱罗舞[13]而被重乐器击打声吓得不知所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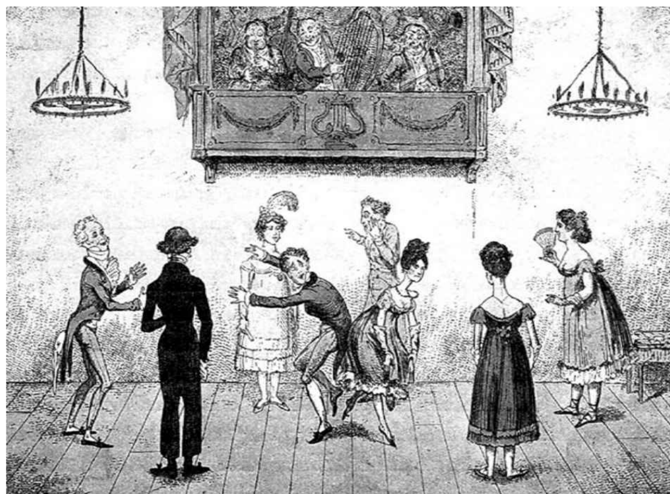
他为皇帝、国王、亲王、元帅及各级官员们准备了一份留作将来吞食的辣乎乎、酸溜溜的特大份色拉。当立法院“五人团”的反帝国浪潮波及百姓时，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不甘示弱的奥芬巴赫随即挥起手中的指挥棒，狠狠地敲打着君主们的脑袋。



雅克•奥芬巴赫



正在跳波莱罗舞的少女



四对舞

他是莫里哀[14]再生，奉命演奏吱吱作响的小提琴。在这些传播革命思想的歌剧演员面前，他不止一次撕下伪善的面具，发出歇斯底里的嘲笑声。伴随着掌声与赞许，他不止一次拿起铃铛，用力摇晃。铃音在被他愚弄的人的耳边不停地回荡。

这个世纪因滋生了一代疑神疑鬼、贪图享乐的人而受到诟病。该定论还应包括施耐德小姐[15]精彩的一幕，她手握父亲的利剑，闪电般刺向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施耐德小姐手中挥舞的这把剑锋利无比，剑剑击中目标，留下散落一地的旧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夸大雅克•奥芬巴赫排山倒海似的摧毁力以及势不可挡的民主精神。尽管随着音乐的跌宕起伏，他颠覆了一些世俗的偏见，粉碎了一些愚蠢的幻想，但因此不去追究他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就显得太孩子气了。雅克•奥芬巴赫开创了一个以嘲讽为时尚的新纪元，使整整一代人沉浸在怀疑与放肆的死亡舞曲中不能自拔。那些认为他的笛声与鼓声随着他的离世而终止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他的名字永远和法兰西第二帝国交织在一起。在他那铿锵有力的最后一击下，法兰西第二帝国轰然倒塌。他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精

神世界的奇葩写照。他是茫茫大雪中的一片雪花，当一片片雪花积累到一定厚度时，便随着地动天摇的雪崩一路向下，裹挟着拿破仑三世及他的帝国直奔命运的深渊。为不失公允，为不抹杀同他一道充当帝国蛀虫之辈的“丰功伟绩”，在这里提他显得非常有必要。在腐蚀拿破仑三世一生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的茫茫沧海中，他是那不可或缺的一滴。

拿破仑三世与常人不同——不管他们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他宅心仁厚，和蔼可亲。如果刻意去抹灭他常常带给人们欢声笑语的事实，一味紧抓着他的小辫子不放，显然会使人嗤之以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职业道德家也并非无过，只是比信徒神圣了一点儿而已。然而，我无意伙同他们对拿破仑三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也不苟同他们因任何风吹草动而对皇帝的抱怨。除了拿破仑三世不同时期找的两三个情妇外，这些越轨行为都没有对杜伊勒里宫的决策产生任何直接影响。这些女人只不过是拿破仑三世一生中的匆匆过客，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然璀璨迷人，但瞬间就消失在漫漫黑夜中。

过去流行一个令人如痴如醉的习俗——热恋中的情侣们会把玫瑰花瓣撒在彼此的头发上。尽管我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拿破仑三世的倾慕之情，但会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的软弱。但愿后人不要因为他的软弱而心生怨气，而要以法兰西人一笑泯恩仇的豁达正视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

[1]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8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871—1873）。

[2]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登基后称“拿破仑一世”。拿破仑三世的父亲是他弟弟。

[3]奥斯特里茨战役（Battle of Austerlitz）是拿破仑战争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拿破仑大军在奥地利帝国奥斯特里茨村附近大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二世的联军，因此这次战役也称“三皇之战”。这次战役打垮第三次反法联盟，迫使奥地利签订了《普雷斯

堡条约》。奥斯特里茨战役与坎尼战役、高加米拉战役齐名，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4]奇斯尔赫斯特（Chiselhurst）位于英格兰伦敦东南郊区。被德国释放后，拿破仑三世来到这里度过了余生。

[5]菲利斯·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1819—1858），意大利烧炭党领袖、革命分子。他认为拿破仑三世严重阻碍了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进程。于是，他谋划行刺拿破仑三世。1858年1月14日，他和其他两位革命分子在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前往剧院的途中往他们的座驾下投掷了几颗炸弹，爆炸造成严重伤亡，但皇帝与皇后侥幸脱险。——原注

[6]据考证，佩帕应是欧仁妮皇后的管家。

[7]即玛丽亚·马纽埃拉·基尔巴特里克（María Manuela Kirkpatrick，1794—1879），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后欧仁妮的母亲。

[8]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中篇小说之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为法国建筑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9]指普法战争。

[10]他们的结合本身是对一切理性的挑战。——原注

[11]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德籍法国作曲家、大提琴演奏家、乐队指挥。他因19世纪50—70年代创作的近百部轻歌剧和未完成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而闻名于世。

[12]四对舞（Quadrille），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宫廷舞。表演时，每四对男女舞伴围成一个方形。因此，四对舞也叫“四对方舞”。

[13]波莱罗舞（Bolero），一种慢节奏的拉丁舞曲及相对应的舞蹈。

[14]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法国剧作家、演员、诗人。他是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15]施耐德小姐是第一位将奥芬巴赫的革命思想付诸实践的人。——原注

第2章

远征墨西哥、与教廷的斗争以及创造贵族的提议

在他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期间，巴黎上流社会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的态度路人皆知。作为这个世纪最伟大姓氏的后人、传奇历史的继承人，他没有摆脱被人嘲笑和不断怀疑的厄运。人们对他没有信心，事实上很少认真考虑过他。他成为总统纯属偶然，在没有更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暂时承认他的合法性，只想让他填补这个空缺而已。人们的这种态度令人生疑。更可疑的是，1848年人们接受了他候选人代表的身份。荒谬的气氛似乎已经笼罩了这位候选人。在一篇文章中，作者以调侃的语气提到了他在斯特拉斯堡[2]和布洛涅[3]的两次暴动，甚至还提到了他的囚禁与逃亡。从此，嘲笑始终与他如影随形。



19世纪的斯特拉斯堡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在斯特拉斯堡发起暴动

上层社会的政治精英层，包括那些无名之辈、波西米亚人[4]以及不义之徒，纷纷排挤他。那些因其显赫的姓氏而心存些许期望的普通民众也不指望能从他那儿得到什么，对他言辞切切的演说无动于衷，对他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心灰意冷。

1848年时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是孤独的，而且这种孤独是绝对的孤独。当时，他的身边除了几个陌生人、几名工人和小商贩外，再无他人。如果不算军队——随时听从他指挥的军队，那么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令人惊愕不已。从伦敦返回巴黎参加第一次选举时，亲

王的选举委员会只有两名鞋匠、一名煤贩子、一名理发师和一名家具商。换作其他人，必定会坐在敞篷车里，所到之处，人们欢呼雀跃，在人群中高高举起手。而他却处处遭遇冷场，即便波拿巴主义的追随者，甚至波拿巴家族的贵胄们，对他的归来也不闻不问。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某个角落，认定一无是处的他只不过是自讨苦吃。于是，孤零零的他独自前行。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既没朋友，也没钱。但亲王身边有一位有权有势且极聪明的人。他对亲王照顾有加，愿誓死相随，并为亲王付出一切。此人就是佩尔西尼公爵[5]；后来，亲王登基称帝后，念及旧情，视他为知己。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友谊是发自内心的，或许你会说，他理应得到皇帝的眷顾。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返回巴黎后，我们目睹了他的选举委员会受尽冷落的场面。当时，他们只能栖身于过道尽头的一间漆黑、狭小的办公室，在那里谋划竞选事宜；尽管极其简陋，但它却为候选人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选举开始之前，詹姆斯·马耶尔·德·罗特席尔德[6]先生曾扬言拒绝向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提供任何竞选资金。于是，落魄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不得不四处奔波，分厘必争，好让亲王的名字出现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墙上。他们频繁深入巴黎郊区，向那里的人们发表演说，一副不达目的——赢得更多支持，使他们把决定国家命运的一票投给亲王——决不罢休的架势。委员们深知此次选举意味着什么；他们早已酝酿一场连自己也无法估量的阴谋。在传奇帝国余温[7]的煽动下，他们首先赢得了女同胞们的芳心。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正是这些女同胞——法兰西人民的女同胞——最终将亲王推向了胜利。



德裔法国银行家詹姆斯·马耶尔·德·罗特席尔德

这次传奇般的胜利就像一出被肆意模仿的陈旧闹剧一般，无疑撩起了人们的好奇之心。工人的妻子们想起拿破仑一世爱子早逝时的痛楚，受到亲王誓死夺回王冠的决心的极大触动，于是就以极大的热忱拥护他参选。这种热忱是女性、普通民众以及养尊处优的人们特有的易受非理性情绪所支配的性格的体现。她们与丈夫一道支持他的事业。她们和多年前的姐妹们一样，几乎做好了将她们的一生托付给英雄[8]的准备。

普通女性大众对他——她们粗俗地称他为“男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这种称呼并非没有一点儿诗情画意。

选举前一天，整个巴黎，事实上，整个法国都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参加竞选冷嘲热讽。他俨然成了人们的笑柄，人们对他当选不抱任何希望。然而，投票结果却使他们不知所措。亲王以超过八万张选

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候选人。事实胜于偏见。偏见曾经甚嚣尘上，如今事实使它卑躬屈膝。那些一度持极左观点的人现在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了。从那天起，亲王便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从那时起，亲王极度蔑视——尽管他掩盖了这种蔑视——不同党派的领袖及上流社会。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劳苦大众的支持，要走进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要获得军队的同情——在关键时刻可帮助他保卫胜利的果实。

初试成功后，他备受鼓舞。现在，他可以迈着大胆的步伐前进了。1848年9月7日，他决定参加补缺选举。随后他不仅在巴黎当选，还在几个区大获全胜。对亲王来说，这次当选无疑是人民对他的再次认可。



人们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参加总统竞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此后，尽管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已入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候选人，但他始终是孤零零的。直至1851年12月2日后，朝臣及谋官求职者们才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队伍越来越庞大，他宅心仁厚，不计前嫌——无论是私利熏心者，还是胆小如鼠者。他和历史长卷中的任何一位亲王一样，宽恕了——如果不曾对他造成伤害——那些曾冷眼旁观，如今却突然调头的归附者。

这里有一段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参加竞选时的小插曲。就在竞选结束后的第二天，有人将查理·德·莫尔尼[9]推荐给亲王，说他的保皇主义、自由主义倾向是新政府最需要的。然而，亲王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怒发冲冠，气冲冲地将他的名字从朋友名单中划掉了。查理·德·莫尔尼对亲王来说再熟悉不过。他精明能干，年富力强，又对亲王鼎力相助，只是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使亲王恼羞成怒，非常尴尬。亲王一直对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有失体面、太招人耳目的饰章耿耿于怀，这个特权显然得到了奥坦斯家族的一个分支的默认。然而，两人最终还是握手言和。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熟悉吧。12月2日[10]之前，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尽管一直厌恶查理·德·莫尔尼，但登基称帝后却对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听之任之。

尽管亲王当时对身居要职的各党派领袖的支持只抱以微弱的希望，尽管他嘱咐同党要完全依靠民众和军队，但他却大胆地向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权威人士抛出了橄榄枝。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同母异父的弟弟查理·德·莫尔尼

爱丽舍宫[11]活跃的政治氛围曾一度给他造成幻觉。他认为这种活跃的局面是人们对他的魅力的回应。那些对他鞍前马后的人并非只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或假装友好。他们心怀崇高理想，并心甘情愿为他效犬马之劳。但不久他的虚荣心就被揭穿了。当最终意识到没有什么办法使虚伪的敌意——像先前一样暂时得到平息——远离他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他使用了冒险家和江湖骗子们惯有的伎俩。他说："那些愿意追随我的人必须忠于我！"到1851年时，反对派变得更肆无忌惮、更目中无人、更坚不可摧了。一开始他们就认为亲王的总统任期

不会很久，而现在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结束他的任期。他们机关算尽，但亲王的卸任似乎遥遥无期。反对的呼声日益高涨、强硬。亲王这次不再犹豫。评估了形势之后，他随即制订了行动方案。他不想一味地妥协了。他召来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彻底铲除了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异党。

如何看待1851年12月2日政变，人们众说纷纭。赞赏也好，谴责也罢，在此我不做任何评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人们对这次政变的功过是非仍然莫衷一是，但我始终认为，不管在哪个世纪，诱发社会变革的起因都是相通的。我毫不犹豫地一遍遍提出重复的问题：1851年12月2日政变是犯罪吗？

我不会忽视，也不会刻意隐瞒这样一个事实：1851年12月2日，国家的法律确实遭到了践踏。但有哪次历史或社会变革是在不打破传统法律束缚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呢？在政治中，犯罪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呢？

政变令人唏嘘，是因为自此国家的命运便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同时迫使国家盲目地依靠军事力量，而在难以调和的权力面前，军队一味盲目地屈从，最终葬送了帝国的前途。我们不妨仅从人的立场来看看这次政变。如果从思辨的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此次政变具备革命的一切要素，而革命唯有在经过严密计算、合乎逻辑的暴动中才能完成。从自由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看，12月2日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倒退。要是政变是在进步与自由思想的激发下发生的，那么它就不会充满血腥了。然而，你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必要时诉诸武力施加影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1851年**12**月**2**日政变，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的骑兵进入巴黎

人们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博爱的时代。我和那些受苦受难却心怀慈悲、相信新时代的人都认为，我们比想象的更接近新时代。这是一个使世界破除桎梏、免遭压迫的时代，是一个引领历史、直奔自由的时代。然而，与某些热心、乐于奉献且有先见之明的人所期望的不同的是，这场即将到来的革新，我们大可放心地断言，不会比之前任何一次革新进展得更顺利，而且会伴以报复与无休止的仇恨，但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想要的幸福。

我认为以上推测同样适用于1851年12月2日政变。我重申一下，这场政变是一场开启新纪元的社会革新。这个推测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地阐述了事物的本质。后来，拿破仑三世重建自由帝国时输得一塌糊涂。他失败了，是因为1869年和1870年的时局不具备社会变革的必要动力，是因为他踌躇不前、未将他的措施付诸实践，是因为他缺乏实现理想的勇气。

1870年1月2日，他处在同样的困境之中，他还能像1851年12月2日那样斗志昂扬、义无反顾地大干一场吗？要知道，当时是普选把他推向了帝位，那可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啊。如今，他能否再次成功还得靠这根救命稻草。

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平息了自由派的反对呼声。1870年，以埃米勒·奥利维耶先生[12]为代表的内阁本应该粉碎帝国的反对者们，从而使帝国能够在冷静的氛围中去实施它的抱负，并保证行动的一致性。诚然，拿破仑政府的立国之本可能会因为权力的不合理分配而招致灭顶之灾，但正如生活琐事一般，政治是由逻辑支配的。在逻辑推演过程中，我们隐约看到一个正在兴起的时代，却全然不知其所经历的狂风暴雨与风平浪静。

要研究拿破仑三世的政治决策，就必须考虑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对内政策，其二是外交政策。

拿破仑三世的对内政策以专制著称。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他不断遭人算计，尽管各部大臣们及其对手对他的权力垂涎三尺——鲁兰先生对此做过详尽的描述，但只要他在位一天，他就能让自己的意愿付诸实践，就能让整个国家言听计从。在歌颂帝国功德的编年史中，帝国的省长们事实上以颂扬见长，就像这一时期的爱情编年史中颂扬女性的桥段一样。第二帝国时期的男性公职人员个个遵纪守法，执法严明。他们对法律的尊崇不亚于对情妇的热心。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妇女们无论属于哪个阶层，在拿破仑三世的私生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对其政府施加过不容置疑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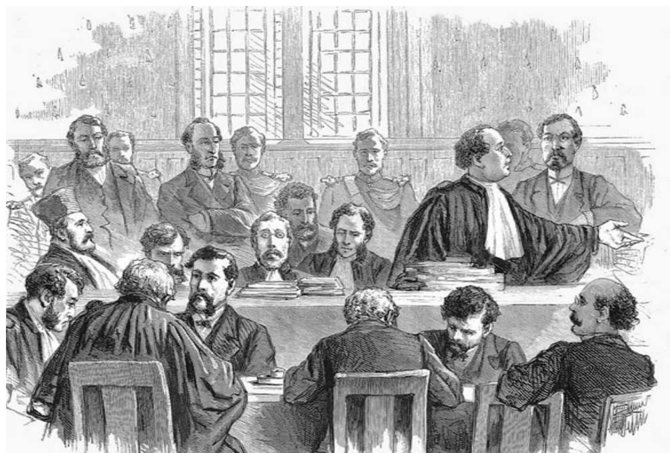
各省政府不管产生的影响多小，都可以看成杜伊勒里宫的缩影。省长夫人在其官邸举办沙龙。那些要么美艳动人、要么聪慧过人、要么生性轻佻的女座上宾在公共集会日频繁受邀前往巴黎。哪位女性如果能受宠被邀前往杜伊勒里宫，就会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

让维耶·德·拉莫特先生是第二帝国时的这样一类省长，他受的指责最多，但却是同辈人中最受欢迎的。让维耶·德·拉莫特先生对纳税人极不公平，他把有名的“暗娼阶层”[13]成员纳入他的政府班子，并经常与下级官员们争论不休。然而，每当巡回演说时，他却熟知如何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他钻进他们的小屋，一会儿问问母牛的健康状

况，一会儿问问卖掉鸡蛋和奶油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收入，还会刻意关心一下他们妻子的身体情况，最后不会忘了夸夸他们的孩子，而民众们为了回报皇帝使者的“深情”，在公选时会将选票毫无保留地投给官方候选人。



埃米勒·奥利维耶



让维耶德拉莫特先生在鲁昂巡回法院演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省长都使用同一套路。有些不为大众所熟悉的、不太接地气的省长在维护自我声誉方面却做得很成功。让维耶·德·拉莫特先生只不过是帝国的代理人，替它行使权力罢了。他受命操纵下层社会，并保证辖区内的人们安分工作。为了能赢得大众的不断支持，拿破仑三世极力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因此，即便有个别心怀敌意的人跳出来反对它时，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需要说明的是，在省长们尽心尽力为拿破仑三世效力时，朝廷里的大臣们却是另一副面孔，他们争相讨好皇帝，只为个人荣辱成败，全然不顾帝国的福祉。他们是大部分官员的真实写照——似乎人人无所事事。这种态度极易让人萌发篡位的想法。极度膨胀的私欲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却浑然不知正是他们把帝国一步步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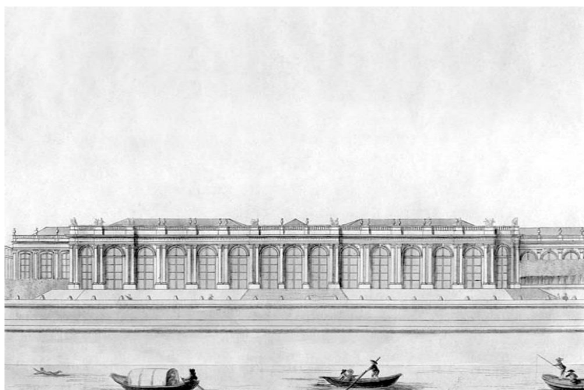
他们中最隐蔽、造成危害最大的人非欧仁·鲁埃[14]先生莫属。一方面，他给皇帝设好局，时不时地加以诱导，让他钻入圈套；另一方面他又深得皇后的赏识与支持。拿破仑三世有理由后悔当初授予他的这位顾问“副皇帝”的头衔。人们如果具备基本的公平意识，就会发现欧仁·鲁埃——我将在下一章讨论他——才是葬送帝国前途、使帝国蒙

受灾难的罪魁祸首，而1869到1870年时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他的替罪羊。

尽管以上陈述针对帝国的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拿破仑三世时期政治自由化及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而这些成就正好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执政理念框架下取得的。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革命的火种已深深植根于拿破仑三世的心田。拿破仑三世拒绝代议制，但这绝非等同独裁。从执政第一天起，他就赞同宪法授予他的特权[15]可授权于专司税收、法律的投票选举团来修改。诸如第二帝国的权力代理人都是杜伊勒里宫忠实的追随者、有权反对明显的立法独立倾向的官方候选人之类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没错，官方候选人给予皇帝实现其愿望的必要支持，但以此公然推测拿破仑三世滥用特权却有失公允，更不要去否认他为了消除自我职权与选举团之间的隔阂而倡导纯粹自由主义时谨慎做出的努力。这点可以通过他派遣大臣前往波旁宫[16]全权处理政务、接受大臣分权制以及从议会中抽调贴身大臣等决策来验证。他并没有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并没有迫使人民的代表放弃人民的事业。

拿破仑三世是否拥有智慧？迄今为止，这仍无定论。不过，事无巨细的他总是小心翼翼，甚至不赋予参议院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的权力。一个由绝大多数渴望大权在握的议员组成的参议院很难与皇室始终持同样的政见。拿破仑三世深知舆论的力量。如有必要，舆论可以肆意歪曲你的本意，譬如从喜好阿谀奉承或甘愿效忠于维护其利益、向其发放俸禄的政府人员口中传出的一句话。因此，为了避免舆论的抨击，留给后人更大的评论空间，他组建了由原上诉法院顾问、从各部顾问中随即抽选的几名陪审员为法官的最高法院。



波旁宫

相比他的大臣们，拿破仑三世更率真、更有胆识。由于本能地惧怕书籍、报纸等大众媒体的舆论力量，他再次授予言论自由权。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他宣布公共集会合法化，促进合作，废除前朝制定的刑法，并使工人摆脱工会的束缚。

拿破仑三世心系劳苦大众，始终关心他们的疾苦。他颁布法令维护工人的利益，如雇主与雇员产生纠纷时，雇主的陈词将被作为量刑定罪的有效依据。因此，他履行了比革命更有效的承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谴责一切旨在约束工会权力的法律条文，为劳动人民的各种协会——不管是商业性质，还是民用性质——提供庇护。他为共济会提供法律保障，并设立了养老基金。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人愿意去认可一位独裁者、一位唯我独尊的人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果读者在了解了这屡遭非议的政策之后还记得先前我曾提到过他是一个多面性格的人的话，就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就是用之不竭的真正的善良，若作为国家元首，他会被给予公正的评判。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认为我是感情用事了。

若要详尽地讨论并分析拿破仑三世所推行的政策，我们就得用专门的著作来详尽阐述了。现在我只想描绘它的轮廓。

在展现欧仁妮皇后涉足政务，简单地再现拿破仑三世所面临的政治与外交世界时，我已在第一章中勾勒出她对内与对外政策中最离奇同时最重要的部分特点。我的原始材料来自经常出入杜伊勒里宫的大臣及大使未公开发表的信件。我特意从杜伊勒里宫对外国及对某些权力代理人的态度入手。我提到过欧仁妮皇后迷恋权力，也强调过她因此而遭到皇帝严厉批评的事。

在人们争相讨好他、尽情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之际，拿破仑三世没有忘记欧洲其他国家在他成功发动政变后的敌视、蔑视以及欲言又止的恶劣态度。他也不可能忘记各国假惺惺、高高在上的做法。他本想着各国政府派驻巴黎的使节能够自尊自爱，安分守己，不该以相熟为借口践踏外交礼节。然而，他身边几乎每个人都对他的提醒置若罔闻。他们仿佛失去了理智，不假思索地置身于侵蚀帝国根基的万千大军中。看着扬尘而来的侵蚀大军，拿破仑三世悲痛欲绝。他曾尝试着力挽狂澜，但为时已晚，因为他被卷入了洪流。他的统治理念决定了他的结局。

在对外政策上，难道拿破仑三世不是在追求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梦想——国家统一的梦想吗？难道他不明白推行该政策时的犹豫不决可能会给帝国大厦——这座大厦是通过专制手段于12月2日那天拔地而起的——带来致命的一击吗？他对此想都没有想过，更谈不上为此而采取任何防止大厦坍塌的措施了。这种威胁一直贯穿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始终。要是他的注意力不被私生活所分散，要是他能摆脱自私自利的昏庸宫廷的干扰，或许他能洞若观火，及时清除威胁帝国安全的邪恶力量。这样一来，他就能更有效地治国理政了。

他高瞻远瞩，早就制定了宏伟的目标，但面对现实，他一筹莫展。危机始终伴随着他。他是新思想的领跑者。他的思想充满憧憬，值得一搏，只是法国时局还不能适应如此激烈的变革。因此，变革只能中断，或许只有在将来才能实现吧。

维护国家统一势必引发暴乱，但只有国家统一了，各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这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思想。他的这种超越阶级束缚、关注社会进步的伟大思想恰好是革命志士们如今所追求的。

拿破仑三世的欧洲政策，尤其是针对意大利和普鲁士的外交政策，给它们提供了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周旋的余地。意大利人和普鲁士人频繁设局使皇帝深陷圈套。他们口蜜腹剑，各有所图。因此，我们更应因皇帝的大公无私、高情远致而肃然起敬。他心系苍生，常怀悲悯。他生性率真，任凭命运无情摧残。

拿破仑三世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理想成就了普鲁士。相比意大利的患得患失，普鲁士倒显得通情达理，在国际问题上明显倾向法国，甚至频繁抛出橄榄枝，表达结盟的意愿。然而，拿破仑三世不赞同与其结盟。因为结盟的本质就是合谋征服，而拿破仑三世并非天生好战，他只有在迫不得已或时局威胁帝国时才被动出击。但现实却容不得仁慈，结果他被倒打一耙。在关键时刻，整个欧洲都开始与他作对，并冠以他“战争狂”“暴君”的恶名。

比亚里茨会谈后，普鲁士兴冲冲地发表声明，用俾斯麦伯爵的话说就是“和皇帝什么事也做不了”。从那时起，普鲁士开始暗中窥探拿破仑三世，并伺机放手一击，就像猫玩弄老鼠一样。既然已做好开战准备，普鲁士便伺机与杜伊勒里宫摊牌。觉得时机已成熟时，俾斯麦伯爵就单独约见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代蒂伯爵[17]，促使法国拟定一份重要的妥协公文。文件由俾斯麦伯爵口述，贝内代蒂伯爵代笔。盛情难却的贝内代蒂伯爵在普鲁士首相的引诱下写下了该公文。主要内容是普鲁士愿以法国占领比利时为条件换取本国政府行动的自由。正是这份碎片化公文，这个不攻自破的“谎言”，为柏林政府悍然发动战争提供了让全欧洲人信以为真的口实。

法国人并不知道这份公文会在比利时引发怎样的危机。比利时的反应很激烈，立即站在了法国的对立面，至今仍敌视我们的国家。不

久前，当我去布鲁塞尔时，我能明显感觉到敌意丝毫不减当年。比利时更愿意相信法国曾意欲诉诸武力吞并它的事实。我们的邻居确实是因为本能地惧怕德国而不敢公然拍手称快，认为我们的处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我们的失败使他们松了一口气。



普鲁士宰相俾斯麦



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代蒂伯爵

我们自然会问：如果拿破仑三世厌恶战争，那他为什么要对俄开战[18]？为什么操纵意大利对抗奥地利？为什么远征墨西哥？为什么要与普鲁士对抗？

对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以国际政治格局为幌子，其实质是促成与英国结盟。另外，拿破仑三世不喜欢俄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忘记了英国人是何等残酷对待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反倒仇恨俄国人。这种仇恨远非曾经使法军蒙羞的著名大撤退[19]能比。他常常不失时机地流露对俄国的厌恶之情。然而，从我公开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也没什么好

感，至少他从没忘记滑铁卢或圣赫勒拿岛。他一再强调，他重视英国，与英国亲善，完全是国家利益所需，尽管这种说法仍遭人怀疑。除了已经分析过的个人恩怨外，我们还需补充一点，那就是拿破仑三世认为法国应与英国加强贸易往来。这无疑是他决定靠近英国、漠视欧洲其他盟国的真正原因。拿破仑三世具有社会主义与人文主义倾向，但这并不能抵消他对俄国独裁统治、农奴制的抨击。然而，如果我们姑且接受以上说法，那我们该怎样解释他对充斥着虚伪的自由主义、助纣为虐的法律、冠冕堂皇的殖民主义的英国的偏爱？

拿破仑三世神秘莫测，犹如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他将是历史上的一道哲学难题。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此事：在拿破仑三世心中，与奥地利开战其实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帮助意大利自由派实现国家统一。当时，意大利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邦国。为了履行他的承诺，也为了使法国抽身，他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解决意大利问题的方案，即严厉制裁奥地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束缚，才能使意大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统一。这也算是他朦胧的理想之一吧。因此，这场战争更像是在满足他个人的愿望，同时使他兑现了一桩承诺。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吗？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认为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意大利能够为己所用，就权当是意大利对自己曾经付出的回报吧。但万一意大利不买这个账呢？要是它恩将仇报，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或许他就是这么想的，他确实梦想建立一个拉丁联邦，一个真正意义上强大的拉丁联邦，邦与邦之间互助互利，惺惺相惜，在关键时刻能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共同抵御狂妄叫嚣的北方联邦[20]。

理查·冯·梅特涅[21]在信中明确谈到了远征墨西哥，把远征墨西哥描述成一段美妙的“浪漫史”、一则迷人的童话，同时是一部欧仁妮皇后针对意大利的复仇记。其实，这场战争是欧仁妮皇后在一位朋友——梅特涅侯爵夫人[22]再三催促下发动的。她们瞒着拿破仑三世制

订了详尽的计划，然后才向他汇报。等拿破仑三世回过神来时，一切为时已晚。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逃脱干系，何况皇后打着他的名号。为了在宫廷中息事宁人，为了避免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只得默许。



对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在库雷克德尔击败土耳其人



大撤退指的是拿破仑三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远征俄国失败后的撤退行动。图为拿破仑撤过贝尔齐纳河

拿破仑三世并未因此而被牵着鼻子走。他曾极力阻止这场战争，但于事无补。皇帝与皇后就此事召开多次会议，会议每次都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充满激烈的争辩，但结果总是令皇帝痛心。在一次言辞激

烈的争辩后，皇帝不愿再纠缠下去，选择了听天由命。

拿破仑三世质问他的妻子道：“我为何要与墨西哥开战？如果只是为了追债这等小事，我何必大动干戈，使我的国家和士兵卷入一场既师出无名又无利可图的战争呢？我被人算计了，我被人耍了，而你却甘愿被那些下三滥的新闻媒体人当枪使！”

那天，他们争吵过后，皇后就把这事告诉查理·德·莫尔尼了。因此，查理·德·莫尔尼知道了皇帝坚决反对远征墨西哥，而他的“加州梦想”也将面临致命的威胁。形势刻不容缓，他随即前往觐见拿破仑三世。他故作镇静，压着心火，不慌不忙，一步步诱使皇帝让步，并套取皇帝不再反对远征的承诺。

查理·德·莫尔尼是这次远征的大赢家，他将获得一大笔财富。这笔财富之于他，正如巴黎之于亨利国王[23]，于情于理都值得他冒险争取。他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力压皇帝的反对呼声。事实上，巴黎与维也纳早已秣兵厉马，剑拔弩张，如果此时贸然阻止，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局势将会更复杂。

这种事件的过程与结果我们已知悉，将最终得到解释并给出更合理的评判——作为最高权力的行使者，他的权欲与反复无常直接决定着未来，牵动着国家的安危。拿破仑三世既大权在握，又胸有成竹，但可惜的是，他对皇后知无不言。在追求情人方面，男人或许更钟情逢场作戏，爱与不爱就是瞬间之事。因此，尽管他具有许多令人羡慕的优秀品质，但他却疏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极易冲动。或许正是这种本能的以自我为中心使他成为万人之上的皇帝。

名言“朕即国家”或许自有其道理和逻辑，饱含着独傲穹宇的恢弘气势，但它却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试想这样的话在一个刚摆脱专制君主统治、根基仍不稳固的国家说出时，人们何其反感！在一个人皆不惜抛头颅，奋勇追求平等、自由、博爱并甘愿为之奋斗终生的自由

国家，说出这样的话确实骇人听闻，甚至十恶不赦。

简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对外战争以及那些不为人知、最终导致1870年法普战争爆发的事件后，我本可以转入另一个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此展开叙述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事件并分析其起因没有什么不合适。然而，本章主要是对拿破仑三世个人的研究，所以我不细述1870年战争，因为我已另辟一章专门探讨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问题。请读者允许我继续我的“画作”，还原一个栩栩如生的拿破仑三世。

关于拿破仑三世的宗教倾向问题，我记得曾给大家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曾说：为了赢得教皇的支持，为了展示对法国教士的特别关心，在欧仁妮皇后的恳求下，皇帝做出了某种妥协。我强调一下，拿破仑三世内心并非真正虔诚，在现实中，他对神职人员不冷不热。他担心教会力量会影响政局，而教士们也会不失时机地在皇帝与国家面前彰显一下自己的存在。他们有时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他们是得到欧仁妮皇后的默许才公然对抗皇帝的。为此，拿破仑三世倒乐意选准时机敲打敲打他们，看看到底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欧仁妮皇后的宗教倾向助长了主教的嚣张气焰，以至于他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拿破仑三世的妥协使他们变本加厉，逐渐觉得自己神圣不可侵犯。随着神圣外表掩盖下的私欲日益膨胀，他们竟对拿破仑三世指手画脚，不仅要求拿破仑三世给教会拨款，而且胃口越来越大。

教士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令人诧异的。尽管拿破仑三世以损害法国利益为代价支持教皇，尽管他在位期间对主教、道貌岸然的神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们对皇帝的反感却丝毫未减。他的大度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种大度的后果是危险的，曾几次使国家蒙难，并最终在我们和意大利中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有时，当主教们前往巴黎觐见拿破仑三世或者拿破仑三世驾临天

主教堂时，大部分主教面子上对拿破仑三世还是毕恭毕敬的。有时，他们就会撕掉伪装的面具，开始玩弄起“死磕”皇帝的伎俩；每当此时，他们总是上跳下窜、毒辣狡诈，并竭尽刻薄之能事。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对抗一刻也不曾停歇过。

皮耶和迪庞卢两位蒙席[24]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并且公然与皇权对抗。断断续续的冲突最终导致国家混乱不堪。拿破仑三世当时本应血腥镇压，然而，当拿破仑三世刚要公开谴责他们的不法行为，并准备将几位傲气十足的高级神职人员绳之以法时，欧仁妮皇后便从宫廷中广布的忠于正统天主教派的密使与探子口中获悉了皇帝的意图。接着，斥责声、哭闹声以及威胁声不绝于耳，杜伊勒里宫顿时鸡犬不宁。这是一位女人的最泼辣的反抗，一位神经质的女人失去理性时的发泄。

欧仁妮皇后压根儿就没把帝国的安危、丈夫的前途以及法国的利益放在心上。她飞扬跋扈，野心勃勃，而且小题大做。她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国家的真正需求与政府机构的安全。她一会儿风尘仆仆地为别人牵线搭桥，成全婚姻，一会儿又正襟危坐，任人唯亲，成就了一批主教。然而，她的判断并不总是明智的。明知拿破仑三世内心反感教会，她却我行我素，笼络高级神职人员，并与皇帝分庭抗礼。在这些高级神职人员中，鲍尔先生值得一提。这个性格怪异的人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25]的密使。来到法国后，他被欧仁妮皇后任命为宫廷道德家，成为她个人小教堂中的座上宾，获赐世界各国通用[26]的“蒙席”头衔。

鲍尔先生确实荒诞不经。作为一名受过洗礼、可能已经改宗的犹太人，在成为杜伊勒里宫布道主持（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之前，他的足迹就已遍布欧洲。他突然以伊莎贝拉女王二世密使的身份出现在拿破仑三世面前。因突如其来的殊荣而名声大噪的鲍尔先生实在与众不同，据说在他摇身一变成为神父之前，他尝试了各种职业：画家、商业旅行者、摄影师以及修士。尽管他背景复杂，但生性浪漫的

欧仁妮皇后却丝毫不介意。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盛情难却，这位高级神职人员发现自己已在杜伊勒里宫站稳了脚跟，并因此而得宠了一段时间。1866年，他到达巴黎。三年后，在苏伊士运河开航之际，他跟随年轻的皇后出席了神圣的剪彩仪式，并做了祈祷。就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在1870年战争期间从未露过面。据说，战争结束后，他想重操旧业，在巴黎设坛布道，但大主教禁止他继续染指国事。于是，他消失了，更确切地讲，他离开了宗教界。他恢复了平民身份。为了抚慰受伤的心，他频繁出没于歌剧院和舞厅。

然而，杜伊勒里宫也不乏独善其身、克己奉公的神父，尽管他们与大臣们多有往来，但却能做到安分守己。皇室从教会中吸纳了一些甘愿效忠朝廷的优秀教士，如曾为拿破仑一世效劳的南希主教；还有波尔多的多内蒙席，他老谋深算，多次被朝廷征召。接下来，我讲一个关于他的有趣故事。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



欧仁妮皇后，绘于19世纪50年代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红衣主教多内因工作很迟才下班，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杜伊勒里宫时，正好和几位身穿低胸连衣裙前去参加晚会的女士迎头相遇。拿破仑三世一再挽留他，但穷尽说辞，还是于事无补。红衣主教指着围在皇后身边的女士问：“陛下您没看见那些‘肩膀’刺到我的眼睛了吗？”

拿破仑三世笑了笑，然后答道：“对不起，阁下，那您更应该感觉到我们‘胸’中的暖意呀。”

红衣主教被这突如其来、答非所问的幽默给逗笑了。接着，他心

甘情愿地多待了一会儿。其实拿破仑三世很少与教士这般亲密。他与主教之间似乎永远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互不信任。

庇护九世[27]因拿破仑三世公开拒绝支持教廷对罗马涅地区[28]的领土要求而怀恨在心。他鼓动法国教士对抗拿破仑三世。教士们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敌意。最终，庇护九世与拿破仑三世无法握手言和。

每逢立法选举，教士的反抗情绪尤其激烈。那么，当我们看到在主教的煽动下，即便是最偏远地方的教区的神父也参与竞选活动，公开支持反对自由党的政府候选人的场景时，便见怪不怪了。在离巴黎最近的外省，那里的人们素以支持每届政府的政敌而闻名。这些地方的教士的态度也更坚决，更咄咄逼人。

一面消极厌世，一面又妄自尊大，拿破仑三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是否与教皇决裂这件事上摇摆不定。忘恩负义的罗马教廷使他痛苦不堪，悲愤难当。他曾不止一次想与其一刀两断，从而摆脱这无尽的精神枷锁。然而，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举棋不定。为报复罗马与主教，他决定积极响应那场当时动摇法国支持高卢派教会决心的运动——一场由乔治斯·达尔博伊蒙席[29]领导的运动，像从前的情况一样，他最后也卷入了充满仇恨与憎恶的汹涌旋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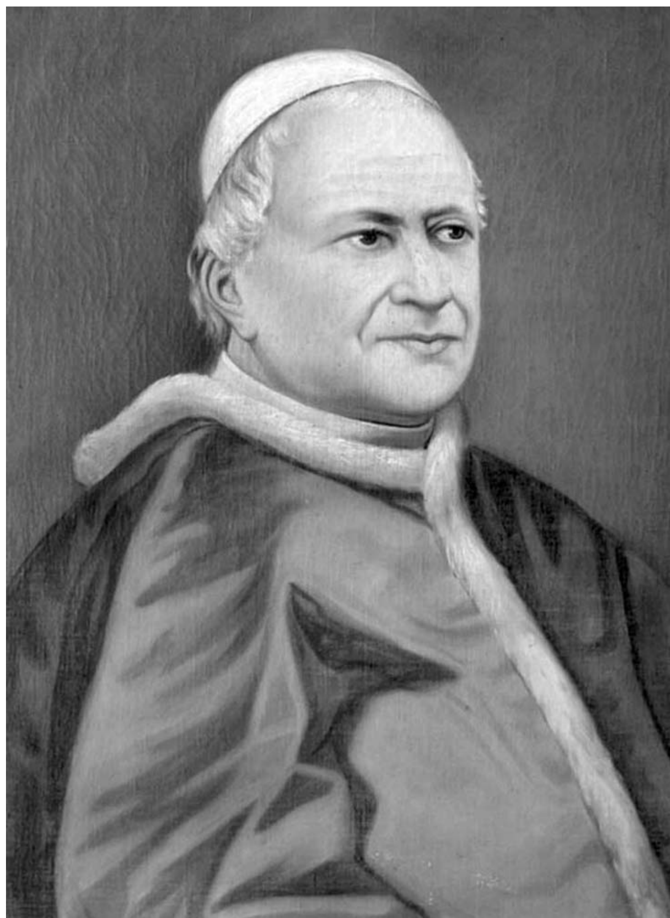
拿破仑三世常因出手大方、爱开玩笑而屡遭算计。作为政治家，他却缺乏基本的常识：教廷是不会向任何世俗权力低头的，除非武力相逼。他理应懂得：没有人甘愿冲破重重阻挠把教廷纳入现代社会体制中来。

教廷的要求遭到拒绝，教士的反抗遭到镇压，于是，整整二十年间，教廷与第二帝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整整二十年，军队时刻待命，随时准备开战。为尽快结束混乱状态，举荐一位既通晓政治又深孚众望的教皇迫在眉睫，他一出现，主教们就不会兴风作浪了。第二帝国赋予教士应有的权力——这是上限，并强迫他们在效忠书上画

押。然而，果真这样做的话，第二帝国迎接的不会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而是熊熊燃烧的怒火与咬牙切齿的仇恨。

第二帝国历史上最荒诞的莫过于贵族阶层的头衔问题。跟伯父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也主张消灭旧贵族阶级，重新分封贵族，这样一来，新封的贵族会因皇恩浩荡而誓死效忠。

事实上，拿破仑三世因其古怪的性格以及社会主义倾向而颇受争议，他不怎么看重贵族，不像伯父那样锲而不舍，只想借贵族头衔来增加他身边人的名望。必要时，他还可以适当赋予他们特权，从而赢得支持。在他看来，贵族就是政府的门面，可以给政府注入活力，还可以彰显帝国的庄重。基于以上原因，他重新制订法律，要为帝国的贵族制度提供保障。他命掌玺大臣拟一份圣旨，目的是打击那些反叛的世袭贵族，内容包括头衔变动、真假甄别及司法审批程序，以便合理处理冒名顶替行为。圣旨拟好后，拿破仑三世想听听帝国最杰出的几个人的意见。接下来，我要与大家分享几个最有意思的片段。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



巴黎大主教乔治斯·达尔博伊

拿破仑三世召见了欧仁·鲁埃、查理·德·莫尔尼、佩尔西尼公爵和W伯爵。读完圣旨后，他停了下来，像以往召开会议时一样，等待大臣们发表意见。随后，四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像炸了锅。

欧仁·鲁埃摒弃一贯的随和，摇晃着脑袋，嘴里胡乱蹦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30]来搪塞拿破仑三世。

欧仁·鲁埃先生是世袭贵族，很少关心此事。为了不扫拿破仑三世的兴，他没怎么反对，但内心深处却没把拿破仑三世的提议当回事，承认贵族阶层是第二帝国不可或缺的，只是许多怀揣自由主义梦想的有志之士却因为没有这个“标签”而被拒之门外。理清思路后，他发表

了以下意见："我认为，贵族时代已风光不再。如果把现代社会的明天继续寄托在对贵族历史的缅怀中，将是极不明智的。我想，只受到一个特权阶层支持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只有奉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国家才能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同时我相信这个道理——人总是要有点儿盼头的，比如极光，其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普通民众无法无天，因此必须让他们绝对臣服于权威，绝对不能让权力落入他们手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俯首帖耳。要创造一个忠于帝国的贵族阶层，即新增一个社会阶层，需加强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方面，官员们目前还做得不够好。这个新创造的阶层将会有效减缓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们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政治突发事件。只有这样，政府的声望才能大大提高，暴乱也会随之远去。因此，我极力赞同皇帝的提议。"

查理·德·莫尔尼几乎没说什么，因为他早已笃信拿破仑三世的思想。他接下来说的几句话妙趣横生，连他本人也暗自叫好，他的讲话再次彰显了他一贯故作高雅、满腹狐疑的本质。

"成为贵族，"为一语惊人，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就像要找一个既准确无误又无人不晓的词来形容一位风尘仆仆的女子一般，"成为贵族就意味着少一份麻烦，多一份乐趣。创造您的贵族去吧！那些即将被封为贵族的平民百姓不会因为被冠以贵族的头衔而失去他们愚昧的本质；如果碰巧有人不那么愚钝且能不辱使命，那就最好不过了，而我们恩威并济的效果也就达到了。帝国并非一定需要贵族。圣日耳曼区[3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一直要求取消贵族制，但有时也以本区遗留的贵族制而洋洋自得……如今，很多贵族，"稍作停顿后，他补充道，"唉！落魄到只剩下头衔了。如果非要创造贵族，那我们必须保证那些因此而获此殊荣的人不再潦倒到只靠头衔来标记自己的贵族身份。"



查理·德·莫尔尼，绘于**19**世纪**50**年代

欧仁·鲁埃、查理·德·莫尔尼轮番发言时，佩尔西尼公爵显得焦躁不安。终于轮到他时，他兴致盎然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欧仁·鲁埃一样，佩尔西尼公爵也喜欢独断专行，但比欧仁·鲁埃坦率、大度。一想到这些龌龊的交易，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行事光明磊落，为人宽宏大度。他虽然以天下为公、心系苍生，但处事极端、残忍，为达到目的，不惜诉诸武力，公开、公平一决高低。他认为劳动人民就应安分守己，他希望他们都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因此，他认为欧仁·鲁埃的说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欧仁·鲁埃极力粉饰劳动人民的卑微，却欲盖弥彰。满腹狐疑的查理·德·莫尔尼使他生厌。只有他自己一枝独秀，心地单纯，正大光明。贵族实际上就是被贴上官方标签、获赐荣华富贵、比其他人显得高高在上，除此之外，在他眼中，与别人无异。

众所周知，佩尔西尼公爵言辞犀利，说话掷地有声，他继续义正辞严地回应欧仁·鲁埃、查理·德·莫尔尼的发言。他声嘶力竭地吼道：“贵族制荒唐至极。在政府机构中，贵族一直是摆设。国家因贵族的自负与荒唐而负重前行，而贵族对帝国毫无用处。公爵、男爵等贵族充其量就是残留的文化痞子。鲁埃，你就是个骗子。你说贵族会给帝国增光添彩，我看你是成心蒙骗皇帝。而莫尔尼的袖珍演说不足一提。莫尔尼总是满口胡言，可能是骗惯女人了吧，油头粉面，矫揉造作，没有一句正经话。这些拙劣的伎俩骗得了女人，却骗不了政治。我坚决反对贵族制，世袭的贵族也好，新生的贵族也罢，如果您能听从我的拙见，那您将名垂青史；如果您一意孤行，最后怨声四起、国家动荡，您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平息暴乱时，可别指望我会同情您……看远一点儿吧。”他顺势将手在空中一划，然后补充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让大家团结起来吧，让您的圣光普照人们渴望的心田，决不能让愚蠢、卑鄙的小人得逞。”

欧仁·鲁埃始终心平气和，对佩尔西尼公爵的长篇大论洗耳恭听，而查理·德·莫尔尼却神情紧张，不停地抚摸着下巴。拿破仑三世虽然因其提议招致强烈的反对而焦躁不安，但却依然坚信该提议是高明的。他忍不住插话，大臣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们的讨论毫无意义，”拿破仑三世气定神闲地说，“我觉得你们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想模仿伯父创造贵族，进而在我与人民之间设一道壁垒，阻止他们追求应有的权利。我的本意是为了奖励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让他们享受应得的荣誉。”

佩尔西尼公爵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陛下，贵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哎呀！佩尔西尼公爵，”拿破仑三世说，“理性点儿，别太固执，你本没有那么坏，对吧？”

刚才还咄咄逼人的佩尔西尼公爵笑了笑，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拿破仑三世了，既然皇帝心意已决，即使强求也于事无补。就像一只狂吠的狗，一旦主人厉声喝止，它便会恭顺地趴在地上，摇起乞求的尾巴。佩尔西尼安静了下来，顿时变得温顺、乖巧，他流露出伤心透顶的神情，但什么也再没说。



一幅讽刺欧仁·鲁埃的漫画。欧仁·鲁埃被画成了鹦鹉身人头的怪物，讽刺他巧舌如簧，贪婪无度



拿破仑三世的心腹佩尔西尼公爵

W伯爵觉得实在没必要反对皇帝的提议，认为争论没有意义，所以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

就这样，一项旨在创造新贵族的法案应运而生了，它是第二帝国另一项“模仿”拿破仑一世的法案。

命运总爱捉弄人。在参与制订这项法案的四人中，只有欧仁·鲁埃一人没有爵位，但他却是四人中最有权力的。

在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中，他常常心存幻想，冥冥之中总觉得

有个声音在召唤他，而这个声音有时近在耳际，有时却远在天边。他只听从命运的安排，把一生的荣辱得失都交给命运之神了。他足智多谋、胸怀韬略，却往往壮志难酬，就像一个人无法用外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样。他心地善良，但也会使别人痛哭流涕。他深爱着他的臣民，但却使他们身陷囹圄。在神话故事中，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描述：在一轮若隐若现的鬼火的指引下，夜行者误入歧途，最后坠入万丈深渊。拿破仑三世有着一颗童真的心，他调皮地追逐着那轮鬼火。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梦想家，却反受其害。他笃信感召，越发执迷不悟，仿佛命该如此。如果将来有一天拿破仑三世能有幸成为某一戏剧的人物原型，那他将会是那个永不停歇而又四处游荡的幽灵的化身。

---

[1]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48年12月到1851年12月期间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大权在握，为后来第二帝国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2]1836年10月29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军队暴动，意欲推翻“七月王朝”。暴动失败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逃离法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亡生活，先后流亡于瑞士、英国、巴西和美国。

[3]1840年8月6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企图在布洛涅再次发动暴动，但还没开始就被边防军逮捕。最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被囚禁在索姆省的哈姆要塞。

[4]指那些希望过着非传统生活风格的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抱持幻想的人，这个群体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

[5]让-吉尔伯特·维克多·菲林（Jean Gilbert Victor Fialin，1808—1872），法国政治家，受封为公爵。

[6]詹姆斯·马耶尔·德·罗特席尔德（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1792—1868），罗特希尔德男爵，出生名雅各布·马耶尔·罗特希尔德，德裔法国银行家，罗特希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

[7]原文Imperial Epic，直译为“帝国史诗”，言外之意是指人们对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美好向往。

[8]拿破仑一世。

[9]查理·德·莫尔尼（Charles de Morny，1811—1865），奥坦斯王后与弗拉奥将军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弟弟。

[10]1851年12月2日。时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发起了一场成功的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从而为1852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扫清了最重要的障碍。

[11]爱丽舍宫（Elysée Palace），建成于1722年，原为路易·亨利·德·拉·图尔·多韦涅的私人宅第。1848年初次被用作法国总统官邸。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爱丽舍宫即成为皇家宫殿。自1873年起，爱丽舍宫被正式确定为法国总统官邸。

[12]埃米勒·奥利维耶（Émile Ollivier，1825—1913），法国政治家、演说家、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拿破仑三世专制，在第二帝国从专制帝国转变为自由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3]暗娼阶层（demi-monde）是指以享乐主义为追求目标的一群人构成的阶层。为达到目的，他们不顾名声，招摇过市，其行为往往令人嗤之以鼻。这种叫法流行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欧洲，是与追求财富和跻身统治阶层相对应的一种享乐行为，包括酗酒、吸毒、赌博、过度消费（尤指盲目追求时尚、扩大仆役阵容、修建豪宅等行为）。暗娼阶层原特指具有以上习气的妇女阶层，后来演变为高级妓女或从事卖淫者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这种叫法则被认为是一种过时的说法。

[14]欧仁·鲁埃（Eugène Rouher，1814—1884），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家。

[15]创制权、通商条约签署权及宣战权。——原注

[16]波旁宫是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南岸。

[17]贝内代蒂伯爵（Count Benedetti，1817—1900），法国外交家，煽动1870年法普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

[18]克里米亚战争。是指1853年10月至1856年2月期间发生的一场军事冲突。交战双方为由法兰西第二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和撒丁王国组成的四国同盟和俄国，俄国战败。

[19]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一世率六十万大军渡过涅曼河，对俄不宣而战。拿破仑一世企图迫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终止与英国的陆上贸易，进而达到使英国臣服法国的目的。战争初期，拿破仑大军所向披靡，俄军节节败退。但随着战线的逐渐拉长、俄军“焦土战术”的实施以及俄国严冬的到来，

法军补给严重不足。10月19日，拿破仑一世下令撤离莫斯科。此时，俄军乘胜追击，在随后发生的几场战役中，法军死伤严重。拿破仑一世在俄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瓦解。

[20]北德意志联邦。

[21]理查·冯·梅特涅（Richard von Metternich，1829—1895），奥地利外交家，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之子。

[22]梅特涅的孙女、奥地利驻法国公使夫人波利娜·德·梅特涅侯爵夫人。

[23]亨利四世（Henry Ⅳ，1553—1610），也称“贤明王亨利”，纳瓦尔王国国王（1572—1589）、法兰西国王（1589—1610）、波旁家族的第一位君主。1610年，他被天主教狂热信徒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刺杀。

[24]原文“Mrgs”为“Monsignor”的缩写，是对天主教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神职人员的尊称，对应汉语称呼为“蒙席、大人或阁下”。

[25]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1830—1904）。

[26]原文为“Passe-Partout”，法语，意为“万能的东西”“到处都适用的东西”。

[27]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1792—1878），天主教会首脑（1846—1878）。他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当选教皇，在位时间接近三十二年。他于1869—1870年间主持召开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大会颁布了“教皇无谬论”。因部分教皇国代表缺席，大会提前闭会。

[28]罗马涅地区（Romagna），意大利历史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东南部地区，这里曾是教皇国的一部分。——原注

[29]乔治斯·达尔博伊（Georges Darboy，1813—1871），法国天主教神父，后来相继晋升为南希主教、巴黎大主教。他是被巴黎公社绑架的一批显要人物之一。1871年5月，他被巴黎公社判处死刑。不久，巴黎公社惨遭镇压。

[30]原文为“monosyllables”，意为“单音节”或“单音节词”，暗指欧仁·鲁埃并不想对拿破仑三世的提议做出任何评论，只想顺着他的意思附和他。

[31]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是法国中北部地区法兰西岛大区伊夫林省的一座市镇。位于巴黎西郊，离巴黎市中心约十九千米。

第3章

拿破仑·热罗姆与欧仁妮皇后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前威斯特伐利亚王国[1]国王热罗姆·波拿巴之子、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堂弟拿破仑·热罗姆强烈反对12月2日政变。他的政治独立性差点导致他与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堂兄决裂。自从拿破仑·热罗姆公开发表自由主义观点后，堂兄弟二人就互相敌视，关系疏远了。但他们总归要握手言和。路易·波拿巴登基后，尽管对堂弟仍心存芥蒂，但还是热情召见了他。从此，两人如影随形，谁也不曾离开过谁。尽管有人状告拿破仑·热罗姆多么荒诞不经、十恶不赦，尽管欧仁妮皇后表面上对他礼遇，实际上笑里藏刀，但拿破仑三世依然如故，非常包容，甚至公开表明他与堂弟的情谊深厚。

为维护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公开否决拿破仑·热罗姆的意见或责备他的行为；然而，当两人面对面时，他却恳求堂弟谅解。他放低姿态，就是不想伤害堂弟。他一贯的易怒、好斗或许使他极易树敌，但他只是将两人的分歧局限在政见上，而不是情感上。这里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可以佐证拿破仑三世与堂弟何等亲密，同时表明两人在公众眼中的关系只是他们设置的“障眼法”。

一天傍晚，拿破仑·热罗姆在杜伊勒里宫做客。那天白天，他大放厥词，极尽煽动之能事。很快，拿破仑三世就知晓了。现在，他把拿破仑·热罗姆拉到一边，当场教训起来。

拿破仑三世说："我听说今天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拿破仑·热罗姆接过话茬，笑着说道："您看我有他们说的那么革命吗？"

拿破仑三世咕哝道："'革命'一词传达的含义可大可小。不，你不是一位革命者，你顶多是轻率了点儿。你身上有我的影子。"短暂的停顿后，他补充道："我糟糕的堂弟，你总是给我捅娄子——大娄子。我的大臣们因我对你的偏袒而郁郁寡欢。私下里我们所见略同，但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默契，让外人觉得我们势不两立。你比我自由，你可以畅所欲言，并且不必担心由此可能引起的恐慌。"

拿破仑·热罗姆确实有这个优势，但拿破仑三世却没有。拿破仑·热罗姆偶尔可以撇开官方的限制在平民百姓中播撒自由的种子。没错，拿破仑三世和拿破仑·热罗姆私下感情甚好。

拿破仑·热罗姆对堂兄天生的菩萨心肠心知肚明，也知道堂兄聪颖过人。他经常和拿破仑三世背着大臣们共商国是，拿破仑三世也乐于高谈阔论。要是拿破仑三世的态度更坚决，换句话说，更专制，或许他就能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了。当大臣们对拿破仑·热罗姆极度不满，或当欧仁妮皇后公开敌视他时，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热罗姆总是彼此克制，以防感情破裂。

我已提到过欧仁妮皇后非常厌恶拿破仑·热罗姆。自从我专门描写这种厌恶的内容出版后，那些别有用心、假公济私的作家们不惜罗列所谓的事实以图推翻我的论点，并告诉大家在整个第二帝国期间，拿破仑·热罗姆与欧仁妮始终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没错，他们确实不和，但把拿破仑·热罗姆刻画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恶棍，把皇后描述成一

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却有失偏颇。只有缺乏基本判断力的人才会相信有违事实的真相，才会相信这段被扭曲的历史。



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拿破仑·热罗姆

尽管拿破仑·热罗姆反感欧仁妮皇后，时而对她怒气冲冲，时而觉得她楚楚可怜，但迫于现实压力，他更会选择与她处好关系。尽管他与欧仁妮皇后的关系谈不上融洽，但至少得容忍她的冷漠。要是欧仁妮皇后能对他友好点儿，或许他们就会相安无事。但这只是痴人说梦，因为拿破仑·热罗姆的所作所为无法使欧仁妮皇后对他心生一点儿

好感。

从前，作为拿破仑三世的顾问，拿破仑·热罗姆强烈反对他与欧仁妮的婚事。欧仁妮皇后至今对此耿耿于怀，不愉快的记忆使她无法与拿破仑·热罗姆重归于好。

听到拿破仑三世对蒙蒂若小姐展开猛烈攻势的消息时，不仅老国王热罗姆[2]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拿破仑·热罗姆也心急如焚地跑到拿破仑三世身边，力劝他终止这场既不明智又危险重重的婚事。拿破仑·热罗姆深知蒙蒂若夫人和她女儿的为人，认为她们只不过是到处碰运气的投机贵族罢了。他觉得是时候该让拿破仑三世意识到他是何等作践自己——竟然要和一位周游于各温泉疗养胜地的美女结婚！尽管拿破仑·热罗姆因其鲁莽的政治倾向而遭人诟病，但在关键问题上他却洞若观火。在堂兄在位期间，他不止一次指出第二帝国存在的各种弊病，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

拿破仑三世订婚时，拿破仑·热罗姆有种预感——某种危险正在悄悄地靠近。他随即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拿破仑三世。一想起两人将来的婚事，拿破仑·热罗姆就绝望透顶。事不宜迟，该向拿破仑三世说明其中的利害了。他立刻前去面见拿破仑三世，顾不得君臣之礼，开门见山直接以“你”称呼拿破仑三世，并跟他讲起道理来。



老国王热罗姆，即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热罗姆·波拿巴



少女时期的蒙蒂若小姐

“你再认真考虑一下与蒙蒂若小姐的婚事。我承认她漂亮，很招人爱。如果你确实喜欢她，就去爱她吧，但不要和她结婚，不要让她成为皇后。法国人会怎么说？全欧洲人会怎么说？你们的结合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法国也会深受其害。我恳求你悔了这桩婚约。你被蒙蒂若小姐迷得神魂颠倒，这很正常，因为她倾国倾城。让她做你的情妇吧。你可以花一大笔钱来结束这场闹剧，但别再纠缠下去。”

拿破仑三世不仅没有理会堂弟的苦口婆心，而且对许多朋友的谏言也置之不理，他们也看出他与蒙蒂若小姐的结合不仅是拿破仑三世家庭的悲哀，也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像对其他人一样，拿破

仑三世对堂弟的谏言付诸一笑。他已经被一位会给所到之处带来霉运的邪恶小仙女的魔力征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如饥似渴而又欲罢不能。

荣升皇后后，蒙蒂若小姐不思悔改，仍斤斤计较过往之事。她对拿破仑·热罗姆一直怀恨在心，即使帝国的倒塌、她的流放甚至丈夫或儿子的死[3]都不曾浇灭她仇恨的火苗。

尽管这种仇恨对帝国的未来产生过致命的影响，尽管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出现的很多灾难中都有它的影子，尽管它使人们对已化作尘土的拿破仑三世仍愤愤不平，并使人们相信皇太子的凄惨下场与此有关，即便如此，我想知道，我们就能理所当然、毫无人性地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她吗？难道一切错误的根源只因蒙蒂若小姐是法国的皇后吗？只因她的美貌吗？只因她熟谙如何俘获男人的心吗？只因她迷人的笑容，就像外表艳丽、实则奇毒无比的鲜花一般，只是为了撩起男人们的欲望，而没能让他们进一步得逞，结果空欢喜一场吗？

那个人们言辞凿凿、传言拿破仑·热罗姆故意陷害欧仁妮皇后的虚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有几种说法可以作为佐证，而我的目的是要揭穿它们的虚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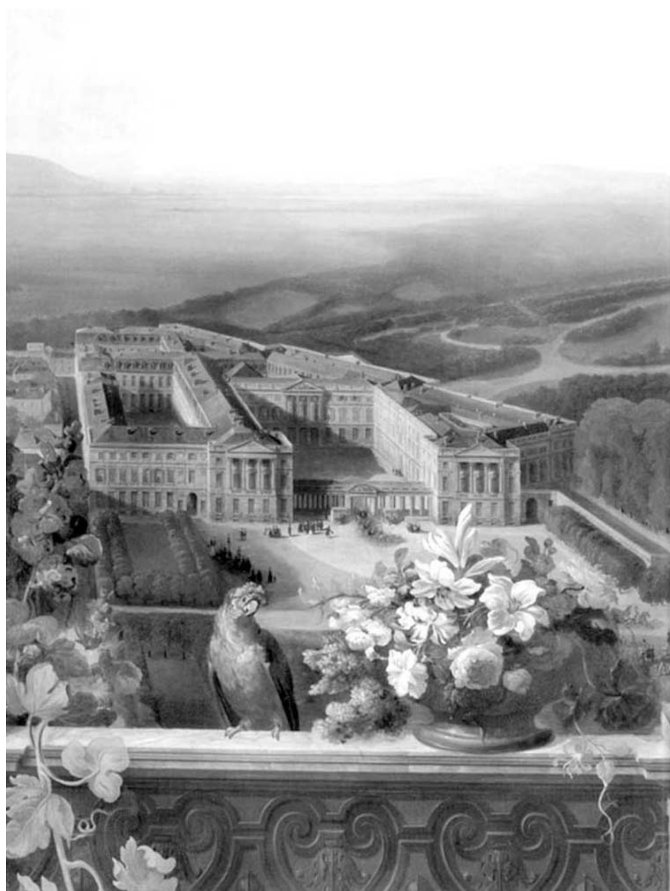
故事是这样的：拿破仑·热罗姆希望拿破仑三世永远不要结婚，这样的话他就会因拿破仑三世没有子嗣而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希望化为泡影后，他四处扬言，公开表达对欧仁妮皇后的怨恨之情。故事继续讲道，在贡比涅宫[4]一次欢迎欧仁妮皇后的晚宴上，他当着众宾客的面直接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议让他第一个给皇后敬酒的请求。

这个故事显然漏洞百出。拿破仑·热罗姆反对拿破仑三世与蒙蒂若小姐结婚，只是出于对女方社会地位的考虑，以及对这种政治联姻是否会给当事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的担忧。拿破仑·热罗姆坚信，贵为一国之君，拿破仑三世的婚姻有很大的选择，可以选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

王室联姻。即便在法国，也有好多可供他选择的良家妙龄美女。无论他选择谁，名望都胜过大打折扣的蒙蒂若小姐；论美貌，从哪方面将都可以碾压她。与她们相比，蒙蒂若小姐就相形见绌了。

敬酒风波纯属杜撰，我有信件佐证。为求证该风波的真伪，我曾求助于杜伊勒里宫当时最有影响力、最受人尊崇的一位官员，他回信否认了关于拿破仑·热罗姆故意招惹蒙蒂若小姐的说法。

事实上，拿破仑·热罗姆从没在欧仁妮皇后的庆生会上拒绝向她祝酒。没错，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他本性率真，从不遮遮掩掩。他讨厌说一套做一套，他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现实使他痛心。他知道，在杜伊勒里宫，除了拿破仑三世和为数不多的两三个朋友外，人人都讨厌他，他的一言一行都遭人误解。因此，他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也在情理之中。看着别人对堂弟说三道四，拿破仑三世苦闷不堪，但却无能为力。他对堂弟的偏爱常在宫中招致别人的数落，并被嗤之以鼻。



贡比涅宫

至于拿破仑•热罗姆本人想迎娶蒙蒂若小姐的流言更是荒唐至极，没有任何可信度。宫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流言。要说拿破仑•热罗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曾垂涎蒙蒂若小姐的美色，这倒说得过去，但他绝没有想过与她相爱，更不会幻想跟她结婚。

撇开任何个人恩怨，欧仁妮皇后之所以讨厌拿破仑•热罗姆，是因为她发觉拿破仑•热罗姆聪明过人，拿破仑三世不及他，从而担心拿破仑•热罗姆会左右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驾崩后，她拒绝接纳拿破仑•热罗姆做儿子的家庭教

师，拒绝他为儿子传道授业。然而，要是她当时接纳了拿破仑•热罗姆，毫无疑问，他将不失为一位忠心耿耿的导师，指不定还能减轻她的痛苦呢。当有人荐举让拿破仑•热罗姆主管她儿子的学业时，她的反驳之词竟然是“他会给可怜的孩子带来不幸！”哎！难道不是她的固执、难以释怀的仇恨造就了拿破仑•热罗姆的不幸吗？难道不是这种仇恨实际上葬送了帝国的前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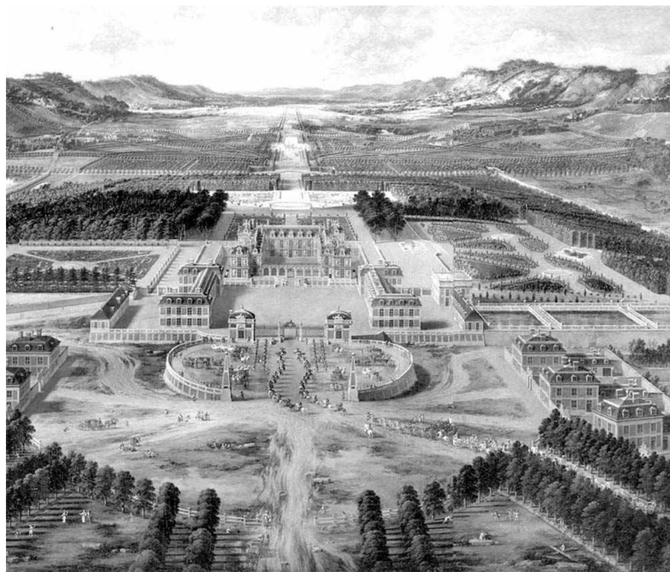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这位官员的说法是可信的。我强调一下，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是杜伊勒里宫当时身份最显赫的权贵之一，也是拿破仑三世最贴心的朋友之一。在第二帝国时期，他亲眼目睹了欧仁妮皇后无休无止的争吵是怎样一步一步毁掉拿破仑三世的一生的。

拿破仑三世驾崩后，根据欧仁妮皇后的懿旨，拿破仑•热罗姆应离开皇室。儿子的死使她愈发粗鲁无礼，她竟在儿子的葬礼上对拿破仑•热罗姆下了逐客令，要求他在葬礼结束后立即离开奇斯尔赫斯特。拿破仑·热罗姆希望能当面宽慰欧仁妮皇后几句，但被这个孑身一人的女人拒绝了。他终于意识到这位母亲已无药可救，即便在当着死去的儿子的面时，也不忘怨东怨西。他仁至义尽，恋无可恋，毅然离开了那个容不下他的地方。现在他终于解开了已被堂兄带入陵墓、不让他做帝国合法继承人的秘密，随即放弃了做继承人的权利。

“杜伊勒里宫容不下我，”他对那些因他突然撤出而惊诧不已的人说，“我在这儿的使命就此结束。”

那天发生在凡尔赛宫的一幕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时，国民议会在凡尔赛宫召开会议。论及公众礼拜事宜时，拿破仑•热罗姆代表民众发言。提及拿破仑三世对罗马的政策，他指着欧仁妮皇后吼道，如果他有权发言，并获准揭露第二帝国末期的秘密的话，他将给国民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他知道拿破仑三世为什么要奉行那样的政策，那是因为皇后一直左右着拿破仑三世的决策，从而导致拿破仑三世最终制定了那些致命的、不可挽回的政策。

或许拿破仑•热罗姆那天实在是忍无可忍，才把心中积累的怨气一下子发泄出来。这么多年来，欧仁妮皇后一直拿他当出气筒，处处与他作对。此刻，他终于萌生了复仇的想法，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着议员的面揭露皇后丑陋的嘴脸，让大家明白了第二帝国的衰落、拿破仑三世的惨败，皇后难辞其咎。我不清楚拿破仑•热罗姆在留给后人的文稿中有没有明确提到至今人们还拐弯抹角谈及的那些指控，但我相信它们可以澄清后人对他的看法。如果这些文稿真的存在，他的后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马上销毁。虽然他已离开，但欧仁妮皇后的仇恨仍如幽灵般笼罩着他。欧仁妮皇后无情地夺走了他的儿子维克多[5]，而维克多本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陪在他身边，让他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皇后就连维克多也不肯放过，因为她仍做着帝国复辟的美梦[6]。



凡尔赛宫

拿破仑•热罗姆犹如恺撒再生。尽管他一生过失连连，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和曾经的恺撒一样，他聪明过人，刚正不阿。他身材高大魁梧，有运动员般强健的体魄。他端庄大气，当他以习惯性的步态走在街道上时，周围的一切都因他而黯然失色。他身体微微前

倾，但步履安详。当他从人们面前走过时，腰间的摆饰随着富有节奏感的步伐起伏，人们仿佛再次看到了某位身披紫袍、沈腰潘鬓的罗马皇帝为观看即将上演的血腥决斗仪式径直朝竞技场上的看台走去的样子。

相比他的外貌，他的性格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描述清楚。尽管他见解独到，总能一语中的，但他性情急躁，不善于权衡利弊，结果导致失误不断，不仅毁了名声，而且给自己实现夙愿制造了道道障碍。他向往民主，但又独断专行。他前一秒钟还在推崇普世自由主义，一转眼又以独裁者的形象自居。他这种多变的性格让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所适从。他就像困于大海中间的领航员，一边风平浪静，而另一边却波涛滚滚，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都无法靠岸，好像厄运故意从中作梗似的。

他的多变性格在家庭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位自诩为民主主义者的亲王仗着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向拜访他的来客抖足了威风。他在府中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结果有人说杜伊勒里宫的宫廷氛围远没有王宫[7]浓厚。

拿破仑•热罗姆一生做过很多错事，有些甚至是终生大错，但瑕不掩瑜，他依然是19世纪最出色的人之一。

和拿破仑三世一样，拿破仑•热罗姆能言善辩，善于诱导别人反驳自己的观点，然后据理力争，口若悬河，以绝对优势碾压对方，并从中获得乐趣。有时，他会故作萌态，以女性特有的阴柔完胜对方，并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赞同自己的观点。有时不知何故，他不再滔滔不绝，也不再风度翩翩，刚刚给人留下的亲王形象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的他就变得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好不容易纳入自己麾下的示好者被他的孤傲推到了对立面。

他藐视政客，却不得不与他们朝夕相处；他悲天悯人，为了劳苦

大众，大声疾呼，奔走相告。接二连三的不幸使他的生活多了一份淡淡的忧伤，仕途也因此险象环生。久而久之，他万念俱灰，终日郁郁寡欢。他思想崇高，但举止有失优雅；他志存高远，但做事尚欠稳妥，即便如此，他那崇高的理想——熠熠生辉的崇高理想——是拿破仑一世伟大思想的再现。

他近乎固执甚至鲁莽的行为方式，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矫揉造作，都疏远了那些曾试图向他示好的人。虽然他们并非他的亲信，但在堂兄弟二人的情感出现问题之际，他们却身先士卒，甘愿充当他与拿破仑三世之间的调停人，主动央求拿破仑三世支持他的事业。他表面粗鲁无礼，但实非刻意为之；他天生叛逆，却童心未泯，厌恶颓废的生活态度、虚伪的生活方式、狭隘的人生理想。他曾干过坏事，也曾嘲笑、辱骂过别人，每当想起这些，他都羞愧难当。当朋友当着他的面指出他不得体或有失公允的行为并告诉他该怎么做更可取时，他总是一副兴致勃勃、洗耳恭听的样子，然后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鲁莽、冒失，全然没有往日高高在上、唇枪舌剑的神情，而是温顺地接受建议，并立即付诸行动。

拿破仑•热罗姆心直口快，他本人也因此而乐此不疲，但他的直爽往往被周遭环境所湮没。接下来，我讲个故事，让读者领略一下拿破仑•热罗姆性格中善良的一面。

一天，在贡比涅宫，阿道夫·比约[8]受拿破仑三世委托，与欧仁·鲁埃和马涅一起在两院议会上为杜伊勒里宫拟订的政策做辩护。阿道夫·比约碰巧从拿破仑•热罗姆身边经过，就向当时正和一位朋友聊天的亲王深深鞠了一躬。众所周知，阿道夫·比约是王宫的常客。据说，阿道夫·比约深得老国王热罗姆喜欢。阿道夫·比约也非常尊敬拿破仑•热罗姆。他鞠完躬后，拿破仑•热罗姆一脸茫然，没有理睬对方的敬意。这让刚才和他聊天的女士大吃一惊，她直截了当地问拿破仑•热罗姆为什么要那样做。这看似无关紧要的举动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她问道：“殿下，您没看见比约先生给您鞠躬吗？”

拿破仑•热罗姆回答道：“我看见了，但我想我和他之间没任何友谊可言，因此没必要给他回礼。”

“殿下，难道您忘了比约先生是您真正的朋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深得令尊爱惜吗？”

“我会选择性地遗忘一切或记住一切。比约昨天在国民议会上发言了，他的演说苍白无力，废话连篇，毫无独到见解。”整篇演说只涉及罗马问题，而罗马问题恰好是拿破仑•热罗姆最热心的问题之一。“他的演说没有意义，我顿时对他失去了信心。不管是谁，只要在政治立场上与皇后沆瀣一气，他就不是我的朋友。”



杜伊勒里宫的代言人阿道夫·比约

她说：“哎呀！殿下，您太偏激了。我们应该相信比约先生那样做是情非得已的，只是为了讨好皇后罢了，但他爱戴的人是您啊！即使这样，您也应该理解，作为杜伊勒里宫精挑细选的代言人，在罗马问题上他不能唱反调。您觉得管弦乐队中的乐师能把乐队的表演变成个人独奏吗？把您的怨恨暂且搁置一边，跟他握手言和吧。他会因您真诚的歉意而感动万分，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忠于您。殿下，您身边本来就没几个朋友，不能再失去那些顶着压力向您表达忠心的人了！”

拿破仑•热罗姆认真地听着，沉思片刻后，站了起来，表情痛苦。

他说：“你说的对，比约先生身不由己，我应该向他道歉。”

真情的流露使他显得与众不同。

拿破仑•热罗姆找到比约先生，向他道歉，说刚才不该那般无礼。

这个故事充分展示了拿破仑•热罗姆爱憎分明、感情用事的性情，让我们对皇室的罗马政策窥见一斑，表明了罗马问题背后相互关联的几股势力明争暗斗、冲突不断的复杂局面。与拿破仑•热罗姆理论的那位女士熟谙政治，她是第二帝国时期政坛上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

前面我已提到，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热罗姆亲密无间、形影不离。那些诽谤两人互为仇敌、随时准备攻击对方的传言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堂兄在位期间，拿破仑•热罗姆一直遭到欧仁妮皇后的仇视。久而久之，欧仁妮皇后的亲信也对拿破仑•热罗姆不怀好意，并公开与他为敌。要是拿破仑三世有足够的魄力或绝对的权威，从而化解拿破仑•热罗姆与其政敌之间的矛盾，那么拿破仑•热罗姆极可能成为他的得力臂膀。拿破仑三世或许能制止拿破仑•热罗姆做蠢事，使他的才智为帝国所用。如果两人之间没有分歧，政见统一，并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与尊重，那么帝国的根基将坚不可摧，帝国的事业将一片光明。拿破仑•热罗姆遭人诟病的原因是他公开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宏伟蓝图，政治上与拿破仑三世水火不容。然而，我觉得在此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关于拿破仑•热罗姆公开反对拿破仑三世的那些演说疑点重重，值得读者去甄别。

拿破仑•热罗姆——我只是想澄清上文的说法——从没在拿破仑三世审定、许可之前公开发表任何言论。在公开发表言论之前，拿破仑•热罗姆总是先给拿破仑三世递呈一份手写的演讲稿，而拿破仑三世总是以最快的时间审阅完后交还。不赞同演讲稿中某些表述时，拿破仑三世就建议堂弟“某某处应略作改动”。拿破仑三世只是以建议的口吻

提出不同意见，没有任何命令的语气。他也从没指责过拿破仑•热罗姆居心不良或图谋不轨。

拿破仑•热罗姆一直顺着拿破仑三世的意愿校订演讲稿。然而，某次当堂弟发表演讲时，拿破仑三世突然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风骤变，言辞咄咄逼人。演讲稿中多出了一些与原稿格格不入的内容。演讲稿可是他与堂弟一起拟的！这该如何解释？原来，从他与拿破仑三世拟定演讲稿到拿破仑·热罗姆发表讲话这段时间——这个事实值得注意、考虑——在欧仁妮皇后的策划下，阴谋、丑闻等杂七杂八的烦心事一拥而上，如果这些事恰好刺激到生性易怒而又叛逆的拿破仑•热罗姆，那么拿破仑·热罗姆会做出极其不明智而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事情。尽管他对拿破仑三世忠心耿耿，但仍免不了遭人算计的下场；尽管他甘愿臣服拿破仑三世，却还是摆脱不了被迫害的悲惨命运，就像竞技场上被人拿着刺棒驱赶的猛兽一样，明知自己别无选择，却依然渴望自己的生活不被打搅。

当拿破仑•热罗姆在科西嘉发表著名的演讲时，内阁与杜伊勒里宫雷霆大发的场面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就是这篇当时遭到《通报》严厉批评的令人费解的演讲竟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拿来说事，企图以此作为流放拿破仑•热罗姆的借口。实际上，这篇演说稿发表之前是经过拿破仑三世审阅的。拿破仑三世只字未改，也未做任何评论。

拿破仑三世对他最亲密、最喜欢的一位朋友说：“他们的目的是向我施压，使我与堂弟反目成仇，让我把他赶出杜伊勒里宫，往他的伤口上撒盐，给他新增一条‘罪状’，使他从我的世界中消失，将他从皇室中除名。我永远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永远不会把我的堂弟视为敌人。尽管他在背后给我添堵，不赞同我的政治方针，但与我面对面时，他又很顺从。他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没有敷衍我。他对我流露出的感情也是真诚的。当别人严厉的指责、无情的蔑视使他忍无可忍时，他会暴跳如雷，咬牙切齿，进行反击。当然，他这样做不是针对我，他反击的目标是我身边的那些人，有男士，也有女士。我理

解他心中的怒火。假如我是他，我还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当仁慈遭遇无情的践踏与羞辱时，即便心地再宽仁，也难做到无动于衷。他打心眼里爱我，有这点就够了，我别无所求。我有必要对他冷眼相看、落井下石吗？”

拿破仑•热罗姆心直口快，拿破仑三世为此感到欣慰，对他的评价也很中肯。拿破仑•热罗姆对狂妄不可一世的人不屑一顾。感情上他从一而终；待人上，他推心置腹，即使是敌人，也以诚相待；面对困难他无所畏惧，自带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磅礴气势。他身上的任何美德都足以影响国家的命运。

然而，拿破仑•热罗姆既不受宫廷的欢迎，也不受政界的欢迎，更不受大众的欢迎。不管他多么才华横溢、聪明过人，也不管他多么光明磊落，都没法抵消流言蜚语的侵蚀，也无法使他自己摆脱无休无止的恶意诽谤的侵扰。尽管他为人刚正不阿、智慧超群，但他却摆脱不了被谎言愚弄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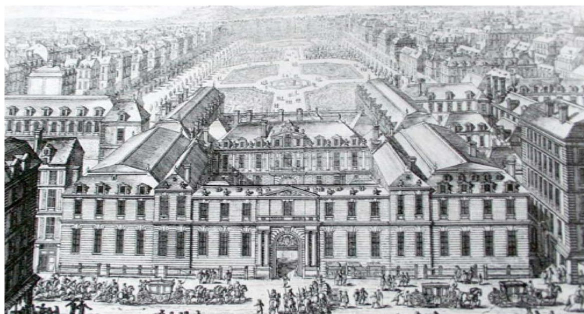
虽然他熟识政府运行机制，但却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为了人民的利益，他鞠躬尽瘁、殚精竭虑，结果却被他们视为笑柄。相比其他亲王，他显得更有威严；相比其他贵族，他显得更有气派。尽管如此，上流社会依然对他不屑一顾。他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但民主派从没把他当回事。简而言之，他不受人待见，常遭人忌，又被人退避三分——惧怕被当面嘲弄、奚落，因为论智商，论气势，无人能与他匹敌。他怀揣远大梦想，具有如恺撒般的雄才大略，但邪恶之神早已盯上了他，他的梦想注定会夭折。

第二帝国时期的拿破仑•热罗姆就是一个愤世嫉俗、不满现状、有明显宗派倾向的人。他与拿破仑三世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所见略同。尽管他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有时思想偏激，但与拿破仑三世隐隐约约的社会主义思潮不冲突。拿破仑三世非常赞同拿破仑•热罗姆的大一统学说。德意志的统一丝毫没引起拿破仑•热罗姆的警觉，

他竟然希望法国能理解德意志的统一事业，为法国没能与俾斯麦在比亚里茨达成相互谅解、支持其实现政治抱负的协议而扼腕叹息。

拿破仑•热罗姆悲天悯人，与拿破仑三世相惺相惜，但就是因为他易怒、易受他人操控、不合宫廷礼仪的坏脾气而蒙蔽了别人的双眼，于是别人看不到他的好。没错，拿破仑•热罗姆有点儿孩子气，放荡不羁，做事轻率，因此常授人以柄。命运仿佛注定他无法大展宏图，总是让他在不该沉默的时候沉默，该勇敢时却软弱。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热罗姆每次离开杜伊勒里宫回到宏伟壮观的王宫（Palais-Royal）时，态度就会骤然大变，开始仇视一切。不管是他支持的政治顾问，还是消遣时他身边的朋友，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开始，最后却不欢而散。

拿破仑•热罗姆的议政厅[9]成员都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他们中有政客、记者、作家，都是杜伊勒里宫的敌人，每天变着花样给欧仁妮皇后通风报信，给拿破仑三世的官方活动与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使拿破仑三世忍无可忍。



王宫

然而，拿破仑三世却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过拿破仑•热罗姆身边的朋友。

“不会，不会，”当有人提醒他这些人是危险人物时，他会习惯性地说，“不会，不会；他们只是一群没有主见的胆小鬼。稍微动动脑

筋即可对付他们。参议院中几个醒目的席位就能摆平一切。”

拿破仑•热罗姆的幕僚行为怪异，处处与杜伊勒里宫作对，但他却没有因此与拿破仑三世分庭抗礼，没有培植自己的势力来满足自我膨胀的虚荣心，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也没有为了私利而与堂兄唱对台戏。相反，他内心恐惧廷臣，怕打经济方面的交道。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展现一下他在打经济方面的交道时的小心翼翼以及掌管他人钱财时惴惴不安的样子。

1870年战争结束后，拿破仑•热罗姆想创办一份报纸作为自己的喉舌。一位富有的朋友——同时是他的狂热崇拜者——非常赞同他的想法，却发觉拿破仑•热罗姆实施该计划有困难，因为拿破仑•热罗姆没钱以顺利完成计划，于是就和他商议，最后同意无条件借给他创办报纸所需的全部经费，并且没有还款期限。拿破仑•热罗姆喜出望外，爽快地答应了朋友的慷慨资助，立即着手将实施计划。但拿到钱后没过多久，他就变得躁动不安了。

一天，拿破仑•热罗姆对一位困惑不解的朋友说：“您可能已经听说X先生资助我很早以前就想创办的报纸的事了吧。我因这笔慷慨的借款而心神不定。我将要投资的这笔钱不是我的。它或许可以使我获得红利，但也有可能使我赔得精光。万一血本无归，我可无力偿还借款。因此，我还是不用这笔钱为好。这笔钱确实困扰我，使我揪心，我要把它归还。我会再三斟酌，如果确有必要创办这份报纸，我会卖掉普朗然[10]附近的部分地产。我不愿让人指着鼻子说我投机取巧。”

拿破仑•热罗姆言出必行，把钱退还给了X先生。他卖掉了部分地产，筹足了办报纸所需的经费。于是，他就不欠任何人的情了。

此举生动地体现了拿破仑•热罗姆的高尚情操，值得称赞，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他。尽管他的为人备受争议，尽管他常遭人算计，但他高尚的品德值得我们尊敬。我知道大众永远不会认可拿破仑•热罗姆

性格中行侠仗义的一面，因为他们对那些司空见惯的、平淡无奇的事迹很少感兴趣。相反，他们对恶贯满盈的坏人的任何风吹草动却乐此不疲，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人物，对遭遇不幸的好人却不闻不问，甚至落井下石。我能想象到这种人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惊愕表情。我们已经习惯把拿破仑•热罗姆定义为一位丑陋怪异的人，所有关于他的故事都是荒诞不经、索然无味的。

关于拿破仑•热罗姆的记忆，如今我们的脑海中只剩下漫画家们、不入流的文人们塑造的那个荒唐的“外号”了。每当提起他的外号，人们就会忍不住嘲笑他的为人。这个外号彻底毁灭了他的希望，也使他的威信大打折扣。他总是以一位悲剧演员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公众给予他的并不是同情，而是嘲笑。

在人们眼中，拿破仑•热罗姆就是一个嗜酒如命、追求低俗的人，而与他一同赴晚宴的作家、艺术家等精英却被冠以高尚的名头，他们从事的是人皆仰慕、光彩夺目的社交活动，散发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息。在人们眼中，他胸无大志。实际上，在世风日下、不学无术的帝国中，他身先士卒，自觉充当保护艺术、文化遗产的急先锋，发扬真、善、美，并以身作则。他是继拿破仑一世之后另一个恺撒大帝。他的身上散发着伯父特有的威严。然而，人们没能从他身上看到这点，更没有把他当作心目中的“恺撒大帝”——我没有在该称谓中添加任何修饰词。恺撒大帝这个模糊的比拟使他成为人们的笑柄，似乎它早已是中国鬼故事中幽灵的化身。

1870年战争爆发时，拿破仑•热罗姆正在北欧旅行。听到消息后，他绝望透顶。获悉双方已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开火时，他返回祖国，行色匆匆地赶往圣克卢宫，结果却扑了个空。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早已不在此处理朝政。

拿破仑•热罗姆最终见到了拿破仑三世，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至今仍让人难以忘记。之前，没人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请听我娓娓道

来。

见到拿破仑三世时，拿破仑•热罗姆异常激动。

拿破仑•热罗姆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们已经宣战，是吗？我们根本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我们拿什么去面对战争？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要打赢它，我们没有任何胜算。与这样一个国家开战，我们只会惨败。”

拿破仑三世有气无力地说：“你说的没错，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战争。”

“要是有人能及时告知我，或许还有转机，”拿破仑•热罗姆说，“这都是皇后一手造成的。皇后以及她那些阴险狡诈的亲信使我们卷入了这场浩劫。陛下，我早给您说过，这个女人是您的克星，她会毁掉帝国。帝国已被她的精心算计祸害得千疮百孔了。”

拿破仑三世缓缓站起身，正对着拿破仑•热罗姆，脸色苍白。他提高嗓门，大声喊道：“拿破仑啊！拿破仑！”

“请原谅我的鲁莽。难道您没看见皇后和她身边的那些人，那些在她的指使与她沆瀣一气、仇视政府、企图独揽大权的人？您没看见他们因战争而神采奕奕，全然不顾战争的输赢，只希望借助战争能终结您当下的政权、复辟12月2日前的共和制吗？”

拿破仑三世的语气变得温和，说：“你的话欠妥。你是杞人忧天。唉！或许我跟你有同感。你本性使然，你驾驭不了真情实感。你对皇后有偏见。她坚信我们能够获胜。我们也要怀有信心和希望。”

拿破仑三世停顿了一下，然后上前紧紧握住拿破仑•热罗姆的手，补充道：“事已至此，悔之晚矣！我们已经向普鲁士宣战，现在还能收回成命吗？”

拿破仑•热罗姆反驳道："我们还能怎样！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赶紧考虑后路吧！我们已经输了。"

说完，拿破仑•热罗姆就离开了拿破仑三世，留下孤零零的他思绪万千。

第二天，拿破仑•热罗姆将与拿破仑三世的谈话内容讲给了某侯爵夫人，正是她把这个故事转述给我的。

就在同一天，拿破仑•热罗姆几乎以同样的心情向某夫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输定了，"他说，"我们单独与普鲁士作战，没有一个盟友，我们不能指望意大利或奥地利会伸出援助之手。意大利还没有做好准备。我的岳父维克多·埃玛纽埃尔二世[11]不可能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军队的集结。我们有什么理由指望奥地利会帮助我们呢？萨多瓦战役[12]爆发后我们给它伸过援助之手吗？梅特涅公爵不是亲口告诉我们奥地利保持中立吗？皇后和她的党羽早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但我有一事不解，埃米勒·奥利维耶怎么就这么轻易上了别人的当？他那么热爱这个国家。他聪敏过人，做事稳妥、谨慎，现在怎么就像傻子一样被耍了呢？您现在知道我们身边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君子了吧？至于他是谁，不久将会真相大白。但即便我们找出那个人，也不能挽回惨败的结局。"



维克多·埃玛纽埃尔二世

关于1870年的战争，仅凭寥寥数笔的描述不足以还原真相。在下一章中，我会详尽解读拿破仑•热罗姆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也会谈及拿破仑三世因陷入圈套而遭算计的来龙去脉。这些阴谋使拿破仑三世与普王威廉一世陷入敌视，使拿破仑三世与1月2日内阁[13]之间的矛盾越陷越深，最后无法调和。

第二帝国垮台、拿破仑三世驾崩几年后，皇太子也战死了。其间，拿破仑•热罗姆一直觊觎王位，静静地等待机会的到来。前文我已提到，在奇斯尔赫斯特被逐出皇室、告别政坛后，拿破仑•热罗姆[14]

全身心投入到儿子的教育事业中，频繁地往返于巴黎的安坦林荫大道上的寓所与他内弟——意大利国王翁贝托[15]一世的王宫。

皇太子死后，拿破仑•热罗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欧仁妮皇后对他的仇恨丝毫未减，她的亲信、忠于她的法国部分省与地区仍密谋将他排挤出波拿巴派。识破阴谋后，他展开攻势，主动前往这些地方，告诉那里的人们他才是真正的领袖，尽管他没有告诉他们他这么做的真正企图。

坎坷不平的政治仕途使他一直没能组建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党派。在与对手的较量中，一个固若金汤、团结一致的党派至关重要。然而，当选议员后，他发现自己在议会中已被孤立。

我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在孤立无助的岁月中，他就像一头猫在昏暗角落避难的野兽，不敢主动出击，只能静静地守候送上门来的猎物，如果不走运，等待它的将是死亡。他的座位在议会大厅右侧靠近入口的最后一排。他几乎从不在座位上安稳地坐着，而是不停地在议会大厅与休息室之间走来走去，因为他只对当天讨论的重要议题感兴趣。



翁贝托一世

之前，我曾提到他参加教规辩论的事。我估计那是他在议会上的唯一一次发言。他那天的所作所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他走上讲坛时，全会场的人无不因他庞大、健硕的身躯而惊愕。议员们交头接耳，相互嘀咕，议论纷纷。他扯开嗓门喊道：“听着，听着！”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显然，拿破仑•热罗姆并没有为他们的虚情假意而买单。这些虚情假意要么表示赞同，要么羞辱他。他以与朋友聊天的语气当着议员们的面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他的态度，还是手势，都显得非常友好、亲切。

拿破仑•热罗姆把两根大拇指斜插在裤口袋里，其余手指放在外面，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小时，一会儿猛烈抨击天主教党派，一会儿又支持世俗社会有权摆脱宗教的束缚。激进派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保守派却怒发冲冠，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嘘声。而即便是保守派人士也会时不时地遏制住心中的怒气，竖起双耳，认真聆听他精彩的演讲，偷偷流露出对他的钦佩之情，也许是钦佩他的口才吧。他的论述极尽了演讲的艺术。那天有幸聆听他演讲的人无不被他横溢的才华折服。

他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但却容易感情用事，每每谈及自己感兴趣的事时，他总是语气高亢有力，情绪激愤昂扬。他讲话字正腔圆，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惊得反对派们个个目瞪口呆。他挥舞着双手，不停地耸动宽大、结实的肩膀，全然不屑于他们的反驳与干扰。演说结束后，他缓缓走下讲坛，在共和派的一片喝彩声中径直朝他的座位走去。群情激愤的保守派人士再也抑制不住怒火，大喊着从座位上一拥而起，把拿破仑•热罗姆堵在扇形第一排座位中间，威胁、恐吓之声不绝于耳。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我见所未见，令我永生难忘。

突然一拥而上的人群挡住了他的去路，拿破仑•热罗姆只好退回到讲坛下面，站稳脚跟后，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反击的架势。他庞大的身躯因愤怒而剧烈颤抖着，眼中冒出两道怒火，鼻孔大张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有几个议员已经挥舞着拳头朝他脸上重重地砸过来。不断涌动的人群眼看就要挤到他身上了。他用力地抖了抖强健的肩膀，向前迈出步子，使劲推开迎面而来的人群，三步并作两步奔向自己的座位。坐稳之后，他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口中喘着粗气，宛若铁匠铺熔炉中喷出的强劲气流，用藐视的眼神瞪着刚才冒犯他的人。他面露笑容，活脱脱一位“恺撒大帝”。他似乎在告诉法国的代表们，他或许会为人民的利益而鞠躬尽瘁，但前提是人民要爱戴他。

签署宗教集会法令时，拿破仑•热罗姆已经失去议员的资格。因为

在议会中没有发言权，所以他写了一封名噪一时的信，信中公开提倡应采取合法措施反制天主教协会。这封信激起的政治旋涡与争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碰巧在那段时间计划采访拿破仑•热罗姆，他把地点安排在安坦林荫大道。当时，我同时为好几家保守派报纸撰稿。我们一起讨论了与宗教相关的问题。

拿破仑•热罗姆希望巴黎能有几家报纸支持自己的立场，能为他的事业助一臂之力。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合作没有任何可能，不为别的，就为他前不久写的那封信。我说话时他听得很认真。我说完时，他卷了一支烟，然后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好一会儿才停下。

“先生，”他终于开口说道，“先生，我的信被曲解了。信中没提到任何诋毁宗教的内容，也没提到任何反对自由的内容。我只是呼吁在法律面前人人能平等。我如果有决定权和执行权，就会立即推行这样的法案。您说不管是保守派阵营的报纸还是温和派阵营的报纸，它们都会因为那封有我署名的公开信而拒绝支持我。有那么几家报纸立场一向坚定，我颇感欣慰。这几家报纸的读者中有很多人是波拿巴主义者、保皇主义者以及虔诚的共和党人。如果这几家报纸能为我说几句好话就好了；相反，如果它们胆敢告诉读者我丝毫不关心教区的宗教事务，没人会相信它们。这样一来，它们的订阅者就会流失，它们就会破产。这种结果会令人伤心。然而，如果让我再写一封信，我的立场还是那样，与第一封信中的立场一样。温和派深知我目前的处境。他们知道我不得人心，处处遭人算计，也知道我崇尚自由主义，遵守宗教戒律。不料他们自顾不暇，看似团结，实则一盘散沙，急需一位掌舵人。我向他们毛遂自荐过，他们拒绝了我，担心我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意欲图谋不轨。然而，对他们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的另有其人，绝不是我。当那个人以狰狞的面孔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会想起我的好，但为时晚矣。”

我只能坚守我的立场，所以只好把话题引向其他方面。拿破仑•热罗姆谈笑风生，一会儿大谈时局，一会儿又对当下的政坛人物评头论足。其中有个细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此我简要地描述一下。

拿破仑•热罗姆说："莱昂·甘必大[16]本质上是个心慈手软的家伙，无心惹事。他不是心狠手辣的政客。他多愁善感，似乎所有肥胖的男人都是这样。他将权倾朝野，会升到内阁总理的职位。但到那时，他就会成为一头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狮子[17]；他会温顺地任凭别人剁掉自己的利爪，拔掉牙齿。哦，他会吃一堑长一智的。至于朱尔·费里[18]先生，他是另一类人。他就像外科医生般冷酷无情，任凭病人百般哀求，绝不会心慈手软，而是毅然决然地操起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切向病人的肌肉。他是个天生的管理者。宪法第七条就是他一手缔造的，第七条的细则也是他起草的，但他的最终抱负却没有实现。他的陨落是灾难，还是万幸呢？如果他的政治抱负实现了，法国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不管朝哪个方向，他都会选择极端。他永远不会允许自己听任别人的摆布。他就像一头瘦骨嶙峋却凶猛无比的公牛。"



共和党人莱昂·甘必大

稍作停顿后，拿破仑•热罗姆补充了一句。这句话我已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一书第一章中引用过。

他说：“我对卡尼尔·德·卡萨尼亚克[19]先生持保留意见。他是教皇值得信赖的急先锋。”

拿破仑•热罗姆一生中最后的几次政治行动之一就是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张贴自己的宣言，因而遭遇了几周的牢狱之灾，当时他被关押在巴黎古监狱[20]。

在这次不幸的遭遇之后，他隐居府中，整日郁郁寡欢，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后来，他的大儿子维克多与他断绝关系，这使他原本已

平静的生活排浪迭起。除政客外，为人之父者纷纷鸣不平，对他深表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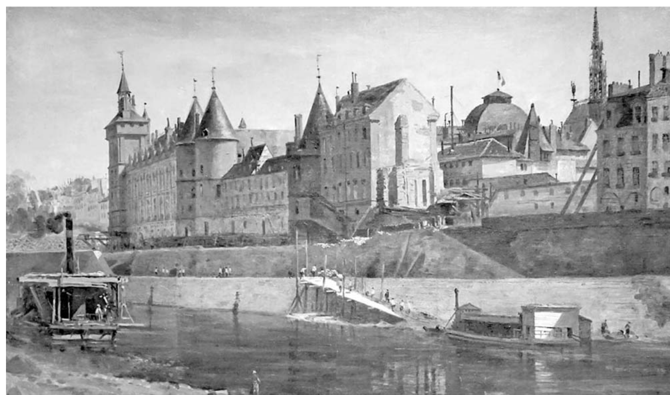
拿破仑•热罗姆的一位挚友向我讲述了父子两人在决裂前的真实对话。在此我只字未改地重述一遍。



朱尔·费里



卡尼尔·德·卡萨尼亚克



巴黎古监狱

父子两人断绝关系事出有因，但公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结局到底是谁之过？父亲还是儿子？

我相信这种情况并非二人所愿。他们双双坠入了旋涡。膨胀的政治野心及贪恋权力的邪念使他们最终成了现实环境的牺牲品。

皇太子曾指定维克多是第二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战死后不久，波拿巴派内讧四起，随即分化为两派，一派拥戴维克多，而另一派则拥戴拿破仑•热罗姆。

以欧仁·若利布瓦[21]为首的拥维克多派——第二帝国时期曾效忠于欧仁妮皇后——公开叫嚣，坚决反对拿破仑·热罗姆，并在几位狂热分子的帮助下，打着所谓的伟大事业、不辜负死去的皇太子的遗愿的幌子，费尽心思劝说维克多与父亲断绝关系。起初，维克多并不赞同这样做。欧仁·若利布瓦与追随者们一看没戏，转而打起拿破仑·热罗姆的主意，劝说他自动放弃皇位，同意由儿子来继承。毫无悬念，拿破仑·热罗姆不会遂了他们的心愿。

欧仁·若利布瓦与追随者们改变策略，继续从维克多身上寻找突破口，郑重地告诉他决不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年轻人良心上还是有点儿不安。但接下来的一个诱惑使他失去了理智，他被告知波拿巴家族

的未来掌握在他手中，这就意味着可以加速王朝复辟了。他顺从了支持者的意愿，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欧仁·若利布瓦与追随者们用计离间他们父子时，拿破仑·热罗姆还蒙在鼓里。维克多忍无可忍，终于在一天早餐后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低着头，告诉父亲他已经做好此后与父亲分开居住的决定，并要求父亲当面赞同他的请求。拿破仑·热罗姆不明就里，一头雾水。“我不反对你的决定，”他说，“你年轻，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也赞同你的想法。我帮你打听，保证找一套完全由你自由支配的住所。”

维克多猛地抬起头，说：“谢了，父亲，但那不是我要的‘独立’。我还是把话挑明吧，为了我的事业，我们应该彻底地分开；为此——我就直说了——我租了一套寓所……我需要独立，”他补充道，“我的党派要求我与您分开，我有义务顺从支持者的意愿。”

拿破仑·热罗姆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的党派？”他大声说道，“你的党派！你说的是哪个党派？我们的事业是不分家的；我的党派也是你的党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以慈父般的语气补充道：“你是不是缺钱花？你是不是厌烦了这种单调的生活？我给你多拨些津贴，我绝不会干扰你的生活。”

然而，年轻的维克多铁心与父亲决裂了，绝不会因父亲的亲切关怀而心软。

“谢谢您的好意，父亲，”他重申自己的观点，“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我们必须断绝关系。”

“啊，我现在才明白，”拿破仑·热罗姆感叹道，“我明白了，有人希望我们父子反目成仇，他们把你当枪使，让你跳出来和我作对。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是你的幕僚早就设计好的吧。毫无疑问，你被欧仁·

若利布瓦收买了。去吧！我不会挽留你。”

拿破仑·热罗姆站起来，离开儿子，走回自己的房间。父子二人从此天各一方，关系彻底决裂。维克多如愿以偿，坐上了党派第一把交椅。

尽管他的父亲在权力竞赛中被无情地甩在了后面，在政治仕途中有过很多失误，但维克多绝无与父亲平起平坐的可能，他永远超越不了父亲的卓越，他的父亲可是这个时代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拿破仑·热罗姆的晚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长期的流放生涯似乎冲淡了他的记忆。镌刻在墓碑上的题名默默地告诉世人它的主人是谁。艺术家与作家肯定不会忘记这位曾经有惠于他们的恩人，更不会忘记这个人曾把他们捧在手心，悉心地呵护他们，欣赏他们。政客们不会忘记他身上散发出的政治家气息——他总是独具慧眼，目光长远，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牢骚满腹。学者们也会因为失去一位知己而黯然伤神，曾经与意气风发的他相处得多么融洽，而现在一切都如东逝的江水一去不复返了。

问，



拿破仑·热罗姆的儿子维克多·拿破仑

文人墨客们应记得拿破仑·热罗姆本人也喜欢舞文弄墨吧。为回应伊波利特·泰纳[22]先生的一部作品[23]，拿破仑·热罗姆亲自执笔撰写了一本名为《拿破仑和他的批评者们》的著作。从文学角度看，这是一部杰作。文人墨客们惺惺相惜，拿破仑·热罗姆也以他们为荣。毫无疑问，拿破仑·热罗姆应得到他们的尊重与倾慕。

面对拿破仑·热罗姆的悲惨遭遇，一群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无知麻木之徒竟然欢呼雀跃、把盏言欢，还为他弥留之际家中的凄凉景象拍手称赞。这戏剧性的一幕是指维克多在拿破仑·热罗姆奄奄一息之际

请求父亲的宽恕。拿破仑·热罗姆从枕头上缓缓抬起头，眼睛里噙着泪水，伤心地说道："罢了，罢了！"仿佛口念咒语。在这些人眼中，拿破仑·热罗姆就像一个被魔咒缠身、被一群复仇天使追赶得无处逃遁的灵魂，一个被逐出伊甸园的罪大恶极的人，但奇怪的是伊甸园本身的界限模糊不清。他是天生的王者，但不幸沦为厄运的玩物，机遇每一次都与他失之交臂。他犹如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天资聪颖，却无奈奸佞当道，妖孽惑众，一代豪杰就此陨落。

拿破仑·热罗姆的一生一直在与厄运赛跑，厄运毁掉了他的一切。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它的摆布。恶毒的命运之神无情地剥夺了他的一切，哪怕是夕阳西下时洒落苍穹的一点儿余晖，哪怕是灾难来临时笼罩寰宇的一片黑暗。厄运造就了他碌碌无为的悲惨结局，迫使他走上了一条注定没有荣光的道路。命运赋予他传奇英雄般的灵魂、恺撒大帝般的禀赋，但却让他如行尸走肉般跻身于芸芸众生。他是一只被桎梏束缚的雄鹰，时时梦想着翱翔天际，却无奈现实的残酷，常常沦为别人的笑柄。他的真实面目并不为世人所知，世人更希望他是一位混迹于狂欢舞会、头戴假面具的舞郎，一个不幸的、被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看到这里，我不禁浑身发抖、泪如泉涌，不因别的，而因汗颜和愤怒。

---

[1]德意志西北部的历史地区，热罗姆·波拿巴曾任国王（1807—1813）。

[2]即热罗姆·拿破仑·波拿巴（Jérôme-Napoléon Bonaparte，1784—1860），拿破仑一世的幼弟，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国王热罗姆一世。1816年被封为蒙特福特亲王。1848年他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后在政府中历任数职。1850年至1852年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上议院议长。

[3]1789年6月1日，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的独生子拿破仑•欧仁•路易•让•约瑟夫•波拿巴在祖鲁战争中战死。

[4]贡比涅宫（Château de Compiègne）是法王路易十五修建的皇宫，后经拿破仑一世修葺一新。它是法国皇室的三个常驻地之一，其他两个是凡尔

赛宫、枫丹白露宫。

[5]维克多（Victor Napoléon，1862—1926），法兰西第二帝国皇位的继承人（1879—1926），被追随者称为“拿破仑五世”。

[6]帝国复辟的美梦是指欧仁妮皇后打着维克多的旗号，意图复辟帝国。

[7]王宫（Palais-Royal）始建于1629年，初为红衣主教黎士留住所，继而为奥尔良家族诸亲王官邸，并非国王的宫殿。

[8]阿道夫·比约（Adolphe Billault，1805—1863），法国律师、政治家，拿破仑三世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9]拿破仑•热罗姆有自己独立的议政厅。——原注

[10]普朗然（Prangins）是今瑞士沃州尼翁区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日内瓦湖畔。

[11]指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1820—1878），先后做过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是意大利人心中的“祖国之父”。

[12]1866年7月3日，萨多瓦（Sadowa）战役爆发，这是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奥地利战败，德意志统一的一大障碍被扫除了。

[13]1870年1月2日，拿破仑三世命埃米勒•奥利维耶担任第二帝国首个责任内阁的司法大臣。责任内阁是法国外部环境恶化、国内自由化呼声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的产物。埃米勒•奥利维耶素以坚决反对君主制而闻名，他主张实行自由主义改革，通过和平的手段把君主专制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

[14]他与国内忠于他的朋友还保持着联系。——原注

[15]翁贝托一世（King Humbert of Italy，1844—1900），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1820—1878）之子，拿破仑•热罗姆的内弟。

[16]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兰西第二帝国末期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著名的共和派政治家。曾担任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1881—1882）。他反对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他是抗击普鲁士的组织者。他为粉碎王朝复辟阴谋、巩固第三共和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7]出自伊索寓言。一头狮子为了娶到自己喜欢的姑娘而拔掉牙齿、剁掉利爪，最后却被姑娘的父亲扫地出门。寓意没有主见，听信别人，结果被原来惧怕自己的人击败。

[18]朱尔·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担任巴黎市长（1870）和法国总理（1880—1881，1883—1885）。因殖民地所需费用太大而引起公愤，1885年被迫下台。最后被一个疯子枪杀。

[19]卡尼尔·德·卡萨尼亚克（Granier de Cassagnac，1806—1880），法国著名记者、影响力甚大的政治家。

[20]巴黎古监狱，全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原是法国皇家豪华寝宫，后改为关押罪犯尤其是政治犯的监狱。

[21]欧仁·若利布瓦（Eugène Jolibois，1819—1896），法国律师、政治家，下夏朗德省波拿巴派议员（1876—1893）。

[22]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称为“批评家心目中的拿破仑”。他的艺术哲学对19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指伊波利特·泰纳的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五卷《现代制度》（1870）一书。该书用整整两章的篇幅（第一、二章）从“种族影响说”的视角剖析拿破仑一世性格残暴的根源，批评他的勃勃野心是建立在践踏法国人民的利益基础上的，称他一手缔造的大厦会随着他的倒台而坍塌，这都归因于他的利己主义。

第4章 夏洛特皇后求援及萨多瓦战役

有两位男士给第二帝国蒙上了悲剧的阴影。他们把阴险的目光投向拿破仑三世。说他们背信弃义一点儿都不为过。他们就像戏剧中惯以塑造的狡诈小人一样，将胸中的怒火毫不留情地喷向自己的猎物。这两个人分别是俾斯麦伯爵和加富尔伯爵。有两位女士对拿破仑三世的生活和第二帝国施加过致命的影响，她们仿佛一只双头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着特有的角色。她们就像来自地狱的两个幽灵，分守在他墓穴的两边，张着长满獠牙的大嘴，吐着长长的舌头，面目狰狞……她们就是欧仁妮皇后和墨西哥帝国皇后夏洛特[1]。正当整个欧洲对拿破仑三世投以期许、温和的目光时，俾斯麦伯爵和加富尔伯爵却盘算着颠覆第二帝国的勾当。正当整个欧洲因拿破仑三世[2]的盛名而卑躬屈膝时，俾斯麦伯爵和加富尔伯爵却看到了希望。大众如果知道他们的密谋，肯定会大惊失色，认为它荒唐至极。我强调一下，他们的密谋就是毁掉第二帝国。

其中一个女人的出现令整个欧洲目瞪口呆。她垂涎拿破仑三世的权力与威严，为了有朝一日能像拿破仑三世那样威武神气，她暗下决心，要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顾一切地向她心中的那个位置一步步

爬去。这原本无可厚非，要是因此去指认她的罪状，后果将不堪设想。或许这只是她随意的一个决定，只不过这个决定透露了她邪恶的本质。她手拿丝线，一圈圈缠绕在拿破仑三世的双脚上。这个女人就是欧仁妮皇后。从侧面来讲，罗马冒险[3]是她实现政治野心的真实体现。在梦寐以求的帝国美梦唾手可得之际，她如梦初醒，恭候她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宝座，而是血与泪的洗礼。

第二个女人也来到舞台上。舞台的背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世界。她就是夏洛特皇后。她刚刚挣脱造物主之手，在浑然不知生命的意义何在、不知情为何物时就迫不及待地栖身人间，头顶鲜花，神采奕奕地沐浴着阳光。她赤裸着身体，静静地站在那里，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她已经卷入权力的旋涡，而且成了权力的牺牲品。雷电交加、风驰电掣，而她像厉鬼一般依然挺立在那个宽敞的舞台上。她成了拿破仑三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犹如一个难缠的幽灵。

在对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上，俾斯麦伯爵和加富尔伯爵大不相同。然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却相同，那就是获胜。认定拿破仑三世对他们的计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曾秘而不宣地同情过他们的想法。这可以从他一贯的决策理念中看出来。

俾斯麦伯爵视拿破仑三世为自己手中的一枚棋子，一旦失去作用，就会无情地弃掉。不过，他从未向拿破仑三世透露过自己的真实意图。在他眼中，拿破仑三世有点儿像斯芬克斯[4]。对于能从拿破仑三世那儿得到什么，他心里没底。然而，这些风起云涌的事件却让俾斯麦伯爵摸着了拿破仑三世的软肋，使他自己的事业锦上添花。平心而论，这些事件足以让欧洲天翻地覆。



夏洛特皇后



加富尔伯爵

加富尔伯爵采取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策略。他善于揣摩拿破仑三世的心思，深知拿破仑三世同情民族统一事业。因此，他对拿破仑三世循循善诱，不断赢得他的支持。俾斯麦伯爵态度强硬、手段残忍，善于制造恐怖气氛，说起话来高声大嗓，仿佛一只咆哮的斗牛犬。而加富尔感情细腻，做事柔中带刚。他了解拿破仑三世的为人，经常鼓动他，进而从中获利。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如果不受《法意协约》[5]的束缚，如果果断一点儿，如果不受债务的困扰，拿破仑三世仍然会奋力前行，带领意大利最终赢得领土上的完整、政治上的独立，尽管他这么做会使加富尔恨得咬牙切齿。放眼望去，意大利事业稳中求

进，一步步朝着国家与民族统一的大好方向发展，这正是拿破仑三世梦寐以求的，这也是对他积极投身于该事业的巨大回报。然而，他却不得不顾及教皇的世俗权力，因此只能左右逢源，在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与教皇之间周旋，谋取法国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没有欧仁妮皇后歇斯底里式的干预，如果她的常务顾问能和他同舟共济，如果他不受手握实权的政党的束缚——他没有自己的政党，他就不会处处受制于人，将会最终实现自己的夙愿。

继意大利后，德意志邦联逐步形成。欧洲历史上注定会涌现出诸如加富尔伯爵、俾斯麦伯爵之类的民族主义者，似乎他们的出现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荣耀，但这份荣耀背后却是法国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他们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各取所需，一人捕获了他的心，而另一人俘获了他的神。两人都出访过法国，只是时机不同；两人都曾被奉为上宾，受到杜伊勒里宫的热情款待。一时之间，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杜伊勒里宫传为佳话，宫廷中掀起了一阵崇拜之风。甚至连欧仁妮皇后的那些身份卑微的专门负责朗读文字材料的人，自从目睹他们的飒爽英姿后，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深深地迷恋上了他们。

那时，杜伊勒里宫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宫廷上下盲目崇拜一切外来之风。男女大臣们鄙视本土的一切东西。他们无视祖国母亲，对她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无心过问百姓疾苦，不把他们对自由的诉求放在心上，反倒对发生在遥远国度的点点滴滴抱以极大的热情与关注，俨然一群头脑简单、目光短浅、吃里扒外的白痴。

加富尔伯爵早在俾斯麦伯爵之前就察觉到了法国人的这个通病。他因此而暗自欢喜，并从中获益。随后，俾斯麦伯爵也从与法国前后几次的接触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信心倍增，最终大获全胜。他与法国的几次接触分别是：比利亚茨会晤，1867年受邀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凡尔赛宫出席威廉一世的加冕仪式[6]——自此之后，波拿巴家族的另一颗璀璨之星[7]也陨落天际。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听过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有一个居无定所的幽灵，会在人们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它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没于婚礼、盛宴、家庭聚会和公共集会。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变得满目疮痍，目光扫到哪里，哪里便会哀鸿遍野，而人们却束手无策。

这个故事曾让我毛骨悚然，每当听到它时，我就会一头扎进讲述者的怀里。这令我不由得想起1867年的情景。当时，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大声地歌颂帝国，赞扬帝国光辉灿烂的荣耀、至高无上的权力。喜庆冲昏了人们的头脑，空前的盛世掩饰了人们的愚蠢与疯狂，他们围坐在一张巨大无比的餐桌旁，把酒言欢，热闹非凡。此情此景使我又想起了那个故事。正当酒兴情浓时，我记得有个人推开椅子，站起身来，那个人正是俾斯麦伯爵，看到他，我就想起了那个故事中的幽灵，他凶狠的目光扫视着在座的每个人，仿佛死神降临一般。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一直全力支持意大利的事业，尽管带着一丝无奈与被动。在后人看来，意大利开创了民族统一大业的先河。从此，民族统一事业犹如决堤之河，势不可挡。除了纠缠不清的意大利问题，还有两大因素对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帝国产生过致命的影响。这两大因素就是墨西哥和萨多瓦。

在本章伊始，我用寥寥数笔的描述刻画了一个不幸的女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女人的身上看到墨西哥灾难的影子。回想当时她因丈夫加冕为墨西哥皇帝[8]离开巴黎前往墨西哥的新家时，她神采奕奕，而当她再次出现在巴黎街头时，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她泪眼婆娑、楚楚可怜，和乞讨者无异，这一切都是拜欧仁妮皇后和梅特涅侯爵夫人的荒唐行为[9]所赐。她伫立在拿破仑三世面前，就像一位了无生机的绝望女神，一座轮廓模糊的雕像。她向拿破仑三世诉说着自己的辛酸往事。从这一刻起，她成了拿破仑三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圣克卢宫召开廷议时，这种失态的行为已有了苗头。当时现场

的气氛令人发怵，而这个可怜的女人后来成了不幸的牺牲品。



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馆区



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梅特涅侯爵夫人

有个桥段比上文提到的那一幕更富戏剧性，这次的主角是夏洛特皇后与拿破仑三世。它发生在圣克卢宫廷议后的某一天。这幕剧极尽悲剧之精华，难以言表。尽管剧情瘆人，但撩动了人们的恻隐之心。

逗留巴黎期间，夏洛特皇后不止一次请求面见拿破仑三世，向他当面澄清她此次出访欧洲的动机，并恳求拿破仑三世能够延续他的支持——他曾承诺支持她的丈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但后来收回了承诺。

拿破仑三世对夏洛特皇后这次求见的目的心知肚明，但他已决定

不再进行墨西哥远征[10]，坦然面对现实。因此，无论她怎样央求，只要能推掉，他就对年轻的夏洛特皇后避而不见。但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最终，他应允了夏洛特皇后的请求，答应与她见面。

面对欧仁妮皇后咄咄逼人的气势、梅特涅侯爵夫妇一唱一和的外交攻势，拿破仑三世本人也觉得远征墨西哥能为自己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耀，可以让他的皇权在美洲大陆上生根发芽。于是，他对远征充满了信心，觉得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他太急于求成了，结果被眼前的虚幻美景蒙蔽，竟没有认真、彻底地思考当下的实际困难。梦醒时，他突然觉察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不再受墨西哥人[11]欢迎、拥戴，简而言之，认清仓促犯下的错误时，他惊慌失措地退回营帐，嘴里念叨着“事已至此[12]”。从道义上来讲，此次远征或许本来就不占理，但政府行为背后的逻辑往往是无情的，不给你任何机会去考虑道义与情感上的事。

因此，准许夏洛特皇后觐见[13]时，拿破仑三世早已准备好该如何面对她的理论、泪水与愤怒了。

夏洛特皇后怀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目光中带着些许怒气。她既盼着拿破仑三世到来，又怕他的到来。在她看来，既然拿破仑三世把自己的丈夫推上了皇位，那他就不应该半途而废。但她还是忍不住担心起来，因为从他的托辞、令她失望的举措以及流露出的遗憾来判断，他已暗示他不再对她的故事感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14]，她曾有过不祥预感，而这次她不得不饮下这杯苦酒了。

当被告知拿破仑三世快到时，她上前迎接拿破仑三世，简单寒暄几句后，便迫不及待地把心中压抑了很久的想法向拿破仑三世和盘托出。

夏洛特皇后说道：“陛下，您可能终于被我丈夫的不幸遭遇打动了。您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吗？”

拿破仑三世沉默了片刻，然后极温和地表达了他诚挚的遗憾。

他回答道：“我在墨西哥的行动已经终止。我不能出尔反尔。如果我这么做，我的政府及两院会拒绝执行。”

“您是皇帝，陛下。”

“我是皇帝。可只有当我的命令能给法国带来荣耀、符合法国的利益时，它们才会受到尊重，得执到行。”他顿时变得激动起来，“但我不能拥权自重，置我的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不能让我的国家卷入一场无止无休、无利可图的战争。”

“就在不久前，您可不是这么讲的。”

“就在不久前，我还心存希望。”

“啊，您曾有过希望？”

“当时我多么希望马克西米利安能好自为之，能够用我赋予的权力赢得墨西哥人的爱戴。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洞察民情，想他们之所想，以自己的才智铸就宏图伟业。”

“可现在呢？”

“现在我不报希望了。”

夏洛特皇后颤抖着站起来，挪动着沉重的双脚，在高大的会客厅里走了几步，然后抬起胳膊，把手甩向额头正上方。

“可恶，”她喃喃自语道，“可恶！”

夏洛特皇后再次在离拿破仑三世不远的地方坐下来。

“陛下，人们都说您慈悲，您总会对那些遭遇不幸的人施以援

手。现在，我和丈夫就是那些遭遇不幸的人，您就发发慈悲吧！我求您，陛下，支持支持我们吧，我们会由衷地爱您，并为您祈福。”

夏洛特皇后再次站起来，走到拿破仑三世面前，行了一个屈膝礼，准备用她的双唇亲吻拿破仑三世的手。然而，拿破仑三世及时阻止了她，低头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个刚才苦苦哀求的女人。

他亲吻着夏洛特皇后的手指说：“你说你的丈夫身陷困境。要摆脱困境，只有靠他自己了。让他随我的军队回国吧，别再做那个所谓的帝国梦了，那是一个不祥的梦。”

夏洛特皇后突然变得傲慢起来，大声嚷道：“这算什么事，陛下？您让我的丈夫——堂堂的墨西哥皇帝夹着尾巴逃掉？让他颜面扫地，做一个胆小鬼？”

“胜败乃兵家常事。敢于认输的将军既不是胆小鬼，也不失体面。难道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境不像一位战败的将军吗？让他学学这样的将军吧。巧言只会蒙蔽理智，贻害无穷。你有点儿紧张，你的神经崩得太紧了。我希望你别总这么紧张兮兮的。”

夏洛特皇后再也听不下去了。“绝无可能，”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她提高嗓门，大声喊道，“马克西米利安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他绝不会灰头土脸地逃掉，绝不会姑息那些试图夺走皇冠的叛贼。是的，有一件事他可能会做，如果迫不得已，他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届时我将与他同存亡。”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夏洛特皇后

拿破仑三世说道：“我希望你冷静地考虑一下我刚才的观点和建议。马克西米利安和你的前程全依仗于你的决定。”

夏洛特皇后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直没动，她的目光呆滞，脑海中翻滚着一切可能的后果。她无心在意拿破仑三世说了什么，她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好像在哼着某个曲调。

“他必死无疑，他必死无疑，我将与他共同面对死亡。他们会把我们合葬在一起；我们将肩并肩共躺同一墓穴，互诉衷肠，忘却人类的残酷无情。后人会为我们唱赞歌，颂扬我们曾经的荣耀。”

拿破仑三世满脸忧伤，但同时变得警觉起来。他想起了夏洛特皇后曾在圣克卢宫遭到攻击时的情景，担心悲剧重演。他轻轻地按着她的胳膊，扶她坐下。她毫无意识，任由拿破仑三世摆布，两眼呆呆地望着拿破仑三世，浑然不知一切。过了片刻，她猛地回过神来。

“啊，您是皇帝，”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您就是那位把我的丈夫扶上皇位的万能的皇帝；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女人，百般央求您，向因受您所赐而最终沦为受害者的人大发慈悲。”

随后，她换了一种极其严厉的语气。“那么，您确定要这么做吗？您让我们自生自灭？”

拿破仑三世突然意识到自己尴尬的境地，回答道：“我已经告诉你我无力帮助马克西米利安。”

夏洛特皇后再次站起身，一动不动，双眼充满悲伤，认真地打量着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被她的气场震住了，不好意思地把目光扫向地面。突然，她双膝落地，跪在拿破仑三世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拿破仑三世顿时慌了手脚，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夏洛特皇后就已双手合十，在拿破仑三世面前做起祈祷，求拿破仑三世大发慈悲，就像无计可施的人们殷切地祈求上帝一样。

夏洛特皇后深情款款地说道：“陛下，马克西米利安在墨西哥遇到了劲敌，他们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歹徒，毫无怜悯之心。如果不派军增援，他根本抵挡不住，他们会加害于他。我这次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救他。他急不可待地盼着我回去，我知道他心急如焚，就像已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扳着指头算自己还能在世上活多久一样。陛下，您也爱过。曾经的美好回忆肯定能再次打开您的心扉，能让您感同身受。我爱着我的丈夫，陛下，他也爱着我。我们是彼此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们发发慈悲吧！我恳求您不要用他的牺牲来助长一个叛逆民族的嚣张气焰。他以慈悲为怀，不止一次地赦免死囚犯。陛下，我大胆恳求

您放过一个善良的人，救马克西米利安一命吧！”

那个不幸女人的祈求终于停了下来，她已精疲力竭。她开始呜咽起来，整个身体颤抖着。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苦苦哀求中。当她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整个人瘫坐在了地上。

拿破仑三世想轻轻地把她扶起来，对她说几句宽心的话。他觉得没必要让这令人心碎的一幕继续下去了，得赶紧结束。

拿破仑三世说：“我会竭尽所能确保你和丈夫的安全与幸福。哎！但我不能骗你。在这件事上，我的政府态度已经很明确。法国不再支持马克西米利安做墨西哥的皇帝。”

拿破仑三世一说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慌了神。夏洛特皇后站起来，更确切地讲，是从地上跳起来，僵立在拿破仑三世面前。她大张着嘴巴，俨然一个疯婆子，乍一看恐怖瘆人，又一看楚楚动人。当着他的面，她脱口将心中的失望、愤怒、怨气一泄而出。

“陛下，”她一边抽泣，一边说道，“都说您宅心仁厚，平易近人，那是骗人的！都说您心胸宽广，海纳百川，那是骗人的！都说您至高无上，无所不能，同样是骗人的！您就是一个魔鬼。贵为皇帝，您无权可施；身为统治者，您胸无大志。您就是邪恶的命运之神，拉我们给您垫背。您是万恶之源，您主宰着一切邪恶的力量。然而，恶有恶报，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找上您的门。您，还有您的宝座，在您毫无防备时，顷刻就会荡然无存！”

在她狂轰滥炸时，她的情绪一步步走向失控。最后，她彻底失控了。她张开双臂，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宛若一头发起攻击的猛兽。

“后退！”她撕心肺裂地连续喊了三声，“后退，后退，陛下！”然后她补了一句，“现在该轮到我对您说我不指望您了。”

面对她的呵斥，拿破仑三世心头一震，徐徐直起身来。一时之

间，他怒火中烧，这个女人太放肆了。但当他再次把目光扫向面前绝望透顶的皇后时，他心软了，怒火渐渐消失了，理解她刚刚说的那番言辞激烈的话了。拿破仑三世很少大发雷霆，但一旦发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这次他始终克制自己，没插一句话，也没摆出任何手势，任凭夏洛特皇后恶语相向。看着夏洛特皇后哭天抢地的绝望模样，他却爱莫能助。他耷拉着脑袋，心中充满同情，失落地离开了会客厅。

再次返回圣克卢宫时，拿破仑三世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拒绝会见任何客人。

拿破仑三世惧怕这些可恶的预言会变成现实，一想起这个女人的话，就忧心忡忡。幸好现在独自一人，他能冷静地思考未来了。但有谁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呢？是一张朝他微笑的狰狞面孔，还是一颗划过天际的波拿巴家族之星？

萨多瓦战役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非个人因素所能左右，它们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俾斯麦伯爵于1864年和1865年先后两次就欧洲现状与利益分配问题与拿破仑三世交换意见。双方都希望获得杜伊勒里宫内阁的谅解，但谈判的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最终没能形成钳制各自邻国的法普联盟。

自1864年起，俾斯麦伯爵就打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主意。丹麦战败[15]后，拿破仑三世情绪低落，变得躁动不安。俾斯麦伯爵乘人之危，借机行事，数次给他灌迷魂汤。俾斯麦伯爵满面春风，荣归柏林，心想有了这次教训，法国在短期内再不会干预德意志的统一大业了。

1865年比利亚茨会晤后，他对拿破仑三世是否会保持中立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但这次会晤使他看到了希望：在完成统一大业的进程中，与法国结盟还是有可能的。而拿破仑三世却疑心重重，只是泛泛

地评论了一下欧洲各国的前景，并没有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在某处引述过俾斯麦与瓦莱夫斯基[16]伯爵之间的对话。对话发生在比利亚茨会晤后。这次对话使俾斯麦伯爵彻底打消了与拿破仑三世结盟的想法。在他意识到拿破仑三世不能为己所用时，他立即萌生了清除拿破仑三世这个大障碍的想法。后来，在戈尔茨先生斡旋下，俾斯麦伯爵与拿破仑三世的关系明显好转。

事态紧迫，拿破仑三世急需奥地利与巴黎内阁之间达成谅解，从而确保意大利的独立和完整。这是考验拿破仑三世权威的重要时刻——怎样才能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为了意大利人民的统一大业，他说过的话仍回响在耳际。“为了自由，”他曾振臂高呼，“向亚得里亚海岸进发！”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在拿破仑三世与梅特涅侯爵中间作梗，阻止两人的谈判深入。在普鲁士的再三请求下，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发誓如果维也纳与柏林和谈失败，他将对奥地利宣战。意大利政府的轻率言行泄露了密谈的内容，两国之间的和解随之泡汤。



普丹战争中的丹麦军队



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与丹麦军队交战

奥地利虽然一度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一再重申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立场，但面对狼烟四起的欧洲，它已经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它以所谓的正当诉求为幌子，不顾其他国家的调停，随即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使本已复杂的时局变得更加云谲波诡，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整个欧洲。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因担心国际时局影响拿破仑三世的决策，俾斯麦伯爵再次以承认法国兼并卢森堡与比利时为诱饵，来换取拿破仑三世在他的民族统一大业进程中的中立立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三世根本没将此当回事，即使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两国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还是没认真理会。

不赞成诉诸武力的拿破仑三世发现自己夹在两强之间，处境十分尴尬，双方谁也不愿意妥协。面对柏林与维也纳政府之间的分歧，他觉得是时候表明自己的立场了，他明确告诉普鲁士他不希望欧洲再生战事。在不讨论任何权宜之计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极端的提案。它或许是一场异想天开的游戏，但我们不能据此而颠覆我们脑海中已形成的拿破仑三世的形象——他是通过武装政变登上皇帝宝座的；如果他的最终提案在这种情况下被置之不理，那么他只有一种选择——站在交战国双方的角度去思考双方的利益诉求[17]。

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拿破仑三世当初不该犹豫，而应当机立断，

与普鲁士公开摊牌。然而，在任何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做出判断，对其进行纸上谈兵式的推理也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但事已至此，我们当初并不希望它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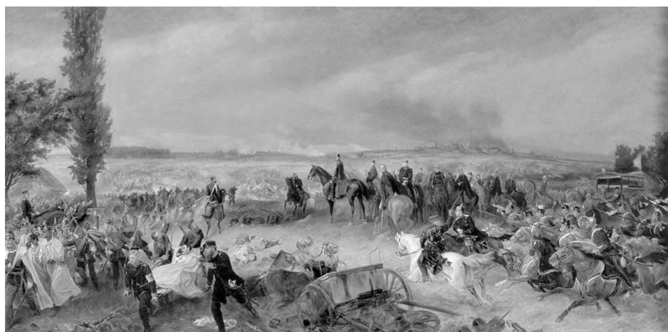
如果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实在不可避免，那么战争会导致至少两种可能的结果。不管是哪种，拿破仑三世都有理由为之欢呼雀跃。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意大利的实力进一步加强，其统一事业便指日可待，而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力量遭到削弱；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欧洲在短时期内再无战事，法国可趁机重整军队，使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伯爵无暇顾及法国的蓬勃发展，而如果有机会，俾斯麦伯爵肯定会百般阻挠。

拿破仑三世言辞凿凿，有理有据。人们视他为斡旋高手，尊他为美好前景的奠基人。

1866年，当奥地利在萨多瓦战败的消息传来时，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拿破仑三世。愤怒的民众失控了，激烈情绪掩盖了拿破仑三世的震惊。他们纷纷替奥地利打抱不平，谴责政府当初不应该对普鲁士抱幻想，也为普鲁士军队在战争中使用的德莱赛步枪[18]的巨大威力而惊愕不已。舆情强烈呼吁拿破仑三世重申他的提案，迫使他继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重新构建欧洲体系。

当时，拿破仑三世身边的几位政客认为普奥两国不会听从皇帝的调停，法国民众也不看好皇帝的斡旋，因为奥普两国之间的敌对已到剑拔弩张的程度[19]。有些人建议他不要学所罗门[20]，去插手已经爆发的普奥战争。有些人建议他阻止普鲁士进一步蚕食德意志全境，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调停失败，就立即在莱茵河沿岸占据有利地形。还有些人则觉得拿破仑三世作为仲裁者本身就明确表明了法国的态度，但他们还是希望内阁能够传达法国的立场，作为和平的条件，呼吁普鲁士公开承诺它的胜利不会殃及欧洲，不再引起欧洲的骚乱。至于先前搁置的关于吞并比利时的提议，现在有必要就我们的诉求照

会柏林了。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宰相俾斯麦和将军毛奇的陪同下来到萨多瓦战场



萨多瓦大战中，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与腓特烈王储相遇

而拿破仑三世仍然做着春秋美梦，天真地认为民族的统一大业本应这样，认为统一的民族将有利于欧洲的稳定与繁荣，因此，他对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它将不可避免地使欧洲政局重新洗牌——几乎持默许的态度。因此，法国表明了不反对德意志统一大业的立场，只向柏林照会法国的利益诉求。

照会内容如下：恢复1814年法国与反法联盟成员国签订的《巴黎和约》中规定的边界；占领卢森堡与美因兹，维持萨克森王国的领土

完整。拿破仑三世命令驻柏林大使贝内代蒂伯爵向俾斯麦伯爵面呈照会。

贝内代蒂伯爵接到杜伊勒里宫的指示时，才从维也纳回来。贝内代蒂伯爵已经向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就使他蒙羞的停战条件做过解释。情况紧急，贝内代蒂伯爵得立刻递呈照会。在通向维也纳的一个小镇上，贝内代蒂伯爵见到了在国王行辕中歇息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伯爵。当时，战事已停，普鲁士与奥地利正在寻找谈判的机会，而普鲁士军队摩拳擦掌，焦急地等待着谈判结果，随时做好开进奥地利首都的准备。

贝内代蒂伯爵发现俾斯麦伯爵似乎很看好这次来访。他向俾斯麦伯爵通报了维也纳之行的情况，告诉他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尽管还没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但已决定在提议框架下停止敌对行动；联邦——德意志北部的几个邦国，不再受奥地利的支配，答应把威尼斯交给法国，然后由法国把它割让给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

俾斯麦伯爵越听越来劲。如果贝内代蒂伯爵与俾斯麦伯爵的谈话就此打住，那么这次会面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都是和谐、友好的。然而，当我们的大使最终向他的谈话对象阐明法国的要求，即为了补偿法国在普奥战争中的绝对中立立场，法国也应该在欧洲支离破碎的乱局中分得一杯羹——吞并前文已提到的国家[21]以及确保法国今后的安全时，俾斯麦伯爵脸上的笑意一下减少了很多。他生性易怒，脾气暴躁，听大使这么一说，马上露出不悦的表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告诉大使这种大事他做不了主，要请示威廉一世。不过，转眼之间，他重拾了外交家的风采。

“这有难度，”他语气平和地说道，刚刚消失的微笑又挂在嘴角上，“要在一次讨论中解决如此严肃的问题的各个环节是办不到的，但机会很多，不必急于一时。我们再做安排，保证双方满意，我坚信我们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分歧。”

带着这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的保证，贝内代蒂伯爵离开了。

这次会面后不久，我们的大使就向拿破仑三世禀报了会面的情况，说他并没能如拿破仑三世所愿完成使命，说普鲁士羽翼已经丰满，不再任由法国摆布，要强行让它兑现以前的承诺已不可能了。

一向善于利用时机的俾斯麦伯爵已经紧锣密鼓地游说北德意志各邦国，让它们站在自己这边，支持他的行动。而这些邦国前几天还和奥地利在战场上与普鲁士厮杀，转眼之间却站在了普鲁士这边，说他们对普鲁士倡导的和平条件无任何异议。或许他们不想再生战事了，这场战争重创了他们。对他们来说，一个独立的邦国也没多大的意义，给他们带不来多少特权与荣耀。让他们与法国开战，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经过一番周密的分析后，俾斯麦伯爵决定立即与奥地利签订和约。遗憾的是，杜伊勒里宫却没能考虑周全，没能抓住机遇在关键时刻强行插手。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与奥地利和解使普鲁士迅速腾出手来。面对团结一致、强大的北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人的自豪感空前膨胀。北德意志联邦开始敌视法国，公然拒绝接受杜伊勒里宫授意贝内代蒂伯爵起草的提案，甚至拒绝就此提案细节展开讨论，拒绝承认法国对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主权，也拒绝改变边界现状。

突如其来的巨变激怒了法国政界。风云变化的时局仿佛晴天霹雳，惊醒了杜伊勒里宫那些睡意正酣的人。它就像辽阔海面上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船只在狂风的肆虐下顷刻之间左摇右晃，甲板上的人

们惊叫着、哭喊着，乱作一团。

然而，时不待人，恐慌并不能解决问题。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当机立断。前一阵子还不愿插手战争的拿破仑三世也因局势的变化而变得焦躁不安。他觉得法国应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战争找回尊严。他电告[22]贝内代蒂伯爵立即返回巴黎。

普鲁士对我们的要求置若罔闻，现在有必要按我们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乌云压顶，死气沉沉，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拿破仑三世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他自登基以来最关键的阶段之一，也是他精神饱受摧残的开端。

外交大臣德律安·德·鲁斯[23]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对普鲁士宣战。这么做会招致北德意志联邦的敌对。奥地利不会助一臂之力，只会看着法国战败。意大利不会和法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只会见风使舵，因为它不看好这场战争——这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意大利不再欢迎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在德律安·德·鲁斯的一再要求下，想起普鲁士的卑劣行径，义愤填膺的拿破仑三世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命令大军开往莱茵兰[24]。这时，第二帝国因之前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而精疲力竭，还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

然而，当他下令备战，告知文臣武将们他的意图时，大家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

骤然而至的恐惧让他们惊慌不已。政客们连连摆头，嘟哝道：“法国并没有受到实际的威胁，只因自尊受到了一点点伤害就断然挑起战争，这是相当愚蠢的，将会面临致命的风险。”将军们议论纷纷，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各持己见。

把法军的备战情况与刚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普军比较后，法军能

否抵挡普军可能的入侵仍疑点重重。在得出准确结论前，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就是严格以普军装备为参照调查法国的军备情况。拿破仑三世将此举视为大臣们的懦弱与逃避，他们害怕承担战争的责任，故意绕开他的真实意图。

他孤立无援。第二帝国名正言顺的支持者们抛弃了他，他的追随者也对他置之不理。第二帝国孤独无助，而他却要把它亲手推向战争的深渊。他没有勇气独自承担一次决定自己国家荣辱成败的行动的全部责任。他沮丧地低下头，希望破灭了。他感受到了羞辱，失望地放弃了行动。

但面对一夜之间变得强大无比的普鲁士，法国空前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心同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法国如何速战速决、战后索赔等问题上来。

然而，从此以后，欢呼声、喝彩声却成了奢望。拿破仑三世注定一生漂泊不定，就像随波逐流的残骸，一会儿漂向海岸，一会儿又漂向大海，一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在无数次摧残与蹂躏下，最后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没错，我们该为他辉煌的一生画上句号了；在这充满宁静、让人备感欣慰的时刻，我们或许该肃然起敬，歌赞他的辉煌。1867年的喝彩声和赞美诗[25]，仿佛低沉的圣歌，仿佛天主教堂中响起的洪亮而又圆润的和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赞美声伴着胜利的欢呼声，响彻天际，回荡在荒弃营地上的军旗之间——军旗随之舞动起来。这些久经战火洗礼的军旗一成不变地向人们讲述着它们背后的故事——它们是隆隆战火中的见证者，它们是国家荣誉的践行者。1867年的赞美诗以其激昂的旋律大声歌颂波拿巴之星，就像当年的东方三博士[26]陶醉于伯利恒[27]之星一样。然而，欢呼声、喝彩声瞬间戛然而止。谎言在一片欢呼声中不攻自破。波拿巴之星危在旦夕，留下万劫不复的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大地上独自游荡。人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尽

管他一心向善，终身对人民的事业念念不忘。他一生大爱无疆，无奈遭人冷落。他曾统治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法国，却死无葬所。

---

[1]即玛丽·夏洛特（Carlota of Mexico，1840—1927），奥地利女大公、墨西哥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妻。

[2]该名字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叛逆与荣耀的代名词以及人们歌颂胜利时的喝彩词。——原注

[3]罗马冒险指欧仁妮皇后主张意大利应由教皇统治的外交政策。面对意大利民族统一事业的快速发展，信奉天主教的欧仁妮皇后坚决支持教皇，保证他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不动摇。先前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拿破仑三世最后被迫让步，同意派法军前往罗马保证教皇国的利益。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70年，法军被赶出意大利，意大利统一。

[4]希腊神话中有翼的狮身女怪。喻指神秘莫测的人物。

[5]1815年，为了协调德语区各邦国间的经济合作，取代1806年瓦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各邦国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德意志邦联。邦联由三十九个独立邦国组成。1866年普奥战争后，邦联解散。1867年，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邦联成立。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统一德意志全境，称德意志帝国。

[6]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这标志着德意志统一的完成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7]指拿破仑三世被俘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

[8]1864年4月，她的丈夫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加冕为墨西哥皇帝，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9]我可不敢称其为犯罪。——原注

[10]指1862到1867年法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

[11]墨西哥人是一个排外性很强的民族。

[12]原文alea jacta est，古拉丁语，这是恺撒的名言，意为“骰子已被掷下”，寓意“事已至此”“木已成舟”，只能破釜沉舟，殊死一搏。

[13]她为此心急如焚，苦苦煎熬了很久。——原注

[14]指圣克卢宫的会客厅。

[15]即普丹战争。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进攻丹麦，丹麦战败。

[16]瓦莱夫斯基（1810—1868），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曾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大臣等职。

[17]言外之意是普鲁士不接受拿破仑三世的调停，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18]德莱赛步枪具有射程远、准确率高、射击速度快等优点。

[19]指法国人叫嚣对普鲁士宣战。

[20]所罗门（？——公元前930），以色列国王。相传以色列王国的分裂是因为所罗门未专事耶和华、私自敬奉诸神所致。此处暗指拿破仑三世不要惹是生非。

[21]即卢森堡与比利时。

[22]指拍电报。

[23]德律安·德·鲁斯（Drouyn de Lhuys，1805—1881），法国政治家，时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大臣。

[24]莱茵兰（Rhineland）泛指德国西部莱茵河中游沿岸地区，历史上称“莱茵河左岸地带”。拿破仑帝国时代，莱茵河左岸北段并入法国，形成了由二十一个德意志邦国组成的“莱茵联盟”。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规定，莱茵河两岸土地归普鲁士王国所有，称“莱茵省”。1871年德国统一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25]原文Te Deum，意为《赞美诗》。《赞美诗》是罗马天主教古老的圣歌之一，在隆重的圣体降福礼或特殊庆典结束时，应念或唱赞主诗，感谢天主所赐的种种恩惠。

[26]东方三博士，指《圣经》中由东方来寻访初生耶稣的三贤王。

[27]伯利恒是巴勒斯坦中部城镇，相传为耶稣的诞生地。

第5章

保皇派、奥尔良派与第二帝国的政治乱象

不管是第二帝国时期的专制统治阶段，还是开明统治阶段，法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仇恨的气息，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而这股仇恨是在“沙龙”里滋生并蔓延开来的。我在《欧仁妮皇后》和《拿破仑三世宫廷》中含蓄地提过圣日耳曼区的领袖们已经嗅到针对拿破仑三世的这股敌意。本章将详尽叙述面对不满与偏见的拿破仑三世是如何泰然处之的。

专制统治阶段的第二帝国受到的“沙龙”的残害或许最严重。专制主义思想、贵族制政府理念充斥于形形色色的“沙龙”，假惺惺地同情共和派的抗议，不断挑衅杜伊勒里宫，毫无示弱之意。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反对当局的党派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我们不用细数，随口就可以说出几个来。其中至少有三个党派值得一提。它们政见迥异，实力雄厚，互不侵犯，但面对共同敌人时总能团结一致。

它们中有坚定的保皇派，唯尚博尔伯爵[1]马首是瞻；有奥尔良派，坚定拥戴流亡的路易·菲利普[2]的儿子们继承王位；还有共和派。

保皇派积极分子主要是女性，她们言辞激烈，消极悲观，无情地蔑视宫中的一切：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甚至整个宫廷。圣日耳曼区不擅长公开叫嚣，它温文尔雅，容易知足常乐。它以自己都难以接受的习俗与礼仪作为庇护。对杜伊勒里宫的一切繁文缛节，它顶多皱皱眉头、噘噘嘴巴，此举当然没有任何危险。因流行的礼仪有感而发的女人们创造了丰富的表情，她们撅着小嘴，眉头紧锁，就像站在圣坛前祈祷的神父们发“国王”[3]这个词时的表情。男人们很快适应了女人们的怪异表情。

尚博尔伯爵对波拿巴皇室及奥尔良派的不同态度使保皇派大为不快。他尊重拿破仑三世及其家人，尤其偏爱年轻的皇太子。相反，他讨厌奥尔良派诸亲王。尚博尔伯爵对波拿巴皇室成员的尊重与对奥尔良派诸亲王的厌恶虽然引起了内部成员的不满，但他们却从不在公众场合表露，只是私下发发牢骚，以自嘲的口吻说拿破仑三世政府及其宫廷至少还能让他们在科布伦茨安心地生活[4]。“移居者”[5]的精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涌动，他们精心谋划着第二个罗伯斯庇尔[6]。计谋本身毫无创新之处，其过程也并非幽默有趣。它夹杂着西班牙烟卷味和舞厅女郎身上霉臭的蜜粉味；它默默地窥探着一切。总之，第二帝国时期的保皇派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诉求，他们大多对社会现状不满，整天郁郁寡欢，而圣日耳曼区则以极优雅的举止无声地抗击杜伊勒里宫，同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

要论融洽程度，非宫廷与圣日耳曼区莫属。拿破仑三世时刻关注着保皇派达官显贵的迫切需求，深知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偶尔有人跳出来叫嚣时，他就会拿政府的几个高薪职位来收买他们，并准许他们信仰自由。对那些贪念杜伊勒里宫荣华富贵的贵妇——她们渴求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拿破仑三世则不定期地邀请她们参加宫廷的各种娱乐活动，从而满足她们的虚荣心。



尚博尔伯爵



年轻的皇太子与母亲欧仁妮皇后

第二帝国时期的男士们可谓别具一格，为了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个个温文尔雅，毕恭毕敬。他们是传统礼仪的忠实践行者。而女士们倒显得粗野，因嫉妒欧仁妮皇后的花容月貌，她们怨声载道。在她们看来，杜伊勒里宫的女主人应该是她们。这些曾经的女主人恶毒而又嫉妒心强，皇室处处迁就她们，但她们却不思感恩，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败坏杜伊勒里宫的风气，心中充满了仇恨。

在她们的私人圈子中，皇后及其侍女们的一言一行成了她们肆意模仿的对象，她们对此乐此不疲。她们这么做无非是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舆论的矛头指向自尊自爱的平民百姓，那么来自各个阶层的抨击将会铺天盖地。他们会因此愤然而起，为自己讨个清白，但那些贵妇会拍手称赞，认为这是在赞美她们呢！

为了使自己的反对立场显得严肃而不失体面，圣日耳曼区的保皇派分支会不定期地选一名德高望重的公爵、侯爵或伯爵离开巴黎，前往弗罗斯多夫[7]或格里茨[8]拜会尚博尔伯爵，以此刺探内情。会谈内容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前，代表往往在圣日耳曼郊区多次推演会谈过程及可能的结果，尽显中世纪特有的礼节与典雅，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肩负重任的贵族光荣完成使命、带着信物——

在这种场合下，尚博尔伯爵从不吝啬笔墨，赞美信使几句，表达对同事[9]的感激之情，并送上对未来的良好祝福——凯旋时，贵族们异常兴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黎街头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披着配有皇家盾形纹章马具的马拖着沉重的马车，缓缓驶过街头，此情此景勾起了人们对美好过往的回忆，从而把眼前帝国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欧仁妮皇后与她的侍女们

这些只有在喜剧中才会出现的角色与桥段很受第二帝国时期贵族们的欢迎。他们对此情有独钟。圣日耳曼郊区的达官显贵们显然不会为了没有把握的事业而放弃追逐历史遗风的嗜好。他们无心过问国事，至于国家实行什么体制，更是毫不在意。他们的所想、所求、所盼只不过是发泄自己狭隘的私欲而已。

在这一点上，尚博尔伯爵跟他们出奇地一致，与他喜结秦晋之好的约瑟夫•查理•安布罗斯•斯坦尼斯劳斯的小女儿玛丽·特蕾莎在遗风旧俗的追求上也是不遗余力。

我在一部著作中曾经提到过尚博尔伯爵夫妇，我在此重述一遍。我申明，此举绝无冒犯他们之意。我写道：

尚博尔伯爵夫人是意大利人，她对欧洲社会产生过致命

的影响；她不但左右着丈夫的思想，而且不止一次插手法国的内外决策。她一直仇恨法国，对法国不怀好意。即使与尚博尔伯爵结婚后，她对法国的偏见也丝毫未减。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家大是大非面前，她都表现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由于对丈夫的思想动态了如指掌，她总能在关键的时刻诱导丈夫放弃他的初衷。这位蒙在鼓里的顶无王冠的可怜的国王却温顺地任由她摆布，浑然不知她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对尚博尔伯爵优雅的贵族生活片段我们并不陌生，大多是对他早年无与伦比的口才的美好回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修辞固然重要，但在政治上华丽的辞藻却是虚伪的代名词，会招致人们的反感。人们对尚博尔伯爵念念不忘的原因是他平易近人，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事实上，他有点儿像异教徒，是一位半神半仙式的人物；他只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关心国家的死活；只有一种说法能够解释通，就是他的脑子有问题。他注定是一位徘徊于宝座附近的平庸之辈。他空有国王的名号，只是偶尔被人记起他曾经是国王。在权力的旋涡中，他只是妻子手中的一枚棋子。在一场注定无果的梦想的推搡下，他如行尸走肉般履行着自己所谓的神圣职责。他终身碌碌无为，对自己的国家更是毫无贡献，尽管他曾假惺惺地爱着法国、陶醉在国王的美梦之中。他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既没留下任何痕迹，也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哪怕是值得称颂的勇气——每个觊觎王位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段历史佳话，每个异族英雄或多或少都有一段传奇经历——的普通故事也没留下。



尚博尔伯爵的妻子玛丽·特蕾莎

有个情况值得一提，那就是第二帝国时期保皇派控制的反动“沙龙”。这些敌对的“沙龙”对拿破仑三世的内政没产生影响，但对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通过插手对外政策，保皇派“主宰”了许多搅动帝国局势的大事。因此，它罪责难逃。在尚博尔伯爵夫人的领导下，保皇派频频干涉帝国的决策，与内阁不停地斗争。它惯用的手段就是这样的。一次，它假手梅特涅侯爵与奥地利政府插手罗马问题。它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欧仁妮皇后对罗马天主教的狂热心理，然后仗着影响力与拿破仑三世分庭抗礼。

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关头才能见证的、引以为豪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这个时代的政客与贵族身上荡然无存。在政客们的眼里，法国就是一张巨大无比的桌子，为他们提供一个绝佳的娱乐平台。他们扔下押着赌注的扑克牌，贪婪地瞅着满桌子的赌注，就像赌徒扔下手中的牌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的赌注时的表情一样。而不管是哪个国家

的贵族，都视爱国为娱乐。他们都有自己特定的圈子。在圈子内，他们不问国籍，法国人也好，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也罢，他们之间都相安无事，仿佛他们就是相见恨晚的英雄，从不问出处。战场上冲锋陷阵时，他们与普通士兵无异，但他们是为个人利益、荣誉而战。他们视战场如赛场，如果不幸被炮弹或子弹击中毙命或死于军刀之下，等待他们的将是来自祖国的铺天盖地的赞誉，就像跨栏时不幸摔下马背而惨死的骑手被盖上他特有的盛装时的情景一样。出生、成长的环境决定了贵族们不能与民融为一体，不能与民同呼吸、共命运，但在生命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行为与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们不能以自相矛盾的世俗处事原则来苛责他们。

尚博尔伯爵是这个世界的王者，在没有研究、理解他之前，对他的任何谴责与羞辱都是不道德的。他身上既没有法兰西民族的优点，也没有它的缺点。他是个异类，就像一支插在不同种树上的枝条。它的枝叶与树本身的枝叶形成巨大反差。他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并不是一个毫无贵族气息的人。他不去做这个国王是有理由的，他讨厌统治一个忠实于传统礼仪——尽管礼仪本身并无害处，但会使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刻板的贵族阶层。

相比保皇派的“沙龙”活动，奥尔良派的此类活动给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奥尔良派人士不安于只发表一些牢骚式言论的现状，他们信仰坚定，政治诉求明确。他们的言论针对性强，政治气息浓厚。他们的领袖要么才华横溢，要么口若悬河，要么熟谙政治。他们是杜伊勒里宫不容忽视的一支可怕的力量。

这些“沙龙”的领袖往往是那些流亡的年轻亲王。他们虽然代表不了整个国家，但至少代表着社会低层各界的人士。他们开始以不幸者自居，后来又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他们真是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吗？答案是否定的。奥尔良公爵[10]，即巴黎伯爵[11]之父，他曾一度被认为是拿破仑三世的继承人。巴黎伯爵的不幸离世使人们悲伤不已，人们至今仍缅怀着他的美德与魅力。

流亡生活并没有磨灭亲王们的雄心壮志。他们频繁地与国内的支持者互动，并鼓励他们殊死一搏。他们敌视第二帝国，在日常生活中发表政见，资助愿为他们鸣不平、倡导他们信念及诉求的新闻媒体。他们是奥尔良派“沙龙”的实际领导者。这些“沙龙”服从他们的权威。他们的领导权既不像喜剧中扮演君主的演员那样有名无实，也不像圣日耳曼郊区的领袖尚博尔伯爵那般空有国王的头衔。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掌权者。胜利的曙光仿佛就在他们眼前。这让我们或多或少想起了远在封建时代的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君主反倒成了他们的手下。



巴黎伯爵菲利普王子

对巴黎伯爵，我只泛泛地说两句。他年富力强，但并不出众，很

适合做一名议员。当然，这是家族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他的思想与政治诉求倾向于他的叔父们，即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儿子们[12]。接下来，我着重讲讲他们中的茹安维尔亲王、内穆尔公爵、蒙庞西耶公爵以及奥马尔公爵。

茹安维尔亲王城府深，有政治手腕。他的大名往往与拿破仑一世式的传奇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就想起“贝勒-普勒号”护卫舰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拿破仑一世遗体时的情景。整个过程是在茹安维尔亲王的监督下完成的。他的为人与忘恩负义的拿破仑三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知道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是七月王朝早就为他铺垫好的。

内穆尔公爵出身高贵，气度不凡，光鲜的人格魅力及骑士般的侠义精神是人们心中经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蒙庞西耶公爵也被广为传颂。他与西班牙王室互动频繁，这让人们欣喜若狂。但在巴黎伯爵的四个叔父中，奥马尔公爵毋庸置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奥尔良派才逐渐有了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当局对奥尔良派敬让三分。

在几个兄弟中，奥马尔公爵最具军人气质。父亲在位及流亡期间，他在军界及政坛上的活跃引起极大关注。这位唐·璜[13]式的人物掀起了人们的一股崇拜热，人们不惜为他冒险、摇旗呐喊。他率军逐鹿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被广为传颂。“沙龙”中的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曾以上校身份，由身着华丽上校军服的情妇爱丽丝小姐陪同，在库尔布尔[14]检阅部队时的故事。奥马尔公爵的一生与法王亨利四世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或多或少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他朝气蓬勃，才华横溢，敢作敢为，深得女人欢心，人们怎样赞扬他都不为过。他与国内的亲信互动频繁。他潜心钻研引起时局动荡的各种问题，紧密关注事态的发展，常常写信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的信件被公开时，往往能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



茹安维尔亲王



极具军人气质的奥马尔公爵



茹安维尔亲王在圣赫勒拿岛打开拿破仑一世的棺椁



茹安维尔亲王从圣赫勒拿岛迎回拿破仑一世的遗体

这些亲王手下的能臣干将遍布第二帝国，当然包括巴黎。他们和那些在“沙龙”中掌握话语权的人都是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其中有七月王朝时期声名显赫的达官显贵们的后裔，分别是布罗伊公爵雅克·维克

多·阿尔伯特[15]、查理·德·雷米萨[16]、约瑟夫·奥松维尔[17]、蒙塔利韦伯爵玛尔蒂·卡米尔·巴克森[18]、德卡兹公爵埃利·路易[19]及查理·德·蒙塔朗贝尔[20]。他们不仅积极主导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创办各种报纸，经常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与共和派一起发出的咆哮声响彻天际，犹如暴风雨来临之际从远处传来的隆隆雷声。

奥尔良派的“沙龙”通常在梯也尔和加列拉的公馆里举行。就是在这里，当时已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风华正茂的布罗伊公爵雅克·维克多·阿尔伯特激情澎湃地向他的朋友们介绍着新思想。他凝视着远方，眼中充满希望，一字一顿地向大家口述他起草的、准备发表的古里古怪的文章。就是在这里，查理·德·雷米萨宣布了他的君主主义信仰，但人们却质疑、回避他的主张，使其号召力大打折扣。敏锐的观察者或许已经从中看出端倪，共和派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就是在这里，约瑟夫·奥松维尔以贵族秉性中的乐天派作风施展自己雄辩的才华。就是在这里，生性暴躁的查理·德·蒙塔朗贝尔口无遮拦，恶毒地诅咒着帝国，而德卡兹公爵埃利·路易更是义愤填膺，将矛头直接指向拿破仑三世本人及所有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即便在1870年战争后，德卡兹公爵埃利•路易依然是最痛恨拿破仑三世的国民议会议员之一。一想起他的母亲德卡兹公爵夫人1861年苦苦哀求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通融的情景，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我在此引述这个小插曲，目的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尽管它旨在证明——正如我在之前出版的著作《欧仁妮皇后》“皇后与社会”一章中所说明的那样——保皇派与拿破仑三世之间存在永远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即便面对极大的诱惑，保皇派也绝不会可怜兮兮地等待拿破仑三世的施舍。一贯以不折不扣、恃才傲物为立身之本的保皇派似乎不吃皇室恩荣共济的那一套，恩惠、荣誉的诱惑似乎只对某些人起作用。毕竟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1861年2月，圣奥莱尔先生受德卡兹公爵夫人的委托，全权负责

与拿破仑三世的大臣商谈援助事宜。在复辟之事上做出妥协后，他将这位影响力广泛的大臣的遗孀的求助信公诸于世。



查理·德·雷米萨

1849年3月7日，时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批准拨给德卡兹公爵六千法郎抚恤金。在写给拿破仑三世的大臣的信中，圣奥莱尔先生提到此事，以便佐证他的请求。圣奥莱尔先生写道：

我尊敬的伯爵：

内附的便条将进一步佐证前几天我给您的信中提到的那些声明的准确性。我们别无他求，只求您大恩大德，能够兑现您的承诺。抛开所有的政治因素不说，您眷顾一位我国前高官遗孀的善举将使您英名长存。

对您的善心我将感激不尽！

您最忠实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星期五

德卡兹公爵夫人在信中写道：

伯爵大人：

1849年，我的丈夫德卡兹公爵获批享受一笔年俸六千法郎的抚恤金，时任总理的奥迪隆·巴罗[21]先生许诺将从政府税收中支付这笔钱。

我生活窘迫，不得不请求您转告陛下不要中断这笔钱的发放。

如果您能帮我这个忙，我将感激涕零。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到。

能做您卑微的、顺从的仆人是我莫大的荣幸
德卡兹公爵夫人

公开这些文献并无恶意。1870年后，如果上述信件作者的儿子

——德卡兹公爵没有冒犯拿破仑三世，或许我永远也不会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世。然而，诸如此类的文献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拿破仑三世为人的判断。强烈的自信使我忍不住公开这些文献，以此来满足读者应有的好奇心，并让他们保持必要的客观性。集腋成裘！如果我们能把体现一个人本质的所有客观事实罗列到一起，历史哲学就会应运而生，而如果其所蕴涵的哲理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可能的结果将超出我们的可控范围。

和保皇派不同的是，奥尔良派中几乎没有有影响力的女性。它吸纳了一大批敢做敢为、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男士。他们反对的呼声容不得半点儿忽视，因为他们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还敢付诸实践。他们曾向杜伊勒里宫全面“开战”，无情地“袭击”了帝国，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甚至学术领域，以此来挑战帝国的权威。他们宣扬自由主义理念，反对帝国禁止一切进步、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独裁主义思想。奥尔良派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尽管后来不再具有——预言了帝国的发展方向，迫不及待地干预帝国的进程，全面灌输他们的政治理念。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挑起蓄谋已久的冲突。要是众亲王的代表群众基础不那么差，他们策划已久的阴谋将会在关键时刻取得成功。这些打着贵族旗号的代表却不习惯穿着上好布料的卡曼纽服[22]。论政治，他们充其量就是半吊子。他们在饰带与香水的掩饰下蠢蠢欲动，打心底看不起人民大众，结果被人民大众无情地抛弃。

---

[1]尚博尔伯爵（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史称“亨利五世”。他本人从未正式承认该尊号。从1844年到1883年，他一直是王位的觊觎者。

[2]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奥尔良王朝唯一一位君主。1848年大革命爆发后逃往英国。

[3]原文为“King”，发音时嘴巴微微张开，双唇凸出，形似噘起的嘴巴。

[4]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无数皇室人员逃往科布伦茨避难。这里暗指拿破仑三世政府对保皇派分子比较宽容。

[5]移居者实际上是指流亡者——因政治因素而流亡国外的人。

[6]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政治家、律师，法国大革命及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在革命浪潮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7]弗罗斯多夫位于今奥地利，尚博尔伯爵曾流亡于此。

[8]格里茨位于今德国，尚博尔伯爵曾流亡于此。

[9]指圣日耳曼郊区的保皇派成员们。

[10]奥尔良公爵（1810—1842），即奥尔良亲王斐迪南·菲利普，路易·菲利普的长子，1842年死于意外事故。

[11]即菲利普王子（Prince Phillipe，1838—1894），法王路易·菲利普之孙，法国王位的觊觎者。

[12]路易·菲利普国王有六子，下文提到的是其中四个。

[13]唐·璜是西欧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以英俊潇洒及风流倜傥著称，一生游走于无数贵妇之间，在文学作品中多被用作情圣的代名词。

[14]库尔布尔是位于巴黎西郊的小镇。

[15]雅克·维克多·阿尔伯特（Jacques Victor Albert，1821—1901），法国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君主主义者。

[16]查理·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1797—1875），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注

[17]约瑟夫·奥松维尔（Joseph d'Haussonville，1809—1884），法国政治家。除了政绩斐然之外，他还在历史研究方面多有建树。

[18]玛尔蒂•卡米尔•巴克森（Marthe Camille Bachasson，1801—1880），法国政治家、法兰西贵族世卿。

[19]埃利·路易（Élie Louis，1780—1860），法国著名政治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他成为自由派领袖。

[20]查理·德·蒙塔朗贝尔（Charles de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论家、历史学家。

[21]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1791—1873），1848年到1849年担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理。

[22]寓意他们心虚、没底气。

第6章

权臣欧仁·鲁埃的恶政与误国

第二帝国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的诞生及专制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开明统治时期。如果撇开个人的政治立场，客观公正地去评价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我们会发现杜伊勒里宫在推行专制统治理念时手法娴熟，在挑选帝国的服务团队时更是一丝不苟。然而，在开明统治阶段，拿破仑三世显得有点儿力不从心。与其把这个阶段划分为一个政治时代，不如说它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时期的犹豫不决，它迈着笨拙的步伐，像摸着石头过河，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位对着画板的画家的模样，他手握画笔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只是被吩咐去创造一幅作品，但始终构思不出该作品的轮廓。开明统治的帝国就是这位画家的缩影。自由是一种新的手段，但画家不知道该如何驾驭。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典型代表除了虽各有图谋但始终心悦诚服地捍卫帝国利益的佩尔尼公爵——-他是拿破仑三世的密友——和其他一些像佩尔尼公爵一样的人之外，还有两人值得一提，那就是查理•德•莫尔尼和欧仁•鲁埃。

我前面已提到查理·德·莫尔尼，在此就不再赘述。然而，一提起这位政客的大名，我还是忍不住会想起人们愤愤不平的样子来。当时，我以回忆录作家的身份对他的历史“角色”做过定性分析，并公诸于世。兴风作浪的朋友们纷纷为他鸣不平，指责我的观点。他们毫不客气地攻击我，说作为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不可能像我故事中说的那样染指当时的财政，也不可能是无数阴谋诡计的始作俑者。

尽管他的追随者高度赞扬他，他的支持者保护他，但查理·德·莫尔尼本人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下面这封1850年——当时正值他政治仕途起伏之际——写给吕奥尔茨先生[1]的信将给读者再现一个真实的查理·德·莫尔尼，也使读者相信我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我的素材也并非胡乱拼凑。

信的空白处写有“1850年9月6日签收”的字样。

星期五[2]

尊敬的吕奥尔茨：

我已去过德沃家。德沃、布朗和我愿意购买贵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先给您支付一万法郎的定金，如果经营顺利，一满两年再给您支付五万法郎。毫无疑问，您将得到那笔钱。除此之外，您还可以从我在英国的生意中享受三分之一的分红。我受他们所托与您商榷此事。咱们快人快语，请您务必尽快答复。当您读完我转陈的条件、看到我对德沃家推动该计划的信心时，尽管我们可能面临一些风险，但我相信您甘愿在英国放手一搏，因为法国的成功就在眼前。我获悉您急需现金，您不惜越过这条令人痛心的海峡寻找商机，而我们是您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请您直接告诉我，您对英国的生意感兴趣，愿意接收调整后的两万四千法郎的定金，并同

意德沃、莫尔尼、布朗三人入股您的公司。如果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办妥此事，我们愿意再付给您六万法郎的现金，或让您享受公司纯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分红。



第二帝国时期的查理·德·莫尔尼

如果您不同意我们的条件，请务必说明原委，并附上您的要求，我好向德沃家交代。您会懂得用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解决问题是多么有必要，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主意全由您来拿。请务必给我回信，以下是收件地址：

塔利-艾伦

苏格兰福思河畔金卡丁镇

您的回信将在德沃家中传阅，请务必字字斟酌，别让他们失望。如果您有私话对我说，请另附页。

就此搁笔，时间匆忙，请勿见怪。

请务必惠存此信。

致敬

查理•德•莫尔尼

从此信可以看出，在博得人们对查理•德•莫尔尼的信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他的为人，但这并非易事。我们还可以看出没有人比他更奸诈、狡猾，更懂得掩人耳目；也没有人比他更懂得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他也精于指使别人做传话筒，而自己却躲得远远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

当然，这封信只反映了查理•德•莫尔尼道德情操的一个侧面。但这足以让他名誉扫地，人们不会再为他受到“玷污的名誉”而打抱不平。如果他们继续坚持之前的观点的话，那将是荒唐可笑、天真幼稚的。

我在本章中不得不提及查理•德•莫尔尼，但重头戏是展示一个全面的欧仁·鲁埃。他发迹于奥弗涅省，从一位小律师一路爬到“副皇帝”的高位。他具有山里人那般健硕的体魄。他的肩膀虽然宽大，但不足以担负卓越的天赋赐给他的累累硕果。他凭着惊人的毅力、勇气与不屈不挠的精神登上了为人臣者的巅峰。暂且不论他是天使还是恶魔，一股强劲的大风，正如维克多·雨果的礼赞之风，一股足以折断雄鹰羽翼、足以使最闪耀的流星改变轨迹的强风，有一天突然把他卷下

了奥林匹斯神山[3]。

初次来巴黎闯荡时，欧仁·鲁埃既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显露才华。他很快放弃了连自己都鄙视的律师职业，将目光投向政治。他卑微的出身赢得了同阶层人士的同情。他也是一名热忱的民主人士，大肆宣扬自由主义。他与君主们势不两立。我不能苛刻地批评人们随着时局变化而改变立场的倾向。我只把欧仁·鲁埃掀起的政治风暴作为客观事实来提，而对风暴本身不做任何评论。



19世纪**60**年代的欧仁·鲁埃

欧仁·鲁埃在公众视野中存在了些许年头，尽管后来人们也曾关注过他，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他第一次抛头露面时的样子。他长相俊俏，身体结实，胸肌特别发达。要是他的举止不那么生硬、呆板，要是他的行为与花哨的打扮之间的反差不那么大，他的形象或许就完美了。“优雅”一词从不适合用在他身上。他是誓死追随欧仁妮皇后，对她百依百顺，不管是私下还是明面上从没想过要违背她的意愿

的为数不多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是一个具有心理学价值的历史事实。

欧仁·鲁埃还在里永[4]法庭做辩护律师时，他的自由主义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在巴黎站稳脚跟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当他分别于1846年、1848年参加竞选时，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已日趋成熟。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人民的事业。

1846年的竞选中，欧仁·鲁埃落选，但他在1848年成功当选议员。从此，他成了世界政治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我手头保存了几封欧仁·鲁埃1848年成功当选人民的代表之后写的信。此时，第二帝国未来的大臣在如何对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做他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件事上摇摆不定。我在这里引用的这些信反映了作者当时矛盾的心理。其中，第一封信写于1848年6月，收件人和第二封信一样，同为时任克莱蒙费朗[5]市长的拉图尔先生。

法兰西共和国[6]
巴黎市长官邸

> 此时此刻，我正在市政厅赶在邮车离开之前给您写信。我视察战地医院和前哨站，忙了一整天。厮杀的场面多么血腥啊！然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或者说将属于我们。大军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所有战争中最可怕的莫过于内战了。今天傍晚或明天的某个时候一切将见分晓。海关大楼已被绝地反击的路易·尤查特·德·拉莫里西埃[7]夷为平地。经过长时间殊死搏斗后，圣安东尼区那个坚固的堡垒终于被攻克。就在此时——凌晨四时半，我收到了大获全胜的消息。反动派因势利导，营造了一种恐怖氛围。街区两边的人们交头接耳，说我们的指挥官已被秘密处决。如果他们给我们造成了重大伤亡，那我们也要让他们血债血偿。我们已损失了五十位同志。我们冒着枪林弹雨解救了一名伤员，使他免于被投

入河[8]中的厄运。

到目前为止，我方的伤亡人数已达一千七百人左右。截至今天凌晨，反动派的伤亡人数也差不多达到这个数了。

城中的交火还在继续。在我给您写信时，我四周的炮声不绝于耳。前方传来捷报，我们的部队取得了胜利。预备役部队展现了非凡的勇气。

这些事件发生两个月后—1848年8月13日，我们发现欧仁·鲁埃的注意力转移到法国的外交政策上了。在一次会议上处理完与选举有关的事宜后，他写道：



路易·尤查特·德·拉莫里西埃

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与国民议会会议上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问题相比，它们只能退居其次了。至于意大利问题该如何收场，我无从得知。令人讨厌的战争灾难我感觉已近在咫尺。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我们将腹背受敌。与其让我们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当初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巧妙地交由奥地利来处理。“贵国与意大利的战争，”我们本应该这样对奥地利说，“将把贵国拖入无法自拔的泥潭。如果贵国被查理·阿尔伯特[9]击败，贵国会颜面扫地，被迫灰溜溜地离开意大利。

如果贵国再与法国为敌，这是贵国需要的胜利吗？我们是不是该坐下来商议商议呢？”内部不团结、没有必胜把握的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接受外交调停。如果开往都灵的大军畅通无阻，以当前的局势来看，我们的军队必胜无疑。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但当我们开口谈及自由时，英国就会慢慢地疏远我们，最后躲得远远的，留下我们独自面对奥地利与俄国，或在某个地方击败我们，让我们蒙羞撤退。

口头辩论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不想为我们望而却步的懦弱行径买单，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将是极其激烈的，因为它会立即变成一场夹杂着个人恩怨的政治斗争。我也担心投票的结果不会支持我们。

我们发现就在同一个月，他还写下了以下文字，文中透露出丝丝悲伤，但还是能看到他满意的神情。



欧仁·鲁埃信中提到的查理·阿尔伯特，撒丁-皮埃蒙特王国的国王

埃米勒·德·吉拉尔丹[10]阴谋案让人虚惊一场，现在终于落下了帷幕。结果，当权者准许重新发行那份叫《人民代表》，主编为我们“亲爱”的同事“公民”蒲鲁东[11]的报纸。蒲鲁东曾撰写系列文章大肆宣扬反社会主义言论。然而，当我们肩负使命清除挡在我们面前的强大的邪恶力量时，蒲鲁东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引我们实现目标呢？政府还在半睡半醒的昏迷状态。现在该是信心饱满，并让饱满的信心彰显自己力量的时候了，必要的措施迫在眉睫，政府应通过这些措施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让整个机制有效地运转起来。二十个委员会拟定的项目因一项新计划的出台而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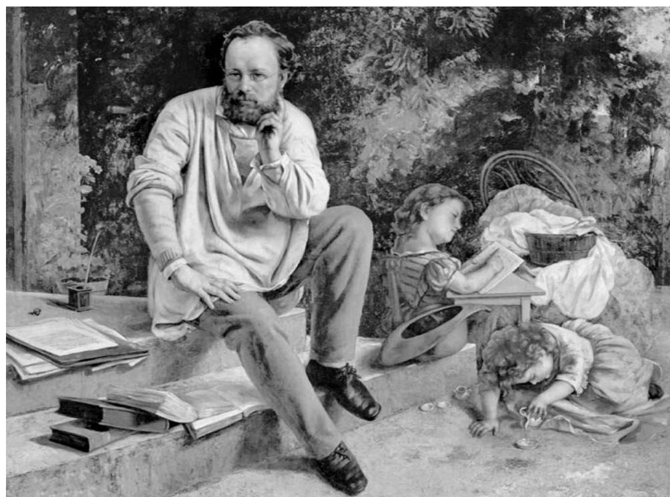
> 搁浅，该计划应在原来计划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应全盘否定之前的计划，但并没有统一的行动方案。如果此时断然得出一切进展井然有序的结论，那无疑是自欺欺人。国家越是涣散，危险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到他意气风发、不久将手握大权的信心。然而，欧仁·鲁埃并没有一直忠实于他在此期间大肆鼓吹的自由主义信仰。1848年革命[12]一年后的1849年4月14日，他突然改变立场，转而反对极端革命主义言论。他写道：

> 当我们逐渐接近目标时，拉蒙塔涅[13]的抗议呼声越来越高涨。我们面面相觑，等待对手主动提出休假请求，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趁机解除他的职务。



一幅讽刺漫画，其寓意埃米勒·德·吉拉尔丹不过是一个挥舞大棒的丑角



19世纪中期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讲坛正前方就是维克多·普洛斯伯·孔西德朗[14]。他刚给我们做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精彩演讲，我们都听得很认真。傻念头在这个不幸的国家只能换来纵容与怜悯。

在同一年—1849年6月，欧仁·鲁埃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法国的对外政策上，这次他的情绪极度悲观。他呼吁道：

我们的外交环境已被“二月革命”严重污染。目前，我们派往国外的代表，那些至少以共和国的名义驻外的代表使我们名誉扫地，使我们的国家蒙羞。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5]先生是不是该发配到奥吉亚斯的牛舍[16]去当值呢？那里有很多空缺。

国内政局依然动荡不安。国内没有良好的政治氛围，政治目光不够长远。尽管国内刚刚发生政变，但形势依然严峻，我们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驱散笼罩在我们头顶的密云。

尽管从以上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欧仁·鲁埃对时局敏锐、准确的判断，但信的内容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历史将告诉我们，在他掌权以后，他是否不忘初心，依然以这段时期所具有的冷静的洞察力与脚踏实地的智慧来实现他宏伟的政治蓝图。

尽管他早期崇尚自由主义，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而被迫戴上了奥林匹斯山诸神的面具[17]，但在欧仁·鲁埃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是一位生活在二月革命阴影中的普通百姓。从他的私生活中，这一点可见一斑。据说与一个人走得越近，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他的真性情。

拿破仑三世的这位生活简朴、墨守成规的权臣喜欢在公众场合大放厥词，在议会中唇枪舌剑。他喜欢花数小时潜心钻研政府理论后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的住所，然后静静地坐在壁炉旁，重新揣摩起昨天因打扰而被中断的扑克牌游戏来。看到他此时的样子，我们或许会认为他是一位在生意上混得风生水起、生活悠然自得的小商人。在打理完商店之后，他哼着小曲儿，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换上拖鞋，懒洋洋地躺在壁炉旁，盘算着当天可观的收入。我们不会从此时他的身上看出雄辩家的任何影子，可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凭着无人能及的口才深深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也无法从此时他的身上看出他就是那个曾经呼风唤雨、让几个国家分分合合的政治家，或者是那个曾与拿破仑三世针锋相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官员。欧仁·鲁埃好比传统故事中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夜幕降临时，锁好房门，以防小偷惦记，悄悄地待在家里，生怕弄出动静来，但当他的脑海中闪现出穷凶极恶的小偷的模样时、想到自己的家以及他赖以生存的家产时，他顿时觉得这一切即将被人从他手里夺走，这时他会莫名其妙地诅咒几句。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欧仁·鲁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小市民倾向。他努力追逐权力，最后如愿以偿，但他会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名利双收之后仍然不忘初心呢？他追逐权力是不是为了更大的抱负呢？欧仁·鲁埃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他虽然身居帝国高官之位，但不爱帝国，不以帝国为荣。他贪慕权力，同与他同朝为官、崇拜金钱或

权力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在他们眼中，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踩着别人的肩膀为自己谋利。

我前面已做过陈述，刚开始，欧仁·鲁埃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但无论他多么一本正经、多么善于推理，终究没能领悟到自由的真谛。自打青年时起，自由的呼声就开始召唤着他；但老成持重[18]的他指定不会坚持太久。随着自由呼声的高涨，他开始胆怯了。自由的终极目标使他沮丧万分。此时，他巴不得溜之大吉。看着张着巨大的双臂向他迎面扑来的自由，他感到阵阵窒息，要是他不趁机躲开，在自由的蹂躏下，他将万劫不复。他就像一位在陌生女人的怀抱中瑟瑟发抖的孩子；在她的嘴唇碰撞他的肌肤的那一刻，他全身紧绷，每根神经都在颤抖。渐渐地，他变得僵直了。每当想起她的吻，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现在，在实现了目标、心灵有了归宿之后，举手投足间他几乎都流露出对自由的仇恨；他每天都在贪慕权力的虚荣中度过，时光陪伴着他与生俱来的偏好，他谈笑风生，一路向前。他那能言善辩的力量就源于他对自由的仇恨以及琐碎的日常工作。

欧仁·鲁埃具有雄辩之才，这点毫无疑问。然而，在他刚步入仕途时，他的言谈并没有露出任何异常，也没有露出半点儿助他日后平步青云、令人不可思议的天赋。当他还在投石问路、无特定信仰之时，他开始大吹自由之风，但他的声音是那么羞涩，语调是那么冰冷、无力，结果没人愿意随声附和。直到他投身于宣扬专制主义的政治运动中时，他的雄辩艺术才崭露头角。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辞藻之能事被他玩于股掌之间。此时，他不得不面对才智非凡的朱尔·法夫尔[19]、朱尔·西蒙[20]、埃米勒·奥利维耶等人的挑战。对于这些人，他并不满足于以权力压制他们。他暗下决心，要与他们一争高低，直到完胜。从这点来看，他确实了不起，毕竟能抵挡住他们唇枪舌剑的人寥寥无几。

此时，他的处境就像一头独自面对一群猎犬围攻的野猪。他站稳脚跟，挺直肩膀，两眼迸射出仇恨的目光，一副若要我死、你必先亡的架势。他自岿然不动。臣民们与拿破仑三世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他就是这道屏障。他坚决地捍卫皇室的尊严。他站在那里，仿佛一块可以移动的巨石，死死地堵住了通向杜伊勒里宫的各个关口。当他举起巨大的拳头，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时，整个世界顿时明白第二帝国的又一个对手即将应声倒地，仿佛被力大无穷的泰坦[21]一击而倒一样。

他的雄辩之才与他的信仰、志向相辅相成。凭着暴躁的脾气与好辩的性情，他的每句话都能刺中敌人的要害，每句诅咒都能让那些自视为天下无敌的拿破仑三世的坚决反对者们哑口无言。他的雄辩之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善与恶的看法。它大力颂扬忠诚。它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空中楼阁林立的王国。在那里，人们只谈激情，不谈理性，感性主宰着理性。

开诚布公地讲，欧仁·鲁埃的言辞是有分量的，但措辞低俗不堪，不能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他一面高度赞扬赋予他无上荣耀的君主，一面甘愿充当国家的旗手，大力挥舞着那面赤色旗子。每当站在讲坛上发表长篇大论时，他总不忘了手握早已在修辞这块磨刀石上磨得锐不可当的那把双刃剑。当人们还笼罩在拿破仑三世传奇式的荣耀所带来的光环之中时，当人们还在担心失去波拿巴皇室庇护的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子时，毫无疑问，通过散布恐慌、利用人们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崇拜之情来赢得人们同情心的最佳时机出现了。不错，欧仁·鲁埃审时度势，能把人们熟烂于心的演讲艺术发挥到极致。从这点上讲，他确实了不起。但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既然他在演讲艺术上并无创新之处，我们就不便讨论它的内在价值了。



朱尔·西蒙



19世纪60年代的埃米勒·奥利维耶

阿道夫•比约去世之前后，欧仁·鲁埃在杜伊勒里宫的位置并不显眼。阿道夫•比约生前一直是欧仁·鲁埃仕途中的拦路虎。欧仁·鲁埃一直垂涎阿道夫•比约的那个位置，但阿道夫•比约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他。阿道夫•比约的离世使他如释重负，他的期盼终于如愿以偿。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脑海中翻滚着曾经穿梭于如今属于自己舞台的那些唯唯诺诺、微不足道的前辈的模样，不知不觉走到了拿破仑三世面前。拿破仑三世本能地用宽大、镇定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从此，他与拿破仑三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步步爬向权力的顶峰。他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曾受惠于欧仁妮皇后——她的专制主义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从那时起，他忠实地效忠欧仁妮皇后，为

她出谋划策。他不仅在政界独领风骚，还在杜伊勒里宫也建起自己的势力集团，排除异己，制造专制氛围，后来这个集团打上欧仁妮皇后的幌子，就更肆无忌惮了，他们把私利强加在帝国头上，使帝国一步步走向毁灭。

当不满足于现行国家体制、崇尚专制主义的拿破仑三世发现自己已沦为别人手中的工具时，他变得焦躁不安。他默许欧仁·鲁埃的所作所为，但实际上被欧仁·鲁埃利用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初衷仍然在他脑海中频频浮现，他不能自打耳光，毕竟兢兢业业的欧仁·鲁埃是按着12月2日制定的方针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不能武断地终止他的工作。于是，拿破仑三世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到了欧仁·鲁埃手中，静静地等待着品尝恶果的滋味。

从此，欧仁·鲁埃全权支配着政府，这让我们想起了驾驭双轮战车的车夫，他不顾前方路况平坦无阻还是沟壑丛生，只管甩起马鞭，狠狠地抽打已健步如飞的骏马，企图让它们跑得更快一些。

臣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暴动的火苗在他们中间蹿动。他们渴求的政治天堂无非就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但欧仁·鲁埃却拒绝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他总是一副傲慢无礼的态度，不屑理会他们来势汹汹却欲言又止的不满与谴责。

当帝国在罗马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接近尾声之际，欧仁·鲁埃与欧仁妮皇后险些使我们与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反目成仇。当他受托代表杜伊勒里宫向公众澄清为何结束人人弃之而后快的罗马行动之事宜时，他倒行逆施，赫然发出咆哮般的吼声：“绝不”，这一吼使拿破仑三世与整个国家从此再无宁日。

即便粗略地回顾一下欧仁·鲁埃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会不禁问他是否精通权术，是否能驾驭一国之政事。

尽管这么做会使我陷入与那些长期致力于研究欧仁·鲁埃的大部分

学者针锋相对的境地，但我还是会毫不迟疑地说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根本不具备治理一个国家所必备的智慧。从“政治家”一词所蕴涵的真正含义来讲，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时他透露出的那股傲气无人能出其右，但当他一夜“暴富”后，这股傲气却使他寝食难安，备受煎熬。在一路拼搏、奔向权力之巅的途中，他紧绷神经，时刻以军人般坚强的意志鞭策自己。他使劲地拓宽自己的肩膀，不给旁边的人立足之地。面对权力的诱惑，他开始变得有恃无恐，政治红利被他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就是不愿意让别人，不管是谁，分享哪怕是一个子儿。他就像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捞得一桶金的那些投机分子，视金如命，心中再无他人。他死死地看守着自己得之不易的财富，生怕溜掉一个子儿。

欧仁·鲁埃的政治抱负完全是为了私利，他贪恋权力的目的不是给他的国家带来荣耀，也不是为了让他的国家免遭苦难。就像某些自私自利的人，他们眼中的爱只不过是他们实现私欲的工具，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与他人分享快乐，而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抱负”投身政治的。

真正的政治家或伟大的统治者所追求的不全是这些。他们还懂得如何抚慰疲倦的灵魂，体恤生活的艰辛与苦楚，会像圣人那样耐心地为每位前来诉苦的人祈福，他的所思所想不会只局限在一己之利上。只要他这么做了，不管在宇宙的哪个角落，我们都会看到他伟大的身影。出生于大山怀抱中的欧仁·鲁埃，家乡山脉巍峨的轮廓像一面巨大的屏幕浮现在他眼前，于是他既无法看得更远，也无法看得更广，犹如一只井底之蛙只能以己之所见度外部世界之所大。

灾难的钟声唤醒了法国。时间的滚滚车轮把我们带到了令人难忘的1870年，时间似乎在那一刻被悲恸凝固了。这时，欧仁·鲁埃——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会详细论述——是参议院议长，他的权力比之前少了一些。但对他来说，重新掌权的大好时机无疑在1870年出现了。他以国家面临的威胁为突破口，成功地转移议员们的视线，并借机向

他们许诺他可以领导法国取得胜利。实际上，他指的胜利就是清除挡在他面前、阻止他独揽政府大权的自由主义者，进而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从此，欧仁·鲁埃实际上扮演着帝国掘墓人的角色。他亲手编织的葬礼面纱如今却被置于帝国额头的前朝小王冠与鲜花替代了。他就是一名罪犯，因为他蓄谋挑起战争，而他急于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要犯罪。

尽管欧仁·鲁埃似乎就是专制帝国的化身，但事实上还有其他人与拿破仑三世一起维护着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在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中，还有其他许多分管不同政务、势力不可小觑的大臣也被人们熟知。他们中有亨利·谢弗罗、让-巴普蒂斯特·迪韦吉耶、里谢、欧仁·若利布瓦、阿道夫·维特里[22]、奥斯曼、菲利克斯·埃斯基鲁·德·帕里厄[23]、佩尔西尼公爵、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24]、马涅、路易·比费、欧内斯特·德·鲁瓦耶[25]、欧内斯特·皮纳尔[26]、彼得里、阿尔弗雷德·勒鲁[27]、赛格里、德维耶纳、埃米勒·奥利维耶、拉盖罗尼埃子爵路易·艾蒂安·亚瑟·迪布勒伊[28]以及其他人。一天，欧仁·鲁埃心血来潮，饶有兴趣地分析起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来。给拿破仑三世的举荐名单里附着他对每位候选人的看法。在此，我只引用他对部分被举荐者的评语。

在亨利•谢弗罗身上，欧仁·鲁埃看到了“一名合格议员所必备的潜质”，但又批评他容易随波逐流，然后补充道：“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会使他误入歧途。”

谈到里谢先生时，欧仁·鲁埃批评道：“他是个不错的演说家，思维活跃，富有哲理，但不够果断，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他有胃病，由此可以判断他管不好自己的嘴。”他继续批评道：“提名佩尔西尼公爵或瓦莱夫斯基伯爵担任内务大臣只会颠覆人们对目前奉行的政策的看法。他们会给国家的内务带来麻烦，并使之变得一塌糊涂。路易•比费擅长纸上谈兵，但不懂运筹帷幄之术，所以不堪重用。”



阿道夫·维特里



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

提到皮纳尔时，欧仁·鲁埃的笔墨明显地重了起来。皮纳尔深得欧仁妮皇后的欢心，他担心思想受制于他的皇后会听信欧内斯特·皮纳尔的“谗言”。因此，妒忌心使他不得不看紧欧内斯特·皮纳尔。欧仁妮皇后有时十分反感他的严加“管教”。她已不止一次试图摆脱这种束缚，尽管对他依然恋恋不舍。

欧仁·鲁埃评价道：“欧内斯特·皮纳尔是一位治安法官，具有极好的口才。他在王宫与最高行政法院享有一定声誉，或许他最适合当选立法团议员。我向陛下举荐他为议员。然而，在他心智还没健全、成

熟之前，让他这样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在陌生的内政部、人事部或劳务部担任要职，或让他负责处理棘手的事务，对他似乎百害而无一利，会摧折他的锐气。因此，在皮纳尔的任用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极大的被动。然而，如果他能避免有风险的跳跃式的提升而一步一步往上走，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插手行政事务——因为他缺乏必要的驾驭能力，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在最高行政法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接着在政界平步青云。”

既然我们的注意力碰巧被欧内斯特·皮纳尔吸引住，那我不妨说说他的事。

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前内政大臣欧内斯特·皮纳尔读完我迫不得已得出的结论——我的前期作品《欧仁妮皇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中的逸事部分对后来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影响——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就陆续出版了几部回忆录。

然而，欧内斯特·皮纳尔先生却因其著作太倚重我的素材而心生怨气。他随即在回忆录第一部第一章（第一百四十二页）对我发起了如下攻击：

> 我听说，今天又有一些旧故事被改编了，自1870年以来，这些故事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我已见怪不怪了。凭作者的主观臆测杜撰的纯娱乐性的故事很受读者的青睐。因此，这对于想通过杜撰绯闻丑事大发横财的作者来说再理想不过了。被毫不知情的人妄加评议的《拿破仑三世的宫廷》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二帝国最有权威、最不明智的大臣之一——欧内斯特·皮纳尔一生忠心耿耿，忠诚到几近盲目，迂腐到不可救药。我们只能赞扬他坚定不移的忠诚，但即便是这种崇高的品质也不足以让他胜任修正我手

头关于第二帝国的文献的工作。



欧内斯特·皮纳尔

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欧内斯特·皮纳尔很少进宫，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内政事务上。他行事极谨慎，格外严肃，与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周围举止轻浮的人们相比，他显得格格不入。除了他一贯的恋旧与不善变通外，总的来讲，他的能力不逊色于别人，但谈及政治时，他连经常往来于杜伊勒里宫的那些社会名流——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的政治倾向都说不清楚。

多年来，我已习惯于在某伯爵夫妇家气氛融洽的客厅里与欧内斯特·皮纳尔碰面。他们家位于蒙塔波尔街，大门向所有好友敞开。但最近由于伯爵夫人的溘然离世，伯爵闭门谢客了。

因为知道我与拿破仑三世的掌玺大臣的关系密切，所以欧内斯特·皮纳尔知道我手头文献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他对我的攻击仅仅出

于对他前同事的感激，是对传统的辩护。

然而，他为什么要在抨击我的文字中提到钱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确实不合常规。作家与出版商讨价还价，并从他们那儿拿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已经不再是秘密。欧内斯特·皮纳尔是否会允许我向他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是他，他是否会拒绝出版商付给他的任何报酬呢？假如他自费出版作品，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出版商对他的作品没有信心呢？他的立场毫不含糊地证明了其说法的荒唐，我很想知道他会不会有更好的说法。

我还是接着讲欧仁·鲁埃的故事吧。

欧仁·鲁埃是舆论批评的焦点。

“埃米勒·奥利维耶充满激情，恪尽职守。”欧仁·鲁埃评价道，“他的性格具有多面性。贪念使他心胸狭窄、敌视别人，而超前的政治观点使他一无是处。在我看来，他比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更不待见我，他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不待见我的搭档。立法团前任议长在某刊物上撰文批评我后，他随后在议会上煽风点火、拉帮结派，鼓动众议员孤立我、攻击我。然而，我知道这些攻击只不过是稻草燃烧冒出的火苗[29]，一点儿小恩小惠就会把它浇灭。”

欧仁·鲁埃对拉盖罗尼埃子爵路易•艾蒂安•亚瑟•迪布勒伊的评价很高，“他的境遇多少有点儿尴尬。”随后，欧仁·鲁埃提议政府让他出任大使，补充道：“因为国家不能没有他的鼎力协助。”

以上这些就是欧仁·鲁埃对拿破仑三世身边政客们的评价。如果他们都能如愿以偿，那么欧仁·鲁埃就得整天提心吊胆。欧仁·鲁埃这么做的目的不是有意损他们，而是借着向拿破仑三世举荐他们的机会，让他们永远不能超越自己，将他们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事实上，他的小资产阶级市民倾向一直贯穿始终。他既谨小慎微，又过于贪恋权力，爱慕虚荣。

在“1870年战争爆发”一章中，我将进一步剖析欧仁·鲁埃在特殊时期扮演的“角色”。他是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初战失利后，就是他借拿破仑三世之权煽动同僚、召集会议、阻止拿破仑三世返回巴黎，迫使皇帝前往阵地，将色当的灾难强加给皇帝。在那里，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走向了终结；在那里，拿破仑三世遭遇了现代史上最无情的厄运的摧残。

旅行结束后，1870年9月4日他返回巴黎，并于当天坐上了上议院议长的席位。他不顾国家的安危，以他一贯秉承的盲目、自豪的姿态拒绝谈论动荡不安的政局，拒绝谈论变革，最后愤然宣布休会，任凭焦躁不安的大臣们苦苦哀求。他以讽刺意味很浓的语调[30]说道：“先生们，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议。”

说完这些透着霸气、值得载入史册的豪言壮语后，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二天他一定会从容地推开紧闭的议会厅大门，出现在上议院。然而，他等不及第二天的到来，9月4日那天傍晚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群情激昂的人们——那些年受尽他侮辱的人——四处寻找他，却不得而终。

然而，我们非要死死盯着人性的弱点不放吗？难道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如私欲、贪婪、愚蠢等，不是所有帝国都赖以生存的根基吗？难道它们不是使璀璨夺目的皇冠失去光泽的“罪魁祸首”吗？是狮子就不愿一直趴在窝里，是雄鹰就不想一直蹲在巢里，更不愿在粪便堆积如山的地方哪怕小憩一会儿。即便在王宫里，犯罪、龌龊之事也横行无阻。因此，我们不应傻乎乎地为此而感到惊讶或愤愤不平。

第二帝国在1870年战争隆隆的炮火声中倒塌后，欧仁·鲁埃在国民议会重组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此时，他是以议员的身份赴凡尔赛走马上任的。我已在前文提到过那次让人难以忘记的会议，他以惊人的勇气舌战同僚，坚决捍卫他曾效忠过的第二帝国。然而，后来政治舞台上没有了他的身影，在他的余生，他再也没想过重操旧业。尽

管这样，他还是成功地让人们在另一个领域——经济领域——听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大名时，人们仍然心有余悸，但他在经济领域的造诣使他在议会中赢得了应有的尊重，就连从前最恨他的敌人也赞不绝口。

其间，他是拿破仑三世流亡政府的首席顾问。拿破仑三世驾崩后，他成了欧仁妮皇后的代言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帝国复辟。他为此殚心竭虑，不放过有可能使帝国复辟的任何机会。他几乎绝望地恳求欧仁妮皇后撤销皇太子参加祖鲁战争的决议。然而，命运之神替他掷出了骰子，欧仁·鲁埃叱咤政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秉着一贯独特、客观的写作风格，我对欧仁·鲁埃的评价是中肯的。然而，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尽管欧仁·鲁埃一生经手过无数钱财，但他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当他的仕途刚起步时，他一贫如洗，位极人臣后他却没有敛一点儿私财。随着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他只背着两只空空如也的口袋。刻意去颂扬一个人的清廉显得有点儿奇怪。或许我们也没有必要连他的衣服夹层也不放过。除非我们心血来潮，侥幸地认为在他的衣服夹层里可能藏有不义之财。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他家里翻箱倒柜，去查询保险柜里仅存的几块钱的来路。然而，有时受舆论“绑架”，有时资金的流动引发骚乱，人们难免会产生好奇心，但一切水落石出时，人们会加倍敬重他的廉洁。

在奢侈与浮华风靡的第二帝国人人崇拜金钱、政府官员动辄上百万收入的日子里，欧仁·鲁埃却能洁身自好，能以资产阶级小市民特有的本分立世。如果他在仕途上能审时度势，如果他能对广大百姓友好一些，尽管深受欧仁妮皇后思想毒害的他在面对威胁第二帝国安危的种种灾难面前不得不表现得盲目自信，不得不以他惯有的骄傲、自大的口气抛出豪言壮语，他依然是一位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他坦然地面对金钱的诱惑，使自己的人格不沾一丝铜臭味。

面对物欲横流的诱惑，他依然能出淤泥而不染。作为一个自我要

求极其严格的人，杜伊勒里宫给他的通行证只不过给他提供了面见拿破仑三世、商榷国是的便利。在他眼中，通行证别无他用，或许他根本就没领会到它的用处。他冷酷无情，面对女色坐怀不乱，难怪杜伊勒里宫中弥漫的轻浮、淫乱之风对他毫无吸引力。荒淫无度在清教徒眼中不就是罪过的代名词吗？

有些人虽死犹生。人们频繁地前往墓地拜谒他们，希望得到某种灵感。欧仁·鲁埃不在他们之列。他就像梦境中不停闪现的身影，挺拔伟岸，光芒万丈，在第二帝国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大背景中，它格外显眼。然而，幻影终归是幻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光环会一点点褪却。

前文我已提过欧仁·鲁埃一生生活低调、不张扬，即便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是一样。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就像一位碰巧被幸运之神眷顾、意外获得一大笔财富而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无名小辈，赶紧小心翼翼地把它锁起来藏好，从没想过要让这笔钱运转起来或把它挥霍掉。尽管人们讥讽欧仁·鲁埃徒劳的激情，蔑视他愚忠愚孝的党派倾向，更不理解他对权位几近疯狂的贪恋，但就像对待其他伟人一样，历史不会磨灭他曾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

---

[1]吕奥尔茨是某著名首饰的发明者。——原注

[2]下方贴有象征伯爵身份的小冠冕。——原注

[3]奥林匹斯神山是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聚集地。

[4]里永是法国中部多姆山省的一个小城。

[5]克莱蒙费朗是法国中南部城市，原奥弗涅大区的首府和多姆山省会。

[6]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7]路易•尤查特•德•拉莫里西埃（Louis Juchault de Lamoricière，1806—1865），法国将军。

[8]指塞纳河。

[9]查理·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1798—1849），撒丁-皮埃蒙特王

国国王。

[10]埃米勒·德·吉拉尔丹（Émile de Girardin，1802—1881），法国记者、出版商、政治家、现代新闻学创始人。

[11]即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使他成了一名“公民”，因此被称为“公民”蒲鲁东。

[12]指1848年2月在法国爆发的旨在推翻“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

[13]拉蒙塔涅是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上索恩省的一个市。此处指来自该地的议员。

[14]维克多•普洛斯伯•孔西德朗（Victor Prosper Considerant，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信徒。

[15]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

[16]即奥吉亚斯国王的牛舍。相传奥吉亚斯国王有一个极大的牛圈，里面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来从未清扫，粪秽堆积如山，十分肮脏。

[17]古希腊人认为奥林匹斯山是世界的中心，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希腊人逐渐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不再认为奥林匹斯山是地理上的奥林匹斯山，而是心中的“神山”。这里暗指欧仁·鲁埃虽然终其一生崇尚自由主义，但却惧怕极端革命主义。

[18]原文为born old，意为出生时就很成熟，暗指欧仁·鲁埃意识到终极的自由与现实利益互相冲突，极力想摆脱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束缚。

[19]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1809—1880），法国政治家，著名的“五人团”成员之一，坚决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20]朱尔·西蒙（Jules Simon，1814—1896），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他成为机会主义共和派领袖之一。

[21]泰坦是希腊神话中统治世界的古老的神族。

[22]阿道夫·维特里（Adolphe Vuitry，1813—1885），法国律师、经济学家、政治家。1863到1864年任法兰西银行行长，1864到1869年任第二帝国最高行政法院院长。

[23]菲利克斯·埃斯基鲁·德·帕里厄（Félix Esquirou de Parieu，1815—

1893），法国著名政治家。

[24]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Alexandre Florian Joseph，1810—1868），波兰籍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25]欧内斯特·德·鲁瓦耶（Ernest de Royer，1808—1877），法国律师、治安法官、政治家。曾两任司法部主官（1851，1857—1859）。

[26]欧内斯特·皮纳尔（Ernest Pinard，1822—1909），法国检察官。因起诉尼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夏尔·博德莱尔的《恶之花》而声名鹊起。

[27]阿尔弗雷德·勒鲁（Alfred Le Roux，1815—1880），法国诗人、银行家、政治家。1869年任农商部大臣。

[28]路易·艾蒂安·亚瑟·迪布勒伊（Louis Étienne Arthur Dubreuil，1816—1875），法国政治家，出身于显赫的普瓦图家族。

[29]暗指不会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

[30]这种语调显然出卖了他令人震惊的无知。

第7章

埃米勒·奥利维耶与自由主义在第二帝国的泛滥

一提起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大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即使在今天，他的名字仍然会激起人们对他的怨恨与诅咒。那些惯以众所周知的一面来评判一个人的人往往把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大名与1870年的灾难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他就是1870年各种恐慌的罪魁祸首。无知与愚蠢的偏见使他们把自己的绝望、仇恨都归咎到他头上。然而，要把他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人们需要勇气。不妨这么说吧，这位不受人待见、遭人误解，或者不幸沦为政治世界中习以为常的虚伪与谎言[1]的受害者，不应被排斥、诅咒，也不应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对象。他不应受到各种无端的指责。他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议员之一。

撇开人们固有的偏见重现第二帝国时期的真人真事需要莫大的勇气。大家对此应该能产生共鸣。我涉足的课题越是充满争议，我越有信心刨根问底、越有信心把它的真实面目展现给大家。在再现埃米勒·

奥利维耶一事上，我不会摒弃一贯的求实精神。我既不害怕揭人之短，也不会听信言过其实的赞誉，只求公允地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埃米勒·奥利维耶。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抚慰我的自尊心，而且要赢得人们对我的信任。我再也不希望人们因为我“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而白眼相向了。

大肆宣扬带有个人色彩的自由主义思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埃米勒·奥利维耶一直是人们心中积极倡导绝对自由主义的权威人士。至于他为何与第二帝国死磕，这点确实让人费解。当他的同僚还在纠缠前朝政纲、共和理念之时，埃米勒·奥利维耶却特立独行，早已认定他此刻向杜伊勒里宫“开战”绝非儿戏，注定遥遥无期，除非帝国政府与时俱进，放弃目前的“政体”，这样他就会宣布放弃敌对。如果将来有一天埃米勒·奥利维耶心满意足地大谈拿破仑三世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人们则会指责他改旗易帜，甘愿放弃之前一直倡导的绝对自由主义理念。然而，这种指责有失公允，因为那时他没有放弃一贯秉承的理念，依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只是时过境迁，他的思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罢了。

当时他是著名的“五人团”团长，与朱尔·法夫尔政见相投，所以他们的关系很亲密。雅克-路易·埃农、阿尔弗雷德·达里蒙[2]与拿破仑三世关系甚密，而才高智深、不受世俗偏见束缚的欧内斯特·皮纳尔却不愿为拿破仑三世效力。1870年战争爆发之际，他以参议院提名议员的身份被举荐给拿破仑三世。

然而，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这些人[3]中只有朱尔·法夫尔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从没想过与拿破仑三世和解。虽然时过境迁，但他依然笃信1851年12月2日政变[4]以前的共和理念。不管在言辞中，还是在公开活动中，他毅然决然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



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拿破仑三世

朱尔·法夫尔在第二帝国的议会中举足轻重，是反对第二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尽管本章是专门讲述埃米勒·奥利维耶[5]的，但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讲讲朱尔·法夫尔的故事。

朱尔·法夫尔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演说家，他那富有魅力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我耳际。每当演讲时，他总是激情饱满，声音抑扬顿挫。不管是哪种讲演，洋溢着热情的，还是迸发出怒火的，他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当议员们在议会中战战兢兢、人民对政事充耳不闻时，他凭

着三寸不烂之舌给他们送去了勇气，点燃了他们的希望，让他们拥有了奋斗的目标。人们由衷地放大这位朋友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就像孩子们听到传奇英雄人物的冒险故事后脑海中浮现出他们伟岸的身影一样。

第二帝国时期，波旁宫另设“朝廷”、召集会议、不容许他党参加的举措实属罕见。但每逢会议召开之际，朱尔·法夫尔总是兴致盎然、充满好奇。

这位谙熟雄辩之术、深知如何控制听众情感的人却天生讨厌置身于喧嚣的人群中。在临近讲演的日子里，他每天匆忙赶往立法团，然后关上休息室的门，努力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有时他伸开四肢，斜躺在安乐椅上，有时背靠扶手椅，腿上放着一本大大的文件夹，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演讲。他脸上时不时流露出的痛苦表情扭曲了他的嘴——一张恶魔之嘴，愤怒的舌头愿在其中大显身手，甜蜜的亲吻也不愿早早地离开。那张伶牙俐齿的嘴，既可以发出天摇地动的怒吼声，也可以说出沁人心脾的良言益语。他用那犹如女人般的纤纤玉指轻轻捋着花白的长胡子。他偶尔猛地甩一下头，将浓密的长发甩向脑后，然后一动不动。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此起彼伏，迎着灿烂的梦想，看着人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大步迈向平坦的仕途。



第二帝国时期的波旁宫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景

然后，他走出休息室，前往议会厅去看看人员是否到齐。当看到整个议会大厅座无虚席时，他喜不自胜。在座的人们有的向他投以欣赏的目光，有的则恨得咬牙切齿。当议长宣布接下来由朱尔·法夫尔做演讲时，翘首跂踵的人们再也等不及了。他迈着轻松的步伐，飘飘然朝讲坛走去时，大使们、政客们、世袭贵族们、拉选票者们、嘈杂的金融家们、时尚界的名媛们、政界的女性领袖们、来自下层社会的狂热者们、宫廷中的宠臣们频频向他颔首致敬，眼中流露着钦佩的目光，笑容满面地欢迎他的到来。在他看来，人们的笑脸相迎一点儿都不多余，他由衷地感到高兴。粉妆玉琢的女士们身上散发的香水味弥漫着整个大厅。她们深情款款，呼吸急促，盼着能一睹他的风采。这一切让他如痴如醉。他尽情地呼吸着芬芳的空气。当看到人们期许的微笑时，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仿佛沉浸在女人的温柔乡里。此刻，他飘飘欲仙了，高兴得无法自已了，脚步不由自主地乱了起来。再次回到休息室时，他已精疲力竭。伴随着一声长叹，他瘫坐在沙发上。

讲坛上的朱尔·法夫尔英姿飒爽。魁梧的身躯在议会大厅中格外显眼；宽大的肩膀似乎占满了，不，挤出了，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讲坛边缘，不是他的肩膀宽，而是讲坛太窄。他那柔滑、白皙的双手紧紧抓着讲坛的两边，显得极不自在。在开讲之前，他习惯性地扫视一下大厅，只见黑压压一片，就连走廊也挤满了人。他打起精神，准备演讲了。刚开始时，他的语调显得太过单调，但越往后头，他越激情高涨。

演讲接近尾声时，朱尔·法夫尔刻意放慢语速，因为不想放过每个让自己感兴趣的细节。讲到兴奋时，难以抑制的激情全部写在脸上。夸张、独特的表情使他的嘴也变了形。当雷鸣般的掌声发出时，他整个人飘了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急促，也越来越刻薄。他一边怒吼着，一边诅咒着专制统治，一边为人们精神上遭受的折磨鸣不平。他指出：“帝国终究会因道德的沦丧而不复存在。”当他带着蔑视的语

调，顺手将仇恨的短剑刺向饱受帝国压榨的人们时，他的嘴角泛起了一丝得意的微笑；可一转眼，愤怒的火苗蹿上了他的眉头，只听见他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偌大的讲坛在他来回走动的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无意识地将胳膊在空中挥舞着，仿佛在和敌人厮打。他的鼻孔张着，眼睛诡秘地眨着，上下起伏的胸脯宛若铁匠铺里随着风箱的拉动从锻铁炉里喷出的忽大忽小的火苗。奇怪、刺耳的喉音时不时地打断他的讲话，就像频繁的打嗝声使人无法流畅地说话一样。他后仰着身子，使劲将胳膊伸向前方，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没人比他更懂得如何恶毒地去诅咒一个人了。他那黝黑的脸庞会突然涨得发紫，血液已蹿升至脖子根，杂乱的头发披散在额头上，嘴角不停地抽动着。

最令人值得回味的要数朱尔·法夫尔的结束语了。演讲接近尾声时，他情绪激昂。此时，他已不再受愤怒和仇恨的支配。他不再夸夸其谈，而是简明扼要地总结他的话题。当谈到自由时，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柔和。他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他轻轻抚摸着“自由”，如同一个男人抚摸心爱的女人一般，极尽打扮之能事力求使她完美。他小心翼翼地拿着画笔，尽力使自己笔下的自由体现得尽善尽美。他深爱着自由，正如蛇爱着碗中的牛奶一样。大厅里的人们听得目瞪口呆。突然，他提高嗓门，连他自己也为之一抖，整个人随之抽搐起来。最后，在一首充满绝望与悲痛的预言诗中，他的演讲缓缓落下帷幕。他已忘却此时自己身处议会大厅，也全然不知现场还有很多同事。然而，在场的人们依然能够听得到他的喃喃自语。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终于安静下来时，还不忘在讲坛上多待一会儿，好像双脚被粘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一样，好像还没有从自我陶醉的演讲中回过神来一样。

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主导的“沙龙”寥寥无几。共和派人士没有自己固定的集会场所。有时，他们选择在冒着被查封的风险、赫然与杜伊勒里宫唱反调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社的办公室里碰头。有时，他们在同党的家里商量对策。朱尔·法夫尔家就是其中之一。在那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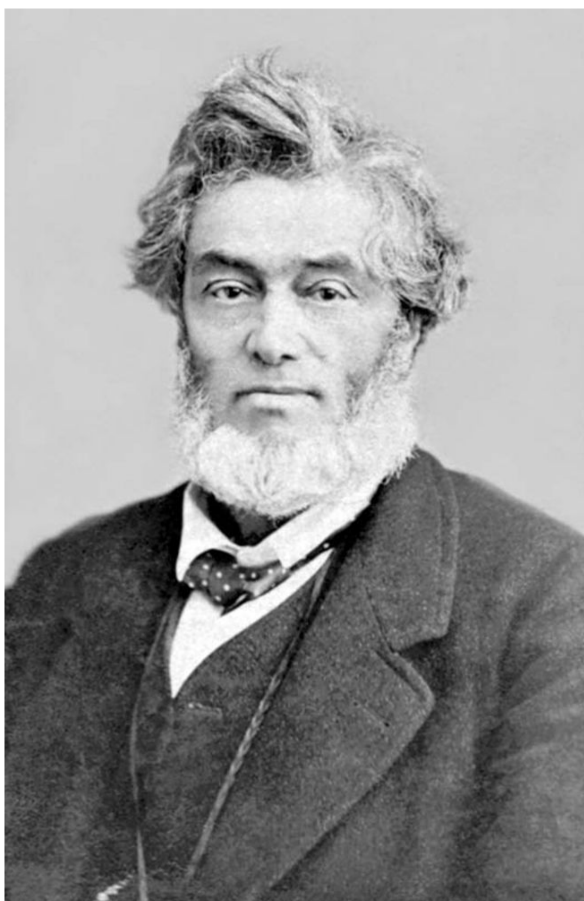
与朋友们共同探讨时局，一起决定他们在公开辩论中的指导方针。

朱尔·法夫尔在自由党中的威望很高。因此，一些小党派的头目、数量相当可观的议员都甘愿受他驱使。发动论战之前，他们自发地前往他的家中，领受他“开战”的命令。这种类型的聚会在帝国摇摇欲坠之际尤其频繁。在他的谆谆教诲下，他们个个摩拳擦掌，信心百倍，脸上流露着必胜的神情，仿佛古时候脸涂圣油、雄赳赳气昂昂奔赴竞技场的运动健将们。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幼者，他们都愿向他求教，聆听他的圣言——年幼者期望能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新的灵感，年长者憧憬着能从他的信仰中找到共鸣。然而，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的失落感也与日俱增，他们向往中的神话被慢慢打破。

当第二帝国从专制统治阶段过渡到开明统治阶段、埃米勒·奥利维耶欣然牵头倡导新运动时，朱尔·法夫尔既诧异又担心。诧异是因为他的对手在权力追逐赛中已经把他甩在后面，担心是因为目前风谲云诡的局势让他摸不着头脑。

当流亡他国的政治犯[6]的儿子埃米勒·奥利维耶摇身一变成了帝国的拥护者时，共和派内部炸开了锅。对他们来说，这犹如晴天霹雳。他英姿勃勃，嘴大唇厚，两只眼睛隐藏在巨大的镜片后面；他外表冷酷、无情，但内心急躁、多情。站在讲坛上的他与朱尔·法夫尔如出一辙。朱尔·法夫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埃米勒·奥利维耶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的劲敌。

朱尔·法夫尔攀登权力高峰的途中还有一大障碍。在政治世界的地平线上，或更确切地讲，在共和主义世界的地平线上，一个危险的人物正徐徐露出身影。他不苟言笑，说话铿锵有力，已经引起公众的关注。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激情。这个人就是莱昂·甘必大。尽管朱尔·法夫尔表面上热情欢迎对方的“加盟”，但莱昂·甘必大与日俱增的名气使他黯然失色，他的内心充满恐惧。



才智非凡的朱尔·法夫尔

莱昂·甘必大性格独特，是人们眼中的“另类”[7]。他生于法国南部。他曾迷茫过、徘徊过，因为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所以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一边耐心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莱昂·甘必大出身律师，凭着良好的口碑深得拉丁区[8]人民的拥戴。一次，他在法庭上控诉第二帝国[9]，赢得了拉丁区人民的爱戴，随之声名鹊起。一天傍晚，竞选初试成功的莱昂·甘必大第一次向人们完整地展现了他志在引领社会改革的宏伟蓝图。南方人侃侃而谈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公开场合他每次获得的成功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此。这次出庭辩护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政治潜力。随后他被提名参加议会选

举，并获得了成功。尽管他的声音刺耳难听、身体弱不禁风，但他还是在政坛上迅速谋得了一席之地。

他在公开场合的行为举止令人印象深刻。当他走在光亮如镜的地板上时，样子滑稽可笑。他叉开双腿，轻轻地往前挪着脚步，生怕一不小心滑倒。当他碰巧看到朋友或熟人穿屋而过时，他总是不忘喊一声“你”[10]！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手势了，每当和别人聊天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双手拦腰抓住对方，粗鲁地扯来扯去。通常情况下，他喜欢摆弄对方的外衣里衬，并不自觉地在对方的身上拍拍打打。每当与政敌争锋相对时，他总能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南方人夸夸其谈的性格特点再次在他身上彰显，在他不停的狂轰滥炸下，对手一步步落入他精心编织的罗网，最后心甘情愿地冲他露出笑脸，此前的粗鲁、无礼顿时被他们抛诸脑后，心中只有无尽的自责与相见恨晚的感慨。



莱昂·甘必大的漫画形象

莱昂·甘必大博学多识，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著名的“不可调和”一词就是他持坚决反对立场的代名词。从此，“不可调和”一词火速传遍法国。该词给他带来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无数次雄辩有力的演讲的效果。

1869年，莱昂·甘必大把波西米亚之风[11]带进了议会。他独辟蹊径，赋予波西米亚主义新的含义——愤世嫉俗，心无念想，郁郁寡欢。莱昂·甘必大把新波西米亚主义在演讲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当这股强劲的波西米亚主义之风吹向议员们时，议员们个个后背发凉，双腿

瑟瑟发抖，瞬间被吹得衣不蔽体。在座的人们无不目瞪口呆，而莱昂·甘必大面无惧色，自我陶醉于愉悦之中，仿佛大街上过往的行人被某个角落传来的宛转悠扬的曲调深深吸引住一般。突然之间，优美的歌声戛然而止，紧随而来的是一番铺天盖地的狂轰滥炸，宛若一群倾巢而出的黄蜂发出的怒吼声一般。

面对莱昂·甘必大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朱尔·法夫尔忧心忡忡。朱尔·法夫尔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紧紧盯着莱昂·甘必大，因为这是一头令人心惊胆战的雄狮。朱尔·法夫尔曾毫不避讳地说，只有把莱昂·甘必大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心时，才可以松一口气；只要莱昂·甘必大一日不受他的控制，他就寝食难安。

后来，朱尔·法夫尔慢慢接受了莱昂·甘必大，发现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对此，莱昂·甘必大并不知情。然而，朱尔·法夫尔给莱昂·甘必大悄悄地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既然莱昂·甘必大气宇轩昂、超凡脱俗，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改革者”，朱尔·法夫尔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麻痹他，让他一直处在自己的可视范围之内，以此来确保自己的地位、权力不受这个市井草民的威胁。莱昂·甘必大以及他眼中的波西米亚就是巴黎人眼中的跳梁小丑。巴黎人愤世嫉俗，无所畏惧。披着传统外衣的莱昂·甘必大将是一位劲敌。朱尔·法夫尔已经领教过和莱昂·甘必大一样难缠的劲敌，那就是埃米勒·奥利维耶。

然而，不负朱尔·法夫尔所望的莱昂·甘必大让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莱昂·甘必大成功地爬上了令他坐卧不安的职位。莱昂·甘必大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了议员，甚至成了法国人眼中的明星。在莱昂·甘必大的咆哮声中，继第二帝国覆亡后匆忙组建的、令人作呕的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12]元帅的政府[13]轰然倒塌。社会各界、外交界向他敞开了大门。他不再是过去人们心目中的庞然大物，也不再是以前那位初来巴黎、偏执一词、我行我素的菜鸟政客。他突然变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之前如狮子鬃毛般披散在两肩的长发变得一丝不乱，整齐

地盘在头上。当他步入弥散着友好气息、充满珠光宝气的客厅时，他不再对别人以“你”相称。他不再担心光滑的地板会让他摔跤。然而，有一点是没变的，他依旧精神饱满、喜怒无常。他一改以往拉拉扯扯的恶习。偶尔情不能已时，老毛病又会发作，他会紧紧抓住对方的衣领，感觉要把对方生吞活剥似的。即便这样，他还是值得称赞，他有过人之处。他的暴脾气虽然导致了一些错误，但人们还是包容了他。当上司们以长者的姿态笑嘻嘻地开他犯下的错误的玩笑时，他一言不发，毕恭毕敬地听着对方的“数落”，就连目光最敏锐的旁观者也看不穿他此刻的真实想法。



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元帅

莱昂·甘必大是个聪明人，是真正的能臣干将。他历经千难万阻，从社会的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攀登到权力的巅峰，成为一颗众人仰望的明星。诚然，他的一生绝非平淡无奇。他的人生之路沟壑丛生，充满坎坷。他玩弄过掩人耳目的庸俗伎俩，品尝过胆怯的滋味，重拾过大步向前的勇气。总之，他的一生几乎是个谜，让人捉摸不透。无论过去如何，不管将来怎样，他的人生历程值得钦佩、羡慕。这位民主斗士，这位来自法国某个鲜为人知的角落的产物却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嗅觉、政治眼光与判断力。当他操着指挥官的腔调、红着脖子，以悍然不动的威严发出炮火般的怒吼时，整个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权贵都向他肃然起敬。然而，除了幸得威尔士亲王[14]的赞赏外，他很少得到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的赞赏，但却令他们印象深刻。他桀骜不逊，善于察言观色，往往让那些心生疑窦的人措手不及。成功地说服劲敌投奔自己麾下时，他会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战果，大夸特夸自己的魅力。

莱昂·甘必大是爱国主义人士。在祖国母亲饱受折磨的日子里，他不离不弃地陪着她，一边给她宽心，一边告诉她苦难终会过去。他的建议或许有不妥之处，但足见他的真心、坚决的勇气以及无比高尚的信心。他慷慨大义，心地善良。他是性情中人，朋友爱慕他，难免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但他最看重的却是真情实感，这比虚无的、排山倒海般的喝彩声更值得拥有。

朱尔·法夫尔是个吝啬鬼，从没想过要与别人分享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乐于独享自己苦苦弄到手的政治权力。他警觉地看守着自己的政治财富，不容许任何人越雷池一步，否则他会以命相拼。他曾被人们扒光衣服，无情地扔在一座伟大城市的大街上，路人皆对他视而不见[15]。在工作中，他经常遭到冷落。那些财大气粗、一手遮天、横在力图变革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改良派面前的资本家、自利主义者组成的伟大阶级无情地鞭笞他、数落他。回想起这段时期的过往，他不禁潸然泪下，心里阵阵酸楚。谁让他生不逢时呢？在一个追逐自我

享受、奢靡成风的时代，谦逊又有何用呢？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只有埋头苦干时，他才能让自己炽热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他生活中的乐趣就体现在工作上。和别人一样，他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几部分，其中最神圣的一部分就是学习。在剩余的时间里，他要么闭目养神，要么享受天伦之乐，要么干点儿别的。他从不会干一件无用之事。他刻意追求清心寡欲式的生活，一心只想着学习。只要手头有未解之题，他从不会轻易合上书本，除非难题已被他破解。这种自虐式的生活扭曲了他的性格。现在，当他手握大权、人们对他投以妒忌的目光时，想想当初自己经历的孤独、精神上遭受的摧残以及苦不堪言的拼搏历程，他怒火中烧。他的过去白璧无瑕，他惊人的毅力令人窒息，仿佛喉咙被刺卡住一样，既让人生气，又让人无可奈何。然而，清教徒式的生活态度正是他无穷力量的源泉。从他步入仕途的第一天起，他就尘封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他绝不允许自己的肉体得到丝毫放纵。没错，他曾有过阵阵不安。面对美色的诱惑，他春心荡漾，心神不宁。然而，不服输的使命感、学业上的压力、尚未实现的雄心壮志使他很快打消了邪恶的念头。他迈开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门前，他推开门，一屁股坐在堆满文件、书籍的办公桌前。青年时期的清贫生活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面无血色，表情呆滞，这让人联想到苦行修炼的僧人或食不果腹、受人虐待的人们的样子。每当看到他挺着胸膛，顶着一头凌乱的乌发，板着脸走过街头时，人们就会想起野兽寻找猎物时的情景。



威尔士亲王

辉煌的一刻终于等到了。突然，他健步如飞，风驰电掣般穿过拥挤的人群，赫然矗立于天地之间。他的吼声惊醒了沉睡中的第二帝国，余音在天地间回荡，如同夜间从森林中传来的饥肠辘辘的狼群的嚎叫声，让人毛骨悚然。他紧紧握着拳头，左右挥舞着胳膊，仿佛穿行于一群醉得东倒西歪的酒鬼中间，做好了随时杀出一条血路的准备。他深知此行荆棘丛生，斗争才刚刚开始。但为了心中的梦想，他甘愿使出浑身解数，负重前行。第二帝国空前的盛况让人们再次体会到了传奇的力量。波拿巴家族迎接日出的枪声每天准时送来新的奇

迹。人们高声欢呼“拿破仑三世万岁”，打着小算盘的女人们温顺地恭候着拿破仑三世的宠幸。奢华的长鞭无情地抽打着每位改良主义者、每位有思想的仁人志士。奢靡、享乐之风迅速席卷全国，那些曾经过怕了苦日子的土包子、饱受情欲摧残的纨绔子弟，在杜伊勒里宫响亮的起床号角的催促下猛地睁开双眼，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渴望已久的自由天堂。生活一片大好，但人性却被一点点扭曲，它大张着嘴巴，酒气熏天，满口胡言乱语。美酒共鲜血一色，肮脏的躯体随着虚幻的乐章翩翩起舞，凶相毕露的死亡之神极不耐烦地等待着最后一支舞曲落幕。思想早已没了灵魂。它静静地躺在荒芜的墓地里，周围的惨叫声、喊冤声此起彼伏。深受世俗享乐主义思想毒害的血液已将法兰西民族的灵魂赶出了躯体。荒淫无度的邪恶之神环视着一切，仿佛风流成性的某位大臣急切地扫视着每个从他面前经过的年轻侍女一般。欢笑声成了每天的主旋律。为了让笑的旋律经久不衰，人们不惜付出一切，若有谁胆敢哭丧着脸，那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朱尔·法夫尔盘算着从这个疯疯癫癫的世界里捞取到的一切好处。当人们正在兴头上时，你需要足够的勇气当头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他鼓足勇气，面无惧色地缓缓站起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转身大踏步向墓地走去，在衣衫褴褛、奄奄一息的死人堆里找到了“思想”“自由”两人的尸体。他俯身走进墓穴，横七竖八的尸体在腐尸甲虫的撕咬下蠕动着。他双手抬起“思想”“自由”的尸骨，狠狠地把它们甩在拿破仑三世宝座前的台阶上。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法国。混合着女人诱人的香水味的腐臭终于让这支眩晕的世纪舞曲停歇了片刻。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受到惊吓的人们战战兢兢地相互打听着这位深夜前往墓地、与死尸共舞的哈姆雷特[16]的接班人到底是何许人也。朱尔·法夫尔的呼声把人们带到了美好的过去，躁动就像一头渴望自由、在笼子里走来走去的野兽一样开始在全国蔓延。

罗马帝国衰落之际，当显贵们的欢笑声被改革家的咆哮声打断时，帝国上下忙成一片，人们分头在找那个扰乱秩序的人，被找到

后，等待他的便是圆形竞技场。睡意正酣的罗马皇帝不想就此放弃骄奢淫逸的美好生活。“幽灵”朱尔·法夫尔的出现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他们惊慌失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道灵光划过他们的脑际，他们猛地想起了古时的罗马皇帝，办法有了！于是，他们纷纷指责、非难这位革命分子，并想尽一切办法整治他。尽管此时法国没有现成的竞技场来让朱尔·法夫尔碰碰运气，但至少还有划桨帆船[17]，或许还可以把他放逐到海外殖民地。如此种种的馊主意层出不穷。只有拿破仑三世一人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冷若冰霜地听着一轮轮的谗言佞语，在朱尔·法夫尔逐步巩固权力、实现政治抱负的道路上丝毫没有为难他。朱尔·法夫尔虽然每天都要面对报纸上铺天盖地的侮辱、好事者的诅咒，但他从未动摇过，也没打算就此停步。他无视拿破仑三世的宽容、忍让，或假装不理不睬，头也不回地朝着自己的目标狂奔而去。他的声音响彻司法大厦。工作上，他一丝不苟，亲自主持每桩扣人心弦的政治诉讼案。他因此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声望也与日俱增。他在议会中的座次从之前的普通议员席一下子跳到了共和派议员的首席。他的成功是巨大的。仕途上的第一站已顺利到达。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但一个遥远的声音在不停地召唤他，又该出发了。他精神抖擞，满怀信心，向横在前进道路上的多数派议员公然发起进攻。

朱尔·法夫尔的崛起、成功并没能终止那一代人的荒唐行为。他在仕途上的巨大成功让人们感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他们终于意识到一股新的可怕的力量已耸立在他们面前；然而，仅凭一人之力终究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人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疯狂地追求享乐，沉迷美色，大把大把地挥霍着手中的金钱。当朱尔·法夫尔——这位极富雄辩之才的演说家站在讲坛上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响亮、浑厚，如同舞厅中高亢的管弦乐声，但他们故意提高嗓门，发出冷冷的嘲笑声，企图盖过他的声音。

然而，朱尔·法夫尔依旧稳扎稳打地朝自己的目标一步步前进，对

人们排山倒海般的赞美声不屑一顾。他对自己激起的仇恨数之又数，并精心地将它们梳理、归类。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安抚人们的愤怒、根除他们的伤痛，而是为了更好地衡量自己的处境，随时做好，如果确有必要，与他们厮杀的准备。

在朱尔·法夫尔看来，守节操、重情义的优良品质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病态时代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招致别人的嘲笑和讽刺。人心不足蛇吞象，即使你把心肝掏给他，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分享给他，他也不会在你奄奄一息的时候摸摸你冰冷而又僵直的手。这样的付出在朱尔·法夫尔眼中没有一点儿必要。朱尔·法夫尔是怀疑论者，他的逻辑推理充满悲观主义。在政治上，只要能让他不选队，他什么好处都可以不要，但他的这种做法或许有不妥之处。不管他是否愿意，现实处境需要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选择了前者，决定投靠改良派，因为他具有惊人的自控力。他提倡自由，但将信将疑，因为他发现了自由主义的死角，这恰好给他指明了“发财致富”的便捷通道。如果能摆脱惯以奉行的清教徒主义教条的束缚，他或许可以让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放松放松，或许可以用他那柔软而又纤细的双手摇摇弄臣帽子上的铃铛。从未体验过真实生活的朱尔·法夫尔依旧厌烦一切尘世之风。他生性率直，“强权胜于正义”是他的人生格言，是他的立世之本。他坚信强权就是真理。他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人生格言的力量。即使面对良知的谴责，他依然雷打不动。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头脑精明、目光长远的人，这些品质铸就了他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巴黎司法大厦

从道德标准上来判断，朱尔·法夫尔是个伪君子。为了实现个人抱负、挑战时运，他不惜诉诸各种令人嗤之以鼻的低级手段。然而，我们是否因此而对他另当别论呢？我们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孕育他不怀好意、粗俗不堪的秉性的成长环境呢？仇恨的毒瘤感染了他浑身的血液，难道仇恨的毒瘤不是夜以继日哀痛的结果吗？孤独、清贫的生活以及可以磨灭激情的斗争在他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或者至少影响了他现在性格的形成。他是一位哲学家，这一点毫无疑问。古代的愤世嫉俗思想对他影响深刻，他吸其精华，剔其糟粕，将其融入现代文明中。

在谋得觊觎已久的职位前，朱尔·法夫尔经历过漫漫长夜。第二帝国的反对力量挡在他面前，不得不逐一消灭。一旦他杀开一条血路、到达目的地，就没人再敢小瞧他了。看着他一步步接近权力的顶峰，人们异常紧张，仿佛庆典上时刻紧绷着的神经。最后，他把自己置于拿破仑三世的眼皮子底下，在立法团的首席交椅上指挥一群龇牙咧嘴、躁动不安的叛逆者，公然向拿破仑三世发出挑战。他在很多方面都无懈可击，但在推行雅克宾主义[18]式的苛刻理念时，他表现得不够坚定。优雅、俊朗的外表下散发着丝丝神秘的气息，这一点就连他本人也并不知情。极简的生活方式给他的人生披上了宗教理想主义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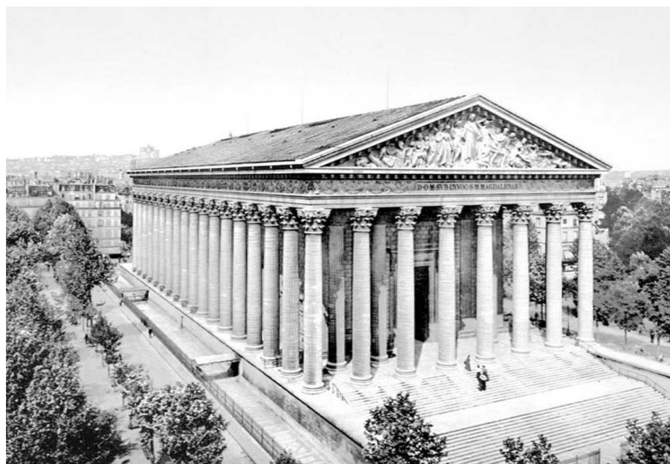
彩，指引他远离尘世的喧嚣，还心灵一片宁静。自从立誓不染指红尘俗世，认为自己已能抵挡住各种低级诱惑后，朱尔·法夫尔仍然不肯善甘罢休，渴望自己能够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样就能保证自己的信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干扰。他给自己的思想设置了一道安全阀，只要有任何不轨的苗头，就会及时地逐出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瞄准了教堂。每当心中有难以抑制的喜悦需要倾吐时，他就会走进教堂，尽情地坦露自己的心声，仿佛面前站着的是自己的红颜知己。当然，他本身就是虔诚的信徒。每个礼拜天上午7时，他都会准时到达玛德莱娜教堂，虔诚地低下头，鼻尖顶在厚厚的祈祷书上，开始全神贯注地聆听神父的祈祷。没人敢拿他性格中的这一面说事，即便是最亲密的党羽也退让三分，因为他们深知一旦犯了他的“将令”，他的怒气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然而，有一个人除外，他是深受大革命[19]思想影响的唐·吉诃德[20]，只有他敢指着朱尔·法夫尔的鼻子说三道四。



朱尔·法夫尔

那人说道："他其实是约阿希姆·缪拉[21]式的教士。"[22]这句话一语中的，真实地反映了朱尔·法夫尔的本质，后来广为流传。

在实现政治野心的道路上，朱尔·法夫尔不遗余力，但他却成了众矢之的。尽管他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疲惫的心灵却渴望得到片刻休息，内心的殷殷呼唤把他带进了教堂，在昏暗的拱形穹顶下，焦躁不安的心灵慢慢得到了抚慰，而这一切恰恰是他从前置之不理的。在这具一尘不染的躯体中，被扭曲的意志阻挡在门外的世俗欲望仍然不时地蠕动着，刺激着每根被激活的神经。世俗的欲望并未从他的躯体中消失殆尽，只是被暂时搁置在某个角落，即使这样，它还是没有向主人肆意膨胀的野心妥协。看到为了摆脱被贪得无厌的自利主义牢牢困住而苦苦挣扎的灵魂时，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想替它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朱尔·法夫尔从不会向别人敞开他那饱受摧残的精神世界之门。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次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无不让他备受煎熬。他从不向别人说起这些事。但当成功说服自己、平息内心的躁动时，他欣喜若狂，再次回到桀骜不逊、不可一世的状态。他的内心世界好比一本天书，他的力量源泉就藏匿其中。他身上确实散发着一股值得我们敬畏的力量，这是他自豪的本钱。因为尽管他经历过失败，也踌躇不前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非凡的一面，不得不佩服他的感召力。他或许就是一位"约阿希姆·缪拉式的教士"，但也可以这样说，"他是真男人。"



绘于19世纪末的玛德莱娜教堂

或许我扯得太远了，有点儿偏离本章的主题了，但我不得不再啰唆一句，朱尔·法夫尔在第二帝国史中占据的位置太显赫了，没有他登场的第二帝国史将是不完整的。同样，我也不得不在这里提及莱昂·甘必大。我相信读者们肯定乐于阅读有关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有幸见证了拿破仑三世时代，所以我的故事可以帮助他们重温那段历史中活跃在自由主义运动一线的主要人物的真实面貌；如果他们当时太小而记不起发生了什么，那么读这些故事就权当了解历史，一睹那个时代伟人的风采吧。

我还是接着讲埃米勒·奥利维耶的故事吧。

第二帝国时期因口才出众、热心投身于政治、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公众人物中，埃米勒·奥利维耶应首屈一指。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但他似乎不太走运，人们至今还对他说三道四，而事实却是，他只不过是拿破仑三世自由主义思想的践行者。

与欧仁·鲁埃不同，埃米勒·奥利维耶超凡脱俗、温文尔雅，因为他喜欢舞文弄墨，本身就是一名小有成就的作家。他也不像朱尔·法夫尔那般极力克制自己的私欲，刻意回避女人。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

当远离了弥漫着硝烟的政治纷争时，他只盼着早点儿回到家里做做家务，将一切烦恼抛诸脑后。

埃米勒·奥利维耶算是个资历较深的政治家了。但不巧的是，他在痛苦与绝望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一片唾弃声中度过了余生。1851年12月3日，也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的第二天，埃米勒·奥利维耶就目睹了父亲的悲惨遭遇。父亲从一座塔楼被拽到另一座塔楼，最后险些被放逐到乌拉圭的卡宴。但父亲的“同党”可就没他那么幸运了。好在威斯特伐利亚老国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叔父热罗姆从中周旋，好在拿破仑·热罗姆也替他求情，埃米勒·奥利维的父亲才被保释，并在国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

埃米勒·奥利维耶是开明之士，所以虽然父亲的悲惨遭遇使他仍心有余悸，但他并没有怀恨在心。他与拿破仑三世之间的敌对与私仇无关，也与拿破仑三世本人无关。有人指责他冰释前嫌、若无其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拿破仑三世的宠幸，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想，他是看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坚韧、刚毅、甘于吃苦的精神，这一点值得任何人钦佩。事实上，铁骨铮铮、淡泊名利的埃米勒·奥利维耶先生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他的目标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大限度地慰藉他内心深处的殷切呼唤，使自由主义思想发扬光大。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他从没把自己置于激烈反对拿破仑三世的风口浪尖上。他从不在公众面前提及杜伊勒里宫的任何事情，也从不向杜伊勒里宫献媚讨好，更没做过投机取巧、使用非法手段谋取私权的龌龊之事。他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事业上，默默地等待机会的到来，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呼风唤雨、扭转乾坤，并甘愿放手一搏。然而，他的做法是极危险的。他不得不极尽演讲之能事，不得不借助于自己手中的权杖。



拿破仑三世的叔父威斯特伐利亚老国王热罗姆·波拿巴

从成功当选立法团议员，更确切地说，从他踏进波旁宫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面对一切困难的准备了。他向远在佛罗伦萨的父亲写信，问他是否该向拿破仑三世宣誓效忠，是否该撇开世俗的偏见、向曾经夺他所爱的那个人俯首称臣？简而言之，如果无法抗拒的使命使他不得不违背良心屈从拿破仑三世的权威，那么是否意味着永远成了他的附庸？父亲回信告诉他不必顾虑重重，既然非要这么做，他大可以放心地去表忠心。表忠心与自我独立、信仰自由并不矛盾，只不过他将身处艰难的处境。只要行得正，走得直，不惹是生非，本本分分干好自己的工作，即使得不到拿破仑三世的宠幸，至少也不会招致讨厌。

父亲的一席话使埃米勒·奥利维耶茅塞顿开，一条人生的阳关大道在他的脑海中缓缓伸向远方。无论风和日丽，还是倾盆大雨，他始终

不慌不忙地沿着这条人生之路走向未来。

对于第二帝国时期埃米勒·奥利维耶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如实地还原一下，并做出客观、公正的阐释。我知道，我对他的评价与学者们给他下的定论大相径庭。或许我的评价会让那些偏激的党人怒发冲冠，也会让那些试图借奔涌的泪水冲刷心中的委屈，但始终无法走出阴影的人悲上加悲。但我依然希望我的不同声音能够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埃米勒·奥利维耶的真性情，更客观地看待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朱尔·法夫尔和埃米勒·奥利维耶都是人们心中数一数二的公众人物。朱尔·法夫尔因出色的口才而深得人心。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颇受赞赏。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名气不比朱尔·法夫尔小，尤其是他的学术素养。能达到他的境界的演说家很少，这使他的口碑大增。

然而，朱尔·法夫尔和埃米勒·奥利维耶在讲坛上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前面我已做过描述，每当站在讲坛上时，朱尔·法夫尔总是慷慨激昂，低沉的声音和着丰富多样、热情洋溢地语调，尽情地拨弄着听众的每根神经；而埃米勒·奥利维耶恰好相反，他用词准确，音色柔美、富有磁性，说起话来娓娓动听。人们都说他有一副喜剧之王般的金嗓子。这种赞赏一点儿都不为过。即使现在，静心倾听，会发现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声音清脆柔和、撩人心弦、富有层次感，尽管带有一点儿普罗旺斯[23]口音，但事实上，这恰好增添了几分美感，仿佛溪水流过鹅卵石时发出的沙沙声，依然铿锵有力，宛若戛玉敲金。而不待见埃米勒·奥利维耶、与她的美貌形成巨大反差的欧仁妮皇后的声音却刺耳、难听，让人难以忍受。她经常取笑埃米勒·奥利维耶说话时的腔调，嗲声嗲气地坦言：她要是有他那样一副嗓子该有多好。

然而，如果你因此认为埃米勒·奥利维耶始终表现得温文尔雅，认为他的言辞一直是这样的彬彬有礼，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时，他的语言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他会反常地将演讲变成极端的雄辩，尽管依

然收放自如地打着优美的手势，尽管措辞依然得体而又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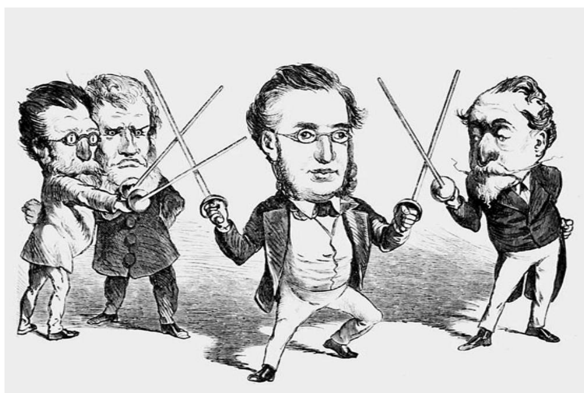
听腻了议会公开辩论赛，看惯了操着刻意美化过的语言、在人们面前大秀口才的一个个公众人物提及1870年战争之前那些享有盛誉的演说家之后，他们要么一脸茫然，要么装作一无所知——几乎没人在意那些大师的辉煌过去。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帝国时期波旁宫中激烈的雄辩场面并不比当下剧院中的热闹气氛逊色。没错，如今的演讲依然能煽动人民的激情，但与不久前洋溢着热情的雄辩相比，风格迥然不同。现在，风向变了：人们把讲坛当成了发泄怒气、攻击他人、蛊惑人心的平台。曾经的政客们不仅注重礼数，而且倾向于以外在的背景装点他们的态度、美化他们的语言。他们喜欢引经据典。不管是法律层面上的约束，还是鲜为人诟病的礼节上的自我克制，都使以前的辩论多了一份文雅，少了一份市井气息。

在立法团发表演讲时，朱尔·法夫尔咄咄逼人的气势往往会把敌对双方的辩论变成一场弥漫着硝烟的战争，胜负难料，险象环生。多数派政府议员一开始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随着演讲接近尾声，看够了朱尔·法夫尔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模样的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会群起攻击、百般刁难。

而埃米勒·奥利维耶说话轻声细语，态度暧昧，多数派政府议员非但不与他争锋，反倒放松警惕，让本该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要狂傲地抵制他的高谈阔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始至终语气平和，满脸堆笑。要想在辱骂声中湮没他的声音也不可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触犯到任何人。埃米勒·奥利维耶就是以这种方式成功地稳住了偏执的政敌，使自己长时间立于帝国议会而不倒。然而，当终于拿到那把向往已久的权杖时，他露出了真面目。

始料未及的是，后来事态的发展令他措手不及。人们的情绪不再随着抑扬顿挫的语调而“翩翩起舞”，祥和的气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顿时乱作一团。埃米勒·奥利维耶扯掉伪善的面纱，向他们发

出响彻云霄的怒吼。他果断出手，迅速清除了挡在前面的障碍。他仿佛一头被围困的猛兽，拼命捍卫着最后的尊严。他不停地咆哮着，眼中既流露出对过去的渴望，又闪现着对未来的无奈。他的声音不再柔和、优美，梦想、希望以及倾其一生苦苦追求却屡遭冷眼的自由在他刺耳、难听的哀鸣中逐渐化作泡影。此时此刻，他或许已下定决心殊死一搏，但局面似乎没有转机的可能。



漫画：埃米勒奥利维耶就像一名无畏的剑客，同时面对多人进攻

至于埃米勒·奥利维耶为什么要改变政治立场，其原因不言而喻，其道理也不难理解。

刚步入政坛时，埃米勒·奥利维耶既无党派上的束缚，又无政治上的恩怨，因此博采众长，广纳人脉，与杜伊勒里宫的达官显贵甚至拿破仑三世本人都能谈得来。正是秉承这样的从政理念，他最终才与拿破仑三世和解。

在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的运作下，他获得了与拿破仑三世见面的机会。关于这点，我已向媒体写信做过阐释。其实，最先认同埃米勒·奥利维耶的是莫尔尼公爵。莫尔尼公爵发觉，埃米勒·奥利维耶反对拿破仑三世推行的政治制度，没跟拿破仑三世本人过不去。

与拿破仑三世产生交集前，埃米勒·奥利维耶就与担任立法团议长的莫尔尼公爵有过深入的交谈。莫尔尼公爵坚决反对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果敢行为使他备受鼓舞。但他在其著作《1月19日》谈及莫尔尼公爵时，语气中却带着一些质疑。

莫尔尼公爵去世前将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了埃米勒·奥利维耶。然而，要不是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那些伟大的计划、崇高的理想或许只能胎死腹中了。

追求绝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很看好埃米勒·奥利维耶，欣赏他卓越的口才，对他的演讲艺术赞不绝口。当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向拿破仑三世举荐他时，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他甚至进言拿破仑三世说将来肯定有用得着这位年轻议员的地方。

竭力挖掘无党派显要人士、招抚前朝死敌，从而彰显个人魅力的拿破仑三世欣然接纳了瓦莱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的谏言，同意在杜伊勒里宫与埃米勒·奥利维耶见面。

两人相见恨晚，交谈甚欢。埃米勒·奥利维耶心悦诚服地接纳了拿破仑三世。他们惺惺相惜，和而不同。我想，人们抓着埃米勒·奥利维耶“屈从”拿破仑三世一事的小辫子不放的原因大概是误会或党派斗争吧。

如果以辩证的思维冷静地看待此事，埃米勒·奥利维耶的效忠誓言确实是发自肺腑的，这一点不容置疑。后来，在与拿破仑三世的交往中，他对拿破仑三世的忠诚从未打过折扣，尤其在被非正常快速擢升之时。他终其一生追逐自由主义，从未与政府就行动、规范之事产生过不悦，这正好保证了他宏伟计划的顺利实施，也为他追求的自由主义信仰提供了保护伞。

在一个思想荒诞、行为轻浮的国度，埃米勒·奥利维耶的这种做法

极易招致危险。在一个易于冲动、贪图享乐、沉浸于遗风旧俗、拒绝革新、疑神疑鬼的国度，他的这种做法同样毫无安全可言。那些意志坚定、永不妥协的无党派人士无情地抨击他、挖苦他。他不幸卷入了法国复古之风的旋涡中。

埃米勒·奥利维耶不仅是一名热心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是一名政治家。他似乎有点儿生不逢时，现实环境始终无法给他提供孕育其卓越领导才能的土壤。然而，在他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大臣[24]后，信仰上的缺陷日益凸显。不久，他在一片责骂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掌权后，他不但要舌战故友，洗涮污点——人们风言风语，说他是叛徒；还要力压侵蚀帝国根基的“皇后党”，劝导迷恋于拿破仑三世传奇、做着复辟帝国美梦的遗老遗少们。

他从不关心宫廷中的是是非非，刻意远离弥漫着轻浮、算计、荒唐、恶意之风的朝堂，尽管如此谨小慎微，埃米勒·奥利维耶还是被杜伊勒里宫的政客们拽入了仇恨的深渊。

对政治家来说，琐碎之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其影响却不容小觑。为了一窥这个打个响鼻都能撼天动地的微型世界，为了看清控制国家命脉、带来无数灾难的权贵们的真面目，我们很有必要（如果可能的话）与那些朝臣们朝夕相处，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点滴，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

然而，司法大臣埃米勒·奥利维耶力图推翻铸就自己理想的政治制度时，那些精神上顿时失去寄托而备感失落的人不顾一切地向他开战了。他试图以公投平息骚乱，非但无济于事，反倒频频将自己置于反对者的枪口之下。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与欧仁·鲁埃矛盾重重，处处与这位“副皇帝”作对。当欧仁·鲁埃在一片斥责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坐上参议院头把交椅时，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噩梦才真正开始。欧仁·鲁埃深得欧仁

妮皇后欢心，受到无微不至的关照。于是，他向埃米勒·奥利维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他发出愤怒的吼声，把仇恨的烈火铺天盖地般引向埃米勒·奥利维耶。虽然大火即将烧身，但埃米勒·奥利维耶面无惧色，岿然矗立在欧仁·鲁埃面前，新仇旧恨燃烧着他的每根神经，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这是仇恨交加的时刻。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爆发之际，在帝国丧钟的长鸣声中，纵使埃米勒·奥利维耶有力挽狂澜的勇气，但他注定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正在第二帝国上空酝酿。空气异常闷热、躁动，时不时地从远处传来低沉的隆隆声，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未等身单力薄、寡助无援的埃米勒·奥利维耶缓过神来，突然一声巨响，他应声而倒，如同被闪电击中的大树轰然倒地一般。接着，肆虐的洪水裹挟着他的躯体，一路奔泻而下，把他冲入未知的深渊，仿佛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向空中的物体，昏昏然不知所向。

第二帝国把他推向了死亡的尽头。一向见风使舵的舆情正静静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不，机会来了！就是他，就是埃米勒·奥利维耶把第二帝国置于北德意志联邦的魔爪之下，让第二帝国受尽屈辱而死的。

在“1870年战争爆发”一章中，我将把埃米勒·奥利维耶在该时期的真实面目展现给大家，我也将毫不保留并且证据确凿地向读者解读1870年战争的真正始作俑者。时间会洗刷掉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冤屈，还他应有的尊重，修正他的历史地位。就在不久前，舆论突然调转风头，微微向他吹来，一直紧绷的神经似乎有了放松的迹象。像拿破仑三世一样，埃米勒·奥利维耶不仅是清白、无辜的，而且值得人们爱戴、同情。或许他一直在等这一刻的到来。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洗刷冤屈——因为他从没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而是为了能让疲倦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能够安详、释然地度过晚年。

我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埃米勒·奥利维耶做出如此评价，是因为真相确实如此，也因为良知一直在召唤着我，更因为我敬重他虽忍辱负重但仍奋力前行的勇气。

埃米勒·奥利维耶蒙羞退出政治舞台后，几乎过着幽居的生活。在他春风得意之时，腆着脸授予他院士荣誉称号、一向标榜学术自由的法兰西学院却反常地拒绝刊载他的就职演讲稿，理由是他的稿子中浓墨重彩地颂扬他曾效忠、爱戴过的君主[25]。面对赤裸裸的侮辱，他愤然放弃了院士的头衔，从此淡出公众视野，私下给一些虔诚的信徒传经布道。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人们渐渐忘了他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当蒙在鼓里的人们获悉俾斯麦伯爵阴谋[26]的实情后，埃米勒·奥利维耶喜不自胜，他的形象再次映入公众的眼帘。

然而，姗姗来迟的喜悦会驱散这么多年来笼罩在埃米勒·奥利维耶心头的阴影吗？他会重新步入政坛，让他那柔和、优美的声音再次回荡在议会大厅吗？

我认为他再不会置身于云谲波诡的乱局中了。我相信他再不会去理睬那个曾经背叛他的所谓的“自由党”了。有些男人绝不会对“妻子”的出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埃米勒·奥利维耶就是这种类型的男人。要是能重新来过，再现一个血气方刚的埃米勒·奥利维耶，他一定会激情饱满但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因为他本就是个热心肠的人。或许当他看到我们为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苦苦挣扎的身影时，他会偷偷地抹两把泪。如果能有幸再次听到他的声音，那将是从墓穴深处传来的哀婉曲子——神秘主义者如是说——宽慰那些依然苟活于世但又不懂曲子深意的人。

---

[1]这种情况在政治圈子中再熟悉不过了。——原注

[2]阿尔弗雷德·达里蒙（Alfred Darimon，1819—1902），法国议员。

[3]“这些人”指1857年到1860年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主要人物，即“五人团”中的埃米勒·奥利维耶、朱尔·法夫尔、欧内斯特·皮纳尔、雅克-路易·埃农及阿尔弗雷德·达里蒙。

[4]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成功发动政变，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为法兰西第二帝国。

[5]埃米勒·奥利维耶与朱尔·法夫尔曾经是朋友，但后来反目成仇。——原注

[6]即埃米勒·奥利维耶的父亲德莫斯泰纳·奥利维耶（1799—1884），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因反对拿破仑三世发动1851年12月2日政变而被放逐，直到1860年才获准回国。

[7]原文“type”，一位某种类型的人，“另类”说明他的性格与众不同。

[8]拉丁区处于巴黎五区和六区之间，是著名的“穷人区”。

[9]指莱昂·甘必大1866年为“博丹事件”的被告人德勒克吕兹做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控诉第二帝国之事。

[10]法语中，宾语人称代词“te”是“你”的意思，但为表尊重，社交场合一般用“vous”，相当于汉语中的您。

[11]借指波西米亚主义。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一群希望过非传统生活的艺术家、作家与任何对传统不持幻想的人的生活方式；其二是指法国人眼中四处漂泊、不受传统束缚的吉卜赛人。

[12]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1808—1893），法国军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3]指帕特里斯·德·麦克马洪元帅总统任期内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

[14]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1841—1910）。

[15]这里是指朱尔·法夫尔等人武装抵抗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的情景。

[16]哈姆莱特，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的男主人公。

[17]指旧时常由奴隶或犯人划桨的帆船。

[18]指以自由、平等为幌子，旨在推行极端暴政的统治理念。

[19]指法国大革命。

[20]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21]约阿希姆·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元帅。青年时，父亲希望他成为教士，但他却选择了从军，一生追随拿破仑一世，立下了赫赫战功。

[22]暗指法夫尔表面虔诚，实则阴险、狡诈。

[23]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埃米勒·奥利维耶的家乡。

[24]指1870年1月2日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司法大臣。

[25]指拿破仑三世。

[26]指“埃姆斯电报事件”，它是普法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第8章

1867年大阅兵与第二帝国全盛时期

观看一部经久不衰的旷世剧作，观众将情感完全融入剧情中，当缓缓升起的帷幕即将露出观众期待已久的精彩之时，他们的血液开始沸腾，呼吸开始急促。这是见证巅峰的时刻，绝妙的语言，优雅的动作，一切美的元素将在这一刻华丽绽放；这是见证巅峰的时刻，剧作的主题将在这一刻得到完美的诠释。我们将撩动心弦、使人欲罢不能的这一刻称为“巅峰时刻”。

时间车轮的滚动声打破了1867年的寂静。第二帝国即将成为历史，曾经的荣耀、醉生梦死般的奢靡生活以及一切不正之风将随着帝国的陨落而烟消云散。在被赶出杜伊勒里宫之前，权贵们仿佛一群被蜂王遗弃的蜜蜂，喧嚣着挤出蜂巢，在空中漫无目的地飞来飞去，一会儿碰到树上，一会儿撞到墙上。病入膏肓却强颜欢笑的第二帝国仰头对空长啸一声，向世人证明自己威风不减当年，但没有料到这是它最后一次出风头了，这是它谢幕前最后一次享受观众的礼遇了，从此，这个舞台与它再无瓜葛。

时间车轮的滚动声打破了1867年的寂静。在帷幕升起的那一刻，

第二帝国这部旷世剧作也被推向了高潮。吞噬万物的漫漫黑夜即将来临，沉默多年的寂静即将被打破。日薄西山的第二帝国在最后一束余晖的映衬下从容地坐在宝座上，细数着前来访问的君主们，舞台在它的脚下伸向四面八方。

时间车轮的滚动声打破了1867年的寂静。第二帝国就像一个神气的军乐队指挥，指挥着由各种乐器组成的乐团。低沉的横笛声、雄壮的号角声夹杂着隆隆的战鼓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突然，他把指挥棒指向紧随乐队的君主们，他们迅即拿起手中的小号，鼓起腮帮子，准备奏响属于他们的乐章；杂乱的小号声顿时打乱了乐队的和谐，好像他们个个都是不合格的小号手，或者笨手笨脚、硬着头皮给士兵们分发给养的随军小贩似的。尽管如此，乐队的演出整体来讲还是相当成功的，令人赞不绝口。第二帝国的光环在高潮迭起的舞台上正渐渐褪去，似乎腾出空间——在如此壮观的场面中，只凭一幕剧的高潮怎能牵动观众的每根神经——迎接虽早已淡出人们视野，但在心里烙下深深印记的那股神秘力量的到来，它迈着轻盈的步伐，穿过层层暮霭，轮廓渐渐清晰起来，它一点儿也没变——自从诞生之日起，它就熠熠生辉，光芒万丈。它就是拿破仑一世传奇的力量！此刻，空前的盛世仿佛拿破仑一世时代再现。拿破仑一世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无法逾越的辉煌，他的光环使所有君主黯然失色。

时间车轮的滚动声打破了1867年的寂静。第二帝国的传奇再次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历史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逝去的日子里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曾经瞒天过海、欺人耳目的传奇再次眨着诡秘的眼睛，俯视着法国的一举一动，而浑然不知的人们却依旧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喜庆中。俄国冰天雪地的冬天在日月的交替轮回中已离人们远去，它的主人亚历山大二世此刻正在拿破仑三世面前点头哈腰；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不是朝拿破仑三世挤眉弄眼嘛！滑铁卢是个该死的地方，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1]是个疯疯癫癫的老家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挽着拿破仑三世的手如是说；圣赫勒拿就是

一出闹剧，是谁缺德胡乱编造了这样一个拙劣的故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不是打发宝贝儿子来给拿破仑三世赔不是了嘛！这个世纪是第二帝国的世纪。此刻，天下诸侯齐聚一堂，共同朝拜他们宗主国的君主——拿破仑三世。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一世曾让拿破仑一世的六十万大军在俄国的冰天雪地里折戟沉沙



雷希施塔特公爵，他是拿破仑一世唯一的儿子。拿破仑一世死后，他被其父的支持者称为“拿破仑二世”，由于身患肺结核，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最终在1832年于维也纳去世

1867年正大踏步朝我们走来。黎明的晨曦已酷热难耐。然而，凶险的暗流却在炫目的一幕背后翻滚。如果说1867年是第二帝国的全盛时期的话，那么它的到来预示着第二帝国从此将走向衰落，因为第二帝国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黑夜正在它面前挥舞着魔爪，随时准备将它拽入无底的深渊。风呼呼，雨凄凄，狼烟遍地。尽管第二帝国在竭力粉饰太平盛世，但猛烈的激流已使它坐卧不宁。显然它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当第二帝国这部旷世剧作在观众的一片喝彩声中缓缓落下帷幕时，迫不及待的恶魔你推我搡，吵嚷着涌向舞台，地板在它们

脚下裂成碎片。它们恶狠狠地盯着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皇太子以及整个宫廷，愤怒地撕下国旗上的鹰章。它们喘着粗气，发出阵阵奸笑声。在它们眼中，第二帝国的辉煌与荣耀简直就是个笑话。不肯善甘罢休的它们走下舞台，把魔爪伸进第二帝国瑟瑟发抖的身体，然后使劲一拉，鲜血从撕裂的身体中奔涌而出。最后，它们手捧鲜血淋淋的心脏，心满意足地朝荒野走去。

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是第二帝国走向荣耀的巅峰。第二帝国神秘的面纱在那一刻也被揭开。然而，当我们报着怀疑的态度细究第二帝国的历史时，会发现当时成功跻身杜伊勒里宫的那些人并非平庸之辈，他们都是有两把刷子的。拿破仑三世也不是昏庸无道。他通过实力赢得了各国君主的尊重，欧洲各国都对他敬让三分。不过，1867年的空前盛况让人觉得有点儿不踏实，有点儿欲盖弥彰的感觉。

就算是在第二帝国最扬眉吐气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伯爵依然没有放弃适时敲打敲打帝国的想法，他们一直盘算着将拿破仑三世引入自己的圈套。然而，面对固若金汤的帝国、不甘示弱的拿破仑三世，他们疑虑重重，担心一旦挑起战端，那个曾经在自己铁蹄之下屈服的帝国[2]会不会避其锋芒、全身而退呢？



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与皇太子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伯爵讨厌第二帝国。因此，只要能让第二帝国一蹶不振，他们就别无他求。但他们与整个世界一同被第二帝国华丽的外表震慑住了，被第二帝国威严的气势吓跑了。他们虽心怀鬼胎，却畏手畏脚，因为他们还没有摸清第二帝国国防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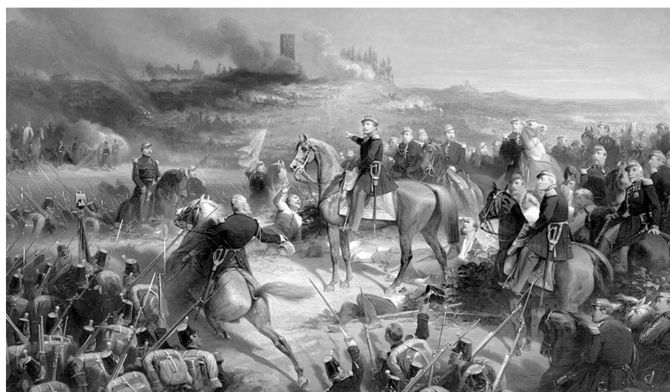
已经知悉他们心中疑虑的拿破仑三世觉得是时候让欧洲各国君主开开眼界了。于是，他安排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阅兵，一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二来向欧洲各国君主秀秀肌肉。1867年6月6日，宏伟的阅兵式在隆尚拉开帷幕，约十万名将士顶着炎炎烈日，整齐地排列在布洛涅平原上，等待光荣时刻的到来。

围在拿破仑三世身边的君主们——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检阅——向世人诠释了第二帝国的伟大，并有幸见证了第二帝国鼎盛时期最雄厚的军事实力。马真塔战役与索尔费利诺战役期间响亮的号角声仍在耳际回荡，滚滚烈焰映红了天空，焦黄的战旗依然闪烁着金光。皇家卫队的所有家底一览无余，来自全国各个军营的所有将士都列阵。检阅台前站满了好奇的人们，他们相互推搡着、嘀咕着，仿佛

一群盘旋在蜂巢上方的蜜蜂，嗡嗡叫个不停。排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是投弹兵方阵，规模壮观，威震八方。紧随其后的是轻骑兵连方阵。往后靠右侧，朝圣克卢方向排列的是重骑兵方阵，沉重的装备压得马儿喘不过气来。它们焦躁地踏着蹄子，时不时地嘶叫两声，像是在表达心中的不满。炮兵方阵在受阅方阵的正中间，远看黑压压一片。炮兵整齐地排成两列，个个神情严肃，目光庄重。排在方阵左侧的是步兵方阵。步兵头戴饰有金色穗带、羽毛的头盔，身着军装，肩挎胸甲，厚重的装束将他们裹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清他们的模样。他们把武器立在地上，使绚丽多彩的隆尚平原增添了一份肃穆。检阅台前百米见外的平地上留下一排洒满干泥巴的深深脚印，一直伸向远方。



马真塔战役。该战役爆发于**1859**年，是奥意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



索尔费利诺战役。该战役爆发于1859年，此战是是奥意法战争中最后一次战役

叙雷纳[3]的空地上挤满了观众。人们像泄了闸的洪水一样涌向车站[4]，这里的列车冒着滚滚浓烟，发出突突的轰鸣声。狭长、陡峭的瓦勒里昂山拔地而起，巍然耸立在巴黎西郊，从容地恭候着向拿破仑三世致敬的那一刻。

迫不及待的人们不时地看着手表，心中的喜悦难以抑制。检阅台的布置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人员搬来凳子，整齐地摆放在台子上。激动的人们你推我搡，脖子伸得长长的，想一探究竟。男人们扯开嗓门，大喊着让女士们收起阳伞。混杂着各种口音的人群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恶语相加。喧嚣声此起彼伏，仿佛一支正在演出的管弦乐队。突然，天边扬起一阵灰尘。紧接着万炮齐鸣，一发发炮弹撕裂长空，隆隆的回声在叙雷纳久久不散。人们的嘈杂声戛然而止，他们屏住呼吸，等待见证辉煌的一刻。隆尚平原上一片寂静。地平线上忽然冒出几个黑影，仿佛骤然而起的旋风。只见拿破仑三世骑着黑马款款而行，崭新的挽具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普王威廉一世分列两边。这是令人窒息的一刻！一百零一发礼炮齐鸣，呼啸着划过天际，向拿破仑三世致以最隆重的问候。与此同时，十万将士齐刷刷地举起枪，喊着响亮的口号，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迎接拿破仑三世的到来。战鼓隆隆，号角声声，就连微微飘扬的军旗刹那间也规则地一展一舒，仿佛在向拿破仑三世倾诉它们的敬慕之情。黑骏马迈着碎步，载着拿破仑三世从掷弹兵、轻骑兵方阵面前疾驰而过。为拿破仑三世开路的是阿尔及利亚籍骑兵方阵，他们身披东方特色的宽松白色披风，只露出身体的正面，好像刚从大雪中走来一样。紧随拿破仑三世身后的是与百人卫队[5]同行的军中大佬——元帅、将军以及外国的军官们。当拿破仑三世一行经过检阅台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欧仁妮皇后起立，皇宫的随行人员也起立。三位君主左手托着帽子，频频地点着头，向台上的皇室贵胄、受阅部队问好。拿破仑三世脸上堆满喜悦，心里默默地感叹，人生的辉煌莫过于此！刚才还将

信将疑、骂骂咧咧的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他们一边欢呼着，一边脱帽向君主致敬。相比光环加身的拿破仑三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威廉一世显得灰头土脸，感觉他们就是特意为拿破仑三世来做陪衬的，就像拿破仑三世的劲敌曾经说过的那样，这样的安排就是让他们吞食圣赫勒拿岛的恶果的。

此刻，瓦勒里昂山一动不动，眼睛瞪得滚圆，脸庞涨得通红，仿佛在积蓄全身力量准备以最洪亮的声音向拿破仑三世致以最特别的问候。难掩激动之情的队伍长龙随着紧促的呼吸一起一伏，大地在它的足下微微颤抖。检阅结束后，拿破仑三世走上检阅台，向台下的人们挥了挥手，然后在前排正中间入座。随后，一名元帅模样的人朝皇帝走来，收到指示后，他向前跨出几步，清了清嗓子，然后大声宣布方阵分列式正式开始。浑厚的声音在隆尚上空回荡，仿佛隆隆作响的火山。迫不及待的十万将士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前开进，饱受战火洗礼的军旗在空中悠然地飘扬着，将士们脸上洋溢着拿破仑三世时代带给他们的荣耀。

连绵不绝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朝检阅台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圣西尔[6]军校的六名骑兵代表，紧随其后的是该校的骑兵营学员方阵。他们娴熟、整齐的步伐赢得了观众不断的掌声。当人们还没从学员方阵的惊喜中清醒过来时，一阵尘土突然腾空而起，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嘈杂声。不一会儿，一群头上裹红色丝巾、身着蓝色夹克的黑人士兵方阵朝检阅台奔跑而来。与其说是方阵，不如说是一群乱哄哄的调皮鬼，他们踏着步子，一边跑，一边指手画脚，不停地发出粗犷而又带着野蛮气息的吼声。对，他们就是被第二帝国收养的土库曼流浪儿。看！他们被第二帝国宠惯得没一点样儿。这群幸运儿在那天出尽了风头！他们被刻意安排在紧随圣西尔军校学员的方阵中。来自大漠深处的“老外们”能与法国人一起见证第二帝国这一伟大的时刻是多么荣幸的事！他们一大早就接到通知说能见到拿破仑三世，并能跟拿破仑三世说说话，难怪此刻他们的心情那么迫切。拿破仑三世非但没

有怪罪他们，反倒觉得那是他们真情的流露。因此，他感动不已。快要接近检阅台时，他们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枪，黝黑的胳膊格外显眼，连蹦带跳地涌向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深情款款地将帽子在空中一挥，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这可是称兄道弟的人之间才可以享受的礼遇呀！台下的士兵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之情了，大声高呼：“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



百人卫队中的士兵

激动的人们一边应声附和，一边涌向贵宾区。慌乱的卫兵迅即站成一排，刺刀相互交叉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以防冲破警戒线。好奇的人们相互推搡着，伸长脖子，准备一睹这支深受拿破仑三世宠幸的异域士兵方阵的真面目。突然，人群中冒出一声尖叫：“看到他们

了！”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大喊起来：“看到他们了！”喊声铿锵有力，富有乐感，与军乐团的号角声、鼓声合奏了一首令人难忘的大合唱。“你注意到那顶帽子了吗？”惊诧的人们不停地说，“你注意到那顶帽子了吗？”人们都想亲眼目睹一下那群曾被邻居家的小孩子追得满大街乱跑的捣蛋鬼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不甘示弱的炮兵方阵像绷紧的线，整齐划一地从平原的一头向另一头移动。坚硬的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规律的嗒嗒声。观众高亢的欢呼声丝毫没能撩动他们的心弦。他们昂首挺胸，步伐整齐，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支铁的队伍，是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看到此刻的他们，人们的脑海中不由得响起震天撼地的厮杀声，一排排炮弹呼啸着划过天际，战马在嘶鸣，战鼓在隆隆作响……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炮兵方阵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渐行渐远。随后，朝检阅台走来的分别是皇家卫队、投弹兵、轻骑兵方阵，再往后是重骑兵方阵，全新的装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颗颗燃烧的煤球。

在隆尚平原这个大舞台上，第二帝国刚刚上演了一部活灵活现、令人震撼的大手笔剧作，仿佛一名被揭开面纱的美少女，她的美貌被一览无余地展现给了人们。第二帝国拿出镇国之宝——闪光的护胸甲。护胸甲被高高地举在空中，耀眼的阳光照在上面，折射出道道金光，仿佛在警告世人：天地间舍我其谁！女士们本着刷刷存在感的目的欣然前往观看盛典，返回时信心满满，充斥着莫名的喜悦，回想起刚才令她们心跳不已的一幕——军官们身上迷人的荣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她们在想什么呢？当然不是荣光背后的英雄事迹！她们虽然也为壮观的阵容不停地鼓掌叫好，但更多关注的是将士们身上华丽的军装。第二帝国不也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吗？埋在皇家卫队心底的传奇种子正在生根、发芽、争先恐后地往上长。老天似乎也偏爱皇家卫队，刻意把最灿烂的阳光洒向他们。自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被黑夜吞噬了光亮的拿破仑[7]之星再次出现在天际，把光辉洒向另一个拿破仑

[8]，让他再续一段传奇佳话。看着头戴巨大熊皮军帽的投弹兵方阵，人们思绪万千，年长者翘着嘴角，细细回味起他们辉煌的过去；年幼者脸上流露出坚定、刚毅的神情。人们的思绪飘过隆尚平原上方，穿过布洛涅森林，最后轻轻地落在荣军院的穹顶上，“另一个拿破仑[9]”此时正在穹顶下长眠。人们仿佛看到了曾经震撼的战争场面，看到了悬浮在“他”头上的层层光环。传奇迈着巨大的步子，跨过阅兵场，向远方走去。此刻，人们心中的仇恨、不满，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仿佛突然蒸发了一样。将士们起落有致的步伐，嘹亮、庄严的口号和着军乐团激情澎湃的乐章，猛烈地激荡着每个人的心弦。在国家面前，在法兰西民族面前，什么政党纷争啊，信仰之殇啊，显得多么渺小。

当人们还在拿破仑一世传奇的余光中懒洋洋地遐想时，平原上突然传来阵阵混杂着金属碰撞声的车轱辘声，他们这才回过神来。循声望去，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从圣克卢宫方向朝他们走来。那就是炮兵方阵。现在该轮到炮兵登场了。张着大嘴巴的加农炮迈着悠扬的步伐，穿过层层阳光，一步步靠近检阅台，人们甚至能隐约听见霰弹相互碰撞发出的噼啪声。有些炮弹车由纯白色的军马来牵引，而另外一些则是由纯黑色的军马牵引，这种黑与白之间的完美搭配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别只看到加农炮拉风的一面，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铜制配件在阳光的映衬下散发着道道淡红色的光泽，映红了尘土飞扬的天空。挂在炮弹车两侧的推弹长杆在树木的剐蹭、碰撞下一起一伏。紧跟在炮弹车后面的是辎重兵方阵，有弹药车，还有古怪的野战厨房车。声势浩大的炮兵方阵渐渐离观众远去，现场逐渐恢复了平静。

突然，所有受阅部队刷地停下了脚步。现场再次鸦雀无声。人们以为阅兵式就此落下了帷幕，准备散去。就在这时，不知谁大喊了一声“看”，人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万胸甲骑兵正雄赳赳地朝检阅台狂奔而来。快到检阅台时，他们敏捷地向台上的贵宾们行了一个侧目礼，

然后马不停蹄地继续朝前奔去。盛典的高潮就此揭开帷幕。现场的观众被骑兵的庞大阵容惊呆了；他们鼓足了劲，一边齐声高呼“万岁！”一边越过道障，向检阅台方向涌去。检阅台似乎要在撼天震地的呼喊声中没入地下了！这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胸甲兵方阵，它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他们是真正的勇士，向世人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精神。如果说投弹兵方阵撩起了人们的美好记忆的话，那么这些胸甲骑兵的精彩表演则唤起了他们对传奇的向往。滑铁卢战场上一幅幅可歌可泣的画面不断地在人们的脑海中翻滚，此役虽败犹荣！那些面目狰狞的钢铁猛兽再次点燃了人们向往帝国的热情，人们的思绪沿着记忆的轴线慢慢飘向远方……



奥斯特里茨战役爆发于**1805**年，此战中拿破仑一世取得决定性胜利。因参战方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所以又称“三皇之战”

最后一名胸甲骑兵从人们面前疾驰而过后，三位君主站起身，缓缓地朝欧仁妮皇后等皇室人员就坐的凉廊走去。在离凉廊大约十米的地方，他们纷纷向欧仁妮皇后脱帽致礼，以示告别，然后登上马车，在亲王、元帅等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离去，瓦勒里昂山悠长、低沉的“吟诵声”[10]再次回荡在隆尚上空。

这就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著名的隆尚大阅兵。灿烂的阳光与绚丽的阵容再次为法兰西谱写了华丽的篇章。拿破仑三世下马后，普王威廉一世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紧接着下了马，他们换乘马车朝布洛涅森林

深处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呼啸着朝坐在拿破仑三世旁边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飞来，子弹射中了杜伊勒里宫车骑总管兰博先生坐骑的头部。可怜的马儿应声倒地。飞溅的鲜血洒了两位君主一身。虽然他们脸色煞白，却连口对随行人员说："没事！没事！……"

后来，人们都听说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事，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我在此不做任何说明。然而，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拿破仑三世随即与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一次谈话。至于谈话内容，拿破仑三世从未向外界公开，只对W伯爵提及过。在此，我向读者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6月6日阅兵盛典结束后没过几天，拿破仑三世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杜伊勒里宫的一间小书房里进行了一次密谈。谈完那起发生在布洛涅森林、让公众颇感兴趣的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后，他们把话题转向当时已席卷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思想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是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事实上，他还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虽然已经意识到此举危险重重，但还是做好了以豁达的心态迎接一切挑战的准备。笃信社会主义思想的拿破仑三世也做好了与当时高涨的舆情妥协的准备，并乐于接受改革现政府政策导向的呼声，却没有意识到当时波涛汹涌的暗流。他的心中充满幻想，他只相信命运会为他安排好一切。随后，两人之间展开了下面的对话。

亚历山大二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应该敞开怀抱、拥抱自由的时代。我坚信，就像那些笃信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一样，自由主义信仰将会使这个我深爱着的世界获得重生。然而，我能从自由主义信仰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我整天提心吊胆，总担心从某个街道的拐角处射来一发子弹，使我命殒黄泉。我本想忘掉就在几天前发生在法国大地上、旨在夺我性命的行刺事件，但我做不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不就没绕开那个话题吗？在民族主义运动事业蒸蒸日上的大背景下，放松遭人暗杀的警惕是极不现实的。就在安东尼·贝雷佐夫斯基[11]举枪瞄准我的那一刻，我相信当时左右他思想的依然不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

但他玩过了头，不得不在由据说是公开、坚决反对一切进步的君主们构成的屏障前停下脚步。那么，遗憾又有何用呢？人们渴望的独立、自由，我统统给他们。我将缔造一个开明的俄罗斯帝国。我希望开明的帝国将和祖先们的专制帝国一样强大。然而，就在这里，我的梦想走向了终结。我已清楚地看到我一手构建的空中楼阁岌岌可危，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我不指望能从自由主义信仰中得到什么，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如果非要让我说出我对自由主义运动的看法，那我会说我已经做好自食恶果的准备。好奇会害死猫，陛下。自由将是影响我们命运的神，我会不会是欧洲所有君主中第一个被它开刀祭旗的呢？今天不幸偏离了预定轨道的那颗子弹明天肯定会正中目标，我已经感觉到子弹正朝我呼呼飞来。”

坐在一旁的拿破仑三世听得又惊又疑，回应道：“我们的统治理念是不同的。尽管您已给予自由主义一些关怀，但还是能看到您早期排斥自由主义的影子。在您加紧步伐准备上前拥抱自由时，您仍然心存戒备。别让自己的神经老这样绷着。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他们绝不会忘恩负义的。尽管人群中偶尔会冒出一两匹害群之马，譬如前不久行刺您、破坏了我们之间和谐的可恶杀手，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们都是恶魔，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物质上的施舍能麻痹人们精神上的诉求，宽阔的胸怀能熔化人们心中的不满与仇恨；自由好比漫漫黑夜中的一盏灯，将指引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会让法国呼吸上自由的空气。当那一刻到来时，我将和陛下您，尽管您曾遭遇不幸，一起不再为自己的人生安全而忧心忡忡。在人们的一片祝福声中，我将引领大家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您说的或许没错，”亚历山大二世接着说道，“但我还是身不由己地感到担心、害怕。而且我对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不抱任何希望。”

拿破仑三世满脸疑惑地问道：“您是说国家统一思想吗？”

“在您看来，这种思想难道不是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吗？”

“意大利已经实现统一，也没见到它的君主与新建的政治、社会制度有什么冲突。如果建立一个大一统的联邦制国家的目的是消灭民族认同，那么各国君主对此肯定没多大兴趣。话又说回来，要取得任何进步都要一个过程。国家的发展就好比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他们脱掉襁褓时，他们得借助引带或大人的搀扶才能迈出人生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越来越茁壮，开始学着自己走路了。他们不断尝试、练习，直到能走得更稳，直到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自己的人生征程。这时，他们不再需要引带，不再需要大人的搀扶。他们一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一边大踏步向自己的未来奔去。到那时，陛下，我们就该退场了。我们就得放下身段，和普通百姓一起出现在大街小巷。我们要与他们打成一片，思他们之所思，想他们之所想。”这时，拿破仑三世露出调皮的微笑，继续说道：“不光如此，我们还要走下宝座，搬上凳子坐在壁炉边。”



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安东尼·贝雷佐夫斯基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绘于**19**世纪**60**年代

亚历山大二世摇了摇头，脸上写满悲伤。

“您是个善良的人，陛下，”他温和地说道，语气中带着深深的遗憾，“但愿您的梦想能成真！”

突然，他换了一种语气，接着说道：“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携手一起踏上您勾勒的大好前程呢？陛下，您信心满满、志在必得，而我却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这一天到来，因为我还不太相信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真的会像您说的那般轻巧！因为我从这种思想中看到的是到时候只有上帝才会告诉你的种种危险。哎，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结盟

呢？我们本应惺惺相惜。”

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拿破仑三世。他低下头，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缓缓抬起头，脸色看起来有点儿苍白，深情地盯着亚历山大二世。

“照您这么说，陛下，”他笑道，“难道我们没爱着彼此吗？”

亚历山大二世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拿破仑三世面前，抓起他的双手，把它们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这是在注定会把第二帝国推向万丈深渊的危机初现之际尚可由拿破仑三世选择的一刻[12]。然而，拿破仑三世却无动于衷，亲眼看着它从自己的指间溜走。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后，他把话题引向了无关自己身家性命的别处。

---

[1]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曾指挥普军参加过滑铁卢等多次重大战役。

[2]指法兰西第一帝国在第六、七次反法同盟战争中败北的事。普鲁士王国当时是反法同盟成员国之一。

[3]叙雷纳位于巴黎西郊。

[4]即叙雷纳-瓦勒里昂火车站。

[5]百人卫队是享有特权的皇家卫队，是拿破仑三世的护军。

[6]圣西尔位于巴黎郊外凡尔赛宫附近。

[7]即拿破仑一世。

[8]此处指拿破仑三世。

[9]指拿破仑一世。

[10]原文Basso Profundo，意大利语，尤指歌剧中独唱的深沉男低音歌手。

[11]安东尼·贝雷佐夫斯基（Antoni Berezowski，1847—1916），波兰

民族主义者。1867年6月6日在巴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后被法国政府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终身服苦役。

[12]拿破仑三世无意与亚历山大二世结盟，错过了大好的战略机遇。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没有遭到来自俄国的掣肘，大军悉数西调，成为打赢普法战争的重要因素。

第9章

戏剧化的自由主义改革

经历了1867年的喜庆与辉煌之后，第二帝国的政治风向悄然发生了变化，进入了一个与先前截然不同的时期——噩梦开始了。

过去几年中，纷至沓来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仿佛在肆虐的狂风中翻滚着涌向岸边的浪花，你追我赶，迫不及待地想亲吻一下日思夜想的大地，或者索性在岩石上撞个粉碎。过去那些年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非偶然的个案，一根无形的线把它们紧紧串在一起；我在前一章中提到的那些被遗忘了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再次出现在还未从俗世的诱惑中缓过神来的复仇幽灵面前，正恶狠狠地盯着它们。

自1867年以来，新旧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逐渐白热化，最终，新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被喜庆冲昏了头脑的人们哪有心思去关心这些！一篇篇讨伐帝国的政治檄文铺天盖地而来，立法团、参议院乱成了一锅粥，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每天都上演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辩论。保守派坚决要求严厉处罚那些大肆宣传反政府言论的始作俑者；帝国下达搜捕令，决心要挖出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乱臣贼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正在杜伊勒里宫上演！拿破仑三世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仁妮皇后是这场反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实际指挥者。在她的精心谋划下，事态正朝着有利于她的方向发展。初战告捷后，她伙同欧仁·鲁埃将瓦莱夫斯基伯爵赶

下了立法团议长的席位，改由欧仁·施耐德[1]先生接替。



瓦莱夫斯基伯爵（右八）与同僚

1867年还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那就是法国没有自愿放弃先前与荷兰达成的关于吞并卢森堡的协议，因为普鲁士此时已不再承认该协议的合法性。

这个消息给当时仍然沐浴在世界博览会余光中的第二帝国一记重重的耳光，全国上下顿时一片哗然。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被枪决的悲惨遭遇一时之间使杜伊勒里宫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克雷塔罗[2]的那位不幸之人的鲜血似乎飞越大洋，溅到了那些依旧徜徉在帝国歌舞升平中的人的脸上。在那一刻，笑容凝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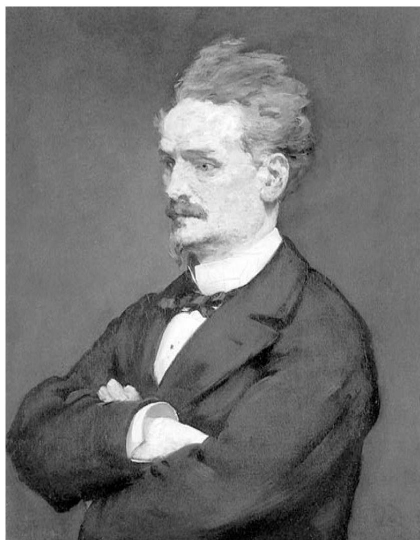
最终，在万炮飞向门塔纳[3]上空的那一刻，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纽带突然断裂，气急败坏的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二世接着就以“雷·加兰拉莫[4]”回敬拿破仑三世。这起祸端的始作俑者就是欧仁妮皇后。为了先发制人，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为了阻止意大利走向统一，她挑起了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事。

日月如梭，世事无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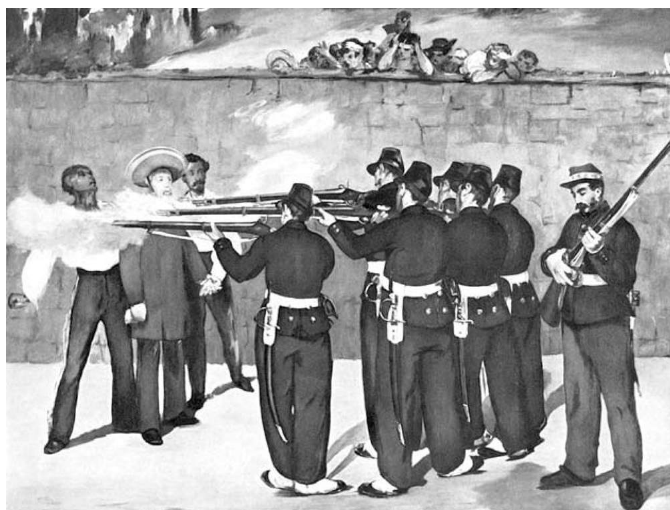
1868年点亮了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5]的“灯笼[6]”，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7]被从宝座上扔了下来。反对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举国上下一片混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无名小辈肆无忌惮地散布着反第二帝国言论，试图激起人们对第二帝国的仇恨。曾经不折不扣反对帝国的战士如今都倒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已使他们精疲力竭；年轻的战士接过老一辈手中的旗帜，踏着他们的步伐，以更昂扬的斗志投身于反对帝国的浪潮中。他们不仅言辞激烈，而且擅长煽动大众的情绪，从而有效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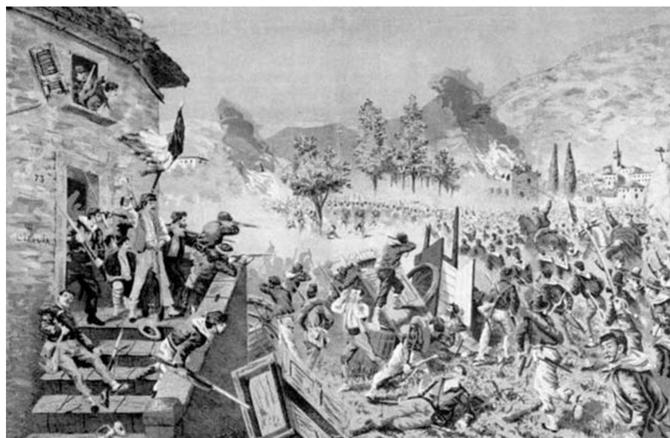
欧仁·施耐德



《灯笼周刊》的创始人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



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克雷塔罗被执行枪决



门塔纳之战。此战让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张

1869年，德高望重的亚森特教父[8]被罗马教皇逐出了教廷，此事在杜伊勒里宫甚至全法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种不祥的预感侵袭着每个人的心头。

形形色色的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反对的呼声和着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一次次考验着杜伊勒里宫的底线。不久，口水战升级为实战。来自郊区的叛逆者纷纷涌上巴黎街头。部分将士也临阵倒戈。形势极其严峻。

巴黎各主街区挤满了愤怒的人们。临危受命的士兵们端起手中冰冷的枪，将无情的子弹射向失去理智的暴民。

长久以来饱受压迫的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于是将仇恨的火焰喷向第二帝国。而在第二帝国崛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士兵不仅好战，而且好胜，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开杀戒。

军队离开了驻地，浩浩荡荡行走在巴黎街头。此时，巴黎仿佛是外国城市一般。每到一处，他们的喊杀声都震天动地，整齐的步伐让人不寒而栗。

驻守凡尔赛、圣克卢、圣莫尔、圣日耳曼的近卫军正焦急地等待

着命令。一旦命令下来，他们会像发怒的狮子，凶猛地扑向面前的猎物。

这仅仅是前兆。面对举国上下人们精神上所遭受的摧残，立法团、上议院没能当机立断，只停留在口水战上，于是非但没有及时解决问题，反而滋生了更多新问题，结果人人自危。

尽管如此，第二帝国在摇摇欲坠之际还是散发出一丝令人宽慰的余热。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典礼暂时平息了一度甚嚣尘上的混乱。拿破仑三世派欧仁妮皇后远赴东方出席开航典礼，他有理由相信这或许是命运刻意为他安排的。因此，他期待着一个美好明天的到来。

残酷的现实再次使拿破仑三世的黄粱美梦化为泡影。不过，深受宿命论毒害的拿破仑三世只是略带惊讶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感到恐惧。他曾经向往的自由主义在实现了其目的后并没有按照他当初的设想向前发展，但他还是心存幻想，一直把自己置于自由主义的理想王国里。他甚至没能静下心来想想：要是他不丧失先前所拥有的权力，皇位或许不会受到威胁。为了重拾梦寐以求的威严、重获理想中的权力，拿破仑三世只是默默关注着政坛的风云变幻，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把一切托付给自己追求的崇高事业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使命——按他的说法，没什么事能撼动他的使命，于是他就像置身事外的圣贤，不管世事如何发展，始终无所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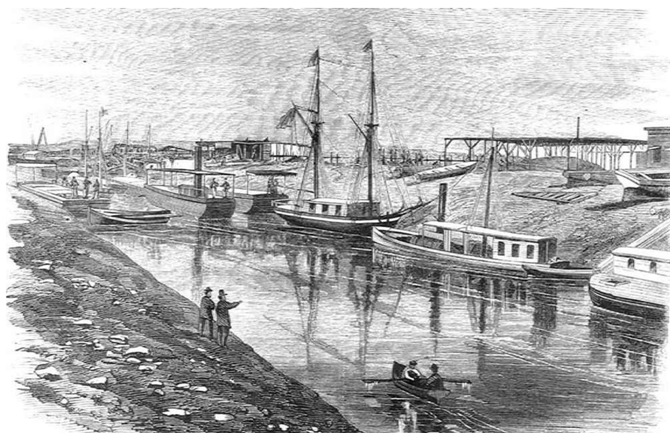
苏伊士运河开航典礼带来的喜庆与荣耀使他苍白的嘴唇增添了几分血色。第二帝国的光芒冲破层层乌云，拼命地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向法兰西大地。拿破仑三世兴奋得像个孩子。他连蹦带跳，高兴得合不拢嘴。当下的一切烦恼顿时成了过眼云烟。他不再想在反对派的持续、猛烈攻击下已经岌岌可危的皇位，也不再想悲悲戚戚的人生，因为无论你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信，最终归宿终是一抔黄土而已。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你又能奈它何！

拿破仑三世不仅自己心地善良，而且相信其他人都是善良的。在他当政期间，带着对拿破仑这个伟大姓氏的满满自信以及对别人毫无保留的善意，他一直坚定地认为臣民是爱戴他的，也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此，当那些他连名字都叫不上的人怒气冲冲地不断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先是一阵诧异，接着又若无其事地做起了美梦，从没想过这些人的诅咒会不会在臣民中间产生负面影响。他只是静静地、面带苦色地看着他们，任凭他们翻江倒海。他完全可以卸掉自由主义思想仁慈的包袱，挥舞手中的权杖有力地回击反对派的非难，还自己清白。然而，心地善良的他总觉得这样做不太人道，总觉得自己有愧于臣民，有愧于政府，没能使其如愿以偿。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就像多年前结束流放生涯第一次踏上法国大地时的心情一样，他觉得自己就是拿破仑一世，自己就是那个注定再现拿破仑一世传奇、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页的不二人选。苏伊士运河开航以及1870年全民公投的成功毫无疑问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此时他身体欠佳，整日忧心忡忡，但仍然满怀激情，打算挺直腰板大干一场。然而，无论是来自东方的赞美，还是国内尚存一息的欢呼，终究没能给他带来昔日身心上的辉煌。瞬间，曾助他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气势已顿然全无。他蹒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摇一晃地朝自己亲手编织的未来走去，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决斗者，索性扔掉手中的长剑，任凭命运发落。世事无常，人心叵测。伺机蜂拥而至的反对派将他一把扯下宝座，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对他拳脚相加。他就像不幸坠落巴黎街头、被来往的重型马车碾得面目全非的可怜受害者一样。

第二帝国的一切荣光已经成为历史。在第二帝国的光环曾经笼罩的大地上，命运之神正似哭似泣地哼唱着绝望的曲调。第二帝国末日的钟声已经响起。

本想着在铺天盖地的灾难扑向第二帝国大厦的那一刻，杜伊勒里宫的常客们会有所收敛，暂时藏起他们一贯丑陋的嘴脸；本想着在那些致命的危险侵蚀大厦的那一刻，宫廷权贵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抵

御眼前的劫难，但他们却没有这么做。这一时期经常出没于杜伊勒里宫的政客们不知何故，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帝国大厦正在咯吱作响，仿佛一夜之间变得耳不聪目不明了，更不用提凡夫俗子以及寄生于宫廷的无名小辈了，他们哪有什么职业的政治敏感去留意沸沸扬扬的民怨、关心异族对法国的仇恨呢？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

阴云笼罩着法国大地，大有一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架势。而第二帝国的“蛀虫们”仍然忙得不可开交，你撕我咬，疯狂地攫取属于自己的最后一杯美羹。他们才不管谁主沉浮呢！

尽管“五人团”微弱的反抗呼声没有对第二帝国造成多大危害，但它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到鼓励的反对者们纷纷站起身，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摆出一副不推翻第二帝国誓不罢休的姿态。立法团成了第二帝国支持者与反对者们殊死搏斗的前沿阵地，每天都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在反对者咄咄逼人的进攻下，杜伊勒里宫的权力与威信逐渐被吞噬了。

起初，杜伊勒里宫不把反对者的激烈言辞放在眼里，仅报以轻蔑的一笑。帝国大厦已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左摇右晃了，但政府还是不想正眼瞅瞅那些叛逆者，冷傲地认为他们只是一群小打小闹的乱臣贼

子，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有人曾提醒政府务必重视混乱的时局，但鬼迷心窍的政府却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沉浸在暖风熏人醉的畅想曲中。不仅如此，政府还刻意营造出一种太平盛世的欢乐场面，从而蒙蔽拿破仑三世的双眼，让他继续在自己的美梦中徜徉。正如我前面已提过的，宫廷中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他们仿佛被灌了迷魂汤一般，过着骄淫奢逸的糜烂生活，将自己最丑陋的一面毫不保留地展示给世人。

面对预示第二帝国气数已尽的种种兆头，第二帝国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既没有悲伤流泪，也没有恐慌万分。也许它还没有弄明白世间万物的轮回之道，竟傻乎乎地认为混乱的时局只不过是一场政治风波而已，没什么可担心的，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息。它从不会忘记以己之生存之道度人民之所想，甚至不惜把人民的怒吼看作乏味生活中的调味剂，而这和欧仁妮皇后的特殊口味不谋而合。自1869年立法团出现许多立志推翻第二帝国的新面孔以来，麻木的宫廷权贵竟荒唐地将他们当成了取乐的对象，不仅给他们每个人量身打造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漫画像，还阴阳怪气地学起他们演讲时的一举一动，就连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的《灯笼周刊》也成了宫中最受欢迎的读物。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欧仁妮皇后一边板着脸，一边一本正经地拿起《灯笼周刊》，一读就是半天。这样说或许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但欧仁妮皇后身边的人却是这么说的。



第二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倒塌的可能，而杜伊勒里宫里依然歌舞升平。图为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皇后在杜伊勒里宫举办晚宴的场景



19世纪60年代的欧仁妮皇后

1867、1868、1869连续三年的纵容硬是把第二帝国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我并非清心寡欲，也绝不仇视一切形式的享乐活动，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第二帝国的前途其实是被杜伊勒里宫的男女老少亲手葬送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逐渐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是他们把本来摇摆不定的爱国主义志士推向了对立面——这是敌国求之不得的，即使现在，敌国仍然希望第三共和国能重蹈第二帝国的覆辙，结果在第二帝国危在旦夕之际，没人愿意出来效力。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早已过惯了极度奢靡生活的宫廷权贵们显得那么脆弱，他们怎肯一下子接受从天堂坠入地狱的现实呢。然而，现实不会给他们选择的余地。他们就像那些享用完美餐、准备离开宴会时却意外发现自己身中剧毒的人，尽管强烈的意念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当众出丑，但无奈身体已不听意念的使唤，即使借着其他东西辅助，他们也是跌跌撞撞、东倒西歪的，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心地善良的人们多少还能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但大多是来嘲笑他们的，仿佛只为等这一刻

到来似的。

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已经名存实亡。曾经被命运之神百般眷顾的幸运儿突然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欢笑声戛然而止，顷刻间一切荡然无存。新起之秀踩着他们的伤口，一路欢呼着去迎接属于他们的明天。初露锋芒的年轻人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边欢呼着，一边义愤填膺地抱怨这个该死的腐朽社会蒙蔽自己太久了。焦渴的内心急切盼望着黑夜马上过去，从而早点儿看到黎明的曙光。

时光的指针悄悄地滑向了1870年，帝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改，一项新政策随即横空出世了——从理论上讲，在垂暮老人的血管中输入年轻人的新鲜血液可以起到神奇作用。然而，新政策非但没能使早已奄奄一息的第二帝国容光焕发，反倒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衰落。持续的混乱以巴黎各区为中心旋即扩散到全国各地，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乐观地认为第二帝国可以引领法国人民顺利抵达理想的彼岸。然而，头脑还清醒的人们却根本不抱希望。他们透过强装的笑颜，穿过挡在前面的云雾，早已看清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第二帝国的张张狰狞面孔。

这些狰狞的面孔——革命的风暴也好，战争的洗礼也罢——早已占据有利地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帝国病入膏肓那一刻的到来，并且不停地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而愚钝的第二帝国对此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二帝国的丧钟敲响的那一刹那，它们一拥而上，打算一下子置第二帝国于万劫不复之地。可怜的第二帝国只有坐等殒命了，因为它早已毫无还击之力。随着一声巨响，第二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霎时地动山摇。后来，据某些大胆的人回忆，当时他们鬼使神差般地回头看了看杜伊勒里宫，眼前的一幕至今仍让他们不寒而栗。在回头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感觉到有一股阴气迎面扑来。透过阴森的云雾，他们隐约看见一位身裹黑衣、披头散发的女人。对，她就是欧仁妮皇后。欧仁妮皇后正惊恐地在偌大的杜伊勒里宫中徘徊。据那些曾到过边界的人说，他们见过一个在边界上来回游荡的孤影，不用仔细

分辨，一眼就能看出那就是拿破仑三世。只见他低着头，看起来很痛苦。想想曾经神武的他，再看看眼前这个既渺小又让人心痛的孤影，不禁有此一问：他怎么就沦落到连沿街乞讨的乞丐都不如的境地了呢？

---

[1]欧仁·施耐德（Eugène Schneider，1805-1875），法国实业家、政治家，曾任立法团议长一职（1867—1870）。

[2]克雷塔罗是墨西哥克雷塔罗州首府。1867年5月11日，墨西哥拿破仑三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这里被枪决。

[3]门塔纳是意大利地名，位于罗马附近。1867年11月3日，法国与罗马教廷联军在门塔纳大败意大利加里波第志愿军，粉碎了志愿军进军罗马的战略计划。

[4]意大利海军的一艘战列舰。

[5]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Victor Henri Rochefort，1831—1913），法国政治家，《灯笼周刊》的创始人。

[6]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指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于1866年创办的、产生重要影响的《灯笼周刊》，也指灯笼。

[7]即伊莎贝拉二世（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在改革派的一片讨伐声中于1868年9月底逃亡法国，开始了她的流亡生涯。1870年6月15日在巴黎正式宣布退位。

[8]即亚森特·卢瓦松（Hyacinthe Loyson，1827—1912），法国著名的罗马天主教神父、神学家。1869年被开除教籍后，被迫离开罗马教廷。

第10章

1870年战争爆发：导火索与罪魁祸首

自从俾斯麦伯爵吞吞吐吐地道出1870年战争爆发的部分实情后，各种议论纷至沓来。人们都想知道那场战争到底缘何而起，究竟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在纷繁芜杂的各类说辞中，有一种说法表述更准确，可信度更高，我愿在此与读者共享。

一提起1870年战争爆发的原因，我相信有很多人想都不用想就会脱口说那场战争的罪魁祸首非当时气势汹汹的自由党中的某些权贵莫属。事实上，他们开始这么想的时候就犯了大忌，那就是凡事不能只看表象，要想弄清本质，不仅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细节，而且不能忽略滋生任何一个细节的外部环境。

把1870年战争的罪责归咎于自由党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理清脉络，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1870年普鲁士真的想和法国开战吗？让霍亨索伦家族[1]的利奥波德亲王[2]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提议真的是为了有意激怒我们、进而达到反目成仇的目的吗？

我会不假思索地说“绝对不是”。不管是先前的“卢森堡事件”，还是后来的“霍亨索伦事件”，普鲁士的初衷绝非为了诱导我们全面开战。纵观第二帝国史，尤其是末期那几年，不难发现我们的双眼始终被一种假象所蒙蔽，这种假象就是一直以来法国视自己为欧洲及其他国家眼中的强国。

受拿破仑三世对外政策的误导，舆情的矛头一直指向普鲁士，国人对普鲁士的信任危机空前膨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深受拿破仑三世民族统一思想启发的普鲁士却一心想着与第二帝国结盟，尽管它屡遭拿破仑三世的冷落，但本着包容、求真、务实的精神，直到战争爆发前夕，它始终没有放弃这一想法。这一点可以从普鲁士驻法国大使奥古斯特·冯·德·戈尔茨的所作所为中看出来。俾斯麦伯爵几度访问法国也可以作为证据。普鲁士打算与杜伊勒里宫共同主宰欧洲的构想在拿破仑三世的多次拒绝下最终化为泡影，于是不得不另做打算，以此来抚慰其受伤的心灵。尽管在法国人面前栽了个大跟头，但直到1870年导致战争爆发的那个事件发生后，普鲁士还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跳出来叫嚣与法国开战。谁会料想到一次外交风波竟会成为两国开战的借口呢？

尽管普鲁士对第二帝国虎视眈眈，但在推进民族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它有很多困难还得仰仗第二帝国的鼎力相助。因此，它对第二帝国的态度远比我们奥地利和意大利要温和。奥古斯特·冯·德·戈尔茨曾说：“当今的欧洲已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它急需新鲜血液的补充，否则必死无疑。就让旧欧洲随风而去吧，因为开创新局面的后来者已崭露头角。不妨原话转告拿破仑三世，他或许会回心转意，觉得我们之间还没到彻底决裂的地步。他或许会明白一个民族的崛起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从奥古斯特·冯·德·戈尔茨的话中不难看出，为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法国在普鲁士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相反，奥地利和意大利并没有成为普鲁士的外交首选。为了使我们的国家丑态百出，这两个国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使尽

浑身解数挖掘出了两个油头粉面、杀人不见血的所谓代表——梅特涅侯爵和科斯坦蒂诺·尼格拉，并派他们来第二帝国捣乱，只不过他们肩负的使命是不同的，他们的阴谋才没能得逞。



普鲁士王国驻法国大使奥古斯特·冯·德·戈尔茨

随着自由主义改革力度的加大，到1869、1870年时，自由主义者陆续占据了政府各部门的重要职位，拿破仑三世也趁机将他志在改革内政的想法公诸于世，并毫不避讳地向埃米勒·奥利维耶吐露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正当他踌躇满志之时，宫廷和议会中悄然兴起了一支可怕的力量。这支只忠于第二帝国、坚决反对一切新思想的力量就

是“皇后党”，之所以被冠以此名，是因为它只直接听命于欧仁妮皇后。

“皇后党”成员不仅身份特殊，而且实力雄厚，他们中既有经常出没于宫廷的常客、内侍，又有地位显赫的国民议会议员、上议院参议员等。其中最有权势的要数欧仁·鲁埃和亨利·谢弗罗[3]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扼杀拿破仑三世的自由主义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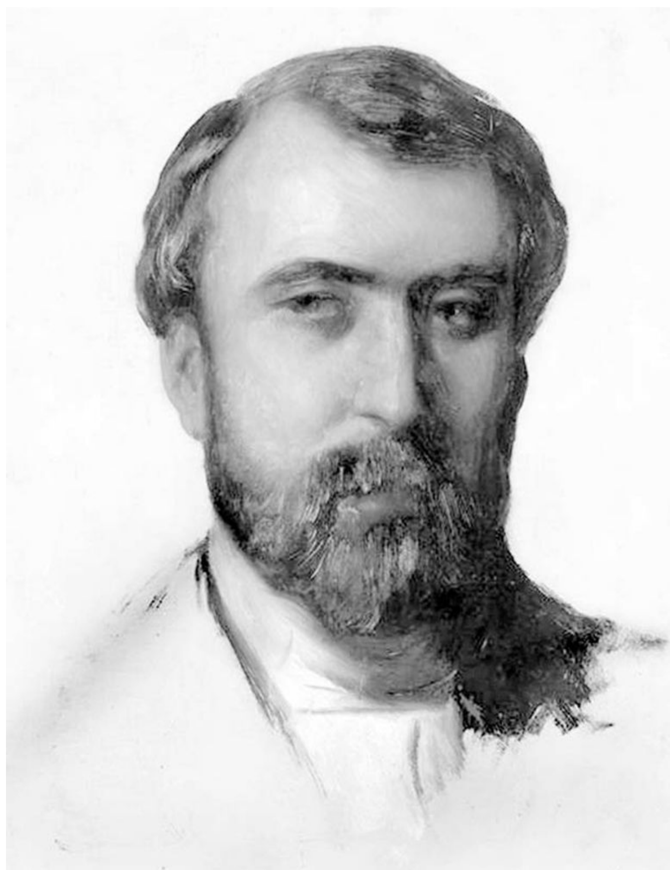
据说，1870年的全民公投就是这帮人有意而为之。看着日益倾向自由主义的拿破仑三世，他们心急如焚，于是就想通过控制民意帮拿破仑三世挽回人心。

也有人说1870年的全民公投实则是1月2日内阁一手操纵的，它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彰显新内阁的活力。为了摆脱第二帝国的束缚，内阁妄图趁其日薄西山之际，通过发动战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让民众彻底接受自己的合法性。然而，诸如此类的种种说法却根本没什么可信性。

公投结束后，不管是政界，还是唯欧仁妮皇后马首是瞻的宫廷，都没有显露任何想要挑起战事的迹象，更谈不上把哪个国家设为假想敌，煽动舆情，企图与其开战。1870年战争的导火索只是众多偶然事件的必然结果。要想弄清楚1870年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我们就得慢慢探究公投结束后的宫廷现状以及欧仁妮皇后圈子里接连发生的“怪事”。



科斯坦蒂诺·尼格拉



亨利·谢弗罗，第二帝国末期的实权人物

为了彻底摆脱被1月2日内阁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拿破仑三世又在酝酿一场政变。公投的成功或许使拿破仑三世更加坚定了决心，但不承想别有用心的人却抢先了一步。迫不及待的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也正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打算先控制1月2日内阁，必要时监禁各位大臣，以此来实现他们重建专制帝国的企图。

当有人拐弯抹角地告诉拿破仑三世“皇后党”的真正意图后，尽管此时拿破仑三世已身心俱疲，但还是立即进行了反击。一心想实现自由主义帝国宏伟蓝图的拿破仑三世给他热心的朋友当头一棒，及时打消了他们的邪恶念头。

然而，被泼了一头冷水的“皇后党”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仇恨的目光投向了拿破仑三世身边的亲信，盘算着如何堂而皇之地把他们赶出政府，如何让杜伊勒里宫中再现昔日的辉煌。

机会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霍亨索伦事件”发生了，喜极而泣的“皇后党”一边抹着兴奋的眼泪，一边欢呼“真是天赐良机！”他们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宫中的权贵们一边倒地倾向欧仁妮皇后，盲目地随着她拍手称赞，难以抑制的兴奋模样仿佛一个快要溺亡的人突然看见漂来的浮标一样，一齐奋不顾身地扑向这根救命稻草。他们失落的激情一下子被重新点燃了，心里想着如果他们的企图——专制帝国的复辟得逞，那么拿破仑三世重新回到他们身边是迟早的事。

欧仁妮皇后立即把欧仁·鲁埃及其他几位活跃在坚决阻止自由主义改革一线的重要人士召集起来。密谋后，他们决定定期召开会议，从而冲击拿破仑三世主导的官方会议。

从此，“皇后党”的非法集会逐渐成为常态。很快，众人皆知的“保证”问题被提上日程，“保证”的先决条件是法国决不向普鲁士妥协，绝不能姑息任何偏袒普鲁士的政策出现。

当埃米勒·奥利维耶满怀喜悦、激动不已地在议会上宣布他已说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撤回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的决议、最终与普鲁士达成谅解的好消息时，在座的“皇后党”成员无不惊愕。眼看到手的馅儿饼被顺势夺走了，他们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权力的天平再次倾斜，要知道这可是复辟专制帝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呀！要想重振帝国的雄风，只有选择战争了。形势刻不容缓，他们得马上找个借口让权力的天平再次倾向自己。借口已近在眼前，为何不拿“保证”问题说事呢！“皇后党”随即以“保证”问题向政府发难，疯狂地向各部大臣开火，以达到其目的，这无疑让本已对法国不

怀好意的俾斯麦伯爵抓住了把柄。

然而，不幸的是，“皇后党”经过强势攻击，在这次较量中占了上风。尽管埃米勒·奥利维耶做出很多试图让决策者回归理智的努力，尽管格拉蒙公爵安东尼·阿尔弗雷德·阿格诺[4]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述其中利害——其实，他已经很亲近“皇后党”了，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固执的欧仁妮皇后。面对志在必得的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先前秉承的不再为难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诉求，被迫同意法国驻柏林大使贝内代蒂伯爵再次与他交涉，逼他做出官方的“保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接到巴黎急电的贝内代蒂伯爵不顾舟车劳顿，随即风尘仆仆地赶往埃姆斯[5]，简单寒暄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向威廉一世道明了来意。正在散步的威廉一世先是一愣，然后不失礼节[6]地接受了法国政府的“保证”请求。



格拉蒙公爵安东尼·阿尔弗雷德·阿格诺

俾斯麦伯爵接着出场了。他擅作主张，篡改了拉齐维尔公爵[7]准备公开的关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对法国政府做出的书面承诺。于是，大战一触即发。

前面我已经提到欧仁妮皇后与欧仁·鲁埃频繁制造阴谋的目的就是要让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的温和政策胎死腹中。在“皇后党”集团的座上宾中，佩尔西尼公爵值得一提。尽管他也是专制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尽管一提起自由主义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我们决不能否认他

并不希望战争爆发。



19世纪**70**年代的俾斯麦伯爵

面对在1866年萨多瓦战役中大伤元气的普鲁士，佩尔西尼公爵当时就强烈建议拿破仑三世应果断采取措施，及时阻止德意志走向统一，否则统一的德意志将会是法国的强敌。1870年，法国面临的不利局面使他嗅到了浓浓的火药味。他整日忧心忡忡，深知指望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帮助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更糟糕的是，拿破仑三世正深陷无法自拔的政治困境。从零散的私人收藏及官方的相关文献来看，谁才是那场政治冲突的真正赢家，人们众说纷纭，各种说法之间悬殊之大令人大跌眼镜。

佩尔西尼公爵察觉到没人愿意把他的恳切建议当回事后，就借机脱离了“皇后党”，谢绝出席由皇后和欧仁·鲁埃主导的各种会议。接

着，他将眼下发生的一连串怪事告诉了拿破仑三世，提醒他务必警惕灾难的降临。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拿破仑三世不但身患重疾、与欧仁皇后关系闹僵，而且每天还要着手调和各派议员之间的尖锐矛盾。各派议员之间的尖锐矛盾牵动了法国所有人的神经，其恶劣影响在巴黎尤其明显。因此，他根本没有精力静下心来认真考虑佩尔西尼公爵向他反馈的那些事情，只是麻木地看着，任其肆虐发展。直到最后一刻，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一事仍持反对态度；但当他意识到“埃姆斯事件”拉响了法国与普鲁士两国之间的战争警报时，伤心欲绝的他再次把希望寄托于命运的安排。

由此可见，1870年战争完全是由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一手煽动起来的。“皇后党”积极制造这场灾难的目的再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彻底粉碎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二帝国，完全清除那些一心帮助拿破仑三世实现自由主义梦想的忠实追随者，进而实现他们复辟专制帝国、重新掌握绝对权力、再次过上骄淫奢逸生活的春秋美梦。

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身体状况已经变得极其糟糕，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要说欧仁妮皇后及宫廷上下对此一无所知的话，那不过是拙劣的托辞罢了。文献显示，当时考虑到拿破仑三世身体上的不便，政府决定让他继续留在圣克卢宫办公，以免给他增加额外负担。通过以上事实我们不难想象拿破仑三世当时面临的是怎样一种艰难处境！

事实胜于雄辩，1870年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欧仁妮皇后。据莫瑟尼将军后来回忆，欧仁妮皇后流亡佛罗伦萨期间曾亲口对他说法国本可以赢得那场战争，从而确保第二帝国屹立不倒，也可以使教皇的势力范围不受影响。

在令人揪心的罗马问题上，拿破仑三世再次败给了坚决维护教皇权威的欧仁妮皇后。这彻底激怒了维克多·埃马努埃尔二世，他扬言如果法国胆敢在他与教皇庇护九世之间作梗，就会不惜诉诸武力。

歪曲的政治导向或许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但历史自有其判断力，它不会因为恩恩怨怨、一己之利或所谓的仇恨而罔顾客观事实。历史总能以其特有的智慧与敏锐的判断力为每件事贴上恰当的标签，而人性的弱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逃脱罪责。于是，人们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掩人耳目、方便自己的目的。

不妨这么说吧，1870年时俾斯麦伯爵对我们深怀敌意这点不假，但让形势失控的却是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在他们不折不扣的叫嚣与煽动下，事态正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飞速发展。“霍亨索伦事件”的发生正中“皇后党”的下怀，他们以普鲁士羞辱法国为借口，一步步将法国推向战争的风口浪尖。

至于那份从埃姆斯发出的电报，俾斯麦伯爵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在电报中说了。自从电报公诸于世后，人们总觉得哪里好像有点儿问题；但被歪曲的事实蒙蔽双眼的百姓却把怒火洒向了1月2日内阁，纷纷指责它才是那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就这样，1月2日内阁不幸背上了挑起普法战争的黑锅。

至于经俾斯麦伯爵授权从埃姆斯发出的那份电报，我越想越觉得事有蹊跷。为解开疑团，我决定另辟蹊径，从媒体尚未公开的文献中找出真相。



19世纪70年代的拿破仑三世

应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要求，拉齐维尔公爵将法国大使贝内代蒂伯爵与威廉一世的谈话内容如实地拍电报告诉了他的上司俾斯麦伯爵。读完电报后，俾斯麦伯爵显得很失落，觉得他一手绘制的宏伟蓝图快毁于一旦了。然而，很快他就变得异常兴奋，满脸坏笑地告诉拉齐维尔公爵电报内容[8]应精简后再发出。就这样，电报内容被篡改了。更可恶的是，欧洲各国政府及报界都知悉了被篡改后的电报内容。

但问题是贝内代蒂伯爵在明知电报内容有误、被篡改后的电报意味着法普两国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默默接受议会说他在埃姆斯受辱呢？他为何不立即指出那是俾斯麦伯爵在背后使坏呢？

他为何不直接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首相、政府以及拿破仑三世，并公开宣布普鲁士的外交声明不合实情、威廉一世羞辱他一事子虚乌有、他未曾冒犯威廉一世的事实呢？

如果贝内代蒂伯爵当时这么做了，很多人或许会乐意一探究竟。他这么做或许会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但至少能使五万法国士兵免遭战死沙场的悲惨命运。在我看来，这样的结局或许关乎一个国家的颜面，但也算是将功赎罪吧。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贝内代蒂伯爵亲口将发生在埃姆斯的事情告知法国政府——与此恰好相反的是，埃米勒•奥利维耶一直坚持说他从未见过电报原文，那么法国上下甚至整个欧洲是怎么获悉俾斯麦伯爵的阴谋诡计的呢？如果不是贝内代蒂伯爵本人将充满挑衅的电报内容告知法国政府，法国政府会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情况下断然向普鲁士宣战吗？



19世纪70年代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在进行各种猜想的同时，我们不经意间漏掉了一个人。为了逃避战争的罪责，为了逃避良心的谴责，这个人极其巧妙地使自己置身事外。如果撇开老奸巨猾、擅长外交权术的俾斯麦伯爵如何戏耍了他的

主子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事不说，俾斯麦伯爵的对手真的就那么不尽职责、甘愿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吗？

在俾斯麦伯爵的对手中，我认为只有一个人最清楚这场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什么。他深知一旦交战，第二帝国将面临怎样的处境，尽管他或许对篡改电报一事一无所知。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三世。

挂帅出征之际，拿破仑三世在写给勒皮克将军的信中说：“谁知道我们能否再见上一面呢？”

当时只有他有能力力挽狂澜，能使我们的国家免遭灾难。但不幸的是，1870年时的拿破仑三世只剩下一副空壳了，他的灵魂早已被阉割。

我之所以敢从全然不同的角度对导致1870年战争爆发的原因作出以上陈述，是因为我手头有那段时期与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接触甚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资料。为了证实那些资料的真实性，我还专门向A先生求证过。A先生算起来还是我的亲戚，曾是拿破仑三世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不久前，他刚刚离世。几年前，我在议会中碰到过他，那时他还是一名资深议员。我还在H伯爵夫人—1871年巴黎沦陷期间一位扮演重要角色的将军之女——的私人沙龙以及我的姑母D伯爵夫人的家中多次见过他。

对于1870年战争的前因后果，我想我手中的这些资料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考虑到本章主题，我不便在此一一罗列这些文献了。但我觉得有必要让读者一睹曾是外交官的V伯爵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尽管这个视角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还是值得探究——来揭露那场战争的起因。

在V伯爵看来，1870年战争完全是帝国利益的需要。战争爆发前夕，立法团中兴起了一股要求废除奥尔良王朝诸亲王流放令的呼声。他随即得出以下结论：这场战争就是波拿巴主义者和杜伊勒里宫的常

客们因担心诸亲王的回归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蓄意挑起的。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清除奥尔良派余孽，因为一旦他们得势的话，在目前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第二帝国将会面临致命的威胁。

V伯爵的这番言论听起来十分古怪。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然而，他的论点再次佐证了我先前坚持的观点，即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真正担心的是遍布政府各部门的自由主义者，而不是打着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名号谋求政治利益的人。我有理由相信，如果能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来重现专制主义帝国昔日的辉煌，那么皇后及其党羽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它成为现实，因为他们不会傻到靠另外一个王朝的垂怜来实现自己的帝王美梦。

撇开信中的观点不说，V伯爵的这封信还是值得一提的。我公开此信的目的就是想让历史学家和大众看到它，从而赢得他们对我开战原因的观点的认可。

V伯爵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 我拜读了您撰写的关于杜伊勒里宫宫廷秘事及帝国统治末期的多部著作。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您在相关著作中并没有把导致帝国终结于色当战役的真正原因公诸于世。
>
> 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我觉得有必要让您了解1870年7月2日那天议会中的真实情形。当有议员提出政府应废除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流放令时，会场气氛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议员们七嘴八舌，仿佛那天的会议就只为解决一件事情，那就是废除流放令、欢迎诸亲王的回归。
>
> 帝国最有可能遭受的最大打击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一场革命，一场由曾经统治过法国、让法国人恋恋不忘的某

一王朝、王室家族所发起的革命。一提到奥尔良王朝，议员们瞬间变得激动不已，仿佛忘记了目前还是第二帝国时代。长期积压的种种不满顿时如洪水猛兽般冲向帝国。议员们一边诅咒着该死的帝国，一边高呼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名字。这就是1870年7月2日那天议会中的真实情形。

自1852年蒙塔朗贝尔在议会中发表演讲时提到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名字以来，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再也没人在帝国提起过。当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名字如茹维尔、奥马尔、蒙庞西耶等突然再次在立法团被提及时，那些曾经效忠于七月王朝、最后迫不得已屈服于拿破仑三世的议员再也抑制不住他们的真情实感了，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声呼喊起诸亲王的名字来。想想那些议员的过往，他们委身第二帝国也实属无奈，如果他们在最后一刻不选择倒向拿破仑三世，谁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我是7月2日那天会议的与会者之一。我的座位在外交使团区，因为当时我的身份是外交官。大厅里挤满了人，看样子像是有重要的事情将在大会上宣布。

刚到波旁宫，我就遇上了参议员H男爵。

我对他说："今天的会议，很可能是激动人心的，您有没有觉得？"

他不屑一顾地回答道："呸！年轻的埃斯唐瑟兰当众引燃事先准备好的爆竹，不明就里的埃米勒·奥利维耶将踩个正着，会闹出些动静的。"

然而，会议并没有像H男爵预言的那样发展。没错，废除奥尔良王朝诸亲王流放令的倡议是那位被称为"年轻的埃斯唐瑟兰"的议员发出的，但奇怪的是，他的倡议却没有遭

到任何一位与会者的反对。“年轻的埃斯唐瑟兰”曾是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朋友，他的倡议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阿方斯·德·拉马丁[9]曾说过的一句话：“唯一能触动法国人心弦的并非喋喋不休的至理名言，而是发自内心的狂热。”他使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年轻流放者获得了重生，并在议会中毫无畏惧地将他们的回归问题提上了日程。

前奥尔良主义者顿时陷入了甜蜜的回忆中，一幕幕绝美的画卷在他们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着。他们想起了护送拿破仑一世遗体的队伍在海军将领茹维尔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巴黎时，人们激动不已的情景，也想起了被非洲炙热的太阳烤得焦黑的奥马尔公爵率领的兵团穿过巴黎街头，途径文森[10]，最后到达内伊[11]时，一路被兴奋的人群夹道欢迎的生动场面，更想起了奥马尔公爵命悬一线时人们焦躁不安的情形。

当时任议会财务主管的老将军勒布勒东扯开嗓门，以盛气凌人的语气回应了埃斯唐瑟兰的请求，我顿时觉得那是来自法国军方的强硬声音。我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

勒布勒东说道：“没错，我在走投无路时被迫投靠了拿破仑三世政府，但我也曾在奥马尔公爵的非洲兵团中服过役。我无时无刻不欣赏他的军事才华。如果能让我国最优秀、最伟大的居民重回故土，我何乐而不为呢？”



阿方斯·德·拉马丁

一个议员在勒布勒东将军讲完后说道：“他的话说到我们的心坎儿上去了，奥马尔公爵是不可多得的名将。”

阿方斯•埃斯基罗斯[12]、朱尔·法夫尔以及皮纳尔从法律的角度对废除诸亲王流放令的请求予以支持。就连波拿巴主义激进派的皮雷老侯爵也随声附和起来。

一贯爱憎分明的埃米勒•德•凯拉特里[13]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地对各部大臣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

当同属反对派阵营的朱尔·格雷维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言论“我既不想随波逐流，也不想同室操戈”之后，受到了左翼同僚的猛烈围攻，尽管他也毫不犹豫地攻击了各部大臣。

就在一瞬间，政府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而它的敌人显然是有备而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推翻第二帝国，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更让政府痛心的是，它的朋友也在反政府的革命风暴中临阵倒戈，无情地抛弃了它。那天的会议场面的确是这样的。曾任瑞士外交部长的某先生——当时他就坐在我的后面——不无惊讶地感慨道：“在这个所谓的波拿巴派议会中，除了奥尔良主义者好像并无他人。”

这位外交官如实地道出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声。

在离开议会之际，我上前拥抱了一下G公爵夫人。

她对我说道：“啊，亲爱的伯爵，我们今天出席的会议根本就不是关于什么政治决策的，而是关乎改朝换代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议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它的后果肯定严重。”



朱尔·格雷维

我回答道："我与您有同感，帝国的统治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1870年7月2日议会中的情形明确了这一点。

迫不及待的内政大臣舍旺迪耶·德·瓦尔德罗姆[14]在第二天，即7月3日——那天正好是礼拜天——就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对此，埃米勒·德·吉尔丹先生可以作证。在他去世前几

个月，他曾给我提起过此事。

7月2日傍晚，舍旺迪耶·德·瓦尔德罗姆邀请埃米勒·德·吉尔丹一起用餐。餐后他们准备离开之际，舍旺迪耶·德·瓦尔德罗姆问道："你听说那个消息了吗？由霍亨索伦家族某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事已确凿无疑。"

埃米勒·德·吉尔丹疑惑不解地问道："此事与我们何干呢？"

舍旺迪耶·德·瓦尔德罗姆反问道："何干？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对法国释放的一个危险信号吗，会威胁到法国的利益吗？我们决不能让霍亨索伦家族的任何亲王去染指西班牙的王位。我们可以借此发动一场战争。"

"如果非要这么做的话，那将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此言差矣！我命令你明天立即撰文，公开发表这么做的必要性。"

"没门！"

尽管埃米勒·德·吉尔丹当时抛出了拒绝的"豪言壮语"，但文章还是如期发表了。然而，埃米勒·德·吉尔丹从未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

就在同一天，即7月3日，胡安·普里姆[15]在马德里收到了一封法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关于法国政府强烈抗议霍亨索伦家族某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一事的。

据我的一位朋友回忆，胡安·普里姆收到电报时，他正好也在。他说普里姆读完电报后立即将它揉成了一团，气冲冲地摔在办公桌上。

他吼道："这个要求有点儿太过分了，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与杜伊勒里宫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通过以上我所说的话，您已经看清1870年战争爆发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了吧？

为了使复辟奥尔良王朝的计划不被暴露，为了出其不意地给帝国以致命的一击，没有比霍亨索伦事件更堂而皇之的借口了。战争只不过是这些事件的必然产物罢了。

试想一下，杜伊勒里宫真的就那么想把事态推到不可挽回的局面吗？它真的有必要四面树敌吗？我不这样认为。至少在那些错综复杂的事件浮出水面之际我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一旦这些事件被心怀叵测的人利用，情况就大不同了。一旦某一王朝政府气数已尽，宫廷上下不再听命于某一君主，即使政府首脑想有所作为，也于事无补了。



埃米勒·德·吉尔丹



西班牙著名政治家胡安·普里姆

以上就是V伯爵写给我的信，信中的内容值得深思。

就V伯爵在信中的陈述而言，它清晰、准确、无可挑剔，但我对他的某些观点却不太赞同。然而，换个角度来讲，V伯爵在信中的描述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测——拿破仑三世只是不幸陷入了早已为他设好的陷阱，只不过充当了行使政府首脑最高权力的角色，从而能顺理成章地向普鲁士宣战了。

尽管曾一夜之间团结起来的前奥尔良主义者强烈要求推翻第二帝

国、复辟七月王朝，但实际情况却是，直到1870年，路易·菲利普国王的儿子们还不具备动摇第二帝国根基的实力。被拿破仑三世提拔的自由主义者纷纷涌进了政府各职能部门，并开始占据要害职位，这引起了“皇后党”的极端恐惧。我想这也是我为何敢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历史有足够准确的证据说明皇后及其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针对1月2日内阁的——的原因所在了。

既然奥尔良王朝诸亲王的问题已不再是问题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解释得通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V伯爵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预谋、发动1870年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已经任由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摆布的杜伊勒里宫想借人事变动之名拔掉政府中的眼中钉，安插他们的心腹，以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说白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仍旧貌美如花、贪恋权力的欧仁妮皇后替代已经年迈体弱的拿破仑三世。

“霍亨索伦事件”发生后，欧仁妮皇后一方面通过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与支持者们紧锣密鼓地将法国与普鲁士推向战争的边缘，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的种种压力与挑战，她时常紧绷神经，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要是有谁不幸撞到枪口上，那是注定要倒霉的。

此时，欧仁妮皇后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情用事了，这使她很难被人理解。有时，她会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目光凝重，神情严肃，没有人会猜到她此刻在想些什么。有时，她会不停地胡言乱语，仿佛持续的高烧一直在折磨她，至于她说了些什么，我想只有上帝才知道。每当摊上喜事时，她就会上演一场生动的感情戏，一会儿激动得泪流满面，一会儿又连连发出怀疑的惊叹，只要能恰当表达她此时的真情实感，她恨不得一下子都尝个遍。这还不算，每当她的情感这般“发作”时，她还蛮横地要求在场的每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附和她的行为。

欧仁妮皇后的这种情感倾向在她的党羽面前显得尤其明显。她的

情感“发作”时也是她最忠实的追随者最受折磨的时候。

在大多数情况下，欧仁妮皇后闹闹情绪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无非是想刷刷存在感，耍耍小女人的脾气而已。然而，有一次她却是相当认真的，那是在关乎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决策的会议上，面对她歇斯底里的发作，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恐惧。后来，欧仁妮皇后的一个死党将这件发生在圣克卢宫的事告诉了我，再次坐实了我为撰写本章内容而引用的文献中的观点。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还原一下它的真面貌。

众所周知，要不是自由派在立法团周旋、坚持要求内阁公开往来的外交信件——政府可以据此正式宣战——从而延迟了巴黎与柏林之间的决裂，持续发酵的“霍亨索伦事件”早就把法国与普鲁士推到了战争的风口浪尖上了。

历史证明，法普两国之间敌意的缓和完全不符合欧仁妮皇后及其党羽的利益。“皇后党”在为上天赐予他们的大好机会喜出望外时，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对自由派的极端不满。面对欧仁妮皇后的所作所为，她的几个朋友虽然明面上仍毕恭毕敬，但私下无不担心事态的急剧恶化。如果他们当时都能穷其智慧，客观、冷静地面对这桩众人一边倒的外交事件，或许事态不会发展到那般恶劣的地步。

一天下午，正当欧仁妮皇后及其亲信再次谈及棘手的问题时，其中一位亲信，某伯爵，一改以往可怜巴巴的样子，终于在良心的谴责下对皇后说了一声“不”。当时，欧仁妮皇后就像着了魔一般，只要有议员胆敢反对发动战争，就肯定会遭到她劈头盖脸的一阵疯狂攻击。这还不止，每当她的攻击告一段落时，她总不忘了停下来看看有没有人为她鼓掌喝彩。当她发表完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后，现场顿时静悄悄一片。但没过多久，某伯爵就打破了寂静，大胆地对欧仁妮皇后的言论作了以下答复。

> 您刚才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即便普鲁士在某种程度上羞辱了法国，但如果阿道夫·梯也尔和他的朋友们就此怂恿皇帝打着政治报复和党派权益的旗号断然向普鲁士宣战，那他们才是真正该遭唾弃的小人。因此，对那些到目前为止还在竭力阻止威廉一世与皇帝走向决裂的人所做的努力，我们应给予肯定。在他们的努力下，如果——当然前提是不能损毁法国的形象——巴黎和柏林能够冰释前嫌、握手言和，我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政府和国家——届时，我会毕恭毕敬地汇报我所观察到的一切——将会因他们曾经的反对而感激涕零。

某伯爵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突如其来的言论着实让欧仁妮皇后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但没过多久，她就回过神来，颤抖着突然转向刚才说话的某伯爵，厉声喊道："什么！那些话是你说的吗？你现在也替左派说话，是吗？啊，如果我的朋友都抛弃我，转身投靠自由派，那我该怎么办？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实则图谋一己之利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只是一帮胆小鬼罢了。他们干预战争是假，实则是为了打乱杜伊勒里宫的计划，以此来增加谈判的筹码。只要杜伊勒里宫做出一点点让步，他们就会变本加厉，逼它就范。难道你还没看出那些一天到晚不停叫嚣的人都是些骗子吗？他们上窜下跳的唯一目的还不是为了招致我们的反感、憎恨？说白了，他们憎恨的人是我，不是其他人；他们想要报复的人是我，而不是皇帝。他们或许永远也不会跻身于立法团，虽然我的计划不幸没能实现，却就此与他们结下了仇怨。他们是不会原谅我的。他们憎恨我，但我绝不会让他们拿我当软柿子捏。"



阿道夫·梯也尔

她一口气说完以上这番话，停顿了片刻。但与往常不同的是，那天既没有人为她鼓掌，也没有人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她缓了口气后又开始了长篇大论。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竟愚蠢到相信他们的鬼话、同意向普鲁士妥协呢？当战争结束、我军班师回朝后，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恬不知耻地对我们说东道西了！还敢不敢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了！我就在那里等着他们，届时我会跟他们好好算算这笔账的，如果他们敢接招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美德正走向消失的边缘；是的，一切美德。好端端的一个政府现在已经被闹腾得鸡犬不

宁，神圣的权威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更别提什么信仰、爱国情怀了，取而代之的竟是那些鬼才知道的所谓的自由与叛逆。是时候力挽狂澜了。”

她突然转向那些竖着耳朵听她发泄不满的人，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便开始哭哭啼啼地央求起来，并迫切希望他们能立即给出明确的答复，就像一个被吊足了胃口但不能马上得到心仪的东西的小孩子。

“你们肯定会助我一臂之力，”她接着说道，“肯定会帮皇帝重新掌握已被蚕食的权力，是不是？你们肯定会陪我一起渡过难关，是不是？请告诉我你们一定会帮助我！我离不开你们。”

气急败坏而精疲力竭的欧仁妮皇后最后竟紧握着拳头抽泣起来。她下意识地胡乱抓弄着裙子，手指一张一合的，仿佛痉挛了似的。慢慢地，她消停了下来。她一动不动，就像昏厥了似的。

在场的朋友们见状随即忙作一团，有人干脆迁就了她的恳求，有人则大献殷勤，尽说好话给她听，而之前激怒了皇后的某伯爵则既失望又难过地摇着头，无趣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霍亨索伦事件”发生之后，宫廷上下一片慌乱，恐惧侵袭着每个人的心头。在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的那一刻，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然而，有一个人除外，她就是欧仁妮皇后。此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蛮横、更无理，而且她的一举一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煽动性。自从她的所作所为勾起了人们对已逝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后，人们不再彷徨，不再举棋不定，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皇后对立面，因为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一个本来就属于他们、能给他们带来无尽欢声笑语的未来。

面对前所未有的躁动与不安，人们一开始就昏昏然不知所措。大街上一片混乱，空气中弥漫着无尽的嘈杂声，即使深居皇宫大院，也能感觉到异常紧张的气氛。必须想办法恢复正常秩序。这些异常的情

况打破了杜伊勒里宫的宁静，它们得为此付出代价。然而，战争的号角声如同一道刺眼的光，照亮了处于迷糊状态的杜伊勒里宫。他们终于肯暂时搁置各自心中的小算盘，重新显现出他们自然、本真的一面了，这才是值得人们肃然起敬的样子。

当近卫军军乐团赫然在圣克卢宫外演奏起激昂澎湃的《马赛曲》时，人们虽然知道这是拿破仑三世授意的，但无不充满恐惧。有人不惜冒犯天威公然指责拿破仑三世的荒唐行为，因为这首曲子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血腥的大革命。但拿破仑三世这次铁了心。看着他们卑躬屈膝的样子，他很知足。

对于当时官方为何突然许可演奏《马赛曲》一事，拿破仑三世说过的几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据拿破仑三世的一位御前大臣回忆，当皇帝告诉他想听听鲁热·德·利尔[16]的曲子，并想让大众一起来听听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拿破仑三世对他说道：“现在，对于一切非法国的东西，我们都应毫不留情地说‘不’。对于一切压制我们血液沸腾的不利因素，我们都应毫不客气地清除。权且不论当下是否适宜解禁《马赛曲》，但我相信它肯定会唤起人们的激情。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人们怎么演奏它我都可以接受。”

拿破仑三世补充道：“如果旧保皇主义者的战斗口号——‘蒙茹瓦，圣德尼[17]’能为法国赢得胜利，我情愿让我的将士们呐喊。法兰西民族有时真的令人难以捉摸。”

自拿破仑三世亲临莱茵兵团部署作战计划以来，宫廷中的生活依然如故，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大臣们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享受着小日子，一边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欧仁妮皇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神清气爽。我们能够想象到她多么开心，因为她现在终于可

以毫无阻碍地美美体验一番高高在上的感觉了。看！她现在摆出的完全是一副皇帝的姿态嘛！你看她多么雍容华贵，多么威风凛凛啊！相比热闹的宫廷而言，边界上一直没有动静，人们甚至都忘了那里正在发生的事。然而，当她听到法军残兵败将的阵阵哀号声，看到阿尔萨斯战场上相互厮杀的震撼场面时，内心的剧痛使她发出了声声哀号。她之所以哀号，不为别的，只为感叹作为一名女性的不幸与悲哀。欧仁妮皇后开始犹豫了。

她深知一切不会从头再来了。曾经令她如痴如醉的美好生活将来也不会再有。她深知她的希望已经破灭，仇恨也好，感情也罢，一切都该画上句号了。她也深知帝国的坍塌必会使她粉身碎骨。她痛苦地挣扎着，她不能就此销声匿迹，毕竟她还得撑起这片天；她抖掉满身的晦气，坚强地走出悲痛的阴影。女性特有的敏感以及陷于困境时的本能反应使她不得不舍弃小我，重拾皇后的尊严，再次威严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鲁热·德·利尔正在创作《马赛曲》



发生在阿尔萨斯一个村庄的战斗

由她主持的各种会议接踵而至。会议的主题已不再是那些狭隘的政治把戏了。她仿佛一夜之间忘记了所有的痛苦，摒弃了所有的政治纷争。她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在她的带领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程度地减少战争对法国造成的伤害，使它尽快恢复元气，尽早找回昔日的快乐。如果仅凭一时的高尚与大度能赎一个穷其一生沉迷于糜烂生活、自私自利的人的罪过，历史肯定会第一时间向在法兰西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做出卓越贡献的欧仁妮皇后致敬；历史也会毫不迟疑地向虽身心备受煎熬，但仍以至高无上的尊严坚决捍卫法国利益的形单影只的欧仁妮皇后投以赞许的目光。

[1]德意志的主要统治家族。

[2]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堂兄。

[3]亨利•谢弗罗（Henri Chevreau，1823—1903），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法国荣誉军团高级军官之一，曾任第二帝国内政大臣一职。

[4]安东尼·阿尔弗雷德·阿格诺（Antoine Alfred Agénor，1819—1880），第十代格拉蒙公爵，法国外交家、政治家。

[5]埃姆斯位于德国科布伦茨东郊，因温泉疗养胜地而闻名于世。

[6]与普鲁士国王在埃姆斯的会面情景是贝内代蒂伯爵亲口告诉欧仁·巴赞先生的。欧仁·巴赞先生是贝内代蒂伯爵的挚友，也是我的挚友，当时他住在凡尔赛，他说贝内代蒂伯爵就是这么对他说的。——原注

[7]拉齐维尔公爵（1809—1873），荷兰贵族，普鲁士军官、政治家。

[8]埃姆斯电文要害部分的原件内容为："贝内代蒂在散步时与我相遇，要求我永远拒绝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在西班牙即位……我予以拒绝，因为不需要也不可能永远承担此种义务。"陛下告诉贝内代蒂伯爵，他在等候安托万亲王的消息……他决定不再接见贝内代蒂伯爵，并通过副官转达，现在无法告诉他更多的消息。"要害部分被篡改后的内容为："大使要求永远拒绝。国王不愿再次接见大使，令值日副官转达，更多消息无可奉告。"——原注

[9]阿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作家、诗人、政治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

[10]文森是法国法兰西大区所辖的瓦勒德马恩省的一个市镇。

[11]内伊是法国法兰西大区所辖的上塞纳省的一个市镇。

[12]阿方斯·埃斯基罗斯（Alphonse Esquiros，1812—1876），法国作家。1850年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身份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851年因反对第二帝国被流放，1869年重新当选立法议会议员。

[13]埃米勒·德·凯拉特里（Émile de Kératry，1832—1904），法国政治家、军人、作家，1870年普法战争的支持者之一。

[14]即让-皮埃尔·拿破仑·欧仁·舍旺迪耶·德·瓦尔德罗姆，1870年1月2日至1870年8月18日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内政部长。

[15]胡安·普里姆（Juan Prim，1814—1870），西班牙军事领袖和政要，在废黜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政变中起过重大作用。1869年，他成为元帅后主政西班牙新政府。

[16]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1760—1836），法国军官，法国国歌《马赛曲》的词曲作者。

[17]“蒙茹瓦，圣德尼”是中世纪法兰西军人惯用的战斗口号，据说源自查理曼大帝时代，其意义并不明确。

第11章

色当会战与拿破仑三世投降

抵达色当[1]后，拿破仑三世随即组建了战地指挥部。1870年8月31日傍晚，穆宗[2]战役的失利让他感到不安。但当他获悉法国军队正在有序地向色当集结，一场会战即将打响时，他的眼睛中露了出些许期望。

然而，8月31日傍晚突然占据他心灵的恐惧却一直在萦绕。在房间里，他焦急地踱来踱去，不停地要求随身副官向他汇报各军团的作战计划，以及各军团目前的战备与士气等情况。阴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房间，死一般寂静。拿破仑三世时不时若有所思地停下脚步，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迈起双腿，再次飞快地来回走动起来，只见他面带土色，嘴角不停地抽搐着，颤抖的双唇不时地冒出几句让人愁肠寸断的话来。

拿破仑三世的身边围满了将军、勤务兵以及侍从武官，但没有文职人员。因此，对拿破仑三世随身携带“小朝廷”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的。跟随拿破仑三世的两名军需官是他特意从波拿巴家族军人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拿破仑三世向他们许诺，全程参加这场战争的后勤保障

工作的酬金是每人一万法郎。

8月31日傍晚陪伴拿破仑三世的就是以上提到的这些人。因无法接过拿破仑三世的话茬，他们只能随声附和。不知不觉已至深夜，拿破仑三世及随行人员打算小憩一会儿。就在这时，拿破仑三世费了好大力气，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势已去，”他说，“我们已经无力回天。”

自从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吃败仗以来，他一直坚持，并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法军应撤退到后方阵地，然后就能集中优势兵力与普军对决了。他还呼吁巴黎的亲信能够冲破重重阻挠，起用一批波拿巴派将领。当麦克马洪元帅紧锣密鼓地重新完成军团集结时，拿破仑三世颇有城府地喊出了军队回撤巴黎的口号。然而，那个任由欧仁妮皇后摆布、身不由己的大臣[3]却再三央求拿破仑三世收回成命，取消撤退的计划。欧仁·鲁埃也百般劝说拿破仑三世只有东进才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可怜的君主仿佛瞬间沦为别人争相控制的玩偶，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从他的建议，军队平常的“小小”调动权也被剥夺了。这倒罢了，他还要忍受各种无端的指责。他现在仅存的一点儿安慰就是身边那些曾与自己共患难的士兵，他的荣辱成败再次与他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他甚至感叹道，士兵们的胜利就是他的胜利，他们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带着这种特权——这种说法，唉，在这种情况下描述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与他的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再恰当不过了——拿破仑三世来到了色当。然而，眼前恐怖的一幕却吓了他一大跳。

“大势已去，”他喃喃自语道，“我们已无力回天。”

他懊悔当初没把军队从前线撤下来，但懊悔又有什么用呢！他绝望了。

阴沉的气氛再次笼罩着拿破仑三世及随行人员。随行人员个个耷拉着脑袋，一个字也没说。拿破仑三世深知他们的心情，没有像往常

一样要求他们发表意见或作出解释，就打发他们回各自的房间歇息。军官们离开之际，他习惯性地向他们道了一声别，就像过去常常在杜伊勒里宫向朋友们道别时的情景一样。

他说道：“再见了，先生们，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房间里只剩他一个人了，但他却毫无睡意。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直到筋疲力尽，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心乱如麻，伤心欲绝。那晚，拿破仑三世上床睡觉时竟连衣服都没脱。然而，即便躺在床上，他能睡得着吗？据拿破仑三世的一名贴身侍卫回忆，那晚他一夜未眠，只听见他不停地翻着身，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那时，拿破仑三世的肾病极其严重，偶尔隐约听见他好像念叨着什么，有时还听见房间里突然发出“砰”的声音，或许是他摔倒在地上了吧。

第二天凌晨三时半拿破仑三世就起了床，匆匆洗漱了一下，然后就差人去叫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近卫队百人团中的菲耶龙上尉。他打扮得整整齐齐，饶有兴趣地像往常一样给胡须打上了蜡。

8月31日，法军与巴伐利亚军[4]在巴泽耶[5]遭遇，拉开了色当会战的序幕。

大约凌晨四时，刚刚盥洗完毕的拿破仑三世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了一跳。他赶紧差人一探究竟，结果得知巴伐利亚军进攻巴泽耶了。当时，防守巴泽耶的是瓦苏瓦涅将军麾下的一个军，该军原本打算前去支援勒布伦将军指挥的第十一军的海军陆战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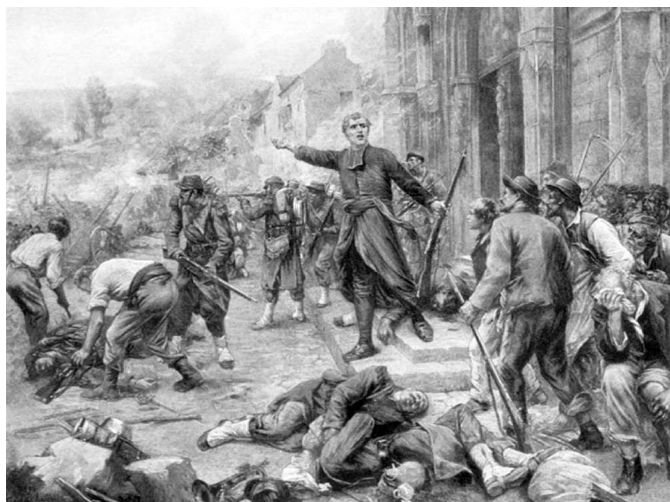
获悉实情后，拿破仑三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等军官们都到齐后，他们一起朝各自的坐骑走去。



法军与巴伐利亚军在巴泽耶遭遇



法军依托巴泽耶的民居与巴伐利亚军周旋



巴泽耶之战，一名法国军官在鼓励士兵与巴伐利亚军战斗

此时，细心的随行人员发现，在上马之前拿破仑三世愣了好一阵子，然后铆足了劲儿好不容易才骑到马背上，他整理马鞍时的痛苦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然而，就在那一刹间，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见他手握缰绳，再次优雅、庄重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东方还未泛白，色当及其周边地区都被茫茫的浓雾笼罩着。1870年9月1日凌晨，拿破仑三世及随行军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前往战场的。

当他们一步步靠近巴泽耶时，双方的交火声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愤怒的炮弹尖叫着穿过层层浓雾，将仇恨的火焰喷向对方的阵地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覆盖了每个人的心头。炮火连绵，回声悠悠。

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拿破仑三世和军官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默默地一步步朝前走去。然而，没过多久，天就亮了。在晨曦的照耀下，浓雾渐渐散去了，眼前的一切顿时清晰可见。

刚开始在巴泽耶燃起的战火逐渐向北蔓延，很快遍布色当周边，甚至延伸到靠近比利时的吉瓦尼。

英勇的法军顶着德意志炮兵密集的炮火，一次次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然而，没有强力炮火掩护的第十二军随时都有被敌军围歼的危险。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的炮兵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来支援第十二军。不幸的是，在德意志炮兵集中优势火力的猛烈攻击下，我军受制于固定炮台的零散的支援火力根本不堪一击。更不幸的是，我军的炮弹根本就到炸不到敌军的阵地。

上午六时半，总指挥麦克马洪元帅在视察阵地时不幸被一块弹片击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负了重伤，因无法继续指挥，就把指挥权交给了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6]将军，然后被士兵用担架抬回了色当。

在前往色当的途中，护送受伤的麦克马洪元帅的小分队正好与拿破仑三世相遇。拿破仑三世停下马，俯身对元帅说了几句饱含深情的话后，继续朝前走去。

此时，陪伴拿破仑三世的军官有帕若尔[7]将军、库尔松将军、居兹曼上尉、德当库尔上尉、菲耶龙上尉、侍从武官内伊·德·拉·莫斯科瓦[8]、特雷瑟松上尉以及其他几位我叫不上名字的军官，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巴泽耶。勒布伦将军指挥的第十一军海军陆战队和第十二军正在与巴伐利亚军火拼。然而，不知何故，拿破仑三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改道前往法德两军交火激烈程度不亚于巴泽耶战场的吉瓦尼。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

到达吉瓦尼时，拿破仑三世发现这里满目疮痍，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据一位目击者——他当时也参加了这场战役，但后来当了逃兵——回忆，被轰鸣的炮声吓得瑟瑟发抖的战马不停地打着响鼻，并伴随着阵阵嘶鸣，皇帝及军官们不得不紧抓缰绳，以防它们乱跑。

观察到巴泽耶的战局似乎有利于法军时，拿破仑三世露出了几分喜色；然而，就在他暗自庆幸时，法军突然出现了撤退的迹象，这让他很不解。忧伤再次爬上了他的眉头，于是派居兹曼上尉去向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问明缘由。临危受命的总指挥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的答复是这是他新制定的作战部署，他计划将大军撤到色当以北的伊利，因为他不想重蹈昨天晚上陷入重围、成为瓮中之鳖的覆辙。了解情况后，拿破仑三世一声也没吭，既没表示赞同，也没发表任何反对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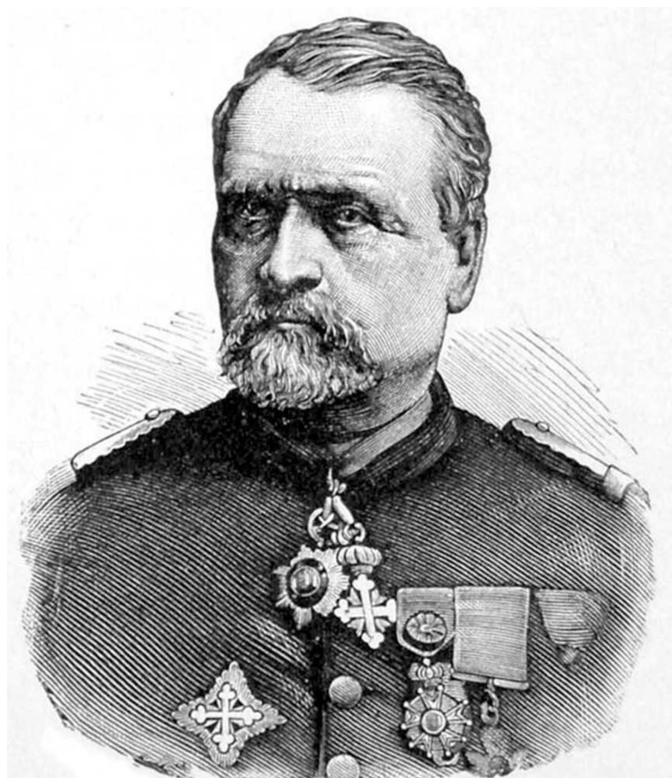
突然，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件再次把拿破仑三世推向了绝望的深

渊。快到上午十时了，大军奉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之命开始撤退。途中，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犹豫过一阵子，好像另有打算，但最终继续后撤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确实是历史上一件罕见的怪事。正在这时，陆军大臣夏尔•库赞•蒙托邦新任命的总指挥埃马纽埃尔·费利克斯·德·温普芬[9]将军到了，从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将军手中接过指挥权，命令立即取消撤往伊利的行动。他当着众将士的面夸下海口，说要把“德军全部赶进默兹河[10]”。他初来乍到，对战场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没意识到战术上的临时变化会在军中引起什么反响，但此时又有谁能拗得过他呢？军中现在可是他一人说了算，将士们只能遵命。



侍从武官内伊·德·拉·莫斯科瓦

在吉瓦尼高地冒着敌人的炮火观察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拿破仑三世，已经对战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深知温普芬将军指挥的集团军目前已完全暴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之内。然而，或许这就是不可挽回的悲剧的开端，拿破仑三世并没有进一步追究造成这种困境的真正原因，对迪克罗将军和温普芬将军之间的矛盾、争议毫不知情，于是关键时刻谁拥有绝对指挥权的问题产生了。机会常在不经意之间错失。当他兵败色当，从步兵随意的聊天中得知两位将军之间的纠葛时，一切已为时过晚。



埃马纽埃尔·费利克斯·德·温普芬将军

要是拿破仑三世能早点儿知道温普芬将军喜怒无常、感情用事，而迪克罗将军虽满怀爱国之心但性格悲观阴郁，他会不会以一位当局者的身份挥动手中的利剑，将两人之间具有犯罪倾向的争执扼杀在萌

芽状态？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赢得色当战役已没有任何可能，但如果当时他不被他的政府架空的话，这场战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呢？

拿破仑三世在吉瓦尼高地视察阵地时，敌军的几颗炮弹落在了他身边，几人随即应声倒地，伤势极其严重。其实，在迪克罗将军被迫向温普芬将军交出指挥权之际，信使德当库尔上尉已奉拿破仑三世口谕准备前往巴泽耶。不幸的是，一块弹片正好击中了他，他当场毙命身亡。几匹战马也惨叫着倒在他身边，弹片撕裂了它们的躯体，鲜血汩汩地冒个不停。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随行人员在他面前痛苦地死去，一匹匹战马哀鸣着咽下最后一口气，拿破仑三世眼里噙满了泪水。等回过神来后，他急忙拿起望远镜，火急火燎地把每个阵地都看了个遍。

离开吉瓦尼后，拿破仑三世及随行人员再次朝巴泽耶进发，途径战火正酣的拉蒙塞勒[11]平原时，拿破仑三世停留了片刻。在迪克罗将军下令大军撤退的同时，普军攻克了法军先前一直誓死保卫的巴泽耶。

就在拿破仑三世等人驻足拉蒙塞勒平原时，敌军的炮弹又朝他们呼啸而来，库尔松将军、特雷瑟松上尉不幸中弹，身上多处负伤；但无论是随行军官，还是侍从，他们个个都表现得异常镇定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随后，他们继续沿巴泽耶走去。到达巴泽耶、穿越两军交火区之后，拿破仑三世转身离开硝烟滚滚的战场，直奔色当而去。

现在已是上午十一时半，拿破仑三世在战场上足足待了五个小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强忍着身体上的剧痛，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握着望远镜左瞧瞧右看看，将战场上的每个角落都观察了个遍。事实上，此时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连独自骑上马背都几乎不可能了。这一点我已在《欧仁妮皇后》一书“色当之后”一章中提及。他的

身体状况太糟糕了，连马都不敢下。他担心一旦下了马，恐怕再也不能骑到马背上了。他只能咬紧牙关，双手扶着马鞍，坚持把所有战场观察一遍。

当拿破仑三世再次返回色当时，色当已经陷入重围，城中挤满了从周围战场上溃逃的将士。现在已是下午一时，法国人失去了这一天。

清晨时笼罩色当的茫茫浓雾现在消失得连一点儿踪影都没有了。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异常沉闷。灰头土脸、神情慌张的将士们在刺眼光线的映衬下显得愈加狼狈。难道连太阳也懂得幸灾乐祸吗？

自开战几周以来，组织不力、行动迟缓的法军接连失利，各军团早已溃不成军。军中上下乱作一团，士气极其低落，再加上指挥官自杀式的作战部署，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屠杀看来已不可避免地要在色当这座历史悠久的边防要塞上演。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刚开始，法军凭借坚固的堡垒，多次击退敌军的猛烈进攻。但随着德意志各集团军的会合以及优势火力的攻击，法军被一步步挤压进色当城中。尽管法军大部还在顽强抵抗，但骚乱已开始在部分军团蔓延。一个个前沿阵地接连丢失，恐惧侵袭着每个士兵的心头。最后他们索性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慌忙逃回城中。

色当城内，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散落的文件与尸体遍地，一片狼藉。受到惊吓的战马、驮畜嘶鸣着狂奔。树林中临时构筑的战壕内挤满了落荒逃窜的士兵。士兵的惨叫声、牲畜的哀鸣声撕心裂肺。色当城内一片火海，士兵脚下一片血海。

成千上万的将士倒在血泊中，撕裂的伤口不停地冒着鲜血。金灿灿的太阳贪婪地舔舐着湿漉漉、苦巴巴、黏糊糊的血液，无情地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化为尘土。太阳像一个大火球似的挂在天上，烤红了

1870年9月的下午，噗噗的火焰穿过团团硝烟，朦胧了凝结在色当上空的晦气，此情此景，与一位行走在漆黑大街上的路人，突然抬头瞥见某药剂师家的窗台上散发着诡异光芒的瓶子又有何区别呢？



拉蒙塞勒平原战场上的法军



拉蒙塞勒平原战场上准备发起进攻的普军

法军发起了最后一波大规模反击，企图一举击退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敌军。率先发起进攻的法军与敌军厮杀在一起。战斗异常惨

烈。一场惨绝人寰的人类大屠杀在色当古镇外拉开了序幕。密集的炮火声响彻整个洼地，喊杀声、惨叫声连绵不绝。那一刻，大地在哭泣，天空在落泪。

一幕幕血腥的画面湿润了拿破仑三世的双眼，滴答滴答的鲜血疲惫了他的身躯，抽空了他那颗仁慈的心。当拿破仑三世及随行人员再次返回色当、准备通过暗道进入公署时，一刻炮弹落在附近，弹片刺伤了紧跟在拿破仑三世身后的内伊·德·拉·莫斯科瓦的胳膊。

若要讨论此时色当城内的惨状，我想历史上还没有哪场战役能与之匹敌，没有哪场战役能对一个地方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

敌军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法军已全线崩溃。溃败的法军随即转身仓皇地向色当城内拼命涌去。霎时，街道上挤满了车辆、加农炮和人员。败下阵来的将士们气冲冲地扔掉手中的武器，任凭它们被狂奔而过的弹药车、马车、加农炮碾得粉碎，纷纷躲进民房和教堂中避难。

紧追不舍的敌军已抵达城外，整个色当城现在都处在其火力攻击范围之内。杀红了眼的敌军再次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展示了残酷与无情。无数门火炮齐刷刷地对准了色当城。指挥官一声令下，万炮齐鸣，飞向城中。城中顿时一片火海。恐慌在城中的每个角落蔓延着。吓破了胆的本地居民仓皇跑进地下室避难。满身血渍、脸被炮火熏得焦黑的士兵们眼中冒着熊熊怒火，仿佛他们才是这座城镇的占领者一般。他们气势汹汹地踏破居民的房门，砸烂屋里的家具，四处搜索能吃的或酒之类的东西。他们这是打着军人的旗号明目张胆地趁火打劫。人们不时地怒吼着“我们已经被出卖了，卖国贼和懦夫们把我们出卖了！”绝望使人们失去了理智，色当古城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浩劫！看着这毫无益处的残杀，拿破仑三世觉得再不能这样犹豫不决了。他决定阻止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返回公署后，拿破仑三世与还留在他身边的几位军官径直走向他的套房。拿破仑三世刚一进门，就把一只手撑在桌子的边缘上，然后瘫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就像骨头散了架似的。

“我受够了，”拿破仑三世哽咽着说道，像是在喃喃自语，“我受够了。为什么要让我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呢？”接着，他用右手撑着额头趴在桌子上，好久都没有说一句话。房间里异常寂静。拿破仑三世的胸口一张一合，剧烈地起伏着，整个身体明显地颤抖着。看到这一幕，看到从未在别人面前抹过眼泪，而今却因无尽的悲伤泣不成声的皇帝时，在场的每个人无不动容。

外面的战斗仍在继续。犹如成千上万辆马车在人行道上走过时隆隆作响的炮火声暗示着敌我两军之间的战线已经越来越短。

爆炸声每传来一次，拿破仑三世都要判断敌军是不是又靠近了一步。每当此时，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抽搐几下，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手指抠几下桌面，发出“吱吱”的声音，仿佛一名将死之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现在已是下午两点。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打破了屋里的沉寂。敌军的先遣炮兵部队攻到城门口了，他们扔下大炮，换上步枪，逼近城中的法国士兵。激烈的巷战开始白热化。

拿破仑三世缓缓站起身，脸色惨白。

“啊，朋友们，”他说道，“这真是烦死人了！这到底有没有完？”

话音刚落，他再次瘫坐在椅子上。由于用力过猛，随着“咔嚓”一声，椅子散架了。还没等侍从副官反应过来，拿破仑三世便重重地摔在地上，凌乱的灰发遮盖了他久经沧桑的脸庞。



法军依托色当城内的建筑抵抗普军



法军与普军在色当展开巷战

自凌晨四时离开色当视察阵地以来，拿破仑三世粒米未进。在一名军官的吩咐下，侍从为他准备了一份餐点，包括一盘三明治、一个小蛋糕和一杯马德拉葡萄酒。

对冒着枪林炮雨、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视察前沿阵地的拿破仑三世的勇气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温普芬将军曾激动地说，拿破仑三世离开色当前吃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早餐[12]，而正在前线冒死指挥战斗的将军

们却只能以少得可怜的生萝卜充饥。

当然，温普芬将军并非拿破仑三世的随行军官[13]。我以上的描述是基于9月1日一位一整天跟随拿破仑三世的随行人员说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侍从为拿破仑三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我相信他也没胃口。真实的情况是，当侍从按那位军官的吩咐把餐点送到拿破仑三世面前时，他轻轻地挥了挥手，甚至看都没看盘子里面盛的到底是什么。他一直在沉思，只在口渴难耐时自己倒了一点儿水，“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

“现在必须停火，”他语气坚决地说道，“必须！如此无休止的牺牲又有何益？”

时间已接近下午三时。拿破仑三世喊来一名勤务兵，命令他去城堡上升起白旗。

但战斗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拿破仑三世开始变得极其烦躁不安，不停地跺着脚，口中一直念叨着“天哪！天哪！”

他再次站起身，不停地问身边的侍从：“既然白旗都升起来了，可恶的战火怎么还不平息？”在问到大概第十遍的时候，勒布伦将军匆匆地走了进来。拿破仑三世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去。

“我亲爱的将军，”他迫不及待地问道，“战斗为何还没停止？早在一个小时前我就令人在城堡上升起了白旗，想早点儿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斗。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我别无他求。我就想立即停火。”

勒布伦将军随即给拿破仑三世道明了原委。他说：“根据战争法，只升白旗并不具备立即停火的法律效力。若要停火，战败方的总指挥要写一份请求停火的文书，并派遣信使送交战胜方总指挥。”

拿破仑三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将军，你立即去找温普芬将军，请务必好言劝告他去做，这是我的唯一想法。”

形势刻不容缓。勒布伦将军转身离开公署，慌慌张张地来到温普芬将军面前，开门见山地转述了拿破仑三世的要求。然而，还没等勒布伦将军把话说完，温普芬将军就已气得火冒三丈，恶狠狠地撂下“我绝不停火”几个字之后又投入了战斗。就这样，战斗仍然没有停下来。

面对早已毫无胜算的战斗，一味的抵抗只能换来更多无辜生命的牺牲。自从拿破仑三世差勒布伦将军向温普芬将军转达他的意愿以来，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其间，拿破仑三世如坐针毡。

此时，色当犹如一只待宰的羔羊，已经无任何还手之力。拿破仑三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不是原本属于色当的平静，而是愈加激烈的炮火声。色当城中弹片四溅，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应声倒地，伤者不计其数。成千上万的鲜活生命被无尽的痛苦折磨着，熊熊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直到傍晚八时，灰头土脸的温普芬将军才想起已被冷落多时的拿破仑三世，然后带着条件觐见拿破仑三世。如果拿破仑三世非要让他履行停火之责，那他宁愿辞去总指挥一职，或者干脆向敌军投降。在一番激烈的争执之后，温普芬将军接受了这个无法避免的厄运，同意向敌军投降。

等温普芬将军毕恭毕敬地把拿破仑三世的降书呈给威廉一世后，战斗戛然而止。然而，一切晚矣。曾经蜚声政坛的拿破仑三世从此失去了皇冠，也没有了手中的佩剑。



温普芬将军毕恭毕敬地把拿破仑三世的降书呈给威廉一世

那天晚上，色当城内惨不忍睹。冤魂的鬼嚎声，伤者的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又肝肠寸断。无法掩饰喜悦之情的敌军抬头仰望布满星辰的苍穹，仿佛在和上帝共享胜利的荣耀。成千上万的敌军将士引吭赞歌，而他们的指挥官及随军神父则默默地站在一边。透过星罗棋布的营地中发出的点点火光，人们依稀能看见披头散发、浑身沾满血渍的士兵们聚众祈祷的情形，他们或许是在为白天的野蛮行为赎罪。不管他们生性是善是恶，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善恶的天平又岂是他们能平衡得了的。

---

[1]色当是法国北部阿登省的一个市。战略要地，历史上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战役，其中尤以1870年普法色当战役最著名。

[2]穆宗是法国北部阿登省的一个市，位于色当东南。

[3]指当时身兼法国首相及陆军大臣的夏尔·库赞·蒙托邦伯爵。

[4]原文为Bavarians，意为巴伐利亚人。这里指随普鲁士军队参战的南德意志邦国巴伐利亚王国的将士。

[5]巴泽耶位于色当与穆宗之间。

[6]奥古斯特-亚历山大·迪克罗（Auguste-Alexandre Ducrot，1817—

1882），法国将军。他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普法战争期间，他任师级指挥官。

[7]即夏尔·保罗·维克多·帕若尔（Charles Paul Victor Pajol，1821—1891），法国骑兵名将帕若尔伯爵克洛德-皮埃尔之子。1870年梅斯被围困之时，他的军衔升至少将。1877年退役。

[8]即埃德加·拿破仑·亨利·内伊（Edgar Napoléon Henry Ney，1812—1882），第三代莫斯科瓦公爵，法国元帅内伊公爵第四子。

[9]埃马纽埃尔·费利克斯·德·温普芬（Emmanuel Félix de Wimpffen，1811—1884），奥地利裔法国将军。

[10]默兹河是欧洲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法国，流经比利时、荷兰，注入北海。

[11]拉蒙塞勒位于巴泽耶以北。

[12]此处含有讽刺意味。言外之意是难怪拿破仑三世有那么充沛的精力。

[13]言外之意是温普芬将军的话没有根据、不可信。

第12章

欧仁妮皇后逃亡、普法和谈与一代王朝的终结

我已在其他著作中讲述过1870年9月4日那天欧仁妮皇后是如何在一片唾骂声中，仅在几位忠诚的朋友如梅特涅侯爵和科斯坦蒂诺•尼格拉等人的护送下狼狈逃离杜伊勒里宫的故事。我也详细描述过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蒙难后的凄惨状况。人们能丝毫不费力气地道出拿破仑三世缘何放弃抵抗、投降，以及后来取道比利时前往德国囚禁地时的来龙去脉。

然而，人们对于欧仁妮皇后的逃亡之旅却知之甚少，而对于她如何从巴黎逃走，乘船从特鲁维尔[1]离开，最后流亡英国的惊险历程更是一无所知。请听我慢慢讲述。

历史学家详细记载了欧仁妮皇后1870年9月4日那天的所作所为，大都称那天为“逃离日”，当然，不管是出于对欧仁妮皇后命悬一线的“好运”的妒忌，还是对她的恶意抨击，这种叫法都是带有偏见的，是完全错误的。真相再明白不过了。眼看愤怒的人群离杜伊勒里宫越来越近，欧仁妮皇后却一点儿也没有想离开的意思。情急之下，几位宫廷贵妇如拉·珀兹、拉·玛蕾莎勒等人簇拥着欧仁妮皇后紧随梅

特涅侯爵和科斯坦蒂诺•尼格拉仓皇离开内屋，穿过杜伊勒里宫庭院右侧的长廊，径直朝卢浮宫大门赶去。

最后，欧仁妮皇后等人从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对面的一个出口走出，来到广场上。此时，欧仁妮皇后的身边只剩下勒布勒东夫人和科斯坦蒂诺•尼格拉了。她虽然把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但还是不停地东张西望着，有气无力地斜靠在卢浮宫柱廊前的那个公园的栅栏上，焦虑地盼望着梅特涅侯爵能早一秒钟将他的座驾（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从码头[2]上弄回来。

就在这时，一个小孩子认出了欧仁妮皇后。

“瞧啊，”他指着皇后喊道，“皇后在这里！”

去找车子的梅特涅侯爵迟迟未返回，广场的人越聚越多，嘈杂声越来越大。这时，一辆出租马车正好经过，欧仁妮皇后没多想就一步跨上了马车。马车缓缓穿过沸腾的人群，径直朝她的一位朋友家驶去。她的朋友碰巧不在家。她先是沮丧了一阵子，随后把她的牙医伊文斯大夫的住址塞到了马车夫的手里。然后，他们匆忙朝布洛涅森林大街和马拉科夫大街的拐角处赶去。

发现伊文斯大夫在家后，大喜过望的欧仁妮皇后瘫坐在椅子上。她的脸色苍白。伊文斯大夫见状，马上安慰了她几句，让她稍作休息。随后他吩咐下人给她熬了些肉汤。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皇后粒米未进。他劝皇后切勿急躁，并向她许诺第二天一定带她离开巴黎。9月5日，皇后在勒布勒东夫人和伊文斯大夫的陪伴下踏上了逃亡国外的旅途。

他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马牵引的四座马车。车上除皇后、伊文斯大夫和勒布勒东夫人外，还有伊文斯大夫两名身着白大褂的助手，他们和马车夫挤坐在一起。



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

当马车穿过库尔布瓦广场时，一幅矗立在广场中心的拿破仑三世画像映进了欧仁妮皇后的眼帘，她若有所思地把头伸出车窗。这是个鲁莽的行为；一个路人认出了她，他像刚才那个小孩子一样大喊起来。人们顿时从马车四周蜂拥而来。马车夫发现情况不妙，立即甩起鞭子，疯狂地抽打着马儿。马车在拥挤的人群中狂奔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到了乡下，把乌烟瘴气、躁动不安的巴黎远远地甩在身后。

然而，装饰华丽的马车在经过乡村时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意。在特殊时期，路人的驻足围观不一定是好事。旅行者们的特殊身份必须掩盖，这是相当有必要的；他们的真实身份一旦暴露，欧仁妮皇后会有生命危险。这次逃亡之旅就很可能重蹈瓦雷纳[3]的覆辙了，那样的结果将是令人遗憾的。意识到潜在危险的伊文斯大夫暗自发誓决不能让那样的悲剧发生在欧仁妮皇后身上。

他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立即换掉目前乘坐的马车。正当伊文斯大夫向欧仁妮皇后陈述他的想法时，机会来了！伴随着一阵“吱呀吱呀”的刺耳声响，一辆胜似古董、破旧不堪的马车正慢悠悠地向埃夫勒驶去。

伊文斯大夫吆喝着让马车夫停车，没等车停稳，他便纵身一跃跳下马车，三步并作两步蹦到那位出租马车夫面前。说明来意后，他希

望马车夫能行行好，把他的“家人”捎到特鲁维尔。谈妥之后，伊文斯大夫扶着欧仁妮皇后和勒布勒东夫人上了马车，然后他们继续前行，而那位马车夫则驾着他们的马车回了巴黎。

这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棘手问题摆在了欧仁妮皇后面前。他们后来租的那两匹马体力不行，不适合跑长路。第二天早上来到一个村子时，任凭马车夫怎样抽打，它们还是站在原地不动。必须换掉它们了！

他们不得不在一家沿着谷仓搭建起来的脏兮兮的简易客栈暂作休息。欧仁妮皇后和勒布勒东夫人挤进一楼的一间看起来古里古怪的小房间。在伊文斯大夫外出物色新马匹的时候，那位板着脸、不苟言笑的马车夫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用着餐。

逃难者们的运气好像不怎么好。昨天晴朗的天空霎时布满了乌云，黑压压的非常可怕。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和几道刺眼的闪电，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咆哮的山洪淹没了所有的道路。

伊文斯大夫被困在了大雨里，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可急坏了欧仁妮皇后，她心急如焚，在客栈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最后，她扎进了倾盆大雨中，巴巴地等着伊文斯大夫。暴雨“哗啦啦”往下倾泻着，欧仁妮皇后站在空旷的谷仓门口，撑着一把只能遮住脑袋的小雨伞，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着。

伊文斯大夫终于回来了，牵着两匹好说歹说才从村民那里租来的马。套上马后，他们冒着大雨匆忙离开了客栈。

到达埃夫勒前，一切都很顺利，或者说基本都顺利。伊文斯大夫原本打算在埃夫勒歇歇脚，但考虑到这样做会耽搁很多宝贵的时间，最后决定继续前进。然而，这个仓促的决定却给欧仁妮皇后带来了新的麻烦。

平安穿过几条街道来到一个广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里聚满了兴奋的人。骑警们在一旁维持着秩序，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军乐队嘹亮的战鼓声和号角声中铿锵有力地踏着整齐的步伐从人群中走过，看样子是在操练。

载着皇后和她的朋友的马车已经来不及掉头，他们离人群太近了。这难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果不其然，躁动的人群开始朝马车狂奔而来。在看似一帆风顺的逃亡之旅中，欧仁妮皇后第三次被人认了出来。此时，伊文斯大夫做好了面对一切危险的准备。

伊文斯大夫硬着头皮不慌不忙地走下马车，故作镇定地问旁边的人："谁是这里管事的？"人越聚越多，皇后被死死围在中间。兴奋的人群不停地高呼："共和国万岁！打倒帝国！"现场气氛异常紧张。在场的每个人，包括欧仁妮皇后的任何一个出格的行为或每句不合时宜的话语都会引发不可预测的悲剧。



19世纪70年代的埃夫勒

万幸的是欧仁妮皇后一声也没吭，在场的人也丝毫没有想冒犯她的意思。

然而，有谁能保证这看似平静的躁动背后不会藏着凶险的暗流

呢！正当伊文斯大夫焦头烂额之际，他忽然在人群中瞥见一个貌似政府官员的人。

伊文斯大夫急忙走到他跟前，向他如实道明了原委。

那人事实上就是一名政府官员。据我猜测，他就是埃夫勒市长。他不仅彬彬有礼，还对欧仁妮皇后的不幸遭遇、凄惨的逃亡之旅表达了极大的同情。他走到马车旁，毕恭毕敬地向皇后鞠了一躬，然后示意人群腾开道路，让他们继续前行。

刚才还乱哄哄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广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人们迅速分成两排，让出一条道来，默默地注视着马车缓缓驶过。这一幕很让人感动！

在几位友人的护送下，欧仁妮皇后带着几分伤感再次踏上了旅程。说起这次特殊的旅程，除了以上的小插曲外，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

一天晚上，刚进入特鲁维尔地界不久，他们就发现马儿精疲力尽了，正好他们也要休息一下。于是，他们在一户农舍前停下马车，敲门唤醒了房子的主人。

隔着紧闭的百叶窗交涉了半天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妇才磨磨唧唧地打开了门。尽管伊文斯大夫已许诺给她一笔丰厚的酬金作为回报，但老妇人显然还是对几位“造访者”不放心。她坚决要求审视每个人一遍后才准许他们进门。她手里提着一盏灯笼，在烛光的映衬下，修长、纤细的手指格外显眼。她端详着伊文斯大夫、欧仁妮皇后以及勒布勒东夫人的脸庞。马车夫也没能躲过她的严格检查。最后，要不是马车夫的一句话，估计老妇人是不会让他们进门的。

“好了，好了，大娘，”他极不耐烦地说道，“他们亏不了你的，他们都是些好人。”

连日的劳顿拖垮了欧仁妮皇后的身体。她患上了重感冒，鼻涕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给她带来很多不便。仓皇逃离杜伊勒里宫时，她只随手带了两三条手帕。这下可忙坏了伊文斯大夫，他不断地从欧仁妮皇后的手中接过擦过鼻涕的手帕，迅速地将胳膊伸出窗外，不停地抖动着，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弄干。



19世纪的特鲁维尔

欧仁妮皇后在特鲁维尔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伊文斯大夫弄来的一艘小游艇。游艇载着那位不幸的女人，划过惊涛骇浪，安全地抵达了黑斯廷斯。

撇开壁垒分明的政党色彩，摒弃世俗、狭隘的偏见，单从欧仁妮皇后的突然倒台，以及随后所遭遇的荆棘丛生的逃亡之旅来看，我们难免也会动恻隐之心。

前一刻钟还高高在上、八面威风的皇后，后一刻钟就被精神上的煎熬压弯了腰——历史往往一瞬间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统治者们的悲欢离合。

她不是唯一一个跌倒在历史舞台上的人。在她之前，无数同她一样叱咤政坛、左右乾坤的皇后不也泪眼婆娑地被迫离开她们的“宝座”了吗？大地在她脚下沸腾，那些曾经自认为会与天地同寿、与日

月同辉的“英魂”挥舞着手中的王冠正向她高呼着、奸笑着。

1870年9月3日的傍晚，恢弘的悲剧再次拉开了帷幕，一度垂头丧气的“英魂”们又觅到了一个难得的知音，顷刻间高兴得如获重生一般。太阳发出最后一抹光彩，昭示着它的辉煌即将成为过去。天空渐渐昏暗了下来，暮色已经降临。黑夜正在吞噬着皇后们身上残留的最后一丝光芒，任凭她们垂死挣扎。窒息感愈发强烈，只有头顶皇冠上的宝石仍不时地发出点点亮光，仿佛在向黑夜做最后的道别。她们的一生宛若划过夜空的流星，虽美但易逝。回望她们的人生轨迹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知道，在诗人的笔下，她们荣辱得失的一生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皇后们倒下了，昔日的臣民们无情地抛弃了她们。她们的悲惨下场就像古代罗马竞技场上裁决违反教规的处子们的一样，尽管她们已卧地不起，但围观的人们还要拿起石头狠狠地砸她们，要知道就是同一群人不久前还围着她们团团转呢。她们的灵魂被诅咒，她们注定要一直徘徊在天堂的门外。人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戴、敬畏她们。面对不知道把她们卷向何处的旋风，她们紧抓着彼此的手，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姑娘们玩游戏时经常唱的那首歌谣：“我们不再在林间起舞，月桂树已被砍伐殆尽。”

大家想必对拿破仑三世被囚禁于威廉肖赫城堡期间——欧仁妮皇后在他到达此地前已经流亡英国——曾委托梅西-阿尔让托伯爵夫人秘密会见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希望他能酌情放宽和平条件的故事并不陌生吧。事实上，在此期间，还有一位伯爵夫人也是众人所知的。为了光复帝国大业，她只身前往布鲁塞尔弗兰德酒店。在那里，她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艰难谈判。

女人们对事件的进程确实有着某种影响和促进。在第二帝国覆亡后的日子里，奇怪的是，这些爱搞阴谋的女人竟然给这一时期打上了烙印。她们以毋容置疑的聪明才智，帮助那些急于摆脱因战争而陷入

的微妙困境的政治家。V夫人就是这种女人。她是欧仁妮皇后宫廷贵妇拉·莫斯科瓦和拉·珀兹的妹妹，奇迹般地卷入了两国停战后的谈判事务中。她高尚的爱国情操至今仍受到人们称赞。当时的场面相当感人。如果不是身处特殊时期、面对特殊事件，我们甚至以为那就是一个唯美的、胜似童话的爱情故事。

很久以前，普鲁士宫廷里有一位法国公使——拉·罗什朗贝尔侯爵，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不仅面容姣好，而且冰雪聪明。王室上下包括后来的威廉一世都视她如珍宝。姑娘的美貌深深打动了一位同在普鲁士宫廷长大的德意志贵族青年，这个青年风度翩翩、英俊潇洒，执意要娶她为妻。不管是从家庭的角度，还是友谊的角度，拉·罗什朗贝尔侯爵与普鲁士宫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得知女儿无意嫁给那位贵族青年后，他便拒绝了这场求婚。



20世纪初的威廉肖赫城堡。色当战败后拿破仑三世被囚禁于此

这个求婚者就是冯·阿尔尼姆伯爵。当时，他风华正茂，仕途一片光明，而且官居要职。

拉·罗什朗贝尔侯爵返回巴黎后，他女儿再也没有见过冯·阿尔尼姆伯爵。多年过去了，他们都不记得对方的模样了。但他们就真的忘

记彼此了吗？更确切地讲，难道冯·阿尔尼姆伯爵一点儿也不记得他曾经朝思暮想的美人了吗？如果我们认为冯•阿尔尼姆伯爵忘记了拉•罗什朗贝尔小姐，那他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他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人。他一边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他早已娶妻成家，身后还跟着一位迷人的小公主——一边还惦记着曾经的梦中情人。

年轻的拉·罗什朗贝尔小姐回到法国后与他人结为伉俪，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要是没有1870年、1871年那些戏剧化的事件发生，她不会再次出现在这位过去的追求者面前。

当国民议会把缔结结束法普和约的历史使命派给政府首脑阿道夫·梯也尔时，这位精明的政治家随即把第二帝国时期立法团中的几位老同行纳入自己麾下。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4]就是其中一位。在阿道夫·梯也尔的指导与支持下，他重组了财政部。



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

在与冯·阿尔尼姆伯爵正式谈判之前，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奉命先会会俾斯麦伯爵。诺曼人[5]与条顿人[6]面面相觑，狐狸和狗互献殷勤。

有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我在此就不啰嗦了。故事讲述了俾斯麦伯爵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意欲灌醉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接下来我要讲的则是一个大家并不熟悉却乐意倾听的故事。欲知那段爱情佳话结局如何，请先听听这支插曲。

时来运转、在贵人的提携下突然被委以重任的奥古斯丁•托马斯•

普耶-克蒂埃后来发现他们家族很早以前就与罗什朗贝尔家族有着不错的交情，他顺藤摸瓜，随即找到了前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自从那段唯美的浪漫情缘不了了之后，她嫁给了V伯爵——这条线索。在V伯爵夫人的斡旋下，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与普鲁士政府代表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此外，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的一个女儿因与朗贝蒂伯爵的婚姻关系正好在阿尔萨斯的贝尔福[7]拥有大片领地。这层在平时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的关系，却在与俾斯麦伯爵的领土谈判中增添了不少筹码。

俾斯麦伯爵的底线是迫使法国将贝尔福周边部分领土割让给普鲁士。于是，谈判陷入了僵局。任凭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严正抗议、百般理论，狂妄自大的俾斯麦伯爵还是寸步不让。这可难坏了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他虽不能使俾斯麦伯爵让步，又不能表现得狼狈不堪。就在这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拿起笔，蘸了蘸墨水，准备在那份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上他的大名。但他迟迟没有下笔，脑海中一直翻滚着那些可怕的结果。突然，他气冲冲地将笔摔在桌子上，然后转向俾斯麦伯爵。

“谁乐意签就让谁去签吧，侯爵，”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反正那个人不会是我。”

俾斯麦伯爵怔住了，接着露出不悦的表情。

“这是什么意思？”俾斯麦伯爵问道，“您已经接受我的条件了。”

“没错，”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答道，“然而，我在接受条件的同时并没有向您许诺要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与我亲近的人一同划归贵国。”

“愿闻其详。”

“不妨跟您说说。我的女婿朗贝蒂伯爵几乎拥有贝尔福周边的所有土地[8]，我绝不会在企图剥夺他的法国公民权、导致我们以外国人互称的文件上写上我的名字。”

“请您理解我的心情，”他站起身来接着说道，“此时此刻，我不仅是一名法国人，而且是孩子们的父亲。我会向我的政府禀明谈判延期的原因，也会请求政府重新委派一名不受个人情感左右的使者再次与您谈判。这样一来，您就会有更大的胜算得偿所愿了。”

听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这么一说，刚才还满脸不悦的俾斯麦伯爵倒喜欢上我们的全权大使了。大使直截了当、别具一格的谈判风格给俾斯麦伯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俾斯麦说道：“您不希望您的女婿、外孙们将来是普鲁士人，这是人之常情。朗贝蒂伯爵的领地在哪里？请给我指指大概位置。”

俾斯麦伯爵顺手拿起一幅专供下属们使用的普通地图，把它铺在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面前。事后普耶-克蒂埃坦言，俾斯麦伯爵当时的举动确实让他感到震惊。但他却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他慢慢地拿起一支铅笔，一本正经地在贝尔福周围尽可能大地画了一个红圈。据说圈内的土地归他女婿所有，但他当时是凭着想象画的，或许其中的一部分是真的。画完后，他拿着地图给俾斯麦伯爵看。

俾斯麦伯爵接过地图，开始故弄玄虚地端详起来。很明显，他这么做是不想在心理上输给对方。然后，他把地图放在桌子上，打开那份列有缔结和约条款的文件，特意加了一句“贝尔福及其周边领土应归法国所有”，然后将文件再次递给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

俾斯麦伯爵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现在，您该满意了吧？”

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当时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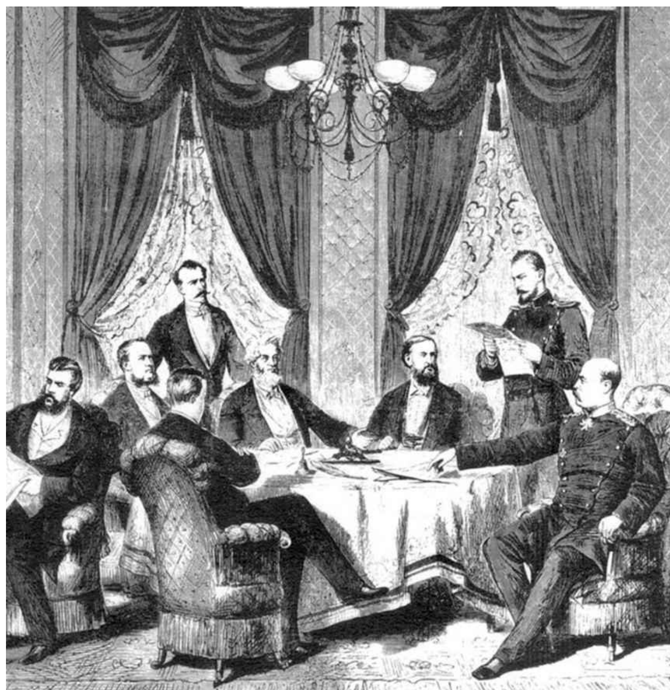
相比敌人企图占据的大片领土，他争取到的只不过是一矢之地，但在他的心中却堪比辽阔疆域。

上面的这则逸事是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亲口讲给我的。我相信那些曾经生活在法德边界争议地区、一夜之间差点儿沦为德国人的法国人肯定会有兴趣读完这个故事。

请听我继续讲我的浪漫故事吧。

V夫人得知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奉命将在法国与威廉一世的代表冯·阿尔尼姆伯爵协商德国索求的战争赔款金额时，就来到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家里。

她说：“冯·阿尔尼姆伯爵表面上看起来平易近人、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固执己见，毫不动摇地履行使命。鉴于之前我与普鲁士宫廷的关系，我对莱茵河那边的人与他们的处事方式还是了解的。我十分了解冯·阿尔尼姆伯爵。你想让我在你和他之间充当斡旋角色吗？愿意给我一个报答祖国的机会让我为你效劳吗？如果你同意，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管了。冯·阿尔尼姆伯爵曾想娶我为妻；尽管我们已多年未曾谋面，但我知道他还没有忘记我。让我和他再见一面，我深信，这次会见定对你肩负的重任产生积极影响。”



法国代表与俾斯麦谈判

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知道V夫人的话不是闹着玩的。

他问道：“但你打算在哪儿与冯·阿尔尼姆伯爵见面呢？”

“就这儿。”

“你是说财政部？”

“是的。”

“那可不行。”

“如果由你来安排，那也未尝不可。”

“你打算怎样摆平他？”

“这是我的秘密，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的秘密？”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你肯定能猜得到。它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冯·阿尔尼姆伯爵没有忘记我，那么他会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听从我的建议；二是他把我忘了，面对他的铁石心肠，我的一切手段都将无济于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为了你的和谈成功，为了国家利益，你敢不敢派我去见见他呢？”

“好吧。”在这个说话掷地有声、将个人感情与政治利益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女人的诱导下，他不得不这样说道，“你见机行事吧！冯·阿尔尼姆伯爵大约明天下午两点来这里。你佯装碰巧到财政部来，然后我就把他交给你。”

第二天，V夫人比原定时间提前一会儿赶到了财政部。与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短促碰面后，她就站到了通向部长办公室的楼梯边，正对着的前厅门口。

不一会儿，冯·阿尔尼姆伯爵出现了。看到他从座驾上下来，朝前厅门口走来时，V夫人先是一怔，然后直立在楼梯的第一个台阶上，仿佛突然被传话谒见重要人士时吓得不知所措一样。

V夫人虽然已不再是妙龄少女，但风韵犹存，依然楚楚动人。结果，冯·阿尔尼姆伯爵一眼就认出了面前这个当年让他倾慕的女人。

冯·阿尔尼姆伯爵后退一步，凝视着她。

“我被她征服了，”他喃喃自语道，似乎明白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原因。

“我被她征服了。”冯·阿尔尼姆伯爵后来也承认。

他心神不宁而又激动不已地朝V夫人走去，接着四只手紧握在一起。

冯·阿尔尼姆伯爵确实被她征服了。V夫人搂住他向上走了几级台阶，就同他一起坐在楼梯上。她急不可待、热情奔放地用德语讲了很多话。

她说了些什么，大家不难猜到。冯·阿尔尼姆伯爵听她讲话，没有插言，头垂下来，手还留在她的手中。

“我听你的，”她话音刚落，冯·阿尔尼姆伯爵就说，接着重复道，“请放心，我听你的！”

V夫人站起身，松开了他的手。

“想想你许下的诺言，”她说，“部长在等你，在他面前，你又变成一个德意志人，甚至是双料的德意志人。可是，我就待在部长办公室旁边的客厅里。我听着你们的全部谈话，如果你欺骗了我，我就会进去提醒你发过的誓言。”

她说到做到。在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同冯·阿尔尼姆伯爵就领土和战争赔款进行谈判时，V夫人一直等候在部长办公室旁边的客厅里。他们的谈判趋向恶化时，她就从半开的门缝中露出头来，迫使冯·阿尔尼姆伯爵克制自己的态度。

最后，冯·阿尔尼姆伯爵开出的条件比俾斯麦伯爵优厚一些。尘封多年的爱情为我们换来了相对宽松的条件。气急败坏的俾斯麦伯爵严厉斥责了冯·阿尔尼姆伯爵。难道俾斯麦伯爵压根儿就没料到冯·阿尔尼姆伯爵的这段浪漫史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管料到与否，俾斯麦伯爵都没有原谅因感情用事而辱没使命的冯·阿尔尼姆伯爵。

从此，V夫人一直对冯·阿尔尼姆伯爵心存感激，他不仅没有忘记她，还在她的国家最无助的时候念及旧情、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援

手。得知冯·阿尔尼姆伯爵惨遭俾斯麦伯爵训斥的消息时，她痛不欲生。

正史中没有被提及的故事难道就不值得公诸于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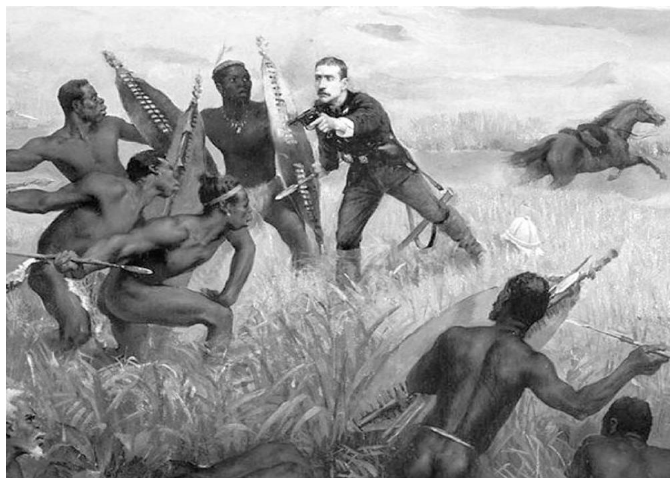
本书使人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人与事。拿破仑三世已经驾崩，皇太子也战死沙场。曾经满地笙歌、处处笑语的第二帝国已经成为历史，唯有三三两两的弃儿如今流落街头。

流亡时期的拿破仑三世有没有想过卷土重来、在法国重建他的帝国呢？事实上，拿破仑三世一刻也没闲着，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紧张地张罗着，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让他的爱子以皇位合法继承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法国人面前。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断言他的姓氏一定能再创一段辉煌的话，那也未免太轻率了。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给人的印象总是沉着内敛、从不张扬。流亡英国时，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人能读懂他的心思。

在他的一生中，他见过太多起落沉浮，亲眼目睹了人们对不再被命运之神青睐的君主们的冷漠与怀疑。不知不觉中，悲剧的帷幕已经为他拉开。然而，反观他的人生历程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他的一生虽历经坎坷，但整体来讲还是很平顺的，这归因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沉着、冷静，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终其一生苦苦追求的理想与超前的统治理念——自由主义。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激进的变革都会引起时局的震荡。



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伯爵



拿破仑三世的儿子死于祖鲁战争，这幅图描绘了皇太子与祖鲁人战斗的场景

尽管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时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正如我所坚持的那样，仍然有许多值得称赞的东西。

尽管他的一生不断遭人质疑，比如他的君主身份、1851年12月2日政变、昏庸腐败的宫廷以及1870年血腥的大屠杀，但他却从未被人憎恨过。当我们怀着平静的心态回忆他的过往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如今默默长眠于阴森陵墓中的他的好处来。

正义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正义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是爱的一种体现；当人们不再哀怒时，那些曾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便可以在爱的港湾里找到庇护，并让他们蒙冤的灵魂获得救赎。

因一时的爱国主义激情而失去理智的人们将愤怒的火焰无情地喷向拿破仑三世。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人们理智的恢复，他们现在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了。人们开始将充满同情、敬意的目光投向那个曾经不顾他们死活、被他们肆意诅咒的人身上。他的真实形象——和蔼、热心，同普通人一样在身处逆境时仍奋斗不息——终于再次被认可。作为君主，他始终心系苍生、慈悲为怀。

对于像拿破仑一世那样令人敬畏、唯我独尊的天才，人们的记忆中除了仇恨和愤怒，别无其他。然而，对于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拿破仑三世，人们虽有怨言，但这种怨气是暂时的。历史不会为他贴上仇恨和愤怒的标签，历史不会因为他的错误与失败而否认他的地位。

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也有过动荡与不安，但在我的这本著作问世后的今天，法国不也不太平吗？不也人心惶惶、骚乱不断吗？

开诚布公地讲，拿破仑三世在位的十八年时间里，法国上下弥漫着一股不正之风，人们道德沦丧、不知廉耻、好逸恶劳、骄矜虚伪、无恶不作。拿破仑三世对此却充耳不闻。他始终以一位悲观宿命主义者的身份任凭这些蠢事滋生。那些有违他初衷、玷污他人格的蠢事不应强加在他的头上。面对曾经的侮辱、谴责，他的形象显得愈发伟岸挺拔，就像如今的共和国，尽管成立之时百废待兴，尽管公民们时有不满，但它不是照样蒸蒸日上吗？

---

[1]特鲁维尔是法国卡瓦尔多斯省的滨海城市。

[2]现在从卢浮宫发往帕西的有轨电车也是从这里发车的。——原注

[3]法国大革命期间，瓦雷纳覆辙是指法王路易十六及王室成员意欲逃离巴黎到外省避难，但不幸在瓦雷纳被捕。历史称这一事件为“王室出逃瓦雷纳”。

[4]奥古斯丁·托马斯·普耶-克蒂埃（Augustin Thomas Pouyer-Quertier，1820—1891），诺曼底人，法国财政部长。他鼓励阿尔及利亚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业，并在那里创办了一家棉花加工厂。1879年，他与合伙人共同成立了法国电报公司。——原注

[5]诺曼人喻指普耶-克蒂埃先生。

[6]条顿人喻指俾斯麦伯爵。

[7]贝尔福是法国东北部城市，1870年法普战争前是阿尔萨斯的一部分。

[8]我们的大使是有点儿夸大其词，但这都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原注

专有名词对照

Second Empire	第二帝国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Adolphe Thiers	阿道夫·梯也尔
Pierre-Jean de Béranger	皮埃尔-让·德·贝朗热
Saint Helena	圣赫勒拿岛
Invalides	荣军院
Prince Louis Napoleon	路易·拿破仑亲王
Victor Hugo	维克多·雨果
Battle of 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战役
Battle of Waterloo	滑铁卢战役
Chiselhurst	奇斯尔赫斯特
Tuileries	杜伊勒里宫
Seine	塞纳河
Lepi	勒皮克
Fleury	弗勒里
Prince Imperial	皇太子
Loulou	路路
Louis	路易
Felice Orsini	菲利斯·奥尔西尼
Pépa	佩帕
Mme. de Montijo	蒙蒂若夫人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脉

Biarritz	比亚里茨
Marquis de la Rochelambert	罗什朗贝尔侯爵
Comédie Française	法兰西喜剧院
Paris Opera	巴黎歌剧院
Place Vendôme	旺多姆广场
Empress Eugénie	欧仁妮皇后
Merimée	梅里美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宫
Saint Cloud	圣克卢宫
Compiègne	贡比涅
Jacques Offenbach	雅克·奥芬巴赫
General Boum	布姆将军
Grande Duchesse	大公夫人
Molière	莫里哀
Mlle. Schneider	施耐德小姐
Strasburg	斯特拉斯堡
Boulogne	布洛涅
Bohemians	波西米亚人
Bonapartists	波拿巴主义
Rothschild	罗特席尔德
Morny	莫尔尼
Hortense	奥坦斯
Elysée	爱丽舍宫
Émile Ollivier	埃米勒·奥利维耶
Janvier de la Motte	让维耶·德·拉莫特
demi-monde	暗娼阶层
Rouher	鲁埃
Bourbon Palace	波旁宫
Senate	参议院
Count Bismarck	俾斯麦伯爵

Benedetti	贝内代蒂
Richard von Metternich	理查·冯·梅特涅
Mme. Metternich	梅特涅侯爵夫人
King Henry	亨利国王
Mgrs. Pie	皮耶
Dupanloup	迪庞卢
Boulevard d'Antin	翁贝托一世
Humbert I	波拿巴派
Bonapartes	恺撒大帝
Cæsar Imperator	保皇主义者
Royalists	朱尔·费里
Jules Ferry	《拿破仑三世的宫廷》
Court of Napoleon III	卡尼尔·德·卡萨尼亚克
Bauer	鲍尔先生
Queen Isabella	伊莎贝拉二世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Bishop of Nancy	南希主教
Bordeaux	波尔多
Mgrs. Donnet	多内蒙席
Pius IX	庇护九世
Romagna	罗马涅地区
Mgrs. Georges Darboy	乔治斯·达尔博伊蒙席
Persigny	佩尔西尼
Count W	W伯爵
Faubourg Saint-Germain	圣日耳曼区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王国
Jerome Bonaparte	热罗姆·波拿巴
Mlle. de Montijo	蒙蒂若小姐
Versailles	凡尔赛宫
Chamber of Deputies	国民议会

Palais-Royal	王宫
Adolphe Billault	阿道夫·比约
Magne	马涅
Corsica	科西嘉
Moniteu	《通报》
Prangins	普朗然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Victor Emmanuel	维克多·埃玛纽埃尔
Sadowa	萨多瓦
Prince Metternich	梅特涅公爵
Granier de Cassagnac	安坦林荫大道
Belle Poule	贝勒-普勒号
Don Juan	唐·璜
Courbevoie	库尔布尔
Henry IV	亨利四世
Jacques-Victor-Albert	雅克·维克多·阿尔伯特
Charles de Rémusat	查理·德·雷米萨
Haussonville	奥松维尔
Marthe Camille Bachasson	玛尔蒂·卡米尔·巴克森
Élie Louis	埃利·路易
Charles de Montalembert	查理·德·蒙塔朗贝尔
Thiers	梯也尔
Galliera	加列拉
Conciergerie	巴黎古监狱
Eugène Jolibois	欧仁·若利布瓦
Bonapartist	维克多派
Hippolyte Taine	伊波利特·泰纳
Count Cavour	加富尔伯爵
Empress Charlotte	夏洛特皇后
Sphinx	斯芬克斯

Goltz	戈尔茨
Mayence	美因兹
Francis Joseph	弗朗茨·约瑟夫
Drouyn de Lhuys	德律安·德·鲁斯
Rhineland	莱茵兰
Bethlehem	伯利恒
Comte de Chambord	尚博尔伯爵
Orleanists	奥尔良派
Louis Philippe	路易·菲利普
Coblentz	科布伦茨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Frohsdorff	弗罗斯多夫
Goritz	格里茨
Duc d'Orleans	奥尔良公爵
Comte de Paris	巴黎伯爵
Prince de Joinville	茹安维尔亲王
Duc de Nemours	内穆尔公爵
Duc de Montpensier	蒙庞西耶公爵
Duc d'Aumale	奥马尔公爵
Titan	泰坦
Henri Chevreau	亨利·谢弗罗
Jean-Baptiste Duvergier	让-巴普蒂斯特·迪韦吉耶
Riché	里谢
Eugène Jolibois	欧仁·若利布瓦
Adolphe Vuitry	阿道夫·维特里
Haussmann	奥斯曼
Félix Esquirou de Parieu	菲利克斯·埃斯基鲁·德·帕里厄
Alexandre Florian Joseph	亚历山大·弗洛莱恩·约瑟夫
Magne	马涅
Louis Buffet	路易·比费

Ernest de Royer	欧内斯特·德·鲁瓦耶
Ernest Pinard	欧内斯特·皮纳尔
Piétri	彼得里
Duchesse Décazes	德卡兹公爵夫人
Sainte-Aulaire	圣奥莱尔
Duc Décazes	德卡兹公爵
Odilon Barrot	奥迪隆·巴罗
Devaux	德沃
Auvergne	奥弗涅省
Riom	利永
Clermont-Ferrand	克莱蒙费朗
Latour	拉图尔
Louis Juchault de Lamoricière	路易·尤查特·德·拉莫里西埃
Faubourg Saint-Antoine	圣安东尼区
Charles Albert	查理·阿尔伯特
Turin	都灵
Émile de Girardin	埃米勒·德·吉拉尔丹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人民代表》
Proudhon	蒲鲁东
La Montagne	拉蒙塔涅
Victor Prosper Considérant	维克多·普洛斯伯·孔西德朗
Revolution of February	二月革命
Alexis de Tocqueville	亚力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Jules Favre	朱尔·法夫尔
Jules Simon	朱尔·西蒙
Émile Ollivier	埃米勒·奥利维耶
Alfred Le Roux	阿尔弗雷德·勒鲁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Duke of Reichstadt	雷希施塔特公爵
Blücher	布吕歇尔

Longchamp	隆尚
Battle of Magenta	马真塔战役
Battle of Solferino	索尔费力诺战役
Suresnes	叙雷纳
Mont. Valerien	瓦勒里昂山
Cent-Gardes	百人卫队
Saint-Cyr	圣西尔军校
Austerlit	斯特里茨
Bois de Boulogne	布洛涅森林
Raimbaud	兰博
Antoni Berezowski	安东尼·贝雷佐夫斯基
Exposition	世界博览会
Maximilian	马克西米利安
Segris	赛格里
Devienne	德维耶纳
Louis Étienne Arthur Dubreuil	路易·艾蒂安·亚瑟·迪布勒伊
Conseil d'État	最高行政法院
Legislative Corps	立法团
Rue du Mont-Thabo	蒙塔波尔街
Jacques-Louis Hénon	雅克-路易·埃农
Léon Gambetta	莱昂·甘必大
Latin Quarte	拉丁区
Bohemianism	波西米亚主义
Neo- Bohemianism	新波西米亚主义
Macmahon	麦克马洪
Prince of Wales	威尔士亲王
Hamlet	哈姆雷特
Palais de Justice	司法大厦
Madeleine	玛德莱娜教堂
Don Quixote	唐·吉诃德

Joachim Murat	约阿希姆·缪拉
Cayenne	卡宴
Le 19 Janvier	《1月19日》
Meuse	默兹河
La Moncelle	拉蒙塞勒
Trouville	特鲁维尔
la Poëze	拉·珀兹
la Maréchale	拉·玛蕾莎勒
Louvre	卢浮宫
Saint-Germain l'Auxerrois	圣日耳曼奥塞尔
Avenue Malakoff	马拉科夫大街
Dr. Evans	伊文斯大夫
Square of Courbevoie	库尔布瓦广场
Evreux	埃夫勒
Hastings	黑斯廷斯
Wilhelmshöhe	威廉肖赫城堡
Countess de Mercy-Argenteau	梅西-阿尔让托伯爵夫人
la Moskawa	拉·莫斯科
Count Von Arnim	冯·阿尔尼姆伯爵
Norman	诺曼人
Teuton	条顿人
Belfort	贝尔福
Rhine	莱茵河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从格拉古兄弟党争、苏拉独裁到马略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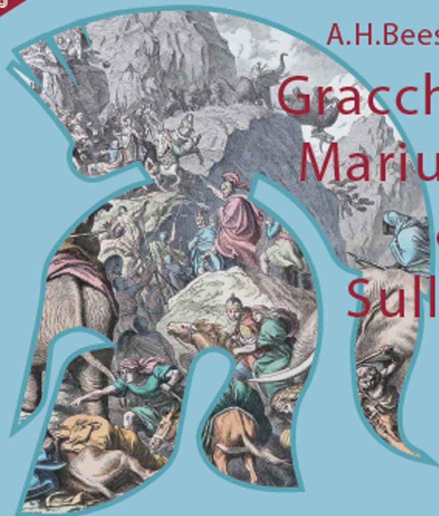
中画史鉴

全景插图版

015

[美] A.H.比斯利 著　黄苏敏 译

A.H.Beesly



Gracchi Marius & Sulla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全景插图版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从格拉古兄弟党争、苏拉独裁到马略改革

[美] A.H.比斯利　著　黄苏敏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从格拉古兄弟党争、苏拉独裁到马略改革 /（美）A.H.比斯利著；黄苏敏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146-1659-0

Ⅰ．①罗…　Ⅱ．①A…②黄…　Ⅲ．①罗马共和国 - 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7791号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从格拉古兄弟党争、苏拉独裁到马略改革

［美］A.H.比斯利　著　黄苏敏　译

出 版 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李　媛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　　编：100048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 权 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19.75

字　　数：254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ISBN 978-7-5146-1659-0

目录

第1章 革命前奏
第2章 提比略·格拉古
第3章 盖约·格拉古
第4章 朱古达战争
第5章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第6章 罗马军队
第7章 萨图尼努斯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
第8章 同盟者战争
第9章 苏尔比斯·鲁弗斯
第10章 盖乌斯·马略与科尼利厄斯·秦纳
第11章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第12章 苏拉在雅典和亚洲
第13章 苏拉在意大利
第14章 苏拉的独裁统治及苏拉之死
第15章 苏拉的反动政策
专有名词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第1章　革命前奏

精彩看点

革命前罗马的阶级构成——罗马公地——早期农业法改革尝试——罗马奴隶制——第一次奴隶战争——贵族、权贵派、平民派、骑士——罗马社会结构——海外行省的形势

公元前2世纪后期，古罗马在世界文明中独领风骚、傲视群雄。三百年间，它将自己的邻邦逐一击败，成为意大利的霸主，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对外征服史。公元前146年，罗马彻底击败自己的宿敌迦太基，并一举吞并了希腊。公元前140年，一场叛乱为罗马除去了维里亚图斯。维里亚图斯是一位藐视罗马统治的将领，他曾多次使罗马军队在西班牙溃不成军，他指挥的游击战是西班牙史上的一段传奇。罗马共和国通过公元前133年的努曼提雅焚城惨剧与公元前132年对西西里岛奴隶起义的血腥镇压，向敌人傲慢地宣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至此，除了一些小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一个冒名顶替帕加马王国[1]后裔的人公然质疑罗马继承阿塔罗斯三世遗产[2]的合法性之外，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寸土地都臣服或受制于这个国土面积不及现在伦敦一半的城邦。约一个世纪后，曾为罗马共和国的强盛立下卓著功勋的政体不复存在。

描述罗马的对外战争并不是本书的重点。虽然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从没停止附和胜利者的最强音，那些凯旋的将士也在自己的国家逐渐占据了重要职位，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像萨姆尼特战争和

布匿战争那样引人关注，因为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以城市为战斗舞台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上。百年革命的第一阶段（前五十年）开始于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结束于亚克兴角战役。这一阶段也是共和体制式微、君主专制萌芽的重要时期。但想要全面了解这五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必须先介绍一下罗马的阶级构成。

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这一时期的罗马社会，除了奴隶阶层，还包括两个阶层。其中一个是统治阶层，由元老构成，他们是国家宪法的制定者。当时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因为罗马共和国的简称是“SPQR”，即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另一个是被统治阶层，即依附民，他们是社会统治阶层以外的阶层。也许我们对“patrician”一词比较熟悉，它是由“patre”派生出来的，现在的意思是贵族，但这个词一开始指借助婚姻获得成功的人，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的含义。元老与依附民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最温和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类似于奴隶解放时期保护人和自由民（解放了的奴隶称自由民）之间的关系。元老阶层与依附民阶层的存在由来已久，而且众所周知。除此之外，平民阶层正在悄然兴起。依附民与平民的区别是：依附民不享有政治权利而平民享有政治权利。关于平民阶层的兴起众说纷纭，他们可能是解除了依附关系的依附民（类似于奴隶的解放），可能是通过入伍、经商或从事手工艺劳动等被罗马社会接受的外国人，也可能是通过奋斗获得平民权利的依附民。“平民”一词究竟是源于塔林组织还是它的前身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新的政治阶层正在崛起。根据当时的宪法（据说由古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起草），罗马每一个自由人都享有公民权，拥有在百人会议上投票的权利。然而，虽然平民享有公民权和贸易权，并且可以拥有私人财产甚至指定财产继承人，但他们要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才能获得与元老阶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一路披荆斩棘，一步步从贵族那里获得通婚权、入仕权，其间，保民官是推动他们获得政治平等权的源动力。保民官的前身是平民法官，公元前494年的一次平民撤离运动[3]使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初露锋

芒。他们代表罗马人民的自由权利，就像今天的报业代表民众的自由权一样。保民官存在的意义是批评当政者。言论自由的温床催生了行动自由。凭借对外战争，罗马征服邻邦，称霸意大利，进而在地中海傲视群雄。与此同时，罗马国内也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寡头政府通过改革成为财阀集团，接着改革政府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君主政治。这里我们不会详细描述罗马早期的变革过程，因为政治革命已经结束，我们要将篇幅留给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有其深刻的根源，实际上，有时候这种根源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源。我们不妨拿英国的历史做个比较，因为英国历史在这方面与当时的罗马非常相似。英国的政体，一开始是寡头统治的君主政体，寡头阶级与富豪阶级间先是对抗，继而联合，这种联合表面上看似平等，但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寡头手中。当时的罗马，中产阶级试图通过拉拢下层民众，迫使上层阶级分享部分特权。但上层阶级反过来也可能求助自己的同盟。罗马的元老贵族的政治手段与今天的巨头大亨的手段大同小异，虽然他们发现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正在取代政治问题，但他们还是希望前期政治家们殚精竭虑未能解决的政治问题能在这一时期解决。然而，纵观历史，只要涉及富人与穷人、资本家与劳工、地主与佃农之间利益的问题，就会变得极其敏感。政治解放带给人们言论自由权，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里，我们需要描述一下两千多年前格拉古兄弟为了罗马的改革事业牺牲自己的过程。今天，由于生活在工业社会，我们对工资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土地问题的关注。然而危机产生的原理是一样的，当时罗马的社会危机基本上属于农业范畴。因此，在描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罗马公地的概念。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希腊的阿克提姆与安东尼决战，罗马战船采用“钳子”战术，击溃了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合舰队（480艘战舰），史称“亚克兴角战役”。这幅图描绘了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战役中击溃安东尼和埃及艳后的联合舰队的场景



布匿战争是在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两个古代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著名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场景

最初，罗马周围的耕地都是由附近居民开垦的，随着对粮食和衣物的需求越来越大，一部分人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军队从这些居民中招募士兵，因此他们受到兵役和土地税的双重剥削。于是，为了生存，一些小农户被迫向城里的富人借钱，由此催生了高利贷和债主阶层。不论当政者采取怎样的措施，还是无法抑制债主人数与债款金额的增长。另外，罗马每征服一座城市，都会没收它的一部分土地，并通过下述四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处置没收的土地：第一种，驱逐原有土地上的地主，将一部分罗马人迁到这里定居。这部分罗马人几乎全是平民，迁徙时他们只能带开垦土地所需的资本，定居后他们依旧

保持罗马人的身份。第二种，将没收的土地卖掉。和现在一样，出售土地前，征服者会绘制一张关于土地的尺寸和边界的平面图，由国家保存。第三种，允许私人在缴纳地税[4]或上交部分农产品的前提下“占有”这块土地。土地持有者可将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进行买卖或使用，并且他的后代享有土地继承权。第四种，一部分土地充做公共牧场，但牧场的使用者必须根据牲畜数量向土地持有者纳税。这种制度效果显著，它符合了制度的制定者，即元老贵族的利益。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元老贵族是这一制度的唯一获益者。穷人没有能力购买罗马之外的大片土地，想要购买土地的穷人势必陷入债务危机，或是受到邻近富人的欺凌。如果穷人购买了土地，富人们会让自己的牲畜践踏他们的田地，或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甚至将他们蓄为奴隶。另外，富人们会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作为牧场，让依附民和奴隶照管他们的牲畜，于是出现了大庄园或大农场。这些庄园和农场后来成为罗马和意大利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自由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募兵场地的缩小，奴隶队伍越来越庞大，他们忍受着奴隶主惨无人道的压迫。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劳而获者挥霍无度，在罗马掀起一股奢靡之风。随着对外征服的不断扩大，这股风气日益盛行。这一社会现象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催生了一个比奴隶阶层地位更低的无名阶层，他们遍布意大利，遭受非人的待遇。贵族之外的平民是否有权占有土地的问题无从考证，但土地持有者可以将自己的土地随意卖给平民。因此，土地可能落入任意一个阶层或任意一个地区的富人手中。因为这些被视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实质上归国家所有，并非真正的私有财产，所以引起了穷人的嫉妒与不满。

当国家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或正在进行殖民活动时，这种不满还处于可控状态。但在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年，意大利几乎没有新的土地可以分配，也没有占领邻国土地的机会。这时，要求归还土地的呼声日益高涨。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5]曾尝试收回公地，结果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一个多世纪后，利基尼亚法规定每

人持有的公地面积不得超过五百尤格拉[6]，另外还须缴纳自己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或五分之一的畜牧产品。通过利基尼亚法，农民希望土地持有者归还超额土地，或者政府将没收的土地低价卖给穷人。制定律法的人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改革目标，甚至没有想过这些措施将会产生的效果。统治者试图用一种混乱方式禁奢，在政治和农业活动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折中办法。利基尼亚法还规定公共牧场上蓄养的大家畜不得超过一百只，小家畜不得超过五百只，并规定了雇用自由劳动力的人数。自由劳动者必须如实上报农产品的产量，以便政府按时收取律法规定的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或五分之一的畜牧产品。可能因为这项制度难以贯彻，所以有了税收官一职。这些律法希望通过有效的措施解决以下问题：贫民的不满、富民的政治弱势，以及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但对于当时千疮百孔的政治局势来说，已经于事无补，就像一个江湖郎中不能仅靠一贴膏药治好瘸腿、盲眼或肺结核。因此，利基尼亚法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律法制定者利基尼亚斯成了第一个因违背这项法律而被起诉的人。公元前232年，弗拉米尼乌斯制定了一项将塞农人[7]的土地分配给平民的法律。由于元老院和贵族的反对，最终这片土地并没有被分配给平民。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因为任何有关土地分配的法律都不能损害特权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有先例可循。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面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成为必争之地，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也许是因为争夺者拥有的土地较少，所以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获得土地的机会；也许是争夺者尚未意识到这种贪欲将会带来的危险，他们只是想占有土地并将其转卖给富有的邻居；也许这些竞争者只是想蓄一两个奴隶，就像当年美国那些以蓄黑奴为基本目标的“吝啬的白人”一样。总而言之，先前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平息人们对农业用地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在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存在这样一种大趋势：社会逐渐分化为富豪阶级和赤贫阶级。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数年后，据说罗马的四十万人口中，只有两千人可以称为真正的富人，但这个国家却聚敛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对任何一个爱国者来说，小土地主的消失不仅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还

极有可能威胁整个国家的存续。一个乐观的保民官也许希望通过补给自由劳动力的方式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但他的穷人支持者却希望直接得到土地。自私与博爱如影随形。相较于稍有优势的罗马贫民，政治家分配土地的提议更希望得到意大利穷人的支持。



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尝试收回公地，损害了大地主和奴隶主的利益，在其第三次执政官卸任后立即受到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幅图描绘了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被执行死刑的场景

接下来需要谈一谈意大利的奴隶状况，因为讨论完罗马公地的性质后自然要讨论罗马的奴隶制度。正是目睹了大部分奴隶的生存状况，格拉古兄弟才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奴隶制度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它不仅损害了奴隶的身心健康，还损害了奴隶主以及他们生活的土地。总之，这项制度有百害而无一利。随着对外征服战争愈演愈烈，奢靡之风日益盛行，堆金叠玉的人屡见不鲜，对奴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据说当时的提洛岛[8]每天买卖的奴隶多达一万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

道格拉古时代罗马的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有数据显示奴隶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但很可能实际情况远远高于这个数据。贸易、采矿、放牧、征税等行业都普遍使用奴隶。如果没有选举权的意大利人即使一贫如洗也会被招募入伍，那么业主使用奴隶的目的就不难揣测，因为只要拥有了奴隶，就可以终身享受奴隶的服务。



一旦沦为奴隶，命运往往非常悲惨。他们不但要从事繁重的劳作，还要忍受奴隶主非人的虐待。这幅图描绘了奴隶的脖子上被挂了标价牌出售的场景

大革命开始前约三十五年，马其顿的征服活动为奴隶贸易注入了强大动力。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盛产奴隶，这些奴隶大多来自非洲、亚洲、西班牙等地。当时有专门负责向奴隶市场输送奴隶的组织，奴隶贩子一般是罗马军队里的一些普通随行人员。当一批奴隶被送到目的地后，奴隶贩子首先将他们记录在案，然后卖出。被卖去从事家政服务的奴隶无疑是最幸运的。古罗马喜剧中狡猾而又喜欢恶作剧的奴隶常常与小主人一起对抗长辈，他们的人生际遇即使没有那么理想，也绝不会让观众觉得悲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惨绝人寰的一幕。奴隶的性命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中，残忍且反复无常的奴隶主常常对他们严刑拷打。如果某个奴隶主被起诉，想要证明他有罪，首先要对他的奴隶进行严刑逼供。我们在美国文学作

品中看到的懒惰、滑稽、油头滑脑的黑奴充满荒诞古怪的幽默感，奴隶主宽大的羽翼为他们遮风挡雨，但这些是对大农场制度的黑暗事实的掩饰。当时的罗马，个别奴隶主的宽厚不能掩盖整个奴隶主阶层的暴虐，他们对奴隶惨无人道的暴行最终使自己作茧自缚，也使罗马共和国走向了灭亡。从许多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被罗马征服的国家对罗马的奴隶制度充满恐惧。为避免沦为奴隶，常常有人在城市沦陷前自杀，甚至出现全城集体自杀的惨象。也会有人奋起反抗，杀死奴隶贩子，但有时也有人被迫亲手杀死自己的至亲。譬如，西班牙一个男孩在城市沦陷前，杀死自己的三个姐妹后绝食自杀。由于恐惧，有些妇女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如果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当时的意大利并未出现大农场制度，那么上述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以及奴隶绝望的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等，足以说明当时罗马奴隶的悲惨状况。最骇人的惨象出现在西西里，那里的奴隶制度令人窒息。除了从事家政服务的奴隶，西西里的所有奴隶都被烙上烙印，常常戴着锁链工作，最不幸的是牧羊人。由于缺衣少食，奴隶们常常会明抢暗偷，他们的主人对此一般持默许态度，甚至鼓励他们偷抢。当政者害怕得罪奴隶主，因此对这些违法行为姑息纵容。因为奴隶市场需求旺盛，所以不仅需要从外地输送奴隶，还需要奴隶大力繁育后代。毫无疑问，当时罗马的情况与近代美国一样，在如何管理奴隶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对于养育婴幼儿奴隶的做法也是大同小异。有些奴隶主会仁慈地将新生的奴隶养大，然后换取更多劳动力。但大多数奴隶主会将新生的奴隶卖掉，然后购买新的奴隶，因为这种做法更加经济，所以十分流行。当时的社会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奴隶们一方面被寒冷、饥饿、陌生的气候折磨，另一方面还要在异国他乡忍受羞辱，常常赤身裸体，朝不保夕——这是身为奴隶的命运。相比之下，死亡几乎是一种解脱。最终，罗马境内的许多地方，包括罗马、明图尔诺、锡纽萨、提洛岛、马其顿以及西西里岛等地，几乎同时爆发了奴隶起义，或者图谋起义。奴隶们像猛兽一样，绝望地扑向贪婪的奴隶主。这些叛乱全部遭到血腥镇压，参与者被严刑拷打，或被集体钉死[9]。各种惨状让人目不忍视。实际上，第一次西西里奴隶

起义爆发时罗马政府并不知晓，到了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的那一年（这个巧合有着非凡的意义），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有必要派一位执政官去镇压。奴隶起义的导火索是埃纳[10]的奴隶主大摩费流斯和他妻子梅格里斯的暴虐。绝望的奴隶们由一个叫尤努斯的叙利亚籍奴隶率领。尤努斯曾预言自己将成为国王，但许多人并未在意他说的话，反而取笑他何时登基。他在埃纳集结了四百人揭竿而起。由于尤努斯能从口中喷火，这些伎俩和预言使他的追随者对他充满信心。起义者几乎屠杀了埃纳所有的男人，只留下一部分军械工。他们强迫军械工戴上脚镣，打造兵器。大摩费流斯和他的妻子被带入剧院，受尽折磨与羞辱。在大摩费流斯苦苦哀求下，一些奴隶开始有所动摇，但赫米亚斯和另一名奴隶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头，而他的妻子被女奴们抛下悬崖了。因为大摩费流斯的女儿之前对奴隶比较友善，所以赫米亚斯和其他奴隶不仅没有伤害她，还将她护送到卡塔纳。此时，尤努斯已被拥立为王，自称安提阿[11]，并任命阿开俄斯为将军。之后，克里昂率领的五千名奴隶加入了他的起义军，随后尤努斯又召集了一万人。据罗马历史学家弗罗鲁斯记载，尤努斯率领的起义军相继打败四名地方官率领的军队，起义军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十万人，并控制了除个别城市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公元前134年，执政官弗拉库斯被派去镇压奴隶起义，结果不得而知。公元前133年，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庇索俘虏了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梅撒那，杀死了八千名奴隶，并处死了所有战俘。公元前132年，P.拉比利亚斯攻陷了起义军占领的陶洛米尼姆和埃纳。这两个城市位于悬崖上，地势十分险要，几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此攻城一度受阻。最后，在城内叛徒的协助下，围攻取得成功。在攻打陶洛米尼姆时，政府军遭到顽强抵抗。据说城内粮草断绝，人们开始吃孩子和女人，最后甚至吃掉了一部分男人。克里昂的兄弟科曼诺斯被带到城外，所有的俘虏先被严刑拷打，后被抛下山崖。克里昂曾在埃纳城发起突围，但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尤努斯仓皇出逃，被罗马士兵从他躲藏的矿洞里拖出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厨师、面包师、搓澡师和弄臣。据说尤努斯后来得了与苏拉[12]和希律王[13]一样的疾病，死在狱中。之后，P.拉比利亚斯又钉死了两万名

奴隶，叛乱的最后一簇火苗终于在腥风血雨中被扑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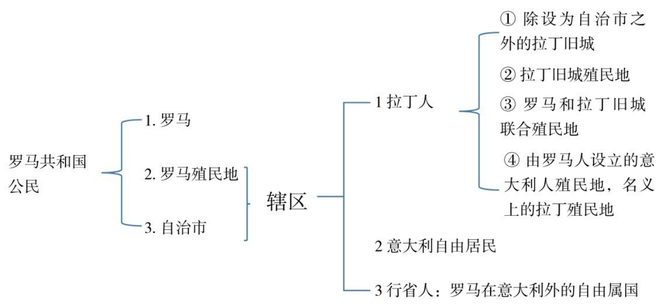


叛乱的奴隶被钉死在木架上

当时罗马社会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穷人的不满、富人的挑衅、奴隶的非人境遇、资本的较量，以及意大利动荡的局势和社会道德的日益堕落，使罗马共和国迫切地呼唤改革。上文提到，平民阶层的产生过程并没有定论，但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从元老阶层争取政治权利的方式。自从开始施行利基尼亚法，上层平民渐渐和元老阶层融合，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和平渐变的过程、一个“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复合贵族”阶层。复合贵族指那些自己或父辈身居高位的人，通俗地说，就是原有贵族和城市新贵。新贵族迅速从下层平民中脱离出来，他们像现在的暴发户一样，模仿贵族的一言一行，并很快超过原有贵族。约在格拉古时期，罗马共和国的两大党派由这些上层平民和贵族把控。无法确定权贵派和民众派诞生的具体时间，但新名称很快取代了原有的称呼，就像托利党成了保守党，辉格党成了民主党。贵族和平民成了过时的称呼，他们在政治上不再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们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都享有选举权，都有担任公职的权利。罗马最强劲的对手迦太基遭到毁灭后，罗马开始称霸四海。一次又一次的征服使罗马国库充盈，穷奢极侈的生活带动了炫富和贪婪之风。担任公职成为掠夺的代名词，官员们渎货无厌，不管是权贵派还是民众派，都罔顾人民的利益，打着元老院的旗号或凭借人脉滥用职权、贪污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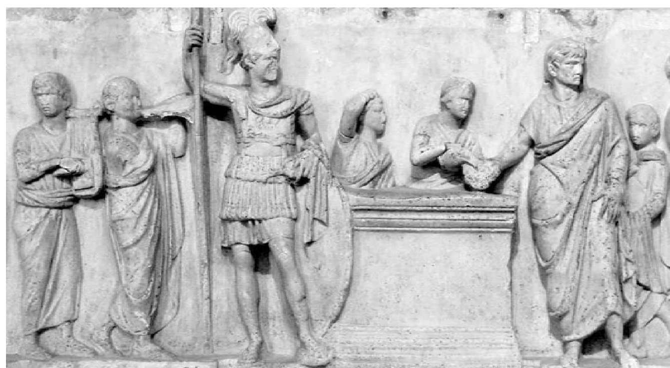
贿。这么说可能对一些洁身自好的好人不公平，但绝对没有污蔑这两大党派。严格来说，权贵派和民众派还称不上党派，只能说是派系。很难判断动机好坏会对个人产生多大影响，因为他们往往用好的动机掩饰卑劣的手段，但却掩饰不住可鄙的本质。正直的权贵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持元老院的优势，他们始终坚信元老院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廉洁的民众派，譬如格拉古，看到元老院已经病入膏肓，希望通过民众的选票推翻它。但虚伪贪婪的政客，不论是权贵派还是平民派，也不论他们主张保守还是激进，政治观点都以个人的私利与野心为出发点。当时世风日下，每个派系都是小人当道。当政者及其帮凶是一群卑劣无耻的乌合之众，他们将个人权势作为唯一的追逐目标。风雨飘摇中的罗马共和国像一根骨头一样，任由狼犬撕抢啮咬。

接下来介绍一下骑士阶层。“骑士”一词的定义后来逐渐扩大，但在当时仅指未进入元老院的富人。一位骑士有可能支持权贵，也有可能倒向连一匹马也买不起的穷人，这一切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下文会详细介绍骑士阶层如何在权贵与穷人之间游移。骑士阶层没有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从而监督和制约权贵派与平民派，他们选择支持能够或愿意满足他们贪欲的一方。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罗马，甚至遍布整个意大利。因此，这个逐渐走向分裂的国家，到处都能嗅到政治风暴的气息。下图清晰地展现了社会革命爆发前夕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结构：



罗马及其殖民地和自治市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从组

织结构上看，罗马的殖民地就是一个小型的罗马。被派往这里的驻守人员要么保留原有职务，要么服从于罗马派来的地方官的管辖。虽然这部分人曾居住在罗马城内，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罗马公民，由于他们和罗马人之间的通婚，民族间的界限渐渐被淡化。辖区是罗马殖民地和各个自治市的统称，每年罗马政府都会派遣地方官员主持这里的司法工作。自治市一般是被征服的意大利城邦，人民享有通婚权和贸易权，但没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这些自治市有些实行自治，有些由罗马派来的地方官管辖。社会革命爆发前，自治市的人民争取到了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但仅限于非常问题。譬如，关于农业法的立法问题，他们可以在罗马部族会议上投票。虽然自治市隶属内事裁判官的管辖范围，但罗马每年会另派官员负责执法。



身着战袍的人为古罗马骑士阶层

拉丁人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臣服于罗马，加入拉丁殖民地的罗马人不再保留罗马公民的身份。拉丁殖民地和拉丁旧城的内部管理是否存在不同还无法确定，他们可能拥有贸易权和通婚权，也可能只有贸易权，但可以确定他们没有投票权和担任公职权。拉丁人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但获取途径在当时备受争议。历史学家李维曾提到一条罗马法律，规定拉丁人只要让自己的子嗣留在殖民地接替自己的位置，就可以移居罗马并登记入册，获得罗马公民权。当时有一些人通过正规或非正规途径迁居罗马并获得了公民权，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另有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后期的拉丁人可以通过在本地担任地方行政

官的方式获取罗马公民权。

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几乎都与罗马签定了协约，因此他们被称为同盟。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政府，但必须向罗马提供士兵、船只和水手。

格拉古时期，拉丁人和所谓的同盟对罗马人的态度是敢怒不敢言。他们也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是富有的土地主和有产阶级，他们一方面与罗马的富人阶级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对罗马官员的傲慢非常不满；另一个是穷人阶级，他们遭到本地富人和罗马富人的双重压迫，或负债累累，或被逐出田园沦为奴隶，或被迫攀附权贵以期分得田产。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罗马对它在协议之下设立的当地自治政府的干预，而是意大利人在严苛的剥削压迫下超负荷劳动。在朱古达战争中，由于战败，拉丁军官依据严法被处决，但罗马士兵却有权在民事法庭上诉。一开始，按照约定，罗马政府应该从罗马和同盟国中平等募兵，但后来战争的重任和最艰巨的任务都落在了同盟国身上，同盟军与罗马军的比例高达二比一。军队甚至不能征召没有一定财产的罗马人入伍，但此项规定并不适用于意大利人。在民事上，意大利人同样遭到残酷不公的对待。一位执政官的夫人想借用代诺[14]的男浴室，因为没有及时腾出并清理浴室，首席地方官M.马里厄斯被剥光衣服，在集市上鞭笞示众。一个自由牧民看到有人乘轿经过维努西亚，打趣地问轿子里是不是装着一个死人。乘轿者是一个罗马青年，他甚至没有任何职位，却让人用捆带将这位牧民活活抽死，理由是自己虽然有点懒，但是个活人。总之，富有的意大利人与原来的平民一样，迫切地想获得罗马公民权。但罗马人不仅停止给予整个意大利群体罗马公民权，甚至对授予罗马人公民权也谨小慎微。穷人对本族的富人积怨已久，如果有人提议攻击有产阶级，不管是罗马人还是意大利人，都会赞成。当然他们最痛恨的还是罗马人，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压迫自己的敌人。

民众的怒火在意大利渐渐蔓延开来，社会革命一触即发。意大利

半岛之外的殖民地局势也不容乐观。罗马与维里亚图斯的斗争和努曼提雅战争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军队绝不是一个可以赚取军功和展示英雄豪气的地方。如果说西庇阿[15]秉承了罗马的将才，格拉古弘扬了共和国的正义，那么其余高官则是在罗马军事史上留下了斑斑劣迹。罗马的将领常常为了个人私利发动战争，他们甚至无视国家秩序，一旦某一地区风平浪静，他们会想方设法兴风作浪，通过巧取豪夺、收受贿赂等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袭击装备不全的野蛮人，获取廉价的胜利，接受虚假的荣誉。游手好闲的骑士常常被打败，可有时在外省受到的耻辱在罗马却成为荣耀，于是，这些人一次次故伎重演。腐败的不仅是高官将领，国家和军队也已经蛆虫横生。国家往往发动没有丝毫价值的战争，它不为开疆拓土的梦想而战，也不为击败汹汹来犯的野蛮侵略者而战，而是为了消灭商业对手。由于城市日趋衰落，军队也渐渐无兵可募，维持社会秩序变得举步维艰。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带着大批随行厨师、演员以及东方奢侈品，满足于暗杀敌方将领、残忍屠杀无辜居民带来的胜利。相较于陆军，罗马海军更加无能，他们任由海盗在地中海肆虐：掠夺岛屿、发动战争、掳走人口充作奴隶。罗马纵容帕提亚人从叙利亚国王那里夺取了波斯、巴比伦、米堤亚等地，致使一个东方大国悄然崛起。罗马奉行“分而治之”的治国理念，这四字箴言“卑鄙自私”的面目在这件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泱泱大国，利用怯懦卑劣的政治手段，挑唆半开化的属国互相对抗，煽动它们彼此猜忌，以此避免他们联盟或在残酷的压榨下与自己兵戈相向。各行省的奴隶起义、小规模的战争和海盗的侵扰此起彼伏，但这些行省一般得不到宗主国的保护和援助。罗马作为一个冷酷的霸主，一味地纵容大批债主和收税人将地方总督留下的财物洗劫一空。杂滥松懈的政策导致各行省民不聊生，腐化堕落、巧取豪夺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形势雪上加霜。



努曼提雅战争。这幅图描绘了城内居民由于害怕变为奴隶，在城破那一刻自杀的场景

罗马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失职霸主。放弃国家职责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国家内部的衰退。当一个国家的小农阶层被榨干；当奴隶和农奴成为国家的主要劳动力；当大片土地被践踏或供权贵娱乐；当每个人都喊着口号却鲜有真知灼见；当奸商当道甚至在法庭上作威作福；当地方官以罪犯地位的高低为依据量刑，从而谋求升迁；当交易场所变成赌场，议员和权贵成为最大的赌徒；当贪污腐败成为普遍现象；当社会变成无耻、贪欲、欺骗、污秽的温床；当法庭的审判暴露出国家已成为秃鹰循味夺食的腐肉；当部族内部充满无耻之徒；当外族入侵者与众多“德高望重”的绅士里应外合对城市进行劫掠，其残忍程度令普通盗匪都望尘莫及；当所有这一切成为社会的基调时，只能证明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

有一番景象更让人匪夷所思。在全世界看来，富人阶层和贵族阶层同为一群一无是处的乌合之众，但他们之间也互相仇视。意大利人忌恨罗马人，但他们的境遇相较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外省人略胜一筹。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正在酝酿一场风暴，试图报复给他们带来苦难的阶级敌人。随着大量进口奴隶生产农产品，本土产业疲于应付，人口不断减少，军队日渐堕落，统治者畏强欺弱，将战争作为一种投机

工具，外省常遭到侵略者的掠夺，大城市里充斥着愚昧的迷信、骇人的恶行、醉生梦死的奢靡之风……改革已迫在眉睫，此刻，谁会是那位力挽狂澜的英雄？

注解

[1]　帕加马王国（前281—前133），古希腊时期的国家，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译者注（本书除原注外均为译者注，不再另行注明）

[2]　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驾崩时无子嗣，留下遗嘱将帕加马王国并入罗马。

[3]　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也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撤离运动。

[4]　指以庄稼年产量的十分之一作为税金或因在公地放牧征收的税款。

[5]　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曾于公元前502年、前493年、前486年三次担任执政官。在最后一次执政官卸任后，立即受到控告，被处以死刑。

[6]　大约三百一十英亩。

[7]　塞尔特史上有两个部落，一个在高卢，一个在意大利，即塞农人。公元4世纪塞农人开始了与罗马人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公元前283年，塞农人被逐出意大利，他们的土地沦为殖民地，被分给罗马公民。

[8]　爱琴海岛屿。

[9]　古罗马处死人犯的一种方式，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10]　西西里著名城市。

[11]　塞琉古国王的名字。

[12]　本书主角之一，罗马共和国著名统帅、政治家、独裁者。

[13]　希律王（前74—前4），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王，据说死于肾病和坏蛆并发症。

[14]　意大利城市。

[15]　这里是指罗马共和国统帅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第2章　提比略·格拉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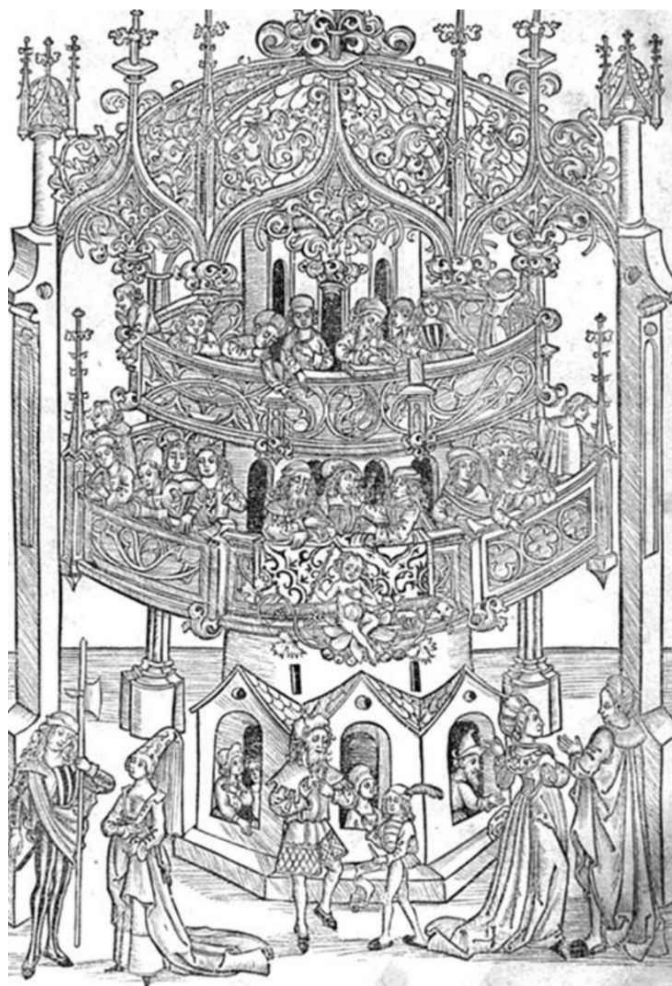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农业法》议案——他们的智慧——土地持有者的不满——屋大维的阻挠——为提比略·格拉古的行为辩护——提比略·格拉古未实行的改革——提比略·格拉古再次竞选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动机——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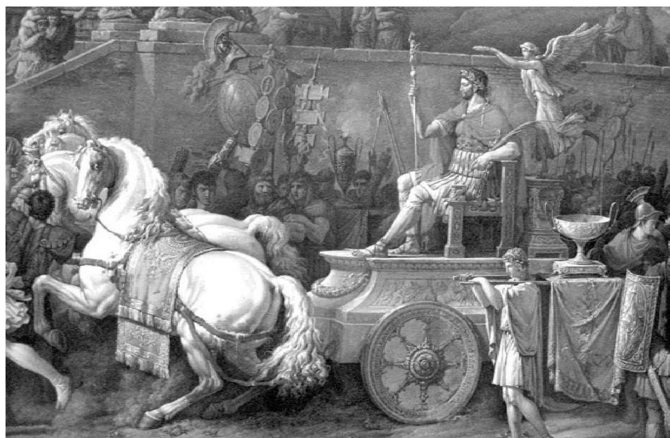
　　这段历史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征服努曼提雅和迦太基的名将——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史称“小西庇阿”。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将军为人友善，骁勇善战，治军严明。生活中，他非常喜爱希腊文化，同时秉承了古罗马的朴素之风，但他对城市暴民充满鄙夷，并经常直言自己的观点。当他关于自己的妻舅提比略·格拉古的死亡的言论遭到驳斥时，他大声呵斥道：“闭嘴！你们不配做意大利人！当初我将你们押送到这里，难道现在我会因为你们身上除去了枷锁就惧怕你们？”他憎恶社会陋习，讨厌追求阴柔之美的艺术。他用尖锐的语言表达了对歌唱舞蹈的厌恶：“我们的孩子正在学习低贱的技艺。从古至今，自由人家的孩子都不愿学习唱歌，这是一门可耻的技艺。但现在他们居然带着各种乐器去演艺学校学习唱歌。这种现象令人难以置信，上等人的孩子怎么能学习这些下贱的技艺？我在舞蹈学校时，亲眼看见了五十多名学习舞蹈的男孩和女孩（我以名誉担保，所言非虚），其中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他的父亲当时还在竞选公职。甚至还有和着响板跳舞的男孩，最可怜和最不知羞耻的奴隶都不愿跳

这种舞。这些所见所闻让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痛心不已！”在另一个场合，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表现了非凡的辩才。担任监察官时，他罢免了一个叫阿瑟留斯的官员，后来穆敏乌斯恢复了阿瑟留斯的骑士身份。阿瑟留斯讽刺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职位，说监察官一般都死于非命。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反唇相讥道：“难怪恢复你职位的人是为监察官举行就职典礼的人。”

这些逸闻趣事说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他体格健壮，性情温和，骁勇善战，为官廉洁。他的生活也一向简朴，虽然攻城略地可以带来很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但他在去世时依旧两袖清风。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1]、哲学家帕奈提奥斯[2]、诗人特伦斯和卢基里乌斯[3]，以及雄辩家和政治家盖乌斯·莱伊利乌斯都是他的好友。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无论在地位、才华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是一位有才能、锐意进取、可以拯救国家的人，但他并没有打算为此牺牲自己。机敏如他，不可能没有觉察到当时社会的种种流弊，但他还是被本能所左右。作为贵族中的佼佼者，他赞成改革，但改革的目的却是为了巩固自己所属阶层的统治。可能是出于恐惧或者反感，只要遇到有点儿激进的改革措施他便选择退缩。贵族文人对自由主义的暧昧态度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扭转历史的英雄。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本质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这不是空穴来风，他在改革初期一直作壁上观，在最后一刻才被迫做出选择，尽管他知道这个选择是错误的。在这一艰难时刻，文过饰非也许情有可原，但将他宣扬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显然很可笑。他没有提出有效的政治措施，如果他的同僚有好的想法，他也会竭力鼓动对方放弃。当有人指出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措施在罗马无法实施时，他回答道：“罗马将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些改革措施，我和我的朋友也会尽最大努力促使改革取得成果。”遗憾的是，他囿于自己从小一直受禁锢的思维模式。当一位品德比他高尚的年轻人——提比略·格拉古因为他的延误而牺牲时，他只是冷酷地引用了《荷马史诗》中的一句话：“犯下此类恶行的人必将自取灭亡。”



诗人特伦斯（中间站立者），出自13世纪一本书籍中的插图



坐在战车上的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当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在改革中竭力保全自己时，他的妻舅提比略·格拉古却为此耗尽了青春的激情。根据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载，提比略·格拉古遇害时不到三十岁，但这一记载可能有误，提比略·格拉古当时可能是三十五岁。提比略·格拉古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贵族，他的外祖父是打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并征服非洲的大西庇阿，他的母亲科涅莉亚是历史上的少数知名女性之一。他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高贵、有修养、勇敢、精通古希腊文化、能言善辩。他的辩术师从米提林尼的迪奥芬尼[4]。他的妻子是执政官阿匹乌斯的女儿，他的弟弟是执政官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的女婿。他曾在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军中效力，并在征服迦太基的战争中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他在努曼提雅的战争中担任曼奇努斯[5]的财务官，凭借自己的诚实和正直挽救了罗马军队，使其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因为当时努曼提雅的统治者拒绝与罗马的执政官谈判，却同意与提比略·格拉古谈判。只要他满足现状，不去理会国家面临的各种危机，他将成为罗马最有前途的青年。然而，他不仅拥有非凡的洞察力，还是一位有良知的青年，面对历史的洪流，他毅然选择了飞蛾扑火，力挽颓势。他的性格与他的政治措施一样充满争议，因此在一部分人眼里，他是一位爱国者，但在另一部分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即使今天，历史学家对提比略·格拉古改革的性质仍然有

不同的看法。但通过对各方面资料的比较以及独立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对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计划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必须弄清楚的一点是，提比略·格拉古究竟在为哪一方争取利益。上文提到的公地主要分布在边境河流卢比孔河、马克莱河和阿普里亚河流域，集中在意大利的南、北方。罗马史学家阿庇安认为，被征服地区的土地绝大部分是这些公地。根据提比略·格拉古的提案，国家应该从富人那里收回一部分土地分给穷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在利基尼亚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既然已经有利基尼亚法，为何还要出台一部相似的法律？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有个奇怪的规则，即长时间不使用的法律会失去约束力。这项提议与利基尼亚法的不同之处是：如果持有者交出超过五百尤格拉的那部分土地，就可以获得永久持有五百尤格拉土地的保障。另外，土地持有者的每个儿子还可以保留二百五十尤格拉土地。有些作家猜测，当时罗马的个人占有土地量不超过一千尤格拉。



打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大西庇阿（中间坐者）。这幅图描绘了大西庇阿释放俘虏的场景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提比略·格拉古的法律提案绝不是蛊惑人心的阴谋。他看到了当时奴隶劳动力破坏自由劳动力、土地荒芜、军队衰落、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提议从富人那里收回土地分给穷人，而且不仅分给罗马的穷人，还分给殖民地自治市的穷人，以及意大利的自由居民。仅此一项，强加在他头上蛊惑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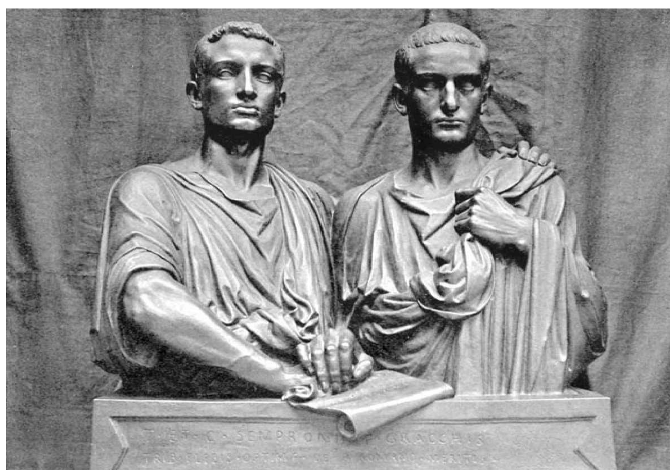
的罪名就无法成立。当然，这项提议在历史上并未有效实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想要蛊惑民心的人也不可能像他这样遍地撒网。由于这项提议，他的政敌找到了瓦解他的支持者的机会。总的来说，提比略·格拉古的提议沉重打击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腐败根源，如果这支“强心剂”也不起作用，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国家已经无药可医。历史上并没有对意大利自由居民获得土地的途径进行详细记载，有可能是在国家的默许下，从土地最初的占有者——罗马公民那里购买。总之，政策颁布后，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意大利富人的土地渐渐被分配到穷人手中，分到土地的穷人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农民阶层，暂时缓解了奴隶造成的困扰。贫民获得土地后常常选择立即转卖。为了防止新的政策重蹈利基尼亚法的覆辙——成为一纸空文，提比略·格拉古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即贫民获得土地后无权转卖。尽管很难落实这项政策，但也没有更好的措施取代它。最后，由于死亡和其他原因，土地易主的现象无法避免。因此，提比略·格拉古又提议成立一个长期理事会，实施监督管理工作。显然，这一举措非常明智且很有必要。

关于提比略·格拉古的律法我们目前只能了解这么多，想要更深入、更透彻地了解还很困难。很难计算当每个土地持有者给自己留下五百尤格拉土地，再给每个儿子留下二百五十尤格拉土地后，还能交还给国家多少土地。不过这一难题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根据史学家阿庇安的考证，这批公地占被征服土地的绝大部分，因此有些豪门望族可能拥有大片牧场。尽管如此，由于对提比略·格拉古的法律了解有限，有些事情我们依然无法解释。譬如，如果上交的公地超过五百尤格拉，如果有人多上交两尤格拉，有人多上交两千尤格拉，那么将补偿界限设在五百尤格拉是否合理？另外，因为该律法遭到了强烈抗议，所以很难认为它只影响了持有公地面积超过五百尤格拉的人。但抗议的动机可以解释为一些未受到重大影响的人的未雨绸缪，他们希望将可能产生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我们无法推测提比略·格拉古想要采取何种方式让自由劳动力代替奴隶劳动力，也无

从得知他将如何划分“公地”“私地”（这二者的界限在许多地方已常年无从划分），然而，从提比略·格拉古的一些重要提案的综合性和全面性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政治家的风范，这使我们相信他并没有忽略改革途中的绊脚石。阿庇安认为提比略·格拉古渴望成就一番他认为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事业，并给出证据证明提比略·格拉古是一个好人，对此，我们非常赞成。但阿庇安又说提比略·格拉古过于急躁，没有充分考虑到实施改革的难度，一些现代作家对他也有类似评价，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提比略·格拉古本人的行为更具说服力。下面是记载提比略·格拉古的言论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内容如下：

>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栖居的洞穴，但为国家抛洒热血的勇士，除了阳光与空气外一无所有，他们居无定所，无家可归，只能携妻带子，四处流浪。他们的将领愚弄他们，鼓动他们浴血奋战，为家庭保护神而战，为身后的荣耀而战。然而，罗马并没有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祖先或为他们安息的坟茔设立祭坛。士兵们用生命换来这个国家的繁荣和昌盛，他们被称为这个世界的主宰，但没有人相信这一称呼。难道人民不能分享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普通人没有为国而战的能力？难道公民不如奴隶？难道异族人或拥有些许土地的人是最具爱国情怀的人？你们通过战争获得巨额财产，接着又将目光投向未被征服的地方。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未来你们是凭借勇气和胆识征服其他地区，还是凭借社会的弊病和动荡？敌人夺走了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因此，如果你们仍然希望征服未被征服的地方，就必须主动放弃这些土地，将它们分给那些为国家事业冲锋陷阵的人。千万不要舍本逐末，况且你们还能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补偿——永久性地免费拥有五百尤格拉土地，如果你们有儿子，每个儿子还可以保留二百五十尤格拉土地。

最后一句中的“舍本逐末”一词值得推敲。公地持有者的损失也许并没有大到不可控的地步。反对者愤怒的原因除了被迫上交土地外，还有归还土地的相关规定以及以前长期受到认可的土地占有权的变更。由奴隶维护的五百尤格拉牧场对一个富有的罗马人来说并不重要，但罗马富人担心提比略·格拉古会将军队作为改革的下一个目标。纨绔子弟们发现，相比农耕和畜牧，参与对外事务更容易发家致富。另外，公地持有者认为自己遭到了极大的不公，并认为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这种心理我们可以理解。譬如，某公地持有者从别处购得土地，并获得了头衔，结果却鸡飞蛋打。这类人的愤懑之情不亚于那些买了印度股票的人，因为一旦印度政府破产，英国政府就会拒绝赔偿股民的损失。涉及头衔这类复杂问题的案例很多，虽然受到影响的阶层并不庞大，但他们却足够强大。每一个拥有低级头衔的土地持有者，即使他持有的地产非常少（假设是三十多尤格拉，也就是农业法提议的土地分配额），也可能因为恐慌加入反对者的阵营，将提比略·格拉古丑化成一个蛊惑民心的强盗。上述是我们知道的有关提比略·格拉古的农业法的内情，下文我们将介绍这项法律实施的过程。



提比略·格拉古兄弟的雕像

提比略·格拉古有个同事叫屋大维，据说曾是他的好友。提比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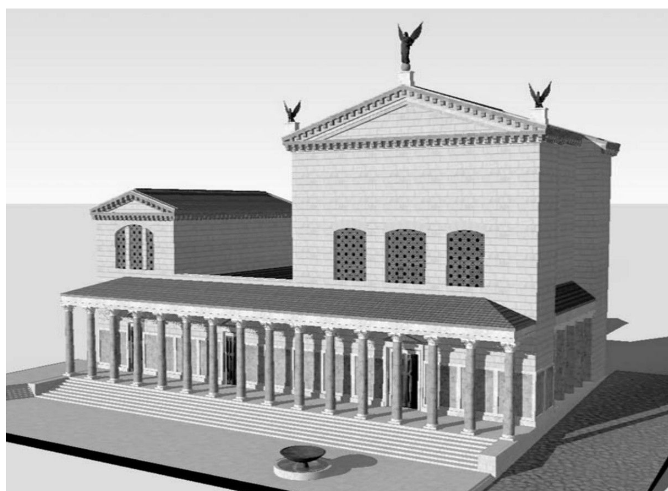
格拉古指定的法律一旦生效，屋大维就会损失土地，因此他强烈反对这项法律。提比略·格拉古愿意自己出资补偿屋大维上交土地后的损失，但屋大维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并利用保民官的否决权阻止提比略·格拉古向选民宣读议案。同时，提比略·格拉古也利用手中的权力暂停了公务，并拒绝支付公共费用。等到投票的那一天，反对方夺走了投票缸，于是，提比略·格拉古和其他保民官同意了元老院提出的意见。结果，利用相关的法律程序通过议案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提比略·格拉古也受到了同僚的奚落。愤怒的提比略·格拉古无奈之下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人民投票表决罢免他或者屋大维的职务，这是一位正直、慷慨的人为了国家大义而非个人私利提出的建议。提比略·格拉古召集了三十五个部族，投票表决是否罢免屋大维。第一个部族投了赞成票，与此同时，提比略·格拉古苦苦哀求他的老朋友主动放弃职位，但遭到了拒绝。接下来的十六个部族纷纷投了赞成票，提比略·格拉古再次尝试谈判，可对方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投票继续进行。当屋大维的职位被罢免时，他仍然拒绝离开。根据普鲁塔克记载，提比略·格拉古让一个自由民将屋大维拖离了广场。

人们普遍认为，提比略·格拉古的这些行为是罗马革命的导火索，因此，他是造成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打个比方，一些愚蠢、恶毒的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注满爆炸性气体，有一个人打开门致使一束光线射入，难道这个人就是导致屋子爆炸的元凶巨恶吗？有人认为提比略·格拉古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违反了宪法的程序，侵犯了保民官的尊严，但当时的宪法太过软弱，法律程序成了一群麻木不仁的顽固分子的盾牌，爱国人士几乎不可能通过任何常规程序推动改革，曾经被视为穷人的父母官和保护伞的保民官也已今非昔比。正如提比略·格拉古说的那样，富人发现了如何利用保民官为自己服务的方法。如果对强行侵犯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理算是违法的话，那么提比略·格拉古确实有罪。这种所谓的“罪行”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如果要谴责提比略·格拉古，就需要一同谴责华盛顿。提比略·格拉古的罪行与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有很大关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大多数人对革命的看

法。但如果一些失败的革命可以被谅解，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次革命不是少数人为了狭隘的个人目的发动的变革，而是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一次变革，热情高涨的人们从意大利各地涌向罗马投票。很难判断提比略·格拉古是否预计到了自己的改革将会产生的重要影响，也许他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可以窥见自己的未来。因为他为人慷慨热情，所以人们猜测他性格软弱，容易感情用事，并认为他的政策是一时冲动，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除了一些作家刻意强调他和他弟弟盖约·格拉古之间的区别之外，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证据。如果提比略·格拉古的性格与这些人说的一样，那么西塞罗对他的演讲的评价就不会是“尖锐、合理，但缺乏修辞色彩”了。他始终表里如一，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采取温和的改革方式，即使被反对派逼到绝境，打破章程召集部族投票，他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过分的举措或倾左偏右的行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陷入了革命的旋涡。我们不能因为一幅肖像是用灰色的颜料画出来的，就断定这是一幅逼真的肖像。那些作家之所以认为提比略·格拉古是一位好人同时也是一位不合格的公民，只是因为他们急于采取明暗对比的方法来提高人物的鲜明度。我们不能说提比略·格拉古没有犯过错，但根据种种事实判断，他确实是一位睿智且品德高尚的人。

元老院通过对胜出的保民官的各种刁难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譬如，限定提比略·格拉古每天只有约一先令的公费开销，甚至暗杀了他的一位朋友。当P.西庇阿·纳西卡等人忙着用这些卑鄙的伎俩对付他时，提比略·格拉古又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议案来补充农业法的缺陷。当时，帕加马的最后一任国王阿塔罗斯三世去世，留下遗嘱将帕加马并入罗马。提比略·格拉古希望将阿塔罗斯三世留下的遗产分给新移民，同时表示希望将帕加马的殖民处理权从元老院移交给人民。对于第二个提议，由于我们缺乏对细节的了解，不能妄议。第一个提议显得公平而又明智，且十分必要，因为之前的经验表明，穷人一旦获得土地，就有可能受到诱惑而将土地转卖给有钱人，但提比略·格拉古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得转卖，因此他希望新移民在新的农场中可以受到公平

对待。面对这些提议，元老院嗅到了新的危机，他们很快采取了一些卑鄙的手段对付提比略·格拉古。一个议员声称，帕加马的使者给提比略·格拉古带去了王冠和紫色长袍，另一个议员称看见有人在夜里举着火炬护送提比略·格拉古回家，还有一个议员谴责提比略·格拉古对屋大维的处置。最后一条攻击并没有前两条那么可鄙。提比略·格拉古对此回应道：“我们应该遵从宪法的精神，而不是浮于文字表面。”同时他还在酝酿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剑锋直指元老院。据普鲁塔克记载，这些改革措施包括缩短士兵的服役期，争取骑士与议员平等参与事务的权利等。目前为止，审判权仅属于议员。根据历史学家维莱乌斯的记载，提比略·格拉古还赋予卢比孔河和马克莱河以南地区的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如果这一点属实，就再次证明了提比略·格拉古高瞻远瞩的政治才干。要想全面实施这些变革措施，必须延长自己的任期，于是提比略·格拉古试图连任保民官一职。考虑到个人安全，竞选连任似乎是个正确的决定，竞选资格也不难获得。但事实并非如此，相比他的事业，谋求连任似乎并不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决定。选举当天，有两个部族先投了赞成票，但被贵族们宣布无效，理由是法律规定保民官不得连任。可能确实有这么一条规定，不过像利基尼亚法那样，虽然未被正式废除，但也没有多大约束力，可反对派抓住竞选程序中的这个破绽不放。一些作家谴责提比略·格拉古无视法律的存在，将其视为他的另一条罪行。贵族们在两个部族投票后才提出抗议，恰恰说明他们是狗急跳墙，无计可施时抛出了本已无效的律法，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心虚。此时，首席保民官如布里乌斯对于是否继续投票这一问题感到左右为难，屋大维的继任者穆敏乌斯提出将这个职位让给他，但其他人认为这一职位应该抽签决定，因此选举延期到第二天。



罗马元老院的复原图



提比略·格拉古的头像

事态的发展已无法控制。选举当天，提比略·格拉古穿上丧服，临行前将年幼的儿子托付给支持他的人民。想到一群暴徒即将夺走自己

宝贵的生命，作为一位父亲、一位政治家，他心中的父爱和痛苦也许夹杂着一丝恐惧。实际上，英勇的提比略·格拉古有能力保护自己，但如果他认定死亡对自己伟大的事业必不可少，那么他会义无反顾地这么做。前一天晚上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如果在选举时需要借助武力，他会发出暗号。有些人据此推断他打算谋反，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想谋反，只是打算以暴制暴，因为显然暴力已不可避免，除此之外他无路可走。提比略·格拉古政策的一个弱点是缺乏有效的支持，如果苏拉没有军队的保护，最终也会一败涂地，就像克伦威尔没有军队就成不了一位强大的将军一样。但此时正值秋收时节，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大都在田间劳作。第二天黎明时分出现的种种迹象，在迷信的罗马人看来都是不祥的先兆。被罗马人视为圣禽的鹰拒绝进食，提比略·格拉古在家门口失足摔伤了脚，几只乌鸦在左边屋顶上打架，碰掉了一块瓦片，正好砸在他的脚上。但布洛休斯一直陪在他的身边，鼓励他。当他去议事大厅时，受到支持者的热烈欢迎。根据阿庇安的说法，当富人阻挠选举正常进行时，提比略·格拉古发出了暗号。但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6]过来告诉提比略·格拉古敌人准备谋杀他，由于执政官斯凯乌拉拒绝动手，反对者便武装了自己的盟友和奴隶，与此同时，提比略·格拉古发出了暗号。排除上述分歧，两位史学家对P.西庇阿·纳西卡在元老院的所作所为达成了共识，因此下面这个说法相对比较可靠：P.西庇阿·纳西卡请求斯凯乌拉捉拿独裁者，斯凯乌拉表示不愿成为第一个动用武力的人。于是P.西庇阿·纳西卡集结了元老院的议员，爬到议事厅的高处，他的党羽手持棍棒、凳腿，冲上前驱散了群众。提比略·格拉古被地上的尸体绊倒，最后丧生于名叫萨蒂里厄斯或鲁弗斯的保民官之手，因为这两人都声称自己杀死了提比略·格拉古。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殉道士、罗马革命中真正的骑士就此陨落。这件臭名昭著的谋杀案预示着罗马——提比略·格拉古誓死拯救的国家，未来的几十年将会发生更多流血冲突事件。

注解

[1] 波利比乌斯（Polibius），罗马共和国时期历史学家。他本是希腊人，大约三十七岁时作为一名政治犯来到罗马。晚年时他成为了罗马公民。

[2] 帕奈提奥斯（Panaetius，前185—约前109），出生于罗德岛，斯多葛派著名哲学家。

[3] 卢基里乌斯（Lucilius），罗马共和国时期诗人、讽刺作家，他的作品取材广泛，辛辣地讽刺了罗马社会各方面。

[4] 迪奥芬尼（Diophanes），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修辞学家。

[5] 曼奇努斯（Mancinus）是努曼提雅战争中的官员。他因为能力不足而使罗马军队误入敌人设下的陷阱，最后由提比略·格拉古解围。

[6] 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Fulvius Flaccus）是格拉古兄弟的盟友，曾任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执政官、保民官。

第3章　盖约·格拉古

精彩看点

布洛休斯幸免于难——提比略·格拉古的法律得以实施——意大利人反对的原因——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态度——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之死——盖约·格拉古的财务官生涯——《班努斯法》——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授予意大利自由居民罗马公民权——福莱杰雷的起义和毁灭——盖约·格拉古担任保民官——与提比略·格拉古的比较——盖约·格拉古的改革目标——为《粮食法》辩解——盖约·格拉古的陪审权法——关于亚洲的税法——对骑士阶层的怀柔政策——他的殖民地——提议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其他计划——贵族反对派的阴谋——德鲁苏斯法令——再次竞选保民官遭拒——遇害——盖约·格拉古部分法律依旧有效——《玛利亚法》——元老院的反动立法——封闭的贵族圈

三百多人在此次冲突中丧生，尸身被抛入台伯河。暂时取得胜利的贵族们变本加厉，继续驱逐、杀戮剩余的改革派。布洛休斯在面对审判时公开申明，如果提比略·格拉古命他烧毁议事大厅，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他对这位领导人的爱国精神深信不疑。他的回答不仅体现了他和提比略·格拉古的高尚品德，还表明了他刚毅不屈的性格。哲学家们向来对软弱而又冲动的人嗤之以鼻。最终，布洛休斯被赦免，但这也许不是因为他的回答让人肃然起敬，而是因为他与一些贵族之间的关系。虽然贵族反对改革派的斗争仍在继续，但逝者未竟的事业却并未中断。如果提比略·格拉古泉下有知，他会坚信敌人卑劣的

手段无法阻挠自己伟大的事业。

土地分配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阿匹乌斯和姆基安努斯去世后，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即他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开始出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公元前125年，罗马的劳动力非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近八万人。这次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很可能得益于土地委员会的贡献，但如果小土地主和无产者不在募兵范围内，这一增长也不算特别明显，因为这些阶层是土地分配的主要对象。另外，以前被富人从土地上驱逐的穷人并没有将自己的名字上报给检察官，这些人的孩子也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但他们领取土地时会登记自己的名字。据刻在公共纪念碑上的碑文记载，公元前132年，执政官将牧人从自己的领地上驱逐出去，然后将农民安顿在这些土地上，于是，正如提比略·格拉古期望的那样，这些农民一方面成为兵源的重要补充力量，另一方面遏制了奴隶数量与规模的继续增加。据记载，这一政策覆盖了整个意大利。如果其他地方的改革程度能和罗马一样，那么穷人的困境就会得到缓解，土地保有权正常化也指日可待。但同时，这些改革措施激化的社会矛盾也不难想象。一些人被迫离开肥沃的耕地，被赶到荒地上；一些人原以为自己的财产是私有性质，付出代价后才明白是属于国家的；一些人非法强占土地，现在已真相大白；一些意大利自由居民购买了小块土地，却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头衔；还有一些人通过特殊法令获得土地，但最后这些土地也成了土地委员会改革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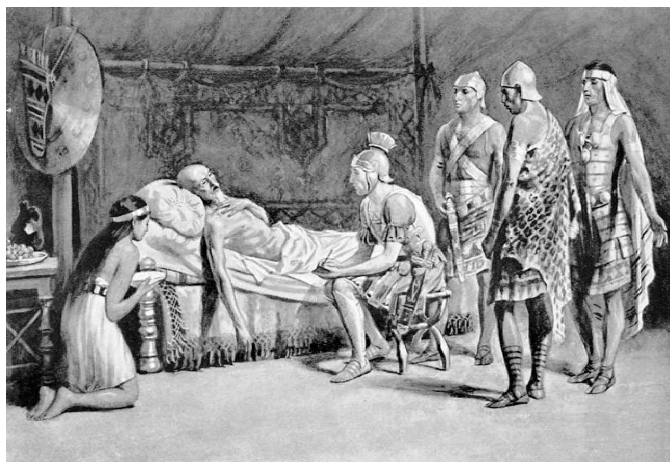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在记载这类事件时，并没有解释清楚当年提比略·格拉古在意大利各地区的主要支持者现在为什么会倒戈相向，成为土地委员会的主要反对者，也没有详细解释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众所周知，罗马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两大阶级，但我们忽略了整个意大利普遍存在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阶层。人们总是过分强调罗马的阶级分化，但对首都之外的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往往轻描淡写，仿佛这些地区的人都是利益一致的共同体。对意大利人看似前后矛盾的

态度自然也有了唯一的解释，当年支持提比略·格拉古的是意大利城市贫民以及小农阶层，而寻求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庇护、对抗土地委员会的则是城市有产者和乡村富农。随着改革力量的壮大，不少人开始谋求更多土地，但发现自己原来拥有的头衔现在变得朝不保夕。这种推测未必属实，但却填补了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留下的空白，同时也展现了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鲜为人知的一面。历史对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定位是一位不屑迎合下层民众的爱国者，但如果备受压迫的老实农民或他的战友向他求助，他便摇身一变，成为这些人的利益保护者。现实生活中，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比较自由的观点，他会毫不留情地反驳。作为一名监察官，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从未祈求众神赐予这个国家荣光，而是祈求众神维持社会现状，甚至不加干预。作为一名普通人，他很英勇，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太过怯懦。面对自己和朋友们点燃的革命火花，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却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支持元老院。然而，元老院依然痛恨他，因为他不但是一名改良主义者，而且他的品格反衬出元老院的卑劣。他控告一名叫奥里留斯·科塔的议员，由于审判员对他的敌视而拒绝将其定罪。他转而向意大利的土地主求助，但意大利的土地主在利欲的驱使下，利用他充当自己的喉舌，使他成了为他们谋取利益、僵化思想的代言人。虽然贵族们在内心深处拒绝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结盟，但元老院却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也“不负众望”，协助执政官剥夺了土地委员会的权力，并使委员会名存实亡。事成后，执政官立即找借口离开罗马。很快，在一天早晨，人们发现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去世的前一天夜里，当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时，还在构思第二天有关意大利人地位的演说。然而他在此时被杀，表面上看起来是死于他的政敌之手，譬如帕皮礼乌斯·卡尔博或格拉古党，但从声誉角度考虑，他的死是适时的。尽管在私生活方面，他并没有像苏拉一样的恶行，但作为一名政客，他扮演着与苏拉相似的角色。他在攻打西班牙时犯下的罪行以及在提比略·格拉古遇害时发表的言论透露出一个军人的狭隘本质和嗜血本性，这个污点使这位集众多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人难以受人景

仰。他曾有机会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伟人，但面对天赐良机，他退缩了，就像他亲手播种的庄稼开始萌芽时，他又亲自毁了它。因为他的个人品行无可厚非，而且在各派系的倾轧中他采取了折中路线，所以历史学家向来对他青睐有加。但历史学家忽略了一个事实：政治立场与许多事情一样，对错分明。脚踏两只船只能证明一个政治家的软弱，不能证明他是一位伟人或是一个好人。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与科尼利厄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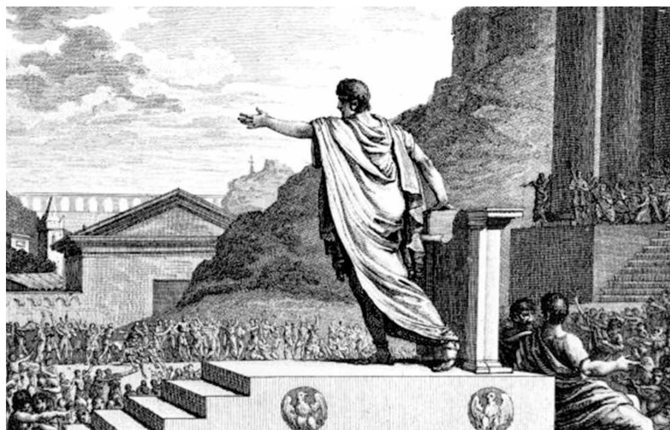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之死

公元前126年，盖约·格拉古成为土地委员会委员七年后，当选财务官。当时撒丁岛爆发了叛乱，命运选择了盖约·格拉古担任执政官奥列斯特的财务官，和他一同前往撒丁岛。据说他在提比略·格拉古被杀时保持了沉默，目的是等候时机扭转局势。在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中，盖约·格拉古脱下了自己的伪装，世人才知道这位青年一直在韬光养晦。“他们杀害了他，”他振臂疾呼，“这些恶棍杀害了提比略·格拉古，我高尚的兄长！这些暴民！”他在演说中大力支持帕皮里亚法，因为该法承认保民官连任的合法性，但由于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等人的反对，这一律法最终流产，不过几年后又得以实施。担任财务官期间，盖约·格拉古曾发表演说反对朱尼乌斯·班努斯提出的旨在驱逐外邦人的法律，但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提比略·格拉古的律法才得以实施。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他为这些人代言时，他正踩着自己兄长的脚印前行。有一次，他宣称自己梦见提比略·格拉古对他说，“你还在犹豫什么？你我都逃脱不了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的命运。”在演讲中添加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有效，特别是当他面对一群迷信的听众时，效果立竿见影。但我们知道，正常的逻辑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不是夜有所梦、日有所思。毫无疑问，作为弟弟，盖约·格拉古唯一的愿望是为提比略·格拉古报仇，并将提比略·格拉古曾经构想的

蓝图付诸实施。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舞台上，罗马人迷信的所谓先兆比比皆是。历史学家用带有讽刺意味的严肃口吻做了如下记录：“除了维伊周围从天而降的油和牛奶，据说猫头鹰飞过议事大厅这件事也是真的。”提比略·格拉古的好友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主动出击，为了收买意大利自由居民中的反对派，使他们支持农业法，他提议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正如《利基尼亚法》那样，一旦给了贫民一些甜头，就必须同时给富人一些好处，这样才能确保获得双方的支持。这一提案意义重大，当时罗马的危机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意大利贫民因为《农业法》的暂停表现出不满，富人们因为《班努斯法》的实施感到愤怒，引起矛盾的其他一些深层原因在上文已经提及。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提出议案那年，也许因为这一提案被驳回，拉丁殖民地福莱杰雷发动了叛乱。最后，叛乱被极其残忍的方式镇压了，整个城市遭到毁灭，统治者在原址附近新建了一个叫法布雷的殖民地。此时，意大利人的不满变成了沉默的愤怒。元老院开始恐慌，因为他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并非迷信捏造出来的预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也是在罗马最黑暗的时期，共和国的殖民地一直恪尽职守，但在和平时期，它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居然反叛了。然而，福莱杰雷真的孤立无援吗？元老院对此非常怀疑，他们将矛头指向格拉古党，据说还指控盖约·格拉古勾结叛军。在这种时候毫无根据地挑衅一个正直的人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如果指控属实，那么审判的结果就是盖约·格拉古被无罪释放。接下来，他立即参与了竞选保民官的活动。与此同时，杀害提比略·格拉古的党徒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更有才干、更难对付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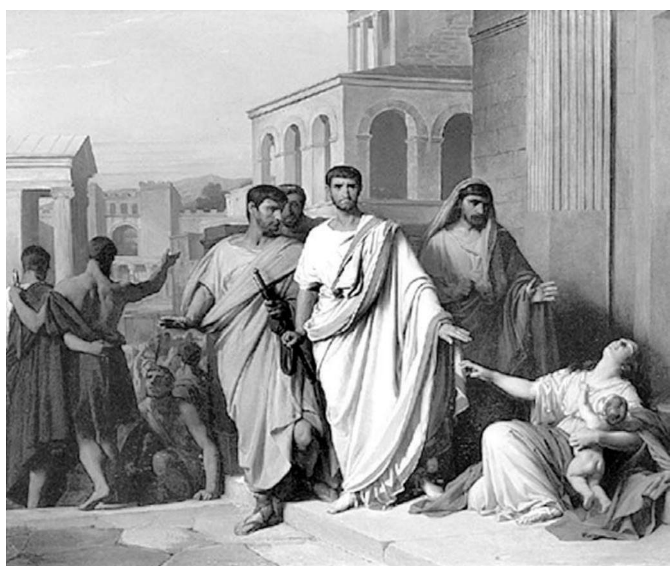


盖约·格拉古登台演说

虽然盖约·格拉古年纪尚轻，并没有在高层正式任职，但在所有人心中，他在政治上已经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发表的第一次演说在人民当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也成了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元老院延长了奥列斯特在外统率的期限，目的是让他的财务官长期远驻海外。元老院对盖约·格拉古的忌惮从侧面体现了他的重要性。令盖约·格拉古的朋友们感到欣慰的是邻邦对盖约·格拉古的尊敬和推崇。撒丁岛人一开始拒绝向奥列斯特供应物资并得到了元老院的许可，但在盖约·格拉古的斡旋下，当地人冒着被上诉的危险自愿为他们提供物资。努米底亚国王米西普萨，即前任国王马西尼撒儿子，也给奥列斯特送来了玉米，但他申明这是出于对盖约·格拉古的敬重。由于对外邦人的畏惧，元老院无法直接干涉这件事。盖约·格拉古亲口描述了他在撒丁岛的生活，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贵族们的生活。他对人民说："我在撒丁岛待了两年，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是为了你们的利益。那里没有珍馐美馔供我享用，没有俊美奴隶环伺左右，也没有暮夜怀金和假公济私，更没有买笑追欢，你们的孩子看到的是比指挥部更得体的生活方式。别人带着酒罐出去，装着钱回来，而我带着钱去，空着手回来。这就是我在撒丁岛两年的成果。"

盖约·格拉古回到了罗马，带着十年来从未消减的仇恨，准备为自

己的兄长讨回公道。对格拉古兄弟的评价存在两种极端，一部分人贬低提比略·格拉古而抬高盖约·格拉古，但多数人又认为追随者远不及发起者伟大，盖约·格拉古只是他兄长的追随者，虽然他与他的兄长一样勇敢、博学、执着，一样有政治智慧和献身精神，但他永远无法超越他的兄长。遇害前，盖约·格拉古将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的儿子送入元老院，这件事表明他在竭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盖约·格拉古梦见提比略·格拉古的事说明提比略·格拉古对他影响重大。他在辩论中讲述梦境以及公开承认宿命论等事实有力驳斥了“提比略·格拉古冲动、感情用事，盖约·格拉古理性、精于计算”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盖约·格拉古从之前的事件中吸取了经验，他知道等候时机，不能将仁慈浪费在敌人身上。他生活简单，带着满腔激情和舍身取义的精神投入兄长的事业。同时，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的兄长更深谋远虑、更富辩才。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他的准备更充分。



盖约·格拉古在罗马

现代历史学家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盖约·格拉古的法律。我们只能

通过推测理解法律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但这里我们不会具体比较盖约·格拉古在做保民官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期间政策的不同。盖约·格拉古的法令在大体范围和倾向上都脉络清晰，它的直接目标是推翻议会制政府，扩大商人阶层的行政管理权和意大利人的司法权。也许他想通过一系列改革成为罗马实际的君主，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在构想君主制，然后放长线钓大鱼，在未来的某一天作为继任者接手自己一手创立的政体。这一庞大计划中必定有许多过渡性的东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盖约·格拉古能多活几年，并且一直保持原有的影响力，那么罗马帝国建立的时间可以提早一个世纪。

当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时，意大利人蜂拥至罗马，贵族们费尽心思进行阻挠。公元前124年12月10日，盖约·格拉古正式任职，在十位保民官中排名第四。他有种预感，即使自己不主动进行改革，人民也不会答应。也许他曾乞求人民放弃改革，因为他和他的幼子是这个名门仅存的男丁，大西庇阿去世了，他的兄长提比略·格拉也为了人民的事业献身了，但人民听不进去。据说他的母亲让他改变了主意。丧子之痛使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的坚强变成了仇恨。也许在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中，盖约·格拉古提到了自己的家庭，说那是一个让自己不忍驻足的地方，母亲总是在绝望地哭泣，她不但没有阻止自己步兄长的后尘，而且恳求他为兄长报仇。这类小故事不像虚构的。但不管事实如何，我们在他早期热情似火的演说中觉察不到一丝怯懦，他在演说中常常达到忘我的程度，有时甚至需要借助特殊工具控制声音。据说他的助手手持乐器站在他身边，当他音调过高或过低时，就通过某个音符提醒他。当他讲到代诺的地方官遭到鞭刑和维努西亚的牧人被杀的事件时，成功激起了听众对贵族的仇恨。他专门针对之前的保民官屋大维制定了一项律法，即禁止被人民罢黜的官员再次竞选职务。据说在他母亲的建议下他最终废除了这项法令。另一项法令也与提比略·格拉古密切相关，即不得在未经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剥夺人们的公民权。如果这项法令得以实施，就可以阻止波比留·利纳斯继续搜捕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紧接着，盖约·格拉古又迫使波比留·利纳斯被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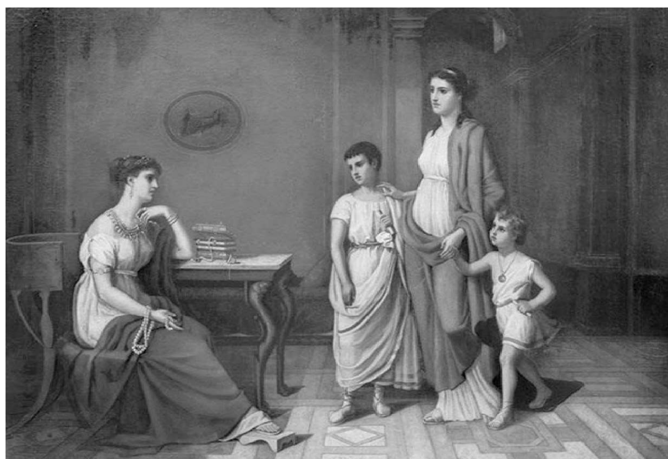
放。他有一段很可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演说，大意是：如果不抓住这个等待多年的时机，他们会很快遭到反对派的起诉。波比留·利纳斯预计到了自己将被流放的结局，主动从罗马请辞。

完成了一系列在他看来非常神圣的使命后，盖约·格拉古开始着手修订新的宪法。有一个普遍的说法认为盖约·格拉古为了达到目的，用《粮食法》收买民心。如果确有其事，那么作家们一方面坚持认为这是一部糟糕的法律，另一方面又不约而同地将盖约·格拉古描绘成一个头脑睿智、仁慈高贵的人，这显得十分矛盾。为了达到目的，盖约·格拉古有时会用一些手段，有时也会扮演坏人的角色，然而，当我们再次仔细研读这一法律时，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它真是一部很糟糕的法律吗？"虽然它最终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但这并不是盖约·格拉古的本意。我们还记得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公地，持有公地的人必须缴纳地税，这笔税收最终归国库所有，供贵族们肆意享乐。而盖约·格拉古的法律为罗马公民制定了一套有关谷物价格的标准，当市场价高于这个标准时，差价由国库补贴。于是我们立刻理解了盖约·格拉古的目的，理解了他在表面公平的蒙蔽下没有预想到这一措施可能导致的混乱局面。他说："公地和地税属于全体罗马人，没有人可以独自享用，因此你们必须以平价谷物的方式将地税返还给人民。"实际上，粮食法是一部很明智的法律，它将贵族们长期侵占的、本该属于人民的部分财产返还给了人民。为了对抗粮食法，德鲁苏斯[1]也出台了一部法律，提议免除地税，土地持有者可以将分配的土地转手等。德鲁苏斯的法律容易使农民产生幻想，但其中存在的欺骗性不言而喻。首先，它欺骗了国家，因为每个土地持有者都有义务为充实国库做贡献，而且它还妨碍了意大利自由农民队伍的壮大。其次，它欺骗了土地持有者，因为它引诱土地持有者走向堕落。当盖约·格拉古恢复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律法时，规定每年向那些分配到土地的穷人征收一次地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粮食法与德鲁苏斯蛊惑人心的律法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现代作家站在现在的角度，指责盖约·格拉古的粮食法是不正确的。退一步讲，即使粮食法确实存在很大缺陷，也不应该

是盖约·格拉古的错，而是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恶政引起的。毫无疑问，这项举措给盖约·格拉古带来了声望，他本人也得到了这种声望带来的好处，但如果说他为了挫败对手刻意扭曲自己高贵的品格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是没有根据的。



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与少年时期的格拉古兄弟



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与少年时期的格拉古兄弟

粮食法为盖约·格拉古争取了包括骑士在内的大量支持者。前面已经提到，骑士是一些未进入元老院的富人。法律规定议员不能经商，尽管他们未必遵守这项法律。一开始，在富人阶层和元老院之间存在

一种怨恨，盖约·格拉古用一些手段有意加深了这种怨恨，具体做法我们并不了解。根据一些权威记载，他帮助骑士获得了审判权，使元老院的审判权旁落。在历史学家李维的摘要中，盖约·格拉古帮助六百名骑士进入了元老院，使骑士获得了比元老院大两倍的权力。这件事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盖约·格拉古也许曾这样提议：为了公平起见，安排六百名骑士组成第二内阁，为每位议员审判员配两位骑士审判员。他制定了一套“反元老院”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有三分之二的审判员出自骑士阶层。我们并不知道他实现上述计划的具体方式，但可以确定他成功打压了元老院并提高了富人阶层的地位。此后，无论在民事诉讼还是在临时或永久性的司法管理委员会中，骑士阶层都拥有无上的权力。罗马人、意大利人甚至议员的审判定罪权都掌握在骑士手中，元老院大权旁落。当然，这种变化没有被立刻察觉出来，但却有效地打击了元老院。人们通常认为盖约·格拉古的这项举措是不经思考、感情用事的结果，然而，西塞罗却说：“担任审判员的骑士近五十年没有收受一分钱贿赂。”也许西塞罗的这句话存在夸张的成分，最终结果也如阿庇安说的那样，适得其反，但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盖约·格拉古的本意是好的，他希望推动改革向好的方向发展。以奥里留斯·科塔一案为例，因为外省一直被元老院控制，所以将属于议员阶层的奥里留斯·科塔交给骑士阶层审判会更合理。

关于盖约·格拉古对亚洲的税收政策我们知之甚少。他规定罗马商人以竞拍的方式承包税收，这对罗马早期的资本家来说是个极大的福利，并且还能有效遏制外省的竞争。据说他还以直接和间接税收制度代替国家原有的定额税收制度。人们对格拉古兄弟处理海外事务时采取的态度普遍抱有狭隘的偏见。譬如，提比略·格拉古将征服全世界描述成一件所有人都必须期待的事，盖约·格拉古可能受了这种看法的影响，在处理海外事务时更倾向采取强硬措施。即便如此，不经过深入了解就盲目指责他的政策是不公平的。定额税收未必比灵活税收更可取。如果年景好，土地收成好，纳税人多交一些税并不会显得不公平，而且亚洲地区相对比较富庶，增加贡税也无可厚非。另外，在罗

马拍卖征税权可以有效防止行省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因为肮脏的交易在远离都城的地方更方便进行。这一政策还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优点，即大大减轻了税收官的负担。

在盖约·格拉古的帮助下，骑士阶层在法庭上的地位渐渐高过元老院，在处理行省事务时他们也获得了利益。据推测，盖约·格拉古还授予骑士象征荣誉的金指环，并在公共演出中为他们预留座位。于是两大阶层——城市富人和城市贫民同时得到了满足。另外，为了安抚支持提比略·格拉古的农业法的农民阶层，盖约·格拉古恢复了因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干预而终止的农业法，还从执政官手中夺回了管理权并将其还给三人委员会。除此之外，他还在意大利半岛的许多地方建立了殖民地，甚至邀请意大利各地人民移居迦太基。面对反对农业法的意大利人，他提议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以此安抚因代诺遭受鞭刑等事件引起的民愤。关于这项举措的说法有多个版本，阿庇安说盖约·格拉古打算给予拉丁人选举权和通婚权，其他意大利人仅给予通婚权。但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即从殖民地获得的种种利益，包括廉价的面包和意大利人手中的部分公地或许都抵不过罗马人对扩大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根深蒂固的偏见。由于狭隘的民族自尊主义，罗马的富人和贫民达成了共识，最终导致盖约·格拉古的垮台。

第二章中我们提到提比略·格拉古寻求连任保民官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施行自己的政策。据阿庇安记载，出于相同的目的，盖约·格拉古二次出任保民官。之前通过的一条法令为他连任保民官扫清了道路，该法令规定：如果某位保民官在任期内没有时间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一任期他可以有优先被选举权。许多人认为阿庇安的记载有误，但又找不到充足的理由证明它是错误的。实际上，盖约·格拉古必然会坚持这条法令，正如阿庇安描述的那样，他的目的是连任保民官。很明显，一旦通过这条法令，罗马就有可能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君主制时代。盖约·格拉古的其他举措似乎也在积极配合君主制。他修筑马路，真实目的是为了让选民能够更方便地来到罗马；他还建

了公共粮仓，不惜代价为士兵们提供衣物，将17岁定为参军最低年限，甚至亲自监管自己殖民地的殖民事务……他几乎无所不在。这些事情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仅仅因为他精力旺盛，我们很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推翻元老院视为首要目标，他的举措也远不止上述这些。当时罗马的惯例是新的执政官诞生后，由元老院为他分配行省，如果新执政官受到元老院的欢迎，就会得到一个富庶的行省，反之则会得到一个贫困的行省。盖约·格拉古打破了这条陈规，他让元老院在执政官选举前指定相应的行省。有人推测他还改变了百人会议的选举程序，但这一猜想没有充足的证据。原来投票时上层阶级有优先投票权，后来，投票顺序由抽签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富人的影响力。

这些大体上就是盖约·格拉古的宏伟计划。如果他比他的兄长少一份执着，也许情况会大不相同。由于他不得不调和各个阶层的利益，他的一些举措可能背离了他最初的理想，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推翻腐朽的社会体制，建立一个健康公平的政府。在此过程中，他没有被个人私利诱惑，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点无可非议。他辩才非凡、斗志昂扬、锲而不舍，并积极将自己构想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虽然他预感到自己可能逃脱不了与兄长相似的命运，但仍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他是历史上最高尚、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他是另一个凯撒，但比凯撒更纯粹、更无私。

贵族们曾经用卑鄙的手段阻挠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现在对盖约·格拉古的改革也不会置之不理。他们发现愚蠢、虚伪的德鲁苏斯制订的法律比P.西庇阿·纳西卡的暴行和莫须有的罪名更有效。许多罗马人对建立迦太基殖民地怀有疑虑，因为这是意大利之外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许多殖民地的迅速发展甚至超过了宗主国，再加上元老院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迷信的人们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人们诅咒这片土地，阻挠重建城市。据说，殖民者在迦太基竖起第一面旗帜时，一阵狂风吹倒了它，祭坛上的牺牲也被吹得散落在四处，插在地上作为

地标的木桩被群狼连根拔起。人们往往会轻易相信这些别有用心的故事，如果盖约·格拉古真的鼓励意大利的殖民者前往这个被他命名为朱诺尼亚的殖民地，说明他正在试图避开罗马人对扩大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阻挠。另外，他用间接的干预手段——一种几乎不近人情的方式促成了这件事。投票开始时，无投票权的人被逐出了城市，他们在投票结束前不得接近城市方圆五英里的所有地方。盖约·格拉古回到罗马后，立刻搬出府邸，住在广场上，因为他认为这是离他的朋友最近的地方。在一些小事上，他也不忘为穷人争取利益，譬如，广场上即将表演一场角斗，地方官命人用凳子将竞技场围住，盖约·格拉古让他们撤走凳子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在表演开始的前一夜搬走了这些凳子。现场观看过现代运动会的人都能体会到，如果一大群观众围着运动员，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清楚比赛，但如果扩大场地，不少人就能够获得好的视角。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盖约·格拉古的良苦用心。虽然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悦了罗马人，但他们还是无法忘记罗马公民权一事，盖约·格拉古在罗马人中的声望日渐下降。这时，元老院唆使他们的同僚德鲁苏斯制定了一部法律来对抗盖约·格拉古。虽然德鲁苏斯只是元老院的傀儡，但他仍想引导元老院制定一些宏观政策，后来他儿子[2]的事业证明了他可能存在这一动机。还有一种可能是，德鲁苏斯是个既不诚实，也无道德原则的小人。



罗马竞技场遗址，绘于18世纪

盖约·格拉古原本考虑建立多个殖民地，但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此时他真正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只有两个。德鲁苏斯也提议建立十二个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安置三千名公民。殖民事务方面盖约·格拉古总是亲历亲为，并雇用自己的朋友参与此事，但德鲁苏斯很坦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亲自参与殖民地的建设。盖约·格拉古要求获得土地的农民缴纳一定的年税，但德鲁苏斯提议免除这份税收；盖约·格拉古为拉丁人争取了罗马公民权，德鲁苏斯立即出台了一项可笑的优惠政策，即不得鞭笞拉丁人，即使是在军中服役的拉丁人。这项政策也许能够直接吸引下层拉丁人的注意力。然而，德鲁苏斯的殖民地有名无实，他的免税制度是一颗裹着糖衣的毒药，他对拉丁人的承诺只是一张廉价的空头支票。但这些虚伪、愚蠢的政策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盖约·格拉古阵营中的贪婪卑劣之徒开始离开他。据说，盖约·格拉古第三次竞选保民官时，他的同事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将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抹去，最后，他的竞选以失败告终。此外，公元前121年的两名执政官中，一名叫奥皮姆斯的执政官是他的死敌。

厄运即将来临，此时的盖约·格拉古也一定预感到自己的担忧即将变成现实，他终究无法逃脱和兄长一样的命运。他的政敌提议废除朱诺尼亚的殖民法律，据普鲁塔克记载，同时废除的还有其他一系列法律。由于吸取了提比略·格拉古惨死的教训，盖约·格拉古的朋友们武装起来，伪装成收割庄稼的农民，以此来保护他。或许他们真的是收割庄稼的农民，或许他们还记得提比略·格拉古遇害的惨象，无论如何，如果当时他们及时武装起来，也许可以使提比略·格拉古免遭毒手。竞选当天，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正在对民众宣读法律，盖约·格拉古在一些支持者的陪同下，来到议事大厅，他没有参加会议，只是在柱廊下来回踱步。这时有个叫安提鲁思的人——他可能受了执政官奥皮姆斯的指使——开始挑头闹事。他或许用言语羞辱了格拉古党，因此被他们刺死了；或许是他拉住了盖约·格拉古的手，又或是他故作亲近或强拉硬拽与盖约·格拉古发生了言语或肢体上的冲突，因此被盖约·格拉古的随从刺死。事发后人们四处逃散，盖约·格拉古匆忙赶往

议事大厅试图解释这件事，但忽然天降暴雨。可能因为下雨，也可能因为凶杀案，会议休会了，盖约·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只好回家。广场上挤满了人，因为他们预感到第二天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奥皮姆斯立刻抓住时机，召集议会，武装占领了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他们抬着安提鲁思的尸体来到广场上，虚伪地大哭着，议员们假惺惺地对这一事件表现出愤慨之情，但关上门后，元老院立即批准执政官动用武力。奥皮姆斯召集议员和骑士武装起来，每个骑士带领两名武装的奴隶。现在，这些曾因盖约·格拉古获益的阶层无耻地抛弃了他。另一边，盖约·格拉古的朋友们彻夜轮流站岗，忠诚地守卫着他家。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也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当夜，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家里围满了人，他们一起喝酒，吹嘘着第二天将会发生的壮举，据说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本人还亲自示范。第二天黎明，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带领一批拿着武器的人，高呼着占领了阿文丁山。盖约·格拉古平静地与妻儿道别，穿着托加袍[3]，两手空空地走了。他明白，自己将一去无回。

“他为祖国感到孤单，他愿为它抛洒热血。”

盖约·格拉古也曾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做出努力。他劝说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送他的小儿子进入元老院询问和谈条件，但这位年轻人带回的消息是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另外，盖约·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必须去元老院领罪。盖约·格拉古打算接受条件，但狂热的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拒绝妥协，他的儿子回到元老院时被奥皮姆斯抓住。随后，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带人攻打阿文丁山，一场激战后，他被打败。他立即带着自己的另一个儿子逃走了，藏身在一个澡堂或工作坊里。他的追捕者威胁道，如果不交出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他们就将那一带全部烧毁。收留他们的人十分害怕，于是派另一个人去举报，父子俩因此双双遇害。



盖约·格拉古与妻儿告别

此时的盖约·格拉古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抗争的打算，他只想在戴安娜神庙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他两个朋友的苦苦哀求和帮助下，他成功脱身。据说，他痛斥忘恩负义者的行为，并激起了人们的公愤，随后他越过台伯河逃走了。当他再次身处险境时，他的两位忠实的朋友庞波尼乌斯和赖托留斯牺牲自己将他救了出来。庞波尼乌斯在阿文丁山下的波特特里格米纳大门那儿救了他，赖托留斯守住大桥让他安全渡过了河。盖约·格拉古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仿佛他不是在逃生，而是在参加一场竞技比赛。他向路人借马，但没有借到，因为人们没有马。敌人穷追不舍，他和一直追随在他身边名叫罗克拉茨或尤珀拉斯的奴隶一起躲进了弗洛拉的小树林里。在那里，这名奴隶杀了盖约·格拉古后自杀了。当时奥皮姆斯发布了一个公告：谁能带来盖约·格拉古或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的首级就可以得到相同重量的黄金。据说一个叫沙皮提姆莱斯的地痞割下了盖约·格拉古的首级，掏出脑子，在里面灌满了铅。虽然他确实欺骗了奥皮姆斯，但奥皮姆斯反过来也愚弄了上交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首级的人，他以这两个人是下等人为由，拒绝兑现赏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随后奥皮姆斯被指控为了金钱将国家利益出卖给朱古达，因此，从他的人品来看，他很可能做出这种事。这一事件中，奥皮姆斯共处死了三千人，其中有许多人与盖约·格拉古的改革并无瓜葛，他们连辩解的

机会都没有便惨遭杀戮。盖约·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的家被洗劫一空，遇难者的财产被尽数没收，整个城市遭遇了一场大清洗。事后，刽子手奥皮姆斯建了一座“和谐之庙”。一天晚上，庙的牌匾上多了一行字：不和谐的工作换来和谐之庙。那一年，葡萄丰收，酿造了大量葡萄酒，有些酒甚至保存了近两个世纪。罗马学者老普林尼说这种酒口感平滑，甘甜中带着丝丝苦味。但伟大的盖约·格拉古留给人们的记忆比醇酒更长久，他的天才和爱国情怀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那些在最后关头为他牺牲的朋友和奴仆也同样名留青史，为这样一位高贵的人牺牲，他们死得其所。



盖约·格拉古的追随者舍身救其脱险



奴隶杀死盖约·格拉古后自杀

盖约·格拉古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也去世了，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也没有活到成年。只有他们的母亲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还活着。根据普鲁塔克的撰述，科涅莉亚·阿菲莉加娜提起两个儿子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哀叹。有人推断，无情的岁月和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使这位老人麻木了。当然，这些人无法理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贵的人在面对自己多舛的命运时，“与其默默承受，不如抬头面对”。

贵族们以为除掉格拉古兄弟后他们就能重掌大权，但他们很快发现，接下来的对手远不及格拉古兄弟仁厚。清算盖约·格拉古的惨案发生在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19年，《玛利亚法》颁布，这是第一部重拳打击罗马贵族统治的法律。玛利亚法规定，每个罗马人都可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参加选举。该法律对任一公职都适用，目的是防止参与竞选的官员拉票。法案一出，便引起了贵族的强烈反对，虽然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声势，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玛利亚法》的实行。阴谋诡计是贵族们最有力的武器，但他们的权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由于相互嫉妒，他们不愿接受他人的领导，一盘散沙似的等待其他派系将其推翻。共和政体已经名存实亡，即便如此，贵族们还是屡次挑衅对手，但这种反动行为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投

票权，所以贵族们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为他们投票。他们不敢干预盖约·格拉古的《粮食法》，也不敢改变亚洲行省的税收制度。十七年前，他们遏制不了骑士阶层的壮大，十七年后，他们依旧不敢废除从骑士阶层中挑选审判员的制度，但在他们“敢”做的事情上，他们绝不手软。譬如，迫害格拉古党人，将波比留·利纳斯从流放地召回等。再如，奥皮姆斯被控利用职权公报私仇杀害了一位公民，元老院竟然将其无罪释放，但对以同样罪名被控诉的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元老院却拒绝释放他，因为他曾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尽管他后来脱离了格拉古阵营。因此，奥皮姆斯下台后，他的代言人被迫自杀，这是一个从事可鄙职业的人应有的下场。

很快，回光返照的贵族们开始加强他们对罗马政务的控制。《巴比亚法》保护了在迦太基获得小块土地的殖民者，但元老院废除了盖约·格拉古曾经规划的殖民地，除涅普顿尼亚外，所有的殖民事务一律终止。接着，他们连续发布了三道政令，废除了《农业法》，使曾因这部法律获得喘息的意大利再度回到了衰退的轨道上。这三道政令是：第一，允许土地持有者转卖土地。提比略·格拉古曾明令禁止转卖土地，但现在，富人可以买下小土地主手中所有的土地，并使用各种手段将小土地主驱逐出去。第二，一个叫鲍里斯或托里斯的保民官禁止继续分发土地，并撤销了土地委员会。这两道法令将大面积的公地双手送给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富人，这些富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头衔。但在格拉古时代，想要获得头衔必须通过烦琐的申请程序。转卖土地虽然是一个冒险行为，但足具诱惑力，因此农民对这一政令选择保持沉默。之前被德鲁苏斯废除的地税现在开始重新征收，获得的利益被贵族们瓜分。第三，由于人们对上述愚蠢政策的姑息纵容，贵族们从中尝到了甜头，他们唆使一个叫凯厄斯·巴比斯的保民官废除了所有地税。这项在公元前111年出台的法律通常被称为《托利安法》，但真正的《托利安法》可能在公元前118年已经开始实行。其间，富人们不断吞并穷人的土地，因此，当元老院废除地税时，真正的获利者其实是他们自己。他们还通过合法方式一劳永逸地将公地转为私地，我

们称其《巴比安法》。西塞罗认为，制定这一法律的斯皮里乌斯·托里斯同时废除了地税，但据阿庇安记载，废除地税的是斯皮里乌斯·鲍里斯。据推测，很可能是西塞罗将这两个名字弄混了，阿庇安记载的斯皮里乌斯·鲍里斯实际上就是斯皮里乌斯·托里斯，而西塞罗提到的保民官斯皮里乌斯·托里斯实际上是另一人。不管怎样，该法律使富人受益无穷，因为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为了防止意大利人反抗，他们在法律中加入了一些其他条款。譬如，提比略·格拉古打算收回原来专门拨给拉丁城的一些土地，这些土地上的许多贫苦农民因为被驱逐而心生不满，但该法令将这些土地的持有权恢复到了提比略·格拉古立法前的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元老院没有给予这些土地持有者永久性头衔，但也不干预他们占有这些土地。此外，如果意大利的自由居民和拉丁人交出盖约·格拉古之前建立的殖民地的土地，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补偿，而且贫苦农民也可以得到一笔补偿，他们可以在仍旧属于公地的牧场上放牧，但大牲口不得超过十只，小牲口不得超过五十只。根据该法，原来由土地委员会掌握的土地司法权现在掌握在执政官、检察官和裁判官手中。纳税人与税收官的矛盾纠纷案由执政官、裁判官审判，因为此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外省，所以主要由各行省的行政长官处理。

阿庇安对这种反动立法的后果做了大致的总结：该法导致公民人口减少、兵源匮乏和税收赤字。实际上，这些结果已经清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奴隶的不满、大庄园的膨胀、人口的减少、土地的贬值……高奏凯歌的贵族们正一步步将这个国家推向毁灭的深渊。最后这段时间，贵族们不为意大利的利益奋斗，也不为征服世界奋斗，而是忙着巩固罗马在意大利的地位和自己在罗马的地位。财富和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据说在巴比安法颁布后的十年，所有公民中只有两千户富人。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23年，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子都担任过执政官，他本人也担任过罗马所有的高级职位。正像罗马历史学家塞勒斯特说的那样，贵族的荣耀代代相传。

罗马还有不少残存的格拉古党，他们迫切希望改变乌烟瘴气的社会现状，但由于没有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再加上敌人的威胁恐吓，他们敢怒不敢言。在努曼提雅战争中，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曾为自己指定了一名接班人，他说如果自己战死，这位年轻人可以接替自己的位置。现在这位勇敢的将士已经从政，他一面忙着遏制贵族的势力，竭力维持投票的私密性和有效性，一面忙着抵制分发谷物，对抗乌合之众。然而，没人知道他能走多远，虽然他已经是一位裁判官，但还是常常遭到梅特路斯家族的排挤。盖约·格拉古的死使元老院的统治延长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内外交困、屈节辱命的二十年：朱古达战争的节节失利、西西里的二次奴隶起义、幽灵般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罗马军队的一次次打击。公元前105年的一次战争结束了这一切，这次战争比第二次布匿战争更惨烈。此时，元老院的腐朽堕落已经达到极致，双手沾满格拉古兄弟鲜血的刽子手也倒在了盖乌斯·马略的剑下，毫无还手之力，他们受到千夫所指，无人同情。

注解

[1]　德鲁苏斯是改革家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父亲，是元老院用来对抗盖约·格拉古的工具。

[2]　德鲁苏斯的儿子M.李维·德鲁苏斯是一位执行力极强的保民官。

[3]　古罗马人穿的宽松长袍。

第4章　朱古达战争

精彩看点

阿塔罗斯三世的遗嘱——阿里斯托尼库斯篡权——平定亚洲——朱古达杀害西耶姆普萨尔、进攻阿德盖巴尔——朱古达在罗马的阴谋和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等贵族的罪行——三人小组受贿——阿德盖巴尔被杀——罗马宣战后朱古达贿赂罗马将领——盖约·曼米努斯的慷慨陈词——朱古达应召至罗马、暗杀玛西瓦——朱古达打败奥鲁斯·阿比诺斯——昆图斯·梅特路斯出任统帅——朱古达战败穆图尔河——游击战——盖乌斯·马略当选执政官、接替昆图斯·梅特路斯——博库斯的背叛——平定努米底亚

阿塔罗斯三世是帕加马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在充满妒意的宗主国居心叵测的“保护”下，他统治的国家艰难发展起来。阿塔罗斯三世驾崩时留下遗嘱，将他的领土并入罗马共和国。登基之初，阿塔罗斯三世屠杀了他父亲所有的朋友及家人，晚年他一直隐居园林，沉迷蜡像制作。如果遗嘱不是伪造的，那么他有预谋的疯癫行为可能与遗嘱有关。他父亲欧迈尼斯二世的私生子阿里斯托尼库斯宣布遗嘱无效，并试图篡夺王位。

公元前133年，阿塔罗斯三世驾崩。同年，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围攻努曼提雅，西西里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在罗马人面临内忧外患之际，阿里斯托尼库斯在一些党羽的支持下发动了起义。如果没有卡帕多西亚国王、比提尼亚国王以及以弗所

等亚洲城市的支援，罗马面临的麻烦可能更大。阿里斯托尼库斯占领了卢克[1]，后来被以弗所人击退。当元老院终于有时间派出专员对付他时，阿里斯托尼库斯已经占领了比提尼亚、阿波罗尼亚、孟多斯、科勒芬以及萨姆斯岛，提比略·格拉古的朋友布洛休斯也投奔了他，罗马的内乱更是增强了他的信心。公元前131年，盖约·格拉古的岳父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担任执政官，并被派往亚洲镇压叛乱。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是罗马的祭司长，他富有、雄辩、出身高贵，且法律知识渊博，根据他与格拉古家族和西庇阿家族的亲密关系推断，他应该是当时罗马贵族圈里的红人。他在亚洲围攻卢克时，在埃利亚看到两块大木材，于是打算派人将其做成攻城槌。但攻城槌的建造师，即卢克的大法官认为小块木材比较合适，于是取来了小块木材。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勃然大怒，命人脱光建造师的衣服鞭打他。第二年，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惊奇地发现敌人出现在卢克附近。他本有机会逃走，但为了防止他的同事弗莱克斯得到这个行省，他将从亚洲搜刮来的所有战利品都带在身上，结果错失了逃脱良机。被捕后，他用木棍戳瞎了追捕者的眼睛，激怒了对方，最后被杀。对他的死的评价其实是对元老院领导下的罗马政府的评价：勇猛而残忍、高贵而无能。他本人就像一块优质的合金，这是我们能给予他的最高评价。

与此同时，由于激起了罗马奴隶的反抗精神，阿里斯托尼库斯的势力日益强大。但公元前130年，局势急剧反转，执政官M.珀珀那迅速结束了战争并将阿里斯托尼库斯押回罗马。随后，阿里斯托尼库斯在监狱里被绞死，布洛休斯也自杀了。他的部分领土被分给曾经援助过罗马的国王们，其中一位是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父亲，佛里几亚是分配给他的领土。但元老院后来又从他的继承人手中收回了这片领土，理由是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父亲曾经贿赂了执政官阿奎留斯，从而得到了这片领土。也许是阿奎留斯太腐败，也许是元老院太吝啬，但很可能是双方沆瀣一气，先由阿奎留斯将领地作为见面礼送给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父亲，再由元老院出面收回。此外，帕加马王国在欧洲的部分

领地被并入了马其顿省，帖尔密斯并入了利西亚，其余的领地组成了一个新行省，叫亚洲省，这个名称反映出罗马扩张领土的野心。实际上，非洲省的名称早已反映出这种野心，但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却源于一个私生子的野心。



米特拉达六世的头部雕像

朱古达是马斯泰那巴[2]的私生子，密西普萨的兄弟。努曼提雅战

争中，他曾与后来的对手盖乌斯·马略一同为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效命。那时，他有意接近罗马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密谋夺取努米底亚王位的继承权。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曾斥责他的这种行为，并说建立友谊的对象应该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但在朱古达心中，高尚的品格无法与他产生共鸣。集勇猛、狡诈、焦躁等性格于一身的朱古达，既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指挥官，也是一名诡计多端的政客。他善于观察并利用别人的弱点，踏着三位亲人的鲜血一步步接近王位。从某个方面看，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德三世，“集勇猛、大胆、冒险精神和自负、敏锐、狡诈、残忍于一身”[3]。之前，努米底亚由密西普萨和他的两位兄弟一同统治，但密西普萨的两位兄弟在他去世前相继去世。随后，在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安排下，密西普萨去世前将努米底亚托付给阿德盖巴尔、西耶姆普萨尔和朱古达。阿德盖巴尔体弱多病且生性懦弱，西耶姆普萨尔性格急躁、鲁莽。这两个人是朱古达的侄子。朱古达比他们大十到十五岁，是最受努米底亚人欢迎的王子，英俊、威武、有从军的经历，符合许多人对国王的期待。但很快，在第一次会议上，西耶姆普萨尔拒绝将象征荣誉的位置授予朱古达，因此激怒了他。朱古达说密西普萨在位的最后五年因为力不胜任而一直无所作为，西耶姆普萨尔反驳说他完全同意，因为密西普萨最后三年做的最蠢的一件事就是接纳了朱古达。接下来是西耶姆普萨尔命丧索米达的故事。朱古达收买了从军时期的一个旧部下，当西耶姆普萨尔来到一个叫索米达的小城时，这个人设法拿到了一套城门钥匙。一天夜里，他潜入城内，砍下西耶姆普萨尔的头，逃出城外献给了朱古达。朱古达乘胜追击，拿下了一座又一座城池，努米底亚最精良的部队都倒向了他。在一次激战中，他打败了阿德盖巴尔。阿德盖巴尔仓皇逃往罗马求援。朱古达也派使者携带大量财宝前往罗马，先后贿赂了他的军中旧友和一些有权势的人。很快，西耶姆普萨尔和阿德盖巴尔兄弟的遭遇在罗马激起的公愤被平息下去，但贵族首领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似乎想要得到更多好处，在他的斡旋下，罗马派出一个由十名专员组成的特派小组前往努米底亚帮助分割领土。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曾被西塞罗誉为最优秀的公民，他年轻时一直想成为一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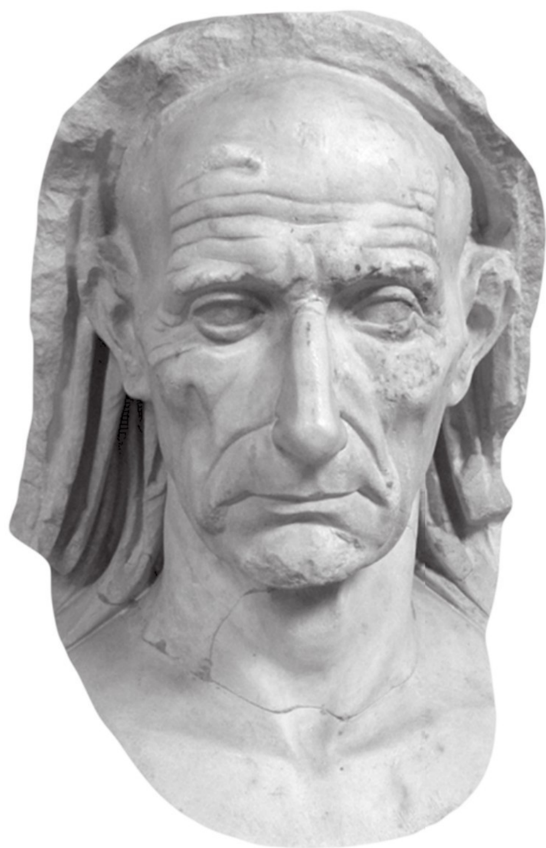
债人，他也很擅长这类工作，因此，他很可能想通过这个特派小组牟利，杀死盖约·格拉古的刽子手奥皮姆斯曾做过类似的事。在罗马时，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曾反对朱古达，但在朱古达虚伪的顺从和诱惑下，他最终与大部分同事一样接受了贿赂。结果，阿德盖巴尔得到了努米底亚王国东半部的领土，表面上他获得了首都锡尔塔和一些重要港口及繁华城镇，但其中大部分地区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而西部肥沃地区都归朱古达所有。



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阿德盖巴尔

这些事发生在公元前117年。罗马的专员小组刚离开，得志的朱古达就擐甲挥戈。愤怒的阿德盖巴尔一面向罗马申诉，一面拿起武器自卫，却在锡尔塔与地中海之间的一个地方被击败。殖民地的意大利居民击退了追击的骑兵，使阿德盖巴尔躲过了在锡尔塔被敌人俘虏的命运。与此同时，罗马收到了阿德盖巴尔的控诉。元老院立即派了十个年轻人前往努米底亚进行仲裁。元老院派十名想得到好处的年轻人前往努米底亚似乎不是无心之举。他们仅命仲裁小组停止战争，让两位统治者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当时双方的战斗形势和围攻锡尔塔的消息还未传到罗马。朱古达接待了仲裁小组，对他们说自己的美德曾得到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赞誉，并且自己是个是非分明的人，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接着他又痛斥阿德盖巴尔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并承诺派使者前往罗马。于是，这十个年轻人甚至连阿德盖巴尔的面都没有见到，就离开了非洲。可想而知，他们走的时候并不像来

的时候那样两手空空。



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头部雕像

锡尔塔城地处一个半岛的岬角，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固若金汤。现代作家将它比喻成一个伸向两座山脉中间的峡谷的方形马刺。“马刺”的一角有一座大桥，将峡谷两边连接起来。锡尔塔城就是现在的君士坦丁[4]，距地中海四十八英里，距阿尔及尔二百英里，位于悬崖峭壁上，三面环河，河对岸的乡村像高高的露台一样环绕在周围。面对这样一个城市，朱古达无法强攻，只能通过封锁消耗城内的资源。四个月后，阿德盖巴尔的两名使者偷偷送信到元老院，这次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主人请求元老院归还领土，而是向元老院求救。元

老院中的一些人主张立即派军前往非洲，但在当时，正直的人总是占少数。最后他们派了三名特使前往非洲，充满自信的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担任三人小组的领导。与此同时，朱古达发起猛攻，试图在罗马特使到来前拿下锡尔塔。三人小组到来后，朱古达前往乌提卡与他们会面。他在乌提卡受到了三人小组的严肃警告。然后，与之前的十人小组一样，三位特使离开了非洲。接下来，锡尔塔投降了。在绝望之际，守城者也许希望通过投降为对手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为自己留一条生路；也可能是因为水源、粮草短缺。然而，朱古达占领锡尔塔后，立即将阿德盖巴尔折磨致死，并开始屠城。



锡尔塔城遗址

朱古达终于惹怒了罗马。元老院名誉扫地，但金钱依然是一个让人舒心的奴隶。骑士阶层深受触动，锡尔塔城中可能有他们的亲人，也可能是另一个敏感原因——他们的钱袋受到了影响。毫无疑问，锡尔塔的意大利人与罗马商人联系密切，但他们的收益却在一夜之间被一个野蛮人没收了。受到朱古达贿赂的议员试图阻止讨论，但没有得逞，因为保民官盖约·曼米努斯的慷慨陈词让他们哑然无语。朱古达新

派来的特使带着大量金银财帛，却被命令在十天内离开意大利。执政官贝斯蒂亚率领军队经水路前往非洲，他的副指挥官是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权衡之后，认为做一个爱国者的收益更大。经过几次战役后，曾让罗马的传统美德不战而屈的金钱再次发挥了作用。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贪欲得到了满足，贝斯蒂亚也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投降，双方停火。随后，罗马军队启程，准备回去监管第二年的竞选。

正直的盖约·曼米努斯十分愤怒，他发表了演说，怒斥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不知道罗马史学家赛勒斯特对他的演讲所做的描述真实与否，但如果赛勒斯特的记录属实，那么这位保民官的铿锵字句一定在每一位正直的罗马人耳边回响，使他们想起了十年前那位极富辩才，却最后葬身台伯河的保民官。盖约·曼米努斯无情地嘲讽听众，由于他们的胆怯，曾为他们的权益战斗的英雄惨遭杀戮，自己也受一群乌合之众的摆布；他们眼睁睁看着财富被抢掠、高级职位被垄断、属国向贵族哭喊求救却无动于衷。更糟的是，共和国的名誉成了用来交易的商品，出卖祖国荣誉的人既不感到羞愧也不感到悲伤，仍旧昂首阔步，高唱凯歌，身居执政官、大祭司等高位，仿佛他们是正人君子而不是卖国贼。盖约·曼米努斯的评述一针见血，他号召人们坚持将朱古达带到罗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检验他投降的诚意。盖约·曼米努斯慷慨激昂的演说终于起了作用，元老院派裁判官卡西乌斯将朱古达带到罗马，但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朱古达犹豫了。贝斯蒂亚等官员纷纷效仿自己的将领，趁火打劫，收受贿赂，还将逃往罗马的努米底亚人卖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朱古达迅速成为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不再仅仅是一个派系首领。努米底亚人甚至希望有一天他能带领他们反抗罗马。犹豫过后，朱古达还是让步了，但半途而废不是他的风格。为了博取同情，他穿着平民衣服来到罗马。当然，他做的远不止这些。那一年是《托利安法》开始实施的第一年，这个法案的起草者可能是保民官凯厄斯·巴比斯，他与自己的同事盖约·曼米努斯的性格完全不同，他收取了朱古达的贿赂。当盖约·曼米努斯盘问朱古达

时，他行使了否决权，阻止对方回答问题。因此，虽然朱古达受到千夫所指，但事情还是沿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但很快，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朱古达有一个叫玛西瓦的堂兄弟，也是前国王马西尼撒的孙子，他在执政官阿尔丁诺斯的鼓动下称王。依据当时的局势，玛西瓦肯定会赢得罗马的支持。因此，在原有方案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朱古达启动了第二套方案，即他经常使用的手段——暗杀。他派亲信波密尔卡刺杀了玛西瓦，并协助波密尔卡从意大利逃脱。朱古达的暴行终于触碰到了那些利令智昏的贵族的底线，他被勒令十天内离开罗马。离开之前，朱古达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这是一座可以被卖掉的城市。买主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它毁灭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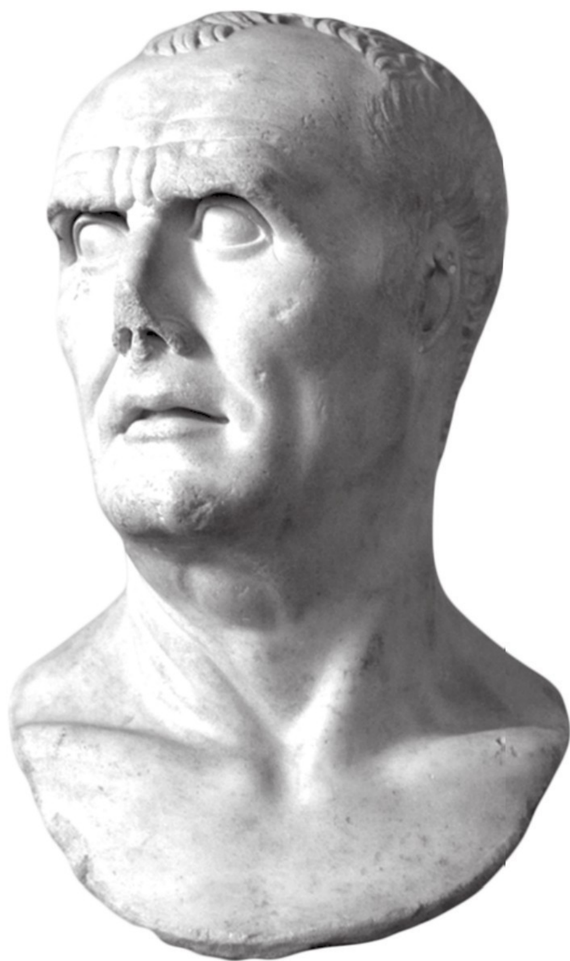
接下来，斯普里乌斯·阿比诺斯被派往努米底亚，他极有可能步贝斯蒂亚和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后尘，因为在公元前110年的竞选中，他的业绩是一张白纸，因此，即使是奥鲁斯·阿比诺斯鲁莽的突袭也无法证实他的清白。公元前109年1月，斯普里乌斯·阿比诺斯的兄弟奥鲁斯·阿比诺斯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做出了一个决定，打算突袭朱古达的金库。他率领军队向金库所在地苏图尔行进。当时正值雨季，连日暴雨将陆地变成一片汪洋。朱古达退入内地，企图诱使奥鲁斯·阿比诺斯与自己达成协议并收买了他的部将。一天夜里，朱古达突然包围了罗马军，被收买的叛徒逃离了岗位，士兵们只能放下武器投降。第二天，朱古达迫使奥鲁斯·阿比诺斯钻过轭门[5]，签订了和平协议。紧接着，朱古达以牙还牙，勒令奥鲁斯·阿比诺斯十天内离开努米底亚。元老院自然不会承认所谓的和平协议，他们甚至没有心情认真审查这一出闹剧。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在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等人身上变成了唐吉诃德式的笑话。斯普里乌斯·阿比诺斯匆匆赶到非洲，看到人山人海的军队后，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终于，罗马的一位保民官站了出来，控诉所有收受贿赂、通敌卖国的行为。做贼心虚的元老院竭力阻挠，并得到了意大利富人的帮助，因为新施行的法令为

意大利富人免去了土地税。尽管如此，元老院还是失败了，保民官议案通过并成立了三人小组，负责调查此事，其中一人是如蝇逐臭的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陪审员由骑士担任。最后，贝斯蒂亚、斯普里乌斯·阿比诺斯、奥皮姆斯、审查官加图的孙子凯厄斯·加图等人被判流放。后来，奥皮姆斯穷困潦倒地死在底耳哈琴，也许对他来说这是最残酷的惩罚。

历史上关于朱古达战争的记载十分详尽。纵观战争涉及的时代背景，似乎没有必要详细记载单纯的军事行动。然而，这段历史并不只关乎军事行动，还涉及对时弊的针砭以及对政府罪行的揭露。朱古达离开罗马时留下的那句话精练地概括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贵族们个个财迷心窍，甚至抛弃了道德颜面，同时期的一场演说从某方面解释了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美食家们说，通常情况下，一顿佳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道道珍馐，最美味的菜品往往在最后呈现，我们称其为'压轴菜'。大部分禽类，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最好吃的部分都是后半部。主人的宴席上的菜品往往也是禽类的后半部，因为这样才能使客人吃得满意，如果是前半部，一般会使客人们吃得索然无味。同样的道理，如果金钱利益是一顿大餐，聪明的食客会将自己的开胃菜让给别人，省去咀嚼的麻烦，否则等他回过神来就什么也没有了。看到别人的长椅上镶金缀银，自己却只有不朽的众神相伴，心情肯定复杂。"

目前为止，战争反映的只是罗马政府不可救药的堕落腐败，但接下来的战争反映出它如何陷入革命的旋涡无法自拔。盖乌斯·马略顶住昆图斯·梅特路斯施加的压力，当选执政官，这件事标志着罗马共和政体的衰落和君主政体的崛起。苏拉和盖乌斯·马略的对抗表明最高权力的角逐不在广场上，而是在军营中。《马尼留斯法》的出台迫切要求罗马军队积极投入战争。公元前109年，昆图斯·梅特路斯当选执政官，努米底亚作为执政官行省分配给他。昆图斯·梅特路斯暴戾而自负，如果他少一些愚蠢的自负，也许会避免许多罪行。上任后，他立

刻开始整顿军队，用残忍的方式惩治逃兵。然而，他的治军手段很有效果，不管是士兵还是对手都意识到，新的统帅不可小觑。罗马人对待逃兵从不仁慈，他们将逃兵丢入兽群，或砍下他们的双手。昆图斯·梅特路斯更是变本加厉，他将三千名逃兵的身体一半埋在土里，露出腰部以上的部分，作为士兵训练时的靶子，最后放火烧掉了他们。



盖乌斯·马略的头部雕像

朱古达害怕了，立即派使者前去与昆图斯·梅特路斯谈判，唯一的条件是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昆图斯·梅特路斯闪烁其词，暗地里与信使密谋，诱使朱古达投降或打算除掉他。虽然暗杀是罗马贵族惯用的伎俩，但昆图斯·梅特路斯在这方面与朱古达相比还是相差太远。此时，陷入困境的朱古达唯一的信念就是抗争到底。

此时的战场上，罗马军队必须越过一座山脉。山下是一片平原，有一条十八英里长的河流，叫穆图尔河[6]。河流与山脉之间的地势起伏不平，可能是山脉的尖坡。朱古达派波密尔卡率领一支步兵团和一群战象驻扎在这片尖坡上，自己带着最精良的步兵和骑兵守在靠近山脉的一端。昆图斯·梅特路斯明知有埋伏，却因为缺水而不得不接近水源，在朝穆图尔河前进的途中遭遇伏击。这时，新的军规产生了效果。虽然前后无援，但被打散的罗马军还是奋力厮杀。最后，昆图斯·梅特路斯和盖乌斯·马略占领了这片土坡，卢提里乌斯·鲁弗斯驱散了步兵团的精兵，杀死或捕获了所有战象。虽然朱古达的计划很周密，但还是落空了，他的大部分士兵落荒而逃，遭到失败时他们经常这么做。于是，朱古达开始了游击战，不断破坏敌军的水源，杀死掉队的士兵。昆图斯·梅特路斯将罗马军分成两路，自己和盖乌斯·马略分别带领一路，继续攻城略地，在必要时将两军会合。随后，他们到达了扎马。当昆图斯·梅特路斯打算快速拿下这座城时，朱古达突袭了他的兵营。虽然没有成功，但第二天朱古达再次袭击了罗马军。于是，昆图斯·梅特路斯不得不改变计划。他派兵驻守攻下的城市，自己前往可能位于乌提卡的冬营与波密尔卡秘密交易。之后，叛变的波密尔卡怂恿朱古达投降。于是朱古达交出了战象和俘兵，以及一大笔钱。正当他打算投降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了波密尔卡的叛变，所以杀了波密尔卡，再一次决定顽抗到底。



古罗马军队与朱古达的战象交战

接下来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8年。公元前107年，盖乌斯·马略返回罗马参加执政官竞选，在此期间，昆图斯·梅特路斯留任军队总指挥。朱古达虽如困兽，却并不是毫无希望。备受罗马军蹂躏的努米底亚人视他为英雄。罗马军占领的重镇瓦加，即现在的巴哈反叛了。随后，昆图斯·梅特路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通敌卖国罪处决了拉丁人指挥官特皮留斯。昆图斯·梅特路斯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因此步步紧逼。朱古达在输了另一场战役后逃往塔莱。昆图斯·梅特路斯越过沙漠，穷追五十英里。被围困四十天后，朱古达再次被迫出逃。但此时，罗马军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朱古达的岳父，与朱古达结盟的毛里塔尼亚的国王博库斯。朱古达诱使博库斯攻打罗马军占领的锡尔塔。与此同时，昆图斯·梅特路斯也得到消息称盖乌斯·马略将前来取代他。这位自负的执政官勃然大怒，立即停止作战，唯恐折损自己的声誉或降低继任者克敌的难度。

非洲的战事对罗马士兵来说是一件既辛苦又鲜有好处的事。朱古达贿赂的时期已经过去，因此军队招兵显得十分困难。盖乌斯·马略扩大了招兵范围，从往常无须服兵役的无产者和小土地主中招募士兵，

缓解了非洲兵源短缺的危机。接替昆图斯·梅特路斯后，盖乌斯·马略继续攻城略地。另一边，博库斯与朱古达兵分两路，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更有利于牵制敌人。但盖乌斯·马略一直保持警惕，虽然每次两军对阵时依然抓不住朱古达，但总能将他打得落花流水。突尼斯南部有一片绿洲，里面有一座叫加夫萨的城市，当时叫开普萨。盖乌斯·马略用了九到十天才艰难攻下这座城。虽然城里的居民都已经投降，但他还是残忍屠杀了城里所有的成年人，并将剩下的人卖作奴隶。赛勒斯特记录了盖乌斯·马略的另一个壮举，但由于地理上的错误，具体位置已无从确认。盖乌斯·马略佩着剑率领军队举着火把四处搜寻，找到了朱古达的金库所在地。金库在悬崖上的一座城堡里，人们认为只有一条路能通往城堡。盖乌斯·马略费时多日，希望通过这条路到达城堡，却无功而返。一次偶然的发现使事情发生了转机，军队里的一个利古里亚人在收集蜗牛时，不知不觉接近了山顶，于是他继续往上爬，终于俯瞰到了全城景色。第二天，盖乌斯·马略派出十名精兵，带上号角、小号，由利古里亚人担任向导前往城堡，自己率领军队从原路发起进攻。到达山顶后，他下令立即进攻。大部队以盾作盔，护住头部，对城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时，城堡的另一侧响起了罗马军的号角声，努米底亚人军心涣散，四处逃窜，城堡很快被攻陷。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昆图斯·梅特路斯



塔莱古城一处遗址，绘于19世纪

盖乌斯·马略与率领少数骑兵的苏拉会合后，继续向东行进，打算在沿海城市过冬。垂死挣扎的朱古达丢出最后一张王牌，以三分之一的国土作筹码，巩固了与博库斯的联盟。一天傍晚，他趁罗马军休息时发动了突袭。罗马军队严明的军规发挥了作用。就像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克曼战役中的英军，分散的罗马军奋起反击。最后，盖乌斯·马略在一座小山上集结部队，并命苏拉率领军队占领了附近的一座山。努米底亚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围住了苏拉的军队，彻夜狂欢。但在黎明时分，盖乌斯·马略的军队吹响了号角，士兵们高呼着冲下山，轻而易举地驱散了敌军。获胜的罗马军继续前行，来到锡尔塔附近。朱古达试图再次切断罗马军的后路。与此同时，博库斯的儿子沃鲁克斯为他带来了一些新的步兵。当骑兵牵制住苏拉时，博库斯率领步兵袭击了敌军的后方部队。与马西尼撒部队作战的朱古达此时也绕到后方，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高呼他已经斩杀了盖乌斯·马略，导致罗马军军心涣散。此时的苏拉就像马斯顿荒原之战中的克伦威尔将军[7]，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立即掉头袭击了博库斯军队的侧翼。朱古达继续做困兽之斗，直到身边的所有人都被杀光后才试图逃走。战役的结果是：博库斯迫切希望与罗马人达成协议，于是盖乌斯·马略派苏拉前去与他谈判。博库斯对罗马人又惧又恨，在朱古达的唆使下，又

一次动摇了。苏拉征得盖乌斯·马略的同意后，派使者前往罗马征询元老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博库斯愿意放下武器，罗马将对他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如果他在战争中为罗马军做出贡献，还可以成为罗马的朋友和同盟。连日来，苏拉冒险拜访了博库斯，进行了多次谈判和密谋。另一边，朱古达也抓紧时间诱惑博库斯。经过几天的踌躇摇摆，这位摩尔人的国王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终于，罗马人精心设计后成功诱捕了叛贼朱古达。身穿王袍、戴着锁链的朱古达跟随盖乌斯·马略的战车来到罗马，据说此时他已神志不清。



朱古达的岳父博库斯一世

战争到这里已经结束。纵观整件事的经过，我们不禁惊叹众神对的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等人的偏爱，这些人自始至终都坐收渔翁之利。朱古达被押送到罗马后，立即关进了监狱。执刑人员为了扒开他的衣服，甚至扯烂了他的衣服，扯下耳环时，将他的耳垂也扯了下来。最后，朱古达被一丝不挂地扔进了图里亚努姆地牢。此时，他的脸上仍带着放荡不羁的笑，高呼："大力神啊，他们给我洗了个冷水澡！"经过六天饥饿的折磨后，朱古达死在地牢里。努米底亚的最西面，大致是今天的阿尔及尔被划分给博库斯，余下的领土给了朱古达的异母兄弟高达。罗马不屑于将一个容易失守的边境国家纳为行省，但他们与内地的一些加图利安部落联盟，因此只要他们愿意，可以随时介入努米底亚的事务。



朱古达战争爆发于公元前2世纪末，交战双方分别为罗马共和国与努米底亚。图为

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被罗马人俘虏的场景

注解

[1] 即现在的勒弗克（Lefke）。——原注

[2] 马斯泰那巴是公元前148到前145年努米底亚的国王之一，与古卢萨（Gulussa）和密西普萨（Micipsa）共治努米底亚国。

[3] 出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查理三世》。

[4] 君士坦丁是西班牙城市。

[5] 将两支长矛插在地上，顶上横扎一支长矛，像球门一样的东西。钻轭门最早由罗马人发明，用来羞辱战败者。

[6] 可能是今天迈杰尔达河（Mejerda）的支流。——原注

[7] 1644年7月2日，马斯顿荒原之战爆发。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国会军一举击溃查理一世的王军，成为英格兰内战的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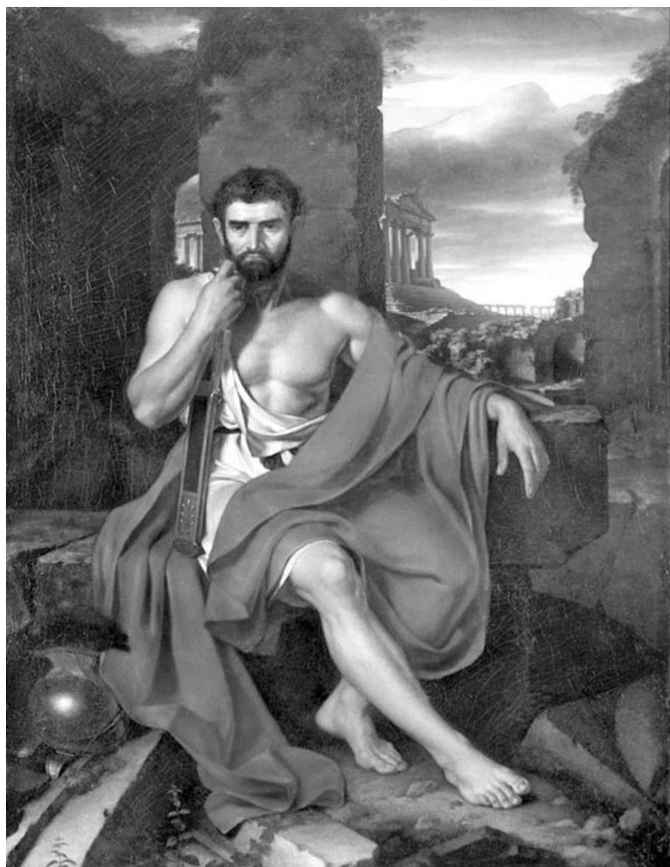
第5章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精彩看点

罗马的社会斗争再次拉开帷幕——人气英雄盖乌斯·马略——罗马无休无止的边境战争——辛布里人打败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和朱尼厄斯·希拉努斯——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和“托洛萨的财宝”——辛布里人打败奥瑞里厄斯·斯考卢斯和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盖乌斯·马略再次当选执政官——侵略者的发源地——侵略者的作战计划——盖乌斯·马略的计划——六河战役——维尔赛莱战役

公元前105年，朱古达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给危机四伏的罗马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好处，譬如，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一位精明强干的将领。在正式叙述与辛布里人的矛盾斗争前，先介绍一下罗马的情况以及罗马最具影响力的人和他的对手。激烈的社会斗争重新拉开帷幕。盖乌斯·马略与苏拉之间的竞争在辛布里战争开始前已经存在，战争使人们一直处在恐慌状态，但比起紧张的社会斗争，这些都只是插曲。此时的盖乌斯·马略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按照监察官加图的说法，一个种过庄稼的人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但盖乌斯·马略是个例外。盖乌斯·马略的家族曾是赫伦尼家族的依附民，西班牙战争中，他和父亲同在军中服役，战争结束后他的父亲在希瑞亚特[1]做短工，他自己则步步高升，不久便被擢升为军官。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对他的评价是：英勇、节俭、清廉、值得信赖，即使与自己意见相左，也不违抗上级的命令。譬如攻打努曼提雅前，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命令驱逐军中所有预言家一事。回程路上，盖乌斯·马略幸运地娶了

尤里乌斯·凯撒的姑母。这位女士的财富和高贵出身为丈夫打开了一扇通往辉煌的大门，对盖乌斯·马略这样出身卑微的人来说，这扇门原本是关闭的。公元前119年，盖乌斯·马略当选保民官，之前提到的政策为他赢得了声誉。在人民眼中，他是一位正直而又爱国的政治家，既不谄媚贵族也不屈从暴民。但与梅特路斯家族之间的争斗此时已经开始，起因是执政官L.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反对他的不记名投票法，因此盖乌斯·马略下令将对方投入监狱，后来由于元老院的妥协，这一命令并未生效。公元前115年，盖乌斯·马略当选裁判官，但遭到诬陷，说他收受贿赂，这件事反映了贵族阶层对平民官员排挤打压的社会现实。第二年，他担任西班牙的地方长官，镇压了当地的匪帮，展现出一贯的领导才能。在军中，他受到士兵们的拥戴，就像拿破仑的部下米歇尔·奈伊[2]。他将自己视作士兵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说粗话、喝酒、干重活。他与昆图斯·梅特路斯一同在乌提卡作战时，一名预言家说神将对他委以重任，于是他向昆图斯·梅特路斯请假，打算回罗马竞选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回复说等他的儿子竞选成功后，他再去参与竞选。盖乌斯·马略对这种蔑视和嘲讽怀恨在心。种种迹象表明，频繁建功使这位原本性情淳朴的粗野汉子变得骄纵自负，甚至将上天的垂怜视为个人的优点。他怀着难以抑制的野心，开始散布舆论，称如果由他担任统帅可以很快结束战争，以此削弱了昆图斯·梅特路斯在军中和罗马商人中的声誉以及高达对他的信任。昆图斯·梅特路斯一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严酷的治军方式使他四处树敌，他也不愿将身边的位置让给高达，并拒绝派罗马骑兵护送高达，这一行为惹恼了这位努米底亚王子，于是高达等人写信给罗马，敦促罗马改任盖乌斯·马略为统帅。迫于各方压力，在竞选前第十二天，昆图斯·梅特路斯放走了盖乌斯·马略。幸运的盖乌斯·马略借力东风，日夜兼程，终于按时抵达了罗马。盖乌斯·马略的出身阶层——城市工匠和乡村阶层蜂拥至罗马听他的演说，他抨击昆图斯·梅特路斯，鼓吹自己将很快俘虏或杀死朱古达。在这次选举中，盖乌斯·马略如愿当选执政官。



盖乌斯·马略，他背后为迦太基的废墟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盖乌斯·马略如何被非凡的成就冲昏头脑。朱古达战争结束时，庆功的甜酒中已经带有丝丝苦味。获得首功、被称为“努米底库斯[3]”的是昆图斯·梅特路斯，凭借胆略和计谋诱捕朱古达的是苏拉，盖乌斯·马略无功而返。昆图斯·梅特路斯做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苏拉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结束了战争。盖乌斯·马略对这两人获得的荣誉感到十分愤怒，当博库斯提议由苏拉代表罗马接受朱古达的投降时，他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预感有一天苏拉将打败自己。除了胆略、将才和对目标的执着外，盖乌斯·马略与苏拉截然相反。苏拉出身贵族、骄纵、崇尚希腊文学，战争不是他的全部。他身上不仅有狮子的勇气，还有狐狸的狡诈，这一点非常让人畏惧。与盖

乌斯·马略相同的是，苏拉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一名女子——但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这名女子对苏拉的帮助就像查尔斯二世的女眷对年轻的丘吉尔的帮助。如果说盖乌斯·马略粗野的本性随着年岁的增长堕落成了嗜血的兽性，那么苏拉自始至终一直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他会因为一句玩笑杀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冷血、残酷、精于算计的行事作风使他比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让人憎恨，拿破仑一世都无法与其比肩。他从内心深处厌恶和排斥盖乌斯·马略粗俗的作风。当他鄙视对方的动机、看到对方逐渐走向堕落时，也一定垂涎盖乌斯·马略邪恶的天赋为其带来的无上尊荣，但此时他还不能表现出敌意。按捺不住的盖乌斯·马略参加完凯旋庆典后（公元前104年1月1日），穿着庆典长袍怒气冲冲地闯入元老院，给权贵们来了个下马威。在国人眼里，他是当下的大英雄。当北方战争爆发时，对苏拉来说最可靠的做法是追随自己的老上级赚取军功，但盖乌斯·马略这次却离不开这位能干的部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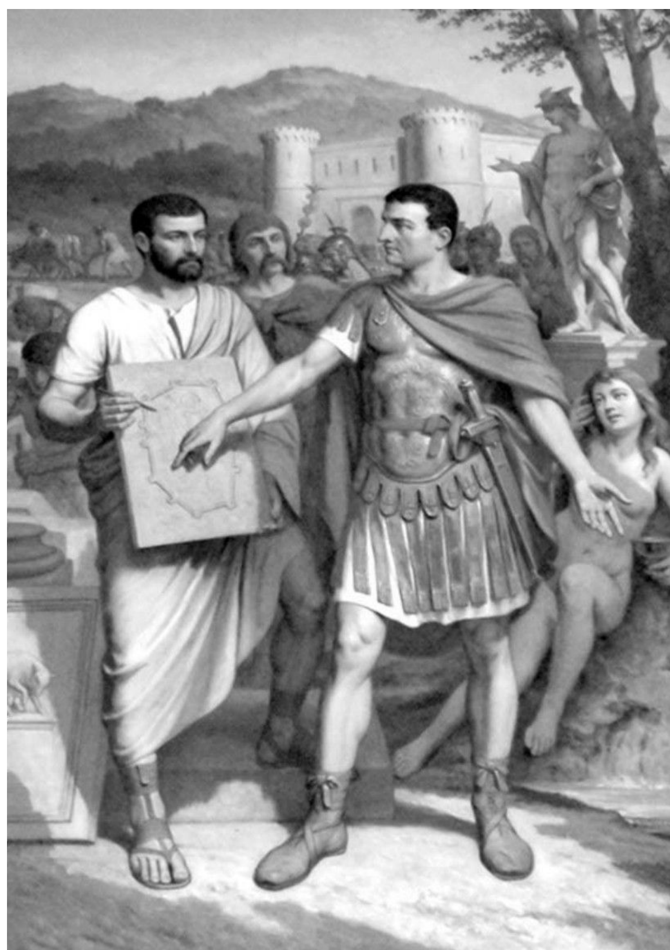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正面的人物头像为苏拉，背面的内容为苏拉坐在高位上，接受朱古达献上的橄榄枝

罗马边境战事频仍，除了与野蛮民族的摩擦外，将领们也会刻意制造一些战事为自己赚取军功和荣誉，但这些战事并不总是以罗马的胜利结束。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发生了许多战争，交战双方互有胜败。赛姆普罗涅斯·图提坦[4]击败了伊利里亚的伊埃派德人，但他之前也败给过伊埃派德人。公元前125年，居住在马赛以西、罗纳河和迪朗斯河以南的利古里亚族的赛亚人进攻马赛，弗莱克斯前往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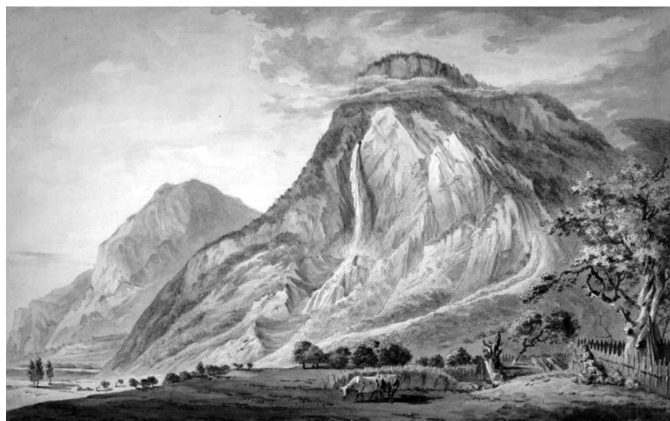
压，于公元前123年凯旋而归。同年，昆图斯·梅特路斯夺回了被海盗占领的巴利阿里群岛。公元前122年，赛亚人再次挑衅，卡尔维努斯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大概是现代的艾克斯，在那里设立了殖民地六河。这个殖民地成为罗马日后进一步征服周边的重要据点。高卢最强大的国家是埃杜维和阿维尔尼，分别位于伊莱弗河两岸，也就是现在的阿利埃河。这两个国家互为对手，阿维尔尼与罗纳河以东同纬度的阿洛布罗热部族结盟，埃杜维与罗马结盟。公元前122年或前121年，地方总督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指控阿洛布罗热侵犯埃杜维的领土，并窝藏了赛亚国王，因此发动了战争。最后，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在阿维尼翁附近打败了阿洛布罗热与阿维尔尼的联军，但损失了两万兵力。随后，费比乌斯接替了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向北行军越过伊萨拉河。公元前121年8月8日，在伊萨拉河与罗纳河的交汇处，他击败了前来援助阿洛布罗热的阿维尔尼军队，屠杀了十二万俘虏（另一说法是十五万俘虏）。阿维尔尼国王被俘，押往罗马，阿洛布罗热也臣服了罗马。这一年是盖约·格拉古遇害、艾特纳火山爆发的一年，同时也是葡萄丰收的一年。公元前118年，马修斯·瑞克斯歼灭了斯坦尼。斯坦尼可能是沿海阿尔卑斯山的利古里亚部落，与罗马通往南高卢的通道呈一条直线。这次胜仗使马修斯·瑞克斯获得了军功。同年，罗马不顾元老院的反对，决定在纳尔波建立殖民地，这个地方处在罗马到塔拉科那行省的通道上，也是罗马通往加仑河谷的必经之路。新建的行省包括塞文山脉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乡村地区，东北达日内瓦。他们还在罗纳河和比利牛斯山之间修了一条马路，称多美亚大道。公元前117年，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平白无故地去攻打伊利里亚的达尔马提亚人，另一种说法是他根本没有进攻便凯旋而归，获得了“达尔马提科斯”的姓氏，意为“征服达尔马提亚者”。公元前115年，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打败了亚得里亚海北岸的卡尔尼部落。公元前114年的执政官博尔基乌斯·加图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马其顿边境抵御高卢斯科迪斯克部落的进攻时全军覆没。公元前112年，斯科迪斯克部落被李维·德鲁苏斯打败，公元前109年又被米努基乌斯·鲁弗斯击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斯科迪斯克部落第一次胜利到第一次

失败间的这一年格外值得关注，不是因为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和色雷斯从撒丁岛凯旋而归，而是因为辛布里人第一次与罗马发生了冲突。辛布里人已经越过罗马边境（或将要越过边境），罗马派执政官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前去迎战。一部分辛布里人入侵诺里库姆，帕皮礼乌斯·卡尔博遣人警告他们，称诺里库姆是罗马的友邦。对方同意撤离，但帕皮礼乌斯·卡尔博却背信弃义，发起了进攻，结果在一个叫诺里亚的地方战败，颜面尽失。四年后，即公元前109年，盖乌斯·马略的同事朱尼厄斯·希拉努斯再次遭遇了这群野蛮人，当时他们已经越过莱茵河，在南高卢的新行省打败了朱尼厄斯·希拉努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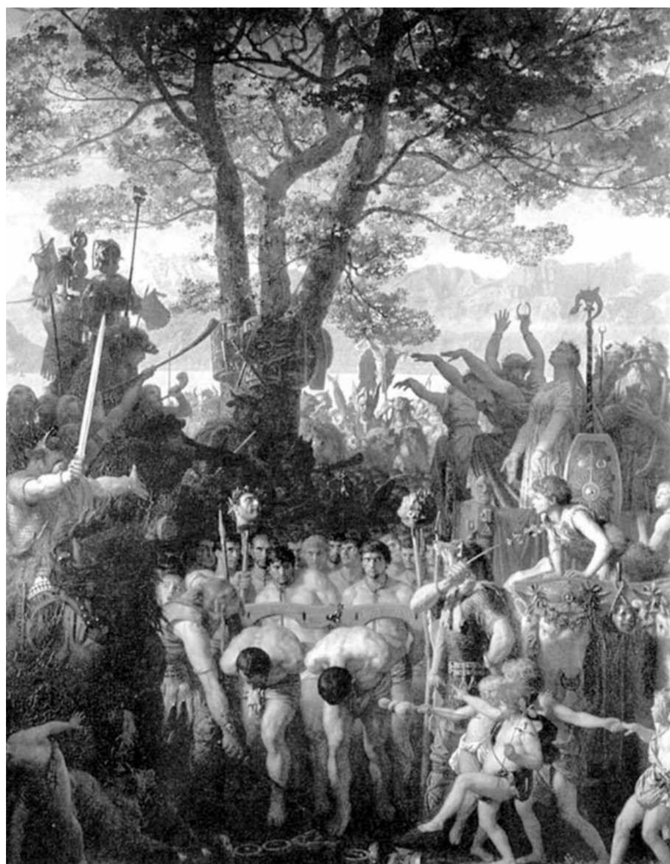


一名古罗马军官（右）与赛亚人（左）

辛布里人的迅速扩张使赫尔维蒂人感到焦躁不安。公元前107年，居住在侏罗山脉、罗纳河和日内瓦河之间的赫尔维蒂人的一支提古罗尼人打败并杀死了罗马执政官路奇乌斯·隆吉努斯，并逼迫他的副官钻轭门。于是，托洛萨[5]人造反了，驻守托洛萨的罗马将士很快都被套上了锁链。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通过欺骗收复了托洛萨，将城里所有财宝送往马赛。这笔不义之财在半路遭到打劫，事后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被指控雇用劫匪打劫这笔钱财。此后，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的名字成了灾难和偷窃欺诈的代名词。辛布里人一边向罗马索要定居的土地，一边酝酿着袭击意大利的计划。公元前105年，他们在罗纳河左岸俘虏并杀死了奥瑞里厄斯·斯考卢斯。当时在左岸率领军队主力的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给右岸的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也就是当时的执政官传递消息，要求对方过河会军。但正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马科斯·米努修斯与另一个马克西姆斯——费比乌斯·马克西姆斯[6]之间的关系那样，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对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充满猜忌和戒备。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与辛布里人谈判时，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认为对方想借此机会抢夺军功，盛怒之下贸然挑起了战役，结果战败，失去了营地（失败地点不详）。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也战败了，据记载罗马损失了八千兵力和两万随军杂役。罗马陷入恐慌，南高卢再次蠢蠢欲动。罗马进入戒备状态，他们缩短了悼念亡者的时间，每个适合服兵役的男子都被要求宣誓不得离开意大利，意大利港口的船长也必须宣誓不能带这些适龄男子出海。公元前104年，盖乌斯·马略当选执政官。



雄伟的阿尔卑斯山，绘于18世纪



提古罗尼人逼迫路奇乌斯·隆吉努斯的副官及俘虏钻过轭门

除去这些预警，命运之神依然垂青罗马。辛布里人也许发过誓，他们毁掉了到手的战利品，随后，沿着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新修的大路从西向比利牛斯山行进，一路烧杀抢掠。在凯尔提波利，他们遭遇劲敌，退回了南高卢。在南高卢他们与条顿人结盟，再次威胁意大利。但这一时期，共和国的将军们也忙碌起来。盖乌斯·马略的老战友卢提里乌斯·鲁弗斯正厉兵秣马，让角斗士教士兵们击剑。公元前104年初，盖乌斯·马略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之后他前往南高卢。在那里，苏拉俘虏了特克托撒国王，盖乌斯·马略则筹集供给、招募士兵、压制当地的反叛，此外，他还在罗纳河口上方一英里处开凿了一条运河，连接了罗纳河和一片湖泊[7]。他想利用罗纳河运送士兵和物资，但河里的冲击物给运输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公元前103年和公元前102年，他再次当选执政官。此时，他已经做好了打击侵略者的准备。

对这些侵略者的来历一直存在争论。他们也许是凯尔特人或条顿人，也许来自波罗的海或阿卓夫海岸，也许是居住在第聂伯河与顿河之间的奇美里人，亦或他们的名称源自他们的特征而不是居住地，下面这种推测比较可靠：在大西洋和波罗的海南岸之间，从比利牛斯山到伏尔加河一带，在远古时期曾有一些野蛮居民定期来到此地。当时凯尔特人迁往西班牙、意大利南部、德国东部和多瑙河东岸，以莱茵河作屏障，定居下来，开始了半开化的生活。现在的日耳曼部落与当时的凯尔特人一样来回迁徙。这些频繁迁徙的民族可能受到了其他部落的入侵，但根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观点，导致这些民族频繁迁徙的原因是海水泛滥，因为向南涌入的移民不是军队，而是整个民族，男女老幼一同寻找新的居住地。其中也有凯尔特人和赫尔维蒂人。尤里乌斯·凯撒认为他们并不是凯尔特人，因为他们有着淡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孩子们留着老年人的发型，所有这些都不是凯尔特人的特征。据此，我们将他们视为日耳曼人，“辛布里”这个名称可能源自他们的语言，意为“斗士”或“破坏者”。他们的最后一次迁徙是从莱茵河、多瑙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国家迁出。这些人身材高大，作战

时挥着长剑，手举狭窄的盾，头戴铜头盔，穿着铜甲，为了防止撤退，前排士兵常用绳索连在一起，旁边还有女祭司为他们欢呼助战。一旦抓到俘虏，就切开俘虏的喉咙，再将他们碎尸，用他们的内脏做占卜。



早期的日耳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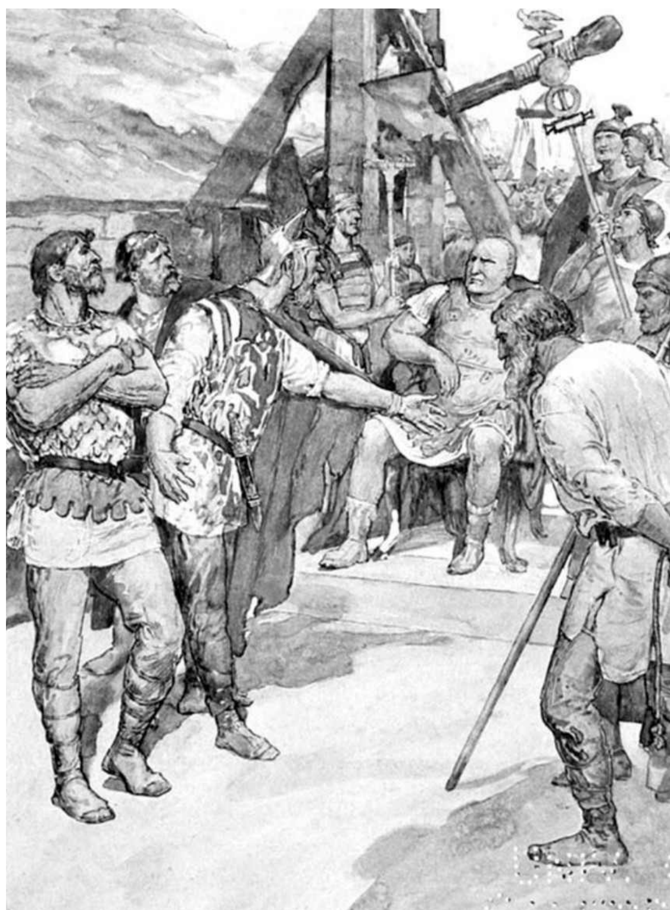
日耳曼人以英勇善战著称于世。这幅图描绘了日耳曼人战斗的场景

入侵者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条顿人、阿姆布昂人和格尼人从西部攻打意大利，辛布里人从东部进攻。条顿人与辛布里人结盟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结盟的地点在南高卢。阿姆布昂部落与格尼部落可能都是赫尔维蒂的分支。盖乌斯·马略在伊萨拉河与罗纳河的交汇处，也就是费比乌斯大败阿维尔尼军队的地方静待西翼的侵略军，他想要控制通往罗马的两条主道路，即小圣伯纳关隘上的一条路和沿海的一条路。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当年曾驱逐了军营里所有的预言家，但盖乌

斯·马略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现在的成就都得益于一个叫玛莎的叙利亚女预言家。士兵们也有自己迷信的动物。他们抓到两只秃鹰，在它们的脖子上套上环，然后放生，这样秃鹰再次出现在军队上空时，就能被很快认出。

侵略者到达营地时，罗马军试图突袭，但被击退了。日耳曼人连续六天排队经过罗马军营，讽刺他们是不是想让秃鹰给家里送信。盖乌斯·马略一边加强营地在夜里的防守，一边小心翼翼地跟踪日耳曼人，发现他们徒步向沿海的大路行进，因此他们不可能带着车马。一条让敌人不战而亡的计策快速成形，但由于意外，一场战役拉开帷幕。在六河，也就是今天的艾克斯东部，盖乌斯·马略占领了一片山脉，其中一座是今天的圣维多利亚山。山下有一条河，满足了军队的用水需求。他希望士兵们尽快适应这些野蛮人的作战模式。一些日耳曼人在河里洗澡，他们告诫对方不要靠近，但下来取水的人越来越多，战役由此开始。这次战役史称“六河战役”。第一次冲突发生在阿姆布昂人和罗马人支持的利古里亚人之间，阿姆布昂人渡过河逃往他们的车马所在地——那里传来女人们的反击声、尖叫声和扭打声——最后他们被追捕者杀死，第一天的战斗结束。



盖乌斯·马略与辛布里人的使者



接下来的一天，双方军队一直处在紧张的备战状态。盖乌斯·马略命一些步兵带着马匹率领一支军营杂役组成的骑兵队，埋伏在敌人后方的山谷中，自己在营地前整顿军队。骑兵先行一步到达平原，日耳曼人冲上山头，遭到猛烈攻击。山下的主力部队持剑冲上山，与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肉搏战，日耳曼人被迫退下山。此时，盖乌斯·马略安排的伏兵呼啸着冲过来，与主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战役变成了一场大屠杀。据说这次战役战死了二十万人，其中包括国王条顿波杜斯。另一种说法是条顿波杜斯被生擒，成了盖乌斯·马略最大的战利品。罗马军将抢来的战利品堆成一座小山，盖乌斯·马略在将士们的簇拥下，手持火把，点燃了火。与此同时，罗马传来捷报，盖乌斯·马略第五次当选执政官。士兵们欢呼着，军官们给盖乌斯·马略戴上象征胜利的月桂花环。时至今日，法国南部的布利也尔村庄以及圣维多利亚山地区仍在纪念这次伟大的战役，直到法国大革命前，附近的村庄还保留着列队游行至圣维多利亚山并在那里燃起篝火的习俗，人们头戴鲜花围着篝火载歌载舞，高喊“胜利！胜利！”

与此同时，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在东部与辛布里人作战。六河战役爆发时，辛布里人涌向阿瑟西斯河[8]东岸的河谷。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驻扎在西岸的维罗纳下游，东岸有他的一小支部队。当敌人出现时，这支军队立即投入战斗，由于河流阻隔，敌人无法顺势追击。辛布里人攻下桥梁后，因为钦佩守桥人的英勇，所以放了守桥人一条生路。此时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正逃往提挈诺河或波河，敌人截断了他的退路。于是，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佯装要在山上长期安营扎寨，趁对方松懈时，突然袭击了他们的营寨，然后渡过了河，与对岸获胜而归的高卢军队和盖乌斯·马略的军队（盖乌斯·马略当时已经返回罗马）成功会师。圣维多利亚山村的庆功宴在5月举行，罗马与辛布里人的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1年7月30日，距大胜条顿人已有一年多。日耳曼人有不在冬天作战的习俗，他们在这个百年来未遭到侵略

的富庶国家日日狂欢，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生活。部落渐渐被分散，最远到了赛西亚河。据说当盖乌斯·马略来到这里时，辛布里人派人为条顿人索要土地，盖乌斯·马略称他们的盟友已经获得自己想要的土地。随后，他们要求盖乌斯·马略定下战役的地点和时间，盖乌斯·马略说罗马人在这种事情上从不与敌人协商，但他可以破例，战役地点定在维尔赛莱附近的坎庇罗狄。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荒诞，辛布里人不可能在条顿人失败一年多后还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可能的，辛布里人向罗马人索要土地却遭遇打击，因此事态不断恶化。据普鲁塔克记载，盖乌斯·马略判断战争将很快结束，于是在战场上偷偷安插了他的人马，以期窃取军功，但实际上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才是这次战役的主将，盖乌斯·马略在开战前已不知所踪。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普鲁塔克参考了苏拉的回忆录，但苏拉痛恨盖乌斯·马略，因此上述记载可能有失偏颇。无论如何，盖乌斯·马略的治军风格在战斗中再次体现了出来，他命将士们一定要在战前吃饱，而且他练兵有术，任何自然环境都只能影响到敌人，他的将士们在灼灼烈日下也能做到面不改色。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从没有享受过这样舒适的生活，于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沦陷了，六河战役的惨剧再次上演。据说此次战役中有十二万人被杀，其中包括日耳曼人的国王波伊奥里克斯，六万人被俘。但最后的问题是无法确认此次战役的头号功臣。盖乌斯·马略慷慨地坚持与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分享胜利的荣耀，但大部分人认为军功应该授予盖乌斯·马略。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掌握在大部分人手中。



维尔赛莱之战

注解

[1] 今天的卡瑟玛（Casamare）。——原注

[2] 米歇尔·奈伊出身平民，是拿破仑手下最勇猛的将军。

[3] 意为“努米底亚征服者”。

[4] 赛姆普罗涅斯·图提坦是出身于平民的政治家，公元前129年任执政官。

[5] 位于今天西班牙境内。

[6]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为了扭转败局，元老院任命经验丰富的前执政官费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担任独裁官，同时为限制他的权力，派他的政敌马科斯·努米修斯担任他的副手。

[7] 可能是现在的伊斯图摩湖（Etang de l'Estouma）。——原注

[8] 现在的阿迪杰河（Adige）。——原注

第6章　罗马军队

精彩看点

第二次奴隶战争——阿奎留斯平叛——罗马军队改革——统一军备——马略骡——以队列为战术单位——军官——军团数量——士兵工资——禁卫营——罗马人不愿入伍——从军职业化

罗马与辛布里艰难作战的同时，不得不往其他战场派兵。这一时期，奴隶起义再次大规模爆发，起义地区包括努凯里亚、卡普阿、阿蒂卡的银矿和图里，其中图里的起义军首领是一名骑士，叫米努基乌斯或维提乌斯。他一开始想买一个女奴，但没有筹够钱，于是将自己原有的奴隶武装起来，又召集了一批奴隶，总数达到三万五千人，自己建立了一个王国，自立为王。裁判官卢库勒斯率领一支四万四千人的军队讨伐他。虽然卢库勒斯在军队数量上占优势，但他更喜欢用朱古达的手段，于是买通了维提乌斯手下的一个希腊人，镇压了这次叛乱。但与过去一样，西西里岛的奴隶起义最严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盖乌斯·马略由于兵源不足而向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美德三世求援，但对方称无法提供援助，因为罗马税收官将许多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卖为奴隶，所以元老院颁布法令，不得将盟国的自由民卖为奴隶。根据这些法令，西西里总督P.李西尼·涅尔瓦下令释放当地的奴隶，然而，由于奴隶主的不满和阻挠，他最终收回了命令。燃起希望的奴隶在失望之余骚动起来。P.李西尼·涅尔瓦通过欺骗手段镇压了第一拨反叛，但他生性懦弱，在应对赫拉克利亚附近的另一支起义军时一再延误，最后派出一名副官，率领一支六百人的军队前去镇压。此时，奴隶军

已经十分强大，他们将罗马军一举击溃，缴获了更精良的装备，并选举萨尔维乌斯为王，由他统率两万步兵和两千匹马。后来，萨尔维乌斯改名特里丰，这个名字是公元前149年叙利亚篡位国王的名字。随后，起义军进攻摩根提亚，向前来支援的政府军发动了突袭并击败了对方。他们声称如果对方放下武器便可以保住性命，于是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进一步壮大。紧接着，西部的奴隶起义在利利俾爆发，首领雅典尼昂智勇双全，在沦为奴隶前他是一名海盗船长，后来伪装成一名魔术师当选这支起义军的首领。之后，雅典尼昂臣服特里丰，担任义军将领。特里奥卡拉[1]成了起义军的司令部。在某种意义上，西西里第二次奴隶起义其实是第一次奴隶起义的翻版。第一次起义中，西西里人克里昂臣服自称安提阿的尤努斯，现在，西西里人雅典尼昂臣服自称特里丰的萨尔维乌斯。这次起义可能爆发于公元前105年，但一直到公元前103年，也就是在卢库勒斯镇压了维提乌斯的反叛后，他才率领一支一万六千或一万七千人的军队前去镇压。特里丰并不信任雅典尼昂，曾一度将他下狱，不过此时他又将雅典尼昂放了出来。在瑟赛阿发生的一场激战中，两万名奴隶被杀，他们以为雅典尼昂也战死了，并没有理会他。之后，卢库勒斯迟迟没有攻打特里奥卡拉，他这么做的理由是想给他的继任者C.塞维里乌斯设置障碍。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实行全民投票选举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执政官职位在名义上对所有人开放，但实际上高级职位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且仅对少数家族开放。据说，当盖乌斯·马略冲破重重阻隔，挤入这个圈子时，昆图斯·梅特路斯也曾做过与卢库勒斯类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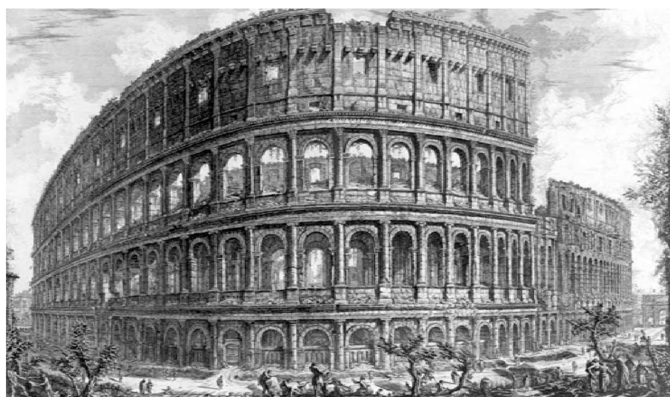
裁判官卢库勒斯

C.塞维里乌斯的作战能力不强。特里丰死后，雅典尼昂成为国王，突袭了C.塞维里乌斯的兵营，差点俘虏了麦西拿。公元前101年，罗马派阿奎留斯平定叛乱，他打败并亲手杀死了雅典尼昂，一支一千人的武装部队也向他投降了。阿奎留斯将这些俘虏押送到罗马，让他们在斗兽场上与野兽厮杀，但他们宁愿死在同伴的剑下，也不愿这样屈辱地活着。这批人中活到最后的是一个叫萨提洛斯的人，他杀死自己最后一个同伴后自杀了。公元前100年，这次奴隶起义被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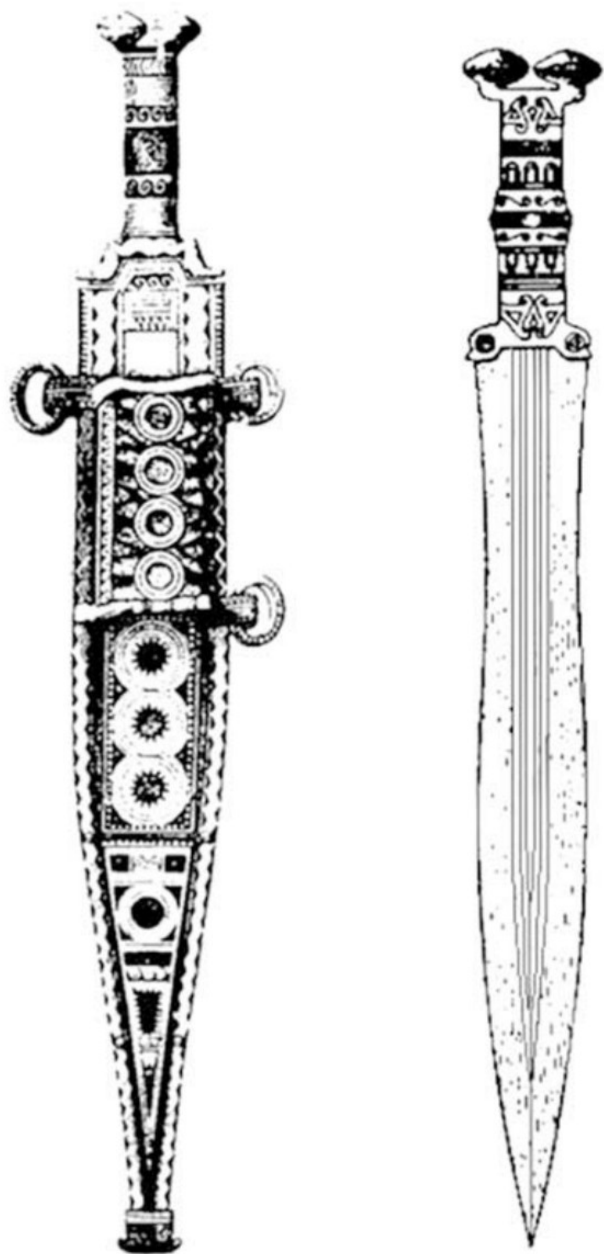
镇压，根据史实推断，战争的结果是：富庶的西西里过去一直为罗马供应粮食，但战后变得一片荒芜，城镇居民只能靠领取罗马的救济粮生活。

叙述完这场发生在世纪之交的战争，我们将目光移到盖乌斯·马略的军事改革上，即他在之前的战争中的制胜法宝。虽然我们无法判断下面这些改革措施哪些是盖乌斯·马略亲自倡导的，但它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盖乌斯·马略改革前，军队的青年兵、壮年兵和后备兵依据服役年限的长短划分等级，取代了之前的塞尔维昂等级制。盖乌斯·马略废除了这一等级制度，改用每个步兵统一配置的制度，每个士兵配一把六英尺宽九英寸长的铁头重型标枪、一把轻型标枪、一把剑和一套铠甲。此外，军队还要根据行军长短携带粮食和其他军备物资，譬如支撑营房的木桩、工具等。为了减轻士兵的负担，盖乌斯·马略发明了“马略骡”，士兵们用叉棍支撑一块木板放置军备物资，将其扛在肩上。在此之前，罗马军队的征兵范围已经从罗马公民扩大到意大利人和外国雇佣军，譬如色雷斯、非洲、利古里亚以及巴利亚利等民族的雇佣军。盖乌斯·马略改革后，历史上再也没有提到过轻步兵，所有的轻武装部队都成了辅助部队。改革之前的战术单位是小队，现在改为队列，一个军团包括十个队列，每个队列包括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又包括两个百人队。军团的标志是鹰，第一队列最年长的百夫长手持鹰徽。每个队列都有自己的军旗，每个小队也有自己的小旗，还有两个百夫长，各领导一支百人队伍。百夫长根据自己所在的队列评定等级，分一到十级。最年轻的百夫长管理第十队列第三小队第二百人队，最年长的百夫长管理第一队列第一小队第一百人队，同时也是首席百夫长或第一等级百夫长。非特殊委派的军官大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成为军事保民官的可能性很小。每个军团有一组军事保民官，他们隶属将军的随员，如果表现合格可以获得军衔。起初，这些保民官由执政官指派，后来一部分由人民选举，一部分由执政官指派。尤里乌斯·凯撒后来让自己的随从官员取代了军事保民官，其中一名官员带领一支军团，盖乌斯·马略的做法与此大同小异。一个常规军团理论上

包括四千二百名士兵和三百匹马，但实际情况往往超过这个数目。波利比乌斯时期，士兵的工资标准是低等列兵每天两个银币、百夫长每天四个银币、骑兵每天六个银币；另外还有粮食补贴，但他们的工资常常由于衣物、武器和粮食等的发放而遭到克扣，因此有了盖约·格拉古关于军队的改革（见第三章）。从塔西陀的《编年史》中，我们发现士兵们对这种克扣现象一直很不满。辅助部队可以得到粮食补贴，但没有政府工资。部队工兵叫“法布里”，有木工兵、机械工兵等，都由部队长官管理，属于部队职员。部队职员还包括统帅、一部分军官，譬如军团副帅、分队将领、财务官或军需管理员等。这一时期最有意义的改革之一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在努曼提雅实施的保镖制度，或称禁卫营制度。禁卫营由一些有军衔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中有些人曾跟随将领学习本领，有些人是专为这个职位招募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一般都是曾在其他军队服过役的老兵，严格来说叫留用老兵。骑士阶层不再组成骑兵团，他们开始为禁卫营服务或担任军事保民官、长官、特别委员会委员等。尤里乌斯·凯撒时期的骑兵队仅作为辅助部队发挥作用。



古罗马斗兽场遗址，绘于18世纪



古罗马士兵装备的剑



古罗马标枪兵

罗马的富人阶层长期以来拒绝服兵役。由于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军中的军衔等级一直处在空缺状态。格拉古兄弟的演说中曾提到这一问题，但实际问题在与维里阿斯、朱古达、特里丰以及辛布里人的战争中逐渐暴露出来，解决办法之一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及，即禁止意大利所有港口的船长向外运输适合服兵役的男子。暂且不提盟国的情

况，我们知道在罗马公民中，服兵役的人要有一定的财产。盖乌斯·马略降低了阶级上的要求，允许无产者自愿参军。这些人将掠夺财富视为参军目标，并且非常在意将领们的悬赏。盖乌斯·马略并没有废除服兵役的义务，但自愿入伍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成为社会常态。改革后的军队不仅包括罗马或意大利人，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战斗力与之前的军队相比毫不逊色，并很快成为独立于国家的一个群体。公民们开始迷恋专业技术，军队中的爱国主义逐渐被拜金主义取代，军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意志力，只知道自己崇拜的将领或追求个人私欲。将领们会经常奖赏将士，为他们向国家索要土地。维尔赛莱战役后，盖乌斯·马略授予两个意大利队列特许权，他说在武器的喧嚣声中自己听不到法律的声音。赋予军队特权，使他们成为正规军，这种只有国王才能行使的权力完全超越了执政官的权限。



古罗马军中的百夫长

注解

[1] 可能位于卡拉塔-贝罗塔（Calata Belllotta）附近。——原注

第7章　萨图尼努斯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

精彩看点

萨图尼努斯联合盖约·格劳西亚和盖乌斯·马略继续格拉古的改革——《塞尔维利亚法》的要旨：缓解行省压力、安抚骑士阶层、向全体公民开放审判权——萨图尼努斯的《农业法》——《粮食法》和《叛国法》——盖约·格劳西亚政敌曼米努斯遇害——萨图尼努斯遭到攻击并被盖乌斯·马略抛弃——里西尼亚法律的颁布预示着同盟者战争的爆发——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酝酿改革——踩着格拉古兄弟的脚印前行——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关于意大利人、粮食、殖民地和骑士的提案——政敌菲利普——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遇害

手握大权的盖乌斯·马略回到罗马后，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中无法自拔。他认为自己横扫欧、非两个大陆的功绩堪比酒神巴克斯的远征[1]，还给自己做了一个与这位神祇一样的酒杯。他满口粗话，与他交谈的人稍有不同意见他便觉得厌烦。他对国家改革的方案、社会弊端及各种恶行都没有洞见。但昆图斯·梅特路斯等人的鄙视使他不得不在自己出身的阶层中寻求支持。他在军中的英勇事迹使这些阶层对他充满崇拜，将他视为天生的领袖和新时代的缔造者。然而，事实上，他的野心并不需要外部因素的刺激，对第七次出任执政官他志在必得。

从他后来的行为中看，他已沉浸在粗鄙的私欲中无法自拔，最后甚至发展成了愚蠢疯狂的暴行。当他希望利用不同的派系为自己的继续高升铺路（实际上他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时，那些比他更具才干的政客却想利用他推翻权贵派。

曼米努斯的长篇演说表明罗马依然存在格拉古兄弟的精神。现在，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用格拉古兄弟曾反对的暴力方式接过了改革的接力棒。然而，开了这种暴力先河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敌人。我们对卢修斯·萨图尼努斯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一个执着却不过分审慎的人。在当代，审慎意味着自谦或自我牺牲。当时，盖乌斯·马略身边有两派人，一派是卡米尔·德穆兰和丹东，一派是机智幽默、深受民众喜爱的盖约·格劳西亚和阴郁、傲慢的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双方都想通过盖乌斯·马略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很难从行为角度谴责他们，因为之前的格拉古兄弟和后来的德鲁苏斯都试图做同样的事。当格拉古兄弟、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等人、德鲁苏斯相继失败后，社会革命终于爆发了。历史学家一般不太重视这些人在早期领导的一系列运动，尽管这一系列运动持续时间长，领导者们的性情、采用的手段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可能不会像一些现代历史学家那样，将罗马的历史进程视为一个突发的、毫无联系的过程，也不会认为爆发社会革命的原因像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的反叛一样令人费解。

卢修斯·萨图尼努斯与盖约·格拉古一样，将乡村与城市或行省与大都市视为两组相对的概念。他也曾拉拢骑士阶层，但骑士阶层在为意大利人寻求平等地位时遭到了歧视，他们试图利用一个派系对付另一个派系的企图最终也失败了。卢修斯·萨图尼努斯想要争取盖乌斯·马略老兵的支持来对抗反对派，结果事与愿违，富人阶层、贵族和城市暴民联合起来反对他。当他占领了议事大厅时，同时受到三支力量的反抗。公元前100年，盖乌斯·马略第六次担任执政官，盖约·格劳西亚担任裁判官，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第二次出任保民官。如果他们三人

联合，可能会形成一股足以推翻原有体制的强大力量，但盖乌斯·马略虚荣且摇摆不定的性格注定他只能是权贵派的得力盟友。同年，尤里乌斯·凯撒出生。整个罗马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够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盖乌斯·马略在公元前102年第五次竞选执政官时，卢修斯·萨图尼努斯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塞尔维利亚法》开始实行。该法律规定了罗马官员审理行省敲诈勒索案件的责任，通过淘汰法将最终审判权赋予骑士（明确宣布议员、雇佣工人等不适合这一工作）。我们无法确定《格拉古法》是否是因为《塞尔维利亚法》，即《塞尔维利亚·卡皮欧法》被废除，但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第一部《塞尔维利亚法》就是被第二部取代的。然而，不管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将权力还给骑士阶层还是巩固骑士阶层的地位，审判员的职位理论上应该向所有公民开放，虽然这一职位最终将所有非骑士阶层排除在外，但并没有明文规定某一具体阶层拥有审判权。该法还规定，如果无公民权的人能在与官员的纠纷案中胜诉，可以借此获得公民权。据此分析，《塞尔维利亚法》有三个目的：第一，方便人们检举控诉敲诈勒索行为，并进行奖赏，缓解行省压力；第二，拉拢骑士阶层；第三，打破司法权垄断现象（至少在名义上），让所有不受特别限制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司法权。西塞罗严厉抨击了盖约·格劳西亚，说他是被海帕波拉斯等人用来蛊惑人心的政客，但从《塞尔维利亚法》来看，这种评价过于片面。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卢修斯·萨图尼努斯

据说当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竞选保民官时，他和盖约·格劳西亚曾

派人暗杀另一位保民官候选人——诺尼乌斯，因为他们怕对方会使用否决权反对他们的提案。因为之前盖乌斯·马略竞选执政官时得到了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的帮助，所以这次他也帮助了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盖乌斯·马略加入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和盖约·格劳西亚的联盟其实是由于个人恩怨，他想打击另一个候选人，即他的竞争对手，也是他最讨厌的昆图斯·梅特路斯。卢修斯·萨图尼努斯为了报答盖乌斯·马略，上台后的第一项政策就是直接打击昆图斯·梅特路斯。这是一项农业法，受益人是盖乌斯·马略的老兵，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任何拒绝宣誓遵守这项律法的议员将在五天之内被逐出元老院。按照这一规定，昆图斯·梅特路斯必定会被逐出罗马。这项法律不仅展现了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的手段，还体现了他的洞察力。同盟者战争证明意大利的一些阶层已经表现出极度不满情绪，这项政策旨在平息这些阶层的不满。之前，卢修斯·萨图尼努斯曾提议在非洲分配土地，现在他提议将土地分配的范围扩大到山外高卢、西西里、亚该亚和马其顿，并用从托洛萨获得的财富为殖民者增添装备，盖乌斯·马略也将获得土地。罗马对这些殖民地的态度一直是历史上的不解之谜，它们本应是罗马人的殖民地，但罗马百姓却反对这一法律，意大利人又以暴力方式支持它。有些人认为虽然这些殖民地属于罗马，但意大利人也可以向这些地方殖民。还有一种解释是，公元前187年，一万两千名拉丁人冒充罗马公民，被强制逐出罗马，公元前95年，罗马再一次驱逐外族人，这成为同盟者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这些伪公民可能觉得从执政官那里可以更容易获得土地，但执政官的耳朵因武器的喧嚣声失聪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无论如何，乡村派，即意大利人通过暴力方式获得了投票优势，城市民众认为自己的特权受到了侵犯，因此强烈抵制。据说盖乌斯·马略最终用诡计除掉了昆图斯·梅特路斯。他谎称自己不会按法律要求宣誓，但当昆图斯·梅特路斯也这么说的时候，他立即改口，称只要是法律规定他都会发誓遵从，并让乡村选民尽快离开罗马。昆图斯·梅特路斯鄙视盖乌斯·马略的阴谋诡计的同时，接受了流放。

卢修斯·萨图尼努斯恢复了另一部法律，或者说改进了盖约·格拉

古的《粮食法》，将粮食价格降到了最低。毫无疑问，这部法律是为了赢回因《农业法》而丧失的城市暴民的支持。但由于卡皮欧[2]动用武力阻止，该法最终还是流产了。第三部法律是《叛国法》，它规定任何背叛国家的行为都将受到控诉。该法可能是针对卡皮欧制定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卡皮欧遭到了起诉。总而言之，农业法是这些法律当中最主要的，其他法律都是辅助性的。显然，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和盖约·格劳西亚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试图将整个罗马世界的人民纳入与罗马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范围内。他们认为比起只能依靠田间劳作的农民的格拉古兄弟，他们有盖乌斯·马略的士兵作后盾，因此自己的处境应该更安全。他们可能率先动用了武力，因为不管是从之前的历史教训中，还是从卡皮欧等人的行为来看，权贵派绝不会轻易退缩。很难从这些事件中分清谁对谁错，但当盖约·格劳西亚竞选公元前99年的执政官时，他的对手——在人民中拥有很高声望的曼米努斯遇害。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匆忙向他的乡村支持者求援，并占领了议事大厅。此时，他发现将希望寄托在盖乌斯·马略身上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自私的阴谋家盖乌斯·马略曾将一个叫阿奎提亚斯的人投入监狱，因为阿奎提亚斯冒充提比略·格拉古的儿子并广受民众欢迎，引起了他的警觉。最后阿奎提亚斯被人民释放并当选保民官。盖乌斯·马略可能也妒忌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在自己老兵中的声望，另外他急于讨好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的敌人——城市民众，因此这次他抛弃了自己的盟友，选择了与其对立的阵营。他将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和他的朋友们逐出广场，并在他们投降后将他们捆至元老院，最后残忍地砸死了他们。据说卢修斯·萨图尼努斯死前曾被尊为国王，如果确有此事，那么至少说明他朝王权迈出了执着而勇敢的一步。如果盖乌斯·马略有卢修斯·萨图尼努斯一半的胆略和雄心，就算他做的事会暂时激起元老院和骑士阶层的联合反对，以及使城市暴民摇摆不定或表现出敌意，他也能将帝国的建立提早一个世纪。在革命年代，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标准评判一个人。没有人知道卢修斯·萨图尼努斯做的事情中有多少是出于个人的野心，又有多少是为了他高尚的目标，但如果要谴责他，就应该一同谴责克伦威尔。



盖乌斯·马略（中）

此时权贵们的权力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君主制的幽灵促使恐慌中的富人阶层与他们的老对手权贵派联合。城市暴民不仅没有对废除粮食法一事心存感恩，反而迁怒冒充罗马人的意大利人。贵族昆图斯·梅特路斯在城市暴民反对意大利人的热潮中被召回，反对召回他的P.福尔斯被碎尸。盖乌斯·马略发现，阴谋和背叛使自己陷入被人孤立和唾弃的境地，于是逃到了东部。据说他在那里曾试图煽动与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战争。公元前99年，塞斯德·提丢斯提出一部农业法，但遭到了同僚的反对，导致自己被流放。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反映出城市群体和乡村群体之间的对立，也反映了有良心的罗马人对外省人的同情，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窥探到外省人的悲惨处境。第一件事是公元前95年里《西尼亚·米努西亚法》的颁布，这部法律规定罗马的拉丁人和意大利人必须离开罗马。另一件事是对普布利乌斯·鲁弗斯的控诉和审判，他的罪名是敲诈勒索，但事实是他在管理亚洲行省期间，谴责了敲诈勒索行为以及纵容这种行为的骑士法庭。虽然大部分议员与骑士一样罪行累累，但与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一样，尽管这些人被指控敲诈勒索，却无法忍受被迫出庭，于是他们以管理不公正为借口，企图废止《塞尔维利亚法》。

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开始，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倡导改革的人是

元老院的内部成员，但改革又一次被充满仇恨的派系斗争和疯狂的市民优越感扼杀。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父亲老德鲁苏斯曾被元老院利用，成为对付盖约·格拉古的工具。他的性格正直、高傲而又冲动，这种性格很容易被懦弱且世故的阴谋家利用。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在亚洲时曾因受贿被指控，于是，这位备受人们厌恶的政客怂恿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将骑士阶层的司法权还给元老院。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是堕落的贵族阶层中非常罕见的一种人，他厌恶富人阶层的高高在上，不反对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他甚至觉得许多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更可鄙。他痛恨、鄙视自己阶层犯下的种种恶行，误将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建议理解成一种高尚的动机。在意大利人的信任和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怂恿下，他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身边的人，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元老院做出公正的评判。他试图改进格拉古兄弟和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的改革方式，最后却以惨败收场。他将那些利用他或受他影响的议员提出的观点一步步落到实处，这些观点大多是他们随口说出或为了个人私利提出的，但这些人却开始退缩了。



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又被称为小加图

我们并不清楚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真实观点和立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维护意大利人的利益作为改革的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为了使罗马的城市暴民缄口，他降低了货币价值，试图减轻借债人的负担。同时，他建立了一些殖民地，也许是想兑现他父亲曾经的

承诺。另外，他还颁布了一项关于分发廉价粮食的法律。面对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等议员，他通过交还司法权向他们示好。为了弥补骑士阶层遭到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损失，他吸纳了三百名骑士进入元老院，让他们专门审理收受贿赂的案件。这批“入侵”的骑士致使元老院分裂成两个相互对抗的阵营，议员们对此既鄙视又畏惧，那些没能“高升”的骑士也表现出强烈不满。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试图安抚这两个阶层，但却招来了这两个阶层的联合对抗。甚至一部分意大利人也不支持他的方案，一些公地持有者，譬如坎帕尼亚公地的持有者，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由来已久。这部分人对殖民计划充满戒备，因为该计划不仅质疑他们对公地的占有权，还侵占了他们的土地。虽然一些大土地主反对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但绝大部分意大利人还是支持他，在他们的帮助下，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落实了前三项法律。他巧妙地将这三项法律融合在一项政策中，因此，想要获得粮食和土地的人必须参加司法权变革的投票。但罗马当时已经有法律明确禁止在一项议案中合并多项不同的措施，他的做法给对手留下了攻击他的漏洞，对方很快利用这一点进行反击。他的政敌中，为首的是执政官菲利普，当意大利人涌入罗马支持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时，他们威胁选民，记录虚假投票。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离开时，菲利普作为敌对阵营的代言人站了出来，他看起来两面三刀、巧舌如簧，处事没有原则。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一党仁慈但又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在菲利普看来不过是情感泛滥的软弱表现，他公开表示自己必须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因为目前元老院的情况使他难以继续管理政府。他利用大土地主们根深蒂固的偏见或私心，以及城市暴民反意大利人的不满情绪，成为罗马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当然，他并不受意大利人的欢迎。辅助性政策“流产”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陷入绝望。随着他在元老院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他加强了与意大利人的联盟，意大利人发誓将与自己的领袖共进退。从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记载的历史事件中推测，庞培·希洛曾率领一万意大利人携短剑前往罗马索要公民权，但他最终被劝止了。君主制再一次喷薄欲出。不管是这一次，还是盖约·格拉古改革时期，都很难判断改革领袖的态度到底是因为形势所

迫，还是与生俱来的。但当时的形势掌控在菲利普手中，他诱使元老院废除了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已经实行的法律，并将受到该法影响的公地持有者召集到罗马，让他们与罗马的意大利人对峙。一场战斗似乎已经无法避免，但最后一切因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遇害戛然而止。一天晚上，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在自己家中被刺死。据说他在死前高喊这个国家将不会再有一位像他这样的公民。虽然他的能力远不及盖约·格拉古，但却与盖约·格拉古一样无私，而且他也有一位在身后坚强地悼念自己儿子的伟大母亲。那一年出现的种种超自然现象预示着政治暴动的到来，“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上的征兆，都预示着战争和杀戮，预示着敌人的铁蹄和半岛的毁灭。”



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被刺



遇刺后的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

注解

[1] 酒神巴克斯的希腊名是狄奥尼索斯，色雷斯人崇拜的神。传说他曾两次远征，第一次远征埃及，第二次远征印度，大大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2] 他很可能是托洛萨“英雄”、臭名昭著的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的儿子。——原注

第8章　同盟者战争

精彩看点

有产者与小农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同盟者战争在阿斯库路姆爆发——同盟军定都可飞尼奥——第一年起义军节节胜利——《优利娅法》颁布后同盟军节节败退——苏拉的崛起和盖乌斯·马略的陨落——《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战争第一年——同盟军打败多名罗马将领、攻陷一座座城市——翁布里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起义——战争第二年——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科斯科尼乌斯和苏拉分别在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获胜——罗马革命——两支派系试图拉拢同盟军——起义的余火在米特拉达梯战争后被扑灭

上一章描述了罗马与殖民地，即各“同盟者”之间的关系。两百年来，意大利人抵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汉尼拔的征服，始终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但这种看似无坚不摧的忠诚却在政府的傲慢和轻视下日渐消蚀。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改革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意大利的有产者和劳动者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的关系与罗马的土地持有者和最初农业法的受益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因此，同盟者战争爆发前夕，安布利亚和伊特鲁里亚，即菲利普召集支持者的两个地区依旧忠于罗马，因为这里的农民阶层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殆尽，土地集中在大土地主手中。但在农民密集的马尔西、马鲁奇尼及其邻近地区，多年来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一切是罗马腐败堕落的必然结果。随着与罗马的接触日益频繁，宗主们的昭彰恶行在勤劳朴实的意大利人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菲利普之流

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双手沾满爱国者的鲜血，为金钱利益出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良心，难道就应该由这些人来统治意大利吗？为什么罗马士兵可以到民事法庭上诉，而意大利士兵就必须受到戒严令的制裁？为解放罗马战斗的士兵中意大利人的数量为什么是罗马人的两倍？粗野无礼的罗马年轻人和上流贵妇为什么可以随意羞辱意大利的军官、谋杀底层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忠心耿耿，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一些善良的政治家偶尔会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但贵族们常常因《外国人法案》驱逐他们。意大利人尝试支持不同的派系，却总是失望，因为这些派系有一个共同点，即坚决拒绝给予意大利人公正。高尚的格拉古兄弟、清廉的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勇敢的卢修斯·萨图尼努斯等人都因为同情意大利人的处境而被杀。现在，他们最后一个朋友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也死在懦夫手中。是时候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为朋友复仇了！比起残暴的统治者，意大利人不仅勤劳勇敢，而且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也许他们缺乏组织性，但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使他们团结起来，准备反抗罗马长期的压迫。如果此时意大利人消极以对，只会被各个击破，倒在曾经杀死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刀下，或像福莱杰雷殖民地那样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遭到毁灭。

起义在阿斯库路姆爆发了。许多城镇通过交换人质确保相互之间的忠诚。裁判官盖约·塞维利乌斯得到消息后赶到阿斯库路姆，在剧院里严厉谴责了意大利人，而愤怒的民众杀死了他和他的护卫。随后，意大利人关闭城门，屠杀了城里所有的罗马人。马尔西、佩里格尼、马鲁奇尼、弗伦塔尼、维斯提尼、普辛帝、贺皮尼、庞培、维努西亚、伊阿派斯、卢查尼尔、萨姆尼特等地的民众以及里斯河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意大利人纷纷投身义军。除了一些小城市，譬如维斯提尼的毕那城，起义军还有一些像埃克拉努姆的米纽夏斯·玛济斯一样忠诚的拥护者，整个意大利中部和南部都加入了他们。毕那城的情况与安布利亚和伊特鲁里亚相似，形势掌控在大土地主手中。大多数拉丁城和希腊城邦，譬如那不勒斯和利基翁，以及坎帕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依旧忠于罗马，位于这一地区的卡普阿是罗马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港口。

起义军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派人向罗马索取平等公民权，以此作为投降条件。冥顽不灵的罗马人再次严词拒绝。骑士阶层开始迁怒权贵，确切地说是同情意大利人的权贵，认为是他们的愚蠢行为导致了战争。骑士阶层的收益因为战争化为泡影，于是他们以此为借口对元老院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合谋剥夺他们审判权一事进行打击报复。依据《瓦里安法》，意大利人的同情者被送上了法庭，并被判流放罪或被迫缄口。根据西塞罗的说法，操作这一切的是暗杀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刺客。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也被指控，但狡猾的人总能利用阴谋诡计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模仿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为自己辩护，最后不但全身而退，而且脸上还带着一丝威严，但这种表情如果出现在另一个人脸上可能会显得比较真诚。他反驳对方的指控时说："我作为元老院的领袖，竟然受到一个西班牙人的指控，请问罗马人民，你们相信谁？"



庞培城遗址，绘于19世纪

当时的形势岌岌可危，类似的控诉确实有某种借口。亚洲的米特拉达梯六世随时可能停止为罗马供应物资。起义军的士兵都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他们训练有素，军官们个个骁勇善战，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战争以小分队战为主，因此人数尤为重要。罗马已经没有时间犹豫，统治者必须立即清理队伍中的叛徒和投机分子。他们暂时关

闭了审理其他案件的法庭，不断缩减粮食分配，垒起了高高的城墙，以最快方式准备好武器，并从希腊的自由城邦和亚洲少数民族那里筹集了一艘军舰，从罗马公民和亚洲、高卢等地筹集税金。最后，由于战斗的分散性，每位执政官配五名副官。卢普斯率军在皮西努姆到坎帕尼亚的北部地区作战，他手下的将领是庞培·马格努斯[1]的父亲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和盖乌斯·马略。卢修斯·凯撒率军在塞尼阿姆和坎帕尼亚及其南部地区作战，随同前往的五名副官中有两位是赫赫有名的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和苏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罗马在经历了一系列战败、被敌人牵制得精疲力尽时，被迫重新启用盖乌斯·马略和苏拉担任统帅。但此时他们只是两名相隔南北的副官，暂时相安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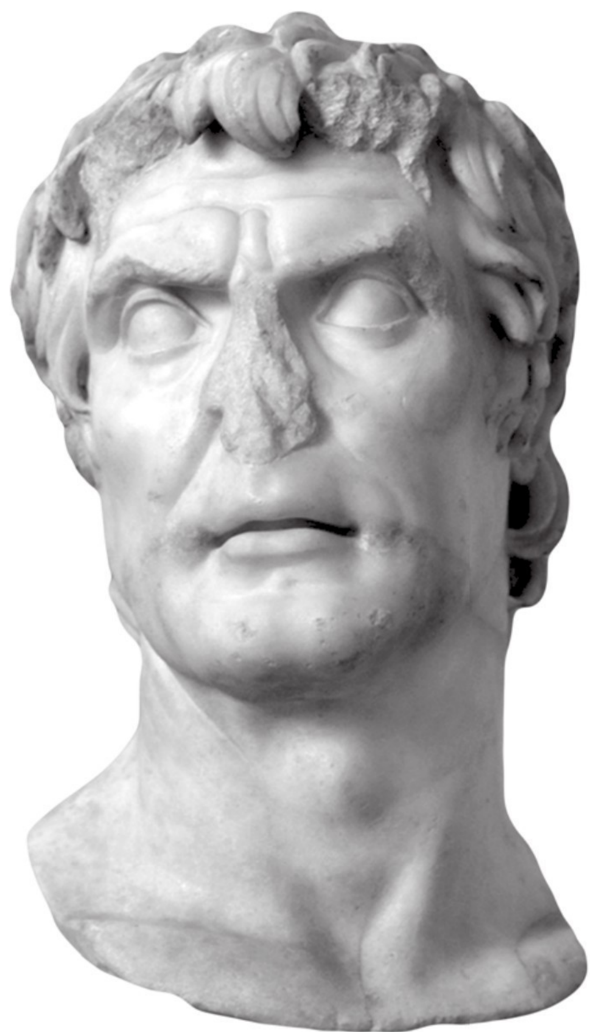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盖乌斯·马略

意大利同盟军也毫不示弱，他们将阿提尔拉斯河，即今天的皮尔斯卡拉河沿岸的可飞尼奥定为首都，因为这个城市正好处在起义地区的中心。很快，起义军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罗马公民权，而是要征服整个罗马。他们将首都更名为意大利卡，在城内建了广场，加固了城墙，发行自己的货币。此外，他们还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选出两名高级执政官、十二名裁判官、一个五百人议会，并为每一个参加起义的团体颁发罗马公民权。起义军的规模达到了十万人。庞培·希洛携六名副官率军在西部和北部与卢普斯作战。在东部和南部作战的卢修斯·凯撒的军队由著名的萨姆尼特人帕皮乌斯·穆提卢斯率领。

战争概况大致如下：第一年，罗马除了少数几场胜仗，大多数战

役都以失败告终。同盟军士气高昂，起义的火焰蔓延到安布利亚和伊特鲁里亚，一度使罗马陷入绝望。但很快，罗马通过几次会议挽救了战场上的颓势。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做出了非常明智的让步，罗马公民权的颁发及时阻止了意大利人不满情绪的进一步蔓延。安布利亚和伊特鲁里亚的起义被迅速镇压下去。战争第二年末，即公元前89年，整个起义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虽然之后罗马的苏尔比斯革命使起义军死灰复燃，意大利各地的起义仍然余火延绵，罗马军也还在塞尼阿姆的萨拜恩、卢卡尼亚和诺拉等地征战，但实际意义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最后，我们将战争分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各包括一年时间。第一阶段意大利同盟军所向披靡，盖乌斯·马略逐渐失去了民心。第二阶段苏拉载誉而归，成为罗马的英雄人物。

战争伊始，罗马军的首要目标是攻下阿斯库路姆。但阿斯库路姆的市民派已经过了服役期的老人守城，突袭了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的军队并将其击败。紧接着，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又在法莱利亚被打败，逃到了拥护意大利的拉丁殖民地费姆，在那里等待塞尔维乌斯·苏尔比斯的救援。援军到来前他成功突围，并重创敌军，开始围攻阿斯库路姆。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9年，罗马军在城墙外围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后，才将阿斯库路姆艰难拿下。战役失败后，赶来救援的阿斯库路姆人朱大西利斯冲入城内，又坚守了几个月。最后由于守城无望，他命人堆起一堆木头，在上面架起桌子，与朋友们设宴聚饮，然后点燃木材，服毒自杀。罗马人攻进城后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屠杀了所有官员，驱逐了剩余的居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些就是失败的起义者的悲惨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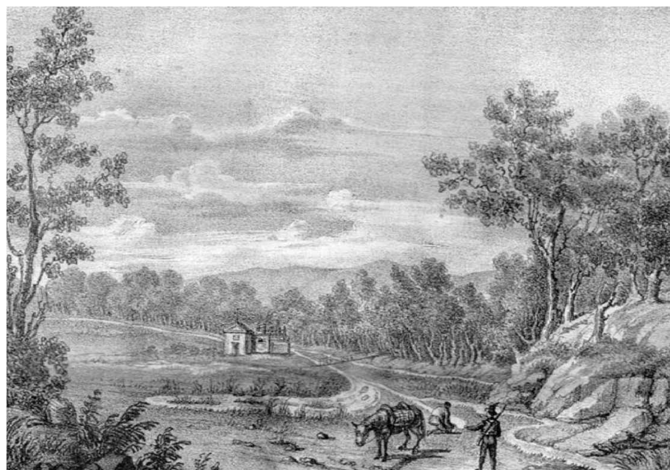
苏拉的头部雕像

罗马复仇的第一站是阿斯库路姆，于是意大利同盟军将目标转向拒绝加入他们的邻近城市。庞培·希洛率军进攻阿尔巴，帕皮乌斯·穆提卢斯负责艾森尼亚。执政官卢修斯·凯撒任命马赛拉斯和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为前锋分别攻打塞尼阿姆和卢卡尼亚，随即又抽身亲自前往。在塞尼阿姆，他遭到维提乌斯·斯卡托的猛烈攻击，损失了两千兵力，于是维那弗鲁[2]反叛了。有一种说法是苏拉解了艾森尼亚的围，

但只是暂时性的、局部的，因为艾森尼亚在年底前已经投降。这一年罗马节节失利，珀珀那失去了四千兵力，其他士兵大多在战场上缴械投降。因此，卢普斯剥夺了珀珀那的统帅职位并将他的军队给了盖乌斯·马略。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在卢卡尼亚遭遇失败，被困在格儒门图姆。这座城里流传着一个关于奴隶救主的感人故事，据说这些奴隶投靠了意大利盟军，当格儒门图姆被攻陷后，他们直接冲进以前居住的地方，拽出女主人，告诉人们他们终于可以报仇了，从而救了他们的女主人一命。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被困的同时，帕皮乌斯·穆提卢斯攻入坎帕尼亚，买通叛徒拿下了诺拉，两千士兵投降了他，拒绝投降的军官被活活饿死。随后，同盟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后攻下了斯塔比伊、萨勒诺、庞培、赫库兰尼姆等城市，可能还包括努塞日亚。由于接受了大量投诚的士兵，再加上从临近地区招募的军队，同盟军迅速壮大。帕皮乌斯·穆提卢斯包围了阿克莱，卢修斯·凯撒急忙赶来支援。朱古达战役后，罗马人将朱古达的儿子囚禁在维努西亚的俄克孙塔，但此时坎努西姆和维努西亚已加入起义军，帕皮乌斯·穆提卢斯释放了朱古达的儿子，给他披上了王袍。卢修斯·凯撒军队中的努米底亚士兵看见自己曾经的主人，纷纷离开军队，卢修斯·凯撒无奈之下只能率军撤离。

罗马军终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帕皮乌斯·穆提卢斯率军偷袭卢修斯·凯撒的营帐，结果被击退。撤退途中，罗马骑兵斩杀了六千名同盟军。虽然卢修斯·凯撒随后又被马略·埃格纳提乌斯击败，但此次胜利还是令罗马人十分振奋。当两军在阿克莱再次相遇时，罗马军自开战以来第一次脱下了丧袍。卢普斯与盖乌斯·马略向马尔西进军。盖乌斯·马略根据以往与辛布里人的作战经验，建议卢普斯不要轻举妄动。然而，卢普斯认为盖乌斯·马略意图抢占军功，为来年参选执政官做铺垫，因此他匆忙开战，在托努斯河上架起两座桥，自己率军越过了一座桥，另一座留给了盖乌斯·马略。当他到达河对岸时，维提乌斯·斯卡托早已设好埋伏，杀了他和八千名将士。将士们的尸体顺着河流漂到下游，盖乌斯·马略看到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的盖乌斯·马

略表现出一名优秀战士的本色，他率军迅速渡河，抢占了敌人的营地。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90年6月11日，引起了罗马人的恐慌。在罗马，卡皮欧由于抵制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受到了骑士阶层的拥护，这位退役老将曾经的功绩被人们再次提出来，他被推上了北方军队联合统帅的位置。实际上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盖乌斯·马略的审慎和苏尔比斯·鲁弗斯在佩里格尼取得的胜利，都因为这位新统帅的鲁莽而变得一文不值。庞培·希洛带了两个年轻奴隶亲自来到罗马军的营帐，谎称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将其交给卡皮欧作人质，以此表达自己的“诚意”。卡皮欧随同庞培·希洛登上一座小山，这时敌人发出信号，提前埋伏好的伏兵冲了出来，杀死了卡皮欧和他的许多部下。这场战斗后，盖乌斯·马略成为北部军唯一的统帅。他率领疲惫的军队坚定地朝马尔西的乡村行进。庞培·希洛挑衅他道：“如果你有本事，就出来应战！”马略回答：“话不能这么说，你要是有本事，就让我拿出本事与你交战！”战斗最终还是打响了，盖乌斯·马略再次取得了胜利。在与马鲁奇尼人领导的一次战役中，罗马军也大获全胜，屠杀了六千名马尔西人。那一时期，苏拉与盖乌斯·马略配合作战。盖乌斯·马略将大部分兵力从坎帕尼亚撤出，苏拉率兵向北行进与他会师。苏拉就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与他在一起时，盖乌斯·马略总显得黯然失色。有一次，在追踪敌人的过程中，敌人躲进了葡萄园，盖乌斯·马略忽然变得畏缩不前，苏拉却在另一个出口斩断了敌军的后路。当然，盖乌斯·马略并不是所有时候都畏首畏尾，有一次他在战争中对部下说：“我不知道你和敌人谁才是最大的懦夫，因为你害怕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也害怕跟在你后面。”但在罗马，盖乌斯·马略正在渐渐失去人们对他的信任，有些人贬低他的功劳，说他已经年老无用，有些人惧怕他胜过惧怕敌人，觉得他太狡猾。据说有一次盖乌斯·马略的军队和庞培·希洛的军队近在咫尺，双方将领进行了亲密交谈，一同诅咒战争，甚至相互拥抱，并要求对方停战。如果这件事属实，那么第二年元老院拒绝任用盖乌斯·马略就不难理解了。



阿克莱地区，绘于19世纪

大约在这一年年底，翁布里亚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加入了起义军。普罗提乌斯击败了翁布里亚人，波尔基乌斯·加图打败了伊特鲁里亚人。总体上，罗马在这些零散战役中败战居多，在主战场坎帕尼亚也遭遇了毁灭性打击。整个国家似乎已经被敌人掌控。在皮西努姆和马尔西，罗马军和同盟军的胜败相对比较平衡，但卢普斯和卡皮欧战死，珀珀那和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遭遇重创。总的来说，同盟军依然占据上风。现在，翁布里亚也反叛了，亚洲的米特拉达梯六世蠢蠢欲动，山外高卢也有叛乱的迹象。虽然像盖乌斯·马略这样自私的阴谋家很可能考虑过投奔敌军，因为同盟军似乎已经胜券在握。正直的人虽然在对局势的判断上与盖乌斯·马略相同，但在行动上却截然不同。德鲁苏斯党人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称战争结果体现了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爱国情怀和深谋远虑，体现了他的建议的合理性。他们获得了《瓦里安法》的执行权，利用该法制裁了它的起草者瓦列乌斯，成功地将他流放。据历史学家奥罗修斯记载，当执政官卢修斯·凯撒利用阿克莱战役的胜利要求元老院为其举行凯旋庆典时，元老院却给了他一件丧袍。如果这件事属实，卢修斯·凯撒对战争感到的不安就有其个人原因了。总而言之，卢修斯·凯撒起草了《优利娅法》，这部举足轻重的法律从实际意义上终结了同盟者战争。关于这部法律有多种记

载。根据格利乌斯的记载，它授予整个拉丁地区罗马公民权，包括所有拉丁殖民地。根据西塞罗的记载，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除山外高卢以外的整个意大利。根据阿庇安的记载，所有仍忠于罗马的意大利人被授予了罗马公民权。不管哪一个版本属实，这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新公民都不能参加原有部族的投票，以免他们的选票将老选民的选票淹没。元老院新设了八个部族，在其他人投票后这些新选民才能开始投票。《优利娅法》推出后很快又有了《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由保民官M.普劳提乌斯·西尔瓦诺斯和C.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共同制定，表面上它是对《优利娅法》的补充。《优利娅法》奖励了那些一直忠于罗马的意大利人，但《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却对那些已经反叛的意大利人伸出了橄榄枝。根据该法，从法律颁布当天开始，如果居住在意大利的同盟城市的公民能在六十天内向裁判官申报，就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同年，由于这项政策，波河北部的许多城市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如果城市的地方长官愿意，都可以申请罗马公民权。一些自由同盟城市却并不将罗马公民权放在眼里，面对罗马公民权，赫拉克里亚和那不勒斯踌躇不决。那不勒斯本来就拥有优惠政策，他们利用土地免去了徭役，因此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比罗马公民权更重要。赫拉克里亚、那不勒斯和利基翁可能与罗马达成了一项特殊协议，他们在接受罗马公民权的同时，保留了原有的语言和制度。这两部法律最终使整个意大利、山外高卢的所有拉丁殖民地以及波河以南山外高卢的同盟地区都获得了罗马公民权，波河北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城市获得了拉丁人权益。与此同时，罗马还颁布了一条大赦令。虽然关于新部族的规定不太让人满意，但效果有目共睹。

公元前89年的执政官是卢修斯·加图，他统领着马里安地区的军队。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继续留任皮西努姆军队的统领。卢修斯·凯撒在坎帕尼亚的工作由苏拉接替。斗志昂扬的同盟军派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越过亚平宁山脉打算加入伊特鲁里亚人的战斗，不幸半路遭到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的拦截，损失了五千人，剩下的士兵也被驱散。实际上即使他们成功抵达伊特鲁里亚，也会发现此行徒劳

无益。此后，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这边捷报频传，他的副官塞尔维乌斯·苏尔比斯在蒂特击溃了马鲁奇尼人，另一位副官梅特路斯·比索打败了马尔西人，他本人亲自率军在阿斯库路姆城外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最终攻下了这座城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第二年，佩里格尼和维斯提尼也投降于他。

意大利东南部，裁判官科斯科尼乌斯烧毁了阿普利亚的萨拉比亚，接受了坎尼的投降，随后又去围攻坎努西姆。马略·埃格纳提乌斯前来支援坎努西姆，虽然暂时将科斯科尼乌斯赶回了坎尼，但他或者他的继任者还是在另一场战役中输给了对方，最终战死沙场。整个阿普利亚地区和埃普基半岛落入科斯科尼乌斯手中，惨遭战火蹂躏。

当罗马在东部沿海地区重塑权威时，苏拉在坎帕尼亚也是战果累累。他在4月收复了斯塔比伊，他的副官T.狄第乌斯在6月攻下了赫库兰尼姆。遗憾的是，T.狄第乌斯在此次战役中丧生。苏拉接着前去围攻庞培城，打败了前来援助的克律恩侠斯，后来在庞培城和诺拉之间再次将他击败，最后在诺拉城门口杀死了克律恩侠斯。大概在同一时期，负责舰队的奥卢斯·阿尔比努斯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这些人很可能是他从罗马招募、准备带去支援苏拉的士兵。苏拉原谅了这些反叛者，允许他们将功折罪。在与克律恩侠斯的战斗中，这些人表现英勇。苏拉通过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和他一贯的好运气，使军队对他忠心耿耿。



古罗马军队与叛军交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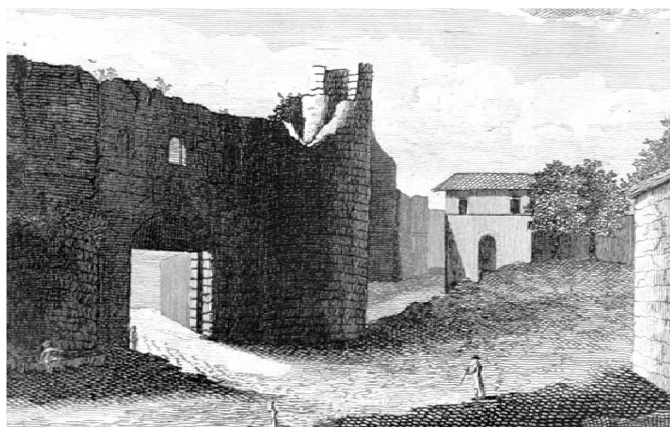
离开诺拉后，苏拉越过赫尔平尼边境，向埃克拉努姆逼进。当日，埃克拉努姆市民正在等待卢卡尼亚人的增援，要求苏拉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苏拉给了他们一小时考虑时间，在这一小时中，他命人在木制城墙周围堆起柳藤。市民们不愿被火烧死，于是选择了投降，然后苏拉将这里洗劫一空。随后，苏拉向北部的塞尼阿姆行进，遭遇了据守山口的帕皮乌斯·穆提卢斯，他在艾森尼亚附近包围了苏拉的军队。苏拉假装愿意求和，当敌人放松警惕时，他率军趁着夜色前进，留下一个号兵吹号警戒，造成军队仍在原地的假象。苏拉后来打败了帕皮乌斯·穆提卢斯，离开了艾森尼亚。在回罗马竞选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前，他又突袭了波维亚努姆。在战场上，苏拉智勇双全，如果他少一分胆略或将才，都可能功败垂成。

因为沿海两岸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所以波维亚努姆取代了可飞尼奥成为同盟军的首都。现在波维亚努姆也被攻陷，艾森尼亚成了起义的中心地区。罗马还占领了赫尔平尼，因此切断了萨姆尼特通往意大利南部卢卡尼亚和布鲁提恩的道路。公元前88年，除了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仍在为了完成所在地区的和谈发动一些零星战役，其他统帅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这两个相互隔绝的地区的同盟军力量。战争已接近尾声，同盟军打算做困兽之斗，他们指定了五名将领，由马尔西人庞培·希洛担任统帅。萨姆尼特人募集了一支包括奴隶在内的五万人的

军队，为了意大利的主权再一次单枪匹马地与自己的宿敌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骁勇善战的庞培·希洛上任后收复了波维亚努姆，但他很快战死了。据说他在与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的一次大战中因失利被杀。阿庇安说他是在埃普基与梅特路斯·比索的一次战役中战败被杀，奥罗修斯认为他是在阿普利亚与塞尔维乌斯·苏尔比斯的战役中战死的。不管怎样，萨姆尼特人的最后一丝希望随着庞培·希洛的去世而化为泡影。据说他们与米特拉达梯六世达成了协议，但即使米特拉达梯六世有能力提供援助，在援军到来前的这段漫长时期，同盟军也会一直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卢卡尼亚，奥卢斯·加比尼乌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匆忙对同盟军的营地发动了袭击，结果战败，自己也丢了性命。同盟军首领卢卡尼亚将军拉姆波尼乌斯试图拿下利基翁，越过这里前往西西里重整旗鼓，但没有成功。坎帕尼亚的诺拉依旧苟延残喘。与此同时，罗马爆发了苏尔比斯革命，将最终平息叛乱的时间推迟到科林门战役后。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革命。由于苏尔比斯革命爆发，加之苏拉当选为米特拉达梯战争的统帅，所以元老院将苏拉召回罗马，此前他一直在围攻诺拉，并击败了前来援助的萨姆尼特军队。由阿皮乌斯·克劳多斯、梅特路斯·比索和普罗提乌斯率领的三支罗马军团依旧在牵制萨姆尼特人，围攻诺拉城。随后，科尼利厄斯·秦纳来到诺拉城，诱使一部分同盟军与他一起前往罗马。但这些起义者很快发现，对方并不是要将他们置于死地，而是想利诱他们结盟，其中还涉及两个派系的斗争。元老院再次向起义者提出了《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有些人接受了条件，放下了武器。但在梅特路斯·比索被召回罗马、罗马加强对诺拉城的围攻期间，诺拉人冲出重围，放火烧了阿贝拉城。萨姆尼特人提出了投降条件，要求对方归还俘虏、逃兵和战利品，加入同盟军的罗马人也必须获得罗马公民权。元老院拒绝了他们的投降条件，于是萨姆尼特人立即转向科尼利厄斯·秦纳和盖乌斯·马略一派，因为他们不仅保证会授予萨姆尼特人罗马公民权，还同意吸纳部分新选民进入原有部族，这一措施在公元前84年，也就是在科尼利厄斯·秦

纳最后一届执政官任期期间，得到了元老院的批准。苏拉回到意大利时，萨姆尼特人和实际上已经独立的卢卡尼亚人成了马略的儿子，即小马略最忠诚的拥护者。公元前82年，萨姆尼特军队的首领、泰莱西阿的庞提乌斯怀着几个世纪来的血海深仇，孤注一掷地向罗马发起了攻击。最后，苏拉在科林门的胜利终于挽救了这个城市。战役结束三天后，苏拉屠杀了所有俘虏，因为他认为只有死亡才能使这些无法和解的敌人放下武器。他冷酷地说："应该从世界上抹去萨姆尼特这个名字，否则罗马将永远不得安宁。"公元前80年，萨姆尼特人撤出诺拉，他们的最后一位伟大将领帕皮乌斯·穆提卢斯伪装后逃往身处代诺的妻子那里，对方却宣布与其断绝了关系。帕皮乌斯·穆提卢斯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随后，苏拉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攻下了艾森尼亚，将其变成一片废墟，至今仍无法修复。直到此时，罗马最强劲的敌人的顽固反抗才被彻底镇压下去。



科林门遗址，绘于18世纪



古罗马城的复原图

注解

[1]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庞培。庞培后来成为前三巨头势力最强者。内战爆发后，他指挥失当，被凯撒击败，详见《罗马内战回忆录》一书。

[2] 康帕尼亚的一个城镇。

第9章　苏尔比斯·鲁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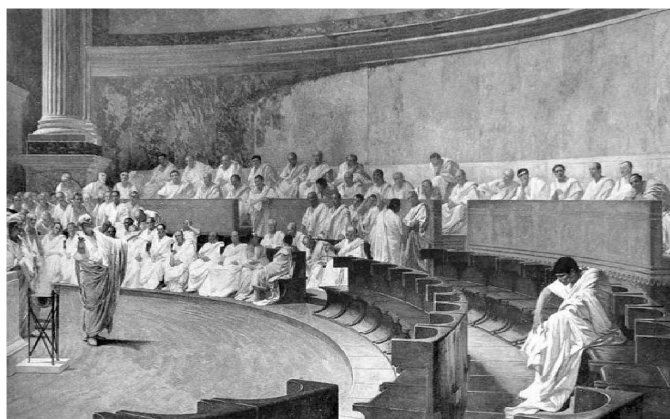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罗马的财政危机——苏尔比斯·鲁弗斯试图改革政府、彻底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苏尔比斯·鲁弗斯的法律在盖乌斯·马略支持下得以实行——苏拉被逐、逃往诺拉、整顿军队、讨伐盖乌斯·马略——苏尔比斯·鲁弗斯遇害——盖乌斯·马略战败逃离罗马——苏拉重组元老院和大会后离开意大利

同盟者战争使意大利变得四分五裂，罗马分毫不差地复制了这一切。在罗马，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厚的壁垒，债主与债务人、保民官与执政官、元老院与反元老院派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由于意大利化的改革，原有派系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两个派系之间的分歧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提倡意大利化的政客们与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改革或多或少地坚持了原有的民主纲领。即便如此，一些人的性格还是很难剖析，譬如苏尔比斯·鲁弗斯，我们很难判断他的行为中有多少是受分裂思想的影响，又有多少是受为土地而战的决心的影响。当然，对他诉诸武力一事不必过分强调，因为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是那个年代的常态，遵纪守法意味着遵从武力解决问题的法则。但苏尔比斯·鲁弗斯有一些前后矛盾的行为，让我们无从分析，甚至无从猜测。

苏尔比斯·鲁弗斯出生于公元前124年，此时他正值盛年。他是一位贵族，演讲时激情四射且颇具感染力。他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

是朋友，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西塞罗曾不吝辞色地夸奖他：“在我接触过的所有演说家中，苏尔比斯·鲁弗斯是最出色的，也可以说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他的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手势、体态优雅却不夸张。演讲时虽然语速较快，但流畅而不失简洁。”苏尔比斯·鲁弗斯担任保民官的前一年，罗马正处在动荡不安中。同盟者战争和亚洲的骚乱引发了经济危机。债务人在债主的逼迫之下，要求启动已经废止的刑法严惩高利贷，保护自己的权益。监察官阿瑟利欧打算将这个问题交给法院审判，但债主们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场上杀死了他。对此，债务人强烈要求免除所有债务。毫无疑问，这些债务人中有许多是社会下层人，但从第二年苏尔比斯·鲁弗斯的提案中，我们发现一些债务人很可能来自元老院。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用现代股市中的专业术语概括，即战争引起了通货“紧缩”，借债已无法支撑毫无节制的挥霍。



西塞罗在元老院慷慨陈词

苏尔比斯·鲁弗斯继承了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事业，试图在整个意大利重建民主政府。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一样，为了实行自己的计划，他必须打消来自多方的偏见。普鲁塔克说他在六百名骑士之间周旋，这些人使他成了“反元老院派”。他提议议员家产不得超过两千第纳里[1]，很显然，这项提议是为了取悦这些骑士，因为许多债主来自骑士阶层。毫无疑问，他试图从骑士阶层中挑选一批人填补驱

逐鲁莽的反意大利权贵时留下的空缺，这也是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曾经做过的事。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一样，苏尔比斯·鲁弗斯必须讨好底层人民，为此他提议吸纳自由民进入部族，因为他们的政策终究需要自己所在阶层的支持，同时他也要摒弃对自己即将组成的新式贵族的偏见。他还打算提议大赦因《瓦利安法》而被流放的人，希望这些人的回归为自己带来一批支持者。当然，该法的起草者瓦列乌斯也会被召回，但权衡下来，这样做利远远大于弊。苏尔比斯·鲁弗斯曾反对赦免这些人，但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尤其是在流放者的朋友的强烈呼吁下。他与优利娅家族长期不和，因为他曾质疑卢修斯·凯撒参选执政官的非法候选资格。他继续推行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计划，为授予意大利人完整的罗马公民权而不懈努力。这一行为可能会引起优利娅家族的不满，因为《优利娅法》和《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已经触碰到甚至超越了他们妥协的底线。但苏尔比斯·鲁弗斯和元老院中支持他的少数派看到了仁慈面纱下的丑恶真相。自《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生效之日起，投降的意大利人非但没有得到公民权，反倒由于反叛失去了原有的盟国权利。即使通过这两部法律受益的意大利人也只是名义上的受益，他们在新的部族中投票，但选票毫无价值，甚至没有被记录下来，因为轮到他们投票时，大部分事情早已尘埃落定。对一位深受德鲁苏斯思想影响的政治家来说，使用这种欺骗性手段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做法。和德鲁苏斯一样，苏尔比斯·鲁弗斯为了达到目的也借用了一些不可靠的手段。

罗马此时分成了两大阵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两大阵营间不仅没有明显的等级、财产、特权等界限，还包含各种类型的支持者，但在元老院中苏尔比斯·鲁弗斯的反对者居多。当苏尔比斯·鲁弗斯提议吸纳意大利人进入旧部族时，两个执政官宣布了一项特殊法令，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停止了所有公共事务。有些现代作家认为，苏尔比斯·鲁弗斯提议吸纳意大利人进入旧部族是为了确保盖乌斯·马略当选对抗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统帅。盖乌斯·马略确实渴望得到这一职位。人们看见他在战神广场上与年轻人一同操练，虽然这时他已经又老又

胖，但他还是想要展现自己敏捷的身手和马背上的功夫。这一行为使他获得了一些人善意的支持，但其他人却认为他最好去巴亚洗澡，因为这种卖弄自己的行为在当时只会遭人鄙视。苏尔比斯·鲁弗斯也许认为盖乌斯·马略是统帅的最佳人选，毕竟他在同盟者战争中战功赫赫。但认为他将盖乌斯·马略的目标当成自己的首要目标是没有根据的，就像我们无法证明普鲁塔克的长篇檄文是对苏尔比斯·鲁弗斯的公正评价一样。苏尔比斯·鲁弗斯是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的朋友，并继承了他的事业，与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一样，他希望借助盖乌斯·马略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并没有将与盖乌斯·马略结盟作为目标。只有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当时的政治，才能判断苏尔比斯·鲁弗斯到底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冒险家，还是一个追随前人事业、心怀抱负的政治家。他强烈抗议执政官的政策，指控对方违法。他的三千名支持者手持武器，走上罗马街头，引发了骚乱，甚至试图杀死执政官。执政官之一庞培·鲁福斯侥幸逃脱，但他的儿子被杀。另一位执政官是苏拉，尽管他废除了非常法，但对手还是穷追不放，据说最后他被慷慨的盖乌斯·马略藏在自己家中才得以幸免。从这些事情中，我们发现首先使用不正当手段的其实是执政官。苏尔比斯·鲁弗斯原本打算通过合法方式实行自己的律法，但执政官们用卑劣手段对他百般阻挠。不管他是在盛怒之下发动了暴动，还是他的支持者们在未得到命令前擅自行动（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此次暴动归根到底是由于他。虽然苏尔比斯·鲁弗斯不是暴动的始作俑者，但却是这次暴动的关键人物。

苏尔比斯·鲁弗斯的法律终于得以实行。苏拉逃到了军中。也许此时苏尔比斯·鲁弗斯才获悉或意识到苏拉可能会带兵杀回罗马。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盖乌斯·马略为东部军队的统帅。他们派了两名保民官前往诺拉的军营，试图从苏拉手中收回军权，却被苏拉的手下杀死了。苏拉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暗示士兵们为自己报仇，他只是抱怨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这些觊觎亚洲财富、想要讨好主人的士兵强烈要求苏拉带着他们前往罗马复仇。除了一名财务官，苏拉手下所有的军官都离开了他。在率领六个军团返回罗马的途中，他遇到了庞

培·鲁福斯，并与之结盟。两名监察官试图劝阻苏拉，但士兵们扯断了他们的饰带，并扯掉了他们的托加袍，吓得他们落荒而逃。元老院再次遣人询问苏拉的意图，得到的还是他无比坚定的回答：“将罗马从暴君手中解救出来。”紧接着，苏拉提议在战神广场与元老院、盖乌斯·马略和苏尔比斯·鲁弗斯谈判。如果他率军前往广场赴约，就会显得这一提议十分荒唐，但如果他打算只身前往，说明这个提议只是一个谎言。总之，这一提议只是个拖延时间的幌子，因为之后他并没有放慢前进的脚步。据说预言家帕斯图密乌斯曾伸出双手向他保证，如果战斗结果不是以苏拉的胜利告终，自己愿意套上锁链接受惩罚。苏拉自己也曾梦到吉兆，他梦到女战神贝罗娜或其他某位女神将一把雷霆杖放在他手中，并让他逐一念出敌人的名字，然后将这些人烧成了灰烬。



罗马战神广场遗址，绘于17世纪

元老院再次派使者前去警告苏拉，禁止他率军进入罗马城方圆五英里的地区。元老们也许依旧沉浸在罗马城长期远离军事干扰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中，正如克伦威尔政变前英国国会的感觉那样。苏拉再一次阳奉阴违，用谎言愚弄了元老院。他带着军队气势汹汹而来，仅用一个兵团占领了卡利安门。庞培·鲁弗斯带领另一支兵团占领了科林门，第三支军团占领了庞斯·萨布利西斯桥，第四支兵团作为预备军驻扎在城外。因此，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由一位执政官独立率领一支军队占领罗马城的景象，士兵们成了罗马的主人。盖乌斯·马略和苏尔比斯·鲁弗斯在埃斯奎里山迎战苏拉的军队，他们从屋顶向下倾倒瓦片，一

度将苏拉的军队击退。但苏拉挥舞着火炬，命手下的士兵发射带火的箭，将盖乌斯·马略赶下了埃斯奎里山。随后他召来预备军团，派遣一支小分队绕过苏布拉从后方袭击敌人。盖乌斯·马略试图在罗特斯神庙狙击敌人，但没有成功。他以自由为诱饵，引诱奴隶加入他的军队，也没有成功。他最终被打败，仓皇逃离了罗马。苏拉不公正的行为引起了骚乱，但他很快用武力平息了骚乱，继而引发了内战。苏尔比斯·鲁弗斯和盖乌斯·马略以及另外十人遭到放逐，据说苏拉还重金悬赏盖乌斯·马略的人头。苏尔比斯·鲁弗斯在罗伦图姆被杀，据维利尤斯·帕特丘拉斯的记载，苏拉将这位演说家的头挂在演讲台上。以他残忍的性格完全有可能做出这种事。苏拉还释放了曾经背叛苏尔比斯·鲁弗斯的一名奴隶，事后又命人将这名奴隶抛下了塔拜亚巨岩。雨果的《九三年》中有关兰提那克和火枪手的情节很可能是受苏拉的故事的启发。接下来，他开始着手恢复罗马的秩序，准备尽快东征。



复原后的古罗马城一角及庞斯·萨布利西斯桥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正面为苏拉头像，背面为罗马士兵将一名奴隶抛下塔拜亚巨岩

在这段历史中，苏拉对意大利逆民的态度相对温和，但他刚离开意大利，他的敌人就卷土重来了。历史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但他们都没有解释清楚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军队和亚洲的战役使苏拉在罗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如果没有军队他就不会有权力，准确地说，没有军队他早已性命难保。于是，他必须兑现对军队的承诺，也就没有精力同时去应付意大利逆民了。毫无疑问，他也渴望通过亚洲的战役得到荣耀和战利品，但如果认为此时他自愿离开意大利就太荒唐了。在这件事上他别无选择，对军队的承诺束缚了他，他只能采取温和措施赢得朋友、安抚敌人。他不指望科尼利厄斯·秦纳能够安分守己，因此给对方安了个作伪证的罪名，对其他人则是听天由命。在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的描述中，苏拉是一个矛盾、爱国而又冷漠的人，但实际上他并不矛盾，甚至一直很自私。如果爱国的定义是大公无私，那么他其实并不爱国。至于冷漠，实际上他并不冷漠，除非被触犯的只是他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苏拉新政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废除《苏尔比斯法》。第二，缓解债务人的压力，建立一些殖民地，随后又颁布了一项有关利率的法令，具体条款不得而知。第三，元老院的力量在同盟者战争中被削弱，于是为了填补空缺，他将三百名权贵送进了元老院。第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元老院有权在政策交与人民讨论前先行讨论。而苏

尔比斯·鲁弗斯凌驾于元老院之上，抵制苏拉的非常法。苏拉的新政规定，每项政策必须先通过元老院的讨论，再交与人民，即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了这项特权。第五，投票将不再在部族会议上进行，而是在百人大会上进行。第六，五个阶层不再有平等权，根据塞尔维昂宪法，第一阶层拥有将近一半的投票权。因为第一阶层的人都拥有十万塞斯特斯[2]以上的财产，所以这项法令使平民的权利转移到了富人手中，罗马民主政治变成了财权政治。但考虑到近期有关投票的操作，这项法令很可能符合元老院和苏拉的共同意愿。除此之外，苏拉没有颁布其他法令，也没有驱逐自己的政敌，只是试图将他的党徒——塞尔维乌斯和诺尼乌斯推上公元前87年的执政官的位置。但事与愿违，最终当选执政官的是民众派领袖科尼利厄斯·秦纳和科耐乌斯·屋大维。科耐乌斯·屋大维虽然属于权贵派，但不是苏拉的党徒。在另一个地方，苏拉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依照人民制定的法令，他打算召回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将北方军队交给他的朋友庞培·鲁弗斯统领。但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暗杀了庞培·鲁弗斯，继续做了军队统帅。保民官弗吉尼厄斯声称要控告苏拉，苏拉依然没有表现出愤怒。他让科尼利厄斯·秦纳拿着一块石头登上议事大厅的屋顶，将石头砸在一群观众面前，庄严宣誓遵守新宪法。随后，苏拉将梅特路斯·皮乌斯留在塞尼阿姆，将阿皮乌斯·克劳多斯留在诺拉，自己匆忙赶到卡普阿，在布伦迪西乌姆港登船前往亚洲。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在军队发生新的变数前兑现自己对他们的承诺，因此此时离开罗马、摆脱他亲手造成的混乱局面，也许是一件好事。于是他非常洒脱地离开了这个随时可能遭到暗杀的是非之地，踏上了东方的大地，开始了寻求名誉和财富的征程。

注解

[1] 古罗马的银币。

[2] 古罗马货币。

第10章　盖乌斯·马略与科尼利厄斯·秦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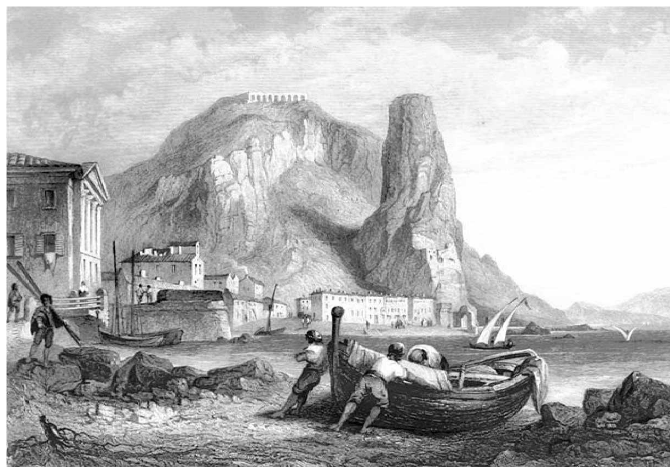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盖乌斯·马略亡命天涯——盖乌斯·马略在西尔策依、敏特奈、迦太基的奇遇——科尼利厄斯·秦纳担任执政官——科耐乌斯·屋大维放逐科尼利厄斯·秦纳——科尼利厄斯·秦纳逃往坎帕尼亚军中、率军杀回罗马——盖乌斯·马略回到伊特鲁里亚——科耐乌斯·屋大维召回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驻足科林门——盖乌斯·马略与科尼利厄斯·秦纳入驻罗马——科尼利厄斯·秦纳权倾罗马

这一时期的盖乌斯·马略都遭遇了什么呢？他的名字闪耀着传奇之光，整个意大利一直流传着他的传奇经历。逃离罗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战神广场上大显身手后已没有任何遗憾）时，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岳父的农场那里取些生活必需品。小马略没能在天亮之前赶到岳父的农场，差点被追踪他的人抓住，幸好农场的管理人看见了他，将他藏在装满豆子的货车里，套上牲畜，前往罗马。到了罗马，小马略来到妻子的住所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趁着暮色赶往奥斯提亚城，找到了一艘开往非洲的船，越海离去。他的父亲盖乌斯·马略没有等到儿子回来，于是在奥斯提亚城和女婿一起登船前往非洲。多年前，青年盖乌斯·马略意气风发地从非洲乘船回罗马竞选第一任执政官，现

在，他却狼狈不堪地从那片他曾经作战的土地逃命。大海对暮年的盖乌斯·马略似乎并不像对年轻时的他那么仁慈，风暴降临，船只沿着海岸被吹向南方。盖乌斯·马略央求船长避开特腊契纳，因为那里的长官格米尼乌斯是他的仇敌。但风暴越来越猛烈，盖乌斯·马略晕船了，不得不在西尔策依上岸。一些牧民告诉他骑兵在到处搜捕他们，于是他们躲在一片浓密的树林里过夜，忍受着饥饿和焦虑的折磨。第二天，盖乌斯·马略来到岸边，请求当地人帮助他。他告诉他们，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个鹰巢落在他的腿上，里面有七只雏鹰，预言家说这意味着他将七次获得最高头衔。在距敏特奈大约两英里半的地方，他们发现一些人骑着马朝这个方向赶来，于是一头扎进海里，朝岸边的一些商船游去。两名奴隶一直跟随在盖乌斯·马略身边保护他。盖乌斯·马略上了其中一艘船，他的女婿上了另一艘船。追捕者向水手们喊话，要求他们将人送上岸，或者抛入水中。于是船长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对于逃难者来说，这一刻一定异常难熬。幸运的是，辛布里战争胜利的强大影响力发挥了作用，船长们商量后决定保护盖乌斯·马略。直到此时，水手们表面上依然表现得慷慨大方，但内心却渴望丢下这个“烫手山芋”。他们在里斯河口登陆时，假装等候顺风，让盖乌斯·马略上岸休息片刻。盖乌斯·马略刚上岸，他们就开船离开了。受到愚弄的盖乌斯·马略爬过一片沼泽地，跨过沟渠，满身泥浆地来到一个老人的农舍前，央求主人收留他，并承诺如果自己能逃脱，一定加倍回报他。老人告诉他自己可以将他藏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将盖乌斯·马略带到河边的一个洞里，然后匆忙盖上洞口。但很快盖乌斯·马略发现自己藏不了了，因为格米尼乌斯的人一路追踪而来，他听到特使大声询问老人是否窝藏了不法分子。惊恐的盖乌斯·马略脱光衣服钻进河里，将自己暴露在追捕者的视线中。他们将赤身裸体、周身沾满泥巴的盖乌斯·马略从河里捞出来，交给了敏特奈的长官。敏特奈的长官将他暂时安置在一个叫范尼雅的女人家里，派重兵看守。范尼雅与格米尼乌斯一样与盖乌斯·马略有过节。盖乌斯·马略第六次担任执政官期间，曾因范尼雅的不法行为罚了她四德拉克马[1]。但看到落魄的盖乌斯·马略时，范尼雅却不计前嫌，极力帮助他。对盖乌斯·马略

来说，现在的处境并不能使他屈服，他坚强的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告诉范尼雅，当他来到她家时，一只跑出来喝水的驴直勾勾地盯着他，大声嘶鸣、撒欢，这预示着他可以通过大海逃生。但敏特奈的长官已经决定杀死盖乌斯·马略，他找了一个辛布里人来做这件事，因为没有公民愿意做这样的事。辛布里人持剑走进阴森森的屋子，旋即跑了出来，边跑边喊："我不能杀盖乌斯·马略！"他看到黑暗中有一双眼睛盯着他，并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问他："你敢杀盖乌斯·马略吗？"辛布里人吓得魂飞魄散，丢下剑仓皇逃走。后来，可能是地方官改变了主意，或者是人民不断向地方官施加压力，盖乌斯·马略逃过一劫。也可能是范尼雅放走了盖乌斯·马略。普鲁塔克的说法是人民要将盖乌斯·马略护送到海边，在去海边的路上有一片无人敢进的恐怖的小树林，但要绕过这个树林需要很长时间。一个老人为盖乌斯·马略带路，告诉他虽然这个地方很恐怖，但从这里走可以逃过一劫。当盖乌斯·马略到达海边时，他的朋友为他找来了一条船。他乘船顺风到达了恩纳里亚[2]，在那里与他的女婿会合，然后一同乘船前往非洲。由于缺水，船只被迫在西西里西北部的伊俄克斯附近停靠，但那里的罗马财务官高度戒备，杀死了十六名水手，还差点俘虏盖乌斯·马略。当他们在曼宁克斯登陆时，盖乌斯·马略听说他的儿子也在非洲，并且已经向努米底亚国王西耶姆普萨尔求助，于是他又重新登船，最后在迦太基登陆。那里的罗马官员派人警告他，让他离开非洲，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当被问到他有什么话要说时，盖乌斯·马略回答："去告诉你们的主人，盖乌斯·马略正坐在迦太基的废墟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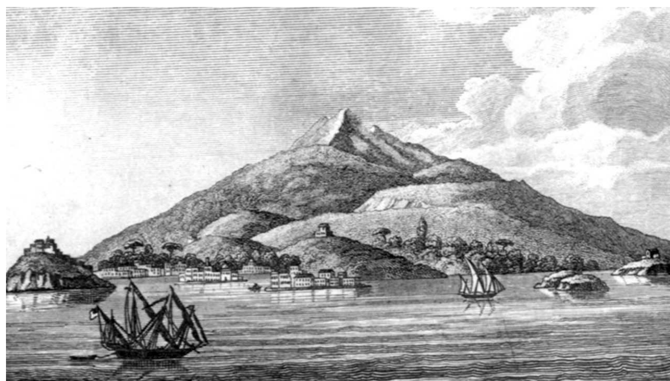


特腊契纳，绘于18世纪

西耶姆普萨尔表面上热情接待了小马略，实际上是软禁了他。据说努米底亚的一个少女被小马略英俊的外表倾倒，协助他逃跑。后来父子俩一同逃往色辛那岛，即现在的克尔肯那岛。在那里，盖乌斯·马略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随即返回了意大利。

苏拉刚离开布伦迪西乌姆港，他小心翼翼促成的停战协议就被撕毁了。据说科尼利厄斯·秦纳受到贿赂（当然这种说法并无确切依据），联合三百人要求旧部族接纳刚刚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我们对科尼利厄斯·秦纳知道的不多，但根据有限资料推测，他是一个大胆而又执着，胸襟不算狭窄，也不嗜血好战的人，但也不能肯定他与卢修斯·萨图尼努斯、苏尔比斯·鲁弗斯、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一样公正无私。他的反对者科耐乌斯·屋大维听说他的支持者在广场上威胁保民官，于是带着一伙人冲上神圣大道，驱散了这些支持者。一大部分支持者在冲突中丧生。因此，科尼利厄斯·秦纳与塞多留[3]一同离开罗马，四处召集自己的朋友。元老院宣布废除科尼利厄斯·秦纳的执政官职务，改选科尼利厄斯·墨卢拉接替他的位置。科尼利厄斯·秦纳胆略过人，他立即赶往坎帕尼亚的军中。到达军中后，他撕碎自己的衣服躺在地上，激起了士兵们的同情。士兵们扶起他，说他仍然是执政官，并表示愿意坚决听从他的号令。随后，科尼利厄斯·秦纳走访了意

大利的一些城市，招募了许多新兵。听说盖乌斯·马略已经到达伊特鲁里亚（可能是在他的邀请下）后，他不顾塞多留的反对立即同意与盖乌斯·马略联盟。



早期的恩纳里亚



盖乌斯·马略在迦太基登陆



盖乌斯·马略坐在迦太基废墟上陷入沉思

这一时期，科耐乌斯·屋大维和科尼利厄斯·墨卢拉加强了罗马城的防守。他们命令山外高卢的军队返回罗马，并从皮西努姆将地方总督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召回。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回来后驻留在科林门，据推测他很可能打算先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加入胜利的一方。他的一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庞培”的儿子此时与他在一起，已经崭露头角，镇压了一场针对父亲的反叛，并识破了敌人暗杀自己的阴谋。

盖乌斯·马略带着一群摩尔人和一伙从伊特鲁里亚召集的奴隶，收

买了叛徒后进入奥斯提亚城，将这个城市洗劫一空。科尼利厄斯·秦纳带兵来到台伯河右岸，与贾尼科洛山隔河相望。塞多留守住罗马上方的河口，并派一支军团前往阿里米努姆，防止意大利北部的援兵南下。危急时刻，元老院召回了梅特路斯·皮乌斯，并试图获得萨姆尼特人的援助。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萨姆尼特人选择了盖乌斯·马略和科尼利厄斯·秦纳的阵营。指挥贾尼科洛山军队的保民官投降了盖乌斯·马略，率领他的人马进攻罗马，但很快被击退。如果不是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劝阻了科耐乌斯·屋大维的进一步追踪，他们可能会被赶下贾尼科洛山。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打算等待时机，最后加入获胜的一方，或者在机会到来时，消灭敌对双方，独占胜利果实。与此同时，罗马爆发了饥荒，瘟疫逐渐蔓延开来。盖乌斯·马略占领了台伯河和一些偏远的、通往罗马的交通要镇。元老院并不信任自己的军队。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突然死于雷击，但他的死与古罗马的建国者罗穆路斯的死一样令人怀疑。人们将他的尸体从停尸架上扯下来，沿街拖走。当科尼利厄斯·秦纳在阿尔本山附近召集军队时，对面的科耐乌斯·屋大维的士兵居然为他欢呼喝彩。此外，两位领导人的意见也不统一，科耐乌斯·屋大维知道自己的手下害怕作战，却不愿让步，但梅特路斯·皮乌斯打算妥协。现在两支军队都在城外，盖乌斯·马略可能由于瘟疫被迫撤退，但他控制了亚壁古道、台伯河以及领近的大部分地区。罗马城内的饥荒越来越严重。士兵们希望梅特路斯·皮乌斯能够夺过科耐乌斯·屋大维的统帅权，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纷纷倒戈，投奔了敌人。因为科耐乌斯·屋大维不愿意像科尼利厄斯·秦纳那样承诺解放奴隶，所以奴隶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最后，元老院派人与科尼利厄斯·秦纳和谈，但当他们还在为是否要承认科尼利厄斯·秦纳执政官的身份争吵不休时，科尼利厄斯·秦纳已经来到大门口。元老院无条件投降，请求科尼利厄斯·秦纳不要大开杀戒。科尼利厄斯·秦纳不愿被形势所迫，但承诺不会主动这么做，因为他想起了身边那个被他授予地方总督权力的冷酷身影，此人曾在与元老院的谈判中故意示弱，但在那张阴沉、胡子拉碴的脸上，科尼利厄斯·秦纳看到了只有杀戮和鲜血才能满足的复仇的渴望。



台伯河沿岸风景



近代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绘制的亚壁古道

科尼利厄斯·秦纳进城时，盖乌斯·马略讥讽地说一个不法分子没有资格参与城内的事务，只有人民在广场上举行会议，正式废除对自己的审判后，他才愿意进城。但盖乌斯·马略刚踏入城内，城门就被立即关闭了。接下来的五天五夜，罗马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根据阿庇安的记载，盖乌斯·马略和科尼利厄斯·秦纳都曾发誓会放过科耐乌斯·屋大维，但盖乌斯·马略从不背弃自己的誓言，因此这个说法表面上根本站不住脚。关于这件事，阿庇安之前的说法是，科尼利厄斯·秦纳答应网开一面，但盖乌斯·马略并没有答应。据说科耐乌斯·屋大维逃到贾

尼科洛山上，穿着官服坐在自己办公的椅子上，等待着敌人。他去世后，敌人效仿苏拉的恶行，将他的头颅挂在演讲台上。科耐乌斯·屋大维固执而又愚钝，他的无能给他的党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包括凯撒兄弟、盖乌斯[4]、收复阿克莱并起草《优利娅法》的卢修斯·凯撒、公元前97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以及卢修斯·凯撒在同盟者战争中的一位副官。这位副官带着儿子一起逃跑，被追上时刺死了自己的儿子，随后自杀。著名的法庭辩论家马库斯·安东尼十分厌恶盖乌斯·马略，据说盖乌斯·马略听说他被捕时，要求手刃仇人，但马库斯·安东尼侥幸逃脱后躲了起来，后因一个奴隶不慎暴露了行踪。这个奴隶去买酒时，卖酒的人问他为什么买的酒比平时多而且比原来好，他悄悄告诉卖酒的人酒是买给马库斯·安东尼的。士兵赶来杀他时，马库斯·安东尼慷慨陈词，请求放他一马。士兵们深受触动，流下了眼泪，不愿动手。这时，在后面等待的军官不耐烦地走上来，亲手砍下了他的头。科尼利厄斯·墨卢拉割脉自杀，他的罪名是在科尼利厄斯·秦纳被罢免后，接替了执政官的职位。他最后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有点古怪，但也悲哀地体现了他的虔诚，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古希腊政治家、雄辩家德摩斯梯尼[5]临终前的壮烈一幕。记录他生前事迹的一块牌匾上写道：割脉之前，他已经摘下官帽，以免像朱庇特的祭司那样戴着官帽死去，亵渎了它的神圣性。

盖乌斯·马略曾经仁慈地宽恕了他在辛布里战争中的战友——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但后来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却帮助他的政敌驱逐他。在盖乌斯·马略看来，这种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当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的家属请求他的赦免时，他回答道："他必须死。"可能由于疾病、酗酒和之前的痛苦经历，这个老人现在有点儿神智失常。以前他还有温厚和蔼的一面，但此时的他只有嗜血的残忍。盖乌斯·马略开始了疯狂的复仇，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曾经蔑视、伤害他的人。当科尼利厄斯·秦纳召见他时，他说自己要在部族里彻底解决募兵问题。他想要的不是选择性的报复，而是杀光所有权贵派的代表。塞多留请求科尼利厄斯·秦纳阻止杀戮，科尼利厄斯·秦纳也尝试着遏制盖乌斯·马略

手下那帮奴隶的怒火，但他不敢与盖乌斯·马略撕破脸，甚至在公元前86年，他还提议让盖乌斯·马略与自己一同担任执政官。然而，盖乌斯·马略刚死，他和塞多留就毫不犹豫地清理了这帮暴徒。

盖乌斯·马略已命不久矣。他报了仇，如愿以偿地第七次当上了执政官。据说他对自己的一个朋友说，经历了这样的人生沉浮，他不愿再冒险了。缠绵病榻七天后，盖乌斯·马略去世。他因酗酒患上了胸膜炎。在弥留之际他变得极度亢奋，幻想自己在亚洲，不断呼喊着，并通过各种手势给梦中的军队鼓劲。1月13日或17日，在第七次担任执政官的第十三天或第十七天，他的生命在一片铿锵声中落幕，享年七十一岁。

盖乌斯·马略去世后的继任者是卢修斯·弗莱克斯，他颁布了一项新法，规定债款的四分之一为法定偿还底线。大概也是在这一年，第纳里恢复到之前的标准价值。卢修斯·弗莱克斯还命人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普查范围包括新的意大利公民，由菲利普担任检查官。菲利普在这一问题上曾因反对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点燃了同盟者战争的导火线。除了上述这些举措，科尼利厄斯·秦纳还吸纳了部分意大利人进入旧部族，但这些事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了解。普布利乌斯·苏尔比斯曾经施行过这项政策，但苏拉在离开意大利前将它废除了。公元前84年，在苏拉回来前，据说元老院授予了意大利人投票权，并将获得自由的奴隶安排进三十五个部族。这些政策可能是在科尼利厄斯·秦纳的高压下通过的，后由元老院正式批准。

此时的科尼利厄斯·秦纳权倾罗马。从公元前87年到公元前84年，他连续四年担任执政官。除了亚洲、马其顿、希腊和梅特路斯·皮乌斯藏身的非洲外，整个罗马世界都匍匐在他脚下。但他并不擅长使用自己手中的的权力。他可能取消了对粮食的限制，并宣布苏拉和梅特路斯·皮乌斯是不法分子。按理来说，他应该竭力阻止苏拉的回归，但他做的这些事比束手待毙更危险。他没有派塞多留去迎战刚刚拿下雅典、击败阿基劳斯的名将，却派了能力不足的卢修斯·弗莱克斯和流

氓无赖费穆布里亚。我们会在下一章介绍科尼利厄斯·秦纳和塞多留事业的失败过程。科尼利厄斯·秦纳突然意识到复仇者已经兵临城下，他要么立即采取行动，要么等着对方杀进城内。于是他匆忙赶到安科纳，派了一支军队前往河对岸，但第二支军队被暴风雨击退，士兵们四下逃散，纷纷表示不愿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他士兵听到这些也拒绝登船。科尼利厄斯·秦纳赶到现场训斥士兵，他的扈从在开道时打了一个士兵，另一个士兵回击了扈从，科尼利厄斯·秦纳命扈从抓住肇事者，随后引发了骚动，科尼利厄斯·秦纳在混乱中被杀。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士兵们杀了科尼利厄斯·秦纳是因为怀疑他是杀死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的凶手。科尼利厄斯·秦纳试图用象征权力的戒指贿赂一个百夫长，换一条生路，但对方回答自己不想要别的，只想处死一个暴君。然而，从始至终，科尼利厄斯·秦纳都应该是一个英勇且具有才干的人，否则塞多留也不会一直死心塌地追随他。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卢修斯·弗莱克斯

注解

[1] 古希腊银币名。

[2] 今天的伊斯基亚岛（Ischia）。——原注

[3] 此人会在后面篇章中专门介绍。——原注

[4] 他成为裁判官前曾试图参选执政官，但遭到普布利乌斯·苏尔比斯的谴责。——原注

[5] 德摩斯梯尼是古希腊雄辩家、民主派政治家。早年师从伊萨学习修

辞，后教授修辞学。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极力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后在雅典组织反马其顿运动，失败后自杀身亡。

第11章　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

精彩看点

塞多留在西班牙——罗马获得的又一遗赠：利奈——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历史——米特拉达梯六世顺从于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强行发动战争——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战败被杀——屠杀亚洲的罗马人——放弃亲征罗德岛

我们暂且将科尼利厄斯·秦纳的事业如何落下帷幕的问题搁在一边，先来说说苏拉的事业以及让罗马谈虎色变的米特拉达梯六世到底是什么人。

在打败北方游牧部落、镇压了第二次奴隶起义后，公元前97年，罗马与西班牙的凯尔提波利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塞多留作为一名军官参战，展现出了自己的英勇与才干。他在卡斯图罗的冬营时，西班牙人见他手下的士兵纪律松散，便乘机发动了袭击。塞多留逃走后集结了逃出来的士兵，折回城里，杀光了城里的敌军。随后，他和士兵们穿上死人的衣服，混入另一个与敌军结盟的城市。但这次战役的胜利却归功于提图斯·狄第乌斯，后来在同盟者战争中此人担任卢修斯·凯撒的副官。此外，塞多留在一场恶战后占领了亚里费西的重镇忒弥所斯以及克林达，还曾因其他军功被授予凯旋庆典。譬如，克林达附近有一个城镇，罗马人与城里的居民有血海深仇。塞多留谎称要将克

林达的土地授予城里的居民，于是居民们前来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但这些人刚出现，塞多留的军队就发动进攻消灭了他们。

公元前96年，普拖雷米·阿皮翁将非洲北岸的利比亚和地中海到罗马之间的狭长梯田地带利奈作为遗产赠给罗马。罗马没有拒绝这份遗赠，但他们不愿费心管理这个国家，于是宣布利奈独立。换句话说，这些城市名义上臣服罗马，罗马也可以随时干预它们的事务，但平时处于自治状态。实际上这种类似无政府状态的统治正好与元老院的政策吻合。



利奈城遗址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米特拉达梯六世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最终走到了罗马的对立面。米特拉达梯六世曾与卡帕多西亚的国王结亲，后来却派人将其暗杀。比提尼亚的国王尼科梅德占领了卡帕多西亚并娶了原国王的遗孀——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姐姐为妻，结果遭到米特拉达梯六世的驱逐。米特拉达梯六世将他姐姐的儿子推上王位，但这位新国王拒绝欢迎他的杀父仇人戈尔迪回国，于是米特拉达梯六世派兵讨伐他，最后暗杀了自己的亲外甥。紧接着，米特拉达梯六世将自己外甥的名字赐给自己的儿子，并将其推上了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宝座，让戈尔迪做儿子的保护人。这件事引起了卡帕多西亚臣民的不满，他们

驱逐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儿子，夺回了王位，并推举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另一个外甥登上了王位，但没过多久又被米特拉达梯六世赶了下来。尼科梅德向罗马的元老院求助，主张扶植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第三个外甥为卡帕多西亚的国王。为了证明真的存在第三位王子，尼科梅德将妻子叫到罗马，让她发誓她有三个儿子。米特拉达梯六世上演了一出冒名顶替的滑稽剧，他派戈尔迪前往罗马，发誓王位上的年轻人是三十多年前死去的卡帕多西亚国王的儿子。元老院如同面对两条争抢猎物的豺狼，采取了中立的解决措施，从米特拉达梯六世手中收回了卡帕多西亚，从尼科梅德手中收回了帕夫拉果尼亚，然后宣布这两个国家独立。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卡帕多西亚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国王，于是元老院任命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为国王。心有不甘的米特拉达梯六世煽动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涅斯驱逐了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被迫逃亡罗马。于是罗马派苏拉前去恢复秩序。公元前92年，苏拉打败了戈尔迪和亚美尼亚人领导的卡帕多西亚军队。在此次战役中，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结下了深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帕提亚人派特使前去与罗马结盟，当时现场有三把椅子，分别给了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苏拉和欧洛巴佐。虽然苏拉只是个地方长官，但却坐在中间位置。这件事激怒了帕提亚国王，但他并没有报复苏拉，而是杀了倒霉的欧洛巴佐。帕提亚的军队中有一位占星者，他仔细观察了苏拉的面相后说出了惊人的预言。听到预言后的苏拉就像当年的盖乌斯·马略一样欣喜若狂，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敌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七次担任罗马的最高长官。但回到罗马后，他却被指控收受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的贿赂。亚洲之行不仅给他带来了荣耀，还使他获得了物质利益，刺激了他的贪欲，促使他再次寻求掠夺亚洲财富的机会。

与此同时，米特拉达梯六世由于蒙受了羞辱，正在寻找报仇的机会，他隐匿身份，先后来到罗马的亚洲省和比提尼亚省，打算在自己足够强大时发动进攻。当他回到家时，发现自己的王后，即他的妹妹对自己不忠，于是处死了她。至此，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妹妹、兄

弟及一个外甥，另外他还囚禁了自己的母亲。他对自己的儿女和嫔妃也一样无情。据说在他死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是他提前给自己最信任的贴身侍从做的安排，同时他杀光后宫所有后妃，以防她们落入敌人之手。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

纵观米特拉达梯六世的一生，其实是一部纵欲、背叛以及谋杀史。他在童年时期已经嗅到血腥味。他的父亲在他十一岁时遭到暗杀，紧接着，他的保护人和他的母亲都想密谋杀害他。这些人让他骑在一匹野马上耍标枪，所幸米特拉达梯六世骑术精湛，对方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后来他们又试图下毒，据说米特拉达梯六世开始精研各种解毒法，使自己变得百毒不侵。之后他逃离了敌人的追捕，在外面过着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的生活，甚至七年没有在屋檐下睡过一次觉。漂泊期间，他日日与凶禽猛兽斗争。七年后，他变成了一个体格健硕、性情凶残的年轻人，一只真正的猛虎，一个不会放过任何妨碍他

野心的男人或勾起他情欲的女人的暴君。他身材高大，力量和精力都超越了东方人的想象；他跑得比鹿还快，吃得比宴会上任何一个人都多；他有百步穿杨的功夫，有驯服最桀骜的野马的本事，还有一天骑行一百二十英里的耐力。二十二个国家都臣服于他，他也掌握了这些国家的所有语言。米特拉达梯六世凶残的兽性外面是一层薄薄的希腊式的典雅外衣。他不仅是一位演奏家，还酷爱收集各种戒指。此外，他养着一批希腊诗人和历史学家，经常赏赐优秀的歌手。虽然他老谋深算，雇用希腊人担任将军，但精明的他却没有越过迷信这道坎。

在与罗马交战的前二十年（前110—前90），米特拉达梯六世一直忙着开疆拓土，他从先辈那里继承了本都王国[1]。他的叔祖父米特拉达梯四世娶了一位有希腊血统的公主，这位公主是叙利亚塞琉古国王的妹妹。他的祖父法尔纳克一世征服了锡诺普和帕夫拉果尼亚，最远曾到达比提尼亚边境。他的父亲米特拉达梯五世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帮助过罗马，被称为“罗马的朋友”，米特拉达梯五世还由于在罗马与阿里斯托尼库斯，即帕加马王国冒名顶替的继承人的纠纷中做出了贡献，名义上被授予佛里几亚省，但后来又被收回了，因为当时正在围剿阿里斯托尼库斯余党的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私自将佛里几亚省拍卖了。米特拉达梯五世在位期间，本都王国的疆界划分还不明确。边境线向东延伸到高加索山脉和幼发拉底河源头，小亚美尼亚成了它的附属国，向南和西南延伸到卡帕多西亚和加拉太，西边的帕夫拉果尼亚是它名义上的边境。后来，米特拉达梯五世在罗马的劝诱下放弃了对外征服，但从那时起，锡诺普成了本都王国的首都，帕夫拉果尼亚和加拉太实际上一直处于独立状态。上述这些是米特拉达梯六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领土，他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的政策，常常通过武力和欺骗的方式扩张领土。在黑海东岸，米特拉达梯六世征服了发西斯的科尔基斯，并将其设为总督辖地。他在北方被称为希腊城市的救世主，那些城市与雅典一样缺乏保护，长期遭到野蛮部落的勒索，很快走向了没落。完成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是两位希腊大将涅俄普托勒摩斯和丢番图。涅俄普托勒摩斯打败了旁提卡彭的叨立克族人。克里

米亚的博斯普鲁斯国王非常感激他，将整个王国拱手送给了他的主人米特拉达梯六世。丢番图率军向西行进到提拉斯河[2]，在一次大战中歼灭了罗克索拉尼人。罗克索拉尼人是游荡在玻里斯提尼斯河[3]和塔内斯河[4]之间的游牧民族。通过这些征服行动，米特拉达梯六世获得了两百塔兰特[5]、二十万蒲式耳粮食，以及大片供他招募士兵的土地。他吞并了东边的小亚美尼亚，并与一个新崛起的王国——大亚美尼亚王国的国王提格拉涅斯结盟。提格拉涅斯将自己的女儿克利奥佩特拉嫁给了米特拉达梯六世。这两个盟国的征服计划是米特拉达梯六世必须占领小亚细亚以及黑海沿岸，提格拉涅斯必须占领内陆和叙利亚。米特拉达梯六世对卡帕多西亚和比提尼亚的干预与阴谋在上文已经提及。当他向卡帕多西亚进军时，军备力量包括八万名步兵、一万匹马和六百辆刀轮战车。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法尔纳克一世

上述事件体现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权力和性格。之前他对苏拉降心相从，但现在却以傲慢不屑的态度等候苏拉发动进攻。我们可以从公元前92年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找到他转变态度的原因。当

提格拉涅斯国王再次驱逐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迎回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儿子时，苏拉并未采取行动让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复辟。在比提尼亚，尼科梅德的二儿子苏格拉底在本都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对其兄长尼科梅德二世的武装反叛，尼科梅德二世的王位继承权曾得到罗马的承认。米特拉达梯六世表面上置身事外，并未插手这些政变。元老院派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为两位国王复辟，同时命米特拉达梯六世在必要时派兵援助。米特拉达梯六世像从前那样答应了，但没有派兵，而是直接杀死了苏格拉底。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90年，当时罗马正处在同盟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也许我们会奇怪米特拉达梯六世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一天赐良机，但在那个年代，信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从意大利传到锡诺普，有时候还不准确。而且此时的米特拉达梯六世对西西里奴隶起义头目安提阿的结局还心有余悸，不时地告诫自己共和国的敌人其下场将会非常悲惨，只有像帕加马那样与罗马保持盟友关系才能安好。公元前92年，苏拉言语中的傲慢加深了他人对他的这一印象。在诉诸武力前，这位狡诈的国王希望通过欺骗手段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也许是真的畏惧，但也因为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他像当时顺从苏拉那样顺从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然而，曾私自拍卖佛里几亚省的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看到亚洲即将爆发的战争将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或者我们往好的方面想，他只是认为米特拉达梯战争已是在弦之箭，于公于私都应该先发制人，夺得先机，于是他逼迫比提尼亚国王宣战，派军队袭击了这个环绕在阿玛斯特里斯城周围的国家，并让舰队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米特拉达梯六世并没有被激怒，他向罗马提出控诉，请求对方调停或出兵保护他。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说他绝不会对尼科梅德二世开战。不难想象米特拉达梯六世听到这种回答时的反应，他立即派他的儿子率军进入卡帕多西亚。此外，他并没有放弃外交手段，于是派特使去见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告诉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如果罗马让尼科梅德二世撤军，他愿意协助他们击退意大利人，否则本都王国与罗马将正式解除盟友关系。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将这件事交给元老院裁决。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为首的专员们将特使带来的消息视为对他们的侮辱，命令米特拉达梯六世

不得进攻尼科梅德二世，并打算恢复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的王位。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这么做可能是由于收了尼科梅德二世的贿赂。尼科梅德二世强烈感觉到罗马人一离开，比提尼亚就会任人宰割。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无形的刺激，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不太可能仅凭匹夫之勇贸然发动战争。

木已成舟，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于是米特拉达梯六世终于释放出他长期压抑的怒火，投入了战争。他摆出一副希腊捍卫者的姿态，声称要率领希腊人打败统治他们的暴君，借此与埃及人和克里特人结盟。他试图煽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叛乱，还与提格拉涅斯定下协约。协约规定亚美尼亚军队必须配合他作战，如果取胜，占领的土地归本都国，其余战利品归亚美尼亚。他一声令下，无数海盗船打着他的旗号席卷了地中海。他召集了二十五万步兵、四万马匹和一百三十辆刀轮战车，以及一支由三百艘甲板船组成的舰队和一百艘配有双排桨的船只“迪克洛塔”。他用罗马人的方式组建了一支外国分队，其中有不少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军队由骁勇善战的希腊将领阿基劳斯和涅俄普托勒摩斯统率。为了对抗强大的敌人，罗马从拜占庭调来了一支舰队，并派出比提尼亚的军队。在锡诺普和阿玛斯特里斯城之间还有三支军团，分别由四万人组成，但其中大部分是匆忙就地招募的亚洲人。第一支军团在比提尼亚和加拉太之间，由卡西乌斯率领；第二支军团在比提尼亚和本都之间，由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率领；第三支军队在卡帕多西亚，由奥皮乌斯率领。这场战争仅用一场战役就基本分出了胜负。阿基劳斯和涅俄普托勒摩斯在阿姆尼亚斯河上击溃了比提尼亚军队，占领了他们的营地并劫掠了军队金库。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一度难分胜负，最后本都军队出动了刀轮战车，使惊恐万分的比提尼亚军四处溃散。兵败后，尼科梅德二世逃往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那里，而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在斯科劳伯山附近被阿基劳斯击败，最后与尼科梅德二世一同越过桑加里斯河逃往帕加马，打算从那里逃往罗德岛。卡西乌斯退到佛里几亚省，试图管制那些未经训练的士兵，但根本无法做到，于是他解散了这部分军队，带着罗马军前往亚帕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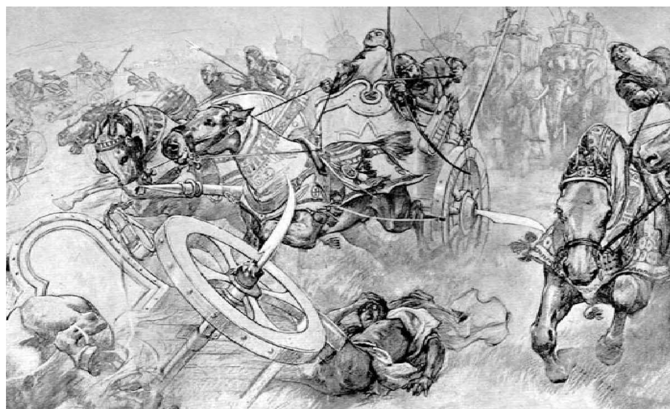
亚。黑海舰队的统帅投降了米特拉达梯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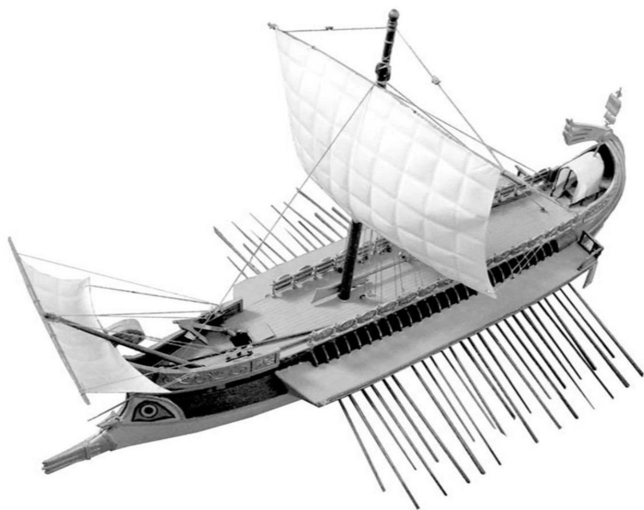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米特拉达梯六世

至此，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海陆两军都大获全胜。击败了比提尼亚后，他从佛里几亚和米西亚进入罗马的亚洲省。在那里，他被人们称为救世主，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他不仅放走了被俘虏的亚洲人，还让他们带着礼物回家。随后，他派信使到利西亚和潘菲利亚寻求结盟。当时的奥皮乌斯在吕库斯河边的老底嘉城。米特拉达梯六世以豁免权为诱饵诱使市民投降。市民投降并交出奥皮乌斯后，他让左右侍卫拉着奥皮乌斯游街示众。米蒂利尼人交出了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米特拉达梯六世让他戴着锁链骑在驴上，每到一处都要呼喊自己的名字。最后，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死在帕加马，米特拉达梯六世用一种极其残酷的刑法结束了他的生命，将熔化的黄金灌入他的喉咙，让世人知道是罗马人的贪婪引发了战争。门德雷斯河畔的美格里西亚、以弗所、米蒂利尼都热烈欢迎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到来。此外，本都军占领了卡里亚的斯特拉托尼。紧接着，米特拉达梯六世又下令攻打西必洛斯山附近的美格里西亚，企图入侵罗德岛。他下了一道惨绝人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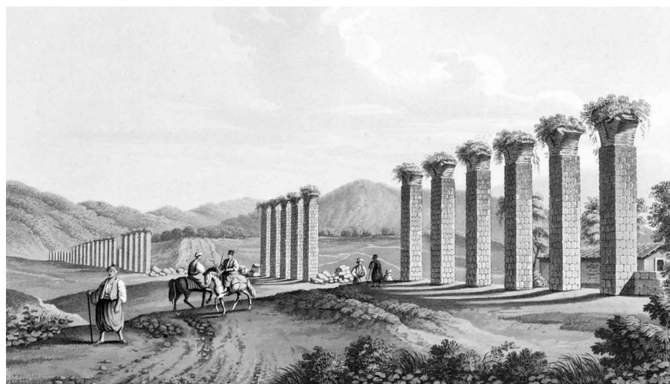
屠杀令，命令士兵在指定的某一天杀光亚洲省所有的罗马和意大利人。任何窝藏死囚或掩埋他们尸体的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但杀死或举报这些人的人可以得到奖赏。另外，奴隶们如果杀死被通缉的主人还可以获得人身自由，杀死债权人的人可以获得由欠债人支付的一半债款。屠杀令颁布后的第三十天，即末日这天，亚洲省的城市笼罩在一片阴云惨雾中，帕加马的公民逃到医神艾斯库累普的神庙，抱着雕像被活活射死。以弗所的公民被拖出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神庙后惨遭杀戮。亚大米田的公民逃向大海，也被抓回来杀死了，他们的孩子被淹死在海里。科斯城是唯一被幸运之神眷顾的城市，躲在斯库累普神庙的人幸存了下来。据说遇害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总计八万，甚至有人说达到了十二万人，当然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夸张。米特拉达梯六世为了斩断与罗马媾和的退路，残忍地犯下了这些滔天罪行。他除掉了罗马的将领，免去了招募军队的后患，让那些长期遭受罗马税收官和奴隶主剥削压迫的农民发泄了心中的愤恨。他不仅免去了债务人的债务，还将他们的债主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此外，他还将几个盟国拉下了水，使他们也成了罗马不共戴天的敌人，与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毫无疑问，他做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此时的罗马似乎鞭长莫及，苏拉并没有向东进军，而是返回了罗马。意大利的内战可能使米特拉达梯六世获得了亚洲的长期统治权，于是他迁都帕加马，锡诺普由他的儿子代理摄政。卡帕多西亚、佛里几亚和比提尼亚都成了他的总督辖地，大量战利品充实了他的金库，他不仅免去了剩余的税款，还允诺免去那些愿意归降的城市五年的税收。



士兵驾驶刀轮战车作战的场景



双排桨战船



以弗所遗址，绘于19世纪

但局势瞬息万变。帕夫拉果尼亚人依旧在顽强抵抗。阿基劳斯的军队在美格里西亚被击退，他本人也因此负伤。米特拉达梯六世被迫放弃了亲征罗德岛的计划，他复仇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也逐渐厌倦了战争，打算将指挥未来战争的任务交给他的将领。他带着新王后回到了帕加马，过着莺歌燕舞、声色犬马的生活。与此同时，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整个意大利为之战栗。复仇女神震怒了，派出了她的使者苏拉。

注解

[1]　马其顿征服卡帕多西亚时，将其一分为二，本都是其中的一个行省。——原注

[2]　今德涅斯特河。——原注

[3]　今第涅伯河。——原注

[4]　今顿河。——原注

[5]　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四万八千英镑。

第12章　苏拉在雅典和亚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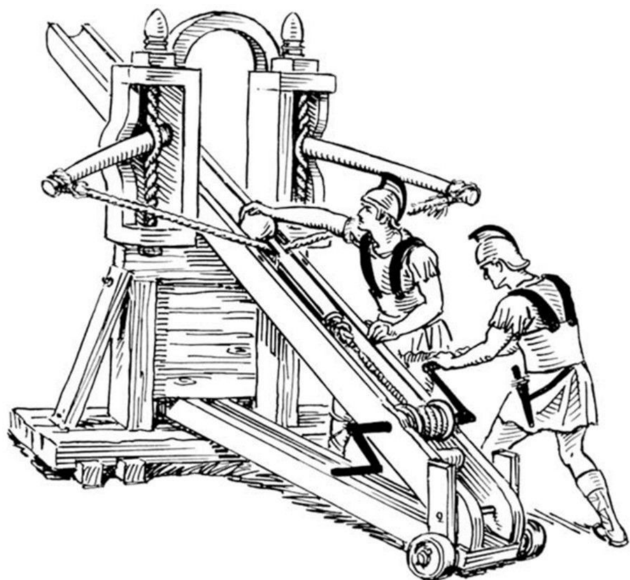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亚里斯提昂唆使雅典人反叛——苏拉登陆伊庇鲁斯、围攻比雷埃夫斯和雅典——苏拉的困境——攻占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在喀罗尼亚和奥科美那斯河边打败阿基劳斯——停战条件——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暴政——费穆布里亚杀死卢修斯·弗莱克斯后死于苏拉之手

亚里斯提昂是一名雅典公民，他的母亲是埃及女奴，父亲或养父是一个叫雅典尼昂的人，他自己曾做过修辞学老师，信奉伊比鸠鲁[1]哲学。此时，他作为雅典人的使节面见米特拉达梯六世，两人相谈甚欢。在向雅典汇报他的出使情况时，他激情四射地称赞米特拉达梯六世的能力以及他在雅典重建民主制度的计划。雅典人派出几艘战船到优比亚岛接亚里斯提昂，并送给他一乘银质底座的轿子。他穿着紫色长袍，戴着一颗可能是他的国王朋友赠送的戒指，被前呼后拥地回到雅典的家中。在一次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中，他竭力渲染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功绩，呼吁人们争取独立，并选举他为将领。不久，亚里斯提昂杀死了竞争对手，当上了雅典的独裁者。自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都落入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手中。人们对罗马的不满迅速蔓延开来。阿基劳斯到达希腊时，除了塞斯比阿人、亚该亚人、拉哥尼亚人和皮奥夏人，其他部族都归顺了他。与此同时，本都王国的舰队占领了优比

亚岛和帕加萨湾上游的城市德米特里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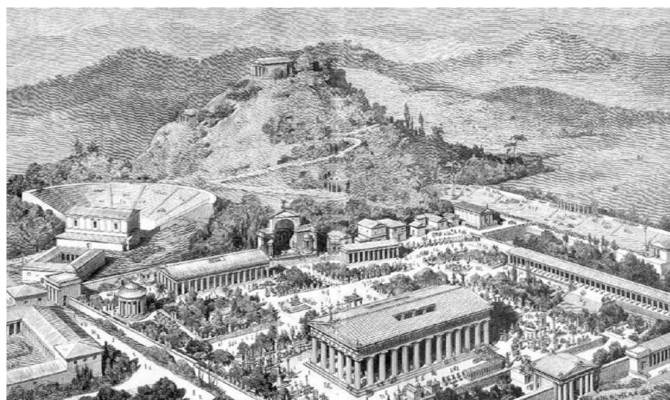
马其顿总督派修罗前去抵抗侵略者。修罗在海上打了一次胜仗，占领了敌人存放战利品的西阿苏斯。随后他进军皮奥夏，与阿基劳斯和亚里斯提昂的联军展开长达三天的恶战，迫使阿基劳斯退回海边。这场战争本来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但此时卢库勒斯宣布了一条消息，称苏拉前来接手战争，于是修罗退回马其顿。公元前87年，苏拉离开布伦迪西乌姆港，在伊庇鲁斯海岸登陆，带着从埃托利亚和塞萨利搜刮来的军需品径直进军雅典。很快，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帝国像一盘散沙一样变得四分五裂。皮奥夏人、底比斯人立即宣布投降。紧接着，苏拉开始围攻由阿基劳斯守卫的比雷埃夫斯和亚里斯提昂守卫的雅典。阿基劳斯在之前的战役中已经表现出他的骁勇善战，在与苏拉交手时，他再次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勇气打乱了对方所有的计划。一次突袭失败后，苏拉退到艾留西斯和麦加拉，与提比斯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保持联系，开始打造石弩和其他器械，并堆起了一个土垒，打算进攻城墙。为此，苏拉砍伐了阿克德米亚和吕克昂的许多树木。与此同时，他在城内安插了两个奴隶做眼线，一旦敌人有突围意图，这两个奴隶就会将刻了字的铅球扔出城外。但苏拉刚堆好土垒，阿基劳斯就在对面的城墙上建起了塔台，这让罗马军头痛不已。得到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增援后，阿基劳斯出城迎战。这场战斗打得十分胶着，后来阿基劳斯损失了两千名士兵，被迫撤军，但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当时城门已经关闭，他只好命人用绳子将他拉上了城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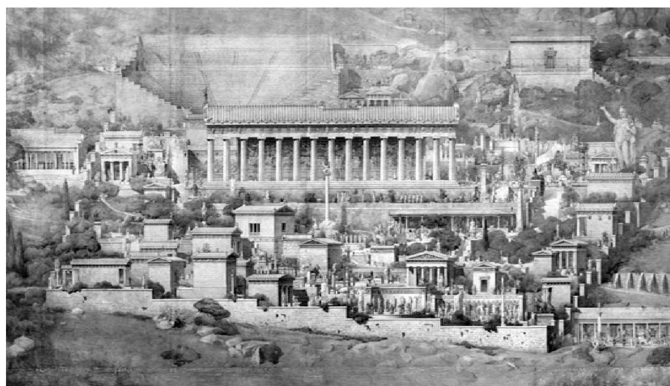
古罗马时期的石弩

苏拉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来希腊时只带了三万人，而且没有舰队，资金短缺。因此他被迫将魔爪伸向了埃皮达鲁斯、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的神殿。他派往特尔斐的信使回来报告称他在神殿里听到了琉特琴的声音，不敢亵渎圣物。苏拉说这是神的旨意，欢迎他们取用神殿里的财宝。他还向神承诺，所取之物来日必当奉还。后来苏拉果真没有食言，他没收了提比斯一半土地后，将土地上的收益献给了神。在最窘迫的时候，他已经无法顾及别人的嘲笑。冬季即将来临，苏拉派卢库勒斯前往埃及借船，但遭到了埃及国王的拒绝，这说明罗马当时在其他国家眼中已今非昔比。于是苏拉将营地设在艾留西斯继续围攻雅典。他命人用石弩同时射出十二颗铅球，将敌军的大塔台轰得摇摇欲坠，迫使阿基劳斯撤掉塔台。他还在雅典城四周筑起了堡垒，将围攻变成了封锁，城内爆发了饥荒。通过两个奴隶内线传递的消息，苏拉打断了阿基劳斯往雅典城内投送食物的计划。与此同时，米特拉达梯六世派自己的儿子率军入侵马其顿。面对强大的敌军，马其顿城内的一小部分罗马军被迫撤退。首战告捷后，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儿子向雅典进发，却在半路上去世了。曾经发生在比雷埃夫斯的惨剧后来又

在耶路撒冷的围城战中重演。阿基劳斯破坏了苏拉的土垒。苏拉再次对城墙发起突袭，摧毁了部分城墙，然后点燃了支撑城墙的坑木，扩大了受破坏城墙的面积，最后分批派士兵前去破坏洞口。阿基劳斯模仿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普拉提亚人，建了一面月牙形内墙，利用这面内墙，他击退了试图从前方和两侧进攻的敌人。最后，苏拉被敌人的顽强抵抗折磨得精疲力尽，放弃了围攻，开始封锁雅典城。所谓的封锁，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阿基劳斯援助雅典，因为他无法阻止敌人从海路输送物资。



奥林匹亚神殿复原图



特尔斐神殿复原图

雅典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小麦的价格贵得惊人，居民们只能靠吃

旧皮革和死尸维持生命。雅典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苏拉，但苏拉直接将代表们赶了回去，因为他们一开口就高谈阔论，责备自己的祖先曾做过的事。很明显这些都是修辞学家亚里斯提昂给他们准备的说辞。苏拉怒斥代表团，说他们这等败类不配做古雅典人的子孙，他不想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只想惩罚他们的背叛。公元前86年3月1日，苏拉在一片号角声和士兵的厮杀声中破城而入，命令手下士兵格杀勿论。据说鲜血流出了城门，一直流到郊外。亚里斯提昂逃到雅典卫城，最后因饥饿难耐，被迫投降，随后被杀死。同时，苏拉加强了对比雷埃夫斯的围攻。罗马军翻过月牙形的内墙，但发现墙内还有一堵墙。然而苏拉还是一步步将阿基劳斯赶到了慕尼契亚（另一种说法是比雷埃夫斯的半岛地带）。因为罗马军没有船，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走。大概在雅典城失陷后不久，阿基劳斯响应塔克西勒的召唤乘船离去。塔克西勒是米特拉达梯六世钦点的新将领，他率领十万步兵、一万马匹和九十辆刀轮战车前去增援希腊。他率领这支军队以及原来米特拉达梯六世儿子的人马在温泉关与阿基劳斯会师，随后沿赛菲索斯河谷向福基斯进军，企图拿下伊拉提亚，但没有成功，于是在喀罗尼亚与苏拉的军队会合。此前苏拉进军皮奥厦，与霍尔登修会师。霍尔登修从塞萨利带来部分军队。但根据阿庇安的记载，这支军队的数量不及敌军的三分之一。普鲁塔克明确记载霍尔登修只有一万五千名步兵和一千五百匹马。苏拉驻扎在赛菲索斯河西岸一片叫斐洛毕奥都斯的高地上，阿基劳斯的军队驻扎在不远处的河对岸。敌军的人数和精良装备令苏拉的士兵震惊不已，他们精良的金属盔甲“在空气中闪耀着闪电一般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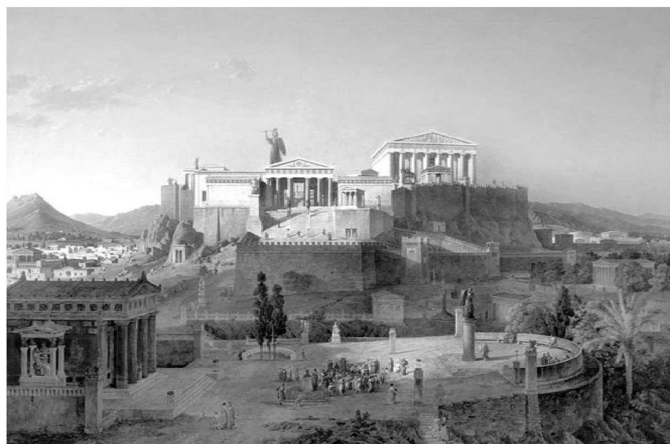
阿基劳斯继续沿赛菲索斯河谷行军，试图抢占位于阿苏斯一个叫帕拉波塔米欧伊的卫城。这座城是战略要地，位于两军的南部。但苏拉的士兵已经厌倦了乏味的土木工作，渴望痛痛快快打一仗。于是他们越过赛菲索斯河，抢占了这个地方，然后越过阿苏斯，占领了伊迪利乌姆山下的地方，在阿基劳斯军队的对面安营扎寨。此时的阿基劳斯也率军越过阿苏斯，在一个更接近可派湖的地方——阿西亚扎营。

阿基劳斯在阿西亚试图抢占喀罗尼亚，但苏拉再一次抢在了他前面，派了一个军团驻守在那里。然而，阿基劳斯抢占了喀罗尼亚南部的图日乌姆山。于是苏拉调来赛菲索斯河对岸其余的军队，与喀罗尼亚的军队会合，将敌人赶出了图日乌姆山。他命穆雷纳留在赛菲索斯河北岸牵制阿西亚的敌人。与此同时，阿基劳斯也在苏拉之后率主力部队渡过赛菲索斯河。穆雷纳紧随其后，与苏拉两人分别率骑兵牵制住阿基劳斯部队的左右两翼，苏拉在右，穆雷纳在左。此时双方军队南北相对，苏拉的军队在南部，阿基劳斯的军队在北部，再往北是赛菲索斯河。

苏拉派了一支小分队绕过图日乌姆山，前往喀罗尼亚后面的小山上，因为那里是敌军的后方。敌军在惊慌失措中从图日乌姆山跑下来，遭遇了穆雷纳率领的左翼军队，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逃回了阿基劳斯军队的中线，军队一片混乱。右翼的苏拉迅速出击，防止敌人出动刀轮战车，因为只要敌人出动刀轮战车，整个罗马军队就会失去战斗力。刀轮战车缓慢前行，所到之处车马皆毁。这时阿基劳斯试图拉长右翼军队包围苏拉。但苏拉早有防备，他让霍尔登修率领部分军队驻扎在左翼军队左边的小山上，伺机行动，攻打敌军左翼。阿基劳斯派了一些步兵击退了霍尔登修，差点将他包围。苏拉匆忙赶来增援。阿基劳斯看到苏拉率军前来，立即掉头袭击了他的右翼，塔克西勒也趁机进攻左翼的穆雷纳军队。苏拉立即回头，让霍尔登修去支援穆雷纳。苏拉出现后，右翼军队将阿基劳斯逼到赛菲索斯河边，同时左翼的穆雷纳也大获全胜，敌军仓惶逃往赛菲索斯河，其中只有一万人逃到了优比亚岛的哈尔基斯。据阿庇安的记载，罗马军只损失了十三人。普鲁塔克的记载以苏拉的回忆录为参考，称只损失了四人。但这一数据很可能是苏拉为了证明自己是天之骄子，在回忆录中杜撰的，这也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雅典城遗址，绘于19世纪



雅典卫城复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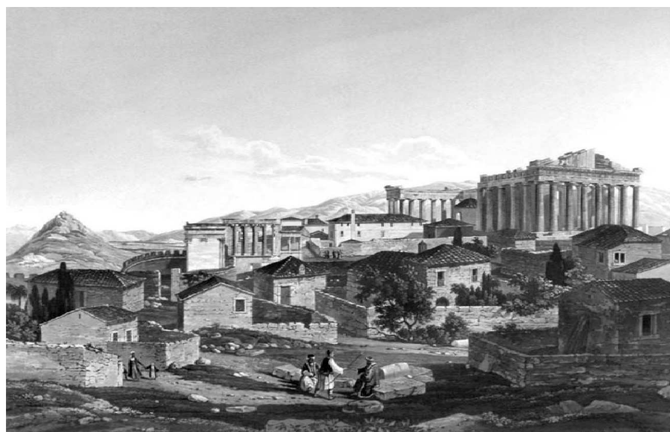
米特拉达梯六世听到阿基劳斯惨败的消息后，立即派多里劳斯率领八千人赶往优比亚岛与阿基劳斯剩余的军队会合。苏拉在弗西奥蒂斯打算对抗前来取代他的卢修斯·弗莱克斯，但听说多里劳斯已经到来，他立即赶回奥科美那斯河边迎战敌军。奥科美那斯河在赛菲索斯河北面汇入可派湖，它的北面还有一条叫梅拉斯的溪流，在赛菲索斯河口附近与其交汇，附近有一片沼泽地。

阿基劳斯建议按兵不动，但多里劳斯奉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旨意，急于复仇，结果在提尔弗斯山附近、可派湖南边的一次小规模战

斗中被苏拉击败。于是多里劳斯开始认真考虑阿基劳斯关于持久战的建议。接下来的战役中，阿基劳斯仍是军队的主帅，老谋深算的米特拉达梯六世对这位部将的能力十分了解。阿基劳斯将军队分成四排，刀轮战车在最前面，第二排是马其顿方阵，第三排是辅助兵，其中有意大利的降兵，最后是轻兵器部队。他还在军队两侧部署了骑兵。苏拉的骑兵较弱，因此他命人在营地两侧挖了沟渠，设了堡垒，用来阻挡对方的骑兵。随后他又将步兵排成三排，中间留下空间方便轻兵器兵种和骑兵在需要时来去自如。他给第二排的士兵分发了木桩，士兵接到命令后将木桩插在地上围成了栅栏。当敌军出动刀轮战车时，第一排士兵退到方阵后面，轻兵器兵种通过预留空间上前，向敌人的车马投掷石块。刀轮战车一出动，苏拉的方阵就陷入了混乱。阿基劳斯派出骑兵，苏拉绕过骑兵袭击了他的后方部队。这场战役一时难分胜负，罗马军人心惶惶，但苏拉忽然拿起一面战旗，冲向敌军，高喊："如果罗马有人问起，你们在什么地方背弃了你们的将领，告诉他们，是在奥科美那斯河畔！"苏拉的话让士兵们无地自容，于是他们重振士气，最后大获全胜。苏拉在这次战役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将才，同时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的结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86年，具体日期不详。

战役结束后，苏拉在塞萨利过冬。他不愿再等卢库勒斯借船归来，于是就地组建了一支舰队。苏拉在代立昂遇见了阿基劳斯，两人都劝对方放弃自己的立场，阿基劳斯承诺如果苏拉愿意投诚，米特拉达梯六世将帮助他对抗科尼利厄斯·秦纳。苏拉劝阿基劳斯推翻米特拉达梯六世。他们用一种奇特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尊重和欣赏。但苏拉不屑于得到亚洲的帮助，另外，忠于米特拉达梯六世的阿基劳斯也根本不想听这类建议。但后来阿基劳斯生病时，苏拉关怀备至，不仅将优比亚岛的土地赠给他，还称他是"罗马人民的朋友"。有人猜测阿基劳斯其实一直在占苏拉的便宜，但这不太可能，因为苏拉正在与米特拉达梯六世签订协议，并准备去见罗马派来的费穆布里亚，所以此时他想与阿基劳斯保持朋友关系很正常。最后苏拉决定忘掉亚洲的

大屠杀，不将米特拉达梯六世逼入绝境。苏拉提出的条件是米特拉达梯六世必须交出卡帕多西亚、帕夫拉果尼亚、比提尼亚、亚洲省和岛屿、八十艘战船以及所有俘虏和逃兵，并向他的士兵提供金钱和物资，同时提供三千塔兰特[2]的战争赔款，为马其顿难民和他从希俄斯掳走的人（下文会讲到这件事）重建家园，为罗德岛等罗马的盟国提供更多船只。接受这些条件后，米特拉达梯六世可以得到罗马的原谅，再次成为罗马的盟友。上述条款令米特拉达梯六世非常恼怒，但这一系列条款充分显示出苏拉的智慧与谋略。处在两面都是悬崖的险境中，苏拉依然可以稳操胜券。罗马没有因为他未实现战争的初衷，即为尼科梅德二世和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复辟而起诉他，最终米特拉达梯六世听从了阿基劳斯的建议接受了他的条件。起初，米特拉达梯六世拒绝了苏拉的条件，苏拉挺进亚洲，在马其顿边境劫掠了一些野蛮部落，随后又恢复了该省的秩序。米特拉达梯六世并没有犹豫太久，因为他自己也身处困境。小亚细亚的居民很快发现屈从这位本都国王实际上是出了狼窝又进了虎口。米特拉达梯六世害怕阿基劳斯在喀罗尼亚的失利会引起叛乱，因此他将能抓到的加拉太首领全都抓起来，将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儿一起杀死。结果，幸免于难的首领们驱逐了他派来的总督。他对希俄斯人也有类似的猜忌，于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让首领们将孩子交给他做人质。另外，他还向他们征收两千塔兰特货币。这些首领筹不到这么一大笔钱，或者他们的统治者谎称财政亏空，于是希俄斯公民被装上船，运往黑海东岸的一个殖民岛。米特拉达梯六世的特使对希俄斯人做出这些事后，被派到了以弗所。他企图故伎重演，但以弗所人早有防范，他们杀了特使，揭竿而起。特拉雷斯、海帕、大都、萨迪斯、士麦那以及其他城市纷纷响应。为了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统治，米特拉达梯六世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譬如免去债务人的债款、授予外国人公民权等，并承诺将自由还给奴隶。显然，这些措施都是他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采取的。有人企图暗杀米特拉达梯六世，结果计划败露，国王在盛怒下派出一个专案小组搜集口供。任何人只要被告发就会被立即处死，据说最后被处死的达一千六百人。



塞萨利地区一处遗址

这些事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86年到公元前85年。此时卢修斯·弗莱克斯正从亚得里亚海取道马其顿和色雷斯直奔亚洲。之前他因为与他的副官费穆布里亚发生争吵，罢免了对方。卢修斯·弗莱克斯从拜占庭前往卡尔西顿时，费穆布里亚煽动原本就对卢修斯·弗莱克斯不满的士兵发动了叛乱。卢修斯·弗莱克斯匆忙赶回来，但了解情况后，他逃到了卡尔西顿，从那里前往尼科米底亚。费穆布里亚在尼科米底亚发现卢修斯·弗莱克斯躲在一口井里，于是杀了他，将他的头丢到海里。紧接着，费穆布里亚对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儿子发动了袭击，在林达库斯河边击败了对方，并一路追击米特拉达梯六世到了帕加马和皮特恩，差一点追上他。最后，米特拉达梯六世渡海逃往米提林尼，费穆布里亚因为没有船只，只能放弃追击。另外一件事也令费穆布里亚十分恼怒。我们前面提到苏拉派卢库勒斯前往埃及借船，但没有借到，后来他从叙利亚和罗德岛借到了船，并煽动科斯人和尼多斯人起义，将本都的党羽赶出了希俄斯和克勒芬。米特拉达梯六世到达皮特恩时，卢库勒斯就在附近，但费穆布里亚向他求助时他却充耳不闻。打败米特拉达梯六世的舰队将领涅俄普托勒摩斯后，卢库勒斯在色雷斯的切索尼与苏拉会面，随后他将苏拉送到特洛德的达耳达诺斯与米特拉达梯六世见面。双方都害怕对方与费穆布里亚达成协议，因此虽然苏拉手下的士兵背负着大屠杀的血海深仇，一直渴望与本都军决一死

战，报仇雪恨，但苏拉还是不顾他们的反对与米特拉达梯六世达成了交易。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苏拉用钱平息了士兵们的怨言。在亚洲是苏拉说了算，就像在罗马是士兵们说了算一样。紧接着，苏拉率军前去对抗费穆布里亚。当时费穆布里亚在吕底亚的比提尼亚，他手下的士兵看到苏拉要求自己的主帅交出军权，于是开始动摇了。费穆布里亚企图强迫他们效忠自己，并杀了第一个拒绝服从他的士兵。随后，他派一个奴隶去暗杀苏拉，但很快败露。苏拉的士兵怒不可遏。最后，苏拉承诺不会杀他，但费穆布里亚已不相信苏拉的话，于是自杀了。他去世后，苏拉将双方军队合二为一，继续处理亚洲的事务。一直效忠罗马或支持罗马的城市得到了重赏；所有不愿回到主人身边的奴隶惨遭杀戮；抵抗罗马军的城市也受到了惩罚，它们的城墙被毁；大屠杀的主谋被处死；纳税人被迫一次性缴纳过去五年的欠款，以及两万塔兰特的罚金，欠款和罚金由卢库勒斯负责收取。为了筹集钱款，被逼无奈的亚洲人不得不将公共建筑抵押给意大利的放债人。苏拉拿到钱后刚离开，深受米特拉达梯六世压迫的海盗们就出现了，他们像一群前来争抢老鹰残留食物的鹫，洗劫了已经被榨干的亚洲人。

注解

[1] 伊比鸠鲁是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

[2] 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七十三万两千英镑。——原注

第13章　苏拉在意大利

精彩看点

苏拉登陆布鲁迪辛乌姆，拥护者蜂拥而来——蒂法塔山战役——塞多留前往西班牙——公元前83年苏拉控制了皮西努姆、阿普利阿和坎帕尼亚——萨克里波图之战——苏拉将小马略围困在普雷尼斯特城——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与梅特路斯·皮乌斯之间悬而未决的皮西努姆之战——屡次援助普雷尼斯特城未果——帕皮里乌斯·卡尔博逃往非洲——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副官危及都城——苏拉前来解围——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的垂死一搏——科林门战役——苏拉告急——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和卢修斯·多米蒂乌斯之死——格涅乌斯·庞培在西西里和非洲的功绩——虚荣的格涅乌斯·庞培——穆雷纳挑起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塞多留在西班牙——塞多留的成功和在当地的权势

公元前84年，苏拉命穆雷纳率领费穆布里亚的军队留在亚洲，自己带着踌躇满志的士兵扛着沉重的财物踏上了归程。军队从以弗所启航，三天后到达了比雷埃夫斯港。苏拉在那里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自己战胜费穆布里亚的过程，但对自己的罪行只字未提。他曾经在罗马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的家园被毁、朋友被谋杀、妻儿被迫亡命天涯，如今他回来了，并且有能力惩治曾经的敌人和那些曾给予他不公正待遇的人。至于其他人，包括新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他都不予追究。除了上一章叙述的事件外，我们对罗马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知道的并不多。当执政官科尼利厄斯·秦纳和帕

皮里乌斯·卡尔博[1]收到信时，他们立即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但元老院的许多议员却感到不寒而栗，他们让两位执政官暂时出去避避风头，同时派了一位使者去与苏拉协商，询问对方是否需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有什么需求。使者刚走，科尼利厄斯·秦纳和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就宣布自己连任公元前83年的执政官，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特地回罗马参加竞选。不久，科尼利厄斯·秦纳在安科纳的兵变中去世。保民官们不断地给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施压，逼迫他回来以规定方式参加竞选。结果，当选执政官的是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和盖约·诺巴纳斯。

与此同时，前来希腊面见苏拉的使者也得到了答复。苏拉称即使罗马人民做出了选择，自己也永远不会与敌人和解，至于安全方面，他有一支忠实的军队保护自己，同时他还愿意保护元老院和追随者们的安全。他派了几个朋友和使者一起回到罗马，代表自己向元老院传递信息。随后，他率军在比雷埃夫斯港登船，下令让船绕过海岸到亚该亚的帕特雷，然后从那里前往布鲁迪辛乌姆的对岸。由于痛风发作，苏拉前往优比亚岛尝试用伊迪帕索斯泉水治疗自己的疾病。普鲁塔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优比亚岛的小故事：苏拉有一天在岸边散步，几个渔民给他带来了几条新鲜的鱼，他非常高兴。但当渔民们告诉他自己是海拉[2]的居民时，他阴冷地说："什么？居然还有海拉人活着！"不过他让渔民们放心，因为这些鱼，他打算放过他们。紧接着，他从优比亚岛越过大陆与军队会合。他率领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根据他的自述，当时意大利敌对党的军队有二十多万人。但他纵容军队的反叛、恶行，以及违反军规的行为，率领他们多次取得胜利。他一直没有摘下温和的面具，然而面具后面是一副有仇必报的冷酷面孔。在士兵眼里，他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他们的英雄和希望，他们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奖赏，他们也会主动给他钱，发誓不会惊扰市民和破坏国家。苏拉没有要士兵们的钱，实际上他根本不缺钱，但当他开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开展自己的计划时，这样的忠心使他如虎添翼。

公元前83年，苏拉从底耳哈琴乘船到了布鲁迪辛乌姆，他在那儿受到了热烈欢迎。苏拉的名字在意大利人中绝不是英雄的代名词，因此他极力避免激化自己与意大利人之间的矛盾，并郑重宣誓自己将尊重他们最近获得的权利。拥护者很快蜂拥而来。马库斯·格拉索斯从非洲赶来，准备出兵马尔西。他请求苏拉派兵护送他，因为他将经过被敌人占领的地区。苏拉激动地说："没问题，你的父亲、兄弟、亲人和朋友都死在那些暴徒手中，这些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也是我现在的征讨对象。"梅特路斯·皮乌斯之前在非洲一直与盖乌斯·马略的军队对抗，后来他逃往利古里亚，从那里赶来见苏拉。昆图斯·卢克莱修·欧费洛也来了，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知道有人在困难时欣然接受他人的帮助，之后却会忘得一干二净。最受欢迎的人是格涅乌斯·庞培[3]，他之所以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活力和声望，还因为他不是空手而来。他之前为科尼利厄斯·秦纳效力，却不被信任，甚至受到排挤。科尼利厄斯·秦纳勒令他交出他的父亲在攻下奥克西穆姆后非法占有的战利品。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为格涅乌斯·庞培辩护，最后宣告格涅乌斯·庞培无罪。但苏拉在意大利占了上风，随后前往他在皮西努姆的一处庄园，将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拥护者逐出了奥克西穆姆，然后利用他已故父亲的影响力召集了三支军备精良且军需充足的军队。罗马派三位军官率领三支军队前去围剿格涅乌斯·庞培，但这三位军官发生了争吵。据说格涅乌斯·庞培亲手杀死了对方最强壮的骑兵，击败了其中的一支军队，最后在阿普利阿的某个地方与苏拉会师。看到这支军队得胜而归，苏拉眼前一亮。格涅乌斯·庞培称苏拉"大将军"，苏拉以相同的称呼回敬他。苏拉也许只是在利用对方的虚荣心，因为年轻的格涅乌斯·庞培智勇双全、英俊潇洒，是士兵和女人们眼中的万人迷，已经习惯别人的奉承，而苏拉的行事风格也是从来不吝称赞他人。随后，马库斯·德鲁苏斯的死对头菲利普也投靠了苏拉，这个人是另一个马库斯·斯考卢斯，他奸诈狡猾，却总能骗取他人的信任。西第古斯也来投靠苏拉，他曾是苏拉的对手，但现在只要是对自己有用的人，精明的苏拉都不会将他们拒之门外。还有帕皮里乌斯·嘉宝的前财务官盖约·韦雷斯，他曾借工作之便侵吞公款，使自己的职业

生涯一开始就背上了背叛和盗窃的双重恶名。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



古罗马时期的货币，上面的人物头像为格涅乌斯·庞培

苏拉继续向北行军，经过阿普利阿时，他禁止部下打扰当地居民，借此拉拢人心。他打算寻找机会对付萨姆尼特人，但现在还不是激怒他们的时候。他还向执政官盖约·诺巴纳斯发出和平提议，这一提议无疑与禁止掠夺当地居民的规定一样虚伪。根据阿庇安的描述，苏拉和执政官盖约·诺巴纳斯在奥菲杜斯河畔的坎努西姆会面，但这一点很可能并不真实。苏拉与盖约·诺巴纳斯的第一次战役爆发在卡普阿附近亚平宁山脉的蒂法塔山上。盖约·诺巴纳斯逮捕了苏拉派去的特使，激怒了对方。苏拉率军势不可挡地冲下蒂法塔山，杀死了六千敌军，自己仅损失了七十人。盖约·诺巴纳斯逃往卡普阿。战役结束后，苏拉越过沃尔图努斯河，踏上阿庇安大道，在代诺遇到了另一位执政官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两人展开谈判。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派塞多留

前往卡普阿，与滞留在此地的盖约·诺巴纳斯商讨对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塞多留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希望能够通过更有效的方式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于是他占领了苏萨，切断了苏拉通往大海的捷径。因为苏拉是海上霸主，所以他对此叫苦不迭，但他一直在贿赂对方的军队，尽管塞多留已经警告过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当西庇阿·阿西阿提库斯遣返苏拉送来的人质时，士兵们已经人心惶惶。当苏拉应邀到达代诺附近时，士兵们直接集体投靠了他。听到这条消息后，帕皮里乌斯·卡尔博说：“与苏拉争斗如同同时与一只狮子和一只狐狸争斗，狐狸远比狮子可怕。”

值得注意的是，苏拉利用故意伪装出来的温和，一步步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但他表面上的温和毕竟只是暂时的，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施展各种诡计，编造各种谎言。公元前88年，他用欺诈手段进军罗马；科林门战役后，他卑鄙地欺骗了萨姆尼特人；他还在回忆录中编造各种谎言，称喀罗尼亚战役中自己仅损失了四名士兵，在萨克里波图他仅损失了二十三名士兵，但却杀死了二十万敌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命运女神的宠儿，用各种荒唐的故事大肆渲染自己对命运女神的感激之情。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谎言，在人们心中，过于自负是一个英雄的缺点。另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是，他的事业从一开始就因为各种背叛获益，敌人的背叛是他成功的基石。萨克里波图的五个队列放下武器，投奔了苏拉；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五个队列背叛了他，投奔了梅特路斯·皮乌斯；伊顿鲁里亚的二百七十名骑兵也背叛了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投奔了苏拉。另外，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派往普雷尼斯特的整整一个军团的援军也加入了格涅乌斯·庞培的阵营。法恩扎战役[4]中有六千人倒戈，之后一支卢卡尼亚军团也效仿这些人投靠了苏拉。那不勒斯和纳尔波也是由于叛徒失陷的，在变节的将士中甚至还包括军队的统帅。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听说有谁背弃了苏拉，因此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大悬念。



奥菲杜斯河沿岸风景，绘于19世纪

塞多留在代诺获胜后被执政官派往西班牙，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尖锐地批评了执政官的无能，或者是执政官打算将西班牙作为撤退的根据地。与此同时，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匆忙赶回罗马，煽动元老院将所有亲近苏拉的议员判为有罪。这是一步自取灭亡的险棋，与苏拉伪善的面具形成了致命的反差。议事大厅和里面的西卜林神谕集在此时被烧毁了。有些人认为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放的火，但很难推测他这样做的目的。苏拉对失去西卜林神谕集感到非常惋惜。这件事标志着第一年内战的结束。苏拉成了皮西努姆、阿普利阿和坎帕尼亚的主人，解决了两个执政官并降服了他们的军队。此外，他对意大利人采取了安抚政策，发誓保护他们的权利，因此获得了一些刚刚得到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城市的支持。

第二年，即公元前82年的执政官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和小马略。人们怀疑小马略派往非洲的总督打算蓄奴并在行省实行专制，于是罗马商人发动了暴动，将这位总督烧死在家中。叛徒菲利普在撒丁岛打败了小马略的裁判官，保证了苏拉在岛上的粮食供给。苏拉在春天攻下了沃尔西山西面的要塞塞泽。当时小马略正好在塞泽附近，他撤退到沃尔西山东部的萨克里波图。苏拉尾随其后，他的目标是杀回罗马。战争在萨克里波图爆发，小马略的左翼军队遭到惨败，五个队列以及两个连的骑兵投降了苏拉，其余军队在屠刀下四处逃散。苏拉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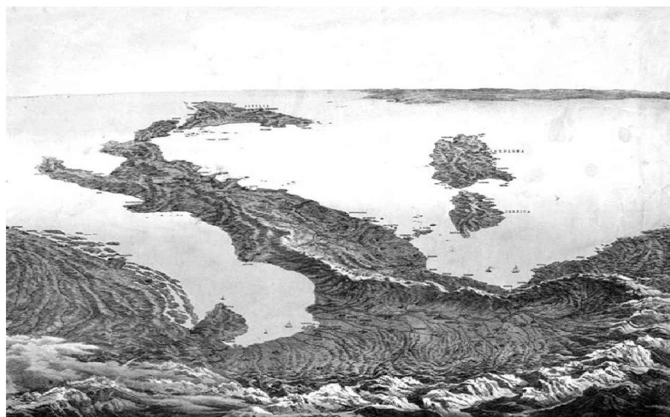
步紧逼，下令关闭普雷尼斯特城门以防小马略和剩下的士兵逃入城内。走投无路的小马略就像当年比雷埃夫斯城外的阿基劳斯，命人用绳索将自己吊上了城墙。这次战役中苏拉俘虏了八千萨姆尼特人。他已经稳操胜券，通向罗马的路也畅通无阻，于是终于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将所有俘虏悉数斩杀。类似的惨剧也在罗马上演。小马略被困在普雷尼斯特城之前，下令屠杀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议员们在元老院内集合，仿佛正在等候分派公务。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表兄弟、格涅乌斯·庞培的岳父等都被杀。格涅乌斯·庞培的岳母得到消息后自杀身亡。历史上第一位法学家、曾尝试将罗马的法律系统化的大主教昆图斯·穆齐·斯凯沃拉逃往火灶神维斯塔神庙，却在那儿遇害。这些人的尸体被抛入台伯河。想到敌人对即将到来的毁灭惶恐不安，小马略竟然有一种残忍的满足感。苏拉派昆图斯·欧费洛继续封锁普雷尼斯特，自己匆忙赶回罗马，但敌人早已闻风而逃，于是他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向人民保证将尽快重建国家。然而，他没有时间继续待在罗马，因为北方正在告急。



小马略头像

北方的形势对苏拉来说很不利，因为刚得到罗马公民权的几个城市是小马略忠实的拥护者。梅特路斯·皮乌斯在皮西努姆的边境河埃西斯河与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一个副官凯瑞那滋展开了一场恶战，最后艰难地打败了对方，占领了毗邻的国家。于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派一支精锐部队前去迎战梅特路斯·皮乌斯，将梅特路斯·皮乌斯逼得一筹莫展。直到萨克里波图战役的消息传来，他才撤到阿里米努姆。梅特路斯·皮乌斯的军队终于恢复了通信并从波河富裕的河谷获得了补给。随后，梅特路斯·皮乌斯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亲自率军打败了帕皮里乌

斯·卡尔博的一个师，迫使其中的五个队列临阵倒戈。他的副官格涅乌斯·庞培在塞纳打败了肯索里努斯并洗劫了这座城市。据说格涅乌斯·庞培还越过波河占领了米兰，他的部下血洗了当地的元老院。与此同时，梅特路斯·皮乌斯率部沿阿里米努斯北部大海东岸航行，切断了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与波河河谷的通信。于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被迫离开阿里米努姆，来到了伊特鲁里亚，在克鲁休姆附近遭遇刚从罗马赶来的苏拉。在克莱因斯河附近的一次骑兵战役中，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二百七十名骑兵投降苏拉，剩下的都被他杀死了。苏拉在阿尔贝纳河畔的萨图尼亚再次得胜而归。但在克鲁休姆附近的一场会战中，苏拉的军队遇到了麻烦，双方经过一整天的激战依旧难分胜负。此时的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已经陷入绝境。凯瑞那滋在斯波莱托附近被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库斯·格拉索斯击败，撤退到城内。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派了一支小分队前去支援，遭到了苏拉的伏击，全军覆没。屋漏偏逢连夜雨，南部也传来了噩耗，被困在普雷尼斯特城内的小马略已经弹尽粮绝。帕皮里乌斯·卡尔博派出八个兵团支援小马略，却遭到格涅乌斯·庞培的伏击并被击溃。为首的军官被包围，撤退到一座小山上，之后他用金蝉脱壳的计策将灯火留在山上，连夜逃走了。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军队发生了叛乱，一个兵团逃到了阿里米努姆，还有许多士兵逃回了家，最后回到他身边的仅有七个队列。第二次援救行动来自南方。同盟者战争中同盟军的将领卢卡尼亚的拉姆波尼乌斯和塞尼阿姆的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率领七万人进入拉丁姆地区。苏拉立即退出伊特鲁里亚，占领了敌人通往普雷尼斯特城的一个必经峡谷。拉丁大道在阿纳尼附近分岔，一条岔路直接通往罗马，另一条绕道通过普雷尼斯特城，苏拉在这里的一个据点布下防线。因此，南部援军无法突破苏拉的防线，小马略也无法冲出昆图斯·欧费洛的包围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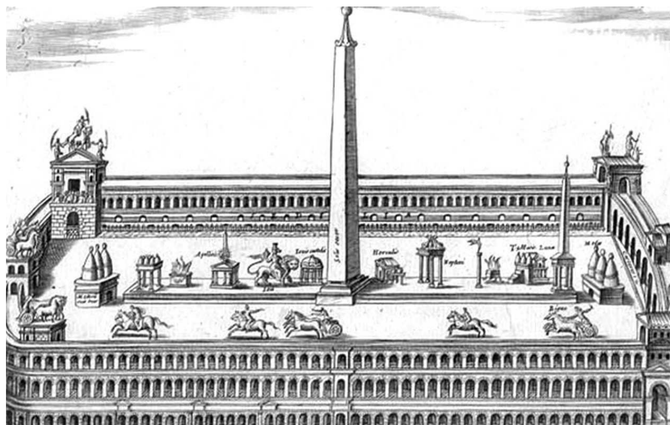
意大利及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绘于19世纪

苏拉的离开给了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和盖约·诺巴纳斯喘息的机会，他们翻过亚平宁山脉，将目标对准梅特路斯·皮乌斯，但最后因为自己的轻率功亏一篑。士兵们经过一天长途跋涉，到达梅特路斯·皮乌斯所在的法恩扎时已疲惫不堪。为了突袭毫无防备的敌军，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和盖约·诺巴纳斯强令士兵在夜晚发动进攻，结果刚刚经历了鞍马劳顿的士兵们遭遇惨败——一万士兵被杀，六千士兵投降或倒戈，其余士兵四下逃散，最后只剩一千人有序退回了阿雷提乌姆。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支卢卡尼亚军团原本打算加入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部队，但得知战役结果后改变了主意，打算投靠梅特路斯·皮乌斯。为首的指挥官派人向苏拉表明了归降的意图，苏拉回复说他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换取谅解。这位指挥官欣然同意，他设了一个“鸿门宴”邀请盖约·诺巴纳斯和军官们前来赴宴，然后杀死了所有前来赴宴的人。盖约·诺巴纳斯拒绝了邀请，逃往罗德岛。苏拉派人威胁罗德岛的居民，要求他们交出盖约·诺巴纳斯。盖约·诺巴纳斯被迫自杀。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在克鲁休姆还有三万兵力，试图第三次支援普雷尼斯特城。他派达玛西普率领两个军团试图与南部的萨姆尼特人南北呼应，但遭到了苏拉的破坏。与此同时，菲登扎传来噩耗，马库斯·卢库勒斯打败了他的一名副官，另外，对方还占领了图德尔并大肆劫掠。面对这些噩耗，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终于失去了信心，逃往非洲。根据普鲁塔克的

记载，面对比自己多三倍的敌人，马库斯·卢库勒斯在战与不战之间踌躇不决，这时，一阵微风拂过，吹落的鲜花飘落在将士们的盔甲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花环，因此将士们士气大振，轻松击败了敌人。帕皮里乌斯·卡尔博逃离后，他的部队在克鲁休姆附近被格涅乌斯·庞培击败，剩下的人在凯瑞那滋和肯索里努斯的率领下与达玛西普会师，随后占领了距罗马十二英里的阿尔本内的一块区域，直接对首都构成了威胁。苏拉之前封锁了通往普雷尼斯特城和罗马的交通要道，在这种形势下他不得不解散营地，派出骑兵骚扰敌人，然后又调集全部兵力防止罗马落入敌人之手。我们无法解释凯瑞那滋南下后为什么没有立即攻打罗马，也许解救普雷尼斯特城才是当务之急，因此他希望先救出小马略，然后攻打苏拉，再打败格涅乌斯·庞培，最后拿下罗马。如果他的计划确实是这样，那么最后他可能是被萨姆尼特人的狂躁冲动弄乱了阵脚。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为了反对凯瑞那滋的计划，一看到苏拉的军队被削弱，就集合了凯瑞那滋的军队，连夜沿拉丁大道进军罗马。黎明时分，军队距罗马只有数英里。苏拉立即紧随其后，但他走的是路程较长的普莱涅斯汀大道，到达罗马时已是中午时分，战斗早已开始，罗马的骑兵在城墙下被击败。

这一天是公元前82年11月1日。将近日暮，苏拉的军队已是人困马乏，但他不得不战，或者决意一战。他命士兵们匆匆吃了点东西，然后在科林门前布下阵来。罗马共和国内战史上，最后也是最残酷的战斗拉开了帷幕。战斗刚开始，苏拉的左翼军队就被击退到城墙边，有士兵逃到普雷尼斯特城给昆图斯·欧费洛带去了苏拉兵败的消息。苏拉差点丧命，他骑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上激励将士们，没有注意到两杆标枪同时向他飞来，但他的马车夫及时发现了危险，用马鞭猛抽马匹。吃痛的马儿向前奔跑，标枪擦过马尾，苏拉躲过一劫。苏拉胸前别着一枚从特尔斐带回来的金色阿波罗像，他激动地亲吻着这枚金像，大声地祈求太阳神保佑他死里逃生回到家后不要屈辱地落入同胞之手。但不管是勇气还是迷信，在面对萨姆尼特人气势汹汹的进攻时，都显得苍白无力。苏拉一生中第一次被打败，夜里可能退回罗

马，也可能继续在城墙边上绝望地挣扎。然而右翼的马库斯·格拉索斯却取得了胜利，一路追击敌人到了安登奈。他在那里停下来派人向苏拉索取食物。听到同伴的好消息后，苏拉立刻与对方会师。打败苏拉的敌军也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撤退并加入了安登奈的队伍。不管怎样，敌军已经是穷途末路。虽然三千人缴械投降，但苏拉从不是一个轻易宽恕别人的人，尽管他经常为了某个不明确的目的摆出一副仁慈的面孔。他发誓称如果降军愿意倒戈并对抗自己的战友，就可以获得他的宽恕。降兵们照他的话做了，但苏拉将他们和其他四五千名俘虏一起带回了罗马，在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集体屠杀了他们。当时苏拉正在贝罗娜神庙对议员们滔滔不绝地演说，外面传来那些可怜的俘虏的哀号声，令人们惊恐不已。但他却让议员们注意听自己的演说，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是那些不值得同情的恶人发出的噪声，他也只不过下令将他们惩戒一番而已。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的鲁莽行为使罗马陷入高卢入侵后最危险的处境中，最终功败垂成。苏拉获胜了，他终于可以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恨，竞技场上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系列暴行的开始。四大将领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凯瑞那滋、达玛西普和肯索里努斯均被斩首。据说罗马军将这四颗人头挂在杆子上，吊在普雷尼斯特城墙外，困在城内的将士们以这种方式获悉了援兵的下场，正如当年汉尼拔知道他的兄弟哈兹鲁勒遇害时的景象。困在城内的军队此时已饿得奄奄一息，无法继续抵抗，援兵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绝望的小马略和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的一个弟弟在投降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昆图斯·欧费洛将小马略的人头送给苏拉，苏拉将其挂在演讲台前，并引用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托芬的一句名言无情地嘲笑道：“在试图掌舵前，得先学会划桨。”随后他前往普雷尼斯特城，命所有居民出城缴械投降。普雷尼斯特城的罗马议员已经被昆图斯·欧费洛杀光了，剩下的居民中有萨姆尼特人、罗马人和普雷尼斯特人。罗马人、妇女和儿童都得到了幸免，其余的一万两千人被杀，整个城市遭到疯狂洗劫。



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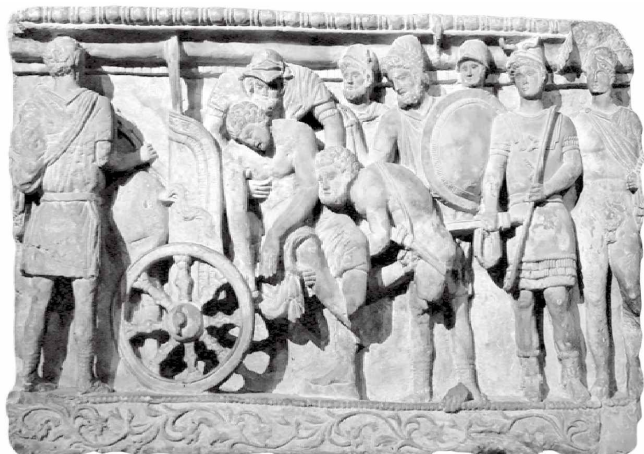
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诺尔巴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抗。由于被叛徒出卖，诺尔巴在夜深人静时落入敌手，市民们通过自刎、上吊、相互杀戮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甚至将自己关在家里，放火烧了房屋。一阵风刮过，整座城市被熊熊烈火吞噬。因此诺尔巴既没有被掠夺，也没有上演被屠杀的惨剧。诺拉两年后才被攻下，在第八章的末尾我们已经看到诺拉投降后帕皮乌斯·穆提卢斯的下场。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萨姆尼特人的最后一个首都艾森尼亚被攻陷，苏拉大开杀戒，发誓要将萨姆尼特人从世界上彻底抹去。伊特鲁里亚的波普洛尼亚坚持了很长时间，沃拉特里是最后一个投降的城市。公元前79年，卫戍部队投降，条件是保全他们的性命。但围攻的士兵大叫一声“叛徒”，用石块砸向他们的将领，来自罗马的骑兵队将整个卫戍部队碾为齑粉。

行省中还有许多事务需要处理。格涅乌斯·庞培被派往西西里。他到达西西里后，马略派的珀珀那随即离开。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从非洲前往科素拉，在科素拉被捕并被带到了格涅乌斯·庞培面前。格涅乌斯·庞培审判了这个曾经支持过自己的人，将他的人头送给了苏拉。据说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在临死前将自己懦弱的性格暴露无疑，竟然请求对方暂缓执刑。不管这个传闻是否真实，历史上的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一

直是一个自私、无能的人。但据说格涅乌斯·庞培在杀光他所有的同伴后，故意留着他的性命，以便在审判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格涅乌斯·庞培比起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也好不了多少。另一件事也表现了格涅乌斯·庞培为人不齿的一面，他为了迎娶苏拉的继女（为了嫁给格涅乌斯·庞培，她离开了原来的丈夫）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随后格涅乌斯·庞培从西西里前往非洲镇压卢修斯·多米蒂乌斯的武装叛乱。

迦太基发生的一件事反映出罗马军日益松懈的军纪。一个士兵发现了一些财宝，于是在军中激起了“寻宝热”，直到几天后士兵们确定再无财宝可寻，才恢复了平静。格涅乌斯·庞培竟然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嘲笑这些士兵。苏拉的治军方式已经显露出不好的一面，给意大利带来了不良影响。苏拉试图摆出一副仁慈的面孔和巧言令色的姿态换取“温厚”的好名声，结果导致其他人竞相效仿他。于是军纪被搅乱，国家濒临毁灭。

格涅乌斯·庞培发现卢修斯·多米蒂乌斯驻扎在一个溪谷后面，于是在一次暴风雨中他率军越过溪谷将敌人击溃。他的部下欢呼雀跃，称他“大将军”，但格涅乌斯·庞培回答说等他们拿下营地后再这样称呼他。敌人的营地很快被攻占，卢修斯·多米蒂乌斯被杀。格涅乌斯·庞培还攻陷了卢修斯·多米蒂乌斯的党羽占领的城市，击败并俘虏了驱逐努米底亚国王希耶姆普萨尔的马略派的篡权者。希耶姆普萨尔复位，他的政敌都被处死了。



出土于沃拉特里的一组古罗马士兵的浮雕

回到乌提卡时，格涅乌斯·庞培收到一条苏拉送来的命令，通知他就地解散军队，仅保留一支军团，等待继任者前去交接。格涅乌斯·庞培的部下们都拥戴他，拒绝服从命令。苏拉很快得到了格涅乌斯·庞培叛变的消息。对此，他说道：“许多人在年老时依然无法逃脱与年轻人斗争的命运。”格涅乌斯·庞培反驳道：“比起夕阳，更多人崇尚朝阳。”不久，苏拉得到的另一条消息让他松了一口气，消息称机智忠诚的格涅乌斯·庞培平息了士兵们的反叛。苏拉在必要时会虚伪地表现出自己的大度。看到格涅乌斯·庞培如此受欢迎，苏拉特地在他返回罗马时出城迎接，并称他“马格纳斯”[5]。虚荣的格涅乌斯·庞培要求为自己举行凯旋庆典。在过去长达四十天的战役中，他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但想要获得凯旋庆典这样的殊荣必须是裁判官级别。格涅乌斯·庞培既不是裁判官，也不是议员，仅是一名骑士。听到他的要求后，苏拉瞠目结舌，但还是轻蔑地说道：“让他去吧！给他想要的凯旋庆典！”

其他官员也在此时横生枝节。昆图斯·欧费洛违背苏拉的意愿参选执政官，带着一群朋友在广场上四处活动。苏拉不是一个会顾念部下旧日功劳的人。他不想发生街头暴动，于是派一个百夫长杀了昆图斯·欧费洛。人们将这个百夫长带到苏拉面前，要求审判百夫长，但苏拉

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个百夫长只是按照他的命令行事，然后阴冷地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个乡下人被虱子咬了两次，于是他脱掉衣服想抖掉上面的虱子，但虱子还是继续咬他，于是他干脆烧了衣服。因此那些已经被警告过两次的人最好不要第三次激怒他，以免引火上身。



格涅乌斯·庞培的凯旋仪式

另一个官员是穆雷纳，当时被留在了亚洲。除了苏拉留在亚洲的军团，穆雷纳还另外募集军队，强迫米利都和其他城镇提供舰队，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米特拉达梯战争。首先是哥齐人反叛，米特拉达梯六世怀疑自己的儿子为了控制哥齐人支持叛乱。因此他让自己的儿子进宫，用金锁链将他锁起来，不久后杀了他。阿基劳斯逃离了米特拉达梯六世，向穆雷纳通风报信说他的国王依旧控制着卡帕多西亚的一部分地区，并正在招募一支强大军队。阿基劳斯可能也受到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的威胁。穆雷纳进军卡帕多西亚，占领了科马纳并掠夺了它的神庙。米特拉达梯六世说他们之前达成了协议，但穆雷纳反问道：“协约在哪里？”因为他们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于是米特拉达梯六世派人前往元老院申诉。穆雷纳越过哈里斯河，带着大量战利品退到佛里几亚和加拉太。紧接着，他不顾元老院的禁令，再次发动了进攻。米特拉达梯六世派戈尔迪前去迎战，很快又御驾亲征，两次打败穆雷纳，将敌人赶到了佛里几亚。为庆祝胜利，米特拉达梯六世在一座高山上燃起篝火，据说一百多英里外的黑海水手都能看到火光。苏拉命穆雷纳不得再战。米特拉达梯六世与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和

解，并将卡帕多西亚纳入了他的领土范围内。为庆祝这一盛事，他再次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穆雷纳回到罗马，等待他的是凯旋庆典。苏拉也许宁愿将这一殊荣授予战败的穆雷纳，也不愿将它授予得胜的格涅乌斯·庞培。

我们发现马略派最有才能的将领塞多留在内战中几乎没有露面。他被派往西班牙期间，占领了比利牛斯山的关口。公元前81年，苏拉派安尼乌斯·卢斯科斯率军攻打塞多留。塞多留的一个副将防守严密，想要通过这个关口几乎不可能。然而这名副将却被自己的部下暗杀，军队也弃关逃走了。塞多留身边几乎没有几个人了，只好逃往新迦太基，随后前往毛里塔尼亚。他在毛里塔尼亚遭到野蛮人的袭击，不得不重新上船，回到西班牙。此时他遇到了一些西西里海盗，与他们联合攻下了伊维萨岛并赶走了罗马驻军。安尼乌斯·卢斯科斯立即前去支援，打败了塞多留。塞多留随后乘船从直布罗陀海峡逃往加德斯。在加德斯他从几个水手口中得知当地有两个岛屿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是西班牙人公认的幸运之岛。塞多留打算在这两个岛屿（很可能是马德拉岛）上定居，但他的西西里盟友航行到毛里塔尼亚帮助某个王子复辟，于是他也来到了毛里塔尼亚，加入了战斗的另一方。苏拉派人协助这位王子，但塞多留打败了他派来的将领，军队也临阵归降。重获军队的塞多留在路西塔尼亚人的邀请下来到西班牙。路西塔尼亚人打算武装反抗罗马。塞多留带着两千六百名罗马人和七百名非洲人越过大海，打败了沿途的罗马巡航舰队，随后以罗马的军队模式组织训练了路西塔尼亚军队。一个路西塔尼亚人送给塞多留一只白色小鹿，塞多留宣称这是狩猎女神戴安娜赐给他的礼物。此后，每当他获得秘密情报，都说是小鹿告诉他的，如果某个军官传来捷报，他会让小鹿戴着花环向众人宣告。此外，他还在军队中推行制服，制服颜色鲜艳，军事色彩浓厚。在他的整治下，路西塔尼亚军队军纪严明，将士们对他忠心耿耿。他率军打败了古达奎弗尔谷地的外西班牙的总督，还多次击败了苏拉派来的梅特路斯·皮乌斯。直到苏拉去世，塞多留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武装，并且控制了西班牙很大一部分地区。



塞多留与路西塔尼亚人，在塞多留脚边的是那只白色小鹿

注解

[1] 格拉古时期那个帕皮里乌斯·嘉宝的侄子。——原注

[2] 奥科美那斯河战役后被毁。——原注

[3] 已经去世的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的儿子。

[4] 帕皮里乌斯·嘉宝和盖约·诺巴纳斯与梅特路斯·皮乌斯之间的战斗，帕皮里乌斯·嘉宝和盖约·诺巴纳斯因为轻敌而大败。

[5] Magnus，在拉丁语中是伟大的意思。

第14章　苏拉的独裁统治及苏拉之死

精彩看点

苏拉的黑名单——苏拉和尤里乌斯·凯撒——康尼利——苏拉恐怖的性格——苏拉之死及声势浩大的葬礼

从亚洲归来的苏拉成了罗马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发表了长篇演说，滔滔不绝地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功绩。他告诉人们，只要顺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但同时表示他决不会饶恕自己的敌人，那些曾与他的敌人为伍的人将遭受惩罚。此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他不仅杀死了自己的敌人，还使自己的盟友变得人人自危。终于，年轻的贵族盖约·梅特路斯在元老院站出来问他：“苏拉，告诉我们，我们的灾难何时结束？我们不敢要求你饶恕那些你决意惩罚的人，但那些你想要拯救的人希望你给他们一个答案。”苏拉回答说他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盖约·梅特路斯接着说：“那么，至少让我们知道你打算消灭哪些人。”于是苏拉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有八十个名字。人们窃窃私语，议论这种做法的不合法性。可能是为了惩戒有非分之想的人，第二天他又列了一份有二百二十个人名的名单，过了一天又列了一份更长的名单。随后他站在讲坛上，告诉人们他已经列出了所有他能记起来的敌人的名单，暂时被遗忘的人日后再列。如果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人说出这种话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以苏拉冷酷残暴的性格，

说出这种话并不令人吃惊。他命人将马略的骨灰挖出，撒入纽河中——这是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苏拉的唯一不切实际的行为。任何窝藏或救了他通缉的罪犯的人，即使是他的父母、兄弟或儿子，都将遭到处决，但如果有人杀了通缉犯，即使是奴隶杀了主人或儿子杀了父亲，都可以获得两塔兰特的赏金。黑名单上所有人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并被没收了财产。不仅是罗马，所有意大利的城市都笼罩在恐怖中。城市里到处都贴着通缉令，在穷凶极恶的行刑者中流传着一句话："有人死在自己的豪宅内，有人死在自己的花园里，还有人死在自己的温水浴场里。"与其说这些人是为了复仇追捕犯人，不如说他们是为了财富。一天，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公民来到广场上，出于好奇看了看通缉令，然后吓得魂飞魄散。他喊道："天哪，这是我！阿尔巴尼的别墅害了我！"他没走多远，就被一个暴徒追上杀死了。大名鼎鼎的尤里乌斯·凯撒当时也受到了威胁，因为他拒绝了苏拉向他提出的离婚要求。苏拉没收了凯撒妻子的财产后，由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居然网开一面，保留了尤里乌斯·凯撒的财产。其间还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案子，西塞罗担任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律师。有两个名叫罗歇斯的人诱使苏拉最宠信的自由民克里索古努斯杀死了另一个叫罗歇斯的人，然后冒名霸占了死者的家产，驱逐了他的儿子。凶手怕事情败露后失去非法侵吞的财产，于是决定倒打一耙，指控死者的儿子杀死了父亲。整件事中最令人恼火的不是这个可怜的儿子遭受的冤屈，而是西塞罗对苏拉卑躬屈膝的谄媚。他将苏拉比作朱庇特，尽管博爱、仁慈，有时也会造成一些破坏，但那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因为他的影响力之大，如电照风行。另外，他还嘲讽认为苏拉可能自取其祸的说法。有句话说得好，"我们差点用手指打动了暴君。"后来，可能由于惧怕苏拉，西塞罗很快离开了罗马。

官方记录中通缉令上有四千七百个名字，这些人中不包括那些因私人原因被暗杀的人。根据一个作家的记载，有些城市被整个拍卖，譬如斯波莱托、普雷尼斯特、茵泰拉木纳和佛罗伦萨。毫无疑问，这些城市里的市民失去了土地、特权和公共建筑，甚至他们的私人住

宅。其他城市被剥夺了除经商权外的所有特权，譬如沃拉特里和阿雷提乌姆。



此图名为《宽大的凯撒》，右边第一位是尤里乌斯·凯撒



西塞罗的半身雕像

苏拉的朋友们参与了此类拍卖，赚了很大一笔钱。一个叫拉休斯的百夫长花了一千万塞斯特斯[1]买了一处庄园，而另外一个自由民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买到一处庄园。马库斯·格拉索斯、盖约·韦雷斯以及苏拉的妻子米提拉都通过这种肮脏交易堆金积玉。尽管拍卖价格大大低于庄园本身的价值，但最后卖出的总价居然高达三亿五千万塞斯特

斯。苏拉支持此类买卖，因为买主的利益与他本人的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即使他去世了，这些买主也会维护他的法令，进而在意大利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苏拉党。同时，他必须兑现对士兵们的承诺。他将意大利还未分配的公地和所有没收来还未卖出的土地分给士兵。通过这些举措，苏拉奖惩并行，一举两得。最后他总共分配了十二多万块土地，二十三个军团的士兵因此受益。苏拉似乎十分欣赏民主的殖民方案，因为从他的这些措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民主殖民方案貌似合理的模仿。他在意大利有一支坚决拥护他的新宪法的常备军。他在罗马授予了一万名奴隶公民权，这些奴隶的旧主已经惨遭杀害。他将他们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并给每个人赐姓康尼利。这支军队随时准备执行主人的命令。观其仆而知其主，最卑鄙的人其实是苏拉的党徒。

加蒂兰是这场恐怖运动中名声最坏的一个人。据说他不仅谋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还因苏拉将自己兄弟的名字纳入黑名单而酬谢苏拉。此外，据说他还做了一件在整个内战过程中最令人发指的事，对马库斯·马略施以酷刑。马库斯·马略是小马略的堂兄弟，他最后成了献祭给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的灵魂的牺牲品。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是第十章中盖乌斯·马略称“必须死”的那个人。可怜的马库斯·马略遭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他被打断四肢、割下鼻子、砍断双手、挖出眼睛，最后被砍下脑袋。西塞罗的弟弟这样描写当时的惨状：“加蒂兰提着马库斯·马略的人头，鲜血一直在向外涌……”但没有人关心西塞罗的弟弟对加蒂兰的描述，因为有两个证据证明加蒂兰在这件事中其实是无辜的。首先，请求苏拉将马库斯·马略处死的是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的儿子，街头巷尾的流言也许混淆了他和加蒂兰的名字。公元前64年，加蒂兰因为这一时期的谋杀案而受到审判，但最终被无罪释放。奇怪的是，人们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将骂名强加在加蒂兰身上，但对苏拉证据凿凿的滔天罪行却视而不见。

虽然苏拉做事向来我行我素，但当宪法形式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时，他也不反对使用它。因为小马略和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去世后，公

元前82年的执政官一职一直空缺，所以苏拉让元老院通过决议批准了他的法案。苏拉先暂时离开了罗马，让元老院根据需要选出一名临时执政官，然后写信给这位临时执政官，建议对方指定一位独裁官，任期没有具体限制，直到罗马世界恢复平静。讽刺的是，他无论何时都忘不了表现自己。他接着说自己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于是公元前82年11月，苏拉正式被授予终身专制权，不仅拥有处置公民生命和财产的权力、扩大或缩小边界的权力、修订意大利各城市和行省宪法的权力、任命地方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的权力以及立法权，还可以无限期地保留自己的专制权。他也可以废除执政官这一职位，但他不屑这么做。在他的专制下，竞选公元前81年的执政官实际上毫无意义。他走在大街上时，二十四名扈从为他开道。他让人们称他“费利克斯”，宣称自己最大的成功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给希腊的信件中，他的署名是“以巴弗提”，意为“喜悦”。他给自己的儿女分别取名福斯图斯和法乌斯塔。他还吹嘘众神在梦里与他对话。众神将一顶金色王冠和金斧头送给了一位女神——他坚信这位女神是他的庇护神。他的性格与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2]一样，冷漠、嗜血、极度迷信而又过分自信。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迷信的人可能会犯下滔天罪行，因为他相信可以通过祈祷和礼物贿赂神灵。恶贯满盈之人往往是那些有着所谓宗教信仰的人。”毫无疑问，在苏拉看来，那些被他屠杀的人都是罪有应得。为了使人们深信自己是众神的宠儿，他为自己残忍的暴行披上了一层合法的面纱。公元前81年6月1日，他正式宣布停止通缉公告。最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他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惨无人道的杀戮计划。他设定了屠杀的终止日期，拟定了固定名单，并按人头缴纳固定金额，谋杀者依据他“关于谋杀罪和投毒罪的法律”按固定程序得以豁免。铁血政策狂热的现代崇拜者可能会通过美化大奸大恶之人亵渎历史，但没有任何一种诡辩术可以让一个独立的读者无视苏拉的品行。他组织谋杀，使国家充斥着游手好闲的士兵，朴实的农民越来越少。他这么做是为了实现某个阶层的利益——他已经发现，这个阶层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尽管他知道这个阶层的重建只是昙花一现，但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择手

段地将其强化。在戏剧化的大结局之后，他重新回归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最自私、最见利忘义、最卑鄙无耻的行为也不过如此。



漫画：加蒂兰受到审判

据说苏拉在临死前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大意是："脆弱、阴柔皆非吾性情。快意恩仇，此生无憾。"

格涅乌斯·庞培是唯一一个成功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在苏拉遗嘱中的朋友。如果有什么能够淡化苏拉留给我们的冷酷自私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自白。他从同胞那里搜刮来大量财富，当他交出自己的独裁权时，将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捐给了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并为人民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宴会。宴会上没有吃完的大量食物被倒进了台伯河。有些酒是珍藏了四十多年的佳酿，可能是盖约·格拉古遇害那年酿的。宴会期间，苏拉的妻子米提拉病倒了。身为大祭司的苏拉可能担心妻子的死会弄脏自己的家，于是他立刻与妻子离婚，让她移居别处。离婚搬家后的米提拉居然活了下来。苏拉很快再婚，新娘是在一次观看角斗表演中走到他身边并拉着他的袖子，说要"沾沾他的好运"的女人。苏拉晚年在库迈附近度过，除了打猎、写回忆录外，他整日与戏子伶人玩耍作乐，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去世前十天，苏拉在普特奥利人的要求下处理了他们的事务，并筹集资金打算将议事大厅恢复原貌。有人说他得了与希律王同样的疾病，有人说根本没有

这种病，还有人说他因为盛怒导致血管破裂而死。人们描述苏拉去世时的状态是：他的脸色苍白，长满了疱，像撒满碎谷粒的桑葚，眼睛变成了蓝色。

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他的死预示着他一手创建的政治制度的解体。他还尸骨未寒，罗马的大人物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的执政官之一雷必达[3]反对进行国葬，但另一位执政官主张国葬。精明的苏拉早已窥出雷必达的性格，生前曾警告格涅乌斯·庞培，说帮助雷必达其实是在养虎为患。格涅乌斯·庞培并不支持雷必达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苏拉的支持者一定会坚持以国葬的方式向他们的领袖表达敬意。阿庇安对葬礼的盛况做了如下描述：

> 苏拉的遗体躺在金舆上，周围是庄严的队列。在一片凯歌声中，骑兵队护送金舆前行，后面跟着从各地赶来送葬的全副武装的老兵，再后面是一大群经常出现在其他人葬礼上的人。金舆前面有大斧和其他象征独裁官权力的物件。送葬队伍进入罗马后，场面十分壮大。送葬队前面又增加了两千多顶金冠，分别是各城市、旧日战友、私人朋友送的礼物。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场葬礼都盛况空前。出于对老兵们的敬畏，所有祭司全身披覆。出席葬礼的还有维斯塔贞女[4]、全体议员和所有身着官服的地方法官，另外还有由武士组成的方阵、战争中苏拉的部下，以及争先恐后赶来扛镀金旗子、镀银盾牌的人。无数的吹笛手吹着柔和、哀伤的挽歌。议员们齐声祝祷，随后是武士们的祝祷，最后人们再重复一遍之前的祝祷。有些人是真心为苏拉的离世哀悼，有些人是出于对士兵们的惧怕。不管在生前还是去世后，苏拉都让他们心生畏惧。这一幕让许多人想起了可怕的过去。苏拉对他的朋友们还算有情有义，但对其他人来说，即使他去世了，也依然是可怕的存在。苏拉的遗体被放在演讲台前，因为他的儿子福斯图斯年纪太小无法担当重任，所以由当时最优秀的演

说家发表葬礼演说。随后，几个身强力壮的议员将金舆扛到了战神广场（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安葬在这里）。他们将金舆放在火葬柴堆上，武士和士兵们组成的队伍庄严地围绕在四周。苏拉的一生到此画上了句号。



维斯塔贞女侍奉圣火的场景

当一个学生读到这段历史时，会感觉这种葬礼就像一个野蛮民族匍匐在某个人或神的坐骑下。即使在两千多年后，苏拉的英勇绝伦、精明睿智和能言善辩依然让许多人着迷。如果只论意志力和智力，我们必须承认他确实是人中龙凤，但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是觉得诛杀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暴君并不算犯罪。

注解

[1] 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八万八千五百四十英镑。

[2] 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1583—1634），一名德国化了的捷克贵族，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

[3] 格涅乌斯·庞培违背苏拉的意愿，强行将此人扶上了执政官的位置。——原注

[4] 维斯塔贞女是侍奉圣火维斯塔女神的女祭司。

第15章　苏拉的反动政策

精彩看点

《科尔内利亚法》——苏拉重组元老院、削弱官员权力、削弱大会职能、将司法权交还元老院——苏拉起草的其他法律——反衬格拉古政策的合理性

我们很难判断苏拉是否直接制定了这一时期的一些法律，就像当时的军队改革可能是盖乌斯·马略推行的，也可能不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政策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推行的。通过搜集一段时期内的所有变革，并将它们归功于或归咎于同一个人，在此基础上推测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可以将问题简单化，使作者的描绘更生动，也省去了读者的不少麻烦。但这不是呈现历史的正确方式。苏拉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即恢复元老院的权威。不只是恢复权威，他还赋予元老院更大的权力，使其集暴民统治和专制统治于一身。虽然他预见到自己的努力可能只是徒劳，但他依然处心积虑且理所当然地希望元老院能够延长属于他的时代，使他能够在坎帕尼亚颐养天年，避开另一场革命。我们对苏拉法律的了解仅限二手资料，因为原始版本早已不在了。人们将这些法律称为“科尔内利亚法”。这一名称可能也指其他法律，但通常情况下指的是苏拉的法律。《科尔内利亚法》的相关资料如下：

第一，元老院原来是一个提供建议和咨询的机构，后来逐渐获得了权威，能够向官员们发号命令。苏拉时期，元老院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他从骑士阶层中吸纳了三百人进入元老院，填补了为数不多的空

缺。这一数据并不确定，有可能是吸纳了五百人，因此元老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在饱和状态。在这之前，想要获得议员资格必须通过监察官的批准（只有担任过保民官或财务官才可以获得批准），或者担任过执政官、裁判官或民政官。苏拉用财务官取代了民政官，并使其成为常规的进身之阶，同时将财务官的人数增加到二十人。他可能（虽然无法确定）还解除了监察官赋予和剥夺议员头衔的权力。“一朝为议员，终身为议员”成为当时的法则。议员主要来自财务官，财务官由部族会议提名选出。因此，元老院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官员、更具代表性、更稳定的群体。

第二，前面已经提到苏拉赋予元老院先行审议某项政策的权力，即通过法律形式确认了这项传统特权。有了法律的保护，元老院不再害怕新政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在此之前，元老院只能通过保民官将某项议案提交给部族会议表决，或者保民官在元老院的批准下提交自己的议案。我们之前提到的苏尔比斯·鲁弗斯越过这一传统，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如果苏拉之前没有以法律形式规定元老院的的批准不可或缺，那么元老院只能通过两种方式维持自己原有的特权。第一种也是他们当时选择的做法，即公布非常法。第二种是在通过平民法时，他们可以挑出里面的技术问题。保民官被剥夺了随时向部族会议提交议案的权力，然后又失去了提前控告某人的权力，可能还失去了召集会议向人民发表演说的权力。苏拉规定担任过保民官的人没有资格担任其他职位。虽然保民官表面上依然有否决权，但无法确定苏拉是否对这项权力也做了限制。此外，保民官滥用表决权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苏拉可能还规定保民官必须来自元老院。他先规定每项法律必须通过元老院的审议，再限制保民官的各项特权，于是立法权被牢牢掌握在了元老院手中。

第三，苏拉调整了部族会议内部的平衡，使表决结果总是对元老院有利。我们在第九章提到过这一问题，苏拉恢复了塞尔维昂宪法规定的投票模式。在这里我们将补充解释一下这项举措的意义。苏拉并

没有废除部族会议，但我们从上述政策中了解到他赋予了元老院实际的立法权，只将名义上的权力给了部族会议。我们只知道百人大会的起源但不了解部族会议的起源，但我们知道部族会议后来逐步获得了与百人大会同等的立法权，平民法也具有了与宪法相同的约束力。总之，人民可以通过两个平行大会制定法律，一个是在部族内就保民官提交的议案进行表决，另一个是在百人大会上就执政官提交的议案进行表决。但随着国家的民主程度越来越高，部族会议的作用越来越大，它通过的立法逐渐集中在依据法律和习俗划分的特殊事件上。除此之外，部族会议还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保民官与民政官以及次要官员的选举、剥夺司法权等事宜，另外还可以提讯在任职期间有不法行为的官员。百人大会的职能也是立法，它选举高级官员、行使死刑案件的审判权等，这一职能源自罗马公民的上诉权，每一百人代表一票。根据塞尔维昂法，虽然第一阶层人数最少，但拥有的财产最多，因此拥有最大的投票权。第一阶层仅凭票数上的优势就能超过其他阶层。在某一时期，这一阶层的划分被更改，产生了一套建立在百人大会和部族会议基础上的新体系。每个部族被划成十个百人团，其中五个百人团由年长的公民组成，另外五个由年轻公民组成。每个部族中都有一个年长百人团和一个年轻百人团被划入第一阶层，一共有三十五个部族，因此每个阶层包含七十个百人团。有人说第一阶层中有三十五个或十八个骑士组成的百人团。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第一阶层依旧拥有投票优势。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获益最多的一个阶层，即使通过抽签方式决定第一个投票的百人团，第一阶层也可以在投票顺序中排在第二位，且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投票，有权势的公民产生的道德效应都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其他百人团，更何况还有人认为通过抽签方式决定投票顺序仅限于第一阶层的百人团。上述内容就是原有的和修改过的百人会议宪法。阿庇安认为苏拉恢复了原有的投票模式，但阿庇安可能混淆了事实。只能说苏拉将部族会议的投票权赋予了百人大会，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第四，为了维护元老院的权威，苏拉削弱了监察官的权力。为了

防止某个人的影响力过大，他规定只有同时做过财务官和裁判官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而且卸任后十年内不得担任要职。他的目的是削弱每个官员的权力，因此，虽然执政官不会像保民官那样对元老院产生威胁，但还是遭到了打击。同时受影响的还有裁判官。在这之前，执政官拥有除国内司法事务外的总体管理指挥权以及除西西里、萨丁岛和大小西班牙（在这几个行省中只能间接行使主权）外的军事指挥权，裁判官中的内事裁判官负责掌管罗马的民事诉讼，外事裁判官负责掌管罗马公民和外国人之间或外国人之间的民事诉讼，另外四位裁判官分别管理四个省。裁判官在必要时还可以兼管内事和外事，以便配合他的同事统率军队。执政官和裁判官在继任者到来前可以延长任期。同样，一位执政官也可以兼顾两个人的日常事务，以便另一位可以执行特殊任务。在指定年份，元老院可以向执政官或裁判官分配本应属于他们的军事或司法任务，然后执政官或裁判官通过抽签或协商方式决定谁来执行任务。随着国家的扩张，特殊任务的分配越来越频繁。总共有八名执政官和裁判官。现在，亚洲省、非洲省、马其顿、纳尔波和西里西亚各需一名官员，另外反勒索法庭也需要一名官员。为了让这八名官员承担十四个人的工作量，元老院规定将执政官和裁判官的任期延长到两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元老院通常会在他们的任期即将结束时将他们派往海外行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苏拉将裁判官的人数从六名增加到八名，并且以法律形式正式将任期定为两年。表面上他似乎扩大了裁判官的权力，但由于民事职能和军事职能的分离，裁判官的权力实际上被削弱了。执政官和裁判官仅负责罗马的民事事务，军队则由地方总督和地方长官统率。任期第一年，两位执政官拥有罗马的一般行政管理权，两名裁判官拥有司法管理权，另外六名管理各种法庭。第二年，这十名官员可以行使包括西西里、萨丁岛亚洲省、非洲省、马其顿、大小西班牙以及山内高卢和山外高卢在内的各行省的最高权力。但在他们的继任者到来后的三十天内，他们必须离开这些行省。如果有人因叛国罪而遭到处罚，任期内不得离开他的行省。另外，如果没有国内的明确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攻外国。以前的官员直接由百人大会选出，

同时拥有民事和军事权力，现在只有被元老院延长任期的官员才能拥有军事权。虽然选拔官员的过程没有变化，但决定权却转移到了元老院手中。

第五，由于苏拉削弱了监察官、执政官、裁判官以及保民官的权力，作为补偿，他恢复了占卜神学院和祭司神学院的增选权并增加了学院数量。这种补偿在精明且迷信的苏拉看来一定是既严肃又诙谐的。此外，增加学院数量就像现在法庭上的丝带和袜带勋章一样，没有一点儿实际作用。

第六，骑士阶层的审判权被剥夺，还给了元老院。

我们在前面曾多次提到审判权以及一些相关叙述。裁判官拥有民事诉讼案的管理权，他们有时能够对案件立即做出判决。如果裁判官认为必须审判某一案件，他会指定一个审判员，并给他一些指令，审判员调查后必须对案件做出判决。裁判官的这一行为相当于今天法官的指控，但这个步骤一般在听取证据前进行。没有任何资料记载这一时期的审判员具体出自哪个阶层，或者记载苏拉干涉这一程序的既定模式。元老院和骑士阶层积存已久的矛盾在成立犯罪法庭时终于爆发。当时已经有一些常设的犯罪法庭，譬如专门调查行省中敲诈勒索案件的反贪污法庭。苏拉组建了其他一些法庭，但我们无法确定此后的罗马法庭哪些是由苏拉组建的。苏拉之后的常设法庭有九个，分别是叛徒法庭、反暴力法庭、反暗杀法庭、反投毒法庭、反弑亲法庭、伪造罪法庭、反勒索法庭、反贪污法庭和反贿赂法庭。另外还有反通奸法庭和反奴役法庭，分别审理通奸罪、重婚罪和奴役自由人等案件。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免除百人会议或部族会议对犯罪案件的审理权、避免指定专门委员会。如果审讯后没有上诉，由于法庭太多，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再指定专门委员会。这些法庭由六名裁判官主持，但因为裁判官人数比法庭数少，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每个法庭每年会指定一名议员担任调查审判员，主持法庭的事务。由于业务需要，现代法庭的法官常常指定一名律师作为他的助手处理案件，这一点可能

仿照了这一时期的罗马法庭模式。裁判官和调查审判员下面还有审判员，他们通过不记名投票和公开投票的方式做出判决。审判员的选拔过程如下：审判员共三百人，分成三个团，在具体案件中，裁判官指定某个审判团队，并将这个团队的审判员名字对应的号码装在瓮里，然后以抽签方式决定那些人来裁决这个案件。当然，其他审判员也可以发起挑战，要求参加审判。苏拉改变了原来从骑士阶层中选拔审判员的做法，转从元老院中选拔审判员。

苏拉成立的另一个法庭是遗产纠纷法庭。审判员由部族选举产生，每个部族选出三个人，一共一百零五人。虽然审判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苏拉知道这个法庭不会产生任何危险，因此没有多加干预。

苏拉可能还制定了其他一些政策，譬如镇压无正当理由分发谷物事件、取消自由民投票资格、停止在公共节日为骑士阶层预留席位、在亚洲重新启动固定税制以取代原有的措施、将意大利的北界从埃西斯延伸到卢比孔河以及将山外高卢变为行省等。显然，苏拉通过各种方法羞辱骑士，但对意大利相关事务的处理可能与他没有太大关系。

苏拉还亲自起草了一些其他法律，包括具体刑事犯罪法和社会问题法。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具体规定了对各种暗杀罪和投毒罪的处罚。此外还有一些与伪造、侵犯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婚姻以及婚外情等相关的法律。另外还有一部禁奢法，据说它限制了一些奢侈品的价格。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这部禁奢法就是历史上最蠢的一部禁奢法，因为最终的结果不是遏制、而是鼓励了贪婪之风。最后还有一部关于意大利和科西嘉岛的阿勒里亚殖民地建设的法律。

通过立法，苏拉使罗马人多年的努力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他剥夺了保民官自由发言的权力，通过扩充元老院将政府禁锢在一个封闭环境中，他还使元老院凌驾在所有官员之上，将自己的党羽安插在罗马和意大利的各个岗位上，并将元老院和骑士阶层争夺多年的审判权

还给了元老院。这种通过实现党徒的野心和压制敌人的利益的方式支撑起来的体制在一开始就埋下了解体的种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拉退位了，但退位只是他实现君主制野心的计划之一。他在敌人的尸骨和革命的流沙上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实际上这是一条通往王权的大道。

苏拉退位时曾昭告天下，于是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跟着他回家，一路上对他谩骂不停，但他只是温和地听着。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这可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退位仪式的一部分。苏拉通过退位摆脱了元老院的约束，这一点是真实的。除此之外，退位事件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闹剧。他盛大的葬礼说明他在去世时依旧手握实权。一则关于苏拉的传闻说他在去世前命人勒死普特奥利的地方官，因为这个地方官没有及时在自己管辖的城里募集到重建议事大厅需要的钱款。同样一件事，格拉古兄弟会怀着善意去做，但苏拉总是充满恶意；同样的土地，格拉古兄弟会将它分给遵纪守法的公民，但苏拉会将它分给贪婪的军人。之后的内战和三头执政都充分说明了格拉古兄弟政策的合理性，除非我们突发奇想，认为是格拉古兄弟创造了那个时代的需求，而不是用他们的才干满足了人们的需要。随着意大利人和外族人的到来，一方面，他们融入日益堕落的罗马人，另一方面给罗马古老的体制注入新的生命。在没有禁令的背景下，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开始萌芽。一个社会的末俗流弊因为暴力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社会瘫痪，即使最有效的良药也无力回天。

之前已经提到意大利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虽然苏拉也在积极建设殖民地，但连年内战大大加速了国家的毁灭。淳朴的乡村阶层逐渐消失，城市阶层日益堕落。贵族们为了维持首都挥霍无度的奢靡生活，开始敲诈勒索行省，这一行为逐渐发展成严重的社会流弊。因此在苏拉之前，常驻的反勒索法庭已经存在。高利贷和战争等是统治阶层中饱私囊的主要途径。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韦雷斯和卢库勒斯等人在海外聚敛的财富以及格拉索斯、苏拉等人在罗马聚敛的财富就是

最好的例证。苏拉极力维护这种腐朽统治，方便贵族们长期巧取豪夺。他的政治主张和他的品行一样臭名昭著。

为了责任放下权力是一回事，为了个人私利逃避责任是另一回事。苏拉是古罗马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史的始作俑者。他统治时期，罗马社会发展趋势明显，目标明确，一如奥古斯都时代。至此，罗马贵族的利益和独裁者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整个古罗马世界的利益中心。

专有名词对照表

Carthage	迦太基
Viriathus	维里亚图斯
Numantia	努曼提雅
Sicilian	西西里岛
Pergamus	帕加马王国
Attalus III	阿塔罗斯三世
Samnite Wars	萨姆尼特战争
Punic Wars	布匿战争
Tiberius Gracchus	提比略·格拉古
Battle of Actium	亚克兴角战役
Patres	元老
Clients	依附民
Libertus	自由民
Plebeians	平民
Tullian	塔林组织
Servius Tullius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Gracchi	格拉古兄弟
Vectigal	地税
Spurius Cassius	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
Licinian Law	《利基尼亚法》
Licinius	利基尼亚斯
Senones	赛农人
Delos	提洛岛
Minturnae	明图尔诺

Sinuessa	锡纽萨
Damophillus	大摩费流斯
Megallis	梅格里斯
Eunus	尤努斯
Hermeias	赫米亚斯
Catana	卡塔纳
Antiochus	安提阿
Achaeus	阿开俄斯
Cleon	克里昂
Florus	弗罗鲁斯
Flaccus	弗拉库斯
Calpurnius Piso	卡尔普尔尼乌斯·庇索
Messana	梅撒那
P.Rupilius	P.拉比利亚斯
Tauromenium	陶洛米尼姆
Comanus	科曼诺斯
Sula	苏拉
Herod	希律王
Optimates	权贵派
Populare	民众派
Equites	骑士阶层
Praetor Urbanus	内事裁判官
Latini	拉丁人
Socii	自由居民
Civitates Foederatae	同盟
Jugurthine war	朱古达战争
Teanum	代诺
M.Marius	M.马里厄斯
Venusia	维努西亚
Persia	波斯

Babylonia	巴比伦
Media	米堤亚
Scipio Aemilianus	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Asellus	阿瑟留斯
Mummius	穆敏乌斯
Polibius	波利比乌斯
Panaetius	帕奈提奥斯
Terence	特伦斯
Lucilius	卢基里乌斯
Augustus	奥古斯都
Metalla	米提拉
Gaius Laelius	盖乌斯·莱伊利乌斯
Plutarch	普鲁塔克
Scipio Africanus	大西庇阿
Cornelia	科利尼亚
Diophanes	迪奥芬尼
Appius	阿匹乌斯
P.Licinius Grassus Mucianus	P.李西尼·格拉斯·姆基安努斯
Mancinus	曼奇努斯
Rubicon	卢比孔河
Macra	马克莱河
Apulia	阿普里亚河
Octavius	屋大维
P.Scipio Nasica	P.西庇阿·纳西卡
Velleius	维莱乌斯
Rubrius	布里乌斯
Blossius	布洛休斯
Fulvius Flaccus	弗尔维乌斯·弗莱克斯
Scaevola	斯凯乌拉
Satyrelius	萨蒂里厄斯

Rufus	鲁弗斯
Papirius Carbo	帕皮礼乌斯·卡尔博
Aurelius Cotta	奥里留斯·科塔
Sardinia	撒丁岛
Orestes	奥列斯特
Lex Papiria	《帕皮里亚法》
Junius Penus	朱尼乌斯·班努斯
Veii	维伊
Fabrateria	法布雷
Micipsa	米西普萨
Masinissa	马西尼撒
Popillius Laenas	波比留·利纳斯
Lex Frumentaria	《粮食法》
Drusus	德鲁苏斯
Junonia	朱诺尼亚
Opimius	奥皮姆斯
Antyllus	安提鲁思
Pomponius	庞波尼乌斯
Laetorius	赖托留斯
Porta Trigemina	波特特里格米纳大门
Philocrates	罗克拉茨
Euporus	尤珀拉斯
Furina	弗洛拉
Sepitimuleius	沙皮提姆莱斯
Pliny	老普林尼
Lex Maria	《玛利亚法》
Lex Baebia	《巴比亚法》
Neptunia	涅普顿尼亚
Borius	鲍里斯
Thorius	托里斯

Caius Baebius	凯厄斯·巴比斯
Spirius Thorius	斯皮里乌斯·托里斯
Quintus Metellus	昆图斯·梅特路斯
Sallust	塞勒斯特
Gaius Marius	盖乌斯·马略
Eumenes II	欧迈尼斯二世
Aristonicus	阿里斯托尼库斯
Ephesus	以弗所
Leucae	卢克
Bithynia	比提尼亚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Myndus	孟多斯
Colophon	科勒芬
Samo	萨姆斯岛
Elaea	埃利亚
Flaccus	弗莱克斯
Perperna	珀珀那
Mithridates VI	米特拉达梯六世
Phrygia	佛里几亚
Aquillius	阿奎留斯
Macedonia	马其顿省
Telmissus	帖尔密斯
Mastanabal	马斯泰那巴
Adherbal	阿德盖巴尔
Hiempasal	西耶姆普萨尔
Thirmida	索米达
M.Aemilius Scaurus	M.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
Cirta	锡尔塔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Utica	乌提卡

Gaius memmius	盖约·曼米努斯
Bestia	贝斯蒂亚
Cassius	卡西乌斯
Massiva	玛西瓦
Aldinus	阿尔丁诺斯
Bomilcar	波密尔卡
Aulus Albinus	奥鲁斯·阿比诺斯
Suthul	苏图尔
Dyrrhachium	底耳哈琴
Law of Manilius	《马尼留斯法》
Muthul	穆图尔河
Mejerda	迈杰尔达河
Rutilius Rufus	卢提里乌斯·鲁弗斯
Zama	扎马
Vaga	瓦加
Baja	巴哈
Turpilius	特皮留斯
Thala	塔莱
Mauretania	毛里塔尼亚
Bocchus	博库斯
Gafsa	加夫萨
Capsa	开普萨
Volux	沃鲁克斯
Masinissa	马西尼撒
Gauda	高达
Gaetulian	加图利安
Cimbri	辛布里人
Cereatae	希瑞亚特
L.Caecilius Metellus	L.凯西利乌斯·梅特路斯
Numidicus	努米底库斯

Semorinius Tuditanus	赛姆普罗涅斯·图提坦
Illyrian	伊利里亚
Iapydes	伊埃派德人
Marseilles	马赛
Rhone	罗纳河
Durance	迪朗斯河
Ligurian	利古里亚族
Salyes	赛亚人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Calvinus	卡尔维努斯
Aix	艾克斯
Aquae Sextiae	六河
Aedui	埃杜维
Arverni	阿维尔尼
Elaver	伊莱弗河
Allier	阿利埃河
Allobroges	阿洛布罗热
Domitius Ahenobarbus	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
Avignon	阿维尼翁
Fabius	费比乌斯
Isara	伊萨拉河
Staeni	斯坦尼
Narbo	纳尔波
Tarraconensis	塔拉科那
Garonne	加仑
Cevennes	塞文山脉
Via Domitia	多美亚大道
Dalmatae	达尔马提亚人
Karni	卡尔尼
Porcius Cato	博尔基乌斯·加图

Minucius Rufus	米努基乌斯·鲁弗斯
Noricum	诺里库姆
Noreia	诺里亚
Junius.Silanus	朱尼厄斯·希拉努斯
Helvetii	赫尔维蒂人
Jura	侏罗山脉
Tiguroni	提古罗尼人
Tolosa	托洛萨
Servillius Caepio	赛尔维里乌斯·卡皮欧
Aurelius.Scaurus	奥瑞里厄斯·斯考卢斯
Mallius Maximus	马利乌斯·马克西姆斯
Marcus Minucius	马科斯·米努修斯
Fabius Maximus	费比乌斯·马克西姆斯
Celtiberi	凯尔提波利
Teutones	条顿人
Tectosages	特克托撒
Azof	阿卓夫
Dnieper	第聂伯河
Don	顿河
Cimmerii	奇美里人
Strabo	斯特拉波
Ambrones	阿姆布昂人
Tugeni	格尼人
Little St.Bernard	小圣伯纳
Sainte Victoire	圣维多利亚山
Teutoboduus	条顿波杜斯
Putridus	布利也尔
Lutatius Catulus	路达提乌斯·卡特鲁斯
Athesis	阿瑟西斯河
Verona	维罗纳

Ticinus	提挈诺河
Po	波河
Sesia	赛西亚河
Vercellae	维尔赛莱
Campi Raudii	坎庇罗狄
Boiorix	波伊奥里克斯
Nuceria	努凯里亚
Capua	卡普阿
Attica	阿蒂卡
Thurii	图里
Minucius	米努基乌斯
Vettius	维提乌斯
Lucullus	卢库勒斯
Nicomedes III	尼科美德三世
P.Licinius Nerva	P.李西尼·涅尔瓦
Heraclea	赫拉克利亚
Salvius	萨尔维乌斯
Tryphon	特里丰
Morgantia	摩根提亚
Lilybaeum	利利俾
Athenion	雅典尼昂
Triocala	特里奥卡拉
Scirthaea	瑟赛阿
C.Servilius	C.塞维里乌斯
Messana	麦西拿
Aquilius	阿奎留斯
Satyrus	萨提洛斯
Hastati	青年兵
Principes	壮年兵
Triarii	后备兵

Servian	塞尔维昂
Marian mules or mariani muli	马略骡
Velite	轻步兵
Evocati	老兵
Viriathus	维里阿斯
Lucius Saturninus	卢修斯·萨图尼努斯
Camille Desmoulins	卡米尔·德穆兰
Danton	丹东
Caius Glaucia	盖约·格劳西亚
Lex Servilia	《塞尔维利亚法》
Lex Servilia Caepio	《塞尔维利亚·卡皮欧法》
Hyperbolus	海帕波拉斯
Transalpine Gaul	山外高卢
Achaia	亚该亚
Lex de Majestate	《叛国法》
Equitius	阿奎提亚斯
Sextus Titius	塞斯德·提丢斯
Lex Licinia Minucia	里西尼亚·米努西亚法
Publius Rufus	普布利乌斯·鲁弗斯
Marcus Livius Drusus	马库斯·李维·德鲁苏斯
Campanian	坎帕尼亚
Philippus	菲利普
Diodorus	狄奥多罗斯
Pompaedius Silo	庞培·希洛
Umbria	安布利亚
Etruria	伊特鲁里亚
Marsi	马尔西
Marrucini	马鲁奇尼
Asculum	阿斯库路姆
Caius.Servilius	盖约·塞维利乌斯

Peligni	佩里格尼
Frentani	弗伦塔尼
Vestini	维斯提尼
Picentini	普辛帝
Herpini	贺皮尼
Pompeii	庞培
Iapyges	伊阿派斯
Lucani	卢查尼尔
Liris	里斯河
Cilicia	西里西亚
Florentia	佛罗伦萨
Pinna	毕那
Aeclanum	埃克拉努姆
Neapolis	那不勒斯
Rhegium	利基翁
Capua	卡普阿
Varian	《瓦里安法》
Lupus	卢普斯
Picenum	皮西努姆
Pompeius Magnus	庞培·马格努斯
Cnaeus Pompeius Strabo	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
Lucius Caesar	卢修斯·凯撒
Samnium	塞尼阿姆
Publius.Grassus	普布利乌斯·格拉索斯
Aternus	阿提尔拉斯河
Perscara	皮尔斯卡拉
Corfinium	可飞尼奥
Italica	意大利卡
Papius Mutilus	帕皮乌斯·穆提卢斯
Sulpician	苏尔比斯

Sabine	萨拜恩
Lucania	卢卡尼亚
Nola	诺拉
Faleria	法莱利亚
Firmum	费姆
Servius Sulpicius	塞尔维乌斯·苏尔比斯
Judacilius	朱大西利斯
Alba	阿尔巴
AEsernia	艾森尼亚
Marcellus	马赛拉斯
Vettius Scato	维提乌斯·斯卡托
Venafrum	维那弗鲁
Grumentum	格儒门图姆
Stabiae	斯塔比伊
Salerno	萨勒诺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Nuceria	努塞日亚
Acerrae	阿克莱
Oxyntas	俄克孙塔
Vestal Virgins	维斯塔贞女
Praetor Peregrinus	外事裁判官
Canusium	坎努西姆
Marius Egnatius	马略·埃格纳提乌斯
Tolenus	托努斯河
Sulpicius Rufus	苏尔比斯·鲁弗斯
Peligni	佩里格尼
Umbrian	翁布里亚人
Plotius	普罗提乌斯
Porcius Cato	波尔基乌斯·加图
Picenum	皮西努姆

Orosius	奥罗修斯
Lex Julia	《优利娅法》
Gellius	格利乌斯
Lex Plautia Papiria	《普劳提乌斯·帕皮里乌斯法》
Lucius Cato	卢修斯·加图
Marian	马里安
Teate	蒂特
Cosconius	科斯科尼乌斯
Apulia	阿普利亚
Salapia	萨拉比亚
Cannae	坎尼
Iapygian	埃普基
T.Didius	T.狄第乌斯
Cluentius	克律恩侠斯
Aulus Albinus	奥卢斯·阿尔比努斯
Hirpini	赫尔平尼
Lucanian	卢卡尼亚人
Bovianum	波维亚努姆
Bruttian	布鲁提恩
Lamponius	拉姆波尼乌斯
Colline Gate	科林门
Cornelius Cinna	科尼利厄斯·秦纳
Abella	阿贝拉城
Asellio	阿瑟利欧
Campus Martius	战神广场
Baiae	巴亚
Pompeius Rufus	庞培·鲁福斯
Postumius	帕斯图密乌斯
Cumae	库迈
Puteoli	普特奥利

Ledipus	雷必达
Calian Gate	卡利安门
Pons Sublicius	庞斯·萨布利西斯桥
Esquiline	埃斯奎里
Laurentum	罗伦图姆
Velleius Paterculus	维利尤斯·帕特丘拉斯
Tarpeian Rock	塔拜亚巨岩
Nonius	诺尼乌斯
Cnaeus Octavius	科耐乌斯·屋大维
Virginius	弗吉尼厄斯
Brundusium	布伦迪西乌姆港
Ostia	奥斯提亚城
Tarracina	特腊契纳
Geminius	格米尼乌斯
Circeii	西尔策依
Minturnae	敏特奈
Fannia	范尼雅
Aeneas	恩纳里亚
Meninx	曼宁克斯
Kerkennah	克尔肯那岛
Sertorius	塞多留
Cornelius Merula	科尼利厄斯·墨卢拉
Janiculum	贾尼科洛山
Romulus	罗穆路斯
Alban Mount	阿尔本山
Via Appia	亚壁古道
Marcus Antonius	马库斯·安东尼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Archelaus	阿基劳斯
Fimbria	费穆布里亚

Ancona	安科纳
Celtiberi	凯尔提波利
Castulo	卡斯图罗
Titus Didius	提图斯·狄第乌斯
Arevaci	亚里费西
Termesus	忒弥所斯
Colenda	克林达
Ptolemaus.Apion	普拖雷米·阿皮翁
Cyrene	利奈
Fausta	法乌斯塔
Albrecht Wallenstein	阿尔伯莱希特·华伦斯坦
Cappadocia	卡帕多西亚
Bithynia	比提尼亚
Nicomedes	尼科梅德
Gordius	戈尔迪
Ariobarzanes I	阿里阿巴尔查尼斯一世
Tigranes	提格拉涅斯
Orobazus	欧洛巴佐
Seleucus	塞琉古
Pharnaces I	法尔纳克一世
Sinope	锡诺普
Paphlagonia	帕夫拉果尼亚
Manius Aquillius	曼尼乌斯·阿基利乌斯
Phasis	发西斯
Colchis	科尔基斯
Neoptolemus	涅俄普托勒摩斯
Diophantus	丢番图
Panticapaeum	旁提卡彭
Tauric Scythians	叨立克族人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

Tyras	提拉斯河
Roxolani	罗克索拉尼人
Borysthenes	玻里斯提尼斯河
Tanais	塔内斯河
Cleopatra	克利奥佩特拉
Socrates	苏格拉底
Amastris	阿玛斯特里斯城
Amnias	阿姆尼亚斯河
Mount Scorobas	斯科劳伯山
Sangarius	桑加里斯河
Rhodes	罗德岛
Apameia	亚帕米亚
Mysia	米西亚
Pamphylia	潘菲利亚
Lycus	吕库斯河
Laodicea	老底嘉城
Mytilenean	米蒂利尼人
Magnesia	门德雷斯河
Magnesia	美格里西亚
Epaphroditus	以巴弗提
Faustus	福斯图斯
Caria	卡里亚
Stratoniceia	斯特拉托尼
Mount Sipylus	西必洛斯山
Adramyttium	亚大米田
Cos	科斯城
Aristion	亚里斯提昂
Epicurus	伊比鸠鲁
Euboea	优比亚岛
Piraeus	比雷埃夫斯

Thespiae	塞斯比阿人
Achaean	亚该亚人
Laconian	拉哥尼亚人
Boeotian	皮奥夏人
Demetrias	德米特里亚
Sura	修罗
Sciathus	西阿苏斯
Epirus	伊庇鲁斯
Aetolia	埃托利亚
Thessaly	塞萨利
Eleusis	艾留西斯
Megara	麦加拉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
Academia	阿克德米亚
Lyceum	吕克昂
Epidaurus	埃皮达鲁斯
Delphi	特尔斐
Munychia	慕尼契亚
Taxile	塔克西勒
Termopylae	温泉关
Phocis	福基斯
Elateia	伊拉提亚
Chaeroneia	喀罗尼亚
Hortensius	霍尔登修
Philoboeotus	斐洛毕奥都斯
Cephissus	赛菲索斯河
Assus	阿苏斯
Lake Copais	可派湖
Parapotamii	帕拉波塔米欧伊
Assia	阿西亚

Felix	费利克斯
Murena	穆雷纳
Chalcis	哈尔基斯
Dorylaus	多里劳斯
Phthiotis	弗西奥蒂斯
Orchomenus	奥科美那斯河
Melas	梅拉斯
Mount Tilphossium	提尔弗斯山
Delium	代立昂
Chios	希俄斯
Tralles	特拉雷斯
Hypaepa	海帕
Metropolis	大都
Sardis	萨迪斯
Smyrna	士麦那
Chalcedon	卡尔西顿
Nicomedia	尼科米底亚
Rhyndacus	林达库斯河
Cnidus	尼多斯
Chersonese	切索尼
Troad	特洛德
Dardanus	达耳达诺斯
Marcus Grassus	马库斯·格拉索斯
Quintus Lucretius Ofella	昆图斯·卢克莱修·欧费洛
Auximum	奥克西穆姆
Cethegus	西第古斯
Caius Verres	盖约·韦雷斯
Aufidus	奥菲杜斯河
Volturnus	沃尔图努斯
Suessa	苏萨

Sacriportus	萨克里波图
Praeneste	普雷尼斯特
Faventia	法恩扎
Voscian Mountains	沃尔西山
Setia	塞泽
Quintus Mucius Scaevola	昆图斯·穆齐·斯凯沃拉
Aesis	埃西斯河
Carrinas	凯瑞那滋
Censorinus	肯索里努斯
Catiline	加蒂兰
Cornelii	康尼利
Clusium	克鲁休姆
Clanis	克莱因斯河
Albegna	阿尔贝纳河
Saturnia	萨图尼亚
Spoletum	斯波莱托
Pontius Telesinus	庞提乌斯·泰利辛努斯
Latium	拉丁姆
Anagnia	阿纳尼
Arretium	阿雷提乌姆
Damasippus	达玛西普
Tuder	图德尔
Alban	阿尔本
Praenestine	普莱涅斯汀
Antemnae	安登奈
Circus Flaminius	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
Aristophane	亚里斯托芬
Norba	诺尔巴
Populonium	波普洛尼亚
Volaterrae	沃拉特里

Cossura	科索拉
Lucius Domitius	卢修斯·多米蒂乌斯
Colchians	哥齐人
Comana	科马纳
Halys	哈里斯河
Annius Luscus	安尼乌斯·卢斯科斯
Iviza	伊维萨岛
Gades	加德斯
Madeira	马德拉岛
Lusitani	路西塔尼亚人
Guadalquiver	古达奎弗尔
Caius Metellus	盖约·梅特路斯
Albani	阿尔巴尼
Roscius	罗歇斯
Chrysogonus	克里索古努斯
Interamna	茵泰拉木纳

中画史鉴 全景插图版 010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德国总参谋部

[英] 斯宾塞·威尔金森 著

鹿婷婷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RESS

全景插图版

德国总参谋部

[英] 斯宾塞·威尔金森　著　　鹿婷婷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总参谋部 /（英）斯宾塞·威尔金森著；鹿婷婷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12

（中画史鉴）

书名原文：The brain of an army ;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ISBN 978-7-5146-1641-5

I．①德…　II．①斯…②鹿…　III．①总参谋部—军事史—德国　IV．①E51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6809号

德国总参谋部

［英］斯宾塞·威尔金森　著　鹿婷婷　译

出 版 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冯　章

执行编辑：朱露茜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16.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书　　号：ISBN 978-7-5146-1641-5

目录

序言
第1部分　总参谋部与战役指挥
　　第1章　绪论
　　第2章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
　　第3章　幕后
　　第4章　五条简短的命令
　　第5章　战役准备
　　第6章　评论家
第2部分　总参谋部与陆军
　　第1章　普鲁士军事机构的精神
　　第2章　陆军的编制
　　第3章　士兵训练体制
　　第4章　军团
　　第5章　军团参谋部
　　第6章　总参谋部的构成及其在陆军中的分布
第3部分　总参谋部与总参谋长
　　第1章　情报部
　　第2章　军事学院
　　第3章　学术进步
　　第4章　总参谋长
附录1　格奈瑟瑙小传
附录2　沙恩霍斯特小传
附录3　米夫林小传
附录4　毛奇小传
附录5　腓特烈二世小传
附录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小传

附录7　腓特烈·威廉三世小传
附录8　腓特烈·威廉四世小传
附录9　威廉一世小传
附录10　腓特烈三世小传
附录11　普鲁士大事年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返回总目录

序言

1887年5月，英国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英国陆军、海军预算做了调查。在特别委员会调查期间，亨利·布兰肯博里[(1)]少将比较了英国与德国的陆军管理体制。他特别提到了德国陆军庞大的总参谋部，并把德军的总参谋部称作“德国军事机构的基石，德国陆军骁勇善战的根本原因，德国军事机构强有力的大脑，德国军事机构得以高效运转的智囊团”。亨利·布兰肯博里少将说：“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中央智囊团都需要简约、高效地运转。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国陆军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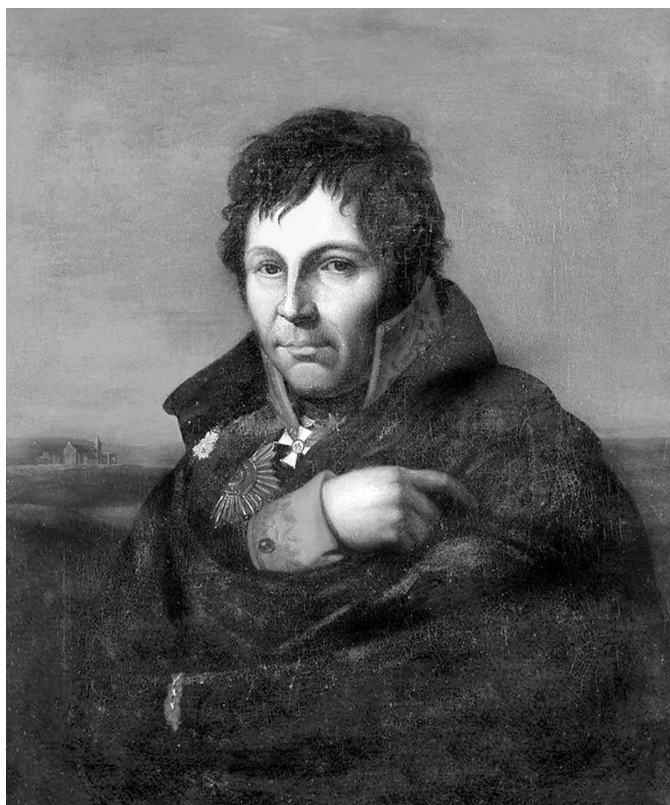
无论何时，一个政治家如果想担任英国陆军大臣一职，首先需要抓住德国军事体制基本原则的本质，区分德国军事体制基本原则中的实质性条款与附属条款；弄清楚哪些基本原则具有地方性、临时性及个人性；掌握德国军事体制得以壮大的原则。只有了解了这些，他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不会毁掉之前的体制，避免既吸收精华又吸收糟粕的全盘接受，将德国军事体制中的优点引入英国军事体制，而不丧失本国特色。

谨以此书献给有此抱负的政治家以及支持他的公众。本书旨在讲述德国总参谋部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军队机构之间的关系。

为了阐述德国总参谋部在战争中的作用，本书以普奥战争为例，而没有选取普法战争，因为普奥战争是战略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更好例证。

(1) 亨利·布兰肯博里（Henry Brackenbury，1837—1914），英国陆军上将。他是陆军元帅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的得力助手，“沃尔斯利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主动请求参加阿萨蒂战役（1873—1874），在祖鲁战争中担任重要大臣（1879—1880）。他曾任印度总督私人秘书（1880）、英国驻法国巴黎使馆武官（1881—1882）、爱尔兰总督助理。1885年，他晋升为陆军少将。1886年，他升任军事情报处总监，后任军械委员会办公室主席（1896—1899）、皇家炮兵团上校指挥官（1897）、军械署署长（1899），后晋升为上将（1901）。——译者注（此后未另作标注的均为译者注）

第1部分　总参谋部与战役指挥



沙恩霍斯特

第1章　绪论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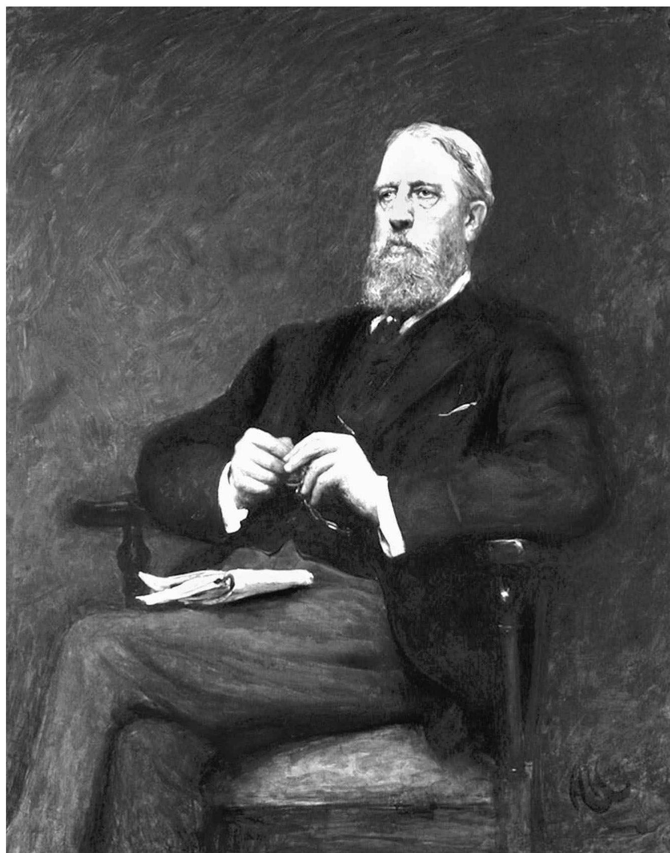
> 德国总参谋部体制的基本特征——总参谋长是伟大的战略家——别国不应盲目模仿德国总参谋部——毛奇伯爵的来信——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伯爵的来信——亚瑟·贝尔福的观点

1884年，在哈廷顿勋爵[(1)]的带领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对国防管理进行了调查。报纸上关于德国总参谋部的评论很多，且大部分评论认为英国效仿了德国的做法，这说明参与讨论的人士似乎并不了解德国总参谋部。因此，我认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地描述这个机构，以帮助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和大众对德国总参谋部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很有必要。1890年2月11日，本书出版。就在当日，《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被签署。

明确的职责分工是德国总参谋部体制的基本特征。战场上，每位将军都需要很多助手，帮助他们处理细节问题，做他们的机要秘书，在他们不能亲临的地方代表他们处理事务，所有助手合起来构成参谋部。司令部职责众多，因此庞大的参谋部需要对参谋不断进行职责分配。在德国，职责分配基于理性和实际原则。将军的职责细分为两类：管理与惩戒，掌控对敌军事行动方向。其中，一方面涉及管理与惩戒，另一方面涉及与战斗准备、指挥直接相关的事务，专业地讲，即战略与战术问题。帮助将军处理战略、战术问题的军官们被称为将军的“一般参谋”。这些军官要接受专门训练，学习对敌军事行动的指挥艺术，即将才艺术。与别国陆军相比，德国军队更重视对将才的培养。英国陆军中，根据承担的具体职责，将军的助手们也有分类。职责的分类源于偶然因素，没有具体原则可循，但会在长期实践后固定下来。参谋部的军官分为副官与军需官，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合理的标准具体分配其职责。这是个弊病，因为一群各自为战、互无联系的军官是无法接受科学训练的。现在，人们已经感受到该弊病并试图弥补，合并了副官和军需官的职能，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他们的职责明确分开。



担任自由党领袖时的哈廷顿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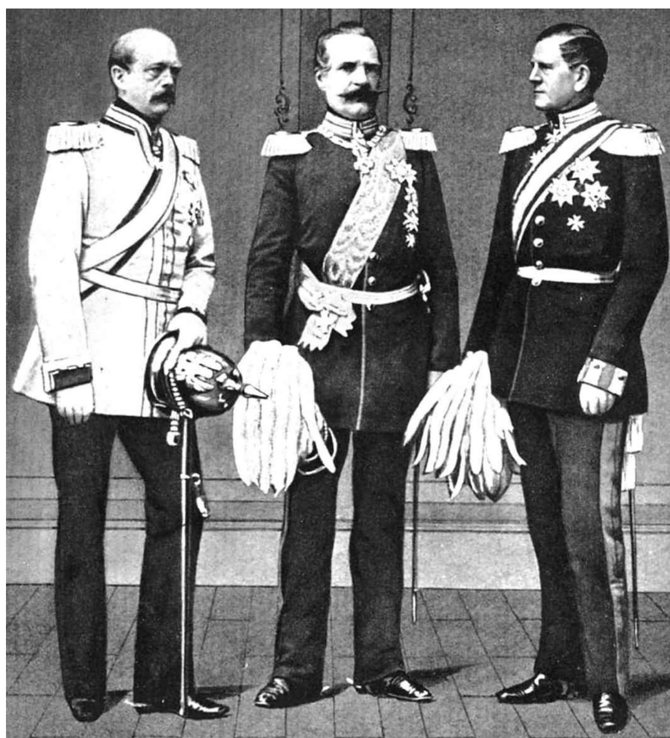


获封德文郡公爵时的哈廷顿勋爵

然而，公众感兴趣的是，德国总参谋部虽然附属于陆军体系，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功臣、伟大的战略家不是普鲁士[3]陆军总司令，而是总参谋长。普鲁士陆军体系的这一特色是否适合别国仿效有待商榷。显然，德国人自认为陆军体系的特色是应运而生，没有普遍适用性。在组建海军过程中，经过大量实践和商讨，德军更换了体制。德军任命中意的海军上将担任“海军司令”，而没有选择皇帝的总参谋长，因为总参谋长身处陆军战场，不能亲自指挥海军作战。

在第一版中，我只满足于告诫别国不要盲目仿效，并没有从德国的这个军事机构中总结出适用于英国陆军的经验教训。当时，官方在

某种程度上对毛奇伯爵与德皇威廉一世的关系避而不谈，没有任何出版物可以作为证明二者关系的可靠的、直接证据，一切仅凭推断。毛奇伯爵死后，他的私人信件[(4)]发表，其军事信件[(5)]初次连载，这些为搞清楚所有问题带来了极大启发。我有幸较早得到了相关线索。书出版之时，我斗胆向毛奇伯爵发了一份校样，请求他允许我在献词中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工作是研究的主题。我有幸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件译文如下：



毛奇（右）与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中）、俾斯麦（左）合影

尊敬的威尔金森先生：

我饶有兴致地拜读了你关于德国总参谋部的作品。很高兴看到，在书中第63页，你抨击了一个流传于民间的说法：每次做重要决策之前，都要召开军事会议。我可以确定地告

诉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从未召开过此类军事会议。

如果与军事顾问商讨后，总指挥仍觉得有必要询问他人的意见，那么可以断定，这个总指挥缺乏主见。

如果威廉一世陛下确实说过书中第58页那样的话，那是他对自己极大的不公。威廉一世陛下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有着异常清晰的判断。他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还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并且在军队指挥中，总指挥的品行远比他所掌握的知识与科技更重要。除去那一段，对你的文章并无其他大的意见。

在书中，你谈到了总指挥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总指挥与政治家都不能事先设定要达到的目标。与敌军初次交火后，战役计划会有所调整。战役成功与否靠的是行动计划，而非最初设定的目标。此外，战役是失利还是捷报频传，这些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家们的主张。战役过程中，只有最权威的人才有能力平衡军事命令与外交主张之间的关系。

你注意到不能在战争爆发之际临时成立总参谋部，早在和平时期就应设立总参谋部，让总参谋部切实运作起来，与部队密切联系。我认为即使这样仍不够。总参谋部必须清楚谁将是未来的总指挥，提前与总指挥密切沟通，取得他的信任。没有这些做基础，总参谋部的地位难保。



威廉一世

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战争中的领袖，这样很有好处。国家元首对总参谋部和部队了如指掌，同时总参谋部和部队也十分了解领袖。在这样领袖与部队相互了解的军队中，战争公告无须发表。

然而，不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允许国家元首做军队首领。如果英国政府想要并能提前选拔胜任的军官担任这个职位，就必须在和平时期给予该军官权威，使他能够影响部队，确立领导权威，并与总参谋部之间建立理解。陆军大臣

通常另有其人，不会由该军官担任。整个战争过程中，陆军大臣在国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处理形形色色的行政事务。

你表示要把这部有趣的书的题献给我，但我认为你应当考虑如果没有这样的题献，你的书是否仍能完美地保持独立判断的特征。

衷心感谢你的沟通。

陆军元帅毛奇伯爵

1890年2月20日

于柏林

因为毛奇伯爵身居要职，所以不能直白地说出英国陆军需要进行的改革，不能详细解释自己的工作性质(6)。

毛奇伯爵认为他所任的总参谋长一职并不一定适合英国陆军，将他的观点与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7)伯爵的独立判断进行比较会很有趣。罗伯茨伯爵允许我公开下面这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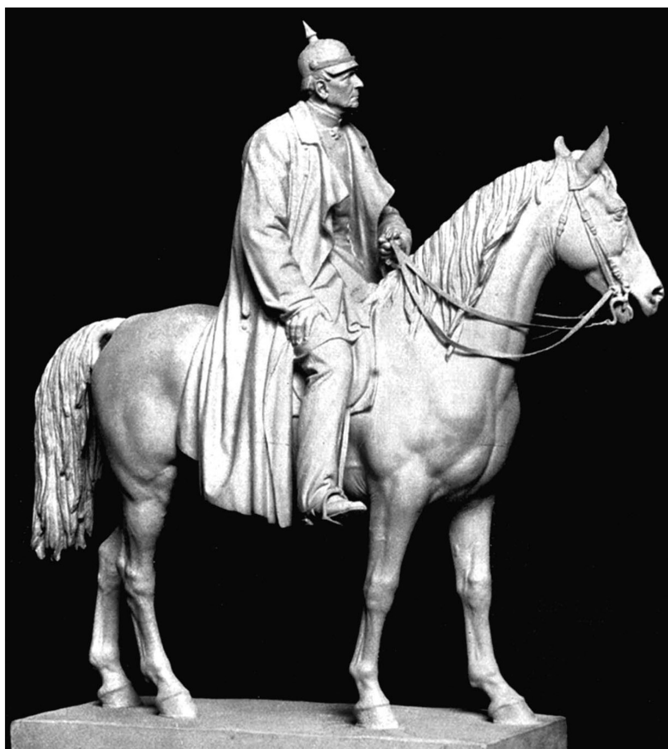
尊敬的威尔金森先生：

感激你赠予我《德国总参谋部》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几封邮件发出前我已收到这些书。其中一些我之前读过，也经常听人提起《德国总参谋部》一书。本想在时间允许时拜读，唉！却总是鲜有空闲。现在，我已带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该书。

其中一点我印象最深。书中有强烈的倾向认为德国的参谋体制与职责分配体制值得全世界借鉴，因为特殊情况下，在能力超群的总参谋长领导下，这一体制十分成功，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就是证明。

一些人认为，总参谋长负责战役准备以及战役行动计

划，在国家军事决策方面起主导作用。然而，正如罗伯特·霍姆[8]1882版《现代战术概要》一书第17到18页总结的那样，一些颇有才干的总指挥和战略家们对此并不认同。一个真正才华横溢的将军或总司令是否会欣然默许德军职责分配体制中所要求的指挥权与责任的分离，我对此表示怀疑。去年8月21日，《泰晤士报》评论说，陆军元帅《毛奇文集》第三卷清楚地证明了毛奇伯爵正是德军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名副其实的总司令，那些名义上的指挥官对所要执行的任务没有任何发言权。毛奇伯爵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战士，他以国王威廉一世的名义发布命令，并且经他发布的命令部队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他的领导下，军事机器顺利运转。但如果总参谋长不能始终发布贤明的命令，行动遭到牵制甚至失败，又或者手下的指挥官们在才智和判断力上胜过总参谋长，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毛奇骑马雕像

奉行军国主义的国家都需要像德国这样的总参谋长，尤其在与德国类似的国家，君主是军队的首领和名义上的总司令，总参谋长就不可或缺了。原因在于，首先，君主可能不具备胜任总司令的才干，从而在战争中领导陆军；其次，即便君主具有这样的能力，他还有很多本国民政事务以及与别国的外交事务要处理，没有时间特别关注军事问题。但对总司令而言，想要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陆军，就必须专注于军事问题。因此，总参谋长就至关重要了，他实际上是真正的总司令。

然而，我国陆军规模小，总司令又是职业军人，因此不需要德国陆军中那样的参谋长。对我们而言，《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第3部分第4章中所勾勒的应当是陆军统帅——陆军中人人敬仰、绝对信任的总司令。书中的一些注释与我的见解不谋而合。布吕歇尔[(9)]需要沙恩霍斯特[(10)]和格奈瑟瑙[(11)]辅佐，从而洗雪前耻。但正如注释中提到的那样，“把真正的指挥权交给沙恩霍斯特和格奈瑟瑙难道不是更好吗”？



布吕歇尔



格奈瑟瑙

我认为，与地位不够高的人相比，皇帝或国王更有可能采纳参谋长的建议。对于周围的人而言，皇帝或国王虽然高高在上，但他会倾听建议。书中的注释提到，德皇虚心听取毛奇伯爵的建议。如果总司令与他的总参谋长社会地位大致相当，且可能没有总参谋长在陆军中的资历深，总司令有可能会憎恶所谓的无理干政。如果总司令心胸狭隘、性格倔强，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种憎恶一定会产生，除非总司令是一个脾气随和、本性软弱的人，但身居高位的人绝不应有这种特征。

当然，我的个人经验微不足道，但我曾经做过有参谋长

辅佐的总司令，也给总司令做过参谋长，“让他扬眉吐气”。身居这样的职位着实令人尴尬，我绝不会再出任这样的职位。已故查理·麦格雷戈爵士[12]担任参谋长期间，我十分幸运，他对我帮助极大。如果他摆出一副陆军统帅的姿态，我本该反对他，但我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性格倔强的人。

至此，我更多提到了战争时期而非和平年代。但即使在和平年代，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体制也不一定适合英国的军事机构，不一定适合英国相对规模较小的陆军。战争时期，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体制极易导致灾难的发生。名义总司令越没有能力，就越容易固执己见。相反，名义总司令能力越强，就越不能容忍无理取闹的干政。总之，英国军事机构中或许不可能设立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一职。我认为，英国陆军总参谋部能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履行相同的职责，没有必要扰乱目前的体制。我们只需让情报和动员部门与副官、军需官密切联系，听从副官与军需官指挥。印度正在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想你应该明白，前述评论基于这一假设：在英国军事机构中，总司令的职位由军人担任，他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如果要挂帅上阵，他最能胜任组建军队参战；为了国家，挑选陆军统帅时可以仿效德军的体制，有必要任命德军式的总参谋长做总司令和内阁的军事顾问。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充分明确、清晰界定总参谋长的职责。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

1891年9月11日

于西姆拉

1890年春签署的《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似乎证实了我的担忧。《报告》提议成立一个被称为“总参谋部”的部门，但该部

门与其要复制的范本——德国总参谋部——无任何相似之处。然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处境十分尴尬，在陆军指挥上遇到了两个问题：管理与宪法。公众期待拥有一支骁勇善战的陆军，抵御大不列颠的敌军，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政治家们一心想组建一支听命于政府的陆军。指挥军队本是皇家的特权，事实上，由英王委任顾问指挥军队的传统也一直存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希望确立这样一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举措。与邮局一样，军队是公共服务机构，受内阁管理与支配。如今的英国，其他理论都不适用。人们感情的脆弱点应得到尊重，但企图让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却触碰到了人们感情的脆弱点。皇家调查委员考虑更多的是尊重人们感情的脆弱点，而不是设立陆军部的必要性。



查理·麦格雷戈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

毫无疑问，第一要务是提防历史重演。因为发号施令的人并不完全服从陆军大臣的领导，所以试图让陆军顺应时代与国家的需要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该目标而进行的所有变革都应有助于英国应对与列强的冲突。近来，英国与列强的斗争十分激烈。

从本书对普奥战争的部分调查不难发现，普鲁士由参谋长起草指导全军的命令，参谋长没有指挥权，以总司令[13]的名义发布命令。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就是这样，普王威廉一世完全信任参谋长，无

一例外地接受他的草案、军队的行动方向；尽管参谋长并没有指挥权，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被他人的权威掩盖，但战役的谋略全部出自他之手。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谋略、策略都出自毛奇伯爵一人，这点威廉一世最清楚，与此同时，毛奇伯爵本人亦深知他受到威廉一世庇护。

一般来讲，陆军总司令拥有唯一指挥权，如果总司令并不是因为军事原因而坐拥这个职位，他最好选一个足够专业的将领来做这项工作。普鲁士就是这样，国王生来就是国王，生来就是总司令。但如果政府能够自由选择总司令，那么任总司令的人定会希望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反感助手的敦促、支配。哈廷顿勋爵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同时提议取消总司令、设立参谋长一职。这个新任的军官要就所有重要军事问题向陆军大臣提出建议，他要研究陆军的兵力和部署以及帝国的防御、制订总体防御计划，并根据计划做具体预算，总之，他要行使总司令的很多重要职责。但他并非陆军总司令，而是陆军民选总督的顾问或助手。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平民都无权带兵打仗、指挥军队。陆军必须有军事上的总司令，而这位总司令则听命于政府，得到政府支持，行使惩戒与指挥陆军的权力，同时，在面对指责时，他又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哈廷顿勋爵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对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避而不谈：战争中陆军的军事指挥问题。政府只有给予所委任的将军充分的权限去领导军事行动，战争才能进行下去。该军官有责任就所有事务、战争计划以及计划的实施情况向政府做出解释。

《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并没有陆军在战争中的指挥做任何规定。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被委以部署军事行动的职责，而不是战争临近时，政府才去挑选总司令。被选中的总司令要么是参谋长，要么另有他人。但任何一位名副其实的总司令都不会为了执行一个二手的军事计划而拿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命运做赌注。但凡总司令

有点儿自尊，都不会在这种情形下承担国防的职责，因为在制订军事计划时，他没有发表意见，并且上任时他已经来不及对既定的军事计划进行修改。因此，如果采纳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计划，就有必要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和平时期的参谋长。不过，该参谋长在和平时期并没有与军队建立起任何关系，不具备指挥军队所必需的精神权威。因此，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计划不能被采纳，因为该计划极易导致战争失败的风险。

修改前言校样时，我听到了两个公告。第一，沃尔斯利勋爵[14]要接替剑桥公爵[15]的职位；第二，尽管要保留总司令的头衔，但要更改该职位的职责，缩小该职位的权力。



沃尔斯利勋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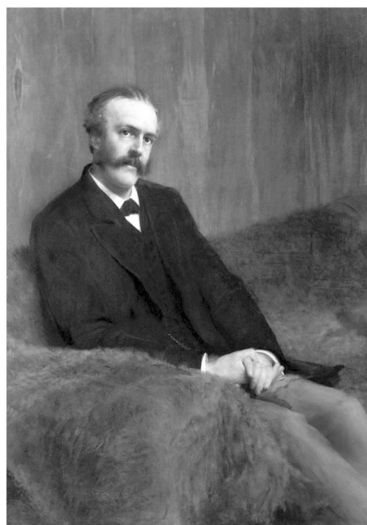


剑桥公爵

英国政府提议改变总司令的职责范围，这表明它与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有相同的忧虑。该忧虑使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陷入窘境。然而，关于新计划的公告并没有提到战争。政府考虑取消总司令对副官、军需官的领导，取消其对其他军事部门负责人的领导。

除其他事务外，军务局还负责与惩戒、训练、陆军教育直接相关的事务；部队驻扎、部队行动计划由军需官办公室负责，副官、军需官直属陆军大臣领导。也就是说，陆军总部的参谋是陆军大臣而非名义总司令的参谋，陆军大臣才是真正的陆军总司令。

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此不能草率地赞成或反对。首先要挖掘促使政府做出这一提议的动机。8月31日，在下议院讲话时，亚瑟·贝尔福[16]就政府观点做出解释。



1902年的贝尔福



1908年的贝尔福

他说："英国陆军部体制已经存在多年，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对英国陆军部体制提出批评，其主旨与实质是什么？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批评的实质在于，如果总司令大权在握，通过总司令，并且只能通过总司令才能将治理陆军的意见、陆军事务告知陆军大臣，那么，首先，总司令被赋予了任何个人都无法承担的重任；其次，陆军大臣只不过是陆军部名义上的首脑，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即使总司令与陆军大臣直接进行沟通，在行政方面陆军大臣仍然

只是总司令的傀儡，因为统军大权掌握在总司令手中。陆军大臣即使征求总司令的建议，最终也不可能对建议真正负责，原因是在议会中，陆军大臣最多是陆军总司令的喉舌，向议会传达总司令的命令罢了。

亚瑟·贝尔福认为总司令肩负的责任过重，难以承受。马尔伯勒公爵[(17)]、威灵顿公爵、拿破仑或许难以苟同。1887年，已故詹姆斯·斯蒂芬[(18)]爵士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对陆军大臣的职责进行了公正的司法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 英国陆军部体制中，首当其冲要考虑陆军大臣。我们需要注意：首先，陆军大臣职责众多；其次，他是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履行这些职责的。他承担着五种不同的重大职责，其中任何一种职责都足以耗尽一个兢兢业业、能力超群、知识渊博的人的全部时间。
>
> 首先，陆军大臣是内阁成员、议会成员。身居此位，他不仅需要关注自己部门的内部事务，还需关注当代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他需要参与重大议题的辩论，并且很多时候，需要在议会中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就这些议题发表见解。



马尔伯勒公爵



威灵顿公爵



拿破仑

其次，他是陆军政治部首脑，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他需要考虑而且要以最快速度考虑战争的全盘指挥；关于对世界各地进行远征的所有重要问题；类似于取消购买这样的政治问题；类似于《惩戒法案》这样的立法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

第三，他是军械部的首脑，需要处理所有与加农炮、小型武器、军火相关的问题，四家大型军火工厂的管理，以及形形色色色的大量军需品的管理。

第四，他需要处理所有关于防御工事、粮食供应的问

> 题。
>
> 第五，他负责计划军事预算，凌驾于其他军事部门之上，管理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英镑的公共经费。
>
> 确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履行所有这些职责。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有履行这些职责所需要的时间、精力或才智；即便能找到这样的奇才，他也将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履行职责，这些不利条件会使他无能为力。

所以如果总司令不堪重负，为了减轻总司令的负担而增加陆军大臣的职责，这样的办法肯定行不通。

亚瑟·贝尔福对此事的看法如下：

> 如果总司令大权在握，通过他并且只能通过他才能将治理军队的意见及军队事务告知陆军大臣，那么实际上，陆军大臣在此过程中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责任”一词悄然出现说明辩论过于轻率。政治术语中没有哪个词比“责任”更危险，因为没有哪个词比“责任”更容易引起歧义。确切地说，如果一个人需要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他就肩负责任。责任暗示着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责任一词具有两面性，从而使该词可用于表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有时，责任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时，责任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他人控制。通常来说，责任不等同于权力。毛奇伯爵谈到普王威廉一世肩负重任，其实他是说威廉一世承担着在重大时刻做决策的职责，这些决策通常由他的顾问提供，通过这种方法，威廉一世在世人面前掩盖了顾问的存在。毛奇伯爵并不是说威廉一世必须对这一点做出解释，除非威廉一世心存愧疚并接受历史的审判。处理与陆军的关系时，陆军大臣使用了政府权威，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与同事的意愿背道而驰。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将不能再担任陆军大臣一职。只要同事们与陆军

大臣意见统一，他就是陆军的首领。但陆军大臣几乎没有责任做解释。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形仅仅是，他所属的政党在下议院中失去多数票，他所在的内阁不得不辞职。这样的事件总有可能发生，却与陆军大臣的表现无关。陆军大臣的表现通常不会导致内阁辞职，除非由于其他原因内阁准备辞职。因此“陆军大臣的责任”一旦出现，我们就应当用更准确的话语代替它：“掌握大权的内阁如果为所欲为，那么在下议院中就有可能失去多数票。”

亚瑟·贝尔福反对总司令大权在握，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抓住他反对的根本原因。如果军队的大事小情都由总司令领导下的唯一一个部门来处理，那么，陆军大臣的权力则仅局限于处理总司令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毋容置疑，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不该同时身居此位，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如果陆军大臣只是一味地接受总司令的决策，那么陆军大臣就仅仅是形式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陆军大臣需要调查决策的根据，提出反对意见，并且重新决策，那么这样一来，总司令就成了摆设。总司令凌驾于陆军大臣之上，但二人却处理同样的事务，这种机构组织形式确实很糟糕。

亚瑟·贝尔福反对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不是因为它有悖于机构的良好组织原则，而是因为在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下，陆军大臣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使决定陆军部以及陆军内部事务的权力落入非内阁成员之手，从而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只有内阁成员团结一致，并掌控所有政府事务，内阁才能保持其权力。

在我看来，这些反对意见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我要说的是，陆军大臣的职责范围一定要超过总司令，并且我不明白由陆军大臣领导的陆军部为什么会损害内阁管理军队的合理权威。

即便这些反对意见有理有据，但如果让总司令兼任陆军大臣，所有的反对意见将不攻自破。也就是说，取消陆军大臣一职，让总司令兼任陆军大臣，同时，总司令应是内阁成员。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采

纳一个看似如此简单的计划呢？原因很简单。内阁是由贵族和议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是一个政党领袖从他的追随者中挑选的。党派契约是内阁成员之间的纽带，旨在保持其在下议院中的多数席位，而军队总司令则应当代表全体国民，而非一个政党。他是战略智慧的化身，拥有战略才华和英明的战略判断力。让总司令成为内阁成员有悖于内阁政党忠诚的原则，会破坏内阁的和谐。

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内阁才能恢复和谐：把决策权交给政党——这违背了总司令的意愿；或者使政党服从战略需要——只有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巨大压力之下，政党的领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

那么，由此可以初步断定，或者肯定地说，无论是否为内阁成员，任何军官都不能掌握统率全军的权力；必须维护内阁的绝对权力，任何军官都不能拥有超出本部门的权威；唯有陆军大臣拥有治军权。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决断很不成功，因为时局动荡不安，需要英国政府做好准备应对冲突，而不是极力维护内阁的至高权力。尽管如此，现实问题是，提议把陆军部的事务进行分工由多个部门完成是否正确。我认为这一提议糟糕透顶，因为分工有悖于要完成的工作的性质。

对陆军管理职责进行必要分工要视战争形势而定，而不是由陆军部决定。如果国家卷入危急的战争，并且我们不希望敌军成功入侵我国，国家就会动用全部或者大部分陆军抵御敌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对两种职能进行清楚的界定：战场上必须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领导军队抵御敌军，所有军官、官员都必须服从有绝对领导权的将军的领导；战场外必须有一名政府官员负责为战场上的部队输送军需物资——食品、弹药、衣物、军饷、新的士兵和战马来代替伤亡者。战场外的这位政府官员与战场上的将军不能为同一人，因为两种职责需要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履行。此外，这两种职责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或者说它们是军队指挥艺术的两个分支。战场上的总指挥需要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指挥技能；战场外供应部门的首脑必须是一名娴熟的后

勤管理者，精通物资的购买、生产以及分配，而无须精通军队纪律管理及训练。

战场上的总指挥与战场外供应部门的首脑和陆军大臣的职责不尽相同。战争中，陆军大臣的职责是协调政府的政治主张与战场上总指挥采取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陆军大臣是总司令的上级。然而，尽管掌管军事物资供应的官员形式上并不是总司令的下级，但他必须努力确保陆军在战场上的需要。

很多重要军事事务既不属于指挥部也不属于供应部管辖，士兵服役期限、征兵条件、军官的任命与提拔制度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事务的处理不仅代表军事还代表非军事的观点与利益；陆军大臣要虚心听取由他的助手组成的总理事会的意见，由内阁做最终决策，有时需经议会批准。由于战时通常需要迅速补充兵员、向部队输送大量物资，因此和平时期就需要对以上事务提前考虑并做出安排，因为做出关于国家超额占用公民的精力、时间、金钱的决策时需要十分谨慎。只有经过由资深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商讨，才能制定出这样的规章。以下是陆军事务的合理分工：指挥部负责军队的惩戒与训练、组织军队参战、行动部署、和平时期以及战时部队的调遣与分配以及出谋划策——这些都是总司令的职责范围；与指挥部平行的是供应部。供应部设法为总司令提供组装战斗武器以及保证战斗武器正常运行的物资；政府的权威通常由陆军大臣来行使。在政府的权威之下，指挥部与供应部协同作战。根据国家政策以及国库状况，陆军大臣调控各个部门的支出。陆军大臣还负责大议会，制定条款，规定由于国防需要国家有权减少对公民在财务、财产和个人方面的服务。

只有提前调查战争形势，和平时期就采用战时所必需的职责分工，才能真正解决亚瑟·贝尔福提出的问题。陆军的内部事务确实应由一个部门负责，但该部门的首脑不应是陆军大臣，而是总司令。总司令一职并不等同于陆军大臣。陆军大臣代表内阁处理与陆军的关系。陆军大臣应当主要考虑国家政策以及如何运用军事手段让政策取得实

效。试图让陆军大臣掌管陆军，证明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考虑过陆军大臣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因此，治国理政观念的缺乏会让陆军的管理陷入窘境。

我不再具体讨论战争中德国陆军机构组织原则在英国陆军中的应用。在《帝国的防御》最后一章中，我和查理·笛尔克(19)爵士就此问题做了详细讨论。这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非批评。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德国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于支持哈廷顿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或政府的提案。对那些从国家防御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而言，这些建议或提案既多此一举、鲁莽冲动又不合时宜。

---

(1) 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什（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1833—1908），第八世德文郡公爵，英国著名政治家，1858—1891年称“哈廷顿勋爵”。1857年入选下议院，其后在帕麦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的政府中任陆军大臣（1866），后来在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第一届政府中任邮政大臣（1868—1871）、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1871—1874）。1875年自由党竞选失败后，他成为下议院反对党领袖。

(2)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是英联邦国家就调查某个重大问题而成立的临时公共问讯机构。该机构拥有强大的权力，它的权力甚至高于法官。

(3) 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尚未统一。普鲁士曾是德国一个最大的邦国。德国总参谋部当时称普鲁士总参谋部。本书涉及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两个时期。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使用普鲁士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两种称谓。

(4) 收于《毛奇文集》，第5卷，298—299页。《德国总参谋部》一书中有我对这一段的全部翻译。——原注

(5) 迄今为止，毛奇元帅关于1864年丹麦战争的重要军事信件竟然被英国军事作家忽视，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原注

(6) 第一版中，毛奇伯爵不希望公之于众的内容已经删除，引用他信中的话来代替。为了使信的内容更易理解，第二版刊登了原文。第二版中，为了

更加简洁、明了，最后一章被缩简。根据毛奇伯爵阅读校样时的标注，经过慎重考虑，有一两处措辞略微做了修改。——原注

(7) 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832—1914），英国陆军元帅，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著名军事家。他先后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起义（1857）、远征埃塞俄比亚（1868）、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并曾任英国陆军总司令，因功勋卓著而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嘉德勋章。

(8) 罗伯特·霍姆把近年来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编纂成《现代战术概要》一书。——原注

(9) 布吕歇尔即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瓦尔施塔特公爵，因为参加莱比锡战役（1813）、滑铁卢战役（1815）而声名远扬。布吕歇尔原在瑞士军队效力，1760年在波美拉尼亚战役中，他被普鲁士军队俘获，而后加入普鲁士陆军，后来在七年战争中做轻骑兵军官。1773年，因反抗腓特烈大帝被迫辞职，一直务农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驾崩。1786年，他官复原职并被提拔为陆军上校，后来晋升为少将（1794）和中将（1801）。1813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七十一岁高龄的布吕歇尔重新挂帅，指挥了著名的吕岑战役、包岑战役、卡茨巴赫战役、莱比锡战役。他是柏林、汉堡、罗斯托克的荣誉市民。

(10) 沙恩霍斯特即格哈德·约翰·大卫·维特兹·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Waitz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及将军。他出生于汉诺威，1801年转入普鲁士军队，次年任柏林高级军官学校校长。他以军事理论和军事改革著称，著有《炮兵研究指南》《军官手册》等。

(11) 格奈瑟瑙即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著名军事改革家。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指挥了1814年的巴黎战役，率领普鲁士军队直捣法国的心脏，直接导致拿破仑退位。1815年滑铁卢之战中，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2) 查理·麦格雷戈（Charles Metcalfe MacGregor，1840—1887），英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及英属印度陆军军需官、情报部长，曾跟随弗雷德里克·罗伯茨伯爵参加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

(13) 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71年，威廉一世即德意志第二帝国皇

位，称“德皇威廉一世”。他的孙子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原注

(14) 沃尔斯利勋爵即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陆军元帅。他参加过英军在缅甸、克里米亚的战争，镇压印度民族起义。

(15) 剑桥公爵是指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Princ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1819—1904），英王乔治三世的孙子。他受封剑桥公爵（1850），曾任英国陆军元帅兼陆军总司令（1856—1895）。

(16) 即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第一代贝尔福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191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17) 马尔伯勒公爵即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英国政治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格兰和荷兰联军总司令。

(18) 詹姆斯·史帝芬（James Stephen，1789—1859），英国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副大臣（1836—1847），在实施《废除奴隶制法案》中起到重要作用。

(19) 查理·笛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843—1911），英国自由派政治家。19世纪70年代早期，他是托利党成员，后来成为反辉格党运动的领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一度被吹捧为未来首相的人选，最终因1885年臭名昭著的离婚案而没能成为首相。

第2章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

精彩看点

> 7月2日的政治、军事形势——普鲁士陆军的方位——该区域的地形——腓特烈·查理亲王推测奥地利陆军的方位——为7月3日与奥军决战作相关部署——普军发现奥军的真正方位——位于伊钦的大本营重新向第二集团军下达命令——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1866年7月2日是星期一。这天下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随行人员驾车驶入位于克尔科诺谢山南部北波希米亚山区的小镇——伊钦。威廉一世气宇轩昂、英姿飒爽，数十年的执政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记。他言谈慷慨激昂，没有一丝忧虑。经过数月的疲惫外交，德意志联邦议会做出决议，大意是普鲁士违反了“联邦的和平”，德意志联邦军队即将出动讨伐普鲁士。决议做出不到三周，政治危机更加激化，这意味着普鲁士将与萨克森、汉诺威、黑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奥地利帝国同时交战。除了这些敌人，普鲁士还得考虑那些各有图谋的友好国家。俄国是乐善好施的旁观者；意大利是积极的盟友，尽管战斗力不强，却能牵制一部分奥地利军队；法国爱管闲事，但此时态度尚不明确，很可能根据时局变化选边站队，并且法国大使意欲对普鲁士国王表示不敬。与此同时，普鲁士国内也是困难重重。普鲁士议会代表自由派选民，极其反对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政策。由于两周来一直担心复杂的军事行动，威廉一世于周六早晨离开柏林，亲自视察部队。此前通过军事行动，普鲁士成功击败汉诺威军队，并且不动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萨克森王国。



克尔科诺谢山地形图



普奥战争时期的柏林

6月22日，普鲁士两个军团分别接到命令，对波希米亚发起进攻。6月29日，两个军团均越过了位于波希米亚北部的大山。这座山是波希米亚的屏障，就如壁垒般。它们离伊钦仅有几个小时车程，途中零星分布着一些村庄。再行军一天，两个军团就能在伊钦会师。经过一周的艰苦战斗，士兵们已疲惫不堪。率领十一万五千名士兵从西里西亚归来的腓特烈王储与奥地利陆军各部进行了三场硝烟弥漫的战役和三场激烈的前哨战。他的部队驻扎在易北河左岸，总部位于克尼格霍夫，距伊钦正东二十英里[(1)]。威廉一世的侄子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另一支共十四万人的大军。他们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但因为部署不周，所以士兵们厌倦了不必要的行军。腓特烈·查理亲王亲自从其位于卡梅涅茨的大本营出发前往伊钦大本营汇报。他的大本营距伊钦六七英里。

当时，奥地利军队的确切行踪不明。据推测，奥军可能驻扎在易北河的另一岸。易北河与位于牛津边上的伊西斯河流域面积大致相等。易北河由北向南蜿蜒向东流去。从克尼格霍夫到克尼格雷茨直线距离二十五英里，方向正南正北。如果把这条直线看作弓弦，易北河就相当于弓，约瑟夫[(2)]的要塞就是弓的把手。作为弓的最南端，克尼格雷茨与伊钦平行，距伊钦二十七英里。一条大路几乎与这条直线并

行。周一下午，位于伊钦的大本营揣测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易北河东岸，其侧翼被克尼格雷茨和约瑟夫的要塞环绕。这个位置易守难攻。因此，总参谋部决定让两个普鲁士军团次日休整，召集军官们研究方案，准备改变战术。

返回位于卡梅涅茨大本营的途中，腓特烈·查理亲王得知整个预测都是错误的。对克尼格雷茨进行侦察的军官发现比斯特里兹溪旁大路两边有大量奥地利军队警戒。比斯特里兹溪几乎与易北河平行，距易北河大约七英里。比较几个情报后，腓特烈·查理亲王发现比斯特里兹溪附近至少有四个奥地利军团。据此，他推测奥军将于次日清晨发动进攻，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于次日天亮前率先发起攻击。晚上9时，他发布了行动命令，9时45分给在克尼格霍夫的腓特烈王储写了一封信，请求对方向约瑟夫派一两个军团，牵制那里的奥军。他派参谋长前往伊钦向威廉一世汇报。参谋长于晚11时抵达伊钦。



腓特烈王储



腓特烈·查理亲王

威廉一世陛下[3]即刻决定，无论在比斯特里兹溪附近发现了奥地利的全部军队还是仅发现了奥地利军队的主力，都将派出所有兵力进攻易北河畔的奥军……因此，根据威廉一世陛下的旨意，毛奇伯爵立即向第二集团军（即腓特烈王储的部队）发布了命令，内容如下：

“根据第一集团军的情报，奥军共有三个军团，或许后面还会得到增援，敌军已经越过位于萨多瓦由比斯特里兹溪构成的防线。第一军团预计于清晨时分与敌军交战。

“根据命令，第一军团将于7月3日凌晨2时与霍斯兹的两个师，米德维兹的一个师，斯勒克维兹的一个师，皮斯坎尼科和布瑞斯克的两个师，格特沃瑟的骑兵团共同抗敌。

“威廉一世陛下将立即做出相关部署，尽快开始行动，

以便你军支援第一集团军，阻止敌军右翼前进。如若情况发生变化，今天下午的命令将不再有效。”

冯·毛奇

这封信函以及另一封短笺于午夜发出。另一封短笺写给驻扎在伊钦和克尼格霍夫之间的一个军团（这是此时第二集团军驻扎在易北河西岸的唯一一支军队）总指挥，信中要求总指挥等待腓特烈王储的指令。

事实上，奥地利-萨克森联军（共八个军团）都聚集在易北河与比斯特里兹溪之间。他们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捍卫比斯特里兹溪左岸、面朝西的战略要地。如果腓特烈·查理亲王的行动得不到支援，7月3日就有可能成为普鲁士军队的灾难日：第一集团军将与兵力强大、几乎两倍于自己的敌军交战；第二集团军向约瑟夫派遣一个军团，但几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第二集团军的其余兵力相距遥远，无法及时与第一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伊钦的命令正合时宜：在不妨碍腓特烈·查理亲王进攻的前提下，第二集团军奉命在最有效的方位——敌军的侧翼，发动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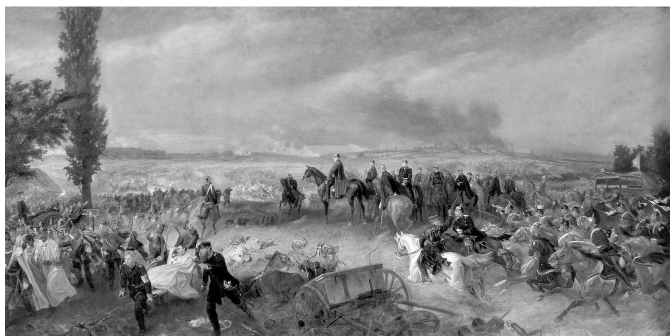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晨，正如所料，奥地利军队兵力充足，在第一集团军进攻过程中，奥军显示出顽强的抵抗力。腓特烈·查理亲王只能牵制奥地利军队，等待第二集团军支援。那日，腓特烈王储的主力师的进攻让战斗分出了胜负，主力师攻占了克鲁姆——奥军阵地的要隘，奥军形势危急，这次战斗乃至整个战局胜负已定。7月2日夜间11时至12时在伊钦雄狮酒店形成的决议确保了克尼格雷茨战役的胜利。克尼格雷茨战役可能是当代规模最大、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普军与奥军在克尼格雷茨激战



两军骑兵混战



威廉一世亲临克尼格雷茨战场



战后的克尼格雷茨



克尼格雷茨之战结束后，威廉一世与腓特烈皇储握手

---

(1) 1英里约为1.6千米。

(2) 自1850年起，维也纳划分为八个区，约瑟夫就是第八个区。

(3) 《1866年普奥战争》，第249页，德意志总参谋部战争事务处第二处出版发行。——原注

第3章　幕后

精彩看点

> 国王威廉一世取得军事成功的秘密——选定唯一的顾问——坚决执行顾问的决议——参谋长一职的历史由来——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伊钦大本营的行动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人谦逊，他自知才疏学浅，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腓特烈·查理·亚历山大[1]说："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我应该只是个军士长。"那么，他是如何迅速做出决断，取得重大胜利，成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偶像的呢？一位研究1859年意大利战役的普鲁士历史学家给出了答案。这位历史学家写道：

> 历史上，有些统帅不与人商讨就可独自做出决断，周围的人只需执行命令，这样的统帅往往是旷世奇才。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陆军总司令不会对他人的建议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建议很可能是训练有素、极有经验的人讨论后形成的正确判断。然而，即便在这些建议中，也只有一个可以被采纳。军事等级机构就算在思想上也有从属关系。建议只能由专人提交给总司令，供其考虑。选择顾问不是看军衔或资历，而是依靠总司令对顾问的绝对信任。尽管顾问给出的建议并不总是最佳选择，但如果始终如一地按照顾问的建议采取行动，顾问的军事主导思想一经采纳就会被坚定地执行，那么事情总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与顾问不同的是，一切功过都属于总司令。



腓特烈·查理·亚历山大



腓特烈大帝

> 如果总司令周围有一群各自为战、互无联系的人，那么这种人越多，越聪明，越自以为是，事情就越糟糕。总司令一会儿听这个人的，一会儿听那个人的；一会儿执行相对较明智的举措，一会儿采纳另一个更加明智的计划，然后又觉得第三个顾问的反对意见、第四个顾问的补救措施更合情合理，被其说服——极有可能的是，尽管每个策略都有理有据，但总司令却屡战屡败。

依据普鲁士的制度，陆军总参谋长是国王任命的最具权威的顾问。尽管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2)]时期，总参谋部只是隶属于战争部的和平调停机构，总参谋长这一职位已开始变得尤其重要。在此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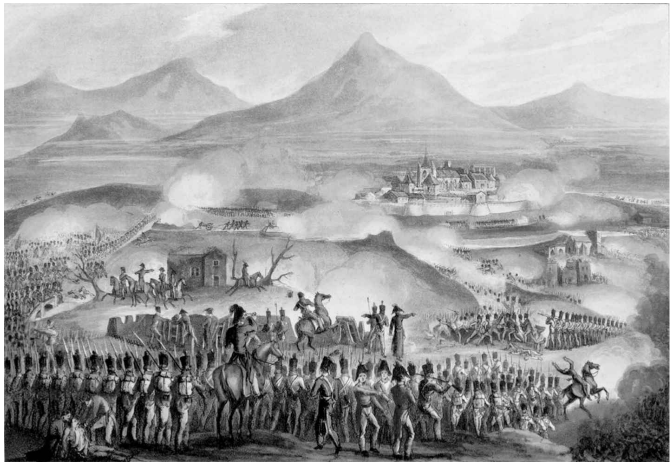
与拿破仑作战的普鲁士军队中没有能与拿破仑匹敌的人，普王只能任命布吕歇尔为统帅，由沙恩霍斯特辅佐，沙恩霍斯特死后由格奈瑟瑙辅佐。1815年和平来临后，总参谋部正式成立。1821年，卡尔·冯·米夫林[(3)]成为总参谋长。根据规定，卡尔·冯·米夫林直接对普王负责，总参谋部不再隶属于战争部。在战争部之外设立独立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分工的进步，说明普鲁士军队需要一个全新的机构行使战争部之前没有被很好行使的职能。战争部、总参谋部分设后，战争部负责军队的招募、维护与管理；总参谋部战争时期负责统率军队，和平时期负责为战时做准备。为了让总参谋部集中精力指挥陆军作战，不受日常琐事的干扰，总参谋部被设为一个独立机构。1829年，陆军中将威廉·冯·克劳泽内克[(4)]接替卡尔·冯·米夫林；1848年，陆军中将卡尔·冯·赖赫尔[(5)]接替威廉·冯·克劳泽内克；1857年，卡尔·冯·赖赫尔将军死后，总参谋长一职由少将冯·毛奇接任。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的行动很好地说明了总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的分工。冯·福伊格茨·雷茨[(6)]将军——腓特烈·查理亲王统帅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部参谋长——抵达伊钦准备向国王汇报时，威廉一世正准备就寝。威廉一世派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去见毛奇。威廉一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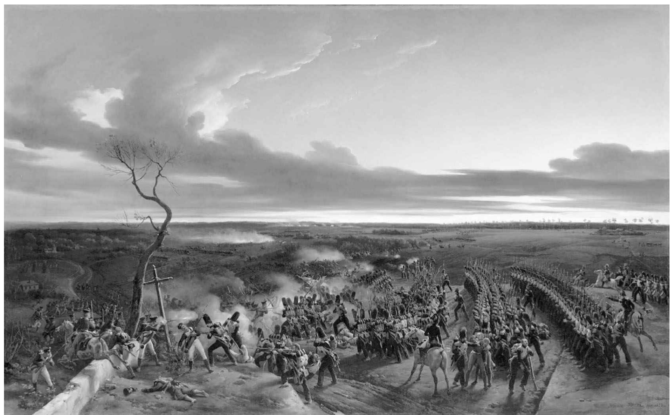
> 如果毛奇伯爵认为情报至关重要，需要重新做出部署，无论多晚，让毛奇伯爵前来听命。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莱比锡战役：俄军、普军与奥军集结待命，准备进攻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图卢兹战役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蒙米拉伊尔战役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巴黎战役

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来到毛奇伯爵的住处，向他做了汇报。毛奇伯爵做出决策，然后去见威廉一世，并向威廉一世阐明观点：无论全部还是仅有部分奥地利军队驻扎在萨多瓦，都应同时派出两个集团军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从两侧同时发动进攻一定会让普鲁士军队赢得最佳机会，最终大获全胜，这正是普鲁士军队所希望的。即使奥地利军队兵力众多，普鲁士军队也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威廉一世马上批准了毛奇伯爵的建议。接下来，毛奇伯爵写了两个便笺，立刻派人发出。

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抵达伊钦时已是夜里11时。便笺于午夜时分发出。短短一小时内，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分别向国王威廉一世和毛奇伯爵做了汇报，毛奇伯爵深思熟虑并做出决策，来到威廉一世的住所，写下便笺，并将便笺发出。由此看来，中间没有经过商讨。在此刻，首次重大战役即将打响之际，威廉一世已经对毛奇伯爵建立起了深深的信任，如同四年后一样。

---

(1) 也就是腓特烈·查理亲王的父亲。——原注

(2) 即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1813—1814），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七国联军于1813年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1814年进攻法国，占领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其中重要的战役有吕岑战役、包岑战役、德累斯顿战役。其中的莱比锡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战役。

(3) 卡尔·冯·米夫林（Karl Freiherr von Müffling，1775—185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滑铁卢战役期间，他担任布吕歇尔的联络官，是最终击败拿破仑的筹划者之一。作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首任参谋长，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地形学和制图学颇有研究。

(4) 威廉·冯·克劳泽内克（Wilhelm von Krauseneck，1774—1850），曾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829—1848），接替卡尔·冯·米夫林的工作。他曾在1834到1835年考虑过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和持续的研究。

(5) 卡尔·冯·赖赫尔（Karl von Reyher，1786—1857），曾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848—1857）。他尤其注重对总参谋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他规定，从事总参谋部勤务的军官必须在普通军事学校学习三年，在测绘局工作三年，夏季从事野外测绘勤务，冬季从事军事科学工作。他十分注重新技术在军事中的运用。1848年，即他任总参谋长的第一年，便将后膛枪引入普军。1855年，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内外铁路运输能力的报告，将铁路纳入作战计划之中。在赖赫尔与战争部长博因的合作下，总参谋部的特殊地位逐渐显露出来。

(6) 冯·福伊格茨·雷茨（von Voigts-Rhetz，1809—1877），普鲁士将军。1827年入伍，先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1833—1835），后在地形师服役（1837），接着在总参谋部工作（1839）。他历任上尉（1841）、陆军少校（1847）、第五军团参谋长（1852）、陆军上校（1855）、陆军少将（1858）、战争部长（1859）、陆军中将（1863）。普奥战争期间，他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普法战争期间，他加入第二集团军。

第4章　五条简短的命令

精彩看点

> 　　普鲁士军事体制的职责分工与专门责任机构——少量、简短的命令充分说明普鲁士军事体制的简洁性

在某种意义上，1866年7月2日的决策并无非凡之处。如果两个集团军在同一战线作战，彼此相距仅一天的路程，并且敌军与两个集团军各相距一天的路程，判断两个集团军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并不难，研究中解决此类问题也很容易。普鲁士陆军尽管掌握的情报并不完整，但还是能根据军事常识在伊钦部署行动。形势看似简单明了，但在战争中确保能制订出这样的行动计划也绝非易事。军事评论说，如果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1)]元帅的行动计划合情合理并被贯彻始终，失败或许可以避免——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后聪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在于其军队体制使军事常识在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以便在需要时能加以应用——这样的军事分工很明智。

陆军总部有诸多事务需要管理。和平时期负责征兵、训练，部队的衣、食及装备，传达命令，维护军纪。战时，陆军总部需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确保下属能执行规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总部要日日甚至时刻关注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普鲁士军事制度规定，总参谋长只需负责各集团军的军事行动，把每个新情况都视为战略问题看待，并对军事行动方案做出解释。这些军事行动方案是总参谋长知识与经验积累的成果。与肩负重担、为许多事务分心的总司令相比，身居此位的总参谋长无须担心被其他事务打扰，为过多职责分心。他能明辨局势，沉着应对。按照类型对军务进行分类，把每项工作交给训练有素之人；有专门责任机构，依据监管范围，减轻军官们处理烦琐事务的负担；陆军被分成几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因此，总参谋长只需考虑战役中的重大问题以及麾下两三个集团军要参加的行动的目标。总参谋长向各集团军总司令下达战役的总目标、分配任务，每个集团军的负责人又把自己的军团或师[(2)]分成许多分队。除了确定战役目标外，每个集团军的负责人还须确定战役的总体方向，这些是军团或师的总司令不能自行决定的，军团或师的总司令和参谋可自行安排行动的具体细节。



1849年的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



1866年的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

普鲁士军队简便、高效的体制减轻了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压力，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866年6月21日，普鲁士军事谈判代表向奥地利哨兵递交了战书。当时，第一集团军集结在萨克森与西里西亚的边境上，第二集团军集结在尼斯附近。从6月21日到决战打响，有记载称威廉一世的大本营只发出了五条简短的命令。

第一条命令

6月2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柏林向位于格尔利茨和尼斯的两个集团军发电：“国王陛下命令两个集团军向波希米亚挺进，在伊钦方向会师。”

同日，威廉一世写信详细解释电报内容，并对腓特烈·查理亲王补充道，由于第二集团军肩负翻越苏台德山脉的重任，第一集团军必须加速前进，以解第二集团军的燃眉之急。

第二条命令

6月29日，国王威廉一世在柏林向腓特烈·查理亲王发电："第二集团军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但目前处境仍十分艰难。国王陛下希望第一集团军加速前进，救第二集团军于水火之中。"

由于腓特烈·查理亲王行动迟疑、缓慢，丧失了很多时间，国王威廉一世向腓特烈·查理亲王重申了他的命令。

第三条命令

6月30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克霍弗特向两个集团军发电（此时国王正在离开柏林前往部队的途中）："命令第二集团军在易北河休整，第一集团军朝克尼格雷茨挺进。"（因为形势发生变化，所以第一条命令被修改）

第四条命令

7月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伊钦命令两个集团军于7月3日进行休整，对前方及奥地利军队的驻地进行侦察。当晚，该命令被取消。

第五条命令

毛奇向腓特烈王储下达的命令(3)。

这些命令简短、易懂，与陆军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异曲同工。周一午夜时分，毛奇在伊钦写信给腓特烈王储。周二凌晨4时，信就被送到了腓特烈王储位于克尼格霍夫的大本营。凌晨5时，第二集团军参

谋长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4]将军下达命令，长约二十行。

> 根据收到的情报，预计敌军将于今日进攻位于霍斯兹、米洛维兹和斯勒克维兹的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前往支援，命令如下：
>
> 第一军团分两路纵队沿赞布勒斯和格托丁向格布格里茨进军。
>
> ……

第二军团军令亦如此。每句两行，共五句话的命令指导着十一万五千名陆军（四个军团与一个骑兵师）。这些命令足矣。各军团由各自的参谋长辅佐军团总司令做具体安排。



高级军事会议。最靠左而站者是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



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与同僚亲切握手，站在他旁边穿白衣者是俾斯麦

---

(1) 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August Ritter von Benede，1804—1881），奥地利帝国陆军元帅。1822年在奥地利陆军服役。他在平息加利西亚叛乱（1846）、反撒丁王国的库尔塔托尼之战（1849）、文森之战（1849）和第一次库拉托扎之战（1849）中功勋卓著，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1846）、玛利亚·特蕾莎骑士勋章（1849）。他历任第二军团司令（1857）、第八军团司令（1859）、总参谋长兼匈牙利总督（1860）、意大利奥军司令官并晋升陆军元帅（1861—1866）、波希米亚奥军司令（1866）。他在指挥奥军与毛奇指挥的普军在克尼格雷茨作战时失利，战败后引咎辞职，1881年在格拉茨去世。

(2) 1866年，第一集团军由师而非军团组成，第二集团军由军团组成。——原注

(3) 见本书正文第44页。

(4) 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Leonhard von Blumenthal，1810—1900），普鲁士陆军元帅。他历任普鲁士皇家警卫军少尉（1827）、第三军团参谋长（1864、1866）、第二军团参谋长（1866）、第三军团参谋长（1866），后晋升上将（1873），被封为伯爵（1883），最后晋升陆军元帅（1888）。他在克尼格雷茨战役（1866）、色当战役（1870）和围攻巴黎（1870—1871）等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1900年在克腾附近的奎伦多夫去世。

第5章　战役准备

精彩看点

战役准备的特性——发布动员令——集结军队——政治因素的影响——国王威廉一世一心想避免战争——战役准备过程中总参谋部要处理的问题：计算所需兵力、战场上的兵力分配、选择集结地点、根据需要成立两个集团军——部队向指定地点前进——用铁路输送兵力及随后的徒步行军——6月6日普军的方位——由于政治原因普军决定推迟开战——推迟开战使普军更加了解奥军的行动——普鲁士修改作战计划——威廉一世最终决定宣战——普军进攻萨克森——6月22日普鲁士两个集团军的方位——总结

事实上，陆军的详细行动几乎不可能在战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陆军的行动取决于敌军的行动，但战前是不可能准确预测敌军的行动的。宣战前，部队仍在自己的阵地上时，高效、英明的政府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做战斗准备。陆军可以实行战时体制，在有利时机集结。普鲁士陆军的战前准备工作不同程度上都由总参谋部负责。

首先，陆军按战时体制编制，统称为“战前动员”，包括调动预备役部队和战马；在各军团间分配预备役部队和战马，为它们提供装备；设立、完善各军团的参谋部及各种后勤保障。总参谋部已就战前行动做了具体安排、调整，以便命令一经发布，整个军事计划能在规定日期顺利进行[1]。无论战争的前线在哪里，动员的过程本质上都一样：部队在大本营待命。在普鲁士，除非做好开赴战场的充分准备，否则任何军团不会离开指挥部。

其次，在边境集结陆军是军事行动真正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与象棋比赛类似，最重要的是集结地点的选择，集结地点应选在最适合开战的地方。

按战时体制编制把陆军输送到边境是危急时刻采取的行动，这既受政治因素也受军事因素制约，对这样的行动做出正确评价不可能不考虑政治环境的影响。然而，政治环境对动员与集结军队这两个过程影响不同。动员是个机械过程。政治家们可能会敦促或放缓动员。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动员的本质没变，尽管因此引发的摩擦可能会增加。进攻或防御的直接准备就是集结陆军，但政治家们如果不愿发动进攻，就可能会影响集结可用兵力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一心想避免战争。直到1866年6月14日，他仍然决定不打第一枪，也不赞同任何有进攻倾向的举措。劝威廉一世同意备战真的很困难。当奥地利早已进行动员，即将把部队开赴边境

时，普鲁士才在5月3日至5月12日陆续发布了动员令。调动的兵力共计三十二万六千人，分成九个军团[(2)]，以及柏林的一个预备役军团[(3)]，荷尔斯泰因文工团和集结在韦茨拉尔，由德意志联邦要塞撤退的普鲁士守备部队组成的军团。5月12日至6月22日做的兵力部署安排，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部署兵力或许更像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找到答案。

战争准备的第一步是计算所需兵力[(4)]。对英国的小规模战争而言，计算兵力显然是有必要的。1882年的英埃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英国对兵力的计算可谓相当精准。两个欧洲国家交战，从一开始，双方都会认为对方会动用所有可动用的兵力。然而，很多战役的失利主要归咎于疏于计算兵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859年，奥地利军队用不足一半的陆军兵力对抗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军[(5)]。1885年，国王米兰一世在没有调集塞尔维亚全部陆军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保加利亚[(6)]。这两次失利主要归咎于最初的错误判断。

兵力的计算以对敌军可调遣兵力的估算为基础。1866年，普鲁士总参谋部不得不面对最初的困境：即便到了5月8日仍然难以确定德意志联邦的哪些州会站在普鲁士一边，哪些州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总参谋部做出最坏的假设，估计北德意志会派兵三万六千人，南德意志十万人，萨克森和奥地利二十六万四千人，共计四十万人[(7)]。毫无疑问，普鲁士必须动用全部可动用的兵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部署兵力对抗这三支敌军。根据之前的估算，按比例分配兵力，需要动用二十万五千人抵抗奥地利和萨克森，三万人抵抗北德意志，八万人抵抗南德意志。总参谋部预计，直到战争后期，南德意志的兵力才能准备就绪，所以战争初期可以忽略不计。汉诺威和黑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与普鲁士王国的主体分开，因此汉诺威和黑森是劲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它们做好准备之前发动猛攻。然而事实上，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的命运取决于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军事对抗的胜败。如果奥地利战败，普鲁士无论如何都会乘

胜追击；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中获胜，那些小国即使没有战败，也无疑会听命于奥地利。普鲁士决定动用全部陆军（八个半军团以及一个预备役军团，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人）抵抗奥地利和萨克森，动用第七军团的一半兵力以及集结在荷尔斯泰因和韦茨拉尔的少量陆军对抗德意志联邦的其余兵力。这些兵力首先迫使黑森和汉诺威的军队缴械投降（于6月29日签订《朗根萨尔察投降协定》），然后进攻并打败南德意志的军队，之后，选择陆军集结的地点，以便开始下一步行动。这是战役中最高统帅的初次行动，一旦决策错误将意味着拉开厄运的序幕。如果可能，每位将军都希望用其全部兵力去对抗敌军的分散兵力。因此，最高统帅会首先想到把军队集结在一个地方，或者至少让军队集中起来，以便所有军队能联合作战。



撒丁王国的军队与奥军激战



塞尔维亚国王米兰一世

如果在上西里西亚集结，普鲁士陆军将位于距奥地利首都最近的位置；如果在格尔利茨集结，普鲁士陆军将位于柏林或布雷斯劳与从波希米亚逼近的奥地利陆军之间。这两处一个有利于进攻，一个有利于防守，因此是最佳的集结地点。但普鲁士陆军只有一准备就绪就向维也纳进军，西里西亚的地理位置才不会失去价值。在威廉一世看来，5月中旬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可接受。然而，还有一个不容辩驳的理由反对把全部陆军集结在这两个地区，即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开展军事行动。因为从遥远的省份抵达这两个地区将耗时几周，等到军队集结完毕恐怕为时已晚，即便使用铁路运输也克服不了这个难题。由于铁轨的特性，姑且抛开距离因素，用唯一的铁路线去输送所有的军团

需要九至十二天，但通往上西里西亚只有一条铁路可用，因此，通过铁路把全部陆军输送到这两个地区将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此外，上述两个地区中没有一个足够富裕，能长时间供给如此庞大的陆军。如果战争能够避免，威廉一世决心不开战。因此，有必要让陆军在集结完成后等待几周，这意味着第一发枪打响之前，陆军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把九个军团集结成一个集团军都行不通，普鲁士需要成立各自独立的集团军，优先考虑防御。集结的中心定在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周围。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位于来自波希米亚的奥地利军队向柏林或布雷斯劳进军的铁路线上。据说，此时[8]，奥地利军队正在集结。



布雷斯劳

总参谋部根据这一决定安排军队开往前线的行动。如前所述，铁路系统不可能将军队直接、快速地输送到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总共有五条铁路通往面对萨克森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普鲁士边境地区。五条铁路的终点分别位于蔡茨、哈雷、赫茨伯格、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或者尼斯）。铁路终点的分布构成一条曲线，长达二百五十英里。同时使用五条铁路是集结军队最快、最可行的办法。以上五个地点集结了部分军队后，继续通过徒步行军的方式集结兵力。徒步行军集结全体陆军的最短路线是通往弧线中心的半径距离，但弧线的中心位于敌军的领土，因此，尽管这些路线称心如意，普鲁士在战前却无法采用。还有一条路线是徒步行军沿圆周集结，这一计划最终被采

纳。一下火车，所有军团沿弧线朝指定地点行进。

来自波森和西里西亚的军团在希维德尼察和尼斯集结[9]，向右方的兰茨胡特和瓦尔登堡挺进。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的半个军团和莱茵省的军团在蔡茨和哈雷下火车，沿萨克森边境挺进，直至易北河的源头。这些部队与来自柏林的预备役军团一起，构成易北河集团军，一旦萨克森王国的军队来攻，则继续向东行动。来自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普属萨克森的军团被编入第一集团军，由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他们起初在托尔盖德和科特布斯之间集结，然后沿边境朝格尔利茨挺进，于6月的第一个周末抵达西里西亚西边的角落[10]。当时，其余行动已经完成。

现在，总参谋部急于开战。然而，三个集团军无法在普鲁士的国土上实现协同，这样一来，某些重要区域将得不到保护。它们也不能原地等待奥地利进攻，这样会冒其中一个集团军孤军奋战、遭受敌军优势兵力打击的风险。如果它们同时朝位于奥地利的那个圆心进军也会招致同样的风险。奥地利也在做准备，每增加一天，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但威廉一世仍然认为可以调解，不允许动用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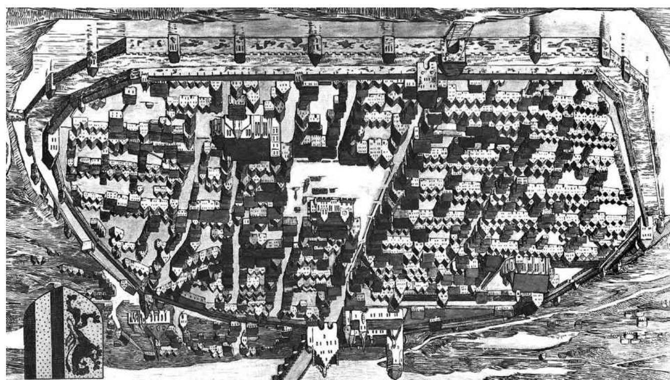
1866年6月11日，普鲁士总参谋部获悉，正如所料，欲与普鲁士作战的七个奥地利军团中有六个位于摩拉维亚，而非波希米亚。据此推断，奥地利军团打算经由尼斯向布雷斯劳进军。对于这次行动，获悉的相关数据显示奥地利军团中有五或六个军团大约会在6月19日穿越西里西亚边境。为了抵御奥地利的可能入侵，第二集团军被调往尼斯河，面朝南部署，柏林的皇家禁卫军以及第一军团前往支援。第一军团原计划乘火车向东挺进至格尔利茨，这里离布雷斯劳很近。如果奥地利军队入侵西里西亚，或者没有按预期方向进军，一旦奥地利军队进入萨克森或波希米亚，第一集团军就能直逼布雷斯劳。6月19日，上述行动执行了。同时，易北河集团军也将调往东部，加入第一集团军。但由托尔高到格尔利茨的最短路线要经过德累斯顿，因此，易北河集团军须首先占领德累斯顿。以上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政治

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866年6月14日，国会做出不友好决议，敦促国王威廉一世下决心。6月15日，普鲁士对萨克森王国宣战。6月16日，易北河集团军越过边境；6月18日，易北河集团军占领德累斯顿；6月19日，易北河集团军与位于格尔利茨由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取得联系。腓特烈·查理亲王把第一集团军聚集在格尔利茨南面的靠近萨克森王国和西里西亚的边境地区，紧邻波希米亚边境。此时，来自德累斯顿的易北河集团军迅速向第一集团军右翼靠拢，以便使两个集团军联合起来向波希米亚进军。第一集团军左翼沿克尔科诺谢山脚前进，与第二集团军会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奥地利会对西里西亚发动进攻，因此，腓特烈王储接到命令，向西行军至波希米亚与他的表兄会合。6月19日，腓特烈王储打算提前派一个军团前往兰茨胡特，让其他军团留在尼斯，准备抵抗来自南部或西部的进攻。一两天后，他的两个军团撤到山区，只有一个军团留守尼斯。普鲁士费了很大周折才骗过奥地利军团，让其相信普鲁士的所有军队仍然驻扎在尼斯，准备向摩拉维亚挺进。这就是普鲁士的两个集团军在6月22日的处境。此时，电报命令它们穿越波希米亚边境，在伊钦附近会师。

从最初的准备阶段可以看出，参谋长毛奇有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集结大量的兵力打败奥地利-萨克森联军。起初，他的部署受到政治因素限制。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就成立集团军的做法行不通。后来，国王威廉一世决定开战之前，普鲁士调集集团军应对由奥地利的部署引发的形势变化。进攻萨克森王国是全面集结的又一个阶段。6月22日，形势变得明朗——奥地利军队打算进攻西里西亚。问题在于是让第一集团军通过普鲁士领土继续朝第二集团军行进——既然奥地利的形势已经明朗，这个路线很安全——还是让两个集团军都采用最短的路线会师，然后朝波希米亚挺进，但这样会给第二集团军带来风险。参谋长大胆采用了第二种路线，结果证明很成功。



勃兰登堡



德累斯顿

---

(1) 动员的细节没有被公开，但各国复制了普鲁士体制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可用一个虚拟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和平时期一个连队拥有兵力一百二十人，并且每年有四十人会转入预备役部队，与此同时，每年招募同等数量的新兵，战时兵力为两百四十人。接到公开的动员令后，每个预备役士兵都有责任径直前往连队指挥部报到，根据其居住地与连队的距离，他们会在接到动员令的第一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赶到连队指挥部。连长有全连战士的名单，负责为两百四十名战士准备崭新的战斗装备。预备役士兵抵达后，接受体检，领取装备，然后被分派到各自的岗位上。根据分工制度所规定的职责（制定分工制度是总参谋部的主要工作），从将军到号兵会分配到最能

胜任的并且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的任务。快速、从容、确定是动员要达到的目标。——原注

(2) 和平时期，皇家禁卫军驻扎在柏林，第一至第八军团主要驻扎在以下八个省：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勃兰登堡（Brandenburg）、普属萨克森（Prussian Saxony）、波森（Posen）、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莱茵（Rhenish Prussia）。——原注

(3) 1866年5月19日召集的预备役军团。——原注

(4) “国王威廉一世坐立不安，准备向奥地利国王宣战。他询问总参谋长普鲁士一万兵力是否能抵挡奥地利两万大军。如若不行，鉴于奥地利军队还没有迫近，他将派外交使节商讨和平解决的条件。”——原注

(5) 史称“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

(6) 史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

(7) 对抗普鲁士的实际兵力为：北德意志军两万五千人；南德意志军九万四千人；奥地利及萨克森王国军队二十七万一千人；合计三十九万人。——原注

(8) 1866年5月中旬。——原注

(9) 两个军团整编为第二集团军，由腓特烈王储率领。——原注

(10) 西边的角落是指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周围地区。——原注

第6章　评论家

精彩看点

干扰评论家对战役指挥做出正确评价的因素——对指挥官的主要动机缺乏了解——军事评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草率的判断——只有充分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

除了指挥军事行动外，最难的要数对军事行动做出正确的评价了。领军打仗受诸多因素影响，历史学家往往会忽略其中很多因素。因此，评论家几乎不能确定他能否站在所研究的将军的角度看待问题。例如，评论家假设指挥官没有掌握某些情报，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评论家的评论就是以被完全歪曲的事实为基础的，即使最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无法避免犯此类错误。普鲁士总参谋部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资料宣称，奥地利的指挥官们没有觉察到腓特烈王储从尼斯向西进军，然而奥地利总参谋部的资料显示，早在6月25日腓特烈王储的集团军还没有越过边境时，奥地利指挥部就得到了详细情报。当难免犯错时，固执己见堪称鲁莽之举。不过，我们允许对普奥战争传统评价的价值提出质疑。例如，1889年3月23日，奥康纳·莫里斯先生在《论军事学院》一书中写道："毛奇伯爵的战略并不像成功人士的崇拜者所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他在进攻法国时并未试图像在伊钦那样，把位于在贝内德克率领下的敌军集中兵力攻击范围内分散的普鲁士陆军联合起来。"(1)《比利时概要》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批评，但绝无嘲讽之意。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说明毛奇伯爵究竟错在哪里，就连奥地利历史学家也宣称鉴于普鲁士的阵地位于尼斯和卢萨蒂亚，前往伊钦会师是唯一明智的路线。难道错在原先不该沿边境分散兵力？如果是这样，评论家应该说明面对当时的政治条件和战场的地形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1866年普奥战争的准备工作表明，复杂的政治形势对战争策略的选择有重大影响，这样讲不是更恰当吗？相比之下，1870年普法战争的问题要简单得多。普鲁士要对付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理由犹豫、拖延。此外，普军三十三万对抗法军二十五万，即使前提条件再不利，普鲁士总参谋部也能宣战(2)。1866年，战略家们的任务可能更简单。如果早在5月国王威廉一世就意识到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并从那时就充分授权毛奇伯爵，那么后代对普鲁士政策的评价也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但二十年后，人们很可能仍会提出这样的批评。冲突发生在德意志人之间，并且当时普遍的观点都在谴责普鲁士的政策。此外，自滑铁卢战役(3)以来，普鲁士没有重大的胜利记录在案。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一世自然会犹豫不决，而他想保护普鲁士每寸国土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因为许多年后该时期的主要人物的个人历史才会公之于众，因此，历史学家对很多东西不得而知，与此同时，评价的作用首先在于理解要评价的事件。

阅读战役中部队的行动总结，然后列举出双方将领所犯的错误不是目的所在，这只会误导读者，让读者误以为将领们通常马虎大意、懦弱无能、愚昧无知，却不能让读者明白干扰行动指挥的因素。但如果结果显示战场上采纳的策略伴随着风险，或者灾难接踵而至，企图弄清楚将军们为什么还会一如既往地使用该策略，就需要让读者了解战争的性质。这种研究方法尽管不能满足喜欢偏袒一方、散布赞扬或批评的虚荣心，却能让付出的辛苦得到回报，增强读者的洞察力，帮助读者形成正确的评价。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冲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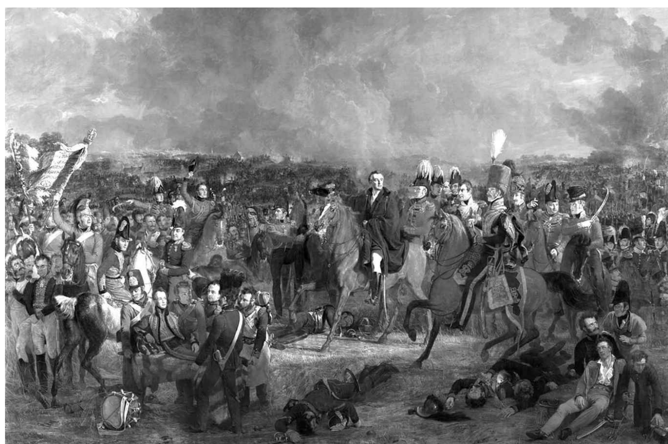
滑铁卢战役中，英军与法军鏖战



滑铁卢战役中，普军重创法军



滑铁卢战役关键时刻，威灵顿公爵激励士气



威灵顿公爵来到滑铁卢战场与将士们庆祝大捷

---

(1) 如果奥康纳·莫里斯先生在地图上标注出6月22日奥地利和普鲁士陆军的分布位置，以及“把分散的陆军集合起来”的命令发布日期等等，他会发现奥地利兵力分布的范围也并不比普鲁士两个集团军分布的范围小。——原注

(2) 《普法战争史》，德国总参谋部编，第1卷，第74页。——原注

(3) 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当时属荷兰联合王国），由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与由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进行决战，反法联军获得了决定性

胜利。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此战役也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最后一战。

第2部分　总参谋部与陆军



威廉一世

第1章　普鲁士军事机构的精神

精彩看点

> 普鲁士军官的精神——军官、教师与士兵的领袖——提拔制度——选拔高级指挥官——上级对下属的工作效率负责

总参谋部被视为“陆军大脑”，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因为如同人的大脑，总参谋部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只有与其控制的机体保持关联，并通过神经系统的分支与机体联合起来，大脑才能正常工作。那么，普鲁士陆军是怎样适应、接收来自智力中心的刺激信号的呢？

有什么样的军官，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普鲁士陆军军官们恪尽职守，才有了普鲁士陆军的稳如泰山。世界上是否有这么一群男人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职责着实令人怀疑，英国人认为：多数普鲁士军官穷得可怜，他们收入微薄，从未用过奢侈品。

1874年，威廉一世在对陆军的正式演说中这样写道：“奢侈和舒适越普遍，军官就越要庄严地面对责任，越不能忘记他还没有得到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尊贵地位，而尊贵地位也不能靠物质财富维持。萎靡不振的生活方式会损害军官的斗志，患得患失、追求舒适会严重削弱军官在国家和社会中尊贵地位的根基。”(1)这番话正说出了普鲁士军官的精神。很多军官以贫穷为荣，即使忍饥挨饿也心甘情愿，甚至兴高采烈。一些高级军官率先垂范，放弃了钟爱的雪茄，普鲁士军官的伙食决称不上美食。



19世纪70年代的德皇威廉一世



19世纪80年代的德皇威廉一世

“军官还应扮演教师与部门领导的角色。这意味着他在知识、经验、人格魅力上要胜过他人。每个军官都要勇于承担责任，无论情况多么特殊，都能以人格作担保完成使命，甚至是在无法等待命令发布的情况下。”(2)这是普鲁士军事纪律的基石，它确保了“军官的合法地位，让士兵信心满满、大家相互奉献，深信每个人都不可或缺，领袖更是举足轻重。”(3)提拔制度有利于实现官方的远大目标。资历原则

合法化，只有伤残人员退役或者总参谋部进行特别选拔时才会有所调整，没有资历原则，任何公共服务都不可能成为职业。“高级指挥权应交给能力出众、受过军事教育、品行和体力兼备的军官。”(4)此外，“将军的特殊职责在于下令确保所有要塞的司令，所有师、旅、团、营的指挥官以及他的军团中所有校级军官，只要具备战场上所需要的体力和应对特别召唤所需的智慧和能力，就能坚守岗位。一旦发现有损于军事机关正常运转的微小变化，将军有责任向我汇报。同时，将军必须向我递交优秀军官或者能胜任高级别职位的军官名单。”(5)

普鲁士军事体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从而确保该体制朝既定目标发展，这是普鲁士军事体制的首要特征，这一方法显然是成功的。

---

(1) 《普鲁士军官荣誉法庭条例》，1874年5月2日。——原注

(2) 《野战勤务条例（六）》，1887。——原注

(3) 泰纳：《旧制度》，第108页。——原注

(4) 1849年5月8日内阁发布的命令。——原注

(5) 内阁发布的命令，即1816年3月13日威廉一世在内阁做出的指示。——原注

第2章　陆军的编制

精彩看点

> 军团及其划分——连、骑兵中队、炮兵连指挥官——上级规定目标，下属自行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权力、责任的分级——上级不用为琐事费心

编制意味着对每个人的工作都做了规定；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确切职责，懂得权力与责任并存。

当代陆军以军团为作战单位。和平年代以及战争时期，普鲁士陆军均以军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每个省是一个军区[(1)]，该省的所有部队都属于某军团[(2)]，由该军团将军指挥。在军事问题上，将军拥有绝对权力，独立于战争部，直接对国王负责。除了少数问题需要经国王同意或由战争部安排外，军团内的所有大政方针最终由将军定夺，但鲜有细节问题需要将军处理。

无论何时，军团均以战时体制进行编制。在步兵中，四个连组成一个营，三个营组成一个团，两个团组成一个旅，两个步兵旅加上适当比例的骑兵和炮兵组成一个步兵师。四五个骑兵中队组成一个骑兵团，两三个骑兵团组成一个骑兵旅，两三个骑兵旅组成一个骑兵师。两三个炮兵连组成一个炮兵大队，两三个炮兵大队组成一个炮兵团，两个炮兵团组成一个炮兵旅。军团由多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或骑兵师[(3)]以及一个炮兵旅组成。

责任和权力始于基础单元——连队、骑兵中队或炮兵连。这些单元的上尉或指挥官是拥有惩戒权的级别最低的军官。和平时期他们负责训练，战争时期率领连队、骑兵中队或炮兵连打仗。中尉以及级别更低的军士协助其工作。在连队中，以步兵为例，上尉的权力最高。上尉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训练方法、时间分配和训练中要遵守的指令，他的上级无权干涉。

上级只需关注训练结果。在连队训练规定时间的最后阶段，上级会到连队视察训练结果，如果士兵没能接受良好的训诫，或者该连不能胜任营里的工作，这一切将归咎于上尉，他很可能因此失去晋升的机会。

营长接着对连队进行训练，在营队的军事演习中锤炼连队的战斗

力。营长负责为由四个连队组成的营服务，而不是干涉连队的内部事务。演习场犹如战场，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例如，“如果营队接到命令攻打农场，其营长必须向连队下达各自的任务，指示进攻地点，或者至少笼统指明前进的方向。营长要安排行动的时间，以便连队间相互配合。但各个连队如何完成指定任务，按什么样的编队战斗——营长在确认上尉们拥有必要的洞察力的前提下，会把这些以及类似的细节问题交给他们处理。”(4)

这样一来，军团中的权力和责任就有了等级。上尉军衔以上的指挥官监管由基础单元构成的团体，除非对营长直接负责的军官失职，否则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指挥官的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监管的范围越大，对细节问题的责任就越小。上级规定目标，下级可以自由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被干涉。因此，每种身份的军官都习惯了行使权力，自主做出判断。



普鲁士陆军连级指挥官。他们是拥有惩戒权的级别最低的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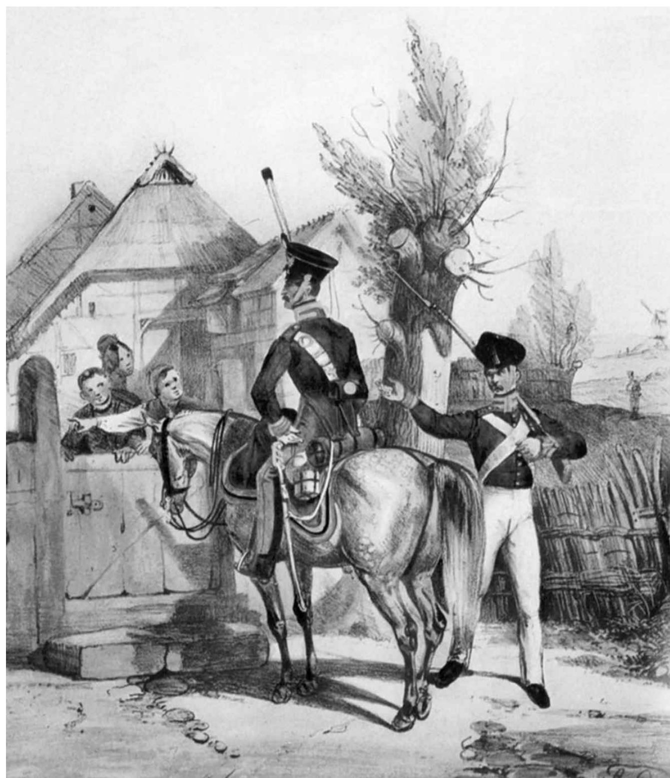
普鲁士陆军营级指挥官



普鲁士骑兵中队



训练间歇，连长向营长汇报



军事演习期间，普鲁士陆军一名军官向百姓问路

普鲁士的军事体制使指挥军团的工作和责任被下放。上校决定团务；少将决定旅务；由中将指挥的师是一个有条不紊的整体，如果需要，可以独立行动，不受军团长的监管；指挥军团的将军只需与几个下属直接打交道；步兵师、骑兵旅或骑兵师以及炮兵旅的指挥官与军团各机构的领导打交道，安排后勤保障和医疗服务。将军视察、检查各部队的工作情况，但从不越俎代庖做下属的工作，因此，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处理需要他做决策的重要事务。例如，战争中军团前进还是后退，向左推进还是向右推进；立即开战还是推迟开战；如何部署兵力，与敌军交战的兵力以及预备部队的安排。因为不受琐事的干扰，所以接到来自陆军总部的命令后，将军可以足够慎重地考虑陆军总部的意图，冷静地做决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一旦做出决策，他要以个人生命和名誉做赌注去执行该决策。

(1) 省与省之间的军事和非军事界限并不完全相同。——原注

(2) 守卫要塞的部队除外。——原注

(3) 近年来，骑兵师独立于军团之外。——原注

(4) 布卢姆：《论战略》，第136页。——原注

第3章　士兵训练体制

精彩看点

战争需要决定了和平时期军队训练的内容——军事演习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部队训练以军事演习告终——提高、检验将军的能力

“战争对军队的要求决定了和平时期的训练内容……作战期间，士兵的任务很简单——能够冲锋陷阵、熟练使用武器。只要士兵具备高品质和高智力，接受过有效的身体锻炼与军事训练，就能做到这两点。此外，只有服从指挥官意志和纪律的约束，士兵的行动才有价值。”(1)

只有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训练、指导每个新兵，上述目标才能实现，可以说，士兵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训练上。接下来是连队训练，同样要一丝不苟。连队羽翼丰满，就能在营中占据一席之地。经过一段时间，营就能在团中拥有立锥之地，进而团在各旅中获得一隅之地。军事演习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各师（有时甚至整个军团）联合进行训练，进行实战演习。

军事演习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首先，军事演习前各旅结束日常训练，通过大规模机动演习对三个兵种进行操练；通过各师甚至军团的军事演习，提高三个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通过各种军事演习，明确部队训练的进展和士兵技术掌握的程度。

军事演习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训练指挥官。模拟战争中，部队被分为敌我两方，双方指挥官从裁判处了解让双方短兵相接的模拟行动的敌我形势，像在实战中一样，了解敌军情报。

双方指挥官需要独立判断，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将军们快速、准确掌握战争形势并根据已知情报采取行动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检验。这种安排是为了尽可能让各个级别的军官都经受锻炼，通常主要受益者是将军和各旅、师或军的指挥官们。

最终，普鲁士的士兵训练体制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傀儡般的、对指挥官百依百顺的军团，任何时候都能轻易操控；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将军，游刃有余地控制着这个强大、复杂的傀儡。



参加冬季训练的普鲁士将士



实战演习中的两名普鲁士士兵



一名参谋向长官汇报演习情况



演习中的骑兵旗手

---

(1) 《野战勤务》条例一与条例二。——原注

第4章　军团

精彩看点

回顾确保军团正常运转的方法——军团内大量的行政事务——勾勒了一副普鲁士军团接到动员令后徒步行军、驻扎的虚拟画面——指挥官的双重担忧——为消除指挥官忧虑而构建的军事体制——由两至三人负责行政事务——指挥军队、管理日常事务的军事职能——副官负责日常事务

1866年，普鲁士陆军共有九个军团，现在德国陆军有二十个军团，一旦战争爆发，军团的数量还会增加。把如此庞大的部队整编成由四五个军团组成的集团军，更易于管理。显然，集团军乃至整个陆军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将军们能否对军团得心应手地指挥。前文提及一些保证军团有效运转的方法：首先，军团的各组成部分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第二，各军团要联合起来协同训练，这样才能避免“乌合之众”的弊端；第三，将军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指挥官，能看清战场形势，冷静地判断，且当机立断。一方面，选拔[(1)]、任命将军时，这些是必备素质；另一方面，军事演习为将军们提供了锻炼、检验必备素质的机会。

然而，保证将军具有战略设计能力、战术指挥能力和作战经验还不够，还必须同时保证将军不为日常管理分心。

由三万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在指定演习阵地或战场集结前，将军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除了战斗中管理、指挥部队的能力外，他还需要另一种执行能力：必须给所有士兵提供军装、武器，定期给士兵提供充足的食物。给军团提供粮食就好比养活一个小镇。不同的是，小镇原地不动，但军团每天都会移动到距原地点十到十五英里的新地点。三万名士兵中总会有人生病需要照顾，如果军团与敌军交战，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照料、转移、保护和给养。为使这个过程井然有序，需要一群特殊的官员来执行管理陆军的职能，同时还要不断从和平地区招募新兵、启用有战争经验的老兵，以此保证军团的兵员数量。



普鲁士陆军步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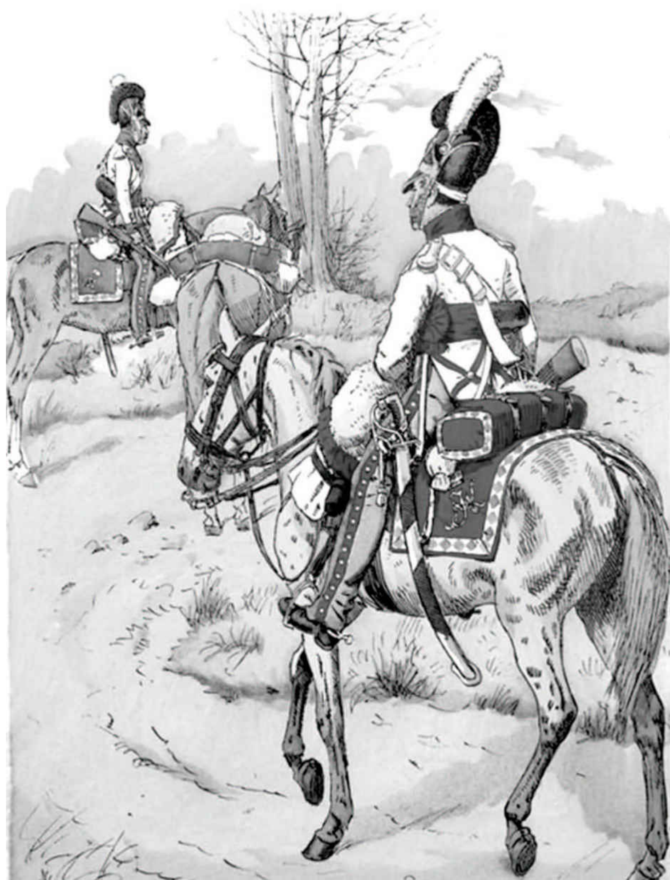
这其中的每件事情都需要被不断关注，否则整个军事机器将会发生故障并停止工作。军团的几个部门之间职责重合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盘根错节的事务而必然引发的摩擦，但指挥官对以上事务的忧虑永远无法消除。为了说明将军的众多严重忧虑，我将在下面尝试勾勒一副战役中军团运作的画面。

一个军团正沿着欧洲大陆的一条大路向西前进，道路两旁是绵延数里的大片树林，阻碍着部队走上真正的公路。骑兵师正在警戒前方树林西侧二十英里处空旷地带上的敌军，各条大路、小路、便道上，一队队轻骑兵穿越八九英里的区域，密切关注着敌军。后面两三英里处是其余的骑兵师，一列由骑马步兵、枪骑兵、骑马炮兵组成的纵队绵延两英里。走在纵队最前面的是指挥骑兵师的中将和他的参谋长。现在是上午10时，7月骄阳的炙烤下，骑马步兵枪骑兵和骑马炮兵稳健地向前跑着，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只能看见领头的骑兵中队。有时，一阵微风将尘土向南吹去，一时之间，长长的队伍尽现眼前。

两位骑手朝西北的一条大路疾驰而去。队伍的步伐放缓，开始行

走。这二人一位是年轻的轻骑兵军官，另一位是个列兵。从列兵打着绷带的胳膊可以看出他受了伤。二人满身尘土，他们的马匹极度疲乏。二人接近大路时，将军和他的随从人员继续向前，到右侧的牧场与他们会合，纵队继续沿大路前进。两位骑手礼貌地行了军礼，简短地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中将问了几个问题，两位骑手做了回答。纵队突然停下来。接下来的短暂休息中，中将口述了一封短笺，一名军官做了记录。这封短笺被交给了一位枪骑兵，他立即沿大路朝后方疾驰。几分钟后，中将发布进攻指令，所有骑马步兵和枪骑兵离开大路，小跑着穿过田野，向西北而去，不久就消失在一片凹地里。

疾驰五英里后，去送信的枪骑兵与一群躺在路边休息的同伴会合，他们的马拴在附近的草地里，其中一匹马搭着马鞍、上了马勒。信使一到，其中一人立即跳马上鞍，信使将短笺交给这位精神抖擞的骑兵，几句话过后，骑兵沿大路朝后方飞奔。就这样，短笺三次易手。第四位骑兵的目的地距森林西边界五英里。途中，他不断与行进中的部队相遇。他首先超过几队胸甲骑兵。一两英里后又超过了步兵、骑马炮兵、更多的步兵，还有一队一英里长的四轮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弹药、搭桥材料以及医疗用品，还超过了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



普鲁士枪骑兵



枪骑兵指挥官

骑兵接近树林时发现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有一英里长。之后，骑兵继续追赶军团指挥官，将短笺交给他。

天还没亮，指挥轻骑兵的中将就出发了，往前线骑行了数英里，躲过了敌军的斥候，发现了四处露营的敌军骑兵师。他能认出这个师，并确定这个骑兵师的骑兵和骑马炮兵都能征善战。返回的途中，他被敌军的巡逻兵发现，受到夹击，后来逃脱。

此次获得的情报对骑兵师乃至整个军团以及该军团所属的陆军都至关重要。骑兵师的指挥官马上根据情报做出部署。军团指挥官派一名军官带着报告和他的回执短笺前往森林东面的陆军后方总部。因为

要沿着大路走，这名军官途中赶上并超过了军团的大部队。

走在最前面的步兵旅以及许多装满枪支弹药的马车占满了道路，绵延1.75英里。军团炮兵紧随其后，绵延1.5英里。接下来的4.5英里是步兵第二师（包括骑兵团和炮兵团）。在空旷的道路上飞奔十五分钟后，这名军官到达了大路东面的树林。其间，他经过了负重的辎重部队，这是一队运输军需品的，在大路上绵延1.5英里的军用马车。每晚部队都需要这些物品，士兵们从而能舒服一些，但这些物品又不便装入背包。经过这些马车后不久，正当他要赶上军团辎重部队最前面的队伍时，他上了一条往北的交叉路。这条路上，辎重部队在大路上绵延十一二英里，马车接二连三，队伍拉得很长：载有枪支、小型武器和弹药的马车；载有三万士兵四天所需粮食的马车；载有骑兵、炮兵和马车的马匹所需干草、燕麦的马车；装有军团浮桥纵列的马车；为了运输额外的粮食，减轻军用四轮马车负担而征用的医用两轮马车和大量的农用两轮马车。

因此，将军前方五英里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从将军到辎重部队的末尾有将近十二英里。如果所有队伍同时前进，从辎重部队的前端到主力部队的末尾还有十二英里。

傍晚，骑兵带着写给军团指挥官的一封信从陆军总部返回时，看到了另一番情景。在树林中间的一个村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马车正沿大路由北向南列队。这里有一片广阔的空地。夜晚来临前，这里将挤满马车。前面的马路空旷开阔。沉重的辎重分散在十字路口，每队马车都在寻找其团队的住所。树林的西面、路边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村庄都住满了军团的部队。所以，与马路相连的空地方圆六英里内，每个农场或建筑物都被军团的连或炮兵连租用。最西面的村庄里住着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村庄旁边通往西面的所有大路、小路上，前哨站里都驻扎着哨兵。将军居住的白十字酒店位于大路旁一个布局散乱的村子里。在房屋前方，一名军官正告诉一位老农，他对村民们提供的食物很满意，必需品已经够用，但还需要更多的燕麦、

奶酪和培根，如果第二天早晨能送到，就将用现金支付。酒店的一间小会客室里，两名军官正忙着检查从这个地区的邮局取来的半打邮件袋里的东西。

楼上，刚从前哨站回来的将军正在听取汇报。军团的监督官提议在辎重队停靠的村庄建立临时补给站，第二日清晨把征用的两轮马车送回军团的铁路终点站。第二位军官说，像在同一个村庄一样，来自总部的电报晚上一定会送达。第三位军官说，有一百五十匹战马不能继续服役，来自家乡的新战马将在两天后到达补给站。还有一位军官提交了因脚痛、腹泻、中暑而不能继续前行的士兵名单。这时，大本营来信，命令将军立即准备沿树林向北挺进。这意味着辎重部队要沿穿越树林的交叉路前进。这条路崎岖不平，因此必须清理掉路上的障碍物，否则这条路将难以承受繁重的交通。

在检查邮件袋的过程中，最新的敌情被发现了。除一人外，其余军官解散。将军和他的机要秘书继续研究刚得到的情报。这时，又一名信使带着一封短笺飞奔至将军驻地。短笺的大意是南面邻近军团的先锋警戒部队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该军团指挥官请求将军立即派兵支援，以便援兵第二日正午前能加入战斗。

上面只是对现实情况的虚拟描述[(2)]，旨在说明使将军分心的事务的双重性。在行使军事指挥职能的同时，他还要行使监督管理的职能。作为指挥官，他的职责包括持续关注敌军的行动以及上司的命令，他需要研究上级指挥官的意图，并在对敌行动中遵照执行。但仅仅管理军团就需要付出全部精力，因此他很有可能忽略上级指挥官和敌军。

一个良好的体制应尽可能减轻将军管理军队的负担，使其专心研究指令、关注敌军。将权力分配给各战斗单位有助于将军行使总体指挥权，此外，还应有一个以类似管理服务原则为基础的机构，可由将军随从人员中的主任参谋对该机构进行监管。

军团监督官负责粮食、军需品、军饷的供应及运输；军医总监负责医院和救护工作；将军做决策时，军团审计员为其处理司法事务。

严格地讲，军事指挥职能分两类：对敌作战时指挥部队的职能和内部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士兵的日常生活就像例行公事。每个团都有警卫、哨兵和值日官；每个团都有巡逻队和杂役队。所有士兵轮流承担这些职责，因此，需要每天对这些职责进行合理分配。每天都会有名册说明军官和士兵的职责。各团中，副官安排内部机制的运作，指挥官监督、管理。同样，各旅、师及军团都设有副官一职。军团中由四名军官组成的办公署行使副官的职责。





普鲁士军旗



将军指挥步兵发起冲锋



将军指挥步兵射击敌人

---

(1) 近年来，由于多数被委任的将军都接受过总参谋部的特殊培训，选拔变得越加严格。不管军衔多高，只要不能胜任，就会被无情地辞退。——原注

(2) 上述场景以1875至1885年间德国陆军的战斗组织细节为基础。无法获得1866年普鲁士军团的类似报道。读者或许能够想象战争的混乱状态，尤

其在战败时，军团被迫尽量以树林作掩护撤退，而辎重队很可能被困在通往北面的交叉路上。——原注

第5章　军团参谋部

精彩看点

> 辅佐将军决定军事方向——战争时期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和平年代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军团参谋长——军团高效使用人才的原因——专业军官详细阐述军事行动计划

将军的权力包括：与陆军总部沟通、指挥部队作战；指挥部队前进、暂停和战斗；为了行动需要对该地区进行侦察；搜集、筛选敌军情报；汇编报告，向上级指挥官汇报，给军团提供纪录。

军团参谋部协助将军处理这些事务。军团参谋部包括一个由上校或中校担任的参谋长，一个校官和两个上尉[(1)]。战时，师或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如下[(2)]：

（1）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详细安排部队的战斗、行军、休整及安全保障工作。

（2）以命令的形式将安排传达下去。

（3）搜集、筛选、分析敌军情报。

（4）保证师或军团的运转效率，确保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

（5）将所有行动记录在案。

（6）侦察。

和平时期，参谋部负责为战争做准备，制定详细的动员计划，该计划需要定期更新；制订详细的行军及驻扎计划；为秋季军事演习[(3)]精心挑选地点并做相关准备；监管军团铁路及电报服务。

将军不能履职时，军团参谋部参谋长有权代表将军，并以将军的名义发布紧急命令。此外，参谋长对所有参谋有总体监管权，不仅有权管理他的直接部下，还有权管理副官、监察官、审计员。

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也是参谋部的职责之一。只有物资供应得到有力保障，行军或打仗时士兵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参谋部还要了解军事形势，以保障专门负责该事务的几个部门领导高效工作。例如，

他们必须了解何时发动进攻、何时撤退或在一场战争蓄势待发时做相应安排。因此，军团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部门负责人与指挥官之间交流的喉舌，部队行动的所有命令以及部队的部署都要经他之手，同时，他还负责搜集、筛选敌军情报。他的三个助手协助他处理琐碎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参谋长是将军的机要秘书，为将军准备重要信函；是将军的至交，他了解将军的观点和意图，能用将军的视角看问题。他熟知陆军总部的工作方法和观点，因为他曾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接受过培训，深受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影响。他熟悉军团的工作，因为战前的和平年间他就担任此职，负责安排军团军事演习。他接受的训练和经历使他非常胜任将军的得力助手这一角色，能够把将军的意图转化为具体的命令，在适当的时候把各种建议交由将军批准。

上述体制为军团贤明地使用人才提供了便利。各个管理部门井然有序，权力集中在一个能谋善断的管理者身上。尽管这位管理者的决策要提交将军批准，但几乎不会被修改或推翻。通过参谋部处理军团内部事务，将军得以全身心地关注军事行动。军事行动计划也早已为将军准备好，一组接受过特定学科——指挥技能——培训和训练的军官会详细阐述军事行动计划的细节。



秋季军事演习开始



秋季演习中的两名军官



秋季演习中的一名参谋和几名士兵

---

(1) 和平时期，通常只有一个上尉。师的指挥官具有中将军衔，总参谋部通常派具有上校或少校军衔的军官辅佐其工作。在只有一个兵种的小分队里，没有总参谋部的代表。——原注

(2) 布隆萨特·冯·舍伦道夫：《总参谋部勤务》，第1卷，第4页。——原注

(3) 秋季军事演习又称“秋季练兵”，是普鲁士传统的军事活动。

第6章　总参谋部的构成及其在陆军中的分布

精彩看点

> 参谋部自身构成一个军团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构——军官在师或团总参谋部与部队间交替工作——从事科学研究的军官放弃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参谋部的数量及其分布——军官在总参谋部与陆军各师或团参谋部间交替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对工作的影响——分散在陆军中的总参谋部成员——由精心挑选的年轻军官组成的总参谋部

德国总参谋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军团。总参谋部的军官穿特殊的制服，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团的名单里，他们的提拔申请由陆军总参谋长递交[1]。总的来讲，参谋部军官军衔的晋升要比陆军中的其他军官快。

然而，用这种方式构成的军团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关。按照规定，军官要在团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交替服役，这样就确保了军团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以及参谋部军官实践能力的提高。同第一次被委派到总参谋部一样，随后再返回总参谋部也要靠选拔，也就是说，依靠特长。

在总参谋部工作四五年后，上尉会被调到团级单位。一两年后，他可能晋升为少校，然后被再次选入总参谋部。经过一个任期，他会接管一个营，然后又回到总参谋部工作，之后被提拔，指挥一个团。他可能会从团长的职位上再次被选到总参谋部，最终以少将身份指挥一个旅。

那些被总参谋部选中做纯科学研究工作——例如地理、地形调查——的军官从事特殊的职业，放弃了在战场上领兵打仗的机会。他们属于总参谋部的一个辅助机构，被列在附属人员的名单里。一般来讲，他们都是学者而非战士，科学成就卓越却不具备战斗所需的充沛体力。他们待在辅助机构里，无需在广阔的沙场上冲锋陷阵。

总参谋部共计有两百名军官，其中九十名被分配到各师和军团[2]，大约一百名军官组成了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其中又有一半在辅助机构任职。军官们在师级或团级参谋部与总参谋部之间交替工作，勤奋、有能力的军官开始了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并且他的优异表现将保证他能定期返回总参谋部工作，他将经历陆军各师或团参谋部的工作以及中央管理机构的工作。

因此，总参谋部不仅是智慧的源泉，推动着全军的发展，还是循

环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部分与中央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总参谋部研究指挥艺术，将陆军作为战争武器，与奥地利军队、意大利军队或其他盟军合作，对抗法国军队、俄国军队及其他潜在的敌人，研究中获得的意见被广泛应用于管理陆军各部。进行全面研究时，这一中央部门的优越性由于军官具有管理步兵连、骑兵中队、炮兵连乃至师和军团的实践经验而突显。

总参谋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在特定时期组成总参谋部的两百名军官，还在于很多正在团或营锻炼的指挥官都曾有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曾在总参谋部担任过各个级别的职务。总参谋部一直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军官。每年大约有六十名低级别军官被暂时委任而没有正式入编，也就是说，还没有与原来的团脱离关系。他们是每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或陆军参谋大学的一百名陆军中尉中的精英分子，会在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一年，并由总参谋长亲自监督他们的工作。一年后，他们重新回到团级单位。团级单位任职期满后，其中的精英会晋升为上尉，就职于总参谋部，填补其他军官因升职而留下的空缺。通过这样不断选拔合适的军官，总参谋部的人数保持不变。



奥地利军队



法国军队



俄国军队

(1) 1864年3月22日的内阁命令：团长递交团属军官提拔申请。——原注

(2) 有四个德国陆军军团不属于普鲁士陆军，分别时萨克森军团、符腾堡军团和巴伐利亚军团（两个）。——原注

第3部分　总参谋部与总参谋长



毛奇伯爵

第1章　情报部

精彩看点

战前准备包括战前决定兵力分配以及往前线集结、输送兵力——总参谋部负责采集与战役部署相关的信息——总参谋部的职责划分——总参谋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对各国进行军事研究的基础——普鲁士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对敌军资源的了解情况——别国军队中的类似机构——铁路调度——地图绘制

陆军总参谋部的驻地位于柏林。作为参谋长的喉舌，总参谋部协助总参谋长工作。和平时期，总参谋长专注于准备战时部队指挥，为此，总参谋长承担的工作分为三部分：对特定的、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实际部署；对军官进行指导、技能培训；对作为造就、运用指挥能力手段的战争进行科学研究。

针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总参谋长需要亲自做的准备工作包括行动部署、预测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况、合理分布可用兵力、在边境集结军队、把部队从和平地区输送到指定地点[(1)]。做决策前，总参谋长需要对交战国及其参战军队了如指掌。

和平年代，德国总参谋部负责不断搜集、分析军事信息。根据这一职能，总参谋部下设三个师[(2)]，负责特定地区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第一师负责瑞典、挪威、俄国、土耳其和奥地利；第二师负责德国、丹麦、意大利和瑞士；第三师负责欧洲东部除俄国外的国家及美洲。关于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大家可查阅《参考书目索引》[(3)]。多年来（1869—1883），该索引每年都在印刷、出版。打开其中名为“大英帝国”的一章，读者会发现这里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在别处是找不到的。这一章的开头详细描述了这些年来军械部分别针对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国海军部的调查进展。“国家与人民”这个条目下有一系列书目，包含有最新统计数据的出版物、人口普查概要、总注册官报告概要，以及针对阐述相关问题的著作的注释。接下来的条目有机构、管理、金融、文化、移民、矿业、农业、林业以及海洋经济、海洋工业和海洋贸易，每条都很详细。通讯又细分为铁路、邮政、电报和内河航运。有几页是英国陆军这些年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出版物有英文版或外文版，包括官方出版物、争论性小册子、杂志和报纸文章。还有几页是英国海军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其所占页面较少。最后回顾了新旅行指南、旅行手册、大英帝国地图，尤其包括各县旅行指南、历史、地图及详图。各殖民地的概况紧随其后。

《参考书目索引》对欧洲各国资源详细、系统的研究为判断各国战斗力提供了依据，远比单纯搜集军事统计数据可靠。《参考书目索引》仅仅是对各国进行军事研究的基础。它不是德国总参谋部三个师的成果，而是辅助机构——地理部、统计部的成果，辅助机构为德国总参谋部的三个师提供工作所需的材料。

《参考书目索引》现已不再公开发行，但已出版的书堪称系统研究的典范，显示出德国总参谋部决策基础的深度和广度，即总参谋长制定行动计划时所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充实性。因此，1866年，开始为普奥战争做准备时，总参谋长对奥地利陆军各部的位置及状况了如指掌，能够准确判断其动员及兵力运输的时间，同奥地利人一样深知奥地利帝国继续战争所面临的困难。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总参谋部完整地掌握了敌军的军事资源和其他资源状况。



英国陆军骑兵



英国陆军步兵

我们在看过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局出版的双周刊《国外军事期刊》（自1872年起发行）后会发现，德国总参谋部所做的研究并不占据垄断地位，英国陆军情报处[4]也从事类似的工作，进行地理及统计数据研究。

前面提到，1866年普奥战争时，普鲁士陆军从和平时期的驻地被调到指定集结地点，一部分步行，一部分乘火车。普奥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一篇总结普奥战争经验的文章中，资深军事评论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5]极力主张“认真研究之后铁路对战争中行动计划总体方向即战略，所引发的改变”，并坦言该研究是“目前战争指挥艺术理论中的空白”[6]。你或许会认为，总参谋部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二十一

天内，总参谋部把一百二十到三百六十英里外的十九万七千名士兵，五万五千匹马，五千三百辆军车调到集结地，没有发生一起事故，与原定的时间表没有太大偏差。

总参谋部设有专门的师负责战时铁路调度，并试图给总参谋部的每位军官在这个特殊单位短期工作的机会。

绘制军事地图与对有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进行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不能把这两项工作交给不同机构。在德国，研究地理的主要政府机构隶属于总参谋部，该机构的军官都在增补名单上。研究地理的工作交由三个部门完成——三角学部、地形测量部和地图绘制部。国家测量局局长监管这三个部门，局长本人是陆军总参谋长的下属。

---

(1) 参考第一部分第四章。——原注

(2) 近年来，德国总参谋部机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原注

(3) 《总参谋部地理数据库》，柏林，1869—1883。——原注

(4) 参考1875年已故陆军少将、时任陆军少校的皇家学院院士布兰肯伯里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会所作的题为《国内外总参谋部的情报搜集职责》的讲座。读过该讲稿后，应记住英国陆军部情报处的创立日期。——原注

(5)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19世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拿破仑时期的将军。由于遭到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的嫉恨和排挤，安托万·亨利·约米尼于1813年毅然离开法军，投奔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俄土战争期间（1828—1829），安托万·亨利·约米尼任俄军总参谋长。他在理论上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规律、经验和教训，是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提倡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和19世纪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并称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两大权威。他有关战争和军事理论的鸿篇巨著包括：《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生涯》《战争艺术论》《法国大革命军事批判史》等。他的著作从19世纪起便成为西方国家各大军事院校的教科书，至今仍是军校学生的必读课本。

(6)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战争艺术论补编（第三版）》，巴黎，1866年。——原注

第2章　军事学院

精彩看点

普鲁士依靠教育改革再次崛起—1810年沙恩霍斯特创办高级军官学校——沙恩霍斯特早年的教育著作——1810年以来军事学院的历史——现行的规章制度——工作制度——军事学院的目标——军事学院的构成及管理——入学考试——必修实践课程——教学制度——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军事学院的课程——教学方法——战术——军事历史——参谋部实习和旅行——军事学院的教学目标与大学的理想教学目标的对比

与拿破仑初次交锋之后，腓特烈大帝缔造的普鲁士王国被粉碎。后来，依靠革新，普鲁士再次崛起。此次革新的显著特点是努力为机构尤其是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1]推动普鲁士政治改革，威廉·冯·洪堡[2]推行通才教育，而沙恩霍斯特则在陆军中同时推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沙恩霍斯特认为军事教育是军队改革的基石。1810年10月15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同一天[3]，由沙恩霍斯特将军创办的高级军官学校也开学了。它是普鲁士最高军事学府，现称军事学院。沙恩霍斯特将军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显著。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



威廉·冯·洪堡

早在1792年，沙恩霍斯特还没有经历任何战争时，他就已经出版了《军官手册》一书。书中以他那个时期的战争为例解释并阐述了实地作战的原则和细节。1793年至1794年，沙恩霍斯特参与镇压法国大革命，凭借他的初次战争经历，在汉诺威王国服役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回忆录，回忆录中突出了军事教育的重要地位。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鲁士军事机关工作，最初被派往由腓特烈大帝创办、当时仍然存在的军事学校为年轻军官授课。其间，他重新编排并拓展了教授的课程，担任学院主管，为高级军官讲授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重要课程。沙恩霍斯特1801年至1805年的讲稿被零零散散地保存下来。这些讲稿证明沙恩霍斯特不仅让学生关注推动行动计划指挥

的技能和科技，他还是让学生关注战争行动计划指挥的第一人。1805年，沙恩霍斯特为军事学院起草了规章，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主要原则，现今普鲁士高等军事教育仍保持先前教育体制的特点，只不过形式有所发展。当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爱徒，多年后，他仍然认为早年学习的课程是他撰写精彩文章的智慧源泉，让他找到了支撑所有理论的论据。1805年，动员一开始，所有讲座和课程突然中断；1806年，大灾难接踵而至。



汉诺威王国国徽

1810年创办的高级军官学校旨在对有能力、有希望晋升高级军衔的军官进行培训，有别于旨在对即将成为军官的年轻人提供专业训练的初级军官学校。高级军官学校与普鲁士总参谋部联系密切。当时，沙恩霍斯特任总参谋长，十分重视对年轻军官的培养。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高级军官学校最早的教授之一。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高级军官学校几乎停办。1815年，和平实现后，高级军官学校恢复，归军事教育监察长管理，不再由参谋长管辖。接下来漫长的和平时期中，有很多杰出人物在军事学院工作过：1818年至1830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任校长；1820年至1859年，伟大的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4]任教授。1859年，高级军官学校正式更名为军事学院。1872年，总参谋长再次接管军事学院。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李特尔

现行规章制度尽管很新颖，但也不过是从沙恩霍斯特制定的规章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制度。现行规章制度的价值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长期的、连续的传统。

两则名为《工作制度》和《教学制度》的简短准则，集中体现了军事学院的规章制度，这两则简洁的叙述性文献较好地说明了军事学院的运作模式。

“百日皇帝”德皇腓特烈三世签署了军事学院《工作制度》。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工作制度》开篇写道：“军事学院旨在让各兵种中具有一定才能的军官进入高等军事科学领域深造，从而增加、拓展他们的军事知识，加强他们做出准确军

事判断的能力。”

“除了直接接受职业训练外，军官们还要努力按照军队的要求深入了解正式学科的某些领域，掌握一至两门外语，能进行交流，从事写作。”

作为教学机构，军事学院的运转归总参谋长管辖。总参谋长负责任命教师、选拔军官进入军事学院学习（被召入军事学院）、需要时解散军官、批准没有被召集的军官偶尔听课。军事学院的校长具有上将军衔，负责军事学院的惩戒、管理。校长由一至两名助理和教学委员会协助，并对助理和教学委员会有任命权。教学委员会的职责是批准教授们的课程计划，课程开始前及结束后组织考试。军事学院的学制为三年，每年有三个月假期。被选派或征召的学生学制为一年，视其勤奋程度和品行决定是否延期。服役五年、被授予上尉军衔超过四年的军官均可向军事学院递交入学申请，是否被录取视考试成绩而定。

“入学考试的目的在于确定候选人是否具有普通教育的程度以及在军事学院学习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入学考试还要考查候选人的判断力。没有判断力，候选人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仅凭死记硬背的知识是无法回答考试中的问题的。试题要考查候选人清晰、镇定、连续表达的能力。必考的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包括正式考试和应用）、火器的特性及构造、筑城术及勘测。普通科目包括历史、地理、数学和法语。考查战术应用的试卷要尽可能简单，必须包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让候选人给出解决办法并解释原因。候选人需从几个月前公布的题目中选取一个，撰写论文并提交。文章可用德文或法文撰写，这旨在测试候选人的判断力和接受普通教育的程度。校长会将“考试成绩优异的军官（通常由教学研究委员会评判）的名单提交给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希望将这些军官招入军事学院，总数不超过100人。参谋长向各军团指挥官下达决议，由各军团指挥官通知相关军官。”

《工作制度》规定，军事学院的教学中决不能忽略实际应用：

作为对讲座的补充，在教授们的带领下，学生们要参观军工厂、技术学院、柏林和施潘道[(5)]的训练场及要塞。学生们要参加铁道军事机构的训练，沿着军用铁路边旅行边学习。

战术、防御工事、运输方面的课程要有实践训练做补充。此外，第一与第二学年过后的假期中的部分时间，由于教学需要，每名军官都将被派往另外两个军种的团级单位实习，尽管他并不属于该军种。最后，第三学年末，军官要执勤三周，实践参谋职责。



1888年3月9日，腓特烈三世登基时的画像



1888年6月15日，腓特烈三世驾崩。在位九十九天，史称“百日皇帝”

《工作制度》本身并不涉及教学范围和方法，但《工作制度》中说明，陆军总参谋部即将发布的《教学制度》会就教学范围和教学方法做出具体规定。

毛奇伯爵在总参谋长任期快结束时颁布了军事学院现行的《教学制度》(6)。只有再现其中的主要条款，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该教学制度的价值。但对教育机构的准确评判必须以比较标准为基础。比较标准是人们乐于接受的、用于衡量事物完美程度的原则。目前，这样的范例在最佳的大学培养模式中可以找到，其精髓可用几句话概括。

针对成人而非儿童的教学体制不是为了弥补早期教育的不足，而是致力于培养一些接受过训练、服从管制的人，因此不能机械管理。在智能教育中，教学制度不做作，富有理性，根据培养目标，对科目进行分类。对学生而言，只要他做好准备，取得新进展将水到渠成。课程具有统一性、完整性，这对学生品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高等教育独树一帜，以科学理念为基础，不只为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恰当的方法了解、领悟各个领域的知识”(7)。高等教育是学习方法的传授，这个观念大大影响了实践。学生一旦成熟起来，

就会放弃普通领域知识的学习，专攻某一领域[8]。相关领域中，他不仅是追随者，还是独立的学者，能独立分析并做出判断，与老师共同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交流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一辈与年轻一代思想交流的过程。”[9]

从教育的观点来讲，毛奇伯爵的《教学制度》值得深入研究。下面谨列出其开篇段落的全文：

学习的课程

根据军事学院的建校宗旨，学习的课程旨在让学生接受全面的专业教育，决不能在一般学科研究的广泛领域中迷失方向。

完好的正规教育是接受全面军事专业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专业学习期间决不能忽略正规教育以及普通智力和判断力的强化。根据学生在军训队、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及工兵学校掌握的知识情况以及体育常识进行课程设置。我们强调，通过记忆简单重复已有的知识远远不够，所有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高层次的训练，因此必须独具特色，完全不受非军事学校的束缚。

在服五年兵役的过程中，军官们获得的实践能力在很多方面为教学打下了基础。

教学方法

在军事学院，各科目的教学从基础知识开始，目的在于加深、拓展对已学知识的理解。随着课程的深入，教学转向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军官按照当代战争的要求

做好充分准备。形式科学[10]的教学方法有别于军事科目。形式科学教学采用讲座形式，学员理解、记忆讲座的内容，军事科目要求学生应用并充分利用所学知识。此外，师生间积极的意见交流、激励学生共同研究也很重要。在一人讲解、其他人倾听的课堂上，合作的激励效应是绝对看不到的，只有教师清晰的讲解加上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具体实践中才能产生激励效应。因此，在纯理论的军事科目讲座中要尽可能增加实例，解释细节时要结合地图。此外，在讲座过程中，要不断鼓励学生发表原创性讲演。准备讲演的过程能促使学生形成独立的见解。讲演的题目应与军事相关，不能只与形式科学相关。

教师如果能够凭借语言能力和个人魅力让学生的智力获得发展，使其渴望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充分激起学生为自己而学的意念，那么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军事学院向学生教授的不是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知识，而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已经掌握和自己推断出来的理论情况决定是否开设新科目。

至此，《教学制度》的基本框架被搭建起来。《教学制度》继续评述军事学院教授的科目，针对每门科目说明学习该科目的原因及授课方法。

以下是四门主要科目，让我们对军事学院的教学体制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战术

战术教学为重中之重。战术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我国及邻国军队现行的战术规则；通过讲授、设置问题让学生熟悉当代战争千变万化的状况。

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我国军队机构和战术形式的

历史发展梗概；训练手册、野战勤务条例、步枪射击训练等对部队实战极其重要的课程；当代欧洲战斗形式详解。

除正规教学外，涉及德军行军、打仗、休整的战术规则应通过设置问题进行解释，其中包括各兵种联合作战。解决此类复杂问题的重点在于各兵种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

第二、第三学年只开设应用战术学。第二学年系统学习步兵师、骑兵师勤务，尤其是关于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方面的相关问题。第三学年学习军团在军队中的作用。

教师应致力于通过讲解战斗实例，在地图上练习指挥作战以及实战训练，使教学具有启发性。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讲授当代及近期战争经验，教师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二、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讲座是和平时期教授战争、真正唤醒学生研究重要战役兴趣的有效方式。讲座要强调，应对不断变化的作战方式是优秀指挥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突出杰出人物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以及与单纯物质手段相比精神力量的重要性。

讲座决不是对一系列军事事件互无关联的描述，而应注重事件之间的偶然联系，关注领导能力，同时阐明每个时期的战争主张。如果教师能通过讲座成功地训练学生的判断能力，讲座就很有意义。

这里所说的判断能力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负面评论，而是应当怎样做、怎样决断之类的明确建议。

第一学年的讲座应涉及腓特烈大帝时期一个或多个战役；第二学年涉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役或者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役；第三学年涉及拿破仑一世之后的战役，尤其是德皇威廉一世时期的战役。

三、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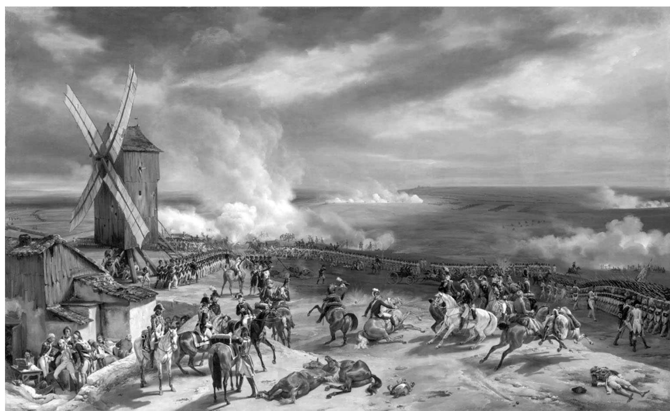
渊博的历史知识是普通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军官的职业生涯有诸多价值。历史讲座将为军官渊博的历史知识奠定基础，这样的讲座通常持续三年。讲座的目的在于使用有代表性的国家和个人的历史说明人类在宗教观念、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各阶段以及科学、艺术、哲学成就上的总体发展，联系先前的形势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形态加以说明，以史为鉴，服务当代。军官必须了解，当代是历史的延续。了解历史是军官工作的基础。

四、总参谋部的职能和军事实践

该课程涉及总参谋部的职能以及和平时期与战时总参谋部参谋的工作。内容如下，具体顺序由教师自行安排：（一）我国总参谋部的发展历史。（二）其他列强的相应军事机构设置。（三）根据帝国宪法、军事法律及协议[(11)]对我国军队的划分。（四）总纲领指导下的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职责；军事演习准备及动员准备；机动军队的构成。（五）铁路和运输。（六）战场上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职责，尤其是参谋长在总指挥部的地位和职责。（七）和平时期以及战时军队的补给原则，可用资源、财源以及补给方法。（八）邻国的战争实力和军队构成。



腓特烈大帝时期的著名战役——霍奇基尔战役。该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一学年的必修课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战役——瓦尔密战役。该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二学年的必修课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接受奥军投降。奥斯特里茨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二学年的必修课



丹麦步兵在德波尔击退普鲁士骑兵的进攻。德波尔战役是普丹战争著名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三学年的必修课

课程结束时的军事实践(12)为每位军官提供了检验自身的能力、知识和耐力，了解自己能做什么的机会。根据实习指导教师给出的一般性和专门意见，对总指挥部的决策以及总参谋部的参谋在被采纳的措施中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军事实践将部队分为两方，通常每一方的兵力都不能超出战时假想敌步兵师的兵力。实习安排应当让军官在正规战场上得到锻炼，提高发布命令的能力，掌握军队部署知识，讨论作

战形势，分析部署对部队的影响，并全面了解战役或战斗状况。每位参加军事实践的军官都应拥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解决各种难题。

乍一看毛奇伯爵的《教学制度》，将原创性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真正手段的鼓吹者们或许看不到他的鸿鹄之志，他们会耻笑军事学院用仅利于学生智力和记忆力发展的讲座形式教授自然科学和历史。但作为一所军事学校，柏林军事学院有其实际目标：德国总参谋部的参谋在这里学习如何把旨在训练理解力的自然科学应用到解决与战争相关的问题中。此外，同德国其他军事条例一样，《教学制度》并没有体现遵照规范进行教学的彻底性。以军事历史为例，《教学制度》规定第三学年学习“德皇威廉一世时期的战役”。粗浅的学习就能满足这个要求，细读普奥战争或普法战争概要也能完成规定的任务，研究官方历史中的一个或多个战役似乎也完全符合要求。但实际上，军事学院的学生对指定战役的研究往往更加广泛、深入。军事学院学习期满后的见习期，学生们开始接触用于编纂总参谋部历史的材料，根据原始文献做出独立判断，这正是历史教授教学的最终目标。

毫无疑问，人们对军事学院褒贬不一。严格说来，在大学里，应当解放思想，使体验大学生活、感受大学精神的人形成自由、主动、独立的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接受过文科教育的人可能会更富同情心，并通过大学教育形成民主或专制倾向。无论如何，只要大学教育不辱使命，学生就能找到方向，并且能为自己定位，思想不受条例影响，不受权威限制。不同的是，学术自由不是军事学院的目标，军事学院关心的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为普鲁士国王培养优秀的士兵，实现这个直接目标是否是实现更高目标的有效途径还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探讨。

---

(1)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1757—1831），通称施泰因男爵，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曾任普鲁士首相（1804—1807）。他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进行的改革，挽救了即将灭亡的普鲁士王国。施泰因于1806年施行的改革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由于主张体制改革，由大臣分掌朝政，施泰因于1807年初被免职。著有关于普鲁士行政机构改革政治见解的《拿骚备忘录》。他曾担任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1812），在法兰克福创立历史学会（1819）。

(2)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著名教育改革家、语言学家及外交官，曾任普鲁士宗教和教育大臣（1801—1810）。1810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极其重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提出了“教研合一”的教育主张，实施教育改革，被誉为“德国现代大学之父”。

(3) 卡尔·施瓦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传》，第1卷，第151页。——原注

(4) 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普鲁士地理学家。他与亚历山大·冯·洪堡并称为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他曾任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1819），在柏林大学教授历史（1820），并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821），之后任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1825）直至1859年逝世。他还在柏林高级军官学校任地理学教授（1820—1859）。他对探索非洲大陆有极大的兴趣，著有《地球学》一书。他是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的老师。

(5) 施潘道（Spandau）是德国柏林最西面的一个区，位于哈韦尔河与施普雷河汇流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施潘道是大型弹药工厂所在地，设有众多的军营。1920年，施潘道被作为一个区纳入柏林。

(6) 《教学制度》的颁布日期为1888年8月12日；报纸刊登毛奇伯爵递交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辞职报告的时间为1888年8月10日。——原注

(7)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307页。——原注

(8)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262页。——原注

(9)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165页。——原注

(10) 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是与形式系统，例如逻辑、数学、理论计算科学、遥控学、信息理论、博弈论、系统理论、判定理论和理论语言学

等有关的形式语言学。严格说来，形式科学并非一种科学，而是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建构的抽象逻辑系统。形式科学是一种语言工具，用于描绘用符号系统表示的抽象结构。

(11) 这里的协议指普鲁士王国与萨克森王国、巴伐利亚王国和符腾堡王国签订的协议，以此来管理这三个国家的陆军。——原注

(12) 军事实践（实习）的形式为模拟战斗或者模拟战役，实践地点通常选择在专门进行该项训练的无人居住的地区。部队是虚拟部队，但是参加模拟战役的军官各自有不同的指挥职务，根据虚拟的战场形势，在仲裁的沟通下，发布命令，做出部署。——原注

第3章　学术进步

精彩看点

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及其在总参谋部中的体现——军事历史——克劳塞维茨的主导思想——批评方法——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著作—1859年意大利战役——应用方法——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历史专著——军事历史与理论间的联系——普鲁士的军事理论为个人成果——毛奇论新式火器对战术的影响—1866年的普奥战争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德国总参谋部成员对军事理论的个人贡献——德国总参谋部在学术上占据领先地位

教师的不断学习是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教师应对自己的学科抱有极大的兴趣，而这样的兴趣源于教师努力拓展知识范围以及对本学科知识的研究与突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应是教学，而是他痴迷于该学科的表现。高等阶段教学的受益者决不是单方面，学生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回馈教师的帮助：经过活跃的知识先驱者的积极阐述，尽管一些原理变得鲜活、富有生气，但要把它们讲清楚，还需要研究者将研究与要阐述的学说体系或主体结合起来，军事学院与德国总参谋部之间的紧密联系正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关系。

前文提到德国总参谋部的部门职能：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搜集、分析军事信息，以此为依据制定作战计划；军事行动开始后，总参谋部通过其各职能部门为总参谋长提供我军以及敌军的相关资料，总参谋长随时需要根据这些资料作进一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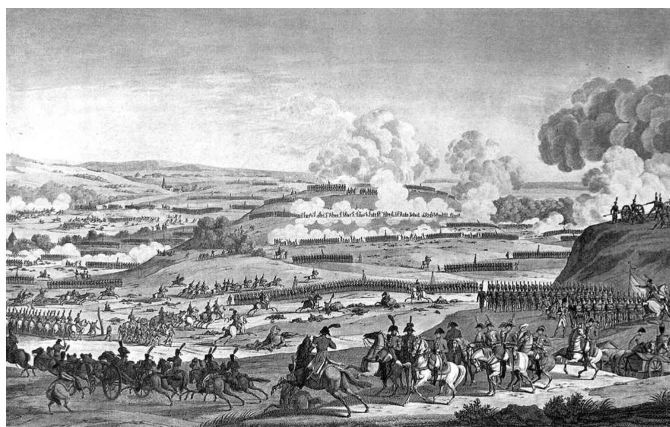
这些只是预备或准备工作，关键之举在于总参谋长根据获得的信息设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向自己提问题：现在该怎么办？然后进行回答。如前所述，总参谋长作为总参谋部的灵魂体现在他能运用特殊的才能。因此，对总参谋长胜任该职位所具备的能力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制度》阐述了初级阶段发展、训练指挥才能的方法。《教学制度》的各部分阐述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官应具备的全套“知识装备”，并按重要性进行了分类。首先要安排的是军事历史，它被誉为“和平时期教授战争最有效的手段”[(1)]，在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占很大比重。德国总参谋部设有专门部门深入研究军事历史，普鲁士的军事智慧便源于历史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

克劳塞维茨[(2)]的著作体现了军事学院的主导思想，阐述了普鲁士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区分了对事件的单纯描述和批判性

研究，指出对事件的单纯描述只能揭示事件之间浅显的因果关系。他把应用于军事历史的批判方法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首先是研究历史过程本身[3]，包括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弄清史实，在此基础上，弄清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查明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4]；最后着手判断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恰当。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5]才能找到军事历史的教育价值。

普鲁士军事学院不仅旨在发展学生的理解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他们的品格[6]。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熟知战役的基本情况以及理论对战役结果的总体影响，还要得出明确的结论，弄清该怎么做。研究军事行动时，学生必须明确如果把自己放在将军的位置上，自己会采取什么路线。



1806年10月14日，普军与法军在耶拿会战



拿破仑率军攻占柏林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对总参谋部的历史研究有重大影响。1862年，《1859年意大利战役史（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汇编本）》出版了。该书为毛奇伯爵所著，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前言中几乎用克劳塞维茨的原话叙述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尽可能准确地弄清楚动乱中北意大利发生的事件的起因，根据事件的起因推断事件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客观评论事件的性质。如果缺乏客观评论，事件的经验教训就不能为我所用，更不用说为我们提供有效指导了。"意大利战争史是进行积极评价的范本，作者在每个阶段都把自己依次放在双方指挥官的位置上，清楚、准确地指出在他看来当时最恰当的举措。毫无疑问，这是教授指挥技能的有效方法，是和平时期为具有相关知识的军官设计的最佳训练方法。

1867年出版了《1866年德意志战争史（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汇编本）》。前言中称该书为"来自普鲁士军队的官方报道，起初仅供普鲁士军队使用"。作者写道："书中的描述具有片面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近来的敌人还没有公开任何消息解释他们的行动动机。"德国总参谋部出版的法德战争报道也有类似的局限性。但抛开作者提到的局限性，这两本书恰恰提供了对军校学生极具价值的史料。作者费尽心力确保事实陈述真实可靠，清楚地阐述了普鲁士或统

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作战的的主要动机。这些著作以及近来出版的《1864年丹麦战争史》构成了丰富的客观批评资料。客观批评是军事判断力成熟的主要手段。

1883年以来，德国总参谋部出版了一系列历史专著，目的是以近年来的战役为主题，“阐述与指挥艺术相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雇佣方式、各兵种的职能、安全保障工作、小型战争、防御工事、军队的构成及维护”。文章以先前的战争为例，旨在使读者“增进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对事件及其中的相关人物做出更深刻、更准确的判断。”

军事学院的《教学制度》阐述了军事历史的研究目的——让人们了解“优秀的指挥才能赖以存在的固定因素，以及这些固定因素与不断变幻的战术形式之间的联系”。良好的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同时，只有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论。此外，理论决不能孤立存在，理论是对历史现实的概括，必须在与历史现实的不断接触中汲取营养，如同巨人安泰俄斯，每当他被举到空中，离开母亲大地女神的怀抱，他的力气就消失殆尽。同样，没能造就理论的历史研究既无益又无用。

普鲁士政府部门的传统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德国总参谋部理论著作创作的活跃程度不亚于历史研究，但理论部门的每本著作均由作者独立署名出版，因此，没有官方理论[(7)]，只有军官个人的理论。威廉一世时期，德国总参谋部的著作均以军官个人名义出版，对这些著作的短篇报道显示，被人们所接受的军事理论的主体几乎全部来源于军官的个人理论。

1865年，一份军事报纸的增刊上刊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未署名文章，题目为《论改良火器对战斗的影响》，后来，毛奇伯爵承认该文为他所写。该文以详实的历史数据为依据，透彻地分析了由于采用膛线炮和后膛来复枪，战场上部队管理预期进行的改革。作者用专业的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当代战场士兵生理学、

心理学的新特点。

后膛来复枪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能变换射击目标，其射程远、精度高，在距离已知、目标能见的情况下，一英里范围内，能阻击敌人派来的大军。除精准射击外，使用后膛来复枪的士兵还需经过精心的训练。

在很大程度上，战役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短程武器的炮火储备，距离估算的误差对短程武器并不重要，军官要严格控制炮火的使用必须避免浪费弹药。射击时一横列排开；在敌人的来复枪射程范围内调动军队排成一列纵队，这样调度起来就迅速、易于操控了，而且移动时能充分利用地面做掩护。新式火器只有在开阔地带才能充分发挥效力，因此，防御者会寻找一片开阔的坡地作为射击的阵地。前进过程中，进攻者会选择起伏不平的地面或者树林、村庄作为掩护。尽管文章中提到新式武器有利于防御，防御方的将军会迫使敌军在有利的阵地发起进攻，但是如果防御者处在后膛来复枪的有效射击范围内，后膛来复枪的攻击效果就立竿见影，防御者根本无法抵挡枪林弹雨的攻击，如果他们企图手持刺刀冲锋，最终也只能在针式步枪的猛烈火力面前止步不前[(8)]。

1866年，普鲁士在对奥战争中践行了上述观点，证明其确为真知灼见。纳霍德战役中，腓特烈王储的右翼纵队出现在大山中，击败了试图阻止其从大山隘口走出的奥地利军团，这印证了毛奇伯爵的主要观点。普军的阵地位于奥军进攻的山坡顶。普军以小分队为单位，分散开来通过短距离持续、猛烈的射击阻止奥地利大部队前进。战后，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时任少校、后任中将的库恩，发表了关于腓特烈王储早期战争的历史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士兵学会了使用针式步枪，指挥官利用小分队做机动，部署了射击队形。在起伏不平或有掩护的地点发动进攻更有利，克尼格雷茨战役本身就是个例证，因为爱德华·冯·弗兰泽基[(9)]率军在马斯洛德森林的激战为普军的致命一击奠定了基础。

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总参谋部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该研究持续到1881年。这期间，为了提升理论水平，或者说为了更好地指挥未来的战争，仔细审查这段历史成了军事批评的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对普法战争的批评竟然是由德国人自己进行的。军事批评的大部分工作由总参谋部完成，成果为总参谋部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军事理论著作。从1870年到1875年，《指挥艺术》发表了韦尔迪·杜·维尔诺斯[(10)]将军的系列研究，他的研究对当今军事文学影响深远。他研究回顾了沙恩霍斯特将军的教学成果，指出沙恩霍斯特将军的教学成果不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理论，而是关于战争指挥的原则[(11)]。韦尔迪的研究基于其在总参谋部历史部从事普奥、普法战争记录的工作经历。1882年，布卢姆发表了《论策略》一文，该文以1872年公开的普法战争中色当会战之后所有战役的策略为依据进行阐述。1883年，科尔玛·冯·德·戈尔茨[(12)]将军的杰作《武装的人民》出版了，此书深受大众喜爱，是大量历史研究的成果。以上作者都曾供职于德国总参谋部。



色当会战中，正在观察敌情的法军军官



色当会战中正在进行防御的法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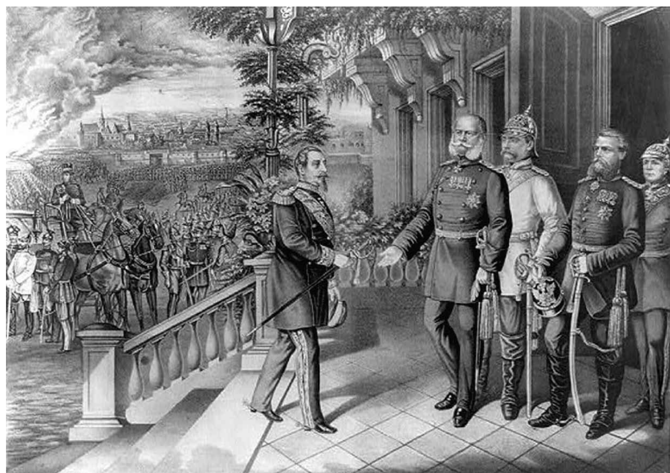
普法两军在色当激战



色当会战中，拿破仑三世被俘



被俘后的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交谈



拿破仑三世向威廉一世投降，色当会战结束

战后，一些军官对战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当然，他们的经验源于实战指挥，而不是做参谋的工作经历。法国战场或波希米亚战场上，博古斯拉夫斯基、雷曼、特伦巴赫和梅都担任过连长，即便如此，做参谋的工作经历对他们仍有巨大影响。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13)]撰文回复了梅《战术回顾》一文；威廉·冯·舍尔夫[(14)]关于正规战术的系列文章一经发表（1873）就被广泛阅读；1881年，雅各布·迈克尔[(15)]出版了关于战术问题的专著，将十年来大量的争论结果浓缩为一个体系。他们都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因此，可以说二十多年来，德国总参谋部在欧洲军事思想研究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讲绝不为过。

至此，我们讲述了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成为将军前必需完成的学业及其特点。任中尉五年后，他已掌握了基本的勤务，与同年应征入伍的士兵一样，具有了军人气质，怀抱理想，精明强干，对国家绝对忠诚；经过军事学院的三年学习，他懂得了战争的性质，掌握了军队指挥技能，同时学会了运用实际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做决断时斩钉截铁。现在，他在心理素质、智力和性格上已经完全成熟，把男子汉的大好年华献给了总参谋部的高等研究，用以指挥行动的实施与实践，

在师或军团参谋部发挥全面的指导作用。这些年的时间里，通过各个层面有价值的工作，他的能力得到充分提升。获得将军军衔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成熟、敏锐的判断力，他在行军中以及战场上迅速、敏锐的观察力让门外汉觉得不可思议；拥有可靠、迅速的决断力，能够瞬间准确无误地解决指挥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制完美无缺，每种体制都有不足之处，不可能完全排除偏袒或偏见的影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普鲁士陆军高级军官实践能力的平均水平都很高，这主要归功于学生的选拔、各阶段上级领导的仔细检查以及指导参谋部高等教育的领导人的成熟智慧。

各部队的军官在学术进步过程中都遇到了特别的困难：权力和服从是所有军事机构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原则似乎完全有悖于学术的自由发展；学术不发展，军队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评论自由会削弱纪律的基础，但养成无条件服从的习惯又会毁掉独立判断的能力；没有独立判断力，道德和学术就不可能发展。德国总参谋部摆脱了这一窘境，科学进步上敢为人先，把自身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国防事务。

---

(1)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莫里斯上校的文章《战争》第345页："根本不存在，并且从来没有什么'战争艺术'。它只不过是对军事历史的系统学习。"——原注

(2) 特别有趣、值得一提的是1823至1826年间，毛奇是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当时克劳塞维茨任校长。然而，校长本人并不从事教学，并且克劳塞维茨在世时没有出版任何著作。所以这证明克劳塞维茨本人对毛奇没有任何影响。——原注

(3) 《战争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第2卷，第5章。——原注

(4) 克劳塞维茨充分认识到批判性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很多情况下，采纳

特定策略的真实原因和动机无法考证。——原注

(5) 指上文提到的“判断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译者注

(6) 与约翰·福斯特的《品格决定论》进行比较会有有趣的发现——《品格决定论》讨论了“结论性思维方式”的价值。——原注

(7) 士兵训练手册和野战勤务条例代表官方理论，但这些手册并不是由总参谋部负责撰写的。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个由各个级别的战斗军官组成特别委员会——一名指挥军团的将军以及师长、旅长、团长、营长。委员会的军官们通常接受过总参谋部的培训，作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们的意见会被参考。他们负责拟定条例草案，先发布试行本，经过全面评估、修正后正式发布。——原注

(8) 文中对《论改良火器对战斗的影响》一文的内容提要做了两处改动，以便符合目前的说法。其中用“两英里”替换了“一英里”，用“一横列”替换了“line two deep”。读者可以参考一位著名军官、总参谋部的资深成员近来关于《仲夏夜之梦》中战术问题的有趣但异端的讨论。——原注

(9) 爱德华·冯·弗兰泽基（Eduard von Fransecky，1807—1890），普鲁士将军，参加过丹麦战争、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他曾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部任职（1843—1857），被授予蓝马斯克勋章、黑影勋章、红鹰勋章。

(10) 1882年，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发表了关于罗斯巴赫战役和耶拿战役的文章。——原注

(11) 韦尔迪以真实或虚拟战役为材料，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在德国，这被称为“应用方法”。该方法由1854至1872年任普鲁士及统一后的德国军事教育主任冯·普克将军提出。——原注

(12)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1843—1916），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史学家、军事作家。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和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腓特烈·查理亲王的参谋部任职。他曾在波茨坦军事学校任教（1871）。著有《武装的人民》，开创了人民战争理论。他帮助土耳其重建了陆军。

(13) 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1864—1950），德国军官、政治家、总参谋部参谋。他奉命到奥斯曼帝国执行军事任务，任奥斯曼陆军参谋长，在为奥斯曼陆军起草作战计划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被称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发起者”，也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

的狂热支持者。

(14) 威廉·冯·舍伦夫（Wilhelm von Scherff，1834—1911），德国将军、军事作家。1852年加入普鲁士陆军，曾任普鲁士陆军副官（1860—1866），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任普鲁士总参谋部参谋，普鲁士军事学院军事战术教师（1873—1878），保加利亚边境调整委员会成员（1879），第29步兵团指挥官，第11军团参谋部参谋长（1882），德意志帝国驻斯特拉斯堡第33步兵师中将、指挥官。

(15) 克莱门斯·威廉·雅各布·迈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1842—1905），普鲁士陆军将军，日本明治天皇时期政府的外国顾问（1885—1888），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以及普鲁士军事演习的概念引入日本军队，强化了日本军官绝对效忠天皇的思想。他曾参加普法战争，并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第4章　总参谋长

精彩看点

> 战略家应具备的品质——总司令与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普鲁士军事体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要素——职责分类——全书总结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胜似一所学校。凡夫俗子的行为皆有原因，先前的经历就可以解释他的所做所为，但出类拔萃之人却有极高的天分。牛顿、哥伦布、斯坦利[1]或惠特沃斯[2]这样的人身上潜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洞察力，陆军领导机构，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计划的领导机构，更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才。

战争爆发前夕，人们总会义愤填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现得情绪激动、心神不宁，这直接干扰人们作判断，甚至扭曲人们对人和事的看法。此时正是千钧一发之刻，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根据形势，和平时期制订的临时集结计划需要重新审议、安排并执行，战略家此时必须拥有清晰的判断力，不受自身和国人情绪的影响。

集结令发布，部队开始行动，各种困难接踵而至。无论大本营准备再充分，信息再灵通，每天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与意外事件相比，国民情绪的波动更容易打乱战略家的平静。他必须为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只有他最明白决战要付出的牺牲、所面临的风险：几千人会因此丧命；成千上万人会因此负伤；一个错误估计、错误判断或不幸事故都会导致失败，给国家造成影响深远甚至毁灭性的后果。在巨大的责任之下，战略家必须得心应手地运用判断力，就像暴风雨中的指南针，其精准的平衡决不会被打破。

战略家要有雄才大略，当众人因形势危急而无法自持时，他依然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当众人在看似无法阻挡的趋势前发生动摇时，他却能忠于内心。普通人在琐事面前畏首畏尾，但战略家却卓尔不群、意志坚定，普通军官与他之间的差距决非训练体制所能弥补。战略家面对任何重大事件、危险、责任时均能保持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种内心的镇定是普通人通过任何方法都无法获得的。

人民领袖应有最高指挥权。拥有最高指挥权的将军领导陆军，亲

自监管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准备工作。他的总参谋长做他的机要助手，减轻他的负担，处理细节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军团总指挥和军团参谋长之间的关系。

在普鲁士，作为陆军首领，国王有充分理由亲自上阵，这些理由并没有因为他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而发生变化。他掌握政府的总体方向，无法亲自解决战役策略准备的相关问题，所以无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总参谋长都是他的战略顾问。较之专职总司令的助手，总参谋长的作用举足轻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王威廉一世在他亲自指挥的两场了不起的战争中，他对自己挑选的总参谋长言听计从。两场战争中对陆军的成功指挥都归功于国王屈尊纡贵的优秀品质以及毛奇伯爵的杰出才干。毛奇伯爵总是把战略决策权交给国王威廉一世，这是明智之举，而国王威廉一世认为毛奇伯爵是战略决策的提供者，把陆军的成功归功于毛奇伯爵的“行动指挥”，也体现了他的广阔胸怀(3)。1866年普鲁士的胜利以及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都归功于国王威廉一世与毛奇伯爵共同建立的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极其重要的是，威廉一世拥有最高政治、军事统治权。政治部门中，他也有一位股肱之臣——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与毛奇伯爵地位相当，这确保了政治指挥与军事指挥之间的和谐，对战争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根据威廉一世、俾斯麦首相和毛奇伯爵的卓越品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推论说一个军事体制切实可行，难免有些草率，毕竟只有在国王完全行使管理权的情况下，该体制才适用。

综上所述，总司令与总参谋长之间是一种个人关系，由于双方的性格和能力不尽相同，这种关系的本质也会有所变化：如果总司令本人才华横溢，总参谋长必须俯首听命；如果总司令在军事行动计划上需要帮助，总参谋长必须主动献计献策。显然，如果下属成为策略的来源，那就意味着总司令要豁达大度，并且这绝非寻常之举。

对职责进行分类，以此调节劳动分工，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永恒价值所在。国王集政府权威与军队领袖于一身，不亲自理政，有专人

为他打点所有事宜。把整个陆军的事务分门别类，每个部门都有军官领导，在本部门内行使国王赋予的权力。国王的监管权并不表现为国王重复军官们的工作，而是军官们对国王负责，向国王递交重要计划。但如果国王不同意，我们有理由相信递交计划的军官会因此辞职，由与国王政见相同的人取代他的职位，这既维护了国王的权威，也不会打击国王挑选、授权的助手的积极性。



1871年，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等文臣武将的拥戴下，在凡尔赛宫即皇帝位，德意志帝国建立



威廉一世与俾斯麦



1889年的俾斯麦

部队的真正指挥权掌握在军团长官或要塞司令手中，他们直接对国王负责，他们的下属对他们负责。陆军的总体事务分属三个部门管理：个人事务，例如军官的任命与提拔、退休、军饷和勋章，属国王的军事内阁管理，军事内阁有自己的首长；行政事务，即机构、装备、军备、防御工事，属战争部管理；第三个部门，即总参谋部，主要负责陆军的战略、战术问题，而非陆军的行政指挥。各部门之间直接沟通，制度规定，无论何时，各方都有决定权，这加速了沟通的进程。因此，作为陆军管理机关之一的总参谋部赖以存在的纲领同样适用于所有受过训诫的陆军和有序的战争。

创立之初，各国陆军中总参谋部的基本形式为辅助指挥工具，唯有普鲁士充分认识到参谋部的重要性，成立了专门机构，将重要的对敌行动指挥与次要的但必不可少的行政事务分割开来[4]。总参谋部被委以制订陆军行动计划或与对敌行动计划的主要方面直接相关的职责，因此，总参谋部拓展了指挥官的思想，帮助其履行独特、艰巨的职能。

为了适应陆军指挥权的加强，德国将陆军适当划分为永久独立的部分，自行管理行政、军事事务。军团管理自身内部事务，设有副官、审计员、监督官，在战争部的帮助下，与战争部一起满足军团需要。由于军团完全服从中央的战略指挥，因此，战略指挥机构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其他机构的相应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

陆军总参谋长一职至关重要，需要精心选拔。陆军总司令对精心挑选的总参谋长充分信任，意味着总参谋长的履职方式不会受到干预。总参谋长受托为自己的部门选拔、训练军官。

策划军事行动需要精通军事科学知识，掌握娴熟的军事技能。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成为一所培养将才的学校，这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创作出许多经典著作，涉及战争艺术理论的各个学科。

军事学院作为总参谋部的培训学校，隶属于总参谋部，将军事教育的标准提升到最高水平。

总参谋部各部门共同致力于开展对智力和意志力要求极高的军事行动，这正是参谋部在陆军各部门中团结一致的表现。通过选拔组建军团，使军官通晓领导职责，熟悉部队生活和精神风貌，其结果必然是军官们不断往来于团参谋部和总参谋部之间，在总参谋部的各部门轮流任职。

简而言之，总参谋部是陆军大脑或者胜似陆军大脑。

“总参谋长和两百多名参谋一起提前为各种可能的战役做准备；研究战场的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邻国陆军的动态；他们共同制订战争策略；他们对陆军机构了如指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干预与组织、训练相关的所有问题；他们构成了一个有机体，人员在陆军中遍布，不断获取实践经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带去相同的原则和教义。”(5)

---

(1) 威廉·福特·罗宾逊·斯坦利（William Ford Robinson Stanley，1829—1909），英国发明家、工程师、慈善家。他在英国和美国申请了七十八项专利。他设计并制造了精确的绘图和数学仪器、测绘仪器。他筹划并成立了英国第一所职业学院——斯坦利职业技术学院（现在的哈里斯南诺伍德学院）。

(2) 乔治·弗雷德里克·惠特沃斯（George Frederick Whitworth，1816—1907），长老会教的传教士，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学院。他在华盛顿的大丘建立了第一所教堂。曾任华盛顿大学校长（1866—1867，1874—1876），创办了惠特沃斯学院（今惠特沃斯大学）。

(3) 参考《毛奇著作集》国王威廉一世给毛奇1870年10月28日写给其信件的回信：“您对军事行动的英明指挥”，以及给毛奇1871年3月22日写给其信件的回信：“杰出的战争行动指挥”。第1卷，第268页。——原注

(4) 军队行政官员负责用政府认为适当的国家资金为军队购置物资。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这都是必要的工作。在普鲁士，战争部行使该职能，用国家资金购买军用物资，用于对抗敌军。——原注

(5) 《国外军事期刊》，第32册，第261页。——原注

附录1　格奈瑟瑙小传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冯·格奈瑟瑙是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1760年12月27日，他出生于上萨克森的席尔道。他的父亲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奥古斯特·威廉·奈哈特。他的童年生活十分穷困，分别在席尔道、维尔茨堡、爱尔福特度过。1777年，格奈瑟瑙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两年后加入驻扎在爱尔福特的奥地利军团。1782年，格奈瑟瑙进入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侯爵的部队。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侯爵的部队受英国军队雇佣，格奈瑟瑙跟随侯爵的部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在战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786年回国后，他加入了普鲁士军队，任步兵中尉，1790年，晋升为上尉。1793年至1794年，格奈瑟瑙参加了俄、奥、普三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的行动。在亚沃尔十年平静的军旅生涯中，格奈瑟瑙广泛研究了政治、军事历史。1796年，他与卡洛琳·冯·科特维茨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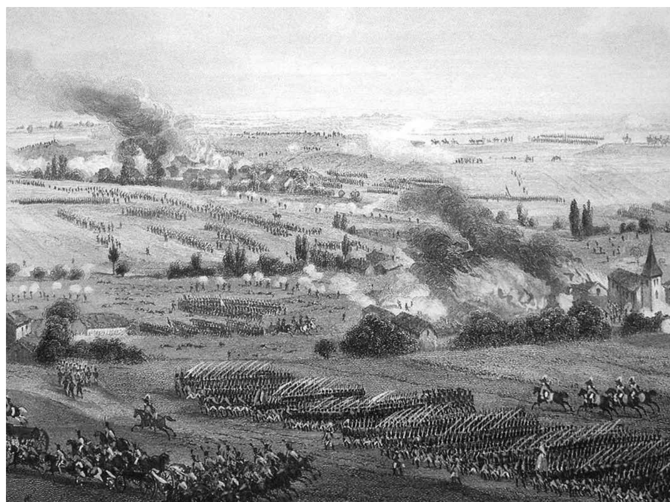
1806年，作为腓特烈·路易的参谋，格奈瑟瑙参加了萨尔费尔德战役以及耶拿战役，随后指挥一个临时步兵旅，在莱斯托克的带领下参加了立陶宛战役。1807年，格奈瑟瑙少校被普鲁士陆军任命为司令官，前往科尔贝格。尽管普军人数少，装备、弹药不足，但在斐迪南·巴普蒂斯塔·冯·希尔[(1)]和约阿希姆·克里斯蒂安·内特尔贝克的帮助下，普军顶住了拿破仑大军的进攻，直至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为此，格奈瑟瑙被授予蓝马克斯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中校。

作为工程兵主任、重组委员会成员，在重组普鲁士军队方面，格奈瑟瑙与沙恩霍斯特发挥了巨大作用。1809年，格奈瑟瑙晋升为陆军上校，但他重组军队的改革措施引起了法国的怀疑，普鲁士首相卡尔·

冯·施泰因被迫辞职，格奈瑟瑙也被解职。之后，他秘密出使奥地利、俄国、瑞典、英国，最后返回柏林，继续担任爱国党的领袖。

1812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格奈瑟瑙少将担任布吕歇尔的军需官、参谋长，开启了军事历史上总司令与其参谋长和谐、紧密合作的历史。作为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瑟瑙指挥了1814年巴黎战役。格奈瑟瑙与布吕歇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他们的带领下，普鲁士军队虽然屡有败绩，却斗志昂扬。1814年4月，他们率领普鲁士军队直捣法国的心脏，拿破仑被迫退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奈瑟瑙的指挥。1814年，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格奈瑟瑙与约克、克莱斯特、比洛一起，被封为伯爵，同时布吕歇尔被封为瓦尔施塔特公爵。

1815年，格奈瑟瑙再次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并在滑铁卢之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815年的利尼战役中，格奈瑟瑙统领普鲁士军队，直达瓦夫尔，部分普鲁士军队从瓦尔夫出发与威灵顿将军的部队会师，参加了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普鲁士军队的侧翼进攻帮助英普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滑铁卢战役中，格奈瑟瑙乘胜追击，俘获了拿破仑的马车。接下来的战斗中，普鲁士军队在威灵顿公爵的部队之前抵达巴黎。为了表彰格奈瑟瑙，他被授予黑鹰勋章。



利尼战役

1816年，格奈瑟瑙担任普鲁士第八军团总司令，但不久之后，因为病痛和政治原因，格奈瑟瑙辞职。随后的两年间，格奈瑟瑙住在西里西亚的艾德曼斯多夫。1818年，格奈瑟瑙接替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卡尔克罗伊特伯爵，成为柏林总督，1825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831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格奈瑟瑙被任命为波兰前线普军总司令，克劳塞维茨担任他的参谋长。格奈瑟瑙在波兹南染上霍乱，于1831年8月24日不幸逝世，不久后，克劳塞维茨也染上霍乱，病故。

格奈瑟瑙是腓特烈大帝执政以来普鲁士最伟大的将军，他崇高的品质不仅赢得了军队中他的上下级的尊敬，而且赢得了全体普鲁士人民的爱戴。1855年，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为格奈瑟瑙塑像，将他的雕塑竖立在柏林；1889年，为纪念1807年的巴黎围攻战，科尔贝格的掷弹兵团以格奈瑟瑙命名；1870年，格奈瑟瑙的一个儿子带领第八军团的一个旅参加了普法战争；德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着格奈瑟瑙的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装甲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舰以及战后的护卫舰，均以格奈瑟瑙命名，此外，德国一些城市的街道也以格奈瑟瑙命名。

(1) 斐迪南·巴普蒂斯塔·冯·希尔（Ferdinand Baptista von Schil，1776—1809），普鲁士陆军少校。1809年，法国进攻普鲁士时，他率军奋起反抗，但因寡不敌众而一败涂地，最终向拿破仑军队投降。

附录2　沙恩霍斯特小传

格哈德·约翰·大卫·维特兹·冯·沙恩霍斯特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1755年12月2日，他出生于汉诺威附近、今下萨克森州的吕本贝格新城的一个地主家庭，后通过自学，成功考入位于文斯托夫的威廉军事学院；1778年进入汉诺威王国军队服役，利用在团队服役的间歇继续自学，并从事文学创作；1783年转入炮兵部队，在汉诺威的炮兵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军事期刊，该期刊一直持续出版到1805年；1788年，他撰写并出版了《军官手册》；1792年，他撰写并出版了《战地实用军事手册》。

沙恩霍斯特与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妹妹克拉拉·施迈茨结婚，尽管他在吕本贝格新城农场每年有一定的收入，但从事写作的收入仍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1793年，在约克公爵的带领下，沙恩霍斯特参加了荷兰战争。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争。1794年，他加入梅嫩防卫部队，不久晋升为少校，然后进入汉诺威王国参谋部工作。

1795年，《巴塞尔协议》签订之后，沙恩霍斯特返回汉诺威。此时，他在反法联军中名声大噪，接到各国邀请，邀其效力。后来，他接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邀请，于1801年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陆军中校，收入比在汉诺威翻了一番。他被派往军事学院任教，成立了柏林军事协会。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他的学生。在1804至1805年的动员及安全防卫阶段以及1806年的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他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并在战斗中负伤。在普鲁士军队撤退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果断。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的最后阶段，普鲁士军队伤亡惨重，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向法国军队投降，签订

《拉特考投降协议》。由于在埃劳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沙恩霍斯被授予普鲁士最高军事勋章——蓝马克斯勋章。

显然，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越了一名优秀的参谋。经过七年的战争磨炼，他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放弃了采用陈旧的战争形式的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并且进行决战才能缓解法国大革命给普鲁士带来的政治、军事威胁。1807年，普俄联军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沙恩霍斯特晋升为少将，领导军事改革委员会，进行军事改革。委员会中有诸多优秀的年轻军官，如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卡尔·冯·格罗曼、赫尔曼·冯·博恩等，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也是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但拿破仑很快对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起了疑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得不搁置甚至取消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提议。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沙恩霍斯特对单一的正规军制度进行改革，提出全民预备役制度。虽然全民预备役制度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实施，但他为预备役制度定下了原则，为其实施铺平了道路。他主张在军队中慎用酷刑，确立军官依靠战功晋升军衔的制度，废除了外国人服军役的制度，简化了军事行政机构。



腓特烈·威廉三世

1811年至1812年，法国迫使普鲁士与其结盟，共同对抗俄国，普鲁士向法国派遣了一支部队，听命于拿破仑，沙恩霍斯特也跟随这支部队离开了柏林。1813年，沙恩霍斯特撰写并出版了《炮兵研究指南》。

沙恩霍斯特回国后，拒绝接受更高的职位，出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俄国维特根斯坦亲王十分欣赏沙恩霍斯特的才华，请求布吕歇尔

暂时将沙恩霍斯特借给他，做他的参谋长，布吕歇尔同意了。1813年的吕岑战役的第一次战斗中，普鲁士遭遇失败，这次失败与以往不同，法军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严重缺乏骑兵，同样伤亡惨重。在这次战斗中，沙恩霍斯特的脚受伤，加上向德累斯顿撤退的过程中疲劳过度，伤势恶化。1813年6月28日，在前往布拉格与施瓦岑贝格和拉得茨基协商武装干涉奥地利时，沙恩霍斯特不幸逝世。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刚刚晋升为中将。为了纪念他，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柏林为沙恩霍斯特竖立了雕像，沙恩霍斯特被葬于柏林伤残军人公墓。

附录3　米夫林小传

卡尔·冯·米夫林是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滑铁卢战役期间，米夫林担任布吕歇尔的联络官，是最终击败拿破仑的筹划者之一。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对地形学和制图学颇有研究。

1775年6月12日，米夫林出生于哈雷；1790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799年开始致力于编纂军事字典的工作；1802年冬，被派往一个新成立的参谋部担任军需官助理，在天文学家弗朗兹·西弗·冯·扎克男爵手下从事测绘工作；1805年，普鲁士与法国开战在即，普鲁士军队处于战时状态，米夫林晋升为上尉，相继就职于利奥波德·亚历山大·冯·沃腾斯勒本将军、腓特烈·路易以及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麾下；1806年11月7日，吕贝克战役之后第二天，米夫林参与签订了《拉特考投降协议》，之后，米夫林加入了魏玛公爵的文职机构。

1813年，米夫林再次加入普鲁士军队，任职于西里西亚陆军参谋部。米夫林的军事业务素质和常识受到赏识，但他与格奈瑟瑙性格不和，经常发生摩擦。第一次攻占巴黎期间，米夫林任俄国将军迈克尔·安德烈亚斯·巴克莱·德·托利和弗雷德里希·格拉夫·克莱斯特·冯·诺伦多夫的参谋长。米夫林是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司令部的普鲁士专员。拿破仑倒台后，米夫林与法国签署了《圣克劳德条约》。后来，米夫林在法国占领军总参谋部担任参谋，这期间，他利用部分时间在莱茵河从事测绘工作。1821年，米夫林任普鲁士总参谋部参谋长。尽管人们认为米夫林过分沉迷于地质学研究，不注重为战争做训练准备，但

他的研究没有白费，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确立了良好的体制，开展了详细的测绘工作。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和谈期间，米夫林参观了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米夫林在普鲁士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838年至1847年，米夫林出任柏林军事总督，后来他还创造了绘制地图的晕滃线法[(1)]。随着身体每况愈下，米夫林辞去总参谋长，1851年1月10日，米夫林在其柏林附近的庄园逝世。

---

(1) 晕滃线法地图上表示地形的一种方法，1799年由莱曼创制，20世纪中叶被晕渲法取代，现已较少使用。

附录4　毛奇小传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是普鲁士陆军元帅，他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达三十年之久，为与其侄儿小毛奇区别，又被称为“老毛奇”。

1800年10月26日，毛奇出生于帕庆，其父为丹麦中将。1805年，他们在荷尔斯泰因定居，但法国军队烧毁了他们乡下的房屋，吕贝克镇上的房子也被法军劫掠一空，他们变得一贫如洗。毛奇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九岁时，他被送到荷尔斯泰因的寄宿学校；十二岁时，他被送到为丹麦军队和朝廷培养士官的少年军校；1818年，他成了丹麦国王的侍从，后在丹麦步兵团担任少尉；二十一岁时，毛奇参加了普鲁士陆军；1822年，他担任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第八步兵团的中尉；二十三岁时，进入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后改名为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1826年，三年学习期满后毕业。

毛奇负责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少年军校，在西里西亚和波森做了三年军事测绘。1832年，毛奇被举荐到柏林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工作；1833年，调入普鲁士总参谋部，晋升为中尉。

俄裔美国军事史学家马克斯·布特在《战争改变历史》一书中这样评价毛奇：毛奇热爱音乐、诗歌、美术、考古和戏剧，精通七国语言（德语、丹麦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还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的写生中有许多风景画和肖像画。此外，他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作家。1840年，毛奇返回柏林后出版发行了《土耳其游记》，并为该书创作了很多插图，这使他成为文学名人。毛奇头戴土耳其毡帽，做了公开演讲，欣然接受了文学名人这一

角色。尽管毛奇兴趣广泛，但他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被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所惊骇，坚定地效忠于国王和旧制度。

1827年，毛奇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朋友》；1831年，他撰写文章《论荷兰与比利时的关系》；1832年，根据平时的阅读以及对波兰人民生活和性格的观察，他写下《论波兰的内部环境与社会状况》一文；1832年，他与出版商签约，翻译爱德华·吉本的长篇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此，他将得到七十五马克作为报酬，他想用这笔钱买匹马。但十八个月过去了，他只翻译了十二卷中的九卷，《罗马帝国衰亡史》最终没能出版，毛奇也只得到了二十五马克。

1835年，毛奇晋升为上尉，被准许休假六个月。这期间，他在欧洲东南部游历。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邀请毛奇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陆军改革，得到普鲁士国王的许可后，毛奇接受了邀请。在伊斯坦布尔的两年时间里，毛奇学会了土耳其语，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瓦拉吉亚、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等地。

1838年，毛奇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纳托利亚军队司令的顾问，其间进行了大范围的侦查和勘测。183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纳托利亚军队与埃及军队交战，但敌军到来之时，该军队司令拒绝听取毛奇的建议，毛奇便辞去参谋的职位。1839年，尼西比斯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战败。返回柏林后，毛奇出版了《1835—1839土耳其社会状况与事件》一书。1840年，他与英国姑娘玛丽亚·贝莎·海伦娜·伯特结婚，婚后生活十分幸福，但没有孩子。

1840年，毛奇任普鲁士第四军团参谋，出版了他绘制的伊斯坦布尔地图，以及与另一位德国旅行家共同绘制的小亚细亚新版地图。他热衷于铁路研究，1843年，他发表了文章《决定铁路线选择的因素》。1845年，出版《俄土战争：1828—1829》一书。1848年，毛

奇返回普鲁士总参谋部，任第四军团参谋长，共七年时间，他相继晋升为陆军中校、陆军上校。

1857年，毛奇被任命为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上任后，致力于改革普鲁士陆军的战略、战术方法，改良军队装备以及通讯、交通方式，改革参谋的培训体制，改变调动军队的方式。

1859年，奥地利与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普鲁士调集了军队，但是没有参战。之后，陆军大臣阿尔布雷特·冯·罗恩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重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毛奇密切关注意大利的战争形势，并写下了《意大利战争史》。

1864年，普丹战争（即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毛奇留守柏林，没有跟随普军到前线。由于普军对毛奇的战争计划执行不力，致使战争迟迟分不出胜负，随后毛奇被任命为普鲁士、奥地利和北德意志联军总参谋长，亲自到前线指挥，彻底改变了战局，联军大获全胜，至此，毛奇取得了国王威廉一世的绝对信任。

1866年，作为总参谋长，毛奇指挥了普奥战争。他拟定作战计划，利用铁路运输线实施战略输送，使用电报进行统一指挥，克服了远距离机动和外线作战带来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将部队集结到了萨克森和奥地利的边境地区。普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为普鲁士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军总参谋长毛奇在战前就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色当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包围了法军，从各个方向对法军发起进攻，最终迫使法军投降。色当战役取得胜利后，毛奇继续率军向巴黎挺近，随后普军围攻巴黎和梅茨。1871年1月26日，法国签订《巴黎投降条约》，2月26日两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1870年，由于在普法战争以及色当战役中的功绩卓著，毛奇受封

伯爵；1871年晋升为陆军元帅，后被授予汉堡市荣誉市民称号。

毛奇负责研究普法战争历史，这段历史在1874年至1881年间由德国总参谋部陆续公开，毛奇成为民族英雄和家喻户晓的名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各地为毛奇塑了50多座雕像，尽管其中一些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仍有很多保留至今。

1888年8月9日，88岁高龄的毛奇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1890年10月26日是毛奇的90岁生日，这一天被定为国定节日。1891年4月24日，毛奇在柏林的家中病逝，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附录5　腓特烈二世小传

腓特烈二世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1712年生于柏林，1713年被立为王储，1740年至1786年在位，实行开明统治。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也被亲切地称为“老弗里茨”。

童年时期，腓特烈王储对音乐、文学和法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其父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尚武思想产生严重冲突，经常遭到父亲毒打。1730年，腓特烈二世试图和汉斯·赫尔曼·冯·卡特逃往英格兰，但以失败告终，最终被囚禁并被判处叛国罪。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经威胁他放弃继承权。卡特被处决时，他受父亲逼迫，亲眼目睹了行刑的过程，结果当场昏厥。后来，他被赦免，但军衔被剥夺了，并被迫待在昆斯特林，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

迫于父亲的压力，腓特烈王储不得不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远房亲戚——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结婚。他们之间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友谊，两人无子女。这场政治婚姻是自1701年以来奥地利干涉普鲁士政治的结果。婚后两人基本保持分居状态，只在节庆场合一同出现。

后来，腓特烈王储返回部队，担任陆军上校。波兰王位继承战期间，他随欧根亲王学习军事。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驾崩，他继位，称“腓特烈二世”。因为没有子嗣，他立弟弟奥古斯都·威廉为王位继承人。

1740年，普鲁士发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占领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普鲁士守住了既得领土。

这两次西里西亚战争都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腓特烈二世亲自领军作战，显露了出色的军事才华。

1756年至1763年，普鲁士与英国结盟对抗法、奥、俄同盟，与奥地利争夺殖民地及在德意志的霸权。通过七年战争，普鲁士巩固了在德意志的特殊地位。1772年，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自此，他自称普鲁士国王，而非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1)]。1778年，普鲁士参加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执政期间，腓特烈二世改革了政府机构、司法体系，使非贵族血统的平民有机会成为法官和高级官员；鼓励各国移民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普鲁士发展；实行出版和文学自由；重组军队，扩张了疆土。普鲁士成为欧洲的重要政治力量。

腓特烈二世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影响力很大的军事理论家。

1786年8月，腓特烈二世在波茨坦驾崩，享年七十四岁。

---

(1) 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称号（1701—1772）。1772年后，勃兰登堡选帝侯采用普鲁士国王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以选帝侯的身份统治勃兰登堡，并臣服神圣罗马帝国。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取得对普鲁士公国的统治权，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组成共主邦联。为了回报霍亨索伦家族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允许腓特烈加冕称王，称“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王号只适用于普鲁士地区。1772年，腓特烈二世成为包括普鲁士、勃兰登堡等地所有领土的国王，称“普鲁士国王”。

附录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二世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孙。其父奥古斯特·威廉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第五子，腓特烈二世之弟，1744年生于柏林，1786年至1797年在位。由于腓特烈二世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成为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1758年，奥古斯特·威廉薨逝，腓特烈·威廉二世被立为王储。腓特烈二世驾崩后，他继位。

1765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与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查理一世的女儿结婚，育有一女。1767年，二人离婚。同年，他与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九世之女弗里德里克·路易丝结婚，育有四子三女，腓特烈·威廉三世是他们的长子。此外，腓特烈·威廉二世有许多情妇，并与她们有不少私生子女。

执政初期，腓特烈·威廉二世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税收制度改革、教育改革，降低海关税，修建道路、运河，鼓励贸易，深受臣民们欢迎。不过，他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支持基督教反对启蒙运动；制定严格的出版物审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

腓特烈·威廉二世插手欧洲事务，但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任何好处。1787年，荷兰爆发反对威廉五世的起义。为了保护妹妹（威廉五世的妻子），腓特烈·威廉二世武力介入，帮助威廉五世复辟，但普鲁士付出高昂代价，得不偿失。1790年，普鲁士与俄国、奥地利对抗土耳其，虽然战争取得胜利，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没有获得一寸土地。

战后，普鲁士首相赫茨贝格被罢黜，而腓特烈·威廉二世彻底放弃了腓特烈二世以来的反奥传统。

1791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会晤，发表《皮尔尼茨宣言》。1792年7月，腓特烈·威廉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缔结第一次反法同盟，这是后来欧洲形成的一系列反法同盟的基础。1793年1月，普鲁士与俄国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条约，普鲁士获得但泽、托伦和波兹南等地。1794年11月，普鲁士与俄国、奥地利共同镇压波兰民族起义。1795年4月，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签定《巴塞尔和约》，法国将莱茵河以东的领土还给普鲁士。至此，第一次反法同盟宣告失败。1795年10月，俄、普、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条约，导致波兰灭亡。

腓特烈·威廉二世在位期间，虽然普鲁士疆土不断扩大，但其在欧洲的威望却大大下降。政府无能，债台高筑。1797年11月16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驾崩，享年五十三岁，其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

附录7　腓特烈·威廉三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三世是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长子，1770年生于波茨坦，1797年至1840年在位。

幼年时代，他的父亲与情妇威廉·恩科打得火热，他被交给家庭教师抚养。后来，他去了汉斯·冯·布卢门塔尔伯爵的领地帕雷茨，与伯爵的儿子一起长大。他生活得非常开心，长大后买下了这块领地。

青年时代，他加入了普鲁士军队，1784年成为中尉，1786年晋升为陆军中校，1790年晋升为上校，参加了1792年至1794年的反法战争。1793年，他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的露易丝结婚。两人相敬如宾，深受普鲁士臣民爱戴。

1797年11月6日，腓特烈·威廉三世登基。在位期间，他削减王室开支，解散了腓特烈·威廉二世时期的幕僚，改革了腓特烈·威廉二世时期的高压政策。

拿破仑战争初期，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保持中立，没有加入1805年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后来，受到王后影响，他于1806年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军几乎覆没。拿破仑占领柏林，王室成员逃往东普鲁士，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1807年6月法军占领整个普鲁士。7月9日，普鲁士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向法国割地、赔款，割让其在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第二次与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

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

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惨败后，普鲁士的重臣卡尔·施泰因、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以及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等人开始推行改革，改组政府机构，改革普鲁士军队。

1812年，普鲁士与法国结盟入侵俄国。1813年，法国在俄国战败，普鲁士转而与俄国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0月，莱比锡战役爆发，普鲁士军队发挥决定性作用，大败法军。

拿破仑战争后，腓特烈·威廉三世变得极端保守，不仅没有兑现为普鲁士制定一部宪法的诺言，而且制止立宪运动。腓特烈·威廉三世在位的后二十五年时间里，普鲁士国势渐弱。1840年6月7日，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柏林驾崩，享年六十九岁，其长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

附录8　腓特烈·威廉四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四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长子，1795年生于柏林，1840年至1861年在位，人称“浪漫君王”。

1814年，他参加第六次反法战争。1823年，他与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路多薇卡结婚，婚后生活幸福，但没有子女。

1840年6月，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他属于保守派，但不是暴君，他放宽了父亲统治时期极端保守政策和出版审查制度。他决定制定宪法，但拒绝通过选举建立立法议会。他虽然虔诚地信奉路德教，但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对建筑学及园艺颇感兴趣，出资继续修建科隆大教堂（天主教大教堂）。1844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亲临科隆大教堂竣工仪式，成为第一位进入天主教教堂的普鲁士国王。

1848年，柏林爆发三月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起初决定武力镇压，但在3月9日，他决定撤军，带头进行革命，成立了自由主义政府，召开国民议会，下令起草宪法。后来，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命令军队重新占领柏林。1848年12月，他解散了国民议会。他一度想统一德意志。1849年4月3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授予他德意志皇帝的称号，但他拒绝接受，因为重建神圣罗马帝国才是他的梦想。他尝试成立爱尔福特联盟议会，统一德意志邦国，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邦联之外。然而，俄国与奥地利结盟，开始对付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自知势单力薄，为避免战争，1850年11月29日与奥地利签署《奥

尔米茨条约》，被迫放弃统一德意志的计划。

解散国民议会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并没有恢复官僚统治，他颁布了新宪法，设立了两会制的普鲁士议会，上议院由贵族组成，下议院由民选产生。下议院由所有纳税人选出，但选举资格则基于缴税额，所以不能实现普选。新宪法授予国王任命部长的权力，重建保守的地方议会与州议会，确保了国王操纵行政机构与军队的权力。该制度比1848年以前的制度更为自由，但仍是一个保守的制度，由国王、贵族与军队掌握大权。该宪法直到1918年普鲁士王国被废除后才失效。

1848年革命后，腓特烈·威廉四世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瘫痪，精神失常。1858年，他的弟弟威廉出任摄政王，直至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

附录9　威廉一世小传

威廉一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二子，腓特烈·威廉四世之弟，1797年生于柏林，1861年至1888年在位。

179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祖父腓特烈·威廉二世驾崩，随后，其父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威廉一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二子，本不该继位，因此所受教育不多。1801年到1809年，他同哥哥（未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时跟随约翰·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德尔布吕克学习。1814年，威廉一世入伍，参加了反法战争。因在战争中表现英勇，他晋升为上尉，并获得铁十字勋章。1815年，威廉一世晋升为少校。在滑铁卢战役中，威廉一世效命于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元帅麾下。1815年后，他开始从事外交活动，成为一名外交官。

1826年，他被迫与波兰公主艾丽萨·拉齐维尔断绝关系，因为父亲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同意他们结合。据说，他们有一个私生女，由他人抚养。1829年，他与萨克森-魏玛-艾泽纳赫公国卡尔·弗里德里希大公之女奥古斯塔结婚。他们的婚姻表面上十分稳定，实际上并不幸福。

1840年，威廉一世的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子嗣，所以他成为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1848年革命期间，他成功粉碎了针对其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变。因为他使用了加农炮，所以不受臣民欢迎，得到“霰弹亲王”的绰号。他不得不乔装改扮成商人，逃往英国。回国后，他指挥普鲁士陆军，平定了巴登起义。1849年，他出任莱茵兰和韦斯伐利亚总督。1854年，他升任陆军元

帅兼美因茨联邦要塞总督。

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精神失常，无法料理国事。1858年，他担任摄政王。他不顾兄长的反对，宣誓就职，承诺维护宪法的权威。尽管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问题上与自由党意见相左，但仍任命自由党成员卡尔·安东·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为首相，开启了普鲁士发展的“新纪元”。

1861年1月2日，腓特烈·威廉四世驾崩，他登基，称“威廉一世”。7月，来自莱比锡的一名学生企图暗杀他。幸运的是，他仅受轻伤。10月18日，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时，威廉一世在柯尼斯堡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自1701年普鲁士建国以来普鲁士国王的首次加冕仪式。

威廉一世与议会不和，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与腓特烈·威廉四世相比，威廉一世较少干涉议会。1862年，议会拒绝增加用于军队改革的军事预算。军事改革包括将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从十五万增加至二十万，将每年的新兵人数从四万增加至六万三千。然而，当时争议最大的是继续推行1856年开始实行的三年制兵役，这遭到议会否决。威廉一世一度想退位，但遭到他的儿子（腓特烈王储）反对。后来，威廉一世接受了阿尔布雷特·冯·罗恩的建议，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推行铁血政策。按照普鲁士宪法，首相只对国王负责，不听命于议会。



威廉一世在柯尼斯堡的一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

俾斯麦是保守的容克贵族，威廉一世忠实的朋友。虽然他与威廉一世是臣子与君主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掌握着普鲁士内政和外交的实权。他与威廉一世的政见数次不和，扬言辞职。最后，威廉一世妥协，并好言慰留。

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威廉一世任普鲁士陆军总司令。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后，威廉一世想继续进军维也纳，但俾斯麦和腓特烈王储意欲与奥地利和解。他们企图说服威廉一世放弃进攻计划。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俾斯麦说如果威廉一世不同意，他就辞职。最终，俾斯麦取得胜利。

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威廉一世出任北德意志邦联军队司令。威廉一世与南德意志邦联签订协议，约定一旦与别国交战，将由威廉一世统领南德意志邦联的军队。1870年普法战争中，威廉一世在色当战役中统领南、北德意志邦联的军队。后来，南德意志邦联加入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德意志帝国，将德意志邦联主席改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新宪法于1871年1月1日生效。

然而，威廉一世担心新宪法中德意志皇帝的尊号会使之前普鲁士国王的头衔黯然失色，就迟迟不肯接受德意志皇帝的尊号。威廉一世想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俾斯麦劝谏道，这会引发南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抗议。随后，威廉一世勉强同意接受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尊号。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称帝，行加冕礼。1872年，英国与美国的边界纠纷中，威廉一世担任仲裁。最后，圣胡安群岛划归美国，英美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领土争端。

俾斯麦在回忆录里写道，威廉一世是一位传统、谦恭、彬彬有礼的绅士，名副其实的普鲁士军官，但有些判断偶尔会被“妇人之仁”所影响。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首相俾斯麦，只负责审批俾斯麦的政策，而他成了国家尊严的象征。

1878年5月11日，埃米尔·马克斯·霍黛尔企图刺杀威廉一世，但以失败告终。当时，威廉一世和他的女儿乘坐马出行。霍黛尔向八十一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开枪，但没有击中。霍黛尔穿过大街逃窜时再次向威廉一世开枪，又没有击中。混乱之中，一个抓捕霍黛尔的人受了严重内伤，两天后死去。霍黛尔被捕，被判处死刑。同年6月2日，威廉一世再次遭到刺杀，并受了重伤。刺客卡尔·诺比林随后企图开枪自尽，三个月后死于自杀时的枪伤。

尽管霍黛尔被社会民主党开除，但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以刺杀事件为借口制订了《反社会主义法》。《反社会主义法》旨在打击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人阶级运动，取缔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刊物被停刊，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不被允许发表，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反社会主义法》的内容每两三年增加一次。尽管受到报复，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继续扩大。迫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1890年10月1日《反社会主义法》被废除。

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信给威廉一世，抱怨柏林无视俄国

的利益。为此，威廉一世不顾俾斯麦反对，携妻子和儿子前往俄国，与亚历山大二世当面会谈，目的是改善两国关系。俾斯麦再次以辞职相威胁，并不顾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结盟。1878年10月，威廉一世同意与奥地利结盟，共抗俄国。

1883年9月18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刺杀威廉一世。但天气潮湿，炸药无法引燃，刺杀再次失败。尽管多次遭到刺杀，并且因在1848年镇压起义时使用了加农炮而不受欢迎，但大多数时候，威廉一世和他的妻子还是非常受臣民爱戴的。尤其到了晚年。很多人视他们为“旧普鲁士”的化身，喜欢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在柏林病逝，享年九十一岁，其子腓特烈三世继位。

附录10　腓特烈三世小传

腓特烈三世是威廉一世的独子，1831年生于波茨坦，1861年被立为王储，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皇位继承人，1888年3月9日至6月5日在位。因为在位仅九十九天，所以他被称为“百日皇帝”。

腓特烈三世的母亲在萨克森-魏玛-艾泽纳赫公国较为民主、自由的氛围下长大，信奉自由主义。但威廉一世在霍亨索伦家族尚武思想的影响下长大。因此，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在这样的氛围中，腓特烈三世度过了煎熬的童年。他成长在一个政治极其动荡的时代，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获得百姓的热情支持。自由主义者试图维护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创建议会，制定宪法。

腓特烈三世天资聪颖，童年时期曾学习英语、法语、历史、地理、物理、音乐、宗教，尤其擅长体操。十岁时他就担任第一步兵警卫团少尉，并被授予黑鹰勋章。他本该积极参与军队事务，但十八岁那年，他打破了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就读于波恩大学，学习历史、法律、管理及公共政策，成为第一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鲁士王储。

1858年，他与英国维多利亚公主结为夫妇。维多利亚公主是自由主义者。腓特烈三世虽然在尚武主义家庭背景下长大，但由于波恩大学的学习经历以及在英国的经历，所以也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为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寻求话语权，反对父亲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为首相，公开与俾斯麦为敌，谴责俾斯麦限制出版自由等政策。威廉一世为此十分恼火，并斥责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主张使用和平手段统一德意志，并不赞成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威廉一世执政期间，腓特烈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因此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他监督德意志邦联总司令和他的参谋，机智地处理了二人之间的争论。普奥联军打败丹麦军队，占领日德兰半岛南部。战后，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引发了普奥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兄弟相残，所以不主张通过战争来统一德意志。然而，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获得蓝马克斯勋章。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率领第三集团军，取得维森堡之战及沃尔特岛之战的胜利。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大业，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首位皇帝。

1888年3月，威廉一世驾崩，腓特烈三世登基。他决心改革行政部门，由内阁取代对皇帝负责的首相的权力，认为内阁成员应对国会负责，由内阁制定政府政策。然而，1887年5月他就患上喉癌，病痛使他有心无力。1888年6月5日，腓特烈三世驾崩，享年五十七岁。

附录11　普鲁士大事年表

1740年　腓特烈·威廉一世驾崩，腓特烈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

1740年至1742年　经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腓特烈二世占领西里西亚

1744年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

1745年6月　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

1745年12月　签订《德累斯顿和约》，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

1750年至1753年　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柏林

1756年1月　腓特烈二世与英王乔治二世签订《威斯敏斯特条约》

1756年至1763年　普鲁士参加七年战争

1758年10月　腓特烈二世的姐姐维尔哈米娜去世

1760年8月　普鲁士在里格尼茨打败奥地利

1762年1月　沙皇彼得三世帮助普鲁士作战

1763年2月　《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七年战争结束

1772年　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8年至1779年　普鲁士参加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1785年7月　组建由德意志邦联，抵制奥地利扩张

1786年8月　腓特烈二世驾崩，其侄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

1787年　镇压荷兰起义，帮助威廉五世复辟

1790年　参加俄国、奥地利对抗土耳其的战争

1791年　腓特烈·威廉二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会晤，发表《皮尔尼茨宣言》

1792年2月　与比利时缔结第一次反法同盟

1793年1月　与俄国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条约

1795年4月　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签定《巴塞尔和约》

1795年10月　俄、普、奥三国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条约

1797年11月　腓特烈·威廉二世驾崩，其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继承王位

1806年　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

1806年10月　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鲁士几乎全军覆没

1807年7月　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

1807年10月　普鲁士公布废除农奴制的《10月敕令》

1810年　洪堡创办柏林大学

1812年　与法国结盟入侵俄国

1813年　与俄国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

1813年10月　取得莱比锡战役胜利

1815年　拿破仑战败，英、俄、普、奥四国结盟，普鲁士、奥地利崛起，根据维也纳会议组成德意志邦联

1835年　第一条铁路在纽伦堡与菲尔特之间通车

1840年　腓特烈·威廉三世驾崩，其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

1848年　柏林爆发三月革命

1850年11月　签署《奥尔米茨条约》

1857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瘫痪，精神失常

1858年至1861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弟弟威廉出任摄政王

1861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其弟弟威廉一世继位

1862年　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加快了德意志统一步伐

1864年　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

1866年　普奥战争

1867年　建立北德意志邦联

1870年至1871年　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兼并了南德意志邦联，统一了德国

1871年1月　威廉一世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位皇帝

1888年3月　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三世继承王位

1888年6月　腓特烈三世因喉癌驾崩。威廉二世继位

1890年3月　威廉二世辞退俾斯麦

1898年10月　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1905年3月　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

1905年3月至1906年5月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1911年7月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1914年6月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年9月5日至12日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

1916年　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

1918年7月15日至8月6日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918年11月3日　基尔港水兵起义

1918年11月9日　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帝国灭亡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Royal Commission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Lord Hartington	哈廷顿勋爵
Prussian General Staff	普鲁士总参谋部
Count Moltke	毛奇伯爵
Chief of Staff	总参谋长
Commander-in-Chief	总司令
Army Head-quaters Staff	英国陆军总参谋部
Grand General Staff of Germany Army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
Hartington Commission	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
Intelligence and Mobilization Departments	情报与动员部门
Adjutant-General	副官
Quarter-Master-General	军需官
Duke of Cambridge	剑桥公爵
Lord Wolseley	沃尔斯利勋爵
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
Minister of War	陆军大臣
War Office	陆军部
Select Committee	特别委员会
Giant Mountains	克尔科诺谢山
King William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Nothern Bohemian	北波希米亚

Diet of Germanic Confederation	德意志联邦议会
Elbe	易北河
Precis of Modern Tactics	《现代战术摘要》
Discipline Act	《惩戒法案》
Ordance Department	军械部
Lion Inn	雄狮酒店
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家族
War School for Offices	高级军官学校
War Academy	军事学院
National Survey	国家测量局
Battle of Waterloo	滑铁卢战役
Order of Service	《工作制度》
Order of Teaching	《教学制度》
Capitulation of Langensalza	《巴特朗根萨尔察协议》
The Academy	《论军事学院》
Revue Militaire de l'Etranger	《国外军事期刊》
Imperial Defence	《帝国的防御》
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格哈特·列伯莱希特·冯·布吕歇尔
Scharnhorst	沙恩霍斯特
Gneisenau	格奈瑟瑙
Carl von Clausewitz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Muffling	卡尔·冯·米夫林
Antoine Henri Jomini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
Wilhelm von Krauseneck	威廉·冯·克劳泽内克
Karl von Reyher	卡尔·冯·赖赫尔将军
von Voigts Rhetz	冯·福伊格茨-雷茨
Boguslawski	博古斯拉夫斯基
Robert Home	罗伯特·霍姆
Frederick Sleigh Roberts	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
Arthur Balfour	亚瑟·贝尔福

Layman	雷曼
Tellenbach	特伦巴赫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	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
von Scherff	冯·舍尔夫
Wilhelm von Humboldt	威廉·冯·洪堡
Stein	施泰因
O'Commor Morris	奥康纳·莫里斯
Benedek	贝内德克
von Blumenth	冯·布卢门塔尔
Major-General Brackenbury	布兰肯博里少将
Charles Macgregor	查理·麦格雷戈爵士
Malborough	马尔伯勒
Napoleon	拿破仑
Charles Dilke	查理·笛尔克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Prince Frederick Charles	腓特烈·查理亲王
Crown Prince	腓特烈王储
King Milan	国王米兰
Koniggratz	克尼格雷茨
Horsitz	霍斯兹
Milowitz	米洛维兹
Cerekwitz	斯勒克维兹
Zabres	赞布勒斯
Gr.Trotin	格托丁
Gr.Burglitz	格布格里茨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Wetzlar	韦茨拉尔
Sardinia	撒丁王国
Buagarians	保加利亚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Prussian Saxony	普属萨克森
Posen	波森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Rhenish Prussia	莱茵省
Gorlitz	格尔利茨
Breslau	布雷斯劳
Schweidnitz	希维德尼察
Zeitz	蔡茨
Halle	哈雷
Hertzberg	赫茨伯格
Neisse	尼斯
Landshut	兰茨胡特
Waldenburg	瓦尔登堡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Torgad	托尔盖德
Cottbus	科特布斯
Hoyerswerda	霍耶斯韦达
Lusatia	卢萨蒂亚
Sadowa	萨多瓦
Gorlitz	格尔利茨
Kohlfurt	克霍弗特
Moravia	摩拉维亚
Torgau	托尔高
Dresden	德累斯顿
Bistritz	比斯特里察
Horsitz	霍斯兹
Cerekwitz	斯勒克维兹
Pschanek	皮斯坎尼科

Briskan	布瑞斯克
Gutwasser	格特沃瑟
Clum	克鲁姆
Gitschin	伊钦
Hanover	汉诺威
Hesse	黑森
Bavaria	巴伐利亚
Wurttemberg	符腾堡
Simla	西姆拉
Kamenitz	卡梅涅茨
Leipzig	莱比锡
Spandau	施潘道